历代王朝的衰亡

（共5册）

王朝的终结
大清帝国的衰亡
金满楼 著

王朝的终结
大明帝国的衰亡
夏维中 著

王朝的终结
大宋帝国的衰亡
赵益 著

王朝的终结
大唐帝国的衰亡
赵益 著

王朝的终结
大汉帝国的衰亡
徐兴无 著

王朝的终结
丛书

大汉帝国的衰亡

白日薄西山



徐兴无 著

大汉帝国

社会阶层固化，寒门子弟上升无门，战争真的能将士族和寒门转换？
外戚和宦官轮流擅权，地方豪族势力又一天天膨胀，

是谁搞乱了汉朝天下？

江苏人民出版社


熊猫君激发个人成长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历代王朝的衰亡
(共5册)
王朝的终结
丛书
大汉帝国的衰亡
白日薄西山
徐兴无 著
大汉帝国
社会阶层固化，寒门子弟上升无门，战争真的能将士族和寒门转换？
外戚和宦官轮流擅权，地方豪族势力又一天天膨胀，
是谁搞乱了汉朝天下？
江苏人民出版社
大唐帝国的衰亡
大宋帝国的衰亡
大明帝国的衰亡
大清帝国的衰亡


熊猫君激发个人成长

总目录

白日薄西山：大汉帝国的衰亡
景山的晚风：大明帝国的衰亡
日落九世纪：大唐帝国的衰亡
西风凋碧树：大宋帝国的衰亡

王朝的终结丛书

大汉帝国的衰亡

白日薄西山



徐兴无 著

大汉帝国

社会阶层固化，寒门子弟上升无门，战争真的能将士族和寒门转换？
外戚和宦官轮流擅权，地方豪族势力又一天天膨胀，

是谁搞乱了汉朝天下？

江苏人民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白日薄西山:大汉帝国的衰亡

作者：徐兴无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6-01

ISBN：978721418467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总序
第一章 孝灵皇帝
　　享国最久的帝国
　　占星术的失误
　　孤儿、天子、母后
　　士大夫与宦官
　　北宫政变
第二章 大放逐
　　被出卖的将军
　　御座上的青蛇
　　党人与太学生
　　李校尉与郭处士
　　党狱
　　黑暗中的对话
第三章 风雨如晦
　　胡太傅
　　李太尉
　　段将军
　　蔡议郎
　　鸿都门学
　　酷吏
　　鲤鱼腹中书
　　卖官鬻爵
　　法治的失败
　　屠夫的女儿成为皇后
　　焦尾琴
第四章 太平道
　　难民的幻觉
　　岁在甲子
　　大赦
　　战场
　　五斗米道
　　机变与隐患
第五章 烽火狼烟
　　凉州

两都赋
夷夏之分
羌族史诗
羌乱
鹰犬与豺狼
第六章 北邙山
天子的发明
州牧与校尉
大行皇帝
大将军
引狼入室
黑夜暗流
董卓进京
天子别姬
第七章 东京西京
军阀
关东联军
天子西迁
曹操奋一军之勇
西蜀割据
荆州割据
辽东割据
江东英雄
冀、幽争夺战
刺杀董卓
第八章 蒿里行
蔡邕之死
南行的诗人
长安变局
青州黄巾
屯田令
赵太仆
孙策据有江东
死里逃生
天子还都
易京楼
代汉者当涂高
挟天子以令诸侯
蒿里行
第九章 日蚀苍黄

征讨袁术
排除异己
兵不厌诈
绞杀吕布
逐鹿中原
煮酒论英雄
官渡之战
梦兆龙蛇
攻克邺城
东临碣石有遗篇
三顾茅庐
丞相专制
赤壁之战
平定凉州
天下三分
皇帝与编年史
文姬归汉
禅让
第十章 遗响
天下大势
墓穴诅咒
附录 东汉帝王列表
初版后记

总序

关注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何在？西方史学家一直推崇公元前二世纪时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话："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而考古学证明，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商代，中国人就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时的史官们不仅要记录发生了的事件，还要预测将要发生的事件。他们选择龟甲来刻写卜辞，因为龟具有长久的寿命，见证过历史的沧桑，所以能够暗示未来的吉凶。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也是文明延续性最强的民族国家，很大的原因在于这个民族强烈的历史意识，使他们一旦遇到重要的选择，便首先去翻阅史书。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某个王朝一旦出现衰亡的征兆，上天和民众马上会抛弃它，将它变成新兴王朝的历史收藏，以供取资。《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记载夏桀迷惑暴乱，太史令终古便出奔投商。而当商纣王迷惑暴乱之际，内史向挚也"载其图法，出亡之周"。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官似乎有着一种自觉的意识：让历史永远服务于未来。

什么是重大事件？古代史书中记录的重大事件大多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中最大的又莫过于改朝换代，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兴亡"。而中国人讨论"亡"似乎更有甚于"兴"。古代中国在战国秦汉之际发生过最为重大的转折。此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享国超过五六百年甚至达八百年的氏族王国，但这样的国家毕竟是联盟式的松散政体。而经过战国秦汉的历史实践过程完成、确立的郡县制国家，才是统一的领土国家和全民国家。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国家体制如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起算，至清帝逊位的1911年，延续了2132年。其间有过二十多个统一或分裂；汉族或少数民族的王朝，但都奉行了郡县制度，因此我们不妨将他们视作一个中华帝国的不同届次的

政府。只是这些政府的任期与更换方式与近现代国家不同而已。而他们开辟的国土、传成的民族，创造的文化、锻造的性格大都被近现代的中国人继承了下来。

汉、唐、宋、明、清是中华帝国任期最长的五大王朝，这些国祚久长，创造过盛世的王朝，其衰亡更加具有历史意味。我们发现，尽管它们的灭亡各有原因，但有两个方面是相同的，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其一是这五个王朝的灭亡形式囊括了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两种形式：来自内部的分裂与来自外部的挑战。汉、唐亡于内；宋、明亡于外；清朝有些例外，其外部的挑战来自于新的时代与新的世界。当然，他们的灭亡都是内忧加外患，销磨积弊多年，才导致一个最终解决的方式。其二是这五个王朝由于制度的优越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就，没有一个王朝是毁于一旦的。他们的代替者或是受其抚育的臣民，或是受其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除了清朝，其他四个王朝的代替者无一不以他们的继任者自居，进行政治改革并修撰前任王朝的国史。就清朝而言，最后的革命是由于改良政治的失败而导致的。这一点，与夏、商、周、秦、汉之间的推翻暴政，解民于水火式的革命很不一样。因此，汉、唐、宋、明、清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是最为丰富的，而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也是最为深刻的。它们是历史遗产最丰富的王朝。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套讨论兴亡的丛书只是历史通俗读物而不是学术著作，是三个大学文史专业教师不务正业的少作和一位作家对历史的演绎，代表着他们的文字趣味与历史见识，这次再版作了少许的修订。他们的目的只是用现代散文话语营构一个历史阅读场景，其中只有情节、人物、议论而不是在阐述历史的规律和理论，叙述与议论各有不同的视角，对历史的看法和文风也不尽统一。但他们相信，在这个全球风云变幻、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会有更多的国人想要了解我们的过去，关注我们的未来。正如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所言：“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惟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如果这套文字通俗但又不是戏说的丛书能够感发人们对国史的兴趣，便满足了他们的心愿。

徐兴无

2016年5月于南京大学

第一章
孝灵皇帝

行行重行行，白日薄西山。

——汉末民谣

享国最久的帝国

冬天，是死亡的季节，夕阳透着惨白，沉沦于西山。

孝桓皇帝永康元年（167）的冬天，是本朝世祖光武皇帝中兴以来的第一百四十三个冬天，大统延嗣了十一位君主。倘若上溯到高皇帝开辟大汉基业的那一年，这便是第三百七十个冬天了，大统之中，也得再上溯十三位君主。

对于一个帝国来说，单凭这样的年龄，就足以在历史学家的笔下赢得美好的声誉。这不仅是对在本朝之前只有十五年的秦帝国而言，就是对直至公元1911年的中华帝国历朝历代而言，本朝也是享国最久的帝国。事实上，在史学家的心目中，能和本朝共享最高荣誉的帝国，仅仅是七世纪到十世纪的大唐帝国而已。本朝的国号“汉”，成了所有中国人的代称。

当然，久盛必衰，是中国哲学中丝毫不用证明的道理。先哲云：“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老子》）因而本朝的灭亡也在所难免。可是，对于每一个生活在本朝现实中的人来说，偌大一个帝国的衰亡，决非是一件人人都能承受得起的事件。

占星术的失误

二百多年前，占星家们就预言本朝的灭亡了。那是在汉武帝崩后，刚刚达到极盛的王朝，因为和匈奴连年开战，又陷入了困顿之中，民间便开始怀疑朝廷的气数。有位叫路温舒的方士，从小跟他的祖父学天文历算之学，认为汉家有“三七之厄”，也就是说，汉家的天命只有三七的乘数，即二百一十年。宣帝朝，他做到了临淮太守，便

向朝廷上了道密奏，汉家叫“封事”，将他的预言备案以为警戒。到了成帝朝，因为孝成皇帝的性欲很强，经常在后妃怀孕时行房事，导致多次流产，所以一直没有皇子诞生，朝廷的统嗣出现了危机。此时，另一位叫谷永的文士再次提起这个预言。汉家的天子们对这些警告充耳不闻，但孝成皇帝的母亲也就是皇太后的一位娘家侄子王莽却铭记在心，他不仅要利用这一预言，而且刻意要使预言兑现。孝平皇帝元始五年（5）冬天，在安汉公王莽的安排下，平帝开始生病，到十二月的一天，安汉公又安排了平帝驾崩归西。这一天，大汉帝国的年寿恰满二百一十岁。

预言实现之后，安汉公便成立了一个国号叫“新”的王朝，自己做了天子。但他谋杀汉家天子的事引发了地方大臣和民众的起义，人们似乎还是期望做大汉的臣民，于是，王莽的帝国几乎同秦帝国一样的短命。大汉帝国在世祖光武皇帝的手中得以光复，起死回生。史家郑重地将世祖以前的朝代叫作“前汉”，将世祖光复的朝代叫作“后汉”。至今，人们谈起世祖光武皇帝带兵收复长安时的情景，仍是绘声绘色，仿佛目睹亲历：

世祖光武皇帝和他的部下们穿戴整齐，大冠、宽衣、博带，朴素中显出无与伦比的高贵与庄重。那些年迈的前朝官吏们恭候在道边，流着眼泪庆贺道：“没想到今天又见到汉官威仪！”

时至今日，占星家们似乎不再公布耸人听闻的政治预言了，因此，永康元年的冬天，就被他们粗心地放过。可是，一切关心本朝命运的官吏和人民，都感受到了异样的寒冷。事实上，后代的历史学家们正是把这个冬天，当成了我们大汉帝国的最后一个季节，当作本朝寿终正寝倒计时的开始。

孤儿、天子、母后

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八丁丑日，本朝帝都洛阳城中那座最大的宫殿，笼罩在不祥的氛围之中。不久，京城的吏民都被告知：天子崩于

德阳殿。

有一个事实，是让任何朝代的吏民们都难以接受的，那就是天子年仅三十六岁。不过，对于本朝的吏民来说，已经不以为怪了。本朝列祖列宗皆不永年：世祖光武皇帝年六十二，孝明皇帝年四十八，孝章皇帝年三十三，孝和皇帝年二十，殇帝年仅二岁，孝安皇帝年三十二，孝顺皇帝年三十，冲帝年仅三岁，质帝年仅九岁。这些天子向世人显示着血脉基因的退化，此乃天命，非人力所能为也。

按照惯例，臣下们必须用道德的标准评价这位刚刚宾天的天子，为他上一个谥号。天子太年轻了。他十五岁登基，可直到他三十岁时，才从不可一世的大将军梁冀手中收回大政。然而，由他做主的六年，同样使人失望。

对此，天子生前不是没有自知之明。在他三十一岁那一年，有一天，为了不使臣下惊慌失措，他故意作出放松的姿态询问近侍大臣爰延："依卿看来，朕是什么样的君主？"

爰延答道："和我们大汉的列祖列宗相比，陛下算是位中等的君主。"

汉家的吏民品评事物，喜欢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中还可再细分上、中、下三等，共为九等，或称九品。在本朝最伟大的史家班孟坚的著作《汉书》里，便将自有人类以来的历史人物依九品等第评论了一番。中等的人物，是在圣人之下，不肖小人之上的平常人。爰延的意思是说：像陛下这样的君主，自己不可能有所作为。如果被贤臣辅佐，天下就会大治；如果被小人包围，天下就会大乱。这个评价直切而不落阿谀之嫌，可更多的还是对天子的期望。天子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为此，他升迁了爰延的官职。

即使充当一位中等的君主，他还是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精力更多地耗费在下等君主们常常关注的那些事情上了。史书记载他惟一过人的才赋是"好音乐，善琴笙"，这是史家指责他喜好声色的委婉叙述。他还被描写成是个有异端思想的皇帝，他破天荒地在宫廷中为佛教的祖师释迦牟尼和道家的祖师老子设立了祭坛。这一点，不仅违

背了本朝以儒家学说为政教大纲的原则，而且，这两种信仰都具有的清心寡欲的教条，还被他的臣下们信手拈来，作为指责他好色的矛头，令他陷入尴尬的境地。事实上，他的短寿正是由于他的信仰没有能够战胜他的欲望。

臣下们最终还是选择了一个“桓”字作为他的谥号，这是个不坏的称呼。“桓”有“大”的含义，按谥法：“辟土服远谓之桓”，在此之前，只有春秋战国的诸侯霸主们如齐桓公等拥有过这样的名号。这是因为近年来惟一值得提起的政绩是：本朝在与周边民族，特别是与西北羌族的冲突中，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

和前汉的孝成皇帝一样，孝桓皇帝生前有很多女人，但也没有子嗣。

这又是一件令人头痛，而在本朝却见怪不怪的事。本朝的列祖列宗不仅年寿不长，而且生育能力不强。由嫡长子承继大统的制度，在本朝难以贯彻。孝殇皇帝以出生一百多天的婴儿承继其父孝和皇帝的大统，不满七个月就夭折崩殂，大统旁落到他的叔父孝安皇帝身上。此后的孝顺皇帝是孝安皇帝的独生子，而这条微弱的血脉又以一个年仅两岁的幼主登基、不满五个月便又崩殂的形式中断了，这便是孝冲皇帝。此时，皇室中已无储君，只得从藩王中遴选。以后的孝质皇帝以及眼下这位刚刚宾天的孝桓皇帝，都是以外藩的身分入继大统的。

未来的新帝只能产生于藩王之中，似乎，这已成了惯例；仿佛，这又是天命。一切的一切，皆非人力所能为也。

国不可一日无君，正如天不可久阴。新帝的拥立，已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按本朝的礼法，大行皇帝的葬礼，要在新帝即位后举行，此间，诸位大臣们仍循旧政，事侍死如生。可是，天子驾崩毕竟给人带来不安，对朝官来说，最担心的是将来的人事变更，以及朝纲的因革。本朝的政治从来是朋党纷争，瓜葛纠缠，险象环生，一言难尽。故而在此期间，中枢机构的诸多大臣竟托病不朝，这引起了太尉陈蕃的担忧，他给这些机构递去了一封公开信，指责道：“古人立节，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床，于义安乎？”

以太尉的资历、耿直与威望，这封信让大家感到无地自容，纷纷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同时，拥立新帝的行动已经开始。

这一年，汉河间国解渎亭侯刘宏才十二岁。如此年纪便领侯爵，并非由于他的早熟，或是在政治、道德上有什么超常的成就，而是表明：他是个失怙的少年。他的爵位袭自他的父亲——已故汉解渎亭侯刘苌。十二岁的侯王，对事情的理解只能是朦朦胧胧的。他可能知道，刚刚驾崩的天子是自己的堂叔父，他们来自一个共同的先祖，即孝章皇帝之子、汉河间王刘开，但他决不可能知道，天命竟然转移到了他的身上。直到从洛阳来的马队、仪仗簇拥着一辆白盖马车来到他的府第；直到朝中侍御史、光禄大夫刘儵、中常侍曹节，拿着朝廷的符节，一起向他行大礼时，他似乎才明白了。

接着，光禄大夫向他宣读了以太后的名义发布的诏书：

> 大行皇帝德配天地，光照上下。不获胤嗣之祚，早弃万国。朕忧心摧伤，追览前代法：王后无适，即择贤近亲。考德叙才，莫若解渎亭侯宏，年十二，嶷然有周成之质。春秋之义，为人后者为之子，其以宏为大行皇帝嗣。使光禄大夫刘儵持节之国奉迎。

这支由黄门宦官、禁军虎贲、羽林组成的上千人的车驾队伍，从洛阳向东北方向的河间国封地进发，要走八百多里地，但他们来得很快，几乎与天子驾崩的讣告相接踵。当这支队伍出现在河间境内时，使得许多略上年纪的百姓，仿佛又看到了二十一年前，同样的车驾来此迎接孝桓皇帝时的情景，至今三尺童子尚会吟诵当年的歌谣：“车班班，入河间。”河间王的家族，竟然连出两位天子！这便是天命！

车驾离开得也很匆忙。天子以十二月丁丑日驾崩，而迎驾的队伍已于次年正月初三己亥日抵达洛阳，先后不到一个月。

新天子的母亲姓董，河间人，史书不载其名。此时，尽管她的儿子成了人君，但她却没有被允许随子进京。当儿子登临大宝之后，她也没有得到企望中的待遇，而是仅仅被封为“慎园贵人”。就这，还是沾了亡夫的光，因为新天子即位后，按本朝尊崇孝道的准则，追尊自己的生父为“孝仁皇”，陵墓为“慎陵”。所以，她被册封为一位已故天子的贵妃。

这一点，以新天子当时的年龄，不会懂得个中原委；但对一个十二岁而又失去父亲的孩子来说，做了天子却必须离开他的母亲，真让他迷惘或者难过。即使在他成年以后，也会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夺情的事。当然，他也明白了真正的原因，那就是决定自己入继大统的绝非天命，绝非自己有什么“周成之质”，而是孝桓皇帝的遗孀窦太后，以及她的势力集团。太后之所以在诸多的宗室藩王中选择了自己，绝非她的情感天平倾向于亡夫的家族，而是看中了自己当时的年龄。太后要做自己的母亲，并且希望自己永远是个孩子。

簇拥着白盖车的队伍在凛冽的寒风中抵达京城北门外的夏门亭。前城门校尉、槐里侯，现拜大将军、窦太后之父窦武，持节率朝官恭候在此。窦武对新天子的拥戴之功，可能刘儵已在路上禀报过了：“正是大将军，在孝桓皇帝驾崩之后，立即召见了臣下，因臣下是河间人，向臣下询问了河间国诸王侯的情况，决定由陛下入继大统，并亲自进宫奏白太后。”

大将军率群臣向储君行了礼，刘宏也在光禄大夫的引导下向大将军及群臣们长揖还礼。看上去，大将军是个很有威仪和修养的中年人，令储君敬畏。随后，大将军请储君换乘。这是一驾青盖马车，“青”，是苍天的颜色，本朝的宪法上写着：“天子父天母地”。就这样，昊昊苍天笼罩着储君，从帝都的北门——夏门进入了北宫。

次日，于德阳殿即皇帝位，改元“建宁”。这位新天子百年之后，被谥为“孝灵皇帝”，按史家的惯例，不妨即可称之为“灵帝”。

太后姓窦名妙，可这个动人的名字从未打动过她的亡夫，而且，就在半个多月前，这个名字使得她的亡夫留下的其他嫔妃们感到大势不妙，魂飞魄散。

太后的家族，是本朝最高贵的家族之一。她的先祖窦融历任世祖光武皇帝朝的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冀州牧、大司空，封安丰侯，也是本朝的开国元勋。王莽之末，群雄并起，窦融作为割据河西走廊这一军事重地的豪强和军事首领，及时地交通并归附了世祖，从而使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倾斜。因而，世祖对他的态度一直右于其他公卿。他与世祖的联合，还基于另一个更为神圣而遥远的原因，他的七

世祖窦广国就是前汉孝文皇后的胞弟。因此他对世祖说：作为汉室的外戚，理应辅佐皇族的事业。这一点，深得世祖的嘉许，并将《太史公书》中的《外戚世家》赠给了他，因而窦氏家族再次与本朝的皇室续上了姻亲关系，除了眼下这位太后出自窦氏之外，本朝孝章皇帝的皇后也出自这个家族。

本朝皇后的册立，大多根据天子的喜好和嫔妃们的懿德，或者是纯粹生物学的因素，即被立为皇后的嫔妃给天子生下了储君。这与高皇帝开辟的前汉大不相同。高皇帝以布衣庶民，提三尺剑，马上征战而得天下。他和他的开国大臣的体内流着爱吃狗肉的村夫野民的血，从来就不相信王侯将相都是天生的贵种。因此高皇帝以下的列祖列宗们的皇后大多来自下级官吏或平民百姓之家，甚至是贱隶倡优。其立废皆由天意。即如这位窦太后的远祖窦广国，以及他的姐姐、孝文皇帝的太后，因为家境贫寒，姐弟俩年幼即被人分而出卖。多少年后，窦广国知道姐姐已在深宫，而他自己尚且为人奴仆。姐弟相见，叙及旧事，广国说："姐姐在客店里与我分手时，向人家乞借了澡盆，为我洗了澡。又乞讨饭食喂了我，这才离去。"话语凄凉，姐弟俩及周围的宦官、宫女皆大恸之。

大汉的长期的恩德和文教终于养育出了一大批豪强士族，他们成为大汉的支柱，向上托起天子这个屋顶，向下镇制百姓这个基础。出于大汉皇室旁亲远系的世祖光武皇帝正是依靠了他们，才光复了大汉的基业，当然，也就必须让他们分享到更多的政治利益。其中一个重要的形式，就是本朝的天子有义务从这些家族中选择自己的配偶，并且借此平衡与各大士族，特别是北方与南阳两大士族群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完全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世祖本人是始作俑者，在征战之际，他册立北方士族之女郭圣通为后，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光复以后，世祖为安抚自己故乡的士族，又废郭后而册立来自南阳的阴丽华为后，尽管她已是一个中年妇女。与天子的联姻，是帝国大股东们的股票。这样的股票升值迅速，回报丰厚，但也充满了风险。

窦后的册立，遵循了同样的故事。

孝桓皇帝的第一个皇后梁莹，来自北方的士族，是大将军梁冀在

他十五岁登基那年强加给他的，因为她是大将军的胞妹。史书上说她因为没有子嗣，不见夫君宠御，忧疾而终，这样的说法可能颠倒了因果。不过她的死，给天子铲除大将军提供了时机。事后，官僚们的建议又使他不得不册立了来自南阳士族的邓猛女为后。七年以后，她被指控无子嗣且又恃尊骄忌，贬死于冷宫。窦后作为孝桓皇帝的第三位皇后，是因为她的家族一直是梁大将军家族的死对头。她伴随天子只有两个多年头，从未得到丈夫的宠爱，因而也无子嗣。孝桓皇帝的情感或是欲望，全部倾注在一个叫田圣的妃子和其他风情婉约的嫔妃们的身上，留给她的仅仅是祭品一般的尊贵和寂寞。这一切铸成了报复的利剑，像一切因为缺乏人道的生活而变得异常狠毒的女人一样，她甚至在亡夫刚刚人殓之时，就令人诛杀了田圣，并且扬言要杀死所有的嫔妃。倘若没有几个大宦官的苦苦求情，她的亡夫将会携带更多的心上人同往极乐世界。

面对这样的一位新的母亲并且是尊贵的母后，年少的天子更多地感到敬畏，大概成年以后的天子，还会把这种敬畏变成后怕和胆寒。

士大夫与宦官

登基典礼只是担任天子这一尊爵的第一道手续，灵帝在大臣们的安排下，又办完了其他的手续：二月十三辛酉日，葬孝桓皇帝于宣陵。二十二庚午日，拜谒高皇帝庙。二十三辛未日，拜谒世祖庙。在接受了本朝的传统教育之后，施民以恩惠，宣布大赦天下，赐民爵位及帛物。闰三月十五甲午日，追尊自己的祖父为孝元皇，祖母夏氏为孝元皇后；追尊生父为孝仁皇，封生母董氏为慎园贵人。如此，便将自家的宗法谱系与国家的大统合而为一。这些，只有天子感到游戏般的新鲜，大臣及士民们皆知是惯例。不过，新天子的即位毕竟给本朝的政治带来了希望，特别是与那些对本朝抱有极大责任心的士人，莫不延颈以望太平。

这种希望并不来自天子本人，由于本朝列祖列宗的短寿，很多臣

僚经历过两至三朝乃至四朝，大统延续过程中诸多见怪不怪的事，至少在他们的心中确立了这样的观念：即天子仅仅是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玩偶。太平盛世的希望寄托在本朝的各种势力集团，能否自觉地遵循本朝的祖宗之法，能否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出任宰臣。

希望来自这样的消息：本朝拜前太尉陈蕃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及司徒胡广参录尚书事，并由前长乐卫尉王畅出任司空。

这意味着，朝政又回到了士大夫的手中，因为太傅、大将军、司徒均为本朝尊职，参录尚书事即掌握了本朝的中枢机构、天子的秘书处——尚书台的政务。胡广是一位恭色逊言、明哲保身因而能历数朝的大臣。尽管是个老滑头，但他与各种势力妥协的背后，却是为了坚持本朝的政纲。窦武虽以外戚而登尊位，但其人年少即以学问和德行著称，有名士风范；在位时征辟名士，治家严谨。他与以前的几位大将军，特别是与那位历孝顺、孝质、孝桓三朝、有“跋扈将军”之称的梁冀截然不同。他的品行被士大夫们视为同志，而他的地位又被士大夫们视为依赖。王畅一直是士人的榜样，当初陈太傅举荐他时，给他下了十个字的评语：“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至于陈蕃，则是本朝道德文章的化身、士大夫的领袖、有能力将一个儿皇帝教导成尧舜明君的老师。他的政治主张，是本朝宪法中一切崇高和美好文字的体现。他在实现这些理想的过程中，非常固执、强硬地不与任何势力妥协，这种刚性的政治作风，在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道德和舆论威望的同时，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仇恨与阴谋。这一点，是本朝吏民们对政治清明充满希望的时刻忽视了的一个潜伏的危机。

意识到这个危机的存在，甚至很敏感于这个危机的人并不多。陈蕃的固执与强硬并未使他盲目乐观或刚愎自用，七十多岁的老臣有着超乎常人的宦海经验，他最早注视着危机的发展，注视着他的敌手，并积极地寻找时机。

建宁元年（168）的六月，天子接受了窦太后的懿旨：录定策功。封窦武、曹节等十一人为列侯。大将军家族封侯者最多，其子窦机为渭阳侯；侄子窦绍、窦靖分别为雩侯、西乡侯。他知道，所谓定策功，就是赏赐拥立他为帝的几位大臣及其家族成员。在太后看来，

这是维护窦氏家族地位的重要决策。窦武及其子侄的封侯自是必要；曹节有北迎灵帝之功，封长安乡侯。更重要的是，他在孝桓皇帝时，就已成为宦官首领，是窦氏左右皇帝所要拉拢的人物；而陈蕃则是维持朝纲、笼络士大夫的依靠。此外，太后对陈太傅怀有特别的感激之情，如果没有陈蕃当年坚持以窦氏的高贵门第为立后的根据，孝桓皇帝会将他最心爱的、但出身寒微的女人田圣立为皇后。因此，封陈蕃为高阳乡侯。

灵帝不知道太后的良苦用心，他只是感到在窦武、陈蕃和曹节这三个人当中，惟有曹节给了他这个年龄的人所希望得到的东西，而大将军与陈太傅对他的教训和管束让他敬畏。他从心底里想逃避他们，逃避他们威严的目光，逃避他们无休止的大道理，逃避他们安排的经学功课和礼仪演习。他喜欢和曹节以及王甫、郑飒、奶妈赵娆以及一大帮女尚书们在一起，他们每天都能让自己吃到从未吃过的东西，玩从未玩过的游戏，发自己从不敢发的脾气，说自己从不敢说的话。他想自己的家，想自己的母亲，因而更想从他们这些人身上找到补偿。

灵帝更不知道的是：这次录定策功，竟开启了那个潜伏着的危机。

就在封侯的圣旨下达之后，发生了两件节外生枝的事情。

涿郡有一位名叫卢植的布衣士人向窦武递交了一封书信，信中的言辞非常直切，指出窦武接受侯王之爵是名不符实、贪天功为己有。因为窦氏尽管作为天下聚目而视、延颈以望的宰辅，但定策拥立灵帝这件事并不是依据了立长立贤的立储原则，而是依照皇室的家谱做出的选择，无甚功德值得称言。卢植还以本朝国嗣屡绝、四方盗贼纷起、朝中人事错综复杂等为借口，提醒窦氏保全身名，辞去封赏。

卢植的这封信不亚于一位巫师对诸多危机的预言，可惜的是，大将军没有重视这封信。不久的将来，大将军就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卢植也为挽救他的预言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这是后话了。

卢植作为一个布衣，竟敢向尊贵的大将军直陈言辞，说明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即像卢植这样的士人，不管是在野还是在朝，都不希望

大将军是一个外戚大将军，而应该是一个士大夫大将军。本朝孝殇皇帝以降，皇统屡绝，国柄或归外戚，或归宦官，朝纲紊乱，积重难返。就封赏爵位来说，其道德依据已经丧失，受封者多为外戚、宦官之亲党或通贿权奸的虚诈之徒，故而接受封爵，往往被视为接受了一种耻辱。

眼前的这位大将军虽然和以往的大将军不同，但他毕竟与卢植或其他士大夫的出处不一样了，他有一些与他的太后女儿相同而与士大夫们相左的想法，或者他有更多的考虑，或者他过于自信。

无独有偶的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太傅陈蕃，一连十多道奏章，向太后辞去了爵位，他的理由正大而谦逊。他说："臣闻割地之封，功德是焉。臣虽无素洁之行，窃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若受爵不让，掩而就之，使皇天震怒，灾流下民，于臣之身，亦何所寄！""不以其道得之，不居"，是孔夫子的话，不过陈太傅所说的"道"，却饱含了反讽。

冲突的前提，是阵营的形成，这件节外生枝的事，使得双方都关注起彼此的阵脚。

在一次例行的处理政务会议之后，陈太傅请大将军私下议事。

"大将军，时下大统已继，百废待兴，天下名士，皆思奋其智力。前朝为奸佞所黜贤良，如李膺、杜密、尹勋、刘瑜诸位，现已起用，可谓既从人望，而德归太后，太平之志可申矣！"陈太傅说。

大将军听了连连颔首。

太傅见大将军流露了态度，便将座椅向大将军移近了一点，又说道："曹节、王甫等人，自先帝朝起，就操弄国柄，浊乱海内。如不趁早除之，将来恐难以对付啊！"

窦武听了，向太傅揖拜道：

"太傅有此忠正之言，实乃汉家的福祉。太傅之意，深合我心。"

太傅面露喜色，以手拍席，奋然而起。

大将军的性格和太傅不同，他似乎更加谨慎、持重。但他缺乏果断与刚毅，因而他的谨慎与持重就掺杂了犹豫和迟钝。

他开始一步步地安排实现他与陈太傅商量好的事。在他的办公室里，召开了多次会议，与会者有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以及孝桓皇帝朝被废黜的著名官僚李膺、宗正刘猛、太仆杜密、从事中郎荀昱、颖川名士陈寔等。

外戚与宦官，一直是本朝干扰士大夫行政的力量，孝桓皇帝从大将军梁冀手中收回国柄后，立即交给了宦官们。现在，外戚毕竟与士大夫们合而为一了，他们开始对付共同的敌人。

窦太后是个有远见的女人，她知道依靠自己这个久居禁中的妇道人家，或者手中的儿皇帝，是不能治理好国家的。治理一个国家，光靠权势不行，必须依靠官僚士大夫们。他们熟谙行政的技术过程，明晓君臣大义，尽管有的时候耿直得过于迂腐，一点儿不会察言观色。然而太后又是个典型的女人，好虚荣，喜欢享受权势。这种感觉，只有从她周围的宦官和女尚书们的谄媚中得到。而且，她从来没有意识到这帮同她共同生活于皇宫大内之中的奴仆们，与皇宫之外的帝国各级行政机构中的官僚们，竟然是水火不相容的。

这几个月来，她已经多次在被侍候得舒舒服服的情形下，将爵位、官职当作小玩意一样赏给了几个宦官和皇帝乳母的亲朋好友们。当然，每次封赏都以天子的名义，并在天子的监督下，由掌玺大臣盖上御玺后发布。这个习惯后来被灵帝不折不扣地继承下去，并有所创造。这又是后话。他们都不太明白：这些东西都是国家的重器，对于亲近宠近的奴仆或亲戚，可赏之以财，但决不可授之以爵。

时已八月，洛阳城中秋风萧瑟，凉透单衣。

陈太傅有些等不及了，他是个政治洁癖，希望像扫地一样处理国家的政务。太傅的名望，来自他十五岁时的怪异行为。那时他闲处一室，听任院子里杂草丛生。有一天，父亲的朋友、郡中功曹薛勤来访，见状便对他说：“小子！贵客到此，为何不好好地洒扫庭院？”

“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能扫此一室？”

陈太傅说出了一句永垂青史的豪言。

对于大将军的慎重，太傅有些不解，可能还有些顾虑。他在家中徘徊反侧，想找一个好的借口，敦促大将军早些下手。

忽然，府外的街市上，传来了喧嚣之声，接着，家仆进来报告：天上出现日蚀，百姓们正在祈祷和叫喊，希望驱除吞食太阳的天狗。太傅心中一震，吩咐备车去大将军府。

“日乃阳气，君王之象。月乃阴气，臣下之象。今苍天示以日蚀，当有君侧小人作奸弄权，太傅必为此事而来吧？”大将军一见太傅便急切地问道。

太傅见大将军知晓天道，便直截了当地从人事的角度提醒大将军：

“当初孝元皇帝朝，御史大夫萧望之竟为一个阉人石显所谮，被迫自尽。当今李膺、杜密诸公，曾为阉宦所窘，祸及妻小。何况现在像石显这样的人，不下数十个，为害就在眼前啊！蕃以七十之年，欲为将军除害。今可且因日蚀之事，斥罢宦官，以答天变。此外，乳母赵夫人及诸多女尚书，每天都在太后面前搬弄是非，干扰朝政。急宜退绝，请将军从速计议。”

“太傅请回，武即刻进宫，面陈太后。”大将军窦武答道。

斥罢宦官的理由很简单，在士大夫的眼里，宦官不具备人格，只是天子宫内执帚奉盏的奴隶。君臣之间，有社稷大义可言，真正的臣子应当是社稷之臣，而非天子的私臣。故君对臣不可无礼，臣对君亦可去就，而对宦官则无须如此。可士大夫们有一点不明白，并不是一开始，宦官们就一心一意地与他们过不去，而是被士大夫们用各种制度和礼仪禁锢在大内的那位天子，不时地想把耳目手足伸展到大内之外的更为广阔的天地之中，直接干预士大夫们操纵的行政运行程序。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不倚重身边的这帮残贱之人，天子即便顶天立地，也是四顾茫然，真成了他一天到晚挂在嘴上的谦称：孤家寡人。再则，主子和奴才朝夕相处，他们之间的感情即便不是最真诚的，可也不是君臣大义这种崇高却冰冷的道德所能替代的。

这些道理，年少的天子尚不知晓，可窦太后一定心领神会。她现在和父亲的立场有些分歧。或许，她很自信，认为自己能够驾驭宦官们，因此当父亲向自己及天子列数宦官权重专断、子弟布列、贪暴无厌，以致天下汹汹等罪状，并要求废除全部宦官时，她便觉得父亲的主张过于荒唐了些。而灵帝听了，则又怕又气。

“我大汉自立国以来，世世皆用宦官，此乃国之常典，但当诛其有罪而已，岂可尽加废除？”太后说。

大将军心中怏怏不快，而灵帝则暗自庆幸。

于是，在得到太后的首肯之后，大将军下令逮捕了两个罪行显白的宦官——中常侍管霸和苏康。这是两个颇有才略的大宦官，掌管天子的秘书处，专制独断，在孝桓皇帝朝就与士大夫们结下了怨恨。当然，窦太后之所以同意大将军拿这两个人开刀，还出于她作为女人特有的狠毒心理，因为管霸和苏康曾在孝桓皇帝新丧之时，苦谏她不要杀害除田圣之外的其他嫔妃们。

有时候恶人反要为自己瞬间流露出的良心付出更高的代价。

很快，他们就毙命于大将军的刑具之下。可大将军并不满足，他明白擒贼擒王的道理。管、苏二人仅仅是大宦官曹节等人的爪牙。这几天，大将军屡屡向太后进言，请求诛杀曹节等人，可女儿的态度却屡屡使他失望。

大将军以外戚的显贵身分，来实现士大夫集团的政治愿望，在本朝法制纲纪已被破坏的年代，本是一条政治捷径。可惜的是，连这也行不通了。

就在大将军面陈太后的同时，陈太傅又向天子上了一道奏章，上面写道：

> 今京师嚣嚣，道路喧哗。言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等，与赵夫人、诸尚书并乱天下。附从者升进，忤逆者中伤，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泛泛东西，耽禄畏害。陛下今不急诛此曹，必生变乱，倾危社稷，其祸难量。愿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诸奸知臣疾之。

太傅希望在中央造成与宦官们公开决战的局势。这道宣战书式的

奏章，到了太后手中，便被压下，成了一份备忘录。

北宫政变

太后居住在北宫长乐殿中，身边配有五名女尚书，大宦官朱瑀被封为长乐五官史统领她们。由于不离太后的左右，他似乎最早嗅到了一场大战的血腥气味，并将他的预见通知了宦官领袖们。

八月的一天，帝国天文台的官员将一份天象观测报告送发官内及各级行政机关。这份报告让大家感到异常的紧张，因为报告中所说的天象，很容易成为突发性政治事件的借口。报告中的天象是：

太白犯房之上将，入太微。

本朝的宇宙学说十分完美，乃人类文化之瑰宝。这一理论以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结构为横坐标，将上天划分为与之对应的西、东、北、南、中五官。以远古氏族首领少昊、太昊、颛顼、炎帝、黄帝为各宫之帝，名之为白帝、苍帝、黑帝、赤帝、黄帝，合称五帝。下以太白、岁星、辰星、荧惑、镇星为金、木、水、火、土五星，统领各官。在西、东、北、南四官内，又各选七宿，构成白虎、青龙、玄武、朱雀四种图像。纵坐标按照与赤道平面的垂直程度分为紫微、太微、天市三垣。紫微高居北极，为天皇大帝太一星座所居之宫。太微垣中，有五帝座星，是天皇大帝的布政之宫，也是五帝的值班室。至于房，乃是东官苍龙七宿中的一宿，此星座由上将、次将、上相、次相四星构成，文武相辅，成为天皇大帝行政、典礼、祭祀的所在——“明堂”。本朝以天人合一为宗旨，故天道之运行即为人间之行政，二者之间必有关联。天皇大帝即是人间天子；天之将相，即是人间将相。

太白，金星也。金为兵，故主杀伐之事。现在，它经过房宿中的上将星座，进入了太微座，这一天象，预示着一场刀兵之灾，将要降临到本朝的上将——大将军，以及整个朝廷！

当天夜晚，洛阳南门平城门的守备官接到一位宫中侍卫军士——中黄门校骑出示的符节，命他立即开门。一哨铁骑，举着火把，簇拥着几辆马车打他眼前经过。

这支队伍走了约两里多路，停在本朝祭祀和典礼的所在——明堂。与明堂隔路相对的，是帝国的天文台——灵台。掌管明堂的官员早就在里面布置停当，从车内走出的是长乐五官史朱瑀、从官史共普、张亮、中黄门王尊、长乐谒者滕是、长乐食监王甫等几个重要的宦官领袖。他们将这次密谋，安排得与太白星的运行相一致，因为他们要顺天道行大事了。

歃血结盟以后，他们共祷皇天，发誓曰：

“窦氏无道，请皇天辅皇帝诛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宁！”

具体的方案也已制定，其中包括密切注视朝中的人事变更，收买和控制中枢机构的官吏等等事项。

与此同时，大将军府内灯火通明。大将军和陈太傅收到了他们的同志、本朝著名天文学家、侍中刘瑜送来的紧急书信。刘瑜在信中指出：星辰错谬，不利大臣，宜速断大计。并告知：他向太后也发去了奏章，提醒太后有奸人在天子身旁，必须加紧防范。两位重臣连夜商议，通宵达旦。

次日起，一系列人事变更的命令陆续下达：以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伊、虞祁为洛阳令。如此，大将军便将京畿及直隶地区的军政和治安大权，交给了自己人。下面的问题，就是掌握宿卫军队。

宿卫军队，由羽林、虎贲这两大近侍卫队和北军五营士组成。这些，大将军无甚顾忌，因为这些军士皆非宦官充当。况且，羽林、虎贲为天子的仪仗和贴身勇士，人数不多，各设中郎将统领，其中虎贲中郎将刘淑是自己人。北营的人数最多，达四千多人。五营分别为屯骑、越骑、步军、长水、射声，各设校尉统领，驻扎在都亭。此中人数最多的一支，步军营的校尉，由自己的侄子窦绍担任，屯骑校尉由自己的心腹妆述担任。所以，大将军担心的是由宦官组成的近卫军——中黄门。他们居则宿卫值守宫门，出则骑从天子，夹乘舆车，且

直接控制着禁内。

几天之后，大将军得到了太后的同意，免去原宦官禁军统领魏彪的黄门令一职，代之以自己的心腹宦官——小黄门山冰。

山冰在大将军的授意下，奏请天子之后，便立即逮捕了太后身边的秘书长——长乐尚书郑飒，送北寺狱审讯。

陈太傅听到这个消息后，又激动又担忧。他的政治洁癖又犯了，不过他的冲动之中，包含了果敢与机敏。他觉得这样一个个地逮捕审问，会惊动别的几个大宦官，引发变故。他急忙去对大将军说："这帮家伙，抓了就杀，何必拷问？"

然而，恰恰大将军谨慎却又迟疑的毛病发作了，他觉得自己的方案更稳妥一些，故而没有听从太傅的话。可能他还想对女儿有更多的交待，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将军自信能够运用他的威势合法地翦除宦官势力。

很快，关在北寺狱中的郑飒，吃不住黄门令山冰、尚书尹勋和侍御史祝瑨的轮番审讯和狱吏的拷打，交待了自己的罪行，并牵连出曹节和王甫。尹勋和山冰根据郑飒的交待，拟出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准备奏请太后批准后，就去逮捕曹、王，进而诛杀全部宦官。

九月七日辛亥，报告交给了侍中刘瑜，刘瑜立即将报告封送帝国的中枢机构——尚书台。次日早朝，便可立即奏明皇帝和太后。

一切准备就绪。

洛阳城内，南北两宫，垂宇重檐，气象森严。

在几个宦官领袖中，长乐五官史朱瑀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今天，尚书省内的一名被他收买的官吏，向他密报了刘瑜封送奏章的事。他急切地想看个究竟。但下手需要时机，大将军常常在尚书台值宿。

当天，朱瑀又接到那个官吏的密报：大将军今晚将回府过夜。

大将军一走，朱瑀立刻带了几个宦官赶至尚书台，打开书案上堆

积的皂囊，终于找到了那份报告。看着看着，他的脸色渐渐地泛白，无髭、白嫩但却松弛的下巴颤动了起来，他先咬着牙说道：

“中官当中的放纵之人，自可诛杀！我辈有何大罪，而要如此斩尽杀绝？”

接着，他又用一种凄厉的嗓音，对属下们喊道：

“陈蕃、窦武奏白太后，想要废除皇帝，大逆不道啊！”

朱瑀回到长乐官后，心里一直盘算着。天刚黑，他叫来了十七个心腹宦官。这十七个人都是健壮勇猛之辈，其中包括长乐从官史共普和张亮。朱瑀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他们。然后，他们拔出佩刀，割破手指，将血抹在自己的嘴唇上，指天戳地，发誓诛杀窦氏。

酣睡中的天子，被奶妈赵娆叫醒。睡眼朦胧之中，他看到曹节、王甫等跪在面前，直到曹节将一把寒光闪闪的佩剑呈上来时，他才醒透了。

“陛下！禁外喧嚣，有人反叛，请陛下持剑在手，即刻出御德阳前殿。”曹节奏道。

当他在赵娆和几位宦官的簇拥下，登上德阳殿御座时，曹节和王甫早已赶到。在自己的御座下，两位宦官镇定地布置着。他们让中黄门卫士立刻关闭所有的宫门，并将门卫手中掌握的入宫官员的符信收聚，杜绝任何人进入。接着，他又让中黄门将尚书台值宿的官吏悉数扣押，解到前殿。

在中黄门的刀剑胁迫下，尚书台的官吏们按曹节的授意，在一块块一尺见方的诏板上，写下违心的文字。第一道诏令便是：

拜王甫为黄门令，统领中黄门禁军，逮捕尚书令尹勋和黄门令山冰。

北寺狱，尚书令尹勋与黄门令山冰共同值宿，打算明天继续审讯长乐尚书郑飒。中黄门的铁骑闯了进来，王甫向他们宣读了天子的诏令，山冰立刻指出：这是矫诏，并拒绝拜受。王甫抽出佩剑，刺进了山冰的胸膛。

中黄门解去郑飒的桎梏，搀扶他上车，他拒绝了，索要了佩刀，翻身上马。

铁骑旋风般地驰回北宫，马蹄声打破了都城宵禁之夜的寂静，也惊醒了太后的睡梦。她的寝宫周围，跪着手持刀剑的中黄门，不得已，她交出了玉玺。

一个宦官，领着一队持戟的卫士，匆匆赶到南宫，关闭了宫门，并断绝了南、北两宫之间的通道，一条长达一里的走廊。

大将军白天早早地就出了宫，他觉得他和陈太傅商量的大事，明天早朝时，就会见出分晓了。一连许多天的会议和办公，让他感到疲乏。大将军不会像陈太傅那样，能够忍受自己的庭院荒芜不堪，一心专注于天下大事。他是个考究的绅士，因而他决定今晚回府，好好休息一下。

他的寝第华丽高雅，这些装饰物有很多是女儿送来的皇家收藏，而且，今晚侍寝的娇娃，也来自宫中。

和大将军不同，陈太傅喜欢享受思想，他不仅担任了天子的老师和枢密大臣，而且，几十位来自各地的学生住在他的家中，使他的府第成了一座典型的经学研究院。所以，每天公牍之余，他的时间都花在研究和讲授经学上面。今天晚餐以后，他仍给学生们上了一课，讲的是《春秋》大义。学生们都感到太傅今天的讲授非常精彩，好像他矍铄的面容和闪着银光的须发。

夜深的时候，大将军的府第被中黄门包围。大将军从春梦中惊醒后，立刻登上门楼问话，门外铁骑们手中的火把，映照着一个大将军熟悉的面孔：长乐尚书郑飒。他手里拿着天子的符节，身边还有中央监察部门的官吏。郑飒大声地向门楼上宣读了收捕窦武的诏令，叱令窦武速速开门接诏。

久候不见开门，郑飒下令：冲进府内，捉拿窦武。此时一骑来报：窦武携带随从，由后门突出。

北军五营，步军校尉窦绍正在巡夜，听见营外马蹄声急促，忙让人持了火把，爬上营门边的敌楼。不一会儿，他看到几骑驰来，叫门

的正是叔父的声音。又听见后面传来马蹄声，凭借军人的经验，他马上判断出那是追兵。他立即命令开门，放窦武等入营。营门刚刚关上，中黄门的追兵已至，窦武尚未下马，便叫窦绍放箭。

几个中黄门中箭落马，郑飒见状，即令铁骑返回北宫。

大将军惊魂初定，随即让校尉们集合手下的几千军士，开往都亭校场。在校场点将台上，大将军声色俱厉地对军士们叫道：

“黄门、常侍们现已谋反，尽力者当封侯重赏！”

就在大将军驰往北营之际，他派往太傅府报信的人已敲开陈太傅的府门。太傅立刻叫醒府中的属员和他心爱的学生们。向他们说明了今夜突发的事变，表示他马上就去奔赴国难。

他的属员和学生计八十余人，为老太傅的义愤所激，纷纷拔剑在手，打起火把，护卫着太傅，涌向北宫。

北宫的东门——承明门紧闭着，门楼上持戟卫士的长官大声向太傅喊道：

“天子没有诏书召公到此，为何勒兵入宫？”

火光中，太傅一脸正气，此时此刻，他铿锵有力的回答仍引经据典，蕴藉着士大夫特有的学者风度：

“当初晋国大夫赵鞅引兵入宫，清除君主身边的奸人，故而孔夫子修撰《春秋》时，对他大加赞赏。尔等宿卫天子，怎能不明春秋大义？”

卫士长官听了，为之动容。

持戟卫士打开了承明门。太傅的队伍继续向宫内涌去，在尚书台的门口停了下来，太傅想在这里发表演说，进而控制局势。

太傅攘臂高呼道：“大将军忠心卫国，黄门反逆，为何反说窦氏无道？”

“谁出此言？”

随着声音，从尚书台边的道路上，转出一队中黄门剑士，为首的是现任黄门令王甫。

王甫一手按剑，一手指着太傅说："先帝新弃天下，陵园尚未完工。窦武有何功劳，兄弟父子并封三侯！又设乐饮宴，多取掖廷宫人，旬日之间，聚财巨万。大臣如此，有何道理可言？陈公现为宰辅大臣却与他相互结党，竟还说要惩治反贼！左右，给我拿下！"

剑士们一拥而上。太傅拔出佩剑，对王甫大喝一声。剑士们见老太傅如此，不敢贸然上前，只得将太傅和他的属下、学生们围困在核心。

在一阵僵持之后，太傅的队伍被驱散，太傅和他的几个重要属官被押送北寺狱。

太傅与宦官们结怨太深。本朝制度：中央各级官员、包括掖廷宦官，其俸禄钱粮的发放和假期的批准，皆由尚书台的副长官——尚书仆射与右丞对掌。太傅自孝桓皇帝朝即任尚书令，在任其间，曾运用手中的权力让一些宦官失业，并克扣了不少在任宦官的俸禄与假期。现在，押送太傅的宦官们欣喜若狂。一进北寺狱的刑房，中黄门的一个骑兵副官便将老太傅踏翻在地，踩着他骂道：

"你这个老怪物，还能裁我们的员，扣我们的俸禄和假期吗？"

是夜，本朝太傅陈蕃遇难。太傅字仲举，汝南平舆人。

黄门令王甫，已控制了北宫中的局势。除了中黄门，虎贲、羽林两支禁军也被他掌握。三支禁军计有一千多人，王甫将他们安扎在北宫的南大门——朱雀门上。

在都亭的大将军，也对五营兵士作了布置。他很快恢复了自信，因为五营兵士的人数是宦官禁军的几倍。他下令军队奔赴北宫靖难。

天亮的时候，必有一场大战。

曹节一直坐镇在德阳殿。现在，他似乎已经预料到天亮以后可能发生的情况，这是他最不想见到的结果，因为不仅担忧大将军的兵力强大，而且，天一亮，全城的吏民都会知道今夜的政变，事态会变得

复杂而棘手。他希望以最快的方式解决大将军。

他想起了一个人。

帝国护匈奴中郎将张奂，今晚注定了没有好觉可睡。去年冬天，羌人抄掠三辅，张将军与部将尹端、董卓大破之，斩其豪酋，杀虏万余。近来，他接到朝廷的诏令，命他振旅还朝。他带着一支精锐的卫队，举行了入城和献俘仪式。他是一个天生的军事家，因为他很少在军事上下功夫。这些天，他抖落征尘，屏退公务，又回到了他钟爱的书斋生活。在研究和传授欧阳氏的《尚书》学方面，他有着很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声望。他和两个儿子张芝和张昶，都是帝国著名的书法家，后世学草书者，无不以为楷模。

可是现在，他被人叫起接受诏旨。颁旨之人，是宫中大总管——少府卿周靖，他现已持天子符节、拜为车骑将军。诏板上说窦武已反，命他率卫队与周靖一道去收领北军，讨伐窦氏。天子的印玺昭然，作为臣子，当即刻赴诏。张奂披挂完毕，与周靖率兵至朱雀门，会同王甫的兵士，向宫外开去。

天已大白，北宫之外的双阙前，两军相遇。

王甫向北军的士兵出示了天子的诏令，宣布张奂是他们的新任指挥官，并命令手下的军士不断地对北军叫道：“窦武反叛，汝等皆为禁兵，当宿卫宫省，为何随之造反？先降者有赏！”

王甫的手段很快就奏效了。大将军的阵脚渐渐松动并喧哗了起来。接着，一些军士扔下武器，跑向王甫的阵营。

眼下的突变，是大将军万万没有想到的。其实，这正是大将军最疏忽的地方。

北营的军士，除长水校尉所辖的骑兵征自乌桓和匈奴这两个民族之外，其余多是洛阳城中的子弟。他们有着京师小民特有的政治敏感和纨袴气息，权衡利害的能力大于分辨是非的能力，并且非常爱惜生命。孝桓皇帝朝，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曾跟随中常侍收捕不可一世的大将军梁冀，因而深知中官的厉害。何况，现在又面临天子的诏令、威震边关的大将张奂和他手下如狼似虎的卫队。再者，大将军的亲党

出任北军校尉，不过数月，对将士的恩宠尚未普及，威信未立。

接近中午的时候，大将军及其亲党已经震慑不住北军五营。阵营中的兵士所剩无几。大将军见王甫麾军逼来，只得与窦绍等回马而走。追兵将大将军等包围在都亭，大将军解鞍下马，稍作喘息。然后，长叹一声，拔剑自刎。步军校尉窦绍亦随之自刎。

他们的首级，被悬在都亭示众。

黄门令王甫回到北宫德阳殿的时候，灵帝已斜在御座上睡着了。

天子的宝剑，落在地上。

按例，秋风肃杀之际，正是本朝处决人犯、典狱正刑之时，不过，今年的秋天，由于处决的人犯过多，洛阳城里的小民们已失去了延颈围观的兴趣。稍有良知的人，则不忍去看，因为成批被杀的，都是本朝的贤臣及其亲党宗族。

被处决的名单中有：大将军的近亲、姻亲和宾客、侍中刘瑜及其家族、北军屯骑校尉冯述及其家族。刘瑜字季节，广陵人，通天文历算之术，以上书直谏著闻朝野。就刑之后，宦官烧毁了他的这些谏书，宣布为胡说八道。

虎贲中郎将刘淑、尚书令尹勋、议郎刘儒和已退休在野的故尚书魏朗，以大将军的同谋而受到指控。刘淑、尹勋、刘儒下狱自杀。刘淑字仲承，河间乐成人，本朝皇室宗亲。孝桓皇帝朝征入京师对策，为天下第一。尹勋字伯元，河南巩人，衣冠世家，为人刚毅，少时读书，得忠臣义士之事，未尝不投书而叹。刘儒字叔林，东郡阳平人，孝桓皇帝朝以极言直谏著称。魏朗字少英，会稽上虞人。在征至京师受审的途中自杀，有《魏子》一书遗世。

死者的门生故吏以及被他们征辟举荐做官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免去官职，永不录用并交地方管束，本朝称之为：禁锢。大将军的一些远亲，还被流放到帝国疆域的最南端——日南郡，那儿接近北纬十五度，住着赤身裸体的野蛮人。

大将军府的大总管胡腾，因收葬大将军尸体，被押回他远在南方

湘水流域的故乡桂阳郡禁锢。在他的安排下，大将军惟一的血脉、孙子窦辅逃离了京师。一年以后，曹节发觉此事，追捕甚急，胡腾与大将军府令史张敞携带窦辅窜入相邻的零陵郡中，诈称是自己的儿子并为他娶亲成家。

陈太傅的友人朱震，当时担任帝国沛郡铚县县令。闻讯后弃官入京，哭葬太傅，又藏匿太傅之子陈逸于甘陵界中，故而全家遭致监禁。朱震备受拷掠，至死不言。

议郎巴肃，也被押回故乡勃海郡高城县禁锢。由于法官的疏忽，他可谓幸免于难了。因为他是大将军诛杀宦官计划的重要制定者。很快，曹节就查出了这条漏网之鱼。收杀巴肃的诏令用飞骑传送到高城县令的手中。巴肃得知后，自己来到县衙的大堂，他不愿难为自己这位担任县令的老朋友。县令急忙将他拖入内室，解下身上的绶印，说道：

“公大义凛然，在下愿意弃官，和您一起流浪江湖。”

巴肃向他长揖道：“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已不隐其谋，又何必逃其刑呢？”言毕，自入槛车。

与大搜捕比肩接踵而来的，便是大封赏。这次政变中的宦官领袖、中常侍、长安乡侯曹节迁为长乐卫尉，改封育阳侯。长乐食监王甫迁为中常侍，黄门令如故。长乐五官史朱瑀及其从官史共普、张亮等六人，皆封为列侯。护匈奴中郎将张奂迁大司农，以功封侯。此外，尚有十一名宦官与官吏封为关内侯。

朝中的人事也作了变更。天子的太傅换成了和颜悦色的原司徒胡广，并让他主持尚书台的政务。以原司空刘宠为司徒，大鸿胪许栩为司空。

现在，大将军和陈太傅威严的身影已从朝堂上消失了，他们和一大群同志、僚属静静地躺在京师北门外邙山脚下的平民坟场之中。不过，他们的愿望并没有随着身躯的入土而被埋葬。二十一年以后，另一位大将军和一大批武装起来的士大夫们实现了这个愿望。但那时，我们的大汉帝国也随之灭亡了。

建宁元年的秋天，帝国失掉了最后一次挽救危亡的机会。

建宁二年（169）春正月丁丑日，本朝大赦天下。十四岁的天子身穿礼服，登上御座，颁布了诏令。他习惯地向身体的侧后看看，那是以往临朝时太后的座位。今天，他才有了至高无上的感觉，但又感到前所未有的茫然与失措。大将军和太傅的被杀，使他夺得了一个帝王能够拥有的享受一切尊荣和声色的权力，同时也使他终其一生只能扮演着不称职的君主的角色。现在，只有身边的中常侍们教他如何应对大臣了。他对中常侍这次英勇反击很是感激，又为自己感到庆幸，因为他知道自己成为天子的途径，和叔父孝桓皇帝如出一辙：由太后和一位大将军当作傀儡选中，然后依靠中官砍掉控制自己的巨手。但对于自己来说，这个过程在一年之内就迅速地完成了。

几天之后，慎园贵人董氏从河间国的老家来到京师，天子亲自来到夏门亭——这个去年大将军迎接自己的所在，奉迎亲生母亲。此时，长乐宫的主人窦太后已被迁到南宫的一所殿院中，过着寂寥的生活。她后悔莫及，因为她终于看透了中官们，明白了一个道理：谄媚绝非忠诚。

三月乙巳日，天子的生母去掉了贵人的称号，被尊为孝仁皇后。她的兄长、天子的舅舅董宠被授予执金吾的职位，掌握宫外的警卫和水火非常之事，下有属丞一人，领缇骑二百。同时，董宠之子董重亦被授予五官中郎将之职。

一系列重新确立天子地位的动作，其背后都有缜密的安排和独特的用心。这又出自几位宦官领袖的精心设计。作为天子，则不可能考虑许多，不过，聪明的士大夫们一定能看出端倪，那就是：新太后没有住进北宫，而是被奉养在南官嘉德殿内，号为永乐宫。帝国的中央机构和政治中枢，皆在北宫。孝明皇帝永平三年（60），诏起北官及诸官府，至永平八年（65）冬七月成。宦官们不仅把原先住在北官，操纵国柄的窦太后迁到南宫，而且也不让新太后成为第二个把持北官的女人。

先哲有言：“福兮，祸之所倚。”这对执金吾董宠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按本朝的惯例，他应该是新任大将军的候选人，但在这个

最嫉恨大将军的时期，他不仅失去了成为大将军的可能性，而且失去了生存的可能性。

次年九月，董宠因擅用他姐姐的名义，去走一些大臣的后门，搞些请托之事，被中官指控。同月，死于审讯之中。在本朝的政坛上，所谓廉政的举措，常常是排除异己的手段。

建宁四年（171）正月初三甲子日，本朝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典礼：为天子加元服。

元者，首也。首之服即为冠冕。本朝沿用周礼，男子年二十左右，即可为之行加冠礼，象征他已是一位成年人，具备承担社会事务的能力。作为天子也不能例外。而且，他的冠礼必须成为臣民的礼仪典范。天子的年龄，距礼仪规定的年龄还差整整四年。不过，本朝的列祖列宗自孝和皇帝以降，除了未及冠年即已夭折者，皆于十三岁或十六岁举行冠礼。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承继大统的年龄过于幼小的缘故吧。

太傅胡广带着宗正、太常、大鸿胪寺的官吏，在高皇帝庙中，已布置了好几天了。永乐宫的新太后请他担任典礼中的西宾，因而他不仅是礼仪中的主持者，而且是这位即将成年者的导师和长老的化身。

清晨，天子乘着装饰华贵的金根车，由文武随从陪伴至庙前。他从庙前的东阶升至堂前，西向，面对在堂门西侧东向而立的太傅。相互揖礼后，宗正和卜师向天子汇报了典礼日期的选择以及准备的情形。随即天子被引导进入高皇帝庙的西厢。

天子沐浴之后，先后身着四套服饰展示在庙堂下的百官面前。大家看到了天子头戴进贤冠、爵弁、武弁和通天冠的四种威仪，象征着他所承担的道德、权力、军事和祭礼的义务。然后，天子手执玉圭，被引导着向高皇帝的灵位行礼，再进入设好的筵席，象征性地饮上几口用古式的尊爵呈进上来的酒。最后，太傅胡广向天子诵读了祝辞。

天子的车队回到北宫嘉德殿的朝堂之上，庄严的钟磬声敲起，参加国宴的嘉宾皆已入席。天子进到后堂，换上最正式和庄重的朝服。当他出现时，乐声更加洪亮，群臣伏拜，山呼万岁。赞礼官大声地朗

诵起颂文，并宣布天子的新诏令：大赦天下。

灵帝觉得这才是他真正的即位大典。作为一个天子，成年礼的举行，意味着他开始亲政了，他似乎也觉得自己懂事了。在典礼之中，他体验到了无比的尊贵和自信。这次典礼植下的自信，使得天子在以后的执政岁月中，时时表现出妄自的冲动。

可匍匐在丹墀下的大臣们，则为这个以幼小之躯顶戴旒冕的少年而忧心忡忡，甚至感到嘉德殿的高基厚础，都在自己的膝下颤动起来。

典礼结束时，天已黄昏。有两个官吏在回家的路上，对今天的典礼品头论足。其中一个感慨地说道：“国家就如一杆秤，天子就是秤砣，虽为孤家寡人，但他依靠臣下作秤杆，竟可以均衡起沉重的天下！”

另一位却说：“阁下您作为秤杆，难道不觉得，这只秤砣太轻了吗？”

洛阳的正月，虽已进入春天的节气，但尚无暖意。他们的谈论，就在寒风中飘散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章
大放逐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
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
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
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

——赵壹《秦客诗》

被出卖的将军

在天子加元服时所宣布的大赦令中，有一类人不在赦免之列，那就是：党人。

天子不能原谅他们。天子的这种仇恨，是由宦官们培养起来的。

建宁元年（168）九月的北宫政变结束了，但这场碰撞犹如一场大地震，它的余震仍延续到第二年。

大将军和陈太傅被诛之后，士大夫们或垂头丧气，或咬牙切齿；宦官和奸小们兴高采烈，拍手称快。不过，有一个人却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复杂心情，这个人便是张奂。

他被宦官们出卖了。

事后，他知道了一切，知道了宦官矫诏调他出马，正是因为他刚刚被征入京而蒙在鼓里。自孝桓皇帝永寿元年（155）被朝廷任命为安定属国都尉开始，他一直在与南匈奴、东羌、先零、乌桓、鲜卑等周边民族作战。凭借西北敦煌人天生的军事才能和年轻时游学三辅而养成的儒学境界，他成功地运用军事和怀柔两种手段，受到这些民族的畏服。由于他的仕途，是由征辟大将军梁冀府开始的，故而在梁冀倒台后，一度被禁锢在家。那时，他的师长和好友、帝国度辽将军皇甫规多次上书，举荐张奂代替自己，因而他又被拜为武威太守，再次镇守西北。皇甫规，字威明，安定朝那人，陈太傅的同志，宦官的对头。

以去年冬天大破东羌的功劳，张奂理当封侯。但他也明白，想封侯，就必须侍奉中官，而这又是他深以为耻的事。果然，在振旅还朝期间，朝廷颁布了对他的赏赐：赐钱二十万，家中一子为郎官。他推辞了这一殊荣，官场和战场，他都有些厌倦了。于是，他乘此机会，向朝廷提出了一个更低级的但必须改变一条法律的要求：将自己以及

家族的户籍，迁到帝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区域——长安与洛阳之间的弘农郡华阴地界。朝廷答应了他的要求，为此，也打破了边人不得内徙的律令。

现在，侯王的爵位终于放在自己的面前，但张奂却感到如鞭挞于朝市一样的难堪。他一连上表，非常坚决地辞去了封赏，只保留了大司农的职务。因为这是朝廷的职官，可以保持自己士大夫的身分和为朝廷效力的权力；再则，大司农之职所享受的禄秩为二千石，与护匈奴中郎将同秩；加之自己曾于孝桓皇帝延熹九年（166）担任过此职，因而也谈不上升迁。

就这样，他还是受到了朋友、同僚乃至门生们当面或书面的指责。他只是默默无言，杜门自省。他更在等待着机会，洗刷自己的耻辱，昭大白于世人。

御座上的青蛇

这一年，刚刚进入初夏的季节，本朝历法的四月份，洛阳的天气连续多日异常闷热。二十一日壬辰这天，居住在老宫殿大梁上的一条青蛇，忍耐不住，下到殿中天子的御座上纳凉，把参加朝会的天子和大臣们吓得不轻。本朝以天人感应为信仰，因而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观察和研究自然界的一切变化，作为制定和修正政策的依据。由于积世的衰微，因而每一点小小的怪异现象，都会被人们视作不好的兆头。

其实，天总是按其常道行事的。第二天癸巳日的下午，风云变幻，大风、霹雳、冰雹旋踵齐至，把个京师搅得昏天黑地、一片狼藉。负责撰写帝国日记的史官们，在风雨中掌起灯火，削简疾书：

> “建宁二年，四月壬辰，青蛇见御座。癸巳，大风、雨雹、霹雳，拔大木百余。”

中黄门和羽林、虎贲骑士的马蹄声，激荡在风雨之中。一份份由

尚书台起草的诏旨，被送到重臣家中及中央各官署，令公卿及下属各上封事议政。

大司农张奂，被霹雳震撼得热泪盈眶。他站立在堂前，将整整一大碗酒洒在阶下，对他的僚属们说道："上天震怒，以申君子之冤。奂以此酒，奠大将军及太傅之英灵！"

百僚之中，张奂第一个将奏疏写好，封在皂黑色的帛囊中，送到尚书台。

天子亲自打开了大司农的封事：

> 昔周公葬不如礼，天乃动威。今窦武、陈蕃忠贞，未被明宥，妖眚之来，皆为此也。宜急为收葬，徙还家属，其从坐禁锢，一切蠲除。又，皇太后虽居南宫，而恩礼不接，朝臣莫言，远近失望。宜思大义，顾复之报。

天子这两天受到了惊恐，加之他刚刚亲政，因而将天有灾异即诏公卿议政这一本朝早已仪式化了的行政惯例，看得新鲜而重要。作为一个小孩，天子对灾异有着无知的好奇；何况，为大将军和太傅翻案，又是由张奂提出的。在阅读封事的过程中，大将军、太傅、窦太后的身影又出现在他眼前：大将军带着仪仗站在夏门亭的寒风之中；太傅殷切教诲自己时，颤动着的下巴上的银须；醒来时坐在床边，看护着自己的太后。张奂的话，大概是对的吧？

相继而来的是郎中谢弼、光禄勋杨赐等公卿大夫的封事。他们的意见，与大司农如出一辙。其中谢弼的话更为耸听，他引用了《诗经》中"惟虺惟蛇，女子之祥"的诗句，指出御座上的那条蛇，作为象征天子的龙的同类，正是太后在自然界中的化身。因而这种怪异的现象，就被解释成由于天子辜负太后援立之恩，仍隔她于空宫之中，太后愁苦而感动天心的结果。本朝尊崇周礼，为人后者为人之子，在天子入继大统之后，孝桓皇帝和窦太后就是他的法定父母。本朝又以孝道治天下，天子这样做，势必无面目以见天下！和别人不同的是，谢弼还进一步向天子提出了挽回诛杀大将军这一恶果的方法：征辟故司空王畅和长乐少府李膺执掌中枢。

不能说，天子对他们的言辞无动于衷，可即便打动了天子，天子

又能有何作为呢？果然，天子感到茫茫然了，他第一个反应就使得这些认真负责的士大夫们大失所望：他竟去找中常侍们商量了。

宦官们用极为简单的辩解和过去几个大将军的故事，就让天子改变了主意，并取得了处理这些问题的特权。

大司农张奂接到诏令，让他迁任太常。这是个位高事闲的官职，掌管朝廷的礼仪与祭祀。谢弼，则被外迁至江淮一带的广陵府，担任地方行政副长官。接到调令后，谢郎中就感到不妙，广陵府属东郡管辖，而郡守曹绍，正是曹节的侄子。

几个月后，谢弼在广陵府任上被捕，死于郡狱。

张奂仍在努力，他联络了尚书刘猛、刁韪、卫良等人，郑重地向天子上疏，要求朝廷准许王畅、李膺二人进入中枢，在太尉、司徒、司空这三公中充任二职。没过几天，他的府第就被中黄门包围了，为首的中官对他宣读了圣旨，指责他扰乱朝纲，构党营私。

这回，张奂的心凉透了。不知怎地，他开始自嘲起来，绝望使他大彻大悟，一反常态。他没有做任何辩解，接诏之后，马上脱去朝服，免冠跣足，来到北寺狱自首认罪。

过了几天，张奂回到府中，吩咐紧闭府门，重新布置起自己的书斋。他又研读起《尚书》来了。他有上千名学生，心情平静的时候，也上一上课。

风波暂时平息，朝廷扣除张奂三个月的薪水，以示惩罚。

张奂和谢弼的碰壁，在于他们的封事中提到了李膺和王畅。这两个人的名字，勾起了宦官们自先帝朝就已落下的心病。仇恨和积怨，让他们感到浑身痛痒不堪。曹节和王甫等中官都认为，趁着大将军阵营刚刚受到重创的机会，必须根治这块心病。

李膺和王畅，是孝桓皇帝朝的党人。

党人与太学生

党人的话题，得从先帝朝讲起。

本朝自高皇帝开基以来，沿承秦帝国创制的中央与地方郡县两级行政制度，一改周代的贵族分封和世袭制度。帝国选拔官吏的根本准则，不再依靠贵族的宗法血缘，而是受过教育的民众——士人。和秦始皇不同的是，本朝列祖列宗所用的士人，不是学申、韩法家之术的狱吏，而是自幼习诵五经的经生。因为本朝的列祖列宗接受了始皇帝的教训，不再把单纯的法律作为治理帝国的主要手段，而是推崇自周文王、周公直到孔夫子构建和传授下来的一套道德文化的理想。本朝的理想是德治而非法治，尽管帝国的法律也很强大。起用这些经生的方法，是察举和征辟，也就是将地方官员考察推荐与朝廷调查征召的手法结合起来。中央和地方双向试用的官吏，来自许多名目：比如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孝廉、至孝、有道、敦厚质直、仁贤、茂才，试五经博士弟子、太学生，试明经、耆儒、童子，试尚书、将帅等等。从这些名目可见，本朝用人的标准，是士人的德行和经术。当他这两方面的修养已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声誉，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士大夫行列的候选人，一般把他们叫作名士。从原则上讲，即便是帝国皇室成员，如果他不甘于仅仅做一个享受生活的侯王，而想献身政治，也必须走这条道路。

老实说，本朝的久长，在于列祖列宗一直坚持着这一制度。

不过，一个人的名声，恐怕不仅仅靠自己的德行和经术，还来自于他的交往。有条件的士人，往往年轻时就去京师游学，或入太学跟从博士学习，结交中央的名人和士大夫，同学之间也形成了群体。地方的名士和地方有清望的官僚之间，往往也有着师生或朋友的关系。他们在一起，激励品德，研讨经术，议论政治。

像任何崇高的理想都与庸俗的现实相依为命一样，本朝仕途的道德标准也携带着功利的目的。因为热衷于仕途的士大夫们不仅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还要为自己，为妻小，为宗族，为亲党谋福利，谋权势。于是察举征辟之中，就有了复杂的文章，直至成了赤裸裸的贸易活动。孝和皇帝以降，帝国的察举铨选，多为外戚、宦官交替把持，朝政昏暗，士风日下，忠正之士被废，虚

诈阿谀之徒登堂。不能说，外戚和宦官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士大夫们，故意要把帝国的制度搞垮，但他们总是将权力看成是聚敛财富的手段。这种权力经济观，势必给本朝的政治乃至经济带来严重的恶果。命运总是将才华加上清贫交给前者，而将平庸加上财富交给后者。孝桓皇帝朝，京师就传着一首民谣：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至少在孝顺皇帝朝，士大夫们已有清流与浊流的区分。当时的地方吏治和政治风气已腐败不堪，因而政府监察部门不得不于汉安元年（142），选派八位御史，到各地巡察。武阳人张纲，作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却将这种走过场的巡察看得最透。他的车驾刚刚走到京师外的都亭，他就命手下掘了个大坑，把马车的轮子卸下，扔了下去。部属不解其意，张纲冷笑着对他们说了八个字："豺狼当路，安问狐狸？"

这种分化与冲突，到了孝桓皇帝朝；愈演愈烈。清流士大夫和一些在野的处士、太学生，以及郡国学府的生徒们，以气节、道德、文章相互标榜，引为同志。他们希望用扭转社会风气、掌控舆论，直言进谏甚至动用权力来医治身患绝症的大汉帝国。渐渐地，一个有号召力的士人集团，从帝国的各种社会阶层中独立了出来。

他们的至圣先师孔夫子说过："君子朋而不党。"结党是可耻的，结党营私者正是他们的敌人。可是，本朝的许多事情都属于见怪不怪之类，被称作"党人"而载人史册的，恰恰反成了他们自己。

帝国的最高学府——太学，自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五年（29）起，就坐落在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了。它的讲堂长十丈，广三丈，令天下的学子们心向往之。本朝的名儒大师，往往在其中充任太学博士，教授由京师的公卿子弟以及游学之士组成的太学生。到孝桓皇帝朝，太学生已达三万人。这些师生，都享受着朝廷的俸禄和津贴。大概也正因为这一点，他们似乎有着超乎学生本分的政治责任心。他们从来就没有认识到：钻研经典这件事本身，就为帝国的文教增添了光彩，就不辜负帝国发给他们的奖学金。他们总是本着经典中那些圣人所说的

远不可及的理想标准，衡量本朝的政治。太迂阔，太不实际了。可他们又太会造声势了，他们有的是名声和号召力，许多人的家中，世代公卿，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

孝桓皇帝朝的一天，当时，大将军梁冀尚把持着国柄。一个名叫郭泰，字林宗的学子，打太原介休来到太学。他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衣着朴素但却风度翩翩。经过几天的辩驳，他的学识使得太学里的师生们接纳了他。渐渐地，他竟成了太学生瞩目的人物。其实，他的出身与任何一位同学比都相形见绌。他很小就成了孤儿，长大后，母亲见家里穷得不行，让他到县衙里弄份差使干干。可他却说："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他向姐夫借了些钱，约了同学、后来曾任本朝太尉的宋仲外出游学。到了成皋地界，一起就学于经学大师屈伯彦。那时他并日而食，衣不蔽体，常常裹着一条被单进进出出，进则蔽于前，出则蔽于后。在精通经典，练就善辩的口才并妙解音律、天文、数术之后，他决定去京师碰碰运气。

大约在延熹二年（159），郭泰拜访了一个人：当时的河南尹李膺。

李膺字元礼，颖川襄城人。其祖李修，是孝安皇帝朝的太尉。其父李益，是赵国的相国。可谓三世公卿。而他却对郭泰这样一位寒士一见如故，大加赞赏。此事一时轰动朝野，传为佳话。因为一名白衣士人，一旦被大名鼎鼎的李膺容接，就被看成是登龙门了。太学生中与郭泰齐名的，还有颖川人贾彪。由于郭泰的引荐，漆工出身的申屠蟠、小贩出身的孟敏、仆人出身的庾乘，以及农夫出身的茅容，都加入到太学生的圈子中来了。当学府中的道德文章理想和学生们年轻而冲动的生命结合到一起，加之有了学生领袖，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他们的运动叫做"清议"。不过，从一开始就蒙上了构党的名声，这完全出于一种民间歌谣的误会。

孝桓皇帝未登大宝之前，曾拜甘陵人周福为师。周福的学识，不如他的同乡河南尹房植。可是，周福却因学生而富贵，担任了本朝的尚书。于是两人的学生和宾客们争气斗胜，无事生非地编了一首歌

谣，叫作：“天下规矩房伯武（房植字），因师获印周仲进（周福字）。”并且到处传播，互相攻讦。于是他们被戏称为党人。后来又传出一首歌谣：“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但坐啸。”这是因为汝南太守宗资，任用了名士范滂为自己的下属，一切事务，惟范孟博是听。而南阳太守成，也委政于岑晊的原因。太学生们觉得有趣，也感到这种歌谣便于传播，于是他们便意气用事地指点江山，评议起人物来了。

他们有的是机灵，什么“天下模楷李元礼”，什么“不畏强御陈仲举”，什么“天下俊秀王叔茂（畅）”，把个京师搞得沸沸扬扬，以至有些公卿，为了讨个好声名，或是害怕落个坏名声，不得不屈驾亲往太学生的宿舍，和他们套近乎，攀附风雅。

除了编歌谣之外，太学生还有更厉害的一招：游行请愿。

早在郭林宗来太学之前，太学生就养成了这种习气。那时的学生领袖是颍川人刘陶、帝国皇室的宗亲、济北贞王刘勃的后裔。

孝桓皇帝永兴元年（153），冀州黄河泛滥，淹没数十万户人家。一时饿殍横野，盗贼纷起。朝廷擢派大将军梁冀府典兵事朱穆赴冀州刺史任。朱穆认为天灾事小，人祸事大，便放出风声，严惩贪官。出发之前，他收到三位冀州籍的中官送来的拜帖。他知道宦官的意图，是想让自己关照他们在冀州的亲党，于是他称疾不见。等到他渡过黄河，发现所到郡县的长官纷纷挂印而走，竟达四十多人。抵达州署后，又有几名官吏畏罪自杀。他还查得朝中大宦官赵忠之父，死后归葬冀州安平郡，竟敢僭越本朝礼法，以玉衣入殓。即刻命人发墓剖棺陈尸，收捕家属。正当冀州人心大快之际，他们的刺史大人却被槛车送京。临行之际，冀州吏民请了画工，要将他的画像置于刺史公堂之上。朱穆连忙催促槛车上路，留言于记事板上：“勿画吾形，以为吾负。忠义之未显，何形像之足纪也！”

可这件事让血气方刚的刘陶听说了。在朱穆被判决服苦役的第二天，几千名太学生从太学徒步出发，游行至北宫阙前，要求孝桓皇帝接受他们的请愿书。京师的吏民也纷纷来声援。刘陶上书的矛头，直指宦官：

“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吸则令伊、颜化为桀、跖。”

最后，刘陶竟提出由自己代朱穆去服苦役。终于，从宫里送出了回复的诏旨，赦免朱穆，去官回家。

延熹二年（159），太学生再次去北官阙前请愿。起因是边将皇甫规平羌有功当封，几个中官向他索贿，在遭到拒绝后，便陷害皇甫规下狱。请愿是由太学生张凤发起的，参加者除太学生之外，还有三百多名朝中士大夫。皇甫规被赦遣归。

本年七月，大将军梁冀倒台，朝中就剩下两大敌手：士大夫和宦官。八月，孝桓皇帝册封五位帮他倒梁的中官为侯。同月，士大夫集团便发起了攻击。

一天，北宫大门外贴出了大字报——“露布”，即一件未加封的奏书，声明是写给天子和三公府的。书中的言辞相当尖刻，指出：大将军梁冀罪虽当诛，但以朝廷天子之尊，诛杀梁氏这件事，在礼法上，不过杀一家臣耳，不同于高祖皇帝的兴邦开国，也不同于边将们的安边拓境。而皇上却因此事封谋臣为万户侯，实属不经省御，班爵错乱。高皇帝九泉得知，能不怪之？而西北的列位边将，能不一失望而解体？何况皇上所封的侯王，又都是些阉竖小人呢？孔子曰：“帝者，谛也。”即为天下审定之法，而当今之封，是否表明：帝欲不谛乎？

露布的署名，是一个小官僚：东郡白马县令、甘陵人李云。他很固执迂腐，从白马跑到三百六十多里地之外的京师，就为了说几句天子最不爱听的话。

恰恰天子这些天又特别没有理性和耐心，因为他完全沉浸在胜利的快乐之中，第一次玩弄封赏的权力，李云的话，简直是大扫其兴。于是天子震怒，下诏尚书都护用剑戟叉着李云，送黄门令掌管的北寺狱，并指定中常侍管霸和御史、廷尉轮番拷问。

偏偏这件事又引出另一个固执的小官僚——弘农郡五官掾杜众来了，他知道后，上书说自己愿意与李云同死。天子很爽快地答应了他

的要求，安排他住进了李云的监狱。大鸿胪陈蕃上疏请宥李、杜之罪，天子立刻打发他回了家。太常杨秉、洛阳令沐茂、郎中上官资又一次联名上书，天子马上扣了他们的薪水。天子如此与一个小臣计较，连他的宠臣宦官们都觉得没有必要。

管霸在天子去濯龙池祭祀老子和佛陀的时候，向他进言说："李云乃是乡野的愚儒，杜众也不过是郡中小吏，他们出于一时狂戆，不足加罪。"

天子说："那么，'帝欲不谛'，是什么话？常侍难道还想原谅他们吗？"

管霸不再申言。几天后，李、杜二人死于狱中。

天子的举措助长了中官们的气焰，连本朝威望甚高的太尉黄琼都感到无力回天，称疾不起，他在辞职报告中说完了他对当朝天子的最后忠告：

> "陛下即位以来，未有胜政。使朱紫共色，粉墨杂糅，所谓抵金玉于砂砾，碎玉璧于泥涂，四方闻之，莫不愤叹。臣世荷国恩，身轻位重，敢以垂绝之日，陈不讳之言。"

气倒了太尉不久，又气死了一位重臣，那就是朱穆。他此时又被朝廷征召，拜为尚书。他援引大汉故事，上奏天子，要求罢省中官。书奏多日，不见回音，他又执拗地去面见天子，重申自己的要求。天子仍是大怒，不予回答。朱穆也豁出去了，伏在地上不肯起来。天子进了内室，让左右咄喝他出殿。朱穆仍是不起，他希望天子能回心转意。过了好一会儿，他觉得周围没有了声响。抬起头来，才发觉只身处在深寂空旷的大殿之中。朱穆泪流满面地回了家，生了几天的气之后，他的背疽发作，惨呼而亡。

不过，士大夫与中官们的搏斗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而是拉锯式地展开了，可怜的孝桓皇帝只能充当最蹩脚的裁判。

次年，因策动倒梁事件而封侯的五位宦官之中，新丰侯单超病死，并享受了国葬。余下的四位是：武原侯徐璜、东武阳侯具瑗、上蔡侯左悺、汝阳侯唐衡。京师吏民皆知他们的势力，有民谣唱

道："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隐喻他们势能回天，骄贵无匹，恶如卧虎，随心所欲。更值得担忧的是，他们的那些不具备管理帝国能力的亲党们，竟担任着大量的地方要职，中央的士大夫们不断地处理由这些人引发的恶性事件。

延熹六年（163），司空周景和太尉杨秉以整饬吏治，罢斥贪官为借口，上书天子。得到许可之后，一连免职和追究了五十多名中央台省和地方刺史、郡长级的官吏，其中主要是中官的亲党。一时，天下肃然。

七年（164），唐衡和徐璜病卒。

八年（165），太尉杨秉又拿中官开刀。这年春天，中常侍侯览之兄、益州刺史侯参，被杨太尉以囚车槛送京师，在途中畏罪自杀。太尉从他的车中搜出大量的金银锦帛并调查出许多犯罪事实，于是上疏参奏侯览。

天子想袒护侯览，但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实在无法公然地袒护。于是至尊无上的天子，竟钻起帝国行政制度的漏洞来了。他指使尚书台的官员，去责问杨太尉的下属："设官分职，各有司存，三公统外，御史察内。今越奏近官，于经典、汉制，何所依据？请公开具对！"

这又给了杨太尉一次表现的机会。杨秉的出身，乃本朝的经学世家，又为公卿望族，太尉本人精于《易》学、《尚书》和《春秋》，从侍御史、刺史、太中大夫、左右郎将、侍中尚书做到太仆、太常和太尉，故于经典、汉制皆了如指掌。他马上让人去解释说：

"《春秋传》曰：'除君之恶，惟力是视'。以前宦官邓通懈慢，大大臣申屠嘉当面诘责，孝文皇帝从其言而黜邓通。且按汉家制度，三公之职，无所不统。"

春秋大义和前朝故事，搞得天子哑口无言，只好暂免侯览中常侍之职。

接着，司隶校尉韩愇又上书汇报了左悺和其兄太仆、南乡侯左称，聚敛为奸、放纵宾客、侵犯吏民的罪恶。"左回天"和他的兄长畏

罪自杀。这位司隶校尉又奏中常侍具瑗及其兄沛相具恭的贪污罪，吓得“具独坐”自己去监狱自首认罪，缴还侯印，天子贬其为都乡侯。

本年夏天，杨太尉薨。太尉字叔节，弘农华阴人。其世祖杨喜，从高皇帝龙兴，追杀西楚霸王，封赤泉侯。高祖杨敞，孝昭皇帝时为相，封安平侯。父杨震，孝安皇帝朝太尉，有五子，杨秉是第三子。杨太尉为人清白寡欲，尝对人言：“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

李校尉与郭处士

有些日子了，孝桓皇帝发现宦官们老是在自己的眼前转来转去，连休沐日也不出宫。便问一位小黄门。谁知小黄门一听询问，跪下就哭，委屈地说：“怕李校尉！”

天子听了，哑然失笑道：“谁让你们去惹人家！”

天子如此奚落他的奴才们，事出有因。

李校尉就是河南尹李膺。延熹三年（160），他查出北海郡守、宛陵大姓羊元群罢官时，将自己藏在郡衙厕所里的贪赃携回。李膺上表请按其罪。不料羊元群行贿中官，反将李膺论罪，罚做苦役。同时牵连了大司农刘祐、延尉冯绲。幸得司隶校尉应奉的恳请，孝桓皇帝原谅了李膺等人。延熹八年（165），应奉对帝国的前途失去信心，称疾自退，与陈蕃等举荐李膺。不久，李膺复拜司隶校尉。

李膺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士，他的威名，是他早年在边关与鲜卑人的战争中打出来的。司隶校尉一职，事实上是京畿地区的警察总监，震慑着河南尹、河内郡、弘农郡、河东郡、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包括西都长安与东都洛阳的狭长的帝国核心地带。上任十多天，他就接手了一桩大案。

京师以北的河内郡野王县，其县令张朔，是中常侍张让之弟。他贪残无道。一天，他的好奇心居然发展到想观察人类的生命是如何形

成的，于是他剖杀了一名正在怀孕的民妇。在本朝这个特别重视人伦的社会，这种行为属于十恶不赦、罪该万死之列。不过，他还没有狂妄到不把李校尉放在眼里的地步。现在，他只得弃官潜回京师，住进哥哥在宫外置下的宅第中。张让还觉得不放心，挖空了堂屋前两人合抱粗的廊柱，让杀人犯躲进去避风头。

李校尉以其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砸开了廊柱，将张朔捉拿归案。杀人犯被打得不轻，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心里一个劲地祈祷哥哥来救他，可刽子手的大刀已经劈下了。

第二天，李膺接到诏令，命他马上入宫面圣。他知道张让已在天子面前将自己告下。果然，天子诘问他为何不先请示，便加诛辟。李膺镇定地答道："《礼记》有云：公族犯罪，虽天子宥免，但有司必须依法而不从圣命。当初孔夫子担任鲁国的司寇，七天就杀了少正卯。可臣下我到任已经十多天了，私下常以未杀奸佞而自责。没想到圣上却嫌我办得太快。臣知犯上之罪难赦，特请给我五天时间，为圣上除掉此案的元凶首恶，然后，臣请就鼎镬而受烹刑。"

天子听了，无言以对。他无法驳回李校尉从经典和圣人那里援引的根据，而且，天子听出，这个顽固的家伙还要没完没了地查下去。够了够了，天子的心思不在这些烦人的事情上。他对跪在一旁的张让没好声气地说："你弟弟罪有应得，李校尉有何过错？"

张朔的头，被李校尉命人拿到京畿地区各郡县示众。李校尉手下的捕快，也在四处奔走，搞得宦官们觉得出去一趟就可能惹来麻烦，连他们的那些有张狂癖好的亲党们，也不敢穿着高档时装，乘坐豪华车子到洛阳串门走户了。

李校尉的同志们，也在各自的任上清洗和打击宦官的势力。为此，他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南阳太守成瑨与其下属岑晊、张牧收捕了辖区内买通中官的大商人张泛。不久朝廷的赦令就到了，他们抗旨行刑，并收杀其宗族、宾客达二百多人。与此同时，太原太守刘瓆与郡吏王允也抗旨捕杀了小黄门、晋阳人赵津。在侯览的唆使下，张泛之妻上书喊冤，中官们推

波助澜，天子竟下成、刘二人入狱，论罪当弃市。

接着，侯览本人，也与士大夫们发生了冲突。山阳太守翟超与下属、东部督邮张俭，检举侯览丧母还家时，大起坟茔，逾越制度。奏章被侯览压住，于是张俭掘了侯母的坟，抄了侯览的老家，并具奏其状。

徐璜的侄子、下邳令徐宣，向汝南太守李暠之女求婚不成，顿起歹念，带着吏卒冲进李家，将其女抢回府中，调戏奸淫后，射而杀之。东海相黄浮闻之，立即逮捕了徐宣的一家，无论少长，日日拷打。黄浮的属下们吓坏了，纷纷劝他住手，以免触犯中官。可黄浮的脾气也大得很，说道："徐宣国贼，今日杀之，哪怕明日因之而死，也足以瞑目了！"命狱吏将徐宣拉出去弃市，暴尸七日。

又是由于宦官的运作，翟超、黄浮下狱，被剃去须发，戴上脚镣和颈锁，罚做苦役。

继杨秉而任太尉的陈蕃和司空刘茂上疏天子，请除成、刘、翟、黄四人之罪。天子不悦，让谏官弹劾陈、刘。刘茂闭口不言，可陈蕃仍上疏不止。

此时，一位来自平原郡名叫襄楷的术士诣阙上书，列举了许多不利天子的星象，并将这些天象与上述事件乃至李云、杜众联系起来，请求天子拨冗召见，极尽所言。当然，天子对这种有些癫狂的人见多了，将他的上书扔在一边。

十多天后，这个术士又上书了，这次上书引起了天子的注意，因为襄楷说到了天子个人私生活中的疼痛之处。他说天子之所以至今无嗣，是因为宠爱宦官这样的刑残之人；又称自己藏有神书秘籍《太平经》，其中包含兴国广嗣之术。天子有了些兴趣，会同尚书台的官吏召见了他。见面后，襄楷依旧大谈中官误国，成、刘、翟、黄等人冤枉，天子失望而且愠怒。事后，尚书台的官吏以违背经艺，假借星象，诬上罔事的罪名，奏请收杀襄楷。天子表示了一点大度，判处他两年监禁。

成瑨、刘瓆终于死在狱中。他们的两个下属：岑晊和张牧仓皇逃

窜，未被收系。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怪事，太学的西门，无故自崩。事后，人们看到郭泰沉浸在思考之中。他精通《易》学和术数，西门自坏的事，让他仔细地分析起目前士大夫与太学生掀起的声势。他知道什么是否极泰来，因为他感到太学生的作风过于刚健，不计长久之策，势必遭受摧折。他更感到绝望，在太学的岁月，使得这个想要有所作为的平民出身的学者，看到了帝国从中央开始的彻底腐朽。他觉得那些热血男儿在拼命挽救着一个不可救药的帝国。前几天，他接到朝廷的征辟，他对前来征召自己的官员推心至腹地说：

“我夜观天象，昼察人事。大汉已为上天所弃，朝政不可支也。我又按卦象，运道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方今的形势是：站在岸上尚恐沧海横流将自己卷没，变为鱼虾。倘若去做官，岂不等于冲波奔浪吗？”

和郭泰同时在思考的，还有申屠蟠。他和郭泰一样，坚持不入仕途。看到那么多的学子处士参加清议运动，看到他们幼稚地热衷于政治，他就感到一种不祥之兆正在萌动。在一次清议沙龙上，他悄悄地对身边的同学叹息道：

“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彗先驱，行弟子之礼，终于酿成秦皇坑儒焚书之祸。现在的情形，也差不多了！”

他们决定离开洛阳。

郭泰和申屠蟠的退出，并非出于胆怯，而是一种更大胆的抗议。本朝的士人皆是儒学的信徒。凡是坚信这一学说的君子们，都把自己的进退出处与两个根本问题联系在一起。一是由孔子、孟子一脉相传的精神，或者叫做“道”，这是最高的政治和文化理想。按照这个理想，世界的最佳状态是由圣人统治的太平治世。圣人，首先是一位具备理想人格的导师与先知，其次才是具备推行仁政能力的帝王。这套学说又被概括为“内圣外王”四个字。第二，便是现实的，由列祖列宗构成政治秩序，或者叫做“势”。势是实现道的途径，道是势的目的。如果用一个玄学的概念来解释的话，就是：道为体，势为用。作为一

个追求圣人和仁政的君子，他出仕的目的，不应该是求得俸禄，而是将自己侍奉的帝王，由外王引导到内圣的境界。倘若列祖列宗不争气，倘若势妨碍了道，君子只得回到道的怀抱。一个天下瞩目的名士，如果能够抛弃出仕，选择清贫与隐逸，就是在勇敢地宣布：帝国已经失去了道义上的根据。

郭泰选择了一个深秋晴朗的日子。走的时候，太学为之一空。出了北门，便看到了李校尉和上百辆的车驾，京师的衣冠大儒们几乎都到了。李校尉携住郭泰的手，将他拉上自己的车子。大家簇拥着他俩向西北行去。

经过北邙山的时候，秋风萧瑟，放眼望去，草木凋零，坟墓逶迤成片。忽然，送行的队伍中，响起了高亢而悲怆的歌声：

>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古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人们来到黄河岸边，停在一处长着大槐树的高坂下，随行的仆从们忙着布置好几案和酒食。入席之后，郭泰和大家说了些道别和勉励的话语。几巡酒下去，席中唏嘘感慨之声纷起。郭泰听着身边黄河的惊涛骇浪，遥望秋水长天，北雁南飞，孤寂与怆凉，充满胸臆之间。他对大家说道：“时值今日，感激诸君厚意。郭泰无以言语，请援琴作歌，与诸君别。”

激扬的琴声伴着郭泰深沉的歌声而起，几个已有醉意的太学生也随之起舞：

>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宴罢，李校尉让大家止步，自己又与郭泰共乘一车，上了高坂，驶向渡口。大家引领望之，有人感叹道：“眇若松乔之在霄汉啊！”

申屠蟠也与大家道了别，不过他与郭泰相反，往东南而去。从此，他便绝迹于淮水流域的梁国砀山之中，筑草屋于大桑树下，终生

不出，全其高志，年七十二而逝。

郭泰的离去，给李膺等清流士大夫们带来了更大的悲愤，由于是已经出仕之人，他们的人格就不允许他们作出像郭泰、申屠蟠之类的处士们的选择。他只有拿出整个性命，去为历史负重，作荒漠中的呼喊，作壮烈的牺牲。

党狱

李校尉又接手了一桩案子。案发地点，乃是河内郡。

张成，河内人，是个术士。他的特长是风角之占，也就是通过对季节更换时的风向观察，来推断人事的吉凶。不过，他是个有名的术士，因为他用这套小把戏结交了中官们，又通过中官给天子占过几次，因而被人奉为神明。大凡昏聩的上层人物，皆喜结交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因为古人有言：“国之将兴，听于民；国之将亡，听于神。”

延熹九年（166）春风初起的时节，张成在一个甲寅日，感到风刮得很高，并吹响了柳枝。他知道，按占法，这预示着朝廷要大赦天下了。他想起儿子有个仇人，便告诉儿子这一征兆，让他放心大胆地杀了仇家。

明目张胆的杀人案发生后，杀人犯从容自若地进了李校尉的监狱。七天之后，他父亲的预言应验了。说句真话，如果没有他父亲的原因，李校尉或许就按朝廷的诏令办了。可这次，当他被叫到大堂之上，得意洋洋地准备聆听大赦令的时候，一见到李校尉那张脸，他就立刻明白：父亲的预言失灵了。

张成聪明反被聪明误，丧子之痛，让他气得快要疯了。他一连多日地奔走于宦官的门庭。最后，由他的一位在朝中做官的弟子牢修，向天子上了一封诬告信，声称：“司隶校尉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不遵朝廷诏令，滥杀已赦之民。”

天子的身体已被酒色搞得一塌糊涂，脾气也随之坏得厉害。他再也架不住中官等人的劝说，年轻而苍白的脸气成了青色，震怒之下，他让中书起草诏令，在京畿和各个郡国收捕这些“共为部党”的“党人”。可是，诏书又被退了回来，因为针对全国的诏令，必须经过太尉、司空和司徒三公的平署签字，才能公布天下。而当时的太尉正是陈蕃。

刚刚摆脱大将军控制的年轻天子，又受到帝国官僚体制中公文发行条例的掣肘，孝桓皇帝在盛怒之余，立刻发出了一道可以绕开官僚们的诏令，即一道直接针对非常事件的诏令：立即收捕李膺等人。

具体的执行者是中常侍王甫。李膺等人入狱后不久，一批涉及到二百多个党人的全国通缉令就发出了，其中的首犯是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太丘长陈寔、冀州功曹范滂等。鉴于其中的一些人听到风声后已经逃窜，故而通缉令中都附有很高的悬赏。传递通缉令的驿马和捕快的飞骑从京师出发，向帝国的各个方向扬起恐怖的烟尘。

不过，有些知名党人的脾气，古怪得使那些想靠这笔赏金发点财的家伙大失所望。陈寔一听到通缉令中有自己的名字，竟像一位士兵听到号角一样激动地说：“我不入狱，众人无所依靠。”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古印度那位伟大的圣人释迦牟尼所说的名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还没有在中土流传。陈寔镇定地去了北寺狱。

范滂也属于这类不知好歹的家伙，他刚进号子的时候，狱吏对他说：“范大人，看见过道顶头那个小神龛了吗？”

“嗯，看见了。”

“那是狱神皋陶，乃上古帝尧时的司法大臣。大凡进了号子的人，一定要先祭上一祭，以保佑自己少受牢狱之苦。大人，您不想祭拜吗？”

“你可知，皋陶乃古之正直之臣，知我范滂无罪，他会在上帝面前审理此案。倘我真的有罪，祭他又有何用？”

从此，北寺狱的狱神就无法享受人间的烟火了，因为一旦有犯人要祭皋陶，那位狱吏就会将范大人的话复述一遍。

这几位的入狱，又忙坏了太尉陈蕃，几乎每天他都在面君进谏，可每天，天子那张年轻而病态、冷漠而迷惘的脸，都让他失望和心痛。他也知道，天子对自己够有耐心的了，换了别人，不是罚做苦役，就是丢了脑袋。他更知道，自己的进谏毫无效果，作为帝国的重臣，他现在能做的，就仅仅是进谏不已罢了，因为只要帝国的朝廷中还存在着这种正义的行为，天下人就不至于对帝国完全失望。

很快，天子对他的进谏感到厌烦了，一道诏策下来，说陈蕃向朝廷举荐人才不当，罢官免职。

陈蕃的免职，使朝中无人再敢为党人讲话。

搜捕在全国展开，各郡国陆续开出了本地的党人或与党人牵连者的名单。由于帝国中央下达了硬性的任务，分派了各地的大致名额，加之各地中官势力的努力和政治派别利用此事整人，帝国的党人竟达七八百之多。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帝国的精英分子。

平原相史弼这几天一连收到驿马送来的加急文书，内容都是一个：责问他为何不将本郡的党人名单上报中央？接着，中央来了宦官使者，将自己的属下们拿到馆驿中去拷打，让交出党人。史弼忍耐不住，跑到中官下榻的地方问个究竟。那位使者沉着脸问他："天子下诏捕捉党人，旨意坚决。青州有六郡，五郡有党人，请问史大人，您有什么本事，竟将平原郡治理得连一个党人都没有？"

史弼答道："先王治理天下，划界分境，水土各异，风俗不同。他郡自有党人，本郡惟独没有，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如果一定要禀承上司的意图，谄害善良，滥施刑罚，以逞非理，那么平原郡内，家家户户皆可指为党人。如果朝廷非要我如此，在下惟有一死而已。"

中官被史弼的狡辩弄得愤怒不已，下令黄门骑士将史弼和他的僚属们悉数押进槛车，带往京师。

有像史弼那样隐藏党人的，还有自愿做党人的。

帝国的度辽将军皇甫规，派自己的马弁送了一份书信到天子那里，声言自己曾举荐张奂，这纯属结党的行为。而且，太学生们曾为

自己上书请愿，因为自己是个党人，请天子以党人之罪给予处置。

天子一笑了之，他知道这个老家伙是吃饱了撑得慌，故意来搅浑水。

太学生贾彪，此时任帝国豫州新息长。他是个崇尚道德、个性很慷慨的人。新息这个地方穷得要命，老百姓生子便杀，因为无法养活。他到任的那天，手下官吏呈上来两桩案子：城南有盗贼杀人，城北有母亲杀婴。属下让贾大人先去办城南的案子，可贾大人却说："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

没想到的是，他的举动一石二鸟，竟把城南的盗贼感动了，纷纷面缚自首。数年以来，新息人口增加了数千，男孩的名字都叫贾儿，女孩的名字都叫贾女。

党人的事件发生后，他一直在注视着动向。陈蕃罢免的消息传来，他坐不住了，对自己的同志说："吾不西行，大祸不解。"

贾彪进入洛阳时，已是次年。天子的身体越发地不行了，如果按照术士们给他列出的时间表，他每天必须和十来个女人性交，吃各种丹药和西域胡僧带来的助长性交能力的药品，祭祀佛陀和老子。天子并非乐此不疲，而是感到十分的紧张和恐怖。事实上他也做不到，但没有子嗣的苦恼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又是超乎常人的。正如大汉帝国初期的一位词赋家枚乘所言："皓齿而娥眉，命曰伐性之斧。"天子本来就孱弱的生命之树，已被伐得差不多了。恰恰此时魏郡上报，说有甘露、嘉禾两种祥瑞出现，巴郡又报黄龙现形，这给天子绝望的脸上增添了一些血色。他让朝臣和术士们商议出一个办法庆祝此事，希冀延迟天命，长乐未央。

贾彪慎重地选择了他所要拜访的人物。于是，新立皇后之父、槐里侯、城门校尉窦武和尚书霍谞的府门被叩开了。窦武对于天子的作用固不待说，而霍谞不仅为人正直，而且天子对他的印象很好，因为他在帮助天子扳倒大将军的行动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窦武下了决心，但他对后果同样不抱希望。他写了一封措辞相当直露的上疏给自己的这位天子女婿，并带着槐里侯和城门校尉的印

绶，连同上疏一道交给了天子，表明这也是最后的忠告。他的第一句话和老太尉黄琼最后的上疏几乎是一样的：“陛下即位以来，来闻善政。”上疏中除了指斥中官和为李膺等党人辩护之外，还向天子特别推荐了尚书台的几名德才兼备的贞士良佐：朱寓、荀绲、刘祐、魏朗、刘矩、尹勋、张陵、妫皓、苑康、边韶、戴恢、杨乔等人。最后，他还以道德政治观点，阐述了近来出现的祥瑞：“间者有嘉禾、芝草、黄龙之见，夫瑞生必于嘉士，福至实由善人，在德为瑞，无德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霍谞的上疏也随之送到天子手中。

天子的精力也快耗尽了，他不像前几年那样容易被激怒，看这两封上疏时，他一天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已用在御榻之上了。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亡，其言也善。他叫来王甫，让他去狱中审讯范滂等，妥当地将此案了结。窦武上疏中提到的杨乔，这个年轻人多次上疏批评朝政，天子虽不爱其文意，但却嘉其文采。杨乔容仪伟丽，天子想到自己的公主终身未有所托，读到此处，天子还让中宫去杨乔家中，传达欲招其为驸马的意思。可杨乔太不知趣，坚决辞婚。为了不让天子丢面子，他居然闭门不食，七日而死。

天子大失所望，他觉得这不仅仅是杨乔的辞婚，而且是整个士大夫集团的辞职。

由于李膺、范滂等人的执拗脾气，北寺狱的中官和狱吏发了狠地要整死他们。王甫到来时，看到范滂等被枷号在庭院的阶下，手足头颈皆不得辗转，呻吟喘息。王甫拿着鞭子，挨个地敲打着他们的木枷，来回走动着说：“唉！卿等相互举荐，迭为唇齿，究竟图个什么呢？”

阶下囚中有人答话，那是范滂的声音：“仲尼有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滂欲使天下人同心向善，清白如水，同弃奸恶，如视污泥，以为这就是王道仁政之所愿闻之事，没想到反被认为是构党。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我范滂于首阳山之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伯夷和叔齐！”

听到这里，王甫的鞭子不再挥动了，他的脸上现出严肃和惭愧的

神色，显然，他也被打动了。他下令狱史们解除了党人的桎梏。

天子的病更加绝望，再无能力过问此事。北寺狱中的犯人，这些天似乎开窍了许多，供辞中忽然交待出不少同党来。可中官们看了，却着了慌，原来这些同党，大多数是他们的子弟。这些人也要在太学读书，与党人为师为友，甚至也和士大夫有同样的理想，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成为士大夫，而不是要成为宦官。显然，李膺等在押的党人改变了斗争策略。

延熹九年（166）的六月，朝臣和术士为了挽救天子垂危的龙体，建议改元。照例，改元之际，要大赦天下。王甫等中官对天子说天时宜赦，可将党人赦归故里，交地方禁锢终身，并将党人中二百多名首要分子的姓名书于三公府，提醒三公，永不征辟这些被打成党人的士大夫。

七月十三日庚申，帝国宣布改元永康，大赦天下。

数百辆马车和上千名的士民等候在北寺狱门前。李膺、范滂等人出来时，人群一片欢呼。李膺对大家说道："吾得免此，贾生之谋也！"

每一个党人回到故里的时候，都受到了当地士人和民众的欢迎。范滂回老家汝南，经过南阳郡时，迎接的车辆达数千之多，其中的殷陶、黄穆是范滂的同乡，他俩帮着范滂应对宾客。经过此难，范滂似乎更加成熟，他忙对殷、黄二人说："公等如此，实是加重我的灾祸啊！"范滂没有参加地方的欢迎活动，悄悄地遁还乡里了。

党人们被赶出了京师，可禁锢又使天下的士子，一窝蜂地追随党人，并以此标榜自己。帝国政治舆论的中心，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那些好编歌谣和品评人物的学生，又出台了一套名人榜。其中有所谓的"三君"，为窦武、陈蕃、刘淑，言其能为一代宗师；有所谓的"八俊"，为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言其为人中之精英；有所谓的"八顾"，为郭泰、范滂、尹勋、巴肃、宗慈、夏馥、蔡衍、羊陟，言其能以德行导引士人；又有所谓的"八及"，为张俭、翟超、岑晊、苑康、刘表、陈翔、孔昱、檀敷，言其

能导人追随宗师；还有所谓的“八厨”，为度尚、张邈、王孝、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言其能以财物营救士人。这个名人榜，显示了以党人为核心的清流士人组织的清晰轮廓。当然，也为他们的政敌开出了更为详尽的黑名单。

孝桓皇帝在改元六个月后就宾天了，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主持朝政之际，党人大都恢复了自由，主要的党人如李膺等人皆被起用。可朝廷一直没有下过正式的诏令，宣布解除党禁。所以在此期间，中官们仍旧利用天子的诏令，一再地重申党禁。随着大将军的自杀，被起用的党人也随之被抄杀或废黜，党人之禁，在新天子的治下，看来是没有解除和平反的希望了。

话再回到本朝。

建宁二年（169），张奂、谢弼上表事件之后，长乐卫尉、育阳侯曹节生了场大病，天子下诏，拜他为车骑将军，以便出宫休假养病。以中常侍侯览为长乐太仆，代曹节总领禁中。

侯览最恨党人，他一直盯着他的仇家、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恰恰此时他接到一封控告张俭的上书，是由张的同乡朱并写来的，说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结为部党，图危社稷，而张为党魁。他将这封上书奏明天子，天子让他草诏，下发通缉令逮捕张俭之党。

张俭知道大势不妙，这个同乡朱并的品行极其低下，曾多次请求自己为他引导提携，遭到了拒绝，他一定怀恨在心。现在，通缉令发往全国，天下虽大，可孑然一身，何处可逃？

不过张俭毕竟是个刚健顽强的人，他身上流着英雄的血脉，他的高祖张耳是与高皇帝同时起兵，争雄天下的豪俊，立为赵王。可是现在，这点乱世英雄搏击天下的勇气，只够他的后裔作逃亡之用了。他的逃亡开始时相当窘迫，没有人掩护，跑到天黑的时候，只要看见有门的地方，就去求宿。这些人家，让他感动和后悔，因为他们看重自己的名声，开门收纳，许多人家因此而受到牵连。

他逃跑的路线一直向东，因为东面的鲁国，有他的一位靠得住的朋友、本朝太山都尉孔宙之子孔褒（字文礼）。张俭仓皇到来的时

候，出来迎接他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子，告诉张俭：家兄孔文礼出远门了。张俭见其弟如此年幼，不便多言，打算马上离开。可小孩却开口了："先生请留步，兄虽在外，难道我不能做主人吗？"说着，将张俭让进门里。

张俭知道孔都尉三年前就过世了，孔家惟有高堂健在，孔氏兄弟七人，这一位不知排行第几。他问起后，小孩告诉他："小弟名融，字文举。排行第六。"

张俭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这个小子不同一般。

孔文礼曾告诉过自己，家中六弟幼有异才，四岁时，与诸兄食梨，他就知道谦让，专捡小的吃。大人问他，他说："我为小儿，法当取小者。"十岁时随父进京，想见识一下李校尉。可当时要见李校尉的人太多，故而李校尉以简重自居，不轻易接待宾客。孔文举居然独自造访。他对看门的人说："我是李君通家世交，请予转告。"

李校尉觉得新鲜，让他进来，劈头便问："您的祖上，与我有何通家之好？"

孔融从容答道："当然，吾祖孔夫子，与大人您的祖上李老君同德比义，互为师友，所以融与大人累世通家。"

一番话，说得李校尉和座中宾客大为惊叹。李校尉又来逗他，将他拉到身边，指着桌上的水果说："您想吃点什么吗？"

"想吃。"

"您原来不知道做客的礼节，主人问吃什么，一定要谦让。"

可孔融反唇相讥："大人原来也不知道做主人的礼节，主人摆设食物，是不能问客人吃不吃的。"

坐中，有太中大夫陈炜，也来逗他说："人小的时候聪明，长大了未必出众。"

"看来，这位大人小时候一定很愚钝吧？"

这个小机灵，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李校尉叹息一声说："卿将来

必为伟器，可惜我老了，看不到您成就的那一天了。”

张俭将自己的事告诉了孔融。没几天，风声忽然紧了起来。孔融告诉张俭，事情让鲁国相国知道了，正打算来搜捕。张俭立即谢过孔融，潜遁而去。

不久，孔融和哥哥孔褒一道被捕。审讯时，孔融对法官说：“藏纳逃犯的是我，应当由我坐法。”

孔褒对法官说：“张俭是来找我的，不是小弟之过，我甘愿受法。”

这时，他们的母亲又来自首，声称：“家中之事，由妾作主，应当罚妾才是。”

法官左右为难，只得上报朝廷，诏书下达，命地方判处孔褒下狱。

张俭继续逃亡。一个月后，他来到东莱郡黄县的一个大户人家，主人名叫李笃。第二天，李家大门外站满了军士，县令毛钦因为李笃的身分，没有直接冲进来拿人。李笃忙着出来，将县令迎到大堂的主席上坐下，向他顿首，说道：“大人，在下知罪，张俭负罪亡命，现确在李某家中。大人试想，他是朝廷通缉之人，大人又操兵到此，在下就是想藏，也藏不住。可张俭为天下名士，今日逃亡，亡非其罪，大人忍心逮捕他吗？”

毛钦的反应也令人吃惊，他起身移向李笃，抚着李笃的背说：“古代贤人蘧伯玉以独为君子为耻，如此大仁大义之事，为何只能由足下一人来做？”

“在下虽然爱好仁义，可现在，大人截去一半了！”李笃流着泪答道。

毛钦叹息而去。

李笃让张俭持信去北海找一位叫戏子然的人。在戏子然的护送下，张俭由渔阳郡出关，流亡塞外。

张俭一直没有归案，让中官们大为气恼。这时曹节的病好了，向天子交还了车骑将军的印绶，诏令复为中常侍。不久，又进为大长秋，秩二千石。这是中官的最高职位。

冬天，京师奇冷，可大长秋雪上加霜，打算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一场令人齿寒的大狱。他向天子上奏，建议将一些禁锢在地方的党人领袖就地逮捕治罪，首要分子即行诛杀。

年仅十四岁的天子不像他的叔父孝桓皇帝那样，整个后半生都在与党人生气。他看了上奏以后，对大长秋所说的“构党”二字，不甚了了，便问道：“何以为构党？”

“构党者，即党人也。”

天子又问：“党人为何如此可恶，而要诛杀去除？”

大长秋又答道：“他们相互举荐联络，欲为不轨。”

“不轨欲如何？”

“欲图社稷！”

大长秋的语气坚厉，天子听了有些悚然，宣布可依其奏。

很多党人已经听到风声，更知道这次事态的严重性。

被免官还乡的李膺，这些天几乎天天都接到让他逃跑的忠告。一天，他叫来家中的亲属及门生弟子，从容地与他们诀别。

“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李校尉说完自己去了京师的监狱。没多久，诏书下到他的家中，声言罪臣李膺死有余辜，妻子徙边，门生故吏禁锢在家。禁锢的名单中，漏了一名学生，他是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景顾。景毅慨然长叹：“正因为李膺是天下大贤，老夫才遣子师之。岂能因为名籍脱漏而苟且偷安！”

第二天，景大人上表辞官。

捕杀令到了山阳高平，这是王畅的老家。王司空回家，并非因为大将军事件，而是建宁元年的八月，帝国许多地区都发生了水灾，按

本朝的惯例，有大灾异发生，一定要象征性地免去三公中的一个，以搪塞天变，因而王畅被免。令中官们遗憾的是，王畅已经病死了。他再次地被免。像他这样卒于捕杀令发出之前的党人，还有河南尹刘祐、修武令宗慈、议郎蔡衍、洛阳令孔昱、太山太守苑康、蒙县令檀敷等人。

太仆杜密、名士朱寓、赵典被征召下狱，自杀。

范滂是个要犯。受诏缉捕他的是汝南郡的督邮吴导，可他一到范滂的老家征羌县，就让兵士休息，自己关上房门，伏在床上，抱头大哭。

范滂听说了，叹息一声："一定是为了我的事啊！"

县令郭揖，见范滂前来，说要自首，大吃一惊。吴导的事，就是他让人赶快告诉范滂的，意思是让他快跑，可他竟如此固执。郭揖对范滂说："天下大矣，公为何还在这里？"说完，郭揖解下印绶，表示要与范滂一道逃亡。

"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

郭揖想起，范滂的父亲死得早，他在家是长子，更是个大孝子。说话间，范滂的母亲和兄弟、儿子都来到了大堂上，范滂向母亲跪下，顿首再顿首说道："弟博仲孝敬，足以供养母亲大人。儿自归黄泉随从父亲。家中人死生各得其所。只是母亲大人生我养我，有不可割忍之恩，请大人不要徒增悲戚。"

他的母亲强忍泪水，扶起长子说："我儿今天能与李膺、杜密二公齐名，死有何恨？已有令名，复求长寿，可兼得乎？"

范滂泪流满面，跪拜辞别老母，转身对儿子说道："为父如想让你做坏事，但坏事不能做。如想让你做好事，那么，为父就不能做坏事。"

年少的儿子对父亲说："孩儿知道父亲的志愿。"

吴导跪请范滂上了槛车。送行的吏民，莫不涕下。当年，范滂遇难，年三十有三。范滂年少即举孝廉，任冀州按察使者，登车揽辔，

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除去捕杀的，党人中大部分的出路就是逃亡了。只有极少数的人，或是由于地位不显，或是由于多方营救活动，才免于牢狱之灾。贾彪和河南伊羊陟禁锢在家，不久病卒。御史中丞陈翔下狱，因没有确凿证据而释放。

已经闭门杜客的前大司农张奂，也没有能摆脱牵连。他受到现任司隶校尉王寓的控告，判为党人，遣还弘农郡禁锢。对此，他也认栽了，因为这个王寓靠巴结中官起家，到处请朝中公卿举荐自己，大家因惧惮中官，纷纷保荐，只有自己严辞拒绝，终于是遭到这个小人的报复。

袁闳，汝南南阳人，前朝太尉袁汤宗亲，以耕学为业，不喜结交。袁太尉生了三个儿子袁成、袁逢、袁隗，分别多次出任过帝国的五官中郎将、司空和司徒等最高官职。他们常常接济袁闳这个君子固穷的堂侄子，都被他谢绝了，而他们的子弟，特别是袁成之子袁绍和袁逢之子袁术，却依仗公卿世家的宠贵富奢，飞鹰走狗，行侠仗义，豢养宾客。连中常侍袁赦都与他们互认同宗，引为外援。党狱兴起，袁闳感到，像袁氏这样的家族，加之两个堂兄弟一副乱世英雄的模样，很可能被诬为党人。他对自己的几个亲兄弟说：“袁家的后代，已经不能凭借德行守住先人的福祚，却又竞为骄奢，与乱世争权，真像春秋之世操弄晋国的郤氏三族。”

他打算隐居深山，又考虑到母亲太老，不宜远遁。便花了很大的力气挖了一个环绕庭院的地下室。进去以后，就将出口堵死，留个窗口让家人送饭探视。对外放出风声，说自己匿迹山林。十八年后，袁闳卒于地下室。

袁闳的话，可以作为对二十多年之后形势的预言，但还不是眼下的现实。他自掘坟墓，埋葬了灾难也埋葬了自己。而他的两个招摇的堂兄，却不怕被打成党人，不仅如此，还开始了营救党人的行动。

袁绍是个健壮有威仪的高层贵族子弟，京城里没有他办不成的事。不过，他却非常羡慕一个党人，那便是何颙。何颙字伯求，南阳

襄乡人，在太学时，被郭泰和贾彪以及陈太傅、李校尉引为同志。袁绍佩服他，是因为他的侠义声名。他有个朋友叫虞伟高，父仇未报即已病危，何颙安葬了好友，将仇人的头提来做了祭品。时下，他变更姓名，亡匿汝南地界。由于江湖上的朋友很多，他几乎没有遇到过危险，而且大胆地出入京师，在袁绍府中饮酒击剑，慨陈大义，谋划了好几起营救党人的行动。

另一个敢于营救党人的，是太丘长陈寔。陈寔字仲弓，颍川许昌人。大将军窦武辟为官属。他是个成熟的官吏，和范滂之流不同，他在做地方小吏时，就很善于和宦官周旋。当初中常侍张让的父亲归葬颍川，全郡的豪强士绅都去吊丧，惟独没有一个名士。张让的面子快要丢尽之际，却看到陈寔持着吊仪来了。张让很是感激，一直铭记在心。陈寔以一时的屈辱，为党人留了条后路。在他的努力下，张让网开一面，算是回报了当年的一笔人情。

黑暗中的对话

党人之狱，在当年就告一段落。帝国的栋梁刚直而被摧残，不过，中官们的疾风并非所向披靡，因为士大夫们早已是劲草苍松。

这一年，名士郭泰卒于家中，年四十有四。大将军事件后，他就一病不起，党人之狱兴，他的病情加重。临终前，他让人将他扶到旷野之中，放声恸哭，既而叹道：“《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矣，但不知灭于何人！”

建宁四年，党人夏馥失踪已历两年，他的弟弟夏静用马车载着丝帛在外卖钱寻兄。这天，他来到涅阳的一个集市。忽然，一阵叫卖声引起了他的注意，寻声而去，见是一个面容憔悴黧黑，正在卖农具的铁匠，他忙上前仔细辨认。

“兄长何故沦落在此？在下是小弟夏静。”

铁匠毫无表情，也不答话，收拾起家伙就走。

夏静尾随在后，一直跟到这个铁匠住宿的大车店，向店家要了个和铁匠紧挨着的铺。

夜深了，大车店中劳累了一天的引车卖浆之徒们打起了震雷般的鼾声。铁匠摇了摇身边的夏静。

“兄弟！”黑暗中，铁匠的眼里闪着晶莹的泪光。

“兄长！小弟找你多时，快跟我回家吧！”

“唉！我因守道疾恶，故为权宦所陷，隐迹山林，帮人冶铁，尚且能苟全性命。你却载物寻找，岂非加我以祸吗？”

兄弟俩执手无语。天刚亮，夏馥就消失了。

九年以后，党禁仍未解除，国事益不可堪。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天子请求大赦党人。天子竟然大怒，槛车收捕曹鸾进京，掠杀于槐里狱中。紧接着，朝廷又一次重申党人之禁，又清除了一批党人及其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甚至远房宗亲。

任何帝国，都有灭亡的一天，不过，灭亡的方式却大不相同。这表现在一点：即如果将帝国比作一座大厦的话，在颓朽将倾之际，帝国的子民是拆砖卸瓦，一哄而散，还是抱柱维持，固基支梁。秦帝国有如前者，她的统治支柱士大夫全部加入到民众的反抗行列之中，故而帝国垮于瞬息。可大汉帝国正如后者，这是因为她的文教和道德造就了一大批有教养和气节的士大夫，她的太平与稳定养育了无数的子民甚至周边的异族。她的毁灭，是由于这座大厦太老了，梁朽瓦裂，无可救药。

党锢事件，令大汉统治力量全部丧失，保存下来的精英分子们对大汉不再有眷恋之情，纷纷隐去，或者，加入了另辟地基，重造新帝国的事业。

五十多年以后，天下三分，蜀汉帝国的丞相、本朝党禁期间出生的诸葛亮在给他的嗣君、蜀后主刘禅的上疏中写道：

>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第三章
风雨如晦

年岁晚暮时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车？

——李尤《九曲歌》

胡太傅

天子加元服后，任命李咸为太尉，立执金吾宋酆之女、贵人宋氏为皇后。

第二年（173），改元熹平。就在上半年内，一连死了三个重要人物。

三月十三日壬戌，八十二岁的太傅胡广薨于任上。胡太尉字伯始，南郡华容人，以孝廉和试章奏进入仕途。继陈蕃之后出任天子的太傅，对他来说，这已是个名誉性的职务了。他在宦海中沉浮了三十多年，出任过司空、司徒、太尉和太傅，历事安、顺、冲、质、桓，以及当今天子六位帝王，创下本朝士大夫仕途的最高纪录。他在弥留之际，对帝国的朝政没任何交待，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依靠这种风格，他才能保持这样的纪录。太学生为他编的顺口溜是："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他的高寿，也来自他的这种修养境界。当然，还与他独创的养生秘方有关。他的家乡有一处长满芳菊的河流，水质香甜。孝桓皇帝朝，太傅休沐南归时，患了风疾，医生让他天天喝这里的水。病愈回朝后，太傅仍坚持用这里的菊花泡茶。太傅的性情温和忠厚，但也并非糊涂，因为他精于用人，并熟悉典章制度。陈太傅和本朝的新任太尉李咸，都出于他的举荐。他更精于平衡复杂的关系，他知道，要平衡这种关系，就要付出一些有关名声的代价，因而对太学生的顺口溜，太傅也不以为意。依靠自己的老练与圆滑，保存了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保存了整个士大夫集团的利益。但有两件事情使得胡太傅的名誉受到损伤。

第一件事发生在孝质皇帝朝。这个八岁登基的儿童，仅做了一年的天子就驾崩了，原因是吃了大将军梁冀送来的一碗面条。吃面条的前一天，他在臣下们的面前给大将军下了四个字的评语："跋扈将军"。大将军主张再找一个年幼的嗣君，而胡太傅和当时的太尉李固等人则主张立年长的清河王刘蒜为天子。在相持不下的时候，胡太傅

突然变卦，转向了大将军。李太尉被免，其职由胡太傅代任。

他的转变相当及时，因为孝桓皇帝登基后，刘蒜被大将军逼迫自裁，李太尉死于狱中。胡太傅封安乐乡侯。大将军被诛，胡太傅受到牵连，夺去爵位，免为庶人。可不到一年，孝桓皇帝又怀念起了他，觉得他不像有些士大夫那样不知好歹，于是诏拜司空。其实这是太傅意料中的事，他在仕途中多次被罢免，但复职的时间从来不超过一年。当今的天子更是喜欢他，因为他与陈太傅大不相同。何况，他也是当初与大将军和陈太傅一道，定下拥立自己为帝的重臣之一。太傅由此获得了取媚于时、无忠直之风的评价。

第二件事，他与中常侍丁肃，保持了姻亲关系。丁肃是济阴人，而胡太傅做过济阴太守，他们是老相识了。但本朝的士大夫对通婚相当慎重，太傅如此，引起了士大夫们对他的非议。

他的生活方式，堪称士大夫们的楷模。年少时家境的清寒，使他一直保持简朴的生活。他的孝行也是出了名的，直到八十岁时，他都不拄拐杖，口不言老，因为他的继母还健在，他每天都要亲自侍奉她的起居。

天子给了太傅国葬的待遇，这个待遇包括赐予东园的木材做棺具，赐予原陵的墓地，谥文恭侯，拜家中一子为郎中。出殡之日，由谒者护丧，故吏门生自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以下数百人穿着丧服跟随，这，也创下了大汉开国以来的纪录。

六年以后，天子仍怀念着老太傅，让人画了太傅的像，挂在尚书台内。后来，又召来本朝的议郎蔡邕，为这张画像作颂。蔡议郎是胡太傅的得意门生，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本朝有点身分的人，皆以死后能得到蔡议郎为自己写的墓志或像颂为企盼。蔡议郎的面子薄，人家请了，往往无法推辞。不过，他心里十分清楚，为死人写的文字，是写给活人看的，所以总是要往好里说，说违心的话。他承认写过的惟一的一篇毫不惭愧的作品，是郭泰的墓志《郭有道碑》。这话是他在郭泰的葬礼上，悄悄地对涿郡人卢植讲的。

现在，他又在作违心的文字，尽管像主是自己的老师。不过这次

写得不怎么顺当，他感到：老师这个人，太复杂了，任何褒贬，对于他来说，都无以复加，因为老师的一生，说明了世上还有无是无非的事情。而这正是本朝政治生活中最真实的东西。

李太尉

五月，大宦官侯览受到弹劾，罪名是专权骄奢。接着诏令收回他的长乐太仆和高乡侯的印绶。次日，侯览估计还有更大的打击会到来，自缢而亡。在士大夫的力量刚被重创的时候，这样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竟被搞垮，完全出于他所在的利益集团内部的争斗。侯览之死，只是一个开头。

六月，京师发了大水，气候反常。幽居在南宫的窦太后生了大病，病中得到自己的母亲死于流放地的噩耗。十六日癸巳，年仅三十多岁的太后崩于南宫云台。去岁十月初七日戊子，她与天子见了最后一面。那天是她的生日，天子率群臣向她朝贺，并亲自向她敬酒，行人子之礼，并感谢她拥立自己的功劳。这使她感到非常意外。事后，她又发现自己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过了些日子她才知道，天子的回心转意，是由于黄门令董萌的努力。他劝说天子善待太后，好在天下树立孝道和威望。不过，这一切并未能改善太后的心情，抚今感昔，反而让她备加心酸，忧思成疾。

太后的死，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太尉李咸一直在家生病。他是去年三月由太仆升为太尉的，因为发生了日食，原太尉闻人袭按例免职。窦太后死后的一天，他挣扎着要起来参加朝会，并且命令备车的仆人将一种有毒的大椒捣碎了，用布囊装好，放在马车里。仆人吓坏了，老爷的脾气一向很大，但今天又变得古怪起来。仆人忙着去告诉了老爷的太太和公子们。

李太尉穿好朝服，对聚在面前的家人说：“太后有援立天子之大功，可身陷大难。驾崩之后，中官竟以衣车载太后之尸，置于城南市

舍之中，欲以贵人之礼葬之。幸而天子圣明，诏以太后之礼发丧于天下。可中官曹节、王甫又起歹念，阻止太后进入孝桓皇帝的陵寝，使之不得配食先帝。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天子诏令公卿，大会朝堂，商议此事，老夫定要去辩白是非。倘若太后别葬他处，老夫吞椒自尽，绝不生还！”

公卿们来到了北宫，在议事朝堂外，摘下佩剑，脱去靴履，文武分列，进入大堂。天子没有到场，诏令中常侍赵忠主持会议。赵忠用一种挑战的口吻宣布开会，并让大家主动地提出看法。

会议前的那种小声嘀咕而形成的嗡嗡的声音一下子没有了，几百个公卿大臣相互观望，莫肯先言。赵忠很高兴，他知道会有这种结果。现在，谁还敢公开与中官们对抗呢？他装出一副公道的样子，对大家说：“诸公请尽快议定，天子有诏，让在下一定在今天的朝会上定下此事。”

这时，一个声音冒了出来：“皇太后出自盛德良家，母临天下，宜配先帝，这是无庸置疑的事情！”

赵忠一看，是廷尉陈球。他想：你真是胆大，就再让你出一次风头，看你敢不敢？

“那就请陈廷尉执笔，拟定决议。”赵忠笑着说。

陈廷尉吸了口气，操笔疾书：“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聪明母仪之德；遭时不造，援立圣明承继宗庙，功烈至重。先帝晏驾，因遇大狱，迁居空宫，不幸早世。家虽获罪，事非太后。今若别葬，诚失天下之望！”

赵忠看了，脸上变了颜色，冷笑一声，对陈球道：“陈廷尉此议甚是果敢！”

陈球和李太尉一样，来时与家人告了别。他也冷笑着回敬赵常侍道：“陈太傅和大将军之事，本为冤案，太后又被无故幽闭，为臣常常痛心不已，天下为之愤慨叹息！球今日直言，会后倘若获罪，正是宿昔之愿！”

赵忠知道，陈球把话说到底了，不仅是他本人打算决一死战，而且也坦白了士大夫们借窦太后的葬仪想要做的文章。

这时，李太尉又说道：“臣以为陈廷尉的建议合情合理，这也是臣的意思。”

嗡嗡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大，终于有好几个人大声叫着：“陈廷尉、李太尉言之有理！”“就依此议！”

赵忠收拾不了局面了，他朝曹节、王甫望去。

大长秋和王常侍私语了几句，然后由王常侍说道：“先帝梁后，因其兄大将军梁冀犯逆，别葬懿陵。前朝孝武皇帝黜废卫后，由李夫人配食陵墓。今窦氏罪深，岂能与先帝合葬？”王常侍引据故事反驳大臣，得意非常。

李太尉起身走到大堂中央，再坐下，将奏章板拿在左手，右手则拿着装了大椒的布囊。他缓缓地说：

“臣以为，梁后先于孝桓皇帝而崩，大将军诛后，先帝下诏，废其陵墓为贵人冢；卫后因其子戾太子作乱，为孝武皇帝所废。此皆出自天子生前圣裁，不可与窦太后相比。当初秦始皇幽闭母后，感于茅焦之言，立即驾迎母后，供养如初。以秦后之悖乱，始皇之残暴，尚能听纳直臣之言，不失母子之恩，何况窦太后尊号在身，援立圣明，光隆皇祚，且又不因为获罪而驾崩呢？太后以当今天子为子，天子岂能不以太后为母！子不能黜母，臣不能贬君，此乃天经地义！如果太后不与先帝合葬，即陷天子于不仁不义，过失之大，重于始皇！臣现在左手持章，右手执药，自去诣阙，亲奏天子。倘天子不省臣奏，臣当吞药自裁，于黄泉之下，觐见先帝，具陈得失！”

说完，李太尉起身而去。会议不了了之。

还是由于黄门令董萌的作用，天子下诏，葬太后于孝桓皇帝的宣陵。七月二日癸丑成礼。

八月，黄门令董萌被捕，罪名是谤讪永乐宫董太后，死于狱中。

事情还没有个完。

段将军

九月的一天夜里，几个黑影从太学的宿舍中潜出来，向城北走去。巡查宵禁的骑兵，在京城的街道上纵横穿梭，居然没有发现他们。

次日，北宫南门外的巍巍峙立的朱雀阙上，题着几个醒目的白字，书法疾劲：

“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公卿尸禄，无忠言者！”

观者如云。一时京师的公署官府、市井闾巷、酒馆妓院又有了谈资。负责侦察此事的，是司隶校尉刘猛。他接到诏令，必须在十天内破案。对他来说，破案并不难，他也作了调查，知道是太学生所为，但他就是不愿搜捕，因为他也暗自为这条匿名标语叫好。

一个多月了，案犯尚未落网。刘猛被免职，迁为谏议大夫。大长秋指定御史中丞段颎代刘猛之职。此人一介武夫，司法侦察那一套对他来说至为繁琐，和打仗一样，他指挥铁骑一排排地向太学里面冲，冲得太学生狼奔豕突，最后，几根长绳，系了上千的太学生，押往监狱，统统算作案犯，打的打，关的关，然后上奏结案，大长秋对此深加赞赏。在大长秋的授意下，新任司隶校尉上书弹劾前任，刘猛被判处苦役。

段颎出任司隶校尉这件事，把禁锢在弘农郡的故大司农张奂将军吓了一跳。他知道麻烦事又要来了。段颎的家乡和张将军接近，在武威郡的姑臧。他的声名，也与张将军和皇甫规将军接近，俱为威震帝国西北凉州地域的边将。加之段颎字纪明，张奂字然明，皇甫规字威明，因而帝国的朝野称他们为“凉州三明”。段纪明年少时弓马娴熟，轻财尚侠，从一个管理孝顺皇帝陵园的小吏到破羌将军、新丰县侯的历程，记录了他身经百战的累累功勋。段将军虽是个武夫，但不是个残暴的军人。他爱护士卒的名声播在帝国的朝野，士兵生了病，他都要亲自看望，甚至亲手为之裹扎创口，士兵皆愿为效死而战。在边关

十多年，段将军未尝一日睡过好觉。建宁三年（170），他指挥了帝国与东羌的战争，斩首一万九千余级，俘获无数，东羌遂平，并在安定、汉阳、陇西三郡安置了投降的部落。这一年春天，天子念他辛劳，诏征还京师。段将军带着汉、胡步骑五万多人、汗血千里马和万余口生俘来到京师，刚到远离京师的长安县西境，就受到天子特使的迎接和慰劳，班师的队伍长达数十里，旌旗蔽日，鼓角震天。进入京师后，即拜为侍中、执金吾和河南尹。

段将军和张将军的过节，开始与他们的人格无关，而是出于各自不同的战略观念。在一次对羌人的战争中，张将军主张招抚，而段将军主张讨伐，作为军人，他们也曾为了立功而争夺出战的机会。就这样，两人之间有了意气之争。不过，他们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也建立在战争之中，为常人所不及。孝桓皇帝朝，天子曾为张将军久不出兵击羌而大动肝火，段将军马上向天子面陈韬略，点出他的老同行按兵不动的妙处，使天子豁然开朗。

张奂担心的是现在的段将军。与自己相较，段纪明有一点令人担忧，那就是他的儒学修养相当欠缺，他和一切军人一样，没有政治头脑。残酷的战争，使得他把人世间一切高尚的东西看得很轻，而把及时的感官享乐和财富、地位看得很重。这次因搜捕太学生而迁为司隶校尉，说明段纪明为保富贵，与中官结党。因而他的军事才能就成了张扬中官权势的威力。

还有一件事，让张奂最为担心。

扶风人苏谦，是张奂的世交挚友。可苏谦又与段颍的好友——魏郡人李暠有怨恨。李暠便在出任司隶校尉期间，找了个由头将苏谦捕杀了事。谁知道苏谦的公子苏不韦是个血气方刚的人，他将父亲埋进土中，发誓不报此仇，不举行葬礼。于是他变更姓名，外出结交江湖侠客，天天寻找机会。本朝的风俗和法律，都同情和鼓励复仇，因此李暠也很紧张，一直没有放松对苏不韦的追捕。可过了许多年，不见动静，李暠也就不以为意了。不久，他升迁为大司农。

一天夜里，苏不韦突然从李司农卧室的地砖下面冲出来，持刀砍杀。李司农大呼救命，夺路而逃，室中侍寝的小妾和一个小儿被苏不

韦斫杀。接着，苏不韦又从另一间屋子的地下突出，搜杀李司农。这时，李司农才发现：家中的地下，已被苏不韦挖空了。他惊恐万分，一边布置搜捕，一边让人用厚木板压在地上。自己从一个房间，移到另一个房间，吓得魂不守舍。第二天，李司农又得到报告，说自己父亲的头，被人从坟墓中掘出，挂在京师的闹市口。李司农大索京城，不得要领，又怒又气，吐了几大口血，便命归黄泉。

逃亡中的苏不韦在等待到一次朝廷的大赦令之后，才公开露面回家，为父亲发丧成礼。

这些天，苏不韦突然接到仇家的好友段校尉的邀请书，请他出任司隶校尉的副官，他感到大势不妙，忙去告诉了张奂。张奂也一筹莫展，只得让苏不韦称病在家，不赴征召。

于是，张将军一直担心的麻烦事终于找上门来了。

段校尉听说苏不韦称病不来，大为震怒。他让手下的捕快头目张贤带人去苏不韦家，命他就家中斩杀苏不韦，提着人头回来复命。为了防止张贤违命，段校尉又让人给张贤的老父亲送去一杯毒酒，并捎口信说："如果你家公子拿不到苏不韦的人头，请你马上享用这杯好酒！"命令下达几个时辰以后，苏不韦一家六十多口，被全部斩杀干净。事后，张奂接到段颎发来的公文，说他作为西部边人，迁家于弘农郡，违反朝廷法规，必须马上迁回原籍敦煌。

张将军明白，这是对自己下手的信号。但他此时的处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只得采用哀告的方式了。他让人给老同事送去一封长信，请段将军看在自己父母的坟墓俱在弘农和自己老而无用的份上，垂怜施惠，并且说："如果将军不哀怜，我的一家，便为鱼肉了。"

不出张奂所料，段颎这样的刚猛之人，却吃不得软招，收回了成命。

这封信，为张将军赢得了九年的余生，他七十八岁寿终正寝。遗嘱中说自己不能和光同尘，故而被谗邪所忌，但他同时认为这就是命。晚年长期的禁锢生活，使他对自由无比珍惜，他要求将自己的遗

体盖上被子，连同卧床埋入地下，而不用棺材，因为他厌恶棺内密不透气的黑暗。

太学生事件之后，朝政在高压气候下，出现了暂时平静的局面。可段校尉并不平静，他要忙着抓人，指使他的，是中常侍王甫。

王常侍让段校尉秘密追查的案犯，据说是一伙反贼。为首的是勃海王刘悝。刘悝是孝桓皇帝的胞弟，本为蠡吾侯，后改封为勃海王。此人行为险僻，僭傲不法，出入无常，耽于酒乐，横行州郡。早在孝桓皇帝延熹八年（165），他就受到北军中侯史弼的弹劾。孝桓皇帝出于对胞弟的袒护，没有理睬史弼。但刘悝却受不了，干脆谋起反来。司法部门在控制了局面以后，请求天子废除勃海王。天子作了折中，下诏贬为瘿陶王，地盘小得只有一个县。

瘿陶王受不了穷罪，千方百计地交通关节，谋求复国。人托人，关系一直找到王常侍身上。王常侍很爽快，问他愿出多少钱？瘿陶王说五千万够不够？王常侍便拍了胸脯。永康元年（167），孝桓皇帝驾崩之前，又想起了这个弟弟，诏令复国。于是刘悝不打算付钱了，因为他已从有关线索得知，自己的复国，完全出于哥哥的怜悯，并非王甫之力。王常侍等不到这笔巨款，感到自己被人耍了，怄了一口恶气。经过他的暗中调查，明白了勃海王通过中常侍郑飒、中黄门黄腾打听到复国的原因，并将一笔数目少得多的钱，送给了这二位同事。

段校尉照办就是。十月，收捕郑飒等人下北寺狱，由尚书令廉忠上书天子，报告他们的罪行是“谋立刘悝，大逆不道”。这是天子最嫉恨的事，于是诏书下达到刘悝所在的州郡，冀州刺史奉诏并在王常侍的授意下，收拷刘悝，一直逼得他感到惟有一死才能脱离苦海，毅然自杀方才罢休。勃海王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及傅、相等属官，皆死于郡狱。王常侍等十二人封为列侯。

郑飒第二次进北寺狱了，他感慨万千，因为这一次，居然是被上次将自己从北寺狱中救出来的人关进去的。他知道，这次就别想出来了。

蔡议郎

文姬，蔡议郎心爱的独生女儿，每天早晨，她都要在父亲的指导下，练习琴曲。她知道，父亲不仅是帝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也是最负盛名的琴家。父亲的《琴赋》为人广泛传诵，父亲的《琴论》是开辟性的琴学著作。父亲能从别人的琴声中听出人性中最微妙的地方。有一次，父亲应邀去邻居家里吃饭，走至门口，父亲听到屋里传出琴声。父亲听了，掉头便回。过了一会儿，邻居过来，问父亲为何这么久还不过去。父亲说："我听出，阁下的琴声中透出了杀机。"主人大为叹服地说："蔡君高明，适才我鼓琴之际，见一螳螂正在捕蝉，我心耸然，故而琴声有异。"她知道，父亲如此高妙的琴学修养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道德的深刻体验，一是与自然的浑然默契。父亲一向很超脱，这可能由于蔡氏家族世传黄老道家的哲学。父亲的琴声，让她听到高山流水、鸟鸣猿啼、风花雪月、渔樵问答，听到君子高洁的情操和对生民的同情与关注。

不过，这些天来，她从父亲的琴声里听出了忧患和焦虑。前天夜里，父亲弹了整整一夜的琴，中间，琴弦断了一次。早上她告诉父亲，断的是第二根弦。父亲笑笑，说她只不过是偶然说中罢了。今天，父亲一大早就到庭院中弹琴，她在房里听出是孔子传授的《文王操》，这个曲子中，贯穿着一段沉痛而又坚决的旋律和一个重涩的顿音，表达了周文王的道德境界和政治志向。父亲弹着弹着，有些失态，老是重复这个顿音。终于，琴弦又一次地拨断，随之而来的是父亲的一声长叹。

"父亲，这是第四根弦！"文姬走出来，对父亲说。

"看来，这一次你不是偶然得之。"蔡邕对这个继承了自己所有灵性和才气的女儿说道。

"女儿从父亲的琴里，听出父亲正为国事担忧。"

蔡邕苦笑，未作回答。

蔡邕每天都去东观，那是帝国的皇家图书馆。他和一帮学者从事着两个研究项目：校勘五经和诸子百家典籍，编撰《后汉记》。这个《后汉记》是本朝的国史。他的同事有卢植、杨赐、韩说、张训、马

日磾等人，这是他们最胜任和最愉快的工作，也是令他们伤感的工作，他们总觉得：这是在为帝国结账。

最近，天子经常召他进宫，原因是，天子喜好辞赋和鼓琴。

天子的这两个爱好，几乎与孝桓皇帝如出一辙。当初，孝桓皇帝也曾征召自己从家乡陈留速至京师，请教琴学。他走到半路，就上书称病而回。回去后，他写了一篇《述行赋》。在赋前的序中，他说明了原因：

>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冀新诛，而徐璜、左悺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明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琴，自朝廷敕陈留郡守遣余。到偃师，己病，不得前，得归。

现在，他已在朝为官，再没有办法称病了。不过，几次进宫，他对天子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天子的智力，绝对在一般人之上。他对修辞和琴韵的领悟，来自于先天的聪慧。不过，天子似乎到此为止了，因为他总是浸淫于技巧的表现，因而天子的辞赋和琴声，总是透出浮华和浅滑。蔡邕知道，这一方面是天子的年龄尚轻，对人生的体察不深；另一方面，天子一直缺乏一位让他敬畏的老师，为他讲授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贤之道，因而缺乏人格的修养。进而他又发现，天子在政治上同样如此。天子对政事，往往能够领悟其中曲折，读大臣们的上疏，常常发出感慨之声。可天子缺乏的是决断能力，他把这个权力，交给了中常侍们。原因和前两件事的一样。蔡邕还发现，天子对自己的态度，有别于其他大臣，因为天子向自己学习的，是天子最感兴趣的东西，爱屋及乌，君臣关系中，夹杂了师生的友情。有时，天子在学琴之余，向自己咨询一些朝政。当然，蔡邕每次回答得相当谨慎，他对天子缺乏信心，而且，中常侍们常常不离左右。但是，他意识到：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渐渐地对天子加以引导，何况，自己的职务本来就是参议朝政的议郎。

蔡邕觉得自己已经深深地卷入了朝政，无法超脱，忧患也悄悄地包围了自己。

鸿都门学

熹平四年（175），蔡邕和同事们校勘五经的工作告一段落，他们发现，帝国的学术存在着很大的症结。帝国自孝文皇帝诏收天下书籍，抢救秦火余烬；孝武皇帝听从董仲舒更化之策，独尊儒术以来，《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渐得确立，帝国的各级教育体系和文官储备体系渐得完善。不过，帝国以五经试用文官，有一件麻烦事一直没有解决，那就是《五经》没有定本。

大汉立国之初，先王典籍多从秦代存活下来，从能背诵和传授全文的学者口中抢救出来，因为秦帝国的挟书令至为严厉，简册化为飞灰。可是，记忆力因人而异，加之方言、人老牙缺等等原因，记录下来的文本自然有出入。帝国一心恢复文教，胸怀又至大至厚，因此往往一部经典，因文本的不同，并立数家博士，俱为学官。至孝宣皇帝朝，五经各有三家博士，这些博士所传经典，皆用帝国通行的隶书写成，故称今文经学。出于学术和仕途的考虑，各家博士不仅严格门户，而且相互争论，都说自己的文本出自圣人亲裁。孝宣皇帝没有办法，干脆让大家到石渠阁开会，并且亲自来作决断。除了开会，就是组织学者到皇家图书馆，将收罗到的各种经典文本互相比较，取长补短，搞出一个官方的定本，作为考试的依据。

孝成皇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5），诏光禄大夫刘向等人校订皇家图书。刘向又让小儿子刘歆协助自己的工作。父子俩领着一帮学者一干就是二十年。刘向病死后，孝哀皇帝让刘歆继续主持。刘向父子在校书时，发现图书馆里藏有许多秦帝国没有烧毁的简册，当中有五经的文本。这些本子用先秦的文字——六国古文写成，有些经典或传记甚至是学官的文本中所不具备的。刘歆经过调查，得知这些本子有的来自民间的进献，有的来自考古发现，其中的一些，已经由先朝学者与今文典籍作过比较。刘歆来了兴趣，他开始校勘，最后，他相信这些古文的文本要比今文的文本可靠得多，于是他提出将古文也立为学官。在与博士官们辩论之后，刘歆失败了，因为他太幼稚了，仅仅将

经学看成了一个学术问题。帝国已经有这么多人靠经学吃饭，不能再容忍别人来抢饭碗了。再则，古文的文本尚未得到全部系统地整理，研究和传授系统没有确立，古文又为秦李斯统一小篆前的六国书体，识者寥寥。更重要的是，帝国确立经学的目的，本不专为学术，而是树立帝国的政教大纲，因此，经典的文本是否与圣人接近是一回事，而对经典的解释、宣传和活学活用则是更重要的事。帝国所立学官，皆有一套能够指导现实政治之术，甚至以《禹贡》治理黄河，以《洪范》察知天变，以《春秋》判决案件，以《诗三百》当作谏书，这种庸俗化的应用，在帝国拨乱反正、创设文教的过程中，却极具生命力。而古文经典，则缺乏这种功能。

可是刘歆还是把一个麻烦给惹下了。

世祖光武皇帝光复汉室以来，今文经学的门派分得更细，争斗也愈烈，但作为官学，它的思想渐渐不能适应朝政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开始僵化。一些士大夫在民间整理和传授古文经，解释古文经，甚至编出了识别和解释古文经的字典。这个学派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不太注重从经典中发挥出实用的微言大义，而是注重学术化的考订文献、训诂章句。二是更加复古，特别注重发掘经典中属于周代封建宗法和礼乐文化的内涵。这一点具有特别的价值，因为本朝中央皇室的权力渐趋薄弱，而士大夫往往靠着世世传习经学而充当帝国公卿；同时，他们还靠着宗法制度聚族而居，组织起一种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庄园经济，形成左右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世族或者豪强。在他们的心目中，现实中的帝国君主和郡县制统一国家的地位，渐渐让给了儒学的理想和宗族门第。征辟和察举的途径，也受他们的影响。因此，门第道德、名节、博学，就成了他们的标榜。从这个意义上讲，党锢事件，尽管是大是大非之争，也未尝不暗含了一点中央皇权和地方士族势力之间争斗的意味。而大汉消亡后至隋唐间三百多年的历史，正是士族统治天下的时代，此间，古文经学却被立为学官。总之，古文经学到这个时候，似乎开始适应起时代的需要了。

世祖皇帝本人出身士族，他有喜好古文经的倾向。肃宗孝明皇帝同样如此。因此，自世祖皇帝朝，就有人要求立古文经为学官。不过，他们都遭到了刘歆的下场。孝章皇帝朝曾以扶植微学的名义，诏

选天下高材生进京学习古文经。但古文经未能争得学官。学术会议在本朝也开了好几次，最著名的一次是孝章皇帝建初四年（79）的白虎观经学大会。今古文的重要派别都有代表参加，争吵的结果，仍以今文为主流，但古文经的一些内容也被吸收。今古文经学各自内部的相互分歧，使得经典的文本更加复杂。本朝的太学生员大大超过前朝，他们都希望考试的经文符合自己学派的文本。加之他们不太愿意专守一家之说，兼通并学，因而在试卷中杂引诸家的观点。因此，帝国不得不组织人力校订厘正经文。蔡邕他们的校勘，已是第四次大规模的行动了。

其实，蔡邕和卢植等同事们都通古文，但作为官方经学的定本，他们仍决定用今文经典作底本。他们一起给天子上书，要求公布定本，天子欣然同意了。这时，中官李巡对天子说：有的博士为了弟子在试场中争高下，竟然贿赂皇家的写经手，改动官本简册上的文字，吻合于他们的私家传本。这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由蔡议郎亲自用隶书写定经文，刊刻于石碑之上，立于太学。

这一年的三月，四十八块高一丈、宽四尺，正反面都刻有文字的石经矗立在太学讲堂前的东侧。计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五经及《春秋公羊传》、《论语》。蔡议郎一手好字，端庄浑厚中不乏清逸之气。一时间，京师和从外地赶来观看、摹写的人众，络绎不绝，车马相继，填塞街陌。

蔡邕觉得，重新强调帝国的学术和礼乐制度，可能会再次树立帝国的威望，引导天子把握国家的大体，认识国家的大政，或者，会保存帝国最有价值的东西。也许，大汉帝国这朵绚丽的花已经凋谢了，但这朵花结下的种子，却已经成活、生长、壮大，成为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那就是合理的文教制度。今后可能会有无数个帝国相继出现，但只不过是这棵大树上的花开花落罢了。

石经的树立，给蔡邕带来了一点信心。熹平六年（177），他又向天子建议恢复久已荒废的郊祀上天的祭典和在辟雍举行尊慰老人、宣扬孝道的礼仪。这些，都得到了天子的认可和兑现。

天子的想法和蔡议郎大不相同。事实上，他喜欢各种典礼，因为

从小，他就视各种朝仪为游戏。在蔡邕等大臣的指导下，他举行了国家的几个大典。可他还不过瘾，马上自作主张，大加发挥。这一发挥，使得蔡议郎大失所望。

天子喜欢辞赋，这是大汉帝国特有的文学体裁，当初孝武皇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大人赋》，飘飘然有凌云之志。辞赋的字句铺排骈丽，读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令人如痴如醉，回肠荡气。可蔡议郎却教天子一套什么辞赋为小技、道德是根本；辞赋的修辞技巧是末节、以文载道方为鹄的的大道理，让天子感到生厌，或者说，让天子无法理解，天子欣赏自己的才华，可蔡议郎他们却不以为然。这帮士大夫一天到晚就是经学经学，道貌岸然，面目可憎。于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意在天子的脑子里冒了出来。他马上找来侍中祭酒乐松和贾护，让他们召集天下善写辞赋以及能写奇字、缪书、鸟鱼虫书等美术字的人，待制鸿都门下，建立了一座鸿都门学。和太学不同的是，这所新学府专门研讨辞赋和书法，俨然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文学艺术学院，天子充当了这所学院的院长，将自己花了好大精力撰写的一部长达五十章，以上古史为题材的鸿篇巨赋《羲皇篇》当作学院的教材。这下子开了帝国学术的先例，学界哗然。本朝的士大夫以经学为立身之本，又以经学为帝国政教之本。可帝国的天子却立了一所以文学弄臣和俳优们组成的帝国学府，这实在是有悖大体。可他们不明白，天子在这里找到了自我的位置。乐松和贾护本为文学侍臣，出身平民，以他们的名望绝对召不来名士级的人物。于是，几十个无行趋势、擅长雕虫小技之徒成了鸿都门学院的生员，每天向天子形容讲述闾里市井那些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情，夸赞天子的辞章，卖弄辞藻和艺技。天子居于深宫，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新鲜和满足。他给了这些人丰厚的赏赐，待之以不次之位。

蔡邕多次谏罢鸿都门学，天子的脸色不好看。作为帝国文化的维护者，蔡议郎感到帝国最后的一块圣地也被玷污了。

酷吏

这年夏天，那位曾经给大将军窦武写信的涿郡布衣、现任帝国政府秘书长的卢植尚书，在东观编纂《后汉记》的闲暇之中，将老友蔡邕叫到一边，对他说：“阁下可认识阳球？”

这个名字，让蔡议郎出了一身的冷汗。

“阁下提起此人，莫非有什么见教？”

“卢某知道，此人是阁下叔父大人的对头。前几天朝廷罢免一批在地方施行严刑苛法和贪污横暴的官吏，阳球被控告，逮捕至京。可天子却以他任九江太守时讨伐山贼有功，特加赦免，并拜为议郎。阁下应多加提防。”

阳球属于严刑苛法的酷吏，与贪污无涉，因为他为官清廉，也有政缔才干，但性情严厉，睚眦必报。此人出身渔阳泉州的大族，又娶中常侍程璜之女为二房，少习弓马，善于击剑，酷爱申不害、韩非子的法家学说；以孝廉被举入仕，任尚书侍郎，精于朝廷法律和制度，所写奏章，为尚书台的样板。出任高唐令时，曾因执法过于严酷而被朝廷收捕，后被赦免。九江山蛮造反，朝廷以卢尚书出任太守，用怀柔之策，山蛮宾服。可卢尚书不久生病辞官，阳球接任，设了圈套，将山蛮歼灭殆尽。当然，阳球更明白山蛮造反的原因，是帝国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和残酷压迫，于是，他又杀了不少奸吏。接着出任渔阳国相国，搞得郡中豪强权贵屏声息气。本朝以德治为本，故而像阳球这样的酷吏尽管整肃了社会秩序，但口碑总是不佳。作为一个出了名的酷吏，阳球刻薄的性格和他所崇尚的以峻法理国的思想既相一致又相矛盾。他对法律的无比执着，基于他刚猛狭隘的个性力量，他从来就没有畏惧过任何权势。但这一力量又使得他常常将法律当成宣泄个人意志的手段：置人于死地而后快；或者，公报私仇，甚至犯法。他最初的声名来自于他对法律的公然对抗。当时，有郡吏污辱阳球的母亲，少年的阳球纠合了十来个小兄弟，把那个郡吏家中杀了个鸡犬不留。

阳球和蔡议郎叔父蔡质有过节，这个过节完全出于个人的恩怨。可事情无独有偶，阳球还与蔡议郎的对头、大鸿胪刘郃相善。现在这个酷吏来到了京师，对此事一定不会甘心。因此，卢尚书及时地将消

息通报给老朋友。

可是，蔡议郎是个文人，他能有什么办法？只是出身冷汗，日日小心提防罢了。

不久，朝廷又拜阳球为将作大匠，掌管帝国的重要工程和器械制造。继而又拜尚书令。

次年二月，天子更加醉心于他的学院，下诏对全国招生，命中央和地方官僚推荐，并许愿要给鸿都门学的毕业生分配最好的职业：出则为刺史、太守，入则为尚书、侍中，甚至可以封侯赐爵。但这一举措却起了反作用，鸿都门学的生源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因为士君子们已经把它看成是不学无术、钻营取巧之徒汇集的野鸡大学。后来，天子还令人将乐松、江览等三十二名鸿都门学学者画像立赞，劝诫天下学子。大臣们纷纷上书劝止，新上任的尚书令阳球也切言不可，告诫天子以太学为重，速罢鸿都门之学，以销天下之谤。所有的书奏，天子皆不省。

三月，朝廷宣布改元“光和”。因为本年的二月，发生了比较大的日食和地震，天子希望通过改元顺从天意。但上天并没有体会他的苦心，一连又降下几次比日食和地震还要令他恐慌的灾异。四月，天子贴身秘书、顾问们的办公室——侍中寺里养的一只下蛋的母鸡突然打起鸣来，从此变成了一只公鸡。六月，有人报称在天子的寝室温德殿东边的庭院中看到一道黑气，长十多丈，像一条龙。七月，又有人报称看到一道青色的霓虹降到南宫玉堂后殿的庭院。天子着了慌，叫来了几位有学问的大臣询问原因和消解的法术。他也知道，对这种事情，宦官和鸿都门学院的教授们只有茫然相顾的份。

会议在南宫金商门崇德署召开。天子仍未到场，又让曹节和王甫召集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议郎张华、蔡邕、太史令单飏到会，向每人颁授了天子的诏书——一块一尺来长的木板，上面命令发给每人一副笔砚和两块一尺长的奏章板，让书面对策，限时封囊交卷。大臣们对这种做法十分反感，因为帝国的制度规定：天子的诏书板，本朝又称之为“尺一”，必须由天子御省，再经三公和尚书台审核颁发，中官不得插手。可现在，“尺一”已经操持在中官之手，不仅是

一般的“尺一”，就连拜用官吏的任命“尺一”，中官们也能从天子手上弄来颁发。这样，天子与群臣之间便有了道“尺一”之墙，皆被中官玩弄于指掌之上。

前故太尉杨秉之子、天子的老师之一、光禄大夫杨赐仰天而叹，对曹、王二人说：“曹公、王公，我每次读《汉书·张禹传》，未尝不愤恚叹息。张禹此人，身为孝成皇帝之师，每次生病，孝成皇帝都要车驾临幸，垂问起居，可谓极尽人臣之宠。但他不能竭忠尽情，为天子谋赞国家大事，反而示意天子授给他小儿子官职，调还他远在边郡的女婿，难怪朱游要用尚方斩马剑诛之。吾以微薄之学，充当天子之师，吾家又累世见宠，却无以报国。现在，吾当此大问，只有竭忠而言，放笔直书，无所顾忌，即便有得罪之处，也只有死而后已了。二公还请多多包涵。”

时间一到，曹、王二人将诸位的对策当面封好，宣布散会。

天子第一个打开的是杨赐的对策，因为天子知道，杨赐不仅精通五经之学，还精通一门高深的学问，那就是谶纬之学。这门学问据说是孔夫子的秘学，专门回答有关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问题。“谶”为预言之意，“纬”则相对于“经”而言，是孔门阐释五经的秘典。当初，势单力薄的世祖光武皇帝就是应了一句“刘秀发兵捕不道”的谶言，便在王莽之际纷起的群雄中得了天命，因此，他宣布这门学问为帝国的天宪。尽管许多士大夫和经师曾当着他的面戳穿这些神神叨叨的理论出自汉世旁枝末学的伪造与假托，但他仍然坚信不疑，并狠狠地惩罚了这些过于迂执而没有政治原则的家伙。因为，光武皇帝也明白，在帝国臣民普遍相信天象与人间政治之间存在着直接感应的前提下，谶纬学说恰好补充了五经中所缺乏的有关天道与阴阳五行以及占星望气等方面的理论。这是一门可以直接拿来应用的政治巫术，比五经学说少绕许多弯子。当然，这套学说在给他带来权威和方便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麻烦，因为大臣们马上能够充分地应用这套理论批评朝政并形成了传统。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麻烦还对他的子孙们形成了威胁，因为野心家们或者造反者也会利用这套巫术工具推算出大汉帝国的死期，这又是后话了。

杨赐的对策中，援引了两条谶纬的说法，一条叫做《中孚经》，其中说：“霓之比，无德以色亲。”一条叫做《春秋谶》，其中说：“天投霓，天下怨，海内乱。”他认为温德殿的黑气和玉堂后殿的青虹都是霓虹之类，按照占星术的说法，象征天子政柄的北斗星运行失度，就会出现霓虹；而且，相对于天子的象征——太阳来说，霓虹是阴气，象征着奸臣或后宫。所以，杨赐马上就指出：这些怪异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天子任用中官、贪恋女色和游玩、宠幸鸿都门学中的群小。他警告天子斥远上述诸人，速征在野的君子，并制止中官们操持“尺一”，才能够消弭灾变。

天子最后打开的，是蔡议郎的对策。这份对策更加耸人听闻。蔡邕说：“这些怪异，皆是亡国的征兆，可大汉不亡，是因为上天对大汉殷勤不已，屡出妖变以示谴责，希望人君感悟，转危为安。霓虹、鸡变，都是妇人或奸小干政的结果。天子的乳母赵娆、永乐门史霍玉、都是奸邪，他们所进用的太尉张颢、光禄勋伟璋、长水校尉赵玄、屯骑校尉盖升等，都是贪图名位财物的小人。现在京师吏民中又风传宫中有个叫程大人的中官耆宿，即将成为国家大患，请天子严加提防。鸿都门学，也应该罢止。又闻陛下近来喜好工艺制作之事，必须迅速停止，以国事为务。廷尉郭禧、光禄大夫桥玄、故太尉刘宠等人，皆敦厚老成、聪明方直、忠实守正，陛下应倚重委任。”和杨赐一样，蔡议郎也多了个心眼，在对策的最后恳求天子将自己的对策保密，因为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祸。

天子看了，叹息声不断。大长秋曹节在下面听见，心里犯了嘀咕。

一会儿，天子下座，去上厕所。大长秋马上趋前，将蔡议郎的对策扫视了一遍。

蔡议郎对策中提起的那个叫“程大人”的资深宦官，正是阳球的岳父、中常侍程璜。大长秋将今天看到的东西，添油加醋地告诉了他。程璜叫来大鸿胪刘郃和阳球商议了一番。当蔡议郎接到帝国监察官署的传讯通知时，他为自己的弄巧成拙而懊丧不已。他只得上书求助于天子，说自己实在是愚憨，不顾后果。陛下应念及臣下忠言，加以掩

蔽。自己年已四十有六，又是个鳏夫，死不足憾，只恐陛下今后听不到真话了。

上书石沉大海。监察部门传讯的内容是：蔡邕和其叔父蔡质曾以私事请托刘郃，刘郃不听，他们便怀恨在心，加以中伤。蔡氏叔侄要求原告出场对质，审讯官张恕没容蔡氏叔侄多加辩解，就宣布将二人关进洛阳狱中。

负责讯问他们的狱吏叫张静。一进审讯室，张静就对蔡邕说："蔡大人，不瞒您说，告您的是一封匿名信。信上说您对刘郃怀恨在心，但也未说您有所行为，而且按照法律，原告不出面，无法定罪。不过，下官身为小小狱吏，也无力回天。大人博学多闻，古往今来，像大人这样的冤案，岂止一件？"

几天后，判决如下："质、邕二人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弃市！"接着，司法部门将判决送交天子批准。

判决是由中常侍吕强送达天子的。吕强字汉盛，河南成皋人，与丁肃、徐衍、李巡、赵祐等中官在朝野享有清忠奉公、博学多览的名声。当初大将军窦武诛后，天子大封中官为侯，吕强坚决辞去了都乡侯的爵位。现在，他向天子力陈蔡邕之冤，希望天子宽恕。天子也想起了蔡议郎的上书，于是在判决书上改批了一段话："减死一等，与家属徙守朔方郡，不得以令赦免。"后一句话是说，即便朝廷颁布大赦天下，蔡邕一家也不在赦列。

鲤鱼腹中书

又是一个秋风秋雨的时节，蔡邕和他相依为命的女儿文姬告别了京师，告别了朋友，走上了西去流放的征途。一天深夜，一个带刀的刺客窜入蔡议郎住的客店，不过他没有下手，反而纳头便拜，对蔡邕说明自己是阳球派来行刺的，他让蔡大人路上小心。一路辛苦，蔡氏家族到了与游牧民族相邻的阴山脚下的朔方郡，蔡邕和叔父去拜望郡

守。郡守王智，是王甫的弟弟，一向羡慕蔡邕的名气，蔡邕的到来，使他大为高兴，想与蔡邕结交为友，借以抬高自己的名声，再说，他也知道，哥哥和这次陷害蔡邕的程璜不大对路。他对蔡氏一家大加安慰，接着拿出一封书信给他们看。这又是阳球的书信，要求郡守相机下手，除掉蔡邕。郡守将他们安排到阴山南面长城下的五原安阳县，这里的居住条件略好一些，并告诫他们多加防范。作为一名流放犯，蔡议郎开始服苦役，他的工作是牧养军马。

一天，有人送给蔡邕一对鲜活的鲤鱼后便告辞了。他吃了鲤鱼后非常感动，因为作为不能通信的犯人，他竟在鱼肚子里收到了朋友们的书信。牧马归来，他喝了些当地用马奶酿制的带点膻味的酒，抚琴吟唱了一首相当抒情的诗：

> 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可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

朋友的书信中各诉他一个消息，即大家都在为他请求天子。特别是卢尚书，他以东观的《后汉记》因蔡议郎流放而无法修撰为借口，屡屡上书。天子也说，蔡先生的才华，本朝无人可比。

次年，蔡议郎接到大赦令，命他速还京师。可临行前的一件事，让蔡议郎改变了行程。

郡守王智平常对蔡邕看待得不错，可蔡议郎也太古板，像躲苍蝇一样躲着王太守。现在王太守下了帖子，大会宾客，为蔡议郎饯行。蔡议郎不得已而赴之。酒酣耳热之际，王太守豪情大发，起身舞蹈，并示意蔡议郎起身同舞。蔡议郎老夫子一个，不精此道，对王太守的示意表示了冷漠。王太守在众宾客面前下不了台，勃然大怒，指着蔡议郎的鼻子骂道：“你竟敢小看我！”

蔡议郎也来了脾气，起身拂袖而去。

第二天，蔡议郎在半路上命车夫改辙南行，他想到王太守的势力，便觉京师如一口陷阱在等着他。此后的十二年中，蔡邕流窜江

湖，往来居住于吴越和山东之间的亲朋好友家中。

迫害蔡邕这样的文士，并不能满足阳球的心理。担任将作大匠的职务，更不能施展他这个天生的法官的才华。他有相当理性的一面和对帝国法律的忠诚。近来一些事态的发展，令他深思，感到帝国如再不用法制来整顿一下，将不可以堪。而破坏帝国法律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官的势力集团，最张狂的，就数王甫这个家伙。

王甫一直有一块心病，那就是宋皇后。勃海王刘悝的王妃，正是当今皇后的姑妈。六年前，王甫将勃海王一家诛杀殆尽后，并不感到轻松，他一直小心提防着皇后。这些年，王甫像一只猎狗一样嗅着气味。他近来发现，天子对宋皇后毫无兴趣，因为天子的后宫添丁加口，美人如云。每年八月，朝廷中的大夫和庭掖丞都要带着相面的先生去洛阳城乡阅视良家少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于相法者，皆载还后宫。他还发现，这些新来的嫔妃们对宋皇后都很反感。王甫对她们做了不少工作，于是天子的枕边刮起了阵阵谤毁之风。九月的一天，王甫看时机成熟，便向天子密报了一件事：宋皇后因失宠和姑妈谋反被诛之事，怀恨在心，请了些旁门左道的巫师，天天在宫中诅咒圣上。

天子照例又震怒了起来，诏收皇后玺绶。皇后在冷宫中忧愤至死，皇后的父兄等亲戚并被诛杀。

第一个有反应的大臣，是卢尚书，他马上奏表，要求准许收葬宋皇后家属的尸骸，但未见成效。

宋氏作为皇后，平常对周围的中官们也是恩宠有加的，最后还是由几位黄门和常侍合资收葬了宋皇后的父兄。王甫自勃海王事件起，就开启了中官集团内部的争斗，这种争斗全为钱财和权势，毫无理想色彩，因而为自己招来了仇怨。

卖官鬻爵

这年年底，本朝又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事，在曹节和王甫的鼓动下，天子下令在西邸公开以帝国的名义卖官鬻爵，初步定下的价格是：秩四百石的官职四百万钱，二千石的二千万，以此类推，一万钱一石官秩。如欲登三公之位，再加千万；登卿位，加五百万，这是全部自费的一类。如果是被朝廷征辟或是地方察举的官员，也要交纳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费用。当然，价格还要看任职地点的经济水平而浮动。天子知道，买官是一种投资方式。这些家伙得了官职后，马上便会在任上疯狂地搜刮。但天子管不了这许多，他和中官们商议，在西园设了个秘密金库。富有四海的天子居然如此爱好聚敛财物，也是事出有因。天子出身小小的亭侯，日子并不丰裕，因此，天子常常为孝桓皇帝不懂得积攒私钱而惋惜再三；当然，这里还有他母亲董太后的缘故。这个侯王的妃子，其爱好也与民间妇人一般，老是鼓捣儿子积些钱财，以备个大灾小难的。不过她没有想到，儿子是天子，一旦开了盘子，帝国的金融便失控了。

这又引起了士大夫们的抗议，不过天子已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因为他已将帝国的政府结构彻底摧毁了。在这件开天辟地的事情之前，天子还在中官的指使下做过一次创举，那就是熹平四年（175），本朝宣布宦者可以为令。这意味着处于内廷的中官们可以合法而直接地参加到由士大夫们组成的帝国政府机构之中，而在此之前，中官们必须通过影响天子的方法间接地干预士大夫的外廷。党锢、宦者为令、公开鬻官，给帝国的主干——中央政府，砍下了致命的三斧头。

一天，天子来了兴趣，又演起了孝桓皇帝的故伎，他想听听大臣们对自己的评价。于是召来侍中杨奇，此人是杨震的曾孙、杨赐的侄儿。

天子问他：“朕比桓帝如何？”

“陛下之于桓帝，犹如虞舜比德唐尧。”

天子马上听出，杨奇的回答，是个大大的反讽，等于是说：“陛下与桓帝，是乌龟和王八，半斤对八两。”

天子讨了个没趣，只得悻悻地说：“卿的脖子硬，真是杨震的子孙。”

法治的失败

光和二年（179）三月，因为中原一带发生了大疫，照常例罢免三公，太尉桥玄、司徒袁滂被免，以太中大夫段颎和大鸿胪刘郃分别代之。段颎出自中官的安排，太尉掌兵，而段颎手上有兵，这是他依附中官的资本。

这些年来，大长秋和王常侍又在中央和地方安插了不少自己的亲信，这些亲信很快就在任上胡作非为，把帝国的声名搞得一败涂地。其中最张狂的人又与王甫有关。

此人叫王吉，是王常侍的儿子，但对王常侍这样的人来说，所谓儿子，只能是养子了。这次王吉被任命为沛相，他的心理残酷得有些变态。在郡中处决了犯人，还要将尸首大卸八块，放在马车上，贴上犯人的罪状，遍示郡中。尸首腐烂后，便用绳子串连骸骨，继续示众，人皆骇然。任官五年，杀人逾万。

一天，阳球和老朋友、大鸿胪刘同在岳父程常侍家中饮宴，程璜也感慨曹、王等中官太胡来了，一点不知收敛，搞得天下怨怒，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接着便讲了王甫以及王吉做下的一些事情。

酷吏最听不得这种事，果然，阳球先是咬牙切齿，继而拍着大腿，狠狠地说：“如果让我阳球做司隶校尉，这些王八蛋哪里还有安身之处？”

言者可能是无意，可听者却是有心。程璜有心，他怕女婿惹来祸害，连忙示意他不要胡说。刘郃更有心，阳球的话，使他看到了一丝希望。刘郃心中一直埋着仇怨，因为他的哥哥，正是当年持节去河间迎立天子的侍中刘儵，北宫政变后，因其与大将军窦武同谋而被处死。刘郃小心地做官，小心地周旋，但一直在寻求机会。不过，这些

年来，中官势力的盛大，又让他有些灰心丧气，他的谨慎渐渐蜕变成了懦弱。今天听了阳球的话，他感到震撼，同时也感到恐惧。

回来以后，他马上去找两个靠得住的老朋友、前廷尉、现任永乐太仆陈球和尚书刘纳。

陈球正色说道：“公出自大汉宗室，位登台鼎，为天下人瞻望。公当镇卫社稷，岂能与庸禄尸位之辈雷同，无所作为？现在曹节等人放纵为害，而又久在天子左右，况公之兄长刘侍中被其加害，因此，公今可速速上表，奏请天子徙升阳球为司隶校尉，有计划地收杀曹、王等人，则政出圣主，天下太平的一天，可翘足而待了！”

可刘郃听了，面有难色：“这帮中官凶竖，耳目甚多，我怕大事未成，反而先受其祸啊！”

刘纳对刘郃的犹豫大为反感，他也变了脸，说道：“为国栋梁，倾危不扶，用你做公卿干什么？”

刘郃的胆子，被两个老友的正气扶正了，于是他去走动、联络。他的老成与智慧，马上使朝廷对阳球下达了正式的任命。

四月，阳球刚刚接到任命，便收到杨赐之子、京兆尹杨彪的举报，说王甫指使手下的喽罗们在京师一带欺行霸市，非法收入已达七千多万钱。阳球听了如鲠在喉，为之扼腕。他马上让人去打听王甫的动静，还特别关照手下去看看段太尉的情况。

回报令阳球十二分的满意：王甫回私宅度假，身为三公之一的段太尉因本月发生了一次日食，正在家闭门自省。阳球马上以新拜要职，必须面圣谢恩为借口，要求天子接见。他顺利地见到了天子而没有引起中官们的怀疑。他用坚定的口气说服了耳根相当软的天子，准许他逮捕王甫、段颎，以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等人。

几天后，案犯陆续归案。除此之外，王甫的两个养子：沛相王吉、永乐少府王萌也被收捕至洛阳大狱。阳球喜欢用刑，而且爱好试验新的刑具，听到人犯的呼号，他就像三伏天饮冰一样痛快。一时间，洛阳狱中，捶笞哭叫之声，此起彼伏。

阳球怀着极大的兴趣，亲自审讯王甫父子。他根本不向人犯条列罪状，让人犯一一陈述交待，而是让他们自己招供。人犯当然想不出自己有何罪行，于是阳球顺理成章地对他们动起了大刑。他让人犯享受了审讯室里的每一套刑具，称之为五毒备极。

王萌见养父已经奄奄一息，他曾做过司隶校尉，便以前任的身分哀告阳球说：“我们父子既然都该杀头，还望阳大人看在我和你先后同事的份上，对我老父稍加垂怜吧！”

“你罪大恶极，死有余辜，还想凭借先后同事的名义苟且喘息？”阳大人冷冷地说。

王萌眼见这次难过鬼门关，又气又恨，血直往上涌。他将一口血啐向阳球：“你从前曾像奴才一样侍奉我父子，奴才敢反主子吗？今天你雪上加霜，落井下石，困扼吾辈，总有一天，这也是你的下场！”

阳球的脸还是冷冷的，他对手下说：“拿泥土将王萌的口塞上！鞭杖齐下！”

直到王甫父子三个都断了气，阳大人才打道回府。

次日，他宣布提审段太尉。可狱卒报称段颎昨晚已经畏罪自杀了。阳大人觉得很扫兴，便命人把王甫的尸体卸成几块，挂在京师西北的夏门上示众，并在旁边悬一木牌，上面大书四字：“贼臣王甫”。王氏的家财悉数没收充公，家族成员全部充军到帝国的北极——北景。阳球自信地对手下的从吏们宣布：“可以先将权贵大奸除掉，再收拾其他的奸小。至于那些横行京师的公卿大族子弟，比如袁绍、袁术那几个袁氏家族中的小儿辈，诸位可自行法办他们，哪里还用得着我司隶校尉动手！”

京师的风气一度又回到了李膺做校尉的时候，中官们不敢出宫，权贵们屏声息气。这是本朝多年来少有的大快人心之事。

四月下旬，孝顺皇帝的生母虞贵人薨，朝廷命百官会葬。回来时经过夏门，大家都看到了王甫的尸体。此时，有一个人在车中慨然落泪，他就是大长秋曹节。大长秋叹息道：“我辈可以自相残食，怎么

能让犬狗舔舐汤汁！”

大长秋命身边的小黄门通知所有的常侍：不要回家，直接进宫。他带大家一起面见天子，控告阳球酷刑施虐，好为妄作，搞得京师民怨沸腾，不宜再任司隶校尉一职。

天子见这么多心腹之人指控阳球，大为所动。马上宣布调阳球为卫尉。这是个掌管禁卫宫廷的官职，与司隶校尉官秩相当。调令刚刚拟好，大长秋就让尚书令召阳球进宫拜任。尚书台回报说阳大人外出巡视先帝陵墓了，大长秋又命用快马急召阳球，不得稽留。

阳球知道后，如雷击顶。他迅速进宫求见天子。天子总算给了他面子。他跪下便道：“巨虽无清高之行，蒙陛下恩宠，被鹰犬之任。前时虽诛王甫、段颎等，但对陛下和帝国来说，这些不过是狐狸小丑，不足以宣示天下。恳请陛下假臣一月，臣必令豺狼鸱枭各服其罪。”说毕，只是不住地叩头。

大殿上传来了一个中官发出的让人寒颤的呵叱声：“阳卫尉想违抗诏命吗？”

这个声音回荡了好几遍，阳球才绝望地拜受了诏令。

殿前的青石上，殷红着一滩鲜血。

阳球拜诏后，大长秋便按熹平四年颁布的宦者可以为令的条令，自领尚书令，执掌帝国的人事和中枢大权。以朱瑀代替王甫作为自己的辅佐。

十月，阳球的岳父程璜架不住大长秋的厚贿和威胁，告发了刘郃、陈球、刘纳、阳球谋举阳球出任司隶校尉之事，天子大怒。十月中旬，四人被捕并死于狱中。

阳球事件之后，帝国的中枢再没有打击中官的力量存在了，无论是党锢君子们的道德力量还是酷吏的法制力量。大长秋此举，结束了由王甫挑起的中官集团内部的争斗，强化了中官的集团意识。

屠夫的女儿成为皇后

光和三年（180）十二月，天子已经满二十四岁，宋皇后贬死也有两年多了。立后的问题不能再拖延下去。本月，后宫的何贵人产一子，这是天子惟一的血脉，天子非常高兴，因为和天子同枕共眠的嫔妃们多次地怀孕，却多次地流产；这个婴儿将结束大汉帝国国统屡绝的局面，而且也显示了当今天子超过孝桓皇帝的资质。于是诏下，册立何贵人为皇后。

中官们也很满意新皇后的人选，因为他们最不希望册立来自大士族的女人做皇后，以免再出现很有势力的大将军。这个皇后虽然来自帝国的帝乡——南阳，可出身过于低贱，她的家庭世世为屠户。当年进宫，也是依靠了中官，因为宫女必须出身良家。中常侍郭胜是何皇后的同乡，又主持了当年的选妃、本朝称为“算人”的工作，在接受了何家的重贿之后，何皇后凭她的姿色进入了帝国的掖庭。在宫中，何皇后还有一个更为坚硬的后台，那便是中常侍张让，因为何皇后的胞妹，嫁给了张常侍的养子。

但是，中官们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何皇后也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叫何进。他每天操着屠刀卖肉，却一直在祈祷妹妹能得到宠幸，因为就是他，在父亲死后，自作主张，贿赂中官，将妹妹当作一笔赌注，押往帝国的宫廷。苍天果不负他，妹妹终于受宠，封为贵人。何进扔掉了油腻的屠刀，拜为郎中，再迁虎贲中郎将，又出任颍川太守。皇后册封的当天，何进被召进京，拜为侍中、将作大匠、河南尹。可能是因为他的出身太微贱，中官们没有像当年对待董太后的哥哥董宠那样对待他。但是中官们忘了他的微贱可不同于别的微贱：他是个屠夫。

天子为皇子取名“辨”。由于多次失子，天子很害怕皇子养不活。向宫廷的巫师询问，回答说最好匿名养于宫外修行深的道术方士家中，长大后再接回宫中。经过慎重的考察，小皇子被送到一个叫史子助的道人家中，取了个别名叫“史侯”。

焦尾琴

由于高兴，天子的兴趣又有了增加，他对修造园林相当热衷。这年，他下令建造毕圭和灵昆两座植物园，在京师宣平门外规划土地。司徒杨赐对天子说，京师里里外外已经有西苑、显阳苑、平乐苑、上林苑和鸿德苑五所园林，够陛下您恣情纵游了，如果再造，耗费国力民力，大可不必。天子被说动了，打算停止。可他又去问鸿都门学的教授们，他们当然希望有一个新的赏花作赋的所在，便对天子说，陛下造园林与民同乐，无害于国政。天子大悦，帝国又多了一处风景名胜。

第二年，天子又为帝国的娱乐业写下了新的一页。他下令在后宫造了一条商业街，让宫女和中官们扮作市井小民和商贩，每天表演叫卖、讨价还价、起哄、争斗、盗窃等节目。天子自己穿起大款们的丝绸服装，和这些“市民们”饮宴游乐，经营生意，忙得不亦乐乎。他还喜欢养狗，拿帝国文官戴的进贤冠加在狗头上。天子继而又发明了用四匹驴驾车，比起马车来，这种驴车轻便易驭，天子亲自驾着驴车在商业街上转悠，好不自在。天子“前卫”的举动很快在京师流行了起来，把个驴贩子们弄得乐不可支，因为驴价竟破天荒地超过了马价。

娱乐业的发展需要大笔开支，天子加紧了卖官和征收。但首先得到好处的是中官们，因为各地想要升官的官员们，必须先给中官们回扣，本朝称为“导行费”，才有资格将宝物进呈给天子。为这事，中官吕强多次进谏，天子哪里听得进去。

真是锦上添花，后宫的王美人又为天子生下一子。天子抱在手上，越看越觉得像自己，马上依此意取名为“协”。当天子进而要去看看产妇时，中官悄悄地报告说王美人喝了何皇后送来的贺酒，刚刚死去。天子爆发了平生最大的一次怒火，喊着要废皇后。中官们哗啦跪下一大片，苦苦地哀求。

天子无奈，只得将新皇子抱给母亲董太后。像民间的婆媳一样，董太后与何皇后也是一对冤家。于是太后决定亲自呵护这个苦命的孩子。天子也怕这个孩子养不大，便依母亲的姓给他取了个小名叫“董侯”。天子想了好几天的王美人，不得排解，便求助于艺术，写了一篇长长而充满感伤情怀的《追德赋》。这篇佳作之所以没能流芳百

世，是因为何皇后看了以后，打翻了醋坛子，将天子的大手笔扔到火里，烧得竹简劈啪乱响。

年底，大长秋曹节和中常侍朱瑀相继病卒。以中常侍赵忠代领大长秋。

一天，远窜在吴越之地的蔡邕，见人用梧桐木烧火做饭，忽然听到烈火中传来会心的一声响，蔡议郎马上从主人的锅膛里抢出了这段木料，回家制成一张琴，刚一弹拨，琴声清亮而又绵长。蔡议郎像找到情人一样不住地抚摸琴身，烈火给这张绝妙好琴的尾部打下了一点烙印。此后，这张琴一直在流传，被称为“焦尾琴”。

蔡议郎抚摸之余，又感慨了起来：

“琴声再美，怕也只能弹奏亡国之音了！”

第四章
太平道

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

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

——汉末民谣

难民的幻觉

光和六年（183）一开春，天子便下令大赦天下，因为他的心情特别得好。朝中士大夫和中官们的内讧暂时得以缓息；去年秋天，朝廷成功地招抚了叛乱的南方板盾蛮。十月，以杨赐为太尉。年底的时候，天子西狩至函谷关，回京师时经过城南的太学。天子文思大发，在众多的太学生面前即兴作赋，并直接将赋文书写在石碑上，博得太学生们的山呼万岁，天子向他们说了些勉励的套话。在石经面前，他问起自己的老师蔡邕现在何处。臣下们不知所云，天子也只能感慨一番。

天子不知，此时，蔡议郎也正在感慨焦尾琴只能弹奏亡国之音呢。老师的感慨比他这位不太成器的学生的感慨，要意味深长得多。流亡在民间的生活，使蔡议郎多了一个观察帝国政治的角度。他觉得，大将军也好，中官也好，士大夫也好，这么多年的争斗，谁都不是胜利者。因为处于帝国这棵大树最上层的他们，这些年来兴风作雨，将帝国摇撼得损枝折干、花谢叶败之后，这棵大树的根部——帝国的民众，已经不堪经受如此的动荡。

自孝桓皇帝朝以来，民变频繁，东面的琅琊、南方的蜀郡、荆州、九江、扬州、会稽，乃至迫近京畿的河南等地，先后发生达十五六起之多。其中的一些平而复起，旷日持久。其实，任何帝国都无法将她的恩泽平均地施予自己的子民，加之地方官吏的酷虐，民众的反叛本来就是无可避免的事，招抚之或剿灭之，无妨大局。本朝自孝安皇帝时起，攻杀长吏、占山为寇的民变就已经时有发生，但都是迫于饥荒或者压榨，一时激愤所为，有的则纯粹属于聚众抢劫的盗贼团伙，大都是零星分散且规模较小的孤立之举。可是近年来的民变，有一些与以往不同的迹象。第一个迹象是：明确地打出了推翻大汉帝国的旗帜，叛乱后自称皇帝者甚多。第二个迹象是：他们似乎普遍地相信一种在民间悄然兴起、与黄帝、老子及神仙方术有关的宗教，比如

他们的首领往往自称“黄帝子”、“真人”、“太初皇帝”、“太上皇帝”等等。这说明，大汉已被他的子民们抛弃了，而且，他的子民们正在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方式联络起来反叛帝国。

这种方式便是宗教，宗教能够赋予人们坚定的信念和超常的狂热，还能赋予人们高效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在任何改变历史的时刻，这都是压倒一切物质力量的精神核能。

早在熹平六年（177），当时在司徒任上的太尉杨赐和他的僚属、司徒掾刘陶，同时上书天子，密报了一个异常的情况：有个叫张角的钜鹿人，在民间用念咒和符水为人治病。他认为人有疾病，是因为人犯了道德上的过失或不敬神灵的罪行，所以，除了用这种与神沟通的方式治疗之外，他还让人跪拜忏悔。他自称是“大贤良师”，向民众传播信奉黄帝和老子的“太平道”。据民间谣传，张角法术无边，妙手回春。十几年来，徒众达十万之多，遍及帝国的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地，已成蔓延之势，而州郡守备官员反被其迷惑，认为张角以善道教化百姓，没有危害，甚至还有信奉者。杨赐的上书中，敏锐地指出了张角之所以成气候的原因，在于本朝无法解决的一个大结症：流民问题。

大汉的开国君主高皇帝和他的战友们是一帮平民的代表，他们的理想是把土地分给单个的小自耕农家庭，然后由帝国的官吏向他们收取赋税，征用劳役。男耕女织，饱食终日，君民相安，天下太平。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社会结构，在刚刚经过战乱之后，大汉有可能组织起这样的社会，并且有能力统治这样的社会。但是，随着如此庞大的帝国极其复杂的日常生活的展开，这一简单的结构必然发生变化与错乱。人口的增加，土地需要的扩大，商业的开展，剩余资金的投放，社会阶层的升降，帝国行政机构的延伸，加之天灾人祸、对外战争等等，帝国最基层土地的主人不断地更换着。其主要趋向是：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这些少数人来自帝国的贵族、官僚、商人、地方豪强、世家大族以及善于经营的农民，他们得到土地的方法有很多，主要是通过买卖，当然，其中不乏巧取豪夺的手段。按说，私有财产的扩大对帝国政府并非一件坏事，因为这意味着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财富总数的增加，帝国只要出台相应的

管理政策并且改变税制，就可以重新适应和管理日益复杂的社会。可是，有一个基本原则是帝国无法更变的，即土地是帝国的财产，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土地只有一种合法的分配方法：由政府向农民授田，或者向勋贵们赏赐。一切民间自由进行的土地贸易都是非法的。因此，本朝采取打击土地兼并和限制私有财产的政策以维持较为原始状态下的小农经济，从而保证政府能用简单的行政方式和道德教条统治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

正因为如此，帝国的政策开始与社会发展的规律背道而驰。土地的兼并者，一方面不能向国家公布他的土地数目；一方面，他也就无法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向国家缴纳相应的赋税；同时，他也不会保障原土地所有者的生活。帝国既无法律肯定臣民享有私有财产的权利，臣民们也就无法向帝国尽自己的义务。可更为悲惨的命运却降临到了丧失土地的农民身上，没有了土地，他无法承担政府规定的赋税，他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成为土地新主人的雇佣；二是离开家园，成为流民，而这两种出路，都是以放弃自己的公民身分为代价的。他们的梦想有两个，一是最现实的：吃饱肚子，穿上衣服；一是最不现实的：生活在一个比大汉的社会还要好的社会之中，这个社会仍然用大汉君臣们常常挂在嘴上的两个字——“太平”来形容，但必须绝对平均、无私、和谐、道德、无阶级、无政府、无法律、无剥削、无天灾、无疾病。

孝和皇帝以来，土地兼并更加迅速，流民规模逐年增大。由于帝国的土地和财富聚集在大土地的拥有者手中，帝国一面要限制、打击他们，一面又不得不与他们妥协，从他们手中尽可能地多征收钱财，而帝国在如此窘迫的财政状态下，还必须赈抚和安置流民，这实在是一件没有希望的事。难怪当今天子要卖官鬻爵，因为国库里面已没有供他花销的费用了。从本朝末期一些思想家们遗留给后世的著作中可以发现，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豪民们占有成百上千顷的土地，奴婢牛马、金银珠宝无法计数，富过王侯。在帝国的户口簿上，仅为一户，但他们却役使着成百上千户的人家。可那些流民们，已经无衣无食，甚至到了“裸行草食”和“人相食”的地步。

这样，张角的宗教团体便成了流民们的归宿。由于信仰的作用，

张角的信徒中也不乏地主、富商和官宦，集中了不少的财物；流民在他的宗教大家庭里，可以憧憬他们的梦想；而地方官吏也感到张角的宗教解决了令他们头痛的社会问题，因此也有好感。所以，杨赐的上书中提出了让地方官吏安置或送回流民，孤立张角的教团，然后再诛杀魁首的策略。

刘陶的上书指出了更为迫切的问题：据他的侦察，张角的党羽已经潜入京师，活动于民众和官宦之中，大有觊视朝廷之意。应速加侦缉，并诏令天下，以重赏募收张角。

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的上书被把持中书的中官们“留中不发”了。事后杨赐因故离职，无法问及。刘陶向天子打听此事，天子王顾左右，让他把《春秋》编得有些条理，以便自己阅读。刘陶无奈，只得去图书馆消磨时光。

岁在甲子

更不知是什么原因，杨赐和刘陶上书的事情，居然被远在冀州的太平道大贤良师张角获悉。在这几年中，他加紧了部署。张角是一个有宗教激情的领袖，他觉得宗教不仅应该是人们的心灵归宿，而且应该是理想的家园，只有建立一个宗教国家，天下的苍生，才可能幸福。这个宗教国家的理想并非他的发明，而来自他珍藏的一部秘笈《太平经》的描绘。这部秘笈在宇宙学说上采用了老子和庄子的观点，但发挥的却是如何用法术和宗教信条而不是法律和道德来治理国家，直至调养个人的身心，达到长生不老的境界。这些法术和信条有许多并不来自道家，而来自五行家、方士、神仙家和墨家，而后者又是先秦时代由手工艺者组成的行会式的民间学派。这个学派一开始就采用了类似后世秘密社会的方式组织自己的成员，并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大神，会对每个人的善恶行为作出反应。这样一来，道德修养就成了宗教的戒律。所以，墨家尽管在大秦帝国时代就销声匿迹，因为法制国家绝不允许秘密结社，但墨家的信徒们凭着他们在物理和化学

上的造诣，摇身一变成了精于制造器物、炼制丹药的方士。可墨家这种特殊的组织方式也在他们心目中演化成为宗教国家的社会结构。

一开始，太平道教徒对大汉帝国存有信心，他们把实现宗教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大汉天子的身上。前汉孝成皇帝时，国事不振，齐地有个叫甘忠可的人诣阙，献上一部叫做《包元太平经》的书，说大汉虽逢天地的大终之际，但天不弃大汉，派了一个叫“赤精子”的神仙下凡，帮助大汉重新接受天命。他不知道，大汉的立国学说是儒家思想，这种思想最讨厌有神论者，在当朝大儒刘向的建议下，以“假鬼神罔上惑众”的罪名将甘忠可下狱至死。过了些年头，孝哀皇帝即位，国事益加不堪，天子久病不起，因而甘忠可的弟子夏良贺和大臣李寻等人再次以太平道劝说天子，天子相信了，下令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希望能够获得新生。李寻等人甚至开始用太平道的方式改组政府机构，但由于儒家士大夫们的抵抗，又由于天子的病并未因此而好转，于是几个太平道教徒人头落地。本朝孝顺皇帝时，又有一位齐地人宫崇诣阙，献上一部名为《太平清领书》的秘笈，并且声称：这部书是他的老师于吉在曲阳泉水上得到的神书，用红白两种丝帛装帧、青朱两种颜色书写，计一百七十卷，其中说的都是让帝王立刻能至于太平的法术。士大夫们看了，又定为妖妄不经，封存在国家图书馆里。孝桓皇帝因为忧虑无子，曾召见方士襄楷，这个方士又提起了这部有太平字样的书来。当然，他又遭到了拒绝。

张角多年来一直在钻研这部书籍，但和他的前辈们不同的是，他深知实现书中理想社会的力量，是广大的民众，而不是大汉的君臣。他还是一个出色的宗教活动家，不仅善于发动民众，而且会组织联络，安插耳目和钉子。因而在得到来自大汉中枢机构的信徒送来的情报之后，他马上召集几个大弟子和自己的两个弟弟张宝、张梁商议。

几个教团首领决定派出八名使者，以布道的名义，迅速联络，把教徒们按地域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立一个渠帅。由大方首领马元义将荆、扬地区的几万名教徒收聚起来，约在明年，即光和七年（184）到冀州南部、接近司隶校尉部的邺县结合，一举暴动。

他们之所以选择明年起事，是因为明年的干支是“甲子”，每一个甲子年都是历法的新周期的开始，可以让广大的民众相信这是新天命降临的时刻。这个时刻，象征着大汉的“苍天”将会死去，而象征着太平道“中黄太乙”神将统治天下，这个神是由代表黄帝的五帝星座正中的黄帝座加上代表天帝的太乙星座混合而成的神祇，这个神主宰的“黄天”即将诞生。于是太平道拟定新的国号就叫作“黄天太平”。

马元义向自己属下的教徒下达了命令，他自己又带着一些骨干潜入了京师。不多时，京师的小儿都会唱这样的歌谣：“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帝国政府各大机关的大门上，不时地出现用白土书写的“甲子”二字。京师的警备长官、河南尹何进觉得蹊跷，他作了侦察，但找不到头绪，因为马元义等人每次进城，都有安全可靠的人接应。这便是将杨赐和刘陶的上书扣下不发并密报给张角的人，他们竟然是中常侍封谞和徐奉。

马元义和封、徐二人约定，明年三月五日，内外俱起。

光和七年（184）元月，发生了一件让张角意料不到的事。马元义的弟子、济南人唐周上书朝廷，告发了太平道教徒的暴动计划。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羽林军卫士和五校营的军士们在何进的率领下，包围了封、徐二位中官的府第，搜出了藏于其中的马元义。几天之内，马元义布置在京师内的党羽们纷纷被捕。马元义本人，在京师的街市广场上，被用称为“车裂”的酷刑处死。紧接着，京师闭门大索，不仅在闾里街巷搜捕张角党徒，就连帝国各大机关之中，也进行了排查，先后诛杀达千余人。

在此同时，帝国政府命令冀州刺史部的所有官吏和武装力量行动起来，缉拿张角等人。

张角采取了应急的措施，派出快马，日夜驰告各方：立即起义，以头戴黄巾作为标记。二月，张角和弟弟张宝、张梁分别自称“天公将军”、“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策动冀州的教徒暴动。于是，冀州一带的安平、甘陵教徒，拘捕了安平王刘续和甘陵王刘忠；邻近幽州地带的广阳教团首领黄沙，率部攻杀太守刘卫和幽州刺史郭勋。这一系列暴动，从北部对京师形成了压迫之势。

南方的教徒以三个地方为核心，举兵响应。京师西南的南阳，是世祖皇帝的老家，这里的教团首领张曼成率众攻杀了太守褚贡。京师东南紧邻的两郡：颖川和汝南的郡城，相继被教团首领波才和彭脱率众攻陷。京师的南部也形成了威胁。

仿佛一夜之间，天下裹着黄色头巾的人头攒动，如蜂聚蚁集，“黄巾贼”攻占州郡，捕杀长官的急报，随着快马的奔蹄，涌到京师的北宫。

大赦

三月，北官的御前会议，已经开了好多天了，每次都是天子亲临，因为他也懂得，国家安危之际，还是靠大臣们才行。公卿们提出了先稳固京师的建议，诏令拜何皇后之兄、现任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封慎侯，统率京师所有的御林军和警备部队，在京师周围设置了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轘、旋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隘。从此，本朝又有了一个而且是最后一个大将军。

第二步，必须调动野战部队平定暴乱。可帝国野战军的精华都在西北边关抵御着羌人，无法调动。正在朝中的北地太守皇甫嵩参加了御前会议，他是本朝著名边将皇甫规将军的侄子，其父皇甫节为本朝雁门太守。这个家族世代经营帝国的边塞，野战经验至为丰富，加之家学渊厚，有文为儒宗、武为将表之称。和他的父辈一样，他不仅仅是个军人，而且是有政治头脑的大臣。此刻，他站出来，向天子面陈了几条不仅有关讨平黄巾，而且有关帝国前途的战略：

首先，大赦党人，解除党禁，取得人心。

其次，将西园中所藏卖官之钱拿出来招募和赏赐军士。

再次，立即在五校营士中选拔精锐，在京畿地区招募勇士，组练军队，并诏令各地的太守、刺史们就地征兵，鼓励地方士族和豪强们自行募勇讨贼。

最后，慎选人才，将兵出战。

会后，天子还向中常侍吕强询问是否应该解除党禁。吕强说："党锢久积，人情怨愤，而这些党人在地方上盘根错节，宗族和师生的势力颇大，如不加赦免，恐怕他们会与张角合谋，蔓延开来，后悔莫及啊！现在，陛下如能大赦党人，惩治贪污，整饬吏治，则天下人心，仍归大汉，盗贼不难平定。"

天子终于采纳了皇甫嵩的全部建议。

京师选募的精勇达四万多人，朝议之后，诏拜卢植为北中郎将，讨伐北部黄巾，与张角决战；诏拜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俊为右中郎将，讨伐南部黄巾。诏令各地方军队，皆受三位中郎将的节制。

卢植字子干，幽州涿郡人，才兼文武，他的文才来自他少年时的苦学，那时他和本朝最负盛名的学者郑玄一起在大儒马融的门下修习。马先生是个外戚贵胄，一点没有书生学者的寒酸气，上课的时候还要布列罗帐，熏香沐浴，并且要有倡女歌舞助兴。当然，这也是他考验学生意志的恶作剧之一。卢植这位身长八尺二寸，声如洪钟并能饮酒一石的美男子居然连眼珠子都没往女人身上转一下，因而赢得了先生的青睐。他的武略来自他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和征抚九江蛮夷叛乱的经验。加之他在涿郡地区有威望的宗亲朋党势力和太傅、司徒、司空、太尉四府的推举，他带着由五校营士组成的军队向北进发了。

朱俊字公伟，南方会稽郡上虞人，家世贫寒，但却以孝道闻名。他从小吏做起，又参加过征伐交趾南蛮的战争。由于他的精干和谋略，依仗着他在家乡招募的部曲家兵，累积军功，至拜交趾刺史。平定交趾梁龙叛乱之后，封都亭侯，征人朝中，拜为谏议大夫。这次出讨黄巾，他的部曲也编人了行伍之中。

临行之前，朱俊上表天子，要求任命他的老部下、现任帝国下邳县丞的孙坚，担任佐军司马一职。此人字文台，吴郡富春人，在江东一带颇有英名。十七岁与父亲乘船外出做生意，看见海盗们正在岸上瓜分抢来的财物，船主不敢前进。孙坚对父亲说："此贼可击，请讨之。"父亲对他说："你可别惹祸。"可孙坚操刀上了岸，用手指东划

西，大声呼叫，好像在指挥人马包围海盗。海盗们大惊，弃物而逃，孙坚追上去砍得一个首级带回船上，从此他在州府里谋到了一个警官的职位。后来又招募乡里子弟精勇千余人，讨伐会稽郡的道教徒暴乱，击破其首领、自称阳明皇帝的许昌。朝廷批准了朱俊的表奏，孙坚受命后，以他的名义征募军队，一时间，下邳、淮、泗的少年、商旅和农夫几千人响应而至。

三大将出征了，天子的紧张稍有缓解，他在思考变乱发生的原因，其中最使他不解的是，他最信任的中官当中，居然有人与黄巾贼勾结。他命所有的常侍们到自己的寝室中，把北寺狱审问封谞、徐奉的笔录掷在他们面前，没好声气地说："寡人平素与尔等，可谓共享荣华，视为一家之人。寡人常言：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尔等常说党人想要图谋寡人的社稷，将他们全部禁锢，甚至诛杀。现在，党人们依旧忠心报国，举兵平叛。可尔等反而与张角交通，尔等自己说说，该不该杀？"

中常侍们听了，一齐叩首，声称："这都是王甫、侯览两个奸贼干的，与我等无关啊！"接着，他们表示，愿意出钱赞助军队，召还各自在州郡任官的宗亲子弟。

天子听了，面色缓和，他让常侍们起来，关照他们小心谨慎，不要在国事危难之际，做出些过分的事情。再说，王甫、侯览已经作古，封、徐二人也明正典刑，勾结张角的事，死无对证。

天子斥责中官的事，朝野皆知。一些大臣又以为有了机会，纷纷上书弹劾中官，为首的是侍中向栩和郎中张钧。他们认为，百姓之所以依附张角作乱，根子在于诸常侍们放纵父兄、子弟、姻亲、宾客侵掠百姓，只需将诸常侍们的头砍下来，挂到京师的南门外，布告天下，则无需动用军队，寇乱自消。天子将他们的奏章给常侍们看，吓得他们纷纷免冠跣足，要求去洛阳狱中自首洗罪。不知怎么搞的，天子又下诏抚慰他们，让他们视事如故。没多久，向侍中和张郎中都被收系大狱，罪名是勾结张角，图谋不轨。他们都没能活着出来。

赵忠、张让等收拾了他俩之后，便又拿吕强开刀。他们告诉天子，吕强和一些党人常常在一起议论朝事，还多次地读《汉书》中的

《霍光传》。这后一件事，理所当然地激怒了天子。因为霍光是孝昭皇帝的大将军，孝昭皇帝驾崩之后，立昌邑王为君。但因昌邑王荒淫无度，霍光与大臣们在宗庙之中历数昌邑王的过错，将他废黜，改立孝宣皇帝。当今天子亦为大将军所立，这是他最忌讳的事。果然，天子大怒，让黄门卫士携带兵器押吕强来见。谁知吕强也发起怒来，对卫士们说：“我一死，天下必定大乱。大丈夫尽忠为国，怎能去对簿公堂？”说完，拔剑自刎。

天子又去和太尉杨赐讨论黄巾之事，杨太尉的调子和向侍中与张郎中差不多，说根子还在中官身上。天子又不耐烦了。一个月后，以国家发生流寇为名，免去了杨太尉的职务，以太仆邓盛代之。诏令刚下几天，天子在中书翻阅文件时，忽然看到了七年前杨太尉和刘陶密报张角的奏折，天子大惊，继而感叹，马上诏令封杨赐为临晋侯，刘陶为中陵乡侯。

战场

战事首先在南部战场展开。

皇甫嵩和朱俊各统一军，他们决定首先攻击颖川黄巾，解除最贴近京师的威胁。他们的对手是颖川太平道教团首领波才。首战并未告捷，皇甫将军在朱将军战败之后，便采取了保守的战术，进保长社，屯兵筑寨，以静制动。他需要观察对手的战法。朱将军的出战，事实上也是试探，严整的帝国正规野战部队在辽阔的野外一下子与毫无阵法但却漫山遍野的黄巾们遭遇，手足无措，不得要领。现在，不出皇甫将军所料，帝国的军队一扎下营寨，波才就率部下包围了长社。皇甫将军的部下见到数倍于己的敌军，大为恐慌。但只有皇甫将军和朱将军暗自高兴，因为帝国的军队已成了一只拳头，面对着聚拢起来的敌军主力，一旦打出去便能奏效。

就在此际，京师及时地派出一支精悍的骑兵作为援军，向长社进发。统领这支骑兵的将军，是帝国新拜骑都尉曹操。

曹操其实不姓曹，但也不知道原来的姓了，因为他的父亲曹嵩，是孝桓皇帝朝大长秋曹腾从民间抱来的养子。本朝从孝顺皇帝朝起，诏准中官养子袭爵。曹腾是沛国谯郡人氏，他担任中官首领一职，因为他是孝桓皇帝推翻大将军梁冀行动的主要策划者。不过他在士大夫中有很好的声名，他所推荐的官僚，后来大都是著名的党人。曹操的父亲曹嵩，曾出任过帝国的司隶校尉、大司农和大鸿胪等高级职务。天子开西园卖官之后，曹嵩又出钱一亿，买了个太尉做。曹操出身在这样优越的家庭，也像一切官宦子弟一样，天资聪慧，放纵不羁，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他有夜入民宅的嗜好，曾经和袁绍劫持过新嫁娘，还曾私入中常侍张让的宅第，被人发现后，舞着手戟，跳墙而出。不过，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不甘于此，他好独立思考，也不愿意按常规的途径塑造自己。他钻研过经学，但博览群书，更好法家的学说。他觉得大汉如此不振的根本原因，不能简单地从道德上归之于大将军、中官，或是士大夫的专权，而是整个社会缺乏法制，政府光靠道德这种表面文章无法高效率地运转局势，君主的权威也无法树立。他还有一定的远见，私下研习兵书，终其一生，都在探讨《孙子兵法》，给后世留下了一部最权威的注释本。因而在其他痛恨宦官的清流士大夫鄙视他的出身时，惟独乔玄老太尉欣赏他，对他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乔太尉还让他去找许劭，此人专门品评天下名士，他的话，无疑是最好的广告。许劭看了曹操半天，一言不发。曹操急了，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一定要问个明白。

许劭慢吞吞地吐出十个字："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曹操大喜而去。

熹平三年（174），曹操举孝廉，出任洛阳北部尉，进入仕途。这是个负责警备京师城门的官职。他一到任，就开始实践他的法家学说。在修缮了城门之后，他在每座城门中挂上五种颜色的大棒，有犯禁者，不管他是谁，即刻棒杀。连天子最宠幸的小黄门蹇硕的叔叔，因为不顾宵禁令，夜里出游，也死在曹操的棒下。由于曹操的背景，权贵们拿他无奈。后来找了个借口，将他外放到顿丘做县令去了。不久，又召回朝廷，拜为议郎。于是他又上书，要求为窦武和陈蕃平

反，但如石沉大海。后来他便沉默了，他深知大汉已无可救药。

担任骑兵军官，是他戎马倥偬，在马背上度过一生的开始。

五月，波才率军围皇甫嵩于长社已多日，坚攻不下。黄巾有些疲惫和松懈，但也不愿解围。皇甫将军发现黄巾的营寨都扎在有草木的地方，大概为了战马饮食的方便。在一个刮大风的夜里，皇甫将军命军士们手持火把，突出城外，冲人敌营，点燃草木和营房，纵火大呼。喊声刚起，皇甫将军一面让人在城墙上举火响应，一面亲率兵马鼓噪而出。黄巾大乱奔跑。几天后，曹操军至，与皇甫将军和朱将军兵合一处，严阵而出，与波才的黄巾在野外恶战一场，大破黄巾。波才弃军而走，帝国军队斩首数万。诏封皇甫嵩为都乡侯。

六月，南方战场又传捷报，南阳太守秦颉击破占据宛城的黄巾张曼成部，斩张曼成。皇甫嵩和朱俊继续进击汝南陈国黄巾，于阳翟和西华大破波才和彭脱，黄巾散乱，收复三郡。皇甫将军上表，将功劳归于朱将军，诏下封朱俊为西乡侯，迁镇贼中郎将；又诏皇甫嵩进击东郡，朱俊进击南阳。

本月，皇甫嵩击破东郡黄巾，生擒其帅卜巳，斩首七千余级。

北部战场的进展也相当顺利。北中郎将卢植以他的声望，很快在冀、幽二州组织起响应的军队。各地的太守、商人、大庄园主们纷纷纠合兵丁乡勇，讨伐黄巾。在这些军队中，有卢植将军的门生辽西公孙瓒和涿郡刘备。公孙瓒字伯珪，出生小吏，但有英雄气质，太守将女儿嫁给他并送他去卢植门下读书。后举孝廉，担任辽东属国长史。刘备字玄德，也是个英雄坯子。他是个没落贵族，虽为孝景皇帝的玄孙、中山靖王之后，可穷得靠贩卖草鞋和草席为生，与公孙瓒情同兄弟。可他不喜欢读书，喜欢狗马、音乐和时装，好结交豪侠之人。后来得到中山大商人张世平和苏双的接济，贩起马匹这种高档商品，因而他更有钱财纠合徒众。其中就有亡命于汲郡的河东杀人犯关羽，以及汲郡富户张飞。后世的史书上，说他们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故而又被说书人演义出桃园三结义的传奇故事。

几仗打下来，张角渐不可支，退守广宗。卢将军也不马上进攻，

命人在广宗城外建筑堡垒，挖掘壕堑，打造云梯。他要一举全歼黄巾的总指挥部。战报送至京师，朝廷相当重视这场战役，天子派出小黄门左丰前来监军。左丰不懂军事，却懂得弄钱，他让人暗示卢植向自己行贿。卢将军不知是生了气还是没听明白，左丰等了几天，见卢将军毫无表示，怏怏而回。天子问他战况，他说广宗那几个贼，哪用得着这样大动干戈。卢将军分明是故意息军固垒，不是怯战，便是故意邀功罢了。

就在卢将军即将下达总攻命令的前一天，京师来了一辆囚车，把卢将军带走了。天子对卢将军发了火，卢将军一肚子无可奈何，陈述了半天，才捡了条性命。

卢植离职，中央一时无将可遣，天子只得从西北调边将。边将姓董名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粗猛有力，能在马上左右驰射，而且很有计谋，更有野心。他在羌汉杂居的边塞长大，深知羌胡的禀性。在家种田时，羌人的酋长来看他，他竟将自家的耕牛杀了招待客人，这使得豪爽的羌人大为感动，回去后让手下送了他几千头牲畜。从孝桓皇帝时，他便跟从张奂将军与羌人作战，军功卓著并组织起自己的军队，其中一大部分是剽悍的羌人。他现任帝国的并州刺史、河东太守。朝廷的诏书下达，拜他为东中郎将，命即刻进兵冀州。

八月，董卓与张角交战，钜鹿太守郭典请他沿用卢植的步步为营、包围清剿的战略。董卓与羌人打惯了，觉得这种保守的战略十分可笑。他用骑兵在野外进击，以求速战速决，谁知无法找到主力，处处挨打。朝廷下诏责问，董卓自惭形秽，承认失败，并上书请求以皇甫将军代替自己。

战事正紧，中原地区的太平道大贤良师、黄巾军天公将军张角病故。由其三弟人公将军张梁权宜军事。张梁所统部众，是冀州黄巾的精锐。

十月初，皇甫将军带着自己的部下来到北部战场并接管了卢将军的军队。开至广宗，与人公将军的军队刚一交手，就被击溃。皇甫将军马上又命闭营休战，以观其变。郭典来见，面陈董卓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不遵卢将军的战略。皇甫将军大为赞赏，马上修书，上达天

子，陈述卢将军的功劳，又召来各部将校，布置策略。他说："黄巾贼人多势大，且群情激愤，不可正面交锋。仍用长社战法，固营疲敌，待其意志懈怠，再作突袭。贼多为本地人氐，地形人情皆较我军熟悉，又蜂拥而起，易为呼应。故我军必须严守卢将军之策，逐步包围，将其分割，使之无可联络，方可一鼓而奏凯歌，永绝大汉之患。"

皇甫将军下令部属仍在广宗筑营挖堑，打造攻具。这一点，他与卢将军的禀性一致，平常行军，每到一处，他必令军士认真地修立营寨，等军士的营寨修好后，他才入帐休息。军士们吃了饭，他才肯吃饭。

月底，皇甫将军突然命令倾营出动，悄悄接近敌堡。鸡刚叫头遍，声势浩大的攻城开始了。午饭时分，帝国军队的一支终于突进广宗城内，那些能在野外漫山遍地冲锋的流民军队，此时却不懂调度，乱成一团。张梁压不住阵脚，弃城而走，未出城即被皇甫将军的亲兵校尉截住斩杀。屠杀继续进行着，人公将军的流民部下虽然不及帝国军队训练有素，但英勇异常且视死如归，战至最后，无一人投降，五万多人，全部跳入广宗城东的滔滔清河水中。

残阳如血，皇甫将军和部下在黄昏的凄凉与悲壮中揩拭刀剑，清点战果，计斩首三万，焚烧车辆辎重三万余辆，其妇孺家属俘获甚众。又命撬开张角之棺，戮尸、斩首，传送京师。

十一月，皇甫将军与郭典太守乘胜进军，围逼下曲阳黄巾统帅、地公将军张宝。势如破竹，一鼓即下，斩杀张宝并黄巾将士首级十万多。

所有的头颅、战利品和俘虏、捷报悉数送往京师。在京师城南将头颅堆成一小山，又封上土，称为"京观"，请天子驾临观看。天子大喜，下诏封皇甫将军槐里侯，拜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在接见皇甫将军和郭太守时，天子还背诵了冀州的两首民谣：

"郭君围堑，董将不许。几令狐狸，化为豺虎。赖我郭君，不畏强御。转机之间，敌为穷虏。猗猗惠君，实完疆土。"

"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

天子对其他公卿们说："此二首谣谚，为冀州百姓歌颂郭典及皇甫嵩而作。本朝自孝武皇帝以来，遵依周礼，采风观俗。世祖皇帝以降，本朝以民谣为地方官吏的考核标准，但声望之高，未及于此。"

天子再糊涂，可对文学的兴趣与修养却让群臣称许。

天子问皇甫将军："寡人委将军为冀州牧，将军有何见教？"

"冀州刚遭战乱，惟需休息。请陛下恩准免除冀州一年田租以赡济饥民。"皇甫将军请求道。

天子依可。接着诏令朱俊将军迅速结束南方战事。

宛城是兵家必争之地，南阳郡府所在。张曼成部溃散后，黄巾又推赵弘为帅，聚集十余万众，重新拔下宛城。自六月份起，朱俊将军合荆州刺史徐璆及南阳太守秦颉所部仅一万八千人包围了宛城，打算在这里与南阳黄巾决一死战。但直至八月，战事仍无进展。因为这一万八千的精兵，无论如何也啃不动十多万人的流民军队。

朝中有人提出征回朱俊，以失职罪起诉他。但司空张温上疏极力陈述，他认为从前秦用白起，燕用乐毅，皆旷年历载，才建奇功。朱俊攻破颍川黄巾，已有功效，现又麾军直指南阳，战略已定，临阵易将，乃兵法所忌。宜给以时间，责其成功。

诏书到达，朱俊将军犯了急，下令部下猛攻不已。赵弘被杀。

黄巾残部又推戴韩忠为帅，坚守宛城。朱将军考虑到自己兵力太少，便决定攻其一点。在城西南角筑堡垒，鸣鼓攻打。黄巾也相应地将兵力集中到西南防御。战酣之际，朱将军亲率精锐从东北攻打。冲破外城。韩忠退守内城，惶恐之下，乞求投降。当时，司马张超、刺史徐璆、太守秦颉认为可以受降。可朱将军说："战争有形势仿佛但处理方式相异者，秦末，民无定主，故而奖赏归顺者以鼓励投降；可现今海内一统，只有黄巾敢于犯上作乱，此际如果纳降，则无以惩恶扬善，反而开启动乱之端。贼人利则进攻，败则乞降，放纵敌人长期寇略，决非良久之计。"

应该说，朱将军的意见极富战略眼光。可一连许多天的急攻，仍

不见成效。朱将军亲自登上城外的土丘观望动静。回来后，他恍然大悟，对部下说道：

“我知道了，贼人现在见我逼迫太紧，乞降无望，故而打算决一死战。万人一心，犹不可挡，何况十万人呢？现在我命令撤围，并兵一处，从一点进攻。贼见围解，必奋力从一角突出，突围之际，众心必定离散，此乃易破之道也。”

果不出朱将军所料，黄巾韩忠部一哄而散，争先逃命。朱将军乘胜追击数十里，斩首万余级，韩忠投降。太守秦颉气不过，亲自斩杀了韩忠。这下又惹了麻烦。刚刚被击散的黄巾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在孙夏的号召下，又聚集成势，一路杀回宛城，将帝国军队赶了出去。

朱将军大动肝火，命令军士们不得休息，再攻宛城。佐军司马孙坚身先士卒，登上城墙，冲开缺口。宛城再次攻陷。孙夏仓皇逃出。朱将军一路穷追不舍，至鄂精山斩杀孙夏及其所部万人。

南阳黄巾破散。由张角发动的各部黄巾遂平。朱将军振旅还朝，封钱塘侯，拜右车骑将军、光禄大夫。

五斗米道

十二月，大赦天下，改元中平。

中平这个年号，只不过是大汉帝国的自我安慰罢了。从此以后，大汉帝国就没有一年太平日子了。

本年七月，当董卓代替卢植讨伐冀州黄巾之际，益州巴郡的五斗米道，在又一位姓张的领袖策动下，攻占了郡城。五斗米道是太平道的一支。益州四面险要，但太平道却传播甚快。张角发动中原黄巾之际，益州有不少号称黄巾者与之响应。张修和张角一样，也用治病的方法传播太平道。不过，他自称“五斗米师”，因为他让病家出五斗米入教，并在一间静室之中思过忏悔，然后将罪过写成三份，一份埋于

山上，一份埋于地下，又一份沉于水中，称为“三官手书”。教团之中，设“祭酒”、“鬼吏”，前者传习道经，后者为人治病。他们的道经不是《太平经》，而是《老子》，祭酒们按照宗教的思想重新解释这部哲学著作，使之成为宗教圣经。经过几代祭酒的解释，后来形成一部称为《老子想尔注》的道经。张角被杀之后不久，张修之乱，也被益州地方官吏及豪强们平定，张修身亡。可他的五斗米道却变本加厉地传播着，以至几年之后，他的教徒们终于在汉中建立了一个标准的宗教国家。

和张修一样，张角的徒众虽被击破，但宗教的纽带仍将他们联络在一起，只要有流民集中的地方，就有太平道在传播，一旦有所激发，立即生变，只不过不及张角的规模罢了。帝国的山谷、边境、州郡，布满了割据的黄巾。主要有河北博陵人张牛角、河北常山人褚飞燕，以及黄龙、左校、于根氏、张白骑、刘石、左髯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城、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蝤等人，他们的奇怪姓名，有的至今无法破译。大致上于根氏、左髯丈八为多须者，雷公、大目为声大、眼大者，白骑、飞燕为骑白马与身轻如燕者，平汉、白雀为宗教名称者。他们的根据地是以黑山为中心的河北上党、赵郡、中山、常山、河内等地的山谷地带，各部少则六七千人，多则二三万人。张牛角战没之后，众人推褚飞燕为帅，改姓张。统众计达百万。所在各郡，都惮怕轻勇矫捷的张飞燕，称之为“黑山贼”。朝廷与之交手多次，皆因其战术灵活，无法制服。

朝廷正为此事犯愁之际，张飞燕自己找上门来，主动归顺朝廷。朝廷息事宁人，把朱俊将军决不受降的策略抛至一边，授予张飞燕平难中郎将的高级军事头衔，统领河北山谷诸部，还可把持地方的官吏选拔。张飞燕有点像以后大明朝的张献忠，投降只是他的策略。他一旦取得合法地位后，就开始有步骤地扩展势力，部署向京师进逼的战略。朝廷不得不又一次地烦劳朱将军去解决他们。

机变与隐患

豫州刺史王允，字子师，太原人。十八岁时即得到郭泰的赏识，说："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十九岁为郡中小吏时，就敢收杀回乡搜刮民脂的小黄门赵津。张角之乱，朝廷拜其为豫州刺史，讨黄巾。他与卢植、皇甫嵩配合，连战告捷。他征辟了两名助手皆是天下的名士和党人，一个叫荀爽，字慈明，战国大哲学家荀子的第十二世孙。荀氏为颍川大族，其父荀淑为孝安皇帝时郎中，李膺、李固的老师。荀爽兄弟八人，并有德行才名，而他最为突出，时号"荀氏八龙，慈明无双"。他是一个经学家、史学家和哲学家，有《公羊问》、《汉语》和《新书》等著作传世。另一个则是孔融。王允击破黄巾达十万之众，在审理俘虏时，他发现了中常侍张让派自己的宾客与黄巾勾结的书信。

天子收到了王允送来的这封信，把张让、这个被自己称为父亲的大太监叫来，大光其火。张让叩头认罪，又巧言令色地为自己开脱了一番，天子的脸色缓解，叫他一边去罢。

没多久，张让叫人给王允编了个罪名，将他从任上逮捕下狱。第二天遇上朝廷颁布大赦令，王允复职。可不出十天，囚车又到了他家门口，他的好友杨赐大人知道这一去京师，必当受尽折磨，让宾客随车而来，送他一封信，暗示他自杀了事。王允的门客和僚属流着眼泪给他递上毒药。谁知王允没有西方大哲人苏格拉底的修养，一把将药碗打翻，厉声说道："我乃朝廷大臣，如果获罪于天子，应当受大辟之刑以谢天下，岂能服毒自裁？"说罢，登上囚车。到了京师，在杨赐、袁隗等公卿的营救下，他才得以减去死罪。后又遇大赦，王允出狱，他担心中官们追杀自己，于是更变姓名，隐匿他乡。

次年，天子在大长秋赵忠和中常侍张让的建议下，诏令增加税收，天下田亩，每亩十钱。又诏发州郡送木材文石于京师，修缮宫室。所有授予官职的人员，必须出资赞助军队。因为这一年的仗打下来国库荡然。天子的西园小金库的银根也吃了紧，天子害怕哪天又出乱子，或者又有个皇甫嵩站出来，要他将西园的钱拿出来筹建军队，于是他改变储蓄方法，把钱存放到中常侍和小黄门家里，每家代为保管几千万。他还懂得投资，让小黄门为他在故乡河间国买田造屋，置办能够升值或者保值的不动产。

钜鹿太守司马直刚刚接到委任状，就让他交钱，还说因为他有清名，可以减免三百万。司马直怅然地叹道：“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求官，吾不忍也。”上书辞官。朝廷见一大笔钱没了，下令不得辞职。司马直行至孟津，上书朝廷，极陈国家将亡之征，吞药自杀。消息传出，朝野震动，天子不得不暂时免征修宫室的物资，以缓民力。

三月，崔烈担任帝国司徒。他是冀州的名士，又是文化大族。他的祖父崔骃、叔父崔瑗皆为名师宿儒，受到朝野的尊敬。堂兄崔寔，帝国的辽东太守，著名的政治学家，所作《政论》，被誉为帝王准则。他为官清廉，家徒四壁，死时子孙无力安葬，靠杨赐、段颎和袁绍的两位叔父袁逢、袁隗出资下土。崔烈本人历任郡守，官至九卿。他感到崔家应该出一个位登三公的人，他打听了一下，买个司徒，要出钱千万。这时天子的保姆程夫人让人通知他，她可以搞到优惠价。最后，崔烈出了一半的钱给程夫人。不几天，天子就大会公卿，拜他为司徒。在典礼之中，天子有点后悔，对左右中官说：“悔不该如此，不然可以搞到一千万。”

程夫人一听，急了，大声地对天子说：“陛下，崔公乃是天下的名士，怎么会花钱买官？因为我的缘故，才得以位列三公，这难道不是件美事吗？”

话音刚落，公卿哗然。靠一个妇人得官，还不如花几个钱呢。

一天，他的公子、虎贲中郎将崔钧穿着盔甲从军营中回家，崔烈叫住儿子问道：“我位居三公，外边议论如何？

“父亲大人少有英名，历任卿守，外人从没说过大人不当登三公之位，可现在您登了三公之位，天下人却大失所望。”

“这是为何？”

“天下人嫌您身上有铜臭！”

崔烈听了，大怒。举起手杖向儿子打来。崔钧狼狈而逃，身上的铠甲哗哗作响。

崔烈骂道：“你这个送死的大兵，为父打你就跑，这是孝顺吗？”

儿子答道："从前大舜侍奉父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非不孝也！"

崔烈不追了，和儿子相比，更觉惭愧。

过了些时候，天子想巡视故乡。这个计划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一则天子很想念故土；二则河间在冀州境内，黄巾平定，天子可借此举宣扬朝廷威信。诏下冀州刺史王芬，准备接驾事宜。

王芬回到家中，秘密召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陈逸，故太傅陈蕃之子，北宫事变之后，他一直在流窜，近年隐于王芬家中；另一个便是有太平道理想的方士襄楷。他将这道诏书递给他们看，并说："这该不是天赐良机吧？"

密谋在继续，参加的人越来越多，骨干分子还有南阳人许攸、沛国人周旌。襄楷说："我夜观天文，不利中官。可以利用天子此行，诛灭中官。"

王芬说："如果真是如此，我愿倡导天下，废掉天子，另立明主，以拯救大汉。"

最后，他们订立了联络豪强，以武力劫持天子，另立合肥王为君的计划。他们还上书朝廷，声称黑山贼攻劫郡县，要求朝廷准许在冀州一带招募兵勇。部署起了军事。

曹操接到了他们的书信。自黄巾平定后，他以战功升迁济南相，又在境内以严法治理，并且断绝各种不合帝国教化的包括能引发太平道的各类地方宗教信仰。不久征还京师，授东郡太守。他知道这又是哪个豪强告到中央去了，于是他干脆如了人家的愿，自觉地上表称疾辞职，回到故乡谯国，在县城外筑室一间，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此娱乐。

曹操读信后，怦然心动。他思考了整整一夜，次日，让信使带回复书。

信中告诉王芬，此举不能成功，因为废立之事，是天下至为不祥之事。古人能干下这种事情的，只有伊尹和霍光，因为这两个人都居

宰臣之位，心怀忠诚，手握重权。就大汉的霍光而论，他能废昌邑王，在于他受先帝之托，而且昌邑王即位没有几天，不成气候。以此观之，你们自度比伊尹、霍光如何？合肥王的声望比汉初叛乱的诸侯王们如何？当今天子比昌邑王如何？

和曹操同时接到联络书信的还有平原人华歆和陶丘洪。华歆字子鱼，他与陶丘洪俱为平原郡的名士，可陶丘洪自以为识过华歆。在接到书信后，陶丘洪主张响应，而华歆则持与曹操一样的态度。

果不出曹、华二人的所料，有人将消息报入京师，天子下诏王芬速罢招募冀州兵马。又诏王芬入京朝见。

王芬自尽，政变流产。陶丘洪服了华歆。

此事对曹操触动相当大，他后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灵感，可能受这件事的启发。

华歆后来成了曹操的重臣，这是后话了。华歆和同郡的管宁、邴原俱以颍川陈寔为师，三人号为“一龙”，华为龙头、邴为龙腹、管为龙尾。不过，有一天，管宁与华歆断了交。因为这天他俩一起读书，有个大官坐着豪华车子经过门外，管宁看都没看一眼，而华歆不仅看呆了，而且啧啧称叹。管宁马上用刀将他们同坐的草席从中间割开。管宁一生都没有去蹚官场的混水。

这年六月，天子以讨平张角之功，封张让等十二名中常侍为列侯。诏征左车骑将军皇甫嵩还京师，收回将军印绶，削其食邑中的民户六千，原因是连战无功。这令朝野大惑不解。

只有皇甫将军心中明白，张角平定后，班师回朝，他经过赵忠在冀州的庄园，觉得奢侈过分，回来后上书天子，要求予以没收。于是赵忠给了自己眼下的报复。

皇甫将军回到府中，老友、汉阳人阎忠来见，对他说：“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而不回头者，机也。圣人顺时而动，智者因机而发。今将军遇难得之运，蹈易转之机，却临机不发，将如何保持您的大名呢？”

皇甫将军听了，如坠云雾，不解其意。

阎忠又说：“天道无亲，并不一定保佑谁，而是看天下百姓的意志来选择天子。今将军建不赏之功，威震本朝，风驰海外，虽汤武革命，也不及将军。可将军有此声名，却侍奉着庸主，现在已经夺印削户，这样下去能保全身家性命吗？”

皇甫将军听明白了，老朋友劝自己做的是改朝换代的大事业。可皇甫将军的修养太好，他无法跨出这惊心动魄的一大步。他装作没听懂：“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

阎忠仍很耐心地向他陈述形势：“将军之言不完全对。当初韩信为报答高皇帝的小恩小惠，放弃了时机，等到利剑临喉，悔之晚矣。当今天子昏昧无能，将军只要振臂一呼，不要说是天下英雄，就是女子儿童，也知道响应。何况现今中官日日进献谗言，如不早图，祸即临身。上天早已抛弃大汉，顺天应人，除了将军，还有何人？”

皇甫将军听着听着，害怕了起来。忙用手势制止住老朋友：“乱世的谋略，不可用于太平安定的世道。创业的大功，也不是我这样的庸才所能做到。能安天下，就不当乱天下。我只求保持好的名声，死且不朽。老兄的话，到此为止吧！”

阎忠沉默了好一会儿，长揖而别。从此不知去向。

皇甫将军一连几天都在思考阎忠的话。自己说能安天下，但天下还能安吗？天下不再能安了，这里的原因，除了天子、中官胡作非为，除了民众的叛乱永无止息，除了大汉已丧尽民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与自己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自己提出的平定黄巾的四大战略中，有鼓励地方官吏和士族豪强们招募军队这一条，加之朝廷为讨平黄巾而招募的精勇，现在都掌握在将军们手中。这些人的身边，难道就没有阎忠这样的人吗？难道能够保证他们也像自己一样，作出拒绝吗？圣人说：“道心惟微，人心惟危”，老子亦云：“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兵端已启，就不可罢休了。

他告诫自己，如果天下大乱，一定要保持名节，但也要达观顺变，因为大汉确实该亡了。

七月，京师周围发生了相当严重的蝗灾。飞蝗遮天蔽日而过，所经田亩颗粒全无。接着又是一场冰雹，京师笼罩在恐慌和凋零的气氛之中。

十月，临晋侯杨赐薨。天子素服，三日不朝。赐东园棺木，诏令帝国军乐队和羽林骑士鼓吹护驾，公卿百官送葬，谥文烈侯，以其子、侍中杨彪袭爵。

杨赐，是天子一生中最后一位老师。尽管天子将他和陈蕃、蔡邕看成一类人物，无甚好感，但天子毕竟是三十出头的人了，黄巾之乱，又使天子多少有了些辨别是非的能力，他看到朝堂之上，老臣渐去，不禁有些失落。

第五章
烽火狼烟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

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

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

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汉末边塞歌谣

凉州

皇甫嵩将军开始于中平二年（185）六月与阎忠谈话之后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特别是对在平定叛乱中武装和强大起来的帝国军队及其统帅们的担忧。因为，皇甫嵩将军出身边将家族，他知道，黄巾动乱之前，帝国就在周边地区与其他民族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这场战争比黄巾之乱的规模要大得多，因而锻炼出一大批勇敢善战的军人和将领以及地方豪强。他们当中，既有像皇甫家族这样的忠诚于大汉的鹰犬，也有武装到牙齿、嗜血成性的豺狼。他们甚至会和敌人联手反叛主人，或者，放纵敌寇，胁迫主人。

就在皇甫将军攻破冀州黄巾之际，即中平元年（184）十一月，边郡北地郡的先零羌和陇西郡枹罕、河关二县的武装民众，公开反叛帝国，他们的军事首领是金城郡湟水一带的归附大汉的月氏胡人北宫伯玉和汉人李文侯，政治领袖是金城郡的富户豪强边章和韩遂。叛军击杀了帝国西北边郡的军政长官、护羌校尉泠征和金城太守陈懿，并攻打四周的郡县，向帝国的核心地区逼进。二年三月，叛军东进，寇略旧都长安附近的左冯翊、右扶风以及京兆尹三辅地区，朝野震动。诏令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出镇长安，讨伐叛军。

就在皇甫将军厉兵秣马之际，由于开罪大长秋赵忠的事情，他在六月份被夺印削户。好在朝廷委派了司空张温出任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袁滂为副，拜董卓为破虏将军、周慎为荡寇将军，并辖于张温。这个阵容，皇甫将军还比较放心。

他解甲回府，不过他并不闲着，他在等待，等待他出马的那一天，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一天，从他的家乡安定郡来了个人，自称是王符的家人。皇甫将军一听，马上让他进来。这是个中年人，穿着丧服。他对皇甫将军说："家父过世前，嘱咐我将他的著作带给将军。"他解开一只布囊，

拿出几大捆竹简。

这位过世的人字节信，帝国西北边陲的大儒、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他是马融、张衡、崔瑗等大学者的朋友，也是皇甫将军的已故叔父皇甫规将军的挚友。当年皇甫规将军解官回乡，太守来了都不见，而王符一到，将军竟然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倒履出迎，援手而入，同坐欢语。思想家不愿让自己的精神受到世俗的束缚，更不愿意让纯洁的理想去碰撞污浊的现实，所以他甘心做一个隐士，用他自己的称呼，叫做“潜夫”。可这个隐士并没有远离尘世，娱情山水，而是观察、思考、写作。他将毕生的思想，写成一部巨大而系统的著作，对大汉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风俗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批判。皇甫嵩将军如获至宝地打开了竹简，书名一下子映入了眼帘：《潜夫论》。

由于是帝国的边民，王符在《潜夫论》中，特地用了四个章节讨论了帝国的边患问题，分别命名为“劝将”、“救边”、“边议”和“实边”。这，引起了皇甫嵩将军更为浓厚的兴趣。

多日的研读，令皇甫将军思绪万千。他觉得王符的议论不仅面面俱到，而且一针见血。羌人之乱以及现在酿成的整个西北凉州的羌、胡、汉多民族的地域性大叛乱，其根源在于大汉帝国一开始就在战略上采取了放弃凉州的收缩政策。《潜夫论》中指责了孝安皇帝永初年间羌人叛乱时，公卿们主张捐弃凉州、退保三辅的思想。这使皇甫将军想到北宫伯玉寇略三辅时，朝廷委任自己出镇长安的那场御前会议。

那天，天子大会公卿百官于德阳殿正殿，他的焦虑，不减于听到黄巾之乱的消息。不过，天子的精神大不如那一次了。皇甫将军并不认为这是由于黄巾等危难的国事，让天子操劳至此，而是他的荒淫无度，与他的叔父孝桓皇帝如出一辙。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孱弱削瘦，脸色灰青，毫无血气，许多老臣仿佛又看到了先帝。如果说，孝桓皇帝是因为没有子嗣而按照方士们的教唆，把身子搞得一塌糊涂，当今的天子则完全出于刘氏皇族腐朽的遗传天性，以及从小依赖宦官的生活。

第一个站出来发言的是司徒崔烈，他重弹放弃凉州的老调，把出生于边塞北地郡的议郎、曾任朱俊将军护军司马的傅燮将军气得暴跳如雷，他顾不得体面和身分，厉声喊道：“斩了司徒，天下乃安！”

主持朝仪的尚书马上出奏傅燮廷辱大臣，要求天子按罪论处。

天子没有动怒，他对这个身长八尺的伟岸将军有比较深的印象，此人在跟从朱俊讨伐黄巾时，曾上疏陈述黄巾的乱源在于朝廷奸人太多，中官弄权。因为这个，得罪了大长秋赵忠，傅燮没有得到封赏。故当大长秋进一步提出要治他的罪时，天子亲自阻止了这件事，诏拜议郎。天子问他何故出此耸言？

“孝惠皇帝朝，匈奴昌顿单于触犯大汉，樊哙将军为之稍加开脱，季布将军犹言：‘樊哙可斩’。如今凉州居天下要冲，是国家的藩卫。高祖皇帝初兴之际，就委派郦商将军为陇西都尉，专门负责平定北地郡。孝武皇帝开拓边境，于元狩二年降匈奴浑邪王。太初元年，置酒泉、张掖二郡；四年，又置匈奴休屠王领地为武威郡；后元元年，再分酒泉郡置敦煌郡。这一切举措，在战略上都是为了斩断匈奴的右臂，打通大汉西北的道路，安定大汉西北的边陲。而今边郡的牧御官吏们，贪赃失和，使得整个凉州刺史部发生叛乱，而崔烈身为宰臣，不念为国家考虑平叛之策，反而要割弃一方万里之疆土，臣私下大惑不解！如果让羌人这样的披发左衽之虏占据凉州，待到他们士甲坚劲，因此为乱，这是天下的至虑、社稷的深忧啊！倘若崔烈不知此中厉害，这是他的愚蠢；倘若他知道这一点却说出这种话来，则是他的不忠！”

傅将军的振振有词使得天子和公卿们下了平定凉州的决心。

对西北采取放弃的政策，是从世祖光武皇帝光复本朝以后开始的。这与高皇帝开创的大汉帝国风格迥异，特别是与孝武皇帝一朝北击匈奴、开拓西域的雄武气魄大相径庭。以国力论，本朝并不逊于前汉，而且，本朝还曾经动用了小部队和几个勇敢的使者，就成功地迫使王莽篡汉时期纷纷背叛大汉而投向匈奴的西域诸国重新归顺。这便是本朝大学者和历史学家班彪先生的小儿子班超创下的伟业，他年少时就不愿意像他的哥哥班固一样继承父业，做个文人，于是他扔掉

笔，穿上了军装。此外，本朝安丰侯窦融之侄、光禄勋、车都尉窦固，其曾孙、外戚大将军窦宪，都曾于孝明皇帝朝和孝和皇帝朝大破匈奴和西域叛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地理上看，这些征服的地区尚在凉州的西北，而且大汉还在这些地域设置了行政机构和卫戍区。再则，居住在凉州的羌人比起匈奴和西域诸国来，其文明进化、部族人口以及武装力量都落后一大截。《潜夫论》中说羌人开始叛乱时，“党羽未成，人众未合，兵器未备，或持木枝，或空手相搏，草食散乱，未有都督，甚易破也。”又说：“虏或持铜镜以像兵器，或负案板以类盾牌，惶惧扰攘，未能相持。”

为什么大汉竟然对付不了这样的敌手？为什么甘心让羌人扰乱凉州，再次切断大汉西部的通道，丢失了班超和窦宪的成果？又是为什么，大汉的子民也参加了凉州的叛乱？

两都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推究起来，首先要追溯至世祖光武皇帝的立国姿态。

从周武王灭商那个遥远的年代直至大汉，所谓中国，指的是黄河中下游流域，其政治和文化中心有两个，一是华山以西、渭水流域的长安一带，当时叫宗周。一是华山以东、洛水流域的洛阳，当时叫成周。华山在她们之间设置了天然的关隘——函谷关，所以习惯上又称长安一带为关西或关中，洛阳一带为关东或山东。长安一带，周、秦皆为都城。这不仅因为这两个国家根源于此，而且有着高屋建瓴的军事地理优势，渭水流域富饶的大平原、函谷关的天险，使之成为进退有据的地区。而洛阳的营建始于周公，开始的目的，是作为来自关西的征服者周人，控制关东商代遗民以及其他各个氏族的军事据点。由于周公是中国历史上制礼作乐的圣人，加之洛阳被认为是天下之正中，西周被戎狄扫荡以后，洛阳就成了都城。这个都城，更多地具有文化象征的意味，因为她的军事价值远逊于长安。

高皇帝是楚地沛县人，他和他的战友们都是关东人，尽管他们曾经打进秦都咸阳，但他们不想去远离故土的关西享受高官厚禄；再则，高皇帝想开创一个在声誉上比得上周代的帝国，因而他决定以洛阳为都。可谋臣们不让，原因是天下初定，并不安宁，洛阳的规模又不及秦帝国的旧都。一个叫娄敬的谋士对高皇帝说："陛下您取天下的方法和周文王、周武王不同，他们是以德服人，因此可以不依靠天险。而您得天下，杀了这么多的人民，使天下人肝脑涂地，已经谈不上有什么仁德了。不如现实一些，入据关西。陛下您也曾和人打过架，应该知道关键在于卡住对方的脖子，摁住对方的背吧？进了关西，您就算是卡住天下的脖子，摁住天下的背了。"

高皇帝粗暴地说服了他的战友们，车驾幸关中。到了关中，高皇帝很高兴，硬让娄敬改姓了刘，因为高皇帝的家乡土话中，娄和刘本来就发一个音。不过，高皇帝的思乡病还是加重了，最后臣下们只得在长安城里造了一个和高皇帝老家一模一样的村子，并将他的老父亲和一些穿开裆裤时的朋友们安置在里面，给高皇帝提供了一个仿真旅游景点。

事实证明，关西的武力加上关东的经济文化，相得益彰，所谓"关西出将，关东出相"，造成了大汉空前的强盛。特别是对付西北匈奴、羌、胡等民族的入侵，关西有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与震慑作用。大汉也同样重视洛阳的枢纽地位，从孝武皇帝起，分天下郡县为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一人，作为监察官员，代替中央巡视所在郡县的吏治。其核心地区归司隶校尉部，所辖七郡包括了长安至洛阳的狭长地带，洛阳作为大汉东都的观念随着儒学在大汉的确立而深化，因为这是周礼和德治的象征。

光武皇帝也不是关西人，他的家乡南阳与洛阳靠得很近，即皇帝位后，进了洛阳。他认为一个好的国家并不一定以拓土开边为事业，而是达到德治的境地。有一天，光武皇帝在披阅地图时，也曾感慨自己的国土尚不够辽阔，马上，太傅邓禹就告诫他："古之兴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可一个叫杜笃的人写了篇《论都赋》呈上来，说关西是守卫国家的利器，不可以久虚。一些故国老臣也伫立西望，书生加上买卖人出身的光武皇帝没有乡村流氓出身的高皇帝那么粗暴，

他利用了广告和信仰的手段，让人造谣说洛阳发现了神雀凤凰等祥瑞，留住了人们。由于光武皇帝相信谶纬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天下的帝王兴替都按照木、火、土、金、水的五行相生次序，大汉禀承的是火德，火与水相克，因此帝国政府下令洛阳的洛字一律写成“雒”。直到孝章皇帝朝，还有人想念长安，于是朝廷让班固写了篇《两都赋》，在比较两座都城时，玩弄写作技巧，抬高了洛阳的形象。

可是，大汉从此失去了关西的好处，人们也渐渐忘记了关西。而关西也得不到关东文化和经济的润泽，渐渐衰萎。

关西的故都都可以放弃，何况是更加遥远的凉州呢？

夷夏之分

严格地说来，羌人的暴动是叛乱，因为这是大汉帝国内部的民族问题，而不是外来民族入侵造成的边患。

这和前朝的匈奴问题不同。尽管太史公司马迁认为他们是夏后氏的苗裔，但事实上匈奴是一个由境外游牧民族组成的对等的国家，这个国家与大汉这个农业民族组成的国家碰撞之后，像是大漠上的风暴，来得迅猛可怕，但终不能持久。到了本朝初期，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顺并进入大汉的边塞定居；北匈奴则继续保持原有敌对的状态，他们时而犯境，时而求和，目的都在于要从大汉得到生活必需品和一些奢侈品。大汉为了对南匈奴讲信用，没有接受北匈奴的求和。孝明、孝章皇帝时代，北匈奴与大汉展开了争夺西域的战争，终于在永元三年（91）金微山一战中，大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汉军出塞远达五千里之外的漠北，匈奴的主体走上了西迁的道路，而且不知所终。直到四世纪七十年代，一支号称“匈人”的骁勇善战的骑兵部族出现在欧洲东部的哥特境内，几战之后，哥特人被他们赶到了多瑙河以南的罗马帝国境内，哥特人无奈，只得与强大的罗马帝国争夺生存空间，罗马皇帝战败身亡。匈人在现在的匈牙利平原上建立了国家。对于欧洲来说，这是一场比成吉思汗更早的“黄祸”，这场从亚洲

来的风暴加快了西罗马帝国和西欧古典奴隶制度的解体。当然，这个事实，直到十八世纪才由法国学者德·揆尼发现，十九世纪末才由大清帝国的访俄使者洪钧得知并介绍给国内的史学界。

至于羌，则和南夷、百越等南方民族一样，一开始，就是居住在大汉行政疆域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汉人杂居的少数民族。

中国人分别民族的方法相当的独特，也就是说，根本不采用人种学的自然分法，而是采用文化学的分法。他们认为一切人类都来自一个祖先，因而没有必要按照血缘关系划分不同的种族。大汉帝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班固，在他们名彪青史的著作《史记》、《汉书》里，将包括匈奴在内的一切周边民族，都说成炎黄子孙。所谓不同的民族，在他们眼里，仅仅是生活方式不同的社会群体。这样，在汉人的四周，就划分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大异族群。当然，汉人有极大的优越感，他们认为吃五谷、穿衣服、有君长是汉人的专利，只要一个异族人按这种方式生活，就可以视其为汉人；相反，只要一个汉人按异族的生活方式生活，则视其为蛮夷，这就是很多异族汉化后反而能够成功地统治汉人的原因。不过，汉人虽然有着文化上的优越感，却不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周边的民族，据说大禹到了一个裸体的异族地区，便脱了衣服进入。中国的文化圣人孔夫子甚至认为汉人的文化也是从蛮夷那里发展而来的，他在指导学生研究礼仪风俗时，告诉他们："礼失求诸野"，也就是说，如果找不到一种风俗礼仪的来源，就去土著民族那里看看吧。汉人将天子居住的京城作为圆心，向外围画了五个同心圆表示汉族的政治和文化应该统治和波及的范围，即：甸服、侯服、绥服、宾服、要服。最外面的要服，是归顺汉人政府的异族居住地区；要服之外则是荒服，那是蛮夷的世界，中国天子不能去管。按照这个说法，匈奴属于荒服，羌人则属于要服。汉人如此机械地划分，旨在说明不同的治理方式，对于要服的管理只能是相当松散和象征性的。如果要服乃至荒服的少数民族主动归顺中国，则被看作政治昌明的象征，所谓"远方来服"嘛。中国的天子在登基乃至各种国家庆典中，都要表演少数民族歌舞，陈列少数民族进贡的鸟兽珍宝，招待和赏赐少数民族的酋长，用来粉饰太平。

这样的民族观念决定了大汉对境内民族问题的做法是矛盾的：一

面将他们视为同类，有责任去安抚他们，给他们种种便利，希望他们归顺大汉；一面又觉得他们是大汉的负担，要放弃他们。

羌族史诗

羌人几乎和汉人一样古老，商周时代就自中国的西部而来，其中一支很大的单一聚落可能向青海高原和西藏高原迁徙，成了现今西藏人的祖先。大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出自姜姓，即炎帝的后代。《诗经》里面说周人的老祖母叫做姜源，可能就是羌人，不然，孟子为什么要说周文王是西羌人呢？

不过，与周人的联姻并未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一直以松散的游牧部落的姿态向东推进。他们的风俗在《后汉书》中被描述成没有一定居所，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牧产为业。又以父名或母姓为氏族的种号，十二世后便可以相与交婚。为了要保持种族的人口繁衍，他们实行多妻制，并且父死之后，儿子以其后母为妻；兄死之后，弟弟以其嫂嫂为妻。他们的社会结构也保持了先民们的方式，没有君臣上下，强健有力的部落酋长则为领袖，弱小的则主动成为依附。整个民族崇尚勇力，以抄掠其他部落和民族为荣，氏族内部只有杀人偿命一条法律，以战死为吉利、病死为不祥。在军事上，善于在山谷地带打突击战，而不善于在平原地带打持久战。由于处于西方寒冷地区，妇女能在风雪之中生育。这些风俗让汉人看了毛骨悚然，但也很敬佩；汉人的学者称赞他们生在西方，得了五行中的金气，因而刚坚勇猛。

他们曾帮助周武王伐商，但后来又像潮水一样涌向中国内地，到达现在的陕西、山西和河南地界，当时中国称他们为戎人。几乎所有的诸侯都与他们展开过战争，但见效甚微，最终，西周最后一个天子被他们杀掉，周王朝迁都洛阳，开始走下坡路了。但随着中国几个诸侯国的强大，以霸主的身分组织起多国部队，特别是西方强国秦国在穆公的领导下崛起，羌人渐渐又向华夏的边缘地带退却。至战国末

期，中国的戎患基本上消除，只有秦国的边境上尚有一支号为“义渠”的羌人部落，屡败秦人。

终于在秦昭王即位之际，秦国的宣太后决定舍身救国，为后代除去隐患。她用自己的美色勾引义渠王来宫中私通，可能在此过程中，她感到义渠王确实是条汉子，加之自己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不免有些缠绵，又为他生下了两个儿子。三十四年之后，风韵将逝的老太后才忍痛在自己的卧室里对老情人下了毒手。从此秦国将羌人赶得远远的，在羌人的根据地设置了陇西、北地、上郡三个行政区域。

羌人成为大汉西北的主要边患，是从公元二世纪才开始的。当然，羌人和大汉的摩擦开始得较早。这些羌人的部落很多，种号芜杂，但都源于一个孕育于青海湖畔至湟水与黄河之间的古老种族。

这个古老羌族叫作无弋，即奴隶，传说因为他们的祖先爰剑在秦厉公（春秋）时代是秦国的奴隶，他设法逃跑，在追兵上来时钻进一个山洞，像羌人的史诗中吟唱的那样，秦人放火焚烧，突然见到一只大老虎冲出来，吓跑了秦人。爰剑出了洞，又遇上一个被割去鼻子的女囚犯。在荒野之中，结为夫妇。这个羌人的祖母也知道遮丑，将头发覆盖在脸上，因此成为羌人的风俗。以后汉人与羌人作战时，面对的都是骑在马上嗷嗷叫的披头士。

由于大难不死，爰剑便被羌人推为酋长。他采取了和当时诸多部落不同的策略，不向中国的腹地发展，而是将部落带到了河湟地区；更为了不起的是，他把从汉人那里学到的耕种和畜牧技术传授给部落，于是河湟一带的羌人渐渐成为半游牧半农耕的民族，这种能够独立的经济，保证了他们无须冒险去向汉人讨生活，更保证了自身的种族在一种充裕和平的环境下繁衍强大。

果然，到了第四代酋长、爰剑的曾孙忍的时代，河湟地区已经不能养育人口日益增加的羌人，于是他们的旁支开始向外迁徙到中国的西南地区，分布在益州刺史部（今四川一带）的广汉、越巂和武都。忍和他的弟弟舞却留在河湟，分别产下九子和十七子，从此分化为二十六个部落。汉人统称之为西羌。

孝景皇帝时，由于受到匈奴的胁迫，其中的研种部落要求南渡黄河，进入洮水流域的陇西郡，为大汉守卫陇西边塞。他们的要求得到了大汉天子的许可，被安置在狄道、安故直至临洮、氐道、羌道诸县，但大部分的部落，却越过祁连山北上，进入河西走廊地区，和匈奴混杂在一起，屡寇大汉。

孝武皇帝朝，随着大汉对匈奴作战的节节胜利，加之博望侯张骞打开了西域的交通，孝武皇帝采取了“隔绝羌胡”的战略，将大汉的军队开进河西地区，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西达玉门关，这样，把羌人压回河湟，使他们与北方匈奴不得交通。大汉认为羌人是一个比匈奴弱小得多的民族，所以并不像对待匈奴那样用驱逐的手段，而是对他们施加管制。大汉的军队又开进了河湟地区，设立了一个叫作令居的军事要塞。

自由自在、野蛮却质朴的西羌人受不了组织严密、高雅却狡诈的汉人的压迫，当孝武皇帝的小舅子李广利将军战败投降匈奴之际，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羌解仇结盟，共同成为匈奴的军事联盟，合兵十万，攻下令居塞和陇西郡的安故县，包围了陇西郡的枹罕县，并攻打河西。五六年后，大汉的李息和徐自为将军才平定羌乱。

大汉仍不放弃羌人，而是改进了管理手段，在羌人地区设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全权处理羌人事务。这个军政合一的官员下有从事、长史、司马各两名和一批翻译，按时巡视各个部落，处理羌人的不满、要求以及羌汉关系，此外，还不断地派遣通译去大汉境外的羌人那里互通消息。大汉希望藉此培养起羌人的信任与好感，从而维持边塞的和平。孝昭皇帝朝，大汉在河湟地区设置了金城郡。

可是，大规模的叛乱仍在孕育之中，直到七十多岁的赵充国将军出马，才以他的勇略才智和迟暮之年的心血，解决了前汉时期的羌人问题。

那是三十多年后的孝宣皇帝朝，帝国中央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巡视诸羌部落。先零羌的酋长提出了一个居心叵测的扩张要求：渡湟水北上，在荒野地区畜牧。不谙边事的光禄大夫立刻答应为他们请示天子。

当他回朝汇报时，帝国的营平侯、后将军赵充国弹劾他失职。赵将军是陇西人，后又迁居令居塞，因而对羌人再熟悉不过。义渠安国出长安之前，赵充国就反对派他去，并推荐了酒泉太守辛武贤。

羌人没有耐心了，他们驱赶着羊群过了湟水。面对黑压压的移民潮，各地的汉人长官束手无策。

元康三年（前63），孝宣皇帝急召赵充国将军，说是接到情报，先零羌与羌人各部落举行解仇交质盟誓的仪式。赵将军一听便着了急，回答说："这是羌人叛乱的信号。羌人之所以容易制伏，是因为他们部落分散，互相残杀，始终不能统一。三十多年前，西羌反叛，也曾解仇结盟。臣下估计匈奴的使者又到了西羌，因为近来东胡乌桓归顺大汉，匈奴害怕大汉从东方攻击，于是引诱羌人在西方闹事。臣预感到羌人有大的阴谋，应当及早防备才是。"

一个多月以后，快马将情报送至长安：狼何羌派遣使者去匈奴借兵，打算进攻河西敦煌一带。

赵充国分析：狼何羌只是阳关西南的小月氏种族，不会有如此大的胆子，一定是匈奴的使者到了西羌，先零与、开两大羌种解了仇。一旦秋马肥硕，变乱必起。宜速派使者，敕视诸羌，不许他们解仇，让他们知道大汉已发觉了他们的阴谋。

孝宣皇帝觉得，解铃还须系铃人，于是又派了义渠安国前往。

义渠安国为上次的事窝着火，一到河湟，便通知三十多位羌人豪酋开会，会间涌出甲兵，悉皆诛杀，纵兵冲入羌人部落，斩首千余级。于是先零羌一下子反了，神雀元年（前61），归义羌侯杨玉等击败了义渠的汉军。

天子让御史大夫丙吉去问赵充国谁可出征？回报说："赵将军对臣说没有能超过他的。"天子很高兴，之所以派丙吉去询问，是因为赵将军太老，所以一定要他自愿出马。天子又让人去问："将军打算如何用兵？"回报说："百闻不如一见，等老臣到了金城郡，再献上方略。"

赵将军的作风是持重，先计后战，爱惜士卒。所以他的侦察兵相

当出色，行必备战，止必坚营。他认为羌人的骑兵善于冲击，但不通战法，不能持久。于是，他让手下勿贪小利，坚守不出，等待决战的机会，以图全歼。此外，他坚持运用瓦解羌人的政策，只击先零部落。于是，他释放了地方政府扣押的和开部落的人质，命他们回去转告部落："大兵只诛有罪者。天子告诸羌人：斩先零羌大酋长者，赏钱四十万；中酋长者，十五万；小酋长者，二万；男人，三千；老人及妇女儿童，一千；所获财产归各人所有。"

羌人被他搞乱了，在一次各部落酋长联席会议上，他们争吵了起来。有些部落的酋长指责先零部落说："与你们说不要反，现在天子派了赵将军来，八九十岁了，又善于用兵，你们却想一战败之，做梦去罢！"

天子派来了援军，包括一部分御林军和胡越骑兵，由赵将军之子中郎将赵卬率领。不过，以酒泉太守辛武贤为代表的少壮派对赵将军的做法失去了耐心，在他们的动员下，天子发动三辅、河南、河北、陇西、河西等地的步卒、骑士乃至刑徒，计六万人，拜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从张掖、武威出击羌人的、开部落，以求速战。

天子遣书询问赵将军。赵将军竭力陈说远击羌人，道径险绝，非汉人所长的道理，以及不能攻打这两个部落的原因。他告诉天子：善战者将敌人引来，以逸击劳；不善战者，劳师袭远，自去送死。何况是对付散乱游动的羌虏？

像这样的书信来往了好几回，天子和朝中的大臣皆被感动，赞同赵充国的大臣们从十分之三，增至十分之五，最后到十分之八。孝宣皇帝的老师、丞相魏相说："臣愚昧不懂军事，赵将军屡次为国家精心策划，其言多是，臣一任其计。"于是诏令从赵充国之策。同时，天子还有些性急，仍让破羌将军与中郎将合兵，相机进击。

七月，赵将军命令出击，因为预料到先零羌经过长期的屯聚与对峙，必然松懈。果然，羌人大乱，渡湟水而逃。可赵将军不让部下们追击，而是尾随驱逐，部下们不解，他说："穷寇勿迫，追得缓，他们反而跑得慌；追得急，他们反而会回头拼命。"

这一仗，先零羌溺水死者数百人、投降及被斩者五百人、弃牛马羊十万余头。经过、开部落的田地，赵将军的部下纪律严明，不坏庄稼，事后这两个部落的酋长前来归降。

赵将军没有继续追，因为羌人逃跑的方向是没有尽头的。他决定占领羌人的老窝，下令将一万名骑兵转业为农垦战士，在河湟地区屯田，一则为国家节约开支，二则仍维持以逸待劳之势，三则利用羌人思归故土的心理，让他们在流亡饥饿的境况下人心涣散。

天子诏可，在这封诏书的最后，天子竟写上“将军加餐饭，慎兵事，自爱！”的字样。

不久，羌人疲敝，赵充国与破羌将军及中郎将出兵，大胜而回。前后计降三万一千二百人、斩首七千六百级，饿死五六千，逃亡四千。五万先零羌，只剩下两千来人。次年秋，其他羌人部落又陆续送来了先零大酋长杨玉、犹非等人的首级，并率部来降。

赵充国奏请罢屯田。大汉在河湟地区设置金城属国，派驻属国都尉处理归降的羌人问题。至此以后，整个前汉时期，再没有发生大的羌人叛乱。

前汉末期、王莽篡汉时期直至本朝初立，陇西、金城一带的诸多羌人已渐渐地将自己看成大汉的子民。但先零羌仍勾结一些羌种不断地来寇，但皆被击溃。

此时，一个叫烧当部落的羌种也在崛起之中。烧当，是爰剑的第十八代孙的名字，他大概生活在孝元皇帝时代、本朝立国之初，他们的酋长名叫滇良，是烧当的玄孙。他的部落居住在河湟以西的大允谷中，人数很少，而且相当贫穷。时下，他的敌人是先零等几个强大的部落。

大凡中国四周游牧民族的崛起，第一步都是征服本民族内部的部落，滇良经过精心的准备，一举掩袭成功，杀先零三千多人，夺取了他们的根据地大榆中。作为帝国境外的羌人部落，对已划归大汉领土的河湟故土都有着极大的向心力。他们每天都在塞外窥视着，与归顺大汉的塞内降羌联络着，他们的勇士骑在马上，翘首东望。

本朝开国之初，世祖光武皇帝还在忙着平定陇西隗嚣和西蜀公孙述。建武九年（33），隗嚣在围困中又饿又病，气愤而死。他的谋士、后任帝国司徒掾的大学者班彪考虑到王莽时期，青海湖畔的羌人趁大汉之危，时常人寇金城、陇西二郡，而隗嚣又招纳他们与汉军相拒，向光武皇帝建议恢复护羌校尉。当然，班彪的理由是加强和改善对羌人的管理，以防他们的反叛。不过，他的上疏中陈述了羌人反叛的原因："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

班彪说的这些羌人是境内降羌，他们受到了汉人官吏和汉人无赖不公正的对待。这时，他们往往与境外的羌人内外俱起。

先零羌在被烧当羌重创之前，曾于建武十一年（35）冬天，发动数万人攻打金城郡浩亹县。朝臣推举太中大夫马援为陇西太守，率步骑三千，潜行至羌人营地，一举击溃。紧接着又追至羌人的聚居地，击鼓叫噪，乘夜放火，计斩首千余级。此役当中，马太守的胫骨中了箭。

马援将降羌全部安置在陇西、天水直至帝国的核心地区——扶风，他年轻时就不愿意读经书，主动去陇西一带耕田放牧，实践经世的本领。他的目的是把人数少的羌人投放到人数多的汉人之中，演化成规范的大汉民众。同时，他还主张把汉人移民到羌人的土地上。所以，当朝臣们认为金城郡经过多年的战火，羌人多次叛乱，主张放弃金城时，马援大加反驳。最后，迁来了三千口汉人，开水田，修沟渠，缮城郭，汉人安居乐业，塞外羌人不断来降。不过，马援将羌人大规模地迁入境内，也难免留下了后患。因为当时长安及三辅已不复为帝都和京畿，羌人后来屡寇三辅，遂使安置降羌的地区反成为羌人唱主角的舞台，可以说是开门缉盗。当然，这不能怪马太守，因为他的时代，大汉刚刚光复中兴，朝气蓬勃，充满自信，哪里把羌人放在眼里。

这一仗，先零羌元气大伤，退出塞外之后，又被烧当羌重重一击，失去了在河湟地区的主导地位。两年以后，进攻金城、陇西的羌人，就成了烧当部落了。此时滇良已卒，他的两个骁勇善战的儿子滇

吾、滇岸击败太守刘盱，谒者张鸿、陇西长史田飒皆战没。直到孝明皇帝永平元年（58）秋天，才由光武皇帝的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绿林好汉出身的马武将军与孝章皇帝的小舅子窦固，以四万人的优势兵力，斩首五千余级，生俘一千六百口，将羌人一举荡平。这一次，模仿马援将军的做法，迁徙七千口羌人至三辅地区。诏谒者窦林为护羌校尉。酋长滇吾向西远遁，滇岸投降。

窦林闹了个笑话，他的部下受了滇岸的贿赂，说滇岸是酋长，于是依照他的上奏，天子加封滇岸为归义侯。第二年，滇吾又来投降，窦林又奏，并带他们两个一道去洛阳投降，接受加封。孝明皇帝觉得一个部落竟有两个酋长，便追问窦林。窦林语无伦次地搪塞天子：“滇岸就是滇吾，陇西土话不标准吧？”

天子大怒，窦林丢了官。

后来，滇吾的儿子东吾做了酋长，也愿意归顺，但他的弟弟迷吾不干。

他终有了反叛的借口，而且相当的光明正大。孝章皇帝建初二年（77），金城郡安夷县吏霸占卑湳部落一羌人的妻子，被羌人杀死，于是安夷县令捉拿凶手。卑湳部落害怕之下，逃出塞外。迷吾见机，率领几个羌人部落暴动，打败金城太守郝崇，又联合封养部落酋长布桥攻打陇西、汉阳。朝廷即拜马援之子、行车骑将军马防与长水校尉耿恭出征，到次年三月战事结束，布桥投降。

迷吾仍在战斗，十年以后，他成功地引诱并伏击了护羌校尉傅育的军队，傅育下马搏斗，力竭而死。同年秋，新任护羌校尉张纡与马防于木乘谷击破迷吾，在谈判桌上，迷吾又喝到了他最喜欢的汉人官府酿制的酒，可一眨眼的功夫，他的人头连同他喝的酒都放到了傅育的灵位之前。张纡的做法，激怒了羌人，迷吾之子迷唐继承了父亲的事业。

汉人的官吏们对羌人虐待过甚，塞外羌人想攻打边郡，首先要有塞内羌人的反叛才能成气候，可大汉的职官避让制度，使得当地的行政长官大都来自内地，这些人很少能尊重羌人，却很能搜刮羌人。由

于不生长在边郡，一旦羌叛，又无制羌之策，不仅贪赃枉法，而且贪生怕死，力主放弃凉州诸郡，退守关中。所以朝廷往往派出像马援、马防、窦固等熟知边事的将领才能暂时解决问题。但他们能对付得了羌人，却对付不了他们的同僚。有些事情，连天子都感到过分。

孝明皇帝曾经接到一份奏报：一个叫烧何的羌人小部落因为受到卢水胡的攻击，这个部落的百岁老巫婆比铜钳率众归附金城临羌县。由于部落成员犯法，临羌县令一次就收杀七百人并收系了比铜钳。

孝明皇帝看不下去了，他动了恻隐之心，下了一道诏书表示国家无德，不能威服异族。命令释放比铜钳，馈赠医药养护；招纳其部落成员，厚赠财物，送回故地；对犯罪的羌人，认罪者释放，拒不认罪者没官为奴。

张纡诱杀迷吾之后，考虑到羌人将有大规模的叛乱，朝廷公议，以久习边事的武威太守邓训为护羌校尉。他是光武皇帝的太傅邓禹的第六子，少时不好文学，被父亲责难；但很快成了帝国的封疆大吏，北方边郡的乌桓、鲜卑以及西部的卢水胡都很敬佩他。

章和二年（88）冬天，黄河上结了冰。迷唐派人探了探厚薄，便指挥四万骑兵蜂拥过河，直抵塞下。可他没有下令攻城，而是叫来了一个弱小的胡人部落——小月氏胡的酋长。他把腰刀拔出来，在胡人酋长的皮坎肩上蹭了蹭，又让人端上一盘金子和几匹绸缎，要求酋长配合行动。

酋长与他三击掌后，马上将东西送到邓训这里。邓训让他带去一些精锐的骑兵和军官。酋长又派人去报告迷唐：我部已被汉军管制，无法出战。

其他汉人官员劝告邓训："羌胡相攻，本来对我有利。此乃以夷制夷之策，大人不必派兵保护他们。"

"不然，张纡正是因为失信，才引起羌人暴动。大汉长期屯兵，不下二万。粮草转运，耗损府币。凉州吏民，命悬丝发。此处所居胡人，原来之所以常被羌人裹胁，不从大汉，都是由于恩信不厚啊！现在趁着他们困迫之际，以德怀柔，庶几能归顺，为我所用。"

边塞的大门打开了，汉军传令胡人以及一些弱小的羌人部落，速携妻子儿女财产入内。这一下，断绝了迷唐的兵源的供给，分化了羌人的军事联盟。眼见得扎在塞外的帐篷日趋减少，那些进关的胡人对邓训说：“汉家常常让人们自相残杀，惟有邓使君待我们如父母一般，我们惟您的命令所是。”

邓训又让几百名少年羌胡接受教育和训练，作为自己的义从。羌胡以病死为耻辱，一旦病重，辄拔刀自裁。邓训派出军医官把一些危重病人看管起来，加以治疗。

这些事，像春风一样，吹遍了边塞内外。邓训的使者携带着重金奔走于羌胡部落之间，塞外的营帐又少了许多。一天，一批羌人的帐篷随着一顶华丽的大帐向塞下移动。邓训大为高兴，下令启关。他对部下说：“这是迷唐伯父号吾的大帐！”

随号吾来降的有号吾的母亲以及八百多户部民。邓训又点了点塞外的帐篷，下令发动湟中汉、胡、羌兵四千人出击，迷唐逃往西部颇严谷，部落破散，汉军斩首俘虏计六百多人。

次年春天，即孝和皇帝刚即位的那年，迷唐又犯边，邓训命长史任尚将皮革缝在竹筏上，率军渡过黄河，几乎将迷唐部落一网打尽，斩首一千零八百级，生俘二千口。邓训又对归降者及弱小羌胡施加恩抚，迷唐再次远遁千余里。其中一个大部落首领东号率众投降。为了减少边费，又为了解除羌人的顾虑，邓训罢去屯兵，只留二千刑徒屯田开荒，修理城堡。

孝和皇帝永元四年（92）冬天，五十三岁的邓训病危，每天来看他的吏民和羌胡达千人以上。有一天，羌胡民众骑着马在塞上大漠上奔驰，他们大声地歌唱、吼叫，因为邓校尉死了。他们按照哀悼父母的风俗为他送行，有的拔刀自割，说邓校尉死了，我们也一起死罢。

像一切英雄一样，邓训成了这里的民众供奉的神灵。十三年后，孝和皇帝立邓训之女为后，使谒者持节扫墓，追封平寿侯。

邓训的继任者、原蜀郡太守聂尚，打算延续邓训的怀柔政策，他派出使者跑到千里之外找到迷唐，希望他率部回到河湟腹地的大小榆

谷居住，迷唐觉得机会又来了，他回到榆谷后，为了迷惑汉人，让自己的祖母卑缺造访新任护羌校尉。聂尚款待了这位羌人老贵妇，亲自送到塞下，又命翻译官田汜率五名校官护送她到部落中去。可他们再没有回来，他们的血肉被迷唐做了反叛盟誓仪式上的牺牲品。

朝廷大怒，聂尚被免职。七年以后，大汉以死亡一名、更换两名护羌校尉的代价，迫使迷唐投降并亲自到京师纳贡。第二年，迷唐又叛。第三年，金城太守侯霸大破迷唐，将他的部落分散徙居汉阳、安定、陇西三郡，迷唐西窜，病死在一个更加野蛮的发羌部落。他的儿子率残部来降时，都不到十户人家。次年，大汉开始出塞向金城以西屯田移民。至此，本朝前期的羌人问题基本解决。

然而，汉人官吏豪右奴役降羌的事件不断发生，并且，地方的军事将领还常常征发羌人服军役。

于是，对帝国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三次大规模羌乱，陆续爆发了。

羌乱

孝安皇帝永初元年（107），在一次捕杀逃避军役的羌人事件中，安定郡烧当羌酋长麻奴率众叛逃出塞，与先零羌的别种滇零以及钟羌部落攻击郡县，遮断陇西交通。由于他们是降羌，一时没有兵器，竹杆、木棍、案板、铜镜等都当作了兵器。汉人官吏却纷纷畏惧而逃。

朝廷一面诏令羌人，赦免他们的罪行；一面诏令车骑将军邓骘和征西校尉任尚率京师五校营和诸郡兵马五万人屯驻汉阳，进行备战。

选择邓骘，是因为他是邓训的长子，又是太后的长兄，孝安皇帝的拥立者。天子亲自在平乐观阅兵，给他饯行。和他的父亲一样，邓骘在打败了羌人之后，又用怀柔之策，让羌人返回故地。

但次年冬天，任尚在平襄败于羌人。加之五万兵马，粮草转运成了问题，湟中的粮价飞涨，百姓饥饿而死者甚众。这时，一位做过左校令名叫庞参的苦役犯，让儿子送了封信给邓将军，信中以为：与其万里运粮，远就羌胡，不如畜兵养众，以待其疲。因而不妨振旅还朝，并且渐次把凉州的汉民移至三辅，免除他们的租税徭役，使之耕织数年之后，大举进兵，报仇雪恨。

庞参是个通晓边事的干练的官吏，他的建议并非出自对羌人的畏惧，而是看到帝国陷入了一场没完没了的疲劳战。大汉的总体态势从立国起就是收缩的，不如因势利导，使力量内敛，不致耗散。但他是个河南人，他不知道的是：人民与其土地是很难分离的，凉州的汉人不仅热爱凉州，而且以自己是大汉的子民而自豪。

但庞参的建议得到了邓骘的赞同。邓骘在班师回朝的路上被拜为大将军，庞参获释，拜为谒者，去三辅督办军屯和移民的准备工作。

永初四年（110）二月，诏令留在边郡总督军事的任尚还兵长安。

同月，大将军召集京师公卿朝会，讨论放弃凉州，移民三辅的计划。他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两件衣服都坏了，拆一件补另一件，尚能保全一件。不然，两无所保。"公卿们都承认了他的逻辑。

有一个人不同意，他也是靠近河南一带的陈国人。会后，太尉张禹的府门被郎中虞诩敲开。

"大将军之策，有三不可。先帝所开疆土，费尽精力。现在害怕一点小小的花费，轻而放弃，此不可一也；凉州一旦放弃，三辅地区则成了边塞，先帝的陵园暴露于外，此不可二也；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民风猛壮，便习兵事。今羌胡之所以不敢入据三辅心腹之地，就是因为有凉州在其背后。凉州士民之所以推锋执锐，蒙矢石于行阵，父死于前，子战于后，而无反顾之心，就是因为他们是大汉的臣民。现在朝廷打算推而捐之，割而弃之，民众们安土重迁，一定会引领遥望，相互怨恨道：'中国弃我于夷狄！'，倘若他们卒然间起了谋虑，趁着天下饥馑、海内虚弱之际，豪

强相聚，量材立帅，驱赶着羌胡作为前锋，席卷而东，即便姜太公在世，也无法抵挡。真的如此，则函谷关以西的土地，连着旧京、园陵将非复为大汉所有，此不可三也。”

虞翊滔滔陈述，太尉大惊失色：“老夫的考虑没到这一步，没有您的这番话，几乎败了国事，请问有何对策？”

“朝廷可以收罗凉州的豪杰，引其子弟入朝为官，一则作为对他们勤于边事的鼓励，二则作为防止他们谋反的人质。”

公卿们又开了一次会，打算逐步实施虞翊的计划。但大将军有些不高兴，下面的人看出来，便找个借口把虞翊外放到朝歌做县令去了。

大将军仍坚定地实行庞参的计划，次年正月，在连续的军事失利之后，大将军以及边郡的官吏们都主张内徙。三月，朝廷下诏：陇西民众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果然，百姓恋土难迁。朝廷只得采取强制手段，将凉州汉民的庄稼割了，房屋毁了，堡垒拆了，粮仓移了。当时凉州正值蝗灾，百姓又遭此折腾，加之官吏军士们的掠夺，流离分散，死于道路，老弱捐弃，妻子被人虏掠为奴婢者，不计其数。移民结束后，清点人口，丧失大半。

终于，虞翊担忧的事情发生了。

这年九月，凉州汉阳郡的汉人杜琦和其弟杜季贡、同乡王信等人与羌人联合反叛，攻占上邽县。杜琦自称安汉将军。

永初六年（113）六月侍御史唐喜击杀王信。汉阳太守赵博召募刺客刺杀杜琦，杜季贡逃入滇零羌部落，被年少的酋长零昌封为将军，率众驻扎丁奚城。

元初二年（115）冬，战事又进行了一年多，行征西将军司马钧、谒者庞参、校尉仲光均被杜季贡击败，仲光战死，司马钧下狱自杀，庞参称病引退。复以任尚为中郎将，进讨羌叛。移民的计划破产。

虞翊又去拜访任尚。

“兵法曰：‘弱不攻强，走不逐飞’，这是自然之势。而今羌虏皆是骑兵，一天行走几百里，来如风雨，去如绝弦，而汉军却以步兵追击，当然不可。因此虽屯兵二十万，只能虚耗粮草，旷日无功。不如罢免诸郡的兵役，让他们出钱数千，二十人合买一匹马，组成万骑之众，用来驱逐数千虏骑，围追堵截，其道自穷：这是便民的利事，大功可立等而取！”

任尚大喜，依法行之，立奏成效。在丁奚城大破杜季贡，斩首四百余级。

捷报至京师，大将军及太后大喜，召见了虞翊，即拜为武都太守。

虞翊的军队刚到陈仓崤谷，数千羌骑遮拦于前。虞翊下令停止前进，一天之内派出许多快马递送请求援兵的书信，信中的言辞十分恐慌，坚持必须见到援军才能进军。这些消息被羌人得知，他们放心大胆地分散了兵力去抄掠郡县了。

虞翊命部队日夜兼程，日行百余里。又命军士每天增加炉灶，于是在行军的过程中，羌人不敢袭击。他的参军问道：“从前孙膑用减灶之法疑惑敌人，而太守您却反其道而用之。兵法规定日行不得超过三十里，以防不测，而今我们却日行二百里，这是何故？”

“羌虏人多，我军人少，走慢了就容易被他们追袭，走快了则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天天都看到我军炉灶增加，一定认为大汉的援兵前来接应，故而不敢追我。孙膑示弱，我今示强，因为形势不同啊！”

军至赤亭，数万羌骑包围了这座堡垒。

羌人的进攻开始了。汉军的常用战法是先用强弩射杀。可虞太守却下令用小弩射击。羌人见状，以为汉军矢力不足，大为振奋，加紧了进攻。十天以后，虞翊突然命令：每二十张强弩共射一骑。强矢呼啸，发无不中，羌人震动，一哄而溃。汉军鼓噪出击，杀伤甚多。

次日，虞翊大开塞门，布列行阵，摆出一副决战的姿态。羌人也严阵以待，观其动静。他们看到三千多穿着青色号衣的汉军从东门开

出，巡行至北门而入；继而又见三千穿着黑色号衣的汉军从北门出，从西门入；又有三千穿红色号衣的汉军从南门出，从东门人；最后，三千穿白色号衣的汉军从西门出来，向羌人阵前挺进。

羌将急忙传令：这是汉人的五行之阵，汉军众多，不可抵挡，速速后退！

数万人的军队一旦退后，行阵立即乱了起来，行至一处浅滩，中了汉军的埋伏，杀声四起，沙尘滚滚，不辨敌我。羌人大败而走。

虞翊大笑，他的伏兵只有五百，而列阵的也只有三千，之所以吓坏了羌人，是因为这三千人不断地更换衣服的结果。

羌人退后，虞翊在有利地形构筑了堡垒一百八十多所，又招抚流亡的汉人，赈济贫民，开通水运。三年以后，武都郡粮食由每石千钱降到八十钱，人口由一万三千户增加到四万多户。

元初四年（117）二月，护羌校尉任尚招募当阗羌酋长榆鬼刺杀了杜季贡，封其为破羌侯。九月，招募效功羌酋长号封刺杀了滇零羌酋长零昌，封其为羌王。此后，护羌校尉马贤又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至延光元年（122）三月，马贤大破烧当羌麻奴部落；十一月，麻奴降伏。延光三年（124），麻奴死，其弟犀苦继位。第一次大羌乱结束。

第二次大规模羌乱发生于孝顺皇帝朝永建六年（131），护羌校尉韩皓在河湟地区大规模地屯田，逼迫羌人西移，并且拒绝了犀苦酋长返回河湟故地的要求，引起了羌人的恐慌，相互解仇交质，加紧战备。朝廷为了不扩大事态，召回韩皓，以马续代之，收缩屯田，解除了羌人的疑虑。阳嘉元年（132）至二年，朝廷又在湟中扩大屯田。次年，钟羌反叛，被马续击破。永和四年（139），烧当羌酋长那离反叛。五年，新任护羌校尉马贤斩杀那离。六年，朝廷命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临行前，大将军梁商召见他俩，面授机宜：“戎狄蛮夷，皆处于要服和荒服之中，这是因为他们恍惚无常。统领他们的关键，在于没有常法，临事制宜，随其风俗。你们二位一向疾恶如仇，凡事一定要搞得黑白分明，这不好。孔子说过：‘对于没

有仁义的人，如果不因势利导地改变他，而是一味地痛恨他，只能更加激发他为非作歹。’何况，你们面对的是戎狄呢？二位务必安抚羌胡，防其大敌，忍其小过。”

大将军的担心一点都不多余，这两个人都是天生的虐刻，可惜大将军忽略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道理。他们一到任，就搞得羌人鸡飞狗跳。且冻羌与傅难羌攻打金城郡并与一些杂种羌胡大寇三辅，原来被迁至三辅的羌人由于不堪忍受汉人压迫，纷纷响应，一时边塞大乱，来机、刘秉被朝廷召回下狱。

天子拜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为副，将左右羽林、五校营士和州郡兵十万人进屯汉阳。大将军对这一人选有意见，他认为马贤太老了，可天子不听。马贤果然老而昏聩，迟留不进。这时，卢植将军的老师、关西大儒、时任帝国武都太守的马融上书天子，认为羌人卒然而合，并没有严密的组织，应当快速进军，深入打击，使其党羽离散。可是马贤队伍庞大，处处稽留，使得羌人百里望尘，千里听声，回避前锋，抄袭后路。马融提出：借给自己五千名马贤不可用的关东兵马，配给番号，组成先锋敢死队，臣虽不习武事，三月之内，也能破敌。最后，马融汇报说：“臣闻从前吴起为将，暑天不打伞盖，冬天不披裘衣，而马贤行军至野外，垂盖张幕，罗列珍馐，妻妾侍从，事与古反。臣害怕他专守一城，说着打西边而羌人却从东边出来，长此以往，将士不堪，必定奔溃叛变。臣夜观天文，北方并州的分野有兵象，可能北方的乌桓、鲜卑也要有动作，朝廷宜有准备。”

书奏之后，安定郡朝那县的布衣之士皇甫规也上书，报告马贤不恤军事，其势必败。

朝廷均未准奏。次年正月，马贤与且冻羌战于射姑山，贤及二子战没。三辅一带的东羌与金城、陇西的西羌大会合，将战火连成一片，长安的苑马和先帝的园陵都遭到抢掠和焚烧。

三月，新任武都太守赵冲追击巩唐羌，斩首四百余级，降二千多人。朝廷为之一振，诏赵冲总督河西四郡兵马。

皇甫规在这次羌乱中入伍从军，担任功曹，这是一个下级军官，

可他却率八百甲士一仗斩首数级，威震羌胡。升为安定县计掾。他奋笔疾书，上奏天子，要求委以重任：

“臣近年来，屡陈破羌之策，不幸误中，皆可检验。臣每每念及马贤等人拥众四年，未有成功，而悬师之费，以百亿计数。出于平民，回入奸吏。故而江湖之人，群聚为盗；青州徐州，饥荒遍地，人民襁负流散。羌戎溃叛，并非由于国家承平太久，皆是由于边将失于绥御，平常无事则加侵暴，贪图小利则致大害，小胜则虚报斩首数目，兵败则隐匿不言过失。军士劳怨，困于猾吏，进不得速战，为国立功；退不得温饱，以全性命。饿死沟渠，暴骨中原，徒见王师之出，不见振旅之声。羌酋泣血，惊惧生变，所以和平不能持久，叛乱却是经常。这一切，都使得为臣搏手叩心而长吁短叹！愿天子借给臣两营、二郡五千兵马，出其不意，与赵冲将军首尾相应。这里的土地山谷，臣至为熟悉，兵法战术，臣亦略通，朝廷可不烦方寸之印，尺帛之赐，上可以涤患，下可以纳降。倘若认为臣年少官轻，不足为用，请看那些败将们，哪一个不是资深的高官？臣不胜至诚，冒死自陈。”

这封上奏未能奏效，但却显示了皇甫规的雄才大略。

建康元年（144）春天，护羌校尉赵冲的从事马玄随羌人叛变，逃亡出塞，应了马融的预言。赵冲追击叛羌至建威，渡河之际中了埋伏，战死阵前。但此时，由于前些年的残酷争夺，羌人也元气大伤，走向衰落。次年，孝冲皇帝即位元年，左冯翊行政长官梁并以恩信招诱羌人，降伏五万多户，边塞形势又趋平缓。

财政部门上报这次平叛开支达八十多亿。

自孝桓皇帝延熹二年（159）起，爆发了第三次羌人大叛乱。而此际，臣服已久的南匈奴、遗留故地的北匈奴残部、几百年前被匈奴击垮，现在再次崛起的东胡乌桓与鲜卑，纷纷乘机寇掠边境，大汉的整个从东到西的北部边境，狼烟突起。

十二月，烧当、烧何、当煎、勒姐四大部落率八个羌人部落攻入金城、陇西郡。护羌校尉第五访恰恰病卒，帝国政府将刚刚击退犯塞鲜卑的辽东属国都尉段颎（字纪明）将军调至此任。段纪明将军更像一个职业军人，不同于那些儒将们，仅仅把武力当作手段，把羌人的臣服当作目的。他只从战争的实际利害出发，认为帝国应当不惜破费，以驱逐和殄灭为目的，大举进攻羌人。他手下的田晏和夏育，都

是猛将，带着一万二千汉人和义从羌骑，出湟谷，一路追杀，斩首二千级，生俘万余人。次年，段将军在张掖与烧何羌大酋长相遇，从日出杀到日中，杀得段纪明眼发红，从马上下来与羌人格斗，汉军刀折矢尽，羌人更是吃不消，呼啸而走。段将军咬住不放，且斗且追，昼夜相攻。军中无粮，段将军让大家杀马饮血，继续追击。四十天后，汉军追至塞外二千里的积石山（今阿尼玛卿山）。羌人大怒，这座大雪山横阻了去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汉军会穷追到这么远的地方。他们的前辈们曾告诉他们，与汉人作战，只要逃至塞外不毛之地，汉人就不会来了，积蓄几年之后，再去攻打边塞。

段将军和当时的所有汉人一样，认为积石山是黄河之源，他异常激动，勉励将士，不可功亏一篑。最终，汉军斩杀烧何羌大酋长，斩首五千多。回兵之际，段将军又攻击石城羌的部落，斩杀一千六百人。进击白石杂种羌，俘虏三千多人。烧当羌眼见战火将烧至自己的部落，急忙投降。

延熹四年（161）冬天，先零、沈氐二羌进攻并、凉二州。凉州刺史郭闳怕段纪明占了全部的功劳，以种种借口，阻止他进兵。由于军队长时间稽留，军中的义从羌骑兵思念家乡，纷纷叛逃，而郭闳反而归罪于段纪明。段将军退出战事，坐着囚车到了京师，判处苦役。朝廷以济南相胡闳代其职务。胡闳毫无威略，羌人再次大举进犯。陇西及金城的吏民们纷纷至京师上访，为段喊冤。朝廷只得对他的案子加以复审，可段纪明只是谢罪，不喊一声冤枉，在京师的吏民当中赢得了“长者”的声誉。朝廷只好维持原判。

这时，朝廷起用了皇甫规将军。诏拜中郎将，持节督关西军马。第一仗，斩首八百余级，先零羌降伏达十多万。

延熹五年（162），沈氐羌入寇张掖、酒泉。皇甫规发动先零降羌与汉军共击叛羌。行军途中，发生了瘟疫，死者十有三四，可皇甫将军凭借他的威望，亲巡将士，因而无一人叛逃。军队未至，叛羌遣使乞降。皇甫将军是儒将，因而更懂得：战争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政治手段，而政治的根本还在大汉本身。他不仅用树立好的政治形象的方法赢得羌人的归降，而且着手惩治贪婪残暴的地方官吏，以平息

羌人乃至当地汉族民众的愤怒。因此，当他雷厉风行地查办了凉州刺史郭闳、汉阳太守赵熹、安定太守孙俊、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等人之后，沈氐羌的大酋长阗昌便率领十余万口前来归降。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皇甫将军忘了最重要一条：这些官吏的贪暴，只不过是大汉中央和各地政治状况在边郡的翻版，边塞军民的鲜血，并不能让大汉这个老朽的帝国焕发青春。果然，这些被惩处的官吏们潜入京师，四处活动，其中有些人又是中官们的亲朋党羽，于是朝廷下诏责问皇甫规，让他解释：是否曾用财货贿赂羌人，让他们假装投降？

皇甫规上疏自讼，在说明了一切都是诽谤之后，天子为了和稀泥，诏拜皇甫规为议郎，还朝听封。

回到朝中，皇甫将军终于认识到自己所没有认识的问题。中常侍们向他暗示：如不向他们行贿，封赏就要泡汤了。皇甫规犯了倔，就是不答应。于是那些诽谤罪忽然又成立了。等到了司法官面前，竟然他也向皇甫规索贿。如果没有一帮太学生在宫外游行示威，他是逃不出段纪明的下场的。

六年（163），东北边事吃紧，朝廷又拜皇甫将军为度辽将军。他可能仍沉浸在失望之中，上疏推荐了张奂。朝廷仍没有放过他，诏拜使匈奴中郎将。

皇甫将军吃了官司，西羌又反。天子一急之下，让人去洛阳南郊的劳改农场，将混在苦役犯中的段纪明带到朝堂之上，复拜护羌校尉。

七年十月，八年正月，段纪明大破当煎、罕姐羌。八年五月至七月，段纪明对西羌各部发动了大规模围剿，斩首二万三千级，降万余户。捷报西羌平定。

孝桓皇帝在位的最后一年，鲜卑与东羌先零部落联合寇边，自凉州东至并州、幽州皆被其创。诏张奂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的秩位总督三州兵马。

一天，孝桓皇帝见战事尚无大的进展，便叫来班师回朝的段颎：

“先零东羌，既降复叛，而皇甫规、张奂各拥强众，不及时平定。寡人打算让爱卿移兵东讨，请陈策略。”

“臣以为先零虽叛，但降于皇甫规者已有二万多户。张奂按兵不动，是怕刺激他们再次叛乱，而且他考虑到大汉军队长期屯结，人马疲惫，用招降之术，可坐制强敌。不过，臣自有看法：羌人乃狼子野心，难以用恩信招纳，只有长矛挟肩，白刃加颈，方可制服。计算东羌，今只剩下三万多户，又徙居塞内，无险阻地形可依，但三辅、西河、上郡、安定、北地诸郡，皆有降羌内徙，加之匈奴、鲜卑乃至乌桓的呼应，如不采取军事手段，转就滋大，无法收拾。若发动骑兵五千，步兵万人、战车三千辆，经三冬二夏，费钱五十四亿，可以灭尽羌胡，内徙的汉民得还故土。臣算过，永初中羌叛，十有四年，用费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七年羌叛，用费八十亿。如此巨耗，尚不能诛尽群羌，今若不疲民破费，则大汉永无宁日。臣愿竭尽驽劣，听候调遣。”

天子认可，但朝廷只能拨出一万多兵马，段将军仍有信心，带着他们出发了。

在彭阳至高平之间的义逢山，汉军突然遇上先零羌的主力，面对黑压压的奔腾羌骑，汉军的战马都吓得腿抖，更不要说人了。段颎不怕，他下令骑兵列于左右两翼，步兵以长矛在外，排成三重，将操持强弩、利刃的军士放在后面。

“现在，我们去家千里，前进则事成，后退则必死。努力吧！大汉的将士们！搏取功名，让后人景仰吧！大汉的男儿们！”

段将军第一个策马冲锋，汉军热血沸腾，大喊一声，跟了上去。

这一仗，斩首八千余级。捷报至京师，孝桓皇帝已经听不到了。但这个捷报却为这个生前孱弱荒唐的天子争了个相当好听的谥号。窦太后诏赐钱二十万，调皇家金库金帛，赞助军费，拜段纪明为破羌将军，令尽定东羌。破羌将军是一个新的军衔，朝廷下了决心，不再打算护羌了。

建宁元年（168）六月，段将军轻骑追敌，至七月，羌人离散，

四十多个部落窜入汉阳山谷之中。

此际，张奂将军上书，说羌人的余部是难以根除的，而段将军性格轻剽勇猛，可能会吃败仗。宜以恩信招降。

朝廷把张奂的书信转给了段颎，段将军大怒，上书答复说："张奂虽为大汉臣子，又精于军事，却说出此言，实是糊涂。因为当初赵充国、马援等人在对待羌人的问题上都犯过错误，张奂之论证由此来。事实上，降伏羌人，再内徙至大汉的郡县，是引狼人室之举。今臣奉大汉国威，羌人已接近殄灭，望朝廷勿听此言，一以重任委以臣下。"

朝廷没有驳回段将军的上书，但同时派谒者冯禅说降汉阳散羌。

段将军和他和骑司马田晏与假司马夏育放兵至山谷之中，搜剿羌人。又筑木栅围困羌人，从建宁二年（169）五月至七月，斩首一万九千级。冯禅招降了四千羌人，安置于安定、汉阳、陇西三郡。至此，东羌平定。

段前后一百八十战，斩首三万八千余级，获牲畜四十二万七千余头，费用四十四亿，军士死亡四千多名。封新丰县侯。

鹰犬与豺狼

可惜的是，段颎的赫赫战功创立之际，正是整个大汉帝国衰亡之时，因而他在历史上并没有受到像对卫青和霍去病一样的赞誉，而是落了个"专杀为快"、"虽克捷有功，君子所不与也"的评价。对于他个人来说，可能是不公道的，但对大汉帝国镇压羌人的战争来说，不无道理，因为这场战争归根到底是由于大汉政治的腐败而造成的毫无意义的战争，同时，这场战争耗尽了大汉的精力，使之走向死亡。卫青、霍去病的战功，促成了一个强盛的大汉，而段纪明的战功，没有能挽救一个垂死的大汉。宋代大史家司马温公，在煌煌巨著《资治通鉴》中，认定大汉长期的羌人叛乱，其根源在于大汉政府对付不当，

并且站在超越民族界限的立场上说："如果统治者不得要领，即便是华夏之民，也将蜂起而为寇，难道这也可以用段纪明的方法，全部杀尽吗？"

事实上，司马温公的话说迟了将近九百年，因为在本朝天子御政的第十四个年头，凉州的羌人和汉人已经用他们的生命直截了当地体验了这个道理。从永初羌乱中，就可以看出，大汉的边民在帝国放弃他们的家园时，就参加了羌人的队伍。时至今日，凉州的汉人和羌人终于看到：大汉不仅不能养育他们这些子民，而且日益成为自己的敌人，只有凉州这块土地，才是最值得依赖的。

长期厮杀的对手，往往能成为最靠得住的伙伴，正如人类最早的忠实伙伴——狗，却来自最凶残的敌人——狼一样。生存，永远是最高的原则。汉人的文化能影响羌胡，羌胡的文化也能影响汉人，凉州的汉人妇女都是出色的战士，羌胡的部落和汉人的政府军里，分别混杂着汉人和羌胡。

共同的生存地理，酝育出羌汉共同体，酝酿出凉州地方自治运动。

中平二年（185）三月，有关凉州兵马寇掠三辅的御前会议结束之后，谏议大夫刘陶上书天子，指出凉州叛兵之中，有不少段纪明的部下，这些人晓习战阵，识知山川，变诈万端。他们可能会攻击三辅，豕突京师。如此，则车骑将军张温的南边道路将被抄袭，帝国的西征军如果孤立无援，关东将闻风破胆。现在京畿民众有百走退死之心，无一前斗生存之计。张温天性精勇，而朝廷却旦夕催促。他又建议急停天下郡县的赋税徭役，以安民心，惩治中官，以塞民望。

可这份上书又被天子拿给中官们看。他们提醒天子："上书中说的这些事情，下面州郡都没有上报朝廷，他如何得知呢？一定是与贼通情。国家正在多事之秋，陛下可要小心。"

天子没了主张，让北寺狱审查刘陶。刘陶在第一场审讯中便悲愤交加，闭气而亡。

京师一带的百姓在他的葬礼上唱起了挽歌："悒然不乐，思我刘

君。何时复来，安此下民！”

中平元年十一月凉州叛乱的起因，还是郡守贪暴。这一点，汉阳郡长史、敦煌人盖勋最清楚不过。当时，武威郡太守恣行贪婪，凉州从事苏正和调查他的罪行。一天，凉州刺史梁鹄来找盖勋，说苏正和不是盖长史的仇人吗？盖勋说有这回事。梁鹄说：“那我就直说了罢。武威太守贪污的事如果查出来，我作为刺史，是朝廷派来的监察官员，当引咎辞职。所以我打算请您想个办法，杀掉苏正和。”

梁鹄走后，盖勋的部下劝他借此机会报了私仇，盖勋说：“谋事杀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

他去劝告梁鹄：

“系食鹰隼，是因为它能执服众鸟，大人却想烹杀之，将有何用？大人身为大汉重臣，辞职事小，有关大人的清名，事情可就不小了。”

事后，苏正和亲自到盖勋的门前求谢，盖勋不见，让人传了句话出来：“吾为梁使君谋，不为苏正和也。”

盖勋虽然怨苏正和如初，可这件事在凉州地区引起舆论大哗。接着，新上任的刺史左昌盗窃军粮的事情泄露，军中及民间议论纷纷。盖勋劝谏左昌，还粮入库。左昌大怒，下令盖勋与从事辛曾、孔常率兵外屯阿阳。

先零羌和北宫伯玉的军队攻打金城的战报传来，盖勋急忙劝左昌救援金城，左昌不从，致使太守陈懿阵亡。直到左刺史一觉醒来，看到城外神速而来的羌骑，这才害怕起来，派了快马突出，召盖勋带兵来救。

“长史大人，我们为什么要去救那厮？”从事辛曾和孔常说道。

“诸位，无论那厮如何不堪言语，但军法无情，大汉国法仍在。战国之际，齐景公以司马穰苴为将，以庄贾为监军。演兵之际，庄贾迟到，死于军法。诸位身为从事，与监军相比，孰轻孰重？”

围城的羌兵发觉后面有汉军人马杀来，忙派出一队前去阻挡。叛

军将领边章一听是盖勋，下令让开通道，让盖长史的人马直抵城下。

“长史大人，边某戎机在身，不得下马揖礼了，大人近来无恙？”

“边章，你身为大汉子民，却拥羌胡之众，反叛边郡。实在让盖某为你感到遗憾啊？你我相识多年，为身前身后的名分计算，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吧！”

“长史大人，我等叛离大汉，实是大汉弃我等如同草芥。像大人这样的长官，大汉又有几人？倘若左使君早早听从您的话，停止侵夺，或让您率兵责讨我等，庶几可以改过自新。现在，我等攻杀大汉州郡长吏，自知罪在不赦，故而无法投降。大汉已为上天所弃，长史大人好自珍重！”

说完，边章用一个十分潇洒的动作挥动马鞭，围兵如飓风一般，将一股巨尘，带进了遥远的大漠。

叛军虽然给了盖长史天大的面子，可盖长史还得为大汉尽忠。十二月，原护乌桓校尉夏育赴护羌校尉任上，军至畜官，被叛军包围。盖勋与诸州郡兵马前往救援。走到狐般，羌人伏兵大起，汉军大溃。盖勋手下经此一击，不满百人。他本人身被三创，战马死了，伤口在流血，他对部下说：“盖某今日在此殉国。”

他指着阵前的旗杆说：“死后，将我的尸体放在那里！”

身边的将士们保护着他，纷纷倒下。终于，他面对着叛军的重重刀剑。

“住手！”一个酋长模样的人用马鞭拨开叛军。盖勋认出来，这是句种羌酋长滇吾。

“盖长史是大贤人，尔等敢杀他，就是冒犯了上苍！”

盖长史不领情，大声呵叱道：“该死的反虏！你知道什么？快来杀我！”

羌人面面相觑，惊恐疑虑。

滇吾下马：“请大人骑上小人的坐骑，回大汉军中去吧！”

盖大人仍旧不动身。最后，滇吾下令强行将盖大人架上马，派了几名精干的骑兵送他至汉军阵前。大汉任命盖勋为汉阳太守。

刺史左昌被召回京师问罪。新任刺史宋因，是个十足的书生。他认为凉州之所以老是叛乱，因为此地的教育和学术没有搞好，人心之中，没有忠孝节义。他一到任，就对盖勋说："我打算让人多抄些《孝经》，分发到每家每户，令人人诵习，庶几可让人知道大义，平息寇乱之心。"

盖勋长叹一声，心想宋大人说得在理，可现在晚了，大汉只知向凉州民众征收赋税，可从来就不知恩育教化。

"使君大人，从前姜太公封于齐国，可齐国照样出了弑君的崔杼；周公封于鲁国，可鲁国照样也出了篡位的庆父。齐、鲁二国，难道还缺乏教化和学术吗？现在大人不急着做靖难之事，反而做些超出常理的举动，既足以招致凉州百姓的怨恨，又足以被朝廷取笑。盖某知其不可也！"

宋使君太迂了，仍然上书朝廷，要求批准这项计划。朝廷不仅没有批准，反而一纸诏书，免了他的职。

次年八月，左车骑将军张温出兵之时，朝廷诏拜盖勋为讨虏校尉。

中平二年（185）十月，左车骑将军率州郡马步兵十万抵达右扶风美阳县，被边章和韩遂击败。十一月，破虏将军董卓与右扶风守军将领鲍鸿合兵反击，大败叛军。边章、韩遂率军从三辅地区向金城郡榆中县退却。

张温将兵马分为两路，各三万。一路由荡寇将军周慎率领，追击边章和韩遂；另一路，由破虏将军董卓率领，进讨羌人主力——先零部落。

孙坚，此时在张温军中任参谋。周慎临行前，孙坚去他的大帐，对他说："据我探知，贼兵据点之中已无粮草，他们一定要外出运粮。在下愿率万人断其粮道，将军自率大军压境，贼兵必不敢出战。粮草一断，贼兵困乏，则凉州可定。"

周慎没有听从，他径率大军包围了榆中城。攻打数日，无大进展。军队马上面临粮草问题。周慎派出的运粮队在葵园峡遭到叛军的伏击，周慎大恐，弃辎重而退。

董卓一路刚到坦北，就被羌胡团团围住。坚持了好多天，派出的求救使者皆无生还，军队无粮可食。董卓灵机一动，下令军士在营外河中筑堤，拦住上游的水流，然后在堤下捕鱼。羌人以为汉军打算坚持固守，放松了警戒。董卓又命汉军陆续从堤下偷偷行进，几天后，羌人发觉了汉军的计谋，可是为时已晚，当羌胡兵蜂拥而至，最后一名汉军已渡过河去。董卓哈哈大笑，下令破堤，河水汹涌奔腾，羌人只得勒马河边，望洋兴叹。

张温的军队退守扶风。可董卓的军队迟迟不至大营报到。张温让人拿着诏书将董卓带来，问他兵败之状，董卓陈述之际，面呈不服之色，语气桀骜不驯。

孙坚对左车骑将军说道："此人今后必为大患，明公可借此以军法处斩！"

"文台，董卓平素在河、陇一带甚有威名，今日如果杀之，恐怕大军西行征讨，无所依靠啊！"

孙坚是南方人，他不太知道西北边郡的复杂情形，所以他仍进谏道："明公亲率王师，威震天下，为何反依赖董卓！观他刚才所言，犯上无礼，其罪一也；边章、韩遂跋扈多年，当及时进讨，可董卓却说不可，分明是沮军疑众，其罪二也；他受朝廷大任，劳军无功，应对之际，反而轩昂自高，其罪三也。古之名将仗钺临众，将发大军之际，没有不断杀败将以激励士气的。今明公却看重董卓，不加诛杀，亏损威刑，必有后患！"

"文台！"左车骑将军用手势示意孙坚不要再说下去了。"你暂且回营，董卓刚走，见你在我营中久留，必起疑心。"

孙坚叹息而出。

次年春天，天子派出使节至扶风，拜张温为太尉，节度关西兵马。本朝诏拜三公，皆在京师朝堂之上，张温开了三公在外诏拜的先

例，多事之秋，不得不便宜行事了。

同时，拜大长秋赵忠为车骑将军，节度关东兵马。赵忠是个中官，他只会宫里的一套，出掌兵马，他还着实有些紧张。他问禁军统领、执金吾甄举，有什么法子收买军队的人心。甄举说：“上次天子让您定讨黄巾之功，当时的护军司马傅燮因上书弹劾中官，得罪了您，未能封侯，这件事，天下皆知。此人在军中甚有威望，您只要给他封侯，便可收回人心。”

赵忠无奈，只得答应，就让弟弟城门校尉赵延去傅燮家中致以问候。赵延说：“南容（傅燮字），您只要对我家兄稍加答谢，万户侯也不在话下。”

赵延的热脸贴到了冷屁股上，傅燮一脸的严肃：“有功不赏，这是命。我傅燮岂能去求私赏？”

没几天，诏书到门，傅燮跪下接诏，拜为汉阳太守，即刻离京赴任。

傅太守未到郡，就有叛羌闻风而降。郡将范津是南阳人，当年傅太守举孝廉，即出自范津的推荐。傅太守到任，与这位知己合对了兵符。几天以后，范津离任，返京述职，汉阳百姓送了很远。傅燮与之洒泪而别。

这年十月，南方武陵蛮夷反叛。十二月，鲜卑寇掠幽、并二州。天下大扰。

中平四年（187）的正月，朝廷就大赦天下，希望安抚人心，但刚到二月，京师附近的荥阳发生民众暴动，杀中牟县令。次月，河南尹、大将军何进之弟何苗率军出讨，奏凯还朝，拜为车骑将军。

这时，边塞又传警报：韩遂杀了同伙边章、北宫伯玉、李文侯，拥兵十万进围陇西。陇西太守李相如叛变投敌。

诏拜耿鄙为凉州刺史，率六郡兵马进讨韩遂。

耿鄙初来乍到，一切听从他的副手、治中从事程球。可他并不知道，此人在边塞多年，是出了名的奸吏，民怨沸腾。

耿鄙在任上接受的军队中，还有一位军司马叫做马腾。耿鄙在第一天到军中训话时就注意上他了，因为马腾的身长八尺有余，大脸、宽鼻。当询问其出身时，更让耿鄙大吃一惊，他竟是本朝初期平定羌乱的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之后。其父马硕，孝桓皇帝时为凉州天水郡兰干县尉，因失官，留居陇西。又因家贫，遂娶羌女，生下如此伟岸的儿子。前年，狄道县汉人王国联合羌、氐叛乱，响应北宫伯玉。郡县募兵讨击，身为樵夫的马腾应招立功，升为军司马。

“伏波将军大概不会想到，他的后人仍在破羌阵中；更不会想到，他的后人竟是汉羌杂种。”耿鄙心里想着，觉得有趣。

汉阳太守傅燮来见耿鄙。

“使君大人来此不久，统政日浅，民未知教。贼闻大军将至，一定会万众一心。边兵多勇，其锋难当，王师新合，上下未和，万一内变，虽悔无及。不如息军养德，明赏必罚，操练兵马。贼得缓解，必谓我胆怯，必然争势恶斗，内讧不断。大人可趁机率已教之民，讨离心之贼，其功可坐而得之。”

傅燮已经认识到，这次讨伐边叛，已非一蹴而就的事了。他认为还得从吏治入手，以作长久之图。可刺史大人新官上任，贪功冒进，又嫌傅南容小瞧自己。于是大军继进不停。

四月，汉军至狄道县，凉州刺史的别驾做了叛军的内应，杀程球，又害耿鄙，汉军大溃，有的纷纷投贼。

贼兵进围汉阳，傅太守坚守城池。

一天，傅燮在城楼上听到贼军之中，有人用自己的家乡话喊叫。当他走到城墙边上，看见一大片胡人骑兵下马跪在城下，向自己叩头。他一下子明白过来，这是家乡北地郡的胡人。

胡人对他喊道：“我等皆怀太守恩德，不忍加害，愿太守出城，我等愿随太守还乡！”

傅燮之子傅干，年仅十三，此时对父亲说：“国家昏乱，遂使父亲大人不能容于朝堂。现在大人的兵马不足以自守，不如听从羌胡之

言，还归乡里，等天下有道，再出而辅政。”

傅燮止住儿子继续往下讲。

“你知道，我是一定要死于国事的。只有圣人才能通达地处理节操问题，其次只能守住自己的节操罢了。当初殷纣王暴虐天下，周武王兴师为民除害，而伯夷却以为以下犯上，为不义之举，故而不食周粟而死。我遭乱世，不能养浩然之气，却又食了朝廷的俸禄，又怎能逃避国难？我还能去哪儿？必死于此！你有才智，勉之勉之！我的主簿杨会，乃是我家的程婴，可以托孤，今后，你可依靠于他。”

第二天，叛军做好了一切攻城的准备，摆开了阵势。临下达攻城命令之前，叛将王国让已经投降的酒泉太守黄衍到城下喊话：“南容君！天下已非复为大汉所有，南容君是否有意担任我等的统帅？”

城上的傅燮拔出佩剑，大声喝道：“你是大汉的剖符之臣，反而为叛贼充当说客吗？”

王国挥动马鞭，羌胡兵马如旋风一般，将汉阳郡城扫荡一空，傅燮阵亡。朝廷下谥号，曰：“壮节侯”。

汉阳陷没之际，汉军司马马腾率部反水，投靠韩遂，他俩结为异姓兄弟，共推王国为主，进而抄掠三辅。

九月，幽州辽西发生了乌桓与汉人的联合叛乱。

张温进讨凉州时，朝廷调发幽州乌桓突骑三千人，中山相、幽州渔阳人张纯要求担任将领，张温却任命涿郡人公孙瓒为将。乌桓的酋长丘力居根本不想给大汉卖命，军队刚刚开到蓟县，就谣传军粮没有运出。于是一夜之间，军队纷纷叛回乌桓部落。乌桓知道大汉政府饶不了他，于是联合张纯以及故泰山太守张举，举兵叛汉。杀护乌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官吏。叛军拥众十余万，屯驻辽西郡肥如县。张举自称天子，张纯自称弥天将军、安定王，移檄天下，历数当今天子的罪过，称张举当代汉；并命天子退位，京师公卿速来幽州奉迎新天子。

这是大汉的朝廷命官联合异族叛乱的开始。

本月，诏：张温平寇无策，免去太尉之职，以崔烈代之。

十月，南方长沙郡人区星率万人暴动，自称将军。诏议郎孙坚为长沙太守。当月，孙坚平定民变，封乌程侯。

十一月，王国包围陈仓。

皇甫嵩将军退居在家，除了阅读王符的《潜夫论》和历朝平羌史料之外，家中日日宾客盈门，驿马不断，将军仍在规划戎机。陈仓被围的消息传出，他说："该我出马了！"

果然，诏书下达，拜皇甫嵩为左将军，督前将军董卓，合兵四万讨贼。

董卓虽然瞧不起张温，但对皇甫嵩却佩服得很，因为皇甫规和张奂都是他的上司。皇甫氏又是凉州人，与自己同乡。可这一次出征，在战略上，董卓与皇甫嵩发生了分歧。

董卓认为：陈仓危急，宜速往营救。而皇甫嵩却认为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陈仓虽小，但历朝历代均为军事要塞，城守坚固。王国兵马虽强，但久攻不下，其众必疲。疲而击之，全胜之道。

皇甫将军按兵不动。八十多天之后，时已中平六年（189）二月，陈仓来报，贼众解围而走。

皇甫将军下令追击。可董卓却进帐谏道："兵法云：穷寇勿迫，归众勿追。"很显然，他这是有意与主帅唱反调。皇甫将军看得出来，但没有动怒。

"董将军，以前，我不进击，是避其锐气。现在追击，是由于贼军已衰。我军所击，乃是疲师，并非归众。王国的兵马正在撤退，没有斗志，我军以整击乱，并非追击穷寇。"

皇甫将军又命董卓担任后援，自将主力追击叛军，连战大胜，斩首万余级。皇甫将军并未独占功劳，他太有修养，可董卓却以为这是对他更大的羞辱，心怀怨恨。

王国兵败，其部将韩遂、马腾等谋划之后，废了这个不中用的主

子，用兵马劫持了一个凉州名士做主子。

这个人，就是劝说皇甫嵩将军反叛大汉，自做天子的阎忠。

不久，阎忠病死，贼军开始了自相残杀，走向衰微。朝廷暂时得以息兵。

中平五年（188）三月，诏发南匈奴讨张纯，单于羌渠遣左贤王率骑兵至幽州报到。匈奴虽然归附已久，但常常苦于大汉的征用，时下天下动乱不已，匈奴各部皆惧怕汉廷的调发没有个尽头。在骑兵刚刚上路之际，一个大部落联合屠各胡，合兵十余万攻杀单于，立其子右贤王于扶罗为持至尸逐侯单于。南匈奴从此叛汉。

六年，幽州牧刘虞到任，遣使去鲜卑、乌桓等部陈述利害，责令送张纯、张举二人首级于京师。鲜卑、乌桓被使者的利口和大汉的重贿打动，派遣译使来京师归降。

张纯、张举见势不妙，逃出塞外。刘虞罢兵，留降虏校尉公孙瓒将步骑万人屯于右北平。

三月，张纯的门客王政杀张纯，送首级于刘虞。诏拜刘虞为太尉，封容丘侯。

但此时刘虞与部将公孙瓒发生了矛盾。公孙瓒主张扫平乌桓，而刘虞却主张以恩信招降。公孙瓒的主张，看似忠勇可嘉，其实像很多在平定民众和边塞叛乱中积极主张进讨的将领一样，借平寇为名，来充实自己的实力。

中平五年（188）冬天，盖勋被召回京师，天子亲自接见了他。第一句话就问："天下何苦，而反乱如此？"

盖勋回答："中官宠臣及其子弟，扰乱天下，事至于此。"

此时，京师有个望气的卜师，逢人便道："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

一时间，人心惶惶，谣言四起。

第六章
北邙山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
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

——汉乐府歌辞

天子的发明

中平五年（188），盖勋在回答天子的问话时，话刚出口，便觉大悔。因为他忘了身边还有一个人，此人便是小黄门蹇硕。天子回头对蹇硕说：“你说，是这样吗？”

蹇硕是个很有力气的中官，但资格却比张让、赵忠之辈浅得多，可近来天子倒是相当看重他。他听到问话，一时不知所云，面呈惧色。

天子看了觉得好笑，便挥了挥手，表示这个话题到此为止。他一生都在观看中官与士大夫的角斗戏，现在边将又与中官们过不去，实在是烦恼无边。像这样简短的谈话，他也感到相当的吃力。不仅国事如此，家事也一样令人苦恼，出身于屠夫家中的皇后越来越不像话，在宫里飞扬跋扈，老是和自己的母亲永乐太后顶顶撞撞，恶语相加。婆媳关系又扩大到干预政事上来，拜了何皇后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何进为大将军，又要拜她的同母异父的哥哥何苗为车骑将军。这下子太后又闹了起来，可她没有哥哥了，她的哥哥执金吾董宠被中官不明不白地干掉了，只得拜她的娘家侄子、五官中郎将董重为骠骑将军，搞了个平衡。

想到这些事，天子心乱如麻，便令步辇幸南宫玉堂。

天子近年对建筑学的兴趣越发浓厚。玉堂，是他与钩盾令宋典合作的一项古建筑修复工程。与此同时，他又与掖廷令毕岚合作，在南宫东门搞了四个铜塑仙人，在玉堂中铸了四口铜钟。接着，他又迷上了给排水工程。他将几条输水管道铺设在洛阳城南至南官之间，利用地势，使得水流进入宫内。他的水龙头相当考究，一个做成神兽天禄的模样，一个做成月中蟾蜍的模样。不过天子是个相当仁义的人，他在用上自来水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洛阳城的广大居民们。于是他又与宫中的能工巧匠设计了两种抽水工具，一是翻车，即千年之后尚未绝

迹的农业灌溉水车；一是渴乌，即一种曲形汲筒，可用活塞抽吸引水。这两样东西放在洛阳城南的平门桥西，抽出的洛水从喷口中射出，像春雨一样，洒在贯穿洛阳城的南北主干道上。工巧之士对天子的这几项工程赞不绝口，小民百姓刚看到人工降雨的场景时，也欢呼万岁，只有财政大臣叫苦不迭。

当然，天子也不是完全忘情于其中而不问国事的君主，他知道自己的这些行为都会受到臣下的批评，甚至会被不讲情面的史臣写进帝国的史册。可你们这些臣下们可曾为我想想，国事日益衰敝，你们无甚好的对策，还成天在朝堂上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总不能让寡人成天价陪着你们玩这种枯燥无味的把戏？更何况，天子总是觉得浑身无力，他朦朦胧胧之中有些预感，自己的寿命可能会和叔父孝桓皇帝差不多，因而天子更在抓紧时间，去享受那些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

州牧与校尉

面对目前的国家形势，天子批准了两大措施。

第一是改州刺史为州牧。这个建议来自帝国的宗室成员、太常刘焉。大汉自孝武皇帝起设立刺史部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一人，每个州部下辖若干郡县。但有一点必须明白，即州部不是行政区域，帝国的地方行政是郡县两级。那么，州部是什么呢？州部是帝国的地方监察机构。在中央，军政大权由丞相、三公、太尉等掌管，而对中央官吏的监察，则由御史大夫掌管。监察功能延伸到地方，就是刺史了，这是大汉对今后千秋万代树立的一项典范制度。孝武皇帝初立刺史时，故意将刺史的秩位搞得比他的监察对象——郡守低一百四十石，因为嫉妒心理会促使刺史们穷凶极恶地整倒比他大的官僚。可是后来，刺史的权力越来越大，朝廷也只好将其秩位增加至二千石。事实上，至本朝，刺史已经成了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只是没有名分罢了。

刘焉干脆让刺史名副其实。他对天子说：“目前四方兵寇不止，地方上由于刺史的名分和威重都不足以征调粮食兵马加以镇压，而且

朝廷的刺史们大都不称职，贪暴扰民，以至天下离叛。宜改置牧伯，选拔有清名的重臣居此大任。”他说的话得到公卿们的赞同。事实上，平定黄巾以及羌乱的事实，已经告诉大汉的君臣，帝国中央已无力控制局面，形势比较好的地方，都依仗着地方长官个人的威望和势力。

不过，刘焉的建议并非从大汉的利益考虑，而是有他自己的小算盘。他觉得大汉的死期快到了，一家人的性命寄在洛阳城中，迟早要遭祸殃。事后，他去朝中活动，要求委派自己做交趾牧。那是帝国最南端的半开化地区，没有人肯去但却是个避祸的好去处。在没有得到答复之前，他遇上了那个在洛阳城里逢人便说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的望气者。

此人名叫董扶，是个卜师和谶纬专家，他的家乡益州处在四川盆地之中，不仅雾气很重、难见天日，而且迷信流行、神学昌盛，还诞生了中国的本土宗教，直到一千八百多年之后，这里的工商管理部门竟然仍给卜师们创办的预测公司颁发营业执照。和预测大师们往往首先受到无知粗鲁的武将们的知遇一样，董扶的伶牙俐口博得了大将军何进的称赞，并授予侍中这样的高级顾问职务。但这种人，对神灵的兴趣远逊于对阴谋和权力的兴趣，他神秘兮兮地将一个天机泄露给刘焉：

“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

一句话把个胆小的刘焉说得有几分野心了，他又去活动，要求做益州牧。恰巧益州刺史郤俭在任上横征暴敛，加之并州刺史张懿、凉州刺史耿鄙皆被叛乱的羌胡击杀，朝议许可。同时任命宗室成员刘虞为幽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

董扶随刘焉上任，拜蜀郡西部属国都尉、太仓令。一做了官，他就把老本行抛到了九霄云外。

州牧可以行使地方的军政大权，因此，他如果还愿意忠于大汉，则为汉臣；否则，就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事实上，不到几年工夫，大汉的州牧都成了军阀；不想当军阀的州牧，也被想当军阀的州牧打

垮了。后来，当了军阀的州牧们又想当皇帝，可皇帝只能有一个，于是，只得相互开战。最后剩下一两个，谁也吃不动谁了，就各自在占领的地盘上做了皇帝。这样一折腾，秦汉以来四百多年的大一统，中断了将近四百年。

第二大措施，加强帝国中央军队的建设。这一点，天子自从黄巾之乱就开始留意了。中平五年（188）八月，天子组建了一支西园军，下设八个校尉。天子命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议郎赵融为助军左校尉，议郎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谏议大夫淳于琼为右校尉。西园军的指挥权，归上军校尉所有，即连帝国最高军事统帅大将军，也归上军校尉统领，因为天子总是觉得中官可靠，这个魁梧有力、计谋又多的小黄门更是可靠。可天子又相当糊涂，给蹇硕配备的下属尽是些士大夫、士族子弟，这些人都有自己的打算，手上有了兵岂不更好？蹇硕是天子的一条狗，可天子却让他和一群狼在一起。

天子的两大措施，对大汉帝国来说，皆是送终之举，前者开启了地方割据；后者开启了宫廷政变。

这年十月，奏报青州和徐州又闹起了黄巾，来势很大，一时无法对付。这时天子听到了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的谣言。天子要振作精神，压压邪气，他打算搞一个规模相当大的阅兵式。

参加阅兵的军队有京师的禁卫军、西园军和地方选送的军队，计步骑十万。天子让人在洛阳西北的上西门外平乐观筑了个大坛，上建十二重华盖，盖高十丈。大坛的东北又筑一小坛，上建九重华盖，盖高九丈。命参加检阅的军队日日加紧操练。十月十五甲子日，阅兵式开始。天子立于大坛上十二重华盖之下，大将军何进立于小坛九重华盖之下。天子在鸦雀无声的将士面前亲自穿上甲胄，给战马挂上甲片。赞礼官高声喊道：“吾皇万岁，亲临戎阵，称为‘无上将军’！”接着，无上将军由大将军陪同，巡视军阵，将士们山呼万岁，喊声震天。天子苍白的脸上有了些血色，像喝醉了酒似的。回到坛下，天子将一柄宝剑授予大将军。

然后，各军兵种开始表演战术技巧，变换行阵。这时，陪同天子观看表演的将领之中，有讨虏校尉盖勋。天子探下身子问他：“寡人像这样演练行阵，爱卿看了有何感想？”

“臣闻先王炫耀道德而不展示兵马，现在盗寇皆在边远地区，而陛下却在京师阅兵，还不足以昭示陛下的威严与果毅，最多算得上是穷兵黩武罢了！”

盖勋穿着甲胄，按礼不用下跪，站在天子面前说了这番硬梆梆的话。他知道，天子骨子里面，是把这次阅兵当成大型游戏来玩的，大汉的威风早已扫尽，阅兵又能挽回几何？钱倒是花了不少。

谁知，天子的回话也让盖校尉吃惊不小：“说得好啊！寡人恨见君晚，朝中群臣，当初皆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阅兵完毕，盖勋见到袁绍，悄悄地说：“本初（袁绍字），天子甚聪明，一点也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只是为左右群小所蒙蔽罢了！”

盖勋还是错估了天子，天子说这种话，其实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积重难返，大限快至，糊涂了一世却说了说几句聪明一时的漂亮话，虽说可嘉，却于世无补了。

袁绍听了也很高兴，他让盖勋这些天来自己家中叙谈。盖勋心照不宣，他知道，袁绍要和他谈的事，就是整整二十年前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谈的事情。等到了袁绍府上，盖勋才发现，西园军的八个校尉，除了上军校尉，其余皆在座中，主持会议的正是现任大将军何进。

大行皇帝

同样和二十年前一样，中官们也不蒙在鼓里，他们更知道天子目前的身体状况，加紧了一切防备工作。上军校尉蹇硕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将盖勋外放到长安担任京兆尹。然后，他又劝天子派遣何进

西击韩遂。

天子诏可。大将军也有对策，他面奏天子，说精锐皆在青、徐二州击讨黄巾，须先遣袁绍东去二州，调还一些兵马才能西进。天子又诏可。袁绍这一去，天子就没有见他回来过。

蹇硕忘了一条，中官集团现在的对手，不再是纯粹的士大夫。这些少壮派家中有势力，手上有重兵，心怀异志，都是乱世英雄。他们只以利害行事，不会像陈太傅那样，满口春秋大义、道德文章。大将军何进，也非窦武可比。窦武是个标准的贵族，总是相信朝廷的章法，而这个大将军是个卖肉的小刀手，什么都干得出来。

中平六年（189）四月，京师发生了一次持续时间相当长的日蚀。照例，将太尉马日免了，诏拜幽州牧刘虞为太尉。可是，这次因日蚀而罢免三公之一的举措，并没有消除人们心理上的阴影。京师的谣言像大雾一样，笼罩不散。

宫中的气氛比民间还要紧张，因为天子的病越来越重。大臣们看看不行，请天子速立太子。

本来，本朝储君的选定应该毫无麻烦。天子一共两个儿子，当然他的命中可能不止，因为近年来，天子的嫔妃们经过宠幸之后，怀孕的不少。可这些皇家骨血生下后数月即亡，或者尚未出生，就和母亲一道死于非命。这事，只有何皇后清楚。何皇后之子刘辩，今年十四岁，既是长子，又是嫡出，是理所当然的太子。次子刘协，王美人所生，今年九岁。但问题是，天子不喜欢嫡长子，他嫌刘辩轻佻无威仪。天子的评价过于苛刻，十四岁的小孩子，加之从小养成的优越感，可能过于任性胡闹，还谈不上威仪风度。不过，相比之下，刘协作为弟弟，在谈吐行为等方面，确实比哥哥成熟许多。刚生下来的时候，天子就说他长得像自己。其实他仅是相貌与父亲接近，性情却不相同，因为他的养护人、祖母董太后毕竟是王妃出身，来自民间有身分的人家，而哥哥却是由出自屠户的何皇后带大的。

天子就是不下诏立太子，这可急坏了何皇后。

一天，天子在病榻上把上军校尉蹇硕叫到跟前，又将立在帐后的

刘协叫出来，让他对蹇校尉作个揖。天子说：“爱卿，皇子就托付给你了！”

蹇硕跪下，连连叩头，涕泣不止。

四月丙辰日，南宫九龙门内的嘉德殿传来了哀乐，天子驾崩。

大行皇帝年仅三十四岁。他是一个不称职的天子，因为他耽于享乐，宠幸中官，昧于朝政。其实天子虽然糊涂，可有一点最清楚：就是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在这十几年中再掌国政，也只有无可奈何的下场。命运既然安排自己来做大汉的末代天子，本来就要求一个不称职的天子，自己的一生倒是不辱使命。他比叔父孝桓皇帝强的地方是，他为大汉留下了最后的天子，好歹在名义上，又将大汉的国祚延续了三十一年。他比叔父不幸的地方是，此时大汉再没有什么战功捷报可以作为他死后的荣耀了，他的谥号“灵”，比孝桓皇帝差了一大截。“灵”，是放任本性、不见贤思齐、没有政绩的代称。

天子驾崩后，大将军何进接到妹妹、现在应该称为何太后的诏书，命他即刻进宫议事。大将军刚走到嘉德殿的阶下，上军校尉的司马、自己的老朋友潘隐就迎了出来。潘隐一边大声喊道：“恭迎大将军！大将军驾到！”一边对大将军直挤眼睛。

大将军先是一愣，然后环顾空旷森然的宫院，觉得嘉德殿的大屋顶一下子向自己压来。大将军恍然大悟，立即转身向外跑去。潘隐装着不解，跟在后面叫：“大将军何故返回？”

蹇硕急忙出来，拔出佩剑，命人关闭各重宫门，可他的命令传得没有大将军的腿快。

大将军出宫即上马，上马即驰至西园军中，他让袁绍、曹操把手下的军士们带至百郡邸驻扎，自己又去五校营，把禁军也带至这里。百郡邸，是帝国各地方政府的驻京办事处。

第二天，大将军又接到人宫议事的诏旨，他推辞说身患大病。

公卿朝臣们叫嚷着立新君，蹇硕也知道立嫡长子是不可违背的法度，他原打算杀了大将军之后，立刘协为帝，可现在不行了。

第三天，四月戊午日，刘辩即皇帝位。何太后临朝听政，赦天下，改元光熹。封皇弟刘协为勃海王。以后将军、袁绍的叔父袁隗为太傅，与大将军参录尚书事，共主朝政。

大将军

时间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年前，大将军的府邸彻夜灯火，人进人出。这次会议是一次扩大会议，除了原先的骨干分子之外，袁绍带来了二十多位江湖豪杰和党人名士。其中有：何颙，党人兼江湖豪杰。荀攸，字公达，颍川名士，荀爽的侄孙，其叔父荀彧，字文若，也是名士，一向为何颙所赏识。郑泰，字公业，河南开封名士，经学和高官世家，他知道天下将乱，所以政府举他为孝廉时，坚决不去。家中有良田四百顷，可钱却不够用，都被他拿来结交豪杰名士了。王允，孝灵皇帝驾崩之际，他从流亡地跑到京师奔丧嚎哭。此外还有一人，此人是袁绍的同父异母弟弟、帝国虎贲中郎将袁术（字公路）。

袁术和袁绍在名分上却是堂兄弟，因为袁绍虽是长子，但是庶出。故而他们的父亲司空袁逢便将袁绍过继给了二哥、左中郎将袁成，成了袁成的嫡长子。这兄弟两个都有豪侠之气，好养宾客，是京师出了名的贵公子。不过因为嫡庶的关系，袁术有些瞧不起袁绍，但袁绍的名气比他更大。有一次大长秋赵忠都注意了袁绍，那是因为袁绍母丧之后，闭门隐居，不应朝廷征辟。大长秋说："袁本初这样做，是故意抬高自己的身价。他不应朝廷的召命，却在家中收养亡命之徒，不知此儿想干什么？"叔父袁隗听了，回来便对袁绍骂道："你迟早要毁了袁家！"

没几天，大将军任命何颙为北军中侯，荀攸为黄门侍郎，郑泰为尚书，王允为从事中郎。

上军校尉蹇硕写了一封信给大长秋赵忠和中常侍宋典，要求他们鼓动皇后下诏由自己掌握禁军，并关闭北宫的台省办公机构，诛杀大将军和他的兄弟何苗及其党羽。赵忠、宋典等接到书信，立即召集中

官骨干们商议，他们同意了上军校尉的意见。

有一个人不同意，他就是当年去民间选妃子时，受了何进的贿赂，将何太后这个低贱人家的女儿送进宫中的中常侍郭进。他把上军校尉的书信拿给大将军看了。

新帝即位的第十三天，几个黄门剑士劫持了上军校尉，就地诛杀。同时，大将军快马驰至西园，向上军校尉的部下出示了蹇硕的人头，上军也被接管了。

宫里的中官们乱成一团。他们知道，只要一出宫门，大将军就会把他们杀得一个不剩，于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大将军的对手董太后和骠骑将军董重身上。老太后得了中官的钱财，本来就积郁于心中的怒火一下子迸发了出来。她跑到何太后房里，指着她的鼻子骂道：“你现在气焰嚣张，不就仗着你的哥哥吗？我一道诏书，敕骠骑将军断了何进的头，易如反掌！”

何太后听了，冷笑了一声，未作反驳。老太后走了，何太后让人去大将军府报信。

五月，大将军与三公共同上奏天子，说董太后派故中常侍夏恽在地方搜刮财物，悉入永乐宫中。并提出：按汉家故事，孝仁皇后作为藩王之后，不得留住京师，请下诏迁回本国居住。天子奏可。次日，大将军的兵马包围了骠骑将军的府第，在交出了骠骑将军的印绶之后，董重自杀。

六月的一天夜里，董太后暴崩，说法是忧怖而死。但京师民间的舆论却谴责起何氏兄妹。

六月十九辛酉日，葬孝灵皇帝于距京师西北二十里的文陵。大将军又称疾不至，他害怕中官们在葬礼上下手。

七月，新天子下诏，徙勃海王刘协为陈留王。勃海郡距京师太远，陈留接近京畿，这一改封，事实上是便于监控。当然，这又是大将军的主张。至于十四岁的天子，却和这个异母弟弟情同手足。

从内心里，何进还是有些惧怕中官。他和窦武不同，窦武是太自

信，没把中官放在眼里，他身为贵胄，觉得用朝廷的法度就可以收拾中官。而何进来自民间，一向认为中官们相当厉害。如果不是贿赂中官选妹人宫，如果中官们也像对待董太后的哥哥执金吾董宠那样对待自己，不要说能否做到大将军，就是性命也不知在何处了。但是袁绍一直在给何进打气：

“从前窦武想诛杀中官反被他们加害，原因在于言语泄漏。五校营士生长于京师，皆畏惧中官，可窦氏反而依仗他们，可谓自取祸灭。当今将军兄弟二人都掌握着劲兵，部曲将士皆为天下豪俊，乐于效命，此天赞之时也。将军当下决心，为天下除害，垂名后世，不可失也！”

大将军上书何太后，要求将中官们全部免职，由中枢机构的郎官代行其职。可太后是个女人家，她回话说：“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此乃汉家故事，不可废除。况且先帝新弃天下，我怎能抛头露面，与士大夫共议朝政？”

何进又与袁绍商议，是否可以杀一些过于放纵的中官？袁绍说斩草不除根不行。

这时，中官们开始分化何氏家族。这一点是大将军始料未及的。他的后母舞阳君和她改嫁到何家时带来的弟弟何苗都喜欢钱，中官们就给他们钱。于是他们对太后说：“现在天下都在太后您的手中，大将军却一个劲地要杀中官，不就是想削弱太后的权力，而由他一人专政吗？”太后想想也在理。

诛杀中官的事情，就这样拖下来了。

袁绍更加着急，他知道大将军心存畏惧，故打算给大将军吃一颗定心丸。他对大将军说，不如让各地的豪杰猛将带兵进京，以清君侧为名，威胁太后。果然，大将军欣然赞同。

大将军召开会议，定夺此事。

他的主簿、广陵人陈琳（字孔璋）发言反对：“《易》曰：‘即鹿无虞’；谚有‘掩目捕雀’，微小之物尚不可欺而得之，何况国之大事，如何能以诈术行之？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

这就像鼓洪炉以燎毛发一般。只要速发雷霆，行权立断，那么，天人顺之。可现在反而委释利器，征召外助。等到大兵聚会之时，则强者为雄，无法控制。这就犹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反为乱阶罢了！”

陈琳是当代大作家，出语也不凡。可大将军听不进去。

典军校尉曹操事后听说，哈哈大笑：“宦官这个东西，古今宜有。只有天子不当使之专权罢了。既然要治他们的罪过，也当诛杀元凶。这样的事情，让一个狱吏去办就行了，哪有纷纷召至外兵的必要？如果想把中官杀光，计划一定会泄露出去，我已经预见到大将军必败了！”

不过，此事使曹操记住了陈琳。

引狼入室

董卓的兵马驻扎在河东，帝国野战军的精华皆为西北军，屯驻西京扶风一带。董卓的部队是其中惟一的一支位于黄河东岸、距京师最近的。大将军打算从东西两地一起召集军队。他派出府掾王匡和骑都尉鲍信去他们的故乡兖州泰山招募军队，又召东郡太守桥瑁、武猛都尉丁原将兵进发京师。最后，大将军召董卓率军人京。

大将军的意见立刻遭到郑泰和卢植的反对，因为时下的董卓，实际上已是大汉的叛臣。

今年年初，孝灵皇帝未崩之时，朝廷征召董卓入朝为少府卿。他居然敢抗旨不赴，上疏说：“下臣军中有归降的义从羌胡兵将，他们都来对臣说：‘朝廷军饷不发，家中妻小冻饿不堪。’并且拉住臣的马车，不得通行。羌胡之人心肠憋恶，情态如狗，臣不能禁止，只得顺其情而行安慰之事。如事态有变，臣当上疏奏闻陛下。”

天子驾崩之后，朝中公卿即恐他有变故，诏拜他为并州牧，促其

速速上任，将兵马交付皇甫嵩将军。董卓又一次暴露了野心，他的上疏中写道："臣误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既久。他们怀恋臣下对他们的养育之恩，愿为臣奋一旦之命。乞朝廷批准臣率众去并州，效力边陲。"

皇甫将军的侄子皇甫郦见状，马上去找叔父。

"天下兵柄，在大人和董卓手中。现在大人与董卓已结仇怨，势不两存。董卓不奉诏命，揣度京师形势，踌躇不进，心怀奸谋。此人平素凶戾无亲，将士不附。大人今为元帅，可杖国威而讨董卓，上显忠义，下除凶害，无所不成。"

皇甫将军摇了摇头："董卓违命，虽已构成罪名，但我不得诏书，擅自讨伐，也要负担专诛之责。不如上报朝廷裁决吧！"

皇甫将军不是军阀，也不是野心家，他是个真正的军人，只能安天下，不能乱天下。

朝廷很快下诏，责让董卓，董卓干脆不予理睬，把军队开过黄河，观察动静。

大将军还是向董卓发出了命令。郑泰对荀攸说："何公不值得辅佐！"弃官而走。

董卓读罢大将军的命令，大喜过望。本来想当叛臣，现在却从天上掉下一个正当的名分。他下令军士即时就道，在出发之前，向朝廷飞报了一封上书："中常侍张让等，窃幸承宠，浊乱海内。臣闻扬汤止沸，莫若抽去薪柴，溃痈虽痛，胜于侵蚀肌体。从前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今臣辄鸣钟鼓以向洛阳，请收张让等以清奸秽。"

大将军把董卓的上书拿给太后看，太后脾气很大，女人家不晓军戎的厉害所在，就是不答应诛杀全部中官。车骑将军何苗提醒哥哥："当初和大哥一道从南阳进京，俱以贫贱之人而赖中官得到富贵。国家的大事，谈何容易，一旦变故，覆水难收，请大哥哥深思。还是和中官们和好吧！"

何进听了，有些狐疑。这时部下报告董卓的西北军已开至渑池，

距京师两百多里。大将军让谏议大夫种邵带诏去见董卓，让他暂且驻扎，听候调遣。

种邵，帝国度辽将军种暠之孙，新任司空种拂之子，回报说董卓悍然不奉诏。

继而，西北军开至河南城内。大将军无奈，又让种邵带诏，前去慰劳军队，相机劝董卓退军。

种邵刚刚读毕诏书，董卓的几个将士就拔出刀剑顶住种大夫。种大夫大怒，将诏书举过头顶，大叫："天子明诏在此，谁敢抗拒？"

兵士们吓了一跳，纷纷避让。种邵几步走到董卓跟前："董将军既是奉诏前来，为何不愿奉诏退军？"

"种大夫息怒，在下即刻退军。"董卓只得将兵马退出至城西。种邵见西北军总算停止了前进，便回朝复命。

还是那个袁绍，惟恐天下不乱，又来提醒大将军："目前已成交锋之势，对垒已成。将军又在等待什么？还不早作决断？事久则生变，您又要成为第二个窦武了啊！"

何进又倒向袁绍。他干脆让袁绍担任总指挥，命他为司隶校尉，假节，可专命令。命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接着，大将军又让洛阳的司法部门指控中官，让董卓继续进兵，并让他速派快马从驿道驰奏太后，声称将进兵平乐观。

何太后终于害怕了。她下了懿旨，辞退了所有的中官，命他们各自回宫外家中，只留了大将军的亲近在宫里办公。

第二天，大将军的府第外面跪满了中官们，他们叩头谢罪，请大将军从宽发落。袁绍见状大喜，示意大将军下手处决。可何进却对中官们说："天下汹汹不安，正是由于诸君。董卓马上就到，诸君还不早早回乡避难？"

袁绍无奈，只得让人通知各地州郡，说大将军命地方长官收杀中官，逮捕其亲属。

一头白发的张让跑去见自家的儿媳、何太后的胞妹，跪下便叩头：“老臣得罪，你也得和我一道遣回故乡。惟累世受恩，今当远离宫殿，情怀恋恋，愿再能进宫伏侍皇太后和陛下一次，然后退就沟壑，死不恨矣！”

张家儿媳去找母亲和姐姐哭闹，于是诏中官可以回宫入值。

黑夜暗流

九月一日戊辰，大将军自上次嘉德殿逃命之后，第二次独自进入南宫面见太后。他也带了两个心腹将佐吴匡和张璋同来，到了宫门口，大将军让他俩按朝例在外等候。他对妹妹说，这样不行，必须将诸常侍杀了，告谢天下，大汉方可安宁。

大将军一进宫，张让就找到中常侍段珪：“大将军一直声称有病，先帝驾崩，他不临丧，不送葬。现在突然入宫，意欲何为？难道窦氏之事又要发生了吗？”

“我先去太后窗下听个明白，张大人可速去召人。”段珪说。

大将军谈完话，尚未走出南宫，一个小黄门叫住了他，说太后与天子请大将军留步，去嘉德殿说话。

大将军很高兴，妹妹终于回心转意了，让天子也到场，而且是去嘉德殿这样的正式议事朝堂，一定是要颁诏了。

刚进殿，大将军就发觉不妙，因为御座上没有天子和太后。回身一看，几十个中官手持刀剑拦住了去路。

张让站了出来：“大将军阁下，天下溃乱，也非全是我等的过错。当初先帝因太后杀了王美人而要废后，我等涕泣救解，又各出家财千万作为礼物，和悦天子之意。我等之所以如此，就是想日后依托阁下的门户啊！可你现在却要诛灭我等，岂不是太过分了吗！”

没等大将军有所辩解，气愤到极点的尚方监渠穆，拔剑猛刺，何

进惨叫倒地。

不一会儿，正在尚书台值班的官吏们接到诏书：拜故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少府卿许相为河南尹。尚书台的官吏见这一人事安排相当突然，便对送诏的中官说：“请大将军出来共同议定！”

“可以！”说着，中官把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掷向办公桌：“何进谋反，已伏诛矣！”

等了很长时间仍不见大将军，吴匡和张璋显然焦急万分。这时，宫门紧闭，他俩知道事变，立即派人去大将军府报信，同时开始攻打南宫的大门。

不一会儿，虎贲中郎将袁术率兵赶到。袁术下令包围南宫，进而火烧南宫青琐门。青琐门，以门上有工艺精巧的青色雕镂而得名，大火一起，化为乌有。

张让、段珪一边命中黄门卫士坚守南宫，一边去见太后，报称大将军率兵反叛，烧毁宫殿，攻打尚书台。也顾不上太后有什么反应，张常侍和段常侍命卫士簇拥着太后、天子以及陈留王，劫持一部分官吏，从南、北官之间的复道向北宫奔去。

复道有两层，这伙人从上层阁道逃跑，跑了一半，段常侍从一扇窗户看见尚书卢植持戈站在下面。卢植也看见了他，用戈指着段常侍大喊：“尔等中官，竟敢劫持陛下和太后，快快下阁伏罪！”

段常侍情急之下，把何太后拖出来，从窗口猛推下去。卢尚书的手下忙接住了太后，可阁道上的人却跑了。

宫外，袁绍行使起了总指挥的权力。他让叔父、太傅袁隗矫诏召樊陵、许相入朝，两人一到，即被斩首。他和何苗带着一队人马刚到朱雀阙下，就遇上一群从宫中跑出的人。袁、何二人麾兵上前，竟捕得大长秋赵忠，就地诛杀。

吴匡见到何苗，他知道何苗与大将军不同心，恨其入骨，又怀疑何苗与中官共谋。于是他对部下说：“杀大将军的就是车骑将军，吏士们能为大将军报仇吗？”

吴匡是大将军的卫士长，他的部下和他一样，对大将军死心塌地。听了吴匡的话，都哭着喊道："愿致死！"这时正好董卓的弟弟、奉车都尉董旻带着西北军的先头部队赶到，吴匡便领着他们攻杀何苗，把他的户体抛在御花园中。

晚上，袁绍命将北宫的大门封上，搜杀南、北两宫的中官。

从早至晚，大搜捕一直在进行着，两宫大乱。许多士兵不认识谁是中官，将官们说，见到不长胡子的就杀。

可是，并非不长胡子的就是中官。许多办公机构里的官吏不长胡子，有些在宫中干活的工匠也不长胡子，可大兵们不管，杀人杀得性起，恨不得见人就杀。于是许多不长胡子的正常人做了刀下冤鬼。有几个聪明的急中生智，赶忙脱下裤子，露出命根子，才保住性命。

九月三日庚午，张常侍和段常侍见无法支撑局势，便和几十个常侍及中黄门卫士，带着天子和陈留王打洛阳城东北的谷门步行出逃。他们翻过京师城北的北邙山，向黄河渡口方向奔走。袁绍的兵马只顾在城里搜杀，他根本就没有留意在此危急关头，必须首先保护天子。所以袁绍不知道他们的出走。

只有两个人，始终在寻找天子，他们是尚书卢植和河南尹王允。王允让自己的部下、河南郡中区的警备长官贡闵带兵跟随卢大人前去。

天黑的时候，他们在黄河岸边小平津渡口追上了天子一行。

卢尚书向天子跪行大礼之后，贡闵便上前对张、段两位常侍喝道："今不速死，吾将杀灭尔等！"说完，他手起剑落，一个中官倒下了，就这样，他一连杀了四五个。

张让、段珪等人吓得面无人色。最后，张让镇静了下来，这个老宦官颤巍巍地走到天子面前，叉手再拜，叩头不止。然后，他对天子说："臣等就此辞别陛下了，望陛下自爱珍重！"

他们跳进了黄河。黑夜的暗流把他们带向深处。

张让最后的告辞，是值得玩味的，因为这句话说出了大汉帝国的

天子和中官的关系。本朝自光武皇帝光复以来，共计十三帝。从第四位天子孝和皇帝起，凡是在位期间能主持朝政的，无不出于中官的忠心扶持。近者如孝灵皇帝自不待言。远者如孝和皇帝，外戚窦氏立他为帝时，他才十岁。永元三年（91）正月，帝加元服之际，中常侍郑众经过周密策划，一举翦灭大将军窦宪的势力，孝和皇帝得以亲政十五年。孝殇皇帝为孝和皇帝少子，百日即位，两岁即亡。邓太后又立其十三岁的堂兄孝安皇帝。如果不是老太后于建光元年（121）去世的话，年寿仅三十二岁的天子，恐怕连最后五年的亲政的机会都捞不到。孝顺皇帝作为孝安皇帝的独生子和钦定的太子，却因为皇后阎氏的反对而被父亲废为济阴王，当孝安皇帝驾崩，阎太后的家族又想在皇室之中选择一个便于操纵的幼主时，中黄门孙程等人在一个黑夜割袍起誓，发动了崇德殿政变，迎立了十一岁的济阴王。孝顺皇帝亲政达十九年，年三十驾崩。此后，梁氏外戚拥立了孝冲、孝质两位相继夭折的幼童天子，于是他们又立了十五岁的孝桓皇帝，十二年后，孝桓皇帝才得以在厕所之中与小黄门唐衡、中常侍单超等人密谋，打倒了大将军梁冀。

一个偌大的帝国，君主不能没有权威。在大汉的君主废立被外戚们玩弄于掌中之际，士大夫们往往没有坚决拥戴皇权的信念，因为他们是官僚，在他们眼中，君主只是帝国的象征物，而庞大的帝国机器的运转，靠的是官僚行政机制。所以当外戚们玩弄幼主时，士大夫们总以为这是皇室的家事，因而以消极的态度处之。可是中官们一开始却有着义愤之心，中常侍郑众就是一个名声相当好的中官，他的同事蔡伦的名声也很好，在当时，这一点要比他发明了造纸术更为人所知。但这个集团的成员与外戚一样，都是不忠实于或者不知道忠实于帝国法律的人，他们拥护了君权，却不知道君权到底是什么，因而常常做出维护了君权却破坏了帝国正常行政的事情，故而也就从根本上破坏了君权。随着他们私欲的膨胀，他们的拥君与外戚的行为又有什么区别？所以，他们拥戴的君主中，没有一位称得上是明君的。

董卓进京

且说张让等人跳了黄河，卢尚书让贡闵护驾还宫，自己先行回京，召集公卿百官迎驾。

夜深了，难辨道路。贡闵保护着天子和陈留王借着萤火虫的微光向南行走。走了几里之后，兵士们发现了一辆老百姓用的板车。他们把受了惊吓又困得要命的天子和陈留王放上车，推行到洛舍，贡闵下令休息。天子哭闹着要找母后，贡闵束手无策，倒是陈留王安慰了哥哥几句，天子这才睡去。

次日天明，贡闵找来两匹马，让天子独乘一匹，自己抱着陈留王共乘一匹。到了北邙山南面的山坡下，终于见到前来迎驾的公卿大臣们。第一个上前参见的是故太尉崔烈。

突然，西边传来军号和马蹄声，滚滚尘土中，不知来了多少兵马。天子又吓得啼哭起来。公卿及兵士们也很紧张。

旌旗开处，董卓高大肥硕的身影出现了。他驰至近前，滚鞍下马，朝着天子走来。

天子哭得更凶。一个大臣上前拦住董卓，喊道："有诏却兵！"

董卓将他拨到一边："诸公身为国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致使国家播荡，却什么兵？"

崔烈上前呵叱道："董卓回避！"

董卓大怒，指着崔烈的鼻子吼叫："我等昼夜兼程，行三百里而来，你竟敢说什么回避？看我不能断你们的头！"

董卓凶神恶煞的样子和他身后的刀光剑影，把众人都吓住了。

董卓走到天子面前，天子见他一脸横肉和虬髯，脸都白了。董卓说："下臣甲胄在身，不行大礼了。陛下到了这一步，都是因为您让诸常侍和小黄门胡作非为，以取祸败。陛下责任不小啊！"他又问天子出城的经过，天子面色迷惘，语无伦次。

董卓又走到陈留王面前，脸色和悦了许多，他张开手臂："在下便是董卓，让我来抱你上马。"

陈留王比天子要镇静得多，他也不回答，任凭董卓将他抱上马。一路上，董卓问他这两天的经历，陈留王一一为之叙述，董卓笑着说：“王爷幼而聪慧，令下臣钦佩。下臣听说，王爷是董太后带大的，下臣也姓董，论起来，也可以算是太后的同族吧！”

大队人马开进了京师。天子一回宫，朝廷下了大赦令，改元昭宁。命武猛都尉丁原为执金吾，掌典禁军。拜董卓为司空。在检点皇家法物时，发觉传国玉玺丢失了。

这时，鲍信招募的兖州兵马也开至京师，他见董卓带来了兵马，便去对袁绍说：“董卓拥强兵，必有异志。今不早图，必为所制。可趁其新至疲惫，突然袭击，一举可擒！”

袁绍沉吟不决。鲍信见势不妙，带着兵马回兖州去了。

董卓虽然粗野，但不乏智谋。他带进京师的步骑不过三千，一入城，他就收编了何进、何苗的部曲。为了让京师的公卿乃至禁军们慑服，他密令部下在夜里悄悄出城，第二天大张旗鼓地入城，就这样连搞了好几天，京师的人不知道来了多少西北军。

西北军的军纪让京师的百姓们心惊胆战，无论是汉人军士，还是羌胡军士都喜欢抢劫、杀人、奸淫。

九月五日癸酉，董卓大会公卿。他昂着头说道：“皇帝暗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陈留王，众卿以为如何？”

大殿上鸦雀无声，无人敢出来言语。

“当初霍光定策，延年按剑，有敢违抗大议者，皆以军法从事！”

大殿上又回响起董卓恐怖的声音。

可是，卢尚书站了起来：“从前太甲既立，昏昧不明；昌邑王罪名过千百，故而有伊尹、霍光废立之事。当今天子富于春秋，行无失德，不可与前事相比！”

董卓的脸上显出怒容：“罢了他的座，拉出去斩了！”

兵士们进来，将卢植拖了出去。

侍中蔡邕进前："将军息怒。卢尚书和将军一样，皆是为匡正汉室。如将军一怒而诛之，天下人岂不误会将军的一片忠心？"

蔡邕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原来董卓在进军京师之际，就打算组织一个新的朝廷。他也知道必须找一些名士来作点缀。他派人去找亡命在南方的蔡邕，蔡邕说："我老而且病，就不去领董公的情了。"

董卓让人传话给蔡邕："我喜欢灭人九族！"

蔡邕怕了，他在董卓进京前就赶到了京师。董卓见到他，大喜过望，三日之内将蔡邕从御史升至尚书，又从尚书升到侍中。蔡邕这次回到阔别已久的京师，还带来了爱女文姬，她现在已不再待字闺中，而是一个回到老父亲身边的寡妇了。

继蔡侍中之后，议郎彭伯也对董卓说："卢尚书海内大儒，人之望也。将军今天杀了他，可能会引起天下震怖。"

董卓听明白了，他马上让人放了卢植，但免去官职。

次日，卢植上书请求退休回乡。到了家乡涿郡，他让家人继续北上，直至外长城脚下的上谷。董卓果然派出了人马追至涿郡。三年后，卢植病故于上谷，临终前，遗令以单帛裹身，埋入土穴，不用棺椁。

会后，董卓将会议记录送给太傅袁隗审阅，太傅批道：依将军所议。

当天，董卓又请袁绍来府中议事。董卓说："天下之主，应该是贤明之君。每每想起灵帝，令人气愤！陈留王看起来似乎比天子强些，我想立他，您看如何？人总有小智大痴之处，也不知陈留王到底怎样，姑且就先立他为帝吧，刘氏的种，不值得再留存了！"

袁绍回道："汉家君临天下四百多年，恩泽深厚，兆民拥戴。天子富于春秋，未有不善之举宣于天下，公今欲废嫡立庶，恐众臣不从公之议也。"

董卓听了，按剑而起：“竖子竟敢如此？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你是不是觉得，我董卓的刀不够快？”

袁绍不愧是条汉子，他也勃然大怒：“天下的豪杰，难道只有董公一人？”说罢，袁绍拔出佩刀，横在前胸。董卓的卫兵不敢贸然上前，袁绍大步而出。

袁绍知道董卓新至京师，自己又是大家之子，一时不敢加害，但时间久了也不是个办法。他将自己的司隶校尉印绶挂到京师的上东门，逃奔冀州而去。

前天，董卓就觉得，京师之中惟一还握有重兵的公卿，就是执金吾丁原。他得想个办法。

丁原手下有个出名的猛士叫吕布，此人字奉先，出身寒门。丁原在并州刺史任上时，提拔他做了骑都尉。吕布为人粗疏，识字又不多，但膂力过人，骑射出色，人称飞将，加之他有一匹少有的良马，名曰赤兔，民间顺口溜都说：“马中赤兔，人中吕布。”丁原对他信任异常，他成了丁原军队事实上的统率。董卓决定从他下手，因为他认定这样的粗人没有政治远见，稍以荣华富贵引诱，即可上钩。

没有想到如此之快，袁绍刚走，吕布就带着丁原的人头来见董卓了。董卓和他拉着手，认了义父义子，拜为中郎将，封都亭侯。吕布从此执了他的长戟，跟随董卓左右，成了他的卫士长。

董卓的胆子更壮了。第二天，九月六日甲戌，董卓会群臣于崇德前殿。公卿们进宫之际，发现宫中各门，均由董卓的人马把守，心中怦怦直跳。进了崇德殿，看见太后、天子、陈留王都在，大家知道，今天必有大的不幸。

董卓站到御座前，大声宣布：“皇帝在先帝丧服期间，无人子之心，威仪不类人君。今废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协为帝！”

说罢，太傅袁隗将陈留王扶上御座，亲自解下天子的印绶，奉于陈留王。又扶弘农王下殿，北面称臣。

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在这上下易位之际，都成了懂得世事的成

人。

何太后哽咽不止。公卿们目视袁隗。袁隗不敢抬头，袁氏累受皇恩，世代公卿，却做出这种丧失气节之事，太没有面目了。

董卓又宣布：“太后逼迫永乐太后，违背妇姑（婆媳）之礼，迁永安宫居住。”

新天子下诏：“赦天下，改元永汉。”

九月八日丙子，何太后被迫喝下一杯毒酒身亡。董卓言太后暴病，会葬之时，又令公卿不得穿丧服。接着，杀太后之母舞阳君，发何苗棺椁，弃尸道边。

九月十七日乙酉，诏发幽州，以太尉刘虞为大司马，封襄贲侯。诏出，即拜董卓为太尉，封郿侯，加节传、斧钺、虎贲，这是一个规格相当高的仪仗。

尚书、武威人周毖和城门校尉、汝南人伍琼进见董卓，劝他矫正桓、灵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众望。这很合董卓的意思，他一直在准备做新的天子，知道收拢人心的作用。

二十六日甲午，董卓率诸公卿上书，为陈蕃、窦武及死难的党人平反，复其爵位，遣使吊祠，擢用其子孙和门生。

十一月，以董卓为相国，这是大汉初年的重爵，是一个终身职位。天子又下诏：董相国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诏除光熹、昭宁、永汉三个年号，仍称中平六年。

十二月，任命司徒黄琬为太尉，司空杨彪为司徒，光禄勋荀爽为司空。杨彪字文先，杨震的曾孙。黄琬字子琰，其祖父黄琼为孝桓皇帝朝的司空，也是大汉的名臣。其他被董卓擢用的名士还有：郑泰，任尚书。何颙，任长史。陈纪，此人是陈之子，拜五官中郎将。韩融，拜大鸿胪卿。韩馥，原尚书，拜冀州牧。刘岱，原侍中，拜兖州刺史。孔伷，拜豫州刺史。张邈，拜陈留太守。张咨拜南阳太守。只有一个申屠蟠见诏大笑，就是不来京师。

董卓进京后，公卿大臣的委任都从旧官僚或名士当中选拔，西北

军的将校们和他的亲信并没有大加重用。董卓也知道，这些人只能用作犬马驱使，不可委以治国大任。

曹操接到了董卓的任命，让他做骁骑都尉。曹操马上变易姓名，逃向东方。可董卓的追杀令更快，到了中牟，曹操被小吏逮捕。他咬紧牙关，不承认自己是曹操。中牟的功曹认识他，便对中牟令说：“曹操我见过，不是此人。”

曹操回到家乡，散财募兵，以图大事。

天子别姬

次年正月，改元初平。一天，郎中令李儒来到弘农王的府中，将一杯酒递上前来：“王爷请喝了此药，可以辟邪。”

弘农王一下子明白过来，一边避让，一边喊道：“我没病，这是要杀我！”

李儒沉下脸：“王爷，今天不喝了它，董相国那里也不会罢休！”

僵持了一会儿，弘农王说：“请让我与唐姬和宫人作别吧！”

弘农王让下人摆了一桌酒，几杯下肚，弘农王对他心爱的唐姬起舞悲歌：“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藩！逆臣见追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

唐姬涕泣不止，亦起身而歌：

> “皇天崩兮后土颓，身为帝兮命夭摧！死生路异兮从此乖，奈我茕独兮心中哀！”

弘农王执着唐姬的手说：“爱姬，王侯姬妾，不如吏民之妻，自爱！自爱！”

起舞而歌，是楚地风俗，大汉的高皇帝是楚地人，因而将这种风气带进宫廷。大汉天子所作的楚歌，第一首是高皇帝的《大风歌》，

那是一个功成名就的英雄回到故乡时的慷慨抒情之歌。弘农王的这首歌，则成了大汉帝国长歌当哭的挽歌。

第七章
东京西京

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
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蔡文姬《悲愤诗》

军阀

新天子还不习惯称自己是寡人，其实他心里明白，自己是天下最名副其实的寡人。没有了父皇、母亲、祖母和惟一的兄长，以九岁的年龄而言，还是一个孤儿。每次上朝，都是董卓在说话。董卓自称孤，叫得相当自然。他很怕董卓。宦官又被杀光了，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位宫中没有宦官的帝王。董卓让每位公卿、下至黄门侍郎级的官僚家中，出一子为郎，补充中官的职位。

董卓也明白，对于大汉的朝臣们来说，自己和西北军是一股外来的异己力量，因而他不得不因循朝野的愿望。可是，他的努力没多久就失败了，因为他自己的骄横使得士大夫们失望，他带来的西北军的残暴，使得京师的民众失望。

董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军阀，从中平六年他抗诏上疏中可以看出，他把国家的军队，解释成自己的部曲。事实上，在他的军队当中，各个部分又是其将领的私人部曲。用各种大小私欲构建起来的军队，只能是没有理想的军队，他们的统帅也不可能有一个在道德上说得过去的政治理想，即便有，也不可能指望靠这些军人实现。大汉是一个成功的道德国家，董卓的专权，很快使之不堪忍受。

董卓放纵部下抢劫，在这种情形下遭了大殃的，不仅是小民百姓，而且有富贵人家。不少贵戚公卿之家也遭了抢掠，妻女也遭了强占。至于董卓，更是加紧把皇宫里的金银、珠宝、布帛往府里搬。就在他被拜为相国的第二天，他开了杀戒。

他在府中大会宾客，吃得杯盘狼藉。有些京师的大臣都能认出来，董相国怀里搂着的美人们，都是先帝宫中的嫔妃。董卓最喜欢女人，这与他的西北军将士一样。喜欢女人不打紧，关键是这些人喜欢女人的方式让文雅的京师人看不下去。他们只得私下里骂道：“羌胡杂种！禽兽不如！”

董卓喝得面色红紫，脸上每块肌肉都膨胀起来。不过董卓很欣赏自己的长相，他感到脸上有些胀了，让人拿了一面铜镜，照了半天，他对大家说：“我的面相，富贵无上！”座中传来一片嗡嗡的附和，人们心中都在说：“酒后吐真言。”

这时，侍御史扰龙宗进来，趋至董卓跟前，说有事要汇报相国。董卓醉眼朦胧地看着扰御史，忽然，他大叫起来：“快把他拿下！”

“下臣有事欲陈，相国何故拿我？”

董卓的酒醒了，他心里不断地责备自己大意了。军中的生活，养成了董卓特殊的戒心，加之进了京师后，他感到这里人情复杂，虽以强权震慑，但总会有人像袁绍那样心怀异志。因而他规定，所有的人进见，都必须解剑。他刚才就是看到了扰龙宗身上的佩剑。

当着众人的面，扰龙宗被拖到堂下用铁锤击死。董卓像吃了最后一道大菜一样满足，而不少宾客们，喝下去的酒变成了尿。

董卓想起了袁绍、曹操等人，他叫来周毖和伍琼，要他们速速派人去冀州等地捕拿。他又说：“听说袁公路去了南阳？此人也要拿来。”

周、伍二人面面相觑，伍琼回道：“相国这次进京，行的是废立大事，这种事，非常人所及。袁本初不识大体，所以恐惧出奔。此人为京师贵少，实无大志。但相国如购求过急，倒可能激起事变。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如果他们收豪杰聚徒众，英雄因此而起，则关东非相国所有。下臣以为，相国不妨赦之，拜一郡守。袁本初喜于免罪，必不为患。”

“那就拜袁本初为勃海太守，封亢乡侯。拜袁公路为后将军。”

很快，董卓就发觉上了周、伍二人的当。

关东联军

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州郡联兵讨伐董卓。联军的盟主和军事统帅正是袁绍。

由于无法得到天子的正式任命，袁绍以及关东军诸将帅没有朝廷颁授的册命和印绶。袁绍说：“今天权且用木板授予称号，灭了董贼再请天子封许。”

袁绍自号车骑将军，他作了如下的战略部署：

袁绍本人与河内太守王匡进屯河内，冀州牧韩馥留屯冀州邺城，负责督办粮草，豫州刺史孔进屯颍川，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其弟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及曹操俱进屯陈留郡酸枣，袁术进屯南阳郡鲁阳。每部各数万人马。

对于京师洛阳来说，这是一个从东北到东部，再到西南的弧形半包围圈。

袁绍手下有陈琳，写得一手好檄文，鼓动天下。东郡太守桥瑁还假造了京师三公发给各州郡的公开信，说天子及朝廷见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家于患难之中。一时群起响应，声势颇大。

董相国愤怒了好些天，关东联军从统帅到诸位太守将领，他皆委以重任，使之镇守关东，没想到没有一个向着自家，他开始对整个京畿和关东地区疑虑重重。

到处是阴谋。

董卓觉得，要寻求对付关东联军的方略，还得向周毖和伍琼询问。

他先召伍琼来内厅商量。伍琼穿着朝服来了。他安慰了董相国几句，说这些人不过是乌合之众，相国兵马乃天下劲旅，击之如摧枯拉朽。董卓见他忠心耿耿，大为高兴，亲自送他至内厅门口。伍琼拱起双手向董卓行礼辞别，董卓也抬手致意。这时，他见一道寒光直穿胁下。董卓身体虽肥，但一点都不笨拙，微微往旁边一闪，然后一把拿住伍琼的手臂。

伍琼心里暗暗叫苦，没想到董卓的膂力如此之大。董卓叫来卫士

将刺客缚了，他也吓得汗透内衣。

“卿想造反吗？”

“你不是我的君王，我也不是你的臣子，何反之有？你乱国篡主，罪盈恶大。今天是我的死期，故来诛杀奸贼。恨不能车裂你于市朝之上，以谢天下！”

伍琼死后，周毖也被捕杀。此后，董卓让吕布不离左右，因而无人下得了手。

董卓大会朝臣，请大家议论大发兵马、讨伐关东联军之事。尚书郑泰出来唱了反调：“夫政在仁德，不在兵众。”话没说完，董卓就打断了他：“如卿之言，兵马皆是无用之物？”

董卓对这帮人怀疑到了极点。

郑泰马上就打消了董卓的疑虑：“臣的话并非如此。臣只是以为关东军不值得如此大动干戈。明公您出自西州，少为将帅，娴习军事。而袁本初公卿子弟，生长京师；张孟卓（张邈字）乃东平长者，平素坐不窥堂；孔公绪（孔伷字）清谈高论，嘘枯吹生。他们皆无军旅之才，临锋决敌，非能与公匹敌。何况，他们起兵皆没有天子的委命，师出无名，尊卑无序，因而不可能同心协力，齐进齐退。且关东承平日久，民不习战，而关西屡遭羌寇，妇女都能挟弓而战。天下人所畏惧的，无过于并、凉之人与羌胡义从，而明公拥之为爪牙，好像驱虎狼以赴犬羊、鼓裂风而扫枯叶，谁敢御之？明公现今秉国公正，讨灭中官，树立忠义，奉辞伐罪，又谁敢御之？然而，无事征兵以惊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为盗，放弃仁德，自亏威重啊！”

郑泰的话，让董卓放了心，更让朝臣们放了心。董卓即拜郑泰为将军，命他负责讨伐关东联军。第二天，董卓又起了疑心，收了昨天的成命，拜郑泰为议郎。

天子西迁

正月里，关东联军还是同西北军交锋了。

由河内太守王匡率领的关东联军先头部队，到达洛阳东北的河阳津渡口，打算渡黄河南进。董卓派出两支人马迎敌。一支向平阴渡进发，做出从这里渡河进击的态势；另一支则悄悄地从小平津渡河，向北行进了一段，再向东绕至敌后。王匡的人马遭受惨败，几乎全军覆没。关东联军锐气大挫。

很快，董卓作出了一个具有长久战略意义的选择，迁都长安。

进军京师的期间，董卓明白了一个道理，大汉确实如袁本初所言：恩泽深厚，兆民戴之。今天下大乱，但大汉天子这个名称，可以成为一切举措的最正当的借口。京师是大汉二百多年的首都，这里根基牢固，难以动摇，要控制天子，进而自己称帝，必须把天子挟持到自己的根据地——关西。

他准备迅速行动，先将天子迁出京师，自己率部分西北军击垮关东联军。这一方面是考虑到关东联军的威胁；另一方面，董卓得到了一个情报：南匈奴单于于扶罗率数千骑兵与河北诸山谷黄巾的一支——郭太所率白波谷黄巾合兵一处，寇掠郡县，兵马已至河东平阳。如果他们渡过黄河，从东京洛阳去西京长安的通道将被切断。

董卓在正式召集公卿商议迁都之前，上表奏请拜河南尹朱俊为太仆。作为自己的副手，他对朱俊在军事上的才干十分欣赏。先帝驾崩之际，河北诸山谷的黄巾曾经寇掠河内，逼进京师，朱俊就任河内太守，带着家兵将黄巾击退。董卓想让他谋划洛阳一带的军事。可朱俊将军对董相国派来的使者说：“国家西迁，必负天下之望，以成山东之衅，臣不知其可也。”

使者说：“相国召君受拜而君拒之，没有问君迁都之事而君却言之，这是何故？”

“做相国之副，非臣所能胜任；迁都不是个好办法，这是国事之所急。臣辞所不堪，言其所急，正是做臣子应该做的。”

董相国还是议论迁都了，他打算先耐着性子和这班文臣们讲道理。他说：“高祖都关中，十有一世；光武都洛阳，于今也十有一世

了。我看了《石苞谶》这部秘书，上面说宜迁都长安，以应天人之意。”

一阵沉默之后，司徒杨彪出来说：“移都改制，是天下的大事。从前关中遭王莽之乱，残破不堪，故光武皇帝改都洛阳，历年已久，百姓安乐。今无故捐弃宗庙、园陵，恐百姓惊动，必乱如沸粥。至于《石苞谶》，乃妖邪之书，岂可信用？”

董相国又道：“关中肥饶，故秦得以吞并六国。且陇右出产木材，杜陵有孝武皇帝的陶灶，作砖瓦，一朝可办。至于百姓，何足与议。如有作乱，我以大兵驱之，别说是西去长安，就是东去沧海，也可办到！”

杨彪还在争辩：“天下动之至易，安之甚难，请明公三思！”

董相国的耐心有些不够了：“公欲阻碍国之大事吗？”

太尉黄琬也不知趣，对董相国说：“正是因为此乃国之大事，杨公之言，难道不值得明公考虑吗？”

董相国听了，沉下了脸，不作回答。

司空荀爽见势不好，怕这二位再这么迂下去，就掉了脑袋。赶忙出来对他们说道：“相国难道高兴迁都吗？山东兵起，非一日可禁，故而迁都以图之，此乃是秦、汉开国时的形势。”

董卓听了，面色缓和，宣布散会。

会后，杨、黄二人又上驳议。

二月五日乙亥，董相国以灾异之故，策免杨、黄，以光禄勋赵廉为太尉，太仆王允为司徒。

杨、黄二人有些怕了，亲自去给董相国赔不是，董相国也是个好面子的人，马上拜他们为光禄大夫。

现在，董相国还是放心不下，他还想到了一个威胁，那就是自己的根据地关西地带，驻扎着西北军的总节度皇甫嵩将军。此人与自己有隙，会不会在后面对自己下手。他与皇甫将军之间的隙缝可谓越来

越大了，也可以说是发展到了仇恨的地步了。

董相国进了洛阳，就打听得皇甫将军的叔父、已故护羌校尉皇甫规将军有一后妻，寡居京师。

董相国听人说皇甫家的寡妇年轻貌美，而且写得一手好字。董相国想起来，自己从前受皇甫规将军节度时，接到的军令板上，确实是一笔好章草。

董相国出身职业军人，身边尽是些狐媚妖姬，没见过什么大家风范的女人，于是他派人以重金作为聘礼送到皇甫家门前。第二天，皇甫家的寡妇轻车来到相国府，跪在门口，向相国婉言陈辞，谢绝婚事。

董相国见她果然仪范出众，风采动人，颇是垂涎。可是她居然敢不从命，董相国怒火中烧，他让侍者拔出刀来，围住这个弱小的女人，说道："孤之威令，欲令四海风靡，哪有一妇人能够抗命的？"

谁知皇甫家的寡妇是个烈性子，她站起身便骂："你这个羌胡之种，毒害天下，还不够吗？妾之先人，清德传世，夫君皇甫氏，文武上才，为汉忠臣。当初，你不是他手下的走卒吗？竟敢对长官的夫人行此非礼？"

董相国在自家大门口，被一个女人破口大骂，还被揭了老底，怒不可遏，他下令卫兵将皇甫家的寡妇绑在马车上，鞭杖齐下。

皇甫将军的妻子对打手说："何不下手重些，请干脆点吧！"不一会儿就断了气。

董相国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心悸。

他不敢贸然地调动皇甫嵩，于是先调京兆尹盖勋回来做议郎。与京兆尹毗邻的扶风郡正是皇甫将军的驻地，盖勋又是皇甫的老战友，调他进京，可以观察皇甫嵩的反应。

帝国的左将军皇甫嵩手上有三万兵马，盖勋一接到调令，就去找皇甫嵩，劝他举兵声讨董卓。皇甫将军告诉他等等再说。

董相国这里等不及了，他又征拜皇甫嵩进京担任城门校尉。

皇甫嵩的长史梁衍对皇甫将军说：“将军如果去了，小则受困辱，大则遭祸殃。现在天子先来长安，董卓自留洛阳，不如以将军之众，迎接至尊，然后奉诏讨贼。袁氏逼其东，将军迫其西，董卓可擒也！”

皇甫将军摆摆手，命人准备车马去洛阳。盖勋见状，也一同去了。

董相国放了心，他还提升盖勋为越骑校尉。这是因为有一天开军事会议，朱俊向董相国说了一套战术。董相国最讨厌别人在自己面前奢谈军事，他对朱俊一挥手：“孤百战百胜，决之于心。卿勿妄说，触乱军法，脏了我的刀！”

盖勋立即反驳：“往古之时，殷高宗武丁，英明过人，尚且求人箴谏，何况是您呢？反而要杜人之口？”

董相国先是一愣，然后大笑：“二位爱卿，孤刚才失礼了！”

初平元年（190）二月十七日丁亥，天子的车驾西迁长安。

立国四百多年的大汉，到了她的劫期。

董相国命部分军队负责驱赶京师吏民西迁，将西京的国政委与王允。自将精兵屯驻于毕圭苑。董卓是不打算回来的，也不允许今后还有人回到关东，于是他下令烧毁大汉立于洛阳的宗庙、宫殿、各级官署直至民宅。财物也是他所关注的，于是国库荡然，京师的富室几乎都以谋逆罪而被西北军的军事法庭草草判决，家财悉数没收运往长安。董相国觉得这些东西还不够他将来的开国费用，又密令吕布率人开掘大汉列祖列宗的陵墓和一些公卿的墓冢。

京师周围二百里内，人烟绝迹，鸡犬之声不闻；西去路上，百姓饥饿倒毙，备受兵士抄掠，积尸盈路，野狗豺狼，成群出没。

只有一样东西，董相国和他的将士们都看不上眼，那就是大汉皇家图书馆和太学里汗牛充栋的典籍。董相国觉得，这些竹简和丝帛是制作火把的绝好材料，当然他的兵士们还作了发挥，他们将大批的帛

书当作车篷和口袋。这些典籍是大汉最值得骄傲的宝藏，在秦始皇用大火和酷刑扫荡文化之后，大汉开国初期的帝王们一点一滴地从民间将五经六艺以及诸子百家之言收至中央，又网罗博士，召收弟子，研读经典，培育出一门门的学问。财富可以迅速地复制，而文化则逝者如斯。当初光武皇帝定都洛阳时，用马车从关中长安以及全国各地往洛阳运送典籍，共计两千辆次。这次西迁，王允特别让人抢救图书，可惜只运出七十车，路上又丢弃了大半。董相国的这把火，使得大汉最为深远的立国根基毁于一旦。以后的王朝，只能将从民间收集到的古文写本的五经立为官学，而大汉发展出的熔天地人为一炉的博大而实用的今文经学，至今都寻不出个真面目了。

蔡邕现任五官中郎将，奉驾西迁去了。他不知道，他立在太学里的石经，已被焚烧太学的大火烤焦、发脆，在一阵大雨之后，轰然裂断，纷纷倒塌。

蔡中郎的心也和石经一样焦热，当然，他已经顾不上担忧石经了，因为发生了一件更令他担忧的事情：他的爱女文姬失散了。

文姬与父亲走散了，她茫茫然不辨东西，只觉得京师到处是火、兵、马、刀、剑、血、泪。忽然，她迎头碰上一队西北军，这群军士骑在马上，押着几辆牛车，叫嚣着而来。

文姬躲闪不及，被兵士抓住。她大声分辩，兵士们哈哈大笑，对她哇里哇拉喊了一通，把她扔到车上。她明白，这些人不是羌就是胡，不通汉语。上了车，文姬就吓晕过去了。车上全是妇女，车身四周的木栏上，系满了血淋淋的人头。她们告诉文姬：这些，都是她们的丈夫。她们是京师郊区的民众，二月的今天，是他们祭祀土地神的社日，当祭祀正在进行时，来了这队军士，他们开始了屠杀。

等到文姬醒来时，她们已到了河东境内的黄河渡口。这里等候着匈奴的兵马，他们是来趁火打劫的，而且与董相国的军士们进行奴隶贸易。羌胡乃至匈奴，这些民族在当时之所以是彻头彻尾的野蛮民族，就在于他们从来都把自己种族之外的人当作牲畜财产，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之中，还没有人类这个词语。

文姬被卖到了南匈奴于扶罗单于手下的左贤王部落。

当时，全世界有三个最大的城市，其一是长安，其二是罗马，其三是洛阳。由于长安早已残破，因此洛阳是东方最值得骄傲的城市。她的城墙所包围的面积就达十点一平方公里，其城墙东西九里，南北六里，因为九六为阴阳大数。全城计有十二个城门，笔直的大道，贯穿全城。二十四条主干道，每条宽达二十至四十米。北宫的主体建筑德阳殿，是天子的礼堂，陛高二丈，可容万人。她的一切街道、宫室、神坛、公园、宅第、民居、粮仓、作坊、学校、天文台、气象台，都是以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山河为依据建造的，体现了当时华夏民族的建筑、工艺乃至哲学的最完善的境界。在那个时代，出现这样的都市，其意义比现在那些拥有无数个摩天大楼的都市要大得多。她是大汉文化培育出的硕果，如果这个成熟的果实能被大汉的继承者消化掉，倒不啻为一件好事。可惜的是，她被一个破坏者无情地糟蹋了。

三月五日乙巳，暴雨如注，天子抵达长安，先住在京兆府官舍，过了些时，才将长安的旧宫殿草草修葺了一下搬进去。朝政暂由王允主持。王允带着九岁的天子游览了长乐、未央等著名的宫殿，当然，有的已是遗址了。王允希望这个少年天子能从这些巍峨的宫殿之中，感受到大汉开国君主的英雄气息。果然，不多久，天子喜欢上了史学。

曹操奋一军之勇

把天子弄出了战场，董卓总算松了口气，他现在可以集中精力，同关东军打几仗了。在得到天子进入长安的消息后，三月十八日戊午，董卓下令将袁绍、袁术的家族五十多口，包括太傅袁隗、太仆袁基杀了个干净。派大将徐荣出击关东军。

再说关东军方面，郑泰对董卓说的那番话，虽是为了缓兵，为关东军争取时间，但他对关东军的分析，却是一语中的。关东军在组建

时，就不齐心。袁绍逃到冀州，冀州牧韩馥竞派了兵马去监视他。袁绍一时无法动弹。等到韩馥看到关东俱起时，才问他的参谋刘子惠："今当助袁氏呢，还是助董氏？"刘子惠说："兴兵为国，何问袁、董！"韩馥面有惭色。

刘子惠又说："兵者凶事，不可做出头鸟。应派人去别的州郡看一下，如果大家都起了兵，然后再响应。冀州比起其他州来，并不为弱。可图大计。"

韩馥这才去书袁绍，允许他举兵。

刘子惠的话，已谈不上为国着想了，他事实上在劝主人做军阀。

所以，在关东联军中，越是拥有重兵的，就越不敢轻举妄动，谁也不愿意先把老本拼光。关东军的包围圈很大，但兵力不集中，雁行观望，反而拥兵最少的曹操冲在最前面。

曹操在袁绍的联军中，讨了个奋武将军的头衔。他在陈留纠合宗族、部曲、宾客，由陈留孝廉卫兹出钱，募兵五千，这里有他的堂弟曹洪，字子廉；夏侯惇，字元让。曹洪是个大地主，宗族势力很强；夏侯惇十四岁时，就杀了侮辱他的老师的人，曹操让他做军中司马。在军事上，曹操接受陈留太守张邈的节度。曹操读过兵法，知道战机是最最重要的。他看到诸位太守、将军踌躇不前，便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说："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还有何疑虑？如果让董卓倚靠王室，凭借西京，东向而临天下，即使他丧失道义，犹足为患。现在他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乃天亡董卓之时也。一战即可定天下！"

大家听了面面相觑。这些人都是帝国的精英，如王匡，有任侠的名声，手下有强弩五百；袁遗，袁绍的堂兄，博学有智术。曹操晚年曾对儿子曹丕说："成年之后而能勤奋学习者，惟吾与袁伯业（袁遗字）。"可精英们一旦有了私心，就胆小了起来。

他不顾诸将的意见，独自进军成皋。张邈派卫兹分出一些兵马随后助战。至荥阳汴水遭遇徐荣，被打得大败。曹操中箭，战马也受创。此时曹洪将自己的马交给曹操，曹操不肯上。曹洪说："天下可

无洪，不可无君。”至汴水岸边，水深无船，曹洪又去找了条船，渡水而逃。徐荣虽胜，却感到关东军兵士虽少，但十分英勇，于是引兵返回洛阳，对董卓说酸枣不太容易攻下。

回到酸枣的情形更让曹操气愤。这些关东军将领们天天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曹操又对诸将们说：“诸位如能听从我的计策，使袁本初将军率河内之众兵临孟津，酸枣诸将据守成皋、敖仓、辕、太谷等险要之处，再请袁公路将军率南阳兵马进驻丹水、析县，攻入武关，便能震动关西三辅。诸军皆高壁深垒，不与董卓交战，只是用来宣示天下，以顺讨逆，即可安定天下。今兵马以义而起，又迟疑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感到可耻！”

他们真的满足了曹操的这种羞耻心，不久，关东军内部开始火并。由于军粮将尽，关东军散伙。这时，一向与桥瑁有过节的刘岱下手杀了桥瑁，以王肱为东郡太守。青州刺史焦和率兵随关东军渡河西进，这时，黄巾进入青州境内，由于焦和平素爱好卜筮，迷信鬼神清谈，政治淆乱，赏罚不明，回兵与黄巾交战时，望风而逃，故而本来殷实的青州转而萧条。好在焦和很快病死，袁绍立刻安排了臧洪领抚青州。

曹操和曹洪、夏侯惇去了扬州刺史部的治所淮南。曹洪和扬州刺史陈温是好友，他带着千余名家兵同陈温在境内募兵，在淮水流域的庐江、丹阳募得好几千人，带到龙亢与曹操会合。一天夜里，新兵叛变，焚烧营帐，曹操手刃数人，次日收得不叛者五百人，向河内进发，与袁绍会合。一路上又收募兵马数千。

董卓又松了一口气。他让人把关东军的俘虏用猪油浸过的布裹紧，从脚下开始点火，活活烧死。

五月，董卓又在河阳津成功地袭击了王匡的军队，解除了洛阳城外的威胁。

西北军击垮了关东群雄的意志。但由于这次讨伐董卓的战争，使关东群雄们得以擅自调发各自州郡的民众、财物，形成了与董卓性质相同的关东军阀势力。于是，帝国境内全面的割据、兼并和自治开始

了。

这样的形势首先出现在帝国的南方和东北。

西蜀割据

中平五年（188）刘焉去益州牧任上时，从京师带去两个益州籍的随员，一个是董扶，另一个是太仓令赵韪。刚至益州，正碰上益州地界闹黄巾。黄巾统帅马相、赵祗攻破绵竹，杀县令李升。吏民响应，合众万人，进而攻杀刺史俰俭，连破三郡。于是益州从事贾龙率宗族家兵起而击之，数日之间，大破黄巾。贾龙派人迎接刘焉，将治所移至绵竹。贾龙代表着益州地方豪强的势力，刘焉刚到任，不得不对他们采取拉拢的手段，政治务为宽惠。但他一直在盘算着如何成为益州王。

他迷上了一个本地的中年寡妇，因为她又有风韵又通巫术，这两点使得她美丽而神秘，让刘焉神魂颠倒。她还有个儿子叫张鲁，字公祺。刘焉也知道，这母子俩，其实是益州太平道的总头领。张鲁的祖父张陵从沛国丰县迁居益州，在鸣鹄山中学成道术，成为一个五斗米道的信徒。张鲁之父张衡也是教团中的祭酒。刘焉和张鲁的母亲打得火热，便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当然，这一任命不完全由于恋爱中的冲动，刘焉别有用心。

张鲁和别部司马张修，在刘焉的派遣下，率兵驻扎到益州北部的汉中地区。这里是地理封闭的益州与关西和中原的重要通道。不久，张鲁、张修袭杀汉中太守苏固。

不久，迁到长安的朝廷收到了刘焉的上奏，说益州米贼断绝了道路，赋税送不出来，请不要怪罪益州。在关闭了益州的大门之后，刘焉下手杀了益州的豪强王成、李权等十多人。犍为太守任岐与贾龙以刘焉身为宗室，不兴兵讨伐董卓为由，起兵攻打刘焉，均被刘焉击杀。

刘焉又造起了乘舆仪仗，相邻的荆州刺史刘表上表天子，汇报这一动态。天子发现刘焉有三个儿子在中央任职，便派了老三、奉车都尉刘璋去益州晓谕其父。刘焉留住了儿子，因为益州王也要有王储。董相国见刘璋不回，便把刘益州的另外两子左中郎将刘范和治书御史刘诞下了大狱。

荆州割据

荆州刺史刘表也是宗室成员，字景升，山阳高平人，是个老牌党人，太学生推崇的八俊之一。此人身高八尺，姿貌伟岸，何进任命他担任北军中侯。初平元年（190）三月，荆州刺史王睿为长沙太守孙坚所杀。长安朝廷诏拜刘表为荆州刺史。

战事正紧，刘表接到诏书后才发现自己连个随从都没有。到了荆州地界，没法走路。袁术屯兵鲁阳，吴人苏代自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自拥兵作乱。除此之外，还有宗贼。所谓宗贼，又叫宗部或者宗伍，其头目称为宗帅，是江南山陵地区以宗族为单位的地方武装。刘表单马进入了宜城，找到当地的三位乡绅：蒯良、蒯越和蔡瑁商议对策。刘表说："宗贼太厉害，袁公路又借他们的势力为祸一方，我想征兵，又怕征了管不住，计将安出？"

蒯良说："征不到兵，是由于仁不足；征到了又管不住，是由于义不足。如以仁义治理州郡，则百姓归附，如水之趋下，还怕什么征了管不住而来问我们兴兵之策？"

刘表碰了个软钉子，心想，你说的都是废话。他又回顾蒯越。蒯越说："治理太平之世，先用仁义之道；可治理乱世，就得用权谋。兵不在多，在于得人心。袁术勇而无谋，苏代、贝羽都是武夫，不足为虑。至于宗贼，他们的宗帅贪暴残虐，为下所患。在下与他们素有交往，可诱之使来，使君诛其无道，抚用其众。天下大乱，民众都希望一方太平，安居乐业。如果他们听说使君有盛德，一定会扶老携幼而来。等到兵集众附，则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

定。袁术虽率兵而至，也无能为力了。”

刘表喜出望外，摆了好几桌酒，请了五十五位宗帅，砍了五十五颗人头。蒯越又说降了襄阳最大的宗帅张虎和陈生。荆州八郡，除南阳郡之外，其他七郡：南郡、江夏、零陵、桂阳、长沙、武陵、章陵，基本平定。刘表将治所设在襄阳。没有几年，刘表带甲十余万，荆州成了南方最太平的地区，成了北方许多百姓和大族的避难所。刘表不像那些只知道用刀剑割据地盘的军阀们，他兴建了许多学校，招集外来的儒学大师如綦毋闿、宋忠之流，重新解释五经，形成了荆州学派。刘表也不像刘焉，他不做僭越礼制的事，仍像一个刺史那样事事上奏，岁岁贡赋。因而他既树了威，又立了名，终其一生，都没有人能打他和荆州的主意。

就在刘表去荆州任上的时候，北方幽州牧刘虞被拜为太傅。战火遍地，长安的任命竟不得通报到幽州地界。其实，刘虞也不见得愿意去长安任职。幽州远接塞外，与乌桓和鲜卑的摩擦又多，帝国政府往常每年调用青州、冀州的赋税二亿钱给幽州开支。现在，这笔开支又告断绝。刘虞故意在公开场合穿上破衣草鞋，每天在公署的食堂里吃饭，不买肉吃。他还减轻刑罚，劝督农桑，开通上谷地区的边境贸易，发掘渔阳地区的盐铁资源。秋天又碰上个丰收，幽州地界的谷子每石才三十钱。于是，饥荒和瘟疫流行的青、徐民众士人纷纷逃难幽州，刘虞又给了他们安居乐业的条件。

初平二年（191）正月，关东军的盟主袁绍召集各部将帅开会，袁绍拿出冀州牧韩馥的信对大家说：“韩冀州言，天子幼冲，迫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刘虞，为大汉宗室贤者，天象今有四星会于幽燕分野，谶书又言神将在燕分。济阴有一男子王定得一玉印，上刻‘虞为天子’。代郡天空出现两个太阳，这一切都说明刘虞当代天子而立。我等今议，是否可共戴刘虞为天子？”

曹操不同意：“我等之所以起义兵而远近皆应，就在于以义而动。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而一旦改易，天下如何安定？诸君如果北面刘虞称臣，曹某独自向西。”

曹操不见得是大汉的忠臣，只是他最反对分裂；皇帝可以换，甚

至可以捏在掌心里，但不能有两个。大汉几百年经营的法制化和道德化的统一社会模式不能破坏。有一天，他在喝了酒之后，朋友们敲着匙箸，唱个痛快。老歌唱厌了，就嚷嚷着要求当代著名的乐府诗作家曹操即兴写首新歌，曹操都不用拿笔写，张口便唱：

> 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班白不负戴。寸泽如此，百谷用成。却走马，以粪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子养有若父与兄。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

歌词太严肃，把大家的酒兴都唱没了。却让一个人认识了曹操。

济北相鲍信私下对曹操说：“能拨乱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虽强必毙。君大概是天之所生吧？”

曹操对袁绍这样的凭借世家大族声望的盟主越来越感到失望，他们的声望只不过是作为他们私分天下的道德外衣。他们成不了大事。

另一个不能成大事的，是袁绍的兄弟袁术。他也接到了袁绍关于拥立新帝的书信。他把这个小老婆养的哥哥看得好生透彻。他不能同意由袁绍主宰天下，所以他用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回绝了北方的建议。在回信中，袁术说：“志在灭卓，不识其他！”

刘虞接见了袁、韩派来的使者、乐浪太守张岐。在听完了张岐的陈述之后，刘虞大声呵叱。张岐回去禀报，袁绍和韩馥仍不甘心，又请刘虞出任新朝廷，领尚书事。刘虞对使者说：“回去告诉袁绍，如果再以此事相逼迫，刘某马上出塞，奔往匈奴，自绝于汉。”

袁绍讨了个大没趣。

刘虞因为此事，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奉职修贡，愈加恭肃。塞外胡人的贡品，他让人历尽艰难，转送长安。

辽东割据

董相国在洛阳指挥作战之际，他的大将、玄菟人徐荣向他推荐了同乡、故冀州刺史公孙度（字子升），董卓让他去任辽东太守。董卓的意图在于让公孙度在刘虞和袁绍的东北形成威胁。

公孙度一到州郡，就发现辽东的大姓、地方官吏都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于是他将几个官吏笞杀于闹市，又夷灭了几百家大姓。郡中大恐。接着，公孙度又发兵攻打高句丽和乌丸，边境大安。一天，他对三个亲信将领说："汉祚将绝，当与诸卿共图王业！"说完，把他们带到土地神的庙前，他指着前面的地上说："你们看：这里有一个大石头，下面有三个小石头顶着它。石生于土地庙，说明我当有土地。大石头是我，为王；小石头是你们，为三公。"

然后，他就顺理成章地自称辽东侯、平州牧，分辽东为辽西、中辽二部，自置太守；又渡海收取莱州、营州，各置刺史。立汉高祖和光武皇帝的宗庙，用天子仪仗，郊祀天地，登记田亩户口，征募兵马，做上了辽东王。

几年之后，北海郡的三个名士邴原、管宁、王烈来辽东避难，公孙度虚馆以待，可这三个家伙都不领情。管宁住到最北面的荒塞，表示自己没有从事政治的心志。公孙度有时骑上好几天的马去看他一次，管宁尽跟他谈些枯燥的学术问题。后来公孙度不去了，他觉得不值得为争个礼贤下士的声誉而如此奔波。邴原却是个急性子，一天到晚地批评辽东的地方政治，公孙度又有些不耐烦。管宁劝邴原赶紧跑，公孙度知道了，也就放他走了。剩下一个王烈，公孙度让他无论如何出来做个长史，好歹给自己撑个门面，不要让人家说公孙的政府里尽是些只会舞刀弄棒的粗货，可王烈又做起了小买卖。十五年后，公孙度病故，其子公孙康嗣位。

江东英雄

关东军割据、自治，在董卓的眼里，都不是最大的或者最直接的威胁。他觉得最难对付的，是自己的老同事孙文台（孙坚字）。当初

张温如听了他的话，自己连帅帐都出不了。自己率西北军刚进洛阳时，听说孙文台连连拍着大腿叹道：“张公昔从吾言，朝廷今无此难也！”

关东军起，长沙太守、乌程侯孙坚跟从荆州刺史王睿起兵响应。可这个王睿一向视孙坚为行伍之人，待他无礼，又不给他军资。其实，王刺史才是个粗人，他看不惯武陵太守曹寅，就扬言要宰了曹太守。曹太守的军队太少，打不过王睿，于是他想起了孙文台这个英雄。

一天，曹太守派人给孙坚送去一份公文，孙坚看了窃喜，原来是朝廷来此地巡视的御史温毅让自己收杀王睿的手令。孙坚也是个精细人，他同时猜到这份公文可能出自曹太守之手。

孙坚的兵马一下子包围了王睿的公署，王睿登楼而望，让人问外面的军士要干什么。一名军士上前说：久战劳苦，使君所赏，都不够穿衣。请再发些军饷。”

王睿急了，说：“刺史岂有所吝？请诸位自人府库查看。”

军士们向公署里涌。

忽然，王睿见孙坚到了跟前，大惊：“文台，军士闹事求常，你怎么也跟在里面？”

孙坚慢慢地说：“有御史手令，命我诛君。”

“我有何罪？”

“哈！你的罪就是不知罪！”孙坚回道。

王睿没了辙，只求留个整尸。孙坚请他随便。

王刺史刮了些金子吞下死了。

孙坚率军渡江北上，欲与南阳的袁术会师。到了南阳，兵已数万。南阳太守张咨不理不睬，孙坚请他来喝酒。

酒酣之际，孙坚的主簿来奏：“前些时移檄南阳，请南阳地界整修道路，资给军粮。而太守稽停义兵，使之不能及时讨贼，请按军法

从事。”

张咨欲出不得，被斩首营外。南阳大恐，孙坚军队所至之处，有求必应。孙坚前至鲁阳，与袁术会合。一下子占了整个南阳郡。袁术表奏孙坚行破虏将军之职，领豫州刺史。

初平元年（190）的冬天，董卓的兵马与孙坚相遇。

这天，孙坚没有准备。他率领文吏武将，在南阳城外摆开宴席，送他的长史公仇称回长沙督运军粮。突然，几十个西北军的骑兵奔驰而来，众人大恐。可孙坚却谈笑风生，行酒如故。将佐请示他如何对付，他说：“整顿行阵，无得妄动！”

可是，敌军越来越多，孙坚这才慢慢起身，让人们次第入城。他对左右说：“刚才我之所以不起身，是怕大家一哄而跑，相互蹈藉，不得入城，为敌所乘。”

西北军见孙坚的军队如此整齐，以为有备，引退而去。

次年二月，孙坚进屯梁东，遇上了徐荣的劲旅，被打得大败。孙坚带着几十个随从溃围而出，他戴着个红头巾，追兵在后面大叫：“红头巾者为孙坚！”

孙竖脱下红头巾，往手下大将祖茂头上一按，策马狂奔。

追兵盯上了祖茂。祖茂跑到一片坟地之间，将头巾挂在一棵矮树上，自己伏在乱草之中。不一会儿，骑兵上前，将头巾围了几重，定睛看了才觉上当。

孙坚收集散卒，进屯阳人。董卓派出东郡太守胡轸和吕布，率郡兵和西北军步骑五千迎击。

胡轸是个急性子，可他不是西北军的将领，一出征，就觉得压不住台。于是他说：“一定要杀个大将，才能整齐队伍。”这下把西北军的骄兵悍将惹火了，便找吕布诉苦。吕布说，干脆坏了事算了。到了广成，距阳人几十里地，士马疲劳。董相国本来让他们在此休整，次日攻打，可吕布说阳人的贼已逃走，必须夜行军掩袭。

到了阳人，发现孙坚军队严阵以待。西北军掩袭不成，又饥又渴，只得释甲休息。

吕布又说：“贼军出城了！”军士大溃而奔，行十多里后才觉无事。定下神来，天明又至城下。孙坚大出其军，势如破竹。胡轸、吕布逃还洛阳，部将华雄被斩。

吕布都战不过孙坚，这让董相国大为懊恼。可更感到困扰的却是袁术，他这些天听身边的谋士们劝说，说孙坚如果在南阳一带得了势，进而攻人洛阳，则不可控制，此所谓除狼而得虎。

孙坚见后方的军粮断了，知道袁术有了疑虑，连夜从阳人驰马百余里至鲁阳，把袁术从床上叫起来。孙坚用佩剑在地上划了深深的一道印痕，口气坚定而沉重：“袁将军，孙某之所以奋不顾身，上为国家讨贼，下报将军家门私仇。我与董卓没有骨肉之怨，而将军却听信谗言，疑心孙某，这是为何？”

袁术被说得手足无措，马上声称误会了。

孙坚得了军粮，继续前进。董相国慌了，他又让部将李傕造访孙坚，说董相国愿与将军结亲，此外，将军可把子弟亲信的名单开出，董相国担保他们出任刺史、郡守之职。

孙坚与董卓共事的时候，李傕还是个下级军官，所以孙坚对其不客气地骂道：“董卓，你逆天无道，今不夷你三族，悬示四海，我孙文台死不瞑目！”

孙坚的大军已到了距洛阳九十里的大谷，西北军的几次抵抗都未奏效，他们终于感到关东也有英雄。

董相国听说孙坚已进至先帝的陵园区，他决定亲自披挂上阵，会会老同事。可是老同事一点不讲情面，打得董相国丢盔弃甲。慌乱之中，董相国把洛阳的防务交给吕布，自率主力退至洛阳西边的渑池和陕县布防。

孙坚终于实现了他收复旧京的宏愿，此举在当时震动极大。几天后，军进洛阳，击走吕布。孙坚见洛阳残破之状，竟惆怅流涕，命军

士修葺宗庙，祀以太牢，并填塞被西北军掘破的先帝陵墓。

一名下级军官来报：在城南甄官井中，兵士发现了一颗玉玺。孙坚命令呈上，他读着上面的文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有四寸见方，纽交五龙，一角已缺。孙坚对将佐们说：“这是传国玉玺，高祖入关时得自秦王子婴之手，乃秦始皇的镇国之宝。”

将佐们一齐贺喜：“将军得玺，乃是天授，必有神龙之运。”

孙坚让他们不要大肆声张。

传国玉玺不是天子的用玺，但却是得到天命的象征。天子的用玺共计六枚，分别是：“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总称“六玺”。孙坚得了玉玺，心里窃喜，他的将佐们本来就是与他死生与共的结义之友，这下子更加跟定了他。

孙坚见京师人烟绝迹，无法屯兵，下令兵进新安，邀击董卓。

董相国召来长史刘艾，商议对策。

“关东军屡战屡败，皆畏孤，没有什么作为。只有孙文台这个混蛋，颇能带兵用人，要告诫诸将，多多提防。孤当初与周慎西征韩遂、边让于金城，孤请张温让孤率兵为周慎后盾，可他却让孤进讨先零叛羌。孤知其不可，遂留别部司马刘靖率步骑四千屯安定，大造声势。虏果疑安定有大兵屯驻，故当虏欲截孤归道之际，孤小击，虏辄退走，因为害怕大兵出援。而孙文台随周慎出战，也请周慎派他先率兵攻金城，而让周慎带二万兵马为其后援，则韩、边畏大兵，必不敢与孙文台决战，这样，孙文台就可以出兵断虏粮道。周慎能用其言，凉州说不定就平定了。张温既不能用孤，周慎又不能用孙文台，故而大败。孙文台当时不过是佐军司马，所见能与孤同，其才可用。可惜他跟着袁家小儿，到头也是个死啊！”

刘艾见相国唠唠叨叨地说这些，排解不了个孙文台，便开慰他说：“孙文台虽能有此见解，但恐亦不如李傕、郭汜二将。听说他当初在美阳也被羌人打得大败。”

“是的。不过，当时孙文台的兵马素质太差，皆是乌合之众。且战有利钝胜负，若论关东大势，孙文台是最令人头疼的。”

刘艾又说：“关东军驱掠百姓，以作寇乱，其锋不如人，坚甲利兵强弩之用又不如人，如何能够久长？”

董相国叹了口气：“是啊，只要杀了二袁、刘表、孙文台，天下自然臣服于孤了。”

他让东中郎将董越屯渑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又让自己的女婿、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形成三道防线，再命河南尹朱俊留守洛阳。自己带着大军退入长安。

孙坚见状，率军回屯鲁阳。

朱俊也率部讲入荆州，与刘表会合。

初平二年（191）四月，董卓抵达长安。

公卿大臣全部出城恭迎，见到相国，拜于车下。董卓既不下车，也不还礼。他的马车装扮得也相当过分：青色车盖、金色车板，上竖两幡，饰以飞龙。

董相国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经过此人身边时，他让车子停下。

“义真。”董相国叫着现任御史中丞皇甫嵩将军的名字：“你怕不怕孤？”

皇甫将军拱拱手说：“明公若以仁德辅佐朝廷，皇甫氏大庆方至，何怖之有？若呈以淫刑，天下人皆怕，岂独皇甫？”

董相国大笑：“义真，现在，你服了孤了吧？”

“没想到明公到了如此地步。”

“鸿鹄本有远志，只是燕雀不知道罢了。”

“非也，昔与明公俱为鸿鹄，没想到明公今天变成了凤凰。”

“唉！卿如此臣服，今天可以不拜孤了。从前的过节，孤与卿皆不计较吧！”

董相国听了皇甫将军的奉承之后，有些飘飘然，他召来蔡中郎：“孤之功德，可比姜太公。孤想自称尚父，卿以为如何？”

蔡邕回道：“明公威德诚为巍巍，然比之太公，愚意以为不可。须待关东平定，车驾还返东京，方可议此。”

蔡邕的话，董相国还是听的，事关朝仪大典，自己任着性子来，可能会出笑话。不过，他还是觉得相国小了些，便改称太师。

没几天，长安地震，董卓又找来蔡邕。蔡邕说地为阴、为臣，这一定是由于臣下逾制造成的。董太师只得将自己的青盖车改成了黑盖车。

董太师家所有的人都封了侯，连未成年的孙女都是如此。董太师最讨厌见天子，他让三公和朝臣到他的别墅——郿坞来办公。这座别墅是个城堡，墙高可与长安城墙比肩，其中积谷可食三十年。董太师说，大事如成，雄居天下；不成，则据守此坞养老送终。办完公，董太师总是很客气地挽留大臣们在坞中吃工作餐，可吃饭时，董太师从来不招待歌舞音乐，而是招待杀人表演，断舌、挖眼、斩足、炸煮，董太师特别喜欢看人未死之际的惨叫与挣扎，越是惨厉，董太师的食欲越好。可大臣们的肠胃全得了病，不仅吃不下东西，连匙箸都拿不起来。

财政大臣告诉董太师：钱没了。董太师没学过经济学，但却懂得换币掠夺。他下令不得使用大汉的五铢钱，改为小钱。铸小钱的铜料就是孝灵皇帝铸的几个铜人。长安的谷价一下子达到一斛数十万，以至民间的商人只能以货易货。

长安的刑法异常苛刻和随意，吏民日益不堪。最后，故太尉、董太师的老上司、现任卫尉张温遭了殃。一天，望气的太史说，天象异常，必须杀一大臣以塞天变。于是张温以与关东军通谋之罪被笞杀。

董太师回长安后，司徒王允还政于太师，京师的百姓都说：王司徒躲到哪里去了？

王司徒躲在家里，但心急如焚。最让他失望的不是董太师的胡作非为，而是关东军。在董卓回关西之后，他们不仅没有一个率兵西

讨，而且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混战。

冀、幽争夺战

本年七月，袁绍开始了统一北方的努力。

冀州牧韩馥是袁家的门生故吏，因此袁绍才从京师逃奔冀州。有一件事引起了他对袁绍的猜忌。

原并州刺史丁原的部将张杨（字稚叔），受已故大将军何进的派遣，回乡募得精兵数千。发生了董卓之乱，他只得驻兵上党，一边与河北诸山谷的黑山黄巾周旋，一边进攻上党太守于军事要塞壶关。关东军起，张杨归附袁绍，与南单于于扶罗合兵屯于漳水。恰恰在此时，韩馥的部将义叛变而逃，而袁绍却接纳了他。袁绍又招降又纳叛，野心不小。

很快，袁绍发现韩馥给自己提供的军资不如以前了。此时，董卓回兵长安，袁绍考虑了好些天，叫来外甥高干、颍川人荀谌、辛评、郭图这几位韩馥的亲信谋士，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些话。然后，自率兵马南下，屯于延津。

袁绍的大军一走，屯于幽州右北平的刘虞部将、奋武将军公孙瓒以讨伐董卓为名，率兵进入冀州境内，击败韩馥驻在首府安平的兵马。冀州郡县纷纷开门而降。韩馥惶恐不安。

这时，几个谋士一齐上来对韩馥说：“公孙瓒乘胜南下，燕代之卒，其锋难当；袁将军又引军东向，其意难知，如此，则冀州难保。”

“诸位有何良策？”

荀谌说：“君自度宽仁容众，与袁本初相比如何？”

“不如。”

“那么，临危决策，智勇过人，与袁本初相比如何？”

“不如。”

“那么，世布恩德，天下受惠，与袁本初相比如何？”

“也不如。”

“冀州为天下重资，明君既自知不如袁本初，则袁氏也必不甘为明君之下，如果他与公孙瓒并力谋取冀州，危亡之势可明。我等与明君计：袁氏是明君的老朋友，又是同盟，明君莫若将冀州让与袁氏，袁氏得了冀州，必不让公孙瓒，则明君既有让贤之名，又得安身之所，愿明君勿再迟疑。”

韩馥有些发怵了。回头又问自己的长史耿武、别驾闵纯和治中李历。他们都不同意：“冀州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怎能将冀州拱手相让？”

他们的话不错，袁绍的军队，有时饿得只能吃野枣。

可韩馥与袁绍相比，毕竟是个平庸之辈。他说：“我乃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让，古人所贵，诸君为何反对？”

驻扎在孟津的韩馥部将赵浮与程奂听说了韩馥的决定，立刻引军东还，他们率领战船数百、强弩万人，在夜里鼓吹经过袁绍安扎在朝歌清水口的大营，搞得袁绍十分恐慌。回到冀州，赵、程二将对韩馥说：“袁本初军粮匮乏，部众离散，惟有张杨、于扶罗新附，也不肯为其所用。我等愿以所部兵士击之，旬日之间，必使之土崩瓦解。明君您只须开阁高枕，何虑何忧！”

韩馥还是不听，派儿子把冀州的大印送到袁绍的黎阳大帐之中，自己知趣地搬到大长秋赵忠在冀州的别墅里。

袁绍怕夜长梦多，立马回首府安平接收政权。韩馥的从事们纷纷往府外跑，耿武和闵纯拔剑阻拦，连劈数人都止不住。袁绍马上让人将这些不忠于主子的人杀了。他坐上了冀州牧的交椅，又很客气地任命韩馥为奋威将军，但既不给兵，也不给从属。倒是韩馥的部将受到

了袁绍的宠厚待遇，广平人沮授为奋武将军，魏郡人审配为治中，钜鹿人田丰为别驾，南阳人许攸、逢纪以及荀谌皆为谋士，河内人朱汉为都官从事。

朱汉知道袁绍的心思，一天，他擅发兵马包围了韩馥的住处，亲自拔刀冲进屋里，韩馥吓得跑上了楼。朱汉捕得韩馥的长子，打断了他的双腿。袁绍听说，马上赶到，收杀朱汉，劝慰韩馥。韩馥就便请求袁绍让他去陈留太守张邈那儿躲避。袁绍答应了。

住了没多久，袁绍派人到张邈府中传递消息，张邈让韩馥也来席中作陪。酒酣之际，来使忽然与张邈耳语了一会儿，惊弓之鸟韩馥更加杯弓蛇影，这一定是交待张邈图谋自己。韩馥便起身去上厕所，在这个臭哄哄的地方，拔刀自裁。

沮授是个有战略头脑的人，他马上向袁绍陈述了下一步的计划：以冀州之众，东并青州，南定兖州，北降幽、辽，西收并州，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师，迎天子大驾于西京，规复汉家宗庙于洛阳，号令天下，以讨未服。比及数年，大功可成。

可是，本年秋天，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黄巾运动，使袁绍不得不重打他的如意算盘。

黑山黄巾于毒、白绕、眭固部十余万众南下，进逼冀州心脏地区邺城，进而又抄掠东郡，兖州东郡太守王肱抵挡不住。同时，青州黄巾三十万众，北上进击勃海，并有与黑山黄巾会师的趋势。由于近来的战乱，流民、饥民的队伍扩大，因而黄巾又成了声势。黄巾是一个军队与流民家庭的混合体，它以人数众多的简陋军队拖带着千户万口的饥民向有食物的地方缓缓行进，所到之处，官仓和富室被洗劫一空，而沿途的饥民又像滚雪球似的加入队伍。

这时，所有的混战者都不约而同地对所在地区的黄巾展开了攻势。

鲍信对曹操说：“袁绍做盟主，专权武断，将为国家的祸乱，无疑又是一个董卓罢了。现在如果抑制他，力量不够，不如去黄河以南开辟地盘，以观形势。”

曹操内心对袁绍不仅失望，而且厌恶。有一天，袁绍竟拿出一颗玉印，请曹操一观。曹操知道，袁绍早有自立之意，让人刻了一方天子之玺。

曹操大笑不语，也不去看。

恰巧，东郡告急，曹操便与鲍信带兵去了东郡，在黄河西岸的濮阳击破黄巾白绕部。袁绍上表朝廷，拜曹操为东郡太守，治所设在东武阳。当然，朝廷是不会承认袁绍所封的官员的，只是整个关东都暂时承认袁绍有便宜从事的权力。

南下的黄巾受到阻碍，北上的黄巾又遭到公孙瓒的重创。他们北上至东光南部，遇到公孙瓒步骑二万人的邀击，被斩首三万多级。黄巾弃了辎重，还渡黄河，公孙瓒又趁其半渡之时发起攻击，死伤数万，河水为之赤红。最终，七万黄巾以及数不清的车甲财物为公孙瓒俘获。

公孙瓒让部将田楷扫荡青州，田楷的部将刘备跟随作战，被公孙瓒任命为平原相。刘备的两个把兄弟关羽和张飞做了别部司马，整天跟着他。一天，刘备又看上一个人，此人姓赵名云，字子龙，冀州常山人氏。赵云带着本郡子弟投靠公孙瓒时，公孙瓒问他：“冀州人氏都愿跟随袁氏，为何君独能知迷而返？”赵云说：“天下汹汹，不知是非，民有倒悬之危，故只从仁政所在，并不是因为忽视袁公而钟情于将军。”很快，赵云发现站错了队。他遇上了刘备，谈了好几天，遂为至交，因而跟到刘备任上，给他统率骑兵。

孔融，时年三十八岁，任青州北海相。青州黄巾刚起，孔融便收合士民，起兵讲武，但被黄巾击败。黄巾北上之后，孔融收集散失的民众，恢复家业，建立学校，表彰贤良，抚恤孤寡，殡葬尸骨。他希望用文治来消弭战乱，可他的书生之举马上就被从北方战场败退下来的黄巾打破。孔融率民勇出屯都昌，被黄巾管亥部包围。

正在愁苦之际，有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突围进入都昌与孔融相见，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州中名士太史慈（字子义），此人避乱辽东，其母在州中，孔融曾多次派人慰问。这时，太史慈回乡探母，母

亲命他速去营救。知儿莫如母，她知道儿子文武过人，又精于骑射。

次日，包围圈在缩小。太史慈拿了两个箭靶出了城，黄巾惊起，严阵以待。只见太史慈将两个箭靶竖起，射了一阵，又拔起带回城内。就这样，一连三天，黄巾不以为怪了。第四天，太史慈出城后，快马扬鞭，突围而走。到了平原，将情况告诉刘备，请求救援。

刘备这个群雄之中的无名小辈，一下子就明白了营救孔北海这样的大名士，对自己的声誉和前途意味着什么。他受宠若惊地说：“啊，孔北海也知道世间有刘备吗？”

刘备的三千步骑飞速赶来，黄巾只得散去。

事后，孔融对太史慈说：“卿是我的少年挚友。”太史慈回去告诉母亲，母亲说：“我为你报答了孔北海而感到高兴。”

黄巾的势头只是受到抑制而已，可群雄们又赶紧投入了混战。

先是，南匈奴单于劫持张杨背叛袁绍，屯军邺城之南的黎阳。董卓认为这样可以对袁绍构成威胁，于是拜张杨为河内太守、建义将军。又从长安派出杨懿为河南尹，加强对关东的防御。

然后，刘虞的儿子刘和带着一项使命，从长安逃出来，奔向幽州找父亲。可他出逃时，是从长安南部的武关出来的，因此必经南阳。他见到了袁术，说这次出逃，是因为天子想回洛阳，派自己去幽州，让父亲率兵迎驾。

袁术一听，说你别走了，你的令尊是我的军事盟友，你只须修书于他，派兵来此会合，我也出兵，一道西迎天子。袁术为何如此，他有个打算：在不久的将来，他将与自己最大的敌人袁绍决一雌雄，这就必须与幽州搞好关系，让幽州的力量抄袁绍的后路。

刘虞的一千名骑兵到了南阳。不料此事被公孙瓒得知，他马上去劝告刘虞，说袁公路救驾是假，有异谋是真。刘虞不信。随着公孙瓒军事实力的扩大，他与刘虞的矛盾也越加激化。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派出堂弟公孙越率千骑抵达南阳，说通了袁术，拘留刘和，收编刘虞兵马。刘和想方设法出逃，至冀州地界，又被袁绍挽留。

袁氏二兄到底是一个种，在战略设计上如出一辙。袁绍也在袁术的后方搞起了小动作，与荆州刘表结成了同盟，把个袁术气得发疯。他给公孙瓒写了封信说袁绍不是袁家生的，又大骂那些投了袁绍的人："群小们不听从我而听从我的家奴吗？"

袁绍先以朝廷的名义任命会稽人周昂为豫州刺史，袭夺孙坚的据点阳城。孙坚长叹一声："同举义兵，将救社稷，不想逆贼如此相残，我当与谁共同奋斗？"说完，点起大军，一举攻下阳城，周昂败逃。

这次战役中，公孙越受袁术的委派，前来帮助孙坚，不想中箭身亡。这下子激怒了公孙瓒，他把一腔怒火泄到袁绍身上，行书天下，公布了袁绍十大罪状，发兵南进冀州磐河。所到之处，郡守们纷纷归降。

袁绍有些怕了，他让人把勃海太守的印绶送给住在州中的公孙范，这又是公孙瓒的堂弟，以求缓和关系。可公孙范一到任所就率郡兵响应了堂兄。继而，公孙瓒自己委派部将严纲为冀州刺史，田楷为青州刺史，单经为兖州刺史。

趁着公孙瓒南击袁绍，袁术派孙坚南击刘表，与刘表的大将黄祖大战于樊、邓二县之时，孙坚连连获胜，进围荆州首府襄阳。刘表无奈，派黄祖连夜回兵援救，在回兵途中又遭孙坚伏击，黄祖大败，往岘山的荒野中逃窜。然而，孙坚过于英雄，穷追不放。黄祖心想，你能打我的埋伏，我就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

孙坚遇上了埋伏，被竹林里的荆州兵射中，倒下马后，后援又不济，遂被乱刀砍死。尸体被拖到襄阳，刘表手下的部将桓阶是孙坚举荐的孝廉，他站出来请求为孙坚发丧。刘表最喜欢表彰节义之事，又赞叹孙文台是个盖世的英雄，下令厚葬。

这一仗之后，袁术就再也打不过刘表了。年仅三十七岁的孙坚留下一个寡妇：钱塘吴氏，四个未成年的儿子：孙策、孙权、孙翊、孙匡。长子孙策才十六岁。孙坚的侄子孙贲率众投袁术，袁术让他袭领了叔父的豫州刺史。

荆州的故河南尹朱俊将军，在得到徐州刺史陶谦的资助后，出兵洛阳，击走河南尹陈懿。陶谦，字恭祖，丹阳人，原是皇甫嵩的部将，又从张温西击韩遂。孝灵皇帝驾崩那年，青州黄巾起，朝廷拜他任徐州刺史。他一到任，便成功地驱逐了境内的黄巾，对长安政府，他一直间行贡献，后又拜为徐州牧，封溧阳侯。现在，他也明白了，应该趁乱割据一方。于是他下手杀了州中的几个名士，横征暴敛。又杀了他的黑道朋友、下邳土匪阙宣，收编其众。他上表请拜朱俊行车骑将军，并送他精兵三千，准备引以为援。

董太师听了大怒，派女婿牛辅屯驻陕县，部将李傕、郭汜和张济出关，大破朱俊。朱俊退出洛阳，屯兵中牟。

次年，即初平三年（192）正月，朝廷虽然颁布了大赦令，可出关的西北军还是抄掠了陈留、颖川诸郡。原亢父令，现弃官在家的颖川望族成员荀彧，劝说乡人避乱他乡。他认为颖川是个四战之地。可乡人安土重迁，就是不走。他便率了自家的宗族投了袁绍。不久，他的乡人都遭到西北军的屠杀。

荀彧住了些时候，富有先见之明的他发现袁绍不会成气候，在听到曹操的事迹后，他毅然率宗族投了曹操。

处于弱势之中的曹操见有如此大的世族来投奔自家，大喜过望。和荀彧交谈之后更是惊喜，他发现自己不仅捞到了声势，而且得了个人才。曹操执着荀彧的手：“先生真是我的张子房啊！”

曹操的野心不小，他把荀彧比作张良，俨然是自比起汉高祖来了。

袁绍决定亲自去打公孙瓒，两军在界桥会战。公孙瓒以步兵三万结为方阵，以骑兵一万分夹两翼，自率精兵，由乌桓骑士组成的白马义从居中，旌旗铠甲，光照天地。袁绍却以骑兵八百居前，强弩千张夹辅，自将步兵数万结阵于后。

公孙瓒放马冲来，可他遇上了袁绍的骑兵统领麴义，此人久在边塞，晓习与羌胡作战的战术，他命军士伏在盾下不动，等到公孙瓒的骑兵冲到距自己十来步时，同时俱起，强弩齐发，扬尘大叫，直向前

突。这一仗，公孙瓒手下大将严纲阵亡，袁绍军斩首千余级。麴义又纵兵追击，拔了公孙瓒营中的牙门。公孙瓒大军四散。

袁绍在后面放心大胆地带着一百来个强弩手和卫士前进，突然，他遇上了逃出大营的公孙瓒及其两千名白马义从。这伙骑兵将袁绍围了几重，矢如雨下。田丰把袁绍扶到一堵断垣之后，袁绍不肯，他将头盔扔到地上，大喊："大丈夫应前斗而死，躲到墙后，怎能活命？"可是，公孙瓒的箭太厉害了，田丰硬是把主公拖到墙后。幸亏麴义及时赶到，白马骑士才呼啸而去。

公孙瓒退出冀州。他后悔莫及，因为那天打了好久，竟不知道包围的是袁绍。

刺杀董卓

司徒王允绝望极了，刘和一去不回，朱俊又被击败。他同黄门侍郎荀攸、尚书郑泰、议郎何颙、侍中种辑商议。荀攸提出，干脆搞宫廷政变，荀攸说："董卓骄忍无亲，虽资强兵，实一匹夫耳，可直接刺杀。"

荀攸和郑泰等人说干就干，准备了起来。可事情泄露，董太师的大兵搜捕甚急，郑泰出逃袁术，何颙、荀攸被捕，何颙忧惧自尽，荀攸却谈笑风生，能吃能喝。

他们都不如王司徒。

王允经常去董太师的别墅里奏事，他发现董太师不仅对朝臣无礼，而且对西北军的将士也像狗一样地呼来喝去，就是他的干儿子、贴身侍卫吕布也不能除外。有一次，王司徒看见董太师对吕布大光其火，竟拔出手戟掷向吕布，吕布连忙躲避，向董太师谢罪，太师才改容解意。王司徒想，荀攸对董卓的分析相当准确。

自此，吕布成了王司徒家的座上客，在王司徒家里，他才有自

由，可以尽情地喝酒，王司徒真会曲尽人意，常常叫些歌伎陪侍。有一天，吕布喝多了，拉住王司徒的手："司徒大人，吕布恐怕活不长了。"

"将军乃天下英雄，何故出此言语？"

吕布告诉王司徒：董太师现在越发疑心有人要刺杀他，让吕布每天守在他的内室之中。可他房里的那些妖姬们实在动人，吕奉先又是个美男子，自然免不了与这些女人眉来眼去，后来便动了真。事后吕奉先越想越怕，天天惶恐不安。

王司徒心中窃喜，他说："将军岂能受此大辱，不如就此下手，除了老贼！"

吕布吓醒了，他望着王司徒发愣，可王司徒的脸上，神色坚毅。

"可董太师是我的义父。"

"将军自姓吕，本非骨肉。现在忧死不暇，还谈什么父子？老贼掷戟之时，岂有父子之情？"

吕布一腔英雄血被王司徒的话和酒精烧得沸腾了起来。

初平三年（192）三月，天子便生了病，一直未见好。四月一日丁巳日，朝廷宣布天子有疾新愈，大会朝臣于未央殿祝贺。董太师当然要出场。他很有戒心，从别墅到未央殿，沿途陈兵夹道，左步右骑。太师身着朝服，坐着他的黑盖车，让吕布执了大戟护卫于后。

吕布让手下的勇士骑都尉李肃、秦谊、陈卫带十多个卫士充当北掖门的护卫。王允派尚书仆射士孙瑞亲自书写诏书交给吕布，又关照十一岁的天子沉着冷静，不要失态。

董太师的车驾进了北掖门，吕布朝身穿卫士服的李肃使了个眼色，李肃挥戟上前，直刺董卓。谁知董太师在宽大的朝服里穿了软甲，李肃的戟没能刺入。李肃又刺一戟，伤了董卓的臂。董卓坠车，大叫："吕布何在？"

吕布将赤兔马带至董卓面前，拿出诏书，举过头顶："有诏在

此，命讨贼臣！”

董太师怒不可遏，大骂：“庸狗，竟敢如此？”

吕布被骂得气急，一戟刺入董卓的胸膛。

董太师的主簿田仪和董太师的家奴赶忙扑到董卓的尸体上，吕布一一刺杀。然后，吕布大叫：“诏书讨董卓，其余不问！”

西北军的卫士们眼睁睁地看着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个个怔在那里。突然，他们爆发出欢呼声：“万岁！万岁！”

董太师肥硕的尸体被抛弃在长安的闹市口，他的母亲、弟弟和宗族全部丧命。政府从他的别墅中抄出黄金三万斤、银八万斤、锦帛珍宝堆积如山。

几天之后，董太师的尸体开始腐烂，守尸的兵士在太师的肚脐上插了一根灯芯，太师的脂肪便成了灯油。最后，袁氏的门生将董卓的尸体烧成灰，满地撒了。

长安的吏民歌舞相庆，当了家中的首饰买酒痛饮。荀攸获释。

诏下：以王允录尚书事，吕布为奋威将军、假节、仪比三司，与王允共秉朝政。

如此强大专横的西北军统帅，竟被他牢牢控制的儿皇帝朝廷搞了政变，这说明：大汉帝国虎死不倒架。

第八章
蒿里行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曹植《送应氏》

蔡邕之死

所有的人都在欢呼董太师的被诛，只有一个人为之感叹了一声，并为此而送了命。这个人便是蔡中郎。

他不是在为董太师感到悲伤，只是由此感到国家多事，前途难以卜知。可是他感叹的太不是地方了，竟在朝臣们的庆贺宴会之上。大家都知道，董太师对待大汉的旧臣中，最厚遇蔡邕。他们都按照政客的眼光，对蔡中郎的感叹侧目而视。

王司徒甚至感到愤怒。王允是个刚直的性子，这种性格过了分就是认死理，意气用事，这是大汉许多名士的风格。董太师执政期间，王允不知怎么搞的，一下子老成了很多，竟能像一条蛇似的与太师曲折周旋。可现在的成功，让王司徒充满了自信，于是他那个被压抑了很久的禀性又抬起头来。

他怒不可遏，指着蔡中郎的鼻子呵叱道："董卓，国之大贼，几乎亡了大汉。君为王臣，应当同大家一道痛恨董贼。可你，竞怀其私遇，反感伤痛，这难道不是共为大逆吗？廷尉，收其下狱！"

"王公！您误会了，我蔡邕受董卓私遇不假，这确实是不忠之举。可古今大义，耳所常听，口所常言，岂能背叛朝廷而向着董卓？"

蔡邕越说越感到悲愤，他又想到下落不明的女儿，觉得生命竟如此脆弱，不值得留恋。可他还是有放心不下的事。见王司徒怒气不消，他又请求道："在下愿受黥面刖足之刑，请暂寄性命，让在下完成《后汉记》的编撰工作。"

在先帝朝就曾与蔡中郎一道从事这项工作的现任太尉马日劝说王司徒："伯喈（蔡邕字）旷世逸才，多识大汉史事，当由他续修汉史，成一代大典。他的罪过，至为微小，倘若因此而诛之，岂不太失

天下人之望吗？”

这时，其他的大臣也纷纷为蔡中郎说情。

王允咬牙切齿地说：“从前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让他写了《史记》，成为谤书流行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更不可让佞臣执笔于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又使我等蒙其非议。”

蔡邕下了大狱。马太尉对人说：“王公大概要绝后了，善人，是国家的纲纪；著作，是国家的大典。灭纪废典，能长久吗？”

南行的诗人

王粲，字仲宣，党禁时期死去的司空王畅之孙，时年十七。他是蔡中郎在长安收的得意门生。蔡中郎的宾客们都很奇怪，每次这个又矮又丑的少年来访，蔡中郎都赶不及地到门口迎接。蔡邕对大家说：“此王公之孙，有异才，我不如啊！”

他还对王粲说：“我家的书和我写的文章，你都可以拿去。”

王粲发现，蔡中郎最值得人尊敬的地方，还不是他身为学术大师，为人又称得上道德楷模，而是在于他既能总结大汉过去的思想，又能预见到新的思想。他曾经给王粲看过一本书，那是一个叫王充的人写的，名为《论衡》。此人生于光武皇帝建武三年（27），卒于孝和皇帝永元年间（89-104），一生穷困潦倒，默默无闻，书的命运也一样。可在那个年代，王充就对大汉的哲学、经学、文化、政治等方面均做了系统的批判。主旨是认为大汉帝国一直奉行的信仰：天与人是互相感应的思想，其实是一种虚妄之说。他说，天、人、万物皆由气构成，气是一种冷酷的物质，而不是贯穿在人身上的性格、气节，因而没有感情的偏向和道德的因素。这种想法，无疑会让人对一个帝国存在的根据、对人的社会构成的原因产生新的思考。

蔡中郎居然把这本无人问津的异端著作收藏在家中，并告诉王粲

寻找新的思想出路。

王粲在监狱里见到老师，他伤心极了。与老师诀别之后，他感到长安会有大乱，因为荆州刘表是他的祖父王畅的学生，他的族兄王凯又娶了刘表的女儿，所以，便出关往荆州方向避难去了。

且说王粲到荆州后，刘表嫌他长得丑，脾气又不好，不打算重用他。王粲只得和荆州学派的几个大师如宋衷之流混在一起，研讨学术。他带来的蔡中郎家的藏书和新的异端思想与荆州学派一拍即合，他们对天道、性命等形而上学做了探究。王粲死后，藏书归了过继给他的王凯之子王业。王业有子名王弼，在王弼的手上，终于构建了一种称为玄学的新思想，用道家的学说补充了经学，特别是《周易》，因而对天人关系做了更加抽象和完善的解释，影响了三个世纪。这是后话的后话了。

现在，蔡邕死了，王粲正奔向荆州。一路上的凄惨景象和老师亡故的悲痛让他无法排遣。在一个破旧的小旅店里，他写了一首《七哀诗》：

>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构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饿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诗中所表达的忧患与悲悯的情怀，在后世的诗人中，只有杜甫堪与之比肩。

长安变局

王司徒的脾气大得让人无法接近，吕布一介武夫，负其功劳，也常常自夸自大。这两个人相辅朝政有些困难。王司徒一向不把吕布当公卿大臣看待，而是看成一个剑客侠士，因此不愿意与他商量正经的政事。关西到处是董卓的部曲，汉廷仍是羊在狼群，所以吕布劝王司

徒早些下手，把他们一网打尽。可王司徒却说：“此辈无罪，不可以。”吕布说那么你就采取安抚之策，拿出财物颁赐将校和公卿，王司徒也不肯。

王司徒先让士孙瑞草诏，赦免董卓的部下，后来又认为这样反而会引一起他们的怀疑，又作了罢。

董卓从凉州带来的部曲，最有战斗力的都分布在关东与关西之间的各个关隘，董卓的三大将李傕、郭汜和张济都在关东作战。这些人如果回兵攻打长安，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有人劝王司徒：“凉州人最怕关东人报复，如果解散他们，打通关隘，他们一定人人自危。可以让皇甫嵩将军统率他们，屯留陕县，加以安抚。”

这确实是一条妙计，然而王司徒至此仍对关东群雄抱有好感和希望：“不行，关东起义兵者，都是我等的同党，若让他们屯陕距险，虽然安定了凉州人的心，却会让关东人疑心。”

事情一拖再拖，凉州人开始惶恐不安了，他们相互分析道：“蔡伯喈这样的人都杀了，王司徒让我们解散兵马，可一旦解散，则为鱼肉。”

倒是熟谙戎机的吕布果断，他干脆派出李肃去陕县，以诏命诛杀牛辅。牛辅造了反，将李肃击走。吕布杀了李肃。

牛辅也吓坏了，他本来就胆小，又迷信，每天把辟兵符带在身上，有客来见，一定让相师看看客人脸上有无杀气。一天夜里，他的营中有兵士叛逃，引起骚动。牛辅以为全部哗变了，连忙带上细软，和胡赤儿等五六个亲兵渡河而逃。胡赤儿看他有那么多的细软，动了歹念，将他的头砍下，送至长安，吞了细软，还拿了一笔赏金。

牛辅一死，李傕、郭汜、张济没了主张，他们一面拥兵自守，一面派遣使者去长安，请求赦免。这无疑又给了王司徒一个机会。可是王司徒却说：“正月已大赦天下，朝廷制度，一年之中不可有两次大赦。”

李傕等到底是粗人，没有头脑，一时更加恐慌。他们打算解散兵马，回凉州老家。

就在这时，出来一个很有谋略的人，救了他们。

此人姓贾名翊，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时被阎忠赏识，说他有陈平、张良之才。有一次，他和几十个人一道出门，遇上叛乱的氐人，把他们都绑起来活埋。贾翊对他们说：“你们别埋我，我是段纪明的外孙，我家一定会拿很多钱来赎我的。”叛氐一听是段将军的外孙，敬仰得不得了，和他结盟，并送他回家。现在，他在牛辅手下任讨虏校尉。

贾翊对他们说：“诸位如果弃军单行，一个小小的地方保长就可以把你们拿获。不如向西攻打长安，为董公报仇。事成，则奉国家以正天下；如不成，西走凉州，为时不晚。”贾翊觉得，我们西北军将士也是朝廷命官，又不是反贼，我们也能拥戴大汉天子。

这些武夫们茅塞顿开。他们结了盟，晨夜西进。

王司徒有些急了，他找来两个凉州地方绅士胡文才和杨整修，让他俩去劝李傕等解兵。这两个人领命而去，他们不仅没有劝解，反而鼓动西北军西进。因为王司徒说话的口气实在让人受不了：“这些鼠子想干什么？你们去把他们叫来！”

李傕、郭汜、张济，加上留在长安一带的董卓残部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兵十余万，围攻长安，打了八天八夜。第八天，六月一日戊午，吕布手下的西蜀兵哗变，打开城门，西北军涌人长安。吕布打了半天，看看大势已去，便把董卓的骷髅头系在马上，带着几百个亲兵来到青琐门外，喊王司徒一同走。

王司徒非要做那种属于“时穷节乃现”的事情，在门楼上回道：“如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则如我大愿；如不能，则奉身以死国事。朝廷幼少，恃我辅佐，临难苟且，我不忍心。请吕将军努力杀出，勉励关东诸公，要以国家为念！”

吕布的赤兔马像一团烈焰似的喷薄而去。西北军的铁骑在城里恣意蹂躏，百姓死者数万。叛军逼至宫外。

太常种拂对王司徒说：“为国大臣，不能禁暴御侮，让叛军白刃向宫，我去一战！”很快，王司徒就看见叛军的长枪上挑起了种太常

的头。随着叛军向宫内进逼，太仆鲁馗、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次第被杀。崔烈的儿子崔钧早就投了袁绍，董卓便将崔烈下了狱，董卓被诛，崔烈复出，拜为城门校尉。

王司徒扶着天子上了宣平门。李傕等人扔了兵器，山呼万岁，跪在门楼下叩头。

天子问道："卿等放兵纵横，想有何作为？"

"董卓忠于陛下，无故被吕布所杀。臣等为董卓报仇，非敢为乱。请让我们事后自诣廷尉论罪。"

李傕麾兵围了城楼，送上一道奏表，请王司徒下楼。

天子又惊又气，竟回头问起王司徒："董太师到底有何罪过？"

王允一下子气结不能说话，长叹一声，下了楼。西北军又欢呼了一阵万岁。

次日，大赦天下。拜李傕为杨武将军、郭汜为杨烈将军、樊稠等人皆为中郎将。司隶校尉黄琬被杀。

王司徒有两个同乡宋翼和王宏，现任京畿左冯翊和右扶风的守备。西北军因为有他们，一时不敢对王司徒下手，发了一道诏书征他们回朝。

王宏识破了机关，不打算回去；可宋翼是个书呆子，说王命难违，虽知有祸，也不可抗旨。王宏又劝他与关东联络，起兵讨伐李傕，转祸为福。宋翼还是不听。王宏自知独木难支，只得应诏同去。等到他与宋翼皆被拉到刑场时，他才骂道："宋翼竖儒，不足议大计！"

王司徒妻子宗族十多人同时被杀。他的尸体也和董卓一样，放在闹市口示众。李傕等人找了些董卓的衣冠，备了上好的棺木，在他的别墅举行了改葬仪式。据长安的老百姓传说：当天夜里，一响惊雷震开了董太师的坟墓，接着大雨倾盆而下，竟把董太师的棺材漂了出来。

七月，以太尉马日为太傅，录尚书事。八月，以皇甫嵩为太尉。后免，以周忠代之。九月，以李傕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郭汜为后将军、樊稠为右将军、张济为骠骑将军，俱封侯，共节朝政。张济出屯弘农。以淳于嘉为司徒，杨彪为司空。

他们找到贾翊，要给他封侯。贾翊说："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他们只得硬让他做了个尚书。

同月，西北凉州的叛军首领韩遂与马腾率部来到长安。他们对李、郭二人说："当初董太师让他们不要和西北军作对，归顺朝廷，答应他们共图关东。现在董太师死了，希望能得到朝廷的封赏。于是诏下拜韩遂为镇西将军，回镇金城；马腾为征西将军，屯于郿。至此，凉州叛军被帝国西北军收编。

十月，荆州刺史刘表遣使贡献，诏拜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

吕布从武关杀出，去了南阳投袁术。他把董卓的头骨给了袁术，袁术感谢他为袁氏家族雪了深仇。可是吕布和他的赤兔马成了关东的害群之马，他和部下在南阳相当放肆，抄掠无度。袁术的脸色有些难看了，于是他和他的赤兔马又成了关东的丧家之犬，逃奔袁绍。

青州黄中

长安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可关东群雄却忙得顾不过来，他们实在太辜负王司徒的厚望了。只有曹操留意此事。

本年初，曹操在顿丘受到黑山黄巾于毒部的攻击，曹操不仅不迎击，反而率兵入山，去攻打于毒的大本营。果然于毒回师救援，曹操邀击获胜，顺手还击溃了眭固部和匈奴于扶罗单于的兵马。刚对付了北面的黑山黄巾，到了四月，南面的青州黄巾又抄掠兖州，百万之众，势不可挡。刺史刘岱不听济北相鲍信让他固守疲敌的劝告，出战阵亡。东郡太守、曹操的部将、东郡人陈宫和鲍信都劝曹操入主兖

州，以此作为根据地，兴霸王之业。在陈、鲍二人的活动下，州中官吏和豪强世族同意迎立曹操。州吏万潜代表大家至东郡迎曹操领兖州刺史。曹操进击青州黄巾于寿张，屡战不利，但曹操抚慰并激励将士，明设赏罚，多用奇兵，昼夜奋战，终于击退黄巾。此役，鲍信阵亡，乱兵之后，尸体失踪，曹操痛失良友，重金购尸也无结果。他让人用木头刻了鲍信的样子，设祭、哭吊。

不久，长安政府派了一个叫金尚的兖州刺史前来上任，被曹操派去迎驾的人马吓得投奔袁术去了。十二月，曹操以千余步骑，继续追击青州黄巾的主力。黄巾尾大不掉，终感疲惫，写信给曹操，说大汉的气数已尽，黄天当立，君虽有命世之才，也无可挽救。曹操不答应。黄巾被追得无可奈何，宣布向曹操投降。曹操没有想到，一下子收降了三十万黄巾兵士，男女老幼百余万口，这是不花钱的兵源。曹操选择精锐编为步骑，号青州兵。曹操在关东的心脏地区站住了脚。

屯田令

西北军在长安发动政变之后，曹操的治中从事毛玠向他提了两条建议：一、修耕植以畜军资；二、奉天子以令不臣。这两条建议正中曹操的下怀，因为多年的战乱，富裕的中原地区残破不堪，地方政府的仓储已不足支付一年。曹操看到中原地区许多土地已成无主田亩，又从黄巾手中收缴了大量的农具和耕牛。于是他采用大汉在边塞地区实行过的屯田之法，将无主田收归地方政府，一部分由军士和黄巾降卒耕种，名为军屯；另一部分召募流民耕种，名为民屯。所谓屯，即指居住方式是军事化的，耕作方式是集体化的，农具和耕牛由政府供给，课以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租。曹操的军政府成了大农场主。四年以后，曹操把这一生产方式上升为正式的经济制度，设置了屯田令。这一招，既保证了曹操的军粮，又解决了流民问题。

曹操的使者必须经过张杨的地盘才能到达长安，可张杨不让借道。这时定陶人董昭为袁绍所不容，辞了参军之职，打算去长安见天

子，正在张杨这里做客。他告诉张杨："将来与袁绍争天下的就是曹孟德，而且曹孟德必胜。你何不就此与他结个缘分呢？"

李傕、郭汜准备扣押曹操的使者，颍川世族、黄门侍郎钟繇说："方今英雄并起，各有异志。惟有曹兖州心向王室，如逆其忠款，对长安方面不利。"就这样，曹操的使者终于带着中央政府的奖慰令回到兖州，曹操抢来的刺史至此合法化了。袁绍对曹操的战绩也很满意，曹操越强大，南方的袁术就越紧张。可是，曹操今后却为了兖州，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本年底，公孙瓒派兵和袁绍在勃海郡的龙河打了一仗。战事完毕，袁绍写了一封信与公孙瓒交流经验："龙河之师，羸兵前诱，大兵未济，而足下胆破众散，不鼓而败。"

由于扬州刺史陈温病故，袁氏兄弟同时派出了扬州刺史，到底袁术在南方的势力大，袁绍的刺史被赶走，由袁术所派陈瑀出任此职。

陶谦对长安的政变也作了反应，他做了一件关东群雄都不敢做的事：讨伐李傕，奉迎天子。他联络了一些刺史和郡守，推朱俊为太师。事实上，他想另立中央，奉迎天子只是借口。长安的太尉周忠和尚书贾翊干脆用天子的名义征朱俊入朝。消息传来，连朱俊的部下都不愿意人长安。朱将军说："以君召臣，义不俟驾。况天子之诏呢？且李傕、郭汜乃小儿辈，樊稠也是庸才，没有远略又势力相敌，变难必作。我可利用他们的矛盾，则大事可济。"

朱将军到了长安，拜为太仆。次年，代周忠为太尉，录尚书事。

为了配合公孙瓒在龙河攻打袁绍，袁术向北方最直接的敌人、袁绍的部下曹操发动了进攻。初平四年（193）正月，袁术的军队已攻至陈留，曹操兵驻甄城，双方战事进入了胶着状态。黄雀捕蝉，螳螂在后，袁绍的南方联盟刘表一则配合袁绍，二则为夺取荆州八郡中的最后一郡南阳，出兵切断了袁术的粮道，进而攻下南阳。此时，袁绍在打退了公孙瓒的攻击之后，派兵增援曹操。形势突变，袁术痛失根据地南阳，屯于封丘，联合了黑山黄巾一部和于扶罗单于，继而又被曹操击溃。袁术遂走襄邑、宁陵，皆被曹操击破；至九江，扬州刺史

陈瑀不愿接纳。袁术退保阴陵，集兵淮北，继而攻下扬州刺史部的首府寿春，自称徐州伯。陈瑀逃奔下邳。长安李傕拜他为左将军，封阳翟侯，假节。袁术的势力移到了淮南。

赵太仆

三月，长安朝廷在去年八月就已派出的两个持节镇抚关东的特使：太傅马日和太仆赵岐抵达。朝廷认为关东士族多，这两个人都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又是大学者，能够调解群雄的纷争。

马太傅和赵太仆说来还有些沾亲带故。马太傅是马融的族子和学生，赵太仆是马融的堂妹夫。赵太仆今年已经八十一岁了，他的坎坷生平，是大汉帝国正直士人的典型。当初谁都讨好贵族大学者马融，可就是赵岐不理他。孝桓皇帝朝，赵岐得罪了中官，宗族被杀殆尽，他亡命江淮，卖饼为生。孝灵皇帝朝，太傅胡广推荐他出任并州刺史，不久又遭党禁达十余年。中平元年（184）随张温讨伐边章、韩遂，拜敦煌太守，路遇边章。边章胁迫他担任凉州军政首脑，赵岐诡辞得免，逃归长安。

赵太仆在学术文化方面，给大汉帝国乃至今后的时代做了一个很大的贡献，那就是他在亡命期间，为《孟子》作了一个出色的注释本：《孟子章句》，这是我们现今尚能看到的最早、最完备的《孟子》注本。如果没有他，我们很有可能看不到《孟子》这部伟大的著作。这是因为，大汉的官方经学，只承认儒家学派所传授的五部先王政教大典，那就是《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至于记录儒家大师言行或他们亲自撰写的著作如《论语》、《孟子》、《荀子》之类，在皇家图书馆里都归入诸子百家。大汉初年，《孟子》和其他一些诸子学说皆被立过学官，后来只推崇五经了，诸子之学便无人问津。赵太仆为什么单单要为这本书作章句呢？因为他看到，经学是大汉养活的官学，这种学说已经没有独立性了，成了现实政治的附庸，可现实的政治又是如此黑暗。作为一个士人，

应该在现实政治的强权说教之外，寻找属于内心和人类的真理，寻找一种超越庸俗卑下的道德。也就是说，他要在现实的强权——“势”之上，为天下人树立一个理想的境界——“道”，合理的“势”与“道”配合，不合理的“势”可以压迫“道”，但终将屈服于“道”。而这个“道”的载体，就是士人。赵太仆在《孟子》里面看到了他所向往的“仁政”和“浩然之气”。他的努力，使得中国的士人心目中树立了一个高于帝王世系的孔、孟道统。因而在今后，不管现实如何不合理，不管天下如何混战，也不管天子如何地更换，主宰中国的是汉人还是异族，中国的士大夫们都成功地使得以儒家学说为指导的政治制度、道德标准和文化教育延续发展了下去。到了宋代，《孟子》终于被立为经典。

赵太仆向北说和袁绍与公孙瓒，他受到了曹操、袁绍的热情接待。公孙瓒也来了信，说能与袁将军同受赵太仆的劝解，实在是三生有幸。为了早些把这个老家伙哄走，当着赵太仆的面，公孙瓒把女儿送到袁家做儿媳。赵太仆约他们明年到洛阳和谈，他们说一定一定。

马太傅向南劝说袁术。袁术说：“请太傅把朝廷的符节借下臣一观。”可这一借就再也不还了。袁术指着手下上千名凶神恶煞的军官，让马太傅以政府的名义征辟他们做官。马太傅说：“将军家中的先公们都为朝廷辟过士，你难道不知道辟士是怎么回事？”住了许久，他看袁术冥顽不化，要求还他符节，放他回去。袁术根本就不见他。行动不便、饮食不周的马太傅，又急又气，吐血而亡。

孙策据有江东

马太傅在寿春还是征辟了一个人的，任命他为怀义校尉。他就是孙坚的长子孙策（字伯符）。

孙策十多岁就名闻乡里，后随母亲住在舒城，结识了这里的豪强之子周瑜（字公瑾）。这两个同年的美少年一见倾心，情同手足，孙策为兄，周瑜为弟。他去寿春投奔袁术，袁术怕他索要孙坚的士卒，

便对他说：“我用你舅舅吴景为丹阳太守、堂兄孙贲为都尉，你可去他们那里募兵。”孙策刚募到兵，就被泾县军阀祖郎袭击，大溃而逃，又回到袁术大营。袁术这才把孙坚的上千名残部还了孙策。袁术常常对人说：“我要是有像孙郎这样的儿子，死也无憾了！”说归说，袁术还是提防着孙策，不让他得势。他曾答应拜孙策为九江太守，后来又反悔；既而又让孙策去打庐江太守陆康，因为袁术要攻打徐州陶谦，陆康不愿借米三万斛。孙策攻下庐江，袁术又不任命他做太守。孙策失望之际，孙坚的校尉、丹阳人朱治劝少主人离开袁术，归取江东。这时，袁术让吴景与孙贲攻打盘踞在曲阿的由朝廷任命的扬州刺史刘繇，二人在横江和利当两地遭到刘繇部将樊能与张英的抵抗，战事毫无进展。

孙策对袁术请求道：“江东有我家的旧部宗亲，在下愿去助舅舅打横江，横江如拔，则回江东，可募得子弟兵三万以佐明公纵横天下。”

袁术想，刘繇在曲阿，王朗在会稽，孙策未必能得逞，便拜他为折冲校尉。孙策带了千余步兵，十匹战马，到了历阳，收众五千。路上，遇到周瑜率军资兵马来迎，孙策对周瑜说：“我得卿，是天作之合！”一路下去，击走樊能、孙英，所向披靡，朝廷命官、军阀土豪、山贼土匪，或降或逃。老百姓都想看看英俊的孙郎与周郎，一看便倾心，于是队伍渐渐扩大。后来他们占领了皖城，发现城内乔公家里有两个绝色的姐妹大乔、小乔，于是孙郎和周郎同时做了新郎。在与刘繇的交锋之中，孙策遇上了太史慈。

太史慈原是来投奔他的同乡刘繇，刘繇不重用他，因为太史慈年轻时，为了征辟之事而作过弊，东莱大族都看不起他，这才先避难于辽东。刘繇拘于舆论，只任用他为侦察兵的统领。他刚出来侦察，就和孙策打得难舍难分。孙策夺了太史慈的手戟，太史慈夺了孙策的头盔。后来，刘繇兵败逃至豫章，太史慈逃入泾县山越族境内，被孙策俘虏。孙策执着他的手说：“当与卿共图大事。”刘繇亡故，豫章有上万的残兵，孙策派太史慈前去安抚收编，左右都说：“太史慈一去必不回返。”孙策在饯行时握着太史慈的手腕问道：“何时能还？”“不过六十日。”太史慈如期而还。就这样，孙策陆续又收得江东英杰张

纮、张昭、鲁肃等人，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孙氏据有江东。

死里逃生

曹操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攻打兖州东南方向的徐州。首先在战略上，徐州是兵家必争之地，曹操不打，袁绍一定要打，莫若自己动手，拿下徐州，名归袁绍，实属曹操。其次，徐州牧陶谦与公孙瓒联盟，是袁、曹二人的后方威胁，打下徐州，兖州才能算得上巩固。再次，徐州只能由曹操打，因为黑山黄巾在冀州闹得厉害，一度联络袁绍部下哗变，攻下了邺城。袁绍正在一心讨伐黑山黄巾，无力将兵锋转向徐州。最后，一个最直接的原因，促使曹操下决心马上就打：他的父亲、故太尉曹嵩被陶谦的部下袭杀。

曹操的父亲先前去青州琅琊避难，曹操做稳了兖州刺史，便让泰山太守应劭将父亲曹太公接至兖州。走到陶谦的地界阴平县，守备此地的部将看曹太公的行装有许多车，一时起了歹念，杀进宾馆。曹太公让人掘开后院墙逃跑，他让小妾先从墙洞爬出去，可小妾太肥，堵在洞口，进退两难。士兵冲至后院，曹太公及小儿子曹德被杀。应劭见交不了差，逃奔袁绍去了。应劭，字仲远，有《风俗通》一书传世，记载当时的典章、名物、制度、风俗、人物。其侄应玚，后辟为曹操的府掾。

初平四年（193）秋，曹操亲自出征，临行前，他和陈留太守张邈告别，对家中人说："我若不还，可依靠孟卓（张邈字）。"张邈少时，好游侠，与曹操、袁绍是一起玩的小兄弟。关东起兵后，有一次他触犯了盟主袁绍，袁绍让曹操杀了他。曹操说："孟卓，亲友也。天下未定，干嘛自相残杀？"

曹军一连攻拔徐州十多座城池，打到徐州首府彭城时，与陶谦大战一场，陶谦败走，退保郯县。曹军攻郯不克，便攻下了虑县、睢陵、夏丘。曹操为发泄怒火，张扬他的孝道，竟下令屠城，所攻之处，鸡犬不留，在泗水岸边活埋并砍杀平民百姓十万口，泗水为之不

流。

陶谦急了。次年，兴平元年（194）二月，他向公孙瓒委任的青州刺史田楷告急，田楷让刘备带所部一千多人去增援，陶谦又拨给他四千名丹阳籍的家兵。刘备一下子有了一支像样的队伍，干脆离开田楷归依陶谦。陶谦开了个豫州刺史的空头支票给刘备。正巧，曹军粮尽而退，刘备便屯兵小沛，给陶谦看家护院。

曹操回到兖州，见到张邈，相对垂泪，感慨生死。

四月，曹操以夏侯惇为东郡太守，司马荀彧、寿张令程昱留守甄城大本营，自率兵马再攻徐州。徐州地界的吏民听到曹军到了，如五雷轰顶，逃命不迭。曹军从徐州北部由西向东扫荡，连下琅琊、东海，南下回军，于郯东击破刘备，陶谦吓得收拾细软，准备回老家丹阳去了。

就在这大功垂成之际，曹操接到从兖州而来的飞骑密报，曹操看后，大惊失色，立刻传令：火速回军兖州。

让曹操惊慌的消息是：他的好朋友张邈竟然与他的部将陈宫联合兖州一些郡县长吏和豪强大族发动兵变，迎接吕布入主兖州。

吕布投了袁绍之后，参加了袁绍对黑山黄巾的围剿。这一次，袁绍给了黑山黄巾以毁灭性的打击，他亲率大军扫荡了黑山黄巾的根据地，黄巾帅左髭丈八等被斩，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李大目、于根氏等全军覆没，屯壁屠尽。最后，袁绍与黑山黄巾最强悍的统帅张燕以及屠各胡、雁门乌桓在常山交战。这一仗，多亏吕布的将士冲锋陷阵，大破张燕。战后，吕布和他的手下杀性未消，又抄掠起袁绍境内的吏民。过了些天，吕布看情况不妙，袁绍可能要对自己下手，便主动要求率部南下洛阳。袁绍拜他做司隶校尉，又派了几十个壮士随他同去。

吕布上了路。一天夜里，他让人在自己营帐中鼓筝。夜深的时候，袁绍的壮士冲入帐中，将吕布的地铺砍了个稀烂，这才发现吕布早已逃走。次日回报袁绍，袁绍吓得关闭城门。

吕布没有回兵报仇，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孤独的骑士，因为关东没

有他的根据地。他投向张杨，经过张邈的领地，二人谈得投机，临别之时，把手共誓。这件事，让袁绍知道了，大为恼怒；张邈也感到不安，他总觉得袁绍会让曹操杀了自己。此时，曹操做了一件失策的事情，他杀了前九江太守、陈留地界的名士边让，因为他讥议曹操。张邈、陈宫都是陈留地方名士出身，这样一来他俩与兖州的许多士族、官吏皆不自安，于是和张邈的弟弟张洪，以及许汜、王楷谋迎吕布。

吕布一听，正中下怀，他到张杨这里也待不下去。长安李傕和郭汜派人送金子给张杨，向他购买吕布的人头。吕布对张杨说："干脆些，拿了吕布的头去买官吧！"张杨说："我也不是那种小人。"

陈官带着兵马秘密地把吕布迎入濮阳。为了打消荀彧的疑虑，他宣称吕将军是来助曹操打徐州的。荀彧是何等机智的人，他马上觉察有变，速召东郡太守夏侯惇来镇甄城。夏侯惇太守在一个深夜到达，处死了一批与吕布通谋的官吏和将领，吕布出走。荀彧对东阿人程昱说："现在只有大本营甄城和东阿、范县三处不动，其余皆叛，您有民望，必须速去镇抚。"

吕布的将领汜嶷已经进入范县，可程昱还是冒险找到县令靳允，对他晓以利害，告诉他：吕布不过是个匹夫，曹使君的智略乃上天所授，请您拒守范县，我守东阿，则可恢复州郡。"靳允流着眼泪发誓："不敢有二心。"

直到靳允把汜嶷的头扔到跟前，程昱才直奔东阿，他先让骑兵守住黄河边上的仓亭津，从东岸濮阳而来的陈宫无法渡河，于是东阿吏民在程昱和东阿令枣祗的率领下构筑工事，拒城坚守。叛军一时无法进展。

曹操率军赶到东阿，他执住程昱的手："没有你，我就无家可归了。"他任命程昱为东平相，守范县。此时吕布打甄城不克，回兵濮阳。曹操大喜，对手下人说："吕布进入兖州，竟然不知道先据东平，切断亢父、泰山之间的道路，乘险要地势邀击我的归路，却还军濮阳，我知其无能了！"

曹操加紧平叛，他夜袭濮阳城西的吕布大营，大破而还。天亮的

时候，遇上了吕布来援。从早上打到傍晚，曹操总算领教了吕布的英勇，曹军无法进攻，只能被动防御吕布的铁骑。眼见不能支撑，曹操以重金召募将士抵挡。这时，他的司马、陈留人典韦应募而出。

典韦让手下人伏着别动，说：“敌人距我十来步时再报告。”

“典司马，敌骑已距我十步了！”

“五步再报！”

“五步了！”

“敌军上来了！”

典韦大呼而起，挥戟杀人敌阵，砍杀数人，将士们随之冲锋，击退了吕布。晚上，曹操引军而回，拜典韦为都尉，担任自己的卫士长。

曹军继续进攻濮阳，城中大姓田氏做了曹军内应，打开城门。曹操让人烧了东门，表示不拿下此城，决不回返。可是他遭到了吕布强大的反冲锋，曹军大败而退。曹操策马而走，几个吕布的骑兵截住了他，乱兵之中，他们也未多加辨认，只是问他：“曹操在哪儿？”

“前面乘黄马而逃的便是。”

曹操突火而出，手被烧伤。到了营帐，亲自劳军，勉励再战。就这样打了一百多天。天上忽然飞来了黑压压的蝗虫，曹操下令回军甄城。吕布也没了粮食，退至乘氏，又被当地人李进击走，屯驻山阳。十月，蝗灾使得兖州发生了大饥荒，战事暂告停止。

天子还都

兴平二年（195）正月，大赦天下。去年改元兴平，是因为天子十三岁，行了加元服礼。从去年开始，长安及三辅地区就发生了大饥荒，天一直不下雨，谷一斛卖到五十万，长安地区有了人吃人的事

情。天子命侍御史侯汶用皇家粮库里的米煮些稀粥赈济饥民。过了些天，饿死的人数还在上升。天子很聪明，他让人取五升米当着自己的面煮粥，计煮了两盆之多。据此，他认定侯汶贪污，打了他五十杖。更多的贫民喝到了稀粥，可三辅十万户百姓已剩下了个零头。

然而，天子微薄的接济无济于事，天灾又带来人祸，西北军的将士也怕饥荒，他们便动手抢劫。天子见宫女都没有像样的衣服，便让李傕将国库里的布匹调一些出来。李傕说：“宫中有衣服，还要什么？”天子无奈，只得让人卖了御厩中的马匹，买回些布，可半路上又被李傕抢去了，连贾诩的劝告都不听。去年二月，侍中马宇、谏议大夫种邵、右中郎将刘范说通屯驻在附近的马腾率众袭击长安，赶走李傕、郭汜。马腾以及韩遂从凉州开来的兵马才开到平乐观，马宇等人的谋划就泄露了，他们出奔槐里。李傕派郭汜、樊稠和自己的侄子李利进攻马腾、韩遂，马、韩二人败走凉州。西北军接着冲进槐里，将几个大臣杀了个干净。

马腾、韩遂撤出长安时，樊稠和李利在后追击，李利追击不力，樊稠骂道：“人家要断你叔父的头，你却如此怠慢，看我敢不敢斩了你！”兵至陈仓，马腾回马趋向樊稠：“樊将军，马某有话要与你说。天地翻覆，未可知也。你我所争，并非私怨，而是天子的家事。我与将军为一州同乡，今虽小异，当求大同。我想与你作个别，交个朋友，后会有期！”

樊稠将马带过马腾身边，伸出一只手，与马腾握在一起，说了些问寒问暖的话。许久，马腾拨马而去。

远处的李利看在眼里，回去就告诉了叔叔。

此役，益州牧刘焉的两个在长安的儿子刘范、刘诞也在槐里被杀。议郎庞羲将刘焉的几个孙子送到益州。此时刘焉在绵竹的治所被大火烧毁，徙治成都。刘焉经此几重创痛，发背疽而死。州中大吏赵韪等见其子刘璋懦弱，可以控制，便上表朝廷，要求拜刘璋为益州刺史。可朝廷却拜颖川人扈瑁为刺史。刘璋部将沈弥、娄发、甘宁于是反对刘璋，发动兵变，失败后逃归荆州刘表。朝廷改诏，拜刘璋为益州牧，刘璋拜赵韪为征东中郎将，准备东击刘表。

直到二月，樊稠向李傕要兵，说是出关东进。李傕让他来开军事会议商议此事。樊稠一到，就被斩首。这一下，西北军中的军官们互相猜疑了起来。

不过，谁的疑心都没有郭汜的老婆大，可她自己的疑心又没有她的醋劲大。她看李傕老是请丈夫去府上喝酒，丈夫喝得醉醺醺地回来，嘴里一个劲地夸李傕府上的侍女有味道。她恨不得杀了李傕。

终于有一天，李将军派人送了些风味菜肴给郭将军。郭将军的太太趁人不备，在菜里放了些黑乎乎的豆豉，等郭将军快下箸时走到他身边说："食从外来，会不会有名堂？"然后，她就在菜里挑出些黑乎乎的东西。郭太太说："一栖不容两雄，我本来就对你如此相信姓李的有看法。"这下把个郭汜搞得又怕又急。次日，李傕又请他过府饮酒，喝了个大醉。回到家里，他忽然怀疑李傕可能在酒中下了毒，忙让军士到厕所里弄些粪汁，咬着牙喝了下去，把肠子都快吐出来了。

两个武夫交了恶。双方的军士都参加了武斗。

天子让大臣们调解，谁也不敢去。郭汜决定把天子劫到营中，可手下有人叛逃到李傕的营中，把他的计划泄了出去。某夜，天子被李傕的侄儿李暹叫醒。天子一看，宫外有三千兵马和三乘马车。太尉杨彪阻止李暹说："自古以来，哪有帝王跑到人家的道理？诸君做事，怎么如此无礼？"李暹回道："李将军大计已定，在下照办就是。"

天子坐一乘，贵人伏氏坐一乘，尚书贾诩和左灵合坐一乘入了李营。李傕让部下把官里的东西和女人都抢到营中，放一把大火，烧得天子无家可归。郭汜也下了手，他把能捉到的公卿大臣都劫到营内做人质。朱俊将军气得当场倒地身亡，杨彪被天子派去郭营和解李、郭，也被扣留。

本月，皇甫嵩将军病逝。

四月，立贵人琅琊伏氏为皇后，拜其父侍中伏完为执金吾。

同月，郭汜准备攻打李营。杨彪说："群臣共斗，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这像什么话？"郭汜一听，拔刀欲刺。中郎将杨密死死劝阻，郭汜才让杨彪滚回去。

大汉历法的四月，已是酷暑，天子和群臣在李营饮食不济。天子让李将军拨给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赐左右。李傕说："早晚供饭，还要米干嘛？"他让人送来五具发臭的牛骨，天子大怒，打算责问李傕。侍中杨琦说："陛下暂且忍耐。李傕是个边鄙武夫，自知犯了大逆，心中正狂躁不安。陛下不可显扬他的罪行，以防他有非常之举。"

李傕也在备战，他召来羌、胡酋长，送了些宫里的小玩意，对他们说：只要击败郭汜，宫里的女人，随你们挑。羌、胡酋长们兴高采烈。

一天夜里，郭汜的兵马杀了进来，李傕的部将张苞开了营门，箭矢一直射到了天子的帷帐，李傕的左耳也被射穿。李傕部将、原白波谷黄巾统领杨奉击走郭汜，张苞随郭汜而去。

次日，李傕移营北坞，坚守不出。他很迷信，每天都让巫师鼓舞娱神，祭祠六丁。又塑起董卓像，每日上供。他每天也来朝见天子，连称呼都叫得不得体，一会儿"明陛下"，一会儿"明帝"，然后就婆婆妈妈地数落郭汜的不是，天子也只好随口应答。这让李将军很高兴，他逢人便说："明陛下真是圣贤的君主。"可他每天的朝见都让天子的侍中近臣们十分恐慌，因为他居然带着三口刀，身上挂两口，右手将马鞭和佩刀一起拿着。侍臣们只好带上刀剑，站在天子身边。李将军倒十分见怪，他说："天子身边的人不好，他们想图谋我，我这才带刀见驾。"侍中李祯是他的同乡，对他说："大汉制度，天子在军中，左右皆带刀。并非冲着将军来的。"李傕不闹了。

天子又让皇甫郦调解，李傕说："我有讨吕布之功，辅政四年，三辅清静，天下所知。郭汜算什么东西？他原名郭多，是个盗马贼，怎可与我平起平坐？皇甫将军，您也是凉州人，您看我的兵马士众，能不能收拾那厮？"

"董太师如此强大，也被吕布袭杀。将军身为上将，国家的好处都占尽了，可现在郭汜质公卿，将军劫天子，你说哪个的罪过更大？就连杨奉这种白波黄巾出身的人，都觉得将军做得过分了。"

“我不听，你走吧！”

皇甫郦到天子营帐中，直言李傕言辞不逊。天子怕李傕加害皇甫郦，下了道手敕让他出营。李傕果然派虎贲中郎将王昌追杀，王昌让皇甫郦快逃，回去说没追上。

天子见调解无望，只得安抚李傕，拜他为大司马，位在三公之上。李傕高兴得厚赐了巫师们。

到了六月，李、郭二军相攻，死亡上万。杨奉谋杀李傕，事泄而叛，由于他带走了大批的军士，李营的兵力一下子减弱不少。月底，镇东将军张济从陕县回军长安，调解李、郭，并打算迁天子乘舆出关至弘农郡。天子每日都在思念旧京，便让人再次劝解李、郭二人。过了些日子，二人同意和解。张济让他们各送一子给对方作人质，可李将军的老婆不愿意，事情又拖了下来。

倒是羌、胡酋长们等不及了，日日到天子的营帐前探头探脑：“请问把门的将军，天子在里面吗？”

“有什么事？”

“李将军答应给我们宫女，现在何处？”

天子气急败坏，叫贾诩来：“卿奉职忠心，所以登荣宠之位。今羌、胡满路，请为寡人想个方略。”

贾诩也没办法，只得请羌、胡酋长们吃饭，好言相劝，说朝廷不会失言，只是现在不行，请诸位耐心等待。羌、胡见如此情形，知道无望，便怨起李傕来了，纷纷带着兵马走了。李将军越发单薄了。终于，他和郭汜这个盗马贼和解，互送一女为人质。

兴平二年（195）七月的一天，天子的车驾出宣平门，向弘农郡进发，开始了为时一年的颠沛流离。

门外吊桥刚刚放下，李傕的兵马就追围了上来，而郭汜的军士数百人又拦在桥头：“车中是天子吗？”郭汜的军士问道。

侍中刘艾大呼：“是天子！退避！”他又掀起天子的车帷。

天子面对军士：“你们不退兵，是想逼迫至尊吗？”

西北军哗地闪开，跪伏在地。车驾刚过桥，西北军士兵齐呼：“万岁！万岁！”郭汜率军随驾而行。

夜里，天子到达霸陵，张济命人送来了晚餐和一些日用品。

次日，天子诏下，以张济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如三公；郭汜为车骑将军；杨定为后将军；杨奉为兴义将军；牛辅的部将、孝灵皇帝母董太后之侄董承为安集将军。张济和百官们劝天子出关幸弘农郡，可郭汜却让天子幸长安西北的高陵。天子不答应，郭汜也不答应，天子便绝食。郭汜只得同意天子到附近的县邑。

八月，车驾幸新丰，侍中种辑知道郭汜打算再次劫持天子，早就密令杨定、董承、杨奉合兵新丰，郭汜见阴谋泄露，弃军而逃，奔入终南山中。

十月一日戊戌，郭汜的随驾部将夏育、高硕又谋划劫天子西行，夜里放火。侍中刘艾让天子自行决定到谁的营中躲避。这时，杨奉、董承率兵来迎天子进入杨奉的营寨，与夏育等恶战一场，大破之。五日壬寅，天子幸华阴。

天子没有料到，这些护驾的西北军将领也想劫持自己。宁辑将军段煨派人送来了丰厚的食品和衣物，并示意天子在窘迫时可进入他的营帐。杨奉、杨定、董承听了大不高兴，他们恐吓天子，说郭汜就在段煨的营中，他们的同党侍中种辑和左灵也这么说。而另一些公卿如太尉杨彪、司徒赵温、侍中刘艾、尚书梁绍等都誓死担保段煨不反。天子迷惑了，干脆谁的营寨也不去。这一夜，天子与公卿露宿道南。

这下子几个将军打了起来，夜深之际，左灵与种辑请天子下诏讨伐段煨，天子说：“段煨的罪行没有彰著，杨奉等就要攻打他，还想命朕下诏吗？”种辑坚持让天子下诏，天子不睡也不答应。

十四岁的天子，在强权胁迫和颠沛流离之中，已经成就了一种外柔内刚的性格，他必须充分利用他的列祖列宗的威灵，利用大汉帝国这块金字招牌的最后辉煌，来争取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杨奉等人终于擅自攻打段煨了，打了十多天没有结果。这些天，段煨仍旧送东西来，天子感动了，让侍中、尚书们去和解将军们。他们也打累了，于是卖给天子一个面子，奉诏还营。

就在这时，李傕和郭汜亲率大军追了上来，杨定吓得要命，半路被郭汜打得匹马而逃，投了荆州。张济这些天与董承、杨奉不和，干脆与李、郭合兵，共追天子舆乘。十二月，在弘农郡东涧大战一场，董、杨二军大败，百官、兵士死亡甚多，御物、典籍、符策散失殆尽。射声校尉沮俊受伤坠马，李傕问左右："他还能活吗？"沮俊骂道："你们这些凶逆，逼劫天子，使公卿被害，宫人流离，自古乱臣贼子，没有到你们这种地步的！"李傕下令将他处死。

战后，天子只得再次露宿。董承和杨奉情急之际，一面答应与李、郭讲和，一面秘密让人去白波谷黄巾统帅李乐、韩暹、胡才以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那里搬来数千名骑兵，打了一仗就击溃了李、郭、张三人的军队。

十二月二十四日庚申，车驾继续东进，董承、李乐护卫舆乘，胡才、杨奉、韩暹、右贤王断后。走了不久，李又追上来，把杨奉打得大败，许多大臣死于乱军阵中。李傕又要杀司徒赵温、太常王绛、卫尉周忠等，贾翊不让，这才作罢。

李乐见后面的兵马已溃，急忙让天子上马而走，天子说不能舍百官而去。到了陕县，李乐与董承结营自守。此时只剩下数百名兵士，远处已能听到李傕军士的叫喊声。

李乐又建议天子乘船沿黄河而下，经砥柱，出孟津。杨彪不同意，他说："臣是弘农人，自此向东，河水有三十六滩，险不可行。"刘艾也说："臣出任过陕令，知其地形，太尉所言甚是。"他们下了决心，一定要渡过黄河，到北岸去才能摆脱追兵。于是让李乐先行至渡口，准备好船具，约定举火为号。

伏皇后的哥哥伏德抱着几匹绢，又扶着伏皇后艰难行进。董承看见了，让卫士乘乱砍杀伏德，夺了那几匹绢。兄长的血，溅了妹妹一身。到了黄河岸边，只见岸高十丈，无路可下，董承只得拿出那几匹

绢来，结为长索，让人背着天子和皇后缘此而下，其余的人只好匍匐而下，甚至有跑下去的。董承的兵士趁机大掠，官吏和宫女的衣服都被扒走，卫尉士孙瑞也被乱兵所杀。

李傕的骑兵见河岸有火，纵马赶到岸边，大喊：“你们想劫走天子吗？”

董承命人用绵被为幔，弓箭手在后稳住阵脚，天子公卿先行渡河，其余人一概不问。人们争相上船，董承挥剑乱斫，船舱里落了许多手指头。

天子进入李乐扎在河对岸大阳县境内的营寨。河内太守张杨让人送来了米粮，河东太守王邑又送来绵帛。休整了几日之后，天子终于坐上一辆牛车，幸安邑。

诏下：拜胡才为征东将军，张杨为安国将军，王邑为列侯，韩暹为征西将军，李乐为征北将军，与杨奉、董承共辅国政。其他将领见朝廷如此大加封拜，纷纷来要官做，天子无可奈何，只得胡乱加封。大汉拜官封爵，制度极严，必须铸造金属印玺，只有在紧急状况下，如临阵拜将，铸印不及，才用刀在金属印坯上刻字，名曰：“急就章”。现在，连刻印都来不及了，拿了铁锥在印坯上画几个字就算了，这些强盗出身的将领看见印上有字，也就心满意足了。

天子的朝廷更是可笑，连门都没有，几间破旧民房，用篱笆草草围上，士兵们没有看过天子上朝，每天都伏在篱笆上看天子与公卿议事。他们觉得公卿们对天子行的礼、天子和公卿们的语言，都那么斯文奇怪，不禁哈哈大笑。将领们更是放肆，每天拿了酒肉，到天子门前大呼小叫，让侍中请天子出来同乐。侍中不为通报，他们就骂骂咧咧，拳脚相加。他们不敢对天子怎样，却敢将宫女们拖到营中陪酒。这一带又闹了饥荒，粮食日益紧张，天子只能将就着过了。

本年十月，朝廷拜曹操为兖州牧。刺史改为州牧，是由实力决定的。此时，他已经击破吕布，重新巩固了兖州。

本年正月，曹操在定陶打败吕布后，于闰五月进击盘踞在钜野的吕布部将薛兰和李封。吕布前来援救，不胜而逃，曹操斩杀二将，进

军乘氏。这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曹操打算先取徐州，回头再收拾吕布。荀彧不同意："今已破薛兰、李封，如分兵东击陈宫，陈宫必不敢西顾，这样，就有时间收割麦子。有了粮食，可一举而破吕布。等破了吕布，再南结扬州刺史刘繇，共讨袁术，兵临淮、泗。如果舍吕布而东进徐州，必须留兵兖州，留多了兵不够用，留少了又挡不住吕布的寇暴，则兖州危急，万一徐州失利，将军何处可归？"

曹操听从了建议，一边迅速收麦，一边设下埋伏，击溃来犯的陈宫和吕布，并纵兵大追。吕布在兖州站不住脚了，东奔刘备。张邈让弟弟张超率家族守住雍丘，自己随吕布而去。

陶谦于本年年初病故，临死前，对别驾麋竺说："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于是陶谦一断气，麋竺就率人迎立刘备。刘备假惺惺地推让，说袁公路就在寿春，可以请他来任州牧。麋竺说："公路骄豪，非治乱之主。今欲与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匡主济民，下可割地守境。"孔融也对刘备说："袁公路岂是忧国忘家的人吗？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全凭民意，天予你而不取，悔不可追。"

其实刘备的推辞，就是要探测一下徐州的民意，因为袁公路对自己来说，确是强敌。现在，刘备接过了印绶。

吕布见到刘备，主动套近乎："我和卿同是边郡之人，算是同乡。我见关东兵起，想杀董卓，可我杀了董卓，出奔关东，没有一人愿意收留我，都想谋我的性命，这是为什么？"他又请刘备到营中吃饭，让自己的老婆出来拜见刘备，并介绍说这是我的义弟。刘备见他如此粗疏，言语无常，只得与他客客气气，心里却十分讨厌他。

曹操就任兖州牧之后，进围雍丘。张超指望好友臧洪来救，可臧洪又是袁绍的人，时任东郡太守。张超跑到袁绍那里哭求救兵，袁绍不给。臧洪又要求自带所部兵马赶往雍丘，袁绍不许。十二月，雍丘溃败，张超自杀，张邈的三族被曹操夷灭。张邈去袁术处求救，途中被部下所杀。

臧洪悔恨不已，他是个讲义气的人，于是拥兵而叛。袁绍爱惜他是个好汉，让他的同乡陈琳写信劝说，他回了封信把陈琳嘲弄了一

通。袁绍点起大兵，把臧洪围了个水泄不通。城内饿得吃起了老鼠，最后的日子来到了，臧洪把家中所有的米都分给了吏民，又杀了爱妾给将士们吃，所以，城陷之时，无一人投降。袁绍对臧洪说：“臧洪，干嘛这样！这下该服气了吧？”

袁绍的好言相劝，又招来臧洪的一顿臭骂，无非说他是大汉的叛臣。袁绍长叹一声，让人杀了臧洪。忽然，座中一个人愤然而起，愿与臧洪同死。此人是臧洪的好友陈容，他也骂了一通袁绍，然后说：“仁义岂是常有的东西，蹈之则为君子，背之则为小人。今愿与臧洪同日死，不与将军同日生！”袁绍也如了他的愿望。

袁绍大营中，人人相觑，有个人小声地说：“为何一天之内，杀了两位烈士？”

次年正月，改元建安（196）。

南匈奴于扶罗单于死，子呼厨泉立。

由于粮食紧张，董承、张杨想护卫天子回洛阳，杨奉与李乐不同意，发生了内讧。韩暹进攻董承，董承逃奔野王。胡才又想进攻韩暹，天子让人制止了。

张杨去年曾到安邑见过驾，劝天子回洛阳，杨奉等人就阻挠不让。现在既已开战，张杨就让董承先去修缮洛阳的宫殿。太仆赵岐也住在洛阳，他约了袁绍、公孙瓒和袁术于去年秋天来洛阳议和，他们满口答应，可事后全部违约，赵太仆为此生了场大病。现在，他见天子还都，非常高兴，主动去荆州说服了刘表，刘表让他带来了大量的兵士和物资修宫勤王。

五月，天子命杨奉、李乐、韩暹派兵护送还都，杨奉等奉诏而行。六月，抵达闻喜县，半路上，张杨送来了粮食。到了洛阳郊外，又等了几天，直到七月一日甲子，这是个吉利的日子，天子的车驾还幸旧都。宫殿尚未修好，先住入故大长秋赵忠的宅第。八月八日辛丑，幸南宫杨安殿，这是张杨为表彰自己的功劳而命名的。

张杨对大家说：“天子君临天下了，朝廷自有公卿大臣，下臣当外出护卫京师。”他退至野王，杨奉也屯驻梁县，韩暹与董承负责宿

卫。十日癸卯，拜张杨为大司马、杨奉为车骑将军、韩暹为大将军、领司隶校尉。

洛阳，荒芜不堪，废池乔木，断壁残垣。粮食仍是异常紧张，百官露宿野餐，甚至采食野菜。西北军的兵士仍在抢劫、烧杀。

天子颠沛之际，袁绍、袁术、曹操三人都反应冷淡，可还都之后，三人的态度就各不相同了。

袁绍在去年天子到达安邑时，就受到谋臣沮授的建议："西迎大驾，都于邺下，挟天子以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也就是说，把天子挟持到袁绍的大本营——冀州邺城。但另两个谋臣郭图、淳于琼却认为，把天子弄来之后，起码在礼节上动不动就要请示天子，听天子的话则无权，不听又有违命之嫌，况且汉室已行将灭亡，没有什么号召力了。可沮授仍认为："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如不早定，必有先下手为强的人。"袁绍不听他的话。

袁绍有自己的打算，他现在无心顾及天子，他最大的心病是北方的公孙瓒。

三年前，公孙瓒统一了幽州。他一步步地搞垮他的主人幽州牧刘虞。刘虞一直告诫他不要和袁绍闹摩擦，他不听。于是，刘虞开始控制他的兵源和军粮。公孙瓒一面不断地上奏朝廷，说刘虞的不是；一面纵兵抄掠，又在蓟城东南构筑军事要塞。刘虞忍不住，亲率大军十万讨伐。可他不习行阵，进攻要塞之前竟告诫军士只许杀公孙瓒一人，不得烧杀平民。当他的军队包围了公孙瓒的要塞时，公孙瓒的主力恰恰不在营中。可公孙瓒利用了刘虞的弱点，以数百名敢死队员纵火突围，收兵回攻。刘虞兵溃，北奔居庸。公孙瓒一口气追到居庸，打了三天杀入城中，逮捕了刘虞及其妻子儿女，回到蓟城。这时，朝廷的钦差刚巧从长安到达，传达了朝廷对他们的宣慰：增加刘虞的封地，拜公孙瓒为前将军、封易侯。公孙瓒向钦差诬蔑刘虞与袁绍勾结，打算自立为天子，钦差不信。公孙瓒便胁迫钦差监斩，在蓟城市中心杀了刘虞一家，把人头让钦差带回长安。半路上，刘虞的部下把人头劫走归葬。

刘虞派往长安的信使田畴回到蓟城，闻讯痛哭，他亲祭刘虞的坟墓，在墓前宣读朝廷的回信，然后烧毁。公孙瓒将田畴捉来：“为什么不把朝廷的公文交给我？”

“汉室衰颓，人怀异心，只有刘公不失忠节。公文中的内容，没有将军一句好话。将军杀无罪之君，仇守义之臣，恐怕燕、赵之士宁愿蹈东海而死，也不愿跟着将军了。”

公孙瓒听了也心寒，放了田畴。田畴回到故乡无终县，与宗族扫地为盟：“君仇不报，誓不为人！”言毕，隐入徐无山之中。几年之后，他的居住地聚集了五千多户人家。田畴与大家商议之后，自定法律，建立了一个和平的、民主议会制的自治政权，连乌桓、鲜卑的一些部落也来归附。这一切，都是初平四年（193）年底的事。

易京楼

兴平二年（195）年底，袁绍有了一个对公孙瓒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机会。此时，刘虞的从事鲜于辅和乌桓司马阎柔率领州兵，联合胡骑数万，声称为刘虞报仇，攻打渔阳太守邹丹的潞县，斩首四千多级。他们请袁绍派刘虞之子刘和出兵，袁绍还派出了麴义。鲜于辅等联合乌桓峭王、鲜卑骑兵南迎刘和以及袁绍的援兵，合兵十万，在鲍丘大败公孙瓒，斩首两万多级。一下子，代郡、广阳、上谷、右北平的吏民纷纷杀了公孙瓒所设的官员，起而响应。公孙瓒的军队屡屡败退。

公孙瓒干脆在易城构筑了一座旷古未有的综合工事——易京楼，主楼高十丈，周围的堑壕深五六丈。楼上作为他和妻妾的住处，男人七岁以上不得人内，铸铁为门，饮食、用品、公文皆用吊篮传递，不会宾客，不见将士，有事就让楼上的女人扯开嗓子喊。大家都被他这种疯狂的举动搞得困惑不解，问他为何如此。公孙瓒写了几根竹简用篮子吊下来：“我昔驱畔胡于塞表（孝灵皇帝中平五年事），扫黄巾于孟津（初平二年事），当此之时，谓天下指麾可定。至于今日，兵

革方始，观此，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楼不攻’，今吾诸营楼橹数十重，积谷三百万斛，食尽此谷，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公孙瓒划地为牢，诸将见大势已去，纷纷离去。其实，公孙瓒此举完全出于他的一个爱好，他喜欢听儿歌，又觉得儿歌出自天真，应是天意。近来，他听到一首易城儿歌唱道：“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惟有此中可避世。”从而突发奇想，遂有此举。

袁绍听说大喜过望，他积极备战，力争一举攻下幽州，解除后方隐患。

代汉者当涂高

袁术一是忙着夺徐州，二是忙着做皇帝。

建安元年（196）六月，袁术与刘备展开了争夺徐州的战役。刘备让司马张飞守下邳，自守盱眙、淮阴，与袁术相持。袁术说动了吕布袭击下邳。正好张飞在城中虐待陶谦故将，中郎将许耽开城响应，张飞败走，刘备的太太和子女被吕布俘获。刘备回军下邳，又被吕布击溃。刘备只得将残兵走广陵，与袁术交锋，又被打得大败。刘备走投无路，向义兄吕布投降，吕布此时正在生袁术的气，因为袁术答应给他的军粮没有兑现，他仍让刘备做空头的豫州刺史，屯兵小沛，合兵击走了袁术。本月，吕布自称徐州牧。这下，对曹操来说，讨吕布与攻徐州就是一回事了。

袁术等不及了，他感到身体也不太好，可皇帝仍没有做成。于是他请了个谶纬专家为他寻找做皇帝的根据。在那个时代，做皇帝除了现实的条件成熟之外，还需要有对天意的解释，才能具备号召力以取得民心。大汉帝国的臣民们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仰：千秋万世的天子都由五个家族轮流做，而轮流的次序就是五行。他们的搭配是：伏羲（木）、神农（火）、黄帝（土）、少昊（金）、颛顼（水）。五行

的关系有顺逆两种，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是一个循环相生的承继关系；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是一个循环相克的消灭关系。战国之际把五行又称作五德，他们认为周王朝属于火德，因而靠着武力夺得天下，又开始实践一种新制度的秦始皇帝采用了相克学说解释他的帝国，下令秦帝国属于水德，水是黑色的、冷的，所以秦国应该以严酷的法律治理天下，以黑色为最高贵的色彩。大汉孝武皇帝也有这种相克的信仰，他宣布大汉为土德，土是黄色的、温的，所以大汉帝国以信义道德治理天下，以黄色为最高贵的色彩。但是后来，温和的儒家学者认为，一切凭借武力建立的帝国都是不合法的，帝国之间的传递，在天意的角度看，都是道德的传递，道德的属性不同，但都是以和平继承的方式传递的。经过他们的严密考证，发现周王朝应该是木德，由于秦帝国推行暴政且又短命，因而周王朝的嫡传应是大汉帝国。这样，按照相生的学说，大汉应是火德。这个新说法虽是个概念游戏，但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不可动摇的影响，那就是，皇帝轮流做是合法的，一种德行衰亡了，应该有新的德行替代它，但是，五行相生的次序却不能改变。这就规定了任何皇帝都不能改变政治制度和文化道德理想。而这个制度和理想，事实上就是秦、汉帝国四百多年营建起来的日趋完善的统一大帝国。

光武皇帝光复大汉之后，就采用了新的学说，宣布大汉为火德。火是红色的、热的，它是人类文明的能源，所以大汉以文明和礼乐治理天下，以赤色为最高贵的色彩。按照这个逻辑，时下的群雄们如果想做皇帝，必须找到两个证据，一是证明自己是黄帝的后裔，二是证明自己身上有土德的象征。

袁术是黄帝的后裔，这一点很好证明，因为袁氏祖先是古代陈国的贵族，陈国贵族是虞舜的后裔，而虞舜又是黄帝的后裔。后一点有些麻烦，谶纬专家灵机一动，说时下流行的谣言是："代汉者当途高"，意即有一个站在路上的大高个子应当代替大汉皇帝，袁术个头还算高，更为巧妙的是他的字里有一个"路"字，这下全解决了。袁术很高兴，他又让人去将孙文台的太太拘捕起来，直到她交出了传国玉玺。然后，大会群臣，商议称帝之事。

令他十分沮丧的是，没有一个部下同意他的主张，主簿阎象说：当初三分天下，周文王已有其二，尚且臣事殷纣。将军比周文王差远了，而汉室比殷纣又好多了。更可恨的是，孙策在江东还写了封信讥讽他一通，并从此脱离了他的指挥。

挟天子以令诸侯

曹操正驻兵许县，他马上听从了荀彧的建议，谋划迎奉天子。他派扬武将军曹洪率兵去洛阳，可遭到董承的阻击。愁苦之际，洛阳的议郎董昭看清了形势，他觉得西北军本来就不齐心，其中杨奉的兵最多，但在关东没有根基，最希望外援。于是，他以曹操的名义写信告知杨奉，表示愿与他共辅汉室。杨奉得书，对大家说，兖州军在许县，有兵有粮，国家可以依赖。这时，董承与韩暹闹了矛盾，也秘密遣人请曹操出兵洛阳。

建安元年（196）八月十八日辛亥，曹操进入洛阳，奏韩暹、张杨有罪，诛其同党尚书冯硕等三人。天子以韩、张有护驾之功，诏一切勿问。以曹操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拜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董承等十三位将领为列侯，追赠射声校尉沮俊为弘农太守。讨有罪，赏有功，矜死节，文章做得有板有眼。

曹操私下请了董昭，他握着董议郎的手与自己同坐，问道：“孤来此地，当用何计策？”

“洛阳的诸将，皆怀异志，不可依赖。将军如留京辅弼，多有不便，不如移驾幸许。可朝廷新还旧京，天下举首企望，迁都为非常之事，因而要多多计划。”

“此孤之本志，可杨奉就在近处，兵马又精良，如何对付？”

“杨奉在关东缺少同党外援，将军拜镇东将军、袭费亭侯皆出杨奉之力。可厚遗答谢，以安其意，并说请天子驾幸鲁阳，以便许县粮食顺利输送。杨奉武夫，必不生疑。”

曹操依计而行。八月二十七日庚申，车驾出京师东行。杨奉觉察上当，追之不及。九月七日己巳，车驾至许县，天子幸曹操营，拜曹操大将军，封武平侯。在许县设立宗庙社稷，称许都。

曹操指使天子近臣说动天子，下诏责备袁绍，说他地广兵多，自树朋党，不出师勤王，却擅自讨伐。袁绍无奈，只得上疏自责，作了深刻的检查。十一月七日戊辰，诏拜袁绍为太尉，封邺侯。袁绍闻诏大怒：“没有我，曹操早没命了，现在他竟敢挟天子而命令我吗？”

袁绍辞了封赏，这下倒把曹操吓得不轻。他权衡利弊，上表请求把大将军之位让给袁绍。二十五日丙戌，诏拜曹操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

尽管曹操还要考虑袁绍的存在，但近水楼台先得月，曹操可以很自在地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任命自己的部下，收罗人才。荀彧做了侍中，守尚书令。他又向曹操推荐了自己的侄子荀攸以及颍川名士郭嘉。曹操与荀攸谈完话，对人说：“公达（荀攸字）非常人也，我能和他商议计策，天下事有什么可担心的？”而当他与郭嘉谈完话，又对人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是此人！”

荀攸被征为汝南太守，后入尚书，为曹操军师；郭嘉为司空祭酒。

曹操还想到笼络一些大汉旧臣。如钟繇，曹操不会忘记他当初劝说李傕厚待自己派往长安使节之事，以其护卫天子出关有功，诏拜侍中尚书仆射，封东武亭侯。孔融在北海，既不能抵挡黄巾，又不能抵挡袁绍之子、青州刺史袁谭，连太太都被袁谭俘虏了。曹操和孔融是老朋友了，知道他虽是个书生，但名望甚高，征为将作大匠。此外，他还收了一个叫许褚的勇士，作为卫士。不过，曹操虽爱才，但他待下属过于苛刻，府中的官吏有了过失，往往要吃曹操的大杖。只有一个何夔，他告诉曹操：“我身上天天带着毒药，明公如果加杖于我，我宁死也不可辱。”所以曹操从来不敢对他怎样。

本年，许都的屯田取得成功，得谷百万斛。而此时天下大饥，哀鸿遍野，袁绍的兵士在河北吃桑椹，袁术的兵士在江淮吃河蚌，小民

百姓不甘心饿死的就只能吃小孩了。只有曹操吃得饱饱的，有精力想心事。

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徐州和吕布。天子九月迁许都之后，曹操于十月进击杨奉，杨奉与韩暹南奔袁术。十月，曹操进击吕布。

和曹操同时想着徐州的还有袁术。

本年秋天，袁术一边与吕布通婚姻之好，一边遣部将纪灵率步骑三万进击刘备。吕布手下劝吕布不要去救，让袁术杀了刘备。吕布这回不知怎么有了脑子，他说了一番唇亡齿寒的道理，率步骑千余增援刘备。他到了小沛的西南，请纪灵、刘备一起吃饭，对纪灵说："玄德（刘备字），吕布之弟，被诸君所困，故来救之。我吕布素来不喜欢争斗，却喜欢劝和。"说完，他让小卒将他的大戟扛到营门口插好，操起一张强弓："诸君请看我射戟上的月牙支刃，射中了，请散兵；射不中，你们继续开战。"

吕布一箭中戟，兵士们欢呼起来，纪灵和刘备皆起身祝贺："将军天威也！"次日，他们又在一起大吃大喝，划了一通拳，称兄道弟，拱手而散。

刘备在小沛住安稳了之后，又惹是非，他先是偷偷募兵，又让人装成盗匪劫了吕布去河内买马的金子。吕布大怒，派部将高顺、张辽于九月攻破小沛。刘备逃走，高顺便把刘备的妻子俘去见吕布。

落难的刘备恰恰碰上了抵达梁国地界的曹操，曹操对他很客气，留他在军中共征吕布。一天，曹操问郭嘉："有人劝孤杀了刘备，因为刘备是个英雄，不早图之，后必为患。卿以为如何？"

郭嘉说主公您正兴大业，刘备既是英雄，杀他一人，却失天下人之望，太划不来了。于是曹操又让刘备回小沛收了些残兵，送他些军粮，安抚下来。

就在曹操将要对吕布发动总攻之际，后方许都受到一支游离出长安的西北军的威胁，使得曹操不得不回师营救。

这支西北军的统帅叫张绣，是张济的族子。张济自天子出关后，

看见关西残破不堪，便将所部带出关外，进入荆州境内。他发起了攻打南阳穰城的战役，却中箭身亡。刘表假惺惺地去说：“张将军穷迫而来投我，荆州将士却如此无礼，此非本牧的初衷。”刘表为张济发了丧。

此时贾翊从驻扎在华阴的段煨营中出走，来奔张绣。张绣对他执子孙之礼。贾翊定下神来，便带张绣去见刘表。刘表热情接待了他们，并接受了他们要求收编的请求。于是，由建忠将军张绣领张济部伍，屯驻南阳首府宛城。

不过，贾翊是最能择木而栖的良禽，他一出客厅，就对张绣说：“刘表这个人，太平之世可以做到三公。但离乱之世，他不见事变，无有远略，不会有什么作为。”

宛城距许都很近，刘表让张绣这样的降将屯驻军事要地，就是想在曹操背后安下钉子。

建安二年（197）正月，曹操军进育水，讨伐张绣。张绣觉得自己在关东无势，不如投个更强的主子，便率众投降。

曹操进了张绣的大营，他的眼睛忽然散了光，发起愣来。他看到了张济的太太、张绣的叔母，正是他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当晚，他请众将及张绣、张夫人赴宴。宴后，曹操仗着酒醉脸红，别人看不出他的羞耻，宣布让张夫人侍寝。

张绣脸都憋紫了，一时又不好发作，部将们连忙把他架走。

曹操的部下却不以为怪，他们都知道曹操既爱江山又爱美人。而且，他有个怪癖，专喜纳女战俘为妾，因为他心里总是觉得老婆是别人的好，年轻时他和袁绍合作的最刺激的游戏就是劫人家的新嫁娘。

贾翊让张绣千万止怒，静观些时候。不久，张绣手下的勇士胡车儿受到曹操的接见，有人告知张绣说曹操给了他一囊金子。张绣认定，这是曹操收买胡车儿袭杀自己。

贾翊对张绣说了如此这般。在回军之际，张绣请求把军队开到大路上走，曹操许可。上大路必经曹军大营，按照军事条例，张绣军士

必须卸甲而行。可张绣又说军中马车太少，只能挂甲而行。曹操又许可了。就在张绣的兵马走到中营之时，队伍中发出一声叫喊，冲向曹操的大帐。

曹操躲闪不及，中了一箭，长子曹昂被杀。幸亏典韦赶到，才保护曹操离开大帐，狼狈而逃。一时曹军大乱，狼奔豕突。典韦身被十创，在重重包围之下，将双戟同时插入两个敌兵的胸膛，瞠目大骂，气绝而亡。

曹操出了大帐，马上镇定下来，让手下布置了一个小埋伏，击退张绣的追兵。张绣回军穰城，再投刘表，曹操回师许都。路上，曹操手下的青州兵大肆抄掠，平虏校尉于禁麾兵击杀，青州兵向曹操告状，曹操大大地夸奖了于禁，说育水之难，我犹狼狈，将军能整顿乱军，有不动之节，虽古之名将，也不能如此。封益亭侯。

曹操对张夫人说："我一定要宰了张绣这个匹夫！"

就在曹操备战之际，袁绍写了一封语辞傲慢的信来，对他指手划脚。曹操气得把信拿给荀彧和郭嘉看。

"孤今将讨不义而力不能敌，卿等以为如何？"

郭嘉的回答，简直就是一篇大文章："刘邦、项羽不能匹敌，明公当有所知。汉祖惟以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袁绍有十败，明公有十胜。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为道胜；绍以逆动，公奉天子，此为义胜；大汉自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整，公以猛纠之，上下知制，此为治胜；绍外宽内忌，用人却又怀疑，且任人唯亲，公外简易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是举，不问远近，此为度胜；绍多谋却少决断，多有失误，公得计辄行，应变无穷，此为谋胜；绍高议揖让以收名誉，浮而不实之士多往归之，公以至心待人，不为虚美，忠正而有远见才能之士皆愿为公所用，此为德胜；绍见人饥寒，体恤安抚，形于颜色，其所不见，则不加考虑，公于眼前小事，往往疏忽，至于大事，公虑及四海，恩之所加，多过人之所望，虽不为公亲眼所见，公却虑之，无所不周，此为仁胜；绍手下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以道御下，谗言不行，此为明胜；绍不知

是非善恶，公于善进之以礼，于恶绳之以法，此为文胜；绍好虚张声势，不知兵要，公以少胜多，用兵如神，兵士依赖，敌人害怕，此为武胜。”

从来大言不惭的曹操听了此言也不好意思了起来：“如卿所言，孤有何德以当之。”

其实，曹操大可不必谦逊，这正是他和袁氏集团最大的分歧。曹操的做法，是他对大汉帝国衰亡史作了研究和思考之后采取的对策。这里有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用人，二是制度。大汉帝国确立了一套以德治为主的制度，与之相应，大汉的文官集团的选拔标准也以个人道德为主。这种趋向走极端之后，法治松弛，想人仕的士人不去学习经世本领，却标榜道德，慕求虚名。这种人，要么人品正直却无才能，要么愤世嫉俗却无政治理性，要么巧言令色，结朋树党，虚伪奸诈。由于征辟的大权渐渐归人世家大族或豪强乃至中官之手，用人标准更是任人唯亲，紊乱不堪，即便有些正直之士在品评人物，但也不过是一种舆论，无济于事。道德一旦成了挂在嘴边上天天讲的东西，就成了傻乎乎的废物，进而成为束缚人性的可憎的枷锁和破坏国家法治的利斧。士大夫与外戚、中官的拉锯战之所以毫无结果，在于他们自己也不愿意大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袁绍家中四世公卿，所以他是大汉丧失生机的统治阶层的代表。

曹操坚定地相信，法治是挽救一切社会的手段。法治的社会中，道德问题应该成为一种更抽象、更宽泛、更真实、更个人化的东西，而不是成天标榜说教的东西。所以曹操每次发布求才令时，都强调唯才是举，甚至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都可以重用。如此，曹操的帐下往往有不少重臣出自寒门，这些人可能并非不仁不孝，只是出身卑微，没有人给他作广告罢了。寒门之士，有进取心，了解社会，实践能力强，充满活力。即使真是鸡鸣狗盗之徒，只要他有本事，曹操对其为人并不介意。比如典军校尉丁斐，这个人是个理财能手，可是喜欢小偷小摸，他用军队里的壮牛换了自家的瘦牛，甚至把公家的金印换了大饼吃。可曹操却说：“大家都让我好好治治他，我并非不知此人贪财。可我有了他，就像我家有了条爱偷嘴却善于捉老鼠的狗，偷嘴虽有小损，但却使我的囊贮完好无失。”

顺便解释一下，那时候，狗拿耗子并非多管闲事，现今出土的汉代画砖上，就有此图。以猫捕鼠，是后来印度和尚引进的技术。

曹操的个人生活之中，也多不拘礼法。他个子小，皮肤又黑，却很有魅力，因为他具有超出常人的幽默感且多才多艺。他喜欢穿便服，戴头巾而不戴冠冕，见客时也是如此。他自制了一只小皮包，有点像现在的女士们用的那种，放些手帕、小刀之类。他与人谈笑，无所不言；一次欢悦大笑之时，竟将头没人杯盘，沾了一脸的菜肴。他善骑射，好读书，其书法、围棋、弹琴得之于当时的高手如张芝、郭凯、蔡邕等人的传授或切磋，并能与他们媲美。他更是一个大诗人，因为他有真性情。他对女人也是如此，他觉得女人就是要漂亮，有才艺。他的妻妾大都出身寒门，甚至是娼优歌伎，或是战俘。但曹操有一点好，他知道尊重她们。丁夫人的养子曹修亡于乱军之中，丁夫人天天与曹操哭闹，他一气之下让她回娘家去。过了些时，曹操去看她，可她还是闹，曹操便提出离婚，并交待她家人，早些给她找个婆家，不要误了她的一生。尹夫人也是他收纳的寡妇，来时带了个儿子叫何晏，后来成了玄学家，当时年仅七岁，聪明过人，曹操一见便爱，想让他改姓曹。可何晏却在地上画了一个方块，坐在当中对曹操说："这是何氏的家，你不要进来。"把个曹操弄得乐不可支。他的这些性格，影响了他的子弟和近臣们。在他的身边，不仅猛将如云、谋士如林，而且有一个以他及其二子曹丕和曹植为首的文学家集团，开创了文学的黄金时代。他们在建安年代吟唱的慷慨激昂的诗篇，被后人誉为建安风骨，成了今后一切大诗人的营养。

蒿里行

郭嘉向曹操建议说："袁绍现在正忙于北击公孙瓒，明公可趁其远征，东取吕布。如果袁绍来犯，以吕布为援，将为害不小。"

荀彧也说："不先取吕布，则与袁绍作战之时，我军将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河北难以攻克。"

可曹操还是有顾虑，他说："我还担心袁绍联络关中的西北军，再联合羌胡，引诱蜀、汉，如此，则我兖、豫二州抗天下六分之五，如何是好？"

荀彧笑道说："关中将帅有十来个，不能统一，其中只有马腾、韩遂最强，他们看见关东争战，必各自拥众自保。若以天子名义抚以恩德，遣使连和，虽不能久安，起码也可等到明公统一了关东。尚书仆射钟繇有智谋，可以关西之事委之。"

本年二月，钟繇及谒者仆射裴茂持节至长安。钟繇去书马、韩，陈说祸福，二人立刻遣子入朝为质，侍卫天子。裴茂率关西诸将诛杀李傕，夷其三族。郭汜为其部将五习所杀。胡才为仇家刺杀。李乐病亡。

同月，袁术在寿春称帝，自称"仲家"，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

三月，诏将作大匠孔融持节至冀州，拜袁绍为大将军，授权兼督冀、青、幽、并四州军政大事。

五月，关东又发生了严重的蝗灾，人口骤减。曹操回想初平元年兴兵讨伐董卓以来，已历七载，其间沧海桑田，令人感慨。在一次欢宴酣醉之际，他选择了一支叫做《蒿里行》的凄凉悲怆的丧曲，重新填词，命人歌唱。座中闻之，无不怆然涕泣：

>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第九章
日蚀苍黄

馨香易销歇，繁华会枯槁。

怅望何所言，临风送怀抱。

——汉末无名氏

征讨袁术

建安二年（197）二月袁术称帝一事，提醒了曹操，在东击吕布之前，必须对南方的刘表和东南方的袁术作出进攻的态势，使他们的气焰有所收敛，不然，他们会乘机袭击许都。况且，袁术称帝，自己又标榜拥戴汉室，不征讨一下，是交待不过去的。

袁术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必须开展对徐州方面的外交工作。他有个老朋友叫陈珪，是孝灵皇帝朝廷尉陈球的侄儿，现任徐州沛相。袁术写信给他，又留用了他的一个儿子作为人质，希望他能甘心为自己所用。接着，袁术派使者韩胤去告知吕布自己称帝一事，并提出与吕布结成亲家。吕布便让女儿随韩胤前往袁家。可陈珪却回绝了袁术的要求，还回信指责老朋友图谋不轨。他是个有远见的人，马上去找吕布。

“曹公奉迎天子，辅赞国政，将军应与其协同策谋，共成大计。今却与袁公路结婚姻之好，必受不义之名，将有累卵之危啊！”

吕布一听，立即派出快骑，一直追至深夜，讨回女儿，并将韩胤械送许都，以谋逆罪枭首于市。

陈珪又向吕布提出由自己的儿子陈登去进见曹操，吕布不肯。这时，曹操为征袁术，反而又要先稳住吕布，他写了一封亲笔信，对吕布深加安慰，又让天子拜吕布为左将军。吕布这才让陈登带着回信和谢表去了许都，他关照陈登，让曹操正式承认自己是徐州牧。

陈登的话正中曹操下怀，他说吕布勇而无谋，轻于去就，宜早图之。曹操说："吕布狼子野心，难以久养，非卿不能究其情伪。"他即刻拜陈登为广陵太守。临别之际，他握着陈登的手："东方之事，就托付卿了。"

吕布听了陈登的汇报，气得拔剑斩了几案，他问陈登为什么没有弄个徐州牧回来，反而为自己捞了个大官？陈登不慌不忙地说："在下见到曹公，对他说：'养吕将军譬如养虎，要给他吃饱肉，不然就会咬人的。'可曹公说：'不对，譬如养鹰，饿着反为所用，吃饱了反而会飞走。'"吕布听了，反而得意起来了。

袁术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派出部将张勋、乔蕤与韩暹、杨奉步骑数万，合击下邳。吕布仅有步兵三千，骑兵四百，心里发毛。陈珪说："你何不离间他们？"

吕布写信给韩、杨二人说："我杀董卓，将军亲送大驾回都，俱立功名，为何与袁公路一起谋反？不如与我合力，共击袁公路。"

就这样，吕、韩、杨三军将张、乔二军一直赶到距寿春二百里的钟离，吕布让部下大肆抢掠了一阵，张贴了许多嘲笑袁术的布告，然后渡淮北还。刚刚渡河，袁术亲率大军赶到，吕布让士兵隔着淮河对袁天子大声地说了些下流话。

曹操又想到正在经营江东的孙策，他让议郎王浦携诏书去江东，拜孙策为骑都尉、袭爵乌程侯，领会稽太守，命他与吕布及吴郡太守陈瑀共讨袁术。谁知孙策嫌官太小，说一定要拜个将军，王议郎只好先让他借明汉将军之号行事。

一切安排妥当，九月，曹操亲征袁术。阵斩乔蕤，袁术大败，渡

淮而走。

排除异己

回师许都后，曹操忙里偷闲干了一件排除异己的事。他借口太尉杨彪是袁术的姐夫，让司法部门指控杨彪欲图废立，大逆不道，拘捕审讯。他把矛头对着世代公卿的杨彪，意在一举两得：其一，曹操对世家大族又拉又打，他需要他们的家财和势力的支援，对荀氏等大族就采取了拉拢的手段；又担心他们看不起自己的出身，因而又必须削弱他们。杨氏是有名的高门，搞垮他可以杀一儆百。其二，天子都许以来，自己在外南征北讨，而天子周围总有一班汉室旧臣图谋收权，甚至与袁绍、袁术等人暗中往来，自己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就不得不稍稍学习一下董卓，让汉室的天子近臣俯首帖耳。他在天子身边安插了侍臣，又笼络了不少旧臣。现在，他还要借惩治杨彪，向汉室示威。

孔融听说，来了气。他见到曹操，说杨彪四世公卿，海内所瞻。《周书》里面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袁氏与杨氏的关系呢？曹操说这是国家的意见。孔融回答：如果周成王杀了召公，周公能说不知道吗？孔融以年幼的天子比年幼的成王，而分别以曹操和杨彪比辅弼重臣周公与召公。

曹操对孔融也有气，这个人是自己在蔡邕家里相识的老朋友，但任气使性，仗着才气足，经常阴阳怪气地戏弄自己。一次曹操见粮食紧张，下令禁酒，孔融竟写信说："天有酒旗之星，地有酒泉之郡，人有爱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钟，无以成圣。况且桀纣以好色亡国，为何您不下令禁绝婚姻呢？"其实孔融知道，曹操最喜欢的正是酒色。曹操内心的愠怒，被御史大夫郗虑揣摩到了，便弹劾孔融，使之免官在家。可孔融仍是宾朋满座，欢宴达旦。他对大家说："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我无忧矣！"曹操想想算了，又把太中大夫这个闲职给了孔融。今天见他又为杨彪说情，还那样引经据典，令人生厌。

他不回话。孔融急了：“天下人指望明公辅弼汉室，至于太平，可明公却横杀无辜，海内失望，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当挂衣而去，不再上朝！”说完，拂袖而去。

孔融如此，荀彧也着急了，他和孔融一起去找司法官满宠，命他审问时不要用刑。满宠照样用了刑，孔融、荀彧闻讯大怒。可满宠向曹操汇报案情时却说：“杨彪受了刑都没有招供出什么来，这样的人名闻海内，没有确切的罪名，是不可以判决的。明公如此做，大失民望，窃为明公感到可惜。”孔、荀二人这才佩服满宠的既忠于职守，又主持公道的人品。

曹操的目的还是达到了，杨彪知道汉室衰微，政在曹氏，自己的儿子杨修又在曹操的办公室里做事，便知趣地声称腿脚萎缩，闭门不出。

可是，汉室旧臣与曹操的矛盾却加深了，更大的密谋在积极地筹划之中。

兵不厌诈

十一月，曹操进击刘表，他选择张绣作为打击对象，公私怨仇兼而报之。曹军拔阳湖，下舞阴，生擒刘表大将邓济。避乱荆州的颍川名士杜袭、赵俨、繁钦投奔曹操。

建安三年（195）正月，曹军还许都。得知韩暹、杨奉寇掠徐、扬之间，杨奉又劝刘备共击吕布，被刘备在酒宴之中斩杀；韩暹出逃并州，被杼秋县令张宣所杀。至此，董卓缔造的西北军解体。

三月，曹操又征张绣。荀攸说：“张绣与刘表相恃为强。但张绣以游军仰食于刘表，刘表又不可能养虎为患，他们势必乖离。缓军以待，可致其乱；急而攻之，其势必相救。”曹操最恨张绣，就是不听，把张绣围在穰城。

可是袁绍又捣了曹操的蛋。他早就命曹操迁都甄城，曹操不答应。他的谋士田丰劝他袭击许都，抢走天子。五月，曹操赶忙撤军回救。贾诩让张绣勿追，张绣不从。

曹操在给荀彧的军事通报中说：“我军到了安众，一定能打败张绣。”等到了安众，曹军又遇上刘表援兵的阻击。曹操命军士夜间于险要处凿开一条山路，并做出从此逃走的假象。刘表和张绣的军队循迹而追，中了曹军的埋伏，大败而回。此刻，贾诩却对张绣说：“快收残兵，继续追击，必能获胜。”张绣说：“不听您的话，已招致失败，为何又让我追击？”贾诩回道：“兵势有变，只须追击便是。”

张绣的残兵又追了上去，曹操的主力已走，留下的阻击部队果然被张绣重创，得胜而归。

事后，双方都在总结经验。荀彧问曹操为何当初认为到了安众能够取胜？曹操说：“我知道刘表要阻击我军，前后夹击，这是将我军置之死地。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我知道必胜。”张绣也问贾诩：“为何我以精兵追之反败，以败兵追之反胜？”贾诩说：“将军虽勇，但非曹公的对手。曹公攻将军，没有失策，忽然退兵，定是朝中政局有了变故，因此曹公必定安排断后事宜，故追之必败。曹公已破将军，必轻军速进，所留断后的将领又非将军的敌手，故虽用败兵，追之必胜。”张绣对贾诩大为佩服。

此时，吕布又被袁术说服，遣部将攻破刘备，曹操派夏侯惇接应刘备，又被打败。刘备单骑走脱。

绞杀吕布

曹操下决心解决吕布这个心腹之患。有的将领认为：东击吕布，刘表、袁术必在后袭击。荀攸却说：“刘表、张绣新败，必不敢动。吕布骁勇，倚仗袁术，纵横江、淮，豪杰必应。可趁其新叛朝廷，众心未一，一举击破。”

半路上，曹军遇上刘备，刘备告知：泰山一带的地方武装首领臧霸、孙观、吴敦、尹礼、昌豨等人都依附了吕布。曹军开至彭城。

陈宫劝吕布趁曹军远来疲惫，主动从下邳出击。吕布说：“不如等他们来，我们把他们憋死在泗水之中。”

吕布一句话，失去了彭城。十月，曹军拔彭城，屠城。陈登率所部作先锋，进围下邳。吕布开城出战，均被击回。困苦之中，他接到曹操的劝降书，可陈宫阻止了他，对他说：“将军率步骑出屯下邳城外，我率兵坚守城内，内外呼应。曹军攻将军，则我击其背；若攻下邳，将军营救于外。不过数月，曹军粮尽，击之可破。”吕布让高顺与陈宫守城，自率骑兵出城切断曹军的粮道。可是他的太太提醒他说：“陈宫与高顺素来不和，将军一出，他们如有变故，将军何以安身？曹操待陈宫如赤子，陈宫尚且舍而归我，今将军待陈宫又不如曹操，却指望委城池、妻子于他，一旦有变，我还能做你的老婆吗？”

吕布吓得不敢出城，只得又派人求救于袁术。袁术说：“吕布不送女儿来，理当失败，为何还来求救？”使者说：“如果吕布败了，明公也就完了。”袁术只好派了些兵马虚张声势。吕布急了，不就是没送女儿吗？本将军亲自给你这个老贼送去！夜里，吕布跨上赤兔马，将女儿用绢帛捆在马上，扬鞭而出。可曹军雨点般的箭矢将吕布射回。

倒是吕布的朋友张杨讲义气，主动出兵东市，声援吕布。十一月，张杨被其部将杨丑袭杀，部将眭固又杀杨丑，率众北归袁绍。张杨这个人性情懦弱，平时部将们谋反事泄，张杨不仅不追究，反而对他们哭。

下邳很难攻打，曹操让工兵在城外挖了一圈深堑。士兵疲惫，都想回家。荀攸、郭嘉对大家解释说吕布虽勇，但锐气已尽，不可让他喘气。陈宫虽有智谋，但脑子动得慢。趁着吕布没力气，陈宫的计策还没想出来，加紧进攻，一定能获大胜。

一个月之后，吕布架不住了，竟跑到城墙上对曹军喊道：“你们不要困我，我自当去向明公自首！”陈宫马上把他从城墙上拖下

来：“逆贼曹操，是什么明公？今日降之，如卵击石，岂能保全？”

刘备的司马关羽对曹操说：“我愿率人做攻城先锋，但请求明公在城破之时，将一个妇人赐给在下为妻。”

“哦？”曹操又来了兴趣。“云长（关羽字），此妇何方人氏？”

关羽回道：“此乃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前妻。秦宜禄为吕布所遣，前往袁术处，袁氏妻之以宗室之女。前妻杜氏遂留下邳。”

“好的，好的。”曹操若有所思地应道。

吕布像头困兽，脾气大得让人害怕。他下令全城禁酒，不得歌唱欢乐。可这天部将侯成竟然敢送酒肉给吕布，说是一匹好马失而复得，被吕布臭骂一通。

十一月，侯成与部将宋宪、魏续等人拘捕了陈宫、高顺，率众出降。城破，吕布退至城南白门楼，曹军进围楼下。吕布对手下说：“把我的头拿了去请赏吧！”左右说：“我们不能做这种事，将军，我们还是下去投降吧！”

曹操得意地处置俘虏，刘备等人也在场。当吕布被绑上前来时，他竟对曹操说：“天下已定了！”曹操装着没听明白：“你说什么？”

“明公所患，不过是吕布罢了。今天，我服了明公。如让我率骑兵，明公率步兵，平定天下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吕布大言不惭之后，又对刘备说话：“玄德，你是座上客，我是阶下囚，绳子绑得这么紧，为何一言不发？”

曹操大笑：“缚虎不得不紧啊！”他挥手示意兵士松绑。刘备终于开口说话了：“明公，你难道忘了吕布是怎样侍奉丁原和董卓的吗？”

曹操一听，对刘备点了点头，又对吕布冷笑了起来。

吕布见大势已去，对刘备破口大骂：“大耳小儿！无信无义！”

曹操又让带陈宫。

“公台（陈宫字），你平生自认为多智多谋，今天是怎么了？”

陈宫指着吕布："此人不听我言，故至于此。"

"卿的老母，如何处置？"

"我听说以孝治天下的人，不加害别人的双亲。老母是死是活，在于明公，不在我陈宫。"

"那么，卿的妻小如何处置？"

"我听说施仁政于天下的人，不绝人家的香火。妻小是死是活，也在于明公，不在我陈宫。"

曹操无言以对。陈宫说："那就请杀我吧。"说完，陈宫往刑场走去。曹操望着他的背影，想起与陈宫共同开创兖州的往事，心里一阵发酸，眼泪流了下来。他一挥手，下令将陈宫、吕布、高顺绞死，传首许都。又命将陈宫老母、妻小接至许都厚养终身。

吕布部将张辽以及臧霸、吴敦、尹礼、孙观、昌稀皆降。

且说关云长一进城就直奔秦宜禄家，但不见了杜氏。家僮说来了一群兵将她带走了。关羽恨得咬牙切齿，一定是曹操先下了手。

曹操又得了一个美妇人。秦宜禄过些天也来归降，曹操命他为铚长。杜氏带来一个小男孩，名朗，小名阿苏，一副聪颖之相。曹操十分欢喜，常常在宴会上带他坐在身边，还对宾客们说："世间有谁像我这样喜爱假子的吗？"

逐鹿中原

徐州战役结束之后，孙策派部将正义校尉张纮送来一些南方的土特产。曹操上表天子，拜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又将自己的侄女许配给孙策的弟弟孙匡，并为儿子曹彰娶了孙策堂兄孙贲之女。辟孙策之弟孙权、孙翊为官，拜张纮为侍御史，留都供职。派议郎刘琬前去江东宣布诏书，并征召原会稽太守王朗回朝。

王朗字景兴，东海大族，陶廉所举茂才，经学家，天子在长安时拜为会稽太守。孙策经略江东，他的功曹、汉末最著名的《易》学专家虞翻劝他逃避，他不听，坚守城池却被孙策打得大败，只得投降孙策。回朝后拜谏议大夫，参司空事，与钟繇共同主持司法工作。他的儿子王肃后来成了大经学家，总结了大汉的经学成就，开创了下一个朝代的新经学体系。

刘琬到了江东，见到孙策的几个兄弟。刘琬精通相面，他特别看中了孙策的二弟、十五岁的孙权（字仲谋），当时任阳羡长，是个孝廉。回到许都时，他对曹操说："孙氏兄弟虽然皆是英雄，但命禄不长，只有孙权，方颐大口，目有精光，形貌奇伟，骨体不凡，有大贵长寿之相，明公不妨拭目以待。"曹操平素不太相信这些东西，笑笑作罢。

曹操攻拔了徐州，袁绍也消灭了公孙瓒。年底，袁绍对公孙瓒的战事全面展开。公孙瓒连吃败仗，遣子公孙续请救于黑山黄巾。次年春天，黑山黄巾统帅张燕与公孙续率兵十万，分三路援救易城。兵马未至，公孙瓒让人送书给儿子，让他率五千铁骑埋伏于山谷，举火为号，自将兵马出击袁绍。可是书信被袁绍截获，袁军如期举火，公孙瓒以为救兵已到，率众冲出城外。袁军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公孙瓒退入易京楼自守不出。袁绍命兵士挖地道穿过楼下，架上木柴，点火焚烧。

公孙瓒缢杀妻子、姐妹、子女，引火自焚。部将田楷战死，公孙续逃入塞外，被屠各胡袭杀。

刘虞的部将鲜于辅现为渔阳太守，他听从了当地名士田豫的劝告，率众归顺许都，以奉王命。诏拜建忠将军，都督幽州六郡。

此时，乌桓王丘力居已死，儿子楼班年纪太小，部落里拥立其侄蹋顿为王，统摄上谷部落酋长难楼、辽东部落酋长苏仆延、右北平部落酋长乌延等。由于袁绍攻公孙瓒时，上述乌桓各部都出了力气，因而袁绍以天子的名义颁赐他们单于印绶，派阎柔出塞宣慰。其后，难楼、苏仆延二部奉楼班为单于，以蹋顿为王。如此，乌桓也归顺了袁绍。

袁绍拥有了幽、并、冀、青四州，按照他的任人唯亲原则，以长子袁谭出镇青州刺史，次子袁熙出镇幽州刺史，外甥高干出镇并州刺史，而以幼子袁尚为冀州刺史，镇邺，作为他未来的继承者，这一点使得长子袁谭十分不满，当时袁绍的谋臣沮授就指出："必为祸始。"可袁绍不听，他太喜欢小儿子了，原因仅仅是长得好看。

袁绍心满意足，他作出试探，看看舆论是否允许自己称帝。主簿耿包看出他的心事，建议他应天顺人，称尊号。袁绍将耿包的建议下达部属们决断，大家一致认为耿包之言妖妄，应该诛杀。袁绍只得顺从众议，杀耿包以自解。

不能称帝，就只能劫持汉帝，大汉帝国的招牌简直有如神灵。袁绍不得不加紧备战，与老朋友曹操决一雌雄了。

建安四年（199）的上半年，袁术困顿不堪，资源竭尽，部将叛变，士卒走散。袁术走投无路，想到了他家婢女生的兄弟袁绍。他让人将自己的帝号送归袁绍，写了一封拍马屁的书信，说："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无权，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代末年七国分势无异，强者终究兼并天下。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人户百万，论强则无以比大，论德则无以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谨归大命，君其兴之！"

袁谭从青州迎接叔父，打算自下邳通过，遭到曹操部将朱灵和刘备的邀击，袁术只得退回寿春。六月，袁术出寿春，行八十里至江亭，又为部将雷薄所拒。三天之后，袁术问厨子还有多少粮食？厨子说只有麦屑三十斛。袁术又急又热，脸色泛白，要喝蜜水，厨子说没有蜂蜜了。袁术瘫坐床上，叹息不止。忽然，他暴跳而起，大声喊道："袁术竟至于此？"接着便大口吐血，气绝身亡。其弟袁胤扶着灵柩，带着袁术妻子投奔皖城的庐江太守刘勋。故广陵太守徐廖将传国玉玺献至许都。

此后孙策克皖城，为袁术发丧安葬，抚恤袁术妻小，拜其子袁耀为郎中，受到舆论的称誉。

从去年开始，荆州南部的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在长沙太守张羡

的率领下，反叛刘表，与曹操联络。刘表忙于讨伐，无暇北顾。

命运把公平交给了曹操，他没有了南方的后患，也开始备战，与袁绍逐鹿中原。

袁绍点起步兵十万、骑兵一万，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许攸为参谋，颜良、文丑为将军，沮授为监军，打算直插曹操的腹地许都。在命令下达之前，他的谋士集团内部，对如何布置战争，产生了分歧。以沮授和田丰为一派，主张打持久战，以政治上的胜利为目标；以郭图和审配为另一派，主张打闪电战，以战术上的胜利为目标。他们在主子面前各陈己见。

沮授说："近年讨公孙瓒，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蓄。应该务农息民，先遣使节献捷天子，如不能通，则奏曹操阻隔王路，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建造战船器械，分遣精骑抄其边境，使其不安，而我则以静制动，如此三年，可唾手而得。"

郭图说："兵法云：十倍于敌则围之，五倍于敌则攻之，与敌相等则战之。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强众以伐曹操，易如反手，何必如此多虑！"

沮授说："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义者无敌，骄者先灭。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举师南下，已违大义。且战争胜负在于策略，不在强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练，非公孙瓒之辈可以比拟。今弃万安之术而兴无名之师，窃为明公担忧！"

审配说："武王伐纣，不为不义；何况是兵加曹操，怎能谓之不义？且以明公今日之强，将士思奋，如不及时完成大业，真所谓'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这就是越国所以称霸，吴国所以灭亡的道理。监军之计在于把稳，却不能察知时机与变化。"

袁绍拍了板，用郭、审之策。

沮授出了帐，郭图又对袁绍说："明公，沮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如果专权，将何以制之？《黄石公兵法》曰：'臣与主同则亡'。"

袁绍经过考虑，将一个监军改为三个监军，由沮授、郭图、淳于

琼分掌其权。临行之前，骑都尉崔琰说：“天子在许，民望所归，不可攻打。”袁绍连听都不听。崔琰的家族是清河大姓，本人又是大经学家郑玄的学生，风度威仪俱佳。

袁军攻打许都的消息传来，许都一片惊恐。曹操成天在给大家打气。大臣之中孔融的胆最小，他去找荀彧，说了一通田丰、许攸是第一流的谋士，审配、逢纪是第一流的忠臣，颜良、文丑是第一流的勇将，袁绍地广众多，如何是好等等担忧。荀彧一一为他分析：“袁绍众多而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这几个人之间又不相容。审、逢二人拥护幼子袁尚，田丰与辛评拥护长子袁谭，争权之势，昭然可见。至于颜良、文丑，不过两个匹夫，可一战而擒。老兄，你不害怕了吧？”孔融快快而去。

八月，曹操主动北渡黄河，驻扎在黎阳，摆出进攻的态势。同时，派遣在泰山地区有威信的军事首领臧霸率精骑进入青州，以遏制青州刺史袁谭从东面的进攻。在布置了第一道防线之后，曹操留部将于禁屯守黄河北岸，自将兵马退回许都。半路上，曹操又把兵马分出大半，屯守黄河以南、汴水南岸的重要渡口——官渡，作为第二道防线。

曹操还是放心不下关西的地方官吏、将士以及地方自治势力，他担心他们会与袁绍联盟。因为凉州刺史韦端近来派从事杨阜造访了许都，曹操看出这是来探测情况，好选择何去何从。他派遣侍御史卫凯持节镇抚关西。卫凯到任后，立即写信给荀彧，说近年来一些流亡在荆州的关西民众陆续回乡，由于没有了土地和家业，关西诸将和豪强把他们收为自己的部曲。地方政府由于财政紧张，不能与他们争夺民众。如此，又会形成新的割据势力。他建议政府将关西的生活必需品——盐控制起来，实行专卖；再用卖盐的钱收购耕牛，廉价租借或出售给流民，鼓励他们开荒耕田，民众闻之，必趋之而来；再留司隶校尉镇治关西，委以重权。如此，则豪强与诸将的势力日削，官府和民众的势力日盛，是强本弱敌的长远之计。荀彧把情况汇报曹操，曹操十分佩服卫凯的见解，立即在关西地区设置谒者仆射监盐官，以司隶校尉驻弘农办公。

袁绍也在开辟第二战场，他仍寄希望于南方的刘表。刘表配合他的行动，可就是不出兵。一则他的南方有战事，抽不开身；二则他为自保荆州而采取的中立政策十分愚蠢。用他自己的话说，对许都方面不失职责，对冀州方面不背盟主，希望双方都不与自己为难。可用他的从事中郎韩嵩的话说就是，拥甲十万，坐观成败，袁绍求援不肯相助，见曹操之强又不能归，双方都积怨于荆州，何以中立？刘表听了韩嵩的话，也有些狐疑，便让韩嵩去许都侦察，以便及时作出选择。韩嵩对他说："我与主公是君臣关系，主公有一定的主张，我才可以去许都贯彻。如果没有，万一天子给我一个职位，我只得做天子之臣，不能再给主公卖命了，请主公三思。"韩嵩到了许都，果然被拜为侍中、零陵太守。回到荆州后，刘表气得要杀了韩嵩，幸亏他的太太蔡氏说了情。

袁绍又去找张绣，还专门写了信给贾诩。使者来到的时候，贾诩忽然说："归谢袁本初，他自家兄弟都不能相容。何以能容天下的国士？"张绣倒吃了一惊，对贾诩悄悄地说："这下我靠谁呢？"

"不如从曹公！"张绣听了更是吃惊。

贾诩解释道："曹公挟天子以令天下，必定得胜，从之一也；袁绍强大，我以少从多，必不以我为重；曹公兵少，得我必喜，从之二也；有霸王之志的人，一定会放下私怨以示信义于天下，从之三也。请将军不要迟疑！"

十一月，张绣率众归降曹操。曹操拉着张绣的手入了酒席，说我与将军已是亲戚，就亲上加亲吧，听说将军有一女，请下嫁犬子曹均如何？张绣心里叹息一声，难怪你曹孟德会胡来，原来你不知道伦理，你纳我叔母为妾，又与我做亲家，这辈分怎么算？罢罢，张绣再也不生曹操的气了。酒后，曹操在帐外又悄悄地拉住贾诩的手："使我信义重于天下者，子也！"次日诏拜张绣为扬武将军，贾诩为执金吾，封都亭侯。

年底，曹操又去了官渡。

煮酒论英雄

袁绍的计划落了空，可曹操的后院也起了火。

一天，曹操的侍卫徐他等人进入大帐，直趋曹操的卧床。忽然，他们发现许褚在曹操身边侍立，神色一下子慌张起来。许褚抽刀便刺，杀了徐他。

曹操让人好好审讯其他几个侍卫。

建安五年（200）正月，犯人开口招供，一个更大的密谋泄露了。正月九日壬子，曹操火速赶回了许都，捕杀了车骑将军董承、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服，灭其三族。随后，让甲士带剑进入后宫，跪奏天子，声称董承之女董贵人与父谋反，请天子允许甲士带出诛杀。天子气得浑身发抖，曹操终于展示了狰狞面目。天子说："董贵人身上有孕，不可出。"甲士出禀曹操，曹操说再不允许就动手。过了许久，甲士将董贵人的人头带出。

伏皇后目睹这一切，写了一封书信，将这天的残暴场面仔细描述，交给父亲伏完，让他多为女儿和天子着想。伏完不敢吱声，只将书信给几个密友看了。

司法官员报告说，董承等密谋刺杀主公时，矫用天子的名义写了一份诏书，并缝在衣带里，说是受天子的密诏，让大臣们诛杀曹操。看到这份密诏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刘备。

曹操恍然大悟，他想起了一件事来。

在刘备与朱灵东击袁术前，曹操请刘备喝酒。曹操醉醺醺地对刘备说："方今天下英雄，只有使君和我曹操罢了！袁本初之徒，不值一提！"话音刚落，天上一响炸雷，地下一声叮铛，刘备手上的汤匙跌落。刘备说："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的确如此！"曹操当时心想，这人恐怕也是个熊包。现在看来，刘备心里有鬼。

不出曹操所料，董承被诛之后，刘备马上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命关羽守下邳，自守小沛，冒豨也投了刘备，合众数万与袁绍联兵。曹操十分着急，派司空长史刘岱、中郎将王忠出击徐州。刘备把这两个将军击走，还告诫他们："像你们这号的，就是来上一百个，也不能拿我怎样。曹公自来，也未可知！"

于是，曹公只得自来了。

田丰听说，连忙劝袁绍出兵接应刘备，在曹军与刘备交战时，袭击曹军的后路。袁绍说小儿子生病，没有空。田丰气得用手杖捣着地：“大事去矣！”

刘备以为，曹操要对付袁绍，无暇东顾，所以他敢对刘岱说大话。这时侦察兵来报，说曹操亲率大军来了，他还不相信，便带上十来个骑兵前往巡视。只见尘土飞扬处，曹操的麾盖飘然而至。刘备才觉得不妙，拍马便走，连军队都不要了。

曹军攻拔下邳，擒获关羽，俘虏了刘备的妻子，回军击破昌豨，速回官渡。刘备逃奔青州，由袁谭派兵送至冀州。袁绍出邺城二百里迎接。

刘备和张飞逃跑之时，顺带捎上了秦宜禄。秦宜禄有点犹豫，张飞说：“人家抢了你的老婆，你还跟着起什么劲？”走了一半，秦宜禄又后悔了，便往回溜。张飞赶上去刺了一矛，送他回了老家。

田丰又劝袁绍：“刘备既破，曹操后方无忧，许都不再空虚。且曹操善于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不可轻视。不如持久而待。将军可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简练奇兵，乘虚迭出，袭扰河南。曹操救右则击左，救左则击右，使之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不到三年，坐而可克。今弃大计而欲决胜负于一战，如不如愿，后悔不及！”袁绍不听。正如荀彧所说，田丰刚而犯上，他不死心，又加重口气劝谏袁绍。袁绍光了火，以临战沮众之罪拘捕田丰。

袁绍让陈琳写了一篇长长的檄文，历数曹操的罪状，颁行天下。曹操看了，对陈琳的文采大加称赏，拿给他两个爱好文学的儿子看，让他俩好好揣摩。曹操只对其中的一句话十分生气，那是一句骂了他祖宗三代的话：“司空曹操，祖父腾，故中常侍，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匄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

建安五年（200）二月，袁绍兵进黎阳。沮授临行时，把家财全

部散与宗族子弟，对弟弟沮宗说：“此行必败，身不可保了。”

袁绍先让大将颜良攻击驻守在白马的东郡太守刘延，沮授说颜良性子太急，不可独当一面。袁绍又不听。四月，曹操听从荀攸的计策，率军至延津之后，不奔白马，从西侧向袁绍的后方迂回。趁袁绍调动大军西进之际，命关羽、张辽以轻骑回袭白马。颜良仓猝应战，被关羽临阵刺杀，斩首而还。袁绍一听，渡河追击，沮授认为不可如此依循敌军，必须先屯延津，再进兵官渡，稳扎稳打。袁绍心急，不听此计。沮授只得向主子辞职。袁绍既不同意辞职，又不重用沮授，将沮授所监人马归并郭图。

在延津以南的一个大坡之下，曹操与袁绍相遇。曹操的兵士报称看到了五六百个敌骑。过了一会儿，又报：骑兵越来越多，步兵不可胜数。曹操不耐烦地说：“不要报了！”他下令兵士解鞍放马。将士们都劝他回营坚守并且必须考虑到从白马拉来的辎重刚到阵前，尚未运回大营。荀攸笑了：“这是诱敌之计！”曹操也神色悠闲地笑了。

冲在最前面的是刘备和大将文丑。五六千敌骑已快至眼前，诸将催促曹操上马，曹操仍示意不要动。敌骑又多了许多，其中一部分扑向了曹军的辎重。曹操大喊一声：“上马！”率六百骑兵冲人敌阵，纵横突杀，敌军一片大乱。乱中，袁绍的爱将文丑阵亡，刘备早就逃得无踪无影，天黑了才回到营中。袁绍懊丧到了极点。

次日，曹操对张辽说：“你去看看，关云长有没有走。”

张辽知道，曹操一直想收买关羽，还让自己以私交劝关羽归顺曹操，可关羽都以受刘备之恩，誓共生死作为推辞，并告诉自己：他知道曹公的一片厚意，一定要立个大功来报答他。果然，张辽带回来一封关羽的告别信以及曹操每次赏赐给他的东西，说是去袁军投刘备去了。左右大怒，纷纷要求追杀关羽，曹操拦住他们：“孤知道云长斩杀颜良之后，即将弃孤而去。忠于主人，此乃义士，不要追了。”

延津之战结束后，曹操又退守官渡。他明白自己兵力少，不能将战线拉长。坚守官渡，一则可以集中兵力，二则可以诱敌深入，拉长敌军的补给线，伺隙攻击。

此时，在幽州镇抚乌桓的阎柔遣使拜见曹操，表示归顺。曹操拜他为乌桓校尉。鲜于辅亲自来到官渡拜见曹操，拜为右度辽将军，命他还镇幽州。这样，曹操使袁绍腹背受敌。

曹操还听从了朗陵长赵俨的建议，在急需军资之际，缓征绵绢，以安民心。

官渡之战

袁绍又收罗了汝南地区的黄巾刘辟部，让刘备与之配合，率军抄掠许都西侧的颍川和南部的汝南，在曹军背后开辟战场。刘备刚至，即被严阵以待的议郎督骑、曹操的堂弟曹仁击溃。刘备回袁绍大营，看看形势不妙，提出请求：让他南下劝说刘表袭击曹军。袁绍答应了，并让他经过汝南，与黄巾统帅龚都联络。刘备到达汝南，与龚都合兵数千，袭杀曹军将领蔡杨，展开了游击战。不久，袁绍又派出部将韩荀抄断许都西侧道路，又被曹仁打得大败。袁绍侵扰曹军后方的战略企图未能得逞。

七月，袁绍大军南进阳武，与官渡隔汴水相望。八月，袁军又向前逼近，依沙丘屯下大营，东西长达几十里，气势雄壮。

曹操也将大营扎在沙丘地带，与袁绍相拒。

九月一日庚午，两军阵前天昏地暗，发生了日全食。双方士兵的心理都异常紧张。

当日光射出刺眼的光芒，曹操麾动大军杀向袁绍的大营。损失一批士兵之后，曹操只得退守营寨，坚壁不出。于是轮到袁绍来打他了。袁绍在曹军的营外堆了土山，构筑了木楼，在上面把箭矢像下雨一样地射向曹营，打得曹军顶着盾牌趴在地上。曹操下令用抛石机击折袁军的木楼。袁绍天上不行，又来地下，夜里挖地道攻击曹营。曹操命工兵在营前开了一条又宽又深的横沟，袁绍的地道断了头。打了半个月，曹操的军粮紧张了起来，士卒疲惫不堪，甚至有些百姓也叛

归袁绍。曹操一见到运粮的军士，就抚着他们的背说："劳驾诸位，再辛苦十五天，看我为你们破了袁绍，就不再劳累诸位了。"过了些时，曹操也吃不消了，写信给他的总参谋长荀彧，提出退守许都。荀彧回信说成败在此一举，主公你可不能让我们难堪。曹操只得硬起头皮，去堵那像蚂蚁一般多的袁军。

十月的一天，曹操的机会终于来了。

晚上，军士来报，说袁绍的谋士许攸来降，曹操一跃而起，不穿外衣，光着脚出来，拍着巴掌大笑着说："子卿远来，我的大事成了！"许攸字子远，曹操一时不知用什么爱称叫他，干脆叫起子卿来了。

许攸来降，是因为与袁绍为了曹操的事闹翻了。他建议袁绍趁曹操全力拒敌、无法分兵之际，派出精锐，奇袭许都。袁绍说："我只要曹操，不要天子。"这时，邺城家中又传来了坏消息，说族中有人犯法，被审配收系。许攸一气之下，夜奔曹营。

许攸和曹操、袁绍都是少年时的朋友，他个性又傲慢，所以也不和曹操客气，开门见山地问曹操："你的军中还有多少粮食？"

曹操说："尚可支撑一年。"

"不对，重说！"

"半年。"

"足下小名阿瞒，果然狡诈如初，如不想破袁氏，就不必再说了。"

曹操这才打消疑虑，有些尴尬地说："刚才说的是笑话，其实只够一个月了。子卿有何妙计？"

许攸慢吞吞地说："袁氏的万辆粮车，已将军粮运至乌巢，距其营北四十里，大将淳于琼守之，防备不严。如以轻兵袭击，烧其粮草，不出三日，袁氏必败！"

曹操大喜，留曹洪、荀攸守营，亲率步骑五千，打起袁军旗帜，

人衔枚，马缚口，携带柴草，在一个夜里从小路进袭乌巢。路上还遇到袁军的巡逻队，问他们干什么，曹军答道：“袁公怕曹军抄掠后方，特派我们增援防守。”

不一会儿，乌巢的火光照彻天空，淳于琼的大营乱成一团，无法作战。天亮之后，淳于琼看曹操就带了五千人，而自己手下有一万多，便将兵士列于营外进攻曹操，被曹操打得退入营寨，曹操麾军攻之。

这边的袁绍不但不急，反而也以为机会来了，他对袁谭说：“曹操打淳于琼，我就拔了他的大营，让他无路可归！”他下令张郃、高览速攻曹营。张郃说：“不可，曹操率精兵袭击，必能攻破淳于琼。淳于琼一败，我等大势已去。不如先救乌巢。”这时，郭图却坚持打曹营。张郃恨恨地说：“曹操如此做，一定会先让大本营防守坚固，如果攻之不拔，淳于琼再败走，我等全部要做俘虏！”

正在攻打淳于琼的曹操，听士兵报告袁绍的骑兵已经接近，气得他大声呵叱：“贼兵到我背后再报告！”他不顾一切地猛攻淳于琼。

当袁绍的骑兵到了面前时，乌巢的粮草已经烧光，曹操让兵士将淳于琼的人头和袁军士兵的鼻子、牛马的唇舌扔向敌军。袁军大惧而归。郭图眼见交待不了，对袁绍汇报说：“张郃那边太慢，以致兵败。”

正在攻打曹操大营的张郃得知之后，一怒之下，与高览烧了战车向曹洪投降。曹洪不敢相信这一切，迟疑不决，怕是有诈。荀攸果断地让人开了营门。

梦兆龙蛇

据说，乌巢被袭的前一天夜里，在元城县病危之中的大经学家郑玄做了一个奇异的梦。他梦见孔子对他说：“起来，起来，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白天，他一直在合计这个梦。辰、巳是十二地

支，也是汉人等分天体为十二个区域的名称。岁为岁星，按占星术的理论，岁星在其中哪个区域，哪个区域就会有大事发生。可郑玄想：今年、明年，岁星都不在这两个区域，孔夫子托这个梦是何意思呢？哦，他恍然大悟：辰为龙，巳为蛇，龙蛇交替，意味着改朝换代。他已经七十四岁了，一生辛劳，无意仕途却遭受党锢，他将大汉的今古文两大派的经学成果都作了总结和融合，著述等身，桃李满园。年轻时他拜马融为师，马融只让他的学生教授之，可是不久他就成了马融最器重的弟子。三年后，当他学成回北海高密乡里之时，马融对学生们说："郑生今去，我的学说便传到了东方。"这一次，袁绍了为沽名钓誉，让袁潭逼迫郑玄随军。郑玄行至元城，病情加重，留住不进。他没有听到袁绍兵败的消息就故去了。郑玄的死，标志着大汉帝国开创的文教事业的终结。他的学生之中显赫于仕途者，一个叫郗虑，在曹操手下任御史大夫；一个叫崔琰，在袁绍手下任骑都尉。

乌巢的大火，使袁绍的大军如山崩海泻，袁绍和长子袁谭来不及戴头盔，率八百名骑兵仓皇渡河。曹操追之不及，尽获其帐中图书、珍宝和军中辎重，俘虏河北兵士七万多人。曹操一狠心，下令悉数坑杀。沮授被俘，曹操与他总结了这场战役的得失，赦罪厚待。后来沮授因挂念河北的家小，谋归冀州，曹操考虑到营中军机尽为所知，下令捕杀。在清点袁绍的文件时，曹操发现了一大摞许都大臣及将领与袁绍往来的书信。曹操把他们叫来："袁本初强大之时，连孤都不能自保，何况你们众人呢？"说完，他让人当着他们的面焚烧了信件。

曹操回军汝南，击破刘备、龚都。刘备投奔刘表。刘表待他为上宾，让他屯兵新野。

袁绍逃奔之际，冀州的一些城邑纷纷降曹，袁绍走入部将蒋义渠营中，蒋义渠避帐尊处，下令河北各州不要惊慌，河北稍定。

此时，关在牢里的田丰对恭喜他的人说："以袁绍的妒忌心理，打胜了，他会放了我；可打败了，他一定会杀了我的。"其实袁绍倒在后悔当初不听田别驾的话，可是田丰的政敌逢纪进了谗言，说田丰正在拍手大笑，袁绍这才下达死刑命令。于是真正拍手大笑的成了曹操，他听到消息后说："当初我一听田丰未随军而来，就知袁绍必

败。后来担心袁绍回邺城后，如听从田丰的计谋，最后的胜负就不可知了。现在，我高枕无忧了。”

审配的两个儿子都做了曹军的俘虏，于是袁绍听从郭图和辛评的建议，为防止他谋反，打算取消他的监军职务。可是审配的同盟逢纪说审配天性刚烈，不会做出那种事。袁绍同意了他的话。

就在官渡之战进行之际，江东的孙策大业未成身先去。

孙策这个人喜欢打猎，部下常劝他不要动辄轻装出猎，他不听。可这个习惯被他的仇家、故吴郡太守许贡家人探知，因为主人为孙策所杀，所以他们在孙策打猎的路上设了埋伏。孙策的马快，后面的随从跟不上，因而被三个刺客射中，其中一箭正中他的面颊。他和他的父亲孙坚下场一样。

临终之际，他召张昭和弟弟孙权（字仲谋）近前说话：“中国方乱，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视吾弟！”

他把印绶交给弟弟：“举江东之众，决战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你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你。保重吧，诸位爱卿！周公瑾将兵在外，恨不能见，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建安五年（200）四月四日，孙策逝去，年仅二十六岁。

孙权悲号不已，这时张昭上来扶起了他：“孝廉啊，这哪是你哭的时候！”他一挥手，让人给孙权换上礼服，拉上马，出巡军营，安抚众心。周瑜也率兵奔丧而回，与张昭誓辅新主。张昭上表朝廷，下移州郡，江东的将校文吏，州郡吏民委心服从，局势稳定。

官渡战后，曹操听说孙策遇刺，打算征讨江东。侍御史张纮说，乘人之丧，不合道义，如果打不了，又结冤家，不如安抚江东。于是曹操拜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以张纮为会稽东部尉。他原想让张纮去江东，引导孙权内附自己，可张纮这一去，犹如放虎归山。不过，曹操也将一个人征回朝廷，他就是故豫章太守华歆。孙策略地至鄱阳湖畔的豫章，华歆投降，孙策对他恩礼有加，可他仍日日思归。这不仅出于政治立场，还因为他是冀州平原人，过不惯南方的生活。那时的江南，尚属蛮荒之地。

不久，孙权又起用了鲁肃、吕蒙两个文臣武将，诛杀叛将，以割据一方为事业，江东日益开拓稳固。孙权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谋取鲁肃向他建议的荆州。

此时，荆州叛将张羡病死，解除了刘表的南方之忧。零陵、桂阳等地悉平。刘表见袁绍已败，也不打算尊奉许都朝廷了。他在荆州郊祀天地，用起天子仪仗，只是没有称帝罢了。

本年底，益州也发生了一件大事。

刘璋的父亲刘焉当年进入益州之际，与当地的豪强就有矛盾。后来关东、关西大乱，南阳、三辅等地的民众流人益州避难。刘焉将其中的精壮编成军队，相对于处在西部的益州，号称东州兵。东州兵瞧不起益州的土著，常常侵暴地方，刘璋性格宽柔暗弱，无有威重，对东州兵放任自由。于是州中大吏赵韪结合土著豪强，与荆州联络，反叛刘璋，围刘璋于成都。次年三月，东州兵平定叛乱。

另一个趁乱而起的是张鲁，他在汉中袭杀同僚张修，吞并其众。刘璋一怒之下，把张鲁的弟弟和那个以色情勾引自己父亲的巫婆一并杀了。从此，张鲁割据汉中。他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宗教政权。在这个自治区内，民众皆为教中的鬼卒，长官为祭酒。生病、犯法皆用自首、忏悔、祈祷、出资铺路修桥的方法解决。这里还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实行乌托邦思想的地区之一，有公费医疗，路边上有免费旅店和免费食堂。引得外地的流民纷至沓来。

攻克邺城

建安七年（202）正月，曹操率军北回，经过故乡谯县，祭祀了故太尉乔玄。然后，兵进官渡，谋攻冀州。

五月，袁绍吐血而亡。留下几个儿子哪是曹操的对手。

逢纪、审配立袁尚为冀州牧。袁谭大怒，自称车骑将军，率兵屯

黎阳，向弟弟索要兵马抵抗曹军。袁尚让逄纪带了些老弱残兵来见袁谭，被袁谭诛杀。九月，曹军攻打袁谭，袁尚终于顾手足，自率兵马营救兄长，曹军大胜，二袁退而固守。

建安八年（203）二月，曹操攻打黎阳，二袁败还邺城。曹操命兵士尽割邺城郊外的麦子。这时，郭嘉反劝曹操退兵，原因是二袁本有矛盾，攻则齐心对外，缓则分裂相争，不如麾军南向刘表，以观其变。

五月，曹操回师许都，兵进汝南西平攻击刘表。果然，袁氏兄弟发生内讧，袁谭败出邺城，引兵北屯南皮。八月，袁尚大破袁谭，袁谭东奔平原，固城坚守，并派辛评之弟辛毗向曹操求援。

辛毗到达西平传达了袁谭的意思，诸将都劝曹操不要以二袁为意，先攻刘表。可荀攸又坚持必须乘乱夺取冀州，作为北方的根据地。次日，辛毗见曹操没有北向之意，便去找郭嘉。郭嘉带他去见曹操，曹操问：“袁谭的话一定可信？袁尚一定可破？”辛毗回道：“明公不要问可信与否，只须看一看形势。你现在去攻打邺城，袁尚如不还救，就不能自守。如还，即使袁谭又随后袭击，以明公之威，击此疲惫之敌，易如反掌。”

十月，曹军到达黎阳，袁尚闻讯回军邺城。部将吕旷、高翔叛归曹操。袁谭闻知，暗中派人送印绶给二将。曹操得知，便与袁谭结了亲家，暂且稳住他。

建安九年（204）正月，曹操回渡黄河，引淇水入白沟，开出了一条运粮的水路，打算攻击邺城。

二月，袁尚留审配、苏由守邺城，自率兵马又去平原打他大哥。曹操闻知，兵进洹水。苏由暗结曹军准备内应，可密谋泄露，苏由出逃曹营。曹军抵达邺城，筑土山，挖地道，展开了总攻。四月，曹操留曹洪指挥攻城，自率兵马袭击袁军毛城守将尹楷，断了邺城的粮道。河北诸郡纷纷投降，黑山黄巾统帅张燕遣使请求援助曹军，曹操拜他为平北将军。

五月，曹操又让人平了土山，填了地道，环绕邺城挖了一条浅浅

的壕沟。审配看了，撇嘴一笑，不以为意。到了深夜，曹操动员工兵快速挖掘，使之又深又宽。次日，当着审配的面打开漳河堤坝，大水一下子将壕堑灌满，邺城成了一座孤岛。曹操特别擅长用工兵。

七月，袁尚南下营救邺城，让主簿李孚突破曹军重围，进城报知审配。李孚装成曹军中的高级将佐，自称巡夜的都督，从曹营一路呵叱下去，对围城曹军赏赏罚罚，穿过了曹军的包围进入邺城。曹操说：“他进了城，看他怎么出城。”过了些天，一群打着白幡的百姓从城里走出，声称投降，为了出去看看庄稼的长势。李孚混迹其中，顺利回营。

曹操料定袁尚从西山北援邺城，让人去那里设下埋伏。夜里，只见城内城外举火呼应，审配开城出击，袁尚也麾兵冲杀。曹军击退审配，进而包围了袁尚。袁尚大溃，出奔中山。曹操让人将袁尚军中的辎重俘虏带至邺城墙下，摇其军心。

审配鼓励将士英勇抗击，说幽州袁熙即将来援，冀州何患无主。于是城上箭如雨下，几中曹操本人。审配又把辛评一家老少全部杀光，以示决心。

双方对峙到八月二日戊寅的深夜，审配的侄儿、东门校尉审荣当了叛徒，开门应敌。邺城告破。

曹操的儿子曹丕第一个冲进了袁绍的府中。进入内室，只见袁绍的太太搂着一个女子，抖成一团。曹丕上前对袁太太说：“刘夫人干嘛如此害怕？请让那位娘子抬起头来。”那个娘子仍不肯。袁太太无奈，亲自将她的头捧起。曹丕眼里露出和他父亲看到美女时一样的神色。他后来将此禀告父亲，曹操问：“那女人是谁？”

“是袁熙之妻甄氏。”

“哦，为父也听说袁熙小儿有一美妇。吾儿既然喜欢，为父即日为你迎娶。”

当审配押上来时，曹操爱惜人才，想让他归降，笑着问他：“那天孤出阵城下，你的箭矢为何如此之多？”可审配不知趣，回道：“我犹恨太少！”这时辛毗上来又哭又闹，让明公为他做主，报仇雪恨。

曹操无奈，杀了审配。

随即曹操命人去袁家宣示慰劳，将袁绍的私人物件退还其妻刘氏。他让人煮了牛头羊首，来到袁绍的墓前，洒酒于地，不等手下文臣宣读文绉绉的祭词，便放声大哭起来，本初、本初地叫了一通。这种祭吊故然是做给人家看的官样文章，可曹操届时却动了真情。因为他意识到：他和袁本初的心目中，相互都有两个袁本初和曹孟德，一对是少年时就结下深交的情同手足的朋友，一对是争名夺利、厮杀于疆场的死敌。现在，两个袁本初都消失了，只剩下了一个孤独的曹孟德，仍在为名利厮杀。

九月，天子下诏，以曹操领冀州牧。曹操让还兖州牧。此后，曹操便将他的幕府搬至邺城。一则河北人口众多，粮草充足；二则他再也不愿或是不敢在许都办公了，有一件事让他一生想起来都很后怕。

诛杀董承之后，曹操有一天班师回都，他入宫奏事。按照大汉制度，三公带兵入朝天子，须由虎贲卫士带刀挟持左右。曹操身为司空，也就遵制觐见了。谁知天子见了他，怒形于色，对他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君如能辅佐大汉，就请厚待皇室，尊敬天子。如果不能，请君垂恩，早些舍弃寡人！”曹操大惊失色，俯仰请罪。回到宫外，他竟然汗流浃背，从此他本人再不进皇宫了。

曹操在冀州又收罗了许多袁绍手下的人才，辟崔琰为别驾，以袁尚从事牵招为冀州从事。只有许攸被杀，就是因为他太傲慢的缘故。冀州打下之后，他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喊曹操的小名字，还指着曹操的背影对人说：“没有我，这家伙进不了邺城。”曹操回头笑着说：“你说得太对了！”从此他再也看不到曹操对他笑了。

十月，高干举并州归降。曹操仍以他为并州刺史。此时，袁谭乘机将袁尚赶到故安投奔袁熙去了，收编了袁尚的部下。曹操致书袁谭，责其背叛。十二月，袁谭在曹军的进攻下，退守南皮清河。为切断袁氏兄弟的后路，曹操遣使安抚了辽东的公孙度，送他一个永宁乡侯的爵号，可公孙度却把印绶往仓库里一扔，说：“我是辽东王，什么永宁乡侯。”说完这句话，他就死了，其子公孙康嗣位，把永宁乡侯给了弟弟公孙恭。

牵招被曹操派去安抚辽东乌桓。这时，公孙康的使者也到了乌桓的部落。乌桓峭王不知何去何从，便让两个汉人互相吵架，最后，他觉得还是曹操的使者腰杆子硬，竟拔出刀要杀另一个汉人使节，并表示归降曹操。

东临碣石有遗篇

建安十年（205）正月，曹操攻克南皮，斩杀袁谭、郭图。陈琳被俘，曹操说："卿当初为本初写檄文，历数孤的罪状就行了，干嘛还要骂我的祖宗呢？"陈琳也觉得不好意思了，连忙谢罪。曹操请他担任自己的秘书长。

三月，幽州刺史袁熙的部将焦触、张南哗变，袁熙、袁尚兄弟逃奔辽西乌桓蹋顿部落。四月，黑山黄巾统帅张燕率部十万归降，封安国亭侯。

同月，辽西乌桓进攻鲜于辅于犷平。八月，曹军进讨，乌桓出塞。

十月，高干趁曹军击讨乌桓之际，联络部分关西将领，据并州反叛。曹操一面派西平太守杜畿进击关西，一面让马腾从西部夹击，关西遂平。

建安十一年（206）正月，曹操留儿子曹丕守邺城，以崔琰为辅，自率兵马进击高干，在壶关将高干包围。三月，壶关降，高干逃入南匈奴求救，遭到单于的拒绝。高干只得南奔刘表，至弘农上洛，被当地都尉王琰捕杀。曹操命梁习为并州刺史，打击豪强，募归远逃塞外、流入胡狄的汉民，委任名士为地方长官，并州从此安宁。在并州游学的学者仲长统早就对高干说："君有雄心，但无雄才。"并州破后，荀彧举荐他出任尚书郎。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本朝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有《昌言》传世，论述治乱政体；又有《乐志论》传世，其中讨论人生的意义，皆以黄老道家自然思想为宗

旨。

八月，辽西乌桓蹋顿部联合乌桓诸部，在袁氏兄弟的唆使下，大举犯边。曹操不得不远征塞外。

建安十二年（207）二月，曹操在邺城大封功臣二十多人，全部封侯。只有荀彧屡屡辞让，不给面子。自董承事件之后，荀彧在是否拥戴汉室的问题上，私下与曹操有了分歧。

同月，曹操点起大军，进击乌桓。大家都不同意，一则出塞作战地理险要，风俗相异；二则怕刘表、刘备北上袭击许都。只有郭嘉一个劲地坚持说："乌桓从来就认为汉人不可能出塞远征，一旦深入，他们必无防备。袁氏兄弟尚有势力，不可姑息。至于刘表，自知刘备比他厉害，不可能不防刘备而举国北进。"到了易城，郭嘉又一反远征军的常规战法，让曹操抛弃辎重，轻装速进。

到达无终时，天气已经热了起来，雨水渐多，道路泥泞，水淹不通。此时，田畴率部来归，他说从平冈经卢龙塞有一条久已废弃的小道可至乌桓的大本营柳城。于是曹操命人做了一些军中的告示牌插在路边，上面写了道路不通，且等秋冬进军的字样。乌桓侦察兵看了，回报汉人大军已还。

当八月份曹操的大军到达柳城时，刚刚探得消息的乌桓和袁氏兄弟仓猝之间率领数万骑兵出抵曹操。

曹操登上白狼山，见乌桓骑兵不整，便令张辽为前锋冲击敌阵，敌军大溃。蹋顿等数名酋长被斩，降获二十万口。从此曹操营中又多了一支骁勇善战的乌桓骑兵。袁氏兄弟与速仆丸单于东奔辽东公孙康。

曹操策马驰出柳城，直至大海之滨。汹涌的波涛使他心潮起伏。郭嘉说："这就是当年秦始皇东巡的终点碣石，明公征抚天下，不意也至天涯海角，壮哉壮哉！"

曹操笑道："秦始皇至此，只不过射鲸而还；孤与天下豪俊成就事业，感慨甚多，试与诸君吟咏抒怀。"他马上命笔，作《观沧海》以示群臣：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哉至哉，歌以咏志。

后世的人们，包括许多否定曹操的人，都说他的诗作得没有话说，还说这首诗“有吞吐宇宙气象”。

九月，曹操下令回军。经过上谷时，他专程祭扫了卢植的墓地。没多久，公孙康派人把袁氏兄弟和单于的人头送至帐下。曹操说这正在他的预料之中。至次年正月，曹操才回到邺城，一路上经历了冰天雪地和饥饿疾病之苦。郭嘉得了重病，回邺城不久就去世了，年仅三十八岁。曹操哭着对荀攸等人说：“诸君都是孤的同辈，只有郭奉孝（郭嘉字）最小。孤本来想，等平定了天下，将孤身后的事，托付给奉孝，可他竟不幸夭折，这就是命吗？”

三顾茅庐

就在曹操北征乌桓之时，在荆州寄人篱下的刘备日子也不太好过。刘表与自己都是没落贵族，因此表面上还以亲戚兄弟相称。刘表经常请刘备喝酒，可对他连眼都不眨一下地盯着。刘备还是坚持着与刘表周旋，因为他看准了一点，刘表已经老而多病，两个儿子刘琦、刘琮皆懦弱无能。而且刘表的家中也是危机四伏。由于刘表给幼子刘琮娶了后妻蔡氏的侄女，蔡氏和其弟蔡瑁、外甥张允成天在刘表面前诋毁刘琦。刘表老而昏聩，重信蔡氏一家，百年之后，必有内忧。刘备在等待。一次，刘表请他喝酒，刘备上了一趟厕所回到座席，面色凄凉。刘表问他何故如此，刘备说，在厕所里看见自己身上起了髀肉，这是因为久不乘战马的缘故。日月若驰，老之将至，而功业无望，所以悲从中来。刘表放了心，还同病相怜了一通。

刘备在荆州，最不如意的是没有了兵源。但他却有了一个意外的大收获。他先在新野得到一个叫徐庶的谋士，觉得比起他从徐州带来的麋竺、简雍之流高明了许多。这才感到自己一直东奔西跑，无所事

事，是由于没有谋士。可徐庶却说最厉害的还不是自己，而是一个住在隆中，号为卧龙的高人。刘备说：“请你带他一块来好吗？”徐庶说：“主公，你现在还不够资格，只能自己去看他。”过了些时，他遇上了襄阳隐士司马徽，这个人最会鉴别人才，号称水镜先生。水镜先生告诉刘备：“这里有一个卧龙，一个凤雏。前者是诸葛亮，字孔明；后者是庞统，字士元。庞士元是我的朋友庞德公的侄儿，诸葛亮也以叔侄礼侍奉庞德公。诸葛孔明自比管仲、乐毅，庞士元少时迟钝，此二人俱无人识之。”

于是刘备耐着性子表演了历史上礼贤下士的最感人的一幕，三次造访诸葛亮的乡村别墅。诸葛亮才请他进屋，摒退左右，关上室门，拿出一张他日夜研究的地图，说出一番在当时可谓大逆不道的话来，其主旨就是教授刘备占有荆州，西图巴蜀，割据一方的策略。这次谈话在历史上被称为“隆中对”。本年，刘备四十七岁，他望着小自己整整二十岁的诸葛亮，欣喜异常。带诸葛亮回来之后，他对成天不服气的两个武夫弟兄关羽、张飞说：“孤有了孔明，如鱼得水！”后来，凤雏也归了他。

建安十三年（208）正月，曹操在邺城之北，挖了一个叫玄武湖的人工湖，开始训练水军。消息传到荆州，刘表心里直发毛。孙权也开始侵夺荆州的地盘。上半年，刘表驻守在夏口的大将黄祖被孙权部将吕蒙斩杀，黄祖手下的勇将甘宁投奔孙权。

丞相专制

六月，曹操对帝国中枢机构的官僚制度作了改革。他取消了按照儒家典籍《周礼》设置的，以司徒、司马、司空三公统领中央政府的体制，恢复了秦帝国和高皇帝朝设置的，以丞相和御史大夫为首的中枢机构。其目的在于将国家的大权全部集中到丞相手中，也反映了曹操对秦帝国以及大汉初期法制社会的向往。秦帝国将中央分为以天子为首，以九卿为臣属的内廷，和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人为首的

外廷。外廷是政府的行政机构。丞相负责政务，御史大夫负责监察，太尉负责军事。皇帝是最高国家元首，但不过细地干预外廷执行具体的政事。可是后来，孝武皇帝要与臣下们争权，便通过管理内廷文件的机构——尚书台控制文件的批准与执行，并授予中官“尚书令”的头衔，掌控尚书台。孝昭皇帝年幼不能视事，便起用重臣霍光领尚书事。至孝成皇帝朝，尚书令以及尚书皆用士人，这些人官阶虽低，但都能直接服从天子的意图处理政务，丞相已被架空。光武皇帝光复以来，将丞相分为司徒、司空、太尉三公，不付实权，只是名誉上地位最高的公卿。在国家改元、典礼，灾变之际，皆按例更换。发号施令的大权归尚书台掌管，重臣如掌实权，往往在头衔之后冠以“领尚书事”或“录尚书事”的字样。

曹操改革了制度，这丞相他是做定了。丞相内府里的幕僚计有东曹掾、西曹掾、主簿、文学掾和法曹议令史，分别由崔琰、毛玠、司马朗、司马懿和卢毓担任。司马懿是司马朗的弟弟，聪明有大略，时年二十七岁，河内大世族出身，祖父司马隽任过颍川太守，父亲司马防任过京兆尹，皆为二千石高官。他和袁绍一样，身上禀承着世家大族的高贵习气，看不起曹操的政府，当曹操征辟的时候，他居然装成麻疯病人。曹操说你不来，就杀了你，他这才吓得应聘。就是这个人，日后将曹操的事业和理想付诸东流。

可是曹操的丞相府不是一个和平帝国的国家政务机构，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人政府，因此曹操指望通过丞相制来恢复正常的法制社会，还有很大的距离。事实上，他所颁布的法令，绝大多数是军事管制条令或是战时法令，如果想要经营一个大一统的帝国，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

八月，以郗虑为御史大夫。他上任的第一个月，就杀了孔融及其妻子，罪名是当初在北海为相时，召合徒众，图谋不轨；近来接见孙权的使者时，又谤讪朝廷。其实孔融真正的罪名是，他上书天子，说按照古制，千里之内不得分封诸侯。把矛头指向曹操迁居邺城这件事。

赤壁之战

建安十三年（208）八月，当曹操的大军已到达南阳宛城时，屯驻樊城的刘备大惊失色。此时刘表刚死，刘琮继位。前来襄阳奔丧的刘琦被阻在门外，不得见父亲一面。刘琦流涕而去。按照诸葛亮的主意，他出奔汉水下游。不一会儿，刘备见到了刘琮派来的使者宋忠，他告诉刘备，刘琮已举州而降，派人拿着父亲刘表所持有的汉节去新野迎接曹操。

刘备连忙率民众向南边的江陵撤退，让关羽先乘船至江陵等候。经过襄阳时，刘备在城下喊刘琮一道走，刘琮不答。刘备去刘表墓前大哭一通，策马南窜。

曹操一听刘备南逃江陵，亲率精骑五千，日行三百多里，抄袭江陵，因为江陵是荆州的大粮仓。追至当阳长阪坡，击溃了刘备军民混杂的十万之众。刘备与诸葛亮等数十骑得以脱身。赵云保护刘备的妻子甘夫人，怀抱其子刘禅突出重围。张飞在后，以二十多骑横立长阪坡桥头，嗔目大喝。曹军见他一副不要命的样子，又怕他设有埋伏，稍稍退却，为刘备逃跑争取了时间。徐庶之母在皮役被曹军俘获，徐庶是个孝子，没办法，进了曹营。

曹军到达江陵之后，命刘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擢用荆州人士多人，包括荆州大将文聘和韩嵩，以文聘为江夏太守，韩嵩为大鸿胪。王粲也至曹操帐下，任丞相掾属。继而操练水军，打算顺流东下，进击江东。

十月，鲁肃说服孙权与刘备联合抗击曹操，并代表孙权至夏口见到刘备。鲁肃又对诸葛亮说：“足下在江东任事的兄长诸葛谨，是我的至交。”于是鲁肃与诸葛亮定了交。当诸葛亮随鲁肃到了柴桑见到孙权时，孙权的臣下们正吵成一团，以张昭为首的一些文臣主张投降，孙权也被他说得左右摇摆。诸葛亮、鲁肃以及从鄱阳赶回来的周瑜，用三张利口使孙权当着众臣，拔出佩刀，斩去几案的一角

说："诸将吏敢再说投降曹操的，就与此案一样！"

周瑜的水军与曹操在赤壁相遇。经过侦察，一切都像周瑜对孙权分析的那样，曹操号称八十万的大军，实际仅有二十二万左右，其中七八万是荆州的降卒。北方兵士不习水战，风浪一起，呕吐不止，并且染上了疾病。而周瑜的水军训练有素，阵法严整。一次驻扎在樊口的刘备见到周瑜的战船，亲自乘船来慰劳。刘备问："将军有多少人？"

"三万。"

"太少了！"

"足够了，玄德公请观周瑜大破曹操。"

刘备提出让鲁肃出来一见，周瑜说："军中条令严整，玄德公此来，专见我一人，如欲见子敬（鲁肃字），可专程见他。"

刘备听了又惭愧，又佩服。

决战开始了，周瑜部将黄盖先致书曹操，请求投降。在一个东南风大起的日子，用冲击舰十艘，装上枯柴，灌上油，裹上帷幕，插上旌旗，鱼贯而来。曹军以为黄盖来降，没有戒备。离曹军水军大营只有两里之时，黄盖下令点火，撤人于舰后小船。顷刻之间，曹操的水军化为灰烬。刘备、周瑜见火光大起，水陆齐进，围追堵截。曹操败走，至华容时，泥泞难行，他命瘦弱的兵士背上草填铺道路，让骑兵蹈藉而过。出了华容，曹操大喜，对部下说："刘备，真是我的对手，但是计出太晚。如果他在华容放火，我们就完了。"退至南郡，人马死伤大半。曹操命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引军北还。

后来，因孙、刘联军久攻江陵，曹仁难以抵抗，曹操的救援又多次被敌挫败，曹操命曹仁放弃江陵，把防线收缩至襄阳。建安十四年（209），曹操与孙权在东线合肥展开争夺，设置了东部防御和进攻的据点。

刘备推刘琦为荆州刺史，招抚了刘表的老部下，武陵、长沙、桂

阳、零陵四郡的太守。次年，刘琦病死。刘备征得孙权同意之后，自领荆州牧，驻扎公安。其余四郡，南郡、江夏为孙权占领，南阳、章陵为曹操占领。后来，孙权又将妹妹嫁给刘备，在刘备的请求和鲁肃的建议之下，孙权考虑到将来曹操如从东线合肥进攻江东的心脏地带，西线的防御无暇顾及，让给刘备可以遏止曹操从上游东下，便把南郡委托给了刘备。

建安十五年（210）冬天，曹操在邺城筑铜雀台，这是一个属于皇宫建筑种类的高台，表明曹操营建新都的野心。

十二月，曹操下了一道《明本志令》，叙述了自己一生从举孝廉到平定刘表的经历和功绩。这是一篇少有的说真话的宣言。他说："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表示一定要掌握大权，不然既败了国家，又祸及子孙，江湖未静，不可让位。如果有人指责，可以让出一部分食邑。他说这篇表明心志的宣令，无有讳言，不仅对天下人这样讲，即使对妻妾子女，也如是说。最后，他对自己百年之后也作了两个交待：其一，自己生前不称帝，如果天命在曹氏，他也只能做周文王，由儿子完成改朝换代的仪式。其二，所有的小妾，在自己百年之后，任从改嫁。并且有义务对后夫传达曹孟德的心志，使他人皆知之。从这时起，曹操已认清了天下三分的形势，他对他这一生不能统一中国怅恨不已，下一步的战略全是为下一代着想了。他决定讨平关西、益州，稳固北方，再进而对孙权、刘备构成持久而占上风的军事态势。

平定凉州

建安十六年（211），天子拜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

三月，曹操以经过关西讨伐汉中张鲁为名，出兵西进。关西诸将韩遂、马超、杨秋、张横、梁兴等人发觉不对，联兵十万屯据潼关。曹操讨伐荆州之前，马腾的部将与韩遂的部将发生内讧，钟繇让凉州

刺史韦端出面调解。荆州战事进行之中，曹操命人劝说马腾散兵回朝，马腾同意。曹操拜马腾为卫尉，以其子马超为偏将军，留凉州统领其众。马腾及其家属全部迁居邺城。现在，马超也顾不上老父亲在曹操手上做着人质，毅然起兵，抵抗曹操对西北地区发动的统一战争。七月，曹操留曹丕守邺城，自击马超。八月，曹操坐镇潼关南岸，吸引关西军队，同时命徐晃等从黄河北岸的蒲阪西渡黄河，于西岸建立据点，然后将大军陆续北调。曹操本人最后渡河，这时马超率步骑万人攻击只有几百个卫士的曹操，许褚一手持马鞍挡住箭矢，一手撑船，丁斐放出牛马扰乱敌阵。渡过黄河，曹操笑着对部下说："今天差点被小贼困住。"

九月，曹军陆续渡过渭水，又从河西开了一条甬道，直通渭水北岸，粮草运输通畅无阻。马超等见此形势，要求和谈，曹操不许。但贾翊建议可以假假地同意，曹操问他计从何出，贾翊说："离之而已。"曹操马上回道："解！"

韩遂的父亲与曹操同时举孝廉，韩遂本人年轻时去过京师，与曹操有点交情。因此当曹操与他在阵上相见时，曹操放马上前，不和他谈军事，反而与他回忆起往事来了，什么过去京师哪家妓院的妓女长得好，哪家馆子的菜好吃，哪个地方的风景好；当初的朋友，现在哪个不在了，哪个在哪儿。谈着谈着，两个人忘了是在疆场的敌手，一会儿唏嘘，一会儿大笑。把阵后的马超看得糊里糊涂，过了些时，韩遂军中的羌、胡骑兵涌上前来，曹操大声说："你们是不是想看看曹孟德？我也是人，并没有四目两口，只是多些智谋罢了。"说罢大笑。羌胡兵交首而语，啧啧赞叹。

马超问韩遂曹操说些什么，韩遂说没有说什么。马超对他多了个心眼。他后来又看见曹操派人送信给韩遂，信上圈圈点点，不知写了些什么机密。终于，曹操发动了一次让他们意想不到的猛攻，斩杀无数，马、韩二人逃奔凉州。十月，曹操至安定，杨秋投降。十二月，曹操回师，留夏侯渊屯长安。由于曹操与韩遂的一席谈话，关西叛将们再也不可能齐心了。

次年，曹操诛杀马腾，夷灭三族。两年后，马超攻杀凉州刺史韦

康，韦康部下杨阜、姜叙起兵讨伐，杀了马超的妻子，马超南奔张鲁，被委任为都讲祭酒这样一个宗教神职。不久，他见张鲁长不了，又投奔已经入蜀的刘备。四年后，在夏侯渊追击之中的韩遂，被部将袭杀，传首邺城。二十七年前发生的凉州羌汉叛乱，至此方算平息。

本年底，益州牧刘璋受到北部张鲁的威胁，又担心镇压不住益州地方豪强的反抗，在军议校尉张松的建议下，请刘备入蜀平定张鲁。张松实际上是益州地方势力的代表，他推荐同谋法正为使节，去荆州迎接刘备。法正向刘备进献了乘机夺取益州的计策。刘备以关羽、诸葛亮守荆州，带着庞统，点起步兵数万从水路入蜀。

至涪县，遇到前来迎接的刘璋。张松、法正和庞统示意刘备在宴会上袭杀刘璋，刘备说不可仓促。他与刘璋欢饮百余日后，刘璋推刘备为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刘备推刘璋为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刘璋还成都，刘备北进葭萌关，作出进攻张鲁的态势。

天下三分

建安十七年（212）正月，曹操回到邺城。天子诏曹操入朝之时，可以享受“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待遇。

九月，孙权在张纮的建议下，将治所迁至秣陵，改名建康，筑石头城。此后中国凡有建于江南的王朝，大多以此为都。吕蒙又建议孙权在合肥以南的巢湖濡须水口构筑军事要塞濡须坞。这是一个军港，当时东吴诸将认为光着脚就可以上船，干嘛要建船坞。吕蒙说：“当敌人的骑兵冲来时，你们连水都来不及下，还能人船？”

十月，曹操为遏制孙权北上，率军进攻濡须坞。

建安十八年（213）正月，曹军击破孙权的江西大营。孙权自率七万人前来抗击。曹操见孙权舟船器仗军伍整肃，长叹一声：“生子当如孙仲谋，像刘景升（刘表字）的儿子，猪狗罢了！”这时，他接到孙权送来的书信，上面写着：“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曹操发现囊

中还有一块帛，打开一看，还是孙权的手书，写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对部将们说："孙权不欺孤。"

四月，曹操回军邺城。

孙、曹交兵之际，孙权请刘备出兵援助。刘备向刘璋提出回荆州。刘璋看出刘备在葭萌驻兵一年，毫无动静，此次以回军为借口，图谋益州。于是刘璋斩杀张松，下令各关守军，阻击刘备。刘备撕破了脸，一路攻下涪县、绵竹。庞统在攻打雒城之役中中箭身亡。荆州的诸葛亮率张飞、赵云由水路入蜀，攻下江州，与刘备会师成都。

本年五月，天子以冀州十郡割增邺城所属的魏郡，改为魏国。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至邺城，策封曹操为魏公，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赐九锡，这是一套仅次于天子的仪仗。这一封赏在去年打孙权之前就已定下了。当时由董昭建议曹操："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可荀彧不同意，搞得曹操很恼火。出师以后，荀彧生病留住寿春。一天，他接到曹操送来的食品，打开食盒，什么都没有。他一下子明白了。当晚，服毒自尽，时年五十。

七月，诏魏公在封地之内建立社稷、宗庙。从此，在大汉的公文和国史之中，不称曹操的姓名而称爵号。同月，魏公（曹操的新称呼）纳三女给天子，册封为贵人；魏公其他未成年的女儿，皆在所封国内等待成年后再入宫廷。这样，大汉天子成了魏公永远的女婿。

九月，魏公在邺城作金虎台。十月，魏公分魏国为东西两部，设置都尉。十一月，魏国设置尚书、侍中、六卿。

建安十九年（214）三月，诏魏公位在诸侯王之上，授金玺、赤绂、远游冠。

七月，魏公再征孙权。途中，尚书令荀攸病故，时年五十八。

本年夏天，刘备攻占成都，自领益州牧，以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赵云等为爪牙。诸葛亮一上台使推行法治，法正劝道："当初高祖入关，与父老约法三章，秦民感念其德。如今您凭藉威力，跨有一州，初有其国。却不加安抚；再说我们以客

入主，更应该顺从民愿，请缓驰禁，以慰民心。”诸葛亮却说：“您只其一，不知其二。秦国虽是因苛政酷刑而导致天下反叛，但刘璋却暗弱无能，德政不修，威刑不肃。滥赏官位，导致官位变贱；妄施恩泽，一旦施尽则生怠慢。久生积弊，根源在此。我现在先以法治推行威信，法治通行民众便知道何为恩泽；限制官爵的赐予，官爵不滥百姓才知道何为荣耀。恩荣并济，上下有节，是治国的关键啊！”法正听了，心服口服，从此，刘备上下，皆能笼络和控制益州本地豪强。

刘备占有荆州之后，孙权遣使至益州索要荆州。刘备不让，回道：“我正在图谋凉州，等得了凉州，再还荆州。”孙权便自行派官吏去长沙、桂阳、零陵接收，被留守荆州的大将关羽打得狼狈而回。次年，孙权派吕蒙攻占三郡。由于考虑到曹操谋攻汉中，刘备无法两顾，便与孙权商议，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

至此，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已成，大汉帝国已名存实亡了。

皇帝与编年史

许都的天子，是天下最寂寞最痛苦最尴尬的皇帝。他惟一的消遣就是与臣下们读书聊天，他的生活不可能像他父亲那样奢侈了。尽管魏公喜欢声色享乐，但却提倡节俭。魏公的妻妾都穿布衣，魏公的表面文章做得很好。所以，自己能够保持大汉天子的仪仗与生活标准，就算魏公的恩德了。他的自由也受到限制，周围没有宦官，侍中、侍郎都是魏公的人，特别是御史大夫郗虑，此人才是许都真正的主人。

能和他谈论历史的，是荀彧的侄儿荀悦，此人是个《春秋》学家，当年与荀彧及孔融同时被委任为天子的侍讲。荀悦发现天子和刘氏皇室最后几个年轻的天子一样，都很懦弱但是聪明过人，天子喜欢史学和文学，常常和他谈得通宵达旦。后来，荀悦迁升为秘书监、侍中，成了天子的秘书长。一天，天子说起本朝的国史《汉书》部帙过大，读了不知要领，请荀侍中给编一个简本。荀悦依照《春秋左传》的编年体式，编成《汉纪》呈上御览。他还把自己的著作《申鉴》呈

给天子看。在这部著作里，他总结了大汉政治衰败的四大原因是：虚伪乱俗、营私坏法、放纵越轨、奢侈败制。拯救衰败的对策有五：兴农桑以养民生；审好恶以正风俗；宣文教以彰德化；立武备以秉军威；明赏罚以统国法。

天子觉得，他不可能代表大汉来实行这五大对策了，倒是曹孟德正在逐步推进这些措施。曹孟德和董卓不同，董卓扮演的是一个野蛮的破坏者，曹孟德则是一个挽救者和建设者，尽管他不是为了大汉。大汉的成功和失败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有着四百多年寿命的大帝国，其衰亡的一切原因，全部来自她的自身和内部，因为她没有外在的对手。所以，大汉帝国只是将一个统一帝国的骨架固定了下来，将一个统一大帝国的理想种植了下来，但是她没有完善这一制度。比如：如何防止土地兼并；如何防止文官选拔大权被少数集团操纵；如何处理道德和法治的关系；如何处理君权与官僚集团的关系，等等。

在许都的这些年，一直有大臣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劝说自己让位于曹孟德。并且他们都根据谶纬及祥瑞，为曹孟德寻找了代替大汉的证据。一个最大的证据发生在孝灵皇帝朝熹平五年（176），那年在曹孟德的故乡谯县出现了一条黄龙，地方官吏上报朝廷。朝廷每年都收到大量的祥瑞和灾异的报告，一会儿甘露，一会儿灵芝草，一会儿麒麟。不过，最多的是凤凰，因为凤凰是五行之中火的象征，是大汉国运昌盛的象征。而黄龙却是土德的象征。当时的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飏这是什么征兆，太史令说："此地当有王者兴，不到五十年，还会再次出现的。"

天子不相信这些话，黄巾教徒把"苍天已死"喊得震天响，袁本初、袁公路刻了玉玺，甚至称了帝号，也无济于事。但他相信曹氏将是大汉唯一合理也是唯一能够的继承者，因为曹氏正在大汉的国土上建立一个符合大汉帝国理想的新帝国。

天子的痛苦在于曹孟德的虚伪使得他不得不坐在空旷的大殿上焦熬岁月，董贵人被处死之后，他对曹孟德讲的那番话正是这种心态的宣泄。

终于，曹操又对天子进行了最后一次示威。

建安十九年（214）十一月，伏皇后在董贵人被杀后写给父亲伏完的书信泄露，此时伏完已死。一天，御史大夫郗虑入宫，说明原委之后，请天子下诏废后，并由郗虑持节没收皇后的印绶。天子引郗虑入坐，又让一位侍中起草诏书。说话间，尚书令华歆率甲兵闯入宫内拘捕皇后。皇后关上房门，躲人夹壁。华歆麾兵大索，抓着皇后的头发从壁内拖出来。经过天子的客厅时，光着脚的皇后哭着叫天子：“陛下，不能活我的命吗？”

“我也不知道命在何处！”天子悲痛得有些愤怒了。他回头对郗虑说：“郗公，天下有这样的事吗？”

郗虑低下了头。

皇后几天后就被处死了，两个儿子以及兄弟宗亲死者达百余人。

建安二十年（215）正月，天子立魏公的次女为皇后。

三月，魏公亲征张鲁。张鲁一听，便欲投降。只是弟弟张卫不听，率众数万，把守关隘。曹操斩杀张卫，攻下阳平。张鲁做好了投降的准备，其部下阎圃说：“现在急着投降，让曹操小看了您。不如先逃往巴中，以观形势。”七月，曹操攻人汉中的治所南郑。他发现城中井井有条，完好如初。张鲁走时，将国库清点封藏，未加焚毁。曹操对此大加赞赏，立刻派人安慰张鲁。张鲁遂降，被拜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其子五人及阎圃皆封列侯。汉中这个建立了三十来年的道教政权终于解体。

文姬归汉

建安二十一年（216）正月己丑，封魏公之子六人为列侯。二月，曹操回到邺城。

四月甲午，天子进魏公为魏王。五月己亥，发生了日蚀。

七月，南匈奴呼厨泉单于来朝，留魏居住。以右贤王去卑回匈奴

监国。匈奴的使团应曹操的要求，送回了蔡邕之女文姬。曹操让她嫁给屯田校尉董祀。蔡文姬将她流落匈奴的生活经历，写成一首长长的《悲愤诗》献给曹操。

建安二十二年（217），魏公征孙权。四月，天子诏命魏公用天子仪仗。十月，诏曹丕为魏太子。

本年冬天，刘备进攻汉中。

本年，发生了大瘟疫，曹操的文人集团之中，王粲、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全部病故。此五人，连同阮瑀、孔融被后世称为“建安七子”。

建安二十三年（218），刘备亲自攻打汉中。

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攻杀魏将夏侯渊，魏王亲临汉中，拔出陷于其中的大军，汉中失守。司马懿劝曹操一举攻下汉中，进图益州，可曹操不愿陷入汉中的泥潭。打益州的重任就落到了司马懿的肩上。司马懿借此渐渐在曹氏的政权中充当了权臣。

七月，以曹丕之母卞夫人为王后。卞夫人出身娼家，二十岁在谯县嫁给曹操为妾。曹操立出身卑贱的卞氏为后，意在不再重蹈大汉外戚专政的覆辙。

本月，刘备命关羽向驻守在荆州襄阳、樊城的曹军进击。曹军大将于禁投降，庞德被斩，曹仁坚守待援。司马懿、蒋济建议利用孙、刘两家的矛盾。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魏王至洛阳。吕蒙擒杀关羽，传首洛阳。魏王拜孙权为骠骑将军，领荆州牧。事后孙权才后悔，因为孙、刘合击曹魏的形势化为泡影。

正月二十三日庚子，魏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遗令简葬。他带着遗憾，留下一个军人政府走了。他实行屯田，但没有能改变世族大庄园主的庄园经济，把土地分给农民；任人唯才，但没有制定出从平民中选拔官吏的考核制度。自此以后，中国分裂三百九十二年，至隋、唐帝国，才以均田制恢复了自耕农经济，以科举制实现了平民参

政，一个比大汉规模更大的统一帝国才得以形成。

同月，魏太子曹丕即魏王位。二月，以贾翊为太尉，华歆为相国，王朗为御史大夫。

三月，谯县地方官吏在魏国的示意下，报称出现了黄龙。

禅让

又是一个冬天，黄昏时分，天子伫立殿外，他望着夕阳西下，群鸦乱噪，宫殿的飞檐投下沉重的影子，这个影子正随着太阳的下落而渐渐消失。天子自言自语地说：“明天早上升起的，就不是这轮太阳了。”

禅让政权，是中国人对远古政治状态的传说，它标志着和平的和道德的政权交替方式。尧传给舜，舜又传给禹，禹再也不传给别的贤明的人了，而是传给自己的儿子。此后的时代就被称作“家天下”，从这个时代起，有了犯罪和刑法，有了军队和战争。现在，一个即将消灭大汉帝国的新帝国，为了表明她空前的道德与伟大，决心重现禅让的场景。天子这些天，已将仪式演习熟练。

十月的一天，天子告祭高皇帝庙，使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诏册传位于魏王曹丕。十八天后，新天子升坛受玺，即皇帝位，燎祭天地山川，改元黄初，大赦天下。仪式完毕，新天子对臣下们说：“我今天终于懂得舜和禹之间，是怎么回事了。”值得注意的是，曹丕没有说尧和舜，而是说舜与禹。他希望禅让的场景到此为止。

十一月，封汉天子为山阳公，在其封地内仍用大汉历法、天子仪仗。

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第十章

遗响

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

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

——汉末无名氏

天下大势

从黄初元年（220）起：

一年后，刘备称帝，国号汉，年号“章武”。

七年后，魏文帝曹丕崩，子曹睿即位，史称魏明帝。

九年后，孙权称帝，国号吴，年号“黄龙”。

十四年后，山阳公薨，年五十四。魏明帝以天子礼葬之，谥孝献皇帝，意为聪明睿哲。史称汉献帝，译成白话就是“识相知趣”。

四十三年后，魏灭蜀汉。

四十五年后，司马懿之孙、魏国的丞相、晋王司马炎与魏国第五代天子曹奂之间，又演了一出禅让仪式，新的政权国号为晋，史称西晋。看来，曹丕登基时应该说尧传舜而不是舜传禹。

六十年后，晋灭吴。中国再次统一。

司马氏的政权，经过了司马懿以来的三代经营，标志着汉末地方大世族的势力，在他们的代表人物袁绍被消灭之后，与曹氏政权斗争的胜利。因此这一腐朽的政治集团，提不出一个公正合理的施政纲领，没有能够让中国重新走向长久的统一。很快，全国发生了内乱。西晋统一中国的三十一年以后，匈奴于扶罗单于的后裔刘曜趁乱攻下洛阳，俘虏了西晋的第三代天子，晋迁都长安。五年之后，刘曜再陷长安，俘虏了第四代天子。同时，那些与大汉争斗了几个世纪的周边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如潮水般涌人中原，递相成为中原的主人。西晋王室的一支流亡江南，定都建康，史称“东晋”。自此以后的中国，南北对峙分裂并且各自动乱不已。二百六十四年之后，统一的盛运才再一次降临中国。

墓穴诅咒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群考古学家不满意于历史学家们在书本上讨论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大汉帝国是如何灭亡的，发誓一定要找到真凭实据。他们挖掘了汉代洛阳城的遗址，那些南宫、北宫的残砖断瓦，在重见天日之时，仍是默默无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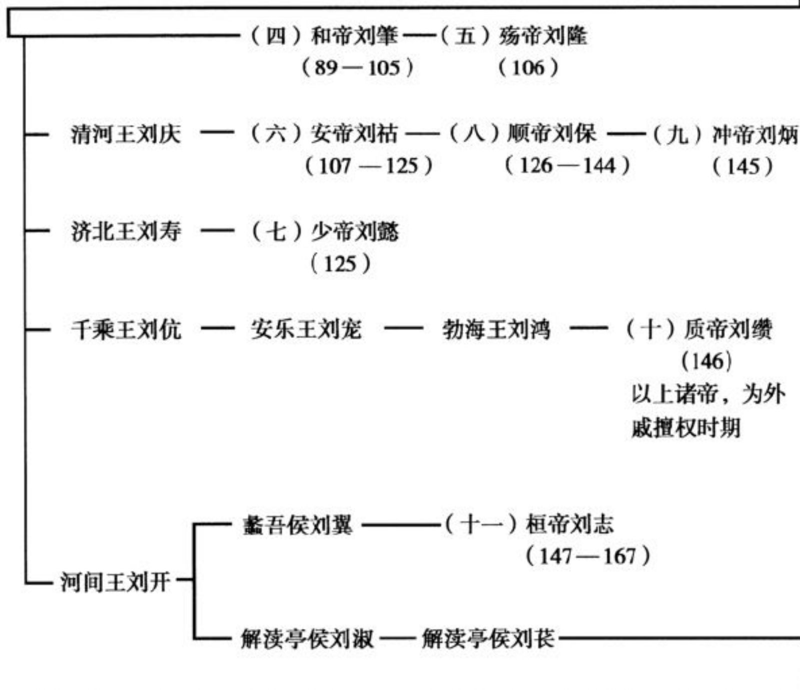
又过了十年，这些考古学家打开了谯县曹操家族的墓葬群，发现在一块墓砖上，烧制着赫然醒目的四个大字：

苍天乃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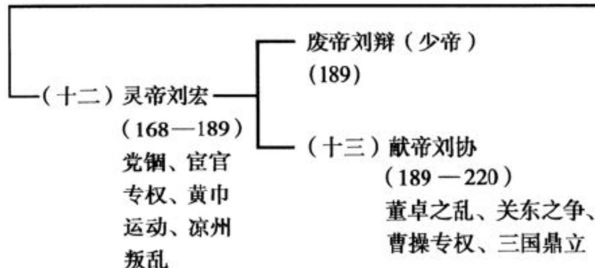
附录

东汉帝王列表

（凡十三君，一百九十六年）



（一）光武帝刘秀
（25—57）
（二）明帝刘庄
（58—75）
（三）章帝刘炟
（76—88）
以上三帝，为东汉全盛时期
（四）和帝刘肇
（89—105）
（五）殇帝刘隆
（106）
清河王刘庆
（六）安帝刘祜
（107—125）
（八）顺帝刘保
（126—144）
（九）冲帝刘炳
（145）
济北王刘寿
（七）少帝刘懿
（125）
千乘王刘伉
安乐王刘宠
勃海王刘鸿
（十）质帝刘缵
（146）
以上诸帝，为外戚擅权时期
河间王刘开
蠡吾侯刘翼
（十一）桓帝刘志
（147—167）
解渎亭侯刘淑
解渎亭侯刘苌



（十二）灵帝刘宏
（168—189）
党锢、宦官专权、黄巾运动、凉州叛乱
废帝刘辩（少帝）
（189）
（十三）献帝刘协
（189—220）
董卓之乱、关东之争、曹操专权、三国鼎立

初版后记

在一个酷暑天的深夜，在我那间地板吱吱响的斗室，我停下了敲击键盘的双手，电脑屏幕的关闭并没有平息我的兴奋，窗外一棵大树，在月光下摇曳着，它的名字叫做“喜树”，这个名字，和我此时的心境是如此的吻合。

可是，担心接踵而来。我担心每一个怀着阅读历史小说心态的人们，在这本书里只读到了失望。因此，我不得不作一个辩解：这本书不是历史小说，如果一定要从文学的角度来定义她的话，勉强可以算作历史纪实文学这一类吧。

所谓纪实，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历史真实，如果有的话，历史就成了超越时空的永恒不变的抽象。所以，任何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哪怕是当时的记录，都是时间的长河冲击到岸边的泥沙，都是世纪的尘土叠压在深层的化石，是骨骼，是牙齿。而那个生命的血肉、气息、神采，则一去不返，逝者如斯。

于是，那些用理性来研究分析这些泥沙、化石、骨骼和牙齿的人们就成了历史学家，而那些用感性来想象编造这些东西的血肉、气息、神采的人们就成了小说家。我的尝试，可以算是一种调和，即吸取了历史学的观点和成果，但没有采用它的叙述方式；借鉴了文学的叙述方式，但没有虚构情节，并加入了必要的分析。也可能这样的尝试非驴非马、画虎不成，但我相信：历史既不完全属于历史学家的冷静解剖，也不完全属于小说家的浪漫虚构，它还属于生活在真实之中的现实的人们，他们之所以需要历史，需要真切地了解历史的方式，是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创造着历史。

大汉帝国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帝国。她和在她之前的试验性

的秦帝国一道，开创并发展了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将夏、商、周三代根据宗法血缘秩序建立起来的分封制的氏族王国，转变为根据宇宙自然秩序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的平民帝国，并使之深入人心，延续至近代。由于在汉代，佛教等外来思想还没有在中国流行，所以，汉代是中华本土文化孕育出来的第一个强盛的时代。这样一个大帝国的衰亡，就更加具备思考的价值。我在这本书中肤浅地归纳出几个方面，我发现：大汉帝国之后的每一个帝国的灭亡，都在以不同的形式重蹈大汉帝国的覆辙，因为这个帝国不仅赋予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姓名，而且铸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本性。

本书的后半部分，和我国伟大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的前半部分，在时间上相一致。我不敢奢望超过她，但由于写作宗旨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角度和面貌，即便在情节上也是如此。比如在这本书里：董卓并没有抢走吕布的貂蝉，曹操倒是夺去了关羽的杜氏。

书中很多地方，吸收了前辈大师和学者如陈寅恪、冯友兰、钱穆、唐长孺、王仲荦、余英时以及当前海内外学界对汉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其中对曹操性格的描写，禀承了我的导师周勋初先生的观点。

最后，感谢我的另一位导师莫砺锋先生，是他使得我和这本书发生了因缘，并促使我完成了这本书。

作者

1995年8月写毕于

南京大学南园十七舍

王朝的终结丛书

大明帝国的衰亡

景山的晚风

夏维中 著



大明帝国

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为仇寇，大明帝国的君臣关系为何会成为一个“死结”？

裁减驿站，节省国用，崇祯的革新之举为何成为明末大动荡的导火索？

是谁将大明帝国折腾完了？

江苏人民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景山的晚风：大明帝国的衰亡

作者：夏维中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6月

ISBN:978721418466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总序
引言 景山的晚风
第一章 崩溃的前奏
正德皇帝：有权就是任性
嘉靖皇帝：根不正苗不红
隆庆皇帝：精神病患者
张居正的多张面孔
明朝失去最后的机会
万历帝拒斥“贤君”之路
爱美人不爱江山，三十年不出宫
遗孤努尔哈赤的崛起
国难当头一毛不拔，是家风？
第二章 荒唐岁月荒唐事
偏心引发国本之争
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移宫案和红丸案
沈阳失守
魏忠贤的时代
二十四大罪
血洗东林党人
造神的时代
第三章 中兴之梦的破灭
朱由检：想要在皇宫中生存就要低调
从信王到崇祯帝的转变
清算阉党
好一个倪元璐
内阁大换血
党争：崇祯最忌惮的事
第四章 后金的挑战
宁锦大捷：立功的人反被弹劾
袁崇焕复出
杀毛文龙埋下杀身之祸
崇祯帝中了反间计？
活剐袁崇焕，一个民族的痛
长山、大凌河之败

叛降
皇太极大举入侵
第五章 步入深渊的内乱
杨鹤抚陕政策的失败
山西征剿失败
陈奇瑜抚局失败
壮大的农民军
凤阳之变，帝乡一夜成火海
擒杀高迎祥
第六章 明朝崩盘的根源
空空荡荡的国库
能赖就赖、能欠就欠的财政
颓靡的士风
凋敝的陕北
第七章 历史没有奇迹
神秘消失的李自成
张献忠兴盛
熊文灿的抚局
卢象升战死疆场
杨嗣昌督师
李自成：打不倒的必使我强大
松锦大败：等不到的救援
不是亡国之君，偏遇亡国之事
第八章 大崩溃
李自成占据襄阳
张献忠攻克武昌
最后一张王牌：孙传庭出关
关中失陷
京师告急
日落紫禁城
尘埃落定，大明已成过去
附录 明朝皇帝简表
初版后记

总序

关注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何在？西方史学家一直推崇公元前二世纪时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话："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而考古学证明，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商代，中国人就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时的史官们不仅要记录发生了的事件，还要预测将要发生的事件。他们选择龟甲来刻写卜辞，因为龟具有长久的寿命，见证过历史的沧桑，所以能够暗示未来的吉凶。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也是文明延续性最强的民族国家，很大的原因在于这个民族强烈的历史意识，使他们一旦遇到重要的选择，便首先去翻阅史书。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某个王朝一旦出现衰亡的征兆，上天和民众马上会抛弃它，将它变成新兴王朝的历史收藏，以供取资。《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记载夏桀迷惑暴乱，太史令终古便出奔投商。而当商纣王迷惑暴乱之际，内史向挚也"载其图法，出亡之周"。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官似乎有着一种自觉的意识：让历史永远服务于未来。

什么是重大事件？古代史书中记录的重大事件大多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中最大的又莫过于改朝换代，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兴亡"。而中国人讨论"亡"似乎更有甚于"兴"。古代中国在战国秦汉之际发生过最为重大的转折。此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享国超过五六百年甚至达八百年的氏族王国，但这样的国家毕竟是联盟式的松散政体。而经过战国秦汉的历史实践过程完成、确立的郡县制国家，才是统一的领土国家和全民国家。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国家体制如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起算，至清帝逊位的1911年，延续了2132年。其间有过二十多个统一或分裂；汉族或少数民族的王朝，但都奉行了郡县制度，因此我们不妨将他们视作一个中华帝国的不同届次的

政府。只是这些政府的任期与更换方式与近现代国家不同而已。而他们开辟的国土、抟成的民族，创造的文化、锻造的性格大都被近现代的中国人继承了下来。

汉、唐、宋、明、清是中华帝国任期最长的五大王朝，这些国祚久长，创造过盛世的王朝，其衰亡更加具有历史意味。我们发现，尽管它们的灭亡各有原因，但有两个方面是相同的，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其一是这五个王朝的灭亡形式囊括了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两种形式：来自内部的分裂与来自外部的挑战。汉、唐亡于内；宋、明亡于外；清朝有些例外，其外部的挑战来自于新的时代与新的世界。当然，他们的灭亡都是内忧加外患，销磨积弊多年，才导致一个最终解决的方式。其二是这五个王朝由于制度的优越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就，没有一个王朝是毁于一旦的。他们的代替者或是受其抚育的臣民，或是受其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除了清朝，其他四个王朝的代替者无一不以他们的继任者自居，进行政治改革并修撰前任王朝的国史。就清朝而言，最后的革命是由于改良政治的失败而导致的。这一点，与夏、商、周、秦、汉之间的推翻暴政，解民于水火式的革命很不一样。因此，汉、唐、宋、明、清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是最为丰富的，而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也是最为深刻的。它们是历史遗产最丰富的王朝。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套讨论兴亡的丛书只是历史通俗读物而不是学术著作，是三个大学文史专业教师不务正业的少作和一位作家对历史的演绎，代表着他们的文字趣味与历史见识，这次再版作了少许的修订。他们的目的只是用现代散文话语营构一个历史阅读场景，其中只有情节、人物、议论而不是在阐述历史的规律和理论，叙述与议论各有不同的视角，对历史的看法和文风也不尽统一。但他们相信，在这个全球风云变幻、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会有更多的国人想要了解我们的过去，关注我们的未来。正如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所言：“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惟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如果这套文字通俗但又不是戏说的丛书能够感发人们对国史的兴趣，便满足了他们的心愿。

徐兴无

2016年5月于南京大学

引言
景山的晚风

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是个天崩地坼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从黄土高坡上杀下来的闯王李自成，率领着被朝廷称作是“流寇”、“逆贼”的农民军，彻底占领了大明朝的京师北京。也就是在这天夜里，崇祯皇帝在煤山寿皇亭（今北京景山东部）自缢身亡。从此，甲申三月十九日就成为历史长河中一个极不平常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不仅标志着大明帝国的崩溃，而且也预示着异族即将入主中原的开始。

后人已不太清楚崇祯帝自杀前后的详细情况，现有的记载也不尽相同，甚至是矛盾百出。据说崇祯帝在三月十八日就知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便匆匆安排后事。在这天晚上，崇祯帝在乾清宫最后召见周皇后和宠爱的袁妃，痛饮数杯之后，崇祯决定把太子及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由他们设法保护外逃活命。安排妥当之后，崇祯帝对周皇后长叹一声道：

“大事去矣！”

话音刚落，便已是泪流满面。皇后、袁妃也是掩面而泣，环立周围的宫女更是哭声一片。崇祯帝只得挥挥手，命宫女们赶快出宫逃命，自寻活路。这时，周皇后抬起泪眼，无限哀怨地对崇祯说道：

“妾侍候陛下十八年，陛下从来听不进我一句劝，以至弄到今天这样的局面！”

说完，周皇后便搂抱着太子和永、定二王，放声痛哭。之后，又是千叮万嘱，依依不舍地把他们送走。

生离死别之后，各寻归宿。周皇后回到她的坤宁宫，上吊自杀，干脆利落。崇祯皇帝见状连声称好。袁妃也回西宫，在崇祯帝的逼迫之下，上吊自杀，不料绳子一断，竟未能一次成功。皇帝只得上去连砍三剑，助她上路。十五岁的长平公主，也被崇祯召来。公主大概已预感到了厄运难逃，大声哀号。崇祯帝只说了句“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呢”，便以左袖掩面，右手挥剑砍向公主，没想到公主在情急之下，本能地以左臂挡剑，结果被砍落左臂，昏死倒地。崇祯见此惨状，再也不忍痛下杀手，便又召集平时宠爱的妃嫔，亲手一一砍杀。

此时的崇祯帝似乎已处于半疯狂的状态之中。他清理后宫之后，竟亲自换上快靴，手提三眼铳，率领几十位持斧拎刀的太监们，骑马在内城中东奔西突，不知是要出城去击杀敌寇，还是想突围逃命，结果是到处碰壁，到天亮时只得灰溜溜地退回宫中。

后人已无法知道崇祯帝是如何度过这最后几个时辰的。据说到了此日的深夜，他还曾亲自跑到前殿，去击钟召集百官，大概是希望能有几位忠臣，来为他殉节，没想到竟无一人赶来，令他大失所望。无奈之中，崇祯帝只得遣散了身边最后几位随从，与太监王承恩携手走入后花园，登上了万寿山。这万寿山俗称煤山（今称之为景山），上有一个新建的寿皇亭，俗称红阁。这红阁原是崇祯为操练内军（由太监组成）而新建的，不料此时竟派上了用场。他在阁中逡巡良久后，便向他宠爱的太监王承恩提出了一个疑问：

“我待大臣向来不薄，今天至此，为什么竟无一人能像前朝靖难时的程济那样追随我而去呢？！”

大概是王承恩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他又为这些文武大臣开脱道：“料想是这些人不知道，所以不能迅速赶来！”

随后，崇祯帝便在红阁边上的海棠树下，上吊自杀。王承恩也随即步其后尘，追随而去。君臣两人，就这样面对面吊在树上，在景山的夜风中，随风摇曳。

三天后，李自成的人马终于发现了他的遗体。他的死状十分惨烈：长发覆面，光着左脚，衣衫凌乱。据说他在衣服上留下了血书遗

诏：

“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

也有人说，遗诏中还有“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杀尽百官、无杀百姓”之类的激愤之辞。

后人大概永远无法弄清上述的记载是否属实，但绝大多数人却宁愿相信这些记载是真实的，因为根据崇祯帝生前的所作所为，上述的内容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位亡国之君能像崇祯皇帝那样，博得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同情。这倒不是因为他死状惨烈，也不是因为他死后被降格安葬，与周皇后一起被草草塞入昌平县的田贵妃墓中（后称思陵），而是因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像是一位亡国之君。正像他生前多次哀叹的那样：“我不是亡国之君，为什么会遇上这么多亡国之事？！”

崇祯帝至死也没有弄明白这个问题。他也无法弄明白这个问题。大明朝的江山虽然在他手中丢失，但应该承担责任的又何止他一个人呢？！他自称无颜去见他的列祖列宗，而他的列祖列宗又何尝有脸见他呢？！

第一章
崩溃的前奏

后人在检讨明帝国崩溃的原因时，大多数人都认为，明朝“虽亡于崇祯，而实亡于万历”，意思是说明朝亡国的祸根早在万历年间就已埋下，万历帝留给子孙的江山已是千疮百孔，像一座即将倾圮的大厦，没有不崩的道理。这种说法是很有见地的。

正德皇帝：有权就是任性

万历帝（神宗朱翊钧）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前后长达四十八年，比他的祖父嘉靖帝（世宗朱厚熜）还要长些。在隆庆五年（1571）的冬天，隆庆帝（穆宗朱载垕）就为年仅九虚岁的儿子朱翊钧举行了成人仪式。没想到此举似乎有先见之明，几个月后，隆庆帝便撒手归天，龙驭上宾，把大明朝的重担压到了年仅十虚岁的儿子肩上。

登基时的万历帝，实际上还是一个孩子，才刚刚懂事，根本无法行使皇帝的权力，也谈不上承担什么责任。幼主当政，已属不祥，更不妙的是，前面的几位皇帝，留下来的已是一副烂摊子了。

万历帝的堂伯祖父正德帝（武宗朱厚照），接位时年仅十五虚岁。正德帝生性爱玩，除了朝政之外，几乎样样喜欢。更糟的是，他认为朝廷文官还不如太监，所以他宁愿把朝政托付给太监，也不愿重用文臣。正德帝先是重用刘瑾，后又宠用江彬、许泰。在这些太监的唆使下，正德帝几乎做尽了皇帝本不应该做的任何事，视皇帝之位几同儿戏。

正德帝的胡闹可以说是历代少见的。他的胡闹，不仅求新、立异、场面大、刺激性强，更要命的是，他专做那些皇帝不能做、至少不能公开做的事，公然蔑视被常人视作是立国之本的那套道德规范。他在内宫操练军队、拆房圈地、搭建帐篷、养狮驯豹，无事不做。有一次他在内宫玩耍烟火，不料引发大火，焚毁大量宫殿，正德帝望着冲天火光，只是开玩笑地说了声：“好一棚大烟火也！”

正德帝到后来已不再满足于这些。他经常外出巡幸，一度长驻宣府镇，但又不允许官员们离开北京城。他不愿再用玉玺，也不愿用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而是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并启用将军印信。至正德十三年（1518），正德帝竟要求给一位名叫朱寿的

将军加封镇国公。他命吏部道：“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领六师，扫除边患，累建奇功，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五千石。”

这位朱寿，不是别人，正是正德帝自己。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自己任命自己为镇国公，真可以说是亘古未见。正德帝还跑到山西太原，与晋王府一位乐工的女儿打得火热，如胶似漆。正德十四年（1519）江西宁王叛乱，天下大震，惟有正德帝十分兴奋，因为他不仅可以显示他的军事实力，而且还可以借此机会去“巡幸”一下他多年想去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此，他决定“亲征”。

实际上，就在他离开北京后的第二天，朝廷就接到了负责江西平叛的王守仁的密报，说宁王已经被俘，无需皇帝亲征。正德帝哪里肯就此善罢甘休！他仍率军浩浩荡荡开赴南京。到达南京前，他突然颁布一道古怪的诏书，禁止天下饲养和宰杀猪。其原因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为“杀猪”和“杀朱”是谐音。正德帝给江南的这份见面礼几乎要引起骚乱，因为南方地区几乎家家养猪，生猪不仅是农家主要副业收入之一，而且猪肉也是当时底层百姓最主要的肉食来源。但正德帝对此全然不顾，依然我行我素，强制推行。

正德帝在南京一住就是八个月，迟迟不肯回北京。富庶繁荣的江南，自然要比肃杀荒凉的北方更令人流连忘返，而美丽清秀的江南女子，大概也比晋王府的乐工之女更吸引人。正德帝哪里肯匆匆而过，自然要把他的“浩荡皇恩”多留些下来。只不过这样一来，苦煞了江南的百姓。好在住了八个月后，正德帝终于返京了。返京途中，他因在清江浦捕鱼，差点淹死，受了惊吓，回京后不久便驾崩了。据说正德帝临终前，也有悔过之意，说以前的那些荒唐事，都是自己之错，怪不得别人。

正德帝做了十五年的荒唐皇帝，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激化了原本存在的许多危机。碰到这样的皇帝，文官们除了冒着挨板子、丢官甚至送命的危险，拼命上疏要求皇帝改变主意外，再无他法，因为皇帝是无法选择的，只有等到他死才能更换。或许正是如此，许多文官对正德帝的死，倒不见得有多大悲伤，反而有点暗中庆幸。他们认为，无论如何，新皇帝应不至于像正德帝那样荒唐，而正德帝无后，也给

他们在选立新帝时留下较大的余地。最后，他们选择了正德帝的堂弟朱厚熜接位，即后来的嘉靖皇帝。在他们看来，这位新皇帝在各方面都比较令人满意，一定会给朝廷带来希望。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大错特错了。

嘉靖皇帝：根不正苗不红

新皇帝朱厚熜出生在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县）。他的父亲朱祐杬是成化帝（宪宗朱见深）的第四子，与弘治皇帝（孝宗朱祐樘）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被封兴献王，就藩安陆。

首辅杨廷和当时力主朱厚熜接位，是有一定目的性的。

依惯例，武宗死后无子嗣，本应从比武宗小一辈即载字辈的宗室中选一位新皇帝。而杨廷和却力主选同辈的朱厚熜接位，严格而言，杨廷和的这种做法，并不尽合大明礼制。他之所以要这样违例行事，原因当然很多，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即看重朱厚熜个人的品行和才学。据说朱厚熜自小就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而且熟悉朝廷礼仪，确实是一个合适人选。何况他当时才十五虚岁，杨廷和大概也认为容易驾驭。没想到正是这位少年，在即位之初，就单枪匹马，与几乎是整个朝廷的文官对抗，并最终达到了目的。

嘉靖帝即位后，首先就提出如何在礼仪上确定他生父母的地位问题。依当时绝大部分文官的意见，嘉靖帝是以弘治皇帝的嗣子身份继位的，理应尊弘治帝为皇考。但这样一来，嘉靖帝就得称自己的生父母为叔父母，这大概勾起了嘉靖帝的心病。

原来，嘉靖帝的祖母邵贵妃出身低微，被其父卖给了杭州镇守太监。在接受了一些书法和文学训练后，她被作为礼物献给了成化皇帝。到嘉靖帝即位时，这位贵妃已被打发到类似冷宫的浣衣局，且双目失明，风烛残年。嘉靖帝的生母蒋氏妃也只是一位武官之女，地位低微。正是在某种自卑而又逆反的心理驱使下，嘉靖皇帝与杨廷和为

首的文官集团进行了长达几年的大礼仪之争，为他的生父母争得了满意的地位和荣誉。

从大礼仪之争中，不难看出嘉靖帝为政为人的某些性格。

首先，嘉靖帝对自己的利益比对朝廷的利益更加看重，为了前者甚至可以不顾后者。嘉靖帝即位之初，天下百废待兴，亟待明君，而他竟然能弃之不顾，为一己之私利而与文官对抗数年，实在是自私之极。

其次，嘉靖帝性格残忍、狠毒。杨廷和是嘉靖帝得以登基的第一功臣，最终却被嘉靖帝逐出朝廷，不存丝毫感念之情。张太后（弘治帝之后，嘉靖帝之伯母）因为冷淡了嘉靖帝的生母，嘉靖帝便抓住一切机会随意羞辱和威逼太后及其家人。在嘉靖三年（1524），嘉靖帝为了其母亲的尊号，竟一次廷杖了一百八十余位京官，其中十七人因伤重致死。这种做法，在明代可谓是空前绝后。

这位嘉靖皇帝在位长达四十五年。在此期间，大明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蒙古人在北部屡屡入侵，构成严重威胁，而朝廷又拿不出有效的办法。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给当地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朝廷为平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庞大的军费开支、皇室的挥霍无度、官吏的普遍腐败、税制的混乱和瓦解以及接连不断的天灾等等，造成了朝廷严重的财政危机。对这些，嘉靖帝似乎有些无动于衷，开始时尚能勉强应付，到后来干脆是消极对抗，甚至还一度把朝廷大权交给了严嵩，时局之败坏就不难想象了。

在漫长的四十余年中，嘉靖帝似乎只对一件事有着长期的浓厚兴趣，甚至可以说是狂热，那就是向神仙祈祷和觅取道家的秘方，以期长生不老。早在即位初期，就有一位叫邵元节的江西道士被他邀入宫中，祈雨禳灾，并“顺便”通过春药之类的办法，为皇帝解决了不育问题。皇帝在即位十多年之后，终于有了孩子，解除了后顾之忧。自此以后，嘉靖帝对道教的魔力更是深信不疑。

邵元节死后，陶仲文进宫接班。陶仲文擅长配制春药和扶乩。在他的指导下，嘉靖帝开始在这方面进行长期的修炼。从嘉靖十九年

（1540）开始，嘉靖帝几乎全力以赴地修炼他的仙丹，并由于长期服用这些含有铅、砷有毒物质的仙丹，而导致了慢性中毒。到后来，嘉靖帝甚至还修炼内丹，大批的幼女被逼入宫内，不知所终。结果引发了一场少见的宫廷叛乱，几位宫女差点用绳子勒死了嘉靖皇帝。

晚年的嘉靖帝几乎成了一个怪物。由于慢性中毒，他严重失眠，以致常常彻夜不眠，批阅奏章。他的情绪极不稳定，记忆力严重衰退。他时时冒出一些古怪的念头，令人难以捉摸。为了哄他，大臣甚至要用种种可笑的办法，如在他睡觉时把桃子放在他身边，说是仙桃等等。嘉靖帝甚至还用扶乩来决定国家大事。也难怪海瑞要上奏章，大骂他是一位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并要他对帝国的危局负全部责任。据说当时嘉靖帝一读罢海瑞奏章，就大喊不要让海瑞跑了，要千刀万剐方才解恨。当得知海瑞已扛着棺材在外面等死时，他却又不想杀海瑞了。

就是这样的一位君主，整整统治了大明朝四十五年。令人不解的是，他居然挺了过来。是靠帝国的惯性、文官集团的忠诚，还是靠嘉靖帝自己的统治手段，一时难以说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嘉靖帝留给那智力迟钝的儿子隆庆帝（穆宗）和年幼的孙子万历帝（神宗）的江山，已是千疮百孔。正如当时民谣所讲的那样，是“嘉靖嘉靖，天下已尽”。

隆庆皇帝：精神病患者

嘉靖帝以后是隆庆帝（穆宗朱载垕）。隆庆皇帝在嘉靖和万历之间，似乎只是一个过渡人物而已。

隆庆皇帝即位时，年已三十岁。他长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中，而他的父亲似乎也没给过他过多的恩宠。他作为长子，很迟才被立为太子。即使在被立为太子后，也没有享受到作为太子应该享有的地位和待遇。嘉靖帝对他和他的异母弟景王，似乎总是不偏不倚，以致于不少人由此猜测，这位太子未必能在老皇帝百年之后顺利接位。这种

经历，对隆庆帝的心理甚至生理，自然会产生很严重的消极影响。

按照传统的说法，隆庆帝是一位节俭和仁厚的君主。这种说法的真实性，现在已受到质疑。隆庆帝的生活根本谈不上什么节俭，传统史家笔法中所讲的仁厚之类的评语，与其说是称赞，还不如说是无能的婉转说法。事实上，隆庆帝智力迟钝，笨嘴拙舌，有人甚至怀疑他有轻度的精神失常。或许正是这些原因，才使得隆庆帝在位期间，总是避免卷入家庭和朝廷的争执之中，也从来不做出任何重要的政治决断。以致于他手下的那些大学士们，经常要隆庆帝参加一些精心安排的盛大典礼，并以此来树立他的威望。

不过，这样的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却要比正德、嘉靖之类的荒唐皇帝好得多。隆庆帝的无能或不愿干预朝廷具体事务的态度，使得他手下那些有能力的官员们能放手去行使朝廷权力，管理帝国。隆庆朝近六年的相对稳定和繁荣的局面，也证明朝廷事务在没有皇帝的干预下似乎也能维持，甚至在某些时候或许能做得更好。万历初期张居正的统治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形。

隆庆帝的统治风格，实际上也为他幼小的儿子万历帝的执政初期种下了善根。由于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阁班子，足以应付朝廷事务，因此，冲龄即位的万历帝，虽不能真正行使权力，但仍能依靠这一文官班子治理帝国，不致发生统治危机。但这种做法，也存在缺陷。因为权力中心的下移，最有可能出现以下的两种局面：一是由数位权臣共同掌权，其后果是极易引起文官之间的倾轧或党争，并必然影响到朝政。二是出现一位大权独揽的权威型人物，并由他以皇帝的名义行使皇帝的大部分行政权力，就像万历初期的张居正那样。但在后一种情形下，又有两个棘手的问题难以解决：一是如何保证这位文官独裁者不用手中的特权为自己的圈子或个人谋取私利，甚至威胁皇帝的地位，动摇王朝的根基；二是如何避免这位文官独裁者的权威一旦失去时所带来的各种灾难性的后果。后来张居正的统治经历，不幸印证了这些推测。

张居正的多张面孔

大明朝历经正德、嘉靖和隆庆三朝而至万历，近七十年的风风雨雨，已使它千疮百孔，根基不稳了。当时的明帝国，已到了非彻底整治不可的紧要关头。开国之君朱元璋留下来的那一套“祖宗之法”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两百多年前朱元璋的统治政策，是依据帝国当时的实际情形制定的。这位从凤阳农村杀出来的半文盲皇帝，做梦也想不到两百多年后帝国的具体状况，这事实上也不能归咎于他。但不幸的是，他的治国之策仍必须被奉为金科玉律，在帝国推行。尽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朝廷也做过些修修补补，但“祖宗之法”的大义宏旨，无法也无人敢去从根本上触动。这种制度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危机，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这种局面，对于万历帝这个不满十岁的小皇帝来说，自然无能为力。幸好有首辅张居正能承担辅佐幼主的重任。他在两位实权人物万历生母慈圣太后和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的有力支持下，控制了局面，使帝国在万历初期一度呈现出中兴的势头。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是明代后期最有作为也是最有争议的权臣。他属于那种有出众才能并且能通过政治手腕去施展才能的杰出文官。他的从政经历，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嘉靖二十六年（1547）考中进士的张居正，熬到隆庆元年（1567）二月，终于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并在同年的四月晋升为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之初，张居正本是一般的大学士，但他很快就利用上层矛盾，踢开了绊脚石，爬到了最高的位置。

他首先支持另一位大学士高拱，赶走了资深的首辅徐阶，让高拱取而代之，自己则伺机而待。隆庆帝死后，张居正终于抓住机会，利用高拱一个言辞不当的失误，把高拱赶回了老家，自己登上了首辅的宝座。在这一过程中，太监冯保主持的司礼监起了关键作用。作为大学士的张居正，去结纳一个太监，即使在当时也算不上什么光彩的事，但张居正毫不犹豫地去做了。因为他深知冯保与万历帝、慈圣太后朝夕相处，在宫内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在这一点上，张居正要比其

对手高拱精明得多。这也是张居正做事的一贯风格。

张居正的官职是内阁首辅。内阁是明代才开始设立的一种机构。明初丞相一职被废除后，皇帝直接控制中央各行政权力机构，承担了大量繁杂的行政事务。事实上，任何一个皇帝，无论他有多么英明能干、精力过人，大概都无法做到事必躬亲，而必须依靠一个秘书机构来做先期处理，分担压力。内阁的出现，正是迎合了这种需求。

既然是皇帝的秘书机构，那么，内阁的权力就很值得玩味。在某些时候，如皇帝年富力强精明能干时，内阁就可能仅仅是一个处理公文至多也只是提出初步意见的秘书班子。但假如皇帝不具备上述的条件时，内阁就很有可能变成实际上的权力机构，而领导内阁的首辅也就很有可能成为帝国的真正统治者了。

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位利用各种条件使自己拥有实权的首辅。在万历朝最初的十年中，张居正在慈圣太后、冯保的有力支持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治和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时，帝国的局面已有了明显的改观。如张居正经过数年的努力，给万历帝留下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财政积余，南北两京及一些省份，都有相当数量的存银。这相对于隆庆朝时的财政而言，简直可以说是奇迹。张居正的理财能力，确实令人叹服！也正是有了这笔积累，万历皇帝亲政后尚能支撑住局面，大明朝也尚能经得起一番折腾。

不过，张居正的做法，在当时就有不少人看不过去。现在看来，张居正之所以要这样做，除个人利益之外，也实在是有迫不得已的客观原因。

张居正交结冯保，并通过冯保影响慈圣太后和小皇帝的做法，就引起不少非议。其实，张居正此举也是传统做法。张居正的所作所为，必须借皇帝的名义进行，才具有合法性。但此时的皇帝，还仅是个孩子，事实上并不具备亲政的能力。因此，张居正自然要交结内廷，取得支持，而同时也希望通过严格的教育，来引导小皇帝能走正路。尽管小皇帝在臣民心目中拥有至高无上的至尊地位，但张居正深知小皇帝也是个孩子，只有严加督导才能成为明君。前任首辅高拱曾

说当时的万历帝，是“十岁幼童何能尽理天下事？”真可谓是一语中的。虽然张居正就是用这句话扳倒了高拱，但他心底里也完全明白高拱道出的是实情。他后来对小皇帝的管教是如此之严，其“不敬”的程度远远要超过高拱的那句话，以致万历帝只要听说“张先生来了”，就打心眼里感到害怕。当然，张居正在死后也为他的做法付出了惨重代价。

张居正在任用亲信、打击异己、独揽大权方面的做法，也招致许多攻击。他在统治期间，大量安插自己的亲信，不仅在北京有一批得力干将，如吏部尚书张瀚、王国光，都御史陈玠等等，绝对听命于他，而且在地方行政以及军队等部门也安插亲信，执行旨意，控制地方。张居正要这样做，原因自然复杂，也不能排除私情方面的因素，但最根本的是帝国体制方面的原因。因为张居正虽位尊首辅，但实际上却不能对现行制度做出重大修改，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没有立法权。不仅如此，即使在具体行政事务上，他往往也只能先用私人渠道，把自己的意见通知下面的亲信，再由这些亲信用公文的形式上达，然后张居正才可以堂而皇之地正式表态，提出处理意见，并用皇帝的名义向下面推行。以张居正为中心的这套非正式的网络，其效率之高，是本朝的行政机构所难以相比的。

因此，从体制的角度来看，张居正所用的手法，在本质上与后来的魏忠贤并无二致。他在内依凭皇帝的信任和权威，在外则广植亲信，自成体系，以避开行政系统的低效率及其干扰。这也是明代权臣首选的政治手法。至于对朝廷的影响，则要看具体的操作者本人如何了。

这并不是要替张居正说什么辩护词。事实上，张居正也确实做了不少传统权臣难免要做的事。他的两个儿子竟先后考中了进士，入了翰林院，别人则自然要起疑心，怀疑张居正是否做了手脚。张居正在其父亲去世后，尽管再三要求“丁忧”回乡，但最后还是不得不遵照皇帝之旨，“夺情”留京，带孝理政。但在许多人看来，张居正是贪恋权位，不遵孝道。张居正回家省亲时，竟用了三十二人的大轿。尽管这是皇帝特许的，但不少人仍坚持认为，这种行为是有逾大臣身份的。更严重的是，张居正在家乡的财产急剧增长，而仅靠他每年数百两白

银的俸禄，是绝无可能做到的，这样也就难免别人有进一步的联想了。到张居正一死，这些都成为他罪行的一部分。

明朝失去最后的机会

张居正死时，万历皇帝已是近二十岁的青年了。在痛哭流涕之余，万历皇帝隐隐约约也感到了些许的轻松。那位令人敬畏的张先生终于走了。

平心而论，万历皇帝早年的表现是令人满意的。他比他的父亲隆庆皇帝要聪颖得多。在母亲慈圣太后和张居正的督察之下，万历帝接受了长期而又严格的正统教育，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圣明的君主。尽管他偶尔也因醉酒、骑马等行为而受到太后和张居正的批评，但总的来讲，仍是个合乎传统道德标准的年轻皇帝。而且在即位初期，他也一直为自己有张居正这样的辅佐大臣而感到庆幸，并自然而然地在许多方面以张居正为榜样。

但在张居正死后不久，万历帝逐渐听到了不少他原先根本无法听到的言论。张居正的对立派开始试探性地放出风声，旁敲侧击地把张居正的种种“罪行”揭露了出来，丑化其形象。万历帝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原先那位令人敬佩的“张先生”的形象，已逐步在脑海中消失，代之而来的是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任人唯亲、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的奸臣形象。

冯保家产的籍没，似乎已使万历帝确信了外面对张居正的闲言。冯保官至司礼监秉笔太监，长期与万历帝生活在一起，深得宠信。他与张居正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冯保家中被抄出财物之多之精，大大出乎万历帝的意料。既然太监冯保尚且能积下如此财物，那么万历帝自然有理由相信，张居正的家产肯定是一笔天文数字。联想到张居正生前对他的那种道貌岸然式的严厉教育，以及由此而受的委屈和羞辱，万历帝当时的心境是不难想象的。他决定对张居正进行清算。

清算是逐步进行的。张居正首先被剥夺了生前所获的太师头衔，几个儿子的官职自然也被罢免。万历十二年（1584），万历帝决定查抄张居正的家产。圣旨一到湖广，地方便立即派员封锁张府，任何人员不得出入，以等待钦差大臣前来查封。此举本是防止张家暗中转移财产，没想到钦差却姗姗来迟，以致张府中粮薪不济，饿死了不少人。

按本朝惯例，追没的财产应是张居正死时的全部家产。因此，其家族在张居正死后两年中的花销，自然要被追补，甚至还要加上可能被转移的那部分。这不仅给查抄带来了技术上的困难，而且也有很大的随意性。依万历皇帝等人最初的设想，张居正留下的家产应该是个大数目，没想到查抄的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钦差大臣想当然地认为查抄数目远远不符合实际，便对张居正长子张敬修进行严刑逼供。张敬修最后被迫自杀身亡，而张家确实也交不出更多的财物，最后不了了之。张家的财产，后来被运到了北京，共一百一十抬，并没有什么值得注目的珍品。不知万历帝过目之后有何感想，大概多少有点失望吧。

假如按张居正一年数百两白银的俸禄来计算，张居正的财产也不能算少。明初朱元璋确定的官员俸禄，本来就低，在后来的二百余年中也基本上没有动过。官员如果只取俸禄，则连其基本的生计大概也难以维持。因此，绝大部分的官员，往往会在俸禄之外，另辟一些财源。只要不太过分，朝野也视之为合理。当然，也有例外，如海瑞就是典型。不过，能像海瑞那样吝啬地生活的上层官员，毕竟是少数，事实上明朝也只有他一个！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海瑞之所以这样做，主要也是为了博取政治名声。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性，因为在绝大多数的官员看来，即使是圣贤先哲们，也主张“齐家”和“治国”并重，假如官做到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份儿上，还不如不做。这也就是人人都讲海瑞好但没有人愿意自己成为海瑞的原因。因此，在明朝后期的这种风气下，做了十年首辅的张居正，仅留下了这点财产，即使是想要整他的万历帝之流，大概也觉得不能算是过分。

不过，既然抄了张居正的家，万历帝自然要给他安一个罪名。至于是什么罪名，似乎无关紧要，只要能证明万岁爷的明察就可以了。

在张府被抄四个月后，朝廷终于总结性地公布了张居正的罪状，大意是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专权乱政等等。本当剖棺戮尸，仅仅是念其多年效劳，万历帝才加恩宽宥。张居正的弟弟和两个儿子，被送到烟瘴之地充军，而对其老母则额外加恩，允许以空宅一所和田地一千亩予以赡养，以体现浩荡皇恩。

张居正及其时代就这样凄惨地结束了。许多人在事过境迁之后，尤其是在明末时局日益恶化之时，才纷纷想起了这位权臣的种种好处，甚至盼望大明朝还能再出一位像他那样的人物来扭转乾坤。可惜的是，大明朝没有也不可能再获得这样的机会了。

万历帝拒斥“贤君”之路

万历帝终于大权独揽了。

亲政以后的万历帝，也未尝不想有一番作为。他精神焕发，励精图治，俨然想成为一位臣民们理想的贤君。皇太后和张居正十余年的严格教育，此时对他仍有一定的影响。他对臣僚的腐化感到忧虑，自己亲自草拟手诏，禁止官员互赠。他对于各种礼仪也颇为重视。早朝、经筵也十分讲究。他热心参与各种典礼，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诚意；同时，还策励臣工勤俭笃实。万历十三年（1585），万历帝为解决长期的旱灾，曾十分努力地去履行祈雨的礼仪。在干旱炎热中，他亲自步行去天坛祭天祈雨，同时也破例让京师的臣民亲眼目睹这位年轻万岁爷的天颜。亲政之后的短短几年中，万历帝曾四次外出祭祀祖陵，不辞辛苦。因此，当时许多人都对这位年轻的皇帝寄予厚望。

张居正死后，上层文官班子作了重大调整，很快就形成了以首辅申时行为首的新内阁。申时行与张居正共过事，深知张居正为何在死后会落得如此惨局的真正原因。因此，他吸取了教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一方面与皇帝保持良好的君臣关系，另一方面他也一改张居正严厉刚正的为政风格，扮演和事佬的角色，竭力维护文官集团的团结，协调朝廷方方面面的关系。在他看来，既然朝廷的制度无法作

根本性的调整，那么，只有理顺君臣关系，加强文官之间的合作和团结，同舟共济，才能维持局面。

也正因为如此，在万历亲政后的最初几年中，朝廷也没出什么大乱子，反而颇有些中兴的新气象。包括万历帝在内的许多人，在那时也都觉得，张居正死后，天也没有塌下来。没有张居正和他的那一套，大明朝的日子照样一天天地过了下去，而且也似乎过得很不错。想到这些，大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不少人甚至还暗暗庆幸：倒张算是倒对了！

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种面很快就被打破了。

首先感到别扭的是万历皇帝。他抄没张居正家产不久，就逐渐发现，张居正的倒台并不像他原先认为的那样简单。在倒张的文官中，有不少人是出于私人恩怨，挟私报复，也有人是出于个人名利，其动机并不见得就冠冕堂皇。不过，在他看来，这些人虽然可恶，但并不可怕，也不难对付。令他感到可怕而且难以对付的，倒是倒张运动中的另一类文官。

这类文官，属于那种强硬而坚决、顽固又拘泥的道德型人物。他们有一套正统的道德和礼仪规范，并认为这是唯一的救世治国的灵丹妙药。帝国之所以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或危机，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他们的那一套没有得到彻底的实行。因此，他们绝对不能容忍那些不合乎道德的言行。他们用警惕的眼光，仔细地挑剔着任何人和事，一旦发现问题，便会毫不犹豫地群起而攻之，其道德狂热和牺牲精神令人生畏。

这些人在倒掉张居正后，并不满足，他们又瞄准了年轻的万历皇帝和文官领袖申时行。万历皇帝越来越感到，这批文官有着十分传统和固定的模式，并竭力要引导自己踏上其理想中的“贤君”之路。自己虽有帝王之尊，但实际上往往只是个摆设，根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事，更谈不上什么保持个性。自己的行为，只要稍有偏离之处，便会招致群臣们各种各样的反对。就像有一张无形的网，罩住了自己，令他感到压抑甚至是窒息。

万历帝曾想亲自训练军队，大臣们便以此举不合祖制为由，力劝他放弃这样的念头。他曾几次去视察自己的陵墓，大臣们又觉得过于招摇，便以安全为由予以取消。诸如此类的事情，已越来越令万历帝不快。而最令他伤心的是，他虽贵为天子，却不能给自己心爱的女人提供她想要的东西。

位尊天子的万历帝，身边自然不缺女人。拥有众多妃嫔，本是皇帝分内的权利，万历帝也不会例外。更何况武宗无后而引起皇位继承危机这一前车之鉴，也令张居正等人觉得有必要让万历帝早日成婚，免得节外生枝。因此，万历六年（1578），在母亲慈圣太后的安排下，年仅十四岁的万历帝娶了一位比自己小一岁的平民之女，即王皇后。在此以后，万历帝又册封了许多妃嫔，其后宫也已颇具规模了。

但是，对于周围佳丽如云的万历帝来说，他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女色本身。当然，万历帝也会偶然兴起，做出一些与他身份不符的事情来。如在万历九年（1581）冬天，万历帝看中了慈宁宫一位年长的宫女，并使她怀上了身孕。可能是万历帝在事后也觉得自己此举不太雅观，所以就一直没敢向太后启齿提及。不过，当时的太后，求孙心切，对此不仅没有责怪之意，反而还很高兴。次年秋八月，这位宫女生下了一个男孩，即后来的光宗。母以子贵，这位宫女也一步登天，被封为恭妃。不过，这种册封，也只是依例而行，倒不见得是万历帝的特别眷宠。

真正让万历帝动心的，是一位后来被称作郑贵妃的女性。这位郑氏，在万历十年（1582）与其他八位女性一起被册封为淑嫔。当时，她才是一位十三四岁的少女。从一开始，她就赢得了万历帝的一往情深，而且可以说是终生不渝。能得到如此恩宠，大概不仅仅是因为她有闭月羞花的容貌，更多的倒是因为她聪明伶俐，意志坚决，喜欢读书，并能与万历帝进行心灵上的沟通。也难怪万历帝在众多的后宫佳丽中，惟独对她宠爱有加。

对于这位郑氏，万历帝自然愿意特殊照顾，尤其是在她也生下一位贵子以后。到万历十四年（1586），万历帝不顾群臣反对，毅然册封郑氏为贵妃，其地位明显高于恭妃王氏。至于万历帝是否真的像群

臣猜测的那样，还想进一步提高贵妃及其儿子常洵的地位，不得而知，但他坚决维护贵妃母子应得的权利的念头，却一直没有动摇。而文官们的做法也与他一样，只不过他们要保障的却是王恭妃及其儿子常洛的权益。双方针锋相对，毫不妥协，也弄得一心想协调双方关系的首辅申时行，出力不讨好，碰了一鼻子灰。在万历帝看来，申时行是压不住群臣，难以服众。而大臣们却又偏偏认定申时行是为了贪图高位，不坚持原则。如此一来，申时行苦心经营的平衡局面，就难以为继了。

爱美人不爱江山，三十年不出宫

万历帝选择的办法就是消极对抗，不与文官进行合作。

他从万历十三年（1585）起，就再也没有踏出皇宫一步，直到他驾崩后被抬着去定陵，前后达三十余年之久。

他虽是这个帝国的皇帝，却不大想承担他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他宁愿待在宫中，与宫女、太监们厮混，喝酒作乐，醉生梦死，用自己的方式享受人生，也懒得理会宫外的文官，几乎到了天塌下来他也可以不管的地步。

他几乎不见朝臣，即使像首辅之类的文官首领也很难见到他。大臣的奏章大多“留中”，不做任何处理。甚至连帝国最神圣庄严的庙祀，万历帝也不亲祭，而是派员代祭。帝国的政治中枢机构实际上处于半停顿状态。

他的这种做法，自然引起了大臣的不满，他们纷纷提出批评。万历十八年（1590）春正月，有一位名叫雒于仁的大理寺评判，上了一个措词激烈的奏章，痛斥万历帝“圣体违和”的病因，就是酒色财气：

“我在朝做官已一年有余，仅朝见过皇上三次。此外只听说圣体违和，一切皆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自处理，讲筵也停止了很久。我知道陛下之病，是有病因的。我听说嗜酒则腐肠，恋色

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

接着，这位大理寺评判一一列出万历帝嗜酒、恋色、贪财、尚气的事实，毫无遮拦，淋漓尽致，把万历帝骂得是体无完肤，也骂出了当时不少大臣的心里话。万历帝自然十分震怒，要严办这位胆大妄为的评判。幸亏有申时行从中全力调和，这位评判才保住了性命。

首辅申时行的日子已越来越难过。尽管他竭力调停皇帝与文官之间的紧张关系，竭力维护文官间的信赖和团结，但这种做法已越来越不起作用。至万历十九年（1591），申时行最终因立储问题而不得不离开相位。

本来，在万历十八年（1590）春，申时行已与万历帝就立储问题达成了默契。万历帝当时曾表示，假如朝臣能不再就此事继续打扰他的话，他准备在两年后册立常洛为太子，否则，就要继续推迟。申时行认为皇帝能做这样的让步，也算是有了交待，因此他要求朝臣不要再在这件事上刺激皇帝，以免弄巧成拙。没想到第二年就有一位叫张有德的工部主事，又旧话重提，惹得万历帝十分生气。而大学士许国、王家屏竟也顺势举疏，要求皇帝兑现前诺。可能是为了增加分量，他们竟然把申时行的大名列在首位，而申时行本人对此并不太知情。在得知皇帝的态度后，申时行给皇帝上了密疏，说明情况。不想此举引起了轩然大波。激进的文官指责申时行表面上佯附群臣请立之议，暗中却又和皇帝勾勾搭搭，极不诚实。申时行有口难辩，终于在万历十九年（1591）秋九月致仕。

申时行的下台，给朝廷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申时行在任之时，朝野几乎一致认为他过于听从皇帝，而不能大有作为。很少有人能真正体会到申时行的良苦用心。申时行所起的微妙作用，直到他罢职之后，才逐渐为人所知。申时行的继任者，已根本无法像申时行那样，左右逢源，维持朝廷的基本局面了。

申时行下台前，文官之间的矛盾已开始尖锐。申时行下台后，更是愈演愈烈。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春天，王锡爵被重新任命为首辅。当时万历帝计划同时册封常洛、常洵两子为王，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还是不想立长子常洛为太子。这一做法引起大哗，许多文

官纷纷反对，新任首辅的王锡爵夹在中间，备受攻击。最后，尽管万历帝暂时放弃了这样的念头，但文官的分裂已不可避免。

在这一年的京察中，当时已掌握相当权力的吏部员外郎顾宪成，与吏部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一起，操纵吏部，把那些与内阁成员关系密切的官员尽量罢免。顾宪成等人的做法，实际是对阁臣不满的体现，弄得刚刚回朝的首辅王锡爵很是下不了台。这种水火不相容的做法，挑起了党争，结果是王锡爵罢职，而顾宪成之流也被撤职，朝廷从此不得安宁，再也没有申时行时代的那种局面了。

朝鲜战争的爆发，也加速了明帝国的衰落。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的丰臣秀吉悍然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战争。明朝作为宗主国，自然出兵援助。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九月，中日双方签订了第一次停战和议。但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丰臣秀吉又重启战火，明朝则再次出兵增援，但起初打得并不顺手。幸亏丰臣秀吉于次年七月病死，战局才开始有利于明朝。到年底，日军基本上被击退。朝鲜战争前后长达七年，明朝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大大消耗了本已不强的国力。

其他如播州杨应龙之乱、宁夏哱拜之乱，也给明朝带来了不少麻烦。而当时尚不太受朝廷重视的努尔哈赤，也已在东北迅速崛起。

边疆的安定与否，历来是中原王朝政局的晴雨表。大明朝的乱相，由此而渐见端倪。

财政匮乏的压力，也越来越沉重。张居正死时，曾给朝廷留下一笔不小的国库积累，国家财政尚能应付。但至万历亲政后，朝廷开支日增，而收入却不见增。像宁夏用兵，耗费一百八十万两白银；朝鲜之役，军费开支七百八十余万；播州用兵，也用掉近二百万两。这还仅仅是军费开支。除此之外，皇室及宗藩的开支也是相当惊人的。万历帝为自己修建陵墓，花掉了朝廷一大笔银两。皇长子常洛及诸王子册封、冠婚用掉了九百多万两，另加袍服之费二百七十余万两。此外，宗室人口的激增（至万历四十年已达六十余万），使朝廷每年要耗费大量禄米和开支。像这样的巨额开支，朝廷是无论如何难以承担的，国家财政也必然难以为继了。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万历帝似乎不太把这种事情放在心上。他依旧出手不凡，照用不误。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他以诸皇子婚娶为由，要求从太仓银库（国库）取用白银两千四百万两。这对于当时的朝廷财政而言，几乎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户部自然难以满足。万历帝见此，竟尽遣宦官到各省核查积银，颇有点不刮尽天下财物决不罢休的架势。此前，万历帝向全国派遣税监、矿使，搜括财物的做法，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至此，他竟又变本加厉，最终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大动荡。更令人不解的是，万历帝把这些钱财敛于内廷，不肯与朝廷分享丝毫。对朝廷的财政危机，他简直就是视而不见，似乎与他毫无关系！

皇帝既然如此，大臣们也自然要为自己的生计考虑。万历后期的吏治，败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一时期的各级官员，似乎很少有不谋私利的。有些官员所积下的巨额财富，令人瞠目结舌，很难与他们每年几十两或至多几百两的俸禄联系起来。像出身贫寒且在当时甚至在今天，都可以被认为是清廉之至的东林党魁顾宪成，在其兄弟分家时，尚获得数千亩的田产。世风日下的程度由此可见。既然皇帝、大臣们的日子是如此好过，那么，天下百姓日子的难过，也就可想而知了。

皇帝与大臣之间、大臣与大臣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进行，而且愈演愈烈。

万历皇帝仍然是我行我素。除了拼命用钱同时拼命捞钱之外，他似乎对朝政越来越没有兴趣，借口当然还是“圣体违和”。可仍有一些大臣，不思体恤，不知深浅，竟然还喋喋不休，说些皇帝决不想再听的事情。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月，给事中赵德完就给万历帝上了一疏，煞有其事地说什么郑贵妃预谋在多病的皇后驾崩后，自立为后，并立其子常洵为太子等等。万历帝最不愿意听的就是这件事，自然不免龙颜大怒，命下诏狱，廷杖一百，开除官职，永不录用。

大概是群臣十余年的不懈斗争，再加上赵德完挨的一百大棍，万历帝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的十月进行了正式册封。皇长子常洛最终被立为了皇太子，同日被封的还有福王常洵（封地洛阳）、瑞

王常浩（封地汉中）、慧王常润（封地汉中）、桂王常瀛（封地衡州）。既然是册封这样的盛典，而且还要成婚，万历帝自然不会过分精打细算，他早就提前向户部提出了两千四百万两白银的预算作为开支。可惜户部拿不出这笔款项，所以最后还算节俭，只用了一千多万。为这事皇帝还对户部有点意见，并派宦官到各地查账，看看是否真的是没钱。大概是万历帝对户部官员的敛财能力不太满意，所以他不得不加派税监、矿使分赴各地，开辟财源，弄得十分不成体统。

或许是万历帝看透了朝廷这帮人物，而一心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多为子孙，尤其是他最宠爱的福王谋点产业，免得在他死后受苦。没想到他的这种做法，恰恰是动摇了大明朝的根基，最后祸及子孙。那位受他百般宠爱的福王常洵，后来在洛阳成为李自成的刀下鬼时，不知能否想通其中的因果关系。

伤透了心的万历帝，在此以后更是心灰意懒，不理朝政。就连朝廷最重要的人事安排，他也懒得过问。而部院主管大臣之类的任命，又非要皇帝钦命不可，否则，也只能空缺。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大学士沈鲤等就向皇帝诉苦说，吏部尚书已缺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刑部、工部只有一位侍郎兼理，兵部则尚书、侍郎全缺，礼部仅存一侍郎，户部也只有一位尚书。总计部院堂上官三十一位，竟缺了二十四个。如果去掉那些在职不谋事的，几乎就是无人理政。对此，万历帝仍是不闻不问。到最后几年，像内阁这样最重要的机构，竟也只有首辅方从哲一人，成了光杆司令。这样的朝廷，怎么还能指望它有什么作为。

朝廷的统治能力下降，还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是，朝廷官员之间的派系斗争至此也越演越烈，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东林党是万历后期党争的主角。在张居正统治期间，后来成为东林党魁的青年官员邹元标，就上疏攻击张居正，说他不丁父忧，名为夺情，实则贪位。张居正以后，又有一批年轻官员，像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等等，在朝中互相呼应，干预朝政，并小成气候。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京察中，顾宪成等人操纵吏部，罢免了一大批与内阁关系密切的官员，激化了矛盾，并最终导致了自己的下台。

此后，朝中大权被浙江人沈一贯、方从哲等掌握，人称“浙党”。但顾宪成等人也不甘寂寞。他们以无锡东林书院为中心，以讲学求道为名，裁量人物，讽议朝政，以天下清流自居，名动天下。顾宪成之流及其后继者，后来被魏忠贤扣上了“东林党”这一大名。

起初，东林党人大多尚能称得上正人君子。他们希望重建道德权威并通过道德手段解决当时的一系列危机。这种激进的道德主义旗帜，加上东林党人本身的人格魅力，在开始时犹如一阵新风，给人带来了希望。但道德的力量，并非无限，它需要有一套合理而有效的制度与之相配套。而且，任何个人或集团都有双重性格，在道德和利益之间摇摆不定。只有实现了相对的利益，才能谈得上道德。除了极少数圣人，绝对的道德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道德还会常常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党同伐异的武器。许多人借道德之名，谋自身利益，并以道德去约束别人，放纵自己。至于他们自己到底相信多少，又去做了多少，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开始的东林党人，就是一些绝对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但当他们的组织一旦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团体时，其性质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东林党的许多行为，实际上就是党争行为，其动机也未必像他们自己当初所标榜的那样堂皇，更多时候党派利益要显得重要得多。他们在野时，对当权者样样看不顺眼，动辄口诛笔伐；而当他们得势时，也同样拿不出切实有效的治国手段来。更严重的是，东林党到后来虽声势浩大，实则鱼目混珠，不仅招忌，而且也为其对手提供了不少口实。后来的血光之灾，其实已于此时埋下了因果。

东林党的主要对手是浙党，以及依附于浙党的齐党、楚党、宣党。两派在一切问题上似乎都要针锋相对，并互相倾轧。浙党沈一贯任首辅时，东林党虽居下风，但顾宪成等人仍团结一大批志同道合者，影响朝廷，甚至出位论政。至万历三十九年（1611），东林党人借京察之名，联合吏部尚书孙丕扬，逐斥浙党诸人，掌握了主动。但不久浙党方从哲入阁，浙党又进入反攻状态。到万历四十五年（1617）京察时，方从哲已居首辅，浙党势力进一步加强，东林党人被纷纷罢免。虽然不久后东林党人又在天启初期占了绝对优势，可是，魏忠贤及其党羽的屠刀，很快就要架到他们的脖子上了。

大明朝就是在这样的吵闹声中被动摇了根基。

遗孤努尔哈赤的崛起

尽管逼死崇祯帝的是李自成，但最终建立起新王朝的是满族人，即女真人。

在明王朝相当长的时期内，外族的威胁主要来自蒙古。辽东的满族还基本上构不成威胁。出乎意料的是，恰恰是辽东的这一不起眼的民族，最终入主了中原，在明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强大的清帝国。

满族的兴起和强大，正是在万历朝。万历朝在辽东问题上的严重失策，以及万历朝中央政权的式微，是导致后来满族入主中原的直接原因。

洪武初期，明朝不断用兵东北，打击北元残余势力，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以辽阳（今辽阳市）、广宁（今辽宁北镇县城）、开元（今开元县城北之老城镇）为中心，下辖卫所，建立起以军统政、军政合一的体制。永乐年间，明朝又在黑龙江西来支流亨滚河（今在俄罗斯境内，名阿姆贡河）口对面的奴尔干，设立奴尔干都司，以镇抚女真等少数民族各部，护送朝贡。但至宣德（1426-1435）以后，奴尔干都司已名存实亡。明朝在女真各部也广设羁縻卫所，授其头人、首领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职，由其各统其部，分而治之，互相牵制。

明廷在东北的做法，一方面是想借适度的军威保持对女真的弹压之势，另一方面又通过授以官衔、给予贸易优惠（互市）等恩惠手段，来笼络住女真各部的首领，并由此间接控制住其所属各部。这一统治模式的关键，在于能否控制住女真首领。每年的冬天，明朝官军往往借“烧荒”的名义，深入女真各部，接见各部首领，赏赐各种物品，让他们在感受浩荡皇恩的同时，诚心诚意地替天朝出力，护边安疆。不难看出，明朝对女真各部的统治，能否有效维持，一方面取决

于朝廷派驻东北的长官能否熟练而有效地行使这套驾驭之术，另一方面，也要取决于女真部落能否长期安于现状，有没有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因此，其基础是十分脆弱的。

至万历年间，这两个方面恰恰都出现了问题。长期经营东北的辽东总兵李成梁，举措屡屡失当。而此时的女真族，也正好出了个野心勃勃、才华出众的努尔哈赤。

李成梁，长期任辽东总兵一职，替朝廷经营东北。他是个名副其实的“东北王”。辽东的财政，他几乎完全垄断。军赀、马价、盐课、市赏之类，也由他一人说了算。其中到底有多少入了私囊，更是无人说得清。全辽东的商民之利，他也尽笼入己。由于经济实力雄厚，他就有条件用重金结交朝廷要人权臣，礼送得重，交情自然就深。那些要人权臣，便个个夸他好。就连万历皇帝，也对他另眼相待。他的儿子个个得以封官，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桢、李如樟、李如梅，都是总兵官，其他如李如梓、李如桂、李如梧、李如楠也官封参将，可谓是一门虎将。他的部将，也多是私人亲信。

在辽东，李成梁几乎建起了一个独立王国。辽东总兵这个职位，好像就是专为他设置的。一旦换了别人，就难以胜任。如在万历十九年（1591）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李成梁一度被调离此职，但其影响力仍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致于他的继任者根本无法真正行使职权。十年之中，辽东换了八帅。无奈之中，朝廷大概也看出了辽东问题的症结，认识到了李成梁在东北的法力，加上其子李如松当时又是朝鲜战场上的主帅之一，便不得不又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干脆重新任命他为辽东总兵。当时的李成梁，已是76岁的高龄了。现在看来，明廷在辽东的这种体制，不可避免地使辽东的局面过分依赖于一人。万历时的辽东，可以说是成也李成梁，败也李成梁。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嘉靖三十八年（1559）出生在建州女真苏克素护部的宁古塔穆昆。其祖父名叫场（或译觉昌安）、父亲名他失（或译作塔失、塔克世），虽不是显赫的氏族贵族，但也大概是指挥使一级的头目。努尔哈赤十岁丧母，因受继母虐待，十九岁那年（万历五年，1577）就分居另过，自立门户。

万历十一年（1583），李成梁带兵进剿建州右卫阿台部时，竟误杀了当时与朝廷关系不错的叫场和他失父子两人。一下子失去了祖父、父亲两位亲人的努尔哈赤，自然是悲痛欲绝。或许是出于内疚，李成梁父子此后一直比较偏袒努尔哈赤。在善后处理中，努尔哈赤得到了明朝的敕书二十道、马二十匹，同时世袭其祖父的头衔，被承认是建州左卫的头目之一。

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起兵，开始了统一建州女真的战争。到万历十七年（1589），努尔哈赤最终完成了对建州女真各部的统一，并一跃成为东北最为强大的女真领袖之一。

对努尔哈赤的崛起及其威胁，明朝并没有清楚的认识。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有两点尤为重要。一是朝廷明显受到辽东前线官员的误导。对努尔哈赤，李成梁先是扶持、纵容。当其崛起后，李成梁又产生畏惧之感，不敢采取断然措施，甚至还梦想借其力量安定女真，以致坐失良机。二是努尔哈赤也对朝廷极表“忠顺”，决不得罪朝廷，骗得了信任。到万历十七年（1589），朝廷竟授予努尔哈赤建州左卫都督佥事一职。万历十八年（1590），努尔哈赤第一次进京朝贡。万历二十三年（1595），朝廷加爵努尔哈赤，授龙虎将军。万历二十五年（1597），努尔哈赤第三次到北京朝贡。

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女真后，开始了对其他女真各部的吞并战争。当时的形势也对其十分有利。在李成梁离开辽东的十年中，辽东主帅竟先后换了八次，根本无法对东北进行有效控制。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央朝政的混乱和懈怠等等，也使得朝廷根本无暇顾及东北。到万历三十年（1602）后，朝廷已开始逐步意识到了努尔哈赤的威胁，但此时的努尔哈赤，已是尾大不掉了。

当熊廷弼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任辽东经略时，已明显感到了努尔哈赤的威胁，而且认为这种威胁不可能在短时间解除。因此，他主张朝廷与努尔哈赤进行谈判，必要时可做出一些让步，以争取时间加强辽东防务。这在当时不失是可行之策，但对于许多住在北京的官员们来说，却绝对不能接受。在他们看来，熊廷弼作为堂堂辽东经

略，竟然要与努尔哈赤妥协，天朝颜面何在！因此，他们群起而攻之，不仅熊廷弼的计划被否决，连熊廷弼本人也被召回。他的继任者便对努尔哈赤采取了一系列所谓的强硬对策，试图予以压服。

但这时的努尔哈赤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恭顺了。他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老城）即汗位，国号大金，建元天命。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他以“七大恨”誓师讨明，出兵攻占明军在东北的重镇抚顺，并击败其援军，明军损失惨重。

至此，朝廷才如大梦方醒，仓促应战。

万历帝这下子有点着急了。

他急命老将杨镐任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杨镐匆匆调兵遣马，组建起一支远征军。可出兵需军饷，但国库空虚，又实在拿不出钱来，因此就有人请求万历帝发“内帑”应急。当时万历帝在内廷积下的钱远远超过军饷所需；但他坚决不肯拿出分毫。大臣们只得向南京户部借支，并刮尽天下库藏积余。拖到八月份，军饷仍然不足，又有人提出挪用天下田赋税银应急，万历帝仍然不肯，因为这里面有他自己的一份。不得已，朝臣又提出加征田赋，这次万历帝却很爽快地答应了。当时朝中官僚机构已严重缺员，内阁仅存首辅方从哲一人，许多部院主管大臣位置空缺，根本无法应付大规模战争，以致方从哲急得要辞职。在这种情形下，大军出征的结果如何，是很难预料的。

万历四十七年（1619）春正月，杨镐在朝廷的严令下，决定分四路出兵，号称四十余万大军。具体布置如下：

北路军。在开原、铁岭一线，由开原总兵马林为主将，从三岔儿堡出边，攻敌之北面。叶赫部出兵万人，也归马林指挥。

西路军。在沈阳一线，由山海关总兵杜松为主将，从抚顺出边，攻敌之西面。

南路军。由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从鸦鹘关出边，趋清河（清河在今本溪附近，当时已失），攻敌之南面。

东路军。在宽甸一线，由辽阳总兵刘为主将，从凉马佃出边，会合由姜弘立率领的朝鲜兵，攻敌之东面。

杨镐自己坐镇辽阳指挥。他要求四路大军在三月初二会师于二道关，合营后再向努尔哈赤的都城赫图阿拉（兴京）进军。

这种战略部署，看起来无懈可击，但细究起来，实际上是书呆子式的纸上谈兵，没有不败的道理。

首先，主帅杨镐本人就无能力指挥这场大战。杨镐虽在官场三十余年，但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是忙于周旋，在军事指挥上并没有多少真才实学。他早年在朝鲜战场上就以无能著称。身为辽东经略，他当时是外不知努尔哈赤方面的敌情，内不清自己手下将领的详情。任命他做辽东前敌总指挥，一开始就是大失策。

其次，四路出击，乍看起来可令努尔哈赤腹背受敌，四面楚歌，但到真正实施起来，就会破绽百出。朝廷的军队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战斗力不强，只能以数量上的优势取胜，但分兵之后，数量优势就不复存在。而且，当时正值东北早春严寒，军队进退不便，加上各路指挥之间关系不和，信息不通，根本谈不上什么协同作战。

相反，努尔哈赤对明朝各路大军的兵力分布、进军路线、会师日期、指挥人员等等，了解得清清楚楚。他以逸待劳，依靠其天时地利，集中兵力，实施各个击破。

战役开始后，努尔哈赤首先集中六旗兵力，在萨尔浒山（抚顺东南）击破了山海关总兵杜松的西路军；随后迅速回师向北，再击开原总兵马林的北路军。杨镐得知西、北两路军惨败，急令东、南两路军队停止前进。但此时东路军已深入敌境一百五十公里。努尔哈赤利用明军之间消息不通的弱点，佯扮成杜松的军队，骗开东路军的营门，大败东路军，辽阳总兵刘战死。最后，四路明军只有李如柏的南路军安全撤退。这就是著名的萨尔浒战役。从此，明廷在东北已毫无军事优势可言，不得不进入战略防御阶段。

萨尔浒战役的大败，除了明朝军事部署上的失误外，还与朝廷内部党争激烈、任人唯亲、政治混乱密不可分。杨镐自朝鲜战争以来，

一再损兵折将，却仍能被任命为辽东经略，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与沈一贯、方从哲等浙党有良好的个人关系。不少人曾反对任命杨镐，认为他实非将才，难当如此重任，但方从哲仍坚决支持杨镐。而这位杨镐到达辽东后，不仅显示出其军事上的无能，而且也不能做到以德服人，共赴患难。无才已是不能容忍了，但如果能有德行加以弥补，那还有点希望。如果既无才又无德，那就难以收拾了。杨镐就是属于这样的人物。

杨镐到达前线后，对四路大军将领一开始就搞厚此薄彼。当时的辽阳总兵刘，最是骁勇善战，但由于与杨镐关系不和，受到打击报复，被派往东路，孤军深入，简直就是让他去送死。这一点，据说就连当时协同他作战的朝鲜军元帅姜弘立也看了出来。他曾问刘：

“然则东路兵甚孤，老爷何不请兵？”

刘回答道：

“杨爷与俺自前不相好，必要致死，咱亦受国厚恩，以死自许。”

到后来，刘也真的战死，以身报国，不知他的死有没有解了杨镐的心头之恨。

不过，杨镐对于该照顾的将领，也十分照顾。如南路军将领、辽东总兵李如柏是李成梁的公子，在战事危急时，他不去全力救应，反而全军撤退。事后杨镐对他不仅不予追究，而且还全力保护。李成梁的另一位公子李如桢，在当时被派至辽东，驻防其老家铁岭。而作为铁岭主将的李如桢，却先是把自己的家人迁出铁岭，后又竟然返回沈阳。当努尔哈赤的军队围攻铁岭时，他在沈阳拥兵不救，导致了铁岭的失守。对于这样一位将领，杨镐也能宽厚待之。可见杨镐待人处事，也真是泾渭分明。

萨尔浒之役后，努尔哈赤乘势反击，攻城略地，辽东局势不断恶化。杨镐这样的人物看来是难以应付了，朝廷于是改命熊廷弼以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熊廷弼到辽东后，整顿军队，弹劾败将，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缮城，积极布防，法严令行，很快取得效果，扼制住了努尔哈赤的攻势。杨镐最后也因败绩被下诏狱论死，一

时辽东为之一振。

当时的朝廷内外，人人都知道熊廷弼是个能臣，他去辽东肯定能扭转局面。同时，朝廷上下也深知，像熊廷弼这样的人，也只能在万不得已时才能使用。熊廷弼性格刚烈，恃才傲物，且不大参与当时的党争，不交结权臣，对各路神仙都不买账。对这样的能臣，东林党人不喜欢，浙党、阉党也不喜欢。因为他掌权以后，谁的日子都不好过。当局势危急时，尚可以利用他去应对危局，也只得容忍他的脾气，但一旦局势得以稳定，那就谁也容不得他了。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十月，熊廷弼就被罢免，改由袁应泰出任辽东经略。熊廷弼在辽东的心血也尽付诸东流。

熊廷弼不是不知道自己经略辽东所面临的困难。在赴辽东之前，他曾向朝廷提出了自己的忧虑，请求朝廷给足粮食，予以时日，“毋中格以沮臣气，毋旁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一句话，就是要求朝廷给予全力支持。明知不可能，却还在痴人说梦，由此可见熊廷弼此人的天真。他总以为辽东局势到了这样的地步，朝廷总不至于还像以前那样待他。没想到他的结局仍像前一次经营辽东一样，稍有起色即被罢免召回，他更没想到在数年之后，他又被起用，并且最终成了党争的牺牲品，弄得身首异处，死无葬身之地。

国难当头一毛不拔，是家风？

辽东的局势稍稍缓和后，万历帝又故态重现。

他依然不上朝。万历四十七年（1619）九月，首辅方从哲恳请万历帝能出御文华殿，召见群臣，面商辽东战守方略，皇帝不予理会。吏部尚书赵焕甚至率朝廷百官跪在文华门，请求皇帝能视朝议政。方从哲则在仁德门跪着，等候消息。他们跪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前，万历帝才命一太监叫他们回去，上朝的事则免谈。赵焕等失望至极，曾上疏责问万历帝：

“如果有朝一日蓟门遭蹂躏，铁骑踏京郊，陛下您是否还能在深宫内高枕无忧，称病却之呢？”

万历帝不仅不视朝，不批不发群臣奏章，而且他依然不肯出钱充辽东军费。辽东饷绝，户部又无银，朝臣多次恳请万历帝能先从内库借支应急，万历帝却毫不松口。户部尚书李汝华无奈之中，下令扣留当时广东进解的一笔金花银（例应入皇室内库），充辽饷之用。万历帝得知后，大为震怒，罚李汝华俸禄一月，并要求他立即补足交入内库，李汝华只得照办。

为了筹集辽饷，朝廷只有加征。万历四十六年（1618）已加征过天下田赋。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二月，朝廷又在前一次加征的基础上，再次加征。至次年三月，又因辽饷不支，第三次加征。三年之内，加征三次，大大增加了天下的赋税负担。这对本已不景气的农村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万历皇帝终于驾崩了，最终躺进了三十余年前就造好的定陵。据说他在临死前，很是后悔自己一生的所做所为，并要新帝为他盖愆补过。现在看来，这很可能是朝廷大臣的杰作。他们借死人之口，用遗诏的名义，来对万历弊政做一些补救。他们在万历帝驾崩后的短短三天内，两次动用内库银二百万两急充边饷，并说这是万历帝临终前的交待。事实上，一毛不拔的万历帝是不太可能这样大方的，不过到这种时候，也由不得他了。

万历帝就这样走了，留给自己儿子和朝廷的却是这副烂摊子。后人至今也弄不懂他为什么要如此。不少人试图给他的行为提供一个合理解释，但至今尚没有一种解释能完全令人满意。

三百余年以后，万历帝和他皇后的合葬墓定陵被掘开，几近剖棺曝尸。他是明代皇帝中获此厄运的第一人，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人。在他生前，他事事为自己计较得失，孜孜求利，没想到三百余年后竟是这番情形。这是巧合，还是老天的报应呢？！

第二章
荒唐岁月荒唐事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终于驾崩了。

死讯传出，天下缟素，举国尽哀。臣民们个个都显出悲痛欲绝的样子。

然而，不少人心里想的并不像他们脸上装的那样。尽管没有一人敢说出来，但许多人当时确实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因为万历帝的时代毕竟结束了。他们寄厚望于新的君主，希望新皇帝能给王朝带来一些新气象，甚至扭转乾坤，摆脱危机。

可是，王朝的现实却再一次令他们绝望。苦熬了多少年的泰昌帝，即位仅一个月，竟撒手归天，追随其父而去。随后接位的天启帝，却又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无知少年，根本无法理政。魏忠贤也因此逐步擅权，操持朝政，把大明朝搅得乌烟瘴气。真可以说是荒唐岁月有着道不尽、说不完的荒唐事。

本已步履艰难、千疮百孔的大明朝，再经魏忠贤的这番折腾，已是元气大伤，难以救治了。

偏心引发国本之争

万历帝死后约十天，太子朱常洛在文官的安排下，经过一番虚情假意的推辞后，终于在八月初一日正式登基即位，年号泰昌。

泰昌帝的正式即位，令天下臣民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在万历帝咽气前的最后一刻，他们仍担心这位太子能否顺利即位。

既然是太子，又何以要担心他能否顺利即位呢？

原来，这位生于万历十年（1582）的朱常洛，其母亲王氏本是一位宫女，地位低贱。当时年轻的万历帝，一时兴起，致使她怀孕生下了朱常洛。对于这位儿子及其母亲，万历帝自然是没有什么亲情的。万历帝宠爱的是郑贵妃和她的儿子常洵。平心而论，郑贵妃和常洵，无论在哪方面，大概都要比王氏和常洛强得多。万历帝的偏心，也是人之常情。

但朝廷的绝大多数文官们不能同意万历帝的这种做法。他们认为，既然皇帝的正宫皇后没有嫡出，那么就应该在庶出诸子中立长。朱常洛虽是宫女所生，但他是皇长子，就理应被立为太子。而种种迹象表明，皇帝似乎没有这样的意思。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在大臣们看来，常洛不立为太子，就是违背了朝廷得以立国的根本基础——祖宗之制。因此，保证常洛的法定权利，也就是捍卫朝廷的立国之本，绝对不能让步。

万历帝见到这些大臣慷慨激昂的样子，心中就有气，也懒得理会。这种态度，反而更刺激了那些大臣们，加重了他们的担心。双方便越争越烈，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就往此事上扯，越扯越乱。这就是闹了几十年的国本之争。

开始时，大臣们要求万历帝速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以免夜长梦多，给郑贵妃的儿子常洵占了上风。万历帝就是拖着不办，任凭他们去争，争到不太像话的时候，就拿几个大臣来惩处，但引起的却是大臣更激烈的抗争。一直到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万历帝才立常洛为太子，同时册封福王常洵诸子。但大臣们很快发现，福王常洵仍留在宫中，不去洛阳就藩，而太子常洛虽为太子，仍受到冷落，地位反而不及福王。他们更据此进一步推测，万历帝册立太子不过是权宜之计，福王取而代之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因此必须坚决斗争，逼福王常洵去洛阳就藩，以致冲突再起。

文官们的这种做法，或许是过于咄咄逼人了。万历帝是否有立常洵而废常洛之意，至今不得而知。但万历帝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他宠爱郑贵妃，自然也就不愿意郑贵妃因儿子远离而终日伤心难过。因为按照王朝的惯例，诸王就藩之后，几乎就等于放逐，很少再有机会回北京。这种生离死别的滋味，对于任何一个母亲来说，也难以接受。万历帝自然不想让贵妃因此伤心，更何况他自己也很宠爱福王，从中也能享受到一些父子亲情、天伦之乐。否则，福王诸子一离宫，眼前只剩下一个呆头呆脑的太子，日子实在也是难熬。因此，万历帝开始时不立太子，或许就是不想让儿子们因册立而有贵贱之分。后来不让福王很快去洛阳就藩，也可能是出于亲情，倒并不一定就是有李代桃僵之意。废立太子，毕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像万历帝这样的君主，决不会不懂这方面的利害关系。

但大臣们决不会这样认为。他们坚决要求福王就藩，并深信万历帝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郑贵妃的调唆。他们的这种想法，并不是没依据。按照历史经验，皇帝无疑是英明的。英明的天子，论理本不会做出不英明的事。因此，皇帝的所作所为，假如出了问题，那么肯定是他身边出了坏人，不是奸臣，就是权阉。实在找不出这两类人，那么就要从他身边的女人找原因。孔夫子就说过，女人与小人一样难

养！其实，在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中，女人哪有什么资格去做坏事？即使有，也应从男人身上去找原因！但当时的男性是不会也不愿意承认这点的。

最后，福王只得去了洛阳就藩。但大臣们仍担心太子常洛的地位，因为郑贵妃还在，并仍深得帝宠，谁能保证郑贵妃不会惹是生非？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果真发生了一件对太子不利的大事，更证实了大臣们的忧虑。此月初四日深夜，一位名叫张差的男子，竟手持枣木棍，打进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的宫门内，击伤守门内侍李鉴，冲至前殿檐下，最后被内侍韩本用等人擒获。

尽管从审讯的结果来看，这位男子很可能是一位神经错乱者。他本来是要找郑贵妃宫中的两位太监了结私怨的，只是不熟悉宫中情况而错跑到了东宫。但许多官员，尤其是东林党人，却宁愿相信这是个阴谋。他们认为，张差是受了郑贵妃宫中太监的指使前来谋杀太子的，其幕后主谋自然是郑贵妃。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之所以能审出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为了包庇郑贵妃，其动机值得警惕，因此坚决要求重审，追查元凶。

现在看来，这实在有点冤枉。郑贵妃纵然有天大之胆，大概也不敢去谋杀太子。退一步而言，即使郑贵妃要谋杀太子，也决不会出此下策。方从哲之流，也同样没有如此之胆。如果郑贵妃真有谋杀之心，而又证据确凿的话，那么，即使是万历帝自己，大概也没有办法保住她的性命，更不用说是方从哲之流了。现在看来，是党争的因素起了大作用。方从哲之流，当时是当权派，自然希望尽早了断此事，不要弄出事端来。相反，东林党那时正处下风，很想借此机会来反击浙党，大做文章。

最后的结果是万历皇帝破例在慈宁宫中召见有关大臣。万历帝让太子常洛与他的三个儿子出见大臣，并严责大臣们的所做所为是离间他们父子亲情。他拉着太子的手，对大臣们说，此儿极孝，朕极爱惜。如果朕有别意，何不早作打算，废立更置，又何必要等到现在，况且朕的诸孙（指太子常洛的三子）现已长成！接着，万历帝要太子说话表态。太子也因事涉贵妃，不愿多惹是非。他要求群臣速速处理

张差，并严厉指责群臣道：

“我父子是何等亲爱，而你们在外廷却议论纷纭。你们这些无君之臣，是想让我成为不孝之子吗？”

话说到这份儿上，群臣们谁也不敢再说三道四。结果是张差被凌迟处死，郑贵妃宫中的两位太监也被乱棍打死。事情总算平息下来。

万历帝在此以前，已有二十五年不见群臣。许多大臣，虽为官多年，也不知皇帝是什么样子。这次万历帝竟然为“梃击案”破例，也说明当时朝廷为太子的事闹得有多凶。

为了这位太子，几十年来，朝廷不知闹出了多少风波，也不知有多少大臣，挨了棍子，丢了官职。现在终于等到了登基的这一天，天下臣民此时的心境，就不难想象了。

泰昌帝即位后，迅速做了些顺应民心的事。如发内廷积银百万两充辽东边饷，解燃眉之急；罢一切矿税及监税的中官，起用建言得罪的诸臣等等。

这一切都是用遗诏的名义进行的，是先帝临终前的既定方针。其实，遗诏往往只不过是一纸借口，是借死人之口，说出活人想做的事情。万历帝临终前，曾召见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各部尚书周嘉谟、李汝华、黄嘉善、张问达、黄克缵等人。万历帝当时还能不能说话，到底说了些什么，只有这些人知道。在这些人起草公布的遗诏中，到底有多少是万历帝本人生前的意思，也只有这些人心中明白。

但无论如何，遗诏确实给当时的朝廷提供了一个清除旧朝弊政的机会。

遗诏首先承认了万历朝的弊政甚至万历帝本人的错误。举凡皇帝托病多年、不见朝臣、不亲郊庙、不御朝讲、不批奏章，以及帑䆠半空、矿税烦尽、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政多事等等，都在检讨之列。这种错误也只有用遗诏形式让躺进棺材中的老皇帝自己去说，否则，其他任何人大概都不便也不敢说。因为老皇帝尸骨未寒，如果由新皇帝来批评他自己的父皇，也不免有不孝之虞；如有大臣出面说出

来，则更有不忠之嫌。另外，去批评一个死人，在“以死为大”的社会中，总让人觉得有点不近情理。但要除弊政，则首先要承认哪些是弊政，因此也只能由弊政的制造者自己去承认。不仅要让他承认哪些是弊政，而且还要让他自己说出清除积弊的具体措施，这样新朝方能依此名义动手。反正老皇帝已死，这样做既不怕他龙颜大怒，也不会伤他脸面，说不定还能让他在死后博得知错即改的好名声呢。

至于新即位的泰昌帝，对此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他十分清楚，他所以能有今天，是仰仗朝廷大臣们的全力以赴。感念之下，他又何必去说三道四呢。更何况他也十分明白，其父在世时的许多做法，也确实太不成体统，不除不足以平民愤，开新政。

因此，泰昌帝即位后，朝廷上下似乎又感到了希望，指望泰昌帝能一改其父之风，与朝廷同舟共济，渡过难关。

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泰昌帝似乎是天生的命薄福浅。他才过上几天大富大贵的日子，就竟然得了重病，眼看着就要不行了。

泰昌帝即位时已是三十九虚岁。这在平均寿命要远远低于今天的明朝，虽已是不算小的年龄，但也绝对算不上太老。大臣们总指望他能当上几年的皇帝，顺顺当当地过上一段日子。没想到他即位不久龙体就出了问题。

或许是压抑得太久，骤遇放松，反而乐极生悲。

泰昌帝自万历十年（1582）出生以来，就没过上顺心的日子。他虽是万历帝的长子，但其母亲原本是慈圣太后慈宁宫里的一位宫女，地位低卑不说，其年龄也要大于万历帝，更无相貌、才华或者是家庭方面的优势。当时年轻的万历帝只不过是一时兴起，才临幸过她一次，没想到她竟生下了后来的泰昌帝常洛，拔了头筹。对于这对母子，万历帝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兴趣，也实在谈不上什么亲情，态度

自然也就十分冷淡。

泰昌帝从小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幼儿时代，他虽不十分懂事，但也能多少感觉到父皇的冷淡甚至歧视，而同住宫中的郑贵妃及其儿子常洵却从父皇那里获得了宠爱，耳闻目睹，对他也多少有些刺激。懂事以后，泰昌帝逐步明白了其中的缘由，也知道宫外有许多同情他的大臣们正在冒死维护他的权利，与父皇抗争。他当然不能也不敢说三道四，惟有小心谨慎，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以免招来麻烦，给不喜欢自己的人留下什么把柄。三十余年来，他没出宫城一步，犹如紫禁城中的一位囚徒。长期的压抑，使他的身心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他在宫中，就是一个木偶似的人物。没有万历帝的旨意，他绝对不敢去做任何事，甚至常常要说些违心话。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发生“梃击案”时，当时尚是太子的泰昌帝，虽明白外廷一些大臣对他的苦心，但在朝臣面前，他也只能顺着万历帝的意思说话，甚至还严责他们是想让他做不孝之子。其苦衷又有谁知？直到万历帝病重临终前，太子尚慑于父威，不敢进去侍候，只得在乾清官门外急得只打转。后来还是在杨涟、左光斗等人的鼓励下，才敢进宫尝药视膳，侍候过一次。位尊太子，年近四十，到这种时候尚且如此，可见他在宫中的日子是何等的难熬。

当万历帝一死，局面顿时改观。泰昌帝从一个囚徒式的太子，一下子成了君临天下的皇帝。这种地位的骤变，对于一个压抑了近四十年的人来说，在心理上恐怕是难以承受的。犹如一根长期受挤承压的曲木，突然间负重全释而很容易折断一样，泰昌帝当时的情形，也是如此。

在声色方面，泰昌帝也似乎过于放纵了一点。在做太子时，慑于父威和当时的环境，泰昌帝是丝毫不敢越轨的。而即位之后，约束全无，泰昌帝似乎要把以前的损失补回来。郑贵妃为了尽释前嫌，一次就给泰昌帝进美姬八人，泰昌帝照单全收。郑贵妃还请泰昌帝册立他最得宠的李选侍（西李）为皇后，而这位李选侍也不忘郑贵妃提携之恩，竟向皇上请求册封郑贵妃为皇太后，最后只因大臣强烈反对而作

罢。泰昌帝与郑贵妃之间，至此已是母子亲情融融，全无往日的怨恨，由此也足见郑贵妃对这位新皇帝的需求是摸得何等透彻，手段是何等精妙。只可惜那位可怜的泰昌帝，全不懂久饿之人不可饱食、久渴之人不可牛饮的道理，遂至不可收拾之境地。

泰昌帝病倒后，自知病势凶猛，回天无术，便先后两次召见内阁首辅方从哲等人。至九月初一日，泰昌帝驾崩，距登基之日仅一个月而已。

泰昌帝的暴卒，令朝廷众臣措手不及。明朝政治重新陷入混乱的局面，最终导致了魏忠贤的擅权。

移宫案和红丸案

泰昌帝突然驾崩后，朝廷于仓促之间急忙着手新天子的即位工作。各派人物纷纷登场，争执重起。

九月初一日天刚亮，泰昌帝驾崩于乾清宫。当时，其宠妃李选侍与心腹太监魏进忠（即后来的魏忠贤）试图把皇长子朱由校挟持在乾清宫，与朝廷官员讨价还价。当群臣要进宫入临时，宫中的宦官们竟然推推搡搡，不让入内，气得给事中杨涟大声斥骂。

大臣们最终还是进入了乾清宫，依礼哭拜了泰昌帝，却发现皇长子朱由校不见踪影。大学士刘一燝追问皇长子下落，乾清宫上下无人应答。刘一燝情急之下，声色俱厉，高声呼喊：

“谁敢匿新天子者！”

这话当然是说给里面的李选侍听的。这时，有一位叫王安的太监想了一计，打破了僵局。他是泰昌帝做太子时的伴读，历来与外廷关系不错。他见此情形，便走到里面去见李选侍，并骗过李选侍，一把抱起皇长子朱由校，拔腿就向乾清宫门外跑去，群臣一看人已到手，也跟着王安跑。宫中的宦官们一看情况不妙，急忙追赶，在宫门处扯

住王安的衣服，要求把皇长子送回宫中。杨涟大声呵斥，与宦官周旋，刘一燝和其他人则乘机把皇长子塞入辇中，急匆匆赶到文华殿。

文华殿内，群臣都在急等消息，见皇长子驾到，一片跪倒，口呼万岁，行君臣大礼。礼毕，群臣们就为新天子即位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有人认为此日午时就可即位，有人提出等到初三日即位。而护驾出宫出力最多的杨涟，则不同意仓促即位。他说：

“今海宇清晏，官内也无嫡庶争夺之嫌。老皇帝才死，尚未入葬，丧服临朝也不合礼制。”

针对有人提出新天子登基则天下人心安定的说法，杨涟反驳说：

“天下安与不安，不在于新天子即位的早晚。只要处之得宜，问题也不大。”

最后，杨涟的意见占了上风，群臣们决定，另择吉日登基。但为防止皇长子落人李选侍手中，皇长子不回乾清官，而是去慈庆宫居住。

杨涟自以为此事处置得当，没想到被太仆少卿徐养量、御史左光斗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他们连声严责杨涟不速立新君，是误了大事。他们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如果事情出了什么差错，你死后的一百多斤够天下人吃吗？”

杨涟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

其实，杨涟与左光斗，同是东林党人，后来也同列为“东林前六君子”，惨遭魏忠贤的毒手。左光斗之所以要如此严责杨涟，正是害怕夜长梦多，新君即位遇到麻烦。

左光斗的担心，有想象的成分，但也有事实的根据。当时李选侍仍居乾清官，控制着宫中的局面。廷臣凡有奏章，必先进乾清官，由李选侍过目，然后才能再到慈庆宫皇长子朱由校手中。对这种局面，许多大臣感到不安。性格刚烈的御史左光斗更是忍无可忍。他上了一个措词激烈、言语刻薄的奏疏，要求李选侍立即移出乾清官，到她该去的哕鸾宫去。左光斗说：

“内廷有乾清宫，犹外廷有皇极殿。只有天子可以居住，也只有皇后和天子可以共住。其他妃嫔，虽可以依次进御，但不可以常住。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避嫌，也是为了区别尊卑。”

然后，左光斗话锋一转，直逼李选侍：

“选侍既非皇长子嫡母，又非生母，没有名分，却至今不早作决断，搬出乾清宫。这是借抚养皇长子之名，行干政专制之实。武后之祸，将再见于今日。将来之后果，不忍道出！”

左光斗这份奏疏，淋漓尽致，毫不掩饰，气得李选侍派员宣召左光斗进宫严责。偏偏左光斗不买账，说什么我是天子法官（御史），非天子召不赴，你们算什么？丝毫不给李选侍面子。大学士中，刘一燝支持左光斗，而首辅方从哲则认为这种事能缓即缓，不必如此急迫。

到天启帝正式登基前的一天，杨涟再次上疏，指责李选侍明托保护幼主之名，阴图专权擅政之实，并要求李选侍立即移宫。内阁学士刘一燝、韩爌，拉着首辅方从哲，要求皇长子立即降旨移宫，并站在宫门外等旨，大有逼官之势。李选侍被逼得没法，只好乖乖地去哕鸾宫。皇长子随即移回乾清宫。

哕鸾宫是打发妃嫔宫女了却残生的地方，与冷宫无异。李选侍年纪轻轻，自然不肯去这样的地方，所以她开始时要临终前的泰昌帝封她皇后，后又要挟持幼主，目的就是想留在待遇较好的宫中，倒未必就是像杨、左之流所说的那样，要驾驭朝政。只不过李选侍做事，总有点胡搅蛮缠，结果给外廷抓住了把柄。话又说回来，像李选侍这样的女性，年纪轻轻，毫无经验，满朝大臣都明着欺负她，她除胡搅蛮缠之外，又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天启帝终于正式登基了。

为了年号问题，也曾有过一番争执。泰昌帝即位时，曾议定第二年启用泰昌新年号，没想到泰昌帝即位仅一个月，就撒手归天。新天子天启帝即位，按理明年就应启用天启年号，但这样一来，泰昌年号实际上就没有位置。无奈之下，朝臣们想了一个变通之法，即把万历

四十八年（1620）的最后四个月算是泰昌元年，到第二年启用天启年号。这种做法，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天启即位之时，朝廷局面还算过得去。虽然内阁首辅仍是方从哲，但当时被称作是正人君子的东林党人，以及不少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官员，在朝廷中也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具备一定的优势。但东林党人并没有利用这一有利机会，树立绝对优势，反而抓住一些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大做文章，闹得沸沸扬扬，到后来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左光斗等人仍抓住李选侍的问题不放。李选侍移宫时，手下人大概顺手牵羊，从乾清宫中盗走一些宝物，被发觉后交法司严办。一时宫中人人自危，谣言四起，说李选侍被逼得要上吊，皇八妹（选侍之女）要跳井云云。御史贾继春很是看不过去，便上书内阁，对朝廷的这种做法提出批评。他说：

“新天子刚刚即位，不应诱导他违忤先帝之意，逼迫庶母（指李选侍）。先帝尸骨未寒，而其妻女却已不保。”

因事及移宫，左光斗、杨涟坐不住了，立即纷纷上书，论争由此再起。天启帝回想起李选侍凌辱其生母、要挟先帝册封皇后，以及妄想垂帘听政诸状，不禁火冒三丈，当众历数其恶，并严责贾继春，闹得朝廷一时沸沸扬扬，不得安宁。

作为首辅，方从哲的做法就跟左光斗、杨涟不太一样。在他看来，处理这类事情，大可不必如此。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反对杨涟、左光斗那种逼李选侍移宫的做法，后来更是反对天启帝公布李选侍的罪状。从其位置来看，方从哲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东林党人决不会同意！他们认为，方从哲的做法，是非不分，善恶不辨，是贪恋权位！因此，在移宫之事平息后不久，他们又抓住泰昌帝的死因，大做文章，重提“红丸案”，把矛头直指方从哲。

所谓红丸案，就是要追究泰昌帝猝死的治疗责任。泰昌帝从起病到驾崩，时间很短，而且在去世前曾服用了两粒红丸，导致病情迅速恶化，所以东林党人纷纷指责这是误诊误服，要追究所谓的医疗责

任。

其实，泰昌帝服用红丸的经过是许多人都知道的，而且也是泰昌帝自己点名要服的。

八月初十那天，泰昌帝已感不适，召御医诊治。到十四日，内侍崔文升进泻药去火，泰昌帝服用后，一昼夜泻了三四十次，病情恶化。京师一时纷纷传言，说这是郑贵妃指使的，是想谋害泰昌帝。于是给事中杨涟、左光斗与吏部尚书周嘉谟逼郑贵妃移宫，使其不能插手治疗，并要求首辅方从哲查办崔文升，督察御医慎重下药等等。首辅方从哲也都一一照办了。

但问题还是发生了。

鸿胪寺丞李可灼本无医术，但不知从何处找到一个偏方，说可以医治皇帝龙体。第一次进药时，被首辅方从哲拒绝。但李可灼仍通过宦官把这件事告诉了泰昌帝。泰昌帝在临终前一天的晚上召见大臣时，就问首辅方从哲：

“鸿胪寺进药者安在？”

方从哲当然不敢说泰昌帝是病急乱投医，只能说鸿胪丞李可灼自称有仙方，但臣等不信，没让他进药。泰昌帝坚持要李氏进药，大臣们不放心，商议再三，决定让两人先试服，结果是一人益一人损，没有把握。正在犹豫之际，泰昌帝坚持服下了第一粒红丸。服下以后，泰昌帝感觉良好，并连赞李可灼是忠臣。但第二粒服下后，病情逆转，到第二天清晨就归天了。

从治疗过程来看，以方从哲为首的大臣们还是十分谨慎的。至少方从哲本人是没有什么把柄可以给人抓到的。

给皇帝治病，历来是件棘手的事。按理说，皇帝是半人半仙式的人物，本应万寿无疆，而不会像凡夫俗子那样食五谷、生百病的。但事实上，即使是皇帝本人，也知道这是骗人的把戏，皇帝也一样会生老病死。但皇帝生病，毕竟与凡人不一样。首先是生了病不能讲，至少是不能随便讲，甚至是明知有病却还要故意讲些万寿无疆之类的谎话，遮人耳目，以免动摇人心。其次是没人敢主动去治，但被点到后

也没人敢不去治。治好了自然有功有赏，但治坏了甚至治死了更是担当不起的罪名。所以给皇帝治病时都要组成一个班子，由官员和太医组成，共同承担责任。在具体诊治时，更是议了再议，先求平安无事，决不冒险。

方从哲自然深晓此事关系重大，决不会乱来。或许是泰昌帝也深知其中原委，求治心切，所以自作主张，先服崔文升进奉的泻药，后又坚持要服李可灼的红丸，导致病情恶化而猝死。

所谓仙丹红丸，极有可能是用道家方法炼出来的一种红汞化合物，一般呈红色，有微毒。这种药物在当时是一种据称可治百病但实际上什么病也治不好的东西，服多了会引起慢性中毒。李可灼身为鸿胪寺丞，并不是御医，本不应该去进什么药。他或许是邀功心切，或许是忠心可嘉，硬是进奉此药，没想到不仅没有神效，反而惹下此祸。但细论起来，李可灼也没有多大罪责，药是泰昌帝自己要吃的，服完以后还称赞李可灼是忠臣。况且泰昌帝要服药时，不仅方从哲在场，其他大学士如刘一燝、韩爌，尚书周嘉谟、李汝华，侍郎孙如游，都御史张问达，给事中杨涟，英国公张惟贤等人也在场。服药之事，众目共睹，没有什么可说的。

或许正是出于大局安定方面的考虑，首辅方从哲决定承认既成事实，不去无限上纲，追究什么责任。开始时，他拟旨给那位进丹药的李可灼白银五十两，算是奖励，同时息事宁人。但很多人对这种处理很不满意。御史王安舜首先弹劾方从哲，说他先是轻荐狂医，后又赏其银两，自掩罪行。方从哲无奈，只得重新处理，改罚李可灼俸禄一年。不久，御史郑宗周弹劾那位进泻药的崔文升，要求把他移送法司治罪。方从哲认为此举太过，便改由司礼监处理。没想到此举引起了朝臣的群起攻击。

御史马三元、焦源溥、郭如楚，给事中魏应嘉、太常寺卿曹珖、光禄寺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祺等等，纷纷上书，说崔文升、李可灼罪该万死，而方从哲竟然徇情包庇，国法何在？给事中惠世扬则撕破颜面，直言方从哲有“十大罪状，可杀三次”。在这种情形下，方从哲再也无法在首辅的位置上待下去了。

到这一年的十二月，首辅方从哲经六次请求，最终获准致仕。

方从哲的时代结束了。他从万历之末开始独秉朝政，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方从哲要对这一时期的所有过失，甚至明朝的灭亡，负主要责任。其实，这多少有点委屈。

方从哲作为内阁首辅，自然要对当时的许多事情负责，但不应负全部责任。大明帝国那时已是穷途末日，任何人也难以扭转乾坤。方从哲之后，东林党人一度纷纷掌权，在朝廷中占有相当的优势，但时局也并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

在天启三年（1623）六月东林党人杨涟首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与魏忠贤及其阉党公开冲突以前，东林党人及其支持者在朝廷中占有相当的优势。遗憾的是，东林党人并没有抓住机会，控制住局势。他们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上，并不是很恰当，不仅被人抓住了把柄，而且引起了朝廷的混乱。同时，他们对当时日益强大的魏忠贤，也没有采取断然的有效措施，予以扼制，到后来终受其害。在叙述这些以前，须讲讲天启初年辽东的局势以及几次内乱。

沈阳失守

天启这个新年号的启用，似乎一开始就预示着凶兆。

天启元年（1621）春三月，辽东战局大坏。努尔哈赤乘初春之机，大举反攻，夺取沈阳、辽阳两大重镇，辽河以东大小七十余城，尽降满洲。经略袁应泰、巡抚御史张铨等人战死。

消息传来，朝廷大震。

本来，在杨镐兵败之后，熊廷弼在辽东已逐步立住了阵脚，辽东局势也有好转。但熊廷弼与朝廷诸臣搞不好关系，满朝文武喜欢他的不多。适逢与他有私怨的御史姚宗文赴辽东阅边，回来后大肆攻击熊廷弼，姚宗文的同伙也纷纷应和，说熊廷弼破坏辽疆。熊廷弼愤然抗

疏求罢，朝廷便派袁应泰这位并不精通用兵之道的文官接任经略之位。没想到才几个月，辽东局势便一溃千里，不可收拾。

朝廷急命王化贞巡抚广宁。在此以前，王化贞以参议守广宁，在辽河西部颇得人心。辽沈失守后，前线无将，便就地任命王化贞为巡抚。至六月，朝廷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驻山海关，赐尚方宝剑，节制诸路人马。熊廷弼竟然在这种危急关头再次上任，真不知他是保国卫疆，求功心切，还是一时意气用事，全不知其中关节！

朝廷此次起用熊廷弼，完全是出于无奈。辽河以东全线崩溃后，朝廷才想起如果熊廷弼在前线，局势当不至如此。于是在大学士刘一燝的提议下，朝廷决定重新起用他，而他也竟然又轻率上任。但此次复出，形势已今非昔比，不仅辽河以东城寨尽失，更严重的是，巡抚王化贞并不听熊廷弼节制，反而处处与他对抗。熊廷弼一到前线，就感到事不可为，凶多吉少了。但他此时已无退路。

熊廷弼一到前线，就发现广宁巡抚王化贞的战略大不对头。王化贞原非帅才，也不知如何用兵，他根本不顾前线的具体情况，一味迎合朝廷的意思，主张不切实际的进攻。这与熊廷弼的战略大相径庭，熊廷弼自然不能同意，双方失和也由此开始。

然而，王化贞是很有背景的人。当时新任兵部尚书张鹤鸣，坚决支持王化贞。此年十月上任的内阁首辅叶向高是王化贞的座主，两人有师生之谊，自然也偏向王化贞。或许是朝廷太需要辽东的胜利了，因此当时朝廷上下几乎是一致支持王化贞的进攻。王化贞则在朝廷的支持下，率广宁的官军四万，合毛文龙的两万余人，先后五次出击，却都是无功而还。熊廷弼也被迫由山海关移镇广宁前线，但已被架空。他多次要求朝廷节制王化贞，但朝廷绝大多数官员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要求王化贞不要受熊廷弼节制，而王化贞也上书朝廷，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辽东。真是有点痴人说梦！

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的部队突然反攻，西渡辽河，一举攻破西平堡，并击败明朝援军。王化贞手下最得力的战将游击孙得功叛降。孙得功原想生擒王化贞邀功，幸亏王化贞在部将的保护下，仓皇逃出了广宁。至大凌河畔，王化贞遇到了熊廷弼，便失声而

哭，熊廷弼则微笑着说：

“六万大军，一举荡平，何至如此？”

但熊廷弼至此也无回天之力。他把自己的五千兵马交王化贞带领，殿后掩护，焚烧积储后全线撤人山海关。此役之败，使辽河以西包括重镇广宁在内的四十余城尽入满人之手，明军的防线几乎退到了山海关一线，并已无路可退。辽东就这样被糊里糊涂地丢得一干二净。

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京师大震。最后是熊廷弼、王化贞一起被逮入狱，论死。兵部尚书张鹤鸣不久也被罢免。熊廷弼这样的结局，多少有点代人受过。不过，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他还有被利用的价值，到后来魏忠贤大杀东林党人时，他还要被当作替罪羊，断送了性命。

从张居正到熊廷弼，似乎不难看出，明末的能干之臣，凡是干出点成绩来的，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辽东的惨败，已给朝廷敲响了警钟。不久，朝廷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至此年八月，孙承宗亲自赴前线经略蓟辽。这在明朝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先例。这说明朝廷已认识到体制上存在的问题。

明朝历来重文轻武，主张文治。武将和兵丁几乎都是世袭，没有什么地位。兵员的招募训练、粮饷的供给等等，差不多都由文官负责。即使遇有战事，前线统兵指挥的主帅，也由文官担任。而最后的决策权往往也由朝廷兵部、内阁的文官掌握。前线战将身边，往往还有文官掣肘。这种体制，本是明朝已十分成熟的文官制度的重要特征，目的是限制军人在帝国中的权力，以免后患。就此点而言，效果当然是很不错的。

但至战时，尤其像辽东之战这种大规模战争时期，这种体制就很成问题。前线的主帅并无战场上的绝对指挥权，几乎所有大事都要由朝廷最后决定。任何人物都可以指手画脚，说上一通，效率之低，可想而知。更何况还有人际关系、粮饷供应、兵员调动补充之类的因

素。就是说，前线主帅受到的牵制太多，不能有效、合理、迅速地制定战略决策，动用战争资源，调动兵力等等。这当然是兵家大忌。相反，努尔哈赤能集政治、军事、经济于一体，最大限度地动员人力物力，把他的满洲搞得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两者相较，优劣自明。明朝在辽东的失败，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杨镐到袁应泰，再到熊廷弼、王化贞，朝廷在辽东节节败退，原因固然很多，前线主帅当然也难逃责任，但责任最大的，仍应是朝廷本身。战争是检验一个政权能力的最佳手段之一！辽东的仗打成这种样子，而朝廷却仍没有改变原有文官制度下的军事体制。直到辽东丢光了，才想起要改革，授孙承宗以全权，但为时已晚。试想，如果熊廷弼几次经略辽东中的任何一次能获如此全权，局势或许就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这当然只是假设，而历史恰恰是不允许假设的。

更为遗憾的是，明朝文官制度的这些毛病，到后来仍顽固地影响着时局的发展。孙承宗不久就被罢免。而在明朝的最后一朝崇祯朝，当朝廷的军队与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以及与满洲军进行生死决战时，这样的事仍是屡见不鲜，可以说是与明朝相始终的。

在距此三百余年以后的1964年农历正月初一日，一位熟谙历史的伟大人物曾即兴评点了明史，发表了一些高论。他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是不识字，一个是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就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这番话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也不乏激愤之情，但确实击中了明朝文官制度下的某些体制性的痼疾。

在天启元年（1621）还发生了另一场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地点是在四川、贵州。此年九月，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利用朝廷在四川征兵赴辽东之际，突然发动叛乱，杀死重庆巡抚徐可求及道府总兵官二十余人，占领重庆，并迅速分兵破泸州，陷遵义、兴文，一时川贵响应者无数，最后兵围成都，并建立大梁国号，封丞相以下官员，大震西南。这次叛乱，一直到第二年才得以平息。

奢崇明的叛乱，还引发了天启二年（1622）二月贵州水西土司头目安邦彦的叛乱。安邦彦自称罗甸大王，攻下毕节。贵州诸部群起而

助之，攻城略地。安邦彦率军直逼贵阳，围贵阳十月之久。城中缺粮，以致发展到饥人相食的地步，先是吃死人，后吃活人，到最后甚至亲友相食。知县周思稷，竟自杀以身充军粮。等到外面援军赶来解围之时，城中原有的十余万住户已所剩无几。

到天启二年（1622）五月，白莲教徒徐鸿儒在山东发动叛乱。明末时，蓟州人王森倡导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下设传头、会主诸号，传授白莲教，一时京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信徒无数。后王森虽被捕入狱致死，但其子王好贤，以及骨干徐鸿儒、于宏志承其衣钵，继续发展白莲教的势力。至天启二年，王好贤等见朝廷尽失辽东，人心思乱，便约定是年中秋节起事。后因计划泄密，徐鸿儒在山东首先起事。他自号中兴福烈帝，建元大成兴胜，率众在山东攻城略地，坚持了九个月。徐鸿儒最后兵败被俘，送京师，磔于市。临刑前，据说他曾长叹道：

“我与王好贤父子，经营二十余年，徒党不下二百方，事竟不成，天意也！”

天启初年的这些外祸内乱，已预兆着天下大乱的日子为期不远。大明朝的法统地位已受到严重挑战。不仅关外的努尔哈赤已立国有年，对大明朝虎视眈眈，就连四川的永宁土司奢崇明、贵州的水西土司安邦彦，竟也敢称王立国，来与明廷一争。而山东的徐鸿儒，更是自号中兴福烈帝，建元大成兴胜，公然认为改朝换代的时代已经到来。大明朝的权威，已经开始到了崩溃的边缘了。

从川贵、山东的三起内乱来看，大明朝的虚弱与无能至此也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叛军在开始时几乎遇不到真正有效的抵抗，如近在京畿的山东，在徐鸿儒起兵时，境内几乎无官兵可调可用。而在平叛过程中，中央政府也几乎无力顾及，不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中央政权的权威，在关键时刻要有实力作为基础，否则肯定难以长久维持！

那么，这时候的朝廷官员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呢？他们又在干什么呢？

魏忠贤的时代

在当时朝廷的官员中，最有实权的是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同时，魏忠贤的势力也开始急剧膨胀。

在万历朝后期，方从哲为首的浙、齐、楚三党占据优势，东林党人处于下风。但自方从哲下台后，东林党人便开始在朝廷中占据上风。

在万历驾崩到方从哲下台前，先后新增补了史继、沈？、何宗彦、刘一燝、韩鑛、朱国祚、孙如游等七人入阁，另起用叶向高重新入阁。但当时许多人都在原籍，在京师任职的只有刘一燝、韩鑛、孙如游三人，另加上首辅方从哲。到方从哲一走，孙如游紧接着在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罢职，内阁中真正任职的只有刘一燝、韩鑛两人。这两位都可以算是东林派的。另外，朝中最有人事权力的吏部尚书周嘉谟也是东林党的同盟者。周嘉谟大量起用万历末期被废籍的官员，逼走浙、楚、齐三党的骨干分子。朝廷的形势立即发生了变化。

在此年六月，沈？、何宗彦、朱国祚到京任职。十月，叶向高、史继也回京上任。东林人叶向高任首辅。东林党人仍能控制内阁，在部院要职中也占优势。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天启三年（1623）。

不过，在这种优势之中，也潜伏着隐患。那就是太监魏忠贤势力的迅速壮大。

魏忠贤，原是河北肃宁县的一位无赖浪子。他从小就在社会底层闯荡，很有些江湖阅历，能骑善射，喜爱赌博，拥有赌徒的那种冒险心理。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一类人物！他们往往是动乱时代的弄潮好手。他们具备许多常人不具备的禀赋。他们书虽读得不多，但很精通社会上的各种厚黑之道，正统伦理道德对他们几乎没有多大约束。他们做事心狠手辣，决不拖泥带水，只要能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更重

要的是，他们视人生如赌博，敢于冒险，敢下大注。这一点却正是许多读书人所缺乏的！中国历朝历代，只要一遇乱世，就能看到这些人登台亮相，逐鹿中原。成功者开朝立国，封侯做相，名垂千世。失败者虽身首异处，死无葬身之地，但也能把天下搅得天翻地覆，风光一番。至于身后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对这些人而言，也就无所谓了。

魏忠贤就是此类中的杰出人物。

当在肃宁老家混不下去时，魏忠贤愤然自施宫刑，到天子脚下去搏杀一番。且不说自残在当时医疗条件下所带来的撕心裂肺的疼痛，单就当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道德准则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压力，就足以让一般人对这种富贵捷径望而生畏了。更何况即使做了太监，也未必就能出人头地。但魏忠贤就敢下这样的赌注。

魏忠贤入宫后，投到太监魏朝的门下。那时他的名字仍叫魏进忠。他曾做过天启皇帝生母王才人的典食，大概是管理王才人饮食之类的宦官。后又排挤魏朝，改投太监王安门下，开始在甲子库供职。当时王安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他最早是泰昌帝做太子时的伴读，后又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权力很大。这位王安与外廷关系很不错，东林派的官员在许多问题上都要依仗于他，也很看重他。

魏忠贤开始时不仅走魏朝、王安的路子，而且还结交了一位十分重要的女性，即客氏。客氏原是河北定兴县侯二的妻子，后来被选为天启帝的乳媪，即奶娘。这位客氏，开始时也私侍过魏朝，当时宫中称之为“对食”。这本是宫中宫女、宦官解决生理心理失衡的一种常用办法。结成“对食”的两人一般也地位相当，差距不会太大。魏忠贤挤走魏朝后，便与客氏打得火热。这位客氏，与天启皇帝感情很深，形同母子，在皇帝面前很能说得上话。魏忠贤因此也能通过客氏，亲近皇帝。

在考察历史时，冠冕堂皇的材料固然重要，但也不要因此被它们蒙蔽了眼睛，因为像人情世故之类的因素往往也很起作用。人类社会的演进，或许从长远来看是有必然规律可觅，但从短期而言，往往并不是如此有逻辑，有理性，反而显得混乱、不可捉摸。之所以如此，

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有一条不容忽视，那就是人情。有许多事情，在人情面前往往走样。当然，这种人情，要比今天所讲的人情，无论是在内涵或形式上，都要复杂得多。

皇帝其实也是人，不过是被神化了的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与常人无异。不过由于他高高在上，一般人难以与其接触、交流。但有两种人却不一样，他们有条件与皇帝建立感情。这两种人，一种是生理残缺的宦官，一种是皇帝身边的女性。

宦官并不是明朝的特产，但明代宦官在朝廷政治中的影响之大，却是有名的，在历史上大概也只有东汉、唐代后期可以相比。本来，宦官只是残缺之人，供皇室在宫中驱使，形同奴仆，难以有多高的地位。而历史上却屡有宦官干政之祸。究其原因，仍与君主专制集权这一体制有关。天子深居宫中，整日与宦官厮混在一起，关系非同一般。而皇帝的许多事情，也离不开宦官，生活上姑且不说，就连许多朝廷大事也由宦官操持。只要运作环节出现问题，如皇帝或年幼、或龙体不安、或智力愚笨等等，那么宦官在某种程度上就可行使皇权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权力，宦官干政也就难免了。

明代的宦官干政历来已久。太祖朱元璋曾有意识地抑制宦官的权势，如不许宦官识字，给宦官的待遇也不高。当时宦官的人数也不多，而宦官的职责也仅是洒扫侍奉。朱元璋曾在宫门立一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之类的文字，目的是严禁宦官干政。但时间一长，朱元璋也就不得不依靠宦官做事了。到永乐皇帝时，因宦官在靖难夺权中有功，成祖感念之下，重用宦官，像郑和之类的宦官，竟能代表朝廷，率军宣谕海外。同时，随着内廷制度的确立，太监也获得一些名正言顺的权力，如居“二十四衙门”之首的司礼监，其秉笔太监与内阁首辅对柄机要，实际上是皇帝在宫中的秘书班子，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在明代正统、成化、正德、万历诸朝，都曾发生过宦官干政的事。

如果更仔细地去探究一下，还会发现，凡是有宦官干政的朝代，则必然有这样一些条件，如皇帝或年幼无知、或消极懈怠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些皇帝从小生活在宫中，与宦官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如英

宗（年号正统、天顺）、宪宗（年号成化）、武宗（年号正德），以及后来的万历帝。而像嘉靖帝，做了四十余年皇帝，而且做得也很糟糕，但他在位期间，却无宦官干政之类的事发生，这大概与他少年时代没有生活在宫中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相对于宦官而言，皇帝身边的女性擅权的例子在明代则要少得多。能影响皇帝的女性有两类，一类是皇帝的母亲即太后或类似于母亲身份的人，一类是皇帝的后宫，如皇后、宠妃等等。一般而言，这类女性深居宫内，不太容易出头露面与外廷交接。她们干政的办法只有两个，或直接出头露面，垂帘听政；或利用娘家人，如父亲、兄弟，即一般被统称为外戚的，在朝廷作代理人。这在明代都不太可能。

客氏在明代是个特例。她原本是一个乳娘，地位实在不高。一般而言，像这种女性，到皇室的孩子过了哺乳期后，就会被稍作赏赐，逐出宫门，绝不允许再留宫中，以免孩子日久生情，也避免惹是生非。客氏却例外地被留了下来，这或许是因天启帝生母王才人早逝，缺人照顾。留在宫中的客氏，如同天启帝的母亲，与儿时的天启帝结下了很深的感情。

不过，即使如此，客氏也没什么翻天的本领。问题就出在客氏身边有魏忠贤。魏忠贤一方面可以通过客氏取信于天启帝，另一方面，又可以依此控制司礼监和东厂，并以天启帝的名义来干涉朝政。这样一来，天子名义上仍是天启帝，但其权力实际上已落人了魏忠贤手中。

宦官之类的皇室奴才犹如主人豢养的家犬。主人要是驯养得好，它们犹能忠心耿耿，看家护院，不会出什么乱子。如果主人看管得不好，它们就很有可能跑出豪宅，惹是生非。由于主人地位显赫，一般人不仅不敢打，反而要百般依顺、献媚，免得它们发起性来咬自己一口。当然，也有少数不知深浅的人，嚷着要主人管管，主人却不听，而这些人便又做出要打狗的样子，却又慑于它们主子的威严，不敢真的去打。对这样的人，狗能不咬吗？

其实，又何止太监是这种样子呢？

泰昌帝假如能活长一点，魏忠贤大概还不会这么快地崛起。泰昌帝即位时，他做太子时的伴读王安控制着宫中，并与外廷有着良好的关系。可惜泰昌帝即位仅一个月就撒手归天，并由他的儿子天启帝即位登基。这样一来，魏忠贤的机会就来了。

天启帝即位后不久，魏忠贤（当时仍叫魏进忠）、客氏立即获得殊荣。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其子侯国兴、弟客光先，以及魏忠贤的弟弟等俱获锦衣卫千户的职位。不久，魏忠贤由皇帝赐新名忠贤，从此，魏进忠被称作魏忠贤。这在当时是莫大的荣誉！

魏忠贤要控制内廷，就须先搬掉王安这块绊脚石。王安当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权力很大，而且与外廷关系也很密切。魏忠贤自己不便出面，便指使给事中霍维华弹劾王安，罗织罪名。他自己在宫内配合，矫诏发配王安充南海子净军，并指使手下将其迫害致死。王安之死，对天启初的朝廷政治影响很大。外廷文官，尤其是东林党人，失去了宫中的一位有力支持者。奇怪的是，当时朝廷的许多官员并没有竭尽全力去营救他。

除掉王安，是魏忠贤借用天启帝名义而进行的第一个杰作。当时的天启帝，只不过是一位十四五岁的少年，处于凡事似懂非懂的年龄。在他看来，魏忠贤、客氏是他最可信任的人。不仅如此，这位少年天子似乎也没弄清皇帝到底是干什么的，自然对朝政也不感兴趣。他最感兴趣的是做木工，整天斧锯锥凿，引绳削木，做了拆，拆了做，忙得不亦乐乎。

魏忠贤正是利用这位皇帝，内外勾结，来达到获取权力的目的。魏忠贤很会笼络人。他不仅把天启帝哄得团团转，而且还纠结了一批死党。像司礼监的王体乾、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等，都是其骨干。外廷送上来的奏章，先由这些人审阅，然后再请示魏忠贤，只有魏认可后，方能施行。据说魏忠贤往往乘天启帝在忙木匠活的时候去汇报请示，天启帝受到干扰，很不高兴，于是就会说：

“朕已经知道了，你们去好好办吧！”

具体是怎么办的，只有魏忠贤自己知道。

魏忠贤还善于拉拢结交外廷的官员，投其所好，予以实惠，争取支持。在这一点上，东林党人远远不及魏忠贤。他们整天摆着一副君子的面孔，动辄仁义道德、臧否人物，拒人以千里之外。除非真正是与他们意气相投的人，或者是想利用他们的人，才会不计较他们的待人接物的方式，与他们互相呼应。一般人对他们大多是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反过来，东林党人也不屑与那些他们认为品行有问题的人来往。

魏忠贤在外廷结交的人，开始并不多。如前述弹劾王安的霍维华，就属于魏忠贤最早的外援之一。但这些人的地位并不是很高。魏忠贤较早结纳的重臣当是内阁大学士沈？。沈？，是方从哲的人，浙党骨干，早年在翰林院时，曾给宫中的宦官授过课，魏忠贤之流，都算是他的弟子。泰昌帝即位后，方从哲重新起用沈？，并让其入阁，做大学士，参预机务。

沈？入阁后，因有早年的一段缘分，便与魏忠贤结为同盟，里外援手。魏忠贤的羽翼便开始丰满起来了。

对魏忠贤在宫中的这些活动，外廷的东林党官员也多少有点觉察。侍郎陈邦瞻、御史周宗建、王心一等，在天启即位之初，就力主要客氏出宫。客氏也曾一度被遣出宫，但因天启帝思念不已，竟连饭都不肯吃，朝廷只得又宣其入官。后来虽仍有官员要求客氏出宫，但天启帝一概不理。

第一个被魏忠贤赶下台的东林党官员是吏部尚书周嘉谟。周嘉谟是位实权人物，做事很有能耐。他不仅起用了大批在野的东林党官员，而且还逼走与东林党不和的许多浙、楚、齐三党骨干。他得罪魏忠贤是由于他不满霍维华的为人，并找了个机会赶他外放出京。魏忠贤因此大怒，唆使给事中孙杰，弹劾周嘉谟是受刘一燝之托，要为王安报仇。天启元年（1621）十二月，周嘉谟被罢免。

第二位是顾命大臣、内阁大学士刘一燝。此公在方从哲致仕后的一段时间内，与韩鑛一起主持内阁，做了不少实事。魏忠贤怀疑他在幕后组织言官攻击沈？，便与沈？处处为难他。到天启二年（1622）三月，刘一燝被罢免。不久又因熊廷弼兵败辽东事受牵连，被削籍。

魏忠贤的这种咄咄逼人之势，引起了东林党的反击。他们先是猛烈攻击沈？。不成之后，又转而攻击已致仕的前任首辅方从哲，即沈？的后台，来达到攻击沈？、限制魏忠贤的目的。

天启二年四月，吏部尚书孙慎行上疏追论方从哲进红丸之罪。天启帝下其奏疏令廷臣集议，都御史邹元标、给事中魏大中等一百余名朝官，纷纷要求治方从哲之罪，一时议论汹汹。不过内廷却在庇护方从哲，不治其罪。倒霉的又是崔文升、李可灼，两人被加重处罚，李可灼被充军戍边，崔文升被放逐南京。弄成这样的结果，孙慎行觉得脸面无存，不久便以身体有病辞官而去。这正中了魏忠贤下怀。

东林党人在此种情形下，继续攻击沈？。刑部尚书王纪再劾沈？，把他比作蔡京。不久，王纪被削籍而去，而首辅申时行也迫使沈？在这年的七月下台。沈？的下台是东林党人的一个胜利。是年八月，东林党人孙承宗又经略辽东，形势似乎又有利于东林党。

魏忠贤当然不会罢休。他很快利用首善书院之事，进行反击。此年十月，左都御史邹元标、左副都御史冯从吾这两位东林中坚人物，在魏忠贤等人的压力下，被迫辞职。到天启三年（1623）正月，魏忠贤又成功地让他的党羽顾秉谦、魏广微两人入阁（同时入阁的还有朱国桢、朱延禧），弥补了沈？走后内阁无人的损失，牵制叶向高等东林党人，并为控制内阁埋下了伏笔。

在天启三年，东林党人仍在朝中占据着很大优势。在内阁中，有首辅叶向高、韩爌主政；赵南星居左都御史之位（十月改任吏部尚书），手下有李腾芳、陈于廷两员大将；科道则有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秉宪、魏大中、袁化中等人控制；李邦华、孙居相、王之寀、郑三俊、邹维涟、夏嘉遇、张光前、程国祥、刘廷谏等人则也在各部院占据重要位置。一时声势浩大。

然而，这种兴盛背后，也潜伏着危机。

东林党人做事过于书生气。他们的处世标准就是道德至上。他们不仅自己标榜道德人品（事实上，在东林得势时，已有不少官员是带着功利目的追随东林党的，难免鱼目混珠），身体力行，而且也用此

标准待人接物，全然不懂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更不知施用政治手腕，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东林党人眼里，是掺不得半点沙子的。凡是他们认为品行不端、行事不正的人，他们决不放过。这种做法，且不论其门户党派之见，单就现实而言，也是行不通的。当时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游移在善恶好坏之间，其从善从恶，往往是一念之差，难以绝对化。而东林党人对他们却横眉冷对，拒人千里之外，这势必导致人人自危，把许多本来可以争取的官员推到了魏忠贤的怀抱，反受其害。

如天启三年正月入阁的魏广微，当时虽已上了魏忠贤的船，但开始时并不死心塌地，仍希望与东林党人结些人缘。魏广微入阁后，曾三次到当时任左都御史的赵南星家中登门拜访，以表诚意，因为赵南星与其父魏允贞（字见泉）是多年好友，交情不浅，长期以来也视魏广微为通家世子，关系很不错。但赵南星竟然三次拒见，不给任何颜面，还在背后说："见泉无子也！"意思是说魏允贞怎么会生出这种儿子的！魏广微听到后，对赵南星恨之入骨。从此以后，他死心塌地跟着魏忠贤，跟东林党人坚决作对。

当然，赵南星的这种做法，也可被誉为疾恶如仇（事实上，至今仍有不少人是持这一评价的），但在朝廷当时的这种环境中，作为东林党魁，这种丝毫不讲一点政治手腕的做法，恐怕是弊多利少，至少是不如魏忠贤高明，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假如站在魏广微等人的角度想想，大概也就可以理解魏忠贤到后来为什么能网罗到这么多的干将，天底下为什么一下子会涌出这么多的坏人。

东林党人的政治操作手法，也大有问题。他们寄希望于天启帝的觉悟，一有什么问题，就拼命上疏，希望皇帝能给他们一个公断。他们全然忘了天启帝只不过是一个热心于木工活的懵懂少年，更似乎忘了此时的内廷甚至天子，也由他们的对手魏忠贤牢牢控制，传出来的圣旨也说不清是魏忠贤的还是天启帝的。更可笑的是，东林党人往往稍有不合，便愤然辞官挂职，以显示自己的清白和气节。自周嘉谟开始，许多东林党人先后因此挂职而去。这不是正中魏忠贤的下怀吗？

魏忠贤的做法，却绝无这种书生气。

他自天启元年（1621）开始杀王安，逐周嘉谟、刘一燝后，便步步先手，得寸进尺，有效地扩充了自己的实力。天启二年（1622）三月，魏忠贤开始在宫中举内操，选武阉，练火器。至天启三年（1623），他的宫中军队已达万人之多。此年初，魏忠贤派出刘朝等四十五人，先后至山海关“较事”，犒赏将军，控制军队，刺探军情。不久，他又彻底清洗内宫，杀天启帝选侍赵氏、裕妃、冯贵人，迫害张皇后，牢牢控制住了内宫。

天启三年十二月，魏忠贤开始统辖东厂，不久他又任命田尔耕出掌锦衣卫，许显纯主管镇抚司。对厂卫系统的控制，标志着魏忠贤掌握了只对皇帝负责的司法和惩罚特权。对除皇帝以外的天下所有臣民，魏忠贤都可以罗织罪名，通过厂卫组织，采取包括死刑在内的各种手段，而不必通过朝廷三法司的正常司法程序。从此以后，魏忠贤手中便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

到这个时候，执政的东林党人已无退路了。他们必须与魏忠贤摊底牌了。但此时的魏忠贤大概也不怕哪个与他摊牌了。

二十四大罪

天启四年（1624）六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东林党人正式与魏忠贤摊牌。杨涟在天启元年因移官案被罢官回乡，到次年又以礼科给事中重新起用，此时已官至左副都御史。

在此以前，东林党人已纷纷向魏忠贤开火，猛攻魏忠贤。御史李应升以内操之事，给事中霍守典以魏忠贤乞祠额之事，御史刘廷佐以魏忠贤滥荫之事，给事中沈惟炳以魏忠贤立枷之事，纷纷上疏弹劾魏忠贤，但没有效果。于是，东林干将杨涟亲自出马，上疏痛斥魏忠贤。

杨涟这篇奏疏，写得气势磅礴，淋漓尽致，很有震撼力。

奏疏一开始，杨涟就点出魏忠贤的痛处：

“太监魏忠贤者，本市井无赖，中年净身，夤入内地。”

然后笔锋一转，给魏忠贤的罪恶定性：

“初犹谬为小忠小佞以幸恩，继乃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

接着，奏疏洋洋洒洒，层层深入，列出魏忠贤“大奸大恶”的具体罪状。“二十四大罪”基本上可分成这样几类：

自行拟旨，擅权乱政。魏忠贤擅权以后，从阁臣中夺得拟旨大权，甚至代皇帝内批，坏了祖宗规定的政体。

斥逐直臣，翦已之忌。魏忠贤上台之后，先后利用各种手段斥逐了刘一爆、周嘉谟、孙慎行、邹元标、王纪、钟羽正、文震孟、江秉谦、侯震旸等，阻止孙慎行入阁等等。

清洗宫廷，谋害异己。魏忠贤杀王安、冯贵人、裕妃、赵选侍，迫害张皇后等。

其余如重用私党，亲属滥用恩荫，利用东厂陷害忠良，生活糜烂腐化、穷奢极侈等等，无一不列。

杨涟奏疏所列诸多罪状，几乎事事有据，击中了魏忠贤要害。任凭其中的一条，就够他受的了。

据说魏忠贤一开始很有点紧张，曾求助于内阁大学士韩鑛，希望他出面缓和一下，韩鑛没有理他。魏忠贤见事情已无回旋余地，便立即进行全力反击。

魏忠贤出手不凡，第一招就占了先机。

他走的第一步自然是先去稳住天启帝。他跪在皇帝面前，像受了满肚子委屈的孩子，泪流满面，哭诉着自己的无辜和清白。他还口口声声要辞掉东厂这一摊子事。言下之意，是表明自己只是为皇帝您卖命才接下此事，并不是贪图什么权位，而杨涟这些人竟然如此，真是没法干下去了。

而那位客氏，则为皇帝剖析朝廷格局、人际关系以及魏忠贤为什

么如此招忌的缘由。她要让皇帝明白，朝廷党派林立，各为其利，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魏忠贤为皇上尽心竭力做事，哪能不得罪人呢？像杨涟这样的官员，怎么能不恨魏忠贤呢？

魏忠贤在宫中的那班兄弟死党，像王体乾等等，也纷纷登场。他们以自己耳闻目睹的种种“事实”，竭力在皇上面前称赞魏忠贤，叙说他的劳苦、他的高功、他的耿耿忠心，并让皇上相信，像魏忠贤这样的忠臣，真是人才难得，也是朝廷的福气！

这些“肺腑”之言，真是丝丝入扣，合情合理，深深地打动了天启帝。天启帝放心了，心想原来如此，魏忠贤完全不像杨涟说得那样坏。所以他温旨慰留魏忠贤，让他继续安心做事。对杨涟等人，天启帝真是越想越气。第二天，天启帝就把杨涟的奏疏下给朝廷，并严厉斥责杨涟等人无事生非。

天启帝至此已完全倒向了魏忠贤的一边，对他更加深信不疑，放手不管。

魏忠贤的做法，实在是高明。相比之下，杨涟等人几乎就不是其对手。

杨涟一开始就犯了大错。像这种事关重大的大举动，事前本应绝对保密。而杨涟却没做到这点。他在起草这份奏疏时，已有不少人知道此事。而且，像这种奏疏，也应在早朝之类的场合直接面呈天启帝，不让魏忠贤有自我辩解的机会。据说，杨涟原先也是准备这样做的。他写好奏疏后，本准备在次日早朝时面呈皇上，不料正遇次日免朝。杨涟担心奏疏之事泄密，竟把奏疏直接送到会极门，进呈入宫。他似乎忘了宫中已被魏忠贤绝对控制，在天启帝读到这份奏疏之前，肯定会先落入魏忠贤手中。真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杨涟被严旨斥责后，自然是激愤不服，也知魏忠贤肯定做了手脚，因此准备再次去皇上面前弹劾魏忠贤。但魏忠贤会再给他这样的机会吗？

魏忠贤得知杨涟的意图后，立即设法阻止天启帝上朝，连续三天免朝。等到第四天早朝，天启帝出来了，不过他身边却站着几百名武

装宦官，个个身裹铠甲，手执兵器，气势汹汹，并且敕令文官不许奏事。杨涟等人一见这阵势，也不敢再说什么了。

杨涟的奏疏公开后，朝中盟友纷纷上疏声援。给事中魏大中、许誉卿等，御史刘业、杨玉珂、帅众等，京卿如太常寺卿胡世赏，祭酒蔡毅中等，勋戚如抚宁侯朱国弼，南京列卿如兵部尚书陈道亨、侍郎岳元声等等，共计七十余人，猛攻魏忠贤。内阁首辅叶向高、礼部尚书翁正春等人，也奏请天启帝遣送魏忠贤卸职出宫，以平息众议，但这时的天启帝是无论如何也听不进这些话了。

文官们的这些言行惹火了魏忠贤！他要寻找机会，痛下杀手，给那些文官一点颜色看看，立马扬威。

第一个撞到魏忠贤手上的是一位名叫万爆的工部郎中。

这位耿直的南昌人，大概是觉得杨涟这些人没有把问题说清析透，否则，以皇上之英明怎么会弄不清这么简单的事情呢。因此他便上了一份奏疏，其中有这样几句名言：

“忠贤尽窃大权，生杀予夺，在其掌握。致内廷外朝，止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岂可一日尚留左右。”

书呆子的毛病大都出在嘴上。这位万爆明知魏忠贤有生杀大权，偏偏还要讲出来，以卵击石，而不从根本上想办法解决问题。

魏忠贤正窝着一肚子火没地方出。他见小小的工部郎中竟也敢如此猖獗，骤起杀机，心想万爆你说我魏某人手握生杀大权，那么魏某人今天就拿你万爆开刀，杀给天下臣民看看！

魏忠贤随即矫旨廷杖万爆一百。他手下的厂卫爪牙立即赶到万爆的住所，不由分说，先痛打万爆一顿，然后再把万爆拖到室外，结结实实地打了一百大板，还不时踹上几脚，打得万爆气如游丝。四天后，万爆便一命呜呼，永远闭上了他爱说三道四的嘴巴。

魏忠贤此举，敲山震虎，直打得朝廷官员心惊胆战。即使在东林党人中，也只有像黄尊素这样的几位倔强刚烈之士仍敢跳出来仗义执言，痛斥魏忠贤。不过最后是不了了之。

魏忠贤至此已完全明白他手中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了。他也摸到了外廷那些文官的底细。原先令他多少有点敬畏的文官们，现在看来也不过尔尔，并不可怕。他们除了气势汹汹、口诛笔伐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别的手段，于是，魏忠贤便肆无忌惮起来了。

恶人为恶，关键在于走出第一步。一步既出，便不会再在乎多走几步，不到头破血流，就不会回头。魏忠贤既然杖杀了万爆，便不再在乎多杀几个。杀一个与杀十个、百个，对他而言，已没有多大差别；而且事已至此，犹如箭在弓上，不得不发，不杀也不行。

不过，魏忠贤在开始时，也只敢杀一般官员，尚且不敢杀那些名大位高的大员，就像他刚刚掌权后只敢在宫中偷偷摸摸杀人而不敢公开杀朝廷命官一样。与万爆同遭厄运的另外几位官员，地位影响也差不多与万爆一样，属于魏忠贤认为的那种杀了也不会有太大麻烦的可杀之人。如中书舍人吴怀贤，在家中私读杨涟奏章，读到激愤处，情不自禁，击节称叹，忍不住在旁注上什么要学古人做法，把魏忠贤立即充军戍边之类的批示。没想到佣人告密，他立即被魏忠贤逮捕入狱，活活打死。还有几位官员，或因考试出题，或因写诗，或因酒后失言，得罪了魏忠贤，也遭其毒手。

在魏忠贤确信自己的实力已到了一手遮天的地步时，他便开始了更大的举措，即把那批执政的东林党人通通赶下台，控制朝廷，再一个一个地收拾。

擒贼先擒王！魏忠贤自然要把内阁首辅叶向高作为打击的首选目标。魏忠贤明白，只要能把叶向高赶下台，那么其他的东林党官员也就好办了。

这位叶向高，为人光明正大，忠厚有德。天启初东林党人能有这样兴盛的局面，是与叶向高主持内阁分不开的。更难得的是，叶向高做事一向老成持重，外圆内方，不像杨涟这些性情暴烈的东林激进分子那样，授人话柄。因此，魏忠贤虽恨之入骨，但一时也没有什么办法。在杖杀万爆后不久，魏忠贤终于找到了一个勉勉强强的借口。

事情出在叶向高的外甥林汝翥身上。林汝翥是御史，大概是有点

仗着舅舅的牌子，做起事来便自然有些盛气凌人的味道。在万熸被杖杀后不久，这位林御史有一次率员巡视城中，正巧碰上宫中的两位宦官劫人财物，争斗于道，便令手下上去狠狠地给一顿鞭子。

这还了得！一位小小的御史竟敢太岁头上动土，鞭笞魏忠贤的人。魏忠贤自然不会放过这位御史，便令手下去抓来，廷杖一百，而且要狠狠地打，就像前些日子杖杀万熸一样。

林御史一看情形不对，立即潜逃城外。魏忠贤的手下却认定是叶向高把这位外甥藏在了家中，便把叶向高的住宅团团围住，逼他交出人来。叶向高无人可交，群阉便大声辱骂，不断胡闹，骚扰叶向高。

叶向高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这些群阉如不是受魏忠贤指使、纵容，就是给他们天大的胆，也不敢这样公然上门侮辱内阁首辅。于是他便给皇上上了一疏，其中写道：

“朝廷立国二百余年以来，还从来没有宦官中使围困内阁大臣住宅这样的荒唐之事。我还有什么颜面去见天下士大夫！”

叶向高话说得十分明白：像我这样的天下文官的领袖，你们也敢如此侮辱，斯文何在？

天启帝至此自然不能再不作表示。他优旨慰留叶向高，并撤回中使。不过那位林御史最终还是被抓到，一百棍也照打不误。大概是碍于叶向高的面子，下手时也略留余地，那位林御史竟然挺过了这一百棍，真是奇迹。

廷杖是明代的创造。自古以来，历朝虽视文人为走狗，但刑不上大夫的古训，也很有影响。文臣犯罪，该杀便杀，该刑便刑，但一般不侮辱人格，多少给读书人留点面子，也有些激励文人廉耻之心的意思。但到了朱元璋执政时，竟破天荒地用上了廷杖。这位大字不识几个的皇帝，大概也认为，天子管束文臣，犹如家长管教子女，不打怎行？至于文人气节、廉耻自尊之类的概念，他也无法理解。他本来就是文盲，没读过几本书，却要他能理解体会文人的心理，岂不是苛求于人？这与后来的独裁者明知读书人最爱面子，却偏偏不给面子甚至故意打人上脸、骂人揭短的做法，毕竟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不过，明代虽有廷杖，但多数皇帝却是抱着不到非用不可时不轻易用的态度。像万历帝在位期间，除张居正时用过几次外，也不太用这种手段。因为这种做法毕竟太伤人颜面了。试想：刚刚还道貌岸然、慷慨激昂的文武大臣，转眼被当众扒下裤子，劈劈啪啪一顿板子下去，而被打者如还能爬起来，则仍要撅着屁股、跌跌爬爬地回署上班，这样的情景毕竟太不雅观！所以，上至皇帝下至大臣，一般也认为廷杖能不用则不用。

魏忠贤当然很喜欢这种方法，但也有所顾忌。不过他试探性地杖杀万燝后，却发现此法法力无边，效果奇好，而文官的反对也并不是那么可怕，所以他毫不犹豫要杖打林汝翥。他也知道，这一百大板虽打在林汝翥的屁股上，却伤在叶向高的脸上。你叶向高脸皮再厚，大概也不会无动于衷，再安坐在首辅的位子上！

魏忠贤的估计没有错！叶向高确实再无脸面安于其位，他先后给皇帝上了二十余次疏，要求辞官回乡。天启帝最终同意他致仕。

叶向高的致仕，后来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在东林党人中，叶向高属于那种政治上较为成熟的少数官员之一。他一方面要压制住魏忠贤等人的势力，但又要不露声色；另一方面，他又冒着被严厉指责的危险，顶住或缓和了东林党阵线中那些激进人物的言行，因为这些言行往往于事无补，甚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叶向高在复出之后，基本上是做到了局面的平衡，尽管不少事情尚不尽如人意。

但叶向高毕竟还有文人的不少禀性。在魏忠贤向他公开表示不敬后，他还是沉不住气，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文人心理占了上风，最后坚决要求挂职而去。或许是叶向高已预计到了后来的局面，才毅然辞职，使自己与魏忠贤之间留下一点余地，免得以后遭其毒手。假如是这样的话，叶向高确实是高明之至，并也达到了目的，因为他活到了崇祯初年，在魏忠贤专权的黑暗时代能侥幸过关，未遭血光之灾。

天启四年（1624）九月叶向高的去职，使原先本已脆弱的政治平衡迅速打破。失去叶向高的东林党阵营，很快土崩瓦解，魏忠贤终于达到了目的。

或许是苍天已经预知人间即将到来的灾难，而以它特有的方式警告芸芸众生。就在这时，已过汛期高峰的黄河突然在徐州铜山县东南的奎山（魁山）决口，徐州城内水深丈余，徐州府治只能迁到云龙山办公。

不过，人间似乎并不理会这些警戒，仍一步步地滑向深渊。

同年十月，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被罢免。争端是因御史崔呈秀而起。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扬，一路贪赃枉法，等到还朝时，高攀龙按惯例对他进行考察，发现了他的贪秽之状。赵南星立即议处崔呈秀充军戍边。崔呈秀大急之下急忙跑到魏忠贤那边，哭诉委屈，并说：

“不去赵南星、高攀龙之流，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于是，魏忠贤便开始策划阴谋，最终逼赵、高下台，同时受牵连的还有魏大中、夏嘉遇。赵、高的下台，使东林党失去了对都察院、吏部这两个核心部门的控制。

天启四年十一月，吏部侍郎陈于廷、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被削籍。

不久，才当了一个多月首辅的韩爌也被迫辞职回家。韩爌廉直自持，没有手段。他当上首辅后，大学士魏广微竟要求分享他的首辅权力，魏忠贤则公开支持魏广微。老实巴交的韩爌只有辞职。

十二月，与叶向高、韩爌、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关系密切的内阁中书汪文言，被下镇抚司狱。魏忠贤希望从这位小人物的身上打开缺口，再行株连，兴大狱，全面打击东林党人。这一招既狠又毒，后来东林党人为此吃尽了苦头。

不久，首辅朱国桢罢职。朱国桢才刚刚接替首辅之位，就被魏忠贤的人弹劾。大学士魏广微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只得辞职。不过魏忠贤觉得这位老家伙还算顺眼，放了他一马。魏忠贤对手下的人说：

“这老家伙也是邪人，但不作恶，可以让他体体面面地回去。”

有了魏忠贤这句话，朱国桢才保住了颜面，在离京前被加少傅少保，朝廷派行人护送回乡。朱国桢是这一时期被解职官员中最风光的一个。

魏忠贤也并不是无所禁忌。当时最令魏忠贤头痛的是孙承宗。当魏忠贤在京师力排东林党官员时，东林党的辽东督师孙承宗突然要求入朝祝贺皇上万寿节（十一月十四日，天启帝的生日），据说孙承宗是想借此向皇上当面揭发魏忠贤的罪行。魏广微立即向魏忠贤提出警告：

“孙承宗拥兵数万，将清君侧，兵部侍郎李邦华是其内应。”

魏忠贤非常紧张，在天启帝边上直打转，急得直哭。天启帝也担心孙承宗此举，命阁臣拟旨，商量对策。顾秉谦奋笔拟下一道十分严厉的圣旨，内称：“无旨离信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并连夜打开宫门，召兵部尚书入宫，由兵部尚书连下三道命令，由飞骑连夜送出，严令孙承宗停止前进，立即返回驻地。孙承宗接到圣旨和兵部令时，虽已到通州，但他最终还是未敢再往前跨出一步。魏忠贤此时也得知，孙承宗并没有带什么人马随行，真是虚惊一场。

假如孙承宗继续向北京进发，而且也带着足够的人马的话，朝廷后来的局面是否仍会这样惨烈，就不得而知了。当然，对于像孙承宗这样的文臣，也难以想象他能做出抗旨不遵的事情来。不过，当时朝廷上下都已知道魏忠贤控制着天启帝及朝廷上下，自然也应该明白圣旨中难免掺了魏忠贤的水分，甚至有些圣旨就是魏忠贤本人的意思，但奇怪的是，东林党人中竟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过质疑，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他们抱着只要是圣旨就须无条件执行的绝对信念。或许也正是如此，魏忠贤以及后来魏忠贤式的人物能如此狐假虎威，猖獗之至。

血洗东林党人

魏忠贤把那些东林党骨干清除出朝廷后，已基本上控制了朝政。至此，他便开始向东林党全面开刀了。

他首选汪文言作为突破口。

汪文言是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人（今属安徽），本是一位布衣。这徽州地区，虽地瘠人贫，但出了不少巨商大贾，实力雄厚。而且这些徽州商人，十分崇尚人文，喜交接文人官宦，一旦发家致富，则必然要子弟读书做官，求取功名。这位汪文言大概就是有这样背景的一位人物。他在万历末年游京师，捐纳了一个监生的身份。由于他为人侠义，人也聪明有术，所以结交了不少朝廷要员，如开始时与宫中的实力人物王安、内阁首辅叶向高等人，后来又与韩爌、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关系都十分密切，也难免参与了不少党争之事。叶向高对他十分欣赏，破格提拔他做了内阁中书。这个位置，对一个捐纳监生来说，当时是不太容易的。

魏忠贤原先也不会考虑到用汪文言作为突破口，内阁中书这样的人物毕竟还是太小了一点。问题是出在阮大铖身上。

这位阮大铖也是安徽人士，极具才华，后来孔尚任在《桃花扇》中给了他不少笔墨，把他渲染得家喻户晓，这是后话。阮大铖与东林党人原先并无矛盾，而且与汪文言、左光斗是同乡，关系相当密切，也互知底细。但问题也就出在同乡、朋友这层关系上。

当时吏科都给事中一职空缺，左光斗有意让阮大铖顶这个职位，而阮大铖论资历也应该升迁此职。于是，左光斗便把家居的阮大铖召回。没想到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几位东林党魁，认为阮大铖性格轻躁，不适合任此职，便改由魏大中担任，阮大铖改补工科给事中。兴冲冲的阮大铖犹如冷水泼脸，很不高兴，不仅不感激同乡好友左光斗的提拔，反而记恨起左光斗、魏大中来。东林党人对阮大铖的做法，违背了古训，即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最终吃了大亏。

阮大铖心怀不满，竟唆使同事傅櫆，出面弹劾汪文言结纳左光斗、魏大中，徇私舞弊。汪文言随即被下了诏狱。然而东林党人当时在朝廷还占有优势，而且汪文言也是叶向高提拔的，所以当时负责此

案的镇抚使刘侨还是就事论事，没搞什么株连，只是把汪文言除了名，廷杖了事。据说御史黄尊素专门给刘侨打了招呼，说是汪文言不足怜惜，但不要由此祸及缙绅，刘侨也同意并照办了。

魏忠贤自然不满意这种处理，便以刘侨办事不力而撤了他的职，起用许显纯主持镇抚使。不久，御史梁梦环投魏忠贤之意，上疏再劾汪文言，旧案再提。魏忠贤随即指令许显纯将汪文言逮捕下镇抚司狱，严加鞫治。同时，大理寺丞徐大化，也在魏忠贤的指使下，上疏纠弹杨涟、左光斗等人，党同伐异，招权纳贿。这样一来，汪文言的案子一下子就复杂起来了。

魏忠贤与东林党人当时已是水火不容，仇怨很深，大规模打击迫害东林党人，也是不可避免之事。汪文言只不过是魏抓到的借口而已。东林党人在劫难逃。最不值得的是阮大铖。他最初唆使同事弹劾汪文言，本意也只是公报私仇，出口恶气，他大概也没有想到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后来他活得不尴不尬，遭人唾弃，跟他的这一举措是分不开的。

汪文言被逮捕后，许显纯按照原先制定的策略，一步步逼供、诱供，用尽手段，想撬开汪文言之口，株连东林党人。

株连的名单早已初步拟定。顾秉谦、魏广微两位内阁大学士在此以前就编定了一份《缙绅便览》，把叶向高、韩鑛、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百余名东林党人或与东林党关系密切之人，定为邪党，同时把黄克缵、王永光、徐大化、贾继春、霍维华等同党定为正人，交给魏忠贤，由魏忠贤根据这份名册来定黜徙。

不久，王绍徽又根据《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的名目，重新编排了《东林点将录》交魏忠贤。崔呈秀也编了一份《同志录》，内录东林党人名单，另编《天鉴录》，收录不附东林党人的官员名单。这样，魏忠贤已基本上把当时朝廷的官员分成东林党和非东林党两大类，以示甄别。

为了把东林党诬蔑成人人痛恨的邪党，魏忠贤又指使手下为“梃击”、“移宫”、“红丸”三案翻案。首先由御史杨维垣、给事中霍维华提

出重新评判三案，痛斥刘一燝、韩爌等东林党人当时的处理方法，并由此涉及到辛酉（1621）、癸亥（1623）的京察以及其他之事。凡是东林党人否定的人或事，此时全都被翻了过来。到后来甚至发展到了凡是对魏忠贤手下的人有冤恨，或者他们不喜欢的人，一概被安上东林党的罪名，予以打击。到天启五年（1625）四月，朝廷重修《光宗实录》，把上述的这些“成果”以法定形式确立下来。

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往往反映了现实政治的倾向，甚至直接就是现实政治的表现。东林党人当时为整倒方从哲及其同党，一上来就追论“红丸”等案，从历史事件人手，达到现实党争的目的。魏忠贤上台后，也同样采取了这种手法。最可怜的是李可灼，他为了那粒该死的红丸，开始是获赏，后来又被罚俸、甚至充军，魏忠贤重论“三案”之后，他又被免除充军，真是朝悲暮喜，大起大落。同样的事，同样的人，因不同的人当政，结果是迥然不同！因此，小人物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最好不要去掺和，因为小人物往往是政治斗争中的棋子，具体放在哪里由不得自己作主。

魏忠贤深知，要置东林骨干于死地，像“移宫”之类的罪行还不足至此。汪文言在天启四年底被捕后，许显纯原准备用“移宫”等罪名来迫害东林党人士，并于次年三月正式逮捕前左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寺少卿周朝瑞、陕西副使顾大章等。这六人是东林激进分子，被称为“东林前六君子”。大理寺丞徐大化认为原定罪名过轻，杀之不足以服众，应该给他们上纲上线。于是，徐大化给魏忠贤出了条毒计：

“如果只定他们‘移宫’罪，则无法与贪赃枉法搭上边。如果以杨镐、熊廷弼行贿、他们纳贿来定罪，则事关重大，杀之也更有名目。”

徐大化所以定出这条毒计，也是事出有因。熊廷弼兵败辽东后，被朝廷论处死罪，他为了活命，据说曾托汪文言向内廷许诺行贿白银四万两，得以暂缓执行死刑。但这位熊廷弼也算是清官，平时也没有什么积蓄，所以话虽说出，到时却又拿不出这笔钱，这下可惹恼了魏忠贤之流，熊廷弼自然也难以活命了。这位恃才傲物的熊廷弼，在位

时不肯贪污纳贿，聚敛私财，更不肯给朝中官员馈送分毫，临死前却又要放下架子，梦想靠行贿活命！这位书呆子，至死也不明白，行贿送礼之类的事不是信口开河，而是要用大把大把的银子的。平时要做清官，不贪不贿，囊空如洗，到这个时候竟还想去行贿求人，靠他一年几百两银的俸禄够吗？

熊廷弼此举，不仅害了他自己，而且还害了那批东林党人。

魏忠贤自然会联想，熊廷弼既然想给内廷行贿，难道就不会给东林党人行贿？在魏忠贤看来，天下哪有什么一尘不染的清官。只要花足功夫，总能找点证据出来，何况还有一个现成的活证据汪文言在手中，不怕他不开口。

许显纯便按照魏忠贤的旨意，重审汪文言。没想到汪文言是条汉子，屡受毒刑，仍拒不承认。被打到实在受不了时，汪文言便仰天大呼："世上岂有贪赃之杨大洪哉？！"意思就是说，这个世上，像杨涟（字大洪，一字文孺）这样的清官要是贪赃枉法，真是天大的笑话。他还义正词严地表示：

"你们用这种勾当来污蔑清廉之士，我就是死也不会承认！"

这些话招来的当然是更惨烈的刑罚。许显纯看到汪文言似乎没有承认的意思，便按自己的需要拟写了汪文言供状。没想到已昏死过去的汪文言突然睁眼醒来，厉声斥责道：

"任凭你胡编乱造，到时我一定与你当面对质！"

事已至此，他竟还梦想对质，真是痴人说梦。许显纯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吗？供状编好上奏之时，汪文言自然也就被乱棍打死了。

在许显纯编造的供状上，杨涟、左光斗是各受熊廷弼贿白银二万两，魏大中是三千两，袁化中是六千两，周朝瑞是一万两，顾大章最多，达四万两。这样的数目，是许显纯精心设计的。魏大中之所以只有三千两，是因为魏大中曾力主要定熊廷弼战败之罪，定多了不行。而顾大章之所以要定四万两，也是因为他曾力保过熊廷弼，不然何必如此？除上述六人之外，供状还涉及赵南星等十五位东林党人。

这纸供状最后自然要传到天启帝手中。天启帝见到此状时的心态也是可以想象的。你们这些东林党人，在朝在野时都口口声声仁义道德，骂遍朝廷，没想到却是这种东西，不重治怎么得了？

于是，天启五年（1625）六月，杨涟等六人被下了诏狱。赵南星等十五人被削了籍，削籍是刑事处罚以外最重的处罚，对文官而言，削籍意味着永不起用。另外，这些人仍要被追赃。在天启帝看来，既然受了贿，就要吐出来。这一招更毒！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受贿，家境也多不富裕，哪来这么多钱退赔？这最终苦了他们的家里人。

既然进了诏狱，杨涟等六人的生死只能听天由命了。按制，诏狱由北镇抚司主管。在这里，审讯不受正常司法程序的制约，而只对皇帝负责。既然只有皇帝认为有罪的人才会入诏狱，那么这些人肯定就有弥天大罪，不审就可杀之。但为了印证皇帝的英明，一般还是要审一审，让这些人自己说出自己的罪行来，或许皇帝还会宽恕待人，给予悔过自新的机会。假如不识抬举，那么，诏狱也有办法对付。譬如说它除了枷和立枷之外，还有许多著名的刑具，常用的就有械、镣、棍、拶子、夹棍五种。另外，其刑罚也别出心裁，十分厉害，如“昼夜用刑”、“琵琶”、梃棍、烙铁、“一封书”、灌鼻、钉指之类。这些虽不是明代的专利，但也足以证明明代并不像后人所认为的那样已缺乏想像力。

正因为如此，明代被投进诏狱的人，几乎都是两种结果：低头认罪或自取灭亡。杨涟、左光斗等这六位东林党人，虽有铮铮铁骨，却也无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

杨涟等进了诏狱，许显纯自然要重点“照顾”，不会心慈手软，但没想到这六位东林党人就是不招。据说左光斗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一条脱身之计。他对另外几位说：

“许显纯辈，要杀我们，办法不外两个：如我们不承认纳贿，则继续用酷刑，直到被折磨至死，此为一；或者乘夜深人静之际，悄悄派人进来把我们杀掉，此为二。但如果我们暂时承认受了贿，则按例应当移送到法司审讯，这样一来，我们或许还有见天之日，可以侥幸不死。”

其他的人听了，也觉得有理，竟先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们到这时候仍抱幻想，认为只要承认了罪行，或许皇帝（或魏忠贤）就会放他们一马，改由法司来审讯，说不定还能求得一条生路。他们就不想想，假如魏忠贤事事照章去办，他们怎么会进诏狱呢？

魏忠贤要的就是他们这样的认罪。不过，魏忠贤却不会放他们一马。因为他们既然承认受了熊廷弼的贿，那么，他们难道就不会受其他人的贿吗？！说不定还有更多的贿赂被隐瞒了。既然如此，就应该继续严加追比，尤其对这些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

严加追比就是继续拷打。魏忠贤令许显纯继续对他们用刑，及时汇报案情。此时，左光斗等人才知上当，大错特错了。至此年七月，左光斗、杨涟、魏大中就惨死狱中。杨涟死状最为惨烈，死时身上压着装满沙土的重囊，一根长长的铁钉穿耳而过。左光斗、魏大中死时也是体无完肤，面目全非。过了三天，狱中才报出死讯，三人的尸体已经腐烂，很难辨认出谁是谁了。至八月，袁化中、周朝瑞也在狱中毙命。最后只剩顾大章一人未死，但也并不是他有什么法术，而是因为诏狱的人怕六人全都打死，影响不好，才把他留下移给法司审讯定罪。没想到天启帝最后仍要把他移回诏狱再审。顾大章实在是怕再回那个地方，与其死在那里，还不如自行了断，于是便上吊自杀，求得解脱。

这六位在京师诏狱中受苦，他们的家人也在外面受尽折磨。

杨涟被逮捕时，士民数万，拥道呼号。囚车所过村庄市镇，都焚香设醮，为他祈祷。杨涟死后，家产被没收充公，总数不足白银千两。老母、妻子无处可栖，由两个儿子乞讨求食供养，官府还要不断催逼杨涟的“赃款”，引起了广泛同情。左光斗死后，地方官对其家族严加追比，其兄左光霁被逼死，其母悲泣而死，整个家族尽破。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洢，暗中随父至京师，救父不成，扶柩而归，昼夜哭号，绝食而死。做忠臣的代价实在是太大！这大概也是人人都说忠臣好，但又没有几个人真正去做忠臣的原因吧。

魏忠贤的做法，实在是令人发指。甚至在他的党羽中，也有人觉得太过分了。像魏广微，本是名臣之后，却投了魏忠贤，做上了内阁

大学士。杨、左之狱，他开始也积极参与。但当吏部尚书崔景荣看到诏狱连连杀人时，心中不安，便要魏广微出面上疏制止。魏广微便上了一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杨涟等人今天尽管是有罪之人，但从前也是朝廷命官。即使赃私之事确实，也应转付法司，依据律令定罪，而不应该令镇抚司如此严刑追比。”

他这种良心发现式的建议，魏忠贤自然很不爱听，而且很生气。结果是吏部尚书崔景荣立即被罢免，魏广微也很快下了台。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两人反而是因祸得福，没有继续助纣为虐。可见魏忠贤的爪牙虽全是恶人，但恶人之中，也有稍善之人。有些人今日仍是爪牙同伙，明日却可能变成被排挤的对象。恶人作恶，各人因情况不同，其作恶的程度、分寸也会有所差异。魏广微等人已觉得差不多了，魏忠贤等人却认为才刚刚开始。结果是前者必然被淘汰。正如魏忠贤用天启帝的口气所说的那样：

“朕方率循旧章，而曰朝政日乱；朕方祖述尧舜，而曰不大相侔。”

意思十分明确，即祖宗之制刚刚恢复，尧舜之治也将开始，你们却说什么朝政一日乱于一日，违反祖宗之制，不合帝王之道，真是岂有之理！

魏忠贤当然要一步一步继续走下去！

不久，前辽东经略熊廷弼，被斩首并传首九边。而直接导致辽东惨败的巡抚王化贞却没有同时被斩。不仅如此，御史梁梦环检举说熊廷弼贪污了军饷十七万两，至于他是怎么核算出这个数字的，那就不得而知了，因为熊廷弼的账本早就毁在广宁。不过这已无关紧要了。另一位御史刘徽紧接着就检举熊廷弼有家资百万，应该没收以充军饷。因为在他看来，熊廷弼既然仅贪污一项就多达十七万两，再加上纳贿之类，说他有家资百万也不为过。置人于死地重在推理和联想，并依此形成证据，况且熊廷弼这时也不会再开口说话了。

真正受苦的是熊廷弼的家人！

既然熊廷弼贪污了十七万两军饷，铁证如山，那么他的家人就应该退赔出十七万两来。熊廷弼的家产虽然不足十七万两白银，但谁又能保证不是被他的家人转移藏匿了呢？因此，他的妻子自然要被凌辱，他的儿子只有用刀抹脖子自杀。而他儿子的畏罪自杀，更证明上述推论是合理的，追赃必须继续。这下该轮到熊廷弼的姻亲族人倾家荡产了。

当然，也有人要为熊廷弼鸣不平。武弁蒋应阳，竟然要为熊廷弼喊冤，结果，被立即处死。太仓人孙文豸、顾同寅，作诗讽刺，也被以诽谤罪处斩。其同乡长洲人陈仁锡（编修）、文震孟（修撰）也受株连被削籍。

天启五年（1625）十月，辽东督师孙承宗被罢免，高第代之为经略。

孙承宗这位带有东林党色彩的主帅，在辽东经营得不错。他在山海关外，先筑宁远城，进而守锦州、右屯、大凌河（即关外三城），开屯田五千顷，起用名将袁崇焕，基本上稳住了阵脚。但他与魏忠贤不是同路中人，魏忠贤虽要用之守边，但始终不太放心。至此，魏忠贤才下决心让其下台，代之以自己的心腹兵部尚书高第。

高第胆子比较小。据说他得知自己被委以重任后，吓得放声大哭。到前线后，他首先下令关外军民放弃堡垒，撤到山海关内来。在他看来，孤零零的几个堡垒，怎么能守得住？还不如自己撤退。一时间，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屯山全部放弃，十余万石粮粟弃于空城。关外军民被强行驱赶入关，一路上死伤无数，哭声震天。亏得当时的宁前道袁崇焕坚决不肯撤退，保住了宁远孤城。也正是这座孤城，后来抵住了努尔哈赤的猛烈进攻。努尔哈赤也因此急愤交加，病发而亡。

天启五年（1625）十二月，朝廷张榜东林党人姓名以示天下。

既然东林党人如此罪大恶极，就应该把这些人公布于天下，不仅要让他们现在臭名昭著，而且也让他们遗臭万年。御史卢承钦说得好：

“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像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谓之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林、贺烺，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应该把这些人全部榜示天下，让这些奸佞之徒无处藏身。”

卢御史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些东林党人批倒批臭，让他们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魏忠贤当然大喜，立即把这些东林党人名示天下。按照“君子不党”的古训，当时的人只要一上党人榜，便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天启六年（1626）正月，魏忠贤又炮制了《三朝要典》，进一步打击东林党人。

既然东林党人是这样的糟糕，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可想而知。尤其是他们对“三案”（梃击、移官、红丸）之处理，更是不能容忍。现在是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了。给事中杨所修、霍维华等人提出，应该把有关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奏章，仿《明伦大典》编辑成书，颁示天下。于是由顾秉谦、黄立极、冯铨任总裁，施凤来、杨景辰、孟绍虞、曾楚卿任副总裁。至六月，终于编成《三朝要典》。天启帝还为此书撰写了《御制序文》（实由顾秉谦执笔），以示重视和支持。《要典》之中，编书者处处拼命诋毁东林党人，暴露宣扬东林党人的罪行。如对“梃击”案，编书者是这样评述的：

“王之寀竟然以此来开骨肉之争，诬陷皇祖（万历帝），有负先帝（泰昌帝），虽碎其骨也不足赎其罪！”

对“红丸”案，论述得则更精辟：

“孙慎行创‘不尝药，之说，妄说先帝（泰昌帝）驾崩是不得善终，另有隐情；又附‘不讨贼’之论，诬蔑皇上（天启帝）不得正其始，是罔上不道。”

对“移宫”案，则直论杨涟等人邀功：

“杨涟等人勾结王安，故意加重李选侍之罪，以邀拥戴之功。”

结果是王之寀、孙慎行、杨涟被论为“三案”罪魁祸首。此时，杨涟已死，王之寀则于次年被下诏狱处死，孙慎行被追论遣戍宁夏。当时正在重修《光宗实录》，凡事涉三案的，都必须根据《三朝要典》重新改动。实录实录，顾名思义就应据实而录，但事实上从来就做不到。《光宗实录》修成不久，魏忠贤上台就要重修。后来东林党人重新上台，便又再改，前后共修了三次。好在这也不是明末的独创，唐初李世民上台后就改过其父亲的实录，本朝成祖朱棣也改过《太祖实录》。改来改去，不外乎是把自己越改越好，把敌人越描越黑。历史总想做高高在上的公证人、审判员，但写历史的人又有几个能不食人间烟火呢？

天启六年（1626）二月，魏忠贤下令逮捕东林党人前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员外郎周顺昌，苏松巡抚周起元，谕德缪昌期，御史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这几位就是“东林后七君子”。

他们都是魏忠贤及其党羽恨之入骨之人。

高攀龙，是东林党魁，官至高位，在位时处处为难魏忠贤。魏氏手下干将崔呈秀曾吃过高氏大亏，对他最是痛恨，不杀不足以解心头之恨。周顺昌，也是令魏忠贤头痛的人物。有人认为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的奏疏，就是由他起草的。他赴湖广乡试时，又竟然在题目中提到赵高、仇士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魏忠贤自然不悦。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高攀龙、赵南星被解职返乡时，这位周顺昌竟公然相送至郊外，还与他们执手叹息。魏忠贤已实在不能再容忍了。正巧周顺昌也提出休假回乡，魏便让一小宦官赶到内阁，带去一个口信，说：

“此人尚可留在这里送客吗？”

有了这句话，内阁自然也就让他削职回乡。没想到这位周顺昌，在老家吴县乡居时，仍不收敛。魏大中被捕后，囚车路过苏州，周顺昌不仅请客摆酒，与魏大中同起同卧三天，还要把自己的女儿许嫁给魏大中的孙子。当押囚的旗尉几次催魏大中起程赶路时，周顺昌千不该、万不该，竟当众指名道姓痛骂魏忠贤。魏忠贤听到后，能放过他吗？这几句话后来要了周顺昌的命。

周宗建，是满朝文武中第一个弹劾魏忠贤的，甚至还指责魏忠贤目不识丁，大揭其短。李应升、黄尊素等人，也都是积极追随杨涟攻击魏忠贤的。魏忠贤大概至死也不会忘记李应升奏疏中的那几句令他胆战心惊的严厉之辞：

“忠贤之罪千真万确，无可复辩。千罪万罪，又不胜辩。臣为陛下计，莫若听忠贤亟自引退，以全旦夕之命。为忠贤计，又莫若早自引决，以乞帷盖之恩。不然，恶稔贯盈，他日欲保首领而不可得！”

这种杀气腾腾之语，魏忠贤岂能忘记！尽管魏忠贤人在京师，但对这几位乡居江南的宿敌并没有放松警惕。沈？之弟沈演，时时监督，定期向魏忠贤汇报。苏杭织造李实，也密切注意江南动向。后来，魏忠贤干脆找来一份空白奏疏，令心腹李永贞，用李实的名义填写上奏，弹劾这一批东林党人。具体罪名是，周起元为苏松巡抚时，私吞钱粮几十万，并常与高攀龙等人往来讲学，图谋不轨，并顺手把周顺昌等人的名字写了进去。然后矫旨逮此七人，下诏狱。

在缇骑逮捕这七人时，江南发生了激烈的民变。

高攀龙在家乡无锡得知消息后，知道在劫难逃，便先去道南祠（宋代无锡先贤杨龟山祠）拜谒先贤，为文以告。然后回家，与两位学生及一位弟弟饮酒于后花园中的水榭之上，算是诀别。到晚上，便给皇上写下《遗表》，然后整好衣冠，自沉水池，以死相抗。他的《遗表》称：

“臣虽削夺，旧为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

高攀龙真正实现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诫。他以一死抗争邪恶，恐怕也保住了自己的甚至也是读书人的尊严。不过，他这种举措及其内涵，不会被那些把自杀一向视作是畏罪、自绝的爪牙、帮凶所看重，也不会被那些抱着好死不如赖活观念的凡夫俗子所理解。

京师的缇骑到达苏州后，遇到了大麻烦。周顺昌为官清廉，为人好义，而且为家乡做过不少好事，所以在家乡的威望很高。周顺昌被捕之日，全城几万人不约而同，都举着香要为周吏部请命。执行逮捕的缇骑，见此情形，十分生气，大声斥骂道：

“东厂逮人，你们这些鼠辈竟敢如此！”

说完，便大呼囚犯（周顺昌）何在，还把铁镣手铐之类的刑具往地上狠狠一掷，铿锵有声。这批为天子卖命的打手，原以为只要拿出点气势来，便能吓得住文弱的苏州人。没想到一向文弱的苏州人一下子被激怒了，竟像山崩地坼一样，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一人，其余负伤之人，惊得跳墙逃走。

当时另一支准备赴浙江逮捕黄尊素的人马，也正好泊船在苏州胥门之外，被苏州人围住痛打，船也被击沉。缇骑跳水而逃，才活下命来，但却把捕人的凭据驾帖弄丢了，竟不敢去浙江抓人。在常州抓缪昌期、周应升的人马也遇到了类似的抗争。

周顺昌、黄尊素等人，都是自己去当地官署，自投诏狱的。

据说魏忠贤接到苏州民变的消息后，也非常紧张。不久又接到报告说，已有五名倡乱首犯自首，城中局势也已弹压，他这才放下心来。

后来被处决的那五名首犯是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马杰、沈扬。他们是市井平民，大概也不具备倡乱的号召力，但在政府缉拿凶犯时，自动站了出来，承担责任，以自己的死，保住了苏州全城的平安无事。魏忠贤垮台后，苏州人追念其恩德，在虎丘旁为他们造了很有气魄的合葬墓，并由复社领袖张溥写下了那篇著名的《五人墓碑记》。苏州人还为他们立祠享祭，不过用的是原先为魏忠贤造的生祠，大概是为了废物利用吧。对苏州人的这种安排，这五位亡灵有无意见就不得而知了。试想：几年前尚是为魏忠贤祈祷祝福的生祠，几年后却又被改造而用来纪念这五位壮士，而后者却是因前者而遭惨杀，这种情形，总是有点别扭，也让人感叹世事的不可捉摸！

下诏狱的六位东林党人，在许显纯的手中被整得惨不忍睹，毙命于狱中。

缪昌期，第一个被送进诏狱。在狱中，他慷慨对簿，言辞、气势不屈不挠。他被诬受纳三千两白银，备受毒刑后，终被活活打死。至于死期具体是何日，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他曾为杨涟起草了那个名

疏，所以在五月十二日尸体被领出时，他的十根手指竟已全被打落，塞入两袖之中。

周顺昌，性格最为刚烈。他在狱中仍对魏忠贤骂不绝口。许显纯恨他此时竟仍敢大骂其主子，便用铁锥硬是把他的牙齿一颗颗给挖了出来。周顺昌仍不屈服，把满口鲜血吐到许显纯脸上，大骂不止。许显纯便在夜中派人将其杀害，时为六月十七日。三天后，尸体被领出，皮肉已全部腐烂，仅存发须依稀可辨。

周宗建，因首劾魏忠贤目不识丁，被坐赃一万二千两，许显纯对他下手也最毒。经多次毒刑，周宗建已奄奄一息，倒卧在地，不能出声。许显纯见状，恶狠狠地问道：

“你还能骂魏公一丁不识吗？”

然后就用沙袋压在他身上，使其气绝而亡。这一天是六月十八日。

黄尊素入狱后，也备受煎熬。他自知狱卒将加害自己，便叩首谢君父之恩，赋诗一章。当时狱中仅存李应升一人还活着，关在隔壁牢房，黄尊素便隔墙与他诀别，说了声：

“仲达（李应升字），我先走了。”

当日黄尊素遇害，时为闰六月初一日。黄尊素就是“清初三大家”之一黄宗羲之父，家中赤贫，坐赃虽不足三千两，但仍然赔不出来。家人为此吃尽苦头，最后还是靠故旧、同年及乡人捐助，才交清此款。

闰六月初二日，李应升也被杀于狱中。

周起元，因道路最远，被解到京师下狱时，前面几位已经归天。当时李永贞代李实上疏弹劾周起元贪赃枉法时，随手写下数十万白银之数。许显纯便以此数追赃，周起元受尽折磨，于九月毙命诏狱。其家产全被没收充公，因远不足额，则株连无辜，以致亲友无不倾家荡产。周起元在苏松巡抚任上，掌管的赋税成百上千万两，只要稍起贪心，便是大富，而他却一尘不染，严于律己。家人亲友在他生前未得

到什么好处，在他死后却为他背黑名，破财遭灾！

造神的时代

魏忠贤至此可谓功德圆满。

依当时的逻辑，假如没有魏忠贤力挽狂澜，而让东林党这批“大奸大恶”之人得逞，大明朝还能这样歌舞升平吗？既然如此，那些真心爱戴他的臣民们就必须表达心中的崇敬之情。

东林党已除，朝廷上下差不多都是魏忠贤的热爱者。当然，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热爱，那些人才被重用提拔，位居要职。不过这已是无关紧要的了。当时，顾秉谦、冯铨等人主宰着内阁。其下文臣则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谋杀，号“五彪”；其他如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卿曹钦程等，号“十狗”；此外尚有“十孩儿”、“四十孙”之类的人物。在地方大员中，更是有不少追随者。对这些人而言，没有魏忠贤，哪有今天的这般光景！

他们自然要对魏忠贤感恩戴德，何况他们的主子也很看重这种感激，并要求他们体现到行动上去。忠诚与否，要看行动，也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考察忠诚。当然，也只有被证明是忠诚之人，才有资格和机会，步步升迁，进一步尽忠。可惜的是这种关系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彼此只好心照不宣了。

人到了这种地步，还会嫌荣誉过多吗？魏忠贤也是人，又怎么会免俗？问题在于，像魏忠贤这样功高盖世的救星，该有的荣誉全都有了，不能总是重弹老调。况且这样做也不太能让魏忠贤记得住，对献媚者而言效果不大。陈词滥调已不足以颂德歌功，更不能反映出丰功伟绩。因此必须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人出奇招了！

天启六年（1626）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上书朝廷，要求在西子湖畔敬立魏忠贤的生祠，以表其功。

这当然是创举！

建祠供奉，早已有之。不过，从前此举都是表彰死者，而绝无生者入祠之先例。一般人大概也不太愿意在活着的时候就接受香火供奉。但这些想法，对魏忠贤时代的人来说，已明显过时了。非常时代，自然应有非常之创举。

潘汝桢疏请建祠的创举，立即得到了热烈的响应。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不甘落后，也立即请令杭州卫百户守祠。天启帝则御书“普德”两字，赐作祠额。内阁大臣们则妙笔生花，为功德碑撰文书丹。杭州臣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襄盛举。不久，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一座富丽堂皇的生祠拔地而起，整日香火不断，热闹非凡。里面供奉着魏忠贤偶像——这也是惟一美中不足的了。假如他本人能安坐其中，岂不更好？然而魏公日理万机，朝廷哪能离得开他呢？他只能心临身不临了。

杭州生祠之立，令天下大震！许多人追悔莫及，继而奋起直追。一时落后还情有可原，永远落后则绝不允许！他们要比潘汝桢做得更好！

在短短一年之中，供奉魏忠贤的生祠，如雨后春笋，遍及神州大地。一时之间，天底下最气派、最漂亮的新建筑大概都是生祠。

蓟辽总督阎鸣泰，在其管辖区内建了七所生祠，花费白银数十万两。这钱当然不是出自阎鸣泰的腰包，而是从军费中开支的。当时前线的军费已是捉襟见肘，至少没有富裕到可以挪作他用的程度。但又有谁敢反对如此盛举呢？又有谁能说这是非军事用途式的浪费呢？因为前方将士很有可能受此感召，从而激发士气，再创奇迹。在阎鸣泰眼里，这几十万两白银是花在刀口上了。正如生祠中的匾额所言：

“民心依归，即天心向顺。”

既然是“天心向顺”，则战无不胜，万事可成。

开封城为了建生祠，拆毁民房两千多间。所造生祠，有宫殿九楹，一如帝王格式。巡抚朱童蒙在绥延建生祠时，还用了琉璃瓦。刘诏在蓟州建造的生祠中，魏忠贤已是金像冕旒。

海内闻风而动，除上述这些督抚外，争建生祠者不计其数。宗室如楚王朱华煃，勋戚如武清侯李诚铭（慈圣太后侄子）、保定侯梁世勋等，廷臣如尚书邵辅忠，词臣如庶吉士李若琳等，部郎如郎中鲁国桢，诸司如通政司经历孙如洌、上林监丞张永祚等，也都纷纷建祠。甚至武夫贾竖，无赖地痞，也个个攘臂争先，汹汹然惟恐不及。最可怜的是巡抚杨邦宪。他在南昌造生祠，为了扩充范围，竟悍然下令拆毁供奉周（周敦颐）、二程（程颐、程颢）的三贤祠，先贤偶像，尽被捣毁，让出地方来建生祠。没想到祠还没建，天启帝就龙驭上宾了，不久魏忠贤也就倒了台。这位杨邦宪最后也因此被入了逆案。可见做什么事都要趁早。

为造魏忠贤的生祠，各路官员是费尽了心机。富丽堂皇、金碧辉煌自然不必说，最要花功夫的则是魏忠贤的偶像。魏忠贤的偶像，都用沉香木雕刻，眼、耳、口、鼻栩栩如生。腹中的内脏，也都用金玉珠宝来做。髻发之上，还留有一穴，用以簪插四时香花。据说某地生祠中魏忠贤雕像的头做得稍稍大了些，小太监给它戴冠时戴不进去。匠人在边上看得既怕又急，便顺手用刀把头像削小一点，终于把帽子给戴了上去。小太监见此竟然抱住头像放声大哭，悲痛万分，就好像匠人削的不是木像，而是魏忠贤本人一样。

当时的魏忠贤，真是人人顶礼膜拜。人世中所有赞美的词藻，都被大用特用，毫不吝啬。像“尧天舜德”、“至圣至神”之类的颂词，一时充斥宇内。无数的赞美诗，也铺天盖地而来。督饷尚书黄运泰，在迎接魏忠贤的偶像时，竟行五拜五稽首的大礼，连呼“九千岁”。

千万不要以为那个黄运泰是个愚笨可笑之人，竟对着一个木头人顶礼膜拜。这些木头人有无穷的法力，每个人在它面前的表现，都会如实地反馈到在皇宫里的魏忠贤的耳朵里。魏忠贤虽不能亲赴各地，但自有无数的宵小为他充当千里眼、顺风耳。

相反，就有一些人，因为没有弄清其中的奥妙，或虽然明白了却

又不愿去做，而最终遭了殃。工部侍郎叶宪祖看到京城之内生祠遍地，就连东华门外竟也兴建了生祠，心中不满，便发牢骚道：

“这是天子临辟雍道，土偶（指魏忠贤的偶像）能起立吗？”

不久，这位不识时务的工部侍郎就被削籍了。浙江巡抚潘汝桢首先倡建生祠时，巡按御史刘之待因会稿迟了一天，也被削籍。蓟州道胡士容因不肯给生祠写颂文，遵化道耿如杞因入生祠不拜，都被论了死罪。在歌功颂德、万众拥戴的背后，这样血淋淋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

就在魏忠贤大红大紫之时，其手下却开始闹起了矛盾。内阁大学士冯铨竟然在此时被罢免。这位大学士一向媚事魏忠贤，深得赏识，却与崔呈秀不和。崔呈秀想入阁做大学士，便令手下攻击冯铨、以及不肯推选崔呈秀的吏部尚书王绍徽。冯铨、王绍徽被罢之后，崔呈秀并未能如愿以偿。大概是因为魏忠贤改变了主意。结果是到天启六年（1626）的七月，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槽三人以礼部尚书的身份进了内阁。施凤来没有什么主见，惟以和柔自媚于世。张瑞图则是一味迎合魏忠贤，而且文章书法也不错。生祠中的碑文，多由这位大学士手书，而皇帝诏旨中褒美魏忠贤的华词丽语，也是此公的杰作。李国槽的情况较特别，他是魏忠贤的同乡，属特殊照顾之列。

崔呈秀自然是愤愤不平，但也没有什么办法。他终于明白，主子在不同的时期需要不同的人才，他已落伍了。

其实，冯铨、王绍徽、崔呈秀也不必过于计较，因为失宠的并非只是他们。到天启六年（1626）十月，连首辅顾秉谦也被罢免。

这位顾秉谦，从入阁伊始到做首辅以来，一直是忠心耿耿。东林党人的案件都是由他具体策划操办，编纂《三朝要典》，他亲任总裁，一桩桩，一件件，可谓是劳苦功高。大概是他已预感到魏忠贤的做法将来会出问题，早在处理“东林后七君子”时，他竟提出要依常规把他们交由法司进行正常审讯，魏忠贤对此很是生气。此时，他看到崔呈秀之流内部倾轧日甚一日，开始不安，竟要求卸职回乡。关键时刻，这算什么行为？简直就是对魏忠贤没有信心，甚至是要挟！魏忠

贤自然不悦，便同意他罢职回乡。

顾秉谦这样的文臣，虽为一己私利，助纣为虐，但毕竟熟读孔孟之书，有时心中难免会有一丝善念。对局势的分析，也不像那些大字不识几个或者是头脑发昏的人那么糊涂，所以此时他才会有这样的念头。但这种首鼠两端的性格，也恰恰是他们这类人的弱点。须知一旦作恶，也就难以回头，而且必须付出代价。除非改朝换代以后的新主子仍觉得他们有利用之必要或价值。顾秉谦与冯铨，同是魏忠贤的红人，同为内阁大学士，也差不多同时罢免，但结局迥然不同。顾秉谦晚年境况十分凄凉，客死他乡。而冯铨却熬过了崇祯朝，投靠了新王朝，摇身一变，又做了一阵子新朝显贵，仍然耀武扬威。到那个时候，又有几个人敢提他在明末所做的那些丑事。

话又说回来，尽管闹了些不愉快，但并不妨碍这些人对魏忠贤的歌功颂德。谁又能保证在这样的颂歌大合唱中，不会出现几丝不和谐的杂音呢？

天启六年十月，魏忠贤被进封上公爵位，从子魏良卿也被封宁国公。原来，朝廷兴修三殿至此告成。这自然是大功一件，且全仗魏忠贤督察有方。于是太监李永贞上奏其功，吏部尚书周应秋也连声附和，魏忠贤便被进爵上公，还要加恩三等。一位太监，竟在短短几年内爵至上公，无以复加，似乎在本朝尚无先例。不过，对魏忠贤，当然可以特例特办。

至于其从子魏良卿的进爵理由，则稍稍有点见不得人。这位魏良卿，本早已是被封了高官的权贵了，不过总还要找个机会继续予以提拔，方显得他魏家的与众不同，也符合朝廷内举不避亲的用人原则。当然，照顾总是难免的，谁让他是魏忠贤的从子呢？更何况魏良卿还是为朝廷立了不少功的。如先前被封爵伯侯，就是论功而赏的。立功经过是这样的：

这一年的春天，有位名叫武长春的辽阳男子，在逛妓院时，趁着酒兴，信口开河说些大逆不道的言辞，被东厂的人抓获，由许显纯掠审严讯。审讯的结果是：如果武长春的案子不及时破获，那么肯定会有犯上作乱之举，后果不堪设想！幸亏赖厂臣忠智，才立此奇勋。魏

良卿当然是得了头功。天启帝知道后，自然十分高兴，论功行赏，给封了肃宁伯，赐了铁券（可依此免死），不久又把他晋升为肃宁侯。

或许有人认为武长春的案子显然被夸大了，有邀功之嫌。其实这种情况，也不难理解。且不说在这种时候，满朝文武是否有人敢提出这种不合大势所趋的问题，单就武长春的案子本身而言，其功也是可大可小的。武长春在妓院中胡说八道本是事实，谁能保证他后来不犯上作乱呢？更何况犯上作乱本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像武长春这样口出狂言可以算是逆贼，像后来李自成那样率兵几十万造反也算是逆贼。虽然那位武长春被抓获时仅仅只是口出狂言，而且看起来也不太像是李自成式人物，但问题在于又有谁能保证这位在妓院中被抓获的武长春今后不会变成另一个李自成呢？既然这样，算作大功一件也不为过。天启帝大概也是这种想法。被魏忠贤蒙在鼓里的天启帝，想不通在这种尧舜之治的太平盛世，竟还有这样十恶不赦之徒想要造反，幸亏魏良卿及时破获，否则一旦得逞，怎么得了。因此，他到这年的十月份，又诏令给魏良卿进爵，封为宁国公。当然，在几个月中晋秩三级，快是快了点，但也不违反特例特办的原则。

知道魏良卿被封的缘由后，就不难理解魏忠贤一族及其亲信中竟会有那么多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封赏了。

尽管此时的朝廷已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但要在如此之大的帝国内找些粉饰太平的所谓功绩，也不算是件难事。像袁崇焕在宁远打败了努尔哈赤、各边关修建了堡垒、南京孝陵修葺完工、在甘肃很偶然地打了胜仗、法司缉获了盗贼，等等，都是不错的题材，并被上奏京师。

既然所有的功绩，都是由于魏忠贤领导有方，那么朝廷就应有功必奖，方能体现奖赏先进、激励来者的治国宗旨。问题在于魏忠贤已位尊上公，不能再升了，否则便有喧宾夺主之嫌了。

好在本朝的列祖列宗们，早就对此做出过一些基本的规定，使得魏忠贤的家人们可以分享其荣誉。魏忠贤的族孙魏希孟、魏希孔等，都世袭都督同知，外甥傅之琮、冯继先，俱为都督佥事。魏忠贤的亲信也有近二十位获得了类似的名目。

自从督饷尚书黄运泰喊出“九千岁”后，“九千岁”似乎已是魏忠贤的代名词了。大概是“九千岁”还不足表达心中的祝福，据说后来又有人给他加到“九千九百九十九岁”，离万寿无疆仅一步之遥了。

到了天启七年（1627）五月，有位叫陆万龄的监生，突发奇想，向朝廷建议：要求把魏忠贤供祠于国子监，配享孔子，而把魏忠贤的父亲，配享启圣公。陆万龄是这样陈述理由的：

“孔子作《春秋》，厂臣（指魏忠贤）作《要典》（指《三朝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厂臣诛了东林党。礼宜并尊。”

这位陆监生的意思是，孔子之功，是作《春秋》、诛少正卯，魏忠贤作《三朝要典》、诛杀东林党，也可与之相提并论。既然贡献差不多，魏忠贤也就可以与孔子平起平坐。不过这位陆监生当时尚无资格直接上书魏忠贤，所以只得请国子监司业林代奏。林阅后，用毛笔一涂，当天就挂冠棂星门辞职而去。另一位司业朱之俊却代为奏请，朝廷认为陆监生讲得很有道理，下令实施。而那位不愿代奏的林则被削籍。目不识丁的魏忠贤，竟然可以与万世师表的孔圣人在国子监平起平坐，同享供奉，而这样的主意竟是由熟读孔圣之书的一位监生提出来的，不知孔圣人对此有何想法。

到了七月，魏忠贤因所谓的宁锦大捷而再次大封特封。

他的从孙魏鹏翼被封为安平伯，加少师；从子魏良栋被土壤为东安侯，加太子太保；魏良卿被加太师。顺便说一句，前两位当时尚在襁褓之中，还不会走路。

魏良卿还代天启帝享南郊，祭太庙。这些事本来都是由皇帝亲自做，一般不能由他人代劳的。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天启帝驾崩。临终之前，这位糊涂的皇帝还在乾清宫召见阁部科道诸臣时，诚心诚意地说：

“魏忠贤、王体乾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当时有一位名叫黄立极的官员回答说：“陛下任贤勿贰，诸臣敢不仰体。”

这样的回答，足以让天启帝放心而去了。是啊！有魏忠贤、王体乾这样的“忠臣”在支撑着朝廷大局，天启帝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他哪里知道，正是这些“忠臣”，已趁他在宫中做木匠之际，把他的大明朝搅得天翻地覆。他留给弟弟信王朱由检的，已不是什么太平盛世，而是一个绝无复元希望的烂摊子。他更不会知道，在他死后，大臣们给了他一个不太好听的谥号“熹宗”。而在他死后十七年，他的弟弟崇祯帝作为大明朝的末代皇帝，吊死在煤山，追随他而去。

可怜的天启皇帝，至死还觉得魏忠贤是忠臣！是因为天启帝过于糊涂呢？还是魏忠贤实在厉害呢？大概两者皆而有之！正所谓上有昏君，乱臣贼子才会当道，也才会有一批又一批的忠臣肝脑涂地！

信王朱由检在天启帝死后两天便匆匆登基，兄终弟及。据说魏忠贤曾有过自己做皇帝的打算，不过是因为当时的兵部尚书崔呈秀认为时机未到而作罢。这大概是推测罢了，其实也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

年轻的信王，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以后的十七年中，这位被称作崇祯帝的末代皇帝又是如何呕心沥血，梦想扭转乾坤，而最终却偏偏走上绝路，吊死在煤山的呢？

第三章
中兴之梦的破灭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申时，天启皇帝驾崩。依其遗诏，皇五弟信王朱由检，于八月二十四日午时在皇极殿正式登基，改元崇祯。

像这样兄终弟及式的皇位继承，在本朝已有过两次先例。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后，郕王朱祁钰奉太后之命即皇帝位，接替他那位被蒙古人俘虏的哥哥，即英宗朱祁镇，并改元景泰。不过七年之后，英宗发动“南宫复辟”，夺回皇位，又改元天顺。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朱厚照驾崩无后，其堂弟朱厚熜以兴献王身份入京继位，改元嘉靖。如果再加上明初成祖朱棣弑夺其侄子建文帝之位的话，那么，崇祯帝的继位已是本朝第四次由藩王入继大统了。

崇祯帝即位时才是一个十八虚岁的少年。

但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位少年皇帝。他比他的哥哥天启帝、父亲泰昌帝要强得多。他在即位之初，就于不动声色之中，把那位人见人怕的九千岁魏忠贤及其党羽铲除，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他年少气盛，做事大刀阔斧，一改父兄甚至列祖列宗的为政作风。他孜孜不倦，勤于为政，事必躬亲，令天下臣民感叹不已。最重要的是，他比他的前任，从他哥哥天启帝一直到他的太太爷爷嘉靖帝，都更有上进心、责任心，他从一开始就怀着强烈的中兴之梦。

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崇祯帝也绝对不像一位亡国之君！本朝以前的那些亡国之君的特征似乎在崇祯帝身上找不到。不幸的是，就是这样一位绝不像亡国之君的君主，恰恰做了一位引起广泛同情（而不是令人痛恨）的亡国之君。

或许这正是报应！苍苍上天把他列祖列宗所犯下的所有过错报应在他的身上，而且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试图竭尽全力去扭转乾坤，但却在百般挣扎后走向注定的失败。

或许这也正是最后的机会！大明朝在连出了五六位各色各样的荒唐皇帝后，上天终于给它降临一位能干之君，来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救王朝于危难之时。遗憾的是，大明朝已是积重难返、病入膏肓，仅靠崇祯帝一人已是回天无？力。

此时的大明朝，犹如一架吱吱嘎嘎的大破车，正一步步地滑向深渊。那位刚刚换上来的驾车人崇祯帝则拼尽全力，想停住那下滑的破车，最后却眼睁睁地随着它一起跌落深渊，摔得粉碎！

“我不是亡国之君，为什么有这么多亡国之事？！”

这是崇祯帝后来多次发出的哀叹！他似乎已察觉到自己逃不过亡国之君的命运，但他实在是心有不甘。因为他曾拥有一个强烈的中兴之梦并为之努力，而天下的臣民也都在他身上寄托着中兴的希望。

然而，仿佛就在弹指一挥间，中兴之梦便灰飞烟灭了。

朱由检：想要在皇宫中生存就要低调

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二十四日，又一位男孩降生于东宫

之内。按照“由字辈、木字旁”的玉牒规定，东宫的这位第五子取名由检。

由检的父亲常洛当时仍是太子身份。这位万历帝的长子，自从生下来便遭白眼，很不得宠，凄凄惨惨过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才被正式册封为太子，当时他已是二十岁了。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一月，顺天府籍的选侍王氏为东宫生下了长子由校。尔后，这位太子的选侍、才人们又先后生下几子，到由检降生时已是第五子了。当时的太子常洛，在宫中的生活十分压抑，除了生儿育女，保证血脉兴旺外，似乎也无别的办法来向他的父亲万历帝证明他的才能。由检的降临，对他似乎也无特别的意义，并不像长子由校出生时那么显得重要。

既然已被册封为太子，那么朱常洛就有权利拥有众多选侍、才人之类的女性。在这一点上，没有人能够阻止。朱由检的生母就是属于上述女性中的一位。

这位女性姓刘，当时的身份是选侍。她也是被选人宫的淑女，娘家的身份很一般。按照当时宫中的规矩，刘选侍既为太子生了一位男孩，本应母以子贵，过上舒心些的生活。不幸的是，太子身边有康妃（西李）之类的人争宠邀幸。她们的如簧之舌没有停止过说三道四。太子便渐渐疏远了刘选侍，到后来甚至动辄寻隙斥责。可怜的刘选侍，并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待遇。

据说刘选侍为人忠厚贤惠，恪守妇道。她对自己所受的不公待遇，毫不辩解，只是将万般委屈和激愤深藏于心。久而久之，自然是积郁成疾。就在由检五岁多时，这位刘选侍终于郁郁而死，被太子常洛草草葬在西山。

由检年幼丧母，自然思念不已，但又不敢声张。他当时住在勖勤宫，曾悄悄向近侍询问：

“西山有申懿王的坟葬吗？”

当得到肯定回答后，他便再加问一句：

“申懿王坟旁有刘娘娘的坟墓吗？”

刘娘娘就是他的生母。他曾秘密付钱给近侍，令其前去西山焚纸祭奠。此举不仅可以看出他对生母的思念，也足见年幼的由检颇具心机。

由检即位后，立即献上尊谥，称其母为“孝纯恭懿淑穆庄静毗天毓圣皇太后”，并把她从西山迁葬庆陵，与其父泰昌帝合葬；并且还封生母之父刘应元为瀛国公，其母徐媪为瀛国太夫人，以表达他的尊亲之情。到后来，他还命武英殿中书梁祝根据他人追忆，给其母画了像。像成之后，崇祯帝下旨备好法驾卤簿，由专人护送，从正阳门浩浩荡荡而入皇宫，他本人则亲自跪于午门，迎太后画像，并把画像悬挂在乾清宫中，朝夕供奉仰视。由此不难看出母亲在他心中的地位。

生母刘选侍的早逝，对由检早期的心理影响是很大的。生母死后不久，由检改由李选侍（西李康妃）抚养。当时，这位被称作西李的选侍最得太子常洛的宠爱。在此以前，她已抚养由检的长兄由校。由校的地位和前途，西李自然明白，因此也颇能倾注心血。由检在这一点上，难以与长兄相比。西李对他的态度，自然也不大一样。好在西李不久生下一皇女（皇八妹），无暇兼顾由检，由检便改由另一位李选侍（东李庄妃）抚养。

在东李身上，由检找回了许多早已失去的母爱。这位东李，宽厚仁慈，恪守妇道，且膝下也无子女。她给予由检母亲般的慈爱，有时甚至是宠爱、溺爱，这使由检逐步养成了个性中聪明活泼、任性自信的一面，也使由检在冰冷压抑的宫中，享受到了许多少年时代的乐趣。

但这仅是由检性格中的一面。逐渐懂事的由检很早就开始明白宫中一些他本不该懂得的事。他终生不会忘却他六岁那年发生的事。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他父亲的宫中（慈庆宫）突然闯进来一位后来被认为是有点神经错乱的男子，手持枣木棍，凶狠地击伤几位侍卫。幸好被及时捕获，没有伤及他的父亲。当时朝廷中沸沸扬扬的抗争及其背景，对于六岁的由检来说，还不能理解，但他已不难从当月二十八日祖父的那次不寻常举措中领悟到些什么。

那天，皇祖万历帝在慈宁宫拜见了慈圣太后后，便在慈宁宫召见

了朝臣。在此以前，这位万历帝已是二十五年不见朝臣。当时，皇祖、皇父都说了些十分严厉的话，训斥朝臣。皇祖万历帝还要跪在地上的朝臣们抬起头了，让他们“熟视”即仔细看看当时站在台阶上的三位皇孙。由检就是站在台阶上的那三位皇孙中的一位。或许当时的由检还不能明白大人们的那些言行，但也多少能感受到一些不祥的气氛。

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由检已十一虚岁。这一年，宫中连出大事。先是在七月份，皇祖万历帝驾崩。皇父匆匆接位。然而仅仅一个月，也便撒手归天。皇兄由校再接皇位，改元天启。大事接踵而至，让由检有点无所适从。

当时宫中乱糟糟的那些场面，由检是耳闻目睹的。先是皇祖万历帝病重，召顾命大臣匆匆进宫，交待后事。皇祖驾崩后，皇父接位登基，发内帑充边饷，罢天下矿税盐使等等，颇有点新政的味道。加上皇父收了郑贵妃的几名美女，也着实让他忙了一阵。但没有多久，却传出皇父龙体欠安的消息，太医进出不断。又有一位叫崔文升的内侍进了一剂泻药，皇父服后病情严重恶化，郑贵妃因此被逐出宫禁。大臣们又被召进宫中。到了九月初一日，皇父便驾崩了，据说驾崩前曾服过一位叫李可灼的文官所进的“红丸”。

接下来的事就更让由检吃惊了。先是皇兄由校被大臣们从乾清官抢出，住到了慈庆官。那位一直抚养皇兄的李选侍（西李），竟被逼得住到了类似冷宫的哕鸾宫去了。接着便是皇兄由校正式登基即位，改元天启。做了皇帝的皇兄立即做了两件事，一是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那位与客氏火热的太监魏进忠也被赐享世荫。二是公开揭露那位长期抚养他的李选侍（西李）的罪行。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已深深印入由检的脑海之中。

好在做了皇帝的皇兄对由检这位五弟一直还不错。

天启帝长由检五岁。当时同父的亲兄弟中，也仅存他们两人。那位爱做木匠的天启帝，对自己的弟弟倒是十二分的爱护，两人关系十分亲热。据说当时还不太明白天子是什么官职的由检，竟当面问过刚

接位的皇兄由校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

“你这个官儿我能不能做？”

对弟弟这个罪可至死的问题，由校竟微笑着说：

“可以，可以。等我做几年之后，就轮着你来做了。”

这当然是一句戏言，没想到后来果然应验。由此也可见由检在皇兄心目中的地位。

天启二年（1622）八月二十三日，朱由检被封为信王，仍住勖勤宫。尽管这是正常之事，但对朱由检而言，仍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他就是宫中的信王千岁爷了。

在皇兄的庇护下，信王由检在宫中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但宫中接连不断发生的事，还是让由检触动很深。

天启元年（1621）五月，那位原本在宫中说一不二的司礼太监王安，突然被逐出宫禁，充了南海子净军，不久就被整死了。魏忠贤的势力正在急剧上升，逐步控制宫中。

到了天启二年（1622）三月，魏忠贤又在宫中举起了内操，选武阉，练火器。一年之后，宫中武阉增至万人，个个裹甲出入，威风凛凛。轰隆隆的征炮之声，喧震内外。刘朝等内官，也被派遣出宫，赴边关“较事”。魏忠贤在宫中的势力如日中天。到天启三年（1623）十二月，魏忠贤竟最终以司礼秉笔太监的身份，提督了东厂，掌握了生杀大权。

其实，在此以前，魏忠贤已清理了后宫。天启帝的选侍赵氏，或许是不顺魏忠贤、客氏之意，竟被逼自尽。据说这位赵选侍接到赐她自尽的圣旨后，便把天启帝赐给她的那些物品列放几案之上。面向礼物，放声大哭，最后上吊自杀。

天启帝的另一位妃子——裕妃，也被魏忠贤幽禁在别宫，绝其饮食。这位可怜的裕妃，在饥渴交加之下，只得用嘴去接屋檐上滴下来的雨水，最后被活活饿死。还有一位叫冯贵妃的，最得天启宠爱，魏忠贤竟然趁天启帝出宫郊祀，令人把她活活打死，宫中也无人敢出

声。不过，有一位李成妃，却竟然凭自己的聪明逃过了魔掌。这位李成妃，为受冤失宠的范慧妃鸣不平，魏忠贤、客氏知道之后，也把李成妃软禁在别宫。不过，李成妃预先在别宫的檐瓦之间放置了食物，得以充饥。魏忠贤把她关在别宫中半个月，见她竟然没被饿死，便放她一马，斥为宫人。天启帝的皇后张氏，也因多次在皇帝面前说魏忠贤的坏话，遭了魏忠贤的暗算而流产，从此不育。

这些后宫中的是是非非，或许对信王由检触动不大。但有一件事对他肯定会有切肤之痛，那就是长期抚养他的养母李选侍（东李庄妃）的死。

李选侍是忧郁而死的。

养母的为人，无论宫中宫外，都是赞不绝口的。对信王由检，也是事事周到，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母爱。就是这样可敬可爱的一位长者，却忧郁而死，由检不能不受到深深的震动。他凭着自己的聪颖和敏感的直觉，逐渐明白了养母的死因。原来，养母为人正直，恪守规矩，不愿与客氏、魏忠贤之流同流合污，于是招来忌恨，被百般刁难，受尽委屈。而养母又不愿申辩，即使申辩也是无门，过得很不顺心，最终积郁成疾，撒手归天。

养母的死，对信王由检的打击是相当大的。他逐渐感觉到了人世间万事的复杂和不公，并开始对周围的人和事持怀疑的态度。魏忠贤和客氏一手遮天，也引起了他的警觉。他开始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学会了自我保护。

信王更多地把时间用在读书上。他自小酷爱读书，并有静坐颐养的习惯，能久坐不动，口中却念念有词。除读书之外，据说还常常溜出宫去，微服私访，接触到一些在宫中接触不到的东西。这些，对信王的成长大概也有一些影响。

光阴似箭，转眼到了天启六年（1626）年初。按照当时的算法，信王由检已是十七岁了，到了婚嫁的年龄。而实际上，当时的信王仍只是一个十五周岁多一点的少年。不过，这已是够上生儿育女的年龄了。对于皇室来说，多生多育，是每位成员的义务和责任，因为只有

宗室繁衍，人丁兴旺，朝廷才会有坚实的根基，才会坐稳江山。了解了这些，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本朝宗室经过二百多年的繁衍，至明末已有六十万人之多的道理。

既然已到了婚嫁的年龄，信王由检自然就应该成婚。天启帝开始命礼部为信王选婚，寻觅适合做王妃的女子。按本朝的规矩，皇室子弟的婚配，倒不遵门当户对的古训，而是从民间选取淑女。这样做的原因，一来是因为天下虽大，但也绝对找不出能与皇室门当户对的人家，还不如从普选的淑女中挑一位。二来也是因为皇室拥有独一无二的绝对权势，很难保证本已有根有底的大户人家，在与皇室攀亲后，不利用其影响谋求私利。因此，皇室子弟婚配，一般只选那些没有什么家庭根基的平民之女。而且也只有在确定婚嫁之后，皇室才会通过朝廷，并视实际情况给予其娘家人相应的封赏，享受该享受的待遇，使得其娘家人在显赫富贵之余，也能不忘感念，饮水思源，不至于生出什么是非来。

到了五月十八日，礼部正式奏报皇上，已在顺天府共选了七十七位淑女备选。一月之后，天启帝令正式选婚。

按本朝的惯例，像这种宗亲的大婚之选，一般由皇后主持，外加两位贵妃陪同。淑女们被召进宫后，由皇后等人过目定夺。选取的标准，最重要的倒不是美丽动人，而是要身材匀称，举止端庄，再考虑生辰八字是否合宜之类的因素。选中的淑女，则由皇太后或身份类似的长者，用青纱布蒙盖其头，再在她手臂上套上金玉手镯之类的吉祥物，算是信物。而那些未被选上的，则将庚帖塞回那些人的袖中，赐些银两，劝慰一番遣还家乡。这样的经历，对落选的淑女而言，不仅无伤大雅，或许还会给日后的婚嫁挣些资本，因为她们毕竟是被召入宫过的淑女！

七十七位淑女，被一一召进宫中，由天启帝的皇后张氏及陪同的两位贵妃过目挑选。最后被选中的是大兴县生员周奎的女儿周氏。周奎原是苏州人氏，后落籍大兴。因此她的女儿或许还有些江南水乡的灵秀之气，不像一般北方女子那样粗糙。不过张皇后后来又觉得这位周氏过于弱小，大概是担心她不像能生善育之辈。当时的这位周氏，

也不过是个十六虚岁的少女，自然不会像成人那般丰满。最后还是那位刘昭妃一言九鼎，说道：

“现在看起来是稍微瘦弱一点，不过过一段时间就会长得丰满健壮。”

刘昭妃是万历帝的妃子，在万历六年（1578）就与万历帝的王皇后同时册立，资格很老，而且也深受大家敬重。万历四十八年（1620）王皇后死后，这位刘昭妃便掌太后之室，住慈宁宫，说话很有分量。因此，既然她这样说了，便最后确定周氏，册封为信王妃。这位周氏后来很是争气，先后生了三个儿子，确见刘昭妃慧眼不凡。这九鼎一言，也为刘昭妃积下了人缘，后来升为皇后的周氏，待刘昭妃也很不错。

接下来便开始张罗婚事。礼部奏报信王由检婚礼仪举。闰六月，钦天监选出吉日，婚事便依此而有条不紊、恪守礼制地进行起来：

天启六年（1626）十一月二十五日卯时搬移；

十二月初八日午时当冠；

十二月十六日辰时纳征发册；

十二月二十一日卯时安床；

天启七年（1627）正月二十七日卯时开面；

二月初三日卯时迎亲，信王出府成婚；

二月初五日文武百官身穿吉服赴信王府行礼；

二月初六日信王与王妃周氏行庙见礼。

至此，婚礼便初告结束。在整个婚礼过程中，信王由检像个木偶，任人摆布，没有什么发言权，直到最后才出场。这样的婚姻很难有什么幸福可言。不过信王后来与这位周氏的关系还算过得去，这真是十分难得的。

既然已经结婚，信王便不能再住在大内的勖勤宫了，而应该兴建一座像样的信王府了。四月，皇兄天启皇帝下令兴建信王府第，遣工

部尚书薛凤翔操办。

不过，当时的国库中实在没有多少余银可供大兴土木。辽东的边饷，像一个无底洞，总是填不满，弄得国库匮乏空虚。而就在前不久，信王的三位叔叔，即瑞王常浩、惠王常润、桂王常瀛，分别被遣至汉中、荆州、衡州的封地，破费了不少钱粮。或许是国库已空，因此三王之藩的仪物礼数，已是很将就马虎，能省即省。不过也有人说这是魏忠贤故意以为国节费的名义刻削贬低的，这多少有点冤枉。当时的国库实在拿不出什么钱来铺张浪费，而魏忠贤当然也不会拿自己的钱来为皇帝撑什么场面。

既然无钱，自然就应变通。于是内官监太监李永贞提出把惠王常润原先居住的惠王府修理装饰一番，改成信王府，一来惠王府空着也是空着，二来国库也实在没有余银来新修信王府。这一方案最终得到天启帝的首肯。经过修葺之后的惠王府，便改成了信王府，由信王搬入居住。

这种安排，对信王由检多少有点屈就。不过，此时的信王已能体谅朝廷及皇兄天启帝的难处了。为节国用而委屈自己，对信王来说也不是第一次了。就在这年的正月，信王还辞谢了皇兄赐给他的地租银两，理由是“边境多虞，军费甚匮”。不过，信王也从这些经历中逐渐懂得，即使位尊天子，也离不开那些白花花的银子。

当信王后来成为崇祯帝后，他便开始嗜财如命，拼命为自己捞钱积财，而且一毛不拔，一如他的爷爷万历帝。他的这种做法，不知与他做信王时的这些经历有无关联？

从信王到崇祯帝的转变

信王由检绝对没有要做皇帝的准备，朝廷上下也没有人想到他竟然会做了皇帝。

在不太懂事时，信王曾不知深浅地问过他的皇兄天启帝，能否也

做做天启帝做的那个“官”，皇兄当时也开玩笑地说这个“官”可以和他轮着做。不过这毕竟是戏言。据说信王也曾有过诸如梦见乌龙蟠绕殿柱、在宫中花园的两口井中同时打到两尾金光闪耀的金鱼之类的吉兆。但这些毕竟只是可信可不信的附会而已。懂事以后的信王，熟诵《皇明祖训》，对其中那些严禁诸王非分之想的训词，当然不会陌生。本朝为防止诸王乱政夺位，早已作了种种防范，真有点甚于防贼的味道。对这些，信王自然也懂。尽管皇兄天启帝一直没有子嗣，但皇兄才过二十，年纪轻轻，想来也不至于绝后，而要弟弟接位。因此，信王也一直是安于现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

不过，命运往往就是这样造化人，由不得你自己！天启帝的突然驾崩，竟然使信王由检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形下匆匆登上了皇帝宝座。

天启七年（1627）八月中旬，宫中突然传出天启帝病重的消息。

天启帝当时只有二十四虚岁，按理不应如此。据说在天启六年（一说是天启五年）八月，天启帝祭祀方泽，在回宫途中，曾去西苑荡舟游耍，不幸落入水中。冷水浸袭，加上惊吓，从此落下病根。不过，一般人是不会知道这些事的，因为万岁爷的身体状况，尤其是生病之类的机密，只能是少数的圈内人知道。试想，被臣民口口声声颂作万寿无疆的万岁爷，突然得病，岂不尴尬？又有谁能保证天下臣民能不由此恐慌而致天下不安？甚至一小撮居心叵测的大逆不道之人乘机捣乱？因此生病之类的话是说不得的、传不得的。越是有病，越要把万寿无疆喊得更响。一来算是祝福，二来也是为了掩人耳目，做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事情。

不过，臣民们还是能从一些迹象中猜测到一二。魏忠贤的从子魏良卿不久前曾代天启帝享南郊、祭太庙这一反常举动，多少证实了这种猜测。果然，到了八月十八日，天启帝的病情恶化，看来是不行了。于是魏忠贤便与群臣商议，能否用“垂帘居摄”的办法应对。阁臣施凤来认为此举不妥，便说：

“居摄远不可考，且学他不得！”

意思很明白，就是此举行不通，而且群臣也一致要求信王入宫视疾。

据说魏忠贤也为此找过天启帝的皇后张氏商量对策。按魏忠贤的设想，是令宫妃中的某一位假称有孕，而将魏良卿之子领入宫中，接替皇位，由魏忠贤摄政，就像“新莽之于孺子婴”那样。此计关键是要有皇后张氏的通力合作。然而皇后张氏与客氏、魏忠贤宿有怨恨，而且张氏为人正直，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会含糊。因此当魏忠贤派来的人刚刚把话含蓄婉转地说完，张氏便严正拒绝，而且把话说得没有任何余地。她说：

“从命亦死，不从命亦死，等死耳。不从命而死，可以见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话说到这种份儿上，魏忠贤也就不能再做下去了。

八月二十二日，信王由检被召入宫。

在此以前，信王只能待在信王府中，心里虽然着急，但面上之事则不敢轻举妄动。按理，皇兄病重，信王作为至亲，自然应早早入宫，尝药视膳，嘘寒问暖，方显兄弟亲情！但事实上，信王绝对不敢造次，除非有皇兄明确的旨意。因为这时的信王，已深知政事的复杂、人心的险恶。如信王入视，当然可以被说成是出于兄弟亲情，但如果有人反过来讲，说信王在皇兄尚未驾崩之时，就上蹿下跳，也未尝不可。这种做法，轻则可以说成是信王沉不住气，急于接班，重则可以说成是信王早有异心，妄窥大位，只不过是此时才显出本色。不过，此时已有皇兄天启帝明确要他进宫的御旨，情形就不一样了。

信王由检进宫见到皇兄后，自然是亲情尽露，同时也有点诚惶诚恐。此时的天启帝回光返照。他侧身靠在床上，看着弟弟信王，眼光中包含着无限的哀怜、惜别之情。他对弟弟说：

“到我跟前来，你当为尧舜之君！”

此言一出，信王直吓得瞠目结舌，根本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信王才结结巴巴地说：

“臣死罪，死罪！陛下说这样的话，臣应万死！”

信王深知皇兄话中的含义，但又不敢确定真假，谁敢保证这些话不是皇兄乘病之机对信王的考验呢？不过，此时的天启帝自知将不久于世，倒是诚心诚意地说这番话的。他对信王再三劝慰，并明确告诉信王说：

“善视中宫。魏忠贤可任！”

信王听毕，更是万般恐惧。他转而与身边的魏忠贤搭话，诚恳地称赞魏忠贤，说他侍候皇兄，劳苦功高。魏忠贤当然是语气温和地谦虚一番。随后，信王立即出宫，像逃窜一般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就在信王入宫之前，天启帝还撑着病体，召见阁臣和五军府、六部、都察院等部院大臣，以及科道官员，已把身后由信王接位的意思告谕诸臣，并说：

“魏忠贤、王体乾皆恪守忠贞，可计大事。”

此言大有他们办事、朕即放心之意！魏忠贤的死党、内阁首辅黄立极立即回答：

“陛下任贤勿贰，诸臣无不仰体！”

话说得很明白，意思就是陛下您放心去吧，群臣会照办的。

至此，天启帝大概已放心了。就在召见信王后没多久，即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申时，天启帝在懋德殿驾崩了。

据说，魏忠贤至此仍未死心。他没有立即公布天启帝的死讯。但朝臣们已纷纷听到消息，在第二天天亮时都不约而同地赶到宫门，要求入宫行哭临之礼。守卫宫门的宦官却不准他们入内，说是要换丧服；百官回家换成丧服赶来，宦官却又说先帝尚未成服，百官仍不能进宫哭灵。如此来回折腾了三四回，气喘吁吁的百官在百般哀求之后，才得以进宫，行哭临之礼。

百官们进宫之后，只见魏忠贤、王体乾等少数几人守护着归天的天启帝。魏忠贤两眼红肿，侍立灵侧，不发一言。而王体乾则来回往

复，忙着安排礼部官员准备治丧礼仪及器物用品。群臣礼毕退出后，突见内使十余人急出，传呼崔尚书（兵部尚书崔呈秀）。崔呈秀一人复进宫内，与魏忠贤密谈，具体内容无人知晓。有人推测，可能是魏忠贤与他重谈篡位自立之事。因为在此以前，魏忠贤曾召崔呈秀、田尔耕密谈过篡位之事，当时田尔耕诺诺连声，崔呈秀则是不肯表态，魏忠贤再三追问，崔呈秀才说："恐外有义兵。"魏忠贤于是作罢。此次密谈，是否仍是旧话重提，而崔呈秀是否仍是力阻此举，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后来有关此时的材料，都是不利于魏忠贤的。魏忠贤既是十恶不赦之徒，给他多加几条罪状也无碍大事。人们更愿意相信，像魏忠贤这样的人，在此时肯定是有过篡位之举措的，久而久之便成了定论。不过细究起来，便不难发现，这种说法也并无多少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不乏推测臆想的成分。好在魏忠贤已死，不会争辩，当然即使不死，也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几年前，魏忠贤在整东林党人时，也没给过东林党人争辩的机会，就干脆利落地将他们置于死地。当时朝廷上下也都认为没有什么不妥（至少没有几个人敢公开提出抗争），甚至称魏忠贤是英明果断，翦除奸党，可以与孔子诛少正卯相提并论。因此几年之后，当魏忠贤倒台，人们自然也就用相同的办法，来对付魏忠贤之流，而且更没有人会认为这不是顺应民心。说穿了，就是被打倒的一方没有发言权，奸臣迫害忠臣是如此，忠臣打击奸臣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似乎没有多少差别，手段也几乎完全相同。至于谁是忠臣、谁又是奸臣，时间一长当然会弄清楚，但在当时，似乎仍跳不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

平心而论，魏忠贤当时确实没有走出篡位这一关键之步。如果一切是魏忠贤说了算，而魏忠贤又是如此奸恶，那么魏忠贤篡位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当然，魏忠贤没有这样做，并不是就可以说魏忠贤从来没有起过此心，也不是说魏忠贤也不一定就像原先说得那样坏，而是要强调，魏忠贤所以能作恶无忌，不仅仅是由于其自身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朝廷体制方面存在着不足，可供魏忠贤之流利用。魏忠贤尽管能把这种不足最大限度地为其所用，但他的所作所为，仍只是这种体制的产物，即在内依靠皇帝的信任，在外建立自己

的亲信集团，打击异己，达到目的。他的做法，与六十年前权臣张居正的做法，本质上本无二致，只不过张居正是出于公心，而魏忠贤是循着私心。也正因为如此，一旦先前的条件不再存在时，魏忠贤便不能再继续作恶。崇祯帝即位后几个月，魏忠贤便乖乖地去了他该去的地方，而不是像当时不少人所设想的那样要如何如何。原因只有一个，魏忠贤只是依靠了皇权这一至高无上的权威。一旦失去，便无所作为。至于魏忠贤是否想过让自己成为这个权威，后人不得而知，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魏忠贤并没有敢走出这一步，原因大概也不是他胆子小，而是体制的制约。

既然魏忠贤不敢或不想自己取而代之，那么他就得让合法的继承人信王由检即位。

八月二十三日，魏忠贤宣布了皇后懿旨，将天启帝的死讯布告天下。内阁大学士施凤来、黄立极，英国公张惟贤等纷纷具笺往信王府劝进。原在信王府做过事的太监徐文元，则向魏忠贤自请去信王府迎接信王入宫。这时的信王，大概是悲喜忧惧齐上心头。皇兄英年早逝，作为兄弟至亲的信王，自然是悲痛；皇兄之死，竟把他推向了皇帝的宝座，心中自有欣喜之感；魏忠贤当时是势倾朝野，内宫外廷，都由他控制，能否顺利即位，信王也是心中无数，难免忧心；再想到魏忠贤的为人处世，信王又担心此番进宫，魏忠贤会乘机加害自己，则万般恐惧，一起涌来。此番心境，真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

从信王当时的举措，不难看出他心中的恐惧。

他在入宫前，就预先准备好一些炒熟的米麦之类的干粮，带人宫中。进宫之后，他就在乾清官西向而坐，绝不轻易开口。宦官、朝臣们不时地在为一些琐事争吵，如天启帝的灵柩应放在哪里，皇后是否应该移宫等等，信王也只是在旁冷眼观看，不发表任何意见，一切任其自然。当时朝臣们的举止言行，尽入信王眼中，却没有人能捉摸透信王的心思。信王既不喝宫中一口水，也不吃宫中一粒米。到了晚上，信王独自在乾清官秉烛而坐，不敢合眼片刻。他见一太监持剑而过，便佯装好奇的样子，要留下剑来细看，随后就顺手把它放在身前的桌上，并答应日后付钱给那位小太监。当听到宫中巡逻之声，信王

随即起身慰劳巡夜太监，连道辛苦，甚至还要左右侍从通知光禄寺赐与酒食，一时宫内欢声雷动。

这就是即位前的信王！

当时朝廷上下对信王的继位意见已经一致，遗诏也已公布。遗诏称：

“皇五弟信王朱由检聪明夙著，仁孝性成。爰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命诏伦序，即皇帝位。勉修令德，亲贤纳规，讲学勤政，宽恤民生，严修边备，勿过毁伤。内外文武诸臣，协心辅佐，恪守典则，保皇固本。”

八月二十三日，公、侯、伯、驸马、文武百官及军民耆老等呈劝进表文。

依例，劝进表文要先后进呈三次。前两次总是要被退回，直到第三次新皇帝才会“勉强”同意。饱览诗书的信王，对这套繁文缛节，自然熟知，绝不会出错。

第一次劝进表文呈上后，信王不受。他是这样回答的：

“览所进笺，具见卿等忧国至意，顾予哀痛方切，继统之事，岂忍遽闻，所请不允。”

话说得很明白，意思是你们的为国之心我很明白，但现在皇兄新逝，我悲痛还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心思来听你们谈那些继统接位的事。大臣们当然也知道这是信王按照常例做出的客套，于是便再次呈上劝进表文，内容依旧，不过是多了几句劝信王要以国为重、节哀即位之类的话。信王览后，便又答道：

“卿等为祖宗至意，言益谆切，披览之余，愈增哀痛，岂忍遂即大位！所请不允。”

这次话说得白了一点。信王尽管在“披览之余，愈增哀痛”，但已从“岂忍遽闻”改成了“岂忍遂即大位”，即从原先的听都不想听，到了现在的不想立即即位，事情已大有转机！群臣们便一鼓作气，三呈劝进表文，痛陈利害关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信王果然被感动了，

于是他明确表示：

“卿等合词陈请，至再而三，已悉忠恳。天位至重，诚难久虚。遗命在躬，不敢固逊，勉以所请。”

一天之中，信王对继位的态度，从不想听到群臣提起，到终于同意立即登基，变化不可谓不大。大家都知道这是在演戏，却越演越真。这当然不能怪信王，也不能归咎于群臣，因为这是列祖列宗传下来的规矩，每位新天子即位时都要上演一番，尽管还从来没有一位新天子真把此事当真，而不做皇帝的。

本朝以礼仪立国，道德治世。假如道德礼仪真能化解功利，抑制私欲，理顺人心，则也不失为一种治国救世之道。否则，就必然要走向反面，成为功利的外衣，私欲的借口，甚至是人心动乱的根源。这种遮羞布式的假道德、假礼仪，讲还不如不讲！崇祯即位时的道德，大概就是属于后者。但可悲的是，人人都不敢不讲，包括贵为天子的崇祯帝！

既然信王已经勉为其难，同意即位，礼部便把早已准备好的礼仪程式呈进。

八月二十四日清早，朱由检身穿孝服，在大行皇帝灵前那放满祭品的几案前，亲自祭奠受命。接着，朱由检改穿衮冕，在皇极殿前设香案，备酒果，行告天礼。然后便前往奉先殿谒告祖宗，再在皇祖宣懿昭妃（刘昭妃）前行五拜三叩之礼，在皇后（即皇嫂张氏）前行四拜之礼，最后回到中极殿。另外，他还遣宁国公魏良卿、保定侯梁世勋分别祭告南郊、北郊，驸马侯拱辰祭告太庙，宁晋伯刘天锡祭告社稷。

据说信王在午时来到皇极殿行登基大礼时，突然天雷轰鸣，令在场朝见的群臣大惊失色，以为是不祥之兆。朱由检自然也不高兴。不过，即位仪式仍照常进行。君臣俗套之后，新天子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即位诏》，照本宣读。

《即位诏》自然还是那老一套：先颂列祖列宗、皇明基业；再赞大行皇帝，天启帝几乎被吹得就像是当今尧舜；尔后是叙述登基经

过，公布新朝“崇祯”年号；最后，《即位诏》以新天子的口吻，说出了新朝的治国方针：

> “朕以冲龄统承鸿业。祖功宗德，惟祇服于典章；吏治民艰，将求宜于变通。毗尔中外文武之贤，赞矛股肱耳目之用，光昭旧绪，愈茂新猷。”

不过，这个《即位诏》并不是崇祯帝的意思，而是内阁大学士们的杰作。此时的内阁，仍由魏忠贤的人控制，因此在诏书的字里行间，自然也充溢着这位旧朝权贵的旨意。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份诏书也是魏忠贤及其党羽给新朝新天子今后的大政方针所做出的一个基本规定，大有既定方针的味道。然而，胸怀中兴大志的新天子对此能甘心顺从吗？他还能像他的皇兄天启帝那样容忍魏忠贤之流继续权倾朝野、一手遮天吗？

从新天子不动声色的言行举止中，群臣们暂时还找不到答案。以魏忠贤为首的那些旧朝的既得利益者，此时仍心存一丝侥幸；而他们的对手，却已开始看到了朦胧的希望；更多的人则是在观望。

对这位新天子，天下臣民都在拭目以待！此时新天子本人的心中到底在盘算着什么呢？那只有他自己知道！

清算阉党

崇祯即位之后，一改前几朝皇帝荒怠不勤的做法，事必躬亲，认认真真地做起了天子。

即位前的那种喧嚣忙乱已经过去了，宫中又趋平静。魏忠贤仍然做着他的东厂提督。崇祯帝仍像其皇兄一样，厚待着他本人及其党羽。该赏的照样赏，该荫官也照样荫。皇兄原准备赐给魏忠贤的匾额，崇祯帝也照赏不误。所有这些，再联想起不久前魏忠贤的从子宁国公魏良卿曾在新帝即位前受遣代天子祭告南郊的荣耀，臣民们似乎看不出新天子和权阉魏忠贤之间有什么不和的迹象。

人们不免也有些怀疑，他们两人之间果真能如此融洽吗？新天子对待魏忠贤，果真一如其兄吗？即使如此，他们两人也不致在一开始就能如此天衣无缝，不透丝毫隙光吧。新鞍配老马，尚且需要磨合期，何况是两个活生生的人呢？

魏忠贤也感到不对劲！自然想找机会试探一下。天启七年（1627）九月初一日，已沉不住气的魏忠贤便先施一招，以作试探。他给崇祯上书，乞求辞去东厂提督之职，交还印信等等。魏忠贤先出此招，也是有原因的。几天前，崇祯帝见魏忠贤、王体乾侍立在侧，便随口问起魏忠贤立枷毙人之事，大概是崇祯帝想起了魏忠贤以往用事，动辄以立枷示威，前后被毙杀者以千计之类的往事。崇祯帝此语一出，王体乾立即解释道：

“立枷之法，只是对那些大奸大恶、王法不能治服的人才用！”

崇祯帝听后，默不出声，好久才森然说道：

“话虽然是这样说，但仍觉得此举过于残惨，非国家盛事。”

崇祯帝此番言语，虽没有直接批评魏忠贤等人，但其不悦之情也十分明显。于是，魏忠贤不久便提出了辞呈，以试探虚实。

大出魏忠贤意料的是，崇祯帝不但没有批准，反而还好言相劝，极力慰言了一番，让魏忠贤安心任职。魏忠贤这一招如同打在棉花上，没发出力来。

不过，稍后的一件事却让魏忠贤更不安心起来了，即崇祯帝命奉圣夫人客氏搬出皇宫。这位客氏是天启朝宫中一位十分了不得的人物，魏忠贤能有后来这种局面，客氏功不可没。据说客氏在临出宫前，起了一个大早，素衣哀服，到天启帝的梓宫前拜别。她拿出一个用黄龙袱包裹的小盒，内装天启帝的胎发、痘痂，以及累年剃发、落齿、指甲等等，在灵前焚化，放声大哭。

对客氏的出宫，魏忠贤自然不太愿意。倒不是魏忠贤还想依仗于她，事实上此时的客氏也已失去了原有的价值，而是魏忠贤从中嗅出了崇祯帝对自己的态度，所谓一叶落而知秋。不过话又说回来，崇祯帝令客氏出宫，也不算过分。严格来说，以客氏的身份，她早就不能

留在宫中，先前只不过是由于天启帝的眷宠，她才得以破例长期留住宫中，享受特遇。现在既然已是崇祯帝当朝，让她出宫也未尝不可。更何况她在京师的住宅，也不比那些王宫豪宅逊色。出宫以后仍是富贵荣华。

崇祯帝的这一招，说起来也真是阴毒。在场面上，客氏出宫，合情合理，似乎也与魏忠贤没有多大关系。而实际上，人人都知客魏两人关系非常，动客氏就是碰魏忠贤，是让魏忠贤觉得难受，却又不好说出来。

魏忠贤也自然明白其中的关系。他必须继续出招，试探崇祯帝。

九月初三日，魏忠贤上书乞请免去户部丧礼香蜡银三万两，崇祯帝立即同意，下旨执行。

九月初四日，司礼监太监王体乾也向崇祯帝提出辞呈，却遭崇祯帝拒绝。崇祯帝对王体乾进行一番劝慰，并令他安心留职。

崇祯帝的应对仍然是如此不温不火。他有条不紊地做他该做的事。他追谥生母刘氏为孝纯皇后，以示尊亲之意。他册立信王妃周氏为皇后。他还追尊皇父的选侍李氏（即前述的东李）为庄妃，以报答她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不过，此时的崇祯帝，虽仍不动声色，但似乎也在寻找机会，敲山震虎。

依崇祯帝当时的处境，他大概不会先去主动出击。皇兄生前的谆谆嘱托使他多少有些顾忌：皇兄尸骨未寒，而生前重臣就遭贬逐甚至杀戮，情理上说不过去，别人也难免会有忘恩负义之类的看法，以致于留下口实。而且，崇祯帝当时孤身一人入主宫中，不仅周围全是魏氏党羽，就连朝廷上下也多是由魏忠贤把持，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帝连自保都成问题，哪敢贸然出击？他刚入官时的那种恐惧之感，至此仍未彻底消除。他于不声不响之中，暗暗地把信王府中的太监调到身边，并任命旧侍徐应元入司礼监，委以重任。其防范之心，丝毫不敢放松。在这种情形之下，他敢轻易动手吗？

崇祯帝深知魏忠贤过去的所作所为，也明白魏忠贤一日不除，他就无法大权独揽，更谈不上什么中兴。既然魏忠贤必须除掉，而自己

却又不能轻易出击，那么就只能等待机会！崇祯帝自然清楚，新天子即位之后，总会有人跳出来，或是想翻案，或是想投机，而把矛头指向魏忠贤及其党羽。

果然，不久便有人跳了出来。

国子监司业朱三俊，上疏弹劾监生陆万龄、曹代请祠魏忠贤国学罪。在几个月前，监生陆万龄上书天启帝，说魏忠贤的功劳已可以与孔子相提并论，要把魏忠贤移入国子监与孔子并祠。天启帝也同意了。不过因当时有人提出，假如某一天皇帝驾幸国子监，例应拜祭孔子，而魏忠贤的像就在孔子边上，拜孔子也就是拜魏忠贤，似乎不太方便。所以这个提议就没有实行。此时，朱三俊便以此事弹劾陆万龄等人。崇祯帝随即下令把陆、曹两人下了狱。先前还有一位叫李暎日的监生，也上过一疏，把魏忠贤比作是周公。崇祯帝正好翻到了这份奏疏，也随即下令把那位李监生逮问。

崇祯帝的这些做法，是否算是敲山震虎，就不得而知了。不过魏忠贤却坐不住了。

九月二十五日，魏忠贤上疏奏请停止全国各地为他建造生祠。崇祯帝的答复是优礼有加，他说：

“先前已经赐额同意兴建的那些生祠，继续照常修建。其他的就停下来吧。”

崇祯帝还进一步解释说：

“建祠祝釐，自是舆论之功，厂臣有功不居，更见劳谦之美，准辞免，以成雅志。”

意思很明白，是说天下为魏忠贤建生祠，是出于公心，而魏忠贤居然有功不居，要求停建，真是难得！因此让后面的那些生祠停下来，是为了成全魏忠贤的劳谦之美，而并不是为了其他。

几天之后，糊里糊涂的江西巡抚杨邦宪、巡按御史刘述祖，分别上奏崇祯帝，称魏忠贤功德巍巍，请求在江西为他建生祠。他们为建生祠，也在南昌作了些准备，顺手拆掉了三贤祠之类的古迹。据说崇

祯帝拿着奏章，边看边笑，最后写下“已有旨了”几个字，算是答复。魏忠贤非常紧张，奏请将这笔造祠钱粮解充辽饷，崇祯帝答应了。那两位江西的官员，真有点不识时务，出错了风头，到这种时候仍做这种蠢事。魏忠贤倒台后，这两位官员很是尴尬，吃了大亏。

到了十月初，崇祯帝还先后几次给魏忠贤、王体乾及其党羽叙功加荫。宁国公魏良卿、安平伯魏鹏的免死铁券做成后，崇祯帝仍命赐给。这些做法，多少打消了魏忠贤等人的疑虑，迷惑了他们。不过魏忠贤等人做梦也没想到，率先攻击弹劾他们的，却是自己阵营中的人。

率先上疏攻击魏忠贤党羽的是新任南京通政使的杨所修。这位杨所修，本是魏忠贤的党羽，因不满自己被外放南京这个清闲之地，加上也预计到魏忠贤集团不会长久，所以反戈一击，突然发难，弹劾“崔呈秀夺情，周应秋贪墨”。崔呈秀当时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周应秋任吏部尚书，都是魏忠贤集团中身居要职的骨干。杨所修的突然发难，令崔、周措手不及：崔呈秀立即出面应付。崇祯帝大概认为时机未到，便仍不动声色。他说：

“群臣流品，经先帝分别澄汰已精。朕初御极，嘉与士大夫臻平康之理，不许揣摩风影，致生枝蔓。”

意思是群臣都是皇兄澄汰过的，不致有错。不要捕风捉影，无事生非！

话虽是这么说，不过既然已有人出头，自然就会有人跟上来，无人能挡住！

继杨所修之后，另一位原跟魏忠贤不错的云南道御史杨维垣，也突然上疏，公开弹劾崔呈秀，话说得也很难听，而且涉及到了厂臣。崔呈秀依例上疏辩白，并请求回家守制，崇祯帝没有批准。杨维垣再次上书，揭发崔呈秀的罪行。工部都水司主事陆澄源也参崔呈秀“夺情为安，忍于无亲”。御史贾继春更是骂崔呈秀道：

“说事卖官，娶娼宣淫，但知有官，不知有母，三纲废弛，人禽不辨。”

话说到这种份儿上，崔呈秀再也无颜面在官位上待下去了。他三次上疏乞归守制，崇祯帝终于同意他回家丁忧。

身为兵部尚书的崔呈秀，几年来一直是魏忠贤在外廷最得力的同盟者。他的离职使魏忠贤仿佛被斩断了一条膀子。不仅如此，崔呈秀的下台，也给了朝廷许多官员一种信号，即魏忠贤失势的日子已不远了。

许多官员闻风而动，攻击的矛头也开始指向魏忠贤。到了十月二十五日，有一位叫钱元慤的主事上了一份措辞激烈的奏疏，公开弹劾魏忠贤，把魏忠贤与历史上的王莽、梁冀、王衍、董卓、赵高、武则天等人物的罪行一一作了对比。这位钱主事还为魏忠贤及其党羽魏良卿等人安排了归宿，要求崇祯帝或贬或诛，尽快处理。崇祯帝阅过奏章后，仅批了一句话："钱元慤小臣，如何又来多言，姑不究。"这种态度无疑是鼓励。

到了十月二十六日，有一位名叫钱嘉征的嘉兴贡生上疏，公开揭露魏忠贤的"十大罪状"，语言更为犀利尖锐，事实更为详尽。"十大罪状"依次是"并帝、蔑后、弄兵、无君、克剥、无圣、滥爵、滥冒武功、建生祠、通关节"。钱嘉征最后称魏忠贤的"种种叛逆，罄竹难书，万剐不尽"！

自杨涟首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惨遭毒手之后，还没有人敢如此公开尖锐地弹劾过魏忠贤。按理，钱嘉征只是一位贡生，本无资格给皇帝直接写奏章，所以这位钱贡生在开始时是把奏章送到通政司，按例通政司应负责封进转呈。可能是担心这份奏章会惹麻烦，通政使吕图南便以奏章的格式称谓有毛病为借口，要求钱贡生重新誊写，实际上就是不想封进。血气方刚的钱贡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又弹劾吕图南是"党奸阻抑"，吕图南自然不服，上疏争辩，把事情闹到了崇祯帝那里。崇祯帝便乘机下令把钱贡生的奏疏呈了上来。

崇祯帝在那份奏疏上的批语写得很温和，只是说，魏忠贤之事，朕自有独断。钱嘉征区区一位贡生，不懂规矩，姑且饶过这一回。一位贡生，竟敢这样弹劾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忠贤，而天子竟以不懂规矩为理由，不予追究，这种做法，明眼人自然不难从中揣摩出崇

祯帝的倾向。魏忠贤更是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魏忠贤跑到崇祯帝面前，连呼冤枉，痛哭流涕。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魏忠贤可能已算不上男儿，而且痛哭流涕也是其家常便饭。想当初，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就是用痛哭流涕来取得天启帝的支持，从而反败为胜的。不过这一次在崇祯帝面前，他却失算了。崇祯帝似乎不怕他的眼泪，反而让手下当场诵读那位钱贡生的奏疏，而且还要魏忠贤亲耳聆听。魏忠贤当时的心情如何，就不难想象了。

魏忠贤立即上疏，以患病为由要求辞职。病真是一件好东西。说有就有，要无即无。明明有病，却可以说没病，甚至十分健康；而本来无病，也可以立即称病。其目的都一样，就是为了掩人耳目，利于进退。魏忠贤本想以病为托词，躲过风头，以退为进。没想到崇祯帝将计就计，竟成全了他，收回了司礼监和东厂印信，令他到白虎殿守灵。随后，魏忠贤像赌气似的，疏辞公、侯、伯三爵以及诰券田宅，崇祯帝也得理不饶人，竟一一同意。对其党羽之类似要求，崇祯帝也是一一依此照办，并乘机调整人事安排。

魏忠贤这次彻底失算了。他或许是想以退为进，寻机再起；或许是想远离荣华富贵，以哀兵之形求得同情，侥幸过关；或许是过高估计了自身的影响，没有预计到自己会有这么多的敌人。无论如何，他绝对是走错了棋。他大概忘了官场上的原则，即只有锦上添花，绝无雪中送炭。既然魏忠贤已是将倒之墙、落水之狗，那么就绝无不推、不打的道理。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别人！因为别人也有自己的道理。像东林党人，以前吃尽了苦头，到了这种时候，哪有不跳出来的道理。而当初为了利益而追随魏忠贤的那些人，一见魏忠贤已指望不上了，自然要另寻活路，反戈一击也在所难免。更有不少人则希望在这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奋起一击，立功树名，挣下点出人头地的资本。这样一来，除了那些与魏忠贤牢牢捆在一起的骨干分子以外，还有谁会不倒魏忠贤呢？当然，也有个别官员例外，如前述的那两位江西官员，到了这种时候，还要奏请在南昌为魏忠贤建生祠，如果不是因为江西闭塞、京师信息不通的话，那么这两位官员真是糊涂到了极点。像这种

糊涂虫，也活该倒霉！

魏忠贤的大错就是过早地卸职。如果他能顶住当时的压力，保住其阵营的完整，压住阵脚，不这么急促地卸职，那么，朝廷上下也不致于一下子有这么多人敢跳出来攻击他，他也不致于败得这么快。魏忠贤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败得如此迅速、彻底，总让人在拍手称快之余，不免有这样的疑问：天启朝时的魏忠贤，是否真的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拥有如此大的权力？这其中是否存在有意或无意的夸大？这种夸大是为了加重魏忠贤的罪行，还是减轻天启帝的过失？

魏忠贤既然失势，那么天下倒魏的奏章自然就像雪片一样飞进宫中，到达崇祯帝的手中。或许崇祯帝要的也正是这种效果！这位少年老成的崇祯帝明白，只要大局一定，舆论便会迅速取得惊人的一致。这也是本朝政治的特点。几年前诛杀东林党人时，天下也是口诛笔伐，几乎人人喊杀；与此同时，对魏忠贤则是歌功颂德，无以复加。当然，以天下之大，总有那么一小撮人不合潮流，要唱反调。不过这也没多大关系，因为这些人已绝无机会发表他们的谬论，而且迟早要被顺手打倒。

既然魏忠贤的罪行已经被揭发到了这种程度，那么清算的时机就已经成熟。在十月底，崔呈秀已先被交吏部勘处。到十一月初一日，崇祯帝便公开告谕魏忠贤的罪行。他说：

“朕闻去恶务尽，驭世之大权；人臣无将，有位之炯戒。我国家明悬三尺，严惩大憝，典至重也。朕览诸臣屡列逆恶魏忠贤罪状，俱已洞悉。窃思先帝以左右微劳，稍假思宠，忠贤不报国酬遇，专逞私植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略数其概……”

接着便是魏忠贤的具体罪行。最后，魏忠贤被发配到凤阳祖陵司香，客氏被送到浣衣局监管，两人家产全被籍没入官。

至此，魏忠贤、崔呈秀、客氏等人已被打垮。不过这样的处理绝对不是最终的结果。弹劾他们的奏章仍是络绎不绝，纷纷要求进一步严惩。这也不难理解。一来是魏忠贤已成落水狗，不打也说不过去。二来魏忠贤虽然已成了落水狗，但大家仍心有余悸，担心突然有一天

他会爬上岸，再来咬人，所以要痛下杀手，除恶务尽。就连崇祯帝也有点类似的担心。

魏忠贤当时的做法，也确实授人以话柄。据说他离开北京时，用四十辆大车载着珠宝，并有战马千匹、壮士八百随行，依旧是威风八面，那情形，不像是被贬发配，倒像是赴凤阳做什么大官。这还了得！群臣纷纷攻之，崇祯帝大为震怒，下决心彻底铲除。十一月初四日，他告谕兵部道：

“朕御极以来，深思治理，而有逆恶魏忠贤，擅切国柄，蠹盗内帑，诬陷忠直，草菅人命，狠如虎狼。本当肆市以雪众冤，姑从轻降发凤阳。不思自惩，将素畜亡命之徒，身带凶刃，不胜其数，环拥随护，势若叛然。”

崇祯帝下令锦衣卫派员对魏忠贤严加押送，赴凤阳交割，而对跟随的余党，立即擒拿。

魏忠贤的死党李永贞得知崇祯帝的谕旨后，连夜派心腹李朝钦飞骑追赶魏忠贤密报。李朝钦在一个名叫新店的地方赶上了魏忠贤一行。此日晚上，他们一行人到达阜城（今河北阜城，当时属京畿）投宿。魏忠贤住在尤克简家。他与李朝钦两人举杯痛饮。据说两人酒至酣处，忽听窗外有人唱起一首小曲《挂枝儿》。曲云：

> “听初更，鼓正敲，心儿懊恼。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如今寂寞荒店里，只好醉村醪。又怕酒淡愁浓也，怎把愁肠？扫？
>
> 二更时，辗转愁，梦儿难就。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稠。如今芦为帷，土为炕，寒风入牖。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绕房？走。
>
> 夜将中，鼓冬冬，更锣三下。梦才成，还惊觉，无限嗟呀。想当初，势倾朝，谁人不敬？九卿称晚辈，宰相谒私衙。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
>
> 城楼上，鼓四敲，星移斗转。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如今别龙楼，辞凰阁，凄凄孤馆。鸡声茅店月，月影草桥烟。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
>
> 闹嚷嚷，人催起，五更天气。正寒冬，风凛冽，霜拂征衣。更何

人，效殷勤，寒温彼此。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

据说这是京师一位姓白的书生所作。当时魏忠贤、李朝钦在房中喝酒时，这位白书生在外厢房彻夜吟唱，听得魏忠贤是无限感慨，万念俱灰。现在看来，这首小曲似乎更像是在魏忠贤死后而作的。不过，这首小曲确实唱出了魏忠贤临死的心境：“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

魏忠贤选择了死！这天凌晨，魏忠贤在寓所上吊自杀，他的死党李朝钦也追随而去。十七年后，崇祯帝在煤山也以同样的方式走上了绝路，身边也只剩王承恩一人追随而去。这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后人在崇祯帝自杀的煤山，还立了一块写有“思宗殉国处”字样的石碑，供人凭吊；而在魏忠贤上吊自杀之处，恐怕就不会有类似的东西。阜城人或许至今仍在耿耿于怀，嫌魏忠贤玷污了他们的宝地。假如说历史有什么公正的话，这大概就是公正的一部分。

魏忠贤死时，身边虽不乏李朝钦这样的人物随他而去，但更多的人却不是这样，可谓是应了那句古语：树倒猢狲散。当时押送魏忠贤的两位太监刘应选、郑康升，原都是魏的部下，关系都不错。据说刘应选早上起来，看到魏忠贤已死，便把魏氏随身所带珠宝席卷一空，还假装着说：“魏忠贤跑了，我去追！”便带着心腹几人扬长南去。郑康升倒还算上路子，立即报官，申文上司，等候发落。

魏忠贤一死，其党羽人人自危。崇祯帝借此机会，在群臣人人喊打声中，对其党羽进行大规模清算。

十一月初九日，崇祯帝下旨，命削崔呈秀籍，“追夺告身”。当时已归蓟州的崔呈秀，已知魏忠贤自尽之事，明白大势已去。据说他当时把姬妾招呼到身边，把珍宝都放在眼前，呼酒痛饮，然后也上吊自杀。他最宠爱的小妾萧灵犀也伏剑自杀。

十一月十七日，崇祯帝下令在浣衣局掠死客氏，逮捕其子侯国兴。

到了崇祯元年（1628）正月，崇祯帝又下令对这三位罪魁祸首进

一步加重处罚，不过三位罪犯本人已死，因此只能由他们的尸体来承担这种严厉的处罚。好在当时正处冬天，尸体尚不致腐烂。结果是魏忠贤之尸被寸磔，即所谓“凌迟”（民间俗称“杀千刀”），斩崔呈秀的尸体于蓟州，又斩客氏之尸，并把客氏之尸发净乐堂焚化。这些做法，后人或许体会不到其中的严厉，不过在当时确实已是赶尽杀绝的了。

受到严厉惩罚的还有魏良卿、侯国兴。魏良卿、侯国兴被立即处斩弃市。其家属也受株连，不分老幼，满门抄斩。据说当时被押赴刑场时，有的孩子还熟睡在母亲的怀抱之中，不知祸之将至。当时的人认为这是魏、客惨毒的报应，感到人心大快。现在看来，这未免有些太过。不过话又说回来，古人这样做大概也有古人的道理。试想：如果一人得势时可以为所欲为，恶事做绝，好处占尽，东窗事发后却只要一人承担，本人一死了之，全家富贵依旧，甚至是痛苦一时，痛快一生，那么敢以身试法、心存侥幸的人大概仍会不少。所以古人便定下了这样严厉的株连之法，以示警戒，也让人有后顾之忧。

清算的范围越来越大。在魏忠贤时代春风得意的那班人所共知的骨干，纷纷落马。内阁首辅黄立极在这年年底被罢免。部院大臣中先后被罢的有周应秋、张续我、孟绍虞、田吉、阎鸣泰、刘绍、苏茂相、杨梦衮、孙杰、孙贞、薛凤翔、刘廷元、吴淳夫、李夔龙等。锦衣卫等一些重要部门也被大换血，田尔耕、孙云鹏、张凌云、陈大同、梁梦寰、白太始、魏抚民、李永贞、李实、涂文辅、王国泰、崔应元、王莅民、魏持衡等等，也先后被罢。其余如巡抚单明翊、朱童蒙，提督刘志选等也先后被革职。其中田尔耕、许显纯先被“论死”，后被处死抄家。李永贞也被斩。崔应元、孙云鹤、杨寰等被充军戍边。客光先、客瑶、杨占奇被判“永戍”等等。随着清算的加剧，其中有些人所受的惩罚又进一步升级。

在大批罢免魏氏党羽的同时，崇祯帝还做了一些其他的事。如他下令召回诸边镇的镇守中官，使宦官不能再拥有兵权。不久。他又下令宦官非奉命不得出宫门，让宦官失去交接外廷的机会。即位之初的崇祯帝，对宦官深具戒心，所以有如此禁令。不过到了后来，这位痛恨宦官的皇帝，竟然又重新倚靠宦官，看来宦官之祸，确实是有体制

方面的原因。崇祯帝还下令免去那些在天启朝被逮捕处死官员的“赃款”，释放他们的家属，为后面的抚恤埋下伏笔。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那就是选拔阁臣。

天启七年（1627）的十二月，崇祯帝为了选拔内阁大学士，竟然用了抽签的办法。他先是把九卿科道诸官员召入乾清宫，并把候选人的名单做成签条放入金瓯，然后焚香肃拜，依次从金瓯中拿出签条，被抽到的就算是入阁。依此法第一批被抽到的依次是钱龙锡、李标、杨景辰、来宗道。后来大家觉得入选者太少，崇祯帝便又从瓶中抽出两签，周道登、刘鸿训两人被抽中。这六人便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

选拔内阁大学士这样的最高级官员，崇祯帝竟然要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这不仅反映了这位年轻皇帝对朝廷大臣结党营私的做法深怀戒心，也反映了他为政方面的特色。这种特色，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明显。

不久，崇祯帝迎来了用自己的年号命名的时代，即崇祯元年。这位年轻的皇帝，将在这新的一年中，如何来中兴他那步履艰难的帝国呢？

好一个倪元璐

大明帝国步人崇祯时代，面临着许多严重的困难，真可说是到了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候。这里仍先说中央朝廷政治，其他如外敌、内乱等，留在后面再论。

魏忠贤等人虽在肉体上被彻底消灭，他的骨干党羽们也被纷纷削职惩处，但魏忠贤的阴影仍笼罩在朝廷之上。朝廷对魏氏集团的清算，到底要做到什么地步，仍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原先与魏忠贤有些瓜葛的人，此时仍有不少位居要职。他们此时

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让魏忠贤一案到此为止，不要再深挖下去了，表面上说是稳定人心，实际上还是怕牵连自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一方面大造舆论，另一方面也竭力阻止东林党人的复出。他们深知，只要东林党人复出，朝廷局面就会立即改观。因为东林党人吃魏忠贤的亏太大了，复出后肯定还要继续深究，而且肯定要牵连到与魏忠贤有瓜葛的朝中大臣。

那位首先跳出来弹劾崔呈秀的云南道御史杨维垣，此时就力主魏案到此结束，同时竭力阻止东林党人复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东林党人与魏忠贤、崔呈秀等人也差不多，都是“邪党”。不能因为魏忠贤主持局面、迫害过东林党人，就能证明东林党人不是奸党。东林党这个前朝钦定的案子不能翻！

对魏忠贤之流，此时大概已没人会笨到去帮他们讲话的地步。事情明摆着，谁讲谁沾腥，魏逆爪牙之类的帽子正愁没人去戴！但对东林党人，情形就不同了。被迫害致死的骨干分子前后也只有十几位，而大批被打击的东林党人虽都被削职，但人还在，心也未死。虽然此时他们还没有重大的发言权，但他们的许多同情者自然会为他们出头说话。

崇祯元年（1628），终于有一位叫倪元璐的京官出头为东林党人说话了。

倪元璐，浙江上虞人，天启二年（1622）壬戌科进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崇祯即位后，升为编修。这位倪编修看不惯杨维垣的这种做法，便给崇祯帝上了一疏，为东林党辩护。他说：

“今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氛已息，而正气未伸。”

这两句话掷地有声，画龙点睛。然后笔锋一转，指出东林党人与魏忠贤、崔呈秀的本质区别：

现在攻击崔、魏者，都把他们与东林并称为邪党。如果称东林为邪党，那么魏、崔之流又算什么？魏、崔既是邪党，那么抗击魏、崔的东林岂能算作是邪党？东林是天下才薮，错在过于刻薄，但绝不是狂狷邪党。

倪元璐接下来的话，对有些人就不那么中听了。

他说，读书人处世立身，宁可矫激，也不能忘廉耻。如果以“假借”、“矫激”为大错，那么就会有人公然背叛名义，忘却廉耻，所以会有天启年间那种天下为魏、崔歌功颂德的场面。而大家还自我安慰，说什么“无可奈何，不得不然耳”。正是这种无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造成了天启年间无所不为的局面。现在朝廷竟能原谅这些随波逐流之辈，却不肯替那些刚正不阿的东林党说句公道话！

最后，这位倪编修竟敢点出别人不敢说出的关键，把话说白了：

经过天启大狱，幸存下来的东林党人实在难得。皇帝多次说要酌情起用这批人，而“当事者”却不肯为东林党人翻案，不肯让他们复出。这种做法是怕东林党人复出后报复吗？！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则我认为是过虑了。那些借东林之案而媚崔、魏的人，近来已纷纷落败，难道还要等到东林党人复出后来报复！？那些原本不附崔、魏，并为击败崔、魏出过力的入，实在是难能可贵。对这些人，即使东林党想要报复，也报复不到！

倪元璐的胆子是够大的！他竟敢第一个跳出来，为东林党这样的钦定逆案公然翻案。让人听了心惊胆战。

崇祯帝当时看了他的奏疏后，就不太高兴。

此时的崇祯帝，正为自己一举粉碎崔、魏集团的英明果断而沾沾自喜，天下臣民也是赞颂不已，而这位倪编修竟说什么现在是“方隅未化”、“正气未伸”，大有藐视明主之意，这还了得。崇祯帝被泼了一头冷水，当然很不高兴。他给倪编修的奏疏下了一个结论，说是“持论未当”，并批评倪元璐说：

“朕屡屡下旨，秉公斟酌，起用官员，有什么‘方隅未化’、‘正气未伸’？！”

崇祯帝这样的态度，也自有他的道理。皇兄天启帝临终前谆谆叮嘱，要他重用魏忠贤之流。而自己却在皇兄尸骨未寒之际，把魏氏之流一网打尽。在他看来，已是不易，再搞下去，范围不仅越来越大，涉及的人也势必越来越多。更麻烦的是，魏忠贤所做的事，都是借天

启帝的名义，现在用魏忠贤等人去充当替罪羊，还勉强过得去，但要再深究下去，天启帝大概也脱不了干系。别人就要说闲话了。况且，在崇祯帝眼里，东林党人也算不上什么好东西。

正因为如此，崇祯帝此时不太愿意再有大举措。对东林党人，他不愿予以彻底平反，仅是免去仍然欠着的“赃款”，释放被株连的家属。对那位很有可能是受东林余孽指使而出面攻击首辅黄立极的山阴籍监生胡焕猷，崇祯帝也下令把他除名，以示警戒。在崇祯元年（1628）正月，崇祯帝还下令册封天启帝的皇后为懿安皇后，也多少有点安抚未亡人的意思。

倪元璐的奏疏还令许多人不安。在当时朝廷之中，许多人都与魏忠贤集团多少有点瓜葛。“九千岁”，大家都跟着喊过，“生祠”，大家也都去拜过，不少人甚至还走过魏忠贤等人的路子，这叫做“无可奈何，不得不然”。现在事情过去了，一切往前看，不要再纠缠这些说起来令人难堪的往事了，大家相安无事算了。这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想法。而倪元璐竟又重提旧事，这不是挑起事端，破坏朝廷的安定团结、同舟共济吗？所以很多人开始感到不安。大学士施凤来给皇帝拟旨时，第一条就称倪元璐“持论未当”。杨维垣更是上疏指责倪元璐说：

“词臣（指倪氏）持论甚谬，生心害政可虞！”

这位杨维垣也是犟脾气，后人对他的评价不高，就是因为他在这方面的表现。魏忠贤时代，是他力主修《三朝要典》，把东林党人彻底打倒。崇祯上台后，他又首劾崔呈秀，高举倒魏旗帜。现在他又跳出来，要维持旧局。当时朝中，与魏忠贤有瓜葛的大有人在，而他却偏偏要跳出来出头，招来一身是非。他的所作所为，固然考虑到他自身的利益，但也与他的性格有关。大概正因为如此，当后来清军攻破南京时，这位当时已是被人不屑一顾的魏氏余孽，竟也自杀为朝廷尽忠！他的表现并不比那些正人君子差，甚至还比其中的一些好。你说他是忠臣还是奸臣？说不清！

偏偏倪元璐也是犟脾气。他不服！他竟再次上疏抗争。在他的第二疏中，倪元璐笔锋犀利，用词刻薄，把历史老账全给抖了出来，弄

得许多人下不了台，真有点骂人揭短、打人上脸的味道。

倪元璐的第二疏内容过多，不能一一列出。这里只能择其要者，录出一二。

倪元璐很聪明，他首先声明上次的奏疏是针对杨维垣而发，言下之意就是说并不是针对皇帝的，他也不敢。然后他开始逐条反驳：

圣上说“分别门户，已非治征”、“化异为同”、“天下为公”。而第一个提出孙党、赵党、熊党、邹党之说的正是杨维垣。因此，“陛下于方隅无不化，而维垣实未化；陛下于正气无不伸，而维垣不肯伸。”

杨维垣指责我盛赞东林，理由是东林曾推选过李三才，也拥护过熊廷弼。殊不知东林中也有力击魏忠贤的杨涟、首劾崔呈秀的高攀龙之类的人物！魏氏穷凶极恶，杨维垣竟口口声声称“厂臣公”、“厂臣不爱钱”、“厂臣为国为民”，那么东林人推选李三才，则何罪之有？至于熊廷弼行贿之说，实是魏忠贤用来诬陷清流，迫害杨涟、左光斗的借口，天下无人不知，而杨维垣犹因循旧说！

杨维垣指责我盛赞文震孟。文震孟忤珰（指魏忠贤）削夺，“破帽策蹇，傲蟒玉驰驿”，确实令人敬佩。试观数年来，“破帽策蹇”的气节之士，与那些孜孜求利之徒，孰荣孰辱，不辩自明。正是那些不愿“破帽策蹇”之辈，竞相歌功颂德，倡建生祠；也正是那些希望“蟒玉驰驿”之徒，口呼“九千岁”而能恬不知耻。

杨维垣指责我盛称邹元标。如果说他在京城讲学之举有错则可，如果说他讲学是别有用心则不可。当时魏忠贤驱逐诸人，毁废书院，目的正是钳制学士、士大夫之口，恣行不义。正是从邹元标被以“伪学”之名驱赶出京以后，魏忠贤才以真儒自命。国子监内，魏忠贤俨然与孔子平起平坐。如果邹元标等人仍在，能如此吗？

杨维垣驳斥我“假借”、“矫激”。当初魏、崔得道时，个个任真率性，颂德建祠，如果有一人敢“假借”、“矫激”，而能不颂不建，局面或许会有所改观。

杨维垣竟然说什么，真小人到其恶贯满盈时，自然就可攻而去

之。我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如果要等到恶贯满盈，那坏事已做绝，即使翦除，不也太晚了吗？即使像崔、魏之流，恶贯满盈已非一日，如果不遇圣明之主，谁能翦除！

杨维垣还始终以“无可奈何”为那些替魏忠贤颂德建祠者开脱，我认为这也说不过去！如果只有崔呈秀一人献媚称臣于魏忠贤，魏忠贤能成这样的气候吗！？如果魏忠贤以武力挟持诸臣叛逆造反，诸臣亦能以“无可奈何”而靡然从之吗！？

杨维垣还说什么，今日之忠臣，不应当以反不反崔、魏作为标准，我认为就应该以此为标准。只有通过崔、魏之案，才能确定人品。因此东林之人，反对崔、魏而遭迫害者，当然是正人君子。即使是那些攻击过东林，但因不附崔、魏而遭贬被逐之人，也可算是正人君子！杨维垣不以崔、魏定邪正，是因为他不敢这样做！

最后，倪元璐提纲挈领地说，东林得罪魏逆最深，受到的迫害最酷。时至今日，应当体谅他们被杀被压之苦，而不应当抓住他们的小节不放。魏忠贤之流曾以贬杀东林为首功，而东林党人今天竟然与魏忠贤之流一样，同为邪党恶逆，这算什么逻辑？倪元璐大声疾呼：

“人才不可不惜，我见不可不除，众郁不可不宣，群议不可不集。”

倪元璐之疏，撕开了脸面，把该说的都说了出来。崇祯帝当时尚不想依倪元璐的办法去扩大打击范围。如果依倪编修的严格标准，那么在魏忠贤当权时在台上的官员，大部分都脱不了干系，要是个个严查，打击面自然很大，人事变动就相当剧烈。因此，崇祯帝也就遵从那些稳健派官员（大多是与魏氏有些瓜葛的人）的意见，表达了他不想进一步扩大打击面的想法。他做出批示，说：

朕总揽人才，公正清明，你们这些大臣，同舟共济吧，不要再互相攻击，纠缠于门户之见了。

但既然开了口子，想压下去就不太容易了。继倪元璐之后，又有一位叫瞿式耜的官员，上了一疏，为东林党鸣不平。瞿式耜，常熟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当时官居户科给事中。他在此疏

中，大言他有“六不平”，对往事大发议论，要求把清算运动推动下去。这在当时代表着一种政治呼声。

政治运动一经开始，便会层层深入，刹不住车，想挡也挡不住。既然崇祯帝倒掉了魏忠贤集团，那么许多与魏忠贤有关的人和事，就得重新评价。既然魏忠贤是十恶不赦之徒，那么反对魏忠贤而遭贬杀的那批人就要平反复出。只要案子一有松动，而有人能为他们讲话，或有人复出，自然又要牵动一片，继续造成人事上的变动。原先遭打击的人越来越多地复出，原先在台上的人则自然要被贬被罢，而这种人事变动又会推动运动的继续深入。因此，在魏忠贤刚倒台时，像杨维垣之类还是倒魏的功臣，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杨维垣之流最终成为了运动的对象，沦为魏氏的党羽或倒魏运动的绊脚石，从而被清除出局。

不知崇祯帝是否清楚这一点。不过他的态度不久便有了改变。至崇祯元年（1628）三月，崇祯帝下令追恤天启时遭冤屈陷害而被迫害至死的诸臣，像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被魏忠贤直接逮捕迫害而死的，都被平反昭雪。而像冯从吾、邹元标、高攀龙等被魏忠贤贬削的旧臣，也都有赠恤。那位敢说敢讲的编修倪元璐出了大名，崇祯帝也没有过分追究。在当时的氛围中，这无疑是一个鼓励。

当时力主调和并阻止给东林党人平反的内阁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至此也被罢免。出头攻击他们的是御史罗元宾。这位罗御史措词激烈地说，施、张两位，身为大学士，却在魏忠贤擅权之时，贪图高位，一味迁就迎合，让魏氏为所欲为：赏公封爵，颂德建祠，诛杀削夺，无恶不作。这实在是误国徇私！施、张两位坐不住了，要求辞职，崇祯帝立即同意。这两位阁臣的去职，更有利于运动的深入。

到了四月下旬，那位出了大名的倪元璐，再次出头，上疏要求崇祯帝焚毁那部给东林集团定性的《三朝要典》。这又是一个惊人之举！

《三朝要典》的内容包括万历后期的梃击案、泰昌时期的红丸案及天启即位之际的移宫案。魏忠贤通过《三朝要典》的编修和刊印，不仅给东林党人定了性，为其贬杀东林党人提供了历史和现实依据，

而且还把自己大大美化一番。当时为了奉承魏忠贤，有人竟把魏忠贤抬高到与孔子一样，同是圣贤，列举的理由就是魏忠贤杀东林、修《三朝要典》，与孔子诛少正卯、编《春秋》可以相提并论。此说虽荒唐，但也足见《三朝要典》的分量。现在魏忠贤既败，东林人要彻底翻案，就必须搬掉这块绊脚石。倪元璐是聪明人，所以提出毁掉《要典》。

问题在于要毁《要典》，谈何容易？天启皇帝曾为这部书御制了序言，给定了性。《实录》中有关三案问题的记述上，全都参照了《要典》。更重要的是，主张修《要典》、参与修《要典》的当事人，不少仍在位，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来宗道、杨景辰就是天启朝编修《要典》的副总裁。

因此，当倪元璐提出毁《三典》时，大学士来宗道赶忙票拟圣旨道：

“所奏关系重大，着礼部史馆诸臣详议具奏。”

崇祯帝看了不太满意，便笔一挥，添了一句：

“听朕独断行。”

这句话已有明显的倾向性，所以礼部与史馆诸臣商量的结论也就不难预料。就像来宗道这样的当事者，见风向已变，也竟然要求毁掉此书。当时只有两人公开站出来反对。一位是翰林院的侍读孙之獬，一位是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尚书霍维华。

孙之獬当时跑到东阁，力主不能毁《要典》。话说得相当难听：

“皇上同枝继立，非有胜国之扫除，何必如此心狠手辣？于祖考则失孝，于熹庙则失友。”

孙之獬的话分量很重，意思也很明白：崇祯皇帝你是以兄终弟及的身份继位的，即位前你也是天启帝的臣民，即位后更应心存感念，你何必如此心狠手辣，在皇兄尸骨未寒之际，竟要毁掉《要典》这部由天启帝钦定的传世之作，叫天启帝颜面何存？

当时孙之獬情绪很激动，说完之后失声痛哭，响彻殿廷内外。而

且他立即要求辞职，不干了！这位孙之獬或许是通过此事看穿了世事的多变。清军入关后，他降了大清，最后入了《明史·贰臣传》。

霍维华也力主不可毁《要典》，不过不像孙侍读那样激动。其实，当时与《要典》有染的在朝官员，大有人在。像前述的两位大学士，像这位霍维华，都是《要典》修撰的“功臣”，因此也实在用不着像孙之獬这位侍读那样大出风头，痛哭流涕，弄得贻笑后世。不过，在那种大气候下，孙之獬竟敢如此出头，且不论其动机如何，单凭其勇气而言，也是难能可贵的。

崇祯帝倒没有深究孙之獬，只是让他解职回乡，尽管请求严惩孙之獬的不乏其人。当时崇祯帝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做到既要把运动向前推，又要不太伤了皇兄天启帝的面子。孙之獬的话虽然偏激，但也有几分道理。到了五月上旬，崇祯帝终于下定了决心，下令销毁《三朝要典》。不过他出言仍相当谨慎，说天启帝“止慈止孝，炳若日星”，不过这些光昭盛美的“功绩”，已载于《实录》，不必再用《三朝要典》这样的书来重复，因此《要典》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毁掉算了。这些当然都是废话，但又不得不说。最重要的也并不是这些，而是后面的几句话：

“自今以后，官方不以此事定臧否，人材不以此书定进退，惟是三朝原无遗议，绍明前烈，注意编摩。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异论，务衷朕清平之治。”

此话一出，套在东林党人头上的紧箍咒便失去了效力，等于给东林党人彻底平了反。东林党人大批复出立即变成可能。至于崇祯帝所说的“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异论”之类的客气话，则恐怕就是一厢情愿了。复出后的东林党人，能放过那些魏氏旧党吗？

内阁大换血

首辅李国在此年五月致仕。他是魏忠贤的同乡，能入阁多少沾了

点魏忠贤的光，别人一般也是这样想的。但李国做事，尚有分寸，每持正论。他继黄立极出任首辅五个月，日子极为难过。朝廷对魏忠贤集团的清算愈演愈烈，而他却是天启旧臣，靠魏忠贤提携才人了阁，因此有些话也说不出口。到五月初，他见事已不可为，便上疏乞归，返乡不久后就去世。临去职前，他推荐了韩爌、孙承宗这两位带有东林色彩的大臣代替他。

李国去职后，来宗道出任内阁首辅。这位来宗道与魏忠贤的关系也说不清楚。他做事诡秘，为人圆滑。在魏忠贤时代，他与另一位内阁大学士杨景辰出任过《三朝要典》的副总裁，而到崇祯帝要毁该书时，他也举双手赞成。他对东林一案的平反，态度不是很积极。他曾笑着对倪元璐说：

“你这人也真是多事！按照成例，像你这样的翰林编修，只是香茗一杯而已。”

意思是怪倪元璐为东林出头，是过于多事。因此当时朝野给了来宗道一个“雅号”，称他是“清客宰相”。当时朝廷的气氛，自然容他不得。东林派的官员，纷纷上疏弹劾。来宗道便与杨景辰一起，在六月被罢免。

也就是在这个月，魏忠贤原先的两位干将魏秉谦、冯铨被削籍。这两位干将在魏忠贤擅权时，便因内部矛盾，卸职不干，至此也被处罚。另一位干将许显纯也在此时被斩首。据说在会审许显纯时，后来成为大思想家的黄宗羲，乘隙上去用铁锥狠狠地刺了一锥，算是为自己惨死在许显纯手里的父亲黄尊素报了一锥之仇。

来宗道下台后，刘鸿训实际上就是内阁的当权派。这位刘鸿训做事刚正果断。他利用当时朝廷的局势，毅然罢斥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孙之獬、阮大铖等人，据说是人心大快，但也引起了对手的仇恨。到了十月份，刘鸿训竟被赶下了台，落得个充军戍边的惨局。

刘鸿训在开始时深得崇祯帝的欣赏，也多次给崇祯帝出谋划策，所以他的对手一时也奈何他不得。但到了十月份，他最终还是被对手抓住了把柄。

刘鸿训栽在一件可大可小的事情上，说起来也是够冤的。

当时惠安伯张庆臻被命总督京营，但在皇帝给他的诏书中竟有“兼辖捕营”这样的内容。按朝廷成例，总督京营者不得兼辖巡捕军，免得兵权过于集中。因此上述的任命是严重违制行为，有一位名叫郑其心的提督立即向皇帝提出非议，认为这是不洽适的。

崇祯帝很生气，立即要追究责任。当然他不会追究自己的责任。虽然诏书是以他的名义下的，但事实上却由内阁预先起草好的。皇帝总揽天下大事，日理万机，像京营总督不能兼辖巡捕军这样的琐事，他很有可能就不太清楚，这也情有可原。但对内阁及兵部而言，这样的事就是大错误了。官已做到大学士这份儿上，就应该知道这些具体规定，绝不应该出错。现在出了这样的错误，说轻一点是疏忽，说重一点则是难以开口的大问题了，因为这涉及到京师的兵权。

处理的结果是一位叫田嘉壁的中书舍人，被逮捕下狱，罪名是妄改敕语。这多少有点冤枉，这位中书舍人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妄改这样的文件，而且中书舍人也只是负责誊写，即使想改，恐怕也无从改起。这一点明眼人一看即知。

刘鸿训的对手们自然也知道这点。他们立即抓住这一把柄，猛攻刘鸿训。给事中李觉斯上疏说：

“此事由兵部拟稿，再送内阁辅臣审定，中书舍人缮写。因此仅处理中书舍人一人，不合情理。内阁和兵部也应追究责任！”

多疑的崇祯帝仔细一想，此言也有道理，便亲自赶到便殿询问那些内阁大学士，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学士们个个说不知道。崇祯帝不禁大怒，令廷臣劾奏。这样一来，朝廷就像炸开了锅，热闹非凡。

李觉斯立即上书，说刘鸿训接受了惠安伯张庆臻的贿赂。御史吴玉也上疏说妄改敕书一事，是由刘鸿训一手操纵的。细心的崇祯帝则去查阅内阁的有关文书，发现在兵部呈进内阁的揭帖原件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刘鸿训的批语：“批西司房。”这说明刘鸿训是看过这份文件的，并明确批示把这份揭帖下到西司房（即制敕房）去的。崇祯帝立即下令内阁说：

“事情已十分明白。内阁立即拿出处理的意见来！”

内阁这下子慌了，全体大学士马上合奏申辩，但崇祯帝此时已听不进了。他立即下令，大学士刘鸿训撤职削籍，谪戍代州，最后死在戍所。兵部尚书王在晋削籍，惠安伯张庆臻因是世袭之臣，被停禄三年，以示处罚。

此案多少有点糊涂账的味道。刘鸿训即使有罪，也不至于要被处罚到这种地步。崇祯帝的这种做事风格，也令人不敢恭维。他大概是害怕廷臣结党营私，所以只要稍有迹象，便立即痛下杀手。这种做法，正好被刘鸿训、王在晋的对手所利用。

当时崇祯帝的心境很不好。他本以为像自己这样英明的君主，即位后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扭转乾坤，实现中兴。可现实中的许多事情，并不像他想象得那样简单。坏消息要比好消息多得多。辽东发生兵变，浙江发生海啸，陕西的饥民闹起了事。到九月份。京师又发生了地震。而去年的十月，南京就发生过地震。即位仅一年，南北二京就都震了一次，这莫非是什么不祥之兆？因此，崇祯帝就更加谨慎从事，尤其对于吏治，更是盯得紧，不想让朝廷再出现以往那种结党营私的局面。

不过，当时朝廷的形势，加上崇祯帝自己的为政作风，党争的局面在所难免。到十一月，朝廷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当时崇祯帝下令廷推阁臣。廷臣推举了吏部侍郎成基命、礼部侍郎钱谦益以及郑以伟、李腾芳、孙慎行、薛三省、盛以宏、罗喻义、王永光等十二人，钱谦益名列第二。钱谦益是常熟人，人称“东林浪子”，当时很有些声望，一般都认为他入阁应没有问题。没想到未能入围、心中不满的吏部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猜测到崇祯帝对这一廷推结果有怀疑，便谋划攻击这些人中最具东林色彩的钱谦益，阻止他入阁。

温体仁突然上疏，揭发钱谦益在天启二年（1622）主持浙江乡试时，曾关节受贿，人品不佳，不应入阁。这一疏，真可以说是毁了钱谦益的前程。

这件事说起来还真有点冤枉了钱谦益。当时他主持的浙江乡试，确曾发生过舞弊行为，舞弊者已被惩处，主持乡试的钱谦益虽不知情，但因失察之过，也被夺俸两年。本来此事已过了七年，世人也已淡忘。而老谋深算的温体仁此时突然重提此事，就是为了迎合崇祯帝肃清吏治、严惩贪官的想法，击中了要害。

这一招果然厉害！崇祯帝在第二天就召集阁部科道大员进文华殿，并令当事人温体仁、钱谦益到场对质。

钱谦益根本就没有思想准备。到了皇帝面前，他虽想竭力与温体仁争辩，说清问题，但似乎言辞颇益，底气也不足。而早已精心准备的温体仁，此时却口若悬河，言如泉涌。他慷慨激昂地说：

“我职非言官，本来不应该在此多说。而且这次会推阁臣，我也没有入选，就更应避嫌，不能说三道四。但是，在这种关系到宗社安定的选官枚卜大典举行之际，朝廷上下竟无一人站出来，揭发钱谦益结党纳贿的丑行！我实在不忍心皇上孤立于上，被人蒙骗，因此不得不说！”

这一番肺腑之言，说得崇祯帝连连称是。崇祯帝环视群臣，要他们表态。大部分大臣都说钱谦益无罪，帮他说话，只有周延儒帮着温体仁。他说：

“田千秋（指科场案中那位作弊的举子）关节是真！”

大学士钱龙锡等人则说：

“关节实与钱谦益无干！”

崇祯帝立即插话道：

“关节既真，他为主考，如何说不是他？”

有一位叫章允儒的吏科给事中争辩最力。他指责温体仁说：

“温体仁你是热衷大学士的位置，才会揭发钱谦益的。如果钱谦益应当惩处，你早就应该揭发，怎么要等到今天！”

温体仁马上反驳道：

“在此以前，钱谦益只不过是个闲曹轻职，问题不大，所以就没有揭发，而现在揭发他，正是因为他要入阁，关系重大，目的是要朝廷谨慎用人。如果真要像章允儒说的那样，在此以前就打击他，那才真叫党同伐异呢！”

章允儒不服，又影射温体仁道：

“党同伐异之说，是小人陷害君子的借口，天启朝之事可鉴！”

此时崇祯帝已经不耐烦了，大发脾气，下令把田千秋的那份弊卷拿上来，责问钱谦益作弊是否属实？作弊当然属实，白纸黑字俱在。问题在于钱谦益并未直接参与，而仅仅是失察，两者之间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崇祯帝认为，只要你钱谦益承认天启二年（1622）浙江乡试确有科场案就行了，至于上述的本质区别，他就不必深究了。面对皇帝这样的逻辑，钱谦益还有什么话可讲，只好认罪。既然认罪，崇祯帝更觉得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崇祯帝至此连喊侥幸，庆幸自己明察秋毫，英明果断，没让钱谦益这样的人进了内阁。他大发感慨道：

“要不是温体仁，朕几乎就要犯下大错！”

他越想越气，因为对钱谦益这种人，竟还有这么多人为其如此出力。他叱令把那位叫得最凶的章允儒逮捕下狱，并严厉谴责了那班不识大体的群臣。

周延儒不失时机地向皇帝进言：

“会推的做法，表面上看起来公正，实际上作主的只有一二人而已。其他的人都不敢乱讲话，否则就会招来麻烦。况且田千秋之案已有定论，不必再费口舌。”

周延儒的话，犹如火上浇油。崇祯帝在当天就决定罢掉钱谦益的官，回籍听勘，最后的处罚是坐杖论赎。田千秋更是倒霉，原已判充军，才遇大赦，没想到又进班房再审，最后丢了性命。为钱谦益辩护的人，除上述的章允儒外，其他如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人，都坐了与钱氏结党之罪，被分别处罚。

温体仁、周延儒两人略施小计，就让崇祯帝上了当，从而把当时正得意的东林党人打得大败。

崇祯帝的本性，此时已开始暴露出来。尽管他登基以来，为政勤奋、辛苦，很有责任心，但他的许多致命弱点也越来越明显：他性格多疑、武断，甚至刚愎自用，听不得不同意见，缺乏良好的政治判断力，也不熟谙帝王的驾驭之术，除了罢官杀人之外，也没有什么有效手段控制局面。此时的他还只是听信温体仁罢免了钱谦益，上了一次小当。一年多后，他竟上了满洲人的大当，把自己最得力的辽东主将亲手杀掉。

既然这次廷推没有结果，崇祯帝便任命刚刚还朝的韩鑛出任了内阁首辅。

韩鑛属于东林派的官员，但处事温和老成。在天启年间，他曾出任过首辅，后因与魏忠贤集团不和，便辞职引退。崇祯元年（1628）五月，崇祯决定重新起用韩鑛。此时韩鑛才到京复职，便被任命为首辅。

韩鑛到京时，正逢大学士刘鸿训被重谴，韩鑛立即上疏申救，但崇祯帝没有给他面子。当时有御史，如毛九华、任赞化因不满温体仁攻讦钱谦益的做法，上疏攻击温体仁。崇祯便再召内阁及九卿诸大员质询。温体仁竭力攻击毛九华、任赞化是钱谦益的私党，崇祯帝同意这种看法。崇祯帝秉烛召韩鑛至内殿，严加训导说：

“进言者不忧国而植党，当重绳以法！”

韩鑛在退朝后立即上了一疏，劝诫崇祯皇帝。他说：

“做臣子的不可以植私党以事君主，但做君主的，也不可以随便以私党之类的名目来怀疑大臣。贬黜奖拔，应根据大臣的才品高下、朝事修废而定。如果朝堂官府，戈矛妄起，畛域横分，则不是朝廷宗社的福祉！”

韩鑛的意思，就是要皇帝不要动辄疑神疑鬼，不信任大臣，更不要偏听偏信，主观臆断，随便贬黜升迁官员，而应该根据正常的考核原则和手段来定夺。否则，不仅不能消除大臣植党营私的恶习，反而

会引起文官的分裂，于朝政不利。

韩爌一向以老成持重而闻名。他对朝廷政治体制及其本质的理解和领悟，自然要比年轻的皇帝精深得多。他深知，只有加强文官之间、文官与皇帝之间的相互理解、合作和信任，同舟共济，方能有希望渡过朝廷面临的重重难关。如果再这样吵闹下去，不仅不会有结果，反而只会于事无补，雪上加霜，使艰难的步履在沼泽中越陷越深。后来的局面，证明韩爌的看法是十分有见地的。

党争：崇祯最忌惮的事

不幸的是，崇祯帝根本听不进此类劝告。在他看来，局面之所以恶化至如此地步，吏治是首要原因。要整顿吏治，大概也只有通过重典，别的办法没有什么用。因此，当这年年底有一位叫吴甡的山东御史提出利用崇祯二年（1629）的京察，进一步对阉党进行清算时，崇祯帝立即采纳了他的主意。

山东御史吴甡上疏说：

“京察就近在眼前了，因此十分担心魏氏余奸利用京察，蒙混过关。这些余奸的所作所为，已超出了考功之法的范围，也不是考功之法所能定夺的。因此有必要先令部院科道，把魏氏党羽的罪名，清理一遍，先行惩处之后，再开始正常的京察。”

吴御史的意思，就是先要把魏氏集团的成员或与之有关的官员的旧账先清一清，该处理的先行处理，不要与正常的京察混在一起。这样一来，许多官员势必要被京察前的清算所打击，连京察的机会也没有，其打击面是相当大的，朝廷的动荡也在所难免。

崇祯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认为此举不失是改变朝廷政治的一条出路。在崇祯帝看来，帝国的局面，经过他一年多的苦心经营，理应有中兴的迹象，至少也应有所改观，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仍多有掣肘，积重难返。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他仍认为是吏治。因此，他便想借京

察之机彻底整肃一番，且选定魏、崔集团的成员或有关联的那些人为目标，当时他也只能选此为目标。

崇祯二年（1629）正月二十四日，主意已定的崇祯帝召阁臣韩鑛、李标、钱龙锡及吏部尚书王永光到文华殿。崇祯帝给他们交待了任务。他明确表示要追究天启时那些附逆人员的罪行。为了确定证据，他发下当时那些有关给魏忠贤建祠称颂的奏疏，要求上述四人与左都御史曹于汴在内阁秘密评阅，确定名单，分定罪行，并再三叮嘱，不许让中书舍人之类的人员参预。至于具体的范围和依据，崇祯帝说：

“如事本为公而势非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随人点缀，须当原其初心，或可责其后效。惟是首开谄附，倾陷拥戴，及频频颂美，津津不置，并虽未祠颂而阴行赞导者，据法依律，无枉无徇。”

崇祯帝的话说得很漂亮，意思是只惩处那些骨干成员，而对那些附和之人，则不予追究。但具体执行起来，不可能如此，而且崇祯的真实想法，也不像说得那样好听。

首辅韩鑛、内阁大学士钱龙锡等都不太同意皇帝这种大兴刑狱的做法，因此在开始时仅列了四五十位众所周知的名单，上交皇帝。

当时不少人，甚至包括皇帝本人在内，都认为韩鑛、钱龙锡这样做，是怕结怨太多。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这两位熟谙朝政的大臣，不想因此再次造成文官集团的动荡。试想：魏氏擅权时，真正能不与魏忠贤发生关系的大概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东林党中的那批人物，另外一种或许就是魏忠贤等人用不着、看不上的人物。真正能像东林君子那样不顾身家性命而去抗争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去迎合、应付，这也是文官集团的一种传统、性格。除那些心怀不轨、借机往上爬的人外，大部分迎合魏忠贤的文官，也不见得有多大罪恶。读书人总想功成名就，希望在仕途中混出点名堂来，真正能看破名利的又有几个！更何况魏忠贤当时脸上并没有刻上大奸大恶之类的字样，反而是当时的“圣人”，皇帝的宠臣，他所做的事情，也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去做的。若真论起来，最大的附逆者应该是天启皇帝！

崇祯帝早已忘了当初进宫接受皇兄遗命时，口口声声称誉魏忠贤劳苦功高的情景；也忘了他刚即位时对魏忠贤的态度。当然，也有人说崇祯帝是迫于形势，故作姿态，为的是日后翦除魏逆，这足以见其英明之至。那么试问：崇祯位尊天子，尚且迫于形势，故作姿态，而地位低得多的群臣是否也可以如此呢？崇祯帝这样做是英明之至，而群臣们这样做就是附逆，这就是无情的宫廷政治逻辑！

这样说并不是不分是非，一概而论。事实上，天启朝时确实有一帮无耻之徒，通过种种不齿手段，希图侥幸。这些人应该受到惩处，付出代价。但崇祯帝打击的范围，远不止这些人。因此，当他看到韩鑛等上交的名单时，大为不满，下令再议。

韩鑛等人只得再议。在增加了数十人后，又把名单交给了皇帝。

这次崇祯帝被激怒了。他明令韩鑛等人，以“赞导”、“拥戴”、“颂美”、“谄附”为目，分类扩大范围，增加人数。他气呼呼地说：

“魏忠贤小小一位宫内宦竖，如没有外廷助虐，何能到这种地步？另外，那些追随他的内廷党羽，也要列入。”

崇祯帝说这话时，大概没有想到他在几年后竟又重用宦官，最信任宦官。韩鑛不服，不软不硬地顶了一句：

“外廷不知内事！”

崇祯帝立即斥责道：

“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

意思是你韩鑛对内廷之事，岂能事事不知？只不过是怕招惹是非怨恨罢了。

到了二月初九日，崇祯帝又把韩鑛等人召入便殿。韩鑛等见桌上放着一个黄袱包，内装许多奏疏。原来，崇祯帝竟不辞辛苦，把那些红本奏疏亲自翻出，要韩鑛等依此红本一一取录入案。韩鑛见状，大吃一惊，知道皇上是想借此大兴株连，便立即推托说：

“臣等职在调旨，三尺法非所习。”

意思是我不熟悉刑名，胜任不了这项工作。崇祯帝便又把吏部尚书王永光召进来询问，王永光据实回答说：

“吏部只习考功法，不习刑名。”

王永光讲的是实话，他虽是吏部尚书，但只习考功法，同样不习刑名，意思是他本人也与韩鑛一样，不能胜任。王永光的态度之所以也不积极，是因为他自己正被言官弹劾，说他是“阴附阉党”。在这种情况下，他能积极吗？崇祯帝所定下的标准中的那条“虽未祠颂而阴行赞导者”，真是可以无限发挥：即使你未参加祠颂，也可以把你归入“阴行赞导”之列，因为“阴行赞导”的范围实在太大了。除了那些公开跳出来反对魏氏的英雄外，其他人大概都属于广义上的“阴行赞导”的范围！王永光就是吃了这个亏！

既然韩鑛、王永光都这样异口同声，崇祯帝也不好再深究下去了。于是他又诏令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两位懂刑名的大员加入，负责定罪。

韩鑛等人此时只好遵旨从事，逐一审看奏疏原本、红本，并根据吏部、都察院两位长官开进的官员名单及具体事迹，互相参照对比，再按照皇帝钦定的名目分类抄录，列出名单，酌情拟议，最后由刑部尚书依据律例，各附本款。

到二月二十六日，皇帝再次召见内阁、部院大臣，把原本、红本中未列入的六十五人名单发下，令入案中。皇帝还钦定逆案中各类人等的量刑标准，依次是：谋大逆，判处凌迟；首犯、首逆、同谋、党孽，判处斩首；逆孽，判处充军；颂美，判处罢职为民等等。崇祯帝做事十分仔细，他竟发现漏了来宗道、张瑞图和贾继春。他便责问道：

“张瑞图、来宗道为何不在逆案？”

韩鑛立即回答：

“张瑞图、来宗道没有实状。”

意思是这两位没有什么具体证据。但崇祯帝立即反驳道：

“张瑞图擅长书法，为魏忠贤所爱；来宗道为崔呈秀的父亲请恤典时，奏疏中有‘在天之灵’之语，难道不是证据吗？”

崇祯帝又问道：

“贾继春为何没入逆案？”

贾继春就是那位在杨涟等人力主移宫后提出要善待李选侍的御史。韩爌回答说：

“贾继春当时请善待李选侍，不失厚道。后虽有所改口，令人稍觉反复，但持论也有可取之处。”

崇祯帝随即说了一句：

“惟反复，故为真小人！”

在崇祯帝的亲自过问下，这三位漏网之鱼也被补进逆案。

就在这个月，崇祯帝的长子慈烺出生。这当然是件大喜事，崇祯帝依例大赦天下。但逆案中的人物似乎没有沾到一丝喜气。定案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三月十五日，韩爌等呈上了逆案名单及其事迹、按律拟定的罪名。随后南京确定的逆案材料也报到北京。三月十九日，朝廷正式公布《钦定逆案》。崇祯帝告谕廷臣道：

“竖逆魏忠贤，狷狡下材，备员给使，倾回巧智，党籍保阿，初不过窥颦笑以市阴阳，席宠灵而饕富贵。”

像这样一位原本只是为“市阴阳”、“饕富贵”的“下材”、“给使”之类的宫内宦官，何以有后来那种权倾朝野的局面？用崇祯帝的话，就是“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蠢尔得肆其毒”。

崇祯帝把原因归结到外廷官员的身上。他说：

“乃一时外廷朋奸有徒，实繁有徒。或缔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阴谋指授，肆罗织以屠善良；或密策合图，扼利权而管兵柄。甚至广兴祠颂，明效首功，倡和已极于三封，称谓浸拟于亡等。谁成逆节，致长燎原？”

因此便有《钦定逆案》，以示惩处！崇祯帝的话说得一点不错，如果没有外廷这么多人追随魏忠贤，助纣为虐，魏忠贤是不可能权倾朝野的。但他不知想过没有，当时天下的官员又为什么要去追随魏忠贤呢？魏忠贤又是如何能一步步登天的呢？这样一位一手遮天、无所不能的大奸臣，怎么在新皇帝上台后仅凭一纸诏书就可让他命归黄泉呢？魏氏擅权的根本原因，就是朝廷体制方面存在着漏洞，这位大奸臣的最大后台，就是皇权本身！

《钦定逆案》对朝廷官员进行了一场大甄别、大清洗。除魏、客两位依“谋反大逆律”磔死之外，又分六等：

“首逆同谋”六人：崔呈秀、魏良卿、侯国兴，加上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依谋大逆减等论斩。

“结交近侍”十九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孙如洌、曹钦程、许志吉、薛贞、吴淳夫、李夔龙、田尔耕、许显纯等等。其中只有一位级别很低却能跻身此列的，就是那位提议要把魏忠贤与孔子并祀的监生陆万龄。依照诸衙门官吏与内官互相交结、泄露事情、夤缘作弊而扶同奏启者俱为谄附之例律，这些人被判以斩首，秋后处决。

“结交近侍次等”十一人：魏广微、徐大化、周应秋、霍维华、张讷、阎鸣泰、李鲁生、杨维垣、潘汝桢、郭钦、李之才（孝陵太监）。依照交接近侍官员引名之例律，减等充军。

“逆孽军犯”三十五人：其中魏家占了八人。这些人都是武官和担任武官职务的太监。全部充军。

“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全是内监，判处充军。

“结交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九人：像冯铨、顾秉谦、张瑞图、来宗道等等。此等人数最多，都依交接近侍官员引名之例律，减二等，坐徒三年，纳赎为民。

“结交近侍减等”（又称“末等”）四十四人：像黄立极、施凤来、杨景辰等。对这些人处罚最轻，仅依照考察不谨例，冠带闲住。人们往往不把此等与前述六等相提并论。

另有魏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五十余人。

对《钦定逆案》到底如何看，历来说法不一。但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崇祯帝“除恶务尽”的杀手之着，英明之至。在具体操作上，则有不少分歧。有人说太过了，有人却说还有漏网之鱼。有人说某某不应入案，处罚也太重，有人却说不仅该入，而且等级还应提高，处罚更应加重。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实，《钦定逆案》该不该这样去办，以及该不该在这种时候办，本身就成问题。对魏忠贤及其集团的清算无疑是肯定的，换了别人做皇帝也是如此。问题在于，这样大范围的清算是否适宜，朝廷能否承受得起文官集团这样的动荡和分裂。如果崇祯帝换一种做法，在把逆案迅速定下来的同时，不要过分兴刑狱，缩小打击面，以换取朝廷政治的安定团结，集中精力，上下一致，处理大事急事，结局可能会好一些。

现在再来看看这份《钦定逆案》的名单，也确实让人感到有点不伦不类。这么庞大并且长期把持朝政的叛逆集团，其领导人一位竟是大字不识几个、出身底层市井之徒的太监魏忠贤，另一位则是因为奶水充足而凑巧选人宫中做奶娘的农村妇女。一位不男不女的太监、一位乡村老妇，竟能领导这么多的大学士、部院大臣之类社会上层分子，这本身就值得深思。如果把天启帝作为这个集团的主犯，反而会更合适一点。事实上客、魏靠的就是他和他的皇权。那么，天启帝造谁的反、谋谁的逆？难道造他自己的反、谋自己的逆？当然不是！逻辑上也说不通。因此，说到底，还是朝廷的体制方面存在根本问题！

崇祯帝当然不会十分明白这个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制。但有一点他当时就能做到，那就是依靠自己的努力，避免体制方面的不足和后果，最大限度地调整理顺关系，发挥出体制的最大能量，去应对危局。

不过，崇祯帝的做法，似乎并不是如此。这或许有客观条件方面的因素，但也有他本人的主观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弄到后来，连崇祯帝自己都不敢相信、更不能理解这样的局面：即位以来，朕那样辛苦勤政，而局面却无一点起色，反而越弄越糟。

崇祯帝即位之初，对宦官擅权最为痛恨，严惩不贷。没想到不久以后，他又走上了依凭宦官的旧路，其程度虽比不上其皇兄，但在整个明朝中也是数得上一流的。

崇祯帝即位之后，严禁大臣结党，并屡屡痛惩，没想到却是越禁反而党争越烈，而且他本人似乎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崇祯帝即位伊始，便口口声声说要重用人才、选拔人才，为什么弄到后来却是朝署之中乌合之众甚多？除了开国皇帝太祖之外，本朝还没有哪位皇帝如此重惩过文武百官。真是贬杀愈多，吏治越坏，局面愈糟。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矛盾，始终贯穿于崇祯帝执政的十七年中。除了客观因素的作用外，崇祯帝自己应该负多大的责任呢？

在钦定逆案之后，朝廷经过了一段大清洗的动荡时期，最终总算初步稳定下来。

当时韩爌任首辅，李标、钱龙锡等任大学士，所以便有“东林内阁”之称。东林内阁执政时期，朝廷诸事尚能勉强维持。尽管崇祯帝是急于事功，举措常有失误，但因有老成持重的韩爌及其群辅们的辅佐，在一些大事的处理上，还算妥当，朝廷仍能相对平稳。

不过，随着外敌内乱的不断加剧，崇祯帝的毛病竟又重犯，而且犯得极不是时候。在满洲军队于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突破长城防线，威胁京畿的关键时刻，这位自命不凡的崇祯帝，竟然没有识破满人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反间计，逮捕了辽东前线的总指挥袁崇焕，并按照他自己的逻辑，判处袁崇焕极刑，导演了一幕千古奇冤。

袁崇焕之事一发，朝廷政局陡然逆转。周延儒于此年十二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参预机务，进入最高决策层。大学士钱龙锡却于此月被罢免。崇祯三年（1630）正月，首辅韩爌被罢免。三月，另一位大学士李标致仕。六月，温体仁入阁。不久，周延儒被任命为首辅，原先接替韩爌出任首辅的成基命被罢免。至此，东林内阁彻底解体。

袁崇焕之事，影响如此之大。那么事情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第四章
后金的挑战

崇祯帝即位之时，朝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后金。

后金自万历后期迅速崛起，蚕食辽东，而朝廷却节节败退，防线不断收缩。至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在辽东的防线已退到山海关一线，几乎到了不能再退的地步。因此，在即位伊始，崇祯帝就把辽东问题看作是头等大事。能否解决辽东问题，事实上也是崇祯帝能否实现中兴梦想的关键。

为此，他于崇祯元年（1628）起用原辽东名将袁崇焕，总督辽东，全权处理辽东事务。而袁崇焕也是意气风发，夸下五年平辽复土的海口。但实际情形并不像崇祯帝设想得那么顺利。崇祯帝原以为只要有了袁崇焕，辽东问题的解决就指日可待。而事实上，袁崇焕也非万能，仅靠他一人并不能扭转乾坤。战场内外，原先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甚至反而加剧。困难也依然存在，尤其是蒙古部落的降金，更使本已形同虚设的山海关以西的长城防线失去屏障，直接暴露在后金的攻击之下。更重要的是，此时由皇太极领导的后金，其实力和抱负，也已非昔日可比。

朝廷的力量并没有增强，甚至有所下降，而对手却变得强大了。这样一来，原先相持的局面自然要被打破了。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在明朝廷毫无思想准备之际，避过重兵防守的山海关防线，借蒙古之地突袭山海关以西的长城防线，撕开口子，杀入长城之内。

皇太极这一招，既快又狠，打得朝廷猝不及防，一片混乱。后金军队攻入长城之内后，在京畿腹地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地，并两次围困京师，直到次年五月份才退出长城一线。期间，朝廷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反击，连连损兵折将，丢城失地，被弄得精疲力竭。更严重的是，自作聪明的崇祯帝，听信谣言，中了后金设下的反间计，竟在军情危急之时，逮捕了当时辽东的统帅，也是后金最感畏惧的名将袁崇焕，自毁长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和严重后果。

袁崇焕被逮捕及最终遭残酷磔杀后，辽东前线由孙承宗统辖，然而这位昔日辽东名帅至此也无回天之力了。

当时朝中大权，已落到周延儒、温体仁等人手中，而原先东林内阁的成员，如韩爌、钱龙锡、李标等纷纷去职，或回籍，或获罪。带有东林色彩的孙承宗不可能得到全力支持，反而处处受到掣肘。

由于战事不断，加派日甚，天下衰竭，民乱已起，朝廷疲于应付，犹如抱薪救火，弄得焦头烂额。对辽东前线的支持，无论是兵马还是粮饷，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敷衍了事。在此情形下，孙承宗的防御战略根本无法实施，甚至连现状也难以维持，更谈不上反击、拓展了。

至崇祯四年（1631）八月，一直在与朝廷议和的皇太极，突然出兵围攻朝廷刚刚收复的大凌河城堡，于长山击败了从锦州出动的朝廷援军后，攻克大凌？河。

是年十一月，孙承宗辞职。

一月之后即此年的闰十一月，原毛文龙的部将、登州游击孔有德叛乱，在攻陷登州后，投降后金，并率后金兵攻取重镇旅顺。

辽东形势继续恶化，朝廷根本无法控制。

至崇祯七年（1634）五月，皇太极故伎重演，绕开山海关，借道蒙古，于六月抵达长城脚下。然后兵分4路，杀入长城。京师再次告急。皇太极在内地左冲右突近两个月后，从容而退。

崇祯八年（1635），皇太极获得元朝传国玉玺后，宣布撤销女真名号，统称满洲。

崇祯九年（1636）四月，满洲、蒙古诸贝勒、汉军都元帅、总兵官及文武大臣齐集盛京（沈阳），举行盛大典礼。由多尔衮、土谢图济农巴达礼、孔有德分别上满、蒙、汉文表章。皇太极受“宽温仁皇帝”之号，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定都沈阳。努尔哈赤被追谥为承天广运武皇帝，依汉制上庙号太祖。

至此，一个强大的大清帝国已初具规模。皇太极的抱负也不再是辽东，而是与大明朝争夺天下，取而代之。自此以后，皇太极三次率兵攻入长城防线，在京畿、山东地区大显身手，严重消耗了明朝的实力。而且还攻下了山海关外的四座重城，把前锋推到山海关前。此时，已离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日子不远？了。

因此，在崇祯朝，明朝与后金的对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以袁崇焕的冤狱为分界线的。

宁锦大捷：立功的人反被弹劾

要说到袁崇焕的冤案，就须追述一下天启朝以及崇祯帝即位前后的辽东形势和人事变动。

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突然率兵反击明军。当时，辽东经略熊廷弼（天启元年六月复出任此职）和广宁巡抚王化贞（天启元年五月由参议升任）关系不和。王化贞凭着首辅叶向高、兵部尚书张鹤鸣等人的支持，不听熊廷弼调度，力主全线反击，荡平建州，并先后几次组织军事行动，但都劳而无功。努尔哈赤却在精心准备后打

了王化贞一个措手不及。

努尔哈赤此次西击，先攻下西平堡，然后击败明军援军，占领了重镇广宁及远近四十余座城镇。熊廷弼、王化贞竟率军全线溃退，弃关外之地而不顾。关西蒙古人喀尔沁诸部乘机占领关外五城七十二堡。

熊廷弼、王化贞被下狱论罪。后来魏忠贤利用熊廷弼，大杀东林党人。最后熊廷弼被枭首九边。直到崇祯初韩爌为相时，熊廷弼的儿子还向朝廷吵着要他父亲的脑袋，以便回老家安葬。

熊廷弼被逮之后，王在晋任辽东经略。当时山海关外之地，尽被蒙古喀尔沁诸部控制，经略王在晋和蓟辽总督王象乾主张利用这些蒙古人守关外之地，作为官军与努尔哈赤之间的缓冲带。为此，他们请朝廷发给蒙古人粮饷，予以正式确认。同时，他们又主张在山海关外的八里铺修筑重城，驻兵四万等等。

这时，有位名叫袁崇焕的宁前兵备佥事提出了不同意见，显示出他独到的军事战略眼光。

袁崇焕，广东东莞人（一说祖籍东莞，至袁崇焕时已迁居广西藤县），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曾任福建邵武知县。天启二年（1622），袁崇焕被监察御史侯恂推荐到兵部，破格担任职方主事。侯恂就是“明末四公子”之一侯方域（朝宗）的父亲，有东林色彩，后在镇压明末农民军的战争中被委以重任，提拔过名将左良玉，兵败后曾被逮捕入狱，后获释。后世对此人争议颇大，说法很多。不过在天启初，侯恂还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东林官员。

袁崇焕能破格入兵部任职方主事，除侯恂的荐举外，可能还有一层关系，那就是他与韩爌的关系。袁崇焕考中进士时，主考官就是韩爌，当时他的官职是礼部右侍郎。因此，韩爌与袁崇焕之间，有“座主”、“门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当时官场上是一种很重要的人情渠道。至天启二年（1622）正月袁崇焕被破格调入兵部时，韩爌正是在内阁阁臣的位置上，而且内阁首辅也是东林党人叶向高。

不过，袁崇焕能入兵部，不仅是因为有这层关系，而且更与他本

人的条件有关。袁崇焕虽从小就习举子业，却同时对武略很有兴趣，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本朝的习惯是重文轻武，武人在朝廷中，很难谋得与文官相等的地位，而社会的精英，也很少去走武人这一发展道路。话又说回来，即使想在武略方面有发展，也必须先通过科举谋得文官的资格。在当时，像兵部尚书、经略、巡抚之类率兵带将的高级职位，全由文官担任。就是说，文官做到一定时候，有可能统率武将，而武将却不太可能去统辖文官。当然，这种体制也有问题，因为文官去管军事，虽能约束武将，但能精通兵书同时又武略超群的毕竟是少数，一旦选人不当，像万历末的杨镐那样，就会误大事。因此，像袁崇焕这样既长期熟习兵书韬略，又关注边疆政治的文官，在当时的条件下能脱颖而出，也不算奇怪。

袁崇焕的胆子也够大的。他在王化贞广宁兵溃后，曾一人单骑走遍山海关内外，考察边情。当朝廷上下无不谈辽事而色变时，袁崇焕却在兵部扬言：

“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卒守此。”

意思就是只要给我兵马粮草，我一人就能守住山海关。朝廷正愁没有这样的人，于是便再次破格，给他一个监军佥事的官职，把他推上山海关前线。袁崇焕赴山海关后，没过多久便得了个“铁胆”的称号。辽东经略王在晋也较倚重他，奏请任他为宁前兵备佥事，正式负责防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和前卫屯二地。这在当时就是明军的最前线了。袁崇焕力主在此筑城，作为山海关外的屏障，而王在晋却提出收缩防线，在山海关外不远的八里铺筑城，两人发生了矛盾。

袁崇焕便越级向首辅叶向高禀告，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袁崇焕的不简单。叶向高接到报告后，也拿不定主意，便与另一位阁臣孙承宗商量。

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榜眼，天启帝即位后，以左庶子充日讲官，据说深得天启帝这位少年皇帝的赏识。天启二年（1622）初广宁失守后，辽东形势危急，孙承宗因平素通晓兵法，而被破格由礼部右侍郎提升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这在本朝历史上还没有多少先例。孙承宗的入阁，是由东林党魁、御史左

光斗提议的，叶向高对此积极支持，所以孙承宗一般被认为是东林中的温和派人物或者是东林党的同情者。

孙承宗看到这种情形，便向朝廷提出自己亲自赴山海关，了解详情后再作定夺。孙承宗到达前线后，明确支持袁崇焕的计划。到了此年八月，孙承宗更是以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经略蓟辽，这在本朝也是少见的。

孙承宗在辽东筑城、练兵、屯田、造铠甲，并进行了一系列人员调整。天启五年（1625），已被提拔为山东副使、山东右参政的袁崇焕，以宁远为据点，向东开拓疆域二千余里，分遣将领据守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凌河等，筑城设防，一时形势颇为有利。不幸的是，此年十月，孙承宗因遭到多方压力而辞职。魏忠贤乘机以其党羽兵部尚书高第取而代之，出任经略。

这位高第，虽是兵部尚书，但素无胆略。据说高第得知被任命为经略时，吓得直哭。他到前线后，认为山海关的战线太长，不易据守，便悍然下令全线退缩，撤入山海关。袁崇焕坚决反对，他说：

“兵法有进无退。锦州、右屯（原广宁右屯卫）动摇，则宁远、前卫必将动摇，山海关内也就失去了保障。”

袁崇焕的反对是有道理的。他的主张就是山海关外应有纵深防御，避免山海关直接受敌攻击。而这位高第大概是过于害怕，希望把全部力量收缩在山海关一线，孤注一掷。这与前面王在晋的想法是一样的。这样的战略有两大问题：一是山海关要直接承受敌方的攻击，一旦关破，京畿便无险可守，敌军的铁骑片刻就能到北京城下。二是即使山海关守得住，敌方也能绕过山海关，在山海关以西的长城防线上寻找攻击点，切入山海关之里的京畿之地。由于山海关外没有纵深防御，明朝的军队就无法对敌军进行堵截，破坏其战略实施。后来的情况也确实证实了这种推测。

可高第不管这些。他本来就不懂，加上胆子又小，所以要让他理解、接受袁崇焕的计划，真是太难为他了。因此，他不仅要撤掉锦州、右屯防线，而且要把袁崇焕的宁远、前卫一并撤入关中。袁崇焕

急得都要跳起来，坚决反对。他说：

“我是宁前道，职守在此，死也要在此。我坚决不会撤退！”

遇到这种犟脾气的“铁胆”人物，高第也没有办法，所以宁远、前卫两城仍由袁崇焕驻守，没有撤退。朝廷为安抚袁崇焕，还提他做了山东按察使。但锦州一带的防守据点，如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塔山、杏山等，全部撤守，军民尽撤入关，哭声震天，米粟辎重被委弃者不计其数，明军实力大损。

依高第当时的想法，凭袁崇焕驻守的宁远、前卫两座孤城，大概也挡不住努尔哈赤的铁骑。你袁崇焕既然想逞能，不肯撤人关内，那就让你吃点苦头，到时候你就会乖乖听话了。没想到，袁崇焕竟然依靠孤城，立下了大功！

天启六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乘明军全线撤退之际，率兵西渡辽河，直逼宁远。袁崇焕得到谍报后，迅速召集将士，誓死守城；书写血书，激励士气；传檄山海关、前屯，凡自宁远城逃出者，全部斩杀，以肃军纪。全城人心始稳，誓死守城。

当时努尔哈赤所率军队，超过十万，而袁崇焕在宁远的守军，仅万人，双方实力悬殊。袁崇焕在努尔哈赤围城之初，故意放弃外城，把敌军放进来。后金军队不知是计，便蜂拥而入，攻打内城。袁崇焕立即下令发射刚刚引进的西洋巨炮，配之以滚石矢木，后金军队吃了大亏，努尔哈赤本人也受了重伤，只得全线撤退。这就是“宁远大捷”。

当时的朝廷上下，谁也没想到袁崇焕能打这样一个大胜仗。袁崇焕一下子名声大震，先被提拔为右佥都御史，不久又被任命为辽东巡抚。而那位经略高第，因拥兵不救、折辱诸将而遭交章弹劾，被赶下了台。朝廷上下最痛恨的是高第在宁远激战时拥兵观望，不予救援。不过，在高第看来，他是不便去救。他本来就不同意袁崇焕守宁远孤城，现在仗打了起来，如果袁崇焕打胜了，不是证明他自己原先的战略是错误的吗？对这种打胜了却只能证明自己是错误的仗，像高第这样的人能去拼命吗？

高第之后，王之臣出任经略。王之臣与袁崇焕意见不合，朝廷为调和关系，干脆把辽东的防务一分为二，山海关内由王之臣负责，山海关外由袁崇焕负责。这种做法不免滑稽，因为辽东防务本是一体，现在却被活生生割裂。对这种划分，袁崇焕很不满意，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不信任或猜忌；同时王之臣也不会满意，因为他职为辽东经略，本应全线统筹，而现在却只让他负责关内。朝廷的原意是调和两人关系，现在反而弄巧成拙。

在宁远大捷之后，形势一度对明朝有利。此年的八月，努尔哈赤因在宁远被击重伤，久治不愈而亡。努尔哈赤临终前曾对诸贝勒说：

“我自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何单单宁远一城却没有攻下？！”

努尔哈赤死后，其第八子皇太极接位。皇太极当时面临许多困难。自己以第八子身份接位，并无多大合法性，只不过是因为自己统辖两旗，实力最强。而且，努尔哈赤临终前曾明确告诫，要八贝勒共同治国。因此，当时皇太极急于巩固自己的地位。另外，宁远惨败，加之辖区内的长期经济衰败，皇太极也不太想在即位之初，就与明朝大动干戈。更重要的是，皇太极想借正面缓和之机，压服朝鲜，以解后顾之忧。

天启七年（1627）初，皇太极与袁崇焕之间互派使者，互换书信，进行商谈。皇太极在信中列述了“七大恨”，申诉女真在明朝统治下所受的冤屈，表示愿重修两国之好，互赠礼品。所谓互赠礼品，就是要明朝向后金纳贡。袁崇焕则要皇太极退出开战以来侵占的城池，归还被俘的军民等等，也就是要后金恢复到从前的地位。双方的筹码不一，很难达成一致。

就在和议进行之时，双方都采取了一些举措，各打着自己的算盘。

皇太极乘议和之机，出兵朝鲜，并攻击据守在皮岛（今朝鲜椵岛）的明朝将领毛文龙。朝鲜、皮岛同时告急，请求朝廷支援。

而此时的袁崇焕，正忙着布防筑城。当时经略王之臣已被罢职，

经略一职空缺，由袁崇焕以巡抚的身份全面统辖辽东军务。袁崇焕掌权后，与总兵赵率教巡历锦州、大小凌河三城，并重新设防。正在此时，朝鲜告急，袁崇焕急命部将增援，而朝鲜却因敌不住后金军队的猛攻，已正式投降。朝鲜的投降，使皇太极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使明军失去了从东面夹攻后金的有生力量。

天启七年（1627）五月，已取得朝鲜之战胜利的皇太极，率兵向袁崇焕反扑，说是要报努尔哈赤之仇。在其攻势之下，大、小凌河守城之卒溃逃，皇太极乘势围住锦州。锦州守将赵率教、监军太监纪用遣使请和。袁崇焕急派祖大寿率精兵四千人，绕到敌后，又派水军东出，试图从背后发起攻击。援兵才出发，而敌兵已至宁远城下。袁崇焕故伎重演，用重炮打击攻城之敌。与袁崇焕不和的满桂，也率兵来增援，合击敌军。后金军队伤亡惨重，城外濠沟尸积如山，不得已而撤出宁远，集中力量攻打锦州。锦州守城之兵奋力抵抗，外部援军也纷纷赶到，后金军队便全面撤退，临撤时，毁掉了大、小凌河两座城池。这就是有名的“宁锦大捷”。

宁锦大捷，对皇太极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对于明朝来说，似乎是一个转机。不幸的是，朝廷内部的矛盾再次影响到了辽东局势。

宁锦大捷后，袁崇焕被魏忠贤手下的党羽交章弹劾。他们说袁崇焕没有及时救锦州，毛文龙遭后金袭击，也是因为袁崇焕与后金议和引起的，等等。袁崇焕当然受不了，愤然乞请致仕归里。朝廷顺水推舟，同意袁崇焕之请，而让王之臣复出，指挥辽东军事。

不过，尽管袁崇焕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宁锦大捷还是要论功行赏的。朝廷文武，因宁锦大捷而被增秩赐荫者不下百人。魏忠贤的从孙魏鹏翼虽尚在襁褓之中，却也因宁锦大捷而被封了安平伯。至于袁崇焕，魏忠贤也格外加恩，给他增了一秩。对此，就连魏忠贤的心腹尚书霍维华也觉得太少了一点，因为毕竟是袁崇焕辛辛苦苦打了宁锦大捷，但魏忠贤对这种想法断然拒绝。后来梁启超读到这段历史，曾大发感慨说：

“古未有奸臣在内，而名将得立功于外者！”

其实，梁任公只说对了一部分。奸臣在内，大概也希望名将能立功于外。魏忠贤在朝廷大杀东林党人时，东林党的同情者孙承宗、袁崇焕则在拼着命守住辽东。魏忠贤当然希望他们能立功于外，只不过功劳要算在或大部分算在自己这位“九千岁”头上，能为自己所用。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不行了。另外，名将不能立功于外，并不一定要有奸臣在内。袁崇焕这位名将，后来在崇祯帝这位明君领导下，不仅没有立功，反而丢了性命，而杀他的人，恰恰不是奸臣，而是崇祯帝这位明主。

袁崇焕复出

到了崇祯元年（1628）二月，蓟辽总督王之臣以罪罢免。在朝廷大臣们的纷纷要求下，崇祯帝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此年七月份，袁崇焕至北京，崇祯帝在平台（宫城右后门）召见袁崇焕及群臣。在一番君臣寒暄之后，他即问袁崇焕：

“东兵跳梁，十载于兹，封疆沦没，辽民涂炭。卿万里召赴，忠勇可嘉。所有方略，具实奏闻。”

袁崇焕一听皇帝咨以方略，而且态度亲切诚恳，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便头脑一热，说出了后来有点后悔的话：

“臣受陛下特眷，原假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

崇祯帝一听，龙心大悦，连连许诺袁崇焕说，只要收复辽东失地，不要说你可封伯封侯，就连你的子孙也可同沐圣恩。边上的群臣一听皇帝这样说，连忙异口同声地夸袁崇焕道：

“袁崇焕肝胆意气，识见方略，种种可嘉，真奇男子也。”

这一夸，直把袁崇焕夸得心花怒放，似乎辽东之复，已是指日可待！

崇祯帝此时已累，便先回便殿休息一会儿。皇帝一走，有位名叫

许誉卿的给事中便向袁崇焕请教，问他凭什么只要五年就可复全辽？

袁崇焕被许誉卿这么一问，也只得老实回答：

“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也。”

袁崇焕的意思，就是考虑到皇帝为这事日夜操心，我姑且说五年可以复辽，宽宽他的心。许誉卿一听，知道袁崇焕其实也是心中无底，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因此他立即责怪袁崇焕道：

“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

许誉卿说得也有道理。皇帝英明有为，不是糊涂之辈，你袁崇焕随口说五年可以复辽，到时候皇帝真得按五年之期来考核，你怎么办！许誉卿的话犹如一盆冷水，令袁崇焕冷静下来了。他想起以前治辽的经历，以及朝中的复杂、辽东的艰苦，不由得后悔刚才的失言。因此，当崇祯帝休息后重新踱出来时，袁崇焕的口气就有了很大的改变，他说：

“东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迁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

这时袁崇焕把价码抬高了，不像开始时那样轻率。他提的那些要求也是实情，如果没有朝廷上下一致，同心协力，辽东的仗就没有办法打下去。崇祯帝觉得有道理，便对身边的部臣说，要满足袁的要求。袁崇焕接着说：

“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

这些话很有分量，听得崇祯帝不知不觉站了起来，当即表示：

“卿勿疑虑，朕自主持！”

刘鸿训等阁部大臣见机，也向崇祯帝请赐尚方宝剑，假之便宜，崇祯帝立即同意。此时的崇祯帝，满怀希望，只要袁崇焕提出来的，他都答应。在他看来，只要辽东一平，中兴也就指日可待。而崇祯帝

越是这样，袁崇焕越是担心。因此他在临赴任时，又给皇帝上了一个奏疏，把他心中的想法和担忧，一一写明。他说：

“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臣所能焉。”

说完自己的用兵之策后，袁崇焕话锋一转，点出自己对朝廷在边疆用人方面的担忧。他接着说道：

“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臣非过虑，但中有所危，不得不告。”

袁崇焕这段话，似乎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他所担忧的，后来几乎都变成了现实，而亲手杀他的，竟也是爱他知他的崇祯帝。

袁崇焕赴辽东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宁远兵变，十分棘手。

宁远兵变在袁崇焕赴任前就已发生。起先是镇守宁远的川湖兵因连续四个月未领到军饷，起兵闹事，其余十三营也立即响应。叛兵们捉拿了巡抚毕自肃、总兵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并把他们拘押在谯楼上，形势十分危急。

刚刚赴任的兵备副使郭广，与士兵们没有多少冲突，所以说话尚有些影响力。他竭力保护毕自肃，并千方百计筹集到抚赏等银两万余两，交给川湖兵。川湖兵仍不满足，郭广只得又向商民借贷，凑足五万两，才稍稍压住叛兵凶狠之势。巡抚毕自肃也得以逃到中左所（即塔山堡）。他大概是自感罪行深重，或许是对朝廷感到寒心，所以在上书自劾后，便上吊自杀，寻求解脱。

宁远兵变，反映出当时官军的脆弱。就体制而言，官军士兵主要是招募而来。明初的那种卫所制度及其兵源征募的办法，此时已名存实亡。既然是招募，则兵员素质首先就得不到保证。在当时，只有没办法的人才会去当兵，而且绝大多数人是冲着兵饷去的。这些兵，管

得好就是朝廷的官军，一旦管得不好，那差不多就是盗贼。朝廷四个月不发饷，他们能不闹事吗？这事也怪不得巡抚毕自肃。他虽有治兵不力之罪，但兵士哗变，最直接的原因是欠饷。说到底，是朝廷拖欠了前线的兵饷。毕自肃虽为巡抚，但本身拿不出钱，只有朝廷给钱，毕自肃才有银发饷。

袁崇焕得知宁远兵变后，立即赶赴宁远，与那位能干的郭广密谋对策。袁崇焕的做法，与别人不同。他竟然宽宥了这场兵变的首恶杨正朝、张思顺，令其充前锋立功自赎，以稳住人心。但像兵变这样的严重谋反事件，总得有人去承担责任。袁崇焕便斩了十五名从犯，又把预先知道川湖兵要发动哗变却没有及时上报的中军吴国琦处斩，并罢免了一批军官，以平群愤。当时只有都司程大乐统辖的一营兵士没有参加哗变，袁崇焕特予以奖励。在这些措施之下，宁远才算平静下来。

事态虽已平息，但军饷总得发下去，总拖着也不是长久之计。袁崇焕平定宁远后，立即上疏朝廷请饷。崇祯帝便召群臣商议。绝大部分大臣都请求崇祯帝发内帑充饷，以解燃眉之急，因为户部已无银可拨。崇祯帝一想到要动用自己的“内帑”之银，心中就不太情愿，但不好明确拒绝。正在崇祯帝为难之际，聪明的吏部侍郎周延儒体察到皇帝的心思，便出语惊人，发表了与众不同的高论：

“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效尤，帑将安给？”

崇祯帝一听，有道理！忙问道：

“卿谓如何？”

周延儒接着说道：

“事迫不得不发，但当求经久之策。”

什么是经久之策呢？周延儒几天后又说：

“饷莫若粟。山海粟不缺也，缺银耳。何故哗？安知非骄弁拘煽，以胁崇焕邪？”

这句话真是说到崇祯帝的心坎上了。当时崇祯帝正疑心边将以兵变要挟朝廷，请发军饷，给周延儒这么一点拨，更是豁然开朗。

周延儒这番话，很得崇祯帝欢心。只要能少出他内库的银子，他都听得顺耳。但周延儒的话，却害苦了带兵的将领们。当时的官军，都是招募来的，帮朝廷打一天仗，朝廷就得给一天银子，因此并不像周延儒所讲的那样，有粮无银也能应付。当时朝廷欠饷普遍，不仅欠辽东的军饷，也欠其他地方如陕西等地的兵饷。因此，袁崇焕在平定宁远后，便立即向朝廷请饷。鉴于当时辽东的形势和袁崇焕的面子，崇祯帝尚能基本满足。

袁崇焕随即着手整饬辽东的防务，调整人事安排。毕自肃自杀后，袁崇焕上书请求不要再设巡抚。后登莱巡抚孙国桢被罢时，袁崇焕又上书请求罢除不设。同时，袁崇焕把宁远、锦州合为一镇，由祖大寿仍旧驻守锦州，加中军副将何可刚都督佥事，代替总兵朱梅驻守宁远（朱梅已被解任），而将驻守蓟镇的赵率教移至关门。这样一调整，山海关外仅存两员大将，而袁崇焕自己则镇守宁远，基本上做到了事权归一，理顺了人事关系。

到了崇祯二年（1629）闰四月，崇祯帝以春秋两防的功绩，诏令加袁崇焕太子太保，赐蟒衣、银币，荫锦衣千户。袁崇焕意气风发，原先的小心谨慎已被抛之脑后。不久，他就做了一件令朝野大为震惊的大事，那就是诛杀毛文龙。

杀毛文龙埋下杀身之祸

这位毛文龙，也是当时的一位奇人。他的祖籍在山西太平。因其父到浙江杭州做生意，毛文龙生在杭州，便落籍杭州府仁和县。一般人都认为毛文龙是杭州人，而实际上他是个地道的山西人。

毛文龙虽生在杭州，但仍像当时的许多山西人一样，天生不爱读书，也不事生产，而是阅历江湖，空口谈兵，属于无赖不正之徒。到

后来，他出走投奔他的叔父毛得春，世袭其职充百户，开始到军队中去发展。到天启元年（1621），他已是巡抚王化贞手下的练兵游击。

也就在这一年，毛文龙策动后金的镇江（九连城）守将陈良策反正，一举占领该城，侥幸成功。这次胜利被广宁巡抚王化贞称之为“镇江大捷”。王化贞立即组织兵力，准备一举剿灭辽东，结果是无功而还。不久，镇江城也被后金收复。

毛文龙因有“镇江大捷”，而被提升为副总兵，累加左都督。天启二年（1622）春广宁失守、辽东全线崩溃之后，毛文龙及其据守的皮岛就显得重要起来了。此年六月，朝廷在皮岛设东江镇，再升毛文龙为平辽总兵官，挂将军印，赐尚方剑。除皮岛这一基地外，毛文龙当时尚占据着朝鲜境内的铁山，设有营寨。

毛文龙一心一意经营他的东江镇。这皮岛（椵岛）居鸭绿江口之南，离朝鲜本土仅一水之隔，地理位置险要。岛上居民多是从辽东逃出来的汉人。毛文龙便招募一批手下，做他的“海外天子”。

平心而论，毛文龙仍是明朝的将领，因为他确实在打击后金，牵制敌军，而且还常常上书朝廷，慷慨激昂，说些中听的大话。如他在天启三年（1623）曾上书兵部，说“得饷百万，明年可以灭奴”。实际上他根本做不到。两年之后，他又说：“两年之间，有不平辽灭奴，复三韩之旧业，甘治欺君诳上之罪。”这些大话，他说了不少，不仅魏忠贤爱听，一般人也喜欢听。对于一个这样的朝廷来说，能说些大话的人毕竟还是有用的，至少符合气可鼓而不可泄的原则。况且，毛文龙也做了一些实事，为辽东的战局起到了某种牵制作用，尽管他把斩杀六人说成六万之众等等。

话又说回来，明末说假话、大话的人，也并非毛文龙一人，至少是真正说真话的人不多，因为朝廷上下愿听真话的人本来就不多。事实上，就算毛文龙不说大话，他也承担不起收复辽东的重任。朝廷的大军在关外尚且节节败退，何况毛文龙这样的乌合之众。

或许毛文龙本人就十分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一方面不断与朝廷吹些大话，要官要饷，另一方面，也实实在在地为自己做事。他不断

地要饷，不免也吃些空额，落入自己腰包。更严重的是，他还利用皮岛的地理优势和军队的特权，做些生意赢利，经营的商品中也有不少是违禁品。他还代朝廷征收过往商贾的商税，但不上缴。总的来说，毛文龙在皮岛，兵练得不怎么样，但钱赚得还可以，很有些经济头脑。

毛文龙赚的钱，除落入自己腰包外，开支也不少。手下的一大帮兵马要靠他养活，指望朝廷有时候也的确不可靠；朝廷那么多官员也得罪不起，需要打点。毛文龙在这方面从不吝啬，朝廷上下拿他钱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帮他说话。毛文龙的最大问题是得意忘形，失了分寸，忘了自己的身份。他总以为朝廷没有了他，辽东局势就会如何。他还以为他上下使了钱，朝廷的官员就都会帮他讲话，奈何他不得。在崇祯帝刚即位的天启七年（1627）九月，毛文龙上了一个措辞激烈的奏疏，说他“七年苦楚，百事勤劳，有不平者五事”，具体而言，则是衣服不足、待遇不一、赏罚各异、抹杀战功、传言不断等等，最后甚至以辞职相威胁。崇祯帝拿到这个奏疏后，不明真相，想想毛文龙也真是不易，便下了一个令毛文龙浮想联翩的诏书，称：

> “文龙远戍孤悬，备尝艰苦，屡建捷效，心迹自明。东顾方殷，岂得乞身求代。还宜益奋义勇，多方牵制，以纾朕怀。”

崇祯帝的这种态度，无疑更加刺激了毛文龙的狂妄自大，以致发展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后人在后金的“满文秘档”中还发现了毛文龙与后金往来的密信。毛文龙在密信中曾与皇太极议降，提出所谓“尔（指皇太极）取山海关，我取山东”之类的投降条件。假如这些档案的真实性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历史真是开了个大玩笑。因为明末不少人认为，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就是为了投降后金，没想到毛文龙却曾有过降后金的举措。这真是冤杀了袁崇焕！

毛文龙此等狂妄，自认为朝廷缺他不可，不料朝廷新任命的辽东总督袁崇焕也是个敢作敢为的人。这位当时尚深受崇祯帝宠爱的袁崇焕，原本就与毛文龙有矛盾。在任辽东巡抚时，袁崇焕就曾提出撤销

东江镇的建议，朝廷没有采纳。在天启七年（1627）皇太极出兵攻击皮岛时，袁崇焕的救援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慢了半拍，令毛文龙吃了大亏，丢掉了铁山大营。袁崇焕也因此事而被毛文龙在朝廷中的那些代理人猛烈攻击，最终乞请致仕归里。

袁崇焕此次重掌辽东帅印，毛文龙的问题当然是绕不过去的。所以，在袁崇焕赴辽之前，大学士钱龙锡曾问及袁崇焕赴辽后的具体方略，袁崇焕明确表示：

“当自东江始。文龙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处之，易易耳。”

此言表明，袁崇焕在赴辽之前，就有除掉毛文龙的打算。

袁崇焕一赴任，果然就以毛文龙开刀。袁崇焕很精明，知道毛文龙的要害所在，因此他上了《策画东江事宜疏》，要求朝廷改变运往东江粮饷的饷道，并派兵部部臣参与皮岛的粮饷管理，以便用粮饷来控制住毛文龙。毛文龙当然不干，立即上疏抗辩，而且话说得很难听。他说：

“臣读毕，愁烦慷慨，计无所出。忽闻哭声四起，合岛鼎沸，诸将拥进臣署，言兵丁嗷嗷以致今日，望粮饷到、客商来，有复辽之日，各还故土。谁知袁督师将登州严禁，不许一舡出海。”

毛文龙的话虽有点夸张，但说的也是实情。袁崇焕把山东半岛一封锁，不仅粮饷之船来不了，而且商船也不能赴皮岛，加上朝鲜已降了后金，所以皮岛就成了海中孤岛，难怪毛文龙要说这是“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

以毛文龙的禀性，话自然不会到此为止，更难听的话还在后头。他接着说：

“督臣策画舍近求远，弃易图难，臣竟不知故。今事实难做矣，臣之热肠冷矣，性命危于旦夕矣。每自譬于林畔一日七战时，今又多活数年，即死亦瞑目矣。只不愿如抚臣故事，又有非议于其后耳。督臣为臣上司，臣辩驳其疏，臣亦自觉非体、非理，听皇上或撤或留，臣随（遂）亲抱敕印，竟进登州候旨，逮臣进京，悉从公议，治臣以罪，完臣一生名节，免误封疆大事矣。”

这些话明显带有要挟的色彩，正在兴头上的袁崇焕自然是恨之入骨，杀心顿起。不过，毛文龙的这番话虽不中听，到是基本上在后来应验。他本人不久被诛杀，尽管未等到进京而是被袁崇焕立斩于帐外，应了那句“性命危于旦夕矣”。袁崇焕诛杀毛文龙，后来被视作是其降后金的主要步骤和罪证，应了那句“只不愿如抚臣故事，又有非议于其后耳”。

毛文龙在上此疏时，未必料到他自己真会丧命，而袁崇焕却真的在布置诛杀之事。崇祯二年（1629）五月底，袁崇焕乘舟泛海到达皮岛附近的双岛，名义上当然是检阅兵马。毛文龙在六月初一日由皮岛来到双岛，以下属的身份进谒，后又陪袁崇焕上了皮岛。酒足饭饱之余，袁崇焕也曾试探过毛文龙，给毛文龙一些台阶，如整治部队、返乡养老等等，让毛文龙能顺此体面收场。不幸的是，毛文龙仍是懵懂不解，失之交臂。于是，袁崇焕便准备痛下杀手。

六月五日，袁崇焕终于动了杀手。他预先在一座山上设置大帐，并在帐中埋伏了亲兵。接着，他邀毛文龙前来，一起上山。毛文龙赶到山下，袁崇焕与他寒暄道：

“明天早晨我就要离开此地，你一人担负海外守御重任，请受我一拜！”

毛文龙赶紧回拜。互拜之后，袁崇焕请毛文龙上山，却把他的随从兵卒挡在山下，只许一些将官跟随上山。袁崇焕边走边问那些从官的姓名，回答多为毛姓。毛文龙赶紧解释说，他们都是我的子孙。袁崇焕又笑着说：

“你们远处海外，整日辛苦，为国效力，而每月米粮只有一斛，真是令人痛心，请再受我一拜！”

毛文龙的从官吓得赶紧叩头答谢。就这样你一拜我一拜，一行人就进了大帐。一进大帐，袁崇焕把脸一翻，突然责问毛文龙违反朝命之事。毛文龙哪里受得了，立即反驳。袁崇焕喝令随从扒掉毛文龙的冠戴，捆绑起来，并从容不迫，历数其“十二斩罪”：

“尔有十二斩罪，知之乎？

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

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

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

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

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

部将数千人悉冒已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六当斩。

自宁远还，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

强取民间女子，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当斩。

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九当斩。

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

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

开镇八年，不能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

这“十二斩罪”中，有的确实是事实，有的则有些牵强。如给魏忠贤行贿、在皮岛给魏忠贤塑像这一条，就算不上可斩之罪。当时给魏氏建祠塑像，是一种风气。袁崇焕自己也曾上书朝廷，要求在宁远给魏忠贤造生祠，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造成而已。再如开镇八年未复寸土那一条，也有些勉强。毛文龙未复寸土是事实，但比起那些连连丢失疆土的大吏而言，也算不得弥天大罪。袁崇焕复出之后，好像也是未复寸土，只是一味防御。所以，要求毛文龙以一孤岛之乌合之众，去收复失地，不免苛求。不过，既然袁崇焕要斩杀毛文龙，那么，不要说是“十二斩罪”，就是更多的罪状也能找得到。因此难怪也有人说，袁崇焕捏“十二罪”，矫旨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

旨杀岳武穆，是古今一辙。

毛文龙至此已明白事态的严重性，便不再开口，只是一味叩头求免一死。袁崇焕问毛文龙的从官道：

“文龙罪当斩否？”

众官们吓得连连称该斩。但也有人为他辩护，说其数年劳苦。袁崇焕勃然大怒，斥责道：

“文龙一布衣耳，官极品，满门封荫，足酬劳，何悖逆如是？”

接着，袁崇焕跪下顿首，请旨道：

“臣今诛文龙以肃军。诸将中有若文龙者，悉诛。臣不能成功，皇上也以诛文龙者诛臣！”

此言一出，杀气腾腾，在场诸官谁也不敢出声。袁崇焕便取出尚方剑，在帐前斩杀毛文龙。毛文龙当时也有皇帝所赐的尚方剑，没想到自己却被另一把尚方剑斩杀。据说毛文龙曾祈过梦，在梦中，他的同乡前辈于谦授其一诗：“欲效淮阴，老了一半；好个田横，无人为伴。”当初大家都不解其意。直到毛文龙被斩，大家才恍然大悟，韩信二十七岁任大将，文龙五十二岁作元戎，老了近一半；田横死在荒岛，尚有五百人殉死作伴，而文龙被斩时，却无人作伴。

袁崇焕随即对毛文龙的部队进行了改编，重新任命首领，并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算是稳住了毛文龙的旧部。

袁崇焕诛杀毛文龙，虽不像后来不少人所误解的那样，是出于降后金的目的，但此举确实有点过分。毛文龙也是一位由皇帝钦命的边塞大将，袁崇焕虽有尚方剑和崇祯帝“便宜行事”的圣旨，但也不能说杀就杀，不通过正常的程序。这一点袁崇焕本人也十分清楚，因此，他在诛杀毛文龙后，立即上疏为自己开脱，并向朝廷请罪。崇祯帝虽然没有追究，甚至还“优旨褒答”，但心中的震惊、疑虑是难免的。袁崇焕后来的命运，或许与此举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从当时的敌我情形而言，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也是失策。尽管毛文龙有种种不是，但他仍然是明朝的总兵，他驻守的东江镇，

在朝鲜降后金之后的崇祯初年，是朝廷惟一能在敌人腹背起牵制作用的重镇。而毛文龙一死，东江镇失去约束，不久便土崩瓦解。毛文龙的许多部下也纷纷投敌。其中尚可喜、耿精忠、孔有德等，成为后来清兵入关的急先锋，立下赫赫战功。不过令人奇怪的是，这些人帮明朝打仗时似乎不怎么样，但到打明朝时却是胜多败少。

诛杀毛文龙之后不久，辽东的战局便急转而下，战火蔓延到了京畿。袁崇焕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崇祯帝中了反间计？

崇祯二年（1629）十月下旬，一直与袁崇焕商谈议和的皇太极，突然率兵绕开宁远、山海关一带的明朝防线，由蒙古境内开拔，抵达老河。然后兵分三路，分别从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突袭长城防线，并迅速得手，至十一月初二日，皇太极的三路兵马已到达了遵化城下，形势告急！

皇太极这次突袭，有内外双重因素。崇祯二年（1629），不仅新附后金的蒙古诸部遭受严重灾荒，后金本身也遭重灾，日子艰难。皇太极为了摆脱经济困难，巩固汗位，急于开战。而当时的形势，也有利于进攻。虽说袁崇焕统辖的宁远、山海关防线不容易攻破，但由于蒙古已经归附后金，后金的军队可以在蒙古军的协助下，选择山海关以西的薄弱之处，作为突破口，攻破长城防线。而且此时朝鲜也已归附后金，皇太极不必像原先那样担心朝鲜人在后面攻击他的大本营，没有了后顾之忧。

当时明朝在山海关以西的长城防线十分薄弱。在蒙古喀尔沁等部尚未依附后金前，这段防线尚有缓冲地区，形势不算严峻。但至蒙古诸部归附后金之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因为这段长城防线直接面临着后金的威胁。对此，袁崇焕已清醒地意识到了，所以，他一再上书朝廷，要求在这一线增兵，尤其要用重兵把守蓟州镇（今河北迁西）、遵化（今河北遵化）、蓟州（今河北蓟县）等要地。但朝廷未

能依此具体实施。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朝廷无力布防，二是因为崇祯帝及朝廷上下都认为，对付后金只要袁崇焕就行了，不必再另作筹划。没想到，袁崇焕担心的事，皇太极也想到了，而且迅速实行并一举成功，把明朝打了个措手不及。

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得知长城防线被攻破的军情后，立即率守关兵马飞驰三昼夜，赶到迁西西北的三屯营，却被驻守此镇的总兵官朱国彦阻止，不得入城。赵率教无奈之下，继续西行，遇后金军队伏击，双方激战，结果赵率教战死，其部也全军覆没。

打掉援军的后金军队，乘胜攻打遵化城。巡抚王元雅、保定府推官李献明、永平推官何天球以及现任、前任两位知县和几位武官，或自尽，或战死，遵化沦陷。

遵化一破，三屯营随即军心动摇，一批守将临阵脱逃。总兵官朱国彦愤怒之余，在城中张榜公布逃跑将领的名单，并散尽家财，与妻子张氏双双上吊自杀。形势十分危急。

袁崇焕在十一月初一日赶到山海关后，才得知后金军队已从蒙古攻入长城的有关详情。他立即调兵遣将，进行堵截，自己则亲率祖大寿、何可刚入卫，于十一月十日赶抵蓟州。崇祯帝对袁崇焕“温旨褒勉”，并发内帑犒赏将士，令袁崇焕统率各路兵马。袁崇焕立即作了布置：

以原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等守山海关；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邵忠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仍还镇护诸陵；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扼其西下；保定总兵曹鸣雷、辽东总兵祖大寿驻蓟州遏敌，保定总兵刘策还驻密云。

同时，袁崇焕命游击钟宇，中军王应忠、李应元为右翼，继副总兵张弘谟而进；中军何可刚，游击靳国臣、赵国忠、孙志远、陈景荣、陈继盛，都司刘抚民组成中权，继朱梅而进；祖大寿为后援，继何可刚而进。袁崇焕自己率军居二线之中策应。

朝廷当时一片混乱。当后金军队突破长城防线的消息报到京师，

毫无准备的朝廷上下大为震惊。崇祯帝立即下令京师戒严。遵化沦陷后，京师大震，人心惶惶。崇祯帝任命吏部侍郎成基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又召原先赋闲在家的孙承宗任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督理兵马，负责京师防卫。一时间，只要听说有能用之人，崇祯帝便毫不吝啬，立即给官给钱，予以实权，可见崇祯帝当时的心态。而原任兵部尚书的王洽，则倒了大霉，被逮捕入狱，不久便死于非命。这位王尚书，本是位不错的文官，没想到却丢了性命。王洽被杀，与周延儒有很大关系。在遵化失陷后，崇祯帝召见群臣，周延儒阴森森地说了一番话，而正是这番话要了王尚书的命。周延儒是这样说的：

“世宗斩一丁汝夔，将士震悚，疆敌宵遁。”

此言就是要崇祯帝杀一儆百。崇祯帝认为言之有理，便把王洽下了狱。这位周延儒，总是出这样的鬼点子，害了不少人，最终也害了自己。崇祯帝实用主又的做事风格和变化无常的性格，由此也暴露无遗。

皇太极攻陷遵化后，并没有像袁崇焕所预计的那样强攻蓟州城，而是与蓟州城稍有接触之后，便绕城而过，迅速向西挺进，连陷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直逼京师。在通州以北二十里处扎营后，又分兵向彰义门、天津、密云、居庸关、良乡、固安推进。形势已是十分严峻。

袁崇焕弄清了皇太极的意图后，立即率兵火速向京师靠拢，于十五日赶到了通州附近的河西务。当时朝廷上下已有谣言说袁崇焕勾结后金，所以朝廷命袁崇焕的驻地不得越过蓟州，而袁崇焕此时已越界到了通州附近。因此，部将中有人提醒他，干脆就把部队停驻在河西务，不要再往京师靠近，视敌情而作攻守进退。但袁崇焕勤王心切，没有采纳，反而亲率九千兵马，于十六日抵达左安门（外城即外罗城的东南门。外城在内城之南，呈长方形，环抱内城东西角楼，共有七个城门）。

除袁崇焕这支军队外，京师附近尚有孙承宗驻屯通州，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也率援军赶到了德胜门外驻扎。京师的守卫则

由新上任的兵部尚书李邦华、右侍郎刘之纶主持。督师袁崇焕赶到后，崇祯帝仍赐彩币和玉带，命其统辖各路兵马。

十九日，皇太极率兵进至京师之北土城关之东。皇太极巡视京城外围之后，进兵关厢二里列营进击。宣府总兵侯世禄避其锋芒，不与之战。大同总兵满桂则独自率领自己带来的五千骑兵迎战。在德胜门城楼上督战的兵部尚书李邦华，急令开炮助战，没想到炮弹无眼，误伤了满桂。满桂被抬下来休息。后来有人误把伤满桂的账算到袁崇焕头上，这的确是冤枉。

袁崇焕急忙令都司戴承恩在广渠门（外城之东门，俗称沙窝门）择地布阵，祖大寿在南，王承胤等在西北，自己在西，严阵以待。此日午时，后金兵马在外城以东发起攻击，先由东南方向进攻，祖大寿等人力战却敌。后金兵转而由西面攻击，袁崇焕亲自上阵督战，战斗十分激烈。在敌往后金军的攻势以后，袁崇焕挥师合击，进行反扑，敌军退却至浑河。皇太极鸣金收兵，移营南海子。攻城之势稍稍缓和。

在京师被攻之际，崇祯帝诏天下镇巡官勤王。崇祯帝此时真是有点急了，担心京师守不住，所以才严令各地率师入卫勤王，一时间天下震动。各地援军纷纷向京师集结，围攻南海子，后金军队开始后撤。

十一月二十三日，崇祯帝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等人，对袁崇焕依然是态度和蔼，且有赏赐。当时袁崇焕鉴于局势危急，自感不安，便将传旨的太监留在营中，自己则青衣玄帽独自人城进见。依袁崇焕的初衷，他原准备向皇上提出议和的建议，所以开始时把敌情说得很严重，让崇祯帝等人听得直发慌，但他最终还是没敢提出议和的建议。后来有人说袁崇焕把传旨的太监留在营中，是扣为人质，以防不测，真是妄语。

不过，此时崇祯帝心中已对袁崇焕起了疑心，尽管他不露声色。因此，当袁崇焕提出要率兵人城时，崇祯帝便一口回绝。两天后，当袁崇焕再次提出把自己的部队开进外城休整并请辅臣出援时，崇祯帝仍然拒绝。而大同总兵满桂的部队却可以驻扎在外城休整。袁崇焕至

此已觉察到有些不对头了。

崇祯帝之所以不让袁崇焕入城，主要是怀疑他已勾结后金，入城叛乱。有关袁崇焕暗中勾结后金的传言，也已有些时日。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后，就有人说他是为了帮后金除掉心腹之患。他与后金之间的谈判，也可以被说成暗降后金的具体步骤。更有人说后金从蒙古犯边，正是袁崇焕的主意，并列出不少证据：身为督师，怎能不预知敌军这么大的动作？蓟州一战，后金出兵仅二百余骑，而袁崇焕放炮，连敌人的毫毛也没伤着，双方交战如同儿戏，要不是预先勾结，怎会这样？朝廷明令袁崇焕不要过蓟州，而他却一直移师到京城脚下，来了以后也不认真备战，只是做表面文章，这哪像保卫京师？更有人说，袁崇焕的军队与后金的军队相邻扎营，形同友军，朝廷给袁崇焕的军饷，转眼便到了后金军营。满桂率军对敌激战，袁崇焕不仅无动于衷，反而乘满桂路过营门时，施放暗炮，射伤满桂等等。这些话难免传到崇祯帝耳中。崇祯帝开始尚将信将疑，但当他得到从南海子逃回来的两位太监的密报之后，便坚信不疑了。

这两位太监，一名杨春，一名王成德，职任大堤马房提督。后金兵驻南海子时，他们成了俘虏。皇太极当时正虑除不掉袁崇焕，便想借此二人使用反间计。此时的皇太极，已不像他的父亲努尔哈赤那样，只能从《三国演义》中借用谋略了，而是拥有无数汉人谋士为他出谋划策了。像反间计之类，已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于是，皇太极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两位手下，来到羁押两位太监之处，乘他俩似睡未睡之机，故作耳语，却又让他们听到，意思是袁崇焕与皇太极已有密约，大事可成之类。第二天，高、鲍两人故意让出空当，放跑太监杨春、王成德。

杨、王两人回到宫中，急忙把这些重大情报向崇祯帝汇报。崇祯帝果然中计，深信不疑，并着手安排有关事宜。

十二月初一日，崇祯帝在安排妥当之后，便以议饷名义召见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人。袁崇焕一赶到平台，崇祯帝冷着脸劈头就问：为什么要杀毛文龙？援兵为什么逗留迟缓？崇祯帝好像忘记了他自己几个月来的言行：当初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崇祯帝“优旨褒答”，

并下令公布毛文龙之罪，收捕其爪牙，距今不过几个月；袁崇焕自山海关率军增援赶到蓟州时，崇祯帝还“温旨褒勉”，这也是二十天前的事。就在不到十天之前，崇祯帝还给袁崇焕不少赏赐，以奖其功。

毫无准备的袁崇焕，被崇祯帝这么没来由地一问，连话都说不出来，根本无法辩解。其实崇祯帝也不要袁崇焕辩解，当场下令锦衣卫进来捆人，押赴诏狱。

阁臣成基命当时在场，预先对崇祯帝的计划一无所知。他见此情形，立即跪下叩头，请皇帝慎重。崇祯帝说：

“慎重即因循，何益？”

成基命再次叩头，说：

“兵临城下，非他时比！”

崇祯帝哪里听得进去。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兵临城下，才要果断行事，要不是自己英明无比，明察秋毫，岂不是让袁崇焕得了手，坏了大事！

他随即宣布由满桂总理各路兵马，节制诸将，马世龙、祖大寿分理辽东兵马。

这样一来，祖大寿就待不下去了。祖大寿与不久前战死的赵率教，是袁崇焕手下最得力的两员大将。祖大寿与袁崇焕还有一层更深的关系。当初祖大寿曾犯过大事，罪可至死，全亏袁崇焕保全提携，才有今天。袁崇焕入狱，无论于公于私，祖大寿都咽不下这口气。

不仅如此，接替袁崇焕的满桂，原先也在辽东前线，后因与袁崇焕不和，才被调任。现在满桂统辖各军，祖大寿自然担心受其压制。事实上，祖大寿的部下已受到了歧视。他们在城下守城，而城上的人却向他们扔石头，砸死了几人。他的手下兵卒，动不动被作为间谍处死。甚至有人扬言要用大炮轰击他们。在很多人眼里，祖大寿的部队几乎就是叛军。

祖大寿没法，便不辞而别，突然率军离开京城，往辽东开拔，至山海关时，破关而出，直奔宁远。祖大寿这一走，不仅带走了守城的

主力，而且还很可能谋反。

这一招令崇祯帝猝不及防。他一面指责袁崇焕的罪状，同时又褒扬祖大寿等人，说是两者有别，不搞株连，一面却又告谕孙承宗说，辽东的兵马，是我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又是你旧日部曲，要孙承宗赶紧想办法。

孙承宗没法，命游击石柱国飞驰追赶祖大寿，但只追到了其部下，未能见到祖大寿本人。

同时，阁臣成基命给皇帝出主意，建议请狱中的袁崇焕给祖大寿写信，以袁、祖之间的私交和上下级关系，来阻止祖大寿谋反。袁崇焕依令写了信，朝廷立即遣都司贾登科追赶祖大寿，把此信交给了他。有意思的是，崇祯帝以叛逆罪把袁崇焕下了诏狱，却又令袁崇焕写信劝其部下不要谋反，真不知是什么逻辑！

孙承宗还趁热打铁，写密信给祖大寿出主意。他要祖大寿立即上章自列，并且为朝廷立功，帮袁崇焕赎罪，并承诺为祖大寿在皇帝面前开脱。

既有袁崇焕的信函，又有孙承宗的许诺，祖大寿便上疏朝廷，自列请罪。崇祯帝当然不会追究，便下诏把祖大寿安慰一番，让他继续镇守宁远。到后来，崇祯帝还命孙承宗、马世远移镇山海关。孙、马在辽东将士中很有威信，由他们出面，能安定辽东将士的心。

诸招并下，辽东兵马才稍稍安定下来，没有进一步生出事端。

袁崇焕既然被下了狱，入卫的各路兵马就失去了统帅。于是朝廷又设文武经略，分别由尚书梁廷栋、满桂充任，并各赐尚方剑，分驻西直门和安定门，以加强防御，协调各军。

此时的皇太极，仍率兵在长城之内游弋待机，并两次派使者与明朝廷议和。后金兵马，本是长期游牧的部落，很习惯这种且猎且行的生活。当皇太极得知反间计奏效、袁崇焕下狱后，欣喜若狂。他实在没想到崇祯帝会这么轻易地上了他的当，自毁长城。

欣喜之余，皇太极随即挥师攻下京师西南的良乡城，知县党还醇

等战死。他的另一支兵马攻下了固安城，然后回兵卢沟桥。当时驻守卢沟桥的是副总兵申甫、监军金声。这位申甫，本是位僧人，平时好谈兵。时局危急后，崇祯帝下令破格选才。庶吉士金声就把这位申甫推荐给朝廷。崇祯帝立即召见申甫，并参观了申甫的战车，觉得申甫是难得的人才，便提拔他做了副总兵，给他钱粮招兵买马，修建战车。庶吉士金声也因推荐有功，被提拔为御史，做了申甫的监军。

申甫招的人马，都是些地痞无赖，根本没经过训练。而他的新式武器战车，能有多大用处，也只有天知道。就是这群乌合之众，竟被派去驻守京师外围的重地卢沟桥。结果是在后金兵马的锐利攻势之下，这支军队被全歼，申甫战死，他的战车当然也没什么用处。

占领卢沟桥后，后金军乘胜推进到京师的永定门（京师外城正南门）。满桂正率兵驻扎在外城之内，他自知兵力薄弱，敌不住后金兵锋，所以想依托城墙工事坚守。但崇祯帝严令满桂出城迎敌。无奈之下，满桂挥泪率五千兵马出城布阵。至十七日黎明，潮水一般的后金兵马向满桂发起猛攻，前后十余战。满桂身先士卒，骁勇无比，终因寡不敌众，节节败退。此役满桂战死，副将孙祖寿及参将周旗等三十余将阵亡，总兵官黑云龙、麻登云等被擒，最后投降。

到此时，原先在辽东前线最能打仗的四员大将，已被折腾得差不多了。袁崇焕被下了狱，赵率教、满桂战死，祖大寿被逼走，差点谋反。若要论起来，崇祯帝就是最大的罪魁祸首。

皇太极打败满桂以后，其手下纷纷要求攻打京师。皇太极却不急，他笑着说：

“城中痴儿，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圉（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

若是让崇祯帝听到这番话，真要当场昏过去。他自命不凡，以明君自居，没想到在皇太极眼中，仅是一位“痴儿”而已。

皇太极自知后金实力尚不足守住中原之大，于是再次致书崇祯帝，重申议和之意，然后解了京师之围。

崇祯帝此时仍根本不把皇太极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堂堂天朝，

怎么能屈尊与这小小的建州藩属议和呢？因此他绝对不予考虑！他仍要求各路兵马剿灭皇太极。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根本不可能。没有一路兵马能挡得住后金的锋芒，更不用说能组织起进攻了。

皇太极从京师撤围后，先挥师攻良乡，击溃山西巡抚耿如杞的援兵，再到京师东南的房山，拜谒后金太祖陵，然后挥师向东趋通州，攻下通州以南的张家湾，再东渡运河，攻下香河、三河、玉田、永平、滦州，最后驻扎在三屯营。明朝官员将领几十人战死，而各路援兵却不敢前往救援。当时只有兵部侍郎刘之纶敢率兵去碰后金军队。

这位刘之纶，原本是翰林院的庶吉士。他看到官军节节败退，心里着急，便给皇帝上疏陈方略、出计谋，而且还借钱制造小炮、战车。崇祯帝认为他是个人才，便破格提拔他做兵部侍郎，协理京营戎政，给他一个空头官做做。刘之纶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到满桂战死后，刘之纶向皇帝请兵一万，出城迎战后金，崇祯帝哪里有这么多人给他。因此刘之纶的部队也是些乌合之众。当他带着部队赶到通州时，皇太极开始已过通州，连下香河、永平，势不可挡。这位书呆子率兵急赶遵化，在遵化城外八里的娘娘庙上扎营，为了牵制皇太极，他还联络总兵马世龙、吴自勉，要他们增援。

皇太极派出三万骑兵迎战。马世龙虽在不远的蓟州，但就是拥兵不救。刘之纶只好单独应战，先用自制的小炮轰敌，开始还有点效果。但时间一长，小炮因质量不过关，纷纷自爆，军队大乱。手下人一看大事不妙，请求撤退。刘之纶不肯，大声说道：

“吾受天子厚恩，誓捐躯以报。战不捷，死耳！敢言退者斩！”

此言一出，无人敢退。战斗自辰时打到酉时，异常激烈，刘之纶身先士卒，带领部下殊死力斗，弓箭射尽，则短兵相接，近身肉搏。打到后来，刘之纶自知必死，大呼：

“死！死！负天子恩！”

说完，便解下佩印，交付家人，嘱其交还朝廷。不久，他便中矢身亡，其部下也几乎是全军覆没，十分壮烈。

攻下遵化后，皇太极以遵化、永平、迁安、滦州为据点，分兵把

守。当时朝廷的主力有两支：一支由孙承宗、祖大寿率领，在敌军之东，被敌军切断了与京师的联络；一支由马世龙率领，在敌军之西。两支军队之间根本无法联络。孙承宗只知京师危急，急募敢死队绕过敌占区，沿海边直趋京师，到了京师后，才知京城并没有战事。孙承宗分别派兵驻守开平营（在今唐山市西北）、收复建昌营（在迁安城西北），才算打通了与西路军的联络。

到了此年的三月初，在关内已转了近半年的皇太极开始撤退。从冷口（长城关口之一，当时属迁安县）出，长城进入蒙古境内回沈阳。他临撤之前，再次遗书明朝廷，表达了议和的意向，把事情做得有条有理。不久，他又派遣大贝勒阿敏、贝勒硕托率五千兵马前去换防，驻守永平、滦州、迁安、遵化。至五月初，孙承宗先后收复四城，把后金兵赶出长城，局势才稍稍平息。阿敏在撤退时，下令对永平、迁安进行了残酷的屠城，给明朝只留下了空城。

活剐袁崇焕，一个民族的痛

与皇太极相比，崇祯帝的表现要差多了。

各路兵马的败报频繁传来，令崇祯帝又急又恨，而更多的是无奈。他一度竟躺倒不干了。他不理朝政，不见群臣，急得大臣们直跺脚，顺天府尹刘宗周上疏劝说道：

“国势强弱，视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极门，延见百僚，明言宗庙山陵在此，固守外无他计。”

刘宗周说得很对。在这种时候，你做皇帝的一举一动，对人心士气影响很大，只能鼓气，绝不能泄气。这位刘宗周，也是犟脾气，他从清晨把奏疏呈上去后，就跪在官门外，等候崇祯帝的答复，一直跪到太阳落山，崇祯答应召见群臣后才站起来。

战局的每况愈下，又令朝中的党争激烈起来。

袁崇焕被逮捕后，便有人跳出来挖他的后台。有两位御史，一姓高，一姓史，率先跳了出来，攻击阁臣钱龙锡。这两位御史，本是阉党，在被起用时，钱龙锡曾竭力反对。因此他们便用袁崇焕之事来攻击钱龙锡，说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与后金议和诸事，都是钱龙锡幕后指使，要求皇帝治其罪。双方吵得不可开交。最后钱龙锡称病辞职。

由于钱龙锡辞职，崇祯帝便命礼部右侍郎周延儒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值文渊阁。不久再命何如宠、钱象坤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值文渊阁，两人开始不干，崇祯帝严令立即入阁办事。周延儒从此得势。

到崇祯三年（1630）正月，有一位靠捐资升官的中书舍人加尚宝司卿的原抱奇，跳出来攻击首辅韩鑛，说韩鑛属无能之辈，又是袁崇焕的座主，请求皇帝罢免他。韩鑛的门生、左庶子丁进和与工部主事李逢申也反戈一击，攻击韩鑛。韩鑛感到心寒，再三要求辞职，崇祯帝最终同意。

韩鑛素以稳重老成、办事干练著称。由他任首辅，文官系统尚能维持。而崇祯帝放他一走，朝政便急剧恶化，正人君子一个个不安其位了。

二月，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被迫辞职。

三月，首辅李标到任不到两个月，也辞职归里。

与此同时，周延儒逐步把持朝政。此年六月，温体仁与吴宗达一起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温体仁因诬陷钱谦益，引起不少人的厌恶，朝臣纷纷上书揭发他的丑事。然而，攻击越多，崇祯帝反而觉得温体仁没有结党营私，值得信任，再加上周延儒帮他敲边鼓，最终得以入阁。温体仁一入阁，事情就更糟糕了。袁崇焕当然也就在劫难逃了。

当后金外患渐渐平息时，陕西的内乱已十分猖獗了。焦头烂额的崇祯帝穷于应付，登基时的那个中兴梦想已完全破灭。这个责任到底要由谁来负？他自己当然不会去承担这个责任。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失误之处，局面之所以弄到这种地步，还不全是那些大臣的错。

他又想到了袁崇焕！一个现成的替罪羊。

攻击袁崇焕、钱龙锡的官员，仍不乏其人。那位首先对钱龙锡发难的史御史，此时又有了新的发现。他上疏说袁崇焕与钱龙锡之间还有更可怕的阴谋。除重弹钱龙锡是袁崇焕的幕后主使这一老调外，他还列举出新的罪证，说钱龙锡辞职离京前，曾把袁崇焕赠送给他的数万贿赂，转寄姻家，巧为斡旋等等。据说温体仁、王永光等人，甚至还想借袁崇焕之事，做一个逆案，把钱龙锡等异己一网打尽。只不过因兵部尚书梁廷栋胆小，不敢出头而罢。

这些新的罪证，对崇祯帝无异于火上加油。他下令以最严酷的方式来处死袁崇焕。此年八月十六日，崇祯帝来到暖阁，召见阁臣成基命等人。然后再到平台，召见文武大臣。崇祯帝对大臣们说：

“袁崇焕付托不效，专事欺隐。市粟谋款，纵敌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僧入城，卿等已知之。今法案罪案云何？”

这种事情，哪个肯乱说话，文武大臣只是顿首唯命。其实，崇祯帝也用不着大臣们发言，他早已成竹在胸。于是他接着说：

“依律磔之。家属岁十六以上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特流其妻、子、兄、弟，余不问。”

崇祯帝似乎觉得自己很宽容，只磔袁崇焕一人，充军其妻子兄弟，而没有像《大明律》规定的那样，满门抄斩。群臣们一听，连忙叩头感谢皇帝的宽大仁慈。崇祯帝又问诸臣：

“更何言？”

大臣们一听，连忙说：

“其罪不宥。”

意思是说皇帝实在是宽容得不能再宽容了，袁崇焕罪大恶极，绝无饶恕之余地。于是，崇祯帝下达了正式的圣谕，公布袁崇焕之滔天罪行：

“袁崇焕谋叛欺君，结奸蠹国。斩帅以践虏约，市米以资盗粮。

既用束酋，阳导入犯，复散援师，明拟长驱，及戎马在效，顿兵观望，暗藏夷使，坚请入城，意欲何为？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

于是，刑部侍郎涂国鼎被任命为监决官，在西市设刑场磔袁崇焕。

这磔刑是最惨酷的死刑，俗称“杀千刀”、“活剐”。就是用锋利的刀刃一刀一刀把活人身上的皮肉削下来，多达数千刀，受刑之人要承受长时间的煎熬，才慢慢死去。

袁崇焕就这样被一刀一刀地活剐。当时的京师城内，对袁崇焕已是恨之入骨。试想，当百姓在得知身为辽东最高统帅的袁崇焕，竟是通敌的叛徒后，是何等的心情！因此，在袁崇焕行刑时，城中百姓蜂拥而至，都要亲眼看看这令人解恨的场面。于是，一块块手指大小的血淋淋的皮肉，从袁崇焕身上刚被刽子手削下，转眼就以一文钱一块的价钱，卖到了百姓手中。买到肉的百姓，看着袁崇焕血淋淋的身躯，听着袁崇焕痛苦万分地呻吟、嘶叫，在用最恶毒的言辞诅咒完袁崇焕以后，再吞下那块血淋淋的皮肉。这场面真是大快人心！

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吗？未必！试想当初袁崇焕赴任辽东时，京师的百姓是何等感激！感激袁崇焕受命于危难之中，保家卫国。然而在短短的两年之后，他们又以能生吞袁崇焕一块皮肉为快事。两年之隔，竟是天壤之别！

至此，辽东前线最能干的两位统帅，即熊廷弼和袁崇焕，一个被枭首，另一个则被活剐，皮被剥，肉被啖，血被饮。两人的家族，也跟着受罪。熊廷弼为官清廉，却背上个纳贿贪污的恶名，让本不富裕的家族在他死后还要为他退赔那莫须有的赃款，吃足了苦头。袁崇焕的家族更是不幸。在袁崇焕被磔之后，其妻、子、兄、弟都跟着倒霉，被流放三千里之外，却还要感谢崇祯帝的格外开恩。细想起来，在明末这个奇怪的时代，凡是有所作为的臣子，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袁崇焕死后，崇祯帝也没有放过钱龙锡。当时廷臣根据那位史御

史提供的罪证，定钱龙锡“大辟，决不待时”，意思就是斩立决，并设刑场于西市以待。不过崇祯帝思前想后，总觉得钱龙锡没有逆谋的迹象，所以，最终还是手下留情，没有立斩。正巧有一位名叫黄道周的官员，觉得钱龙锡实在冤枉，便上疏申救。当时没有人敢为袁崇焕喊冤，因为谁帮他说话，谁就有同谋之嫌。而钱龙锡的问题却是可大可小的。所以黄道周上疏之后，尽管崇祯帝以忤旨之罪把黄道周降级外调，但心里还是很受感动，觉得在这种时候黄道周仍敢站出来为钱讲话，不容易！或许正是黄道周一疏，打动了崇祯帝。崇祯帝不久便改变了主意，免钱龙锡死罪，戍定海卫。

钱龙锡能从崇祯帝手中捡回一条命，实在难得！

崇祯帝登基以后的几年中，辽东的局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弄越糟。这原本是一场局部边疆战争，至此战火竟烧到了京师城下。朝廷原先对付的，只不过是一个藩属，而正是这个原先低声下气、称臣纳贡的藩属，竟强大到把一向居高临下的天朝打得落花流水。

天朝的颜面何在！小小的后金何以能不把堂堂天朝放在眼里？

这是当时不少人共同思考的问题。崇祯帝自然也思考过这一问题。他把罪责都推到了袁崇焕身上，说是袁崇焕误国，把事情搞糟了，于是，袁崇焕寸磔而死便是不可避免了。

不过，袁崇焕被处死之后，辽东的局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一步步恶化下去。

长山、大凌河之败

袁崇焕一死，崇祯帝只有依靠孙承宗来统辖辽东战事。

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进士，高阳人。在天启年间，他曾被重用，以兵部尚书兼大学士的身份，亲赴辽东，主持战局，一度稳住了辽东的局势。后因与朝中不和，辞职赋闲。一般认为，孙承

宗具有东林色彩，魏忠贤曾拉拢过他，但被严拒。而魏忠贤大杀东林党人时，他在前线也没有多大的表示。因此在魏忠贤时代，他没有受到迫害。总的来说，孙承宗有才干，能做事，也深谙朝廷上下的利害关系，处世方式较温和中庸，但不失机敏。

孙承宗重新被召时，年龄已过六十，属三朝元老。他在危难之际重挂帅印，尽心尽职，先后收复遵化等四城，为崇祯帝笼络住几乎要叛乱的大将祖大寿，并深得崇祯帝的赏识。

崇祯帝给了孙承宗很多荣誉，希望孙承宗能为他稳住局势。孙承宗在多次辞谢而崇祯帝不许的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硬着头皮干下去，以兵部尚书兼大学士的身份，督理山海关内外军务。

在后金兵退出长城防线后，孙承宗着手布置辽东的防务，加强边备。为了解前线情况，孙承宗不顾体衰年迈，出巡关外。

他从山海关出发，由前屯（广宁前屯卫）、宁远抵达松山、锦州；再由三道关历经石门、燕河等地；最后由石塘路过平谷，途经盘山，进入蓟州而还京师。

巡察全线之后，孙承宗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战略部署，主要有：先任封疆大臣，精择八部大帅，分别战守；蓟镇备守，辽镇备战；合蓟辽战守，防御插汉，收复城池等。崇祯帝极为赞赏，立即同意，就像袁崇焕当初上任时言听计从一样。

崇祯四年（1631）初，辽东巡抚丘禾嘉，要求收复广宁（今北镇）、义州（今义县）、右屯三城。孙承宗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命丘禾嘉先据右屯，修筑大凌河城。这样一来，锦州、大凌河（今锦县）、右屯就形成犄角之势，可以相互依托。守住这三个据点以后，再向东北依次推进，收复较远的广宁城。

总兵官祖大寿、副将何可刚率兵四千，驻守其地。另有班军一万余人，负责修建大凌城。但就在此时，朝廷内部的不同意见再次影响到前线的形势。由于原先支持筑城的兵部尚书梁廷栋的下台，筑城之举引起朝廷的非议。朝廷不少官员认为，大凌河过于荒远，不应重新修筑，浪费人力物力，而应把重点放到蓟州一线来等等。朝廷的意

见，明显与边臣不合，严重影响了前线的战略步骤。

到了崇祯四年（1631）八月，皇太极再次突然出兵，攻打朝廷的辽东防线，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皇太极在崇祯三年（1630）退兵之后，曾遣使入朝，要求与朝廷议和。当时朝廷上下没有一人敢提此事，因为袁崇焕的下场就摆在眼前。而崇祯帝也对此事讳莫如深。至此，皇太极得知祖大寿、何可刚率兵推进，重筑大凌河城，便以此为借口，重开战火。

皇太极是不会让朝廷的军队在此重新立足的。因为一旦明军建立起锦州、右屯、大凌河三角形防线，并以此向广宁推进的话，那么进可继续东进，向后金腹地纵深发展；退可扼制住后金军队进入蒙古地区，切断后金与蒙古的联系。因此皇太极此举，是想乘明军立足未稳时打个措手不及，纯粹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至于他出兵时声称的那些理由，如朝廷进兵辽东、破坏和议之类，只不过是借口罢了。皇太极此举，反过来也证明孙承宗收复大凌河之类的计划是正确的。可惜远在京师的朝廷中能理解的人不多！

此时的皇太极，实力绝对不可低估。后金军队擅长的突然、凶狠的骑兵战术，已令官军闻风丧胆。此时，他又经过千辛万苦，铸成欧式火炮。在崇祯四年（1631）初，首批四十门欧式大炮铸成并投入使用，由佟养性指挥。这样一来，后金就将其固有的那种突然、凶猛的骑兵战术与持续、猛烈的炮兵技术结合起来，实力大增。

崇祯四年（1631）八月初四日，皇太极亲率满汉大军二万余人，在大凌河城下集结。鉴于大凌河城防守坚固，为减少伤亡，皇太极下令对该城进行围困，沿城四周修建栅栏，并挖出一条宽五尺、深七尺的壕沟，以切断城内外的联系。同时他派兵扼守住通往锦州的要道，阻击锦州方向出动的援兵。

当时守城的是辽东名将、总兵官祖大寿和副将何可刚。面对敌兵的包围，祖大寿几次派兵出击，企图撕开缺口，打通城内外通道，杀出一条血路，但都没有成功。皇太极随即下令用新式火炮轰击城外的台堡。在猛烈的轰击之下，大凌河城外围的台堡一一落人敌手，包围

圈不断压缩。

当大凌河被围的消息传来后，督师孙承宗、巡抚丘禾嘉立即组织援军，急赴前线增援，以解大凌河之围。孙承宗、丘禾嘉亲自率军，与总兵官吴襄（祖大寿的妹夫）、宋伟合兵，约四万之众，由山海关向锦州进发。

当援军前锋近万名兵马赶到松山（广宁中屯所）附近时，被阿济格率领的千余名满蒙骑兵拦截击败，退回锦州城内。九月初，另一支大队援兵赶到锦州城外，在小凌河对岸扎营时，皇太极亲率精兵偷袭大营，打得明军措手不及。

九月二十四日，援军主力，包括百余名战将和四万步骑，由监军、太仆寺少卿张春率领，渡过小凌河。三天以后的清晨，当这支兵马乘夜色推进到离大凌河只有十五里的长山时，才被敌兵的前哨发觉。皇太极迅速集合满、蒙、汉军两万人迎敌。当时明军的数量是后金军的两倍。

当后金军赶到阵前，见张春已将大军摆成防御阵形，大炮鸟铳四面排列。皇太极先令骑兵分两翼正面冲击，右翼直扑张春的大营，但因炮火猛烈，伤亡惨重，未能破阵。皇太极随即加入右翼，重整队伍，并令佟养性的炮兵移至明军阵地东侧，用火炮和火箭猛轰张春大营，明军伤亡大增，阵脚开始动摇，张春大营开始溃乱。

在这关键时刻，由吴襄、参将桑噶尔寨统率的另一支援军开始溃退。

张春在重创之下，仍收拾残卒，进行抵抗。当时正逢天起大风，张春便下令纵火攻击佟养性的炮兵阵地。没想到大火起后不久，风向逆转，反而扑向自己的阵地，引起阵脚大乱。皇太极乘机率骑兵冲击，张春的大营便一败涂地了。

三路兵马中的宋伟一营，在力战之后，也因势单力孤，只得撤退溃逃。至此，大军全线崩溃。

长山一役，明军四万之众被皇太极的二万人马击溃，损失惨重。包括张春在内的三十余位高级将领被俘，张吉甫等将领战死，兵马损

失不计其数。更严重的是，明军再也组织不起像样的援军，去解救大凌河之围。

据说战争结束后，被俘将领一一被带到皇太极面前，依次叩拜，只有张春站而不跪。皇太极怒极，从身边兵士中夺过弓箭，要当场将其射杀。在代善等人纷纷劝说求情之下，皇太极才消了气，并赐其珍馔。但张春仍予以拒绝，绝食三天后，皇太极竟亲自探访，亲手赐其酒食，张春大受感动，终于投降（也有人说张春未降，过数年而卒于辽东）。由此也不难看出皇太极的气度和手段。

皇太极在击败援军之后，加紧对祖大寿的劝降工作。在此以前，皇太极已在军事压力之余，多次劝说过祖大寿。至此，皇太极再次派人带着二十三位降清文武官员的招降书，劝说祖大寿投降。被拒绝后，皇太极再次致书城中，反复阐明自己的用人政策，请祖大寿不必疑心，最后，皇太极言辞诚恳地说：

大凌河孤城被困。我并不是由于不能攻取，不能久驻，而要如此苦口婆心。只不过是考虑到山海关外的智勇之士，尽在此城而已。另外，也是因我荷天眷佑，要众将军助我成大业。若杀了你们，于我何益？不如与众将军共图大事。所以才以肝膈之言，屡屡相劝。

祖大寿仍是不肯投降。皇太极便加紧军事攻击，扫清大凌河外围，收缩包围圈。随着冬季的来临，大凌河城内的粮食供应越来越成问题，平民百姓首当其冲，饿死者无数。而兵士不久也无粮可食，先是杀马充饥，后开始有计划地杀人充饥。这些情况被掌握后，皇太极更加紧了劝降攻势。祖大寿走投无路，开始动摇了。

经过反复协商，祖大寿决定投降。十月二十八日，反对投降的副将何可刚被推出城门，在后金兵营前示众以后，被斩首。何可刚临死之前，神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其尸体被拖入城门后，饥饿至极的饥民一拥而上，争夺其肉而食。

斩杀何可刚后，祖大寿派出四名副将、二名游击出城，代表他与其他三十七位命官，与皇太极和众贝勒对天盟誓。盟毕，祖大寿正式献城投降。此时的大凌河城，在被围八十余天后，原有的三万余人，

只剩下一万人左右了。

祖大寿正式投降后，受到了皇太极超规格的接见。诸贝勒出营一里迎接，到达御营时，皇太极出幄相迎，并免其跪拜，而行抱见礼。在并行进幄后，皇太极让祖大寿坐在自己身边，亲以金杯赐酒，又赐御服黑狐帽、貂裘、白马等物。开宴入席时，祖大寿坐在汗兄代善之下，享受了最高规格的礼遇。

投降后的第二天，祖大寿依照原先的约定，赴锦州进行策反。皇太极对他并不是没有顾虑，但考虑到如果祖大寿守诺且能策反锦州，确实是一本万利之事。而且当时祖大寿的子侄也留在后金营中，实际上近似人质，所以皇太极仍决定冒一次险。

然而，祖大寿回到锦州后，并没有发动策反，他推说人手不够，时机未到。不过在几年之后，当祖大寿完全控制锦州时，他仍没有降金。皇太极这次是看走了眼，祖大寿是诈降！

祖大寿献大凌河城，或许只是金蝉脱壳之计？后人至今也没弄清。

令人奇怪的是，生性多疑、残酷无情的崇祯帝，竟然也能放祖大寿一马。对祖大寿在大凌河献城降金一事，当时驻守在锦州城中的巡抚丘禾嘉，已从逸出大凌河城的兵士口中略知一二，并也上书报告了朝廷。但崇祯帝竟没有追查，放过了祖大寿。崇祯帝在即位的十七年中，不知给其对手送去了多少良将重臣，惟有这一次，却能把已降皇太极的祖大寿重新收服，为朝廷而用，实在是难得！

大凌河之战后，严格意义上的满汉战争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从此以后，后金的对明作战，实际上已有不少是由汉人主持。这些汉人绝大部分是世代为明朝效力的辽阳土著边民，是职业军人。这些人就是袁崇焕所谓“以辽人守辽土”中的辽人。仅在大凌河之役中投降后金的就有：祖大寿之子祖泽润、祖泽溥，义子祖可法，侄子祖泽洪，以及刘良臣、刘武、孙定辽、张存仁等一批最有经验的战将。随着战事的进行，越来越多的类似人员加入了投降后金的行列，成为对明作战、开朝立国的急先锋，立下了赫赫战功。

正是这些汉人，再加上关内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最终打败了崇祯帝，倾覆了大明王朝，为明清鼎革创下了条件。如果只凭满洲军队，大概还不足以撼动大明朝的根基。

叛降

长山、大凌河之败，使孙承宗的神话破灭。朝廷中的不满和攻击，犹如急风骤雨般向孙承宗和丘禾嘉压来。

在许多朝廷官员看来，朝廷刚与后金开始接触议和，兵火才息，而孙承宗、丘禾嘉却要惹是生非，去修筑什么大凌河城，惹恼了皇太极，遂造成了长山、大凌河惨败。

作为前线的最高指挥官督师，孙承宗自然应对长山、大凌河的失败负一定责任。但所谓“筑城起隙”之类的逻辑，孙承宗自然难以接受，心里很不是滋味。同时，他更看出了温体仁之辈的险恶，也体会到了在猜忌多疑的崇祯帝手下做事的难处。因此，在长山惨败后，他便以年老为由，多次上疏，要求致仕。

崇祯四年（1631）十一月，崇祯帝批准孙承宗致仕，令驿站车马送其回高阳原籍。不久，因言官追论孙承宗“丧师辱国”之罪，崇祯帝下令夺其官职闲居，并剥夺宁远世荫。到清兵后来进攻高阳时，年近古稀的孙承宗尚率家人拒守。城破后，孙承宗望阙叩头，上吊自杀，为大明朝尽了忠节。

当时已调任南京太仆寺卿的原辽阳巡抚丘禾嘉，也被追论。丘禾嘉以病为由辞职。

在孙承宗辞职后不到一个月，即此年闰十一月，山东便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登州游击孔有德等将领发动叛乱。

这批将领，原都是毛文龙的部将。袁崇焕诛杀毛文龙后，其旧部由副将陈继盛统辖。但不久，参将刘兴治在皮岛发动叛乱，杀陈继盛

等十余人。总兵黄龙随即赴皮岛镇压，皮岛乱兵一哄而散。

孔有德、耿仲明原籍山东，矿徒出身，曾是辽东海盗，后投毛文龙，与尚可喜一起，被称为“山东三矿徒”，是毛文龙手下的骨干将领。孔、耿因不服黄龙统辖，便叛离皮岛，率部来投登莱巡抚孙元化。

登州（今山东蓬莱）是当时山东半岛上的重要军事要塞之一。在天启初，为了协调对后金的作战，在山东设登州、莱州（今山东掖县）巡抚，援助辽东前线。当时任登莱巡抚的是孙元化，嘉定人，举人出身，被任命之前曾任宁前道兵备副使。

就是这位孙元化，竟接收了皮岛的叛将孔有德、耿仲明，并委以重任。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当时，登州要塞正有一位名叫特谢拉·科雷亚的葡萄牙人率领一些葡籍士兵，帮助明军试铸欧式大炮，并获成功。

大凌河被围后，同属孙承宗指挥的登莱巡抚孙元化，急令游击孔有德赶赴前线增援。孔有德奉命北上，抵达吴桥时，因遇雨雪，部队给养供不上，士兵开始抢劫。在另一位与孔有德有相同经历的毛文龙旧部李九成的煽动之下，孔有德正式叛乱，随即杀回山东半岛。

孔有德还兵大掠，先后攻陷陵县（今陵县）、临邑（今临邑）、商河（今商河），接着又杀入齐东，包围德平，不久又舍德平而去，攻陷青城、新城，向半岛杀去。

山东巡抚余大成、登莱巡抚孙元化闻变，非常紧张，立即派兵来鲁北应变。当时，余、孙两人都不愿把事情闹大，力主安抚孔有德，并令沿途州县，不得出兵邀击，以免激化矛盾。孔有德将计就计，假装投降，迷惑孙元化，而实际上却率兵直趋登州。由于沿途州县不敢出兵拦截，让出通道，孔有德便顺利杀到登州城下。

孙元化急令部将张焘率辽兵守登州城外，总兵官张可大也发南兵抗击。两路成合击之势。张焘进兵稍胜，却下令退兵，张可大失去策应，被孔有德杀得大败。形势陡然紧张起来了。

张焘的兵卒，多是辽东籍，与孔有德部关系不错。他们见此情

形，纷纷投入孔有德的叛军行列。孔有德便令这些降卒再混入登州城中，作为内应。而孙元化不察敌情，不听劝告，同意这些早已从叛的散卒进城。与孔有德是旧交的登州中军耿仲明及都司陈光福等，立即策应，举火开门，让叛军从东门攻入登州城，登州便告失陷。此时是崇祯五年（1632）正月。

孙元化是南直隶嘉定人，山东巡抚余大成是南直隶江宁人，总兵官张可大是南京羽林卫军籍。这三位南直隶人，在这场兵变中，根本不是山东、辽东人的对手，被孔有德等骗得团团转。

登州沦陷后，孙元化自杀未成，与同城命官一起被俘。只有总兵张可大在斩杀其妾陈氏后，在其官署上吊自杀。

孔有德令孙元化致书余大成，要求和谈。余大成见事已闹大，便上疏朝廷。崇祯大怒，撤掉了余大成、孙元化两人之职。孔有德见孙元化已无利用价值，念其旧日收留之情，放其出城，放了他一马。可是崇祯帝却不会放过他。他与余大成两人被逮到京师，最后余大成被充军，孙元化竟被斩首弃市。

孙元化是当时朝廷中少数几个接受西方先进技术的高级官员之一，与徐光启关系密切。徐光启、周延儒等曾上书营救，但终未成功。崇祯皇帝这一刀，不仅砍掉了一个巡抚，同时也砍掉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科学家式的高级官员。本来，登州是一个应用先进西方技术的基地，但随着孙元化的被杀，及其葡萄牙籍炮队的毁灭（孔有德进城后，特谢拉·科雷亚及其炮手仅有三人幸免于难）。这个先进的技术基地也就被轻而易举地毁掉了。更严重的是，许多已学会这些技术的原登州官兵，包括孔有德、耿仲明在内，不久后投到了皇太极手下，反过来攻打大明。

可惜崇祯帝不知道孙元化的价值！在人人知道徐光启是大科学家的今天，又有几人能知道孙元化呢？

孔有德占据登州后，推李九成为首领，自己居第二位，耿仲明居第三。除此之外，尚有一些将领，如李应元（李九成之子）、陈有时、毛承禄、陈光福等。他们有的来自直隶海湾中的岛屿，有的来自

旅顺。这批海盗、边民、矿徒出身的职业军人，在登州俨然建立起自己的“王国”。他们刻印建官，招徕海盗流寇，四出焚掠，弄得山东半岛以致辽东前线都人心不定。

崇祯帝重新任命徐从治为山东巡抚、谢琏为登莱巡抚。按照原先的安排，谢琏驻莱州指挥，徐从治则驻青州负责供应粮草。而徐从治却觉得自己驻扎在青州不足镇抚莱州人心，便主动要求移镇莱州。没想到他一去莱州，就被孔有德围在里面达数月之久，最后连命也送在这里。

当时孔有德的部队已先破黄县（今黄县）、平度（今平度）两城，然后增兵攻打莱州。徐从治、谢琏两位巡抚，与总兵杨御蕃分头固守城池，拼死抵抗，形势十分危急。而外围的各路援兵都驻扎在昌邑，由于山东巡抚徐从治被围在莱州城内，援军无人督察，诸将观望，谁也不肯拼死驰援莱州。

开始时，那位胆大的徐从治还敢出城偷袭叛军，且稍有斩获。但兵部尚书熊明遇认为此事尚有招抚的余地，便派主事张国臣去山东处理招抚之事，并要求徐从治不要轻易出兵，破坏抚局。徐从治当然不干，先后三次上疏朝廷，力主抚局无望，应以武力解决。朝廷认为，两抚臣都被困在莱州，应增设总督来山东前线，决定抚战。

侍郎刘宇烈于是被任命为总督，赴山东统辖骑、步兵二万五千人，平定孔有德之乱。但刘总督本无筹略，赴山东后除整天派人去招抚外，不进行任何军事行动，以免动而取咎。孔有德便故伎重演，说是要降，暗中却把孙元化铸造的大炮调到莱州城下，架起猛轰，打死了山东巡抚徐从治。莱州城危在旦夕。

两个月后，孔有德在朝廷的军事压力下，突然又向登莱巡抚谢琏提出投降，并约定降期，请莱州城中的文武官员出城开读。已被困在城中六个月的登莱巡抚谢琏，在不得已之下，决定冒险，便与知府朱万年出城受降。但当兵出身的总兵杨御蕃坚决不去，大概是因为他深知这些叛兵的品性。叛兵见到谢琏等人，连跪带哭，态度诚恳，并拥之而去。谢琏刚被带走，叛兵随即攻城。他们把知府朱万年押到阵前，要他呼喊劝降。朱万年大声喊道：

“吾死矣。汝等宜固守！”

城上的杨御蕃一看形势危急，下令开炮，杀伤叛军不少。而那位朱知府也在自己人的炮火下丧生。

杨御蕃的几炮，总算保住了莱州暂时不失。

消息传到朝廷，舆论大哗，举朝痛愤。于是总督刘宇烈被下了诏狱，兵部尚书熊明遇被撤职。朝廷上下没有一人再敢提抚议。

此年七月，崇祯帝决定不设总督、登莱巡抚之职，而提拔参政朱大典（浙江金华人）任山东巡抚，督各路兵马数万平叛。并从辽东调劲旅约五千人关参战。后来名闻天下的吴三桂（总兵吴襄之子）当时就在这支队伍中。

朱大典至德州后，派副将牟文绶，驰救平度，斩杀叛将陈有时。大军推至昌邑时，总兵金国奇、参将祖宽为前锋，与孔有德大战于沙河，大败孔有德。援军乘胜追击，直至莱州城下，迫使围困莱州城的叛兵解围而去。

莱州城中的守军，开始坚决不相信援军已打到城下，解了莱州之围。因此，当援军向莱州城靠近时，吃尽了孔有德苦头的守城兵民，还以为这又是孔有德玩的花招，立即开炮轰击，城上城下相持不下。最后还是监饷太监高起，派了几位手下的小太监入城，陈说前因后果后，城中守军才开城迎接。当时大概也只剩下太监还没有假冒，所以太监入城，还能取信于人。

几日之后，总兵金国奇等继续进兵，与叛军再战于黄县，斩杀敌军上万人，俘获近千人，逃散及坠海者无数。此次大胜，扭转了山东半岛上的局势。

朱大典督兵以来，全仗辽东调来的五千精兵，冲锋陷阵。像金国奇、靳国臣、祖宽及吴三桂等辽籍将领，个个能征善战。用这些辽将辽兵，来攻杀孔有德手下的山东、辽东兵将，这步棋算是走对了。

在黄县大胜之后，官兵接着向叛军的堡垒登州城进攻。登州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大城之北，还有水城与大城相连。只要打开水城

门，城中之敌就可以泛海而走辽东。因此，朝廷之兵久攻不下。说起来，登州城筑得如此坚固、科学，还是孙元化的功劳。没想到他的心血，没有在对金作战中被用上，反而为孔有德所利用，给朝廷出了个难题。

好在叛军过分自信，竟敢出城挑战。叛军首领李九成率兵掠阵，没想到被官军斩杀。这样一来，原先的五位叛军首领，已有陈有时、李九成被杀，仅存孔有德、耿仲明、毛承禄（毛文龙之子）三人。叛军气势大受影响。

当祖宽等夺取水城门外的护墙，登州通海之路有被切断的危险时，孔有德感到紧张了。他用海船载着子女财帛，率先撤出登州，泛海而去，耿仲明等也随之而去。主帅一走，剩下守城的兵士便没有斗志了。

游击刘良佐派人潜入永福寺中，挖坑道至城墙之下，放置炸药，炸塌了城墙。官兵从缺口一拥而入，打进登州城中。残敌退守城北丹崖山上的蓬莱阁，负隅抵抗。或许是因为朱大典这位文人出身的统帅，爱惜这座建于北宋英宗治平年间的文物名胜，所以心存善念，没有动武，而是用了劝降之法。千余残敌无奈之下，下山投降，但仍有许多人不愿投降，或跳海，或上吊。

此时，已是崇祯六年（1633）的二月了。孔有德山东之叛，自崇祯四年（1631）闰十一月起，一直打到崇祯六年（1633）的二月，前后达十六个月之久。叛军人数从开始时的千余人，越打越多，最终竟有数万之众。由此可见当时朝廷的应变能力是何等之差！

朝廷的武将士卒，在与外族后金作战时，总是败多胜少；在与陕西、山西的叛民作战时，同样也是败多胜少。但令人不解的是，当这些为朝廷效力时似乎算不上是精兵强将的官军，一旦叛乱或投敌后，却都不差不弱。将还是原来的将，兵还是原来的兵，为什么在为大明朝打仗时这么差，而反过来打大明朝时却又变得那么强呢？！

不知崇祯帝和他的那班朝廷官员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山东的胜利，实在是太重要了。崇祯帝即位后，仗是越打越多，

越打越大，却也是越打越输，越打越糟。这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打败了崇祯帝起初可能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而且原先也是朝廷军官的游击孔有德，在当时也算是大功一件，可庆可贺。

于是，朱大典被提拔为兵部右侍郎，世袭锦衣卫百户。其他参战将领，也是赏赐有差。那位追着孔有德、耿仲明泛海而逃，却因慢了一步而被总兵官黄龙邀击俘获的毛承禄，被押到了北京。朝廷为此还搞了个献俘仪式，最后把他寸磔而死。

其实，崇祯皇帝和他的官员们，大可不必如此兴高采烈。因为就在崇祯帝忙于镇压山东叛乱和陕西、山西之乱时，皇太极却在沈阳休养生息了年多，正准备着新的行动。而孔有德、耿仲明的来投，令他大喜过望。

于是，皇太极开始了新的一轮进攻。

皇太极大举入侵

孔有德、耿仲明率部泛海退往辽东时，驻扎在旅顺一线的明总兵官黄龙率兵邀击。黄龙的水军很能打仗，在海上把这支叛军打得七零八落。李九成的儿子李应元被斩杀，毛承禄、陈光福被俘。耿仲明的弟弟、黄龙的部将耿仲格，试图密谋叛乱，接应其兄，幸亏被黄龙及时发觉而斩杀。

吃了大亏的孔有德、耿仲明，仍凭着勇气和经验，带出了包括一些军人家属在内的万余名部下，突上了辽东的陆地。他们怀着对明朝，尤其是乘危邀击他们的总兵黄龙的刻骨仇恨，直奔后金而去。

皇太极早就命人率军在指定地点迎接他们。后金兵帮助他们击退了明朝的追兵，赐以黄金和酒食，并许诺说，只要归顺后金，就可在辽阳附近居住。走投无路的孔有德、耿仲明等人，正求之不得，自然是一口答应，随即率军向沈阳进发。

对这批大明朝的叛兵乱卒，皇太极给予了相当高的礼遇。皇太极亲自出沈阳迎接他们，并免跪拜之礼，改用女真人的抱见礼。而孔有德等坚决不肯，坚持要行跪拜之礼。最后，双方妥协，先行抱见礼，再由孔有德等行跪拜之礼。接着，孔有德献上从登州搬来的大炮，皇太极十分高兴，允许他们驻扎在辽阳之北的新建城市，并授以要职，予以重用。

皇太极之所以对这批人如此另眼相待，除其一贯的用人风格外，还有现实的考虑。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长期生活在辽东，非常熟悉情况，不仅有相当丰富的战斗经验（包括女真人当时尚不太熟悉的海战），而且还接受过孙元化的系统训练，能操作欧式火炮。另外，这些人都曾在毛文龙手下任过职，既当过官军，也做过强盗，有一套笼络、团结部下的有效手段。他们的军队，都是由他们完全控制的私人式部队，与组织涣散的一般官兵很不一样。尽管最后突围到辽东的军队仅万余人，但骨干仍在，只要稍加充实，便是能征善战的悍兵。孔有德、耿仲明后来的经历，也证明了这点。

崇祯六年（1633）七月，已获补充休整的孔有德、耿仲明，为报数月前被海上邀击之仇，率兵攻打辽东重镇旅顺。

旅顺是当时朝廷在辽东半岛上尚存的最后堡垒，由总兵黄龙镇守。当时，黄龙为支援鸭绿江一线，派出水师增援，导致旅顺空虚。孔有德、耿仲明乘机发兵围攻旅顺。黄龙连战皆败，独守孤城，最后火药矢石俱尽。黄龙拔剑自刎，旅顺被攻陷。黄龙部将李惟贤、项祚临、樊化龙、张大禄、尚可义等战死。

旅顺一失，原与旅顺互为犄角的广鹿岛就成了问题。该岛守将尚可喜，本是毛文龙部下，与孔有德、耿仲明也是老关系，容易联络。于是，尚可喜在不受信任、形势危急之时，加紧与后金联系，并于崇祯七年（1634）初，率其数千属户，携带辎重，乘船离岛登陆，到沈阳降敌。他的部队被安排在辽阳以南的海州（今海城）。皇太极没费什么气力又多了一员战将。

至此，皇太极手下的汉族军队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大凌河之战前，由佟养性率领的旧汉兵已以火炮闻名，而大凌河降卒又被补充进

这支军队，加强了其实力。崇祯五年（1632）佟养性死后，这支军队由马光远统领。这支队伍后来成为汉八旗的骨干。孔有德、耿仲明的军队，以及尚可喜的军队，即分别被皇太极称之为“天祐兵”和“天助兵”的两支汉军，后来也被并入汉八旗，并为清朝开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孔、耿攻陷旅顺及尚可喜的叛变，给明朝在辽东的战局造成了严重后果。从此以后，明朝在辽东半岛及周边海岛已无险可守，残存的军队也很快土崩瓦解。奇怪的是，对这些在军事上有重大意义的险要之地，明朝竟不再认真对待，坐视其失。这是一个极大的败招。

崇祯七年（1634）五月，皇太极再次对明朝发起进攻。这次进攻的目标，先是收服蒙古的察哈尔部，然后入边，进攻明朝的边防重镇即宣府（今山西宣化）、大同（今山西大同），而不与山海关防线正面接触。

战略确定以后，皇太极兵分两路，一路从上榆林出发，一路从沙哈出发，攻入蒙古境内。后金部队这次彻底解决了蒙古察哈尔部的问题。在此以前，皇太极先后几次西征，试图压服察哈尔部落，最大的一次是在崇祯五年（1632）。崇祯五年的这次西征，把察哈尔部的首领林丹汗打得西逃（死于崇祯七年，1634）。本次西征，皇太极最终降服了察哈尔部，使其归顺了后金。皇太极对蒙古察哈尔等部的征服，不仅获得了重要的军事盟友，而且还获得了战马的供应基地，更重要的，是使明朝彻底失去了长城外的屏障。

后金军队于六月先后抵达长城附近。根据原定计划，皇太极将其七万精兵分成四路，于七月初攻入长城之内。宣、大一线全线告急。

宣、大一线的防护，本很虚弱，宣、大总督张宗衡、巡抚胡沾恩、总兵张全昌、曹文诏等人的兵马，在皇太极的凌厉攻势下，根本抵挡不住。朝廷下令京师戒严，同时急遣宁远总兵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率数万兵马分道救援，再命保定巡抚丁魁楚移居紫荆关，山西巡抚戴君恩移居雁门关，总兵陈洪范移镇居庸关，阻击后金兵马，保卫京师。

皇太极的几路军队攻势凌厉，势不可挡。七月初七日，攻人大同、张家口。初八日，入保安、怀来。十三日，围宣府，屯天寿山。十四日，驰入永宁（属延庆州）。十六日，围大同左卫（今山西左云），破保安州，杀知州阎生斗。后又攻朔州（今朔县）、围浑源州（今浑源）。至八月，各路军队汇集应州（今应县）。皇太极在攻破代州（今代县）后，分兵出击，西至三坌、崞县，东至繁峙（今繁峙），中至八角（八角是一要塞，在今山西西北）。皇太极则率兵进攻大同。宁远总兵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纷纷驰援。由于大同府久攻不下，皇太极便转攻灵邱、保安等县。

闰八月，代王母杨太妃命宣、大总督张宗衡、总兵曹文诏等与后金求和。皇太极布告以申讨之意，然后攻杀保定竹帛口，杀千总张修身，再攻占宣府万全左卫（今河北万全），从拒墙堡出塞回沈阳。

此次入掠宣府、大同，皇太极虽遇一些抵抗，但总的来讲仍是出入自由，无人能敌。皇太极收兵之后，曾自夸说：

“朕入境几两月，蹂躏禾稼，攻克城池，曾无一人出而对垒，敢发一矢者。”

话虽说得有点夸口，但也没有离谱。皇太极这次再试牛刀，得胜而归，充分说明山海关以西长城防线的薄弱，以及后金、明朝之间军队素质的差距。

遗憾的是，崇祯帝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些，或者是不愿承认这些。当后金军队攻人宣、大等地时，朝廷仍发布了一纸檄文，说什么“满洲原系我属国，今既叛犯我边境，当此炎天深入，必有大祸”。接着便要归顺后金的满、汉、蒙人，立即投归天朝，并威胁说：

“若不来归，非死吾之刀枪，则死于吾之炮下，又不然，亦被彼诬而杀之矣。”

这种恫吓诈骗之言，如无军事上的实力作保证，则显得毫无意义。而事实上，朝廷的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真是令天下失望。如进攻山西崞县（在今山西代县西南，属太原府）的后金军队仅有两千人。当这支军队带着俘获的千余人回撤路过代州（今代县）时，被俘

人员指望代州城的驻军能出兵邀击敌军，解救他们。然而代州城中却不敢发一兵一卒，甚至连箭都不敢发一支，生怕惹怒敌军。被俘人员见此情景，不禁失声痛哭。像这种情形远非一次。当时明朝的军队普遍存在恐敌心理，不敢与后金军队打硬仗。

也正是因为明朝军队如此不济，所以皇太极敢夸下海口。他说：

你明朝出兵一万，我只要用一千人应战；你明朝出兵一千，我只要用兵一百就绰绰有余。如果你明朝敢在前迎战，尚且可以说说大话。否则，一味说大话，讲假话，却又不敢硬碰硬地去打仗，可谓是可耻之极！

话说得很难听，却道出了实情。崇祯帝知道前线详情后，也只有“顿足太息”，无可奈何！他只有把气出在前线的将领身上。他下令兵部查核边臣之罪，结果宣大总督张宗衡，总兵官张全昌、曹文诏，以及巡抚胡沾恩等都被同时罢官遣戍。由于山西巡抚吴甡的恳请，张全昌、曹文诏两位总兵被保全下来，参加了围剿山西的农民军。这种做法，对崇祯帝而言，真是少见的开恩之举。

到了崇祯八年（1635，天聪九年），当崇祯帝被晋陕的农民军搞得焦头烂额时，皇太极正在沈阳筹备开国事宜，一个与天朝平起平坐的新王朝就要崛起了。

崇祯八年（1635），多尔衮出征凯旋，献上了元朝的传国玉玺。诸贝勒和蒙古各部贝勒合议，为皇太极奉上皇帝尊号。皇太极没有接受劝进，只是撤除女真名号，统称满洲。

皇太极对开朝立国一直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他想当皇帝，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但同时又担心自己的实力能否彻底征服中原，更担心女真民族入主中原后，丧失民族性，而被汉族同化，就像他们的祖先在创建金朝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那样。因此，尽管他手下的那些文臣，尤其是汉族文臣如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等，一再劝说皇太极进兵中原，夺取北京，称帝建国，但皇太极却不为所动，多次拒绝。至崇祯八年（1635），羽翼渐丰的皇太极仍只是同意改称满洲，而不建国称帝，坐视中原形势的变化。

至崇祯九年（1636，天聪十年），皇太极终于同意称帝建朝。此年四月，满洲、蒙古诸贝勒，汉军都元帅、总兵官及文武大臣，云集沈阳，举行盛大的登基开国典礼。

皇太极接受“宽温仁皇帝”尊号。由多尔衮、土谢图济农巴达礼、孔有德，分别上满文、蒙文、汉文表章。建国号大清，立年号崇德，以沈阳为国都。追谥努尔哈赤为承天广运武皇帝，依汉制上庙号太祖。

皇太极称帝建国，表明他已有充分的实力和自信逐鹿中原了。不久，皇太极便开始了他更大的步骤。

而此时的崇祯帝和他的文武大臣们，正被黄土高坡上下来的农民军搞得晕头转向。

第五章
步入深渊的内乱

尽管崇祯帝即位伊始，就面临着皇太极的严重挑战，而且最终也是由清朝替代明朝，入主中原，但把崇祯帝逼上煤山的，却是明朝自己的臣民，即从黄土高坡上杀下来的李自成及其同伙。

崇祯帝登基后，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辽东，全力对付皇太极及其后金，对帝国内部存在的严重危机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总认为只要解决了辽东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至少不会像辽东问题那样棘手。

其实，崇祯帝是弄错了。

经过长期的折腾，帝国犹如一座即将倾圮的大厦，充满危机。朝廷的财政经济风雨飘摇，入不敷出。各种名目的加征加派，使百姓负担不断加重；天灾人祸的接踵而至，更是雪上加霜。官僚集团的普遍腐败、无能，也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在这种情形之下，社会虽尚能勉强维持，但已处崩溃之边缘，犹如一个火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矛盾最激化、危机最严重的是陕西、山西等边远省份。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本来就很差，即使是风调雨顺，也只能是勉强维持温饱，更不用说是连年灾荒了。崇祯即位前后，那里正逢大旱，百姓无以为生，纷纷为盗为寇。而此地的民风，一向也是骁勇好斗，加上边兵边寇的推波助澜，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人口众多、范围广泛的大起义，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

陕西的动乱，早在天启末年就有明显的迹象。新即位的崇祯帝，由于忙于应付辽东战事，无暇顾及。而陕西的地方官，也拿不出有力的手段来应对，甚至隐瞒实情，给人以陕西太平无事的错觉。

崇祯元年（1628）年底，陕西境内动乱已成燎原之势。朝廷惊呼陕西“流贼大起”。

崇祯二年（1629），朝廷对陕西地方大员进行改组，命杨鹤总督三边军务，捕流贼。

杨鹤主张用“抚”的手段来解决流贼问题，但也有人主张用“剿”即用武力压服来解决问题。至崇祯四年（1631），崇祯帝原则上仍同意以“抚”为主、以“剿”辅之的办法解决陕西、山西的问题。他说“寇亦我赤子”，并派御史吴甡带帑金十万赴陕西赈济。督师杨鹤也一度成功地招降义军首领神一？魁。

但杨鹤的招抚政策并没解决根本问题，陕西等地的局势更加严峻。崇祯帝下令逮捕杨鹤。崇祯五年（1632），杨鹤被谪戍袁州卫。此后，崇祯帝调整策略，改“抚”为“剿”，任命主剿派、原延绥巡抚洪承畴升任陕西三边总督，四面围堵，暂时平息了陕西的义军。

崇祯六年（1633）春，鉴于山西局势的恶化，崇祯帝任命原临洮总兵曹文诏节制山西、陕西诸路兵马，讨伐山西境内的“流贼”，限三月完成。

经过一番激战以后，农民军于此年年底成功地渡过黄河，突破曹文诏等人的包围圈，进入了以郧阳（今湖北郧县）为中心的陕西、河南、四川、湖广等几省交界之地。崇祯帝所谓“三月平贼”的计划彻底破产。

仗越打越大。崇祯帝于崇祯七年（1634）初任命原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诸省军务，赋以全权，围剿从陕晋逸出之敌。

但这位被崇祯帝寄予厚望的陈奇瑜，在围剿即将大功告成之际，竟上了农民军的当，让农民军轻易逸出包围圈，形势陡然紧张。崇祯帝大怒之下，下令撤职查办，并于此年的十二月任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出任五省总督，同时，从全国各地调拨精兵，试图于半年之内把李自成等人消灭在河南。

面对朝廷的凶猛围剿之势，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将领在河南汇集，其中高迎祥、张献忠率领的一支，直奔明朝中都凤阳杀去，并很快占领了凤阳，放火烧掉了明太祖朱元璋父母的皇陵和龙兴寺，并打出了“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号，彻底与朝廷撕破了脸皮。

凤阳之变，朝野大震。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敢轻视这支土头土脑的农民军了。凤阳之变，同时也标志着帝国的内乱已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辽东的外患，与中原的内乱，在崇祯帝心目中，已摆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了。

凤阳之变后，农民军内部分裂。李自成随高迎祥杀向河南，回陕西。张献忠则下庐州、安庆，经湖广杀回陕西。农民军不仅成功地粉碎了官军的围堵，而且还发展了力量，斩杀了曹文诏等朝廷的著名将领。

为了镇压农民军，朝廷先后任命朱大典为漕运总督，巡抚凤阳；卢象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等，调集各路精兵，与洪承畴等一起进行围堵。自崇祯八年（1635）底至崇祯九年（1636）初，洪承畴、卢象升等率官兵与农民军在陕西、中原展开大战，并于崇祯九年（1636）七月中旬成功地斩杀了农民军的首领之一高迎祥。

高迎祥战死后，农民军一度处于低潮。但时隔不久，农民军在张献忠、李自成的领导下再次掀起反叛浪潮，农民起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可怜的崇祯帝，至此已是精疲力竭了。关外，皇太极于此年四月在沈阳登基建国，虎视眈眈，已令崇祯帝焦头烂额。而在这紧急关头，后院又偏偏起火，从陕晋开始的农民起义，竟越演越烈，势成燎原。这无疑是给崇祯帝及其朝廷在背上插了一刀。

外患内乱，令一直自视为中兴之主的崇祯帝，终于低下了孤傲的头颅，于崇祯八年（1635）十月下达了“罪己诏”，跨出了令人难堪的第一

步。

杨鹤抚陕政策的失败

崇祯即位时，天下已逞乱象，不再太平。

早在天启元年（1621）九月，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就发动叛乱。次年二月，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也反叛，策应奢崇明，西南大震。直到崇祯初年，朝廷在吃尽苦头后才算把叛乱平息下去。

在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也不安宁。先是荷兰殖民者占据澎湖列岛，骚扰沿海。后经朝廷反击，荷兰人才退出澎湖，但仍盘踞台湾。更严重的是，在万历末期福建沿海已形成了不少海商集团，他们亦盗亦商，拥有武装，势力强大，朝廷奈何不得。至天启年间，郑芝龙等人的海商集团，几乎在沿海地区经营着一个海上王国，根本不受朝廷的约束。直到崇祯初，郑芝龙才名义上接受朝廷的招安，暂时不与朝廷作对。这些海盗虽摇身一变成了官军，但朝廷仍是无法真正节制。

尽管川黔、福建有这样那样的麻烦，但至崇祯初算是基本解决了，至少在名义上算是解决了。崇祯帝对此甚至有些洋洋得意。其实，崇祯帝及朝廷的许多官员都忽视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北方地区的不安定因素。

早在天启二年（1622）的五月，山东就爆发过徐鸿儒的叛乱。这场叛乱虽由于组织者的失误很快就被朝廷镇压了下去，但仍是一个大的凶兆。山东与京畿近在咫尺，竟出了这样的大漏子，而且徐鸿儒用的手段也是令朝廷最为头痛的民间宗教，即白莲教，足见民心的不稳定及北方社会问题的严重。

由于徐鸿儒之乱很快被压服，山东的局势也暂时被稳住，朝廷认为北方大概不会再出问题。其实，就在山东被压服的同时，西北的动乱已在酝酿之中，并渐见端倪了。

陕西的民变，实际上从天启五年（1625）就开始了。但那时的民变，规模较小，其行为也只是邀路行劫，打家劫舍，还没有发展到攻城杀官的地步。因此官府往往也只把它视作一般的治安问题，不太注意。但至天启七年（1627），恰恰就是这些小规模的民变，渐成燎原之势，把陕西搅得天翻地覆。

首先动乱的是澄城县，领头的据说是一位名叫王二的人。只要看看此人的名字，就知道他是位底层的穷人。正是这位差不多连名字都没有的底层人，把陕西的反叛之火点了起来。

这年陕西大灾，米贵民饥，而西安府澄城县的县官张斗耀却不顾百姓死活，又严催赋税。此年三月，王二便邀几百名穷苦人，用墨涂面，聚集山上。王二大喝一声道：

“谁敢杀张知县？”

众人一齐喊道：

“我敢杀！”

于是，这群饥民，便在王二的率领下，打下了县城，处死了张斗耀，然后聚集在洛河以北的山上，占山为王。他们飘忽不定，四处出击，先后攻掠到蒲城、韩城、宜君等县。官军奈何他们不得。

在王二之后动手的是绥德州府谷县的王嘉胤。府谷紧贴长城，在陕北东北角，也是最穷最苦的地区。王嘉胤始仅是抢掠富室，后迫于朝廷压力，走投无路，才啸聚为乱。

王嘉胤闯出名声之后，王二便率他的那伙人往北流徙，与王嘉胤会合，聚集在延庆的黄龙山，与官军对抗除王二、王嘉胤之外，陕西各地的饥民也纷纷动手，形成了几股重要的力量。在崇祯元年（1628），陕西境内主要有这样几股力量：

汉南王大梁，阶州周大旺，宜川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苗美，安塞高迎祥，洛川黑煞神，延川王和尚、混天王，庆阳韩朝宰等等。

到了崇祯二年（1629），情形就更严重了。此时的陕西，不仅乱

民的数量和活动区域大大增加，而且乱民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用当时的话讲，就是“陕西饥，流贼大起”。据当时地方官员的报告，除上述澄城、府谷、西安、榆林、延安诸地外，洛川、淳化、略阳、清水、成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耀、静宁、安化、固原、宁羌、延川、米脂、青涧、安定等地都遭到变民劫掠。像鄜、延、宜、雒等地，更是变民往来聚集的渊薮。甚至已有陕西的“流贼”出境活动。

从乱人员的结构也日趋复杂。原先参加动乱的，绝大多数是当地的饥民，即“土寇”，作战能力不是很强。至此，则有不少新生力量加入进来了。当时有人分析，从乱之人主要为“土贼”、“边贼”、“回贼”、“矿贼”和饥民。也有人认为，“流贼”主要由叛卒、逃卒、驿卒、饥民、难民、响马等类组成。总之，参加民变的人员已不再是纯粹的饥民了。

由于新生力量的加入，这些原本不起眼的“流寇”实力大增。尤其是那些边军，原本是朝廷的官军，都是些职业军人，武器、马匹齐备，战斗力很强。不少“流贼”的首领，都是边兵出身。他们具有战斗经验，熟悉地理形势，性格强悍豪放，很有号召力。

陕西的动乱如火如荼，终于震动了京师。崇祯皇帝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

在饥民纷纷起事之初，陕西的地方大吏，如陕西巡抚胡廷宴、延绥总兵岳和声等，都是持敷衍应付的态度。像胡廷宴，能力有限，年岁已老，很不愿意听到下属呈报那些打打杀杀的事情。他说，这只不过是饥民闹事，待明年春后粮食续上以后自然就会平息。没想到动乱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是愈演愈烈。

崇祯二年（1629），陕西频频告急，朝廷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于是，崇祯帝命廷推一位总督陕西全省事务的大员，来处理陕西的危急局面。结果左副都御史杨鹤被推举担此重任。

这位杨鹤，是湖南武陵（今常德）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进士，至崇祯元年（1628）才被提拔为左副都御史。他看到时局危

急，便上疏说他那一套图治之言，主张休兵养民，培养元气，说得头头是道。他这么一出头，正巧赶上了好时候。当时三边总督武之望已死，陕西民变正炽，朝廷上下视之畏途，没有人肯去揽这档子事。既然杨鹤有图治之策，大家便一致推荐他去陕西。

杨鹤其实是一个“素有清望，然不知兵”的典型文官，哪里懂什么军事！但正是这样一位不懂武略的文臣，却被委以重任。崇祯帝特意召见他，问他此番前往，有何方略。杨鹤只是回答：

“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

意思是自己做清官，同时抚恤边军，并没有什么新意。崇祯帝命他出任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全权处理陕西军务。同时罢免胡廷宴、岳和声的巡抚之职，任命刘广生为陕西巡抚，张梦鲸为延绥巡抚，协助总督杨鹤。

起用杨鹤，说明崇祯帝当时仍对陕西的局势很有信心，认为这群饥民，只要略加抚劝，再予之恩惠，就会平息下来。而且，当时的崇祯帝也别无他法，辽东的战事，已弄得他焦头烂额，他不仅无银无兵去增援陕西，甚至还想从陕西抽调边兵来对付后金。因此，他除了能给杨鹤浩荡皇恩外，实在也拿不出别的什么来。

杨鹤匆匆赶赴陕西，梦想立下奇功。但陕西的局势，实际上已很难扭转了。

杨鹤的具体办法，一是招抚，二是救济。通过抚赈，使这些从乱的流民重新返回家乡，安定下来。用他的话说，就是：

朝廷大兵大疫，公私交罄，加派频繁，百姓小民元气大伤。辽东黔蜀的兵事，丧师失律，暴骨成丘，封疆之元气大伤。缙绅结党争权，彼此倾轧，而逆阉乘机诛杀君子善类，士大夫之元气大伤。就像重病初起，百脉尚没有调和，风邪易入，急当培养。

他还对崇祯帝的许多做法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具体的建议。他说：

陛下事事励精，临轩面质。但阁臣大吏，未必事事都知，有问必答；而六部诸臣，也未必能事事皆做，有求必应。这样一来，陛下却

又要发怒生气。因此，臣以为这些做法过分了。现今一切民生国计，吏治边防，应该参照祖宗的成法，委任责成。宽严相济，图之以渐，镇之以静，何虑天下能不太平？

杨鹤的意思，就是朝廷经过这么多的折腾，已是元气大伤，犹如一个久病初愈的人，应慢慢恢复元气，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过于折腾。一句话，就是要崇祯帝不能急躁，慢慢理顺关系。

乍听起来，话说得有些道理。但真要做起来，就不会这么轻巧了。

杨鹤赴任陕西后，便想用招抚和救济相结合的手法来对付农民军。在总督陕西三边任内，杨鹤致力于招抚，而不太愿意动武。用他的话说，就是：粮饷用之于剿，就一去不返，况且杀人太多，也伤和气。还不如用之于抚，救活一人就是得一条性命。盗息民安，功德无量。杨鹤及其部下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先后用招抚的办法，招降了十余支农民军。具体情况如下：

王子顺、张圣述、姬三儿因战败而在延川向延安知府张辇、都司艾穆投降。

王左挂率二百余人在米脂、清涧向总兵杜文焕投降。

苗登云、苗登雾在铁叶岭向总兵杜文焕投降。

小红狼、一丈青、龙江永、掠地虎、郝小泉等在延绥一带向总督杨鹤、巡抚刘广生投降。

王嘉胤在靖边向洪承畴、杜文焕投降。

田近庵、独行狼、上天龙等投降杨鹤。

拓先龄向榆林道张福臻投降。

金翅鹏、过天星向张福臻投降。

独头虎率数千人向雒川知县刘三顾投降。

刘道海、白柳溪率数千人在庆阳接受朝廷的招抚。

点灯子率五千余人在清涧投降官军。

神一魁、孙继业、茹成名率头目六十余、兵卒四千余人，在宁州接受杨鹤招抚。

施冷庵在庆阳接受招安。

两支义军分别在宜雒、延长向陕西巡抚练国事、御史吴甡求抚。

满天星、不沾泥、云交月、间山虎、陈龙等率万余人分别在西川、榆林等地向洪承畴、张应昌、王承恩、侯拱极投降。

点灯子部卒七百余人在稷山向曹文诏投降。

闯王虎、金翅鹏在宜川向王承恩投降。

草上飞在宜君、同官败降。

赵四儿率万人在鄜州一带投降张全昌。

张献忠率两千余人投降洪承畴。

饥民、边兵近一万五千人在庆阳向杨鹤投降。

混天猴等率千余人在甘泉向洪承畴投降。

上天龙、马老虎、独行狼率两千余人在鄜州向杨鹤、洪承畴投降。

郝临庵、刘六向庆阳道周自强投降。

上天猴、混天猴、曹操、飞虎、李仁友率两千人在宜川向杨鹤投降。

谭雄在安塞乞抚。

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在延安等地向洪承畴投降。

从杨鹤等人招抚的记录来看，几乎所有的义军首领都曾向朝廷投降过，或接受过招抚。而且被招抚的人数也不算少。那么，陕西的乱民怎么会越抚越多呢？

应该承认，杨鹤在陕西的招抚工作做得相当卖力。平心而论，杨

鹤也算得上一个既有责任心又有同情心的不错的官员。他的工作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他本人曾先后两次成功地招降了大批义军。

第一次在崇祯三年（1630）六月前后，杨鹤在承受王嘉胤攻掠延安、庆阳的巨大压力之下，隐匿军情，坚决招抚，成功地让王左挂及其部众小红狼等投降朝廷。杨鹤给他们免死牌，把他们安置在河曲、延绥一带。

第二次是在崇祯四年（1631）四月，杨鹤在取得朝廷同意后，成功招抚了当时打得最凶的义军之一神一魁（其兄神一元此时已战死）。这次行动，不仅化解了庆阳之围，而且还一度扭转了陕西等地的不利局势，招降了一大批义军首领，并斩杀了王嘉胤。

也正是因为如此，崇祯帝及一批朝廷官员也曾支持杨鹤的招抚政策。像新任陕西巡抚练国事、职方郎中李继贞等都曾在崇祯四年（1631）上书朝廷，要求招抚。崇祯帝也于此年的正月，利用在文华殿召对内阁、九卿、科道及入觐两司官的机会，特意面召山西按察使杜乔林和陕西参政刘嘉遇，询问山西、陕西的剿抚详情。杜乔林说：

山西河曲王嘉胤部气势凶炽，官军打得很不顺手，现在前线兵力不足，而且严重缺饷，非大量增兵加饷不可。

杜乔林说的是实话，当时王嘉胤部在河曲打得很凶。崇祯帝转而又问刘嘉遇。刘嘉遇说得很悲观。他说：

兵饷不足，因此难以剿灭。而且贼寇见官兵实力不足，更是散后复聚，降后复叛。

刘嘉遇的意思，仍是要朝廷增兵加饷，以武力剿灭，言外之意则是不太赞成招抚。崇祯帝听后，有点不以为然，便说：

“寇亦我赤子，宜抚之。”

崇祯帝之意，就是说这些叛贼也是我大明朝的赤子臣民，应该招抚，不要赶尽杀绝。既然皇帝也这么说，刘嘉遇赶紧改口附和道：

现在用的正是招抚之策！

崇祯帝接着便派御史吴甡带帑银十万两前往陕西赈济。而且在杨鹤上书请求招抚神一魁时，他也明确答复道：

“剿逆抚顺，谕旨屡颁。”

“杨鹤相机招安，允协朕意。”

不幸的是，崇祯帝后来在严办杨鹤招抚失职之罪时，似乎忘记了他自己曾说过这些话。

就在杨鹤庆幸自己成功招抚神一魁、斩杀王嘉胤之时，形势发生了逆转。崇祯四年（1631）七月，神一魁在其部众的挟持下，降而复叛，重操旧业。王嘉胤的旧部也没有因王嘉胤的战死而溃散，而是在新首领王自用（紫金梁）的领导下，在山西重振旗鼓。至此，山西“三十六营”群哄而起，如闯王高迎祥、老回回（马守应）、曹操（罗汝才）、八大王张献忠、过天星（惠登相）、扫地王、整齐王、闯将李自成、蝎子块（拓养坤）、邢红狼、闯塌天（刘国能）、射塌天（李万庆）、阎正虎、一字王、乱世王、混世王等首领，拥兵二十万，与杨鹤作对。一度好转的晋陕形势此时又是急转直下，一塌糊涂。

杨鹤顶不住了。

他给朝廷上了一份名为《微臣万苦堪怜事》的奏疏，哀叹自己已是“焦头烂额”，“贼平无日”。

对杨鹤招抚政策早已不满的朝廷官员，揣摩到崇祯帝此时的心理变化，纷纷上书指责杨鹤。有位叫谢三宾的御史，最为刻薄。他上疏朝廷，提出了几个令杨鹤非常难堪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

既然杨鹤说庆阳抚局（指招抚神一魁部）已成，降贼遣散俱尽，为何李老柴、独行狼攻陷中部？难道他们是从天而降的吗？

谢御史的这番话打动了崇祯帝。他立即命当时在陕西的巡抚御史吴甡汇报前线情形。这位不久前还带着崇祯帝所给的十万白银前往山西赈济，以协助杨鹤招抚的吴甡，此时却一口咬定杨鹤主抚误国，并说：

为今之计，只有调兵措饷，南北会剿，歼灭贼首，招抚余众，秦地才有可救的余地。

崇祯帝接到吴甡的奏疏后，便立即下令逮捕杨鹤，翻脸不认旧账。他说：

“杨鹤总制全陕，何等事权，乃听流寇披猖，不行扑灭，涂炭生灵，大负委任，着革了职，锦衣卫着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员缺推堪任的来用。练国事姑着降三级，戴罪剿贼自赎。如仍玩纵，定行重治不宥。”

可怜的杨鹤，此时竟然还口口声声说，他是奉诏招抚，而且也是剿抚并用，有功无罪。他没想到此时提这些旧账，实在是揭了崇祯帝的短，让当时自我感觉良好的崇祯帝下不了台。第二年，崇祯帝竟下令将杨鹤谪戍袁州。要不是崇祯帝当时要用他的儿子杨嗣昌，杨鹤可能连命都保不住！即使后来杨嗣昌成了朝廷的主要大将之一，并言辞卑恭地恳求崇祯帝宽恕他的父亲时，崇祯帝却仍耿耿于怀，不愿给杨嗣昌这个人情，可见崇祯帝对杨鹤的成见有多深。

有意思的是，这位杨鹤，在魏忠贤掌权时，就因为祸从口出而被削职，此次复出后又因触到了崇祯帝的痛处，被加重了处罚。足见这位湖南籍的书呆子确是本性难改，在官场上混了多少年后仍不明白这样的简单道理，即无论是魏忠贤，还是崇祯帝，都不愿意听不顺耳的话。

其实，杨鹤真是有点冤枉。从杨鹤的下场及招抚的失败，不难看出当时朝廷存在的种种问题。招抚的失败，并不能完全怪罪杨鹤一人。

招抚的失败，首先是因为杨鹤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招抚叛民，说穿了就是要有足够的钱。陕西的叛乱，开始时主要是经济原因，老百姓是因为天灾人祸，无以为生，才铤而走险的。朝廷现在要他们放下武器，重做良民，就须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

但崇祯帝及其朝廷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崇祯二年（1629），崇祯帝开恩，令陕西巡抚刘广生留杂项辽饷银一万四千

两，就地赈济。区区万余两银子，自然不足开销，因此刘广生要求增加款项，而崇祯帝却不肯再拿出钱来了。到了崇祯四年（1631），崇祯帝破天荒拿出了他自己的内库银十万两，令吴甡赴陕西延长赈济。当时延长县城正被乱民围困着，不过当同知赵鹤宣布朝廷放赈的消息后，城围立解，乱民们都拿着赈金回家去了。当时米脂县参加造反的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但听到朝廷赈济的消息后，也纷纷返乡，等着朝廷来赈济。这样的情形，在邻县也曾出现过。

难堪的是，朝廷不愿意也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救济。吴甡的十万两白银，远远不够。当时陕西的米价是七钱白银一斗，如每人分得一两，则最多可支撑五十天。即使十万两白银全都到了百姓手中，至多也只能支撑十万百姓五十天的生活。而当时陕西的情形，已惨到了十室九空人相食的地步，十万白银只能是杯水车薪。吴甡在延绥十九县间散掉十万白银后，发觉就像在一池水中放了一撮盐，起不到多大作用。

即使是那些已经投降的乱民，朝廷也无足够的资金来安置他们，保证他们不再次叛乱。被招抚的人员，随抚随叛，越抚越多。杨鹤多次请求朝廷增加赈济的力度，安顿好这些灾民乱民，而朝廷却无力做到。就连近在咫尺的秦中地区，甚至也不愿安顿流民，恐引狼人室，更勿论其他地方了。当时真正忧国忧民者，为数不多，没有多少人有长远目光，能通盘考虑陕北的问题。多数人认为，陕北的动乱，只是陕北的事，跟自己关系不大。没想到，陕北的乱民，后来演变成强大的农民武装，杀出秦界，殃及了大半个帝国。

如果在陕北刚开始动乱时，帝国上下能齐心协力、全力以赴的话，事情决不至于弄到后来的那种地步，付出的代价或牺牲的利益也决不会这么大。遗憾的是，当初能这样想的人又有几个呢？

杨鹤抚秦的失败，另一个原因是没有足够的兵力。要保证招抚政策的顺利实行，必须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作保证，一来起弹压威慑作用，二来也能在招抚无效时用武力解决那些铁了心造反的骨干分子。可是，杨鹤作为三边总督，手上却没有足够的军队。

尽管杨鹤力主招抚，但也深知军队的重要。面对风起云涌的遍地

义军，手中无像样军队的杨鹤深感不便。崇祯三年（1630），当王左挂、苗美率部攻打韩城时，杨鹤竟无将可点，无兵可调，只得命当时任参政的洪承畴率领临时凑起来的部队匆匆上阵，勉强解围。在此以后，杨鹤几次上书崇祯帝，要求把当时调赴京师守卫的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诸镇边兵重新调回，还镇西北。当时崇祯帝正被后金的入侵搞得焦头烂额，哪里肯把西北的部队放回去。杨鹤无奈之下，只得再请崇祯帝起用前总兵杜文焕，督延绥、固原的三千官兵。这次崇祯帝倒同意了，但仍没有改变陕西粮饷不足、兵力过弱的局面。

抚则缺银少粮，剿则无兵无饷，杨鹤两手空空，能干些什么呢？

杨鹤抚秦的失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官僚体系内部的不一致甚至是不团结。在朝廷中，本就存在主剿和主抚两派，难以统一。甚至连崇祯帝本人，也是摇摆不定。在晋陕前线，同样也存在主剿主抚两派，具体操作不能一致，严重影响了整体局势。

如与陕西相邻的山西当局，在对待农民军的手段上，就与主持陕西的杨鹤有很大不同，更多的是采取讨伐政策。

山西与陕西有一千多里的相邻地带，中间仅有一线黄河相隔。两省的许多情况都很相似。陕西的动乱，很快也影响到了山西。山西北部的大同，属“九边”之一，驻扎着部队。因长期缺饷，这些部队就成了不安分的饥兵。崇祯二年（1629），山西巡抚耿如杞率山西兵马赶赴京师勤王，因粮饷不足，驻地频换，部队发生哗变，纷纷逃回山西。这批溃卒后来成为山西动乱的主要成分之一。

但真正把山西搅乱的还是从陕西来的农民军。崇祯三年（1630）春天，陕西的农民军由于种种原因，开始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此年的三、四月间，老回回马守应、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等部渡过黄河，分兵两路进入山西西北部。十月，攻占了山西省西北部的重镇河曲，控制了黄河渡口。除此以外，陕西农民暴动的另外几支主力如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亦先后率部进入山西。他们与山西的义军会合一处，声势浩大。当时就有人说：

“开始时为寇山西的，多为陕西人。现在作乱山西的，则一半是山西人了。乱起之初的二、三月间，响应的山西人不过十之一，六、七月间，从贼之人十之二三，至今冬，从贼而起者十之五六矣。”

对于山西之乱，地方当局主张以武力压服。当陕西之众杀入山西时，山西巡抚仙克谨立即移镇汾州，指挥阻击。刚从陕西宽松抚局中逸出来的王子顺等，对强硬的仙克谨恨之入骨，并用重贿买通山西人氏，刺杀仙克谨，仙克谨身受重伤。此后接任的巡抚，也都力主剿杀，并与陕西主战派合作除掉了王嘉胤。

不仅山西的做法与杨鹤在陕西的抚局不一致，即使是杨鹤的手下，也有不执行杨鹤政策而暗中主杀的。如杨鹤起用的前宁夏总兵杜文焕，曾在宁夏以凶悍好斗而闻名，心狠手辣，因此他在剿抚问题上，与杨鹤就有很大分歧。他接手后，力主武力解决。他曾以提督身份率兵猛攻河曲的王嘉胤，试图一举歼灭。没想到另一支农民军神一元攻陷宁塞，杀掉了杜文焕一家多口，以报复杜文焕。杜文焕这才解河曲之围，率兵匆匆赶往宁塞。

杨鹤的另一位手下大将洪承畴，在剿抚问题上与杨鹤也不一致。这位原为参政的洪承畴，几次杀降，毒辣之至。崇祯四年（1631）四月，巡抚洪承畴令守备贺人龙等设酒宴犒劳降卒，等降卒入室时伏兵四起，杀掉了三百余人。这种举措，洪承畴后来还重复了几次。

当然，当时杀降的并不是洪承畴一人，还有不少其他的将领也做过这种丑恶之事。如崇祯三年（1630），巡按御史李应期在绥德杀掉了已经投降的义军领袖苗美、左挂子（即王左挂）。崇祯四年（1631），还是这位李应期，又在榆林杀害了已经接受招抚的义军首领王子顺等。

作为朝廷的命官武将，竟干出杀俘这样背信弃义的缺德事，使朝廷的信誉一落千丈。吃了苦头的农民军，生怕再上朝廷的当，不再肯接受招抚了。对于这种做法，不少人曾提出过不同看法。如费密就说过：

“诸路叛贼虽是奸人思乱，但开始时也是为饥荒所迫，势急思

逞。其中希望朝廷招抚返乡的也占十之八九。后陕西总督某（指洪承畴）招抚数千人，某日遣降卒樵采，去其弓矢，发兵数千人围杀。降卒见状，纷纷拔木举石，奋起反抗，突围而出。从此以后，民军绝了投降之心。”

费密之言，很有道理，只是把杀降的责任归在洪承畴一人身上了。

顺便讲一句，最终导致杨鹤下台的神一魁的降而复叛，也是因为杀降。神一魁投降后，杨鹤等令神一魁于耀州诱杀另一支义军首领、当时已降的茹成名，从而引起了神一魁部下的猜疑，最终挟持神一魁重新反叛。

由于上述各种各样的因素，杨鹤的主抚政策最终失败。他自己也落得个悲惨下场。朝廷上下几乎没有人为他辩解开脱。倒是他的老部下洪承畴，还不忘旧情，替他上了一疏，说当时主抚，也是“时势不得不然”，要皇帝抬手放他一马。不过崇祯帝此时根本听不进了。

山西征剿失败

既然杨鹤的招抚政策已彻底失败，那么崇祯帝便依照其一贯作风，在拿杨鹤作了替罪羊之后，另找出路了。

崇祯帝在崇祯四年（1631）十月正式任命洪承畴为陕西三边总督，以武力剿灭义军。此时，崇祯帝对陕晋的义军已是恨之入骨，希望洪承畴把他们迅速赶尽杀绝，以使朝廷全力对付后金的威胁。洪承畴忠实地执行了崇祯帝的策略。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万历丙辰科（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他二十三岁就督学浙江，后被提拔为陕西参政，是一位年少老成、有谋有略的能干之才。

洪承畴在陕西出名是在崇祯三年（1630）。当时，王左挂、苗美

等率兵分列五营，南下进攻韩城，总督杨鹤手下无将，情急之下，令当时尚是参政的洪承畴率兵进援，斩杀叛兵三百余人，解了韩城之围，洪承畴一下子出了大名。从此以后，他开始率兵打仗。由于他有谋有略，而且长期在陕西为官，熟悉陕西情形，所以他的部队在陕西打得不错，并赢得了不少声名。

就在此年的六月前后，因原延绥巡抚张梦鲸被义军的凶猛之势惊吓而死，洪承畴一跃而升任延绥巡抚，成为地方大员。从此以后，洪承畴更是卖力，而且心狠手辣，胆大心细，做事利索。到了崇祯四年（1631）十月，已深得崇祯帝信任的洪承畴，在杨鹤被捕以后，便顺理成章地代替杨鹤，升为陕西三边总督。

升任总督后的洪承畴，忠实地执行崇祯帝的政策，加紧了对陕西义军的残酷围剿，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攻势，几乎是连战皆捷。陕西的形势开始好转。崇祯帝开始尝到剿的甜头，全力支持洪承畴。

崇祯五年（1632）春，洪承畴留饷二十万，遣甘肃总兵杨嘉谟、固原总兵杨麟、临洮总兵曹文诏、延绥总兵王承恩、宁夏总兵贺虎臣等，各率其部，大举进剿陕西义军。洪承畴首选的攻击目标是“宁塞遗贼”。他们本都是神一魁的部众，是当时陕西境内最大的一股义军，首领是红军友、李都司、杜三等。他们与环庆的民变首领郝临庵、刘六合兵，屯驻在镇原（今甘肃镇原），兵势很盛。

在官兵的强大压力下，镇原的义军顶不下去了，便退守东西川、铁角城、芦堡垒等地，利用险要地势拼死抵抗，并威胁庆阳，寻机突围，试图杀入平凉府，借道突入凤翔府。

陕西巡抚练国事，急令固原（今甘肃固原）兵备王镇奇守住各隘口，令平凉府守备徐如翰守住泾州（今甘肃泾州）各关口，防止义军外逸。

同时，总督洪承畴立即从鄜州（今陕西富县）赴庆阳，指挥会战。当时，曹文诏率临洮兵，贺虎臣率宁夏兵也赶赴增援。双方在镇原之北的西澳展开激战，前后数十次。义军吃了大亏，首领杜三、杨老柴被斩杀，兵卒被杀数千人。战役以官军全胜而结束，朝廷称之

为“西澳大捷”。

西澳大捷后，洪承畴等率兵乘胜进击。不久，洪承畴设伏斩杀不沾泥。曹文诏则设反间计除掉红军友，后于环庆击败可天飞、李都司，于耀州击败郝临庵等。

在洪承畴的强大攻势下，“宁塞之众”基本上被打下去了。至崇祯六年（1633），延绥巡抚陈奇瑜继续分遣诸将，搜剿余众，至此年底，陕西的局势基本上被稳住了。

但陕西局势的好转，并没有让崇祯帝及其朝廷松一口气，因为山西的问题已越来越严重了。

山西的动乱，虽有本身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因为陕西的影响。崇祯三年（1630）春，陕西的义军如老回回马守应、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等部，分兵两路杀入山西北部。其后，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也纷纷渡河，进入山西。同时，入援京师的陕西五镇兵马，临阵哗变，纷纷逃回山西等地从乱入伙。山西的局势一下子严峻起来了。

当时山西境内的义军，主要分成两路。一路以西南部的平阳（今山西临汾）为中心，一路以府谷（今府谷，在陕晋交界处）为中心。尤其是王嘉胤部，以府谷、河曲为据点，分兵转战各地，西南攻至延安、庆阳，并杀入山西焚掠，声势浩大。这股义军人数增至三万余人，将领百人，并设有左丞、右丞等官职，下辖自号闯王的高迎祥等一大批干将。

山西当局对于这些“乱民”的态度很坚决，就是武力剿灭。至崇祯四年（1631）四月，当时尚是副总兵的朝廷悍将曹文诏等，利用杨鹤大肆招降各路义军的有利时机，率重兵围攻驻守在河曲一带的王嘉胤部。

曹文诏用重兵围困河曲，断绝其粮饷供应之道。王嘉胤缺粮之下，突围而出，向南冲杀。曹文诏一路紧追，再败之于阳城（今阳城）。此年六月，王嘉胤被部将王国忠所杀。

当时的形势似乎对朝廷很有利。在陕西方面，杨鹤招抚了神一

魁；在山西方面，曹文诏等解决了王嘉胤，因此杨鹤曾很高兴地给朝廷上书，说神一魁、王嘉胤两人已除，其他的小首领不过尔尔，消灭他们指日可待。没想到陕西神一魁降而复叛，山西的义军也没有因王嘉胤之死而彻底垮掉。他们经一度低潮之后，又重新集结起来，大搅山西。

王嘉胤死后，其部众并未溃散，而是重新选举左丞紫金梁（王自用）为首领，重树旗帜。王自用与各路首领深感相互联络的重要性，于是各部众共推王自用为首领，会合闯王高迎祥、扫地王、邢红狼、八大王张献忠、黑煞神、曹操罗汝才、乱世王、闯将李自成、闯塌天刘国能、满天星、老回回马守应、李晋王、党家、八金刚、混天王、蝎子块、点灯子赵胜、不沾泥张存孟、张妙手、白九儿、一阵风、七郎、大天王、九条龙、四天王、上天猴刘九思、丫头子、齐天王、映山红、摧山虎、冲天柱、油里滑、革里眼贺一龙等部，统称“三十六营”，约有二十余万。在陕西之乱被平后，“三十六营”成了反叛朝廷的主力。

山西的战火越打越烈，范围也越来越大。高迎祥、罗汝才（曹操）、张献忠等分道四出，连陷大宁、泽州、寿阳诸州县，全晋震动。朝廷急命宣大总督张宗衡移镇平阳，巡抚许鼎臣驻汾州，分路守扼防御。并派李卑、贺人龙、艾万年等率关中兵赴山西入援。许鼎臣把此三将调至手下，但张宗衡又以总督的身份，传檄三将由他本人指挥，弄得三将无所适从。义军乘机占据临县之东的磨盘山（一名连枝山），并于崇祯五年（1632）九月前后分兵三路：一路据交城（今交城），窥太原，一路据吴甡城（今孝义境内），窥汾州，一路突入沁州（今沁县），陷武乡（今武乡稍东）、辽州（今左权）等，形势相当危急。

崇祯帝急忙采取应急措施，调兵遣将，对付山西的危局。

昌平镇左良玉被急调赴河南堵截。左良玉原系辽东名将，虽大字不识一个，但打仗骁勇。此次因李自成等部从晋城之南突入河南，攻克修武，河南乡绅情急之下，联名上疏朝廷请救。朝廷便急调左良玉率兵两千余人赶赴怀庆堵截。李自成、八金刚、过天星等后来虽重新

杀回山西武乡，不久攻克辽州，而左良玉却留在了河南，负责河南的防务。

崇祯六年（1633）春正月，曹文诏被赋予大权。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变动。在此以前，山西的围剿，各自为政，总督、巡抚及各将领之间矛盾重重，无重臣节制。至此，曹文诏出任山西方面的前线总指挥，负责节制山西、陕西诸路兵马。

曹文诏绝非等闲人物，他是当时陕、晋前线最能干的将领之一。他是山西大同人，年轻时从军辽东，曾在熊廷弼、孙承宗手下做过军士。后由袁崇焕提拔，在祖大寿手下任游击。袁崇焕被逮后，曹文诏也随祖大寿叛逃，后投总兵马世龙，升参将。辗转回山西围剿农民军后，因功升副总兵、总兵。他在镇压陕西义军的过程中，屡建奇功，所以当时有一民谣说：“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由此可见他的威望。事实证明，他山镇山西后，山西的情况有了明显的改观。

崇祯帝还特谕山西各地，要求支持曹文诏等部。当得知山西有的地方官不与曹文诏合作时，他严旨责成御史弹劾纠察，重重处罚。此年五月，崇祯帝还命太监陈大全、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等出任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等四支劲旅的监军，其职掌是记功过、催粮饷。为此，崇祯帝还发内帑四万两，素红蟒缎四千匹，红素千匹，让这四位太监于军前给赏，以示支持。

曹文诏与部将马科、曹变蛟等人一道，率领“逐一挑选、屡经战阵”的马步兵三千五百人，由庆阳出发，经潼关渡黄河，前往山西蒲州、河津，再向山西腹地深入，参加围剿。

曹文诏部，是所有参加围剿的官军中打得最好的一支。

曹文诏在河津经短暂休整后，开赴霍州（今山西霍县）。在霍州与农民军万余人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曹文诏率领的陕西兵骁勇善战，击杀农民军首领钻天鹞、上天龙。农民军溃逸。

曹文诏旋即挥师北上，在太原之北展开攻击。先败农民军于盂县（今盂县），追击途中，在寿阳（今寿阳）之东北的方山，再次大败农民军，斩杀其首领混世王，其余部为游击猛如虎逐走。

至此，太原之北的五台（今五台）、定襄（今定襄）、寿阳等地的农民军基本被曹文诏肃清。

为保卫太原，山西巡抚命曹文诏移兵平定州（今平定），备太原之东。总兵张应昌驻兵汾州（今汾城），备太原之西。贺人龙部为游兵，以备策应。

曹文诏便以平定为据点，不断出击，连败农民军于乐平（今昔阳）、和顺（今和顺）、太谷（今太谷）、范村（太谷之东一重镇）、榆社（今榆社），把在太原附近活动的王自用（紫金梁）、马守应（老回回）部逐走。

曹文诏部继续南下，追击农民军，连败农民军于高平（今高平）、泽州（今晋城）、润城（介于泽州与阳城之间）、沁水（今沁水）、阳城（今阳城），猛击过天星、紫金梁、老回回等部。

四月底，“三十六营”领袖紫金梁王自用在河南济源（今河南济源）病死。原本松散的农民军更陷入各自为战的分散局面，给朝廷的围剿提供了有利时机。

曹文诏为解豫北之困境，率部进入河南境内的涉县（今河南涉县）山区，围剿涌人此地的农民军。然后攻击河南境内的怀庆（今沁阳）、济源（今济源），斩杀农民军首领滚地龙等。此时，诸将李卑、艾万年、汤九州、邓玘及左良玉等，也纷纷率部合击，战场形势一度有利。

但到了此年的八月，却传来了曹文诏调离前线、赴大同任总兵的消息。前线官军一片哗然。

曹文诏这位骁勇善战的良将，没有败给农民军，却中了自己人的暗箭。当前线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被调离了前线。

当时，有位叫刘令誉的巡抚御史，上疏朝廷，以作战不力、不援友军、骄横恣睢、虚报战况等罪名弹劾曹文诏。曹文诏与这位御史结怨，是在山西洪洞。当时曹文诏与乡居的刘令誉没有处好关系。至此，刘令誉巡视河南，曹文诏与他再次相见，仍是话不投机。刘令誉便伺机发难。

按理说，曹文诏在陕西、尤其在山西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他率部赴山西作战后，也几乎没有打过败仗。虽说偶尔也有夸大战功的嫌疑，但曹文诏连战连捷也是事实。遗憾的是，朝廷给他的结论却是“怙势而骄”，他竟然被调往大同。

导致曹文诏被调离的直接原因，仍是崇祯帝本人。崇祯帝做事，一向小事精明，大事糊涂，而且性格褊狭猜忌。那些言官、御史等，大都善于揣摩崇祯帝的心理，顺着他的思路办事，所以这些人提出的弹劾，往往正中崇祯帝的下怀，言无不果。

说起来，曹文诏真是一位难得的将才。他不仅能征善战，而且颇能顾全大局。在陕西打仗时，他屡建战功，却总是被洪承畴压住不报，吃了不少暗亏。御史吴甡很为他抱不平。即使如此，曹文诏仍兢兢业业打仗，没有意气用事。

陕西的平剿告一段落后，曹文诏又被派往山西，参加山西的围剿行动。这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但曹文诏还是立即率兵进入山西，打了近八个月的漂亮仗，扭转了山西的局势。没想到刘令誉的一个奏疏，便让崇祯帝立即改变了看法，竟把这员大将调离了战场。

更倒霉的是，曹文诏赴任大同不久，便遇皇太极率兵犯边。曹文诏没有敌住后金兵的锐利攻势，丢失了大同附近的城池，被崇祯帝问罪，要撤职充军。多亏山西巡抚吴甡力保，崇祯帝才勉强同意让他戴罪立功自赎。至崇祯八年（1635），曹文诏战死，落得个悲惨下场。

或许正是曹文诏在山西用兵太狠太猛，造成了农民军纷纷避其锋芒，逸出山西，窜入了豫北、畿南。

早在崇祯五年（1632）底，就有部分农民军在李自成、八金刚、过天星等人率领下，进入河南的怀庆、修武地区，再由此地杀人山西境内的武乡，并攻陷辽州，有力地支援了其他义军。这是义军首次利用山西、河南交界地区流动作战的成功例子。也正是为了对付河南境内的义军，左良玉才被调赴河南。

到了崇祯六年（1633），农民军为了摆脱山西境内的重兵围剿，纷纷开始转移到山西、豫北、京畿南部的交界地带。

有一部分农民军，因受曹文诏兵锋压迫，从山西平定州东北的固关（故关）附近的磨口山，突破京畿井陉道寇从化的防线，进入京畿南部的顺德（今河北邢台）、真定（今河北正定）两府境内，引起朝廷恐慌。给事中孟国祚对此十分担忧：

“畿南为咽喉重地，顺德则是太平原，可以千里直走京师，没有河山之险可作屏障。现在山西有曹文诏、张应昌，河南有左良玉、邓玘，都有重兵，那么贼将去哪里呢？以往是从陕西赶到山西、从山西赶到河南，现在又转而赶到顺德了！”

为防止畿南之农民军威胁京师，朝廷急派通州兵两千、昌平兵两千，会同保定总兵梁甫部八千，配合大名兵备副使卢象升布防，与山西方面会同夹剿。

卢象升率兵力战，农民军受挫后，自邢台（顺德府治所在地）西撤，越过河南武安（今武安）西北的摩天岭（此地也与山西辽州接壤），进入武安境内，与驻扎此地的农民军合兵。

此时的豫北已是连片烽火。

崇祯六年（1633）初，山西东南部的农民军分两路杀入豫北。一路南下突破仰原关，杀入怀庆府（府治河内，今沁阳）境内的济源县、清化镇（属沁阳县，今名博爱）、武安等地，一度围攻怀庆府城。另一路则向东杀入河南的林县（今林县）、涉县（今涉县）境内。河南守将左良玉连忙招架。

在涉县之西，左良玉击退农民军。

林县的农民军，因有饥民响应，声势很大，一度围攻邻县临漳（今临漳）、淇县（今淇县）。但最终也被左良玉击败。

济源的农民军，当时正在围攻怀庆府城之北的水西关，为紫金梁祝寿。左良玉匆匆率兵从彰德府（府治安阳）赶来解围，击退农民军。

出乎意料的是，左良玉不久却在武安境内被农民军杀得大败，手下的七千河南兵几乎被打得一早二净。豫北四府烽火遍地，形势陡然

严峻起来。

崇祯帝急令总兵邓玘率川兵二千，加上土司马凤仪之兵，进入豫北参战。曹文诏也一度从山西进入豫北的涉县助战。

由于开始时农民军主要在山西活动，河南当局并没有认真备战。像太行山这样的险地，竟都没有派重兵设防，豫北几乎可以说是门户洞开。曹文诏在山西东南部的锐利攻势，使山西境内的农民军大多转移到豫北。五月份，农民军尽至磁州（今磁县），达十余万之多，兵阵长达数十里。

直到此时，崇祯帝才不得不开始重视起豫北来。他派太监赴曹文诏等部监军，并要求曹文诏等自山西支援豫北。

六月，潞王朱常淓自卫辉府（今汲县）上疏告急，要求朝廷重视豫北局势，“早行翦灭，毋轻视贼”，给崇祯帝极大震动。崇祯帝特遣京营总兵倪宠、王朴率卒六千、马五千，昼夜兼程，在八月份终于赶赴豫北。不久，参将汤九州率昌平兵数千也赴豫北参战。

原在山西作战的曹文诏、张应昌等，也率精锐的陕西兵进军豫北参加围剿。卢象升等则在京畿南部设防，攻击逸出之敌。

由于官兵的优势兵力，豫北的农民军开始处于严重的不利境地，被官兵压缩在狭小的豫北地区，连续被动挨打，损失惨重。

至九月份，被围在豫北的一部分农民军，利用险要的山区地形，突围到五台山地区。但不久又杀出五台山，重返豫北。左良玉、汤九州以及倪宠、王朴所率的兵马前后夹击，农民军损失惨重，形势越来越不利，随时有被围歼的危险。

至十一月，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官兵攻势越来越凶，农民军的日子也越来越困难。农民军的首领开始出奇招了。

他们选中了京营总兵王朴。

王朴的家丁有不少是关中人，与农民军算是同乡，其中有些可能还与农民军相识。农民军的领袖便通过重贿拉上了这层关系，并声称愿意接受招安。张妙手、闯塌天、满天飞、邢红狼、闯将李自成等上

书王朴，说：

“我们这些人都是良民，因陕西荒旱，致犯大罪。现在誓死归降，押还故土复业。”

王朴刚从京师调赴豫北不久，没有与这些首领打交道的经验，也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早在陕西就有多次投降的经历，加上拿了他们的钱，于是便与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商量，最后竟同意受降。

十一月十九日，农民军首领贺双全、张妙手等十二人，亲赴河南彰德府武安县城面见王朴、杨进朝、卢九德以及兵备道常道立，表示接受招安的“诚意”。杨进朝信以为真，立即上报朝廷，并停止了军事行动。

当时在武安开报的首领有共有六十一名：

贺双全、新虎、九条龙、闯王（高迎祥）、领兵山、勇将、满天飞、一条龙、一丈青、哄天星（应是混天星）、三只手、一字王、闯将（李自成）、蝎子块、满天星、七条龙、关锁（关索）、八大王、皂莺、张妙手、西营八大王（张献忠）、老张飞、诈手、邢红狼、闯塌天（刘国能）、马鹞子、南营八大王、胡爪、哄世王（应是混世王）、一块云、乱世王、大将军、过天星（惠登相）、二将、猛虎、独虎、老回回（马守应）、高小溪、扫地王、整齐王、五条龙、五阎王、刑闯王、曹操（罗汝才）、稻黍杆、逼上路、四虎、黄龙、大天王、皮里针、张飞、石塌天（射塌天）、薛仁贵、金翅鹏、八金龙、鞋底光、瓦背儿、刘备、钻天鹞、上天龙。

王朴等人哪里知道，农民军首领们使的是金蝉脱壳之计。当诈降在一本正经地进行的同时，农民军正在为渡河突围作准备。十一月二十四日，天气骤冷，山西垣曲至河南济源之间的黄河结冰封冻。农民军乘官军不备，在一个叫毛家寨的地方开始过河。他们用门板覆盖冰面，再盖上泥土，分三路过河。当时驻屯在这一带的十余万农民军，在高迎祥、罗汝才、张献忠、马守应、惠登相、刘国能等人率领下，迅速渡过黄河，南至河南渑池县（今渑池）境内的马蹄窝、野猪鼻等地。

朝廷的防河中军官袁大权仓促战死。

十一月二十六日，天还未亮，农民军就已攻占了渑池县城。

十二月初一日，破伊阳（今汝阳）。

十二月初二日，再破卢氏（今卢氏）。

至此，从山西逸出的农民军，在进入河南后，犹如水银泻地，不可收拾。

十二月初四日，接到河南火速报告的崇祯帝在震怒之余，严令各地进行围堵。崇祯帝怒气冲冲道：

“贼既渡河，豫境邻壤地方，俱宜严防奔突，秦、郧准各抚通着选调将士扼要截剿，豫晋抚监亟督左良玉等合力追击，仍严饬道府州县等官，鼓励乡兵各图堵御。务刻期荡扫，如再疏泄误事，必不轻贷！”

崇祯帝虽十分惊恐震怒，但也没有办法。因为受农民军之骗、并与之议抚的，正是他从北京派去的京营统帅及其监军。当时农民军最看不起的当然也是最喜欢的就是京营。他们仗打得不怎么样，毛病却不少。这次恰恰被农民军所利用！

崇祯帝连自己身边的京营都管不好，还能说些什么呢！

陈奇瑜抚局失败

突破黄河天险而杀入河南的农民军，终于逸出了朝廷军队的重围，进入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当时河南的情形是一团糟，正好给农民军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空间。

河南的灾荒持续了不少时间，百姓的日子也已过不下去。人心思乱，灾民遍地，这为农民军提供了众多兵源。

另外，河南当局当时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黄河以北的豫北四府上，对黄河以南地区的防御根本就没有作周密准备，兵力严重不足。

因此，当农民军突破黄河时，河南负责黄河防守的中军官袁大权根本就没有料到。他也无兵可用，只有战死。

当农民军于几天之内连下河南的渑池、伊阳、卢氏三县时，河南巡抚玄默虽勉强应战，但也只是尾追而已。玄默深知河南的实力根本敌不住人多势众的农民军。像伊阳县城，农民军抵达时，城中无主管官员，城墙颓敝，所以农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杀入城中。再如卢氏县城，也是因为掌印官金如山事先逃跑，不组织抵抗，而让农民军轻易得手。因此，玄默只有火速上报朝廷，要求增援。

好在左良玉迅速过河追击，填补了黄河以南的空虚。到十二月初，汤九州、邓圮、李卑等将领在崇祯帝的严令下，也纷纷过河，参加夹击。

农民军渡河后，真正主动过河迅速追击的将领只有左良玉。左良玉本是为保卫河南而调过来的，农民军进入黄河以南的河南境内，他有责任追击。此时的左良玉还是很卖力的，不像后来那样有些拥兵自保的味道。当然，其他将领所以没有如此反应迅速，也有客观原因，如部分农民军仍留在晋南、豫北而有待收拾等等。

进入河南的义军，分成了几大股。有的留在河南活动，有的则冲出了河南，向邻省挺进。

留在河南境内的农民军，先是向南攻杀，进入南阳、汝州、汝宁三府活动。但不久就被各路官兵各个击破。

汤九州击败了过天星部。过天星部在十二月十九日抵达舞阳县（属南阳府，今舞阳）境内的吴城镇，威逼偃城（今偃城），试图杀入开封府、归德府。被河南巡抚玄默从床上拖起来的总兵汤九州，冒着风雪，连夜率兵偷袭了吴城镇。没有防备的过天星，被汤九州打个措手不及。吃了大亏。过天星乘夜逃窜，汤九州率兵猛追六十里，斩杀四百余人。次日，汤九州又追到汝宁府遂川县（今遂川）境内的横山镇，斩杀六百人。

左良玉则在叶县（属南阳府，今叶县）的保安驿，击败一支义军，擒获头目一条龙、上山虎、展翅飞、小李广等，并乘胜追击，挥兵进入南阳府泌阳（今泌阳）、汝宁府信阳（今信阳）境。

崇祯七年（1634）正月初一日，就连一向不被看重的京营，在刘令誉的督战下，竟然在泌阳的牛蹄村也打了大胜仗，斩首千人。

后来，总兵张应昌部在灵宝、平山打了几仗，把残留在河南的农民军打得大败，其首领张有义（即一盏灯）被俘。

通过这几次大仗，留在河南境内的农民军，除少数逸出外，基本上被朝廷肃清。

与此同时，大量的农民军借道河南，杀入湖广、陕西，甚至四川。

高迎祥等部自卢氏进入山区。卢氏山区，崇山峻岭，天高皇帝远，素来是不法矿徒聚集之地。高迎祥诸部，由矿徒向导，进入内乡（属南阳府，今内乡），并由内乡、邓州（属南阳府，今邓县）、淅川（属南阳府，今淅川）向湖广渗透。

崇祯六年（1633）十二月底，高迎祥等率部扮成香客，杀入湖广郧阳府所属的郧西县城（今郧西），接着又攻破郧西之北的上津。不久，房县（今房县）、保康（今保康）诸县也被攻破。一时间，郧阳府境内，聚集着数万农民军。

郧阳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让官府头痛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开发较晚的大山区，其地形是四望峰峦，大山无边，森林茂密，只有无数庞杂小道、乱流溪水充斥其间，不知尽头。外人进入，如无本地熟悉地形的向导引路，那就根本不分东西南北。对于要躲避官兵的农民军来说，这真是一个玩捉迷藏的好地方。

不仅山区地形有利于农民军，而且郧阳的地理位置也便于四面出击。郧阳之东北，可通河南之淅川、内乡；其西北，则可通陕西之平利、兴安、洵阳、山阳；其西南，则可通四川之大昌等地；其南面，则可通湖广之荆门、远安、夷陵；其东南，也可由汉水直赴襄阳。

明初，朝廷在进行过一次大杀戮后，便把此地变成了禁区。那是在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任命邓愈为征南将军，对郧阳及附近地区用兵长达一年，把该地区不服新朝统治的少数民族及汉族流民几乎杀戮殆尽，并下令禁山，不许附近州县的贫民进山垦荒、移居。

但禁山政策并没有能阻止大量流民的移人。至成化前，人数已多达百万。成化元年（1465），河南人刘通（刘千斤）、石龙（石和尚）率流民在房县造反，朝廷派兵围剿，花了相当代价才镇压下去。由于官兵进山狂捕滥杀，据说十一岁以上的男子皆被斩杀，加上连续旱灾，流民大增，至成化六年（1470），刘千斤的部下河南人李胡子（李原）再次造反。朝廷派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发兵围剿，残酷屠戮。项忠还强制遣还山中流民，被迫害致死者多达数十万。

即使是这样的高压，仍无法阻止流民进山。至成化十二年（1476），在荆襄地区聚集的流民又增到数十万之多。朝廷无奈之下，只得改变策略，把湖广、河南、陕西三省之交的这片山区，单独析出，设置郧阳府，下领七县，归湖广管辖。

至此，农民军深入郧阳山区，真是如鱼得水，如入无人之境。朝廷也深知郧阳山区是麻烦之地。因此，当兵部尚书张凤翼得知农民军已赴南阳境内的内乡、叶县时，就已预感到农民军进入湖广郧阳山区的危险性和可能性了。他于崇祯七年（1634）正月初七日向崇祯帝作了汇报，要求早作准备。

等崇祯帝读到这份报告时，农民军已经进入郧阳等地，搅得天翻地覆，并向四周发展。郧阳抚治蒋允仪手中无兵无饷，只得困守郧阳府城，并火速向兵部奏报，在请罪、请死的同时要求增援。

蒋允仪的奏疏，说得十分悲戚，也很有道理。他说：

“叛贼之祸害越来越深了！自秦至晋，又自晋至豫、至楚，几乎半至天下了！到一处即焚劫一处，祸害已是不堪。而焚劫一处，也即占有一处，那些亡命之徒，闻风而起。如此一来，天下将为盗贼，哪

里还有什么安堵之地？”

接着，蒋允仪一再强调郧、襄地区的重要性，不断诉苦，请兵要饷，要求立即支援郧、襄。他最后可怜兮兮地说：

“不然，臣惟有延颈待尽，束身俟捕而已。”

崇祯帝这次却破天荒没有杀掉蒋允仪，而仅仅是把他革职。而蒋允仪对郧、襄形势的预测则不幸而被言中。

农民军还向郧阳府周边地区攻击。

襄阳府的均州、光化、谷城先后被农民军攻占。这支农民军后来又转掠该府的宜城，进入德安府属的随州、孝感，再攻入黄州府的黄陂、麻城。

荆州方向的情况也很吃紧。农民军一度攻到荆州附近五十里处。附近的当阳、远安等都被攻克。

有些农民军还分路杀入了四川地区。

鉴于战事规模和范围的不断扩大，朝廷官员纷纷要求以“重臣开督府，统摄诸道兵讨贼”，统一事权，避免推诿、观望。崇祯七年（1634）正月，崇祯帝终于特进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诸省军务，“视贼所向，随方剿抚”，给予了极大的权力。不久，在畿南立下战功的卢象升也代替蒋允仪出任郧阳巡抚。

陈奇瑜，字王铉，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他早年以进士授官知县，历任礼科、户科给事中，出任陕西副使、右参政，再任陕西布政使。崇祯五年（1632），陈奇瑜被提拔为延绥巡抚后，率部扫荡各路义军，并用奇兵剿灭占据永宁关的钻天啸、开山斧，名著关陕，深得崇祯帝信任。

陈奇瑜总督五省兵马后，积极布兵围剿。当时的形势已相当紧张。不仅湖广郧阳、襄阳地区农民军势不可挡，而且陕南、四川局势也很严重。尤其是进入四川的农民军，在四川西北部连连得手，并攻下夔州府城（今四川奉节）。

农民军自陕西起事以来，虽转战秦、晋、豫、湖广诸省，但攻下的也只是些州县城池。像夔州府城这样号称天险的重要城市，尚无被攻占的先例。夔州被陷后，其附近的大宁（今巫溪）、巫山（今巫山）也被攻占。

后在四川方面的压力之下，进入四川的农民军又回到湖广郧阳地区，一部从均州往河南，一部从郧阳往淅川，一部往陕西的商南。形势万分危急。

陈奇瑜立即率师从南阳赶到湖广襄阳府均州城，檄令陕、郧、豫、楚四抚臣率兵会讨。具体安排为：

陕西巡抚练国事驻防陕西商洛，遏制农民军之西北；

郧阳巡抚卢象升驻郧阳房县、竹溪，遏制农民军之西；

河南巡抚玄默驻河南卢氏，遏制农民军之东北；

湖广巡抚唐晖驻襄阳府南漳县，遏制农民军之东南。

四面包围既定，陈奇瑜率卢象升等开始进击。他们从郧阳府的竹溪开始，连战于平利（属陕西汉中府）、乌林关、沟阳界、乜家沟、蚋溪、狮子山等地，十余战皆传捷报。其副将刘迁则攻击于平利、竹溪之间，游击贺人龙等追击至紫阳，分获大胜。

在陈奇瑜的强大压力之下，农民军大部分被赶压到了陕西的汉中地区。陈奇瑜得势之后，檄令游击唐通在汉中保护藩王；遣参将贺人龙、刘迁、夏镐扼守略阳、沔县（今勉县），防止农民军西遁；副将杨正芳、余世任扼守褒城（在今汉中之北），防止农民军北逃；他自己则督副将杨化麟、柳国镇驻扎洋县（今洋县）；另命卢象升、练国事、玄默各守要害。陈奇瑜满怀信心，梦想在汉中一口吃掉农民军。

陈奇瑜的围堵果然很快就有了效果。到此年的六月，张献忠等部主力最终被陈奇瑜围困在一个名叫“车厢峡”的地方，陷入了绝境。

车厢峡的确切地点至今仍没找到。一般认为，车厢峡位于兴安县（今兴安），但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车厢峡很可能位于汉中附近，是汉中栈道附近的险地。

据说车厢峡长四十里，四面绝壁。农民军一入峡口，即遭到地方武装的袭击，或垒石断路，或投石飞击，或纵火烧林，农民军吃了大亏。当时正是阴雨连绵的雨季，农民军处境困难，弩解刀蚀，衣甲浸，马蹄穿，人饥马乏，死亡过半。如果陈奇瑜能合兵进击，可望全歼。

但农民军首领们此时又祭出他们屡试不爽的两件法宝，即行贿和诈降。

被困在汉中的农民军主力，目前可以确定的只有张献忠部四万多人。至于闯王高迎祥、李自成等部，当时是否也在其中，仍有待于证实。

农民军把平时攻掠所得的金银珠宝聚集起来，用来贿赂陈奇瑜的左右，疏通关系。他们在做好人情后，便向陈奇瑜提出，要求投降朝廷，返回故里，重做良民。

陈奇瑜此时是踌躇满志，不明底里，以为身陷绝境的农民军这次是真的投降。不动干戈，就能大功告成，如此美事，更是让他乐滋滋地昏了头。他竟轻易地点了头。

他立即上报朝廷。在得到批准后，陈奇瑜接受了农民军的投降。陈奇瑜对投降的农民军还是相当不错的。他把收降的三万六千余人，每一百人编成一队，每队派遣安抚官一名，以示督察。不久前还杀得你死我活的官军和“叛贼”，此时竟相互揖让酣饮，易马而乘，一团和气。原本饥疲不堪、衣衫不整的农民军，此时也已换上了衣甲，吃上了饱饭，甚至配上武器，整队出栈，焕然一新。如此戏剧性的场面，不免有些滑稽。

陈奇瑜哪里知道，这些逐渐恢复元气的农民军，一旦脱离险境之后，又会恢复本性，再叛朝廷。

其实，陈奇瑜本应该知道这批人的本性！在此以前，他们曾多次诈降，让朝廷吃足苦头。陈奇瑜也曾在陕西跟这些人打过交道，并不是初来乍到。遗憾的是，陈奇瑜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如果他那些从陕西跟出来的手下人能及时提醒他，大概事情也不至于弄得这么糟，可

惜的是他的手下人早拿了别人的重贿，哪里还会提醒他？

陈奇瑜好不容易挣出来的声名和地位，没想到竟毁在他手下人手中！

脱离汉中险境的农民军，立即翻了脸，重操旧业。

事情的起因，据陈奇瑜后来的说法，是因为陕西地方当局杀降激变。

据说，当时有一部受抚的农民军，奉督抚之命，被遣送到凤翔（今凤翔）城下，准备在城内安置。凤翔城中的士民哪里肯信？他们担心这些亡命之徒是设计赚城，便死活不肯开城门接纳。最后双方议定，农民军先派人由城下沿绳绐缒上城，商讨有关事宜。结果是被吊上城墙的三十六人惨遭杀害，尸体被摔下了城墙。

城下的农民军傻眼了，退而走宝鸡（今宝鸡）。宝鸡知县李嘉彦自然也不肯接纳，用武力把他们驱逐。结果被招抚的农民军重新反叛，陈奇瑜的抚局也彻底破产。

不过，杀降激变、持异激变，是陈奇瑜的说法。开始时，崇祯帝相信了陈奇瑜，并下令逮捕了李嘉彦等人。而朝廷上下却都说这是陈奇瑜推诿责任，自己犯下大错，却要别人承担责任。

其实，陈奇瑜抚局的失败，在当时有一定的必然性。

对农民军方面而言，诈降仅是一种手段，目的只是为了摆脱困境。在汉中求降时，他们或许是真心投降，因为当时不投降也只有死路一条。但一旦逸出绝境，他们肯定会重操旧业。这些不安分的农民，在起事以前，或许还会逆来顺受，过着非人的生活。起事后，他们已尝到了叛逆的甜头，尽管这种甜头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却仍有吸引力。要想再让他们回乡地，重过挨饥受冻的那种不死不活的日子，恐怕是难上加难了。

对陕西地方当局而言，招抚这么一大批降卒，也有实际困难。当时陕西正逢天灾人祸之后，仓储空虚，官军尚且不能保证粮饷的供给，哪里还余力来供养这么一大批人。况且在当时许多人眼里，这些

农民军都是些杀人放火、不讲信用的可怕人物。一般州县避之犹恐不及，哪里还敢去招惹？闭城不纳、甚至武力驱逐，便也是情理中的事了。

事实上，当时对朝廷危害最大的那几股农民军，一出汉中栈道，便杀掉了监察的安抚官，开始攻掠。这也说明，农民军在汉中投降时，就计划了这一手。

农民军的降而复叛，使陕西的局面顿时严峻起来。整个陕西给搅得翻了天。

高迎祥、李自成等部先后攻掠巩昌府（府治在今陇西）、平凉府（府治在今甘肃固原）、临洮府（府治在今甘肃临洮）、凤翔府（府治在今凤翔）等地几十个州县，先后打败贺人龙、张天礼等部，并斩杀了固原道陆梦龙。在这年的闰八月，李自成还一度把悍将贺人龙包围在陇州（今陕西陇县）。贺人龙与李自成有老乡关系，所以李自成曾派高杰劝降贺人龙，贺人龙不干。后来因洪承畴率兵解围，李自成才率兵退去。

当时活动于庆阳的另一股农民军，也乘势南下，攻到西安附近的三原（今三原）、泾阳（今泾阳）、耀州（今耀州）、富平（今富平）一带，西安震动。

在陕西境内的其他各部，也纷纷攻掠。河南、畿南的农民军则遥相呼应。

农民军之所以能如此气势冲天，还与这年后金的入侵有关。

崇祯七年（1634）五月，皇太极再次率兵，绕过山海关防线，从蒙古地区犯边，攻入宣府、大同等晋北地区，威胁京畿。朝廷除令宣大总督张宗衡，率总兵曹文诏、张全昌抗击外，还先后从陕西、河南调动洪承畴、左良玉、汤九州诸部参加抗击，造成陕西、河南等地兵力空虚，给农民军提供了可乘之机。

直到闰八月后金军队撤出长城一线后，洪承畴等才得以回师陕西，陕西等地的局面也随之有所改观。

洪承畴回师之后，便命总兵左光先率兵赴陇州。当时贺人龙已被李自成的兵马围在陇州四十余日，处境相当困难。左光先率援军赶到后，与贺人龙内外夹击，大破农民军。

此年的九月，朝廷檄令河南、湖广、山西、四川兵分四道入陕会攻：

河南兵进入同州（今陕西大荔）、华州（今陕西华县）地区；

湖广兵进入西安府的商州（今陕西商县）、洛南（今陕西洛南）地区；

四川兵进入汉中府的汉中、平利、兴安（今安康）地区；

山西兵进入西安府的韩城（今韩城）、蒲州（今山西永济）地区。

此外，朝廷还调集防边的二万军队进入陕南参加会战。

由于朝廷的围剿，陕西境内的农民军被迫开始了新的突围。到第二年即崇祯八年（1635）的正月，分成两路的农民军主力，已基本上涌人了河南境内。

一路通过湖广郧阳地区，迂回杀入河南。这股农民军，据说多达二十万人，其前哨已抵达郧阳、上津，后队还没有离开汉南，前后绵亘数百里。而当时郧阳的守军才不过数千人，根本无法抵挡，农民军如入无人之境。这支农民军在郧阳活动不久后，转而北上，进入河南地区。后来又往北杀入河南的南阳府和汝宁府境，向河南中部靠拢。

另一路农民军则直接由陕西杀入河南。这支部队声势浩大，当时有人描写道：

“七年冬，贼骑千余西来，立马西郭麦田中。已而大旗飘飏。遥望崖口以南，旌旗蔽空，甲光耀日，南尽南山，北尽河曲，波压云涌而至。惟闻马嘶之声，自朝至夜，连营数十里。……贼过，人畜践踏，路阔五六里，不知其众之几何也。”

这路农民军进入河南后，便兵分三路：一路从陕州（今陕县）渡

黄河北上，到达山西平阳，不久又渡河重回河南怀庆地区，再杀向归德府（今商丘地区）。另一路从武关杀入南阳，进入湖广襄阳等地区，一番攻掠之后，再杀回河南南阳、汝宁等地，向北集结。第三路则从河南卢氏县，直接向东攻杀。

至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主力大多集结在河南境内，形势十分危急。兵科给事中常自裕当时给崇祯帝上了一份紧急奏疏，说明当时河南的局势。他说：

“中原，自古以来就是天下安危所系。现在农民军一路从陕西东北境的商南、洛南进犯河南汝州，一路从湖广郧西、上津等处进犯南阳。虽有左良玉一旅驻防新安、渑池，陈治邦、乔国柱、张嶷数营扼守汝州，陈永福孤军堵南阳，但农民军人多势众，多路出击，大小七十二营，有二三十万之众，蜂屯伊、嵩、宛、洛之间，急于侵犯汝、宁、郑、宋诸地。上述诸营，除左良玉一军尚可堵拒之外，其余各军都不足以恃，农民军有何所畏而不长驱直入？！现在虽遣张全昌、曹文诏、秦翼明诸将，然各旅都是兵不满千，仅仅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常自裕说得十分明白，崇祯七年（1634）底，大批农民军主力聚集在南阳至洛阳一线，向河南东部和南直隶的西北部进发，而河南境内的官兵根本无法堵截。因此，常自裕要求朝廷立即向河南增饷增兵。速救心腹之患。

崇祯帝此时也急了。如果让农民军向东移动，不仅龙兴之地凤阳要遭殃，而且弄不好要殃及到长江三角洲地区。这可是大明朝的赋税重地！

崇祯帝于崇祯八年（1635）正月诏令洪承畴东出潼关，进入河南围剿，并从各地抽兵调将予以支持，希望能扼制住农民军在河南的的凶狠之势。

不幸的是，此举为时已晚，大祸已不可避免地要降临了。

壮大的农民军

崇祯七年（1634）十一月，崇祯皇帝曾作了一次较大的人事调整，那就是把陈奇瑜撤职查办，代之以洪承畴。

陈奇瑜在汉中因抚局失败而放跑农民军主力以后，崇祯皇帝并没有立即查办陈奇瑜，反而继续支持陈奇瑜，撤办那些被陈奇瑜指责为破坏抚局的陕西方面官员，如李嘉彦（宝鸡知县）、练国事及士民五十余人，并派遣李乔代替练国事出任陕西巡抚。

崇祯帝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希望陈奇瑜能将功补过，重新扭转战局；另一方面，说实在的，也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认识到农民军脱离汉中险境后，能如此迅速发展，把局面搅成这种样子。

随着陕西局面的恶化，以及给事中顾国宝和御史傅永淳等不断弹劾陈奇瑜的主抚误事，崇祯帝终于发现陈奇瑜惹下了多大的麻烦。当时，陕西方面的官员对陈奇瑜意见最大，认为陈奇瑜不仅做事不力，贻害陕西地方，而且还反过来指责陕西方面的官员，使不少陕西官员士绅受到处罚。因此，陕西方面的言论大有置陈奇瑜于死地而后快之势。

不知这些陕西方面的人士当时有没有想到，陈奇瑜这个外省人，虽贻误战机，给陕西惹下麻烦，但农民军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陕西人。说到底，还是陕西人给陕西惹下了麻烦。

在各方压力之下，崇祯帝决心临阵易帅，下令逮捕陈奇瑜，同时任命洪承畴出任兵部尚书，持尚方宝剑，总督晋、陕、豫、川、楚诸省军务，全面负责围剿农民军之事。延绥、宁夏、甘肃三边的防务，仍由其负责。

洪承畴当时已是崇祯帝在西北的王牌。在起用陈奇瑜时，朝廷曾考虑过调用洪承畴负责剿“贼”事业，但因西北边防事重，不能轻易换人才作罢。崇祯七年（1634）五月，后金攻人宣大一线，洪承畴匆匆赴边作战，至闰八月才回师陕西，投入对农民军的作战。没想到在这节骨眼上，西宁（今青海西宁）发生兵变，叛军杀州官，逐守道，闹得很凶。洪承畴只得亲赴西宁平乱。他这一走，本已空虚的陕西，更是挡不住农民军的攻势，弄得农民军尽占关陇之地。

平定西宁兵变以后，洪承畴重回围剿农民军的前线，但此时农民军已逸出陕西，涌向河南，中州形势十分危急。

崇祯八年（1635）正月，崇祯帝诏令洪承畴率兵东出潼关，督各路兵马，在河南境内扑灭农民军。

为了支援洪承畴，崇祯帝调集各地兵马近八万人，进入河南地区。除此以外，归洪承畴统一指挥的还有当时已在的左良玉、陈治邦、乔国柱、张嶷、陈永福各部。不久，又有张全昌、曹文诏、秦翼明等部，以及从辽东调来的祖宽、邓圮等部进入河南参战。

除调兵遣将之外，朝廷还破例大发粮饷。崇祯帝拿出内帑二十万两，户部备饷七十八万余两，另留湖广新饷十三万两，四川新饷二万两，以供军用。

崇祯帝此次可谓是用尽了全力。他严令洪承畴必须在六个月内肃清农民军于河南。

在这种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农民军是如何应对的呢？

据说，农民军主力在崇祯八年（1635）正月初，就已移至荥阳（今河南荥阳，位于郑州之西），并召开了著名的“荥阳大会”，商讨应对之策。

在荥阳参加会议的是所谓“十三家七十二营”。所谓“十三家”，即老回回、闯王、革里眼、左监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可以说是当时河南境内的农民军主力。

据说，当时各家首领已侦知朝廷大兵压境，所以坐下来商讨对策。老资格的老回回首先提出：

农民军应该进入山西地区，以避锋芒。

张献忠（八大王）一听，立即反驳说，这是胆怯之举，并讥笑老回回。老回回很生气，与张献忠争执起来。这时李自成赶紧出面调解，并说了一段后来很是著名的话。他慷慨激昂地说：

“匹夫尚可奋臂争先，何况我们有十万之众！？现在我们的兵力是官兵的十倍，即使关宁（山海关、宁远）铁骑开来，对我们也是无能为力。眼下之计，只有分兵出击，各部分头杀掠，能否奏效则听命于天。”

众头目一听，齐声赞同。于是各部抓阄，确定进兵路线。依次是：

革里眼（贺一龙）、左监王向南，抵挡湖广之兵；

横天王、混十万（马进忠）向西，迎击陕西之兵；

曹操（罗汝才）、过天星（惠登相）分屯荥阳、汜水之间，防守黄河一线，防御开封、归德、河南、汝州诸府之兵；

闯王高迎祥、张献忠东向出击；

老回回（马守应）、九条龙等作为机动部队，策应各部；

后又担心横天王、混十万敌不住陕西过来的洪承畴诸部，便又以射塌天、改世王作其后盾。

于是，众头目于正月壬子日，杀牛马祭天誓师，约定所获金帛子女均分，然后分头出击。

这一史料的作者，是江南名士吴伟业。吴伟业虽是明末清初人，但始终没有真正接触过农民军。不过，他倒是撰写了一本专记陕西农民军的书，名叫《绥寇纪略》。上述的记载，就是出于此书，并入了《明史》，影响很大。

不过，如果参照一下当时农民军的水准和一贯做法，那么，这样一个有模有样的军事会议，是否真的召开过，就很值得怀疑！

不少人认为，这次会议根本就不存在，上面的记载只是个附会。具体的理由有这样一些：

按理说，像吴伟业这种当时与农民军毫不相干的人，都能把此事了解得清清楚楚，那么，当时在前线的朝廷将领们也应知道此事。但奇怪的是，当时的河南巡抚玄默（后著有《剿贼图记》）、河南巡抚

御史金光宸（崇祯七年底至九年春在任，后著有《两河封事》）、以及当时的兵部尚书张凤翼（后也把任职期间的有关军务的题本编成《枢政录》一书）等，都没有提到此事。既然连吴伟业都能知道，那么他们为什么反而不知道？

从时间上来看，荥阳大会也有问题。据称，荥阳大会结束于“壬子”日，这一天应该是崇祯八年正月初一日（公元1635年2月17日）。由此可知大会应该是在崇祯七年十二月底召开的。但史料表明，农民军入荥阳是崇祯八年正月初的事，攻克荥阳是在正月初六日。正月初一尚没有到达荥阳的农民军，又怎么能开荥阳大会？

从会议背景来看，荥阳大会也不能成立。按照吴伟业的说法，农民军之所以要召开会议，是因为他们已获悉了朝廷即将向河南征调关宁、天津等地精锐之师的消息。但根据当时朝廷的机要来看，崇祯帝接到给事中常自裕奏章的时间，以及兵部（尚书张凤翼）议兵、户部（尚书侯恂）议饷的时间，都是在崇祯八年正月上旬、中旬。而皇帝最终批准的时间，是正月二十三日，那时凤阳城早被农民军攻陷了。既然是八年正月下旬才确定下来的，而且又是当时最为机密的军事方案，农民军又怎么能在崇祯七年十二月底侦知？

另外，后来农民军各部的实际攻击方向，与荥阳大会上议定的分兵安排，也大有出入。如按会议决定，横天王、混十万本应迎击从陕西杀来的洪承畴诸部，但实际上这些部队后来却南下攻到了汝宁府的上蔡等地，然后又向东攻击南直隶颍州府境（今安徽阜阳地区）。又如本应南下抵挡湖广之兵的革里眼，以及本应策应各部的老回回、九条龙等部，后来也攻到了今安徽境内，其中老回回部又于二月间杀向了湖广的麻城。再如曹操、过天龙等部，本应留在荥阳、汜水等黄河一线，拖住河南的官兵，但这支农民军后来并没有留在河南，而是南下杀入南直隶的庐州、安庆府，攻打霍山（属庐州府，今安徽英山）、英山（属庐州府，今安徽霍山）、太湖（属安庆府，今安徽太湖），然后进入湖广境内，攻破罗田（今湖北罗田）。由此可见，除了闯王等部东击之外，农民军各部实际的作战路线，与荥阳大会的所谓定向分兵进击的方案，根本不符。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吴伟业所记的荥阳大会，是漏洞百出。其实，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当时河南的情况，就会发现，云集河南的农民军，无论开不开那个大会，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向东南方向挺进。

原因很简单，就是其他的去路皆已被重兵堵死。向西推进肯定不行，因为洪承畴诸部足以让他们心惊肉跳。往西南也不行，因为卢象升等人才把湖广郧、襄地区的农民军逼到了河南。那么往北呢？更不行！因为左良玉的部队守在新安、渑池一带，张全昌、曹文诏所带的山西兵，也由北往南进军。农民军最怕的就是左良玉、曹文诏等人。往东北方向，农民军则更是无路可走，因为最精锐的关宁铁骑、天津兵正是从这个方位的畿南、山东开过来。

因此，农民军只有向南、向东南方向挺进，进入河南东部、东南部，以及南直隶的凤阳、庐州、安庆等地。相对而言，朝廷在这一带的防守力量，要薄弱得多，活动的余地也大。正是因为如此，河南地区的各路农民军才要一齐杀向东南。

如果从农民军当时的构成、素质和作战的习惯方法来看，荥阳大会之类的说法，也是不太实际的，说得难听些，是过高地估计了农民军的档次。

说到这里，就有必要再来回顾一下农民军的一些基本情况。

陕西的动乱，虽开始较早，但最早发难的几乎都是些饥民。这些饥民，参加动乱的最基本、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生活困难，活不下去。因此，农民军在开始时，无论是组织方面，还是战斗力，都很幼稚，遇到战斗力强的正规官兵，还不是对手。

不久，随着边兵、边盗等人员的加入，农民军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边兵、边盗本已有之，虽人数不众，但战斗力很强。崇祯二年（1629）十月，由于后金军队大规模入侵，崇祯帝急令各地勤王。山西巡抚耿如杞和总兵张鸿功，率五千人人卫勤王，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陕西巡抚刘广生和甘肃巡抚梅之焕也遣五镇总兵吴自勉、尤世禄、杨麒、王承恩和杨嘉谟等率兵一万八千人赴援京畿。耿如杞的部

队在北京附近哗变，一哄而散，逃回山西。延绥总兵吴自勉率领的榆林兵，也在中途逃归。甘肃入援部队在金县也发生哗变。这些士兵，不少都加入了农民军。这些边兵的入伙，加上先前已经加入农民军的逃兵等人员，大大加强了农民军的战斗力。

尽管如此，农民军还是处于劣势。陕西境内的农民军虽一时风起云涌，人数众多，但相互之间并没有统一的组织。民间流传着的《水浒》故事和戏曲，当时也是农民军汲取知识的主要来源。因此，此时的农民军，还处于低水平的层次上。

农民军在崇祯三年（1630）春进入山西，尤其是在崇祯六年（1633）冬渡过黄河、杀入河南后，情况开始有了很大变化。如果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那就是“流寇主义”迅速发展。

户部主事张缙彦，曾在崇桢十一年（1638）上疏谈到了他对农民军的看法。他认为：

“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贼之长技在分，而贼之穷技在合；贼之乘时在夏秋，而贼之失时在冬春；贼之得计在以塘马战而老营避，在以火光近而真营远，贼之失计在行营不知备，截杀不相救。”

张缙彦依据其亲身经历，精辟地论述了他对兵情贼势的看法。

具体而言，渡河后的农民军的“流寇主义”，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不建立根据地或政权，到处流动作战，流动不居。农民军的一切人员都随营流动，归附的饥民也人农民军，妇女也是乘马以从。因此，号称有数千或上万人的一营农民军，能打仗的实际上只占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则是老弱妇女之类的人。在战斗不顺利时，被官军冲散、俘杀的，也往往是后者。真正的战斗人员却往往能伺机逃逸，不太容易被俘杀。这也是官军屡报大捷，而农民军精锐仍在的主要原因。

农民军通常是以一大股一大股的形式活动的。一大股往往被称作一营或数营，每营有一头目，其名称不一。有的称掌盘子，意思是管

营子，下面设总管、掌家或管队等职。有的营称总头目，下面设头目。随着农民军人数的增多，不少营达到几万人，其组织形式也随之改变。有的营被分成若干哨，分设大领哨、领哨、大哨头和哨总等职。有的营则将管队分成老管队、小管队、管队三级。也有的营则分成老掌家、大掌家和小掌家。

农民军还设置老营，来安顿家属，管理粮食、器械、旗帜等军需品。每逢战事，农民军往往让老营远远避开，以免受到敌军的冲击，损失家属和辎重。有些农民军还把依附的饥民分成若干专业队。一般而言，农民军对愿从者一律不杀，有手艺者分别被编入各类专业队。

由于流动作战的需要，农民军很注重骑兵即塘马。作战时，骑兵担任主要的攻击任务。每一骑兵都有二三匹战马，轮流换乘，终日疾驰，犹如急风骤雨。撤退时，骑兵的速度也很快。塘马强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往往令马少步多的官军措手不及，处于被动。

农民军各营之间，时分时合，各自为战。早期在陕西时，农民军尚处于一伙一伙的自发形式，数目众多，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很松散。因此，朝廷也很难弄清楚其具体的情况。进入山西后，一度有王自用（紫金梁）等所谓的首领，但这些首领实际上也名不副实，绝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拥有很大的权威。

农民军从山西突围后，这种分散性进一步加强了。有些营是单独行动，有些营则采取临时的合营关系，但很不稳定。渡河后的农民军，甚至连一个名义上的领袖都没有。高迎祥虽有相当大的号召力，但各营并没有正式推选他做首领。他之所以有号召力，是因为实力较强、人缘不错。

不过，到了崇祯八年（1635）春，农民军已出现了比“营”更大的一种组织形式，即“家”。据说在河南荥阳开会时，就有“十三家七十二营”的称谓。自此以后，“十三家”就成为流寇的通称。“家”的出现，表明农民军开始出现合股之势，并最终形成了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主力。

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后人甚至是当时的人，包括与他们作战的朝

廷将帅，都无法真正掌握农民军的详情。其中最令朝廷头痛的，就是那些农民军的头目。

那些头目们，本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员，在平时实在是上不了台面，要不是造反，根本没人会提起他们。但偏偏是这些本不起眼的小人物，还要学《水浒》中的英雄，起那些让人弄不清的名号。况且这些名号，也不是某一人的专利，因为一旦原用某一名号的人死了，还会有新人顶用。再加上那些头目的人数本就很多，几达百人，情形就更复杂了。

当然，现在能勉强弄清楚的，还是不少。自崇祯六年（1633）至崇祯九年（1636）秋的主要农民军首领，大概有这样一些：

高迎祥：号闯王，崇祯八年（1635）七月拥有部众七万，十一月增至十二万。

高应登：号闯天王（撞天王），崇祯八年（1635）十一月拥有部众约十七万。

拓先龄：号一字王，崇祯八年（1635）十一月与张献忠等部一起，拥有部众二十万。

拓养坤：号蝎子块（或称刘哲，亦号蝎子块），崇祯八年（1635）十月拥有部众三万，崇祯九年（1636）发展最速，部众最多，人数在高迎祥之上。

张胖子：号整齐王，崇祯八年（1635）一月，拥有四股部众，大约数万人。

马守应：号老回回（或云老回回是马守玉），崇祯七年（1634）拥有万余人，崇祯八年三月增至数万。

张献忠：号八大王，崇祯八年（1635）三月拥有部众数万。

摇天动：姓名不详，崇祯八年（1635）五月拥有部众数万。

罗汝才：号曹操，崇祯八年（1635）后拥有部众数万。

马进忠：号混十万，崇祯九年（1636）拥有部众数万。

李养纯：号四天王，或张四天王，崇祯九年（1636）拥有部众数万。

李自成：号闯将。高迎祥死后数载才承袭闯王名号，崇祯八年（1635）七月拥有部众七万。

混天王：姓名不详，崇祯七年（1634）七月拥有部众数万，崇祯九年（1636）一月诛死。

惠登相：号过天星，后降官军。

刘国能：号闯塌天，后降官军。

张大受：号满天星。

张一川：号扫地王（或云李靖也称扫地王）。

蔺养成：号乱世王。

贺一龙：号革里眼。

许可变：号改世王。

李万庆：号射塌天，后降官军。

贺锦：号左金王。

王国宁：号兴世王。

薛仁贵：原名不详。以旗帜俱用白色，故名，军中称“白袍将军”。崇祯九年秋诛死。

此外，主要首领尚有混世王、整世王、九条、顺天王、太平王、靖天下、瓦背王、爬天王、紫微星、蛤蟆圆诸人，姓名不详。还有张妙手、贺双全，无名号。

次要首领大约有：

草上飞、抓山虎、双翼虎。以上诸人被擒，姓名不详。

镇山虎、一只虎、满天飞、克天虎、钻天鹞、五条龙、小天王、乌风鬼、黑旋风、黑杀虎、飞山虎、鬼见愁。以上诸人被戮，姓名不

详。

闯虎、黄虎、白虎、头神、紫金梁（不是前面提到的王自用）、黑蝎子，姓名不详。

许文衡、王九仁、王成龙、祁总管，无名号。

留在山西没有南渡黄河的，则有王刚、王之臣、通天柱、掌世王、翻山动、领兵王、姬关锁等。另有高加计号“显道神（或险道神）”，刘浩然号“乡里人”，贺宗汉号“活地草”，三人声势很大。

上述六十余人，肯定不是全部。除了这些“巨首”之外，肯定还有更多的小头目。即使是“巨首”之间，实力悬殊也很大。多的达十万以上，而少的只有数千人。

到崇祯九年（1637）秋，农民军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首领走向了没落，如张妙手、贺双全等人。有些则能始终保住地位，如惠登相、张大受、马进忠、贺锦、贺一龙、李万庆、横天王等。有些则能继续发展，如高迎祥、张献忠、拓养坤、马守应等。有些则倏兴倏衰，如高应登、拓先龄等。当然，也有在此期间才开始发展壮大而独称劲旅的，那就是李自成。关于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情况，留在后面专门介绍。

回顾了农民军的基本情况后，就不难发现，荥阳大会有虚构、夸大的成分。事实上，崇祯八年（1635）春，农民军正是在官军的强大压力下，才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形，利用流动作战的故伎，一齐杀向了官军防守薄弱的东南方向。

不过，农民军这次的攻击方向，算是选对了。

凤阳之变，帝乡一夜成火海

农民军攻击的目标，是南直隶西北部的凤阳等府，即今皖北地区。

凤阳是明王朝的“龙兴”之地，即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朱元璋得天下后，曾在这里大兴土木，先后为自己的父母修建了陵墓即皇陵，扩建了自己少年时代当过和尚的龙兴寺，并按南京的规格修建凤阳城，定其为中都。因此，凤阳对明王朝有特定的意义。

同时，凤阳府也是南京的北方门户，如果凤阳一失，则南京门户洞开，必受兵锋威胁。如果南京出了问题，那东南赋税重地、半壁江山就很难保住，大明朝的气数也就差不多了。因此，凤阳一带，无论从哪方面而言，都不应该出任何差错。

令人费解的是，朝廷并没有十分重视凤阳的防守。本来，朝廷在凤阳设有留守司，以及班军、高墙军、操军和护陵军六千余人。凤阳巡抚督漕驻淮安，兼护泗陵（皇祖陵），太监驻凤阳。但由于承平日久，已无多少战斗力。

早在崇祯六年（1633）冬，当农民军突破黄河南渡河南以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就上书朝廷，要求派兵防守凤阳祖陵。崇祯七年（1634），兵部尚书张凤翼也请饬凤阳抚按加强防守。崇祯帝曾召谕兵户两部，令淮安巡抚朱大典和杨御蕃扼守南畿和凤阳祖陵。但总的来说，凤阳的防守仍很薄弱，尤其是负责防护的巡抚杨一鹏、太监杨泽都不得力。许多人甚至还认为，农民军大概不会杀向凤阳一线。

不幸的是，农民军恰恰选中了朝廷防守比较薄弱的凤阳地区作为主攻方向。

在闯王高迎祥、张献忠等率领下，农民军经河南汝宁，先南下攻破固始，再攻占凤阳府霍丘县。与此同时，另一支农民军在扫地王的率领下，也攻占了凤阳府的颍州城。

霍丘、颍州的朝廷官员，在农民军面前倒还很有骨气。霍丘城破时，县丞张有俊、教谕倪可大、训导何炳若以及大豪绅田既庭等，都不屈而死。颍州被破时，知州尹梦鳌亲持大刀搏杀，后寡不敌众，投城下乌龙潭自杀，其弟、侄七人随之自杀。通判赵士宽，也率家人参与巷战，后投水自杀。其妻则带着三个女儿登楼自焚。

当时的颍州城中，还住着一位任过兵部尚书的张鹤鸣。天启年

间，当时担任兵部尚书的张鹤鸣，曾全力支持巡抚王化贞进攻后金而不服从经略熊廷弼的指挥，导致辽东全线败退，张鹤鸣因此丢官返乡。这次正好被农民军逮个正着。据说张鹤鸣和他的弟弟张鹤腾被抓到后，态度十分强硬。农民军便把张尚书倒悬在树上，张尚书仍骂不绝口，最后被杀。其弟张鹤腾、子张大同也同时被杀。

颍州张鹤鸣大概是农民军在崇祯八年以前处死的最高级别的官员。说也奇怪，颍州城对农民军的反抗，也十分刚烈。城破之后，遇难的官绅士庶多达一百五十人，妇女殉节者二十七人，烈女八人，其“忠烈”之称，一时独盛。

不过，几天后发生在凤阳城中的情形，就与颍州城很不一样了。

农民军破颍州、霍县后，一部分南下攻入庐州府境，另一部分即杀向寿州（今寿县）、凤阳。

凤阳当时的情形已是很糟糕。不过这倒帮了农民军的大忙。

本来，凤阳作为龙兴之地，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明太祖朱元璋曾予以特殊照顾，在赋役方面给了不少优惠。但至明末，这种优惠已不复见。相反，凤阳作为中都，百姓承担的差役、造作多如牛毛，日子几乎到了过不下去的地步。

崇祯四年（1631）十一月，当时任南京礼部右侍郎的钱士升（后于崇祯七年入内阁），在奉命祭告凤阳皇陵之后，曾向朝廷上疏汇报了凤阳地区衰败的景象：

“凤阳号称帝乡，但一入其境，只见土地多荒，庐舍寥落，一望萧然。

“究其原因，是因为凤阳土地本就贫瘠，在江北属下下之郡。一遇灾荒，百姓往往向外逃荒。而走掉的那部分户口本应承担的赋役，就须让留在本地的人承担。如此恶性循环，结果自然是户口越来越少，荒地越来越多。”

所以，钱士升最后要求朝廷对凤阳予以特殊照顾，蠲免凤阳的赋税。

崇祯帝在看过奏疏后，也未有多大反应，只是轻描淡写地批了一句。他是怕开了先例，各地起而效尤。当时他正想方设法增加收入，自然不愿接受钱士升的建议。

既然如此，凤阳的局势便不可避免地要恶化下去了。崇祯七年（1634），凤阳守军曾发生兵变，皇陵卫指挥侯定国被乱兵杀死。

到了崇祯八年（1635）正月，凤阳守备太监杨泽得知农民军已围寿州后，急令留守朱国相准备迎敌，令凤阳知府颜容瑄领乡兵防守。这位杨泽，声名不佳，唯财是贪。凤阳商民对他很是不满，便诉告于巡按御史吴振缨。吴振缨哪敢得罪杨泽，当然不接受诉告。群情激奋之下，百姓一拥而至太监署，点火焚烧。吴振缨则伺机逃脱。

于是，一些极端的百姓便偷偷地赴颍州去接纳农民军。

正月十五日夜，适逢元宵节，凤阳城中依然是仕女如云，笙歌彻耳。农民军的先头部队约三百人，化装成商贾、车夫，悄悄潜入凤阳城中。突然，城中火光四起，喊声冲天，百姓狂奔，一片混乱。农民军乘乱占城，大军随后而至。

当时的凤阳本无城墙，无险可守。城中虽有数千兵马，但根本无法组织抵抗。留守朱国相、指挥袁瑞征仓促应战而死。

据说农民军首领扫地王、太平王杀入府署，抓到了身穿囚衣混迹于囚犯中的知府颜容瑄，用棍子把他活活打杀堂下。推官戴文英等六位文官及四十一位武官，也被处死。据说士民被杀者多达数万人。

或许是农民军这么多年来一直被追杀，吃足苦头，因此把怒气都发泄到了凤阳，以报复崇祯帝和朝廷。

他们把太祖朱元璋父母的陵墓即皇陵糟蹋得面目全非。他们放火烧掉了皇陵、享殿以及陵区内的三十万棵蟠松，杀掉了守陵太监六十余人，把关押在陵区高墙内的罪宗（即犯罪的宗室人员）百余人放跑。他们放火焚烧城中的公私邸舍二万余间。龙兴寺也被点着了大火。一时间，凤阳城内外火光冲天，光照百里之外。

农民军公开打出“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号，在凤阳地区恣掠三日，

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过了几天舒心日子，庆祝他们前所未有的胜利。

据说农民军曾在凤阳神祠中占枚问神，得了个下签。一怒之下，剖神像，拔营而去。在分兵撤退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据说李自成曾向张献忠索要皇陵中那些善拉会吹的小太监，张献忠舍不得给。李自成一怒之下，便与张献忠分开。当然，这些记载是否属实，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从农民军流动作战的一贯手法而言，农民军撤出凤阳地区也是意料中的事。他们根本不会久留此地。另外，凤阳沦陷后，周边的官兵纷纷向凤阳进发。太监卢九德等率川兵三千急驰救援，山东巡抚朱大典也调徐州总兵马、睢州总兵骆举率兵进援。南京方面也有进兵动作。农民军绝不会留在凤阳等着官军来进攻。

具体而言，农民军撤离凤阳地区后的主要攻击路线，有这样几路：

一路由高迎祥、李自成等人率领，从凤阳府太和县进入河南。经河南鹿邑、杞县，进入密县山中。

一路由扫地王等率领，攻亳州（今安徽亳县），走河南夏邑，围归德。这两支部队后在河南归德地区会师，图谋西人潼关。

一路由张献忠等人率领，杀入庐州府境内，先后攻陷庐江（今庐江），屠戮巢县（今巢县）、无为（今无为）及安庆府的潜山（今潜山）、太湖（今太湖）、宿松（今宿松），后遇应天巡抚张国维的抵抗，又杀入湖北麻城，进入河南境内。

张献忠一支，攻掠最凶，南下庐州、安庆两府后，除庐江一城未下外，其余各城无不攻陷，令朝廷无法抵挡。

凤阳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上下一片惊慌。

兵部尚书张凤翼接到败报后，大惊失色，几乎要站立不住，晕倒在地！

崇祯帝接到中都沦陷、皇陵被焚的消息后，悲痛欲绝。此日本当

开讲经筵，崇祯帝特传旨免行。他自己素服避殿，亲自赴太庙祭告祖宗之灵，并命百官修省。

凤阳之变在崇祯帝心中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他在默默承受着朝廷上下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压力之际，不得不面对列祖列宗，反省自己即位以来的种种举措。不过，他更希望他的军队能在短期内剿灭农民军，为他报仇雪恨。

为此，他进行了新的部署。他首先作了人事上的调动。

凤阳被焚，总要有人顶罪。漕运御史兼凤阳巡抚杨一鹏在劫难逃，后被斩首弃市。其实，杨一鹏也有点冤。作为巡抚，杨一鹏因年老多病，是不太称职。但斩他的罪名，却是他没及时救援，或没有及时从淮安移镇凤阳。而在这一点上，杨一鹏却没有死罪。镇守淮安，本是朝廷的规定。而且杨一鹏事先也征求过朝廷的意见，崇祯帝则明确表示不必移镇。当然，话虽是崇祯帝以圣旨的名义说的，实际上却是内阁首辅温体仁的意见。就此而言，朝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与杨一鹏一起被追究的，还有凤阳巡按吴振缨。他也被逮下狱，最后充军戍边。守陵太监杨泽则自知罪孽深重，先畏罪自杀了。

杨一鹏被逮后，由朱大典总督漕运，巡抚凤阳，协同洪承畴围剿农民军。再发精锐的辽兵三千，由总兵祖宽率领，开赴前线。同时急令洪承畴加紧围剿工作。

但前线的战事，并没像崇祯帝所迫切希望的那样，有迅速好转的迹象，反而越来越糟糕。

洪承畴依据当时的形势，制定了一个初步的方案，具体布阵如下：

四川镇抚所属各部，移驻夔门、达州一线，进援湖广襄汉；

湖广抚镇，则分驻承天、襄阳，郧阳巡抚驻郧阳；

漕运总督移驻颍州、亳州，进援河南的汝宁、归德；

山东巡抚移镇曹州、濮州，向南支持江北江南；

山西巡抚移驻蒲州，进援河南灵宝、陕州；

陕西巡抚移镇商州，以便策应、调度陕西南部的兴安、汉中诸地；

河南巡抚移镇汝州、南阳间；

保定抚镇移镇邯郸、磁州一带。

洪承畴的如意计划，是想南北策应，形成一个大包围圈，把农民军困在河南，一举歼灭。

然而，农民军并不会如此“听话”，留在河南等朝廷来围剿。他们不久又故伎重演，杀向关中。

就在洪承畴出潼关进入河南后，原先留在河南西部的农民军便乘陕西空虚，杀回陕西境内。至此，由安徽进入河南的高迎祥、李自成等部，以及由湖北进入河南的张献忠等部，加上原先留在河南的农民军，纷纷杀向河南之西部，并重回陕西境内。

忙了半天的洪承畴，急忙修改战略，由河南回救陕西。他于四月二十日前后在河南汝宁召开了会议，进行了布置。基本情况是：

他本人亲率贺人龙、刘成功等部将，杀入陕西，与农民军决战，同时命曹文诏由湖广进入河南，与他共同作战。

总兵左良玉、汤九州率兵五千，扼守陕西商南县境内的瓦屋、吴村两个要隘，切断农民军进入河南内乡、淅川的捷径；

总兵尤世威、徐来朝率兵五千，扼守陕西洛南县境内的兰草川、朱阳关，防止农民军由此进入河南的灵宝、陕州、卢氏等县；

总兵陈永福率官兵近二千名，扼守河南卢氏、永宁境内诸隘口，协助河南巡抚陈必谦堵截农民军南北往来；

总兵邓玘、尤翟文、张应昌、许成名，各以所部防守汉江南北之上津、郧西、平利、竹溪等县，防止农民军从此地进入湖广境内；

同时请敕朱大典防江北。

这是洪承畴针对农民军流动作战的一贯作风而制定的不得已的策略。他想用拙策死守之法，来对付农民军的轻逸飘忽。此招虽笨，但如能彻底贯彻，至少能把农民军困在陕西，并有机会用精锐之师杀入关中，寻机决战。

遗憾的是，洪承畴的计划，得不到保质保量的贯彻。

先是总兵徐来朝的部卒不听调遣，反叛于卢氏县，此部不战自溃。

接着，总兵邓玘之部众因缺饷而叛变于樊城。邓玘越墙逃跑时，不幸落入大火身亡。其部众一哄而散。

网刚张开，却已先破。

洪承畴只有仰天长叹！长叹之余，洪承畴亲率贺人龙、刘成功两总兵进击，于四月底进驻河南灵宝。五月，移驻西安之北的高岭。

曹文诏从河南阌乡赶到陕西商州，并于金岭川大胜农民军，把农民军压向北部，并一路追击。农民军在老回回、张献忠等率领下，在凤翔与高迎祥等部会合。然后往北、往西挺进。散布陕西各地的农民军也纷纷攻城略地。

洪承畴当时实际上没有多少兵力，根本无法与数十万农民军打硬仗。但慑于“六月廓清”的限期，洪承畴虽苦于兵寡，仍令进兵，咬住农民军，结果是连遭败绩。

六月十一日，乱马川一役，官军前锋刘宏烈被农民军生俘。

六月十四日，副总兵艾万年、刘成功、柳国镇，游击王锡命奉命引兵三千，前往宁州（今甘肃宁县）增援，以解农民军之围。当时李自成正率兵猛攻宁州城。双方交战于宁州附近的襄乐镇。官军抵挡不住，被迫撤退，至巴家寨时被农民军伏击。艾万年、柳国镇均被击毙，部卒被歼一千多人。而刘成功、王锡命则身负重伤，率残卒突围而逃。

前线的败报接踵而至，洪承畴无兵可调，急得团团转。

此时，恰好曹文诏赶到。曹文诏听到这些消息后，拔剑砍地，发誓要与农民军决一死战，报仇雪恨。

仗打到这种份儿上，还有入主动请战，洪承畴自然大喜。他连忙说：

“非将军不足办此贼！”

但高帽子戴过之后，洪承畴又诉苦道：

我手中已无兵可调，不能与你策应。你先行一步，我将从泾阳（今泾阳）趋淳化（今淳化），为将军作后盾！

洪承畴确实无兵可调，只能亲率大营为曹文诏策应。

曹文诏便带着兵卒三千向甘肃进发。在真宁（今正宁）境内的湫头镇与农民军相遇。曹文诏命其子曹变蛟为前锋，自己殿后，进行生死决战。

曹变蛟首先冲杀，斩敌五百，并急追三十里。曹文诏率步卒随后而进。没想到农民军数万骑设伏于此，突然杀出，把曹文诏等团团围住。一时间，箭如蝗飞，杀声震天。

当时农民军并不知道曹文诏的真实身份。不巧的是，有一位被俘的小卒，情急之中，大喊：“将军救我！”

这一喊，引起了农民军的注意。原先做过曹文诏部下的降卒，一下认出了曹文诏，便大喊道：

“这位就是曹总兵！”

农民军自然不会放过曹文诏！不惜一切，坚决追杀。势单力竭的曹文诏，边杀边逃，最后自知难以脱身，便举刀自刎。

一代名将就这样战死疆场！

如果站在朝廷的角度来讲，曹文诏的战死甚至可以与中都凤阳的沦陷相提并论。凤阳之变，虽是惨烈，但毁掉的仅是中都，尽管中都凤阳的意义非同小可。而曹文诏之死，使朝廷失去了一位非同一般的良将，对朝廷的围剿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

曹文诏在当时被称为良将第一，忠勇冠世。如果从他的战绩而言，这种说法一点也不为过。他先后在陕西、山西参加对农民军的围剿，几乎每仗必胜，是农民军最头痛、也是最害怕的一位将领。后来曹文诏曾一度被调任大同总兵，期间因后金入侵而被朝廷处罚。经山西巡抚吴甡的力保，曹文诏才得以重新出任助剿总兵，戴罪立功，并先后转战河南、湖广、陕西，敢打肯打，让农民军吃尽了苦头。

农民军得知曹文诏的死讯后，一时人心大快，士气大振。

与此相反，曹文诏战死的消息，却使前线官兵大受震动，严重影响了士气。

洪承畴接到曹文诏败死的消息后，仰天痛哭，泪血沾衣，追悔不已。洪承畴的功绩，多半是由曹文诏为他挣来的。曹文诏在陕西时，打仗屡屡得胜，而作为上司的洪承畴，却经常不给他上报，而贪为已功。此次曹文诏孤军深入，洪承畴明知凶险，却仍同意他冒险。在洪承畴看来，曹文诏大概还没有打不赢的仗！没想到这种轻率决定，终使一代良将丧命。

崇祯帝接到曹文诏的死讯后，深感痛惜，大概也有点后悔。想当初，曹文诏在山西战场连连得手时，崇祯帝却轻信流言，把他调任大同总兵。后又以后金入侵丢失守地为由，惩处曹文诏充军，幸亏吴甡力保。此时曹文诏战死，崇祯帝才痛感良将难得。他下令给曹文诏赐祭葬，世荫指挥佥事，并令有司建祠，春秋致祭。

洪承畴于正月受命出潼关时，崇祯帝曾命他于六个月内肃清农民军。当时，洪承畴就觉得很勉强。他给皇帝上疏说：

“地阔则难固，兵少则弗敌，鞠躬尽瘁，胜负未可知也。”

话虽是这么说，但洪承畴绝没有预计到六个月后竟会败到这种地步。无兵可用的洪承畴，面对凶狠的农民军，使尽了浑身解数，保住西安等城。他于七月份曾上疏诉苦道：

“官兵不能当贼十分之一，合省宁剿仅四万余人，其势不敌明甚。”

洪承畴能保住西安，已是不错，因为陕西境内的农民军，已占绝对优势。但农民军不久发现，陕西因连年战争、灾荒，粮食供应很成问题，于是图谋东出，进入河南。

张献忠等部试图从陕西蓝田突入河南卢氏县，遭总兵尤世威阻击，一度进入商洛山中。参将徐来朝所率部卒三千人，不肯进山追击，发生哗变，被农民军乘机击溃。徐来朝部一溃，尤世威部失去侧翼保护，加上士兵久戍荒山，水土不服，病疫发作，终于被农民军击溃，豫西边界被突破。

农民军遂分营十余路，一齐杀入河南。除高迎祥、李自成等部留陕之外，大部分都进入河南。据说农民军进入河南时，大队东行，尘埃蔽天，队伍宽四十里，长百余里，老弱居中，精骑在外保护，声势十分浩大。面对如此浩荡大队，总兵左良玉、祖宽竟不敢出击，眼睁睁地看着农民军进入河南。河南再次成为中心战场。

身为五省总督的洪承畴，竟然连陕西一省都应付不了。现在农民军主力又东出河南，更让洪承畴力所不及。朝廷见此情形，急忙商讨对策。

崇祯八年（1635）八月，朝廷任命卢象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特赐尚方宝剑，可便宜行事。

朝廷还给洪承畴、卢象升的任务作了分工。洪承畴主剿西北，卢象升主剿东南，如遇农民军再入陕西，卢象升则进关合击。同时，朝廷分别任命戴东曼、苗祚士和史可法为河南、湖广、南直隶监军御史。

卢象升被推到了叔师的位置。在明这个悲剧时代，此次任命预示着他后来的悲惨结局。

卢象升，字建斗，号九台，南直隶宜兴人。天启戌科（1622）进士，授户部主事，因得力能干再升大名知府，迁山东副使。崇祯二年（1629），因京师危急，募兵勤王。后金兵退后，再迁天雄兵备。当时正逢农民军由山西进犯河北，卢象升积极备战，虽身负重伤，但仍

能多次退敌，立下战功，被农民军称为“卢阎王”，博得声名。崇祯七年（1634），卢象升被任命为郧阳巡抚，调赴湖广。任职期间，卢象升如日中天，声名远扬，并于次年五月被提拔为湖广巡抚。至此，卢象升终于升为五省总督，不久又升为七省总督，与洪承畴一起，成为围剿农民军的两大台柱。

当时卢象升手中的兵力，主要是湖广主客兵约二万人。洪承畴在陕西，也是捉襟见肘。崇祯帝为增加兵力，竭尽全力。他先调兵七万，参加围剿，后又增兵二万，而且还从辽东前线抽调精锐之师参战。

为了配合剿灭，崇祯帝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他甚至在此年的十月，破天荒地下了一份“罪己诏”，摆出一些难得的姿态，来收笼民心。

崇祯帝这一切，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为了剿灭农民军，腾出精力来对付关外的后金。

擒杀高迎祥

面对朝廷的凶狠之势，农民军又是如何应对呢？

杀入河南的农民军，到处出击。一部自河南府的嵩县（今嵩县）杀到汝宁府的郏县（今郏县），再进入开封府的禹县（今禹县），围攻密县，后又放弃，撤围而去。进入汝宁府的农民军，围攻信阳州城失利后，又退而南下，攻湖广的孝感、应山。蝎子块的农民军数万人围攻颖州，大败官军于瓦店集，俘虏总兵张全昌。然后挥兵南下，一路杀到湖广境内的蕲、黄地区，经宿松进犯南直隶安庆府境，进攻潜山、太湖。另一支部队则杀人庐州府，犯英山、霍山，进扰舒城。

张献忠部似乎留在了河南西部地区。

留在陕西的高迎祥、李自成部也东西出击。高迎祥率部西掠，进

攻武功、扶风，围扶风城一个月而未下，待朝廷援兵至，主动撤出。李自成则东击，攻富平、三原以东。十月，李自成与官军总兵左光先、王世钦和副将曹变蛟大战于高陵。

此间，李自成部发生了一点小插曲，给李自成惹下了麻烦。

当官军与李自成部在醴泉相持时，李自成手下的得力干将高杰，竟投降了官军。据说，高杰也是米脂人，深得李自成宠信。而李自成妻邢氏则骄武多智，掌军资，负责分支粮仗。不想日久生情，两人私通。至此，高杰担心事情败露，难逃劫运，便挟持邢氏叛降官军，给李自成带来了不少麻烦。

高杰之叛，使洪承畴大喜过望。洪承畴亲自追剿李自成，大战于渭南、临潼。李自成屡败之后，向东撤逃。

此时高迎祥也受官军压迫，不断东撤，经华阴山中，与李自成会合。然后合力东击，攻破河南卢氏县境内的朱阳关，于十一月份与张献忠等部合营于灵宝。不过，也有人说，李自成根本就没出过陕西。

合营诸部随即猛攻阌乡，击败左良玉、祖宽部，进而攻陷陕州，并东击洛阳。

河南巡抚陈必谦率左良玉立即增援洛阳。攻城受阻的农民军放弃洛阳，分兵进击。

张献忠部南犯汝州府，至嵩山、九皋山，被总兵祖宽击败，死亡千余人。张献忠率部撤走。朝廷称之为“汝西大捷”。

高迎祥等则走偃师、巩县，被从汝宁赶来的祖宽大败于白沙、龙门。这支部队便南下汝宁府，围新蔡，攻遂平、确山、光山，最后被总兵祖宽大败于确山。

卢象升曾于此年底给友人写了一封信，描述了闯王高迎祥部的一些情况。他说：

“二个月来，奔命于汝、宛、河、洛之间，万分忙苦。贼多而且横，前后俘斩虽有数千，但尚不是荡平胜着。必须于崇祯九年正、二、三月内，先剿灭闯王一股，余贼方可次第歼散。”

他接着介绍了闯王高迎祥一部的情况：

“闯王之贼大约七万余，妇女约一二万，丁壮约一二万，精骑约三四万。此贼不亚安（安禄山）、史（史思明），朝廷或许还没有详细了解。此前曾在陕西与洪亨老（洪承畴）大战三次。近来入豫，我与他也大战过两次，擒斩死伤逃散约两万人，至今尚存五万，依然是劲敌！”

卢象升还点出了他的担忧：

“其余五六股贼众，见剿兵渐集，纷纷与闯王合营，势力更大。现在闯王诸部，合奔东南一带，楚、黄、凤、泗、淮、扬，十分危急。因此，我正星驰而南。”

卢象升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崇祯九年（1636）正月，闯王等部正向凤阳方向杀去。

闯王高迎祥在确山被击败后，有人说他曾一度回到陕西，开年后重新杀出。更有人说李自成根本没有与高迎祥一起杀入河南，而是始终留在陕西。意见很不统一。

现在看来，李自成是否与高迎祥一起杀到过河南，确实还有疑问，但高迎祥在崇祯八年（1635）十二月确山之败后，没有重回陕西，而是直杀东部，这大概可以确定。确山之败后，与高迎祥一度合营的老回回、蝎子块曾杀回陕西，被洪承畴部击败于临潼，南入商洛山间。或许是有人把这部分农民军误认为是高迎祥部了。

崇祯九年（1636）正月，闯王率部从河南汝宁府的固始、光山杀入南直隶境内，攻击庐州城（今合肥），阎雄率边兵急救庐州。农民军转而攻下巢县（今安徽巢县，属庐州府）、含山（今安徽含山，属和州）。

接着，农民军冒风雪攻占长江之北的和州（今和县），杀知州黎弘业等。一部分农民军沿江东击，攻打南京之北的江浦（今江苏江浦）。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急派兵防御，农民军退却。闯王、张献忠等七家数十万人则联营攻打滁州。

滁州知州刘大巩拼死固守，城防危在旦夕。卢象升闻警后，立即率总兵祖宽、游击罗岱、副将李明辅等飞驰滁州城下，与农民军展开激战。最后，农民军被击溃，尸伏无数，滁河水赤流数里。

吃了大亏的农民军急速向凤阳、寿州方向撤退。官兵沿路邀击，农民军损失惨重，开始分路向河南境内溃退。

卢象升急速追入河南，布置各军围剿，一时河南境内，杀声震天，血肉横飞。农民军最后逃入南阳府的内乡、淅川山中，卢象升奈何不得。至此年三月，闯王等又纷纷杀回陕西。

围剿的中心一下子又回到了陕西。

朝廷起用孙传庭任陕西巡抚。孙传庭出任巡抚后，锐意进攻。其副将罗尚文击杀整齐王于商洛山中。五月，贺人龙又于安定大败李自成部。

六月，总兵祖宽等率精锐边兵进入陕西作战。

七月，孙传庭、洪承畴率部追击闯王高迎祥于周至，双方展开激战。后因部下叛变，高迎祥被俘，被送往京师，寸磔而死。

高迎祥之死，对陕西的局势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久，农民军首领张妙手、蝎子块向朝廷投降。李自成部也在崇祯九年（1636）九月在汉中失利后，杀入四川，至崇祯十一年（1638）初才重回陕西。但不久李自成部连遭败绩，于此年八月重新躲入川、陕、湖广三省交界的山区，直到崇祯十三年（1640）冬才突然杀出，进入河南。

活跃于河南、湖广、安徽地区的张献忠等部，至崇祯十年（1637）底也遇到了困难。

崇祯十二年（1639）初，张献忠在湖北谷城接受朝廷的招抚。射塌天、罗汝才、混十万、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小秦王、过天星、紫微星、一字王等纷纷投降。

此年五月，张献忠、罗汝才又重新反叛。李自成也于崇祯十三年（1640）冬钻出山区，重新发展，直到最后掀翻明朝。

有关李自成、张献忠的详情，将留在后面叙述。这里先说说崇祯帝即位近十年来，大明朝为何弄成这种局面。

第六章
明朝崩盘的根源

崇祯八年（1635）十月初，崇祯帝走出了他十分难堪的一步，即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承认局势的糟糕及朝廷的失策。

初三日，崇祯帝移居武英殿，并令文武百官一律于各自官署、内阁大臣一律于朝房住宿，日夜值班。同时下达“罪己诏”。诏云：

“朕以凉德，缵承大统，意与天下更新，用还祖宗之旧。不期倚任非人，遂致虏猖寇起。夫建州本属我夷，流氛原吾赤子。若使抚御得宜，何敢逆我颜行。以全盛之天下，文武之多人，无奈夸诈得人，实功罕覯，虏乃三入，寇则七年。师徒暴露，黎庶颠连。国帑匮绌而征调不已，闾阎凋敝而加派难停。中夜思惟，业已不胜愧愤。今年正月，复致上干皇陵。祖恫民仇，责实在朕。于是张兵措饷，勒限责成，伫望执讯歼渠，庶几上慰下对。又不期诸臣失算，再令溃决猖狂。甚至大军辱于小丑，兵民敢于无上。地方复遭蹂躏，生灵又罹汤火。痛心切齿，其何以堪！若不大加剿除，宇内何时休息！已再留多饷，今再调劲兵，立救元元，务在此举……”

对一向自信刚愎的崇祯帝来说，能下这样一个“罪己诏”，真是难上加难之举。假如联想到他即位之初的那种抱负和自负，更可体会到崇祯帝此时的心？境。

那么，一向被认为是中兴之君的崇祯帝，登基八年后，何以把帝国弄成这种样子呢？

这确实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难题。三百年多年来，有关的说法实在是太多，可谓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那就是大明帝国至此已是积重难返，没有不亡的道理。

前面的叙述，多是刀光剑影，讲的是朝廷与外夷内寇的征战，及被动挨打、屡战屡败的过程。至此，让我们看看崇祯帝统治的大明朝，到底出了哪些问题，这些症结又是如何把大明朝推向深渊的。

空空荡荡的国库

朝廷的财政状况，是一个晴雨表，能直接反映出政局的好坏。

崇祯帝接位时，朝廷的财政已呈崩溃之势。这当然不是崇祯帝的错。其实，早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政时，朝廷的财政已很难支撑。幸亏张居正这位理财能手，竭尽全力，才初步扭转了急剧恶化的财政局势。到张居正逝世时，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尚有不少盈余。也正是有这

些盈余，朝廷才经得起万历帝这么多年的折腾。而张居正之后，朝廷的财政局势又重新呈每况愈下之势，至万历后期已很难扭转。

至天启年间，朝廷的财政更加恶化。崇祯帝即位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财政，都已到了崩溃的地步。上上下下都嚷缺钱。

那么，大明朝到底有没有穷到这种地步呢？如果确实穷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按理说，明朝从中叶开始，商品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人口增多，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规模，都要超过以前。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的财政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每况愈下，弄到崩溃的地步，真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明朝赋税体制的前后变化。

明代前期，朝廷的财政收入，基本上是以本色（如米、布等实物）为主，再辅之以劳役征发。这与朱元璋的立国思想是分不开的。依朱元璋的初衷，大明朝应该是一个大家庭。以农为本当然是大前提。天下的臣民，都立足于土地，男耕女织。朝廷则对天下的土地和户口进行直接而又严密的控制，保证财政行为的连续性。财政的基本原则和内容，可以说既简单又稳定，那就是土地所有者按税则交纳实物，成年男丁承担大量的徭役。在货币经济不发达的明代前期，这种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财政体系，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基本上还能维持。

但至明中期开始，这种体制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统元年（1436）开征的金花银，把南方诸省四百万石米麦改折成白银征收，开了实物赋税向货币赋税过渡的先河。从此以后，货币赋税的比重越来越重。至万历初张居正全面推行一条鞭法，更使赋税征收全面货币化，劳役征发的比例也大大降低。明后期的财政体制已逐步转化为货币财政体制。简而言之，朝廷从前所征的实物、所役的劳力，现在大部分改成征收货币。

这种财政体制上的转化，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转变得好，也不应出什么问题。但问题恰恰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转变

没有能够取得成功。说得白一点，就是旧体制下原有的优势在转变中失去了，而新体制却没有解决好旧体制下原本存在的问题，更没有发挥出应该具有的优势及其效用。

朝廷的财政要不发生危机，至少要能做到两点：一是要把该收的钱如数收缴上来，二是要做到收支基本平衡。而明后期的财政恰恰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都出了问题。

要能把朝廷该收缴的钱都如数收上来，环节当然很多，但最基本的就是要有稳定的纳税人，就是说，该交纳赋税的人要愿意交纳而且要交纳得起才行，同时还要保证交上来的钱能如数流入国库，不被贪污挪用。

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土地是最大的一宗财产，自然也是朝廷征税的主要对象。而从明中叶开始，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土地兼并的趋势越演越烈。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社会中的少数人手中，广大的自耕农、甚至中小地主纷纷丧失土地，沦为无地的佃户。顾炎武曾说过，明末江南之民，有田者仅十分之一，其余的都只能靠租佃为生。

且不论破产的农民对社会造成的种种严重后果，单就赋税征收而言，土地兼并就给朝廷造成了毁灭性的危害。道理很简单，因为那些占有大量土地的人，多为缙绅地主，他们本来就享有优免的特权，更何况还要通过种种不法手段来无限扩大这种特权，逃避赋役。

本来，明初朝廷为体恤官绅文人，规定对那些现任或退休的官员，以及取得各种科举资格的如举人、监生或府州县学生，即有可能或即将步入仕途的那些准官员，给予徭役方面的一些优惠，视等级不同而各有减免。但这种照顾是有范围的。后来虽有所扩大，但仍有限制，并非无限。没想到这一特权在明中后期却被无限滥用，以致成为顽疾而无法根治。

这些人物，都是有身份的豪户，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却通过优免特权和种种不法手段，逃避赋役。而地方官员一般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更何况这些地方官吏与这些特权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呢！

像海瑞敢动徐阶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很少见的。

特权阶层逃税，那么没有特权的小户就必须承担原本不应该由他们承担的那部分税粮，而事实上他们又承担不起。他们要么远走他乡，要么聪明一点，把自己的田产投献给那些特权户，向他们交租，因为租额毕竟要比那些赋税稍稍轻一点。这样一来，更是恶性循环。

吏治的腐败也是朝廷财政败坏的另一重要原因。明末官场的贪污之风十分猖獗。朝廷上下，普遍腐败。京官压榨地方官，地方官则又压榨百姓，羊毛出在羊身上，倒霉的是百姓和朝廷。若论法定的年俸，明末的官员个个应该清贫，至少不会富裕，但实际上，明末的官员，绝大多数人的日子过得相当不错。钱从哪里来，当然是通过贪污等不法手段，把本应流入国库的钱放到自己袋中。以致崇祯帝多次哀叹，要是武臣不怕死、文官不爱钱，事情就好办了。

其实，崇祯帝还该加上一句，那就是皇帝也应该不爱钱。事实上，从其祖、其兄，再到他自己，似乎没有皇帝不爱钱。皇室的经济欲求依凭特权地位而日益恶性膨胀，也是败坏朝廷财政的重要原因。

从表面来看，皇帝及其亲属似乎没有必要去参与这些掠夺行为，因为皇帝从理论上讲拥有王朝的一切。而实际上，当时的财政体制，还是对皇室和朝廷有所区别的。一般来说，供朝廷开支的赋税，归户部、工部、太仆寺、光禄寺分别掌管，其中主要是户部的太仓银库；而供皇室开支的收入，如矿冶关榷之税及前述的金花银，则流入内承运库。两者之间虽有联系，但在习惯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即皇室收支和朝廷收支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到明中后期，皇室首先在分配领域极度扩大自己的直接利益。大规模分割和侵吞财富，而且往往是以公然掠夺的方式实现的。如万历皇帝，为了扩大皇室财源，公然派遣以宦官为首的矿税监使，赴全国各地掠夺财富，最终激起民愤，引起了不少地方的动荡。

皇帝把钱拿去后，也绝不肯轻易拿出来。按照惯例，皇室收入（内帑）与朝廷收入（主要是太仓银）虽各有用途，但在特殊情况下，二者之间还是可以互相支持、流动的。而从万历帝开始，皇室绝

不肯拿出钱来支持朝廷。像在万历年间，先后用兵朝鲜、宁夏、播州，军费开支巨大，而万历帝却始终无动于衷，不肯拿内帑出来应急。至万历帝临死前，辽东的仗打得节节败退，急需军费支撑，而太仓却无银可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万历帝仍不理睬大臣们的哀求，就是不出内帑中的一丝银子。有位胆大的户部官员，一度截流了一笔金花钱急充军费，万历帝知道后龙颜大怒，严令户部立即补足。至于军费短缺，似乎与他无关，反正他的钱是不能动的。

不仅皇室的钱不能动之分毫用于朝廷，更严重的是，皇室反过来还要朝廷为其支付巨额开支。像万历皇帝，似乎在赌着气用钱。太子成婚、诸王册封、乾清官修建等，万历帝用掉了朝廷上千万两银子，把国库中的银子几乎用得干干净净。到了天启帝时，皇室还进一步掠夺地方库存，把各地原先的小家底掏得干干净净。到崇祯帝时，这种局面仍没有丝毫改变。自诩是一心为国为民的崇祯帝，在钱的问题上，竟跟其祖万历帝一模一样，死守着他那份内帑，不肯轻易拿出来。

除上述人为原因外，明末的灾荒似乎也特别多，许多地方几乎是无年不灾，而朝廷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救济，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灾民们连生计都无法维持，更谈不上恢复生产，交粮纳税了。

顺便说一句，这些灾荒虽有自然界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人为因素。例如，在当时这样的农业社会中，水利是命脉。政府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也是维持和组织水利事业。在明初以实物和徭役征发的财政体制之下，各地的水利事业尚能维持。在费用方面，基本上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分摊，而百姓则出劳力。明中期以后，这一套水利原则就无法维持了。如黄河，原先规定三年一小挑，五年一大挑，定期疏浚。但至万历以后，黄河利就无法维持了，导致河床淤积越来越厚，河堤经常决口，造成了严重损失。又如江南地区，水利更为重要。只要稍有懈怠，立即就有水旱之虞，重则江河决堤，轻则农业生产受到影响。但在明末，江南水利也处于失修状态，水旱灾不断。

水利重要与否，应该是每个官员都能明白的简单问题，但水利仍连年失修。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经费不足。朝廷不肯出钱，地方无钱

可出，豪绅大户更不肯破财，而广大的百姓，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白白出力。况且，百姓即使肯出力，也无处出力，因为政府不进行有效的组织。

当时也不是没有人提出过这些问题，但一谈到钱字，就没有人肯出头了，连崇祯帝也是如此。如在崇祯初年，给事中黄承吴就当面向崇祯帝指出：

“东南水患不断，都是因为水利失修。”

崇祯帝立即问道：

“水利为何不修？”

大学士周道登、钱龙锡回答说：

“水利是东南第一大事。但修理需要钱粮。”

崇祯帝一听要钱，立即沉默不语，过了好久才转弯抹角地说：

“要修水利，可否扰民？”

意思很明白，要出钱，只有向百姓要，取之于百姓却又会扰民，那就干脆不修。对朝廷最重要的财源之地东南地区的命脉之事，连崇祯帝都是这种态度，其他的人就可想而知了。

朝廷的财政收入日益恶化，而开支却日见增多，收支就很难平衡了。

自万历朝以来，朝廷的开支越来越多，本已不足的财政收入根本无法应付。

军费开支是最大的一项。万历朝打的朝鲜战争，先后用掉上千万两白银，其他如宁夏、川贵等平乱，虽是小敲小打，也动辄百万两。至万历后期，辽东之战越打越大，从此以后，变成了一个无底洞，越填越深，至崇祯朝时，已不知填进去了多少。而雪上加霜的是，天启末年西北战火燃起，朝廷又要于东北之外，再往西北扔钱，而且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军费开支也越来越大。

皇室开支则是另一大项。自万历、天启以来，皇室大事不断，万

历帝、天启帝用掉的钱，可以说是天文数字。其他一些开支，也很可观。如八年中接连死了三个皇帝，丧葬费就是一笔大数字。不过，最经常的巨额开支还是宗室。到了明末，宗室人数已达六十万，其所需宗禄就超过两税的收入，朝廷财政根本无法承担。

能赖就赖、能欠就欠的财政

朝廷上下都需要用钱，而朝廷财政又拿不出足够的钱。拖到后来，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加征，一是拖欠。

当时已普遍用银，且辅之以钱，初看起来似乎已有货币制度，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现代政府，如财政出现了巨额亏空，尚可以通过货币贬值的手段来转嫁负担，即通过多发行货币，贬值货币，来解决或缓和财政压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通货膨胀。但这种手段在明代却不行。因为明代的主要货币虽是白银，却并非银币。流通中的白银价值，基本上是其本身作为贵金属所拥有的价值，而不是朝廷通过银币发行所规定的价值，朝廷对货币价值的干预力很小，更无法使用通货膨胀的手段来达到上述的目的。朝廷虽也发行制钱，但一来是数量太少，不是主要货币，二来制钱用铜制作，加上手工，价也不菲，因此其作用不大。这说起来也十分奇怪，因为当时在中国流通的白银，无论是其数量还是地位，都已不同一般，却始终没有形成以银为本位的货币制度。而在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如欧洲诸国，却相继出现了。

这样的货币制度，使当时朝廷的亏空变得十分棘手。因为朝廷的亏空，就如一个家庭一样，亏一分即是一分，是实实在在的亏，除非拿实实在在的银子来补足，否则别无他法。在这一点上，这种亏空与后来的赤字很不一样。

朝廷财政在这种亏空状态下，根本无钱正常支出，那只有拖欠。说难听一点，就是能赖就赖，能欠即欠。堂堂天朝，做到这种分上，实在让人难堪。

明末朝廷的拖欠，实际上到了惊人的地步。像前述的水利兴修之类的开支，根本无人顾及，并且还算不上拖欠。而有些说起来实在是不能拖欠的款项，朝廷竟也能照样拖欠。

宗室的宗禄，说起来根本就不能拖欠，因为这不仅涉及到朝廷的面子，而且那些领宗禄的人，都是皇帝的至亲，在从前，事实上也不太敢欠。但到明末，朝廷也照欠不误。到后来，经常出现宗禄无法正常兑现的现象。如庆王府，据说到了崇祯六年（1633）才领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的宗禄。代王脉下的一些子孙，竟也八年未领禄米，而灵邱王的部分禄米，竟有缺五十年而没有支到的。这种情形到后来已相当普遍。当然，这与宗室人口急剧膨胀也有关系，但财政困难却是最根本的原因。

朝廷还大欠军饷。明末，各镇士兵、军官都依靠月饷生活，一个月不发饷，则其生活来源就会发生困难。当时朝廷的边饷，主要有民运银和京运银两项。边军各镇主要依此为生。但到明季，这些边饷无法如额到位，拖欠十分严重。如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至天启七年（1627）十八年中，仅京运银一项，朝廷累计拖欠各镇多达九百多万两白银。尤其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拖欠日益严重，至天启末，拖欠数到了惊人的地步。

由于朝廷拖欠，士兵根本无法如期关饷。天启年间，像固原、延绥、宁夏三镇，经常是数月无饷，经年无饷。像边远诸堡，甚至有三年领不到饷的。至崇祯元年（1628），陕西镇的兵饷竟积欠多达三十个月。至崇祯二年（1629），延绥、宁夏、固原欠饷竟达三十六个月。士兵生活无法维持，导致了大规模的哗变从乱。

上述两项，仅是典型的例子，其他类似的情形更是比比皆是。这样的拖欠，不仅使朝廷许多功能实际丧失，误事坏事，更重要的是，朝廷的形象、威信也由此扫地，颜面无存，严重影响了人心，朝廷的凝聚力也逐步丧失。试想，连这种基本费用都无法开支的朝廷，又会有多少人真心实意地为它卖命，而能不懈怠应付，甚至不起异心，另谋活路？

话又说回来，朝廷虽能用拖欠暂时应对困难，但有些费用却如燃

眉之急，无法不予支出。像在辽东前线的用兵，如不筹军饷，那么部队就无法上前线，士兵也不会去拼命，皇太极的铁骑也就会长驱直入，那当然不行。朝廷官员为了筹饷，也就只能在加征上动脑筋，即提高税率。

加派的手段虽不常用，事实上也确实不能常用，但在明朝的历史上还是有先例的。如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犯京师，朝廷兴兵防御，京师和各边的军饷，骤增至近六百万两，一时国库支绌，于是有加派田赋一百二十万两之议。但这次加派，仅限于南畿和浙江等富裕之区，而且也是临时性质，事过即罢。在此以后，虽有地方官吏私自加派之举，但朝廷却没有在全国境内加派。

至万历末年，辽东边患兴起后，仗越打越大，时间越拖越长，朝廷财政入不敷出，而万历帝也不肯支出内帑充军费。无奈之下，朝臣只能议增田赋。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朝廷连续三年加派田赋，累计每亩增加了白银九厘，全国增加田赋收入约五百二十万两。由于地方截留他用或拖欠等缘故，朝廷实际每年可增收入三百五十万两左右。由于这笔钱用于辽东战事，因此被称为辽饷。

因辽饷仍不足军用，天启年间又提高关税、监课及杂项的征收率，约能每年增加收入二百四十万两。与辽饷相加，朝廷能增加收入七百六十万两。除拖欠、蠲免、截留之外，实际能收到五百万两左右。

这种加派，真是空前绝后。当时朝廷的正常收入，应在一千五百万两左右。而在短短的几年中，朝廷竟加派至七百五十万两左右，增加了近一半。从万历末年至天启七年（1627）的前后九年中，朝廷通过加派，实征了近四千万两白银。而且，这种加派，在方法上也很成问题。如杂项，本身就是正赋之外的搜刮，具有加派性质，至此竟在加派上再加派，实在说不过去。又如，加派依全国统一标准进行，根本无视地区之间的贫富区别，对原本贫穷的地区实在是雪上加霜，西北弄成后来的局面，就与此有很大关系。

按理说，万历、天启年间的加派，已是到了不能复加的地步。但至崇祯年间，朝廷竟又连加了四次。崇祯三年（1630），兵部尚书梁

廷栋请增田赋，朝廷便于原先的九厘之外，每亩复增了三厘，称为“新饷”，全国共增田赋银一百六十五万两。到了崇祯八年（1635），总督卢象升又请增饷，朝廷便决定加征“助饷”。到了崇祯十年（1637），兵部尚书杨嗣昌又要求加征“剿饷”，每条银一两加银三分。到崇祯十二年（1639），杨嗣昌又提议加征“练饷”，每亩一分，总额达七百余万两。这种加派，无论是数量还是频率，都是令人瞠目结舌的。

这些加派中的绝大部分，最终还是要落在一般的纳税户头上。具有优免特权的那些缙绅大户，仍会像逃避正税那样，逃避这种加派。这样一来，本已十分不稳定的纳税阶层，更是陷入了绝境。明朝廷的这种做法，无异是饮鸩止渴。

对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早在崇祯二年（1629）就有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当时仍在顺天府尹任上的刘宗周，就对朝廷的做法很不满。他在给崇祯的奏疏中指出：

“陛下励精求治，宵旰非宁，朝令夕考，或许会太平立致！”

接着，刘宗周笔锋一转，毫不客气地批评道：

“然而，程效太急，不免见小利而慕近功。”

刘宗周依次列出崇祯帝为政太急、急功近利的两个方面：

“一是辽事。当时天下正是三空四尽之时，而朝廷却竭天下之力以养饥军，而军愈骄；聚天下之军，以冀一战解决问题，然而战期遥遥。这是汲汲于近功的表现。”“二是理财。一味掊克搜刮者为循吏，而抚字之政绝；上级仅以催征为考课，而原先的黜陟之法亡，赤子百姓无宁岁！而又严赃吏之诛，自执政之下，坐重典者十余人，然而贪风依然如故。这些都是规于小利的表现。”

刘宗周的看法可谓是一针见血。当时朝廷的做法，只顾眼前，而丝毫不计后果，不要说治本，就是连标也弃而不顾。

既然最高当政者如此，那么下面的官员就更是肆无忌惮了。既然朝廷要的只是钱，为了钱，大明朝的基本原则都可以弃之一边，那么

地方官当然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更何况他们还要捞足自己的那一份呢。到最后，有些地方官竟用带征、预征之类的极端手段来榨取搜刮。

所谓带征，就是把历年的欠赋积附于当年的正赋和加派之上。一起征收。所谓预征，就是预先征收来年甚至几年的赋税。每年的正赋带加派，已是极重的负担，至此竟又要在此基础上，再加重压，再加上诸如赋税不均、灾荒不断、贪污私饱等等因素，底层的民众哪能堪此重负？！

早在崇祯元年，户科给事中瞿式耜就上言直指其弊。他说：

“计海内用兵已达十年了，其间无事不取之于民间，而郡县催科苛政，也无一事不入考成。在地方任职的官员，只求征输无误，以保全自己的功名，又有谁为皇帝体恤那些黎民百姓呢？”

瞿式耜接着又描述了百姓在重赋之下的惨景。他痛心疾首地写道：

“每当催征之期一到，征新比旧的差役四驰，而那些不能按期交纳的百姓，被杻系枷锁，不绝于道；复又被鞭笞搒打，叫彻堂皇。至于那些滨水荒坡、不毛山地，其正供赋税本来就难以完成，现今又一概增征新饷，倍之又倍。不堪重负的百姓，只能卖子鬻妻，逃亡他乡。而遗留下来的逋欠，又被加之于其宗族、亲戚头上……”

瞿式耜进而又指出，由于加派过重，逋欠日久，所以每当催征之期，新征旧欠，层累而上，弄得百姓耳目乱，手足忙，心计也惶惶不定：如果补交旧欠吧，却担心负责新征的差役敲比；如果交纳新征吧，则又担心负责催旧的差役来敲比。

瞿式耜这份奏疏所描述的情形，尚是崇祯元年的情形。到了崇祯后期，随着加派的不断，底层百姓的处境更是惨烈。不堪重负的农民，大批逃亡，其负担却被转嫁到未逃者的头上，又引起更大规模的逃亡。这样越逃越多，最终导致了农村经济的凋敝，而朝廷也由此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纳税源。

在天启七年（1627），浙江文人吴应箕曾在信中详细描述了河南

农村地区的这种情形。当时他途经河南真阳（今正阳），出城四十里，举目远望，都是黄茅白草，一片荒凉，弃耕抛荒已非短期。吴应箕十分惊奇，并问轿夫道：

“此县东南西北，田地荒芜都是如此吗？”

轿夫答道：

“像这样的十有八九。息县（今息县）较好，然也有十之四五的田地像这种样子。”

吴应箕到了驿站后，见有老人、差役，便又问道：

“刚才所见一路荒芜之田，难道没有差粮吗？”

数人同声回答道：

“这些田地原本膏腴之业，怎么会没有差粮呢？”

再问：

“何以不耕？”

对道：

“无牛！”

又问：

“何以无牛？”

则又答道：

“多被盗卖出境，无牛所以无佃。此是原因之一。另外，本县马户差役苛急，被报之人，不堪苦役，因此先卖牛弃其地，时间一长连人也逃走了。人户逃跑，则田无主人，所以弃耕。但人虽去而税粮仍在，则坐赔于本户，如户不堪赔，则又坐赔于本里，或坐赔于亲戚。这些被坐赔牵连之家，家境稍富者尚能代之补交，而贫穷者无力赔偿，则也只能弃户而逃。这就是村落为墟、田亩尽废的缘故。”

吴应箕又问道：

“像这样有田而弃逃之家，为什么不在走时把田地卖掉，却宁愿抛荒呢？”

当地人回答说：

“正是因为有了田地，才为差役所苦，现在这些坐赔者正苦于弃之而不得。何况受此抛荒之田，则这些田地的赋役也随之而来，哪能受得了？！正由于此，才会相率而逃，相率而荒，日甚一日，弄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更有意思的是下面的这些对话。吴应箕觉得这种情况地方官员应该设法解决，并又问道：

“难道没有人把这种情况禀告县官吗？”

当地人则回答说：

“此县县令多属贡举出身，日暮途穷，难有晋升的机会，因此多以贪得为念。而且衙门弊多，这些官员也自知无力去其积弊，因此日操鞭扑，设法扳坐，只求粮完，哪有工夫去顾及人户之逃、田亩之荒呢？甚而至于有告理者反遭毒打，所以百姓虽怨声载道，但都不敢出声。”

吴应箕这位书生竟又天真地问这些当地人：此处为通衢，经常有布道巡抚之类的高级官员经过，难道他们就没有问起过这些情况吗？当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吴应箕尚觉得甚为遗憾。

吴应箕真是书生之见。当时的朝廷上下，又有谁不知底层的这种真实情形。就连崇祯皇帝本人也清清楚楚。他在即位时，就曾说过这样的话：

“加派之征，势非得已，近来有司复敲骨吸髓以实其橐！”

其实，地方官员这种利用加派中饱私囊的事，固然应该指责，但口口声声爱民恤民的崇祯帝自己，不也是明知底层之苦，而照样屡屡加派，同时却又惜财如命，不肯轻出其内帑吗？其手下臣僚们，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当然，这并不是为那些百官开脱罪责，事实上，明末的文官阶层确实也应为明末的剧变承担责任的。

颓靡的士风

之所以讲明末的文官阶层要对明朝的灭亡负责，是因为他们作为当时实际统治全国的精英阶层，不仅没有有效地应对明末的局面，扭转其崩溃之势，反而起了反作用，加快了明朝的灭亡。

大明帝国，虽说由皇帝一人独统，但实际上，即使是能力最强的皇帝，也无法做到事无巨细，样样过问。真正统治大明帝国的，还是那一班文官。因此，作为帝国实际统治者的文官集团，其能力、效率、责任心等方面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帝国统治的局面。

遗憾的是，明末文官集团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

自张居正之后，文官集团已无法与皇帝进行有效合作（这当然也有皇帝方面的原因），双方关系屡屡发生危机，直接影响到了朝廷的统治能力。同时，其自身内部也无法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反而陷入长期分裂，门户森然，党争不断，争权夺利，到天启年间竟发展到互相残杀、血肉横飞的惨痛地步。崇祯帝即位后，诛杀魏忠贤等权阉，清洗阉党，虽大快人心，但本质上也是文官内部斗争的另一形式。经过几十年的激烈斗争，文官集团已是元气大伤。更严重的是，崇祯帝清除了所谓阉党之后，文官集团原已形成的这种风气仍未有丝毫改变，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内部斗争并没有停止，仍是相当激烈。朝廷的高级官员，能超然于外而洁身自好的，可以说是寥若晨星。

依崇祯帝的本意，是要严禁植党，根除党争的，但奇怪的是，党禁越严，党争却反而越演越烈。

本来，崇祯帝在清洗阉党之后，曾任命了以韩爌为首的东林内阁。但至崇祯三年（1630）春，韩爌被罢，李标、成命基等也先后被罢归，钱龙锡竟被逮问。东林内阁解体后，内阁遂被周延儒、温体仁

掌握。

崇祯朝的党争，导火线是崇祯元年（1628）底的廷推内阁。当时身为礼部右侍郎的东林党人钱谦益，入阁呼声很高，并被会推人选。这引起了同样想急于入阁的吏部尚书温体仁、吏部侍郎周延儒的不满，他们先是放风说钱谦益操纵了会推，继而又翻出天启元年（1621）浙江乡试的科场旧案，成功地使崇祯帝轻信钱谦益的人品有问题，而且有植党嫌疑，最终导致钱谦益丢官，并同时取得了崇祯帝对自己的信任。事实上，真正植党的倒是周、温等人。

由于在钱谦益入阁问题上占了上风，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周延儒于崇祯元年十二月、温体仁于次年六月先后入阁，前者还担任了内阁首辅之要职。

周、温两人入阁以后，自然也不会免俗，纷纷培植自己的圈子，巩固地位。不久，这两位刚刚还进退一致的同党，竟发生了矛盾，再次掀起了党争高潮。

原来，温体仁虽经周延儒之助而得以入阁，但入阁之后，位居周延儒之下，总觉得不能满足，于是便想取而代之。当然，温体仁在表面上是不会露出丝毫声色来的。

周延儒也不是没有把柄。如他的姻亲陈于泰（宜兴人，与周为同乡）被点为殿试第一；他引用的人，如登莱巡抚孙元化，恰恰在这时出了大事；他的家人被破例提升，且在原籍有种种不法行为而激起民变等等；甚至还有传言说他受了陕西义军首领神一魁的巨贿。一时舆论大哗，纷纷上书攻击周延儒，倒周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行为，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温体仁的暗中支持。

温体仁支持倒周，除了想取而代之外，也有其他的矛盾。如在用人方面，周延儒还不像温体仁那样，毫无原则。如温体仁与吏部尚书王永光，想重新起用逆案中的王之臣，周延儒明确反对，并对崇祯帝说：如王之臣能用，则崔呈秀也可平反了。于是崇祯帝打消了这一念头。而温体仁当然要对周延儒产生不满。由此也可看出两人之间的一些差别。

不过，在攻击周延儒的浪潮中，也有人上疏为周延儒辩护并攻击温体仁。如兵部员外郎华允诚就是如此。华允诚之疏首先指出：

“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形，诸臣有角户分门之念。”

华允诚的意思是，局势已至如此，朝廷仍是这种样子，怎么得了！然后他笔锋一转，指责温体仁干预吏部之权，提拔同乡闵洪学接替王永光担任吏部尚书、党同伐异等罪状，给了温体仁一点颜色。

但温体仁并未就此罢休。当时与温体仁关系密切的宣府监视太监王坤，以陈于泰之事狠狠参了周延儒一本。像太监参劾内阁首辅，本来就不成体统，也史无前例。因此，朝廷上下多为周延儒辩护。周延儒身处困境，便求助于温体仁，希望他能出面说句公道话。温体仁当然不会援手，反而唆使其党羽陈赞化弹劾周延儒，罗织其罪名。吃了暗亏的周延儒，最终于崇祯六年（1633）六月被赶下了台。温体仁也就当仁不让地做了首辅，并一做就是四年。当时朝廷上下都讨厌温体仁，纷纷上书要求重新召回卸职的阁员何如宠，可惜何如宠坚决不肯应召，从而让温体仁顺利得手。

温体仁此人，工于心计，不露声色，精通权术，十分了得。自以为英明无比的崇祯帝，被他玩于股掌而不知，竟说他“纯忠亮节”。正是在崇祯帝的宠信之下，温体仁把他的权术发挥得炉火纯青，于不动声色中，把他不喜欢的那些大臣们，一一予以打击。

最典型的例子是打击文震孟。文震孟以正直、才卓而闻名。在他以少詹事的身份担任皇帝的日讲官时，就以敢讲、能讲而深得好感。崇祯八年（1635），文震孟以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作为首辅的温体仁，对这一任命并不欢迎，但他表面上却装模作样，极力与文震孟搞好关系。每次拟旨，温体仁都要找文震孟商量，有所改动也一概听从。因此此文震孟竟觉得温体仁相当不错，连说：

“温公相当谦虚，怎么都说他奸呢？”

深知温体仁本性的大学士何吾驺好意提醒说：

“此人机深，不可轻信！”

果然，时间稍长，温体仁就故意设下圈套让正直的文震孟钻。温体仁先唆使吏部尚书谢升弹劾御史许誉卿营求高官，因为这位许御史曾以中都凤阳失守而重参过温体仁，温体仁自然要还以颜色，然后便在谢升的奏疏上故意降低处罚程度，拟旨贬谪。深知皇帝性格的温体仁当然知道皇帝不会如此轻易放过，必定要加重处罚，发回重拟，而耿直的文震孟也肯定要帮许誉卿说话、辩护。这样一来，文震孟就会与皇帝发生对立，撞到枪口上。

不出温体仁所料，崇祯帝果然认为原定处罚太轻，退回票拟要求内阁重议。温体仁随即提高了处罚程度，将许誉卿削职为民。耿直的文震孟自然不会同意，当即与温体仁发生了顶撞。温体仁则以帝意之名坚持己见。几天后，圣旨传下，许誉卿果然被削籍为民，文震孟则愤愤不平。

温体仁接着走了第二步。他向皇帝密报说，文震孟到处讲，言官（指许誉卿）被罢是光荣之事，这分明是讽刺皇上您赏罚不公等等。崇祯帝哪里能受得了这种气，一怒之下，罢了文震孟的官。文震孟入阁仅三个月，就被赶下台，创了崇祯朝的记录。大学士何吾驺也受到牵连，被罢了官。温体仁一箭双雕，一下赶走了两个政敌。

温体仁心机很深，手段老辣。当时曾有人这样描述温体仁的伎俩：如果他要推荐某人，一定嘱咐他人先出来提名，自己则跟附其后，暗处使劲，显得其正大无私。如果他要排挤某人，则故意予以宽假，但一定设下圈套，让皇帝发怒生气，从而改重处罚，他自己还落得人情。此法屡试不爽。从文震孟被罢免之事，可知此言不诬。

当时也不是没有人奋起弹劾温体仁的。朝臣如刘宗周、许誉卿，宗藩如唐王朱聿键，勋臣如抚宁侯朱国弼，布衣何儒显等等，都先后弹劾过温体仁，但都受到了处罚。更有一位名叫杨光先的千户，先准备好棺材，然后上书弹劾温体仁，结果被崇祯帝下令打了八十大板，遣戍辽西。

自恃英明的崇祯帝，之所以如此倚信温体仁，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崇祯帝自己的性格及用人方式，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与温体仁权术手段的高超有关。

不过，温体仁虽如此工于心计，精通权术，但最终还是露出马脚。他忘了别人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

崇祯十年（1637），温体仁接到常熟奸民张汉儒状告其死敌钱谦益、瞿式耜乡居不法的状子后，如获至宝，便想借机置之于死地，拟旨逮钱、瞿两人下诏狱严刑追查。没想到一向清高的钱谦益情急之下竟求助于太监曹化淳，请其援手。获悉这一情节后，温体仁立即上书崇祯帝，要求追治曹化淳之罪，却忘记了崇祯帝当时与太监的关系。崇祯帝接到其疏后，竟示之于曹化淳。曹化淳惶恐之极，竭力辩白，并最终弄清了原委，禀报了崇祯帝。深受蒙蔽的崇祯帝，一气之下，下令枷死了张汉儒，罢免了温体仁。圣旨传出，据说北京城中欢声雷动。回到老家浙江乌程县的温体仁，气急攻心，很快就病死了。

温体仁之后，朝廷党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文官内部的斗争，到后来几乎就变成了争权夺利的代名词。在这种情形之下，统治帝国的这些大臣们又有多少精力去处理朝政、应对时局呢？更何况他们本身的能力原本就平庸不堪。

明季文官的普遍无能，可以说是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步。三言两语也说不清，这里仅以内阁为例。

内阁是当时最高决策机构，朝廷大事，基本上先由此决策，再由皇帝定夺认可后即付诸实行。按理说，进入内阁的大臣应该个个是精明能干之人，才不枉担此重任。然而，纵观崇祯朝阁臣，真正具有干练之才的并不多见。

阁臣的选拔，虽需一定的程序和条件，但真正的决定权还是掌握在皇帝手中。崇祯帝选拔阁臣，一度曾以抓阄之法来决定人选，把这种大事视作儿戏。后虽弃之不用，但崇祯帝的个人倾向仍是决定性的。现在看起来，被崇祯帝看中而选入内阁的，似乎也没有几个真才实学之人。

如在崇祯帝即位之初，通过抓阄被选入阁的阁臣周道登，就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人物。某日，崇祯帝御经筵，问他道：

“‘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

周道登竟回答说：

“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

对这种迂腐之言，崇祯帝开始十分不悦，到后来也只好一笑了之。他接着又问：

“近来诸臣奏疏中，总有‘情面’两字。何谓情面？”

周道登竟又答道：

“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这种回答，竟然出自堂堂阁臣之口，令崇祯帝哭笑不得，就连边上的太监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再如稍后的另一位阁臣郑以伟，据说是过目不忘，学问很好，但就是不会票拟。对此，他自己也很着急，曾自叹道：

“我记诵万卷，却窘于数行（指票拟），竟要被后进所看不起！”

他有一次甚至把奏疏中的“何况”两字，误以为是人名，竟在票拟中随手写道：

“何况着按、抚提问。”

直到崇祯帝改正发回后，他才恍然醒悟。

这种成为一时笑谈的书呆子行为，当然只是少数。但当时阁臣之选，多重翰林、进士，却也是实情。这些人虽有文学之才，但不谙政务，不熟吏事，很难有经世作为，更枉谈因时应变以济时艰了。这确实是当时阁臣普遍存在的问题。

像周延儒，状元出身，出道很早，在当时也算得上一个才子。他在入阁前入阁后也都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应对时局，除了揣摩帝意迎合讨好外，好像也没有特别之处。再如在阁长达八年而且做了四年首辅的温体仁，更是个无能之辈，而恰恰是这种庸才，却能长居高位。

温体仁不仅无能，而且还在皇帝面前以无能为荣。当崇祯帝召他

询问兵饷诸事时，他竟然说：

“臣原先以文章待罪禁林，皇上不知臣笨而把臣拔到这个位置上。盗贼越来越多，真是万死不能塞责。然而臣虽愚笨无知，但票拟时却不说假话。兵饷之事，只有靠圣明裁决。”

温体仁身居如此要职，竟然以愚笨为借口，把军政职责推得干干净净，而崇祯帝竟然不治其罪，不去其位，反而觉得温体仁笨得可爱，笨得忠诚。说穿了，就是因为温体仁在说自己笨的同时，衬托出了崇祯帝的英明，崇祯帝听了十分舒心。在舒心之余，崇祯帝大概也觉得有自己这么英明的皇帝，大臣稍微笨一点，也无妨大局。

温体仁所引用的同类，也大都是平庸之辈。对内阁中的温体仁、王应熊、吴宗达三人，当时有一段民谣，专门予以讽刺，民谣称：

“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

温体仁是乌程人，王应熊是巴县人，所以取其籍贯谐音，分别被名之为乌归、王巴，而吴宗达也因无所作为，被人讥之为篾片。事实上，这种说法也没有冤枉他们。温体仁等人在阁之时，内乱外患加剧，尤其是农民起义军越演越烈，而他们不仅未曾有什么大的建树，反而误事坏事不断。

如在崇祯七年（1634），当时农民军已遍布各地，形势相当危急，而身居相位的温体仁竟对山西巡抚吴甡说：

“流贼，癣疥疾，不足忧也！”

但是，就在一个多月后的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竟火烧了中都凤阳和皇陵，天下震动。温体仁对形势判断的水平，由此可见！

又如崇祯九年（1636）九月对卢象升的调动，也可以充分说明温体仁的为官之道。当时中原战场的形势，一度曾十分有利于朝廷。但就在此时，镇压农民军最得力的前线大将卢象升，竟被召入援京师，从而给农民军以极好的喘息机会。更不可思议的是，卢象升旋即又被改调为宣（府）大（同）、山西总督，负责他很不熟悉的边事。卢象

升的调离，使农民军失去了一个强劲的对手，而朝廷的剿灭局面也因此而日陷困境。卢象升的调动，名义上虽是由崇祯帝主持，实际上却是由温体仁操纵。温体仁不满卢象升不为己所用，又忌其功高，于是明知其不习边事，却仍力推卢象升出任边塞，使之身置重地，只要稍有闪失，便可任意治罪。最后卢象升战死边关，朝廷也失去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将帅。

像这种内耗，在崇祯朝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大明朝步步溃退以致后来灭亡的原因，与其说是外患与内乱，还不如说是朝廷本身。而文官集团对此是要负相当的责任的。像上述的这些内耗，严重地影响了文官集团的精诚团结和统治能力，使其根本无法来应对时局，挽救危机。

文官集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因自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原先约束该集团的伦理道德——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也是该集团用以立身处世、统治天下的根本武器——在新的形势下沦丧了。道德沦丧，导致文官私欲横流，普遍腐化；而文官不顾一切追求私利，反过来又在更大程度上瓦解道德，造成更普遍的腐败。如此之恶性循环，最终使局面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

明末文官集团的腐败，真是触目惊心！真难想象这些自幼诵读圣贤书的精英们，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对这种情况，崇祯帝在登基伊始就十分清楚。他曾明确提出“文官不爱钱”之语，要求文官自律戒贪。对此，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一针见血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皇上要求文官不爱钱，但现在的世局，何处不是用钱之地？何官不是爱钱之人？皇人亦知文官不得不爱钱，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文官本来就是以钱晋官，做官之后自然要把本钱捞回来！”

韩一良接着就毫不客气地揭露当时的官场风气。他说：

“据臣所闻见，要谋得一督抚之位，至少须用银五六千两；而道府之美缺，也非用两三千两白银不可。以致于州县及佐贰之缺，也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可知矣。像科

道之官、馆选之进，半数也是靠钱通关节而获得的。”

韩一良还以自己为例，来说明当时官场贿赂公行的情形。他毫不掩饰地说：

“臣是从做县官起步的，现居言路做给事中。对官而言，县官是行贿之首，而给事则是受贿之魁。现在只要一提蠹民搜刮，则全归罪于州县官之不廉。然而州县官又如何能廉？！他们俸薪才多少？而开支却不少！上司票取、书仪、岁送、荐谢之费等等，无不要钱。近来则发展至每遇考满朝觐，动辄三四千两白银。这些银子不会从天而降、自地而出，州县官能清廉吗？科道上的官员称之为开市。臣于二月之内就辞谢书仪五百余两。像臣这样交结不广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韩一良敢于直陈其事，自然难得，崇祯帝不久便提拔他做右佥都御史。不过，文官集团的腐败，却丝毫没有改观，反而是愈演愈烈。到崇祯六年（1633），崇祯帝在文华殿召见群臣时，又提到了官场的腐败行为。他说：

“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来听说被选官员动辄要借京债若干，一旦赴任，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还不是要靠盘剥小民。这样怎么能选到好官？选拔的官员又怎么会爱吾百姓？”

崇祯帝心里十分清楚官场积弊，但对这种普遍腐败却无能为力。所以有人在长安门贴上一首诗谣，来讽刺当时的腐败风气。诗云：

督抚连车载，京堂上斗量。

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

官员选拔在这样的氛围中进行，则整个文官集团难免要散发出呛人的铜臭味。靠钱谋得职位的平庸之辈们，最关心的自然是如何捞钱。他们不仅要捞回本钱，而且还要为进一步的升迁准备更多的资金。相比之下，像报效朝廷社稷之类的“琐事”，则显得无足轻重了。

据说崇祯帝后来自缢身亡而被陈尸禁门之外时，农民军的军师宋献策与李岩偕行散步，见两位僧人在为崇祯帝诵经礼忏，而明朝降臣

却绣衣怒马，叱道而过，惟恐避之不及，毫无故臣惨戚之意。李岩对此大惑不解，便问宋献策道：

“何以纱帽（指官员）反不如和尚？”

宋献策不屑一顾道：

“此等纱帽原是陋品！”

李岩仍是不解，又问道：“明朝科举取士，制度周备，为什么到了国家多事之秋，却不见多少报效之人？”对此，宋献策作了一段精辟的回答：“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所以到了国破君亡的时候，鲜见忠义之臣。

“满朝公卿，哪一个不享朝廷的高爵厚禄？以致一旦君父有难，各思自保。那些做官不久的人就会说，我这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寒窗辛苦，才博得一顶乌纱帽上头，一事未成，哪有即死之理？这说明科举之不得人也。那些旧任老臣则又说，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翼翼，才熬到这一地位。大臣又非我一人，我即独死无益！这说明资格之不得人也。这两种人都认为功名是自己苦熬而得，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也难怪他们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了。可见如此用人，本来就不显朝廷待士之恩。而朝廷却责其报效，不是痴人说梦吗？

“而那些依仗权势、通过情面而被提拔的官员，骄慢贪婪，孝悌尚且不能，怎能指望忠义？那些夤缘而进的富豪子弟，既然花了本钱，自然要捞钱赢利，哪里还能顾得上忠义？

“这就是近来朝廷取士之大弊也。”

宋献策与李岩的对话，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但上述的分析，真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作为当时朝廷的中坚、社会的精英，文官集团要对晚明的悲剧负绝对的责任！

凋敝的陕北

明末的内乱，虽遍布全境，但最终酿成大祸的，却是陕西杀出来的农民军。陕北的局势，之所以会弄到那种地步，则既有陕北的特殊原因，也有朝廷方面的原因，即边政的败坏。

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虽风起云涌，代代不绝，但细究起来，则有明显的地域性。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动乱总是在某几个区域首先开始，然后才席卷各地。陕北就是其中之一。

陕西北部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处于汉民族农耕文明圈与少数民族游牧文明圈的交汇处。在明代，它的涉及范围要远远大于今天。它北控整个河套地区，西、北则是宁夏、甘肃以及青海，明朝西北的防卫全系于此。如果陕北出了问题，外族可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威胁京畿、中原，也可南进关中平原，再东击河南，动摇中原。

也正是因为陕北地处战略要冲，关系重大，所以明廷也十分重视这里的防卫。明长城自晋陕交界的河曲附近，一直西延至嘉峪关，全都在明代陕北的境内。沿长城一线，朝廷广设边镇、卫所，驻扎重兵，以北镇蒙古，西控河西、关陇。因此，兵多可以说是明代陕北的一大特点。

民悍则是陕北的另一大特点。这里地处西北，历来是民族交汇、融合之地。长期的民族融合，加之其他种种因素，养成了此地居民独特的民风。陕北人性格刚毅、凶悍、争强好斗，与中原汉民大不相同。他们往往会铤而走险，甚至揭竿而起。

除兵多、民悍之外，贫穷大概也是陕北的又一特点。且不说明代陕北的那些边缘地区，单就其中心地区黄土高原而言，其自然条件之差，经济水平之落后，也是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黄土高原高低不平，坡陡沟深。更严重的是，这里属半干旱地区，严重缺水。降水量本就不足，而黄土又蓄不住水。由于地形等方面的因素限制，凿井取水也十分不易。因此，即使是正常年份，这一地区的用水也十分吃紧，更不用说到了灾荒之年了。一旦老天几个月不下雨，则干旱必至，而饥荒也就接踵而来了。

除缺水外，这里的气候也很恶劣，其中最严重的是农作物生长期

短。像怀远地区，阴历三月尚未解冻，到九月却已落雪。像米脂等地，也是“春当种而冻弗解，秋未收而霜已降”。这种气候是很不适合农业的。

深山巨壑、地瘠天寒、亢旱少雨等恶劣的自然条件，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严重滞后。像延安地区，农民不知施肥、灌溉，甚至不壅不耕，因此生产效率很低，即使在丰收年份，亩产也不过数斗。农民极其贫困。

相对于农业而言，此地的工业和商业更是落后。此地民众，受传统影响，绝不轻易从事商业。而本地的手工业水平又极其落后，农作物不能制成货品，如有丝无绸，有棉无布，有毛皮而不能制成毯毡，即便像斧斤炉钟之类极简单之手工业，也要依靠外省人。因此，此地商业贸易全由外地人操纵，本地人只能低价销售原料，甘受外人的商业剥削，十分贫困。

像这样的地区，社会经济本已十分脆弱，只要稍有天灾人祸，便会不可收拾，历来就属于难治之地。如果朝廷能派遣得力官员前去抚治，做到政治清明、地方有序的话，则局面尚可勉强维持。但是，明末陕北的吏治却根本做不到这点。

陕北一带，地瘠民穷，交通不便，许多官员都把此地视作畏途，不肯赴任就职。那些在任的官员，也纷纷托关系、找路子，想方设法要调离。因此，明末陕北的许多州县，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缺官难补的问题。到了农民起义爆发后，这种情形则更加严重。崇祯二年（1629），延安、庆阳、平凉三府的州县官竟已缺额半数以上，却又迟迟补不上去。

从素质而言，陕北地方官也是每况愈下。在正德、嘉靖朝，陕北的地方官尚有不少是进士出身，但至万历朝时，这样的情形就不再存在了。此时的地方官，绝大多数是年老的岁贡或升任的教官，副榜的举人已不多见，进士出身的则更是凤毛麟角。即使偶尔有进士出身的官员赴任，也往往如蜻蜓点水，速调他处。有人曾对万历、天启、崇祯三朝陕北宁州、安塞、延川、安定、安化、真宁等六州县官的出身作过统计，结果是该六州县一百三十位州县官，只有五人是进士出

身，而举人、贡生出身的却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这样的官员结构，是不利于吏治的。在明代，科举的身份是被十分看重的。像这些举人、贡生们都是多年场屋失意，没有进一步晋升的机会，才不得已而去补缺的。这些人年老力衰，日暮途穷，已没有什么进取的志向，因此多持得过且过的态度。事实上，朝廷对这些人也不甚重视，甚至会因他们的出身低微而歧视、排挤他们。而地方上的那些豪贾富室，也根本不把这些出身不高、威望不够的地方官放在眼里，照样我行我素，武断乡曲，违法犯禁。“官轻俗悍”的局面也就在所难免了。

既然没有晋升的机会，又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那么，这些被放逐到陕北的地方官们自然也就自暴自弃起来，贪污腐化，不问政事，也就是明末陕北地方官的普遍行为了。这对于本已地瘠民穷的陕北，自然是一种灾难。

不过，这仅仅是明末陕北多灾多难中的一面而已！明季的陕北，灾难不断，尤其以旱灾为最重。在万历朝四十八年间，陕北有记载的旱灾年份达二十五年。在天启朝，更是旱灾、蝗灾不断。到了崇祯年间，更是年年旱灾。如崇祯元年（1628）春夏，陕北滴雨未下，庄稼全被枯死。到了崇祯二年（1629），旱情更加严重，延安、庆阳一带，便是灾情最重的地方。此年四月，有一位叫马懋才的陕北人给崇祯帝上了一疏，描述了陕北的惨状。

马懋才是陕北安塞县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备员行人。他先后到过关外、贵州、湖广等地执行过公务，对各地惨状比较了解。但他认为，各地情形，“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即最惨烈的是陕北。其实际情形远远超出有些大臣所描述的那种“父弃子，夫鬻其妻”、“掘草根以为食、采白石以充饥”之程度。他说：

“臣之家乡延安府自去年以来，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份，百姓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像粪糠皮，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勉强延以不死。到十月以后，蓬草已无，只得剥树皮充饥。榆树皮的味道稍好，所以百姓以此与其他树皮相杂而食，可稍缓其死。到年终树皮啃尽，百姓只得掘山中石块而食。石头性冷而且味腥，稍稍吃点便

觉饱胀，几天后便腹胀下坠而死。那些不甘饿死的饥民，便开始相聚为盗，抢掠财物。政府也不能禁止。偶尔有被捉捕的饥民，也毫不在乎。他们称：饥饿而死与为盗而死都是死，与其坐而饿死，还不如为盗而死，因为做强盗而死，犹能做饱鬼！”

马懋才接着说：

“最可怜者，是在延安府安塞城西某处。此地每日必有弃婴数人，啼哭号泣，呼喊父母，甚至吃食粪土。到次日凌晨，这些弃婴已无一活者。而新弃者又至也。

“更可怕的是，孩子以及孤身独行之人，只要一出城门，便无踪影。后来发现，城外之人以人骨为薪，煮人肉为食，才知原先失踪之孩童，都已被吃掉了。那些吃人的人，也于数日之后变得面目赤肿，燥热而死。因此，遍地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在县城之外，挖了几个大坑，每坑可埋数百人，被用来收拾骸骨。我到之时，已葬满三坑，而数里之外来不及掩葬者，又不知有多少了。小县尚且如此，大县则可想而知了。”

最后，马懋才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黎民百姓只能逃亡，成为饥民、流民，最终沦为盗贼。这就是秦中遍地是盗的原因！

据后来方志的叙述，崇祯朝初期，陕西几乎年年有大旱：

崇祯元年，全陕旱灾、霜灾，陕北尤重，人食蓬蒿。

二年，陕北又大旱，人相食。

三年，全陕旱灾，米脂县夏、秋颗粒无收。

四年，北起榆林，南至延安，大旱。

五年，陕北大饥，人相食，僵尸遍野。

六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

……

饥荒之年，粮价飞涨。如崇祯二年陕北粮价每石四两银子，至三年米脂每石四两银子，府谷已涨至每石六两银子。崇祯四年，延安等地涨到每石六至七两银子，安定等地竟涨至每石十二两银子。粮价居

高不下，其危害十分严重，而拿饷银购粮的兵卒更是首当其冲了。

由于陕北驻有重兵，而本地却没有多少余粮可供军用，所以边军供应历来就是件头痛的事情。在早期，明政府通过屯田、民运等办法，尚能勉强维持。但至明中期以后，税制改革，屯田崩溃，朝廷改用饷银之制，即由政府拨银给边军，边军关饷后在当地购买粮食，这种供应制度很不稳定，受粮价波动的影响很大。

士卒每月拿到的饷银就那么多，如果粮价上涨，就购买不到足够的糕食充饥。陕北长期大旱，根本无粮供应军队，外地如无粮调运进去，军队即使有钱，也无处购粮。更何况自万历末年以来，朝廷把注意力放在东北，对西北军队无暇顾及，陕西诸镇长期欠饷，士卒根本关不到足额饷银，入不敷出。到天启年间，西北士卒已普遍陷入困境，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甚至到了卖妻鬻子、变卖兵器的地步。

既然连最起码的生活都不能维持，军纪自然就要败坏，加上将吏的克扣、虐待，积怨日深，士兵们便开始思变了。聚众闹事、结伙溃逃便不可避免了。这些士兵，原本就是职业军人，家无私产，也没有什么谋生本领，除了做强盗外，别无他法。在天启年间，这种情形已很严重，到了崇祯初年，更是发生了大规模的临阵溃逃、哗变。这些边军最终都汇人了农民军的行列，成了朝廷的掘墓人。

崇祯帝上台后，还做了一件蠢事，那就是裁驿。裁驿之举，对本已恶化的陕北局势，无疑是雪上加霜。

陕西、山西之间千里有余，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因此公私都须依赖驿站、驿道。明廷也依照一定的标准予以补贴。在晋陕一带，有相当多的民众依赖驿站生存，他们虽度日艰辛，但也还算有一个固定的饭碗。

不过，至崇祯帝上台后，突然有一个裁驿之举。有一位名叫刘懋的兵科给事中向崇祯帝提出建议，要求裁撤驿站，节省费用。崇祯帝本就对驿传系统中的腐化深有不满，计划痛革，刘氏之举，正合己意，便于崇祯二年（1629）五月正式议裁，变革万历以前的旧章，重新规定驿传章程，并裁撤了一大批驿站，每年大概能省下六十余万两

白银。

裁驿之举是针对全国的，但受影响最大的是陕晋之地。许多藉此生存的民众，从此失去了谋生的来源，最终投到了农民军的行列。如明末农民军首领李自成，就是其中的一员。

也正是因为裁驿之举影响面很大，所以当时有很多官员对此坚决反对。被裁之人都把仇恨集中到刘懋身上，呼其名而诅咒之。图其形而丛射之。刘懋受此刺激，不久便郁郁而死。他的棺木运到山东后，再也没有人肯运，以致于只能寄存旅舍，经年不得归葬家乡。

后来也有不少人认为，崇祯帝此举，得不偿失。更有人认为，崇祯帝没有能理解祖宗设立驿站之意。他们说，祖宗设立驿站，就是为了控制年轻力强之人，使他们肩挑背负，耗其精力，销其岁月，糊其口腹，而不能惹是生非。崇祯帝却未能知其妙用，而刻意裁削，真是驱民为盗。

平心而论，崇祯帝改革驿递、节省国用，原本也无大错，事实上明末驿递，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问题在于，崇祯帝此举，过多地考虑了朝廷的利益，而置百姓利益于不顾。说到底，像驿递之类的衰败，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势者，百姓并不是获利者，甚至往往是直接受害者。他们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一责任。然而，在现实中，百姓却几乎没有例外地总是为那些并不是由他们造成的过错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明末朝廷的举措，基本上都是如此。百姓们被逼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也只有走官逼民反的绝路，作最后的一搏！

因此，明末的大动荡爆发于陕西，并最终导致了王朝鼎革、外族入侵，这固然有陕北方面的特殊因素，但最根本的症结正是在中央王朝。即使陕北不乱，其他地方同样会乱，并最终也会酿成大动荡。因为像明末这样的政局，已没有不乱的理由！也只有通过一次大动荡的洗涤，中国才会重新出现由乱至治的局面。

第七章
历史没有奇迹

崇祯八年（1635）十月崇祯帝第一次下“罪己诏”，可以说是局势严重恶化的标志。于内乱而言，农民军成功逸出山西，杀入中原，打破了朝廷企图把农民军团于黄河以北陕晋地区的计划。农民军求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使内战规模大大升级。而于外患而言，皇太极已取得了相当的优势，并于崇祯九年（1636）四月正式建国，表明他将与明朝争夺天下的决心及实力。

“罪己诏”的下达，也说明以崇祯帝为首的最高统治层，已清醒认识到了危局的严重程度。因为统治者对臣民的态度，历来是报喜不报忧，甚至是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肯轻易说出真话！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才肯说些真话，作些交待。而他们所以会这么做，更多的倒不是出于对臣民的负责，而是希望臣民们能为他们的江山作最后的牺牲。

《罪己诏》的基本目的就是如此。在此后的数年中，崇祯帝竭尽全力，试图阻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挽救败局。不过，奇迹却没有出现。整个局势在稍有缓和后，便继续恶化，一步步地滑向深渊。

神秘消失的李自成

崇祯七年（1634）底，山西的农民军成功地突破了黄河，进入河南地区，局面开始不可收拾。

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攻破中都凤阳，大震天下。崇祯帝震怒之下，调兵遣将，严令于六个月内歼灭农民军。总督五省军务的洪承畴移兵东出潼关，坐镇河南，指挥各路兵马围剿。

农民军迫于官军压力，又纷纷回师陕西。洪承畴又只得退镇陕西，与义军激战。六月，洪承畴连损艾万年、柳国镇、曹文诏等骁将，损失惨重。此年秋天，农民军又纷纷涌向河南，官兵根本不敢阻挡。李自成等部则继续留在陕西作战。

鉴于义军声势浩大，到处出击，洪承畴又力不从心，崇祯帝便于此年八月任命湖广巡抚卢象升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处军务，率总兵祖宽、祖大乐，副将李重镇所统关辽兵和当地驻军夹剿，并赐其尚方宝剑。这样一来，西北便由洪承畴督剿，东南则有卢象升督剿。内战规模大大升级。

在崇祯八年底至次年上半年，以闯王高迎祥为主力的农民军在河南、安徽、湖广等地与卢象升部厮杀。崇祯九年（1636）正月，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等部东出河南、安徽，一度曾围攻滁州，威胁

南京。卢象升等拼死救援，才把他们又压回河南。在河南大战后，农民军又杀回到陕西。

与此同时，李自成等部在陕西与洪承畴对杀，互有胜负。

崇祯帝为了扭转局势，先于三月再次严令卢象升等限期剿灭农民军，加强军事攻势。至五月，崇祯帝又发布“大赦山西陕西胁从群盗”诏书，招抚“胁从”，瓦解义军。崇祯帝希望通过剿抚并取、双管齐下的办法，尽快扑灭战火。

在前线，朝廷将领也调整策略，集中力量围剿高迎祥。卢象升率官兵驻扎在豫西洛阳一带，扼住农民军东回中原之路。陕西巡抚孙传庭、总督洪承畴则在陕西率兵围剿，充当主力。

七月中旬，洪承畴、孙传庭率军紧迫高迎祥部于周至，双方大战，结果高迎祥被俘，不久于北京被凌迟处死。

高迎祥遇难，陕西农民军呈群龙无首之态。不少首领纷纷投降朝廷。实力最强的李自成，被推为“闯王”，成为陕西境内的农民军主力。至此，后来名震天下的闯王李自成终于脱颖而出。

李自成，陕西米脂继迁寨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八月出生。

继迁寨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特别。它在行政区划上属于米脂县，但距米脂县城却有二百里之遥，而距横山县城怀远堡却只有数十里。因此，继迁寨反而与怀远堡关系密切，许多人甚至误以为它是横山县的属地。怀远堡是明代“九边”之一的延绥镇所属的二十八营堡中的一座，紧贴长城，是延绥镇的重要军事据点之一。据说李自成的母亲就是怀远堡上的居民，因此有人推测李自成早年或许时常往来于此地，耳闻目睹边塞风情，性格甚受影响。

李自成的祖先，已不可考，但据他自己说，他是西夏国主李继迁的后代。西夏为党项族所建。党项族属于羌族中的一支，早年迁徙至陕甘。至唐末黄巢起义时，拓思恭因助唐室平乱有功，被赐李姓，治夏州，即后来的横山县。北宋初，李继迁大举扩充势力，与宋室对抗。后元昊建国，宋称西夏。直到成吉思汗兴起后，西夏才被蒙古铁骑灭亡。李自成是否为李继迁之后，已无法考证。不过，从地域而

言，李自成的家乡倒确实是西夏之地。另外，李自成的相貌也不同一般。他身材虽不是很高，但宽大粗壮，而且是高颧深颊，鸱目鹰鼻，不可能是纯粹的汉人血统。

李自成的世系可上推三代：曾祖李世甫，祖父李海，父亲李守忠。对于其父李守忠的情况，说法很多。有人说他家境贫寒，是贫困的农户。但也有人说李守忠家境富裕，性情忠厚，慷慨好义。不过，在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当米脂知县在奉命掘掉李自成祖坟及其父母坟后，曾给陕西总督汪乔年写了一个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其坟葬在荒山野冈之中，没有墓碑，坟中除一个黑碗外，也无任何随葬品，由此可见李自成的家境是十分贫寒的。

李守忠共生二子，长子李鸿名，次子李鸿基。李鸿基就是李自成。李自成与其兄相差二十岁，比其侄子李过也只大几个月。由于李鸿名早逝，李过与李自成一起，从小就由李守忠扶养。

李自成的幼年是如何度过的，至今仍有不同说法。有人说他幼年很苦，曾被舍入寺庙，后来又到地主家放羊。也有人说他曾读过私塾，但天性却是厌文喜武。据说他曾对一位叫刘国龙的幼时朋友说：

“我辈应习武艺，成大事，读书何用？”

他与李过、刘国龙比试力气，两人不如他力大，他因此十分高兴，说：

“大丈夫应该横行天下，自成自立，若株守父业，岂男子乎？”

从此以后，他便改名李自成。

这些传说是否属实，现在已无法深究。这其实也不奇怪。因为像李自成之流，本是社会底层末流，在成名之前，也不会太引人注目。李自成后虽名震天下，也做了几天的皇帝，可惜的是时间太短，还没有来得及编造自己早年的那些辉煌历史。按惯例，如果他能坐稳江山的话，那么，他就必定会有也应该有许多与他辉煌成就相符合的神话般的早期历史，就像许多成功的开国皇帝那样。既然他原先本不受人注目，后来也没来得及编造，那么，诸种传说纷纷而起，令后人不知真假的局面也就难免了。

大概是在天启六年（1626），当时约二十一岁的李自成去银川做了驿卒。驿卒生活十分困苦，李自成自然吃了不少苦头，其反心便渐渐形成。至崇祯二年（1629）朝廷裁驿，李自成被迫离开驿站，生活更无着落。次年，随着灾荒的加重和动荡的加剧，李自成终于加入了造反的大潮。

李自成的从乱，是官逼民反的典型例子。其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摆脱死亡的威胁，绝无什么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伟大名目。在死亡面前，良民与盗贼仅是一念之差，不是坐着等死，就是铤而走险，用性命去赌一下，或许还能博得苟延残喘的机会。当然，李自成后来能脱颖而出，也并非全是侥幸，而与其性格、能力等大有关系。纵观明末，无论是流芳百世者，还是遗臭万年者，总是有些不同常人之处。

李自成先是投在王左挂手下。崇祯三年（1630）王左挂败降官军，其手下部将或降或死，李自成便投了不沾泥（张存孟）。崇祯四年（1631），不沾泥在关山岭一役被官军重创后，竟投降了朝廷，其余部便各奔东西。李自成又率部投了闯王高迎祥。

有不少人认为，李自成是高迎祥严格意义上的部下，绝对接受高迎祥的指挥。甚至还有李自成是高迎祥的外甥之类的传说。这些说法未必确当。李自成虽是闯王高迎祥的部下，但并非绝对服从高迎祥的指挥，双方的关系是松散的，有时甚至就是名义上的。对农民军的首领来说，最重要的是手中掌握的实力。只要有实力，便能立住脚，否则便没有活路。李自成手中有一定的实力，所以虽不断改换门庭，但始终不倒。到崇祯四年（1631）夏，王自用在山西大聚群雄时，李自成虽名义上仍是高迎祥部属，但已属“三十六营”之一了。至于高迎祥是否为李自成的舅舅，则至今仍很难下定论。有人认为李自成的名号“闯将”与高迎祥的“闯王”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其实，这种推断也是没有足够的依据的。

至崇祯九年（1636）高迎祥被擒杀后，李自成接过了“闯王”名号，成为西北农民军的首领，当然也就成为洪承畴追杀的主要对象。

高迎祥被杀后不久，农民军的两位著名首领张妙手（即张文耀）、蝎子块（即拓养坤）分别从徽州和秦州（今甘肃徽县和天水

市）赴凤翔投降。陕西巡抚孙传庭待之有礼。感召之下，张妙手当场率部投降，蝎子块则在次年三月也遣散部众，亲率头目十二人至会城乞降。李自成等人的压力明显增大。

崇祯九年（1636）春，李自成主要在陕西北部自己的家乡米脂、绥德一带活动。他曾一度打算东渡黄河，杀入山西，但明军已严阵以待，无机可乘，只得向西突击，避人巩昌府徽州（今甘肃徽县）、成县（今甘肃成县）、阶州（今甘肃武都）等地。

此年九月，李自成等部向汉中进军，声势浩大。朝廷急调总兵曹变蛟赴汉中，并悄悄进驻府城。毫不知情的李自成等部，误以为汉中府城中无多少兵力，竟贸然发动进攻。城中的曹总兵不动声色，等其接近城时，突然猛击，大开杀戒。

吃了大亏的李自成等部，只得南下四川。此年十月，李自成等先破川陕咽喉宁羌州（今陕西宁强），再破四川七盘关和朝天关，占领广元县。此后，李自成如入无人之境，势如破竹，在一个月内连破昭化等三十八座州县，并击杀了四川总兵侯良柱。十一月初，李自成等部竟开到了成都郊外，耀武扬威，吓得四川巡抚王维章等面无人色，拼命向朝廷求救。

崇祯帝急令洪承畴火速入川协剿。洪承畴得令后立即率固原总兵左光先、临洮总兵曹变蛟及副将马科、贺人龙、赵光远等部官兵一万余人进川，又檄调延绥总兵王洪、宁夏总兵祖大弼等部屯驻汉中、略阳、徽州、秦州，准备在李自成等部出川时加以堵击。

崇祯帝还对四川的人事作了调整。四川巡抚王维章被撤职查办，由傅宗龙接任其职。陈廷谟则被降三级戴罪杀贼。调整之后的四川当局，也立即调集各处川兵约七万人，布置在成都至阆中一线，以防农民军向川东、川南发展。

这样一来，李自成等部基本上被压缩在嘉陵江以西地区，无法向川东、川南进军，而川西地区则又是少数民族地区，不利发展。僵持到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李自成等部只得分路突围，出川北上，重返陕西。李自成等率部杀向临洮、河州，争世王等率部则取道阳平

关、略阳，北经平凉、固原，直抵庆阳，不久又回陕北。

洪承畴入川扑空，急忙率兵追击。其手下悍将总兵曹变蛟、左光先、祖大弼，副将贺人龙等部紧紧咬住李自成，连战连胜，逼得李自成带着败兵残卒向西进入了少数民族地区，以避锋芒。官兵乘胜追击，不让李自成有喘息的机会。四月，李自成只得又折而东返，从巩昌府属的羊撒寨渡过洮河，逸向西和、礼县（今甘肃西和、礼县）。为了避免让官兵发觉，李自成只得与部下分路而走。李自成所率一股数百人，一度几乎被总兵左光先追俘，处境十分险恶。

五月间，李自成汇集残部约三千余人再入四川境内。痛失战机的洪承畴，此时急令陕西监军道樊一蘅，促副将马科、贺人龙率部进川追击。他本人则带总兵曹变蛟、王洪赶到汉中府的西乡县（今陕西西乡），并檄调总兵左光先率部进驻汉中府，同时在阶州、徽州、文县（今甘肃武都、徽县、文县）及略阳（今陕西略阳）一带布置兵力，严防李自成等部再度北逸或西进。四川巡抚傅宗龙也调集军队，严防农民军窜入成都平原。

李自成在各路官兵夹击之下，十分被动。八月初，双方激战于南江县（今四川南江县），李自成大败之下，夺路北逃，至八月中旬突至陕西城固县（今陕西城固县）境内，准备渡过汉水，取道石泉、兴安（今陕西石泉、安康），杀向湖广或河南境内。没想到在渡河之时，却被左光先部痛击，仅剩下千余人随李自成侥幸逃逸，退入附近山区。

更令李自成伤心的是，他当时最得力的部将之一、六队头目祁总管，竟率六百余人下山，向左光先投降。

如此一来，李自成几乎已完全丧失了实力，只得带着数百名心腹逃入深山密林。洪承畴大喜过望，认为很快就能彻底解决李自成残部。

不过，洪承畴并没有如愿。尽管李自成只剩下残部数百人，而且终日东躲西窜，不成气候，但他并没有像洪承畴所指望的那样，或被擒于官军，或饿死于山林，而是成功地摆脱了追捕，逃入了陕西、四

川、湖广三省交界的大山密林中，一直到崇祯十三年（1640）秋天才重新出世，再震天下。

至于这两年中李自成到底躲在哪里，又干了些什么，目前还没有什么确论。有人为了弥补李自成在这两年中留下的空白，编造了许多动听的故事。其实，在当时的官私文献中，并没有留下什么相关的记载。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此时的李自成，已基本被击溃。朝廷也认为他已难成气候。不久，负责追杀他的洪承畴和孙传庭，就被调往京畿勤王，对付清军的入侵。更重要的是，张献忠、罗汝才在这一时期搞得声势浩大，成为内战的主力，几乎吸引了朝廷的所有注意力。当然，也正是这些因素，才使李自成侥幸熬过难关，并最终能东山再起。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两年多时间内，李自成的活动是以活命为主，求生是其第一目标。他大概不会像有些人所描述的那样从容，甚至会在活一天算一天的窘迫处境下，仍躺在深山老林的草棚中习武修文，运筹帷幄。因此，有关李自成几次想自杀或投降的传闻，或许也有符合情理之处。好在李自成最终没有走到这一步，而是挺了过来。

张献忠兴盛

与这一时期的李自成相比，张献忠占有绝对优势。在闯王高迎祥死后的几年中，张献忠独执牛耳，成了群雄中的第一号人物。

张献忠，字秉吾，又号敬轩，陕西延安人（一说延安卫柳树涧人，属军籍），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九月，与李自成同岁。

关于张献忠的家庭出身，可谓是众说纷纭，大相径庭。

有人说，他的父亲是做鞋的，母亲是织席的。张献忠幼时读书不成，便随逃兵为盗。

也有人说，张献忠的父亲是做小生意的。有一次，他随其父贩枣至四川内江县。他父亲顺手把驴系在一乡绅的石牌坊上，没想到驴粪弄脏了石柱。乡绅家的恶奴跑出来痛骂、鞭打其父，并逼其父用手把驴粪捧走。年幼的张献忠目睹了这一情景，怒火中烧却又不敢争，便暗暗发誓：今后必来此地，赶尽杀绝此辈。后来张献忠入蜀至内江，果真大开杀戒。

又有记载说，张献忠是肤施人，阴险狡猾。其父名快，是一位屠夫，其母姓沈，早亡。张献忠依乞丐徐大过活。他有一次偷吃邻居家的鸡，不巧被撞见遭骂。他愤愤不平地说：我一旦得志，也要让此地人像鸡一样。其残忍之心，少年时代已萌。长大后，张献忠更加无赖。正逢王嘉胤作乱，张献忠便投其帐下，号称八大王，又号黄虎。

甚至还有人称，张献忠本是铁匠之子，从小刚狠。他一度以承造军器为生。当时虽有种种陋规，但煤铁等原料却有余，尚能维持生计。到后来不仅煤铁越来越少，而且工食也遭克扣，生产期限更是越来越急，工匠不堪重负，纷纷破产，而官府追逼却更是变本加厉。张献忠活不下去，便追随王嘉胤造反。

还有一种说法称，张献忠为肤施人，隶延安卫籍，将门之后。年轻时从军犯法，因总兵陈洪范救助而幸免予难，等等。这种说法至今广泛流传，为人采用。

总之，张献忠的家庭背景和早年经历，至今仍如谜一般令人难解。现在看来，张献忠早年大概是读过一点书的，并能粗通文字。据说，在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十三日，张献忠率部攻下河南宝丰县后，曾把读书人都集中到城东河仄龙王庙，一一问过姓名，并劝慰大家不要惊慌。之后，张献忠竟用陕北方言说了一句：“咱是斯文一气，老子学而未成。”说完之后，不语良久，最后把这些文人放回城中，拔营而去。这件轶事说明张献忠是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不完全是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莽夫。

按通常的说法，张献忠在造反之前，先是做过延安府的捕快。张献忠之所以去做捕快，是因为他与同学斗殴，一拳打死了同学，家里为他消灾，几乎是倾家荡产。他父亲一气之下，把他赶出了家门，于

是他便去做了公差。

在延安府做公差时，张献忠常受同事的欺负。据说张献忠曾叹道：

“大丈夫安能久居人下耶？”

依其性格，张献忠大概是会讲出这种话来的。据称，张献忠身材高大，状貌魁伟，脸上有些许麻子，其性情也是不同一般，常常以豪杰自居。像他这样既有抱负，一心想出人头地，又极具逆反心理的不安分之人，往往是乱世魔王，不会安于现状，久居人下的。

既然捕快做得不舒心，又不见得能出人头地，于是张献忠便去投军。在军中，张献忠勇敢善战，立功受赏，获得了不少财物。邻居们见财眼红，常向他借贷。只要他稍有不肯，邻居便以告官来威胁，由此也可见他的财物来得也有些不明不白。县衙的吏胥，也经常向他敲诈勒索。不巧张献忠的族人去做了强盗，县官便把他拿去拷问。张献忠大怒，说道：

“我的资财得之于战阵，是以身家性命去搏来的，不曾做过有负于人的事情。族人被胁迫去从乱，我怎么能知道？你们逼迫如此，是驱虎入山耳！”

张献忠竟然敢采取这种态度，结果自然是被重处，坐淫掠罪而被判死罪。幸而他命不该绝，正要行刑之时，主将陈洪范至，见其奇伟状貌，便替他向总兵王咸求救，最后张献忠被鞭打一百后释放，捡了性命。

如果此事属实，那么，陈洪范真是罪该万死。要是当时他不去多事，为张献忠求情，那么张献忠必死无疑。砍了张献忠，至多是陕北多一条冤魂，而放了张献忠，天下则多了一个混世魔王，纵有十个陈洪范，也无能为力了。

崇祯三年（1630），王嘉胤占据府谷，攻下河曲，张献忠在米脂以十八寨应之，从此开始了他的造反生涯。因他身材高大，面长而黄瘦，加上作战勇敢，便得了个“黄虎”的名号，又称“八大王”。与他一起造反的，还有罗汝才。罗汝才足智多谋，人称“曹操”，其军队也被

命为曹营。

至崇祯四年（1631）王嘉胤战死，王自用起而代之，率部攻掠山西时，张献忠已是“三十六营”中之一营的首领，已能算作一位人物。此年冬天，洪承畴督三边军务，张献忠、罗汝才曾率两千人投降了朝廷，不久又重新叛逃，进入山西。

此次投降，是张献忠多次投降中的第一次。在后来的造反生涯中，张献忠又多次向朝廷投降，并在渡过难关后，又无一例外地重新叛乱，让其对手吃尽了苦头。由此也不难看出张献忠的性格。相比较而言，李自成投降朝廷的次数则要少得多了。

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张献忠追随高迎祥，用行贿、诈降之法，偷渡黄河天险，逸出山西进入河南，窜入卢氏山区，然后突至内乡，经邓州（今河南邓县）等进入湖广的郧阳（今湖北郧县）、襄阳（今湖北襄樊）两府，把湖广西北部搅得天翻地覆。

崇祯七年（1634）春，五省军务总督陈奇瑜，一度曾把张献忠等部围在汉中栈道（也有人称之为兴安境内车厢峡），几乎可不费吹灰之力而全歼之。在万分危急之下，张献忠又用行贿、投降之法，骗过陈奇瑜，死里逃生。

崇祯七年（1634）底八年初，在新任兵部尚书、总督七省军务的洪承畴的追杀之下，张献忠随高迎祥再次杀入河南，并于正月中旬攻下了明中都凤阳，大震天下。

据说，张献忠与李自成在凤阳还闹下了点不愉快。两人为争中都的那些唱曲阉人，伤了和气。据说后来李自成落难时，曾两次去投张献忠，张献忠都没有接纳，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攻下凤阳后，张献忠率部南攻，围庐州、掠舒城、安庆，陷庐江。屠戮巢县、无为、潜山、太湖、宿松诸城，然后从皖西英山等地进入湖广境内，弄得罗田、麻城、黄安等地，处处报警，最后又借道河南，转回陕西。

在崇祯八年（1635）底至九年（1636）上半年，张献忠追随高迎祥，转战于河南、安徽、湖广，主要对手是刚刚由湖北巡抚升任总

督五省军务的卢象升。

崇祯九年（1636）正月，张献忠随闯王高迎祥东下安徽，一度曾围攻滁州，大震留都南京，逼得卢象升火速来救。农民军转而攻打凤阳，未果，便又进入河南。至七月，高迎祥在陕西被俘，张献忠成为势力最大的首领，活跃在河南、湖广一带。

至秋天，张献忠曾与其他各部合攻过襄阳城，没有成功。于是，张献忠便与罗汝才等向东移动。至崇祯十年（1637）正月，诸部顺江而下，与久踞在皖西英山、霍山一带的贺一龙、贺锦合营，烽火直达淮扬，搅得江北一片惊慌。

张献忠等部先攻安庆，未果。三月，农民军复攻蕲州、黄州等地，并在安庆附近重创官兵后，连下数城。

不久，张献忠重回湖广，杀向郧阳地区。六月，滇将龙在田、楚将许名世援郧，击败张献忠。张献忠被迫北撤，进入河南的南阳地区。在南阳，张献忠吃了大亏。

此年八月，张献忠部伪装成官军，想骗开南阳城的大门，不战而取之。没想到正遇上悍将左良玉率部前来，识破了张献忠之计。张献忠被左良玉部将一箭射中了肩膀，幸部将孙可望力救，才幸免于难。

吃了亏的张献忠，把部队拉到了湖北麻城、蕲州一带，与射塌天刘国能等合营。此时朝廷在军事攻势的同时，也展开了强大的招抚攻势。而张献忠、刘国能等，最终未能抵得住诱惑，于崇祯十一年（1638）纷纷投降。

熊文灿的抚局

在叙述张献忠谷城受抚之前，有必要追述一下朝廷方面的有关情况。

崇祯七年（1634）正月，因农民军势力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

广，朝廷特进延绥总督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诸省军务，以重臣开督府，统摄讨伐之事。没想到陈奇瑜这位书呆子，在汉中上了张献忠等的诈降之当，失去了全歼农民军主力的绝好机会。崇祯帝大怒之下，查办了陈奇瑜，并重用了洪承畴。

十二月，洪承畴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督晋、陕、豫、川、楚诸省军务。洪承畴依靠镇压农民军，由一位小小的道员接连破格升迁，至此而极。崇祯帝全力支持洪承畴，并令他于六个月内必须彻底解决问题。

没想到农民军竟于崇祯八年（1635）正月由河南奇袭凤阳，一举得手，令天下大震。至同年八月，崇祯帝见洪承畴一人难当重任，便又任命湖广巡抚卢象升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并规定卢象升负责东南，洪承畴负责西北，联手合剿。

卢象升接手东南战事后，敢打敢拼，竭尽全力，其局面虽不能说占尽优势，却至少尚能维持。到崇祯九年（1636）春夏，正当卢象升与洪承畴对农民军展开东西夹击，形势极为有利时，朝廷却因清兵入侵，不断抽调中原战场上的边兵精锐入卫北京。到九月份，崇祯帝竟下令当时正在郧西追杀农民军的卢象升，总督各镇兵马对抗清军。不久，卢象升又被任命为总督，主持宣大、山西军务，正式离开了中原前线。

卢象升的调离，是朝廷的重大损失，直接导致了中原战场的恶化。这一重大人事变动，虽说是首辅温体仁暗中操纵，但崇祯帝也难辞其咎。

接替卢象升的是王家桢。

王家桢，直隶长垣人，天启年间进士，素喜谈兵，官至兵部侍郎。至此，因卢象升调赴边关，王家桢才又被召复出，总督五省军务，不久又兼河南巡抚。此人少有将才，既无才能，又无魄力，上任后除在河南南阳进剿当地农民军首领杨四处外，竟然举兵不知所进，

更不敢出中州半步。他认为自己的处境比卢象升更难，注定难有起色，于是从一上任开始，便以身体有病为由连上辞呈。崇祯帝先是准他辞去总督之职，专任河南巡抚。不久，他的家兵竟发生了哗变。一方大将，竟连自己的家兵也约束不住，哪里还谈得上剿匪灭贼！崇祯帝一气之下，将他革职。

当时的西北，因有洪承畴及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力战，尚可维持。而原由卢象升主持的东南，自从卢象升调离后，则因将帅无能而显得困难重重，十分被动。除王家桢外，其余如郧阳抚治苗胙土、继任者陈良训、总兵秦翼明等，都只能龟缩在郧阳、襄阳城中，不敢出战。他们当时写的报告，内容大多是匪情。不过偶尔也有妙语，说什么“大小数十战，我既未败，贼势也未衰”云云。

在这种局势下，崇祯帝急于任用新人，以求局面改观。崇祯九年（1636）十月，兵部尚书张凤翼因清兵入侵损失惨重，不能安于其位，便自请赴边带兵御敌。此举正合崇祯帝之意，他立即同意了张凤翼之请，同时准备起用新的兵部尚书，即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万历年间进士，湖广武陵人。崇祯二年（1629），其父杨鹤曾因力主招抚而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赴陕北招抚农民军，结果大败而归，被崇祯帝逮捕严办，差点丢了性命。当时杨嗣昌为救父亲，先后三次上疏要求子代父罪，不仅使其父终免一死，而且还多少感动了崇祯帝，对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崇祯五年（1632），杨嗣昌被任命为永平、山海关巡抚。崇祯七年（1634），又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不久，因其父杨鹤去世，杨嗣昌卸职回家守制，又再居母丧，一直赋闲在家。

崇祯帝选中杨嗣昌，也不是偶然的。杨嗣昌博涉文史，多识先朝故事，口才很好，酬对敏捷。更重要的是，他不肯浮沉宦海，而是想有所建树，具有强烈的责任心。早在陈奇瑜主持剿局时，他就曾屡次上书，献计献策，颇得名誉。兵部尚书张凤翼自请外放后（不久即自杀），兵枢要职空缺，而朝中诸臣中也无合适之人，崇祯帝便想到了

杨嗣昌。此时正好田贵妃之父田弘也上疏称赞杨嗣昌之才，于是崇祯帝便正式下诏，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崇祯十年（1637）三月，杨嗣昌抵达京城，崇祯帝立即召见，君臣相见甚欢。崇祯帝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位能敢作敢为、能以宏大的气魄彻底解决多年祸患的能干之臣，因此他屡屡召见杨嗣昌，商讨军国大计，并予以绝对的支持。如此知遇之恩，也使得杨嗣昌决心一倾其才，竭尽全力为崇祯帝出谋划策，排忧解难。

不久，杨嗣昌便向皇帝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宏大计划，即“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战略。“四正”，即陕西、河南、湖广、江北四个地区，此四区被作为正面战场，由当地巡抚主剿。“六隅”，即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此六地被作为辅助战场，由该六地巡抚分防协剿。以此“四正六隅”，形成“十面之网”，由总督、总理协调。这一计划，是朝廷主动出击的攻势计划。杨嗣昌企图步步围逼攻剿，把农民军一网打尽。

杨嗣昌与洪承畴有明显不同。洪承畴老于世故，对农民军能剿则剿，不过分强求，有时甚至是抱着“知其可为而不为之”的态度。杨嗣昌则不然，他具有盲目的自信心理，不讲条件，不看主客观形势，总以为只手也可力挽狂澜。不过，他的这种态度，崇祯帝当时实在是太需要了。

为了贯彻这一计划，杨嗣昌一方面议兵议饷，一方面物色人选。

杨嗣昌建议增兵十二万。其中：凤阳和泗州祖陵官兵五千，承天祖陵官兵五千；陕西三边总督官兵三万，总理军门官兵三万，作为追剿之用；凤阳、陕西二巡抚官兵各一万，湖广、河南二巡抚官兵各一万五千。

为了应付新增官兵的军饷开支，杨嗣昌要求增饷二百六十余万两。户部尚书程国祥则认为至少需要二百八十余万两。这笔饷银，崇祯帝当然是拿不出来的，因此杨嗣昌建议按田亩加派。但其具体办法，却与卢象升不同。卢象升主张让地主、富户承担重头，而杨嗣昌却主张依田亩一体均输，不计贫富。崇祯帝接受了这一主张，并于崇

祯十年（1637）四月正式下诏加征剿饷。剿饷之征，可谓是饮鸩止渴，给本已艰难的穷苦小民加上了重压，朝廷因此也大失人心。北京城里的百姓甚至称崇祯为“重征”。

杨嗣昌还竭力推荐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王家桢为总理。他上疏说：

“臣思总理一官，与总督专任剿杀，须得饶有胆识，临机应变之才，非现任两广总督熊文灿不可！”

熊文灿何许人也？与他素无交往的杨嗣昌，为什么却要如此力荐呢？

熊文灿，贵州永宁卫籍，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崇祯元年（1628）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不久升任福建巡抚。在巡抚任内，他成功地招抚了海盗郑芝龙，得以升任两广总督。后又借郑氏之力，平定了海盗刘香，一时声誉鹊起。崇祯四年（1631），徐光启曾向崇祯帝推荐过熊文灿。后来，崇祯帝为了了解熊文灿其人，曾以赴广西采办药材的名义派出一位亲信太监，赴广东密访。熊文灿不明真相，自然不敢怠慢，不免馈送宴请。没想到他酒后一时失言，竟把自己从两广总督这个肥缺位置上推到了中原火山口。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一日熊文灿宴请太监。席间太监谈到了日益严重的中原形势，连称无人能为朝廷出力。

已有几杯酒下肚的熊文灿，听到此言，故作姿态，竟拍案而起，大声骂道：

“诸臣误国！要是我去，怎么也不会弄成这样！”

太监见到熊文灿义形于色，正中下怀，便推心置腹地告诉他实情：

“我此行目的，并不是赴广西采办，而是奉旨来专门考察你的。此事非你不可！我这就回去覆命，圣旨很快就会下来，你赶快早作准备。”

熊文灿没想到竟有此等巧事，深悔失言，连忙补救，举出“五难

四不可”等客观原因，希望能推辞掉此职。太监听后笑道，这些事等我见了皇帝后立即帮你请求解决，如果皇帝能不吝答应，你也就不能推托了。

太监回京后，果然如实汇报，崇祯帝便有了重用熊文灿的念头。杨嗣昌见此，也就投其所好，力荐熊文灿出任总理。

崇祯十年（1637）十月，杨嗣昌准备就绪后，便正式上疏，提出了“下三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的所谓“三月平贼”的狂妄计划，经崇祯帝批准后正式下达。

杨嗣昌的计划，十分详细。其主要内容是，以河南、陕西作为主战场，并彻底切断陕、豫之间的联系，防止两地义军合流。具体分工是，陕西巡抚扼守商、洛，郧阳巡抚扼守郧阳、襄阳，湖广巡抚扼守德安（今湖北安陆）、黄安（今湖北红安），安徽巡抚扼守英山、六安，凤阳巡抚扼守住颍州、亳州（今安徽阜阳、亳县）。同时，应天巡抚应堵住太湖、潜山一带，江西巡抚应堵住湖广之黄梅、广济一线，山东巡抚南下堵住徐州、宿州等地，山西巡抚应截住河南陕州（今陕安）、灵宝一线，保定巡抚应前推至河南延津一带。

各地守住之后，由总理提督边兵，监臣率京兵禁旅，河南巡抚率左良垂、陈永福等部，合剿中原。如果陕西的闯王、过天星诸部杀出潼关，则洪承畴应率左光先、曹变蛟、祖大弼等部进入河南作战。

杨嗣昌的计划，首先遭到了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反对。他认为，各边精锐已经调空，各地民膏也已刮尽，增兵加饷只能是句空话，而且农民军的主力集中在陕西，因此应先集中力量解决陕西的问题，只要陕西一定，各地的农民军自然就会平定。

孙传庭的看法，代表了陕西将领的立场。洪承畴、孙传庭等秦将，与杨嗣昌是有矛盾的。不过，他们也明显感到了杨嗣昌的压力。尤其是李自成等部突入四川，朝野纷纷指责洪承畴有意纵寇入川后，洪承畴更是日子难熬，惟有竭尽全力，加紧拼杀。至崇祯十一年（1638），洪承畴、孙传庭基本击溃了李自成部，总算是保住了面子。

就在洪承畴在川、陕拼杀时，熊文灿也想竭力做出点成绩。不过，熊文灿本钱不足，无法像洪、孙那样风光，无奈之下，他又施出了旧法，最终酿成了大祸。

熊文灿走马上任后，请求以左良玉部六千为亲兵，另外招募了两千粤人和精通火器的“乌蛮”作为自卫。十月，熊文灿到安庆。左良玉不大看得起他，更不愿受其节制，便纵兵与熊文灿的卫兵发生冲突。熊文灿只得把那些粤兵和乌蛮兵遣开，而左良玉也不受其节制。无兵可调的熊文灿，只得再请调边兵。朝廷便把冯举、苗有才部约五千人拨给熊文灿。

熊文灿自江北进击湖广后，便在通衢大道上张贴招降告示，劝张献忠、刘国能投降。十一月，熊文灿到达了广济（今湖北蕲春东南、黄梅之西）后，便正式上疏，一方面提出冯举、苗有才的五千之兵，人少势弱，请求增调边兵，另一方面又说什么蕲春、黄梅一带，农民军在此活动已近一年，原因就是此地野有鸡鹜，食有稻粮，沿江一带物产丰富，所以招来了农民军。他竟然建议，如果把百姓移入城中，坚壁清野，使农民军得不到给养，则肯定不战而退。

崇祯帝阅后大怒，连斥熊文灿是在“玩寇”。杨嗣昌也是哭笑不得，但仍为熊文灿辩解，并增调了真、保、山西之兵三千人给他。

熊文灿此举，虽遭否决，但从中已能看出他想用非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企图。

熊文灿确实想用招降的办法来不战而胜。在他看来，武力解决困难重重，不如走偏锋，用招安之法瓦解农民军，说不定事半功倍。他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早在崇祯元年（1628），他就成功地招降了海盗郑芝龙，立了大功。崇祯七年（1634），熊文灿曾试图招抚海盗刘香，没有成功，还受了处分。不过，熊文灿并未因此而放弃此道。到了湖广，他便又想再试此法。

据说熊文灿赴任时，曾专程上了趟庐山，去拜谒熟识的僧人空隐。空隐见他就说：“公误矣！”熊文灿急忙令人退避，询问原因。空隐说：“公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意思是说你自己估估你自己的

兵力能否剿灭农民军。熊文灿连说不能。空隐又问他："诸将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意思是问手下是否有独当一面的大将。熊文灿对此也无把握。空隐一针见血地指出，兵将既不足于剿灭农民军，而皇帝却仅以空名把你推到这样的位置，一旦失败，则必诛无疑。熊文灿听后，呆立良久，然后冒出一句："抚之如何？"空隐答道：

"吾料公必抚。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

空隐似乎早已算定熊文灿的命运，并警告他流寇不同于海寇，要慎之又慎。然而，面对重重困难，熊文灿仍决意以抚代剿。

崇祯十年（1637）年底，熊文灿即派生员卢鼎进入张献忠、刘国能营内招降。张献忠一面表示愿意接受招安，一面却犹豫不决，把队伍经安陆移到承天（今湖北钟祥）、襄阳地区。

春节前后，太监刘元斌在十天之内，连续两次向朝廷上疏，报告张献忠愿意接受招安的信息。

正月初九日，张献忠部移驻湖北谷城（今湖北谷城），将闯塌天的部队赶走，并发布告示，说什么"本营志在匡乱，已逐闯兵远遁。今欲释甲归朝，并不伤害百姓"。同时，拘集当地绅士为他具结担保，要求朝廷同意招抚。

就在张献忠积极准备接受招抚时，闯塌天刘国能却先行了一步。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刘国能在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正式向朝廷投降。

刘国能是与张献忠、李自成同时造反的，而且此时的实力已与张献忠不相上下。但他的情况与其他首领又多少有点不同。他本是位庠生，家庭也较富裕，当初卷入造反浪潮，多少带有点偶然性。数年来，虽转战南北，稍具势力，但毕竟仍是流寇，且前途渺茫，既谈不上建功立业，也不能回乡安居，与张献忠等更是矛盾重重，因此便产生了改悔之意。朝廷招安，无疑是一条生路，加上他母亲也力主投降朝廷，于是便决意立即归附朝廷。

刘国能的归附，令熊文灿喜出望外。熊文灿立即为他向朝廷乞请

赦罪，授予守备职衔，隶属左良玉指挥。刘国能也是知恩图报，竭尽全力为朝廷服务，终于在崇祯十二年（1639）被破格提升为副总兵。

刘国能的投降，对湖广的局势产生了很大影响。刘国能当时有部众五六万人，是农民军的主力。刘国能一降，朝廷顿失重负，官军不仅信心大增，而且更能集中力量攻击其他的农民军，局势因此大变。

四月，张献忠在谷城接收了朝廷的招抚。

刘国能一降，张献忠明显感到了压力，加紧了投降的步伐。他得知熊文灿贪财这一信息后，便派孙可望拿着两块一尺多长的碧玉和两枚直径逾寸的珍珠献给熊文灿。这一招果然有效！熊文灿立即上书朝廷，建议招抚张献忠，并派张大经为其监军。

张献忠是位老谋深算之人，深知受抚仅是权宜之计，不论是真降还是假降，保存实力最为紧要。于是，他利用熊文灿等人急于招抚的心理，辅之以行贿等手段，与朝廷讨价还价。

他坚决不遣散部众，更不愿交出兵权。在乞抚之时，他不说“解散归农”，而是称带兵万名“剿贼自赎”。当熊文灿要调他四千兵马时，他却又以“安集未定”为借口，不肯奉命。

当时并不是没有人看出其中的问题。兵部尚书杨嗣昌就很担心张献忠可能是假降，弄不好要养虎贻患，所以他主张要张献忠先袭杀李自成或老回回（马守应）后，方许招抚，否则就应借此机会“厉兵剿杀”。不过崇祯帝却在太监刘元斌和总理熊文灿的影响下，惟恐剿之不胜，错过了招抚的机会。于是崇祯帝便当面驳斥杨嗣昌道：

“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

皇帝的话自然是一锤定音，没有人敢再唠嗦。

三月二十五日，郧阳巡抚戴东旻造报了招献忠部的花名册，其中解散归农的约一万八千人，精兵约一万一千人。

张献忠就抚后，把大营安扎在谷城外十余里的白沙洲，造屋买地，定居下来，并派兵监视谷城。

对这种情形，朝廷中不少官员表示担心。有人主张把张献忠部调至前线作战，也有人主张予以彻底遣散，以免后患。最后还是崇祯帝发了话，说张献忠在谷城“造房种田，正是招抚的好处，又要遣散往哪里去”。

有了这句话，张献忠便能在谷城立住脚了。张献忠派人去北京，遍行贿赂，以求支持。对熊文灿等地方大员，更是大献媚心。他向巡抚林铭球行跪见礼，求封总兵职务，但又不到驻地襄阳驻防。兵饷不足，他就自立关梁征税，并抄没豪绅大户家产。张献忠显然想通过招抚成为一方霸主，并不是像刘国能那样死心塌地地投降。

朝廷竟然能容忍这种局面，真不知是自身无能、腐败，还是张献忠神通广大！

对张献忠的所谓成功招抚，大大鼓励了熊文灿等主抚官员。熊文灿积极派人去招抚曹操（罗汝才）、老回回（马守应）、射塌天（李万庆）、革里眼（贺一龙）等，其手法也相当妥协、软弱，以致于当时不少人讥笑他的做法是在“求贼”。

至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一度战火又起，双方互有胜负。

但是，随着李自成在陕西战败的消息不断传来，湖北、河南的农民军首领开始动摇。

十一月，罗汝才率一丈青、小秦王、一条龙、过天星、王国宁、常国安、杨友贤、王光恩等首领，从均州（今湖北均县）上了武当山太和宫，向太监李继政投降。李继政移文熊文灿，熊文灿立刻派人招罗汝才等至襄阳，大宴于官署，并奏授罗汝才为游击，分驻其众于上津、房县、竹山、保康、南漳等地。但罗汝才不肯受官领粮，愿为山农耕稼过活，并暗中与张献忠来往。

早在此年的七月，顺义王就已在河南信阳投降。不久，射塌天李万庆也在河南投降。

一时之间，农民军投降之风盛行。即使没有投降的，像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刘希尧、蔺养成等（即革左五营），也由于势单力孤而进入低潮。陕西方面的李自成等部，也被彻

底击败，不成气候。十年以来一直困扰朝廷的内乱，至此似乎已得到初步平息。

其实，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内乱并没有彻底解决，只不过是暂处低潮。只要一有风吹草动，时机成熟，那些暂时归顺朝廷的首领必将卷土重来，再树大旗。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照顾到整体性，这里必须先叙述一下清军方面的情况。

卢象升战死疆场

崇祯九年（天聪十年，1636）四月，皇太极在盛京（今沈阳）正式登基即位，建国号大清，定年号为崇德，仍以盛京为国都。

皇太极建元立国，充分显示出他将与大明朝争夺天下的决心。自此以后，他展开了一系列攻势，与明朝进行决战。

崇祯九年六月底，勇敢善战的阿济格率领十万八旗兵，自喜峰口攻入长城，于延庆集结。然后，阿济格率部深入京畿，攻城略地。

七月初八，清兵攻下昌平，再攻西山受挫后，转而南下良乡。十六日，攻下宝坻，二十二日，又下定兴，既而攻入房山。

面对危急形势，崇祯帝及其大臣们几乎是没有招架之力。清兵犯边的消息传来时，崇祯帝首先任命太监分守各关隘。至于为什么不用大臣而用太监拒敌的原因，崇祯帝的解释是太监动作利索，赴任速度要比大臣快得多！随着战局的发展，崇祯帝除了急命各地边兵火速入卫外，似乎拿不出什么办法来。

清兵攻到房山后，京师戒严，斗米三百钱，人心大乱。崇祯帝在平台召见大臣，希望能议出个办法来。大臣们仍然是陈词滥调，老生常谈，到最后还是崇祯帝想出了个主意，却仍然是“蠲助”两字。兵部尚书张凤翼无奈之下，只得自请总督各处援兵出师，勉强做出个姿态来。

阿济格一路势如破竹，连破房山、安肃（今河北徐水），攻大城。至八月，攻入文安、永清，分攻诸县，先后进攻漷县、遂安、雄县，然后攻香河，进河西务，还涿州，克顺义。再绕到京城东北，至怀柔、大安，西陷西和，分兵屯密云、平谷，再返回雄县，向北侵扰。直至九月初一日，才从冷口出塞。有意思的是，他在出塞前还在塞上树了一块柏木，上面写道：“各官免送！”

此次清兵入关，连陷十二城，大小五十余战，京畿损失惨重。除少数将领外，明朝各处战将几乎没有组织起像样的反击。仗打成了这种样子，也实在没有什么好叙功论赏的，但崇祯帝却仍要奖赏，不过受赏的主要是太监，依次是：太监曹化淳因进马赐彩币；太监曹化淳、张国元因守卫京师有功荫指挥佥事，各世袭；太监高起潜弟荫锦衣卫中所百户世袭，等等。仗打到这种份儿上，不知还有何功可叙？！

倒是兵部尚书张凤翼、宣大总督梁廷栋，深感罪孽深重，先后服毒自杀。而依此两位的人品和原先的表现，应不至于会有此举的。不过，他们幸好及时自杀，否则也难逃重罚，因为不久后，崇祯帝又改变了主意，追论其罪，张凤翼被免职，梁廷栋被处大辟，因其已死，免于实施。张、梁两位，对此似乎已有先见之明！

兵部尚书、宣大总督自然不能久缺，崇祯帝便破例把在家守制的杨嗣昌调来任兵部尚书，又任命刚从湖广前线赶来勤王的卢象升为宣大总督，负责守边。

这一人事变动，对边防并无多大积极作用。新任兵部尚书的杨嗣昌，始终认为朝廷的主要威胁是来自于农民军，而不是皇太极。他上任后的工作重心，也一直是放在镇压农民军一事上。而出任宣大总督的卢象升，虽在镇压农民军上做出了成绩，但对于边事，则毫无经验。据说卢象升的这一调动，本是首辅温体仁对他的算计，因为两人之间颇有积怨。后来的事实也表明，卢象升在任职期间，确实受到了温体仁的压制。即使在温体仁下台后，卢象升也没有得到杨嗣昌等人的有力支持，反而处处受制。

更严重的是，崇祯帝等人对皇太极的勃勃雄心一无所知。对清兵

的人侵，崇祯帝仍认为只是一般侵扰，没有意识到这已是到了两朝争天下的关键时刻。因此，朝廷尚存侥幸之心，在战略和行动上自然不会得力、有效。如此次清兵入侵后，崇祯帝也觉得边关需要加强，否则还要吃亏。但他为此做出的决定，则令人哭笑不得：他竟下令兵部向武清侯李诚铭等借款，以用来练兵买马，制器修边，到日后加上利息再归还。

就在崇祯帝举债借贷之时，皇太极却又瞄准了朝鲜。

早在即位之初，皇太极就出兵朝鲜，以剪除来自东方左翼的后顾之忧，破坏毛文龙从海上进袭辽南的陆上基地。这次出兵虽没有达到消灭毛文龙的目的，但却严重打击了朝鲜，逼迫其缔结了城下之盟，双方约为兄弟之国，朝鲜对后金春秋输岁币，互市中江。

朝鲜虽与后金订约，但并非真心结盟，相反却力图保持和明朝的友好关系，维护明朝的利益。崇祯四年（天聪五年，1631），朝鲜国王李倧拒绝后金要求征调兵船的命令，不肯助后金抢占原由毛文龙占据的海岛。李对后金使者明确表示："明国犹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国可乎？"同时，朝鲜还减少每年向后金交纳的岁币，收容后金逃人，并议罢遣使、互市等。崇祯五年（天聪六年，1632），朝鲜又拒绝向明朝叛将孔有德等提供军粮。此后，双方关系一直十分紧张。

崇祯八年（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打算登基，建元开国，希望能得到朝鲜的支持。朝鲜国王坚决予以拒绝。在崇祯九年（天聪十年，1636）四月举行开国典礼上，朝鲜使者开始不肯参加典礼，后来虽被迫参加，但也坚决不肯行跪叩大礼。最后，两位使者在遭受百般凌辱后，被迫依皇太极等人的意志行事，并接受了大清有辱朝鲜的国书。两人回国后，朝鲜上下纷纷怒斥他们是"奉使辱命"，要求予以处罚。朝鲜国王也以檄文形式回击皇太极，不甘屈服。两国关系已发展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平心而论，当时的朝鲜对明王朝是相当忠诚。而正是这种忠诚，使得皇太极下决心征服朝鲜，解决后顾之忧。遗憾的是，明朝当时已自顾不暇，无法给朝鲜这个属国提供任何保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朝鲜罹难。

崇祯九年（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皇太极决定亲征朝鲜。十二月初，皇太极率领和硕礼亲王代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豫亲王多铎、多罗贝勒岳托、多罗贝勒豪格、多罗安平贝勒杜度，共大军十万，从沈阳出发，进攻朝鲜。初九日，皇太极渡江进入朝鲜。岳托部于十三日到达了平壤，多铎部则于十四日进逼王京汉城，朝鲜国王李倧逃离国都，避入南汉山城，凭险死守待援。双方僵持不下。

崇祯十年（崇德二年，1637）正月，多尔衮出骑兵袭击江华岛（汉城东北汉江人海处），俘获朝鲜国王及重臣的家属二百余名，并以此胁迫朝鲜国王李倧。

李倧被迫于正月三十日出城投降，献出明朝所颁给的敕印，向清臣服。皇太极也释放了被俘家属，只留下了李的长子和次子作为人质。

二月初二日，皇太极班师回国。又命硕托和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进攻当时仍由明朝控制的皮岛（今朝鲜椴岛），后又派阿济格前去助战。四月十二日，阿济格奏报攻克皮岛，杀守岛总兵沈世奎，消灭守岛驻兵一万七千余人。

至此，一直制约清政权发展的东部威胁，已被彻底解除。

至崇祯十一年（崇德三年，1638）八月，皇太极再次决定奔袭明朝，发动了清朝入主中原前最大的一次入关奔袭战。

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命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以豪格、阿巴泰副之，统率八旗左翼军；以岳托为扬武大将军，以杜度副之，率八旗右翼军，分两路攻明。八月二十七日，岳托自率右路军自沈阳出发；九月初四日，多尔衮率左路军从沈阳出发，浩浩荡荡，杀向大明。

为配合多尔衮和岳托，皇太极亲率大军于十月初十日离开沈阳，向山海关进发，以牵制住辽西的明将祖大寿等人援关内。皇太极率部先后骚扰义州、锦州，一直至中后所，遍扰辽河以西地区，牢牢地牵制住了辽西的明军。

多尔衮、岳托率部分别从墙子岭、青山口等关隘攻入长城。正在密云为监视太监邓希诏祝寿的总兵吴国俊急忙率兵至墙子岭与清兵激

战，溃败退至密云。蓟辽总督吴阿衡率兵救援，兵败而死。太监邓希诏不战而逃。两路清军会合后，乘胜挺进，越过迁安、丰润，至通州以西地区，绕过北京，南下涿州，然后分兵八路，在京师南部地区往来扫荡。

面对清军的凌厉攻势，崇祯帝急令各地兵马勤王，并赐卢象升尚方宝剑，总督天下援兵。

十月初二日，京师戒严。

十月初四日，崇祯帝在武英殿召见文武大臣及卢象升，商议御敌之计。卢象升向崇祯帝明确提出主战的基本方针。卢象升列举了消极防守的诸般困难，认为与其处处被动防守，还不如主动出击。崇祯帝认为言之有理，便命他与兵部尚书杨嗣昌、总督中官高起潜商议具体之策。当时杨嗣昌、高起潜并不同意卢象升的看法，于是双方意见不一，不欢而散。卢象升返回昌平前线。

当时卢象升正遭父丧，本应卸职丁忧，但崇祯帝令他夺情留任，所以他是穿着麻衣草履做督师的，心中不免会有些悲壮。

初五日，卢象升以三万兵马扼守昌平。当时，清兵正在南下，势不可阻。卢象升偏不信邪，想迎其锋芒，与其碰一碰。他下令手下诸将，挑选精兵锐卒，约定于十五日夜里分四路袭击清军营地，并下死令："刀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违者斩！"这在当时确实是个大胆的计划，大概也只有卢象升才会有这样的胆子。

总督中官高起潜得知后，很不以为然。他说："只听说过雪夜下蔡州，未曾听说月夜突袭。"意思是你卢象升搞夜袭，也不应该把日子挑在月半。于是，高起潜便以骑师应该少而精为借口，不肯出兵助战。

卢象升哪里能受得了这种气，便要求分兵。杨嗣昌便以宣府、大同兵归卢象升，以关宁诸路兵归高起潜。如此一来，卢象升手中只剩下不足两万兵马。不过，决意要战的卢象升，仍如期在巩华城誓师。他慷慨激昂，说到激动处，泪如雨下。

杨嗣昌见卢象升真要拼命，心中不安起来，便令卢象升赴通州与

高起潜会合，卢象升根本不听，认为这是有意阻挠他出师。杨嗣昌不得已，便急冲冲赶到卢象升军中，劝说卢象升不得轻举妄动。卢象升哪里能听得进去，反而痛斥他道：

“你们决意要与清军议和，难道不想想城下之盟是春秋大耻吗？况且我身负重任，京城中口舌如锋，如果一开和议，肯定是袁崇焕第二。即使不惧杀身之祸，那么像我这样身服重孝之人，现在不去奋身报国，移孝作忠，则是忠孝两失，我还有什么脸面立于人世呢？！”

杨嗣昌被说得无言以对，过了很久才说道：

“你是用尚方剑架在我脖子上吗？”

卢象升接道：

“尚方剑须先架在我的脖子上！如果自己不能歼敌，尚方剑哪会轻易架到别人脖子上。不战而言抚，我决不同意！”

当时杨嗣昌等人主张与清兵议和。在他们看来，清军势不可挡，打起来大概不是其对手。另外，当时陕西的局势虽趋稳定，但河南、湖广仍在激战，朝廷也实在无力两面开战。如果让卢象升一味恋战，弄不好会把京师丢掉。不过，杨嗣昌也知道，议和毕竟不光彩，危险也很大，袁崇焕就是一例，况且崇祯帝现在也决意要战，所以经卢象升这么一说，也就不便再争下去了。

卢象升如期发动了进攻，可惜没有得手。也就在同一天，高起潜部的刘伯禄也在卢沟桥被清兵击败。形势陡然紧张起来。十九日，崇祯帝下令诸大臣分守京师各门，并火速檄召陕西前线的军队入援，于是，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等率十五万大军匆匆北上救援。

十一月初，清兵掠良乡、高阳、涿州等地，然后分兵出击，势如破竹。

初八日，崇祯帝再次召集文武大臣等商议战局。工科都给事中范淑泰说：

“现在敌已临城，朝廷却无定议，不知是战？还是款？”

崇祯帝反问谁人言款？范淑泰答道：

“外面都是如此之说。而且凡有警报，秘而不传，俱讳其事。”

崇祯帝则辩解说，这是因为事涉机密。

不过，范淑泰讲的确是实情。当时形势如此危急，朝廷竟态度不明，或战或和，连许多大臣都弄不清。崇祯帝还以事关机密为由，不向臣民公布实情。如此做法，岂能让天下臣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

范淑泰还针对崇祯帝抱怨粮饷匮乏而发表看法。他说：

“戎事在于行法，今法不行而忧饷，即天雨金，地雨粟，何济？”

他这句话大概说得过重了，逼得崇祯帝说出了真话：

“朝廷何尝不欲行法！”

此言足见崇祯帝的无可奈何。连位居九尊的皇帝也讲出了这种话，由此也不难知道当时的朝政了。君臣们讨论了半天，仍是拿不定主意。倒是大学士刘宇亮，一时热血沸腾，站出来自请视师，着实让崇祯帝高兴了一阵。不过，刘宇亮过后又有些后悔自己的一时冲动，便自己把视师改为阅视，令崇祯帝很不高兴。

清兵继续攻掠。十一月初九日，清军围攻高阳城。原大学士、辽东督师、少师孙承宗就住在高阳城中。当时七十六岁的孙承宗，亲率家人上城抗敌，视死如归。初十日，高阳城破，孙承宗被俘。清兵不忍加刃于他，而让他自尽。孙承宗望北叩头，投环而死。全家子侄男妇百余口，及家中佣人，除一个六岁的孙子及其母亲二人幸免于难外，全部罹难。在其感召之下，城中数千人，在城陷之时，仅有数十人逃亡。

孙承宗之死，令朝野震惊。崇祯帝令有司优恤。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对孙氏的优恤直至第二年才进行，据说是首辅薛国观、兵部尚书杨嗣昌在暗中压制。

攻克高阳后，清兵连下衡水、武邑、枣强、鸡泽、文安、霸州、阜城、平乡、南和、沙河、元氏、赞皇、临城、高邑、献县等地，而

明朝却始终无法进行有效反击。督师卢象升处处受制。崇祯帝在薛国观、杨嗣昌的影响下，打算以孙传庭替而代之，并拿掉了卢象升的兵部尚书衔，令其戴罪立功，又令大学士刘宇亮督察各镇援兵。

当时清军兵分三路，分头进击。卢象升在崇祯帝的压力之下，分兵救援真定，自己则率兵赴保定，寻敌决战。当时卢象升只有残卒数千，缺粮少饷，已无多少战斗力。

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进师至顺德府的巨鹿县贾庄，与清兵发生遭遇战。卢象升居中，杨国柱居右，虎大威居左，列阵迎战。至次日，清兵合围，骑兵数万围之三匝。卢象升率部奋勇冲杀，自辰时激战至未时，炮尽矢穷。最后，卢象升在亲手击杀数十人后，身中四矢三刃，仆地而亡。其亲兵杨陆凯伏在卢象升身上，保护其遗体，身中二十四箭而亡。此役，卢象升所部几乎是全军覆没，仅有杨国柱、虎大威等少许人得以脱身。

卢象升在巨鹿激战时，高起潜正率兵自驻地广平府鸡泽县北上，仅距卢象升五十里之遥。当卢象升战败的消息传来，高起潜急忙避退，没想到中了清军埋伏，大败而逃。当时大学士刘宇亮驻扎在定州（今河北定县），卢象升败报传来时，他竟吓得瘫在地上，不能站立，后来匆匆赶到保定孙传庭的兵营中，以求自保。

高起潜竟把卢象升的死讯隐匿不报。杨嗣昌得到死讯后，先是想诬陷卢象升遇敌退却不战的罪名，没有成功，继而又疑卢象升是否真的战死，派人验视。后来，兵部主事杨廷麟派人在战场上找到了身穿孝服、遍体鳞伤的卢象升遗体。顺德知府于颖，据实上报朝廷，这才弄清了真相。

由于杨嗣昌的阻挠，卢象升的遗体过了两个多月才得以收殓。其应该享有的优恤，也是过了好久才给予。天下的人都为他鸣不平，认为是杨嗣昌在暗中捣鬼。这也是难免的，因为很多人都把卢象升之死归罪于杨嗣昌。如计六奇就认为，卢象升的战死，原因有六：一是与杨嗣昌不和，二是与高起潜不协，三是以弱当强，四是以寡击众，五是无饷，六是无援。后面五条都是因杨嗣昌奸谋所致。所以计六奇说：

“虽然，杀象升之身于一时者，嗣昌也；成象升之名于千载者，亦嗣昌也。”

不过，也亏得有一位像卢象升这样的忠臣，才让后世的宜兴人心里好受些，否则天下还以为明末的宜兴人都像周延儒一样。宜兴自古以来人杰地灵，出了不少人物，却以文人为多，少有带兵征战、搏杀疆场的慷慨之士。卢象升实在是周处以后、千年以来的第一人。不过，做忠臣的代价也实在是大。卢象升战死时才三十九岁，正是壮年。他的弟弟卢象观等，数年后又在宜兴起兵抗清，最后兵败被杀。卢氏一门，从此以后一蹶不振。

卢象升之死，令天下大震。大明朝自与后金开战以来，虽多次损兵折将，但尚未有督师战死的先例。而另一主帅总督高起潜也是兵溃而逃。这真是前所未有的惨败。

清军乘胜横扫畿南几十个州县，然后突然折向山东。杨嗣昌等急调兵布防，山东巡抚颜继祖移师德州。清兵则避开德州，由东昌、临清等渡过运河，然后兵分三路，一路向高唐，一路向济宁，一路围攻济南。

崇祯十二年（崇德四年，1639）正月初二日，清兵攻下了兵力空虚的济南。济南城中的德王朱由枢被俘（后被押解至盛京沈阳），布政使张秉文，副使邓谦济、周之训，运使唐世熊，知府苟好善被杀。济南城被焚掠一空，城内外积尸十三万。明清开战以来，济南是第一个被攻陷的省会。济南的沦陷，不仅使运河沿岸遭受到严重破坏，运河粮道遭到威胁，更重要的是，对交战双方的心理影响巨大。

崇祯帝急令各军驰援济南。大学士刘宇亮，总督孙传庭、祖大寿等率重兵赶赴济南。清兵则撤离济南，南下攻击诸县，最远攻到兖州，因安庆巡抚史可法驻屯徐州，才未继续南下，转而攻击沧州、青县。

由于岳托病死，多尔衮率兵趋天津。三月，在几经冲杀后，清兵最终突破明军的防线，于青山口出关，顺利返回沈阳。

清兵此次入关奔袭，可谓完胜。据多尔衮称，他的左翼军，共克

城三十四座，降者六座，败敌十七阵，俘获人口二十五万七千余等等。右翼军副帅杜度则称，他共克城十九座，降者二城，败敌十六阵，杀两总督及守备以上官共一百余员，生擒一亲王，一郡王，一奉国将军，俘获人口二十万四千余，缴获黄金四千余两、白银近一百万两。

战后，崇祯帝对参战将帅也进行了清算。他令杨嗣昌议文武官员失事罪，分以下五等：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帅、纵敌出塞。不久，顺天、保定、山东巡抚，蓟镇总兵，山东总兵等三十二名高级官员，被处死刑。大学士刘宇亮削籍。而作为大学士、兵部尚书的杨嗣昌，竟未受到任何处分。朝野大为不满，一片哗然。后来，崇祯帝为平息不满，才勉强让其落职冠带视事。

更为严重的是，崇祯帝及杨嗣昌等最高决策层，并没有从根本上去反省战争失败的原因。他们总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文武大臣无能、怕死，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亦应负责任，而且是负主要责任。他们更不会去反省朝廷体制上存在的问题。

不过，崇祯帝似乎也没有时间去反省，因为清兵才退出长城不久，湖广又出了大事，原先归顺朝廷的张献忠，竟又在谷城重举造反大旗了。而那位躲人深山、已销声匿迹了很久的李自成，也乘此机会蠢蠢欲动了。

已被多尔衮折腾了半年多的崇祯帝及其朝廷，才刚喘了口气，不想湖广战火又起。精疲力竭的崇祯帝和他的那班大臣们，只得再打起精神，来全力对付张献忠。

杨嗣昌督师

张献忠再反于谷城，令朝廷措手不及，十分狼狈。

其实，在当时的满朝文武中，也有几位头脑清醒、没拿张献忠钱财的人物。他们对张献忠始终不放心，认为应抓住机会，予以彻底解

决，免得养虎贻患。如郧阳巡抚戴东旻、襄阳道王瑞柟、郧阳按察林铭球、总兵左良玉等，都曾提出，甚至已着手准备对张献忠突袭，但熊文灿坚决不肯，认为不能轻举妄动。

熊文灿等人，一来是拿了张献忠不少好处，不便多说；二来是，他们力主抚局，如果张献忠一反，抚局便破，难以向天下交待。因此，熊文灿等便对张献忠事事优容。而张献忠也是利用有利时机，招兵买马，训练士卒，整肃军纪，制造火器。他还请人讲授孙、吴兵法，研究埋伏、连弩、团营、方阵、左右营诸战法等。更可怕的是，他广行贿赂，广交文武官员，自湖广至京城，路路皆通，朝廷的一举一动，他完全掌握。

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初，张献忠终于再反于谷城。其部下毁城、劫库、放囚。谷城知县阮之钿服毒未死，拒不交印，被农民军惨杀。阮之钿对张献忠再叛早有预感，多次上疏朝廷要求预防，却无人理他。他只得早早写好遗书，准备好毒药等死。在谷城的监军张大经投降，陈洪范在谷城协防的部将马廷宝、徐起祚也被胁从。按察林铭球拒绝与张献忠合作而被杀。

接着，张献忠便率部向房县进发，与罗汝才会合。临走之前，张献忠把他曾行过贿的朝廷官员名单和钱物数目张榜公布。他对此举很是得意，并说没拿过他钱的，只有襄阳道王瑞柟一人而已。

五月二十三日，张献忠率部到达房县。罗汝才等部一哄而起，纷纷响应。张、罗诸部于次日联合攻打房县。

房县知县郝景春是个非常负责的人。他也早就看出了张、罗等人的反心，曾请求朝廷派兵支援，却没有人理会。他只得与主簿朱邦闻、游击杨道选内修守具，外定盟书，苟且旦夕。农民军攻城后，他坚决抵抗，固守待援，坚持了好几天。最后因郧阳卫指挥张三锡打开北门降敌，郝景春才被俘，他拒绝投降，惨遭杀害。其子也同时遇害。

张、罗造反后，均州五营首领王光恩、王国宁、惠登相、常国安、杨友贤聚在一起商议如何应变。王光恩说：“大丈夫各立门户！

今献忠反，吾辈亦反，是出裤下，吾不为也。”他还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以示其不反的决心。后来，惠登相等人发生动摇，而王光恩却坚决站在朝廷一边，说话算话，绝不动摇。

张献忠等人的重新反叛，使湖广抚局顷刻瓦解。最紧张的当然是主持抚局的总理熊文灿。熊文灿命各处巡抚严加防守，又急令左良玉进兵速剿，希冀侥幸取胜，能减轻罪责。左良玉只得在炎热暑天，率河南副将罗岱等，自襄阳进攻房县。由于准备不足，孤兵轻进，左、罗两部中了张献忠、罗汝才的埋伏，被杀得大败。罗岱战死，左良玉侥幸突围。左良玉一向以能战著称，没想到这次却吃了大亏，被歼万余人，连总兵官的印信都弄丢了，手下只剩下千余人。

坏消息接连传到京师，崇祯帝大怒。他下令把熊文灿、河南总兵张任学革职，左良玉降三级图功自赎。随后又严令各督抚合力围剿。

熊文灿虽是崇祯帝点的将，但名义上却是杨嗣昌推荐的。湖广抚局失败，熊文灿自然要被治罪，而作为保人的杨嗣昌心中也很不安。杨嗣昌虽于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入了阁，但仍兼兵部尚书。至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新任兵部尚书傅宗龙抵京，杨嗣昌便向他移交了部务，然后向崇祯帝上疏请罪。崇祯帝让杨嗣昌回内阁佐理。谨慎小心的杨嗣昌便再次上疏请罪，没想到崇祯帝竟降下御旨，要杨嗣昌出京督师，并让杨嗣昌没有一点推托的余地。

于是，杨嗣昌便以礼部兼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出任总督，赐尚方剑，各省兵马自督、抚、镇以下俱听其节制，副、参将以下即可以赐剑从事。

崇祯帝对杨嗣昌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他始终认为杨嗣昌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也处处予以偏袒。此次任命杨嗣昌出京督师，崇祯帝一是希望他能力挽狂澜，做出点成绩，以塞众人之口；二是因为他觉得朝中实在无人，也只有杨嗣昌能担此重任。杨嗣昌任命之后，崇祯帝又是面谕，又是敕书，但仍觉得不放心，便于九月初四日召对杨嗣昌，两人秘密商议了半天。崇祯帝要杨嗣昌重点盯住张献忠，一剿到底，对其他人则可剿抚并用。

为了表示宠爱，崇祯帝除赏赐外，还于宫中赐宴给杨嗣昌送行，又赐座，并三次向杨嗣昌举觞敬酒。最后，崇祯帝还御制诗一首赐给杨嗣昌。诗云：

盐梅今暂作干将，上将威严细柳营。

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

崇祯在位十七年，能获如此殊荣的官员又有几人！杨嗣昌感恩戴德之下，匆匆赴湖广前线。

十月初一日，杨嗣昌到达襄阳，随即同革职总理熊文灿、督理中官刘元斌、巡抚方孔炤、总兵左良玉、陈洪范等会商军务。

十月初五日，杨嗣昌向崇祯帝建议，任命左良玉为“大将”、挂“平贼将军印”。左良玉数年以来为朝廷立下战功不少，也是最能打仗的朝廷将官。此次他由总兵升任将军，实际上是被赋予了节制其他各镇总兵的权力，是杨嗣昌的副帅。崇祯帝还特意从内府中找出一枚已多年不用的“平贼将军印”给左良玉。左良玉不久前才丢失总兵的印信，没想到反而补到了一枚将军印，自然是满心欢喜。

杨嗣昌在笼络住左良玉的同时，却对其他将领严明军纪，不讲情面。失职副将刁明忠被大行鞭挞，监军佥事殷大白被斩首，湖广巡抚方孔炤被逮捕治罪。革职总理熊文灿也被逮解京师。将士们个个心存畏惧，不敢稍有疏忽。

杨嗣昌仍是剿抚并用。他广发舆论，说能捉住张献忠者准抚，能解散胁从难民各回原籍者准抚，能为良民自耕自食者准抚。也就是说，除了张献忠，其他人都可以就抚。杨嗣昌把重点放在张献忠身上。他刊布通缉令，榜上画着张献忠头像，并亲作《西江月》一首：

此是谷城叛贼，而今狗命垂亡。兴安、平利走四方，四下天兵赶上。逃去改名换姓，单衣黑衣逃藏。军民人等绑来降，玉带锦衣升赏。

榜尾大书赏格：“能擒张献忠者赏万金，爵通侯。”

据说张献忠看到这张通缉令后，曾轻蔑地说：“营中有获嗣昌者，赏银三钱！”

不过，张献忠也是精明之人，深知杨嗣昌必会孤注一掷，便率部西进，到达川、陕交界的山区。罗汝才、过天星等部则仍活动于南漳、房山、兴山、远安一带。

杨嗣昌把主力用于追剿张献忠部。左良玉部在陕西官兵的配合下，终于二月初七日在四川太平（今万源）玛瑙山截住了张献忠的主力，进行了一场恶战。张献忠大败，部卒损失了三千五百多人。他自己用的镌有“天赐飞刀”字样的大刀，刻有“西营八大王承天澄清川岳”字样的虎符、镂金龙棍、令旗、令箭、卜卦用的金钱以及妻妾等七口，全被掳获。其军师潘独鳌被俘。十反王杨友贤投降。

杨嗣昌旗开得胜，自然是趾高气扬。崇祯帝也是十分高兴。官军士气大振，乘胜猛追猛打，连败张献忠部。至三月下旬，连连遭挫的张献忠只得率残部进入荒山野岭，处境十分困难。杨嗣昌也认为张献忠的彻底失败，已是指日可待。

不过，朝廷诸将帅之间的不和及内耗，再次帮助张献忠渡过了难关。

杨嗣昌赴任之初，就重用左良玉，而左良玉在屡立战功后，却骄傲起来，渐渐地不把杨嗣昌放在眼里。于是，杨嗣昌想起用陕西总兵贺人龙，并与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商量，不过后来又认为临阵易将，为兵家所忌，便又改变了主意。杨嗣昌的做法，既得罪了左良玉，又引起了贺人龙的不满。两位大将与总督之间便渐渐失和，追剿之事也就受到了影响。

张献忠正好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躲过官兵追捕，于七月份到达巫巴深处的兴山县（今湖北兴山）之北的白羊山，与刚被官兵大败的罗汝才会合。二人一合计，决定避开官兵主力，向四川进发，打杨嗣昌一个措手不及。

张献忠、罗汝才攻入四川，粉碎了杨嗣昌把农民军围剿在湖、川、陕三省交界的企图。杨嗣昌急令各方将领堵截，他本人也于八月移营入川，指挥作战。

由于四川方面十分腐败，川军也毫无战斗力，所以张献忠、罗汝

才入川后打得相当顺手。

张、罗先是在观音岩大败邵仲光，撕开缺口，然后进逼到大昌（在巫山之北）。四川巡抚邵捷春率兵在此驻守，张、罗便绕过大昌，向开县、梁山（今梁平）、新宁（今开江）方向挺进。在达县遇阻后，又转攻大昌、大宁（今巫溪），然后再向西冲杀，由达县攻到巴州（今巴中）、广元、昭化，再攻剑州（今剑阁）。稍作停顿后，张献忠、罗汝才放弃入陕的打算，再南攻梓潼，到十月下旬攻至绵州（今绵阳）。

杨嗣昌率部紧追，于十月二十四日左右赶到梁山，然后经大竹、广安、岳池，到达顺庆（今南充），沿途吃尽苦头。剑州、梓潼之败传报来后，杨嗣昌对四川将领及入川参战的客将进行了参劾和惩治。四川巡抚邵捷春被革职，后被处死，其职由监军道廖大亨接任。陕西总督郑崇俭也因增援不力而被革职，由丁启睿接任。其他被参惩处的将官也有不少。

杨嗣昌和监军万元吉见四川的仗打成这样，便又对前线将领进行了人事变动，提拔猛如虎为总统，张应元为副总统，节制、协调各镇官兵，追杀张献忠和罗汝才。

十一月，杨嗣昌移营重庆。

与此同时，农民军则又攻下成都之北的什邡，接着南下，过汉州（今广汉）、金堂，从成都之东直下简州（简阳）、资阳，再东折至安岳。“以走致敌”，避实击虚的张献忠、罗汝才，至此终于找到了绝好的战机。

十二月初，张献忠、罗汝才连破隆昌、泸州，接着沿长江之北西克南溪，转而北上攻克荣县，围井研，克仁寿，于中旬突至成都城下。成都危在旦夕。然而，张、罗却弃城不攻，突然北上，再破德阳，并继续北上，于昭化境内渡过嘉陵江，智取巴州（今巴中）。至此，张献忠、罗汝才已取得了主动权。

此时张、罗二人的意图已十分明显。他们成功地把杨嗣昌及其主力调入川中，然后摆脱官军，乘机重返防守空虚的湖广。张献忠受抚

谷城期间，曾研读过孙、吴兵法，此番用于实战，看来效果不错。

杨嗣昌当然也读过兵法，看得出张、罗的意图。所以，当张、罗于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初自巴州起营，攻下通江，进至达州，焚断驿舍七百里时，东进湖广的意图已被杨嗣昌察觉。杨嗣昌深知湖广空虚，张、罗如一入湖广，则不可收拾，因此急令堵截。可是，贺人龙率秦兵留驻广元，拒不出击。而左良玉则在杨嗣昌的九次檄调下，才勉强入川堵截。最出力的仍是猛如虎。

猛如虎于正月十三日在开县黄侯城（一说黄陵域）赶上了张献忠、罗汝才部。当时官军已连追四十日，十分疲劳，诸将请求休整一天后再战。猛如虎和参将刘士杰却生怕张献忠逃脱，立即率部攻击。由于孤军追敌，没有友邻部队协调，猛如虎被张献忠切断退路，围住痛击。结果刘士杰战死，猛如虎的儿子、侄子自杀，部队损失大半。最后猛如虎仅与中军马智率残部千余人逸出重围。

猛如虎经此一击，已是元气大伤，无力再战。而奉檄入川的左良玉，却在此关键时刻，竟率部退入陕西兴安地区。如此一来，四川东出湖广之路，门户洞开。

由于张献忠行兵神速，且沿途焚烧驿站，大杀传报塘卒，杨嗣昌已无法迅速掌握川东的战况，湖广方面更是消息不通。当张献忠、罗汝才自夔门（今奉节）突然东入湖广，并于月底攻克兴山、进逼当阳时，湖广方面尚不知黄侯城之战和张献忠东下的消息。郧阳巡抚袁继咸闻警急忙派兵前来防守。

张献忠此时已侦知襄阳空虚，决定长途奔袭襄阳。他留下罗汝才与湖广兵周旋，自己率精锐轻骑，急行军直奔襄阳而去。

张献忠真是运气绝佳。在途中，他正巧遇上杨嗣昌的信使，缴获兵符。于是，张献忠灵机一动，派部将李定国（一说是刘兴秀）率二十余骑扮作官兵，夜叩襄阳城。郧襄道张克俭验过兵符后，放其入城，安排其住在承天寺。二月初四日夜半，这二十余人放火为号，与预先潜伏在城中的人员一起，趁乱袭击官军，弄得城中一片混乱。至天明，张献忠已率主力赶至城下，不费吹灰之力便杀入城中。襄阳城

沦陷。

襄阳城是湖北重镇，兵家必争之地，此次竟被张献忠如此轻易得手，朝廷损失惨重，湖广战局也由此发生了逆变。

张献忠攻下襄阳后，十分高兴。他不仅救出了自己的军师潘独鳌及自己的七个妻妾，而且竟逮住了襄王朱翊铭、贵阳王朱常法，还得了不少银子。郧襄道张克俭、推官邝日广、知县李大觉等也被杀死。美中不足的是竟让襄阳知府王承恩带着福清王逃脱了。

据说张献忠当时端坐在襄王府殿上，对被捆绑在殿下的襄王朱翊铭敬酒道：我打算借用你头，让杨嗣昌以失陷王藩之罪伏法，你努力喝下此酒。随后他下令处死襄王，纵火焚尸。贵阳王接着也被处死。

当时左良玉诸营的家族就住在襄阳对面的樊城。襄阳失守后，樊城便切断汉水上的浮桥，希望能自保。张献忠哪里能轻易放过，便率兵渡江，攻破樊城，报了左良玉俘其妻妾之仇。左良玉在张献忠出川时，避而不战，樊城之破，也算是个报应。

张献忠攻破襄阳，标志着杨嗣昌的死期已到。杨嗣昌获知张、罗出川后，火速赶赴湖广。此时他尚不知襄阳已破，更不知在此以前李自成已攻破洛阳。等他到达夷陵（今湖北宜昌）时，败报传来。杨嗣昌惊恐之下，已不能进食，到荆州沙市时，病情加重，已不能行，便在徐园住下。

此时的杨嗣昌，心如刀绞，已知死期将至。他在给湖广巡抚宋一鹤的信中写道："天降奇祸，突中襄藩。仆呕血伤心，束身俟死，无他说矣。"三月初一日，杨嗣昌死于徐园。也有人说他是服毒自杀的。不过他的儿子事后却极力辩称是病死，而非自杀。想来病死也有可能，因为杨嗣昌一向责任心很重，自负且很重面子，遇此大难，病重猝死并非没有可能。

不过，无论是自杀还是病死，杨嗣昌之死也实在令人感慨。他当时才五十出头，正是壮年，位极人臣，不想顷刻之间却落此下场。再联想其父杨鹤也因剿抚获罪而客死他乡的惨状，更是令人同情。

接替杨嗣昌的是丁启睿。

丁启睿，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本是文职。崇祯十一年（1638），他代孙传庭任陕西巡抚。两年后，因杨嗣昌极力举荐，丁启睿接替郑崇俭出任陕西总督。从其经历来看，丁启睿本没有多大资格接替杨嗣昌。不过，崇祯帝当时也实在找不到合适人选，仓促下便命丁启睿为兵部尚书，改任督师，总督陕西、湖广、河南、四川、山西及大江南北诸军，仍兼陕西三边总督，赐尚方剑和督师印。

丁启睿名为督师，其实并无多少实力。杨嗣昌给他留下约三万兵力，其中左良玉占大部，另有川兵、土司兵若干。他从陕西带出来约一万兵人，包括贺人龙、李国奇所部六千人，宁夏兵两千人，三边兵两千人。靠这点本钱去与河南的李自成拼杀，他也自知不是对手，于是他便去找张献忠。

丁启睿在东出潼关后，便从河南进入湖广，并试图经承天（今湖北钟祥）赴荆州原杨嗣昌军中。湖广巡抚汪承诏认为，贼寇主力在河南，且荆襄一带也已息警，就不必再去了。他还下令把汉水沿岸的舟船藏匿起来，不让丁启睿渡汉水，弄得丁启睿五天不得过汉水，只得转向河南邓州（今邓县）。但邓州城门紧闭，不让进城，丁启睿只得又赴内乡。内乡怕其骚扰地方，竟下令市民不准向城外官军售米卖粮。丁启睿被搞得狼狈之极，其部下也是饥疾交加。当时李自成部正在豫西，军势大盛，丁启睿自然不敢前往。当他得知张献忠在豫东南一带活动时，便灵机一动，率部前往。用他的话说，就是皇帝命我剿豫贼，此亦豫贼也。

张献忠此时也确实是势弱可欺。他攻占襄阳后，因惧左良玉，便急渡汉水而东，攻占河南光川（今潢川），并于四月又回湖广境内，攻占随州（今随县）。五月，张、罗又率部攻打南阳，未下，转而攻打信阳、泌阳。此时丁启睿急令左良玉入豫追剿，张献忠却乘湖广空虚，转而西进，于七月打下了郧西县城。不过，罗汝才却没有跟随前往，据说是与张献忠闹了矛盾，改投李自成了。罗汝才一走，张献忠顿感势单力薄。

八月，当张献忠又回到河南信阳时，正好被左良玉部截住，双方展开一场恶战。当时左良玉心中正憋着一肚子气。因襄阳被张献忠攻

陷，左良玉被削职留任，脸上无光，自然耿耿于怀。而左良玉部下诸将，因住在樊城的家族被张献忠屠杀，更是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此番咬住张献忠，真是个个拼命，竟把张献忠杀得大败。此役张献忠失去了悍将沙头目，部下被俘杀者数万，马匹也丢了一万多匹。他自己也受了伤。

遭此重击的张献忠，急忙逃入山中，间道西进至郧阳，各处官兵则是穷追猛打，左良玉也率部赶赴郧阳。张献忠见无法立足，又率残部二千人逃向河南南阳，左良玉则紧追不放，处境相当危险。不过，张献忠仍凭其经验和机智，侥幸走脱，逃过劫难。

据说张献忠曾想投靠李自成，见面后，李自成要他做自己的部将。张献忠却不肯屈居李自成之下，当年李自成落难时，据说也曾试图投靠张献忠，不过没有成功。此时见张献忠如此态度，李自成一怒之下，便起了杀心。幸亏罗汝才出面劝说，李自成才放他一马，赠他五千骑，令他东进与革、左五营会合。

此说之真假已很难断定。不过从后面的情形来看，张献忠确实在信阳大败后，经河南东进安徽，与革、左五营时合时散，共同作战。崇祯十五年（1642），张献忠率部转战安徽一带，利用朝廷与李自成大战中原的有利时机，积极恢复力量，以图东山再起。

崇祯十五年（1642）四月，张献忠攻下了舒城。攻下舒城后，张献忠痛定思痛，做事有了一些新思路，并做了几件破天荒的事情。如他改舒城为得胜州，召集农民回乡割麦子。三河寨的农民杀猪宰羊迎接他，他竟也知道回赠八头牛、五十两白银。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竟在舒城设起“六部”来。他任命曾做过太仆寺卿的濮中玉做礼部尚书，自己则兼吏、刑尚书，户、兵、工三部也任命了官员。

这些举措，与张献忠先前的做法相比，可以说有天壤之别。在此以前，张献忠绝对是流寇做法，攻一城则弃一城，经常是大肆杀戮。他打仗也主要是靠金帛、良马、美女。每次开战时，必以此来激励士气。他自己在这方面也身体力行，竟拥有九个妻妾。

张献忠的改弦易辙，十分有利于其发展。至五月，他攻克重镇庐

州（今合肥）。六月，攻克庐江，并在巢湖操练起水军，扬言要打芜湖。七月，于六安击败黄得功、刘良佐部，令江南大震。凤阳总督高斗光、安庆巡抚郑二阳因此被革职。

不久，革、左五营向河南进发，投靠李自成、罗汝才。张献忠既不愿前往河南，也不能在安徽独撑局面，便想西进湖广，并预先派其军师潘独鳌潜入武昌，了解敌情。九月底，张献忠率部向湖广、安徽交界的安庆府西部进发。十月，在试攻湖广黄梅失败后，张献忠便率部退至潜山天堂寨一带，恃险自保。而在武昌的潘独鳌也被擒杀，张献忠失掉了一位得力干将。

在潜山天堂寨扎营不久，张献忠遭到黄得功、刘良佐所率官兵偷袭，又吃了一次大亏。不过张献忠实力尚存。他先率部退入湖广的蕲水（今浠水）境内，后又突入安徽境内，先攻桐城，再陷无为，转而又杀向两省交界，攻击太湖、黄梅，然后借李自成攻击湖广之势，于崇祯十六年（1643）春向西猛攻，终于在此年五月攻下湖广省会武昌，建立大西政权。

不过这是后话。此处先要叙述李自成部的有关情况。此时的李自成，已是名声大震，并把中原搅得天翻地覆。

李自成：打不倒的必使我强大

李自成在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被洪承畴大败于陕南后，便率残部退入陕西、四川、湖广三省交界的大山之中。

也是李自成命大！当时追剿他的陕西巡抚孙传庭、总督洪承畴，先后被朝廷火速檄调至京师附近，抗击入侵的清兵。而张献忠、罗汝才在湖广、河南等地的冲杀，也吸引了朝廷的主要兵力。李自成居然因此而躲过了大劫。

一时间，李自成似乎消失了。甚至到处盛传着李自成已死的消息。

事实上，李自成并没有消失！他艰难地挺了过来，并且保留了几十名骨干分子，终于等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躲在山中的李自成到底干了些什么，至今仍是谜。有关的传言也很多。有人说他在走投无路之下，几次想出山投降，甚至还想到过自杀。细想起来，这不是没有可能。不过，他终究还是挺了过来，尽管我们尚不太清楚他是怎样挺过来的。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不仅弄不清李自成躲在深山时干了些什么，而且也不太弄得清李自成是如何从山中复出，复出后又是如何一下子变得如此厉害的。

一般都认为，李自成是在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张献忠谷城再反后走出深山老林的。出山之后的李自成，不断召集旧部，扩充队伍，力量渐渐恢复。

李自成是在崇祯十三年（1640）夏季进入河南后才大出风头的。那么，他在复出后的一年多中到底在哪里活动呢？具体的说法就很多了。

一种说法是，李自成的活动引起了陕西总督郑崇俭的注意。郑崇俭发兵围剿，并予以重创，但最终还是让李自成逃脱，进入湖广郧阳地区。不过到了郧阳地区后，李自成又被杨嗣昌大败过一次，李自成急得差点自杀。最后，李自成才由郧阳走河南。

其他的说法则有所不同。

不过，可基本肯定的是，李自成复出后肯定到达过郧阳地区。潜伏在三省交界大山中的李自成，在复出后由于受陕西方面的压力，开始向郧阳方向移动，与张献忠、罗汝才诸部靠拢。不过，当时郧阳地区已是重兵云集，李自成可能在受到重创后，开始向河南方向挺进。这一方向是有利的，因为入川的张、罗吸引了大部官军主力，李自成逆向而行正好可以避其锋芒。另外，崇祯十三年河南的形势也十分有利于发展。六、七月间，李自成率部从湖广郧阳地区房县出发，取道陕西的平利、洵阳（今旬阳）、商州（今商县），进入了河南的内乡、淅川一带。对李自成的入豫路线，至今还有争论。不过，李自成

确实在这年的十月份出现在河南内乡、淅川地区，而且其部众也一下子成了数万，势力大增。

李自成进入河南这步棋，算是走对了。崇祯十三年（1640），全国普遍发生大灾荒，而河南就是灾情最严重的地区。连年的大旱、蝗灾以及战乱，已把河南搞得赤地千里。而朝廷仍不断增加负担，逼得百姓几乎活不下去，纷纷揭竿而起。

崇祯十二、十三年河南的情形，就像天启末、崇祯初的陕北一样，人人思乱，已处于失控的边缘。

而中原乱，天下必乱！

李自成进入河南后，迅速与当地乱民结合，势力急剧膨胀。在当时的河南，依李自成的经历、才能和号召力，是不难形成一呼百应的局面的。

十月，李自成率兵北上，与河南饥民土寇一斗谷、瓦罐子等会合，人数激增到数万人。

十二月，李自成连破汝州府鲁山、郏县、伊阳（今汝阳）三县，然后进入河南府，连下宜阳、永宁（今洛宁）、偃师、灵宝、新安等县，形势十分有利。

李自成这次复出河南后，有许多做法是与原先不同的。首先，他一改先前不分青红皂白，动辄杀戮的流寇习惯，只杀官员权贵，不杀贫苦百姓。如攻破宜阳时，他不杀平民，只杀官员。攻破永宁，他把万安王朱采和地主豪绅一百余人，带到县西关过堂审讯，然后处死。这些做法表明李自成已开始注意收拢人心。其次，李自成开始收罗、重用知识分子，充当自己的谋士。其中最重要的是牛金星和宋献策。

牛金星是河南汝州府宝丰县（一说河南府卢氏县）人，天启年间曾中过举人，后又因故被革去。牛金星虽是文士，但为人慷慨不羁，颇通天文地理，喜读孙、吴兵法，与一般的文人本就不同。据说他素与姻亲王乡绅不合，儿媳死后，被王乡绅唆使知县把他关进监狱，他还不知其因。当他逃出监狱后，无处可去，便投了李自成，很受器用，成了主要谋士。泥腿子出身的李自成，后来能做到有声有色，颇

成样子，是与这位谋士很有关系的。

宋献策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他的籍贯至今不清楚，一般说他是河南永城人。他本是一位以算命占卦为生的江湖艺人。当他见到李自成时，便献上“十八子主神器”这一谶语。“十八子”便是“李”字，此语就是李姓能得天下之意。这句话本已流传很广，此次被宋献策巧妙利用而献李自成，李自成听了大喜，竟尊他为军师。不过，这位军师在后来的“神机妙算”，大多仍是用算命占卦之类的办法进行，并不见得有多高超。而李自成却对他十分信任，留其在身边，诸事都要请他算一卦。

除牛金星、宋献策外，盛传李自成身边还有一位传奇式人物李岩。李岩据说是河南杞县原兵部尚书李精白的公子，文武双全。因受人陷害，李岩投靠了李自成，成为重要谋士，为李自成做了许多事。以致于有不少人认为，李自成之兴，是因为用了李岩，而李自成之亡，也是因为杀了李岩。而李岩与红娘子的故事，更是被传扬得家喻户晓。不过，李岩是否真有其人，值得怀疑。李岩很有可能是个虚拟的人物，至少他不是李精白的儿子，因为李精白的两个儿子，一个早亡，另一个则是专以农民军为敌，根本与李岩对不上号。

牛金星、宋献策等知识分子的加入，使李自成的档次大为提高。他原先的部下，绝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农民，经过数年造反的磨练，也至多是武夫。靠这些人冲锋陷阵尚可，得天下则难。牛金星之流的加入，则大大加强了李自成的力量。从此以后，李自成的绝大多数的举措，就颇有争天下的味道，很是上路子了。其中攻打洛阳就是一件大手笔。

李自成在崇祯十三年底扫清洛阳周围的据点后，便盯住了洛阳。

洛阳是豫西乃至中原的重镇，其地位非同小可。以前农民军屡次在河南过境，但从没有哪一路首领动过洛阳的念头，甚至往往是绕开它走。现在李自成终于有了攻打洛阳的实力。

当时洛阳城中，住着一位十分显赫的人物，那就是福王朱常洵。福王是万历帝与其宠妃郑贵妃所生，从小深得万历帝的宠爱。据说万

历帝一直有立他做太子的想法，为此曾引起数十年的国本之争，弄得朝廷元气大伤。最后万历帝虽仍立了那位呆拙而又短命的长子朱常洛（即泰昌帝），却在其他方面给予福王以巨大的补偿。福王府是明末最富有、最显赫的藩王府。福王府里的巨额财富，在当时的河南，已成了众矢之的，令人眼红。

李自成决心攻打洛阳城，自然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原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当时正闲居在家乡洛阳。他十分了解局势的严重性，一面急请河南巡抚李仙凤火速增援，一面请求福王拿出些钱来，解决粮饷，激励士气。可是，惜财如命的福王却不肯出钱救急。福王的这种态度，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因为事情明摆着，李自成如果进了城，第一个开刀的必然是福王府，到时候别说是钱财保不住，就连性命也得搭上。不久前，宜阳、永宁两城的宗室乡绅，就是因为一钱不舍，最终被李自成破城而遭灭顶之灾。对这些情况，福王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当时洛阳的防守，十分空虚。原驻人马，根本无法组织防守。城破前，虽有总兵王绍禹率副将罗泰、刘有义进城协防，但这里的士兵长期缺饷，军心很是不稳。福王当时不肯让这些士卒进城，但没有办法阻止，只得出三千两白银犒军。没想到王绍禹独吞此钱，引起不满，罗泰、刘有义竟率部叛投李自成。

十九日，李自成部抵达洛阳北门，开始攻城。叛将罗泰用他带去的火炮轰城，洛阳一片混乱。福王这下子有点慌了，于次日再次出钱募兵守城，但局势已经失控。王绍禹的士兵竟然与城下的农民军谈笑风声，并于半夜发动了兵变。叛乱士兵用刀架住河南分守道王胤昌索饷，王绍禹劝阻无效，根本弹压不住。最后，叛卒杀人放火，打开北门，农民军乘机一拥而入，于二十一日清晨全部占领洛阳。

福王带着他的儿子朱由崧匆匆逃出王府，躲入迎恩寺。体重三百余斤的福王实在是行动不便，最终被农民军抓获。其子朱由崧却伺机逃脱，幸免于难。不过他走得也很狼狈，据说他那华丽的衣服，被那些趁火打劫的人剥得精光，只得裸身而逃。也亏得他走得及时，不仅保住了性命，而且到崇祯帝死后还在南京做了些日子的皇帝（弘光

帝）。

在农民军向李自成献俘时，福王遇到了吕维祺。福王像是见到了救命稻草，忙对吕维祺大喊道："吕先生救我！"吕维祺回答说："我自己也是危在顷刻。"不过吕维祺也真是个大忠臣，到了这种时候仍不忘提醒福王：你好歹也是当朝皇帝的亲叔叔，不要忘了身份而过分出丑。

可惜的是，福王却没有做到这点。他自小娇生惯养，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受过此般委屈。当他一见李自成时，便呈恐惧之态，跪下磕头求饶。李自成哪里会饶他？在威风凛凛地把他痛骂一顿后，李自成先令人打他四十大板，然后斩首示众。据说福王最后被砍成碎片，与鹿肉同煮被吃，成了"福禄宴"的原料。

不知万历帝地下有灵否？当初他对福王百般宠爱，无所不至时，是否能想到他本人正在亲手为爱子埋下祸根？真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吕维祺倒是铮铮铁骨！李自成问他道：

"吕尚书，你今日请兵，明日请饷，要杀我们这些人，现在该怎么办呢？"

吕维祺答道："我身为兵部尚书，自恨无兵可杀你们，现在惟有一死！"

李自成倒很坦然。他说道："兵部尚书是国之大臣，按情理也应当死。"最后，吕维祺被处死。

李自成攻占洛阳，真是见了大世面。从前他虽也打下过不少城镇，但都是些小县城，没法与洛阳比。他没收了福王府中的大量财产，并把其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山区。留下的那些，则任命一位洛阳书办为副将负责看守，作为募兵防城之用。他还开仓济贫，大造声势，笼络人心，一时名震中原。不久中原便开始流传这样的歌谣：

朝求升，暮求合，

近来贫汉难存活。

早早开门拜闯王，
管教大小都欢悦。
吃他粮，穿他娘，
吃着不尽有闯王。
不当差，不纳粮。
大家快活过一场。

正当李自成为攻占洛阳而兴高采烈时，崇祯帝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洛阳失守、福王被杀的消息传来，崇祯帝大为震惊。在召见阁臣、礼、兵部臣及科臣时，崇祯帝竟失声痛哭：“朕不能保一叔父！”但崇祯帝除了重惩失职官员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在河南的李自成，却是越打越顺手。在攻下洛阳后，他竟又打起了开封的主意。不过，开封毕竟不是洛阳，李自成不仅没有得手，反而吃了点亏。

李自成攻占洛阳后，并没有久占的打算。大概是他觉得此时还不具备足够的实力。于是，他儿戏般地任命一些官员，让他们守洛阳，自己却率部退出洛阳。河南巡抚李仙凤侦知洛阳已空，便率兵自开封攻占洛阳。最后，总兵王绍禹被逮捕，送京师凌迟处死。其他失城官员也被惩处。

李自成退出洛阳后，获悉开封空虚，便急率精兵三千、部卒三万，强行军三日，于二月十二日抵达开封，随即展开攻城之役。

开封是一个古都，其地位甚至超过洛阳。明初朱元璋一度曾把它作为北京，后虽罢京置府，但仍是明代中原重镇，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封城墙也厚达五丈，十分牢固。

李自成的到来，令开封城中一片恐慌。洛阳被攻陷后的惨状，更是令城中达官贵人不寒而栗。不过，与洛阳不同的是，此时的开封城内，却能在大敌当前之际，同仇敌忾，坚决死守。

负责守城的河南巡按御史高名衡等，动员一切可动员的力量，坚决死守待援。

住在开封城中的周王朱恭枵，也出其库银五十万两，立下赏格：民间有能出城斩敌一名者，赏银五十两，射杀一名者赏银三十两，射伤或用砖石击伤一名者赏银十两。官兵战死者或重伤者也赏五十两，轻伤者二十五两。周王还出资购来米麦，支锅做饭，送上城头。这些做法，大大激励了守城者。

同时，河南巡抚李仙凤督游击高谦率兵驰援开封。陈永福则在赴洛阳途中折回，兼程两昼夜赶回开封，入城参战。据说左良玉、保定总督杨文岳也各率所部飞驰援汴。

李自成没想到开封竟是块如此难啃的骨头，猛攻数日却没捞到丝毫便宜。十七日，李自成亲临前沿阵地，察看形势，未料到被城上守军认出，一箭飞来，正中其左眼，大伤元气。于是他下令撤退，第一次进攻开封到此结束。

李自成的左眼，从此失明（也有记载说李自成左眼是在第二次攻开封时受伤的，而且也没有失明）。他对开封城，从此也怀有刻骨仇恨。后来，他卷土重来，二攻、三攻开封城，开封城最终葬身鱼腹。

李自成自开封撤围后，向豫西转移，退入山中。此年七月，罗汝才因与张献忠不和，前来与李自成合营，李自成实力大增。罗汝才比李自成年龄大，资历亦很老，此时却待李自成以兄长之礼，以示尊重。不过，两人关系基本上仍是传统上的联营，李自成并非绝对领导。

李、罗合营，由豫西唐县进入湖广枣阳，准备攻击承天（今湖北钟祥），但不久便放弃原计划，复入河南信阳，进入豫西南一带。至九月初，李、罗又开始反击，首先击败了陕西总督傅宗龙。

傅宗龙是在洛阳、襄阳失守后被重新起用的。杨嗣昌自杀后，崇祯帝任命陕西总督丁启睿出任督师，仍兼陕西总督。但丁启睿兵力不足，不敢与李自成对杀。崇祯帝无奈之下，起用了关在狱中的原兵部尚书傅宗龙，令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出任陕西总督。

傅宗龙出名很早。他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的进士，昆阳人。在天启年间，他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成功地平息了贵州安邦彦叛乱，

稳住了西南。崇祯三年（1630），傅宗龙以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出任蓟辽、保定总督，但不久即被解职，赋闲家中。直至崇祯十年（1637），在杨嗣昌的极力推荐下，傅宗龙才被重新起用为四川巡抚，收拾四川残局。崇祯十二年（1639），傅宗龙被召赴京，出任兵部尚书，但因与崇祯帝不合，几个月后便被解职逮捕。至此，崇祯帝才想起了他，急令起用。与此同时，崇祯帝还命保定总督杨文岳、总兵虎大威率兵两万进入河南。河南巡抚李仙凤不久被解职，畏罪自杀，河南巡抚一职由守卫开封而名声大震的高名衡升任。

傅宗龙此次赴任，注定是凶多吉少。他本人几起几落，无辜坐牢，至此已是志气沮丧，部曲离散，已非当年可比。他虽为陕西总督，而实际上陕西已无兵可带。先是洪承畴、孙传庭带走陕兵精锐，赴京畿入卫，后是丁启睿带走了一万人，陕西兵力几乎全部调空，陕西巡抚汪乔年几乎就是光杆司令。另外，陕西经多年的天灾人祸，至此也是赤地千里，一片凋敝。在这种情况下去做陕西总督，傅宗龙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傅宗龙入潼关后，朝廷把在河南作战的李国奇、贺人龙交他指挥，同时又遣保定总督杨文岳率总兵虎大威，与他会师。于是傅宗龙领兵二万出潼关，陕西巡抚汪乔年为其送行，两人相泣而行，握手欷歔，犹如诀别。没想到这真成了最后的死别。

傅宗龙领兵出关后，获知李自成、罗汝才图谋湖广承天，便火速赶赴承天布防。李自成得知后，便虚晃一枪，自枣阳取道应山再入河南。傅宗龙认为李、罗胆怯，便率部猛追，并于九月四日抵达河南新蔡，与杨文岳合兵，共有四万兵力。次日，傅、杨两人率兵渡河，北上项城（在今项城境内）。李、罗见状，便出偏师佯攻汝宁府城（今河南汝阳），而主力部队则设伏于树林之中，等待傅宗龙的官军。

傅宗龙、杨文岳果真中计上当。大队官兵行至孟家庄（今平舆境内）时，竟以为农民军主力已西进，便于此安营休息。农民军乘机发动突袭，官军慌忙集结，仓促应战。在此关键时刻，贺人龙、虎大威、李国奇三将竟率部向沈丘（今沈丘境内）退却，撤出了战场。傅宗龙、杨文岳两总督及其直隶标营，至此却已无法脱身，被合入重

围。杨文岳于当夜成功突围。最后只剩下傅宗龙一人及其标营被围。

傅宗龙急令部下就地抵抗，同时命贺人龙、李国奇火速救援。贺、李却以种种借口拒绝救援。傅宗龙于重围之中，粮弹俱尽，最后竟到了吃死尸的地步。十八日，傅宗龙率残部六千突围，农民军则层层堵截。十九日中午，已接近项城的傅宗龙，终于被农民军追上俘获。

农民军押着傅宗龙，来到项城之下，对守城官兵大喊："我秦督官兵也，请启门纳秦督。"他们试图骗开城门，相机占领项城。没想到傅宗龙突然大喊："我秦督也，不幸堕贼手，左右皆贼也，毋为贼所绐。"

农民军未料到傅宗龙竟会如此，气急之下，抽刀便砍。傅宗龙被砍倒地，仍破口大骂，最后被割去了耳鼻，悲惨而死。据说崇祯帝获知后，很是愧疚，恢复了他兵部尚书之职，加太子少保，予以厚葬。

城上守兵见状，立即开炮猛轰，农民军只得退却。傅宗龙之死，保住了项城。

李、罗此役大胜，不仅缴获了大量衣甲器械，而且还收降了不少陕西籍兵卒，声势大震。他们接连攻下了开封府的商水、扶沟、洧川（在长葛与尉氏之间）、许州（今许昌）、长葛等县。

十月，李、罗围攻南阳府的叶县。镇守叶县的是原农民军首领闯塌天，现朝廷北舞渡副将刘国能。李、罗恨其叛降，猛攻叶县七天，势在必得。刘国能眼看难以支撑，便一人缒下城墙，去见李、罗。他们原本就是老相识。见面后，刘国能对李、罗说："叶县之防守都是我一人所为，与百姓无关。现在我也已尽力，不愿看到破城之灾，所以特来请死！"李自成要他投降，他拒绝道："我奉母命归国，现在母亲虽死，我岂能违背！他还说，我的官是天子亲授，我当以死相报！"说后，他便拔剑自刎。

刘国能的这种态度，在农民军首领中是少有的。投降朝廷后，能做到言行如一的，也只有刘国能等极少数几位。

十一月初，李自成、罗汝才又率兵攻下南阳府城。南阳守将猛如

虎率兵坚决抵抗，战斗异常激烈。城破之后，双方又进行了巷战。最后猛如虎、刘如祚等一大批文武官员被杀。唐王朱聿镆也被处死。

十二月，李自成、罗汝才攻下襄城。襄城守将李万庆，原为陕北农民军著名首领之一，外号射塌天，此次也步刘国能后尘，坚决抵抗，最后城破，不屈不降，被处死。

襄城被攻克前后，李、罗所部又连下镇平、新野、唐县、泌阳（以上属南阳府）、汝州（今临汝）、许州（今许昌）、禹州（今禹县）、新郑、鄢陵、尉氏、通许、陈留等地。十二月二十二日，李、罗再次抵达开封城下，开始了二攻开封之役。

李自成、罗汝才此次攻城，势在必得，其攻势一潮高过一潮，而其攻城手段也是空前之高。没料到河南巡抚高名衡、周王朱恭枵等，也是拼死反击，成功地敌住了李自成的猛攻。双方激战了二十天，损失惨重，却不分胜负。李、罗在无奈之中，审时度势，于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十四日主动撤围，转攻偃城，二攻开封之役到此结束。

李自成、罗汝才虽没打下开封，不久却在襄城打了个大胜仗，处死了陕西总督汪乔年。

汪乔年本是陕西巡抚，傅宗龙死后，他被提升为陕西总督。当汪乔年得知傅宗龙死讯后，大哭不已，长叹道：“傅公死，讨贼无人矣。”没想到朝廷竟让他接下傅宗龙之职。汪乔年深知自己凶多吉少。他说：“寇势方张，我却兵疲饷乏，我出关剿寇，无疑是以肉喂虎。但又不可不去，以持中原之心！”他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崇祯十五年（1642）春，汪乔年率领经七拼八凑而得的三万兵卒，东出潼关。当时李自成正在围攻偃城，汪乔年自知难与其争锋，便转而改走郏县赴李自成老营所在地附近的襄城，攻其必救。襄城绅士于二月初领汪乔年进入襄城，汪乔年随即布防。

李自成得知汪乔年进驻襄城，果然领兵自偃城直逼襄城。李自成与汪乔年之间有一笔私仇，因为汪乔年掘了李自成的祖坟。据说汪乔年出关之前，深感李自成气候已成，已非一般草寇，使出奇招，密令米脂知县边大绶掘其祖坟，坏其风水，糟踏尸骨。他们还于坟中捉到

一条小蛇。汪乔年如获至宝，认为此蛇是即将化龙之灵物，一时间此事被大肆铺张渲染。在出关之前，汪乔年在西安设坛誓师，斩蛇以徇，搞得很像回事。不知李自成后来登基不久即遭败亡，是否与此蛇有关？

李自成此番得知仇人已至襄城，分外眼红。二月十三日，李自成部击杀总兵张国钦于襄城之东。贺人龙等不战而走，逃回陕西。更可气的是，原被李自成困于偃城的左良玉，竟也弃汪乔年不顾，率部东走。汪乔年至此已是瓮中之鳖了。

十七日，李自成攻克襄城。汪乔年等被俘，最后经李自成亲自审判后被杀。其死状十分惨烈，据说先是舌头被割，最后被凌迟活剐。李自成终于报了深仇大恨。

李自成、罗汝才乘胜进军，连克西华、陈州（今淮阳）、太康，并杀入归德府（今商丘），攻克睢州（今睢县）、宁陵、考城、归德、彰德等州县，并与另一支义军即以袁时中为首的小袁营会合。四月中旬，李自成、罗汝才攻占了杞县，并于五月初又回到了开封城下，开始第三次围攻开封。

李自成此次攻城，采取围而不攻之策，试图把开封城困死。

开封城中，高名衡等故伎重演，想尽一切办法死守待援，居然仍能以孤城一座，敌住李自成、罗汝才的猛攻。

朝廷急令督师丁启睿火速增援。保定总督杨文岳，总兵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等也奉命前来，一时官兵云集，号称十八万，以期与李自成在中原决一死战。为了使最能打仗的左良玉出死力拼杀，崇祯帝还特地释放了曾有恩于左良玉的前户部尚书侯恂，让他以兵部右侍郎身份督河南、河北、山东、湖广诸路援兵。同时，崇祯帝还严令接替汪乔年出任陕西总督的孙传庭出关东援开封。

李自成、罗汝才则一面施计令开封城中官兵不敢出城，一面集中优势兵力，寻机重创增援官兵。

于是，双方在开封之南的朱仙镇，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

五月十三日，官兵前锋抵达朱仙镇，李自成率部迎敌。没想到官兵主力左良玉部首先撤退，狂奔八十里，却又中埋伏，被农民军杀得大败。左良玉仅以身免，逃至襄阳。左良玉一溃，官兵大乱，丁启睿、杨文岳等随即溃逃，李自成部猛追四百里，大获全胜。

朱仙镇之战，是朝廷的最后一击。自此以后，朝廷再也无法组织起如此强大的力量，来与李自成决战。在李自成的强大攻势下，朝廷几乎已无招架之力了。

李自成、罗汝才在击溃援兵后，再次围攻开封。开封城内的官员，见增援无望，便再次彻底动员城内力量，坚决死守。开封推官黄澍在曹门竖起一面大白旗，上书："汴梁豪杰，愿从吾游者立此旗下！"没过多久，便组织起一支上万人的队伍，成为守城的主力。为应付粮荒，开封城中除郡王以上府第外，家家搜粮，户户刮银，以供守城之用。到后来，开封城中已是吃尽了一切能吃的东西，惨烈到人吃人的地步。

对开封的被围，崇祯帝十分着急，下死令要各地进援解围。可是，无论是陕西总督孙传庭，还是侯恂，此时都已无力敢与李自成针锋相对了。

孙传庭本是剿杀陕西农民军最得力的将领之一。崇祯十一年（1638）夏，即洪承畴大败李自成前不久，孙传庭奉命赶赴京畿入卫，抗击清兵入侵。卢象升战死后，孙传庭代任其职，不久却因与杨嗣昌不和，竟被逮捕下狱。直到十五年（1642）正月，崇祯帝才放其出狱，以兵部右侍郎之职总督京营赴开封救援。汪乔年死后，他又接任了陕西总督一职。

孙传庭手下并无多少兵力。赴陕前夕，崇祯帝曾召见孙传庭，问其需多少兵力才能击败李自成。孙传庭因久居狱中，不知李自成已非昔比，便提出只需精兵五千。可当他路过河南略知敌情后，自觉失算，于四月又向崇祯提出须练兵两万，请饷二百万。崇祯帝大怒之下，令他领一月饷，出关杀敌。此时孙传庭哪里还有实力去与李自成交锋！更可悲的是，孙传庭在出关之前，还奉密旨斩掉了陕西大将贺人龙，其罪状是多次临阵脱逃。贺人龙与李自成是同乡，长期与农民

军交锋，是当时陕西最得力的战将，号称贺疯子。贺人龙被斩，对孙传庭是一大损失。

至于侯恂，更是无兵之帅。朝廷原希望侯恂能调动左良玉部，而左良玉部至此已经溃散，短时难以恢复。其他各部也大致如此。侯恂本人对当时形势已有清醒的估计，因此他曾上书崇祯帝，要求朝廷放弃中原；而于四周扼守险要，防止形势进一步恶化。同时，他还正确估计到了农民军首领之间的矛盾，认为相互火并只是时间问题，朝廷也可伺机利用。

然而，崇祯帝哪里能听得进去呢？此时的崇祯帝，已是红了眼的赌徒，一心想去翻本。他一再下令侯恂、孙传庭、左良玉等反击。

正当崇祯帝与其部臣在讨价还价之际，开封终于出了大事！九月十五日，黄河堤岸于朱家寨决口，滚滚黄河水倒灌开封。开封城于顷刻之间成为泽国。

那么，黄河的堤岸，到底是谁扒开的呢？

绝大多数人认为，堤岸是守城的官兵扒开的。据说因开封城长期被困，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危在旦夕，守城官员十分恐慌。此时有人向巡按御史严云京献计决河，淹灌农民军。严云京就与巡抚高名衡、推官黄澍一起去见周王，最后商定决河。九月十五日，黄澍率兵掘开了朱家寨口的堤岸。依他们的计划，黄河水可以顺城墙分流，淹灌城外的农民军，不料因城门新塞，土质不坚，洪水反而冲入城中，酿成大祸。

但也有人认为李自成是祸首。李自成久攻开封不下，便依开封地势低、黄河水高之利，决开堤岸，倒灌开封。还有人认为，是官兵先决朱家寨大堤，李自成见状后，反决马家口。两处决堤之黄河水一齐灌入开封。

不管是谁决了黄河堤，最后的结果是开封遭受了灭顶之灾，一片泽国。城中除一小部分官员簇拥周王乘船逃脱外，满城数十万百姓尽葬鱼腹。李自成方面，据说也有数万人被漂没，但绝大部分人因及时转移到高堤，所以损失不大。

开封这个中原古都，至此已是泽国一片，只有钟鼓二楼、各王府屋脊、相国寺顶、上方寺铁塔、周王城垣尚孤零零地露出水面。双方血战四个月，死争开封城，结果竟是如此！

于朝廷而言，开封被淹，是失去了河南的枢纽腹心、南北咽喉。开封不守则无河南，河南不保则失中原，而中原一失，则河北之咽喉断，天下形势由此逆转。

于李自成而言，开封被淹，不仅三攻开封之心血白费，即将到手的熟果顿失，更严重的是，他想以开封来争夺天下的计划落空了。

李自成撤离开封后，率部向豫西进发。因左、革五营也自安徽来合营，李自成的势力更为壮大，并于十月与陕督孙传庭打了一仗，大获全胜。

孙传庭在崇祯帝严令之下，于九月率兵进援开封。不料才出潼关，开封已被淹灌。孙传庭只得改赴南阳。此次出关，孙传庭以总兵高杰为中军，并调总兵左勷（左良玉之子）、白广恩、郑嘉栋、牛成虎等部参加。

李、罗获知陕兵出关，便率兵迎战。十月初一日，双方发生大战。

孙传庭与李自成等是老对手，熟悉对方手段。他于战前布置周密计划，令牛成虎领兵先战，诱敌深入，其他各部则设下埋伏，乘机掩杀。开战后，牛成虎佯败撤退，李自成部果然中计入伏，被杀得大败溃退。官兵拼命追杀，却见沿途甲仗物资很多，便纷纷争抢，队形大乱。不料罗汝才正在附近，他见李自成溃败，而官兵也乱成一团，便突然出击，打得官兵措手不及，损失惨重。孙传庭受此重击，只得退回关内。

至此，朝廷在黄河之南，只剩下驻守在汝宁（今汝南）的保定总督杨文岳部尚可一战了。不过，他很快就成了李自成的下一个目标。

闰十一月初，李自成、罗汝才会合“左革五营”（左金王贺锦、革里眼贺一龙、老回回马守应、乱世王蔺养成、争世王刘希尧），开始攻打汝宁。

汝宁府城是豫东南重地，东可入南直隶安徽地区，南可入湖广地区。它也是藩王封地，崇王朱由就住在这里。当时负责守城的是保定总督杨文岳，监军为佥事孔贞会。

十三日，李自成等部抵达城下，开始攻城。崇王主张献城投降，杨文岳等不肯。双方开始激战，杨文岳、孔贞会亲自登上城头指挥。第二天，农民军展开强攻。他们头顶门板，遮蔽矢石，直逼城下，然后架设云梯、百道登城，终于攻下了汝宁城。

杨文岳、孔贞会等全部被俘。杨文岳是个硬骨头，见了李自成，不但不屈服，反而破口大骂。李自成大怒，令人架起大炮，把杨文岳轰成炮灰。崇王朱由及弟河阳王朱由材、世子朱慈辉投降。后来李自成封崇王为襄阳伯，但不久又把他及其家属全部处死于河南泌阳。

李自成攻下汝宁后，已基本上控制了黄河以南的河南地区。此时的李自成，已有争天下的雄心壮志，其举措也与从前大不相同。他每攻下一城，便不再放弃，而是设置政权，派遣官吏，俨然与朝廷一般。他还严禁抢掠，更不滥杀，公然声称：杀一人者如杀我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他的这些做法，大获民心。

李自成等在攻下汝宁后，便乘胜向湖广进军。在崇祯十五（1642）年十二月，李自成率部连克襄阳、荆门等地。至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李自成又攻克承天、汉阳等地，并又回到襄阳，建立政权。李自成虽未称帝，但已在为此作准备了。一年之后，李自成果然坐在紫禁城中的龙椅上了。

由于辽东的战事也在同步进行，因此，这里还得叙述一下明朝与满清在辽东的战争情况。

松锦大败：等不到的救援

在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至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多尔衮率兵横扫京畿五个多月，大获全胜之后，明、清双方又进入了一个

相对僵持阶段。明朝为扭转形势，全力布防，而清朝则在积极备战，伺机发动新的进攻。

卢象升死后，朝廷先命从陕西前线赶来的陕西巡抚孙传庭代督诸镇援兵，以应付时局。陕西总督洪承畴赶到后，朝廷进行分工。洪承畴任蓟辽总督，陕西入援兵马由其指挥。孙传庭则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

孙传庭为人直爽，敢说敢干，而且在陕西打得也很不错，于是说话便有些失分寸。当他一赶到京畿前线时，就上书说："近来疆事决裂，由计划差谬。事竣，当请决大计。"此言自然得罪了杨嗣昌。杨嗣昌从此对他不满，并开始罗织罪名进行报复，同时支持洪承畴。可是孙传庭还是敢说敢讲。当杨嗣昌等决定以洪承畴所率陕兵守卫蓟辽的计划时，孙传庭竟又反对道：

"陕西兵不能久留于此！陕西贼未彻底剿灭，陕西兵马留此不归，余贼必会死灰复燃。这是帮了李自成等贼的忙。况且陕籍士卒妻儿俱在陕西，如久留于边，陕兵必定会哗变逃归，甚至从乱。这简直就是驱逼官兵从贼！"

事实上，孙传庭此言很有道理。如果陕西的兵马不被立即抽空，那么，中原、湖广的局势也不至于会恶化到后来的地步。有人甚至说，如果不是熊文灿力主抚局，姑息养奸；如果不把孙传庭、洪承畴在大局初定时匆忙抽调出陕西前线，那么，李自成、张献忠之乱决不至于弄到后来那种不可收拾的地步！

遗憾的是，杨嗣昌根本不理睬孙传庭的建议。孙传庭则要求入见皇帝，当面向皇帝汇报。杨嗣昌担心孙传庭会在皇帝面前说不利于自己的话，于是坚决反对。孙传庭在愤恨交加之余，便以耳聋为由，上疏乞求致仕。而杨嗣昌则乘机弹劾孙传庭托疾。不明缘由的崇祯帝勃然大怒，先是把孙传庭削籍为民，同时令人察核孙传庭是否真的有病。调查者据实禀报，孙传庭是真聋而非托疾。但先入为主的崇祯帝却认为其中有诈，竟把调查者和孙传庭一起逮捕入狱。孙传庭的被捕，对当时的朝廷来讲，真是一大损失！

孙传庭一去，洪承畴自然就成了主持辽东战事的主帅。崇祯十二年（1639）十月，洪承畴以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的身份，奉命出山海关至中前所，主持辽东战局。

在此以前，朝廷鉴于清兵入侵京畿如入无人之地的窘境，认为不仅应兵多，更应兵精。在杨嗣昌的主持下，朝廷决定抽练各镇精兵。按照方案，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八镇，以及蓟辽、保定总督所辖之畿辅、山东、河北等共应练兵七十三万多名。同时，朝廷还调整地方政府的官员设置，训练乡兵。为了练兵，朝廷又不得不另征练饷。十二年（1639）六月，朝廷正式下令加派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

这一庞大的计划，在当时的形势下，犹如痴人说梦，根本无法真正实施。不过，崇祯帝仍希望这一计划能给他带来大批精兵，制虏灭寇，挽回败局。

然而，等到洪承畴出关时，朝廷所练的精兵还不见影子。好在洪承畴久经沙场，筹划有方。他一到中前所，就斩杀总监高起潜的亲信千总刘某，虽得罪了高起潜，但倒也整肃了军纪。他又推荐刘肇基、吴三桂分任都督、都督佥事，其中吴三桂以都督充任辽东总兵，团练宁远兵马。

就在洪承畴调兵布防之际，皇太极也在与群臣商讨下一步的进攻计划。经过详细讨论，皇太极最终确定先取锦州、再取山海关、然后直入京畿的战略。

崇祯十三年（崇德五年，1640）三月，皇太极命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八旗右翼主帅，多罗贝勒多铎为八旗军左翼主帅，前往距锦州九十里处修义州城（今辽宁义县），驻扎屯田，围困锦州。四、五月间，皇太极还两次前往巡察。至六月，皇太极又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肃亲王豪格等率兵前往义州换防。多尔衮、豪格等接防后，除严密围困锦州城外，还攻占了锦州城西的敌台九座、小凌河西岸的敌台两座。

锦州城中的驻将是祖大寿。祖大寿是辽东宁远人，他长期戍守辽

东，资历深厚。在十年前的大凌河城之战时，祖大寿曾降过皇太极，不过他又用计脱身，回到了锦州，而且也并没有像他自己承诺的那样，为皇大极夺取锦州城，让皇太极上了一次当。但他的子侄、兄弟，却有不少在当时就归顺了皇太极，并得以重用。

锦州城被围，自然非同小可。洪承畴急忙率部将曹变蛟、左光先、马科、吴三桂等以马步兵五万驰援锦州，在黄土台与清兵激战，战败退还。清兵亦返义州。洪承畴返回宁远后，又对将领作了调整；把曹变蛟、马科两部遣回关内休整：让左光先返回原镇，由白广恩代之；由王廷臣代替拙于调度的刘肇基。同时，洪承畴又奏报朝廷，要求调集附近十余万官兵，并请一年粮饷。崇祯帝也深感事态严重，立即令调兵筹饷，支援辽东。

崇祯十四年（崇德六年，1641）春，洪承畴率曹变蛟、白广恩、吴三桂、王廷臣四位总兵赶赴宁远，并巡视到锦州之南的松山。面对清兵的攻势，洪承畴顿感兵力不足，便又急调蓟镇总兵唐通、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督王朴，率兵马赴援辽东。三月间，大兵云集宁远。

与此同时，清兵也加强了对锦州的围困。皇太极令济尔哈朗换回多尔衮。济尔哈朗接防后，浚深濠，筑垛口，设哨探，把锦州城围得像铁桶一般，基本上切断了锦州城与外界的联系。为了加强攻坚力量，皇太极还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的部队及所有的神威大将军炮队，调到了锦州前线。

面对清军的咄咄之势，前线主帅洪承畴与后方指挥、兵部尚书陈新甲，就如何应对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并严重影响了战局。

洪承畴一开始就主张“可用而后可战”之策，即用持久的战略，步步为营，耗其实力，最终拖垮清军，迫其自撤。当时锦州城虽被孤立，但祖大寿尚能支持，而且他还派人对城外援军传语，称城中粮食足支半年，只是缺乏柴薪，表示了其坚守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他要求援军不要轻战，而要用车营逼迫清兵等等。

如果能依洪承畴的决策，辽东的局势或许尚不至于弄到后来的地

步。遗憾的是，兵部尚书陈新甲却持相反的态度，他主张速战速决，迅速解围。或许是因为李自成、张献忠在河南、湖广闹得太凶，而此时的朝廷太需要胜利了，崇祯帝最后竟完全同意了陈新甲的计划。

依陈新甲的计划，洪承畴应分兵三路：一出塔山，趋大胜堡，攻敌营之西北；一出杏山，抄锦州攻其北；一出松山，渡小凌河，攻敌营之东。而正兵主力则出松山，攻敌营之南。

洪承畴自然不肯依此进兵。原因很简单：一是手下诸将除白广恩、马科、吴三桂外，其余各路都不能独当一面，分兵必然势弱；二是锦州城内城外尚能且战且守，短期内尚无大虞，而清兵却已有粮草短乏之困，如长期拖下去，则必不能支持。

崇祯帝开始时觉得陈新甲说得有理，而经洪承畴这么一说，又觉得洪承畴也有道理，于是摇摆不定。不过在陈新甲及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麒的极力游说下，崇祯帝最终同意了速战速决之策，并下密敕令洪承畴依陈新甲之计划如期出兵。陈新甲也逼迫洪承畴迅速开战，并派亲信赴关外监督。

洪承畴被逼到这种份儿上，也只有出兵了。七月底，洪承畴在宁远誓师后，率部向松山集结，总兵力超过十万。抵达松山后，洪承畴随即布阵，令诸将分驻城外各处，自己则坐镇松山城中，摆出一副解锦州之围的态势。

在八月初的交战中，洪承畴部尚略占优势。不过，随着皇太极亲率大军增援，局势便迅速恶化了。

八月初六日，清兵前线统帅多尔衮等人的奏报传到皇太极手中。皇太极不顾自己鼻血不止，于十五日亲率刚刚集结起来的各部兵马，于沈阳起程，火速赶赴松山前线，并于十九日到达。皇太极随即率部插入松山与杏山之间，切断了松山明军的后退之路。对松山展开了包围之攻势。

一时之间，形势陡转。

洪承畴及其十余万大军，一下子陷入了清兵重围，被困在松山这一弹丸之地，进不能依锦州，退不得归宁远。更严重的是，大军的粮

草供应也无法获得，因为洪承畴为赶进军速度，冒险把粮草留在宁远、杏山和笔架山岛上。这样一来，洪承畴被逼入了战则力量不足、守则粮草已竭的绝境。

几番冲杀后，明军仍是撕不开清兵的防线，军心自然开始动摇。洪承畴认为，粮草已尽，守是死，不战也是死，还不如决一死战，或许还可侥幸获胜，因此他极力鼓动手下诸将率兵奋战。但诸路总兵至此已是心态各异了。

决战尚未开始，大同总兵王朴首先乘黑夜率部逃跑，并引起其他各路的溃逃。战场顿时大乱，士卒们丢盔弃甲，自相践踏，而清兵乘乱斩杀，死伤累累。最后只有洪承畴、辽东巡抚丘民仰及总兵王廷臣、曹变蛟等撤入松山城中。洪承畴只得收集残卒，令部分守城，其他则出城冲杀突围，但出城之部队不久就几乎全军覆没。

洪承畴、丘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及残部万余人，至此已被彻底困在松山孤城了。

松山之役，明军损失惨重。据清朝方面的记载，此役被斩杀的明朝官兵多达五万余人，被缴战马七千余匹，甲胄近万副。吴三桂、王朴、白广恩、马科、李辅明、唐通等战将虽冲出了重围，但也已是无兵之将了。更严重的是，辽东主帅洪承畴、丘民仰等被围在松山城中，锦州城也是危在旦夕了。

松山之战，是明清交战中的一个根本性转折。自此以后，清朝已完全掌握主动，而明朝已是回天无力了。

皇太极围住松山后，并没有发动总攻，而是围而不攻。对锦州、杏山同样也用此法。洪承畴等被困城中，天天盼望援兵前来解围，却始终没能盼来。

崇祯帝也不是不想救援，而实在是力不从心了。

当崇祯帝得知前线败报后，十分震惊，忙召兵部尚书陈新甲商议对策。此时的陈新甲哪里还有什么对策？九月初，崇祯任命杨绳武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关蓟辽津通等处军务，暂代洪承畴之职。同时，崇祯帝竟还命洪承畴固守松山，丘民仰伺机突围。他根本

就不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

杨绳武既无力量也无胆量出关去救援松山、锦州。至十月，崇祯帝又命叶廷桂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宁锦。叶廷桂更是无力救援。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杨绳武去世，由范志完代理总督。范志完也不敢出关救援松、锦。在当时这种形势下，也确实没有人敢出关去与清兵交锋！

好在皇太极竟于此时托人来重提议和之举，事情似乎又有些转机。

皇太极虽成功地围住了锦州、松山，但也面临着难处。天气越来越冷，粮饷更是接济不上，围城的清兵也是困难重重。崇祯十四年（1641）十一月，皇太极让降卒入关，表达了要与明朝议和的意向。兵部尚书陈新甲对此作了口头许诺。但陈新甲并没有把此事告诉崇祯帝。他深知崇祯帝对此的一贯态度，更不会忘记袁崇焕的教训。

到了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形势越来越严重，眼看松山、锦州就要支撑不下去了。陈新甲见军事上毫无进展，便又打起了议和的主意。他暗示了解前方情况的宁前道副使石凤台，把清朝打算议和的有关情况婉转地向崇祯帝汇报，以试探崇祯帝的态度。没想到崇祯帝勃然大怒，把石凤台投进了监狱。但陈新甲仍认为只有议和一途，才能扭转关外局势，于是与大学士谢升相约，再次斗胆向崇祯帝提出。崇祯帝此时的态度已有改变，他只是担心皇太极是否真是打算议和。在谢升的附和下，崇祯帝同意由陈新甲秘密主持议和。

陈新甲随即推荐主事马绍愉，加职方郎中，赐二品服，充任使者。马绍愉等便立即出关驰赴宁远，与清朝前线将领接触。

清廷则明确要求马绍愉等应持有崇祯帝的敕书，以作为信物。马绍愉立即禀报朝廷，兵部随即向皇上奏报。然而，崇祯帝却不肯出此手诏。他的理由表面上是担心泄密，实际上却是放不下架子。直到三月中旬，崇祯帝才以“谕兵部陈新甲”一道敕谕，代其手诏，交前方议和人员作为凭信。但此举为时已晚！松山、锦州已经投降了。

被困在松山的洪承畴等人，日子已相当难过，几乎到了非饿死即

被杀死的地步。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二月二十一日，松山副将夏成德秘密派其子夏舒，前往清营与豪格、多铎联系献城投降之事，约定于二十八日夜动手。至此日夜，清兵发动攻城，夏成德如约内应，松山沦陷。洪承畴、丘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祖大乐，游击祖大名、祖大成，兵备道张斗、姚恭、王之祯，副将江翥、姚勋、朱文德等被俘。最后，丘民仰等一百名军官、三千余名士卒被一齐诛杀。只有祖氏三人因是锦州守将祖大寿的弟兄，被赦活命。而洪承畴最终投降了清廷。

洪承畴被俘之初，清兵令其跪，洪承畴不肯跪，并说道："吾天朝大臣，岂拜小邦王子乎？"于是清兵把他械送沈阳。在皇太极的感召下，洪承畴最终投降，并受到优厚的待遇。后清兵入关，洪承畴被重用，为清廷开国创制、平定江南立下了大功。

崇祯帝在北京误听到洪承畴已经捐躯，十分痛惜，下令赐祭建祠，并亲自祭奠，直到后来弄清了真相，才予以停止，弄得崇祯帝颇有点下不了台。

松山一失，锦州城便无法再守。已坚守锦州一年之久的祖大寿，至此也出城投降。尽管祖大寿十年前既降复叛，至此又坚守锦州一年，令清廷费尽气力，但皇太极仍对他予以宽容处理。祖大寿本人受到了优厚的待遇，其妻子奴仆及部下官属兵丁共四千余口及他们的财产，也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和保护。从祖大寿的遭遇，不难看出皇太极为争取辽将辽人势力而所用的手段，是何等的高明。

在和议未有实质性进展前，皇太极乘胜再次发动攻势。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和济尔哈朗等用红衣大炮攻克了塔山，并进行了屠城。二十二日，又用红衣大炮轰击杏山城，杏山城投降。松山、塔山、杏山随即被全部拆毁。至此，清廷在整个松锦战役中获得全胜。明朝在山海关外的防线，被迫后退至宁远。

明清之间的议和仍在进行之中。

说实在话，如果崇祯帝能面对现实，放手议和，松山、锦州的局面或许不至于会弄成这样。崇祯帝囿于宋金和议的故事，摆着天朝皇

帝的架子，不敢速断速决，最终贻误了战机，葬送了关外的局面。当然，崇祯帝作为天朝皇帝，对议和抱有这样或那样的想法，大概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如朝廷不想议和，则应在其他方面早作决断，绝不能坐失良机。如果再从河南、湖广的局势来考虑，那么，崇祯帝就更应在议和方面慎重处置。

再说皇太极拿到崇祯帝的敕谕后，对崇祯帝的傲慢口气很不满意，认为崇祯帝以天子自居，鄙视他人，口出狂言，不愿和好。皇太极随即以长篇敕谕交付诸王，令其传示明朝使者。马绍愉接到敕谕后，立即赶回呈报。

崇祯帝得到马绍愉的报告后，经过一番盘算，仍决定派使者议和。他给陈新甲下了一道敕谕，内称因未派使者赴沈阳，不通消息，致使“休兵息民”之事没有下文。因此他授权兵部派使者赴沈。与对方接触，探听消息。至此，他虽同意议和，但仍然不肯直接出面与皇太极进行平等对话。

马绍愉及兵部司务朱济之，随即率官员十余人，从役近百人，拿着崇祯帝的敕谕，前往清国，并于五月中旬到达沈阳。此时塔山、杏山已失，形势又有变化了。

当时清朝有许多官员已提出挟松锦大胜之威，继续进攻明朝，以成一统基业。如张存仁等就上书皇太极，陈述明朝国运已衰之势，要求乘此机会扩大战果，并建议“首广其地，次广其财”。不过，皇太极并没有接受这些建议。他仍十分认真地对待议和。他下令对使团予以隆重接待，并予以丰厚的赏赐。最后，皇太极写了一封长信，令马绍愉等转呈崇祯帝。

此信除把战争责任归咎于明朝外，其内容主要是重申和谈之意愿以及和谈的基本条件。这些条件是：两国平等；遣返对方逃人；明朝每年给清朝金万两、银百万两，清则报之以人参、貂皮；以实际占领区划定两国边界等等。以清兵当时的优势而言，皇太极开出的这些条件，虽说咄咄逼人，但也算是基本合理。

不过，对明朝的许多官员而言，这一条件是相当苛刻的，简直就

是宋金和议的翻版。因此，当这一内容被百官知悉后，群情激愤也就在所难免。

在马绍愉等返京之前，朝中已就不很太平。起因是大学士谢升对议和一事说三道四，被言官获悉而上了奏疏，以致传到了外廷。崇祯帝只得将谢升削籍，以塞众口。未料不久风波再起！马绍愉带回的有关议和材料，竟被陈新甲的家僮误为塘报而被抄传，群臣百官意外获悉密件内容，一再传闻的议和消息终获证实。一时间群情汹汹，朝野哗然，令崇祯帝、陈新甲措手不及。

陈新甲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

不过，陈新甲却认为，此事虽是由自己一手操办，但始终是奉旨行事，并未出格。因此，他态度强硬，甚至还有点有恃无恐的样子。他哪里知道，崇祯帝面对群臣的指责，为保全自己的面子和尊严，又要故伎重演，委屈他人了。陈新甲已是在劫难逃了。

七月底，陈新甲被逮入狱。当陈新甲知道崇祯帝要让自己做替罪羊时，急忙遍托人情，希望能起死回生。但崇祯帝决意要杀他以谢天下，谁的人情也没用！九月二十二日，陈新甲被斩于西市。

陈新甲被杀，议和之事便自然停顿下来了。

既然议和无望，皇太极于是决定派兵再次奔袭关内。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十月，皇太极任命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与内大臣图尔格率领满洲、蒙古、汉军各固山额真等军进攻明朝。皇太极此举也可算是对明朝不肯议和的报复。皇太极除要阿巴泰等注意不要妄杀之类的事项外，还另外交待了两点：一是大军无权与明国议和。如明廷要议和则须直接与清国皇帝进行。二是大军如遇农民军，则应善言相待，不能造成冲突，如果他们有使者求见或有书信，则应速转等。

当时明朝的防御情况是这样的：关外、关内分设辽东总督、蓟辽总督，另又设保定、昌平总督；巡抚则有宁远、永平、顺天、保定、密云、天津六个；总兵则有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个。表面上可谓是星罗棋布、无地不防，而实际上是事

权不一，未必有效，更何况松锦大败，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已经尽失，明朝已虚弱得不堪一击了。

战争的进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清兵自界岭口突入长城后，击败蓟辽总兵白腾蛟、马兰峪总兵白广恩，连破迁安、三河等地，分道一趋通州，一自柳树涧趋天津。

崇祯帝随即宣布京师戒严，令勋臣分守各门，征诸城镇兵入援。

由于朝廷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各地官吏或望风溃逃，或献金帛迎降，清兵在畿辅、山东如入无人之境，先后攻陷兖州、顺德、河间三府，以及十八州，六十七县，共八十八城，降一州五县共六城。鲁王及乐陵、阳信、东原、安丘、滋阳诸郡王遇难。府州县官吏死难者数十人。被俘人口三十六万余、牲畜三十二万余，被缴黄金一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珍珠四千余两、彩缎五万余匹，清兵可以说大获全胜。

面对清兵的奔袭，崇祯帝及其大臣们却是一筹莫展。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初，阁臣周延儒在万般无奈下自请督师，但直到二十日才出京。而到四月二十八日，清兵已沿原路北归。周延儒率诸援兵始终跟随其后，不敢与之交战，犹如列队护送一般。

这是清兵入关前的最后一次奔袭，历时七个月，大获全胜。此次奔袭，严重打击了京畿、山东等地区，使这些地区更加凋敝残破。同时，此次奔袭，更暴露了明王朝的不堪一击，增强了皇太极等人夺取天下的信心。皇太极本人虽于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英年早逝，没有亲眼看到江山一统的盛举，但他的后继者却不负其志，不到一年，便完成了他未竟的大业。

不是亡国之君，偏遇亡国之事

大明朝在崇祯帝手中已掌管了十六年，至此已到了穷途末日的地

步了。至崇祯十六年（1643），天下将崩已成定局，剩下的只是早晚而已。

崇祯帝或许已有预感。早在崇祯十二年（1639），一向迷信的崇祯帝，屡屡梦到有一神人在其手掌中写“有”字。他深感惊异，便询问朝臣是何征兆。群臣纷纷称贺，说此为贼平之兆。只有王承恩一人大哭，群臣一片愕然。一崇祯帝也在大惊之余，急问何故。王承恩说：“请皇上赦奴婢不死，奴婢才敢直说。”崇祯帝忙令王承恩直说无妨。没想到王承恩讲出了一番石破天惊的言语来。

王承恩说，依他看来，这是神人托梦告诉皇帝，大明江山将失过半！

崇祯帝大惊失色，忙问其故。王承恩跪下叩首后，接着说道：

“有”字，上半截是“大”字少一捺，下半截是“明”字少一“日”。合起来看，大不成大，明不成明，是大明缺陷之意。神人借此而警示贼寇可虞之至矣，请皇上仔细考虑。

崇祯帝听后，当然很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在那时，崇祯帝虽已知国事艰难，却仍抱有幻想，或许尚不认为江山会真的这么快就失掉。不过，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他大概就已感到了大限即将到来。

大明朝弄到这种地步，当然非崇祯帝一人之过。但他作为大权独揽的最高领导，自然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

平心而论，崇祯帝从登基伊始，就一直兢兢业业，十分操劳，一心想成为中兴之主。与其祖父、皇父、皇兄相比，崇祯帝在这一点上是十分出色的。几乎是所有的史籍都众口一词，充分肯定了崇祯帝为大明王朝的中兴而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并不厌其烦地把诸如励精图治、慨然有为、沉机独断、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等赞语加在他的身上。

而事实上崇祯帝也确实如此。自从正式登基后，他几乎是天天忙忙碌碌，很少有什么享受。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张献忠分别攻占洛阳、襄阳后，崇祯帝因劳累过度，筋疲力尽，以致于有一次在

谒见刘太妃时，竟然坐着睡着了。一觉醒来，崇祯帝感到有失体统，忙向太妃道歉道：

“神祖时海内少事，而今则多灾多难。连着两昼夜看文书奏章。未尝合一下眼，心里烦闷，不思茶饭。没想到在太妃面前，竟如此不能自持。”

太妃心疼得直流眼泪，崇祯帝也跟着流泪，吓得宫人们都不敢抬头。

不过，对崇祯帝治天下的手法及效果，则有不少人提出批评。如亲身经历过明末战乱的张岱，就有这样一番评价。他说：

“先帝（指崇祯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哉？”

张岱此言，确实是一语中的。崇祯帝的许多做法，在当时的形势下，不仅无济于事，反而直接导致了局势的更加恶化。如在用人方面，可以说崇祯帝是满盘皆输。张岱对他的评价是：“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以故侍从之臣，止有唯唯诺诺，如鹦鹉学语，随声附和而已耳。则是先帝立贤无方，天下之人无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并无一人为之分忧宣力。从来孤立无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

综观崇祯帝的前后用人之策及最后结局，确是如此。

温体仁是崇祯帝最宠信的重臣之一。他表面上唯唯诺诺，貌似朴实无华，忠心无二，骨子里却是奸猾无比。在他入阁期间，正是朝廷多事之秋，而他未尝建一策、献一言，相反却终日为自己盘算，与善类为敌。温体仁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讨崇祯帝的欢心，能利用崇祯帝性格上的短处。也正是因为这点，温体仁才能被崇祯帝长期宠信，在阁达八年之久。直到崇祯十年（1637），温体仁才被罢免。

温体仁之后，内阁进行了改组，张至发做了首辅，刘宇亮、薛国观等人了阁。张至发在才智、机变上根本不及温体仁，谈不上有什么创举，也没有得到崇祯帝宠爱，因此不久就被削职回籍。张至发之

后，依次有孔贞运、刘宇亮、薛国观、范复粹等出任首辅。这些人都是庸劣之辈，滥竽充数，难得崇祯帝信任，因此也被走马灯似不断更换。

在此期间走红的是杨嗣昌。杨嗣昌于崇祯十年十月出掌兵部尚书，并于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仍掌兵部。一年未满，杨嗣昌就位极人臣，这充分显示出崇祯帝用人太骤之特点。

杨嗣昌与温体仁不同，他努力想有一番作为，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做法。不过，他对卢象升的战死、熊文灿的失败、孙传庭的被捕等，都负有责任。但是，崇祯帝竟不予追究，刻意宽容，最后竟让杨嗣昌亲赴前线督师。结果是不仅没有挽回败局，反而导致了崇祯十四年（1641）春天形势的急剧恶化，杨嗣昌本人也命丧湖北。虽说杨嗣昌对此不应负全责，但也难辞其咎。崇祯帝也没有通过此事，对自己那种押宝式的用人之道进行反省，从中汲取教训。

崇祯帝的最后一位宠臣，则是周延儒。周延儒早年被温体仁算计，罢归故乡宜兴，至崇祯十四年（1641）十月被召再次入阁，担任首辅。而周延儒之所以能再次被用，是因为有复社首领张溥等人的支持。据说冯铨、侯恂、阮大铖等各出了数万金，交由张溥等人为之活动，交结近侍，打通关节。其条件是周延儒复出后要反过来支持张溥等人。

对周延儒的能力和品行，争议历来很大。他是状元出身，且能位极人臣，不能说他无才。但他最大的毛病，一是贪，二是没有原则，怕负责任。不过，崇祯帝却对周延儒寄予厚望，施之以师礼，并说什么“朕以天下听先生”之类的话。他甚至在崇祯十五年（1642）元旦，还向周延儒等三位阁臣深深作揖，说：“宗社安危，惟诸先生是赖！”真可谓是宠信之极，无以复加！崇祯帝对周延儒的态度，又是其用人太骤的一个生动例子。

事实上，周延儒也无回天之术。在赴任之初，他尚能有一些革旧布新之举，颇得声誉。但时间一长，他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渐渐便有人弹劾周延儒了。但崇祯帝根本听不进去，仍一意姑息。崇祯十六

年（1643）四月，周延儒自请督师抗击清兵，却又不敢交战，事后还谎报军情。崇祯帝不问真假，竟要给他加太师衔，荫其子为中书舍人。当得知真实情况后，崇祯帝恼怒之余，要予以严办，不久却又改变主意，让周延儒坐驿站车马回家，还赏路费等。不过，崇祯帝最后又一改初衷，令周延儒自杀。

崇祯帝之所以能如此宠信温体仁、杨嗣昌、周延儒等人，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能迎合崇祯帝的心意，讨得崇祯帝的欢心。刚愎自用的崇祯帝，就十分喜欢这般能鹦鹉学舌、随声附和之人。相反，对那些敢于发表意见的忠谏之臣，崇祯帝就不太喜欢了。

崇祯帝口口声声要广开言路，但当他真遇到忠诤之臣时，便是另一副嘴脸了。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刘宗周和黄道周两位直臣的遭遇。

刘宗周是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他敢怒敢言，好得罪人。早在天启年间，他就得罪了魏忠贤。魏氏对他还算客气，仅斥之为“矫情厌世”，便让他辞职回家。崇祯帝登基后，他被召回做了顺天府尹。上任之后，他竟斗胆上疏，指责崇祯帝求治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崇祯二年（1629），后金入侵，京畿告急，刘宗周又上疏直言，指责崇祯帝的用人之道，并说用太监典兵，是亡国之兆，弄得崇祯帝很没面子。

到了崇祯八年（1635）七月，吏部奉旨推举孙慎行（不久病卒）、林和刘宗周三人入阁，由皇帝作最后定夺。在崇祯帝召对时，刘宗周竟不分轻重，再次当面指责崇祯帝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他要崇祯帝以收拾人心为本，御外以治内为本，并说如能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则天下自平。

平心而论，刘宗周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刘宗周竟能在大家不敢讲话时直抒其言。对此，崇祯帝即使不舒服，也不应该报复。但崇祯帝最终还是没有让刘宗周入阁，而是改授工部左侍郎。在崇祯帝看来，他这样处理，充其量只是一种警诫，算是很有涵养了。

没想刘宗周并没有到此为止。一个月后，刘宗周竟又上了那篇有名的《痛恨时艰疏》，其措词之激烈，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他竟敢指责崇祯帝不懂圣王求治之道，所作所为不得要领。接着，他又要求崇祯帝不要轻改成法，当以简要出政令，以宽大养人才，以忠厚培国脉，发政施仁，收天下之心等等。言下之意，就是崇祯帝在这方面做得不够。

崇祯帝看到奏疏后，开始是怒不可遏，决意严惩。最后他虽放过了刘宗周，但心中已生厌恶之意。此年十月，当刘宗周再次上疏，指责皇帝重用宦官及内阁无能时，崇祯帝便再也无法忍受了。刘宗周终于被罢免。

到崇祯十五年（1642），被崇祯帝认为是清正敢言却无用的刘宗周，再次被起用为左都御史。没想到上任不久的刘宗周，又与崇祯帝顶撞起来，再次丢了官。

当时，给事中姜埰、行人司副熊开元因得罪了崇祯帝，被下了诏狱，密旨拟处死。刘宗周则认为言官以言语获罪而被下诏狱，本朝尚无先例，也有伤国体，于是便联络群臣奋起救援。在崇祯帝召对群臣时，刘宗周与崇祯帝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结果是姜、熊二人保住了性命，刘宗周却再次被罢免。

黄道周，福建漳浦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曾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任皇帝经筵展书官，后因与魏忠贤有矛盾而致仕闲居。崇祯二年（1629），黄道周被重新起用。崇祯五年（1632），黄道周因上疏攻击周延儒、温体仁而被崇祯帝解职。

崇祯九年（1636），黄道周再次被起用。至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当时已是日讲官、少詹事的黄道周，与杨嗣昌等一起被廷推为阁臣，由崇祯帝作最后定夺。崇祯帝圈定杨嗣昌等人入阁，却把呼声很高的黄道周排除在外，颇出人意料。不久，黄道周便连上三疏，分别攻击杨嗣昌夺情恋位、陈新甲（原为逆案中人，由杨嗣昌重新起用）走邪径、辽东巡抚方一藻主和议等，措辞相当激烈。

崇祯帝则认为，黄道周此举，是与他未能入阁有关。于是，崇祯

帝便把他下到吏部，由吏部议其外遣。不过，崇祯帝在不久后召见内阁及部院大臣时，又与黄道周发生了激烈冲突，从中不难看出崇祯帝对清流的心态。

当时崇祯帝责问黄道周说：“凡无所为而为者，谓之天理；有所为而为者，谓之人欲。你的三个奏疏是在你廷推不成（没有入阁）后上的，这能说是无所为吗？”

崇祯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说你黄道周上此三疏，是有所为而为者，目的就是为了表达你未能入阁之怨气。

没想到黄道周立即反驳道：“天、人止是义、利，臣心为国家，不为功名，自信是无所为！”

崇祯帝反问道：“上个月陈新甲被起用时，你为什么不讲？”

黄道周随口就说：“当时御史林兰友、给事何楷都已上疏弹劾，我与他们是同乡，担心涉结党嫌疑。”

崇祯帝反唇相讥：“难道现在就无嫌疑？”

黄道周接着便说：“天下纲常，边疆大计，今天不讲，后面就无机会，并不是出于私心。”

至此，崇祯帝已不想再与他争下去，便教训道：“清固美德，但也不可过分。”

未料黄道周仍不依不饶，把矛头直指杨嗣昌，说他是不孝不悌。杨嗣昌正在走红，哪里能忍受这种言语，便愤而出奏，称自己是先国后家，并反过来指责黄道周说：你黄道周的道德学问，本人向来钦佩，而你却自称不如郑鄤，还谈什么纲常伦理！

杨嗣昌的原意，也并不是说黄道周不如郑鄤，而是说你黄道周人品学问，都到了为人宗师的分上，却仍说不如郑鄤，那么你那套纲常伦理还有什么谈头？

郑鄤何许人也？郑鄤，武进横林人，其父郑振先、叔父郑振光都是进士，外祖父是大学士吴区闻，岳父是大宗伯孙淇澳。他本人十八

岁中举人，二十八岁中进士，选庶常，揭大珰，一时名气峻峭而鸿远。他的后母，是大学士吴宗达的妹妹，性格暴烈，经常虐待奴婢。郑郧实在看不下去，便求助迷信，整治了她一下。这就是所谓的“郑鄤杖母”事件。此事后由吴宗达向朝廷揭发，没想到却被温体仁利用，并以此来攻击郑鄤的好友、大学士文震孟。崇祯八年（1635）十一月，郑鄤被下了诏狱，至崇祯十二年（1639）被凌迟处死于北京。黄道周曾与郑鄤交游，并说过自己的文章不如郑鄤，以示谦虚。没想到此时被杨嗣昌抓住把柄。

听杨嗣昌这么一说，崇祯帝记起了此事，便责问黄道周：“古人之心无所为，今见各有所主，故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说。古之邪说，别为一教，今则直附于圣贤经传中，系世道人心更大。你还说自己不如郑鄤，是何道理？”

黄道周反驳道：“我说的是文章不如郑鄤！”

崇祯帝穷追不放，黄道周则理直气壮，针锋相对，坚持说杨嗣昌、陈新甲不对。崇祯帝最后竟举出少正卯被诛之事，来影射黄道周。黄道周大声抗辩：“少正卯心术不正，臣心正无一毫私。”两人顶到这种份儿上，都有点下不了台。崇祯帝大怒之下，叱之退下，候旨发落，哪里会料到黄道周会大声争辩道：

“臣今日不尽言，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陛下负臣！”

崇祯帝听罢此话，也盛怒之极，竟挖苦道：“尔一生学问，止成佞耳！”

黄道周一听皇帝竟说他奸佞不正，便跪下抗辩道：

“臣敢将忠佞两字给皇上剖析清楚。如果在君父面前，独立敢言算是佞的话，那么在君父面前谗谄而谀岂不是忠？！忠佞不别，邪正混淆，何以致治？”

崇祯帝再次喝令黄道周退下。最后，崇祯帝将黄道周连贬六秩，外放江西。崇祯十三年（1640），余怒未消的崇祯帝，又将黄道周及举荐黄道周的江西巡抚解学龙，以“党邪乱政”、“徇私”的罪名，一起逮至京师，杖打八十，并下了刑部狱，并重罚了那些试图为黄道周辩

解的官员。

刘宗周、黄道周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清流，学问道德，为天下共推。他们的言行，或许过于激烈，有时甚至很是迂腐，但他们的忠直、负责精神，正是当时官场上所缺乏的。如能用好这些人，则不仅为文官集团提供了榜样，更能鼓舞人心，激励正气。更何况他们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正切中时弊，如能依此而行，于朝廷当大有裨益。

平心而论，崇祯帝也知道刘宗周、黄道周等是操守、学识俱佳之臣，也希望能重用他们，能帮他力挽狂澜。但君臣之间，最终不仅未能和谐相处，同舟共济，反而弄到这般田地。究其原因，固然有双方性格、观点方面的因素，但最根本的症结仍是崇祯帝的治国之策。

崇祯帝治国，过于急功求利，在用人上，更是如此。他口口声声唯才是举，而受他重用之臣却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为他力挽狂澜。而真正有德有才的文武大臣，反而得不到重用，更有像卢象升、傅宗龙、孙传庭诸辈，或战死，或下狱，下场惨烈。崇祯帝总是推诿于文武大臣，认为大明朝之所以会弄到这种地步，都是文武大臣不负责任的结果。

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天下大旱，崇祯帝祈雨未果，于是便下了第二个“罪己诏”。诏中除稍稍自责外，便大骂百官：

> “如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递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殃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扑任意；囊橐既富，则解网念工。巡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似此种种，足干天和。积过良深，所以挽回不？易。”

在此诏中，崇祯帝把能骂的人，都几乎骂遍了。当然，他说的这些，也几乎都是事实。明季吏治之坏，也非崇祯朝开始。问题在于，崇祯帝面对这种局面，应找出应对的有效办法来。而他的用人之策，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是推波助澜。在亡国前的一个月，崇祯帝自己也承认其用人的失败，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任大臣而不法，用小

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奏”。这虽不能全怪崇祯帝，但崇祯帝也确实应负相当的责任。

面对越来越险恶的局面，崇祯帝愤恨之余，惟一的办法就是严惩，轻则撤职，重则入狱砍头。

崇祯一朝，高层官员的变更十分频繁，如兵部尚书先后撤换十四人，刑部尚书则更多，为十七人，而阁臣竟多达五十多人。最令人吃惊的是，崇祯帝竟在半年之中更换了五任蓟镇总督。这种走马灯式的撤换，哪里还能谈得上什么久任之法。

更严重的是，崇祯帝还推行重典之策，严惩文武百官，其手段之烈、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是明代历朝所罕见的。

崇祯帝在位十七年，共杀首辅二人、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其余各级官员更是多得数不清。

首辅被杀的是薛国观、周延儒。首辅一职，在明代具有崇高的地位，可以说是贵极人臣，很少有被杀的。可是崇祯帝竟连杀了二人。虽说崇祯帝手下留情，皆令自尽，但仍相当惨烈。如薛国观自杀后，因崇祯帝无旨，旁人不敢收尸，致使其尸被吊了两天两夜。

总督被杀者，先后有蓟辽总督袁崇焕、刘策，漕运总督杨一鹏，督师熊文灿，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蓟州总督范志完、赵光抃。

巡抚被杀者，有蓟镇巡抚王应豸、山西巡抚耿如杞、宣府巡抚李养冲、大同巡抚张翼明、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永平巡抚马成名、四川巡抚邵捷春等等。

其他被杀的各级官员，因人数太多，根本就无法详列。

这么多官员被杀，固然与崇祯朝的多事有关，但亦与崇祯帝的做法是分不开的。崇祯帝总想以重典治世，整饬吏治，挽救危局，但他没想到的是用法太严、杀人过多，其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如果仔细推敲一下，就不难发现，崇祯帝的杀人，在许多时候是毫无道理而言的，其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

最典型的是袁崇焕！袁崇焕的被杀，纯粹是崇祯帝本人误听谣言

所致，而袁之被杀，又直接导致了辽东局势的恶化。除去袁崇焕外，还有些是罪不至死而被杀的，有些是做了替罪羊的，甚至有些是为一点小过而被冤杀的。到后来，崇祯帝似乎杀到了疯狂的地步。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崇祯帝以失守封疆的罪名，一次竟斩杀了顺天巡抚陈祖苞等三十六位高级官员，可以说是创了纪录。

甚至可以说，崇祯帝到后来已对文官集团失去了信心，并认定天下大乱是文武大臣误国所致，转而产生了狭隘的报复心理。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崇祯帝的这种做法就不难理解了。

既然文武大臣在他眼里是如此角色，那么宦官被重用就不足为奇了。崇祯帝登基后，曾寸磔魏忠贤，清除阉党，一时人心大快。没想到至崇祯二年（1629）底，崇祯帝竟又派宦官监军、提督京营、九门。至崇祯四年（1631），宦官更被大规模起用，不仅监军、监饷、监茶马，甚至还总理户、工两部钱粮，势力越来越大。

崇祯帝之所以要重用宦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大臣们不实心任事，士大夫有负国家，一句话，就是宦官要比文武大臣管用、可靠。因此，不管大臣们如何反对，他就是照用不误。

不过，到了崇祯七年（1634）八月，崇祯帝大概也感觉到了重用宦官所带来的弊端，而且其效果也并不像原先期望的那么高，加上大臣们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声，于是便下令撤回了大部分宦官。可是到了崇祯九年（1636）七月，由于清兵入侵，崇祯帝再次大用宦官，不仅分遣宦官监镇和分守，甚至还设了一位总监，直接指挥各路总兵，从此宦官权力大增。

在崇祯十三年（1640）至十五年（1642）间，尽管崇祯帝又几次对宦官权力进行了限制，但至崇祯十五年底，宦官又重新被重用。自此以后，崇祯帝便再也离不开宦官了。

对宦官参政所必然引起的严重后果，崇祯帝无论是在理性上，还是在感性上都应深有体会。但他却最终未能摆脱宦官，而是重蹈了其皇兄的覆辙。崇祯帝总是自欺欺人地认为，像他这样的英明君主，有足够的把握驾驭宦官，使其为己所用而收奇效，就如他的祖宗明成祖

那样。而事实上，重用宦官，其结果正适得其反，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成了时局恶化的催化剂。遗憾的是，崇祯帝本人至死也没弄懂这点。

其实，崇祯帝没有弄懂的何止是这些！

他在位十七年，始终处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冲突之中：

他反对植党，而党争却愈演愈烈；

他唯才是举，而朝署之中却半染赭衣；

他惩治宦官，而宦官之势却如日中天；

他严禁贪污，而贪污之风却愈演愈烈；

他整饬兵备，其结果却是将不治兵、兵不杀贼；

他口口声声爱民亲民，而百姓却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纷纷为盗；

……

最后的结果是他做了亡国之君。

崇祯帝在魂归煤山前，仍抱着“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信念，把亡国的责任都推到文武大臣们身上。他始终没有想到，他自己正是这场悲剧的主要导演者。

第八章
大崩溃

崇祯十五年（1642）底，天下已呈分崩离析之乱象。

此年闰十一月，李自成率部四十万南下湖广，连破襄阳、荆州等地。至十六年（1643）正月，又破承天、汉阳诸地。在军事胜利的同时，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设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府，自任大元帅，并于河南、湖广占领区设置地方政权，俨然成了武装割据政权。

张献忠虽在此年的十月被官兵重创于安徽潜山天堂寨山区，吃了大亏，但实力仍在。当李自成正忙着清除异己、建立政权时，张献忠乘机于崇祯十六年（1643）春攻入实力空虚的湖广，并于五月初攻克重镇武昌，建起一个中央政权来。

皇太极则于此年的十月任命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率满洲、蒙古、汉军各固山额真，进攻明朝。阿巴泰此次奔袭，历时七个月，横扫京畿、山东，攻下八十八城，俘获难以数计，沉重打击了明王朝。

面对越来越险恶的时局，崇祯帝及满朝文武大臣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明朝走向崩溃。

大崩溃终于来到了。

李自成占据襄阳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李自成率部攻下了汝宁城（今汝南）。至此，河南黄河以南地区全部被攻陷。朝廷实际上已无法控制这一地区，也不再设官，而百姓们则纷纷结寨自保，或降农民军，或受朝命，并互相吞并。中原祸乱，至此为极！

李自成在横扫河南后，于闰十一月率部众四十万人，由河南南阳进入湖广，向襄阳（今湖北襄樊）进军。

当时据守襄阳的是左良玉部。左良玉在朱仙镇被李自成、罗汝才大败后，逃回襄阳。经一段时间的恢复后，此时又有部众二十万，号称三十万。不过朝廷只给饷二万五千人，其余的粮饷只能靠自筹。说是自筹，实际上就是搜刮甚至抢劫，因此给襄阳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军民关系自然是形同水火，十分紧张。

此时的左良玉已非昔比，他再也不敢与李自成打硬仗。当他得知李自成、罗汝才大兵压境时，便于樊城造船，准备随时顺汉水退走东南。不料襄阳百姓对他已恨之入骨，竟放火烧毁了他的船只。左良玉闻讯大怒，下令抢掠民船，载运军资、家眷先走，自己则率部屯兵樊城高地，设阵布防，准备阻击。

李自成部抵达城下，先遭左良玉部火铳阻击，后经当地百姓指点，绕过左良玉部防线，渡过汉水，攻击樊城。左良玉见势不妙，于十二月初三日拔营东遁，樊城随即沦陷，襄阳也于次日被攻占。郧阳巡抚王永祚护送襄、唐二王之子弃城而走。樊城、襄阳之战，充分显示了人心向背对战争所起的巨大作用。当时的百姓，已对朝廷失去信心，甚至是痛恨万分，人心思乱，一见风吹草动，便纷纷闻风而动，反过来支持农民军。

十二月十四日，农民军占领荆门州（今荆门），偏沅巡抚陈睿谟此前已护送惠王朱常润等弃城而走荆州。十六日，农民军占领荆州（今江陵），执杀湘阴王全家。陈睿谟则护送惠王逃往岳州（今湖南岳阳）。荆州被占前，豪绅陆师贽曾主张抵抗，却无人响应，只得自杀。当时荆州城内的士绅百姓都纷纷迎接农民军入城。后人有人感叹道：

“荆州有兵，有炮，有坚城，生齿百万，但无人固守，拱手让贼！”

在荆州得手后，农民军又攻击承天府（今钟祥）。承天府在明代有特殊地位。嘉靖皇帝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的封地就在这里。当时因武宗元无子，兴献王之子朱厚熜得以继大统，做了皇帝。从此，钟祥就被视作龙潜之地，加上兴献王墓地（即献陵）在此，于是被升格为承天府，并设有二卫防守。当时，湖广巡抚宋一鹤、巡按御史李振声、总兵钱中选等都在此驻防。

左良玉率部从襄、樊撤退后，也曾到过承天。饥兵抢掠，左良玉便向巡抚宋一鹤请饷。巡按御史李振声便说：左兵太多，何以给之？即使有粮，也不如养承天之民自守！宋一鹤于是拒绝供饷，闭门不纳。左良玉大怒，下令抢劫后率部扬长而去。如果左良玉部能呆在承天，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

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初一日，农民军攻克承天府。巡抚宋一鹤自杀，巡按李振声被俘，总兵钱中选战死，钦天监博士杨永裕投降。李自成令改承天府为扬武州。

巡按李振声也是米脂人。由于与李自成同姓同乡，被俘后颇受优待。李自成把他留在营中，称其为大哥，百般劝降，并授其为兵政府侍郎。但李振声始终不为所动，甚至还想有所图谋，最终被处死。

承天被占后，农民军想发掘献陵地官，图谋财宝，不想突然雷雨大作，并击死数人，只好作罢。据说罗汝才知道此事后，认为天命依然未改，于是便与李自成起了二心。

农民军攻克承天后，继续东进，连克潜山、京山，并于正月十五日占领汉川县。此地离省会武昌只有一百余里，且可由汉水顺流直达。

武昌大震！

当时左良玉部已在武昌。由于兵饷缺乏，左良玉曾去见过楚王，并说只要给我十万人饷，我就可保武昌无忧。楚王不肯答应。此时见李自成大军逼近，左良玉开始抢掠大量民船，于十八日向九江撤退。从此以后，左良玉部便没有与李自成交过手。

正月十八日，农民军攻占汉阳府城，并随即发动渡江，攻打武昌。由于风急浪大，农民军又多为北方人，不习水性，渡江失败。二十一日，李自成经云梦返回襄阳。当时武昌实力空虚，根本抵挡不住，幸好李自成主动撤兵，否则必陷无疑。

没想到这一撤，倒让张献忠捡了个大便宜。到五月，张献忠未费多大气力便攻占了武昌。

李自成自十五年（1642）闰十一月进兵湖广，至此只用了三个月，便把湖广长江之北的襄阳、荆州、承天、汉阳、德安、黄州等府统统攻陷，仅剩下郧阳一府。郧阳府守将王光恩，原也是陕北的农民军首领，后降朝廷。此时他死心塌地守城，誓不投降，弄得攻城的刘宗敏也没有办法，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李自成回到襄阳后，便开始组建政权。据说当时有人向李自成劝进，牛金星认为不可，于是，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设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府，自任文武大元帅，并分设官职：

设丞相一人，由牛金星担任。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由喻上猷（进士、原御史）、萧应坤（进士、原江西布政使）、杨永裕（进士、原钦天监博士）、李振声（进士、原巡按御史，李振声实际上未降，其职后由丘之陶接任）、邓岩忠（贡士）、姚锡胤任侍郎。

外官则设防御史、府尹、州牧、县令等职。当时李自成设官的地区，大致有河南的开封府（改称扬平府，治在禹州，今禹县）、南阳府、信阳府、汝宁府，湖广的承天府（改称扬武州）、荆州府、德安府（改称安陆府）、襄阳府等。后来其势力又扩大到长江之南。

李自成同时对军队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他把部队划分成两种：一是攻城略地的“五营”，一是镇守之地方军。

“五营”设权将军二人，即田见秀、刘宗敏。田见秀负责提督诸营，刘宗敏则负责中权亲军。刘宗敏所辖的中权亲军设有：

帅标正威武将军张鼐（有人称张鼐就是李双喜的本名），威武将军党守素副之；

帅标左威武将军辛思忠，果毅将军谷可成副之；

帅标右威武将军李友；

帅标前果毅将军任继荣；

帅标后果毅将军吴汝义。

田见秀提督的诸营设置分别为：

左营：制将军刘芳亮，左果毅将军马世耀，右威武将军刘汝魁。

右营：制将军刘希尧，左果毅将军白九鹤（一作白鸠鹤），右果毅将军刘体纯。

前营：制将军袁宗第，左果毅将军谢君友，右果毅将军田虎。

后营：制将军李过，左果毅将军张能，右果毅将军马重僖。

除“五营”以外，李自成还建立一支分镇各地的守卫部队。他依据

先守襄阳，次及承天、德安，再渐及汝宁的宗旨，设卫置帅，分驻各地。主要有：

襄阳卫，由左、右威武将军高一功、冯雄驻守襄阳；

通达卫，由制将军任光荣，左、右威严将军蔺养成、牛万才驻守荆州等地；

杨武卫，以果毅将军白旺、威武将军谢应龙等驻守安陆、汉川等地；

汝宁卫，由威武将军韩华美驻守信阳；

均平卫，由果毅将军周凤梧驻守郑禹二州。

在政权建设的同时，李自成用血腥手段清除异己，以独揽大权，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

首当其冲的是曹操罗汝才、革里眼贺一龙。

曹操罗汝才是最早的陕北农民领袖之一，实力较强。在李自成陕西大败而躲入山中不敢露面时，罗汝才却与张献忠一起，正闹得红火。后因与张献忠合不来，罗汝才便与李自成合营，横扫河南，又下湖广，其贡献和实力并不比李自成逊色。李自成自封“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元帅”时，也给罗汝才封了一个“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但罗汝才无权向全军发布号令。

革里眼贺一龙，则是“革、左五营”的领头人物。他与老回回马守应一起，领导“革、左五营”长期活动在安徽。即使在李自成被击溃、张献忠、罗汝才投降这一最艰苦的时期，他们也从未动摇。“革、左五营”基本上是独立作战的，曾与张献忠联过手，后见李自成在河南打得顺手，便移师河南与他联手，直至湖广。“革、左五营”的实力仅次于当时的李自成、罗汝才。

李自成要独揽大权，必须除掉罗汝才、贺一龙等人，因为罗、贺等人也是实力强劲的竞争者。当时的形势是，要么三支力量散伙，重新各自为战，要么决出胜者，统率全军。于是李自成便先下手为强，抢先动了手。

具体详情，不得而知。据说在此年的三月初，李自成在安排妥当后，邀罗汝才、贺一龙到老营赴宴。罗汝才借故未去。而贺一龙却应邀而至，被乱刀杀死。第二天一早，李自成亲率精骑百人，谎称有事相商，杀罗汝才于其卧室，随即宣布其罪状（自然是通敌），安抚其部众。

罗、贺的部众虽有不少叛逃的，但大部仍在，被收编进李自成营中。老回回马守应当时正在率兵攻打澧州（今湖南澧县），闻讯大惊，不敢再回到李自成的身边。李自成百般拉拢，授其“永辅营英武将军”之号，并送他一颗重四十八两的金印，却都被拒绝。马守应最后病死，其部众大多归了张献忠。革、左五营的其他三位首领，即左金王贺锦、治世王刘希尧、争世王蔺养成，则乖乖地做了李自成的部下。

不久，李自成还纵兵消灭了活动于河南的小袁营，其首领袁时中被杀。

至此，李自成已是大权独揽的农民领袖了。他也拥有了争天下的实力了。

张献忠攻克武昌

就在李自成正忙着在襄阳建立政权、清除异己时，张献忠冷不防地从安徽杀出，直奔武昌，并于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占领武昌，硬是从李自成口中抢走了这块肥肉。

崇祯十五年（1642），张献忠主要活动于安徽。他与“革、左五营”联手，局面虽不像李自成在河南那样轰轰烈烈，但尚能维持。没想到“革、左五营”见李自成声势浩大，便移师河南与其合营。张献忠因与李自成、罗汝才有着说不清的恩恩怨怨，自然就不肯去凑热闹。

由于“革、左五营”的离去，张献忠独木难支，明显感到官兵的重压，于是便准备重回湖广。不料朝廷看出了他的意图，拼命堵截合

围，他只得又重返安徽潜山的天堂寨山区，以避其锋芒。此年十月，总兵刘良佐、黄得功率部偷袭潜山，把张献忠打了措手不及，十分被动。

崇祯十六年（1643）初，当张献忠获悉湖广的情况后，便再次决定进兵湖广。当时的湖广，实力已相当空虚，而且当时湖北麻城一带的民变已闹得十分厉害，形势对张献忠非常有利。

张献忠迅速率部西进，一举突入湖北，连克黄梅、广济、蕲州，大杀乡绅，深受百姓欢迎。三月初，张献忠攻下蕲水（今浠水），杀掉了是宿敌也是“恩人”的熊文灿的全部家族。接着，张献忠又克黄州。当时，麻城民变正闹得不可开交，从乱的奴仆已占据了县城。他们派人来邀张献忠。张献忠大喜之下，急率精骑飞赴麻城，并于四月初六日占领了麻城。麻城一下子就有五六万人投奔了张献忠。

当张献忠攻下罗田时，罗田诸生李时荣给张献忠献上了一条绝好的计策，建议张献忠乘势渡江，直取武昌。张献忠随即征调渔船，并于五月初五日遣先头部队于团凤洲渡江，攻下武昌县（今鄂城）。五月二十三日，张献忠率全军于鸭蛋洲过江。五月二十九日，张献忠抵达武昌城下，开始攻城。

武昌是湖广省会，江汉重镇。此城一失，则江汉肯定不保。然而，朝廷和湖广当局却始终没有在武昌认真设防，心存侥幸。至崇祯十六年（1643）春，武昌的形势已危如累卵，不仅西有李自成重兵压境，东有张献忠兼程而来，而且城中缺兵少饷，人心已经大乱，根本谈不上有真正的防守。

眼看张献忠就要到了，城中要员们这才慌了起来，想起要赶紧布阵设防，并寄希望楚王能拿出钱来，充饷养兵。于是，湖广布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的官员们一齐来到楚王府，跪在楚王朱华奎面前，请他出借银两充饷，被楚王拒绝。家居的大学士贺逢圣，也去晋见楚王，恳求楚王出饷，可楚王竟拿出了洪武年间的一张椅子，说没有别的，只有此椅可佐军充饷。贺逢圣急得当时就哭了起来。直到城陷前没多久，楚王才拿出钱来招募承天、德安的溃兵，号称楚府兵，由楚府长史徐学颜统率。

当张献忠部抵达武昌城下时，道臣王扬基等弃城而走，楚府兵打开保安、文昌二门，纳城投降。参将崔文荣、长史徐学颜战死。大学士贺逢圣则用船载着家人赴墩子湖，沉湖自杀。

楚王朱华奎被俘。当张献忠看到楚府库藏的上百万金银时，叹息道：有这么多钱，竟不肯拿出来守城，朱胡子真是个庸人！最后，楚王被放入笼中，沉江而死。楚王宗室全部被斩杀！据说当时从鹦鹉洲到道士洑之间，浮尸蔽江，一片凄惨景象。

张献忠武昌得手，实力大增，便也学着李自成，在武昌建立起政权来。

他自称“西王”，住进了楚王府，并高树两面大旗，上书“天与人归”，“招贤纳士”。

他改武昌为天授府，江夏为上江县。铸“西王之宝”铜钱。设“五府六部”，分授周文江为兵部尚书，张其在为总兵前军都督，李时荣为巡抚，谢凤州为守道，萧彦为巡道，陈驭六为学道，周综文为天授府知府，黄元凯为黄州府知府，沈会霖为汉阳县知县等。

大概是张献忠曾读过一点书，所以颇有附庸风雅之意。他在黄鹤楼题诗，令部下附和。他还开科取士，录取状元、进士，并授以官职。在这方面，张献忠确实要比李自成强。

可是他的实力仍比不过李自成。虽然他乘左良玉等东下、李自成留驻襄阳的机会，轻取了武昌，占了大便宜，但心里仍不免发怵。据说李自成得知张献忠攻下武昌后，曾派人前往武昌，名为相贺，实则胁迫他归附。张献忠只得笑脸相迎，并赠送金银宝物。李自成受了礼，却没有作书回复。

张献忠担心李自成会前来火并，便于此年七月率大部离开武昌，南下湘赣。未料李自成最后却移兵河南，与孙传庭对垒，并没有前来。这一阴差阳错，倒让左良玉捡了便宜。他在张献忠撤离武昌后，于下游回师西向，一举占了武昌。武昌虽已是空城，但并不影响左帅吹嘘自己的恢复之功。

张献忠率兵南下，连克咸宁、蒲圻，向岳州（今岳阳）方向进

发。原驻防城陵矶的偏沅巡抚李乾德、总兵孔希贵率兵进驻岳州。八月初五日，张献忠二十万大军猛攻岳州，李乾德、孔希贵以及监军道许璟溃退长沙。岳州被克。

二十三日，张献忠部进抵长沙城下。

当时长沙城中住着吉王，惠王也从荆州逃到此地。面对张献忠的大军，湖广巡按刘熙祚、偏沅巡抚李乾德、总兵孔希贵等临阵脱逃，护送两藩王退往衡州（今衡阳），投奔桂王。二十五日，因留守长沙的总兵尹先民、副将何以德、进士史可敬等投降献城，张献忠得以兵不血刃，占领长沙。

张献忠再克衡州。惠王、桂王、吉王等先退至永州（今零陵），张献忠部尾随而至。湖广巡按刘熙祚令官兵护送三位藩王退入广西，自己则死守永州，兵败被杀。

此后，张献忠部又连陷宝庆（今邵阳）、常德。

湖南承平日久，不知战事。张献忠至此，如入无人之境。湖南境内，仅有少数几地得以保全。辰州府（今沅陵）因土司兵守辰龙关（在沅陵县境内，是常德入辰州之要津）而未遭兵火。道州（今道县，属永州府）守备沈至绪战死，其女再战，夺回父尸，道州城也得以保全。

在湖南得手后，张献忠还东攻江西，陷吉安、袁州（今宜春）、建昌（今永修）、抚州（今抚州）等府，并分兵南进至广东南雄、韶州（今韶关）两府境内。

至崇祯十六年（1643）冬，张献忠已基本上控制了湖南全境，并占有江西一部分。他本人坐镇长沙，用从衡州桂王府上拆下来的建材造起了宫殿。此时，他已称自己的军队为天兵，而把大明朝称之为朱朝。为收买人心，他公开发布三年不征粮的命令，并大量任命降官。他还照例要开科取士，收罗文人。他甚至还礼贤下士，每到一地，则大索名士。如衡阳名士王夫之，就被他多次征聘，最后逼得王夫之只能毁容求避，而他居然也就放过了王夫之。

张献忠在湖南的举措，确实与从前大不相同。

当然，张献忠此番来到湖南，自然不会忘记他的老对手杨嗣昌。十一月二十二日，张献忠攻下常德，于是便以平南先锋的名义发布命令道：

“照得诛贼杨某，昔年曾调天下兵马敢抗天兵。某幸早死于吾刃矣。今过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坟墓在此。只不归顺足矣，焉何拴同乡绅士庶，到处立团。合将九族尽诛，坟墓尽掘，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有捉杨姓一人者赏银十两，捉其子孙兄弟者赏千金。为此牌仰该府。”

杨嗣昌及其父杨鹤，不仅自己因剿抚而送命。死后还要连累祖宗、家族，真是惨烈。

此时的张献忠，不仅已稳占三湘，旁掠江西，而且还可以南下广东、广西，东出江西、福建，甚至可以直捣南京，尽占江南。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张献忠竟最终放弃了湖南，又杀向了四川。

张献忠此举，令后人百思不得其解，至今仍是一个谜。

最后一张王牌：孙传庭出关

李自成在襄阳大杀异己、巩固地位后，便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即下一步该怎么走？

正当部下众说纷纭，而李自成本人也举棋不定时，却传来了孙传庭率兵出关、主动出击的消息。李自成再三权衡后，便毅然采纳了顾君恩的建议，定下先取关中，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再攻取山西，进克北京的计划，并随即挥师北上，迎击孙传庭。

孙传庭的出关求战，在某种意义上说，倒是帮助李自成下了决心，选用顾君恩之策。后来的进程也表明，李自成此举无疑是正确的，尽管他疏忽了山海关外清朝的存在。

那么，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孙传庭为什么要主动出击呢？因为这

种做法，在当时无疑是自取灭亡，而且肯定会危及全局。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讲讲当时崇祯帝及朝廷的决策。

崇祯十六年（1643）春，李自成部在湖北大发神威，几乎攻克全境，而驻守此地的左良玉部却一退再退，根本不敢与李自成交战。湖北就这样白白断送！

崇祯帝心急如焚。

他认为局面之所以弄到这般地步，就是因为在杨嗣昌之后，没有一个能干的大臣能代他分劳，总负其责。于是，他又开始物色人选。

崇祯帝这次选中了吴甡。当时已任大学士的吴甡，曾任过陕西巡抚和山西巡抚，曾有长期对付农民军的经历，崇祯帝选中他也不奇怪。在此时的满朝文武中，大概也只有吴甡可堪一用了。

崇祯帝本希望吴甡能自告奋勇，主动站出来请命。三月，崇祯帝召对大臣，说起承天祖陵被毁之事，声泪俱下。接着，他又指责文武大臣调遣失度，暗示要进行人事变动。对当时的形势，文武大臣自然是心中有数，所以没有人肯接话，只是一味跪着叩头。吴甡自然也是如此。

崇祯帝见吴甡不作表示，只得在第二天再次召对大臣，并开门见山地点了吴甡。他对吴甡说：自杨嗣昌死后，督师无人，以致弄到这种地步。你过去曾长期担任过相关职务，可去湖广督师，以图恢复。如此一来，吴甡再也不便推脱，只得以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身份出任督师，而大理寺评事万元吉则被任命为职方郎中，赞画军前。

吴甡过去能长期自保，而没有像其他大臣那样丢官丧命，靠的就是精明老练。他虽口口声声说不惜一死，愿赴疆场，但也决不会贸然行事。他自然要向皇帝提提条件。

吴甡于是上疏崇祯帝，请拨精兵三万，而且还要有敢战之将率领。其理由是，湖广左良玉部军纪败坏，不肯用命，如单派他孤身前往，等于就是无兵之帅，难以有所作为。不仅如此，吴甡还提出了一个保守的进兵方案，说自己先赴金陵，用自己的精兵先胁制住左良玉

后，再进兵湖广，与陕西孙传庭夹击李自成。

崇祯帝看到此疏，自然很不高兴，便把此疏留中不发。吴甡要求呈见，以便当面解释。第二天，崇祯帝便在文昭阁召见了吴甡。

崇祯帝开门见山，批评吴甡说："昨天先生之疏，需兵太多，仓猝之间，哪里去调集？南京与湖广相隔太远，似乎也不是退守之地。"

他还为左良玉作了辩护，说左良玉之退，也是因为地方官不为他筹措粮饷。此支劲旅可供先生之用。吴甡则据理力争：

"左良玉的跋扈，人人皆知，昔年杨嗣昌九檄征调左兵，左竟一兵不发！臣不如杨嗣昌，而左良玉更是今非昔比。如不能节制，则损威重。再说自襄阳顺流可直达南京，易如反掌，因此臣是兼顾南京，而不是退守。"

吴甡当时十分清楚，如果自己不带兵南下，将肯定是一事无成，所以他在这一点上绝不让步。而崇祯帝则认为，到了现在这种地步，你叫我哪里去调这么多兵？况且左良玉的二十万大军，如果处置得当，也不是不可用。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次辅陈演插进来帮皇帝打圆场，说了一句：

"督师出，则督抚之兵皆其兵也！"

吴甡一听，立即回敬道：

"次辅读书中秘，不熟悉军旅，我之所以要请兵，正是因为督抚手中无兵。"

他于是列举了河南总督只有数十名随员，河南巡抚也仅剩下标营千人，湖广巡抚更是两手空空等例子，来说明督抚已无兵可用。

崇祯帝只得令兵部速议发兵。可是兵部也已无兵可调，最后只得拟拨总兵唐通部、马科部及京营兵共一万人，交吴甡指挥。可是唐通当时正率部与入侵的清兵作战，无法抽身，于是吴甡便不肯赴任，在京坐等。

崇祯帝十分希望吴甡能立即赴任，而吴甡也下定决心，手下无兵，决不督师。崇祯帝对此十分不满。不久，首辅周延儒自请督师，朝受命而夕启行；陕西总督孙传庭上疏主动请战，要统兵东出潼关。两位的做法让崇祯帝大感满意，相比之下，更加深了对吴甡的不满。就在此时，那位被吴甡奚落过的次辅陈演，不失时机，再次向皇帝提出，唐通肩负京师拱卫重任，不能轻调，同时也顺手把孙传庭的奋勇直前和吴甡的畏葸不前作了一些对比。忍耐已到了极限的崇祯帝，终于发作了。

当时，已与崇祯帝抗争了两个月的吴甡，也感到不能再抗，准备赴任。临行前一天，吴甡犒劳随从兵马，崇祯帝还令宦官赐银牌给赏。然而到了第二天，崇祯帝突然下诏，令吴甡速进宫入值。吴甡顿感不妙，连上两疏辞职。崇祯帝也就顺水推舟，不予挽留，准其致仕。吴甡自以为脱掉了枷锁，没想到后来还是被重惩。八月，崇祯帝以吴甡延误师期，导致武昌失守的罪名，令锦衣卫把吴甡逮捕入京，论罪遣戍云南金齿卫。

崇祯帝之所以肯准允吴甡致仕，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已决定重用孙传庭了。五月，他令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不久，又进孙传庭为兵部尚书，改任督师，总制应天、凤阳、河南、湖广、四川、贵州军务，仍兼督三边，赐尚方宝剑。他这次又把宝押到了孙传庭身上。

他一方面要孙传庭迅速出兵，一方面又做出了很多姿态。他再一次下了“罪己诏”，并宣布免河南五府三年田租，而事实上那时的河南早就不在朝廷控制之下了。他还下了赏格：“擒李自成者，赏万金，爵通侯；擒张献忠者，官极品，世袭锦衣卫指挥使。”此时的崇祯帝，似乎仍没有认清形势，反而像一个赌红了眼的赌徒，梦想再作最后一搏。

他当时的本钱就是孙传庭。因此，他一再严令孙传庭率兵出关，主动出击。

而在当时朝廷的文武官员中，对孙传庭是否出关是有分歧的。有少数官员抱着与崇祯帝一样的幻想，希望孙传庭出关作战，能与左良

玉部形成夹击之势。而左良玉部也在朝廷严令之下，于六月向西挺进。也有一些陕西籍官员希望孙传庭能早日出关，以减轻陕西的负担。不过，绝大部分官员却认为出关是冒险之举，一旦失败，不仅陕西不保，而且会危及全局，所以他们力主孙传庭呆在陕西不动，视形势变化再作决断。

兵部尚书冯元飙为阻止冒险，一面在皇帝面前力争不可轻战，一面专门写信给孙传庭，希望他不可轻举妄动，并要求他不要再用白广恩、高杰为将。兵部侍郎张凤翔也极力劝崇祯帝不能速战。他说，孙传庭手下的精兵良将，是皇帝最后的家当，不可轻动。中允刘理顺也写信给孙传庭，说此举系天下安危，不仅仅是河南、湖广的问题。出关之策就像药中的劫剂。

但崇祯帝却根本听不进去。他一再严令孙传庭出关。

孙传庭对出关作战能否取胜也没有把握。但在皇帝的严令下，他也只有一途可选。他说："我当然也知道出关作战未必能胜，不过仍希望能侥幸而有万一之功。大大夫岂能再对狱吏乎？"他确实是坐牢坐怕了。

此时的孙传庭，也有了点实力。自从十五年（1642）兵败柿园后，他便退回关中，屯田、缮器、积粟，广招兵马，恢复了不少元气。但他当时之所以敢于冒险出关，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收到了丘之陶的秘信。

丘之陶本是大官僚丘瑜之子，投顺李自成后，被任命兵部侍郎。李自成出襄阳后，他留在襄阳留守，便写信给孙传庭，约以内应。孙传庭大喜之余，自然多了一份信心。没想到他的信使已被李自成的手下中途截获，事情已泄，而他与丘之陶却仍蒙在鼓里。

八月初一日，孙传庭在西安关帝庙誓师。他命总兵马、秦翼明，随陕西巡抚冯师孔，取道商洛进驻南阳，作偏师之用。自己则率大军由灵宝入豫。高杰为中军，王定、官抚民领延绥、宁夏兵为后劲，白广恩则率火车营。为配合自己出关，孙传庭檄左良玉统兵西上，进行夹击，同时令河南总兵卜从善、陈永福在洛阳与自己会合。

孙传庭何曾料到，自己此次出关，却正是走向自己的末日。

关中失陷

李自成对孙传庭出关作战，早就作了准备。他先是派兵进入河南，预作准备，接着又亲率大军北上河南，寻机反击、歼灭孙传庭。

孙传庭于八月上旬进驻洛阳。当时有谋士劝孙传庭修缮洛阳城，储粮，屯田，以作进战退守之计。白广恩也请驻兵分据要害，步步为营，依次推进。可是孙传庭却怕贻误战机，不肯采用，而是急于决战，轻率冒进。

这正中了李自成的圈套！

李自成见孙传庭来势凶猛，便故意示弱，诱敌深入。当时他已从邓州移兵至襄城和郏县之间相待。

九月十二日，孙传庭部攻陷宝丰，并于十四日推进到郏县境内。李自成亲率万骑迎战，孙传庭部白广恩、高杰进击，其前锋杨绳祖、王龙等原是罗汝才部下，此时见到李自成，个个心怀仇恨，奋勇向杀，竟擒获了李自成部下、果毅将军谢君友，砍下了李自成的坐纛，攻陷了郏县。

同时，郧阳道高斗枢与惠登相合兵，在湖广配合孙传庭作战，在八月攻占光化，九月攻下谷城，进逼襄阳。游击折曾修，奔袭了李自成部在唐县的老营，掳其辎重，杀其妻子。

这些捷报不断传来，令孙传庭兴奋不已。他急报朝廷邀功，并口出狂言说，“贼闻臣名皆溃！臣誓清洗豫，不以一贼遗君父忧。”

崇祯帝得报后更是欣喜若狂。他拿着奏疏令大臣们传阅，连说贼灭亡在旦夕！他甚至还传谕吏、工、兵三部，速速配合孙传庭以取得最后胜利，并着手安排善后事宜。只有兵部尚书冯元飙看出了问题，深感大祸即将来临。他说，“贼兵故意以羸弱诱我，不可不忧。”这些

话着实让崇祯帝扫兴。

但冯元飙之担心，不幸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先是丘之陶被斩，内应顿失。丘之陶谎报军情，说左良玉已率兵攻打襄阳，试图令李自成从河南前线抽调兵力回去救援。未料李自成早已侦知其中奥秘，斩杀了丘之陶。

接着又是粮道被断。孙传庭部孤兵深入，后方供应难以维持。连下了六天的大雨，更是令运输艰难。兵卒们个个饥瘦不堪。李自成获内线密报后，一面令坚壁清野，一面令刘宗敏率轻骑间道飞驰至汝州白沙，抄绝孙传庭的粮道。

官兵军心大震，开始骚乱。

孙传庭急令陈永福率豫兵留守兵营，自己率陕西兵分路撤退，决心打通粮道。豫兵不服，也随之溃退。农民军则乘势猛攻，杀得官军人仰马翻。此役孙传庭部被杀四万余人，损失甲仗马骡数十万，最后孙传庭和高杰仅率数千人北渡黄河，绕道山西垣曲县而至潼关，与白广恩会合。

崇祯帝接到败报后，十分震怒，下令削去孙传庭督师、尚书之职，但仍令其以陕西总督的身份收拾余兵固守潼关。不久，又升白广恩为援剿总兵官，挂荡寇将军印，拨给兵员三万，与孙传庭一道守关，以阻李自成部进入陕西。但此时的孙传庭、白广恩，哪里还能守得住潼关呢？

十月初，李自成、刘宗敏统率主力，进攻潼关，同时遣偏师由河南邓县取道商洛地区，进攻陕西，约定在西安会合。

孙传庭当时令高杰、白广恩分驻关外，自己则坐镇关城。

十月初六日，李自成部发动进攻，高杰、白广恩先后溃退，潼关也随即失守。

孙传庭收兵渭南，企图固守。农民军乘势再攻，渭南城破。孙传庭及监军乔元柱被杀（一说两人是死在潼关的）。

李自成于十月初十日再下临潼，并于次日抵达西安城下。

西安是秦王封地。秦王朱存枢富甲天下，是有名的富藩。户部尚书倪元璐曾向崇祯帝建议，让秦王拿出财产来助饷，说与其今后让贼寇拿去，还不如趁早用于享军。崇祯帝没有答应。此时陕西巡抚冯师孔退守西安，城中已无兵可用，便留下了途经西安的五千四川兵守城。官员们劝秦王出点银子，置些棉衣犒军，一来可给士卒防寒，二来也可激励士气。未料秦王竟一口拒绝。

守城副将王根子十分不满，竟约农民军献城。十月十一日，王根子依约大开东门，农民军一拥而入，一举占领西安。巡抚冯师孔、按察使黄、知府简仁瑞、知县吴从义等被杀。

西安被占，不知崇祯帝是否有预感？据说在崇祯十一（1638）年正月，崇祯帝在平台召见群臣时，诏百官起大数问天下事，仙降云：

九九气运迁，泾水河边，渭水河边，投秦入楚闹幽燕。

兵过数番，抢夺公卿入长安。

军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相抛闪。

家家皇天，人人皇天，大水灌魏失秦川。

流寇数载即息，红顶又将发烟。

虎兔之间干戈乱，龙蛇之际是荒年。

此中，“大水灌魏”应指开封被灌，“失秦川”当是西安被占，“红顶”则指清兵。至此，前面的两事已经应验，而清兵入关也为时不远了。

崇祯帝这一赌可以说是输得精光。他寄予厚望的孙传庭就这样凄惨而去，也带走了他最后的几许希望。在开始时，崇祯帝坚决不信孙传庭已死，因为孙传庭的尸体始终没有找到。他下令不予赠荫、哀悼。当孙传庭战死的消息最终被证实后，崇祯帝不禁悲痛之极。

秦中二帅，曾是崇祯帝最倚重的大臣，而其结局却是如此不同。当初洪承畴明明已降清朝，崇祯帝却匆匆立祠、赠荫、追恤，弄得好不尴尬。而现在孙传庭确实战死，且尸骨无存，崇祯帝却坚信其未死，竟不许赠荫、哀悼。不过，他们俩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曾

是崇祯帝的救命稻草。

正当崇祯帝在痛惜孙传庭之死时，李自成在陕西却展开了强大的攻势。

李自成亲率后营李过部和左营刘芳亮部，向北追击高杰。高杰曾是李自成部属，当年拐走了李自成的妻子，降了朝廷，反过来与农民军作战。李自成岂能轻易放过他？！

高杰自知罪孽深重，一旦被抓获，肯定没有活路，于是先从潼关退回陕北。当李自成大兵追来时，他又乘黄河结冰而奔山西。后来李自成东征山西时，他又往南狂逃，一直逃到南京附近。到弘光朝时，他居然又成了史可法手下四大将领之一。他真是命大！

李自成于十一月到达延安。虽然他未能捉住高杰，报夺妻之仇，但在军事上却很是顺手，沿途州县纷纷投降，未花什么气力。当他从延安北上榆林时，他还顺路回到米脂，也算是衣锦还乡。一年多前，其祖坟被掘，李自成此次回来，自然要重修祖坟，致祭追悼，还杀了一个参与伐墓的乡绅，算是报了仇。可惜其祖父、父亲的遗骨已被焚烧扬弃，再也找不回来了。他还到处寻找自己的族人，赠金封爵。甚至还改换了家乡的名称，大概是免得今后称帝时再去改动。于是，延安府被改成天保府，米脂县为天保县，清涧县则为天波府。这一改，果然响亮多了！

李自成一路风光，没想到在榆林却遇到了麻烦。榆林是明朝“九边”之一，居民多隶军籍，以当兵为职业。在与农民军对阵的边将边兵中，就有很多来自榆林。双方打了十几年，仇怨也结深了。大概李自成也想到了这点，所以在劝降的同时，又令李过、刘芳亮率七余万大军作好准备，如果一旦劝降失败，就以武力解决。

榆林人自然不肯降。尽管总兵王定临阵脱逃，但榆林人仍在兵备副使都任、督饷员外郎王家禄，以及卸任里居的总兵尤世威等人的率领下，坚守城池，血战七昼夜，甚至连妇女、孩子也纷纷上城参战。城被攻陷后，满城无一人投降。这在明末是少见的。

其他各路兵马也很顺手。汉中、巩昌等府迅速被克。固原（陕西

镇所在地）、宁夏镇也相继投降。只有贺锦在收服甘肃、西宁时遇到麻烦。

贺锦于十一月率兵西征，不久便攻克兰州，杀肃王。然后又于十二月攻占甘州（今张掖），杀甘肃巡抚林日瑞、总兵马等。而另一支由鲁文彬率领的军队在进攻西宁时，被当地土司击败，鲁文彬也被杀。贺锦驰援西宁，却被伪降的土司带入伏击圈而被杀。其部众悲愤之下，猛攻西宁城，最后攻克西宁，为贺锦报了仇。不过这已是第二年正月的事了。

至此，李自成已是如日中天了。在长江之北，他已占半壁江山。而在军事上，他更是占有绝对优势。一统天下，似乎也是指日可待。

而大明朝的日子就相当难过了。在长江之北，李自成已成横扫天下之势，打得朝廷根本无力还手，甚至连招架之功都没有。在长江之南，张献忠已占据湖南，并准备向十分空虚的四川进发，四川肯定将成他囊中之物。而在山海关外，蒸蒸日上的清朝正虎视眈眈，伺机收拾残局。

大明朝气数将尽了。

既然旧朝将去，那么新朝就应先立。李自成准备建朝立国了。

京师告急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正式登基称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以秦王殿为宫，增旧殿为九间，以符帝制。同时大修长安城。

既然自己称了帝，自然就应光宗耀祖。于是，李自成追尊其曾祖以下均为皇帝，母吕氏为太后。规定其父、祖以及他自己的名讳，不得使用。他还册封高氏为皇后，陈氏为贵妃。

李自成当然也没忘记手下的那班弟兄。弟兄们跟他出生入死，还

不是为了今天的荣华富贵？于是，他大封功臣。权将军、制将军封侯，果毅将军、威武将军则封伯、子、男。刘宗敏、田见秀、谷英、李锦（李过）、刘芳亮、张鼐（李双喜）、袁宗第、刘国昌等被封侯。刘体纯、吴汝义、马世耀、李友、刘忠等被封伯。降将白广恩、陈永福、王良智（即献西安城的王根子）等也被封侯。其余被封子、男爵的则多达80人左右。

既然武官封了爵，那么文官也该一起荣升。李自成改动了官制，以安排众多文官。内阁被称为天祐殿，设大学士平章军国事。此职相当于丞相，自然非牛金星莫属。宋献策则被任命为军师。行政机构虽仍为“六部”，但长官却升了格，原先只有侍郎各一人，现在则增设尚书。中央其他机构的名称以及地方机构的名称，也都作了改动，以示与旧朝有别。李自成分授各级官员，颁发新印。为了招徕读书人，他还开科取士。另外，他特别关照顾君恩，特意赏了顾君恩一班女乐，以回报其入关之策。

李自成仍然坚持三年免征之政策，以收拢人心。不过，这么多兵马要粮要饷，也不是件容易事，不征钱粮，如何维持？李自成自有办法！他向豪绅污吏追赃。在渭南时，他就责令当地豪绅出饷银一百六十万两。进了西安城后，他又故伎重施。他大宴西安城中缙绅大户，并把秦王府中的金银器皿分给他们，然后对他们说，军中缺饷，你们都是官吏，不会没有银子，应该拿出来助军需。此时站在旁边的部下又恰到好处地故意露出兵器，吓得那些缙绅直发抖。于是李自成规定，当过九卿的出银五万，中丞三万，监司一万，知县之类的也要出五千。这种做法，后来又被李自成用在北京。

此时的李自成，在西安城中是十分风光。他每三日亲赴教场校射一次，身穿蓝布袍，张小黄盖，乘马而行。百姓只要一见他的黄龙纛，便一起伏在地上连喊万岁。

从后来的情况看，李自成在西安匆匆登基，似乎是弊多利少。当时他虽占尽优势，但半壁江山毕竟仍在崇祯帝手中，更何况还有他的劲敌张献忠，此时也是实力大增。更不用说山海关外的八旗兵了。另外，李自成自襄阳挥师河南，从九月大战孙传庭，十月破潼关、占西

安，到收三边，占关中，直至次年正月称帝，总共才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胜利来得实在太快了，快得令许多人都无法承受！如果此时能稍作调整，全军上下自满骄傲、追求享受的倾向或许会有所收敛，进京后的局面或许也不致失控。

好在李自成本人在此时还算清醒，还记得崇祯帝仍在北京，等着他去收拾。在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李自成预先派出李友、白鸠鹤两员大将，率先头部队进攻山西。十二月十八日，这支部队在禹门口渡过黄河，并传牌山西各州县，要求各地官吏认清形势，不作抵抗。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八日，李自成统率主力，由西安出发开始东征，直杀北京。权将军田见秀则留守西安。

大军渡过黄河后，便直扑平阳府（今临汾）。正月二十三日，李自成等便到了平阳城下。平阳知府张璘然投降，西河王及宗室三百余人被杀。

另一支部队即刘芳亮所率左营，渡河后即沿黄河北岸向东运动，连克河南怀庆府、卫辉府、彰德府，然后攻入京畿，克大名府、河间府、保定府，最后与李自成会师北京。

李自成、刘宗敏占领平阳后，随即北上，准备攻打太原。而太原几乎没有什么防守。太原这样的省会重镇，竟然到了无兵可守的地步，那么，在潼关失守后两个月中，崇祯帝及山西当局到底在于些什么呢？

这也实在怪不得崇祯帝。他实在是没有办法。

潼关失守后，崇祯帝任命兵部侍郎余应桂接任陕西总督。余应桂吓得脸如土色，不敢前往。最后他虽想再去陕西，但陕西已没有他的地方了。崇祯帝再令宣大总督、山西巡抚和陕西总督协剿，宣大总督、山西巡抚避之尚且不及，哪里还敢去剿？便都推说饷乏马缺，不肯应承。

此时的崇祯帝已无多少自信了。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当李自成正在西安兴高采烈登基时，北京城里却是阴风呼啸，起瓦震

屋，飞沙走石。凤阳地震的消息也于此时传进宫来。据说当时占了两卦。一卦称“风从乾起，主暴兵至，城破，臣民无福”。另一卦更糟，竟是“星入月中，国破君亡”。

此日早朝，钟鸣之后却不见人影。过了很久才见文武大臣赶来，个个畏畏缩缩。早朝结束后，崇祯帝留阁臣喝茶。阁臣们乘机向崇祯帝提出用内帑充饷。不料崇祯帝过了半天才说了一句“今日内帑有难以告先生者”，便潸然泪下。君臣议了半天，也没议出个所以然来。

初三日，崇祯帝召见左中允李明睿。李明睿提议崇祯帝亲征，实际是暗示崇祯帝南迁。崇祯帝急忙用手指天，制止道：“此事不能乱说。”李明睿要崇祯帝赶紧决断，而崇祯帝却说不行，并要李保密。

崇祯帝还下令撤掉余应桂，其陕西总督一职由陕西巡抚李化熙升任。但李化熙也不敢前往陕西。

不过有件事却着实让崇祯帝高兴了一番。大学士李建泰是山西曲沃人，有家财百万。他见崇祯帝如此忧心忡忡，便站出来说他愿意返回家乡，散财集兵抗敌。崇祯帝喜出望外，于正月二十六日告太庙，并亲至正阳门楼设宴为李建泰饯行，命其以大学士督师，赐尚方剑。

可是当李建泰在赴太原途中听说山西局势危急后，便放慢了速度。在涿州时，兵士已逃亡千余人。而至顺德府广宗县时，他因县中豪绅闭城不纳，竟下令攻城。二十九日，当他得知农民军已占领其家乡后，便再也不肯向前走一步了，而是退回了保定。

而此时的太原已是危急万分了。

二月初六日，李自成兵至太原城下。当时城中长官是革职巡抚蒋懋德。他率部勉强支撑了两天。至初八日凌晨，巡抚标营裨将打开新南门投降，太原被克。晋王被俘，蒋懋德自杀，布政使赵建极等多人被杀。

二月十六日，李自成再次率部进发，直逼北京。途中发布了著名的《永昌诏书》，大骂朝廷，并要崇祯帝度德审己，看清形势，及早投降。

二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在宁武遇到了总兵周遇吉的顽强抵抗。双方打得十分激烈。李自成虽最终攻下了宁武城，杀了周遇吉，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据说李自成当时已萌生退意，想班师返回关中。这种说法或许有些夸大，但也说明宁武之战的惨烈。

李自成东渡黄河后，真正的硬仗只有宁武之战。宁武之战后，李自成再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基本上是兵不血刃，势如破竹，直捣北京。

三月初一日，李自成抵达大同。大同总兵姜瓖投降，代王朱传全家被杀，大同巡抚卫景瑗自杀。

接着，阳和（今阳高）兵备道于重华投降，郊迎十里。

三月初六日，李自成抵达宣府（今宣化），早已约定投降的总兵王承胤开门投降，巡抚朱之冯自杀。

三月十五日，李自成抵达居庸关。守将唐通和监军太监杜之秩投降，京师的“北门锁钥”居然被李自成不废吹灰之力就占领了。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部队已抵达了北京城下。

三月十九日，北京被攻破。

日落紫禁城

败报接二连三地传来，真可谓兵败如山倒。

三月十五日，居庸关失守，京师门户大开。居庸关是京师北面的天险，素有“北门锁钥”之称，至此却因守将唐通及监军太监杜之秩的投降，竟未起丝毫作用。

三月十六日，昌平被攻破，“十二陵”被焚。京师之北已无险可守了。

昌平失守的消息传来时，崇祯帝正在依次召对考选诸臣，题目当

然是关于外虏内寇方面的。到了这种时候，崇祯帝居然还做如此无聊之举，不知是何用意？其实，他本人亦已方寸大乱。据说他一会儿凭几而听，一会儿东张西望，又是磨墨，又是倒茶，已经坐立不安了。就在此时，内官匆匆递进一封密件，崇祯帝拆开一看，大惊失色，并立即退入后宫。而那班大臣则被晾在那里，一个个不知所措。

崇祯帝拿到的密件，就是昌平失守的败报！昌平一失，崇祯帝深感大限已到，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恐慌了。

对这一天的到来，崇祯帝应该是有预感的。不过，当预感以如此之快的速度真的要变成现实时，崇祯帝仍是感到突然，甚至有点难以接受。因为他对时局的估计，一直就抱有幻想和侥幸。也正是这些幻想和侥幸，才使他落到了此时进退无路的地步。

当李自成的军队杀过黄河，势如破竹时，崇祯帝及其朝廷就在商讨应对之策。除前述李建泰奉命督师的闹剧外，当时还提出来两个对策：一是调辽东总兵吴三桂部进关守卫京畿，抵挡李自成；一是南迁，退守东南半壁江山。

早在正月十九日，崇祯帝就在召对群臣时提出调吴三桂入关之事。他主张抽调五千精兵随吴三桂入关，并认为关外余兵尚多，调走五千仍可支撑局面。不过，他没有直接下达调兵命令，而是要求大臣们商议后再决定是否实行。说到底，他是怕负责任。

崇祯帝把皮球踢给了大臣们，大臣们则又把皮球踢了回来。首辅陈演坚决反对调吴三桂入关，兵部尚书张缙彦也持此态度。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即担心吴三桂率精兵一撤，不仅宁远等地不保，就连山海关能否守住也成了问题。如此重大之事，哪里是大臣们能负得了责的，因此还得请皇帝圣裁。结果最后还是由崇祯帝自己决定放弃宁远，调吴三桂进关。

不过，陈演等人并没有立即去执行此策。他们一议再议，不断扯皮，千方百计地想推卸责任。直到二月二十一日，蓟辽总督王永吉、巡抚杨鹗、吏科给事中吴麟征，再次奏请放弃关外宁远等地，调吴三桂入关屯卫京师。崇祯帝对陈演等人的拖延也已十分不满，便将此疏

让陈演及大学士魏藻德阅读，两人不敢应对。即使是到了这时候，陈演等仍因怕负责任而不敢决策。他们先是请崇祯帝召见吴三桂之父吴襄，询问吴襄的意见。在得到吴襄肯定答复后，他们竟又请崇祯帝下令派人赴关外询问吴三桂的意见。这样一来一往，便到了月底。

直到三月初四，崇祯帝才下定决心，于是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挂平贼将军印援剿总兵左良玉为宁南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不久又补封山东总兵刘泽清为平东伯。

三月初六日，崇祯帝下令放弃宁远，命蓟辽总督王永吉、宁远总兵吴三桂入卫京师，同时檄调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勤王。结果是吴三桂根本没有来得及赶到北京，刘泽清则谎称有伤，在大掠临清后率兵南逃。而唐通虽及时赶到，却把居庸关拱手让给了李自成。

南迁之议，也早在正月初便由左中允李明睿悄悄向崇祯帝提出。崇祯帝也曾与李明睿秘密商议过此事。随着形势的急剧恶化，驸马巩永固、督师李建泰、左都御史李邦华等纷纷提出南迁之议。其中有人主张崇祯帝赴南京，太子留守北京，有人则主张太子先赴南京，崇祯帝本人则留守北京。依崇祯帝的意思，则倾向于自己赴南京，而把太子留在北京。同时为照顾面子，他希望大臣们能出面固请，并以亲征之类的名义出京南赴。但以陈演为首的内阁却不肯出面承担责任，更有不少大臣反对此举。到后来，崇祯帝看到不少大臣都倾向于太子南下监军，担心生出事端来，便下决心留在北京。他说：

“祖宗辛苦百战，定鼎此土，贼至而去，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

他对太子南下监军之主张更是不满。他斥责道：

“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且如此不济，孩子家又能做什么？”

崇祯帝最终未能下决心南迁，还有另外一原因，那就是对时局仍抱有幻想和侥幸。他先是寄希望于李建泰的督师，后又幻想吴三桂等部的入卫。他甚至认为即使李自成兵临城下，也未必就能攻破北京

城。

不过，事实证明他的这些想法是大错特错了。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部进抵北京城下，开始攻城。当时京城的防守，外则由襄城伯李国桢主持，内则由提督太监王承恩负责。

李国桢的“三大营”驻扎在城外。当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率部掩杀而来时，“三大营”基本上未作抵抗，便已瓦解、投降。其火炮等利器转而被用作攻城。

城外“三大营”瓦解后，守城的重任全由太监负责。当时登陴守御的兵卒仅五六万而已，外加数千小太监，根本难挡攻城之势。更严重的是，主持守城的宦官此时已起异心，准备献城。

据说在北京城破前夕，已降于李自成的原宣府监军太监杜勋射书城中，与守城太监曹化淳联系。有人甚至断定，杜勋曾进入城中，转达了李自成要求崇祯帝逊位的意见。

十八日下午，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仪门，向农民军投降，外城被占领。而城内竟不知此事！

也就在这一天，崇祯帝下了最后一次“罪己诏”，痴人说梦般地宣布只追究李自成一人之罪，其余的人都可获赦。

到了此日的晚上，崇祯帝得知外城已失的消息后，几近疯狂。他逼周后自杀，手刃袁妃、乐安公主、昭仁公主等，又令太子、永王、定王设法出逃。他还发了最后一道谕旨，令成国公朱纯臣总督内外诸军，并把太子托付给他。不过，这道谕旨被送到内阁时，内阁已无人在，不久便被农民军缴获。

崇祯帝最后是如何走上煤山的，死前到底做了什么，实际上已无法弄清。因为当时惟一在他身边的提督太监王承恩，也随他一起自杀了。

实际上，在崇祯帝的遗体被发现之前，包括农民军在内，都不知他是死是活。

三月十九日，农民军进占内城。此日中午，李自成在群臣的前护后拥下，由德胜门进城。至承天门下，李自成挽弓搭箭，射向写着“奉天承运”的门匾。可惜未能射个正着，而略有偏差。

当李自成一行进宫时，跪迎于门左的太子朱慈烺，伏地不起，李自成命人扶起。不久又搜得永王、定王。李自成安慰他们道：今日即同我子，不失富贵！并把他们送到刘宗敏处。

直至二十二日，农民军才于煤山发现了崇祯帝的遗体。其衣袖上写有两行墨书。一行称：“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另一行称：“百官俱赴东宫行在。”

李自成等这下才放下心来。

皇帝已死，太子被擒，京师被占，大明朝至此气数全尽！

不过，尽管大明朝已亡，而戏却并未落幕！李自成的大顺朝、福王的弘光朝等，还先后在北京、南京等地作了最后的表演，直到被入关的大清朝依次击溃、收拾。最终的结果是大清朝入主中原，一统江山！

从这“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短短一年中，或许更能领略到大明朝的悲哀。

尘埃落定，大明已成过去

李自成自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至四月三十日仓促溃退，共历时仅四十二天。

在初进城时，李自成最急于做的事就是找到崇祯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为此，他曾下令，凡能献崇祯帝者，赏黄金千两，而隐匿者则诛其全家。没想到两天后却发现崇祯帝早已自缢于煤山，而太子、永王、定王也于此前被擒获，于是李自成便放下了心。

李自成接下来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处理旧朝留下来的数千文武

大臣；一是着手准备登基大事。

当李自成攻入京城时，司礼掌印太监王德化率内员三百人迎至城门外，被令照旧掌印。其他监局掌印太监也都纷纷出降。因此，李自成进城时，最先出迎的倒是这帮太监！

若崇祯帝地下有知，不知有何感想？！

至于那一帮文武大臣们，开始时却不敢出头，个个潜藏，惟恐不深。他们这样做，倒不一定是出于忠义，而实在是担心祸患临头。李自成在陕西、山西拷掠缙绅的残酷，他们早有所闻。

忠臣当然是有的！在李自成攻破京师时，也有不少文武大臣殉国。这也算是大明养士三百年的一点善报吧。

殉国的勋戚有：宣城伯时春、惠安伯张庆臻、新乐侯刘文炳、彰城侯杨崇猷、新城侯王国兴、少保驸马巩永固等等。

殉国的大臣有：大学士范景文、尚书倪元璐、都御史李邦华、副都御史施邦曜、刑部侍郎孟兆祥、兵部侍郎王家彦、大理寺卿凌义渠、太常寺少卿吴麟征、右中允刘理顺、右谕德马世奇、户部给事中吴甘来、监察御史陈良谟、翰林院检讨汪伟等数十人。

这些勋戚大臣，大多是满门赴死，或上吊、或投井、或自焚，十分惨烈。

殉国的太监，除王承恩陪崇祯帝自缢外，尚有李凤翔、张国元、高明等等。

那么，除了上述的这些殉国者外，满朝勋贵文武数千人，在城破之后又都在干什么呢？

李自成进城之后，便下令勋戚文武各官，于二十一日投职名报到见朝，愿为官者量才擢用，不愿者听其回籍。如隐匿收容，则严惩不贷。

至二十一日，上朝者多人，赴长安门投职名者争先恐后，农民军聚其名帖而焚之。当时承天门不开，诸官都坐在露天等候。至中午时

分，太监王德化自内而出，身边跟着十几个随从。当他见到兵部尚书张缙彦时，便挖苦道："老先生尚在此啊！明朝事都是你与魏阁老（指魏藻德）坏掉的。"张缙彦争辩几句，王德化便命人掌嘴，把张缙彦气得直掉眼泪。

这位王德化，在数月之内，竟连侍三朝。先是任大明司礼监掌印太监，李自成进京后，便率先投降，仍被命做掌印太监。更令人吃惊的是，当李自成溃退、清兵占领北京后，王德化摇身一变，竟又降了大清，仍做他的掌印太监。

此日，文武百官自早上即赴长安门外等候，至日暮才被放出，饿了整整一天。他们一个个缩首低眉，呆若木偶，即使被兵卒百般侮虐，也不敢出声，受尽屈辱。也有刚烈之士，因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而自杀身亡的。如庶子掌坊周凤翔在此日回家后，便上吊自杀。但像周凤翔这样的毕竟只是少数，绝大部分文武官员都在等着发落，其中有些人甚至希望能被新朝所用。如大学士魏藻德，当时被关押在刘宗敏宅内的小房中。那位大学士，就对李自成很有些怨言，他扒着窗缝对外面的人说："如要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于此算是什么？"

但李自成等似乎并没有立即用这些降官。二十一日见朝，被任命的官员并不多，但也没有开杀戒，甚至还相当宽容。如那位负责城防的襄城伯李国桢，被执后不肯下跪，背面而立。李自成等怒问道："为何不跪？"

李国桢回答道："我明朝大臣，没有下跪的道理！"

李自成等便威吓道："不跪则把你凌迟处死！"

李国桢回嘴："随你的便！"

李自成等又威胁道："不跪将把你全家凌迟处死！"

回答仍是随你的便。但当李自成说到不跪将把全城百姓凌迟处死时，李国桢这才跪下，不过仍是反面而跪，而且口中仍说道：

"我是为全城百姓而跪，并不是向你而跪！"

即使如此，李自成也没有处死他，而是把他暂时关押。数天后，

他因被追银受刑，实在熬不住，才自杀身亡。

不过，也有人说这位襄城伯是在演戏。当时他年仅二十七岁。原本就是位大言无忌之人，当他总督守城时，虽拥重兵，却不曾有什么调度，而城破之后，竟能不死而被执，此时徒为大言以从贼听，希望能侥幸免死。平心而论，此时能在李自成面前敢如此说话，不管其动机如何，也确实是需要些胆量的。而其夫人也被农民军所掠，据说农民军把她的衣服剥尽，抱放马上，大呼此襄城伯夫人也！勋臣妇人被辱如此者，实在是少见。

最早被杀的勋戚，倒是成国公朱纯臣。其原因很简单，即崇祯帝临死前曾写下一纸朱谕，要成国公辅助东官（太子）。朱谕被农民军缴获后，因此事关系重大，李自成立即收捕了成国公，并于二十二日下令处死，以绝后患。后又复杀其弟等亲属。

二十三日，崇祯帝、王承恩的尸体被收殓。开始时用的是普通棺木，后改用朱漆棺殓崇祯帝，并与周后的棺木一起被移入佛寺。

同日，刘宗敏、牛金星在午门前选用了一批旧朝文武官员，约一百人。

二十五日，礼部命随驾各官率耆老上表劝进，开始即位典礼的准备工作。

当时不少文武大臣在谋求新朝官职，如戊辰科进士则以同科的身份走宋企郊的路子，而河南人则与牛金星、宋献策拉老乡关系，希望能为新朝所用。

二十六日，旧朝文武纷纷赴朝投递职名、劝进，希望能被录用。农民军除选用了一百余名四品以下官员外，把其余各官登记上册，并以一百人为一组，由骑兵八人押赴各营。

二十七日，派饷于在京各官，不论是否被新朝录用。被录用者派少，未被录用者派多。标准是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到三万，科道、吏部五到三万，翰林三到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至于勋戚之家，则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

在此以前，刘宗敏早已准备好了五千副夹棍。此类夹棍，十分厉害，夹人无不骨碎。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

襄城伯李国桢由刘宗敏追赃，才被夹了两下，便在回房后自杀。

崇祯帝的岳父嘉定伯周奎，自称无钱。十余日前崇祯帝要他捐饷时，他起初还不肯捐，后勉强捐出一万。此时在农民军的夹棍下，一下子就交出了五十万两银子及价值数十万的珍珠币物。其余的勋戚，也都被一一过堂，敲尽榨干，有的甚至丢掉了性命。

大学士陈演，在北京城破之前就被解职，原本有机会走脱，可惜因资产太多，短时内无法处理而滞留于京。此时他也被刘宗敏追赃。据说陈演还未等到用夹棍，就捐四万两白银，刘宗敏很高兴，本打算不再用刑。不料陈演的僮仆检举说其家财远远不止此数。刘宗敏令人搜查，果是如此，大怒之下仍用了重刑。

大学士魏藻德或许真不富裕。城破之前，崇祯帝令其捐饷时，他只肯出白银四百。此时被刘宗敏追赃，上了夹棍后才承认金银万余计。后虽经一夹再夹，直至脑裂而死，也未再榨出油水。他的儿子也不承认还有余银，结果被杀。

在刘宗敏等人的夹棍下，那帮旧朝大臣几乎没有幸免。

与此同时，农民军对那些太监也是照夹不误。原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之心，在重刑之下，交出白银十五万两及许多金银什器缎匹。不过当时都传说他有白银三十万两，因此农民军认为他仍有隐瞒，于是再夹，直到被夹死。也就是这位王之心，几十天前还以家计消乏为辞，不肯助饷，最后才勉强出了一万两。

太监曹化淳交出了白银五万两。

最后由太监交出的金银数，竟与勋戚们所交出的一样多，而比文武百官吐出的整整多出了一倍。

与此同时，农民军还把矛头直指富商大贾，效果居然也很不错。

李自成在短短十几天内，竟得了七千万两白银！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大批满腹经纶、满口仁义道德的既得利益者，在朝廷生死存亡之际，竟然不肯依其财力，支撑大局，到头来竟落得了如此的结局。他们似乎弄不清最简单的道理，即他们的特权地位及随之而来的财富，都是由这个朝廷及其制度所赋予的，一旦没有了这一前提，哪里还保得住特权、财富，甚至是自己起码的尊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李自成进城后他们的结局，应该是预先可以估计到的。

在这一点上，身居九尊之位的崇祯帝竟也是如此。

据说李自成入城之后，搜括各库存银竟多达三千多万两，金数千万两。而作为天下财赋之枢的户部，仅有外解银约四十万两、捐助银二十万两而已。两者相较，不啻天壤。尽管有人对各库存银数提出怀疑，认为不会有如此之多，但城破之时各库仍有巨额存银之事，则不容怀疑。而崇祯帝却藏之不出，口口声声说缺粮少饷，今日加派，明日搜括，真不知是何道理？这些银两不仅未被用于战事，挽救危局，反而最终落入了李自成之手。

崇祯帝当然是看不到这幕了。四月初三日，他与周后的遗体被匆匆塞入田贵妃之墓，草草安葬了。

当李自成在北京城中正忙着追赃、登基时，山海关却出了问题。由于吴三桂的降清，天下局势顿时大变！

强大的清兵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后，势如破竹，几成摧枯拉朽之势。李自成匆匆退回北京后，于四月二十九日草草登基。仪式刚结束，李自成便下令焚烧宫殿和各门城楼，全线撤退。

清兵获知后，一面追击农民军，一面进占北京。当时北京城中纷纷传言吴三桂已夺回太子，纷纷准备迎接。

五月初三日，聚集东郊的官员却突然发现蜂拥而来的并不是吴三桂部，而是满洲八骑。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部傲然占领了北京。

此年的九月，顺治皇帝由沈阳到达了北京，并于十月初一日举行了即位典礼。

在不到半年之间，北京由大明而易手大顺，最终却成了大清的京师。

大清的军队也在各地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西线，清兵猛击李自成部，迫使李自成向陕西节节败退，并于次年（顺治二年，1645）的正月占领了西安。

在占领西安后，多铎移师攻击江南，矛头直指在南京的福王弘光朝。至五月十五日，多铎兵不血刃，占领南京，收编了弘光朝的军队。不久，俘获福王。闰六月，占领杭州，潞王朱常淓降。

另一支清兵在阿济格的率领下，追击李自成部。在顺治二年（1645）的三至四月，清兵与李自成部先后在河南、湖北、江西境内连战八次，李自成部皆败。至五月初，李自成在湖北通山被杀。李自成部大伤元气。

至顺治三年（1646），东线的清军连败浙江的鲁王、福建的隆武、广东的绍武三个残明政权。而西线的清兵也成功地攻入四川，击杀了张献忠。

尽管西南还残存着一个永历朝，东南尚有一位国姓爷，此外还有李自成、张献忠的残部仍在坚持抵抗，但大局已是尘埃落定，明清鼎革之过程也已基本完成。

大明朝从此也就成为了历史。

附录

明朝皇帝简表

年号	庙号	名字	即位时间	即位年龄	在位时间（年）	去世年龄	世袭
洪武	太祖	朱元璋	洪武元年正月（1368.1）	41	31	71	朱世珍之子
建文	惠帝	朱允炆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1398.6）	22	4		朱元璋之孙
永乐	成祖	朱棣	建文四年六月（1402.7）	43	22	65	朱元璋之第四子
洪熙	仁宗	朱高炽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1424.9）	47	1	48	朱棣之长子
宣德	宣宗	朱瞻基	洪熙元年六月（1425.6）	28	10	38	朱高炽之长子
正统	英宗	朱祁镇	宣德十年正月（1435.2）	9	14		朱瞻基之长子
景泰	代宗	朱祁钰	正统十四年九月（1450.9）	22	8	30	朱瞻基之次子
天顺	英宗	朱祁镇	景泰八年正月复辟（1457.2）	31	8	38	
成化	宪宗	朱见深	天顺八年正月（1464.2）	18	23	41	朱祁镇之长子

年号	庙号	名字	即位时间	即位年龄	在位时间（年）	去世年龄	世袭
弘治	孝宗	朱祐樘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1487.9）	18	18	36	朱见深之第三子
正德	武宗	朱厚照	弘治十八年五月（1505.6）	15	16	31	朱祐樘之长子
嘉靖	世宗	朱厚熜	正德十六年四月（1521.5）	15	45	60	朱祐樘之侄
隆庆	穆宗	朱载垕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2）	30	6	36	朱厚熜之第三子
万历	神宗	朱翊钧	隆庆六年六月（1572.7）	10	48	58	朱载垕之第三子
泰昌	光宗	朱常洛	万历四十八年八月（1620.8）	39	1月	39	朱翊钧之长子
天启	熹宗	朱由校	泰昌元年九月（1620.10）	16	7	23	朱常洛之长子
崇祯	思宗	朱由检	天启七年八月（1627.10）	18	17	35	朱常洛之第五子

初版后记

199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佘江涛先生约我撰写本书，我没有多想便应承了下来。当时心存侥幸，总认为以自己的所学来应付这样一本书，大概不会有太大问题。没想到提笔一写，竟断断续续用了3年，拖到1998年1月才得以付梓，大大出乎意料。

依原来的设想，本书应是一本以史实为基础，以深入浅出的笔法来描绘大明帝国衰亡过程并揭示其原因的史学读物。换句话说，本书应是一本由专业工作者撰写的却又要让一般读者读得下去同时又要喜欢读下去的作品。到具体写作后，方知这对专业工作者而言，也并不是一件轻松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挑战。道理很简单：一是因为专业人员长期以来已形成了一套所谓专业化的写作风格——其最大的特点似乎就是让非专业的读者既读不懂同时也没有兴趣去读，而且这种文风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二是因为许多历史问题确有较高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要把它们讲析到一看就明白的程度，也有很大的难度。因此，我在撰写本书时，虽力图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但多年以来养成的“八股”文风仍在时时作祟，并也肯定会在本书中的不少具体内容上有所体现。正因为这点，我很担心本书的写作手法会受到这样的指责，即专业工作者认为已经走得太远，而读者却仍觉得放得不开。不过，我始终认为在今天这样的大氛围下，历史工作者在这方面作些尝试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迫切的。史学普及也应该是史学工作者的基本责任之一，如果做得好，不仅不会影响学术研究的水准，反而会赋予学术研究更大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史学而言，人人都会讲历史固然是悲剧，但如果人人或绝大部分人都不读历史，则又是另一种甚至是更大的悲剧。

晚明史不仅内容丰富、头绪众多，而且争论也很大，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的问题更多，因此也很难把握。在学术界，对如何评价晚明社会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而且至今仍未有定论。涉及具体问题时，则分歧更多，众说纷纭。因此，本书中的许多观点甚至一些史实，仅是一家之说，绝非定论，但由于本书体例所限，无法在撰写时列出那些不同观点。同时，本书的篇幅虽有洋洋三十万余言，但仍无法做到事无巨细、样样罗列而不遗丝毫，事实上至今也没有人能做到。因此，本书紧扣晚明史中的几个主题，侧重晚明史中的若干主线，力求全面详细地勾勒出晚明历史画卷中的主要内容。具体地说，就是围绕着晚明的两大忧患即外患和内乱来展开叙述。

历史之所以是历史，其首要条件是具有真实性。“是什么”和“为什么”是历史研究追求的永恒目标。要描述“是什么”并在此基础上解释“为什么”，则首先要依据真实的历史材料，而非其他。本书的史料来源，主要是《明史》、《崇祯长编》、《国榷》等正统史书，以及像《明纪北略》之类的笔记。另外，本书也参考了大量已有的明史研究成果，如李文治《晚明民变》、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袁良义《明末农民战争》、张德信和谭天星《崇祯皇帝大传》、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等等。限于篇幅和体例，本书无法在正文中一一详细注出，在此特作说明并致谢意。

夏维中

1997年11月于南京

王朝的终结
丛书

大唐帝国的衰亡

日落九世纪

赵益 著



大唐帝国

财相刘晏、谋士王叔文、实干型宰相李绛和李吉甫，为什么每一次励精图治的改革最后都指向更颓败的方向？
新帝废立由宦官拥定，甚至两位皇帝死于宦官之手，

官僚体系的症结出在哪里？

江苏人民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日落九世纪：大唐帝国的衰亡

作者：赵益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6月

ISBN:978721418468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总序
序幕 走九向世纪
“安史之乱”中走出的新帝
财相刘晏：唐朝的格林斯潘
两年之内两位宰相被杀
东方！藩镇又起风云！
四镇联合叛乱，危机爆发
泾师之变：梦想很坚挺，现实很骨感
罪己书：无奈的选择
矛盾的德宗：从雄心勃勃到得过且过
第一章 王叔文：乾坤一局棋
以棋待诏，攀上太子
成败系乎一线
一股新的力量走上政治的前台
实行新政
致命的弱点：缺乏资历
运筹帷幄，容不得丝毫疏忽
没有了“势”，胜负早已注定
王叔文，你的末日到了
第二章 元和：短暂的中兴
帝国遇上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国之将兴，群才迭出
天时、地利、人和不如政治清明
实干型宰相：李绛和李吉甫
现在轮到藩镇犯错误了
中兴和隐患
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
中兴之主竟死在家奴手中
幽州告急，又起风云
宦官与禁卫军
变化中的格局
有了派系，就有了斗争
政事权旁落
宦官反奴为主
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

文宗：不愿做傀儡的新天子
皇帝找错了人
第一次反击：还没开始就已失败
慌不择路，选择郑注和李仲言
第二次反击：计划临时起变
甘露之变：不成功则成仁
进入宦官时代
第五章 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派系之争
党争的前因后缘
道不同不相为谋
孰为君子，孰为小人？
会昌之政：李德裕一个人的时代
恩怨两泯：谁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
第六章 宣宗皇帝：最后的辉煌
十六宅中的三朝皇叔笑到了最后
政治就是不断地否定与再否定
给宣宗当宰相的秘诀
御下有术
被“长生药”结束的时代
第七章 崩溃
新帝的秘密
经济彻底被摧毁
黄巢起事
乱世出贼子
成就霸业的四个步骤
日落长安
初版后记

总序

关注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何在？西方史学家一直推崇公元前二世纪时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话：“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而考古学证明，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商代，中国人就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时的史官们不仅要记录发生了的事件，还要预测将要发生的事件。他们选择龟甲来刻写卜辞，因为龟具有长久的寿命，见证过历史的沧桑，所以能够暗示未来的吉凶。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也是文明延续性最强的民族国家，很大的原因在于这个民族强烈的历史意识，使他们一旦遇到重要的选择，便首先去翻阅史书。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某个王朝一旦出现衰亡的征兆，上天和民众马上会抛弃它，将它变成新兴王朝的历史收藏，以供取资。《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记载夏桀迷惑暴乱，太史令终古便出奔投商。而当商纣王迷惑暴乱之际，内史向挚也“载其图法，出亡之周”。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官似乎有着一种自觉的意识：让历史永远服务于未来。

什么是重大事件？古代史书中记录的重大事件大多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中最大的又莫过于改朝换代，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兴亡”。而中国人讨论“亡”似乎更有甚于“兴”。古代中国在战国秦汉之际发生过最为重大的转折。此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享国超过五六百年甚至达八百年的氏族王国，但这样的国家毕竟是联盟式的松散政体。而经过战国秦汉的历史实践过程完成、确立的郡县制国家，才是统一的领土国家和全民国家。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国家体制如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起算，至清帝逊位的1911年，延续了2132年。其间有过二十多个统一或分裂；汉族或少数民族的王朝，但都奉行了郡县制度，因此我们不妨将他们视作一个中华帝国的不同届次的

政府。只是这些政府的任期与更换方式与近现代国家不同而已。而他们开辟的国土、抟成的民族，创造的文化、锻造的性格大都被近现代的中国人继承了下来。

汉、唐、宋、明、清是中华帝国任期最长的五大王朝，这些国祚久长，创造过盛世的王朝，其衰亡更加具有历史意味。我们发现，尽管它们的灭亡各有原因，但有两个方面是相同的，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其一是这五个王朝的灭亡形式囊括了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两种形式：来自内部的分裂与来自外部的挑战。汉、唐亡于内；宋、明亡于外；清朝有些例外，其外部的挑战来自于新的时代与新的世界。当然，他们的灭亡都是内忧加外患，销磨积弊多年，才导致一个最终解决的方式。其二是这五个王朝由于制度的优越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就，没有一个王朝是毁于一旦的。他们的代替者或是受其抚育的臣民，或是受其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除了清朝，其他四个王朝的代替者无一不以他们的继任者自居，进行政治改革并修撰前任王朝的国史。就清朝而言，最后的革命是由于改良政治的失败而导致的。这一点，与夏、商、周、秦、汉之间的推翻暴政，解民于水火式的革命很不一样。因此，汉、唐、宋、明、清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是最为丰富的，而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也是最为深刻的。它们是历史遗产最丰富的王朝。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套讨论兴亡的丛书只是历史通俗读物而不是学术著作，是三个大学文史专业教师不务正业的少作和一位作家对历史的演绎，代表着他们的文字趣味与历史见识，这次再版作了少许的修订。他们的目的只是用现代散文话语营构一个历史阅读场景，其中只有情节、人物、议论而不是在阐述历史的规律和理论，叙述与议论各有不同的视角，对历史的看法和文风也不尽统一。但他们相信，在这个全球风云变幻、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会有更多的国人想要了解我们的过去，关注我们的未来。正如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所言：“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惟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如果这套文字通俗但又不是戏说的丛书能够感发人们对国史的兴趣，便满足了他们的心愿。

徐兴无

2016年5月于南京大学

序幕

走九向世纪

弱冠遭世难，二纪犹未平。
羁离官远郡，虎豹满西京。
上怀犬马恋，下有骨肉情。
归去在何处？流泪忽沾缨。

——韦应物

这是一个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

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的一天，日暮时分。初夏的夕阳在飞沙朦朦的深处摇摇欲坠，把最后一抹光彩撒向重重檐甍的长安城。从皇城中向东北遥望，远方高处红墙碧瓦的大明宫，仿佛就像是一位悄然独坐的巨人，披着满身的流光溢彩，在最后的辉煌中，无语沉思。

帝国的重要官员们都在皇城中忧心忡忡地等待着。三天前皇上就已经因病重不视朝政了，几天来没有好转的迹象，刚才不久甚至传来了皇上下诏令太子监国的消息，一切似乎都表明：天子大行的时刻即将到来。

夜幕渐渐降下。红烛轻烟中，无数心绪，袅袅升起。此时此刻，当今天子御临天下，业已十有七年。三十多年前的玄宗天宝年间，中原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件，历史上称其为“安史之乱”，这一场中央与叛乱势力的大决战持续了七年之久，实际上，它的余波和由此带来的纷争局面远不止七年。玄宗以后是肃宗，肃宗以后是代宗，肃、代之际国家的现实就是为这一场斗争所带来的恶果而疲于奔命。这是一段从噩梦中醒来却又无法摆脱恐惧梦魇的日子，也是一个令人忧伤与无可奈何的时代。回忆往事，历历如在昨日，又如何不教所有人感慨万端！

就在此时，大明宫紫宸内殿突然灯火大亮，一片哀号之声划破了夜空的寂静：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李豫停止了呼吸，时年五十八岁。慌乱之中，似乎只有太子不为所动，依旧静静地跪在父皇的榻前，表情异常肃穆而凝重，只见他深深地直视着前方，坚毅的目光仿佛穿透了一切障碍。

八天后，太子李适即位，成为唐帝国第十二位皇帝，后来的庙号称德宗。这一天是公元779年的6月18日，离八世纪结束九世纪开始尚有二十一年。

在古代中国，任何一种政治斗争，都是从一个皇帝开始，又从另一个皇帝结束的。只要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天子存在，这一周而复始的

循环就无始无终。

“安史之乱”中走出的新帝

新一代天子似乎并不是一位庸懦之主，但是他的有为之志是否能够实现，却还是一个绝大的未知数。

天子驾崩是国丧，古代传下来的礼法要求臣下服“斩衰”三年，这是古代五种丧服制中最长的一种，子服父丧，就必须遵照这一礼制，三年之内不应考、不做官、不婚娶。不过，这对于国家显然是不适合的，假如朝廷在那么久的时间里无所事事，天下还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礼法无非是治天下务须以孝为本的意思，因此为达到目的，从权变通就是无可非议的了。这种做法似乎是从仁孝的汉文帝开始的，他把三年的时间缩为短短的三十六日，大唐自高宗以来，都是遵照此制行事。先帝的遗诏更是效法列祖的宽仁厚爱，要求“天下吏人，三日释服”，也就是说，只须服丧三日。本来这并无可置否，但是在治丧期间却为此闹出了一场风波，起因来自一位性格刚急、为政苛细的大臣常衮。

常衮数年前就出任宰相，此刻正独当枢务。或许是出于对先帝的爱戴，或许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坚持大臣也要同嗣君一样服丧二十七天。为了证明言出由衷，他在守灵时动不动就放声大哭，弄得其他人十分尴尬。

这一天，常衮照例又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哭得趴在了地上，随从只好走上前去把他扶起。中书舍人崔祐甫对这种矫情实在是不能容忍，指着常衮对众人道：“臣哭君前，要人扶起，天下有如此的礼法吗？”

崔祐甫字贻孙，进士出身，初任寿安县尉，后历任起居舍人、司勋吏部员外郎、御史中丞等，一直做到中书舍人。其时中书省长官中书侍郎空缺，祐甫代理省事。祐甫性情刚直，对宰相常衮的很多做法

无所容受，引起常衮的不满，遂数度以宰相职权相干预。常衮为此特别奏令祐甫分管吏部选官事宜，而对祐甫每次报上的人选，又将其中大多数驳下，并借此斥责祐甫。有一次幽州节度使朱泚上表说，在他手下将领赵贵的家里，猫鼠同乳而不相为害，可见是一件大大的祥瑞。代宗诏示宦官颁示于朝，常衮率文武百官向天子庆贺，独有祐甫不以为然。宫侍问其缘故，他答道："这是失常之事，可哀而不可贺。"并为此向代宗上表陈述理由。祐甫在上表中还引申说：若照五行灾异理论来看，猫不食鼠恐怕是一个不祥之兆，皇上必须"申命宪司，察听贪吏，诫诸边境，无失儆巡"。结果得到了代宗很高的评价，自然就使常衮极度恼恨。

但此刻，常衮却没有料到中书舍人会发出如此严厉的指责，一时语塞，遂更加怀恨在心。

这天礼毕，朝中群臣讨论丧服期限。常衮的机会来了，他引经据典，振振有辞：

"汉文帝从权，也要三十六日；本朝玄宗、肃宗之丧期，始服二十七日。当时诸帝遗诏虽然也说三日释服，但在朝群臣实是二十七天除服。所以臣子应同皇帝一样守丧二十七日。"

祐甫不依不让："先帝遗诏'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并无朝臣庶人之分，更无内外有别之意。三天就是三天，除天子外皆应释服。"

常衮抓住遗诏中的"吏人"字眼："吏乃官员所自行任命者，与公卿百僚岂可等同！"

祐甫力辩道："《左传》中'委之三吏'就是指三公，难道历史上常称的'循吏'、'良吏'，也是胥徒之辈不成？"

常衮似乎一片忠诚："礼制无非人情。当今公卿大臣，无不备受皇恩，若与百姓同制，于礼何安？"

祐甫也拿出杀手锏："如此则置先帝遗诏于何地？遗诏可改，孰不可改？"

两人相互力争，辞色凌厉，吵得不可开交。常衮尤其不能忍受中

书舍人这种强硬的态度，会议结束后立即上表皇上，认为崔祐甫率情变礼，轻改国典，有悖于臣子之道，请求给予贬职潮州刺史的处分。

礼仪是不可偏废的，否则就失去了立国的基础。能否极尽礼事，也是衡量嗣君可否担当国家重任，成为新一代天子的重要标准。连德宗这时都不得不表示出极大的悲哀，一举一动不敢越轨，甚至因为哀痛而食不下咽，只好以一种叫作马齿草做成的汤下饭。德宗接到常衮无疑是过分渲染的奏章时很生气：崔祐甫生为人臣，岂可如此轻论礼制！不过，皇上虽然认为常衮的忠诚可嘉，但也觉得为国家大计着想，援用先朝从权的旧例还是必须的，因而贬祐甫为潮州刺史的处分有点过重了，于是传旨将祐甫贬为河南少尹。

九天后，诏书正式下达。祐甫为人正直，向有口碑，许多朝臣对常衮的做法也多少有些反感，因而新帝即位伊始的第一件事情就在朝廷上下引起了不少物议。礼法在理论上既是一种不可轻改的制度，便往往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微妙的工具，谁能善于利用，谁就能取得想当然的胜利。

这件小事到此并没有完。早先代宗弥留之际，曾命功高勋著的郭子仪兼理冢宰。郭子仪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宝应元年（762）进封为汾阳郡王，官爵显赫。但朝廷不愿子仪久掌兵权，所以授职后或不令到任，或事定即召还朝，使之常处于闲散地位，这也是古今对付功臣的常法。代宗大历年间，吐蕃仍年年入侵，子仪以副元帅久驻河中、邠州，承担防备任务。此际既受命为顾命大臣，新帝便召子仪还朝，充当山陵使，负责先帝的安葬事宜，并赐号“尚父”，进位太傅、中书令，这也都是很高的优宠。类似表面上享受丰厚待遇而实际上被分权架空的军事重臣在当时还有朱泚和崔宁等人。同时，子仪和另一重要的大将朱泚亦以军功挂宰相衔，但皆不预朝政，唯常衮在政事堂处事，需要奏事时代二人署名。本朝建国至今，一直是三省（中书、门下、尚书）长官共同署理政事向皇帝负责，政事堂会议是最高的行政机构。罢贬崔祐甫的奏章署的是三人的名，结果崔祐甫遭贬后，郭、朱二人上表声言祐甫不应获罪，新帝德宗非常惊讶。

于是皇上不顾正在居丧的当口，立即召见二人：“卿等早先说其

有罪，现在又言其无罪，这是何故？”

二人都回答：“当初常衮奏报，臣等并不知道。”言下之意很明显，常衮在这件事上不仅独断专行，且有欺君之嫌。果然，德宗一听，龙颜大怒。新君践祚，恐怕最忌讳的就是臣下的欺罔，常衮竟敢如此欺骗寡人，实在是不可容忍。皇上在万分惊骇中立即下令，贬常衮到千里之外的潮州。当时百官都按序排列在月华门守灵，常衮在众目睽睽中狼狈而出。

这种贬职有一个含蓄的称呼叫“左迁”，天子的诏书往往称之“谪佐遐藩”，在本朝，这是一种最严重的处分。左贬常衮的同时调回了崔祐甫，那时祐甫刚刚离京不久，才走到昭应县，闻诏而返，受命出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大唐制度，非三省长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衔即为宰相。这是倏忽之间发生的事，宰相是国之重臣，挥之即去，招之即来，其突变程度，又使朝野震悚不已。

对被贬出京的变故，祐甫倒是有着思想准备，只是皇上此番以相位托付，却让祐甫在一路上想了很多。昭应就是现在的临潼，离京城不过一天的路，盛夏时节的驿道两侧，山野葱茏，和风吹过道旁的青槐，常常弥漫起一股浓郁的清香。祐甫带马徐徐而行，他并没有考虑原则性的问题，因为像他这样一个并不随事俯仰以取媚君上的人，即使蒙受深恩，入朝为相，也不会因为皇帝而轻易放弃为人处世的初衷。祐甫应当还是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如果处事不当，个人的进退自然是不足为意，但国家的前途就或许会受到严重影响。

祐甫心里很明白，未来的岁月，将无疑是一个多事之秋。

德宗尚未除服，因为丧制最后还是按照常衮的建议实行。尽管常衮排挤祐甫的所作所为多少有点影响新帝的情绪，但这个小插曲很快就过去了，皇上正急切地盼望着祐甫的到来，他需要尽快地进入天子的角色，大大地施展一番。

祐甫一到京，德宗立即在谅荫中召见，询以当前急务。

祐甫对前朝的政治弊端深有体察，对常衮严厉苛细的作风也很不满，所以他认为新帝君临天下，首先必须革除旧弊，开创新风，使喁

喁之情望治。

德宗盼望的正是这句话。新君盛年即位，精力充沛，天子的优荣与无上权力正使他满怀着大干一场的雄心壮志，现在宰相的期望正和他的决心一致，德宗精神大振，示意祐甫说下去。

祐甫道："要想励精图治，更新气象，首先要选拔天下俊才，亦只有如此，国家才能兴旺。所以臣以为当今大计，就是要广开才路。"显然，在祐甫看来，常衮为相时力图矫正前朝以货贿官的弊病，而采取一味杜绝的做法，非登科第者不得进用，使得贤愚同滞，实乃因小失大、得不偿失之举。

德宗颔首，表示同意，紧接着又问道：

"朕近来罢梨园使及出宫廷乐工三百余人，免除四方贡献，又下诏不得妄奏祥瑞、请度僧尼诸举，天下反应如何？"

"民心大悦，"祐甫肯定地说，"朝野内外，皆有耳目一新之感。尤其免除四方贡献一事，臣在入京途中，听过往行人说，甚至河北强藩的士兵都感叹明主出世，纷纷投戈于地，不敢再生反意。"

德宗龙颜大喜，一腔豪情油然而生。

玄宗皇帝以来灾难连绵的现实是有目共睹的，罪魁祸首当然是越来越坐大的藩镇。肃、代两朝以来，各地节度使都拥兵自重，不受朝廷节制，尤其在东方形成了几个强劲的藩镇，互相连衡盘结以自固，给中央集权以极大的威胁。唐代藩镇也称"道"，道的长官为观察使，雄藩重镇又兼节度使，一般的则兼都团练使或防御使以掌军事。道在名义上是监察区，但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行政实体。

河北道的三镇首当其冲。其一是魏博镇，节度使为安禄山的降将田承嗣，代宗末年由其子田悦继任；二是成德镇，最初是奚人李宝臣，此人原名张忠志，曾被安禄山收为义子，投降朝廷较早，朝廷任命为成德节度使，并赐名李宝臣；三是幽州镇，首脑李怀仙原是被契丹役使的胡人，后来加入安禄山叛军，史朝义死后，朝廷任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代宗时的公元768年，其部将朱希彩及朱滔、朱泚兄弟杀李怀仙，后朱氏兄弟又杀朱希彩，先后任节度使。比较起来，最北

的幽州镇似乎对朝廷尚还忠诚，至少还未见什么谋反的迹象。

除此三镇之外，在齐鲁地区还有一个淄青镇，自先朝至今更是一个潜在的对抗朝廷的重要力量。节度使侯希逸原为军士拥立，后被表弟李正己所逐。李正己原名怀玉，是高丽人，正是他前几日派使者入朝觐见德宗，奏言说是出于对圣上的景仰，愿意献钱三十万缗。可见从藩镇士兵到节度大将，都开始为德政所感化了。想到这里，皇上更是由衷地高兴，不过，对李正己过分的殷勤，德宗却是有点怀疑。

绝不可接受这三十万——祐甫的态度斩钉截铁。

德宗大感意外，要他说明理由。

“李正己虎狼之心路人皆知，此举无非是投石问路，试试皇上的态度。”

在德宗看来，祐甫的话当然不无道理。皇上之所以犹豫，也是怕日后被其利用。不过——德宗显然是有些担心，他不可能不有所顾忌的是——“若予拒绝，岂不是会滋生事端？”

“不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祐甫显示出其对形势的独到体察，“派遣使节去淄青慰劳，用李正己所献的三十万缗颁赐将士，一方面普泽圣恩，另一方面也让天下知道朝廷并不看重钱财。”

德宗听到这里，禁不住拍案称绝，下令照计办理。

这无疑是一次出色的策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也引起了严重的后果。不过，德宗和祐甫都无暇顾及了，祐甫正忙着进行大规模的荐延推举，每日都要任命数十人。而皇上更是在考虑一个重大的决策，这是由几天前发生的一件未遂政变引起的。

肇事者是兵部侍郎黎幹。黎幹与一位宦官刘忠翼很亲近，在某种程度上结成了死党，两人在行为上都有点狡险谀佞、恃宠贪纵的味道，引起了众人的愤恨。德宗即位不久，长安城中纷纷传言二人要起事，原因是他们皆参与了劝先帝代宗改立独孤贵妃为皇后，而立其子韩王李迥为太子的密谋，由此可见这二人对当时的太子、现在的新帝早就心怀不满。

在德宗入继大统的态势面前，黎幹也知道逃不过去，但要想有所作为，黎幹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他所担任的兵部副长官——兵部侍郎虽然掌握兵部的实权，但兵部本身却并没有军权。不过，刘忠翼可是皇上身边的人，无疑在这种事情上有着极大的方便。一天晚上，有人看见黎幹悄悄地乘车溜进了忠翼的府第，夜深方回。

德宗接到报告后立即采取行动，一查罪名果然成立，于是两人皆被流贬。皇上这下子想到禁卫军的重要性了，安史之乱后，禁军甚至已成为唐室中央军队的主力，先后成立十军，即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神威，号北衙十军。所谓“北衙军”就是皇帝的近军，而其中尤以神策军最强，在朝廷政治中是举足轻重的力量。回忆起肃宗、代宗时期的大宦官如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先后典掌，均生骄横的故事，德宗真是不寒而栗。目前神策军也由宦官王驾鹤掌领，权倾中外，假如一旦图谋不轨，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德宗在大明宫中苦苦思索了一天。中央必须直接掌握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对付日益骄横的地方藩镇和突发事变，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一支强大的武装处在天子脚下，若任用不得其人，结果就可能更糟。

时间已经到了傍晚时分，德宗望着小太监默默地点燃蜡烛的身影，忽然心光一亮，他想到了数日前曾召见密语的司农卿白秀珪。

这天深夜，白秀珪秘密地进入宫中，与皇上长谈了一夜。最后，德宗赐白秀珪御名“志贞”，作为对他誓愿效忠、受命不让的恩赏。毫无疑问，他的身上寄托着天子的厚望。

事情似乎已经定下，但新帝还是疑虑重重，他清楚地知道这件事非同寻常，每个细节都必须小心谨慎。于是，德宗第二天又在延英殿单独召见了宰相崔祐甫，定下了最后的行动计划。

六月二十六日，神策都知兵马使、右领军大将军王驾鹤接到通知：宰相崔祐甫召见。祐甫当时是首席宰相，有权处理政府百官的日常事务，驾鹤不敢怠慢，立即赶到了设在大明宫月华门外中书省中的政事堂。

双方一见面，少不了一番寒暄客套。驾鹤一心以为有什么急事，落座后，便等着祐甫发话，但祐甫却不紧不慢地谈起一些琐事，有时还请驾鹤发表看法。崔祐甫一向不苟言笑，驾鹤对他也一直颇为敬畏，此刻更是小心应付。不知不觉中时间过去好久，可宰相还没有结束的意思，驾鹤不知祐甫葫芦中卖的什么药，心中狐疑，但又不便开口询问。

就在这时，被御赐新名的白志贞已在数名中官的陪同下，急赴神策军军营走马上任，取代了驾鹤的职位。等到驾鹤回来时被告知，他此刻的职衔已经不是在任十数年的神策首领，而变成了皇家园林的总管——东都园苑使——一个名副其实的闲职了。就常理来说，在和平的局势下，这一带有诡秘色彩的做法多少有失天子的风范，皇帝的疑心病从开始就显得有些过分，不过，这一果断的举动大大地鼓舞了朝臣们的信心，更使得朝廷上下耳目一新，大家似乎都有这样一种感觉：新时代即将开始了。

这段时间中，朝臣们也常常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前一年的十、十一月之间朝廷对安史余孽最后会战的情景来，当时封雍王的德宗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会同各军攻打史朝义的最后据点东都洛阳，一举平定两河，成绩是何等显著！眼下新君即位，更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虽然这些还不能算作是新一代天子的不凡之处，不过至少可以说明当今皇上倒也并非是庸懦之辈。国中士庶大受鼓舞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高兴得太早了。

其中自有原因。

财相刘晏：唐朝的格林斯潘

国用窘迫。新帝为了自己的目标，必然属意财政。理财专家刘晏，为帝国困乏的财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长安五月的早晨还是颇有寒意。五鼓时分，吏部尚书刘晏正骑马

奔向城东北的大明宫。

这一天照例是举行常朝的日子。本朝朝参制度规定，单日御朝，双日休朝，称为正御朝参，又称常朝，皇帝要在宣政殿或含元殿朝见群臣。

刘晏是个不拘小节的人，尽管他在七岁时就有“神童”的美誉，小小年纪即被授为秘书省正字，算得上是少年得志了，但更多时候他还是习惯于把敏锐的才智表现在行动而不是口才上。刘晏的突出成就是在理财方面，十几年来，仕途虽然两起两落，但他仍然不改初衷，兢兢业业地为国家的经济奔走效劳。上到天子，下至士庶，对此都有目共睹。

吏部尚书也是个有名的慢性子，在旁人看来，有时还甚至迂腐得难以理解。仆从们对此是太有体会了，早上起来，时间已经不早了，可尚书还在不紧不慢地裹头。手下人看不下去，教给他正确方法，可尚书不为所动，继续慢腾腾地操作。这不，眼见五鼓已过，早朝将近，现在只好加紧赶路了。但刘晏忽然勒住了马头：“且慢！”

随从们朝着他的眼色望去，这里正好是东市的边缘地带，路旁有人在卖蒸胡饼。炊烟袅袅，热气腾腾。

“去买几只来！”吏部尚书饶有兴趣。

“眼下是去上朝——”

“无妨，”刘晏摆摆宽大的衣袖，“喏，袖中自有天地。”

等刘晏用袖子包着好多蒸胡饼赶到建福门时，朝中的文武大臣们已经在那里鱼贯排列，等候皇上临朝了。此际正是德宗一举剪除黎幹、刘忠翼逆党，又以士人白志贞代王驾鹤主掌神策军等举措施行不久，举国震撼，而朝臣更是议论纷纷，但刘晏对此则似罔若无闻，从袖中掏出蒸胡饼，自顾大啖起来。同列侧目一看，不禁好笑：“尚书真是雅兴，含元殿下，入阁之前，大啖胡饼！但不知其味如何？”

刘晏不知话里调侃之意，忙不迭地道：“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就在这时，皇上驾到，众臣立即按班就列。刘晏也赶紧停止了口

福之享，站到了队列中。他无论如何想不到，就在这时，他的命运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德宗这一天宣布：鉴于掌领天下财赋之一的重臣韩滉过于掊克，调任太常卿，而由刘晏一人独领度支、盐铁、转运、青苗诸使，全面主持财政。

尽管乐观情绪遍布朝中，但人人心里也都很清楚，如今的岁月实际上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当新帝德宗踌躇满志地踏上皇帝的宝座时，国家所面临的却无疑是一个近于灾难性的局面：帝国的河北、山东已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势态，剑南、山南、河南、淮南、岭南数道甚至京畿地内，拥兵大将时时兵变；边疆在吐蕃、回纥的进逼下丧失了河西走廊以及整个西、北部地区，只有少量孤镇在苦苦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国用日竭，南方数道半壁江山的收入维持着朝廷的财政；朝中派系的斗争，也渐有抬头的趋势。可谓是内外交困，形势严峻。

在所有的危机中，帝国的财政是最糟糕的。

当年的先帝代宗就无可奈何。大历四年、九年先后两次下诏，大意都是说：连年的战争兵革之后，天下凋瘠，军国空耗，因而要减轻供费，率行节俭，务劝农桑。但效果却不甚理想，原因亦不外乎战事方殷，国家的消耗实在太大。

幸好肃、代之际，帝国出现了一位天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所作的努力和创下的优良范例拯救了大唐的生命。这个人就是刘晏。

时间必须追溯到十几年前。

肃宗时因为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事剧烈，兵革之际，中外艰食，财政极度困难，因而先后起用第五琦、元载、刘晏、韩滉等人掌理调整财政。四人在理财上的方法各有不同，而成绩亦参差不等，比较起来，刘晏最著，元载最差。

第五琦是最早着眼于南方的人，早在玄宗时就曾建议大力调用江南财赋以应军需，并且身体力行，创办甚多。他又创立榷盐法，即由政府专卖盐业，居相时还严格实行除租调外不得对百姓横征赋税的政策，有很隆的声誉，在许多方面对刘晏有所启发。但第五氏于乾元二

年（公元759年）实行的币制改革却导致了失败，身遭贬斥。后虽被起用，但创意不多。

继之而起的是元载，此人是决定刘晏命运的人物。就理财而言，元载实在是不足称道，他所采取的做法近似于不负责任。在任职江淮转运使这一重要职务期间，负责征括违负拖欠及逋逃民户的应纳租调，所作所为几乎就是明抢。不过，这倒并非是因为他低能，而是因为他的着眼点本不在此。元载出身寒微，因为熟悉道家之学而被擢升，他后来的经历证明他的特长原在于政治上的长袖善舞。在有野心的元载看来，兼任与钱谷打交道的官职杂务繁重，既不利于他的清誉，又影响在仕途上的进一步钻营，显然得不偿失。于是乎不久便推荐平时相处颇好的刘晏代己出任财政职务，刘晏从此正式走进了帝国政治的前台。这时是代宗即位之初的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六月。大历六年，韩滉出任户部侍郎并判度支使，与刘晏分掌天下财赋，刘晏掌江南、山南、江淮、岭南，韩滉掌关内、河东、剑南。韩滉虽然清勤检辖，不容奸佞，但苛克颇甚，人多咨怨。实际上，大历五年以后，恰逢外戎罕侵，又加上连年丰稔，所以国家府库稍实，也并非是韩滉个人的功劳。

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刘晏以吏部尚书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此后职衔虽有所变化，但判领财政的实职并无改变。其中，转运使的任务是负责粮食、财赋的转运，刘晏于此着力尤多。

刘晏一上任，就立即开始实地考察漕运。

马上的奔波足以令人心神劳倦，然而刘晏却似乎总是精神奕奕。这一天终于接近了汴水岸边的一所漕站，一行数人望着远处的汴水，都带住了马辔。那些扈从们更是吁出一口长气，心想这下可以轻松一下了。但回头一看，只见转运使却拿着马鞭拈掐着什么，手下人知道，这是他的老习惯了，以前在京时，每次入朝，这位大人总是一边算账，一边策马赶路。不过现在正在野外，并无财务大事等待处理。

在侍从们看来，眼前但见一派河水而已，难道还有什么可以估算的？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见识短浅者根本不会知道，一位仰观俯察而不懈于感悟的有道者，常常能在天地垂象中得到发人深省的启示。刘晏的理财之能，并非与生俱来，而正是不断学习思考的结果。眼前，滔滔奔涌，宛如白练一般的流水，在刘晏的眼里，既是泉货如流的写照，又何尝不是一种通天下百货之利的鞭策？

汴水一线担负着漕船由江南入河的中继作用，地位特殊。目前的情况是军旅未宁，国用空竭，江南谷麦维系着朝廷的安危。漕船每船载一千石，取淮泗入汴，再由汴至河，沿黄河入渭水，转相受给，达于京师，这条绵长的漕线一路风波险恶，而由此以北的汴水至黄河一段，水急浪高，则是最危险的路程。典运将吏，只要走上几趟，无不须发皆白。

刘晏在这里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定要造新船！”

在刘晏的坚持下，扬子县附近的十个船场在一两年内就建成了。刘晏制定的造价预算更是惊人：每条一百万钱！

大多数官员非常惊诧。一百万钱就是一千缗，按照实际情况，每条漕船有五十万就足够了，况且目前国用正乏，诸般费用都宜精打细算，如何能这样大手大脚？有人直接到刘晏面前表示反对：

“大人每艘给钱千缗，而所用实不及半，如此岂不虚耗太多！”

“不然。”刘晏对来人道，“凡所创制，必须作长久之虑。现在造船是国家的急务，起步阶段参与者甚多，首先要使他们个人收益丰厚，才能使官家的船只质量得到保证。我现在拨一千缗，今后必有偷工减料中饱私囊者，即使减去一半，犹还能保证进行。这就是‘论大计者，固不可计小费’的道理。”

这下轮到来人大为叹服了。

在负责理财的头五年里，他几乎走遍了整个南北漕运线。公元777年，刘晏在回京途中又在陕东进行了考察。这里是南方粮赋运往关中的最后阶段，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现实情况却十分令人忧虑，刘晏给宰相元载写了一封信，着重汇报了当地漕运败坏的状况，

再次强调了重视从南方漕运粮赋的迫切性。

在理财上，刘晏做任何事情都经过全盘考虑。通过五年的实践，他对漕运的种种运作以及各项利弊已经非常清楚。事实证明，刘晏理财的突出成绩正是改善了南北漕运，创制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程和具体的运作方法。同时，完善了盐业专卖，使盐利收入在代宗末期达到了国家总收入的一半。

经济与政治一样，优秀的理论并不能成为优良成效的保证，刘晏的实干经验来自于他的实践，他在具体操作中的种种办法无一不显示出专业化的特征。还有两个例子值得一提：

一是巧妙地利用了知识分子看重声名而专业人士着重眼前利益的普遍特征。刘晏认为，士人的声名和清誉是其前程的基础，一旦陷入赃贿贪污的罪名，则身家性命一起抛失。所以士人大都认为不如弃利重名，以期达到最终显贵的目标。普通的吏人则不同，本朝制度，吏者不可应举，因而即使再廉洁奉公，也不得大用，所以此辈往往铤而走险。基于这种认识，刘晏便任命士子出纳钱谷而以吏员专事文书符牒，使前者得示廉勤而使后者无所用计。

二是对权贵或亲友的嘱托，无论是官位还是俸薪的要求都一概答应，但只是令其徒领干薪，不允许这些人到位视事。

刘晏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方法，明显不符合政治和道德上的要求。在中国，言利始终是与道德信念的要求相悖的，刘晏的某些做法注定了不会长久。就造船一事言，几十年后的咸通年间，有司果然计价给资，无复羡余，结果造出的船只脆弱易坏，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漕运的衰废。

德宗即位了，他正要干一番大事，所以深知财政的重要，否则也就不会如此重用刘晏。刘晏当然也很清楚，国家的急务就是保证财力以应付越来越严峻的现实。他也知道绝不可以停止在原来的成绩上，必须还要更进一步。在独当大局后，刘晏便把目光投向了税制改革。

当时的税制由于现实状况的变化显得弊端百出，理财官员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刘晏早就开始了税制改革的种种实践，如对户、地税

的改订，准备着为彻底改革税制打下基础。然而，难以预料的命运改变了他的一切。

专家往往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有专业上的技术和为此献身的精神，却缺少政治上的眼光。刘晏的政治经验很不足，技术上的精明也不能弥补此道的匮乏，他的第一个错误是贸然参与了对元载的审判，要知道元载与他的私交并不坏，且又是他的提荐者，以刘晏的这种身份作大义灭亲之举在习惯于拉帮结派的人看来却无异于落井下石。他犯的第二个严重错误是对元载死党特别是杨炎没有一举消灭，过于心慈手软的结果是反遭其害。刘晏还不善于正确地洞察政治形势，更可悲的是，甚至到了大祸临头之际也未能省悟。

两年之内两位宰相被杀

两年之间，德宗杀了两位宰相。新帝初政的相对平静，终于烟消云散。

元载的覆败是代宗末年的事。

说来有趣，元载、刘晏和另一位有名的人物李泌都好道术，但由此而形成的人生旨趣却大相径庭。刘晏取其俭朴寡欲，李泌得其无为而为，而元载却把道家的及时行乐、得意狂放奉为座右铭。

元载有大功可恃，是他帮助代宗皇帝诛灭了骄横的宦官鱼朝恩。不过，他也过分地居功自傲了，在代宗后期，元载的狂妄僭越达到了极点。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三月二十八日，任左金吾大将军的国舅吴凑受命包围了宰相办公地政事堂，拘留了元载和另一元党首领王缙。代宗并命刘晏负责审讯。面对这一棘手的事情，刘晏受命时也是很犹豫的，但他对国家的忠诚使得他无法推托。为了显示公正，刘晏还特别建议皇帝委任其他官员共同参与此案的审理。

元载被带到设在中书后堂的合审处，一见到刘晏就说：

“你也来审我？”

道不同不相为谋，刘晏一句话也没说。

其实刘晏并没有荣幸为元载定罪，原因是审理元案并没有因元氏不得人心而显得更加公正，一切都按政治上的需要进行。消灭元党既是上下一致的要求，那么过程就不是主要的了，关键是结果是否符合预期的目标。审讯推问都是由皇帝的近侍们完成的，也只有他们知道皇上需要些什么，不需要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元载、王缙自然是供认不讳，俯首称罪，最后元载与另一首恶宦官董秀被处以极刑。照理王缙也难逃厄运，这时候刘晏显示出他严谨的法制观念，认为罪有首从之分，元载既诛，不宜二人同罪。参审大员们都十分尊重这一意见，结果王缙得到了从宽的处理。另一位元党的中坚分子杨炎由于其一贯的声誉得到了保全，只是贬为道州司马。

道州在今湖南的西南，就处分而言，被贬谪到这样一个荒僻的地方，从朝中掌皇帝制诰的中书舍人一下子变成州府佐吏，其怨恨、悲凉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在道州的两年，杨炎就是这样一直在恩仇必报的信念支撑下度过，刘晏正是低估了他的决心。

偶然的机会总是蕴含着必然性。如果不是崔祐甫取代常衮出任宰相，杨炎的翻身就不一定如此迅速；但杨炎毕竟又不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人，潇洒的外表，雍容的气度以及富于词章的文学才能，使得他在朝中颇有声名。代宗时期，负责起草皇帝诏书的主要就是杨炎与常衮，两人各有所长，被认为是自开元以来少有的大家。不过，机会来得确实有些偶然，起因是崔祐甫既取常衮而代之，一切政事免不了矫枉过正，他入相后一改旧则，凡是荐延推举者一概接纳，不及一年，经他委任除授的官吏已达八百余人，杨炎也是其中之一。

诏旨一下，长安城中反响很大。人们想起风姿绰约、博学多才的美髯公杨炎，都觉得是个宰相的佳选。

两载沉沦，一朝翻身，事情来得突然，连杨炎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一阴一阳之谓道，否泰两端往往是互为因果的，是祸是福，本难

预料。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八月初七下诏征还，大约一个多月后杨炎即由道州抵达京师长安。这时距代宗驾崩德宗即位不到三个月。

恰巧此际有一件大事发生。

南方的南诏国国王合罗风病故，其孙异弁寻即位，竟与吐蕃合兵十万，分三路进犯，其中锋芒最劲的一路目标直指京畿的后方四川。当时蜀地的封疆大吏崔宁正应诏在京，留守的将帅不能有效地御敌，被连陷数州，形势变得非常紧迫。皇上忧虑万分，仓猝之间不知所措，便口宣崔宁觐见，命他返回本镇组织防御。

国家发生外来侵略，正是拥兵大将重获军权称霸一方的最佳机会，崔宁当然乐得奉命。

这一天，崔宁已赴阙辞别即将就道，这时宰相杨炎表现出了他新官上任的热情和超人的智谋，急急上奏皇上以为不可。

蜀地一般包括巴、蜀，其名来源于公元前316年秦置巴、蜀两郡。自秦时蜀郡守李冰开凿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号称“天府之国”。唐以后北宋分置益、梓、利、夔四州，遂有“四川”之称。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独特的地理形势使得其一向自成系统。对中央来说，蜀地既是一个最后的根据地和稳固的堡垒，又是一个不易掌握的地方。在生死存亡之际，它对于中央政府总是无私地敞开怀抱，毫不犹豫地成为全国的大后方；但在平时，这个四面环山的盆地之区又多多少少呈现着割据的状态。就本朝而言，远的不论，从玄宗后期开始到现在，蜀地不听中央号令也将近二十几年了，虽然在安史之乱时作为反击的据点起了很大的作用，可近来王令不行，贡赋不入都是客观的事实。

杨炎表奏的论点是：中央失蜀已非一日，崔宁虽已来朝，但留守者皆其部属，实与无蜀相同；此次派遣崔氏回镇，目的无非是冀其御寇立功，若其有功，则从道义上就更不可能夺其藩镇之权。所以蜀地败固失之，胜亦不得。

德宗对前几朝种下的藩镇祸根，是大有体会的。杨炎的奏议，正

说到自己的心里。但外敌邻近，又岂能因为中央与地方的暧昧关系而不计胜败，丧失帝国的利益？皇上也有点犹豫。

杨炎胸有成竹：不妨仍留崔宁在京，命范阳节度使朱泚领范阳兵数千合同中央禁军出击，何忧不克！奏捷后留驻蜀中，蜀兵必不敢动，然后再将该地军政大权授以可信之帅，可使得千里沃土重归国有。这条计策融汇了政治家的策略、战略家的眼光、阴谋家的手腕，德宗也不得不拍案叫绝。

事情就这样定了。后来的情形正像杨炎策划的那样获得了圆满的结果，崔宁被迫留在了京城，由李晟指挥的中央禁军四千人会同邠宁、陇右二镇军队五千人，大破吐蕃、南诏联军，一直打到大渡河边。无疑，杨炎在德宗这里获得了比西南战场的胜利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皇上的信任，十二月份的另一件事证明了这一点。杨炎建议恢复旧制，把国库的管理权从宦官那里收回到户部的左藏司，德宗立即予以采纳。杨炎以片言移人主之意，博得了朝野的一致赞誉。杨炎大为得意，他毫不怀疑，时机已经成熟了。

德宗皇帝同样也是满怀信心。半年以来的种种经历增加了他御临天下的经验，新君所带来的崭新形象和初步的改革都获得了认可。大唐天子的声威不仅威慑河北诸镇，更是播及夷狄。先帝的山陵已经告竣，求贤诏也已颁布，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天子斗志昂扬。尽管这种斗志隐含着不少轻躁急功的成分，但眼下的局面还丝毫没有让人产生这种担心。新一代天子的不同之处，现在似乎已经稍露端倪：他确实正准备要干一番大事，并且希望着一夜之间取得成功。

在踌躇满志中，一元又始。

按照惯例，新君即位，翌年元旦都要更改年号，德宗在新年改元“建中”，群臣也照例给新帝上尊号，这一次拟定的是“圣神文武皇帝”。时为公元纪年的780年。

新年的第一件大事也是由杨炎完成的，就是新税制“两税法”的颁布，这同时也给四五年来帝国政治中最重要的财政改革划了一个暂时的句号。然而，“两税法”并非是杨炎的创造，而是财政改革的必然，

刘晏等人就为此做过不少的尝试。但杨炎毕竟完成了这一突破，两税法也由此成为后来一千多年税制的不二法则。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宰相的杨炎必须在财政问题上有所建树，否则是不可能在朝政中独当一面的。其时崔祐甫已经病重不能视事，朝廷大员中也只有杨炎能善察颜色，移人主意，所以两税法的实行便无可争辩地印上了杨炎的名字。“两税法”得到了普遍的称赞，政治上的意义是告诉人们杨炎其人在财政上并不乏才识，这对报复当时的财政主将刘晏是有莫大好处的。

去年八月份杨炎一到职，在政事堂中一见到刘晏就分外眼红。杨炎阴沉着一张脸，连个招呼都没打。“刘晏这个小人，落井下石，恩将仇报，我一定要给他好看！”杨炎常常恨恨地对左右的人说。

在杨炎心里，为元载复仇是头等大事，这一念头时刻纠缠着他，食不甘味，寝不安枕。

刘晏知道这里渊源有自，他何尝不清楚杨炎与元载的亲密程度无人能比，杨氏既是元载所提拔，也为元载所亲重，甚至被元载视为可靠的接班人选，杨炎对同乡兼恩师元载怀有无限感戴本不足怪。不过这对刘晏来说却无疑是一个潜伏的危机，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刘晏忽略了，犯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大错。

刘晏都领天下利权，集度支、盐铁、租庸、青苗、转运等使职于一身，权力确实过重，自然也就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新年伊始的一段时间里，长安城里议论纷纷。

杨炎听后暗暗高兴。

于是他首先借此奏上一本，建议德宗罢停刘晏所领诸使。杨炎的理由是这些使职权责过重，应该复归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职能部门如户部等。这在表面上看不无道理，但实际上却是针对刘晏个人，因为当时的财政危机关系到帝国的生死存亡，不采取专门集权的做法是不利于对战时经济的领导的。罢停有关专使仅仅两个月，由于政府中的相关部门停废已久，无法复领财赋之事，杨炎又重新任命韩洄及杜佑为度支、江淮水陆转运使，全如刘晏之旧。先削其权，是进一步打击的

基础，接下来，杨炎的复仇之举进行得雷厉风行，时间之迅速，措施之果断，真让人叹为观止。

杨炎深知打倒一个人的关键是什么。当然，借助于天子的力量是必须的，因为天子是绝对的统治者，在他那里生与死的选择是一个非逻辑的过程。但仅仅是了解到这一点还不够，要想在政治以及肉体上彻底摧毁一个人，有两种办法是非常有效的，其一是在舆论上败坏某人的道德，尽量让公众认为他是个品行恶劣的人；其二是声言某人“心怀异志”，并“图谋不轨”。刘晏在道德上无懈可击，迫使杨炎只好从后者着手，事实证明，第二种方法虽然难度较大，但效果却往往是出乎意料的好。

二月份，当杨炎对德宗说，刘晏曾参与代宗议废皇后而立韩王李迥的生母独孤妃之事，并且还曾与黎幹、刘忠翼合谋时，殿前的另外三位重臣崔祐甫、朱泚、崔宁都觉得过分了：翻出陈年旧账借以生事，简直太无道理。

崔祐甫道：“陛下，此事乃前朝旧事，系出传说，究无实据；至于与黎、刘勾结云云，也很含糊，况且陛下业已大赦，不当复究虚语。伏望陛下慎重处理。”

崔宁、朱泚本来就对杨炎不满，立即随声附和。

杨炎一看不是路，立即涕泗俱下，声音都哽咽了：“此事千真万确，朝野众议沸腾。臣身为宰相，不能正持，罪当万死！”

杨炎的这一做法其实蹩脚得可笑，明白人是不难看出它的虚诳以及其中的真正目的的。德宗不能算笨，多少也还是有点数，否则刘晏立时就会被杀。但德宗是天子，是臣父，无论怎么聪明，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面前却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当今皇上虽并非是个喜怒无常的庸碌莽汉，但至少是一个神经脆弱者，他无法承受一些极小的不快，也不能正确对待生活中遭受的打击。这或许源自于他内心深处的自卑感，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无所不能的权力在他那里得不到关系上的调节。作为一个贤明的天子，必须要懂得有时候身居万人之上并非一定要无事不能。德宗没有也不可能做

到这一点，他的过分的疑心虽不是与生俱来，却也是由其脆弱的后天性格所决定。这种自卑往往伴随着可笑的自作聪明，于是他的猜疑多忌就表现为这样一种盲目的自信和突如其来的感觉被骗的愤怒。

“岂有此理！刘晏竟做过这等事，连朕都被他蒙骗了！”德宗动了怒，立时传旨中书舍人草诏，贬刘晏为忠州刺史。

这当然不是杨炎的最终目的。刘晏仓皇出京未几日，杨炎又奏明德宗，请求委任庾准为荆南节度使，德宗诏可了。

庾准何许人也？此人本以门荫入仕，后来依附于元载死党王缙得以骤升为中书舍人。元载、王缙败亡后，庾准也同样被贬，出为汝州刺史，德宗即位后复出为司农卿。他与杨炎的关系非同寻常，一则出于元党旧人，二则因为他对刘晏更是仇恨。庾准此人既非儒流，又无文才，为人颇为谄媚，很为时论所讥。此次调任，朝中很多人都十分不解。

然而庾准却明白得很，忠州属于荆南节度使的辖区，此番宰相杨炎给他这样一个任命，一切都在不言之中了。尽管如此，庾准还来不及准备行装，就先去宰相府谒见。

果不出所料，杨炎把他延入内室，屏退左右，密谈久之。

杨炎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寻找一切可能的借口除掉刘晏。杨炎本不需要什么借口，只是迫切需要一位代言人，以此证明刘晏的谋反不是三人成虎的子虚乌有。庾准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只用了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奏上了一本，说刘晏心怀怨望，正以忠州为基地准备起事。杨炎在朝中响应，竭力诬陷刘晏。于是，德宗秘密派中使诛杀了刘晏。刘晏时年六十六岁。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刘晏以富国而不劳民之术，俭家而利于众之德，竟至见忌而冤死，正验证了这一古老格言的残酷与无奈。

然而杨炎的复仇也太过猖狂了。果然，罪诛刘晏的诏书一下，群情哗然，天下冤之。

首先是桀骜不驯且又势力强劲的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率先发难，接

连上书朝廷责问刘晏何罪，竟至先诛后诏。刘晏功绩昭著，一旦被谗，不加验实就暴诛重臣，自然使得很多人为之骇然。两河诸镇中的李正己、田悦等都是安史降将，在某种程度上本就对朝廷怀着既怕又恨的心态，刘晏的被杀多少给了他们一些心理上的借口：刘晏无罪受诛，我辈罪恶，岂能与刘晏相比？看来也只有早寻退路了。朝中清议或天下民情未必能使杨炎产生什么负担，但如许议论来自强大的藩镇，就不能不使杨炎感到压力巨大，就连德宗本人和整个朝廷也因此难堪不已。中央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只要不引进军事力量的参与，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最多不过是得胜者趾高气扬、受害者忍气吞声而已，但是一旦有军队的干预，情况就不一样了。朝廷犹豫和缄默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在关键时刻，杨炎自私自利的本性暴露得一览无遗，面对强大的压力害怕得要命，以往排挤别人时所有的果断与坚毅消失殆尽。在此当口，他自作聪明地认为，只要把责任推卸掉就万事大吉了，但杨炎没有仔细地想一想，他要推卸的对象却不是一两个死党，而是至尊的天子。

杨炎秘密地派出心腹数人，命其以宣慰之名分赴诸道，密令他们私下里晓谕不满的各个节度使：刘晏昔日朋附奸佞之徒，曾请代宗改立独孤妃为后，完全是当今皇上痛恨此事而决定杀他。言下之意：与我杨炎无关。

李正己送走杨炎派来的宣慰使，返身对幕僚说：

“今上性格猜忌，用法严峻，我辈难求生路了！”

其他数道的田悦、李宝臣、刘文喜都有同感。

情急之下，轮到杨炎自己开始犯错误，他的这个错误与刘晏所犯的错误一样都是无法弥补的。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德宗还是知道了这件事。本来皇上也许就不无寻找替罪羊推卸责任之意，结果自己倒成了替罪羊。不用说皇上是如何的愤怒了，杨炎从这时开始为自己的败亡自掘了坟墓。

德宗没有立即动手，他知道这不足以致杨炎于死地，弄得不好，

说不定还会损害天子的声名，眼下只能隐而不发，等待机会。尽管如此，疏远这种只可共享乐不能同患难，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之徒，却是皇上马上可以做的事。几个月后的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二月十六日，德宗擢升了御史大夫卢杞任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入居宰相，开始不专任杨炎。卢杞的入相似乎是德宗皇帝短暂清明政治的彻底结束，如果说新一代天子即位两年不到的一段时间里还能算作是有过振作气象的话。从现在开始，失败便接踵而至，一发不可收拾。

卢杞与杨炎在许多方面都可算是标准的反例。杨炎面貌修美，仪容端庄，而卢杞长相极丑，形同鬼魅；杨炎善文章，而卢杞却善口辩。卢杞倒也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卢怀慎曾位居宰相。卢杞以门荫入仕，开始时做过玄宗、肃宗时的大将仆固怀恩的掌书记，后来做过刺史，在朝中历任郎中、御史中丞。卢杞入相发迹前，没有人能够真正地了解他，还是以谨慎小心著称的一代名臣郭子仪很早就看透了卢杞的为人。

当时子仪可是朝中德高望重、天下推服的顾命大臣，不过因年老多病，常卧病在床。朝中百官于是常常趋府问候，子仪在榻上接见，从不屏退左右的姬侍。一日，忽报卢杞来访，子仪立即命左右侍妾悉数退去。卢杞走后，家人问他原因，子仪道：

“卢杞形陋心险，你等见了他必然会笑其长相，此人亦必怀恨在心。一旦他日得权，则灭门之祸为时不远矣！”

郭子仪毕竟阅历丰富，能够一语道破，智慧更是超人一筹。崔祐甫已于去年的六月去世，杨炎也已不受重视，其他几位重臣都是虚领“同平章事”荣衔，于是只有卢杞独揽大权。很难推测德宗为何起用卢杞这样一个至少是很委琐的人，可能是因为数次用人的失望开始矫枉过正，才重用既无功，又无大才的卢杞，而且像赌气一般地一意孤行。所以当卢杞一旦拥有这样一种地位，人们再看出他的真相就已经晚了。

连失意的杨炎都不愿与这样的人为伍，甚至拒绝与卢杞在政事堂“会食”。宰相共进工作午餐是本朝政事堂制度的优良传统，宰相们在工作中发生牴牾是难免的，在会食中进行磋商和讨论，也可增进彼

此的了解，融洽气氛。卢杞开始没有在意，但有些人自不会放弃这种离间的机会，对卢杞说：

“杨公鄙公，不欲同食。”

卢杞这才恍然大悟。在政事堂阁中，他望着杨炎吩咐糊上的桃花窗纸，嘴上没有说话，但心中十分愤怒。

卢杞立即开始了行动。同时，他也知道自己的力量尚且不足，必须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集团，于是太常博士裴延龄成为他树党的首批人选之一。裴氏在德宗后期发挥了很不好的影响，这也得归在卢杞的名下。由于德宗对杨炎进行惩罚是早晚的事，卢杞除掉杨炎并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用的方法也和杨炎对付刘晏的办法如出一辙，先是寻机奏罢杨炎相职，接着利用严郢等与杨炎有仇之辈，给他奏上一个“有异志”的罪名，遂使德宗将杨炎贬为崖州司马。崖州在今天的海南岛，是最严厉的贬谪之地。杨炎这次不再像早先的那次被贬乐观了，在途中他走过一个叫“鬼门关”的地方，充满感慨地写了一首诗：

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

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

虽然走过了“鬼门关”，他还是预感到凶险将不可避免。果然，在离崖州只有百余里的地方被缢杀。两年之间，德宗杀了两位宰相。

德宗皇帝在历史上留下了鲜明记录，他的名字之所以总是与政治、军事以及个人处事上的众多失败联系在一起，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一两年里发生的这些事。“失败”是一个颇让人费神的问题，如果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或者是因此而带来严重的恶果就可以称之为失败的话，德宗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能实现哪怕是一点点预期的计划。德宗初政的相对平静只维持了一年多，就随着刘晏、杨炎的被杀而烟消云散了。

东方！藩镇又起风云！

东方的割据藩镇中，正酝酿着一场更深层次的动乱。

从京师长安向东，出潼关进入都畿道，不远就是与西京长安遥遥相对的东都洛阳，再顺黄河而下就是广袤的河北、河南道，一直到齐鲁平原，这一大块地区当时习惯上称为“山东”。

“山东”可是个敏感的字眼。从战国时开始，“山东”便是秦国所在关中地区的对立面，所以秦以外的六国也称山东。自古以来，这一地区就似乎是关陇中央的对立面。想当初，本朝立国伊始，就开始对山东贵族实行一种既拉拢又排挤的政策，但实际上，山东氏族却一直还是社会生活中最强大的势力之一。不过，到了玄宗时期，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

原因是北方胡人的不断内迁，大批汉化的胡人在河北道一带定居下来，成为新的社会力量，这是和本朝宽容的民族方略与求同存异的雄伟气度分不开的，所谓“修文德以徕远人”。但其中也有一个实际考虑，由于隋末的纷乱使中原特别是河北河南的人口损耗极大，为补充人口，因此一直允许内附诸族大量迁徙到边境地带居住。然而在波澜壮阔的社会变化中，这种大融合过程必然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割据、分裂和战争。东方于是成为主要的舞台。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的七月，河南道的临淄，淄青镇节度府。

数日以来，李正己忧心忡忡，没睡过一次好觉。实际上，自从去年年底皇上借献钱三十万缗一事弄得自己很狼狈以来，李正己就一直在暗暗担忧。今年四月份，北庭泾原镇的刘文喜不受朝廷命令，据泾州首先发难，正己很是兴奋。刘文喜也不过是对宰相杨炎打击泾原军的处事不满，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李正己等一大批边将的看法，正己也和不少人一样上表请德宗宽恕刘氏，息兵罢征。然而皇上却不为这一大堆奏章所动。德宗在朝会上对众臣道：

“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

消息传到淄青，正己很不安。不得已，又派人入朝，借奏事之名打探天子的态度。刘文喜很不幸，由于兵力不济，加上吐蕃不肯发兵

援助，在朱泚的攻打下，一月不到就被击破。正己的使节觐见德宗时，正巧捷报奏到，德宗把文喜的首级往这位使节面前一丢：

“朕给你看看这个，就算是给李正己的宣敕吧！”

来使伏阙不语。一回淄川见到李正己，即称大事不妙。

正己听后浑身冷汗，一言不发。和心腹幕僚们商量的结果是：事不宜迟，必须加紧操练士兵。还未过一个月，刘晏被杀的消息传遍了天下，数道节度一片哗然，正己惊恐之余，上表责问朝廷，矛头直指杨炎和德宗，无疑是下定了决心。

今日，又传来不好的消息：朝廷下令扩建汴州城池。汴州就是今天的开封，是东都洛阳的门户，为中原地区的要冲之地。皇上欲大建汴州，显然是针对东方而来。李正己问探报者：“此事确否？”

“千真万确，东边的人都传遍了，都说天子有东征之志。”

“魏博动静如何？”正己与田悦尽管有矛盾，但在对抗朝廷这点上却是共同的。

“田太尉亦正完聚为备，动作很快。”

正己大恐，当下传令：“速发兵屯曹州，增兵徐州，号令士卒，不得松懈！”

淄青兵马西指东都，南控徐淮，迫使朝廷漕运为之改道。

河南骚然。

德宗这时又遭到一次打击。前年即位之初，天子即有意疏斥宦官，亲任朝士，除任命士人白志贞典掌神策禁军外，还特别重用了两位在太子时就十分信任的文臣张涉和薛邕，但不幸的是，这两位辜负了皇上的恩宠，贪赃受贿，以权聚敛，还被揭发了出来。这下德宗很被动，宦官们在他左右议论纷纷：都说我辈浊乱天下，这些清流聚钱动辄上百万，真不知到底是谁欺骗世人！德宗听后，大为困惑，不知究竟应该倚仗何人，疑心病更加严重起来。卢杞从此开始操纵了帝国的政局。

不过，天子对东方藩镇的态度没有改变，他的那种彻底解决问题的冲动并未因客观条件而有所消减，反而与时俱增。时间到了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矛盾终于爆发。

各大藩镇的想法无非是永远保持割据的现状，传诸子孙世代拥有，而这却是中央政府不能答应的。可是，当中央的力量不能达到足以解决这一症结的程度时，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便不得不作暂时的妥协，这也是玄宗以来肃、代两帝的一贯做法。河北诸镇中的田承嗣、李正己、李宝臣以及山南东道的梁崇义互相勾结，一直就想以土地传诸子孙，所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二月田承嗣一死，李宝臣请求将节度授给田承嗣子田悦，代宗答应了。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正月，成德镇的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自为留后并请求批准，也算是有不久之前田悦的成例可以援引，但德宗的想法自不同于当时的代宗，坚决不许。

有人上奏："李惟岳继承父业已是既成事实，若不因其所求而承认，必生叛乱。"

德宗却不以为然，他有一套顺理成章的理论：叛贼本无资本以生乱，皆凭藉我土地位号以聚众，前几朝因其所欲而任命，结果动乱日滋，所以爵号不足以弭乱反足以长乱。

这一分析本无疑义，但关键是，取消藩镇的自行任免权，势必会引起朝廷与藩镇的直接对抗，中央是否有能力承受这一对抗呢？田悦为李承嗣代请，亦不许，于是五月份田悦先反，发兵攻荆州，战事爆发。六月，山南节度使梁崇义拒绝发兵讨伐田悦，德宗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讨伐；八月，李正己死，其子李纳请袭节度又不许，战争全面铺开。

这一场战争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的五月到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的十月是第一阶段。对德宗来说与其是愤怒忧慌，倒毋宁说是又惊又喜，惊的是三镇蒙受皇恩不浅却公然反叛，喜的是可以趁此一举摧毁，消除这十数年的积患。德宗的想法绝对不能算是幼稚，但却很不周到。他没有想到这也许是一场大决战，而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平叛，因为战争本身如果是由于诸多内在原因而引起的，便同时又

会引发出无数潜在的矛盾，这些矛盾一旦出现，就会牵涉更多的方方面面，就会无休止地扩大，最终激发更深一层的动乱。德宗和他的政府都没有做过通盘的考虑，除了有人在事先提出过要及早防备李正己外，似乎也没有人能够做出周密的计划。讨伐梁崇义的敕书还出自杨炎的手笔，而此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就基本上是卢杞一人把持朝政。

现在战略形势是：中央禁军与河东、昭义军由西向东，淮西军由南向北，幽州军自北往南，形成夹击之势，围攻田悦、李惟岳、李纳和梁崇义。假如情况不生变化，这一格局应该是有利于中央政府的。

果然，在战争的头一两年里，朝廷取得了胜利：第一年，先是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与前一年击破吐蕃、南诏联军的中央军将领李晟大破田悦军，另外一名将领唐朝臣又击破魏博、淄青军于徐州，打通了江淮运输线；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克襄州，梁崇义自缢；第二年，马燧、李抱真、李晟又大破田悦军，当时任卢龙节度使的朱滔攻破成德李惟岳军，结果田悦退回魏州守城自保，李纳在濮州被围，李惟岳部将王武俊杀李惟岳后投降了朝廷。

有些不可抗拒的内在因素决定了胜利必然是暂时的。首先是国力的窘迫，战事开始的第二年亦即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的正月，宰臣们迫于形势，就曾决定削减朝廷百官一个月的俸禄以支援军事费用，连皇室也都被迫缩减了开支。当时负责财政的杜佑在一份咨文中给皇帝与朝廷指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这份具有权威性的报告说：目前诸道用兵，每月军费达一百余万贯，而京城库藏却不够数月的支出；只有在另外获得五百万贯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国用。

这不啻于一个天文数字。卢杞启用了赵赞任户部侍郎，但要筹集这么大一笔钱，赵赞根本是无法办到的。在理财方面，也似乎没有人能再有刘晏、杨炎那样的能力。卢杞很无奈，只能召来他的党人们商量如何解决这一棘手的难题，可商量的结果却是一个很糟的办法。

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向有钱的富商开刀，以朝廷强行借取的办法搜括，可能会得到五百万贯的数目。这一计划得到了德宗的同

意。事实证明，这一做法不仅没能达到目的，反而引起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后来的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六月，赵赞又提出增加房屋与贸易税，并立即付诸实施，结果由于官僚贪污隐盗等原因，也是公家所人百不得半，而怨诟之声，嚣然满于天下。

可以说，造成后来德宗一生中最大的灾难——泾师之变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这两件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德宗与卢杞也是无可奈何的，应付这种战时困难，急功近利的德宗与缺乏技术才识的卢杞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帝国本是一个大家庭，面对日用的窘迫，也只有由家长向成员们征取摊派，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抱怨都是无济于事的。但其中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就是说不能超过维持一个家庭所要求的义务范围，否则家不像一个家，所有的成员也都没有必要再维持家的和谐了。国用的不足预示着朝廷与地方反叛集团力量对比的不平衡，而处事的不当埋下了更大失败的种子，所以便带来了痛苦与不甘心的退却。不过，这还不是最麻烦的。

朝中的情形很不正常，原因是卢杞正对德宗发挥着不好的影响。卢杞的毛病不仅仅在于忌能妒贤，而更在于汲汲于权势，因而一切阻挡其达到目的的障碍，他必然要去之而后快。利用国家的危机来除去自己的政敌是政治家的必备手段，卢杞就很善于此道，他在不久之后排除崔宁以及非常有名的颜真卿都是例子。在利己主义上他与杨炎有些相似，但更有质的不同，杨炎只是出于对恩仇的过分偏激，而卢杞看起来十分信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哲学；在技巧上，卢杞的手段更是高出一筹，最主要的是他真正巧妙、完善地利用了天子。

德宗有时非常困惑，为什么总是有很多人在自己面前诉说卢杞是个奸臣。在他看来，卢杞的谦虚与效忠要比杨炎之流的欺上瞒下与自以为是好得多，天子是不喜欢有人在自己面前耍小聪明的，尽管他有时根本发现不了究竟是谁在被一种小聪明所玩弄。许多情况下，卢杞的建议最终被采纳都是因为他常常突出天子的决策能力，从来都是在皇上所能考虑到的范围内提出自己的主张。于是乎这样一种情形就出现了：在卢杞面前，我们的天子觉得自己异常的高大和完美。

从代宗朝的元载开始，结党的迹象就已经初露端倪。卢杞也深知

这一点的重要，暗自提拔了不少趣味相投的人充担政府的要职，而对与己不合者，总是毫不留情地予以铲除。当时在朝中与他共任宰相的张镒本是他本人推荐的，但由于此公颇为忠正，一度很受德宗的宠信而威胁到自己，卢杞便寻机奏使德宗罢免了张镒的相位。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严郢的被贬。

严郢与杨炎都是元载所推举，在肃、代之时就颇有名声，但他与杨炎在政见上有分歧。杨炎本是一个不大能容忍的人，对严郢也极尽打击之能事。不过严郢与杨炎毕竟还是政见的不同，并不能算作死敌，只是卢杞成功地利用了严郢的私心。

当卢、杨斗争表面化时，有一次德宗询问：群臣中谁可担当大任？

杨炎推荐崔昭、赵惠伯，而卢杞则提名张镒、严郢二人，不外乎与杨炎针锋相对的意思。在与杨炎的斗争过程中，严郢为卢杞立了大功，不仅参与了计划的制定，还具体执行逮捕拷打赵惠伯的任务并使得杨炎最终被逐杀。但杨炎既死，共同的利益关系消失，卢杞又觉得严郢的精明才干难以忍受，遂利用了一件小事贬谪了严郢。在这件事上也很能体现卢杞的作风：他知道不失正直之心的人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常常会突然良心发现，并为之痛苦内疚。于是卢杞故意让严郢在出京的途中路遇赵惠伯的灵柩，严郢果然惭愧万分，一年不到就病死了。

卢杞的专权近乎三年，在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中他的个人手腕竟使他得以善终，在这一点上似乎只有另外一位三朝元老李泌能与之媲美。卢杞或许还要稍为高明一些，因为卢杞在当时几乎是激起了天下人的共愤，有些做法甚至直接导致了叛乱的加剧，可他始终是稳如泰山。然而卢杞达到了他的目的，帝国却大大地损失了，朝廷既然不能完全制服藩镇，藩镇便有理由讨价还价，这种讨价还价是没有结果的，最终只能诉诸武力。而天子如果没有足以服人的德政，天下也就没有必要为无谓的战争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牺牲。

四镇联合叛乱，危机爆发

藩镇再叛，并又一次结成联合同盟。

到了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的闰正月，成德镇的王武俊杀李惟岳投降后，河北道只有田悦的魏州未破，河南道的李纳也在濮州被围，朝廷遂以为天下之平指日可待了。殊不知当时的形势并非只是两河的叛乱，而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呈现出一种混乱的局面，其中的关键是天子的威信正一步步地丧失，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慑服天下。

德宗任命成德降将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二州都团练使，康日知为深、赵二州都团练使，又将旧成德镇的另外二州德、棣分给另一功臣朱滔。这一措施旨在分散旧成德镇的力量，也是朝廷在政治上对付藩镇的惯用伎俩。不过，都团练使这一官职虽然也是一州或数州方镇的军事行政长官，但地位较节度使低。

王武俊拍案大骂："我手刃李惟岳立有大功，官位居然在张孝忠之下，真是岂有此理！"

幕僚们也愤愤不平，王武俊心中火气更大，把朝廷的敕书撕成几块。

另一位有野心的节度使朱滔没有得到较为富庶的深州，也十分的不满，便在该地屯兵据守，拒绝交给康日知。这时在魏州被围的田悦洞若观火，立即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派了两位得力干将星夜赶到了深州去游说朱滔倒戈。

朱滔为人阴险多计，早年对朝廷外示忠顺，利用智谋骗取了代、德两帝的信任，得以成为卢龙（幽州）节度留后，内里却暗怀心计。朱滔的特点在于对任何人都怀有觊觎之心，包括对他的兄长朱泚。

果然，朱滔与田悦一拍即合，还亲自去说服王武俊与张孝忠，在利害相同之下，王武俊也终于举起叛旗，只有张孝忠不为所动。在事发之前，德宗由于康日知的奏报得知了这一情况。魏州尚未攻克，朝廷主力皆被田悦、李纳牵制，现在朱滔、王武俊再叛，根本是无兵可调了。德宗在这当口倒是深思了一番，立即采取了一条缓兵之计，赐封朱滔为通义郡王，希望能起到一些安抚的作用。但朱滔反意甚坚，岂是一个空泛的爵号所能解决的。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的二月，

朱、王联合行动，第一步便是去救困在魏州的田悦。朝廷命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讨伐，结果在魏州的惬山被田、朱、王的部队打得大败。朱滔又遣兵去救李纳，于是四镇结合，声势大振。

从三月份开始，双方进入相持阶段。在朝廷一方，主要力量就是应诏讨逆的其它藩镇，中央神策军只是作为补充力量参战。勤王诸镇中，以淮西李希烈与朔方李怀光实力最为强劲。淮西镇位于南北冲要之地，客观上对河北的割据势力有着一定的牵制防范作用；朔方则属于帝国最早的藩镇之一，原为保卫西北边疆及关中京畿而设，但德宗以中央军队取代了朔方军原本御外的任务，于是它也成为中央对付地方割据的重要军事力量。割据藩镇的存在，是中央与地方某种妥协的结果，同时藩镇之间也是互相牵连互相制约的，割据与防范可以相互转化。

二李本是讨伐叛乱的中坚力量，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前后相继反叛，特别是淮西镇，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实力的强大，与朝廷分利的砝码越来越重，与河北三镇一样最终成为帝国的心腹大患。当然，在这场战事中有一些力量自始至终都忠于朝廷，共进退，同荣辱，维系着天子与帝国的尊严。在相持阶段值得一提的是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的部队以及神策将李晟统领的中央禁军。这三支部队不仅在前期大破叛军，在这一年的战斗中更是互相团结，遏止住了四镇的势头。从这里可以看出，用人是否得当确实是危急存亡关头的一件大事，从杨炎到后来的陆贽也一直向德宗反复强调这一问题，现在以及后来的情况证明，“用人”既是原则性的，同样也是个技术上必须妥善处理的关键所在。

相持不久之后，战事急转直下。朱滔等人为了更加名正言顺，同时也是因为朝廷逐渐失势的缘故，相约称王，在安史之乱后河北诸镇第一次正式结成了联合军事阵线，并向强大的李希烈劝进。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十二月，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建兴王，勾结李纳、朱滔等反叛。此消彼长，如此一来，朝廷的失势就明显了。

李希烈出身行伍，为人暴酷，是个典型的强阀。早在奉命讨伐李正己时，希烈已蓄异志，暗地里就与李纳、朱滔有往来，此刻机会成

熟，公然举起反旗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在东方藩镇最早起事的势力中，山南东道的梁崇义地最偏、兵最少，而法令有理，对朝廷礼貌最恭，然而李希烈却和他有矛盾，极力主张兴师讨伐。德宗其时抑藩心切，未尝没有打过自己的小算盘，他想借助于藩镇之间的相互争斗坐收渔利，便欲以希烈统诸军讨之。当时的杨炎曾极力反对，认为希烈此人反心在骨，不可轻信，若异日平贼后恃功邀上，“陛下何以驭之？”可德宗对杨炎的反感已经很深，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事实证明皇上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未等到河北之祸稍有平息，希烈即叛，战事又从河北扩大到河南。李希烈在建中三年秋天移军许州时有三万人，兵强马壮。许州在今天的河南许昌，直接威胁到东都洛阳。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的正月，希烈出兵四掠，陷汝州，围郑州，游骑至于洛阳郊外，搞得东都士民大为震骇，纷纷出城逃往附近山林躲藏。军情如火燃眉，德宗急忙召见卢杞问计。

真不知卢杞在这种存亡关头怎么还有心思公报私仇。他宽慰皇上说希烈不过是恃功傲慢而已，若能以一位儒雅重臣前去奉宣圣泽，晓以利害，可不战而获，建议派颜真卿到许州去宣慰。德宗也幻想着天子的圣威能够继续化凶为吉，更何况，牺牲一点原则换来精神的胜利本就是人君的常法。诏书一下，举朝失色。

人们都知道年逾古稀的颜真卿是一位刚直不阿的儒教大师，平生容不得半点邪恶，也正因为如此才得罪了卢杞，以他这种性格去赴虎狼之窟，无异于送死。国家失一元老，这是所有人的耻辱。在途中，东都留守郑叔则、宣武军节度使李勉都劝留真卿，李勉还特地为此上表德宗。但这些既没能让皇上收回成命，也没有打消真卿为国赴难的决心。他留下遗书抵达许州，被扣留近八个月，直到最后被李希烈杀害，在威胁利诱面前自始至终没有丧失一点人臣与帝国的尊严。但他的牺牲并未为皇上带来所期望的东西，李希烈照样攻陷了汝州，对关中构成了重大威胁。

情况很明显，战事由稍远的河北一下子移到了中原枢要地区，反叛军队隔绝了南北交通，直接影响到帝国的生存命脉。李晟及李抱真、马燧所部被朱滔、田悦等牵制，驻扎汴州的宣武军自然就成为中原诸镇中对付李希烈的主要力量，但实力尚不足抗衡。四月，德宗被

迫调关中地区的中央部队出战，龙武大将军哥舒曜率领的这支部队协同宣武节度使李勉一度使李希烈退到蔡州，但不久即告失利。八月，李希烈进围襄州，九月，在沪涧一战中德宗另外抽调增援的禁军又被李希烈重创，东都洛阳岌岌可危。洛阳是西京长安的门户，一旦失去，叛军势必长驱直入，这使德宗万分恐慌，于是下诏坚令死守。皇上的心态和眼下的形势都预示着：帝国被迫转入防守无法避免。

这倒不是德宗的虎头蛇尾，而是时势所然。事实上，德宗目前采取的战略正是因为深察了形势的结果，这是由于有一位极负才略的大臣给皇上施加了重大的影响。这位正直的大臣尽管是一位文士，但却对帝国的危机有着深刻的体会，他的态度严肃但文采斐然，从不危言耸听但总是指陈剀切，他凭着对国家和道统的忠诚坚信：到目前为止，皇上是彻底失败了。

德宗未即位前，即已知道陆贽，但直到此时才召用他为翰林学士，起初也只是出于要大手笔起草文告的需要。从先王开始，中国的文教一向昌盛，历朝历代恪守的传统要求首先必须以理服人，以教化治邦怀远，不战而屈人是最上策，其次才是使用武力。本朝尚武，但还是把文化和教化放在首位，天子更是必须如此，所谓内圣才能外王。王令能够遍行天下，不仅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无上的权威，还因为它同时是一种道德和伦理的象征。因此为皇帝起草诏敕文告一向选用博学多才、明理善辩的文臣担任，陆贽就专门负责这一工作达数年之久，他的手笔创造了大唐有史以来最优良的范例。

当帝国的低潮到来时，陆贽不能允许自己再保持沉默了，他在李希烈反叛后连续上奏德宗，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

陆贽提出的问题，德宗未尝没有体会，特别是朱滔、李希烈的反叛，给自己心中带来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但天子总是天子，难道这一至尊无上的权威竟可以被当作是徒具威严的面具？这叫皇上实在无法理解。更有疑问的是，人君任用臣子，都应该是其人的荣幸，也是为国为君都义不容辞的责任，假如一旦违抗圣命，倒戈助逆，又岂能是天子的过错？德宗无法不为自己的幻想所欺骗和愚弄，所以陆贽注定是要白费一些苦心的。但是陆贽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却至少让皇上感

慨万端，这一点在几个月后的那篇著名的《罪己诏》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尽管德宗同意发布这篇诏书多少是出于迫不得已。

陆贽认为，国家的安危在于“势”，势苟安，则异族异类都可成同心；势苟危，则同舟之人皆为仇敌。现在的关键正是国家“势”危，必须承认灾难的现实，停止追求难以达到目标的举动。在这里，陆贽描绘建中以来的德宗用了“孜孜汲汲，极思劳神，徇无已之求，望难必之效”的词语，前二句明褒实贬，后二句则直言无遗，无异是说皇上这两年对付东方藩镇的一切努力不仅都是白费功夫，而且从开始就是一场失败。陆贽还举出玄宗的例子预言，关中京畿地区中央军备的空虚必然会导致内乱，为此必须停止征发中央禁军，息兵罢战，并免除京城及畿县的杂税以安民固邦。德宗没有接受后一条忠告，继续调用了泾原守军开赴前线，结果导致了兵变。但这并不是说德宗对陆贽这一“失败”理论无动于衷，因为如果不是皇上对现实状况的某种默认，无论陆贽在什么情况下提出这样的指责都是不可想象的。

泾师之变：梦想很坚挺，现实很骨感

内忧外患并发所酿成的“泾师之变”，宣告了德宗皇帝所有努力的失败。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八月，当李希烈围攻襄州，德宗就已命令关内的泾原镇出兵赴援。十月初三，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五千经过京师长安。

这时正值严寒，风雪奇大，从泾原来的兵士大多携带子弟同行，希望到长安时能够得到厚赏。负责犒赏的是京兆尹王翃。

王氏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例行公事，其时战况紧急，也无暇顾忌许多，便随便配制出粗糙的菜饭，并还严促部队立即上路。

泾原兵士这一怒不小，骚动之下竟然哗变，领头的人声称大内府库中金帛无数，鼓动大家去拿来平分，于是群情更为激愤。当时部队

已经出发到城外的浐水，变兵重新杀向长安城东的通化门。

姚令言正在宫廷中向德宗辞行，听到消息后立即快马赶回，在路上与变兵不期而遇，令言冒着箭雨呼吁士兵克制：

“汝等少安毋躁，听我一言。”令言声嘶力竭地大喊，“此去东征杀敌立功，何愁不富贵！如何无端生变，招致灭族之祸？”

令言此语更激起众人的悲慨之情，一不做二不休，变兵一哄而上把姚令言拥向城中。德宗这一惊不小，立刻命赐泾原兵每人帛二匹，但已无济于事。军士以为皇帝这种前倨后恭之态是对他们的大不尊重，更加愤怒，杀掉了前来宣慰的宦官。奔至通化门时，已是喊声震天，又有一位太监骑马疾驰而出，刚刚叫出“皇上口谕——”，就已是中箭落马。德宗又命赐金帛二十车，但此时乱兵之势已成，和平解决已是不可能的了。午、未之时，变兵已进入城中，一路对狼狈逃窜的百姓大呼：

“百姓勿惧！此后再不夺汝等商货作典质了！再不用交间架陌税了！”

普王李谊、翰林学士姜公辅奉诏宣慰，一出丹凤门就目瞪口呆：泾原变兵已在宫外列阵排开，周围黑压压围观的百姓有数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德宗只能急召禁军，但德宗即位之初就任命的神策军士人首领白志贞却捅出了一个大纰漏。

原来，近一两年来由于战事正殷，禁兵兵源不足，天子遂命志贞兼京城招募使，负责招募之事。但兵荒马乱之际，招募又谈何容易！志贞无奈，只得请求德宗下令，凡武官豪富之家出子弟、甲马充实禁军，德宗也批示同意执行。如此一来使得人心颇为慌乱，这倒也罢了，关键是军中死伤甚多，白志贞皆不奏报，以京师市廛沽贩之徒填阙。这些人大都是市井商人，在禁军中只是挂名领饷，平时都在做生意，现在事出突然，皇上急召，自然是无一人报到，这个重大事故加剧了德宗的危机。

当德宗听到慌张入报的宦官说根本无禁军可调时，顿时惊得说不出话来。幸好宦官窦文场、霍仙鸣还算能见机行事，赶紧劝说皇上出

走，于是德宗只能带着两个贵妃及诸王子从皇苑北门狼狈出逃，身边唯有窦、霍约一百随从护驾。

巧的是，郭子仪之子司农卿郭曙与数十个家兵正在北郊打猎，将门之子到底处变不惊，听普王李谊说明情况后，立即将卫队变为皇驾的前军，往北疾驱。另一位禁军将领右农武军使令狐建也正在郊外教军人射箭，见此情景遂率近四百人为殿后，追随德宗而行。这时已近黄昏时分。

其他的朝官包括神策军首领白志贞、京城长官京兆尹王翃、宰相卢杞、财长户部侍郎赵赞以及皇帝的重要顾问翰林学士陆贽都茫然无措，不知道皇上到哪里去了，直到傍晚才陆续追到咸阳。滞留京城来不及逃出的大小官吏则不计其数。这一天的变故是德宗皇帝即位以来的彻底失败，也是本朝建国以来发生的天子第二次被迫离开帝国首都的事件，第一次是玄宗皇帝，他在安禄山大兵压境之下逃往了四川。

如果就事论事追查此事的直接原委，除了德宗本人应负主要责任外，一些朝廷大员们恐怕也难逃其责。当时任朔方、邠宁等重镇节度使的李怀光就持这种看法，他这时奉诏急急从魏州前线赶赴勤王，屯军在咸阳。他痛恨卢杞及其党徒本就由来已久，此刻更坚持宰相卢杞谋议乖方，财长赵赞赋敛过重，京兆尹王翃刻薄军粮是导致王驾播迁的主要原因，怀光甚至凭借他的威望扬言要进奏皇上杀掉这三个人。无论这种想法是否出于私心，都反映了相当一部分朝野舆论的倾向。

也有一些人认为白志贞是罪魁祸首，理由是志贞或许在招募禁军的过程中接受了贿赂。这种猜测当然也是很自然的，不过证据不太充分。陆贽的一些奏疏中透露，在东征战斗中禁军的伤亡确实非常严重，而且以沽贩之人充斥军籍，自开元兵兴以来就已不免。由此看来，白志贞也只是处事不当，未能革除旧弊而已。

无疑这是整个中央政府的失败，一切都如天才的陆贽所预言的那样，连年的用兵不仅没有效果，反而触发了萧墙之祸。一天之后，德宗从咸阳抵达了奉天县城，政府的指挥中枢虽然立即开始了运转，可帝国无疑已处在极其紧急的状态之中。

这时在长安城中的兵变已扩大为一场严重的反叛事件，曾经任过泾原节度使的朱泚被乱兵拥立为首。朱泚是朱滔之兄，从某种角度上说，他阴险不及乃弟，冲动莽撞却有过之。他先任幽州节度使，后来在朱滔的怂恿下于大历九年（公元774年）入朝并请留京师，以自己充当实际上的人质来换取朝廷的信赖，做了朱滔的工具。朱泚在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任陇右节度使，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代宗死后被召还任山陵使，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曾兼领过数月的泾原节度使一职，其地位一直是优宠的闲职，是朝廷优待忠诚归附的地方重臣的象征。到目前为止，尽管内心怏怏，可手中无权无兵，只能无所作为，因而他的生活也一直很平静。只是在朱滔叛乱后发生了一件插曲，起因是朱滔还没忘记他的兄长，用信鸽传笺约他在京城谋反，不料被马燧截获，告到德宗那里，吓得朱泚赶紧伏阙请罪。幸好德宗认为长安与河北路途遥远，二人不可能事先串联，因而没有追究。事情虽然过去，但朱泚很清楚，他是不可能永远置身事外的。朱泚当然没有料到泾原兵变的发生，不过一旦当他发现这是一条顺水之船时，便毫不犹豫地踏了上去。

事变的当夜，姚令言就直趋朱泚府第。未过一会儿，朱泚就在变兵一路火把的照耀下走进了天子的含元殿，对外宣称的说法是“权知六军”。

当时局面混乱，消息自然不灵通，但这件事还是被模模糊糊地传到了奉天。有人提醒皇上朱泚可能反叛，必须立即组织防范，却遭到了卢杞的痛责，他向德宗保证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这件事上，卢杞又差一点使帝国遭受灭顶之灾。朱泚果然将计就计，派泾原将领韩旻率精兵三千以迎驾之名偷袭奉天。幸好有一位留陷在京城的大臣以他的勇敢、机智和献身精神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人就是大唐历史上著名的忠臣段秀实，他用计谋诈回了韩旻的部队，并为此而舍身成仁。七天后，朱泚正式僭号称帝，国号秦，自称大秦皇帝，杀唐宗室七十余人，并发兵攻打奉天，创造了安史以来叛乱的极致。这时德宗在奉天城中恨恨地拍着佩剑，后悔当初逃离长安时没有听取大臣姜公辅的意见除掉这个祸患。

一场突来的灾难往往能暂时弥补掉内部的裂痕，造成一股同仇敌

忾的气氛。德宗在奉天诏命全国各地兵马立即来援，十一月，各道兵先后至长安，李怀光也到达了奉天。杰出的将领浑瑊率守备军在奉天保卫战中奋死力战，保住了天子与流亡政府，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十一月二十日李怀光军在醴泉击退了朱泚，解除了奉天之围。然而现实就是那么无情，外在危机一旦得到缓和，内在的矛盾便立即还魂。

满怀怨气的首先是朔方镇的李怀光。李怀光本是粗疏之人，作为地方强藩，在某些利益上与那些因不满而造反的藩镇是有共同语言的，此时既立大功，自矜其功之余，说话更是肆无忌惮，他当然还不能把藩镇的怨气直接发到德宗身上，便把矛头指向卢杞。卢杞立即反击，借助于德宗的力量狠狠地打击了怀光，命令他不必觐见并克期收复长安。

但卢杞的反击到这时已是强弩之末了，因为政治上要求此时必须有一个替罪羊，反对卢杞与白志贞等人的强大舆论正是这种机制的产物，卢杞已经回天无力了。德宗即使再怎么不愿意，也不得不于十二月十九日贬卢杞为新州司马、白志贞为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

又是一个新年到来了，这是德宗登基的第五个年头，公元784年。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新年！原先的种种努力没有任何成效，对付东方河北藩镇的勃勃雄心和强硬路线换来的却是更深重的灾难，一切新的气象都灰飞烟灭。军事上，长安还没有收复，朱滔又勾结回纥为朱泚声援，李希烈攻陷了汴州；物质上，国家的财力已极度匮乏，关中与中原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损伤。政治上虽然取得了表面的一致，但政策仍然不明，上下不通，人心混乱。在现实面前，或者更多的是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德宗终于在某种程度上和陆贽走到了一起。

陆贽仍为翰林学士，但居中参裁，策划事宜，制定诏令，已是皇上不可或缺的辅弼了，奉天吏民，早已称之为“内相”，卢杞等人也无可奈何。

这一年的正月改元“兴元”，颁布了由陆贽起草的《罪己诏》。

帝国的沉沉黑暗中似乎透出了一丝曙光。

罪己书：无奈的选择

“万方多难，罪在朕躬”，自古以来，天子的“罪己”有时不过是一种退让策略，或者只是一种姿态。真正的引咎自责以求重建道德，并不多见。

时间是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正月。策划者是陆贽。

皇上当然知道这不是一篇普通的制书。一段时间以来，天子的心里也很不好受，他常常愤愤地挥剑乱斫，向天仰望，喃喃自语。每次与陆贽交谈后，皇上一方面为自己的轻躁而后悔自责，但同时又忿忿不平，不明白一腔壮志换来的为何是满目的灾难。在奉天的朝会上，他望着垂手肃立的文武百官，经常是心潮起伏，感慨万端。

陆贽坚信，只有一条路可走。

“陛下，”陆贽深思熟虑已非一日，“方今盗贼遍布天下，舆驾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人心。昔成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书诏无所避讳，臣虽愚陋——”说到此处，陆贽已是奋发激昂，“亦可以仰副圣情，使反侧之徒革心向化！”

德宗心中充满了一种悲剧感，他也只有做这样一个无奈的选择。他对翰林学士说：

“国家厄运，罪在朕躬！”此话一出，皇上竟已是泪光晶莹，“朕……愿照卿之意，大谢天下，凡所反侧者，一概赦免，诸将赴难奉天者尽加忠臣名号，——苍天不负予！”

“吾皇万岁！”

罪己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天子替天行道，假如横遭危难或者民心怨腾，自然是因为违背了天道的意旨，才使上天降厄示警。在这种情况下，为免遭天谴，收拾民心，只能是痛自引咎。著名的经典《左氏春秋传》记载了最早的先例，也就是陆贽所说的“成汤罪己”。然而在

后来的天子看来，天子的权威岂可如此等闲视之！所以就一般的情形而言，如狂风暴雨地震干旱等表现出来的“天威难犯”，帝王为天下计，倒是会下诏罪己以求上天的宽恕，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但在人事方面，似乎还没有哪一位天子像古代先王一样深切自责、痛心疾首过。德宗的罪已是一个典范。

这年大年初一发布的诏书表面上是大赦，中心内容却紧紧围绕着自我谴责展开，是一篇真正的《罪己诏》。陆贽写得恳切深痛、诚挚感人，可谓是发自肺腑。这当然是陆贽在某种程度上坚持的缘故，否则皇上不会下决心走这条无奈的道路。

当然，罪己绝非是盲目地丢弃原则。李、田、王等不过是自封王号，而朱泚却有性质上的不同，涂炭宗庙还罢了，僭越称帝，这是大逆不道的极致，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这是天下的共识。如果皇上对他姑息，那就是整个帝国的耻辱和道德伦常的失序，没有人会同意。所以诏书严正但同时不失理节地宣告：对朱泚，“朕不敢赦”。

天子在痛苦的抉择下作出了圣明的决定，这是国运攸关的大事。诏书在最后规定：

“赦书日行五百里，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一匹匹快马，一级级驿站，把奉天的诏令传向四方。在战时状态下，帝国的交通虽然有所损害，但讯息的渠道并未完全隔绝。发布的方向当然也是有重点的：一是“山东”的田悦、王武俊和李纳、朱滔，二是河南的李希烈，三是占据京城长安的朱泚之众。德宗特别命令兵部员外郎李充具体负责河北地区的宣慰任务。

天下大悦。有消息表明，诏书传到山东地区，士卒们听后，皆感极而泣，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致相同。陆贽和德宗的努力没有白费，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诏书提到的那些叛乱首领，却是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打算。已自称大秦皇帝的朱泚不用说了，他只有一条路走到底，于是又更国号为“汉”，自号“汉元皇帝”，改元“天皇”。

王武俊起事多少出于一时的冲动，充其量也不过是因为奖赏不公

而已。泾原兵变后，朱滔、田悦想乘机进兵攻击河北的官军主力之一李抱真部，气焰颇盛。如果再与王武俊合力进军，河北官军不要说回师勤王，就是单单对付正面之敌都非常困难。李抱真感到压力很大，思前想后，只能用计。于是，派了一位谋士贾林前去王武俊处诈降，希望能用他的机智缓冲一下局势。

贾林此人果然有勇有谋，一见面就实话实说，言明此来非降，是来传话的。王武俊是契丹人，很有点胡人的豪爽之气，在贾林对利害的分析下一听动容，拒绝了朱滔的联兵之议，暗地里与抱真和马燧达成了停战协议，这使得河北官军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这种情况下，德宗《罪己诏》一下，王武俊便立即集合三军，宣布撤去伪号。

淄青的李纳、魏博的田悦无非是谋求名位世袭，现在朝廷既然有所表示，天子又如此通情达理，一时无话可说，便也上表请罪，表示归顺。

至于为人暴虐的李希烈，因为独霸淮西，又自恃强大，并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此刻竟效法朱泚，也干脆自称皇帝，国号“大楚”，以汴州为基地，四出攻掠。

只有朱滔最工于心计。此时他已是朱泚的皇太弟，年初还以重金邀请回纥合兵五万西攻贝州，与朱泚首尾呼应。他也许没有想到德宗的赦书居然对他也网开一面，但这时他信心正足，自不会就此罢休。不过，他也给自己留了一点后路以备不时之需，并没有公开抵抗，只是不满于田悦对自己的阴奉阳违，发兵攻打，田悦闭城不出。

东方的局势稍有好转。但祸起萧墙：勒兵京畿的李怀光正怨气冲天。

怀光勤王功不可没，要不是他击退了增援的叛军并及时赶到，奉天之围绝非轻易能解。怀光性格粗野，语无遮拦，一路上都在大骂卢杞误国，为这事连续上表，直到德宗不得已而贬卢杞、赵赞、白志贞以示安慰。怀光还不罢休，又上奏弹劾宦官翟文秀，力请诛杀。翟氏可是皇上信任的人，此刻为安抚大将，德宗也顾不得许多了，只好舍卒保车。

德宗作出这些牺牲，只是希望怀光能立即去收复长安，使得自己尽早重坐龙庭。但怀光的不满并未就此消歇，他也知道皇上的用意，故意屯兵咸阳，逡巡不进。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值此生死存亡关头，幸好帝国还有一位忠臣，这就是检校工部尚书、神策军行营节度使李晟。兵兴以来，李晟所部一直是绝对忠诚朝廷的直属力量之一，他也是急急从河北赶赴关辅的，此刻正驻扎东渭桥，逼视长安。

李晟治军有方，号令严肃。进驻东渭桥后，当机立断，马上合并了不受节制的刘德信部，秣马厉兵，准备进兵。怀光眼见李晟独当一面，十分担心。

怀光自忖，目下自己手中砝码颇重，可以有恃无恐。遂上奏皇帝说：克复长安事关重大，务须诸军协调行动，请求准予与李晟部合军。其用意无非是欲借此控制李晟。

德宗只要怀光能进兵，无有不可，下诏同意。

二军在咸阳西面的陈涛斜会师，筑垒未毕，朱泚就派兵杀到。接到探报，李晟急忙去见怀光。

“明公，”李晟为人向不倨傲，“朱泚若固守宫苑，倒是不易攻取，此番贼众敢轻离巢穴，可谓天赐明公以良机，不可失之！”

怀光此刻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只是苦于没有借口，哪里还想去和朱泚交战。

“我军甫至，人马未饭，岂可应敌！”一口回绝。

李晟长叹而出。

怀光对手下略有不满的将佐说道：“诸位有所不知，此间各道军马，赐粮皆薄，独神策军最厚。薄此厚彼，于理何安？我已表奏圣上，圣上不日将派翰林学士陆贽前来宣慰，且观旨意如何。”

德宗真是无可奈何。他对陆贽说：

“眼下财用窘迫，哪里有这许多粮草！然若逆李怀光之意，势必使其军失望，横生事端，这真叫朕难办！卿可见机行事。”

陆贽一到，怀光当着李晟的面，拍着几案：

“将士们同是为国战斗，然而待遇迥异，如何叫他们心安？”

陆贽无话可说，暗中给李晟打着眼色，希望他能先退一步。李晟会意，大度地说：

“明公是元帅，晟不过是领军受命而已。至于说到增减衣食，只要明公下令，晟无有不遵。”

怀光这下倒不好再说什么了。他也怕就此引起李晟手下士兵的不满，本来是想让李晟自己走这一步，现倒反让李晟将了一军。心中恼怒，但又不好发作，只好将怨气撒向陆贽，言下大是骄狂。

其实李晟知道情形已是箭在弦上，很担心被怀光吃掉，在此之前已秘密奏上一本，请求移军返回东渭桥。这时陆贽也已回到奉天，向德宗汇报了此行的情况，结论是：李怀光不仅奔寇不迫，师老不用，而且阻沮手下将士进取之志。皇上若一味姑息，不采取有效手段，变故将不可避免。德宗忧心忡忡：“然则李晟奏请移军之事，如何处之？”

“臣在彼处，怀光已提到此事。臣当时担心他生疑虑，遂故意夸赞其军力强盛，怀光很得意，反而有轻视李晟之心，曾答应若圣旨同意，不反对李部移军。陛下不妨以此为由下诏怀光，就说既然卿已同意，遂敕李晟军允其所请了。如此辞直理顺，不怕他有借口。”

德宗半信半疑，还不相信怀光会就此造反。到了二月，一个个消息证明这已是一触即发的事时，皇上还心存侥幸，以为是小人的离间，又派中使去晓慰怀光。但李晟已等不及了，率部从咸阳结阵徐徐而退，从而免遭虎口。不几日，李怀光果然反叛，另外二支兵马鄜坊节度使李建徽、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部由于德宗不同意移营，被怀光吞并。

二月二十六日，因为怀光将赵升鸾的密报，皇上终于得知怀光将在第二天偷袭奉天挟持天子，方才龙颜大惊。浑瑊当机立断，坚请舆驾即离奉天。于是，德宗再一次仓皇逃奔，从奉天又逃至陕西南部的梁州。

这才是二月份，看来新年并没有立即使形势好转，相反却越来越糟。不过，矛盾既然全面激化，那么，一切不是在冲突中灭亡，就是在崩溃后再生。帝国尚未走上绝路，朝廷的力量和号召力依然存在，正义也仍在天子一边，人情已经厌恶战争，叛乱诸镇的联防亦开始分崩离析，这一切表明，帝国政权在纷争的夹缝中依然存在着生机。

李晟开始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他和陆贽、浑瑊一样，以自己的忠诚和勇敢在这个事态迫切之际尽到了人臣的责任。此时此刻，他的状况是最危险的：一是处在朱泚和李怀光两支强敌之间，二是由于朝廷转移，部队供给也发生困难。可谓是内无资给，外无救援，处境十分艰难。

这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德宗在出奔的路上不住地问浑瑊：

“渭桥位于贼兵腹部，李晟与敌军兵势悬殊，是否能行？”

“陛下，”浑对李晟信心十足，“李晟秉义执志，势无能夺，以臣看来，必能破贼！”

德宗轻吁长气。

然而李晟却焦虑万分。从战略上讲，克复长安成为扭转整个战局的关键，既可以恢复天下臣民平叛的信心，又能重新掌握关中之地，从而与各道兵马对反叛力量形成夹击之势；相反，假如一旦迟缓，朱泚、朱滔、李怀光、李希烈以及其他一些犹豫观望的地方势力必然会再行勾结，对朝廷形成新的威胁，这无疑将是致命的。长安务须收复，李晟铁了心。

在这种危急时刻还想要有所作为，精神支柱绝对不可或缺。李晟一向能以忠义激励将士，以自我的献身精神来调动全军的士气，此刻更是不敢松懈。但李晟在策略上做得更为成功。

他先是借手下大将张少弘之口，假传圣旨，宣布自己已被任命为尚书仆射、同平章事，以安众心；又写了一封措辞谦卑的信给李怀光，字里行间却谕以祸福利害。李怀光见了，一时倒也踌躇起来。接着，李晟凭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便利，抢先在部队所在的京畿一带地区，以皇帝的名义征粮，这一下军不乏食，声威大振，连李怀光

都暗暗叫苦。

此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李怀光的轻躁之举纯粹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原因是李怀光的朔方军是一代功臣郭子仪的旧部，部下的将士对朝廷有着一种不能割舍的情感联系，许多人本就不愿跟着李怀光背叛朝廷。加上粮饷将竭，在李晟的影响下，军众渐多离散。先是邠州的朔方留守将领韩游瓌杀死留后张昕，上表请受李晟节制；接着原神策将孟涉、段威勇率兵哗变，投归李晟。此后，类似情况更是一发不可收。怀光无奈，只得烧营东走，退向河中。李晟兵不血刃，解除了后顾之忧。

三月，浑瑊派来的步将上官望怀着诏书从小路抵达渭桥，传旨加李晟官衔，李晟流涕承诏。许多兵马开始向李晟靠拢，包括李怀光军中反正的几支军队。同时，浑瑊与借来的吐蕃兵大败朱泚于武亭川。在河北战场上，已去王号的田悦被堂弟田绪杀死，田绪由此继任魏博节度使，并和王武俊与河北官军主将李抱真大败朱滔于贝州，迫使朱滔逃归幽州。攻克长安的时机已经成熟。五月三日，李晟引军抵达通化门。

形势又朝有利的方向发展，不过，德宗故态复萌，一下子又急功起来，差一点坏了大事。

皇上先是迫不及待地向吐蕃借兵，不料吐蕃随浑瑊击败朱泚后大掠而去，又使他很着急。

陆贽道："吐蕃贪狡，有害无益，得其引去，实可庆贺。陛下何忧之有？"

德宗一心只想着帝京能不日光复，又不便明说，便道：

"李晟、浑瑊兵少，怕实力不够吧？"

"吐蕃反复多端，一旦深入郊畿后暗结贼兵，则后果不堪设想。"陆贽何尝不知皇上的心情，于是把话说得很重：

"臣以为，戎兵不去，寇不能灭！"

陆贽这话一出，德宗也不好再说，但又担心众将逼近长安，不要

又像李怀光那样逡巡不前，又道：

“李晟、浑瑊军破敌攻城，当有规划，朕欲贤卿条疏计议，部署下去。”

陆贽一听之下，惊出一身冷汗，皇上的疑惧之心又来了，赶紧上言：

“贤君选将，委任责成，故能有功。何况长安、梁州距离千里，兵势无常，遥为规划，未必合宜。决策九重之中，定计千里之外，岂得成功！”说到此处，陆贽干脆把话点透，“陛下，君上之权本迥异于臣下之权，所谓：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呵！”

此语触到德宗的痛处，皇上缄口无语。

五月二十一日，李晟正式发动攻击，只用了八天就一举克复。同时，西路的浑瑊、戴休颜、韩游瓌也收复了咸阳，并分兵追击逃窜的朱泚。朱泚逃至彭原县时，被部将射杀。

当李晟的破敌文告传到梁州时，天子下泪了。

“天生一李晟，是为社稷万人，不为朕也！”

随驾群臣无不动容。

七月，流亡数月的天子还驾帝京，随行的各路骑步兵有几十万人，一路连亘数十里，长安士庶，夹道欢呼。李晟跪迎于路左，上贺“元凶殄灭，宗庙再清”，又使天子挥泪不已。

长安收复的消息迅速传遍。河中的李怀光处在官军的正面，显得有些孤立，权衡再三，只能上表请罪。帝国喘息甫定，自也无力再追穷寇，皇上下诏表示原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料前去宣抚的使节孔巢父处事欠妥，引起怀光和手下一些胡人的不满，又鼓噪起来，杀死巢父，再次抗命。

但不管怎么说，平叛的战事还是一步步走向成功。在河南方面，负责军事的王子曹王李皋击退了李希烈，收复了安州。在河北，马燧协同李抱真、王武俊再攻朱滔，迫使朱滔上表待罪。

转眼又到了深秋九月。德宗信步皇苑，眼见亭台依旧，池柳依然，不由得心潮翻滚，思绪万千。正是去岁的此时，一次突来的严寒也卷来一场严重的灾难，使得舆驾西迁，饱受颠沛流离、失国丧庙之痛。每念及此，皇上就十分恼恨那误事的白志贞，同时，也想起自危难之始就不离左右的宫官窦文场来。“近卫之任，还是内侍可信！”这次变故使德宗彻底推翻自己早先的想法。

在一路逃难中，皇上既离不开陆贽，也离不了窦文场，似乎两人都是患难之交。其实，宦官和陆贽辈的忠诚是不能类比的，此中道理很简单：在武人得势的纷争之秋，文臣尚可以入幕为僚，而无兵无权的家奴除了跟随主子，是无处可投的。不过，家奴一旦拥有权势尤其是兵权，情况就不同了。

所以还在奉天时，有位大臣萧复就上言曰：“宦官自艰难以来，多为监军，恃恩纵横。此辈只应掌官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权国政。”皇上听了就不高兴。此番有了借口，德宗主意已定。

本月的三十日，德宗正式任命窦文场监领神策军左厢兵马使，王希迁监领右厢兵马使，开始以宦官分典贴身禁军，他当然不可能预料到后果是如何的严重。又是一年过去。由于战事和蝗灾，财政再一次成为迫切的问题，新的一年，就是在江淮转运使韩滉发来的一船船粟帛中开始的。

矛盾的德宗：从雄心勃勃到得过且过

不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磋跎。

帝京的光复并不能说明天子的罪己已感动上苍，因为两河的李希烈、李怀光和幽州的朱滔仍在负隅顽抗，帝国还须征战讨伐；而去岁以来，旱蝗肆虐，草木无遗，以至京畿大馁，道馑相望，又使得稍有转机的形势变得严峻起来。所以，天子还必须继续反省自己，以匡扶天下的德政拯救帝国的宗祧和黎民百姓。于是在公元785年的元日，

德宗又发布大赦令，并改元“贞元”。

这场战事已持续了将近四载，任何一方都已经无力再作持久的打算。朝廷既然在几次决战中取得了胜利，也就证明了维持一种大家庭的力量依然存在。未过两年，大规模的抗争终于以妥协结束：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六月，朱滔死，诸将奉刘怦知幽州军事，上表求归；八月，李怀光穷迫自缢，部下断其首出降，河中平。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四月，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毒杀，淮西一镇至少也在名义上归顺了朝廷。甚至到了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德宗在压力下还终于答应了与回纥和亲，从而又使得吐蕃势弱，不能复为大害，边疆亦暂告绥靖。到这时，尽管天下并不安宁，但天子心中的“外患”毕竟是大大减轻了。也许“贞元”果真是一个吉兆，从此以后，德宗皇帝再也没有更改过年号。就这样，“贞元”记录了二十年的漫漫岁月。

皇上已步入了中年，他的朝气与壮志正在时光的流逝中渐渐地销磨着。

对一个集权帝国而言，内忧与外患永远是相辅相成的。有时大敌当前，反而能弥合内部的裂痕，而当外患一旦消减，内忧却不时滋生。

贞元元年（公元785年）的大赦没有立刻使二李革心投诚，却使另外一个人高兴得手舞足蹈，这就是建中四年（公元783年）被贬为新州司马的卢杞。

卢杞当然也在大赦之列，由新州司马移任吉州长史。他太了解皇上了，知道皇上此刻正陷入了一种无所寄托的忧郁中，一定会想起他的。“吾必定会再次入朝！”卢杞对人说。

真给他猜中了，皇上果然任命卢杞为饶州刺史，命中书舍人袁高草拟诏诰发布这一决定。正直的袁高对德宗的做法十分不满。

这时宰臣是卢翰、刘从一、李勉。袁高对三位宰相说：

“卢杞为相数年，銮驾播迁，海内疮痍，如何又调任大郡刺史？望三位相公力谏圣上。”

卢、刘摆手拒绝，李勉低头不语，袁高见状，气得掉头就走。

卢翰拿着“词头”直接从政事堂后门走进中书舍人院，吩咐其他舍人撰写。第二天，诏书颁布，袁高拗起性子在殿上不肯宣读，与另外两位大臣陈京、赵需出列力争。

德宗说出他的理由：“卢杞亦在大赦之列。”

袁高谏道：“大赦只是宽宥其罪而已，岂可再以刺史授之！”陈京等亦争之不已，皇上忍无可忍，多日的怒火突然发作，大吼道：

“朕就是以为卢杞可用，尔等不须再奏！”皇上的衣袖呼呼生风，左右的侍从吓得连退几步。

赵需等几个人被皇上的威怒所震慑，想从殿前退下，陈京对他叫道：

“赵需莫退！此乃国之大事，吾等当以死力争！”

此话一出，举朝肃然，一下子静了下来。

德宗听了陈京这话，心里倒也有点感动，觉得自己刚才的举动很失态，便挥挥手道：“好了，尔等退下吧。朕自有分寸。”

四天后，德宗的“分寸”只是任命卢杞为澧州别驾。不过，皇上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朝中总有互相排挤、打击的敌对现象存在，似乎他们谁也容不了谁。一段时间以来，天子有理由认为，朝廷中的相互争讧是国家衰败的症因。德宗有时从刘晏、杨炎、卢杞一直想到眼下的当朝宰相甚至封疆大吏李晟、浑瑊等人，觉得他们一个也不可信。究竟应该任用何人呢？天子困惑日甚。

不久，宰相刘从一有病不能理事，德宗征召远在剑南的张延赏入相。

德宗对张延赏印象不错。天宝以来，由于用兵南蛮以及皇驾屡幸等原因，剑南西川三蜀之地负荷奇重，加之内乱频作，兵革屡扰，把好端端的天府之国弄得衰敝不堪。延赏在建中初年任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观察使，薄赋约事，动遵法度，使得情况大有好转。天子逃难

梁州时，多亏了延赏大量的贡奉才得以维持住局面。对延赏在危急时刻的竭忠尽力，德宗没有忘记。

然而此时驻防凤翔的李晟却大为着急，凭着靖难功臣及“西平郡王”的身份，急急上奏皇上，认为张氏过错甚重，不宜进用。德宗览表不悦，但李晟乃国家重臣，意见难违，于是迁延赏为左仆射。

照理李晟没有必要为这件看起来与己不相干的事情大动肝火，为此，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有人猜测可能是当年李晟赴剑南抗击吐蕃、南诏联军时，曾强取了成都的一位官妓而被延赏派人追回，由此两人交恶。这话很不好听，不过倒也确非空穴来风之论。德宗得知其中就里后，真是无可奈何。

具体问题总是让人不知不觉地实际起来。到这一年的年底，尽管朱滔、李怀光相继败亡，但去年的灾荒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国家的财政又一次步入危机。贞元二年正月，德宗任命崔造、刘滋、齐映为相。三人之中，刘滋端默雅重，齐映谦和言美，均无所是非，政事多决于崔造。

崔造是当年刘晏的亲密战友，刘晏遭杨炎、庾准诬奏伏诛后，崔造也被贬为信州刺史。崔造的入相无疑是治理窘迫财政的需要，他资历虽然不深，但因久居江南，对帝国的漕赋转运有很深的了解。

朱泚之乱平定后，天下户口，三耗其二，京畿与中原之地尤剧，帝国对江淮的依赖逐日为甚，相对来说战乱不多而又较为富庶的江南数道担负着帝国一大半的用度。这一任务主要是由水陆运使、度支使、各地巡院以及江淮转运使完成的，其中最最重要的是江淮转运使，当时担任此一职务的是著名的韩滉。

韩滉在大历、建中年间本与刘晏共同负责天下财务，但因为过于严苛，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被刚即位的新帝德宗罢免。不过，韩滉从此却有了更多的机会苦心经营自己的独立王国，移镇镇海军后，安抚百姓，均其租税，未及一年，境内大治。泾原兵乱后，河汴骚然，李希烈又肆虐淮西，大有窥江之志，韩滉遂闭关锁江，筑城池，修坞壁，扩建水军，守境不出；同时又拆佛寺道观建立馆第数十

处，对外宣称说国家多难，此亦不外乎申儆自守，以备鸾驾之意。但这只能糊弄外人，却没有骗过崔造，他对韩滉的小算盘清楚得很。

岂止如此，崔造对其他各地钱谷诸使诸如此类的擅权自利、欺上罔下行为更是非常反感，所以一到任，便采取了行动。

崔造上奏德宗：天下钱物转运，改由各道、各州选官送达京都，诸道转运使、巡院并江淮转运使诸职皆宜罢停；中央政府的度支、盐铁诸使，亦应改由尚书各司负责。各种具体运作，由政府委派宰臣兼理。

崔造的改革之议颇近似于当初杨炎的做法，不过，杨炎主要是针对刘晏个人的，而崔造此举却是出于对财务弊端的真正厌恶。

德宗很为难。江淮转运使是韩滉，朝廷正仰给其源源而来的漕赋，如何能罢停其责？

韩滉听说此事后立即上奏：司务久行，不可遽改！

皇上只好折中处理。德宗批复中书门下说：仍以韩滉为江淮转运使，余如崔造所条奏。

户部侍郎元琇与崔造关系一向不错，在此事上也是崔造的坚定支持者，见了皇上的敕令自忖：韩滉性格刚烈，眼下职责隆盛，势力日增，长此以往，朝廷恐更难制约。于是上奏道："臣等条议此事以为，江南漕米自江至扬子县凡十八里仍请韩滉主持，扬子以北，由臣负责。如此可两相不误。"

德宗然之。

韩滉这下勃然大怒，上书直指元琇：崔造奏停诸使，独以元琇主持盐铁，盐铁之务过失严重，元氏岂是人选！

德宗明知韩滉是出于不满，但却毫无办法。三月份以来，京中情形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连禁军兵士都公然在大道上叫骂，皇上束手无策。面对元琇的奏议，德宗左右不是，忧虑重重。

天子当然不会忘记泾原兵变的伤痛，他也清楚地知道当前的局势

会带来什么后果。皇上日日在宫中遥望东方的渭桥码头，心里暗暗地祷告。

也是大唐命不该绝。秋日的一天，驻守陕州的陕虢都防御使李泌在黄河中看到了从江淮而来的漕运船队，立即把这一情况快递上京。

德宗览毕已是欣喜若狂，慌不择路地跑进东宫，对太子大喊：“漕米已到陕州了！漕米已到陕州了！……我父子得生矣……”父子竟抱头痛哭。

韩滉的三万斛漕米拯救了天子和帝国，德宗这下更是无话可说。十一月，韩滉来到了京师，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兼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崔造的一切改革尽数停止。韩滉又一封封奏疏指责元琇，德宗无法，只得将元琇罢职，又贬为雷州刺史，并贬崔造为右庶子。崔造又气又怒，一病不起。

元琇无罪遭贬，举朝不平。韩滉恃功倨傲，目空一切，又使朝野人心摇动。刘滋、齐映怕事，敢怒不敢言。袁高再一次挺身而出，抗言上疏，但被韩滉指为朋党之论，未被皇上接受。

幸好第二年的二月，韩滉病故了，总算使大家松了一口气。但麻烦还是不免。

刚刚入相一月的张延赏终于得获其志。此公亦非常注重个人好恶，他对很多人不满，主要有两个人，一位自然是李晟，另一位却是齐映。

严格说来，张延赏可算是齐映的师辈。当年齐映在东都应进士举及博学宏词试时，延赏已是河南尹、东都留守，非常赏识齐映。延赏为李晟所败而迁为左仆射后，心下不甘，经常指使已是宰相的齐映为他办事，或对政事指手画脚，或为亲属谋官，不想齐映却不买账，多不答应。延赏这一怒非小。

此时延赏亦得入相，机会终于来了，贞元三年（公元787年）的正月，齐映便被他排挤出京。之后，延赏的矛头就直指李晟。

其实天子对张、李之嫌十分清楚，自然不愿意国家重臣之间有若

许隔阂。任命延赏之初，正好李晟入朝，皇上便下诏令两人讲和，甚至还命韩滉做些工作。李晟倒是有心讲和，主动提出两家结亲，但延赏仍是拒而不许。

李晟很感慨，对人道：“武人性快，杯酒之间可释旧恶。文士虽修睦于外，往往却是蓄怒于内，实在太难打交道了！”李晟预感到大祸将至，十分担心。

尽管延赏出于私愤经常在皇上面前说李晟不宜久典兵权，但实际上这也未尝不是德宗内心暗有的想法。拥兵大将生事邀功、尾大不掉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皇上不能不多一个心眼。实在的，德宗的日子并不好过，他经常处在惴惴不安的焦虑中，虽然已没有那种冲动的折磨，但时时的疑惧也使得内心很不平静。一半是因为担心，一半也是由于皇上的阅历丰富了，德宗终于下定决心卸去了李晟的兵权。幸好此举没有引起大的波动，这里面李晟的明白事理当然也是原因之一。三月，册拜李晟为太尉、中书令、奉朝请，以优渥的待遇结束了李晟的戎马生涯。

在这段时间内边境情况很不好，浑瑊、马燧以及李泌都在为对付两大劲敌吐蕃、回纥而奔波。本来李晟是吐蕃很畏惧的人物，却不幸被罢兵权，很使得亲者痛仇者快，武官们为此议论纷纷。外敌当前，是战是和，皇上实在拿不定主意。这时延赏也卧病不起，德宗终于说服了李泌出任宰相。

李泌可是三朝老臣了，因为信奉道教并身体力行的缘故，似乎对人世的祸福盛衰深有理解，一向不愿做官。先帝代宗出于对他的钦佩逼着他娶妻还俗，进京入仕，但他还是不肯担任宰相。李泌的心智甚高，对人心世事的揣度十分高明，一直都能独善其身。他的精明还在于对天子的心理能够准确地把握，见机行事，随时应变，在许与不许的夹缝中游刃有余，以求得可能的最佳结果。且不论此中是非如何，这一点确实很难得。

李泌为相两年，此后是董晋、窦参并相，五年间形势尚还比较缓和。其间的贞元二、三年左右，有一位叫王叔文的南方人来到了京城长安。当然，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

从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开始，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

四月，久遭他人排挤的陆贽得以入相，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后才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全力报效的机会，陆贽自然十分珍惜。不过，皇上却越来越消沉，其征兆是非常多疑，事事小心。陆贽在任期间为此屡屡上疏，但除了留下了厚厚一大摞奏稿之外，并未产生太大的效果。

此时，在天下人的心目之中，朝中出了一位大大的奸臣，这种想法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朝野上下人人疾之如仇。要说这位万夫所指的奸佞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卢杞一力提拔的裴延龄，其时他正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使，主持财政事务。

德宗就像当年对卢杞一样，其他人越是反对，他对延龄就越是信任。天子从以往失败中总结的教训是不可尽信于人，尤其是当权宰辅，因此他同时需要有一种互相平衡互相牵制的势力来维持政局。皇上独揽大权、事必躬亲属于前者，而任用宦官主持禁军则无疑是后一种想法的结果。

目的既然不可能无限接近，那么平衡永远就是暂时的、流于表面的。这年的六月份，左神策监军窦文场借故奏罢了另一位神策统将柏良器的职务，开始专权军政，这是第一个重大的变化。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两位年轻人柳宗元、刘禹锡考取了这年的进士。前宰相窦参被诬有谋反意图，远贬赐死。

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二月，陆贽终于被贬离京。谁都知道这是因为裴延龄等奸佞的诬谮诋毁，但朝中大臣出于畏惧，敢怒不敢言。然而有一位怪诞之人可不理这一套，此公姓阳名城，据说是一位无所不通的饱学之士，隐于中条山修行数年，很有隐逸之名。李泌与他十分谈得来，力荐天子征召入京，阳氏坚辞不果之下，被授为谏议大夫。此时阳城闻说陆相被罢，竟率领数名有胆略的谏官去伏阙上书，力言陆贽无罪。此事轰动了朝野。

对现实的叛逆总能引起人们心中的共鸣和隐隐的快意。八十多岁的金吾将军张万福听说后跑到阳城等人立候天子的地方延英门，兴奋地大叫：“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

德宗当然大怒，立即召开御前会议准备严办。太子李诵这时表现出了他因不在其位而具有的先进性，在德宗面前开脱，阳城这才获免，被改任国子司业，国子司业就是帝国最高学府“国学”的副长官。不料阳城在任上不久，又因保护一名以言论得罪的太学生薛约再一次触怒了皇上，被贬为道州刺史。这时候，二百七十名太学生连续几天集体诣阙请愿，希望德宗收回成命，但被官吏借故阻隔，奏疏未能上达帝听。

陆贽的离京可算是贞元中期第二个严重的变故，从此，帝国的朝廷少了一位始终坚持自己理论和信仰的人，皇上身边也少了一位饶舌者。陆贽在忠州别驾的职务上度过了余生，在这近十年当中，他只能杜门谢客，闭关静处，寂寞地编写医书，把自己对国家的一腔忠诚倾注在五十卷的《陆氏集验方》上。陆贽最后的十年也是德宗最后的十年，时光流逝中，皇上还有一种偏激也越来越严重：或许是受财资掣肘的痛苦感受太强烈了，德宗变得十分好财物。于是各地官吏竞贡“羡余”，进奉之风大盛，以至于贿赂公行，量职求直，政风日趋败坏。

贞元十九年癸未，即公元803年，德宗六十二岁。这一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只是京畿一带从正月到七月一连六个月没有下雨，收成很不好。在人事方面，三月，淮南节度使杜佑再度入朝，被任命为相。杜佑是刘晏之后一位出色的掌记治民专家，亦颇有富国安邦之术，可惜的是生不逢时，所能做的也只是修葺补正而已。司农卿李实出任都城长官京兆尹，为政暴戾，却独受皇上宠爱，士大夫为之侧目。窦文场致仕退休后，本年六月，内给事孙荣义、杨志廉分任神策左、右军中尉，骄纵招权，势力益盛。此外，地方上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叛乱。

一切虽然很平静，但朝野内外的沉重气氛还是让人惴惴不安。其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尤使朝廷百官们感到异常困惑。有一位叫张正一的大臣给德宗上了一本，不知何故，被皇上单独召见了一次。这本来很平常，大家根本都不以为意。不料，几天后张正一和与他相处不错的吏部员外郎王仲舒、主客员外郎刘伯刍等人突然被贬。人们莫名其妙，不知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京城中谣言四起，猜测纷

纷，然而人人都不敢明说。

九世纪的帷幕已经拉开，帝国未来的岁月向何处去？

第一章

王叔文：乾坤一局棋

本期济仁义，今为众所嗤。灭名竟不试，世人安可支。

——柳宗元

以棋待诏，攀上太子

一位精于棋术者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得以把自己对天下的关心和辅助王政的信念，付诸实施。人生如棋。

王叔文正举棋不定。

棋枰上燕起鹤落，黑白两块大棋交织在一起，呈盘根错节状，从边隅一直漫布至中腹广阔之地。列阵双方短兵相接，终成水火之势：在断点处扩展开来的黑白子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大劫，生死之搏，在此一举。

叔文并非是对棋局感到茫然才迟迟不落子。其实他看得很清楚，这一劫他已是稳操胜算：纵观棋局，他的白子气长势强，而黑棋却明显是愤而不顾，侵地无方，由于过分强硬不防谋断而终于被白棋抓住了机会，一举切断。棋由断处生，在彼厚此薄的情况下，黑棋的弊端已暴露无遗。

但此时此刻，叔文却是身在局内，心在棋外。在他看来，纹枰上的方目直道与星星点点简直就是一张覆罩一切的无形巨网，正在他的手中跃跃待出。然而，是张置疏远，多得道而为胜，还是务相遮绝，要以争便求利，叔文能让棋局唯心任运，却常常感到在如棋的人生搏斗中还是势单力薄。他可以打胜这个生死劫，但不能改变自己的劣势。叔文此时真可谓是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他拈起一粒白子，但这一子似有千钧之重，如何落得下去！

叔文是当之无愧的大国手。他大半生浸淫此道，凭着弈棋擅国而升堂登殿，以棋待诏，入为太子侍读。弈之一道教给他的东西太多了，围奁象天，方局法地，黑白分阴阳，直道神明德，成败臧否，行之在人；方寸之间的云诡波谲，天道王政似可尽譬于斯。“器用有常，施设无祈，因敌为资，应时屈伸，续之不复，变化日新”，这是弈之旨，也是治国之道。叔文对此深信不疑。

叔文是南方越州人。早从肃宗时开始，南方就已是中央财政的半壁江山，时至今日，北方州县贡赋不入的现实决定了朝廷只能加重对南方的搜括。竭泽而渔虽是出于无奈，但带来的后果却相当严重，南方与北方中央的离心力越来越大，一大批出自南方的新兴人士怀着对民间疾苦的强烈关心和改善政治的理想来到长安，叔文也是其中之一。

后来成为叔文坚定同志者之一的南方人刘禹锡曾写了几句诗，颇能反映这一情形：

弱冠游咸京，上书金马外；

结交当时贤，驰声溢四塞。

献策天子，考取进士，这是本朝有志之士实现抱负的必由之路。本朝每年皆要举行选拔人才的考试，所谓“岁举之常选”，而进士一科尤为人所重，进士及第即为日后再通过吏部取士科试而授官铺平了道路。刘禹锡和另一位后来也成为王党中坚分子的柳宗元就是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的同榜进士。

不过，叔文却没有能力去博取功名，因为他似乎不算是个士子，无法进入进士试。如果不是凭着对黑白子的极高造诣，他至今恐怕还只是一介布衣。幸好，本朝特重天下奇才，凡天子所在之处，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艺术、书弈者流，设“翰林院”廪之，日晚而退，有待天子召见。进入翰林院可谓是他人生上的重大转机，但叔文与当时权任日重而被人视为“内相”的翰林学士不同，他其实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待诏”。叔文“以棋待诏”，当然是无足轻重的。但是，能和天子接近，注定了才智独到、志向宏远的叔文不会永远默默无闻而终老于白瑶黑玉之间。终于，酷好道术的德宗看上了他的棋艺精湛、理道深妙，命他入值东宫。尽管叔文并未成为真正的太子侍读，也没有其他什么实际官职，甚至连东宫官属也算不上，然而，陪伴太子给了叔文机会，开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王叔文志存高远。

窥一斑可知全豹。一般的寒门人士有所希进，总要拟托高门。入

值禁中，侍君之侧，尤不得不然。王姓者所假托，不外乎太原王氏或琅琊王氏之类，而王叔文却自称是北海王猛之后。王猛，苻秦时的英雄人物，少贫贱，然苻氏一见若平生，遂语及兴废，可比于刘玄德之遇诸葛孔明。王猛虽起于草莽，却终成苻秦尚书，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拨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仕，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终佐前秦成就霸业。王叔文托意于此，其志向所寄，昭然若揭。

在众多的侍读中，叔文鹤立鸡群，甚至成为太子不是导师的导师。其中原因，固然是由于他的诚挚理想和强烈斗志感染了太子，但更多的是他的智谋使太子深为叹服。

太子就是明天的皇帝，叔文把自己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太子身上，他经常向太子诉说民间疾苦，给太子教导王道的真谛，默默地倾注着全部感情。但世事并非都是注定的，本朝皇储地位不稳颇有先例可鉴，叔文知道明天尚未到来，必须小心谨慎。有一件事终于使太子与他彻底地走到了一起。

那是有一次太子与侍读们闲聊，谈起了“宫市”之事，话匣子打开，叔文与众人都对此愤愤不平。

由专门官吏主持、宫中购外间物以为用度，本是极普通的，称之“宫市”却是近年来的事。原来，大约是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左右，此事改由宦官为之，结果宦官凭着皇宫中人的身份，藉宫市之名掠夺百姓财物，手法近似于强盗所为，成为长安城中的一大害民虐政。有识之士群起反对，但德宗却宁愿相信宦官们的话。以为京师不少市民仰宫市取给，所以凡言宫市不善者，皆不听从。对此，伴读们在太子面前议论纷纷。

太子听后颇为冲动：“尔等论之颇切，寡人正要为皇上极言此事之害！”

众人欢呼，称赞起太子之德。王叔文却突然沉默，闭口不言，显得十分突出。太子看在眼里，待众侍读退下后，独留叔文说话。

“方才独有先生不语，难道有深意以告寡人的吗？”

叔文满腔诚恳：

“叔文蒙太子殿下爱幸，有所识见敢不尽言！殿下请自忖，太子之位应以何为重？”

“哦？”太子不知他何出此问，“倒要请教。”

“太子职当视膳问安，以侍奉皇帝陛下为主，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若疑太子收买人心，殿下何以自解？”

太子大惊，吓出一身冷汗。他望着这位忠心耿耿的师傅，又不禁涕泗俱下：

“若不是先生，寡人何以知此！”

太子从此明白，这位王叔文是真正和他站在一起的同志，正忠诚地为自己走进明天的辉煌殿堂而殚精竭虑。太子不能不大为感动。

其实，叔文也许比太子更为急切，但他也深深地知道，政治亦同于弈棋：知其用而得其处者胜，不知其用而置非其处者败。太子尚不是天子，绝不可置非其处，否则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太子在叔文眼里是一着无上的大棋，他要凭着这步棋改变自己微不足道的实力。但太子若不能成为天子，那就是前功尽弃，叔文绝不能让这招大棋永远锥处囊中。

斜阳入户，在纹枰上投上一抹光辉。叔文有种预感，这一天就快要到了，无论眼前的困难有如何的严重，他也不能半途而废。

叔文把那粒已经捏出汗水的棋子重重拍下。这一天是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的正月二十日，德宗皇帝已病重了整整二十天。

坐在叔文对面的太子李诵已不能说话。

严重的中风使太子的身体彻底垮了。屈指算来，从前年九月至今，太子缠绵病榻将近一年有半。这场病生得凶猛，一下子就使他丧失了言语功能，同时，也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可以说是风中残烛，一点星亮正摇摇欲尽。

垂老的德宗万分忧虑。要知道，储位维系着天下的安危和帝国的未来，绝不能允许有半点的差池。太子的孱弱不是一个好兆头，倘若自己一旦不测，后果必将十分严重。

德宗有时真弄不清自己究竟是否喜欢这位长子，也很难说就没有生过改嗣的念头，至少在十数年前，因为郜国公主奸乱之事，皇上对太子就曾经很不满，颇有废立的意思。

郜国公主在辈份上是德宗的姑妈，婚姻很不幸，先是下嫁裴徽，裴徽早死；后又嫁萧升，不料萧升又短命亡故。可能是因为人生的波折而心灰意冷，公主变得十分放荡，贞元三年（公元787年），蜀州别驾萧鼎、商州丰阳令韦恪、前彭州司马李万以及太子詹事李升等好几个低级官僚经常出入公主宅第，弄得秽声流闻，德宗大为气愤。

本朝立国关陇，受胡人风气影响颇大，礼法之防倒也不甚严峻。不过，对如此败坏风教、有伤皇室尊严之事，却也不能姑息。皇上生气是必然的，处理也很重：郜国公主被幽禁，李万杖杀，萧鼎、韦恪各杖四十，流放岭外，李升贬岭南。两年后，公主因不满于幽闭，竟用蛊术诅咒皇上，事发被废。巧的是，公主的女儿萧氏正是太子之妃，德宗多心，便连带怀疑起太子，当着老臣李泌的面，严厉责问太子是否与此事有关。太子吓得不知所对。

太子惶恐退下，皇上内心里突然浮现出一种想法——是不是舒王更为贤德一些？

舒王李谊是代宗第三子李邈的儿子，朝廷百官都知道，德宗对这位爱弟之子十分喜欢。

李泌是何等人物，察言观色，立即就看出了皇上的心意。皇储乃国运所系，每一个受过传统教育的人都明白这是万万不可轻事废立的，古往今来，天子改嗣之举虽然不乏其例，但无一不以动乱的恶果结束。史臣们的笔下经常暗示说：依照前事，天子有此一心，大都出自后宫或者藩王；皇帝对某个女人和某位皇子的宠幸常常导致太子的废立，忠直之士绝不能媚从。

作为一个元老，李泌更是义不容辞。这下他一反过去的那种雍容

规劝的做法，把皇上的不良用意一语道破：

“陛下惟有一子而疑之，难道想立弟之子？”朝中都了解太子是皇上的嫡长子。

皇上没想到心事一下就被看出，勃然大怒：“卿如何敢离间朕父子谁说舒王不是朕的儿子？”德宗因怜爱幼弟昭靖太子，曾过继舒王为己子，所以有此一说。

李泌心下倒有点好笑，心想皇上取昭靖之子为子，早已不是秘密，天子这话近乎强项了，但又不好明说，便道：

“陛下以前曾经对臣说过。”

“……”德宗哪里还记得，一时语塞。

“陛下对嫡子都这样怀疑，对弟之子就敢说信任吗？”

德宗这下更是恼火：“卿牾逆朕意，不怕灭族？”

“臣垂垂老矣，况位居宰相，以谏而诛，乃臣之本分，又何惧之有！今日臣不谏而使太子废，它日陛下一旦后悔，怪臣之不谏，说不定也要杀臣之子。”说到此，李泌不禁流涕呜咽起来，“昔日太宗曾说过，太子不道而藩王窥伺其位，可两废之。陛下疑东宫而称舒王，岂非窥伺！即使太子有罪，也应立皇孙，千秋万岁之后，天下犹为陛下子孙所有也。”

此话终于打动了德宗，改立之事就此过去了。不过太子却是受惊不小，为此还杀掉了萧妃，对外宣称是因病消灾，其实不外乎是怕皇上疑心。李泌对太子派来致谢的人说：

“眼下太子尽可放心。不过，泌一旦身亡，事情就很难说了！”

太子听后默然不语。

时光流逝，德宗皇帝沉溺于饮酒赋诗，倒也没有再把皇储之事放在心上。但太子身染重病，却给了皇上一个重大的打击。

二十天前的元旦德宗罹病不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一忧虑所致。当天早上，德宗在含元殿接受朝贺后退入偏殿，诸王及皇室宗亲

皆入问候，独有太子以重病不能前来。皇上心情大恶，悲从中来，竟然不能控制，当着大家的面涕泣感叹不已。此后龙体即告不适，病情日甚一日。

二十天来，朝廷的一切运作近于瘫痪，朝野上下忧心忡忡。天子病重倒也罢了，关键是太子竟也不知存亡，那么多天消息一直不通，人们皆不知两宫安否，长安城中人心浮动。

太子尽管不能说话，但脑子却还清楚。他看着师傅王叔文在榻前焦急的表情，听着他在自己耳边的一遍遍恳告，心中很明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也清楚，现在迫切需要他站起来赶到父亲的床前去，让皇上和宰臣们知道他有能力继承大统，立即发布太子监国的诏书，使天下臣民打消疑虑。但是，宫中却没有任何消息，似乎早已忘记了太子的存在。他虽然没有力气拍案而起，但太子坚信，他还是有能力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的。“可是……”情急之下，他只有握着师傅的手，发出呢喃不清的唔唔声。

叔文刚从宅第中赶来，在家里他每天都与他的同盟者沟通信息，商量对策。关键时刻，叔文苦心孤诣建造的同盟军开始发挥了重要作用。先是他的主要同志，亦曾以翰林待诏侍读太子的王伾奉召入宫，成功地联系了同情太子的宦官李正言称诏行事，同时广泛地在皇帝内侍中为叔文张扬，使得众多大权在握的近臣开始注意到朝中还有一位王叔文是辅弼之才。在这紧要回合，王伾入宫无疑是很大的成功，至少可以充分洞悉事态的发展。

不幸的是，坏消息终于来了，现在的情况是，德宗大渐，诸王亲戚皆得入侍汤药，独不传召太子，可见一种另谋立嗣的企图又明显抬头。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由于太子病重而引起的，但这对于叔文来说，不啻于晴空霹雳。叔文心里清楚，自己与太子以往预谋对付宦官的计划有可能透露了风声。他的机智告诉他，宫中正酝酿着阴谋，必须立即阻止，否则的话，几年的心血必然付诸东流。

叔文习惯之下，默默地在太子的榻前摆上棋枰，他要平静一下紧张的心情，更希望失音的太子能用手谈告诉他心中的想法，正如他们以往那样，在黑白之道中追求一种真正的交流。

“拙者无功，弱者先亡”，叔文望着他重重拍下的那一粒白棋，自言自语地说道。他知道太子与自己这一方不占优势，但并非就不能成功，他真希望太子能够听懂这句话的深切含义。

成败系乎一线

病重的太子终于出现在太极殿上，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胜利。

凄凉的夜色渐渐笼罩了大明宫，寝殿里烛光绰绰，帷帘深垂，凝重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就在此时，德宗皇帝已经不行了。

尚药局的四位侍御医都已束手无策，皇上是年老体弱，内忧攻心，加之外感风寒，于是诸疾并作。目下脉相细弱，面无血色，眼见不治。近臣以俱文珍为长，刘光琦、薛盈珍等人依次在榻前垂手而立，默默地看着弥留的皇上，室内一片肃穆。

德宗在最后的时刻，有所回光返照，突然挣扎着身体，呻吟起来，口中喃喃而语。近臣急急趋前，俯耳倾听，但德宗声音微弱，气息如丝，实在无法辨别。

宦官们面面相觑，最后，不免都一起看着俱文珍。

俱文珍算是目前的近侍之首，曾出监宣武军，自窦文场、霍仙鸣相继退休、亡故后，宫中事务皆由文珍主持。此际情况更是非同寻常，其他人自然只能依靠着他主持大局。可是俱文珍同样也拿不定主意，尽管他在内心里对目前态势的根本性质是一清二楚的。

德宗还有没能交待的事情，因此他显然不愿罢休，仍然在拼命地说出一些话来。终于，榻前内侍们听清了皇上的话，天子用最后的精神、最后的力量表达了一个最后的愿望：思见太子！

这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德宗的这个愿望已经不可能得到满足。太子有疾不克前来并非主要原因，真正的缘由是：太子的身体

既然不能承受嗣膺大宝的重责，就有理由发生改立之事；而既然存在废立的可能，那么目前的太子就不具备以嗣君接受遗命的资格。换句话说，皇上尚未大行，宫中的改立意图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在这种情况下，德宗又如何能够见到太子！

无论如何，擅行改嗣都是对传统制度与伦理的严重挑战，更是欺君的大逆之罪，任何人都不能不有所顾忌。但是宦官与天子同体共生、荣辱与共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始终热衷于操纵废立。眼下的情况，绝好的例子。

德宗也许绝没有想到内侍竟可以不听圣意，可是他再也没有力气说话了，略略抬起的头颅重重垂落枕上，两行热泪潸然而下。室内又恢复了死一般的沉寂。

俱文珍沉思片刻，终于下定了决心：“为国家千秋万岁计，也只能如此了。”他看其他人不说话，又道：“太子殿下虽然仁孝宽大，但沉疴在身，早晚不保。国不可一日无君，吾等身为人臣，岂能坐视不顾？这改嗣之事，不议不行！”

决策已定。在座的宦官们虽然犹豫，但想到那位从来对太监不假颜色的东宫太子一旦入主皇宫可能发生的事，只有铤而走险了。

夜半时分，紫微突暗，天一失明，德宗皇帝龙驭上宾。他的最后遭遇令人同情，按照他的性格与行事作为来看，这位天子绝对是死不瞑目。

毫无疑问，太子的资格发生疑问，嗣皇帝就不算确立，宫中目前是绝对不会发丧的。

第二天上午，最年长的亲王、皇叔召王李偲秘密地进入宫中。俟其瞻仰遗容后退入偏室，薛盈珍过来见礼，直言宗庙可忧。

个中情形，召王也略知一二，他所不知道的只是宦官们眼下早已自有分寸。

既然皇叔已默认储位问题现实存在，盈珍就单刀直入，看着他低声说道：“殿下以为舒王如何？”

召王没想到竟要改嗣，大为踌躇，不敢表态。

“禁中也无非是为宗室社稷考虑。”薛盈珍见他犹豫，又补上一句。

“可是——”召王对舒王、太子两位并无亲疏之分，但想到事关宗庙大计，哪里还敢说话。

同时，舒王李谊被传入禁中议事，和诸宦官秘密地商议了许久。看得出来，接下来的事就是寻求诸王的支持了。于是德宗其他诸子通王李谌、虔王李谅，以及较年长一辈的丹王、恩王、简王、忻王等也在下午进入宫中。但事情重大，没有一个敢明确态度。

帝国在政治真空中度过了第一天。

第二天情形照旧。宫墙之外，除了几位王公，没有人知道天子已经驾崩，宫中正酝酿着重大的行动。消息被严格地封锁，甚至连当朝宰相们也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朝野上下被一种不祥的阴云笼罩着。

不过，有一个人例外，这就是王伾。

王伾也是南方人。故乡水土给他的烙印更重，来到京城已经好几年了，却还操着吴语，让人一看就知道他身世微贱。加之他短小的身材、平庸的长相，朝中的大族名士对他很是不屑。王伾自己也很清楚，像他这样的人，是颇难在朝廷立足的。幸好，王伾结交了王叔文，给他的政治生命带来了光明的前景。

王伾自然不如叔文那样富于胆识和才学，但二人的寒微出身却十分相同。与叔文以棋待诏相似，他之所以入侍太子，是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太子殿下多才多艺，对书法也有着一种强烈的爱好，因此对这位书法老师礼遇有加。在王伾的悉心教导下，太子的隶书技艺突飞猛进，德宗很赞赏，经常命太子书写自己的作品。王伾性格、为人也与叔文有较大的不同：和叔文的任气自许相比，王伾多少显得有些浅薄委琐。于是在这位老师面前，太子便不像在叔文面前那样拘谨。数年来，王伾从翰林侍书待诏累迁正议大夫、殿中丞并兼皇太子侍书。

但王叔文的才干决定了只有他才是太子最主要的谋臣，叔文既为太子所仰仗，更为王伾所需要。二王倦勤归来，常常聚在一起煮酒论事，叔文的话虽不多，但每每给王伾以强烈的感受，他不仅从太子那里，同时直接地在叔文本人面前得出了一个结论：与王叔文站在一起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德宗大渐，王伾由于兼带殿中丞一职的缘故，得以入宫参与医药之事，并且打通了支持太子的宦官李忠言的关节，使王叔文进入了大明宫中翰林学士院。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正是因为这一契机，使得王伾知道了德宗大行和禁中秘不发丧的消息。

这天下午，王伾一骑快马，直驰叔文府第。

叔文听罢沉吟不语。尽管不出预料，但他内心还是受惊不小。叔文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让它形于面色，他反复告诫自己：千万要冷静！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宫中下一步会如何行事？

王伾认为：一二日之内，必会传召宰臣禁中议事。

这个分析非常准确。王伾显然已经知道站在己方的大宦官之一的李忠言明确表示了对改嗣的反对，因此在诸王亲戚均未表态，内部意见亦有不一的情况下，宫中主谋者寻求更广泛的支持，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叔文猛省：成败系乎一线！于是叔文立即召集他的同盟者进行会商。

凌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

他是叔文的半个同乡和十几年的故交，数天前刚由浙东节度使判官入为翰林学士。凌准早年上书宰相，被荐于朝廷，授崇文馆校书郎，入仕后一直在宁节度府中任职，泾师之变时为韩游瑰出谋划策，破贼平乱立有大功。凌准富于史识与哲思，对国家现实很有自己的见解，叔文对这位老友极为赞赏。眼下，凌准入居翰林而进入朝廷的中枢阶层，在这个严峻时刻，他第一个在道义上给了叔文以绝大的鼓励与支持。

凌准义正辞严地指出："国有大丧而不宣，有储君而不立，一不可也；窥伺冢宰，摇动宗庙，二不可也；藐视国体，背违伦常，三不可也；隔离中外，扰疑人心，四不可也；危难猝生，坐而不顾，五不可也……"同时，明确地表示自己将在异日的朝会中对中人操纵国是的不良企图，予以坚决的反击。

柳宗元、刘禹锡的态度都与凌准不谋而合。在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面前，王叔文没有理由不感到斗志倍增。最后，叔文进行了具体的安排：凌准速与诸翰林通报消息，力争入阙；王伾翌日入宫为之响应；柳、刘可居外采听，以备不测。

诸人再一次领略了叔文非凡的应变能力，以肃然的静默表示了对他果敢决断的赞同。

又是一天过去，宫中的密谋仍然没有结果。宦官们感到再也不能就这么拖下去了，通知朝官已不可避免。他们当然也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能在朝官那里获得支持，哪怕是默许也行。

德宗驾崩后第三天的傍晚，几个小黄门分别引来了几位翰林学士，他们是郑、卫次公、凌准、李程、张聿、王涯。

在宫中设立翰林学士院是玄宗朝的事，当时的职务还主要是草拟表疏批答，检视王言，以备顾问。德宗时，翰林学士权任加重，得以参掌机密，特别是近几年，翰林学士甚至常被目为"内相"，举凡大诰令、大废置，以及宰臣之密划、内外之密奏，皇上莫不与翰林学士专受专对，他人无得参与，以至宰相有时倒成为摆设。

宦官们力图从翰林学士那里寻求突破口，绝非偶然。

王伾在太极殿前与匆匆而来的学士们会合。卫次公走在前面，正莫名其妙时，王伾即已跨上一步，拉着次公的手，拽过一旁，悄声说了几句。

次公一脸惊异，转过头对紧接而来的郑等道：

"诸位大人，皇上仙升了！请随我入殿举哀！"

几位翰林都很震惊，一时手足无措，跟着次公和迎上来的两名太

监跌跌撞撞地走进殿内，朝着德宗的神柩，齐齐跪下。

几许悲哀、疑惑之绪在各人的心头掠过。

礼毕退下。俱文珍、薛盈珍率几位宦官在偏殿接着，郑按捺不住：

“遗诏何在？如何不见举哀发丧？”

一位宦官口快，大大咧咧地：“禁中商量所立，尚未决定。”

卫次公一听大惊，心想这叫什么话！太子二十几年前就已确立，天下谁人不知！即使病重，也还健在，如何还要商量所立！还未等其他人反应过来，次公脱口而言：

“皇太子虽然有疾，然位居冢嫡，内外系心，‘商量所立’云云从何说起？”

俱文珍缓缓而道：“太子殿下疾甚，恐有不虞，以是内中议立未定——”

次公打断了他的话：“必不得已，也有皇孙广陵王在，立嗣之事顺理成章，何虞之有！”次公亦何尝不清楚宦官们的如意算盘，又补充道：“若有异图，祸乱未已！”

这是有关国体的大事，明达圣理、饱受皇恩的卫次公此时丝毫没有考虑其他，只是无法容忍这种离经叛道之事发生。这无疑也是郑等人的想法，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个人的好恶恩怨是无足轻重的。

凌准和王伾很欣慰。凌准借机趁热打铁，大声说道：“请中使会同诸学士立即拟发遗诏，并于明日发丧，请太子柩前即位，主持大事。”

郑等人立即随声附和。

几位宦官哑口无言。俱文珍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明日发丧，迎太子即皇帝位！”

说这话的时候，俱文珍嘴角闪过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冷笑：太子殿下还能走得动吗？

确实，即将成为皇帝的太子还有一段路要走。

这段路不长，严格算起来不过千步——从东宫寝殿到九仙门——但即使有步辇可乘，这段路在太子看来也无疑等于漫漫长征，因为太子实在是连站立都很困难了。

但时势逼着太子必须振作，否则后果仍无法预料。

当一旦大行发丧，百官素服麻衣依次走入皇宫的时候，如果见不到扶柩的太子，人们当然会怀疑起嗣君是否健在，国统是否有继。这种疑惧绝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谁都知道太子病重已非一日，二十多天的空白给人的压力太重了。

最要命的是禁军已经骚然。驻扎在大明宫两侧九仙门、太和门外的左右神策军担负着护卫天子的重责，他们迫切希望知道烟雾重重的禁宫真相，也有理由见一见他们的君王，不然，在这样一个外患不息的多事之秋，士兵们又何来报效国家的勇气呢！强大的神策两军首领孙荣义、杨志廉都是宦官，担任此职已有数年，权势甚大，禁军将士们聚集在九仙门外喧闹，他们在其中显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太子毕竟毅力非凡，他用意志战胜了病魔。当王伾赶回东宫告诉他皇上驾崩，目下内外忧疑，迫切需要他召见诸军使时，“呼”，太子一下就站起来了。

王伾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喜极而泣。

太子匆匆换上紫衣麻鞋，连帽子都不及戴正，便在宫侍的搀扶下一步一步地走出殿外，坐上步辇，又走出了九仙门。当太子远远地出现时，一片欢呼之声似乎响彻了整个长安城。

第二天，太子身着丧服在宣政殿接见文武百官，宣布先帝遗诏。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二十六日，太子在太极殿即位，终于成为合法的皇帝，后来的庙号为“顺宗”。殿上卫士还不相信重病的太子真的无事，都在引颈遥望，当太子久违的身形出现时，一切以往的疑虑都烟消云散了，“是真太子！”卫士们热泪纵横。

当政治铁幕一旦拉开，人们摆脱惴惴之情后的那种喜悦往往就像

决闸之水，一发而不可收止。病中的新帝也为之欢欣鼓舞。

然而，新帝的身体显然是不适合激动的，兴奋加重了病情，他已是极度的虚弱。但无论如何，新一代天子诞生了，帝国的历史又将翻开沉重的一页。

一股新的力量走上政治的前台

一个太子党团走上了政治前台。

王叔文重重地吁出了一口长气。

来到太子身边十八年了。十八年的满腔热忱、十八年的处心积虑、十八年的兼收并蓄，今天终于看到了结果，兴奋之余，叔文更多的是感慨万端。

弈者以不露机为藏行。叔文内心亦常常把人生比作三尺棋局，他从未对人夸言过太子的信任。走到太子身边仅仅也只是一个机会，但机会并不等于成功。成功需要的是“势”，而叔文清楚地知道“势”之积渐绝非一人之力就能达到的，正如他清楚地知道棋枰上的每一子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一样，同气则相生，断连则共亡。以自己的身世地位，空有抱负是无济于事的，在劣势面前绝不能用强，只有结托依恃，培植羽翼，一点一点作准备。尽管为了保住太子这步棋筋不得不暗发机杼，但在过去的漫漫岁月里，叔文所能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造就这种实现他报国之志的“势力”。

新帝登基了，但这只是叔文初步成功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叔文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同志，从而凝结成了一种力量。“吾道不孤”是一种无法比拟的幸福，每念及此，叔文心中就会油然而生出无比的欣慰。

到目前为止，朝廷百官们还不知道叔文的身边早已集聚了一大批人，他们甚至对叔文本人也不甚清楚，只知道他不过是太子身边许多侍臣之一而已。不过，有些敏感的朝臣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到，御史台

有两位年轻人很不寻常。

这一年监察御史刘禹锡三十四岁，监察御史里行柳宗元三十三岁。

御史台是帝国中央政府的监察机关，设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及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侍御史以下又称“三院御史”，分主下属机构台院、殿院和察院，监察御史为三院御史最下一级，主要职责是纠举官吏过失，巡按监视州县。虽然品位不高，职任却很重，属于可以分日朝参皇帝的“供奉官”。“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常由资历不高或新进者担任。当时朝官们中流行这样一种称呼，称监察御史为“合口椒”，监察御史里行为“开口椒”，取其出言甚“毒”之意，俏皮之中大有点无可奈何的味道。

年轻人气盛，初露头角而显得意气昂扬、锋芒毕露是很自然的事，不过，刘、柳这两位年轻朝官确实大不一般。

禹锡字梦得，行二十八；宗元字子厚，行八，是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的同榜进士。两人才华横溢，都是横空出世的人物，他们不仅意气相投，在文学、哲学旨趣，甚至在性格上亦无不契合，后来的经历证明了二人确实是毕生忠诚不二的朋友。

宗元早就知道了王叔文，那大约是在他人京赴试后的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宗元在邠州省亲时，认识了与其父同在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幕中任职的凌准。

二人一见如故，谈了很多事。让宗元感兴趣的是，凌准多次提到了一位叫王叔文的人。柳宗元当时所不解的是：这位王叔文不过是东宫一侍臣而已，何值凌准如此垂意？

直到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间，宗元赴京参加吏部考试，出于叔文的老友，同时也是宗元的中表亲吕温的介绍，方才真正结交了叔文。虽然那时二人尚未及深谈，但叔文坚明直亮的性格和文武经略之才一下子就征服了宗元。两年后，宗元再试吏部试被录取，授为“集贤殿书院正字”一职，开始正式踏入仕途。此时，叔文的另一位老友李景俭也结交了这位才大志高的同辈，彼此惺惺相惜，走到了一

起。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宗元任满，调为京兆府蓝田县尉，刘禹锡也从淮南节度幕府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得以重回长安，由柳、吕、李的介绍秘密地结识了尚在东宫的王叔文。

禹锡对叔文更是叹赏。此时贞元朝政的种种弊端已大大显露，几人经常悄悄相聚，放言时事，座中，禹锡对叔文精辟的治理和辩才惊奇不已。

柳、刘二人此际虽任职京畿郊县的簿尉，但有很多时间在长安度过，两人初入官场，难免不谙世故，加之学识超人，热情高昂，更显得踔厉风发。柳、刘声誉鹊起，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尤得到朝中一位同样富有才名的年轻朝官、两朝老臣太常卿杜黄裳的女婿、前翰林学士、时任吏部郎中韦执谊的一力拔奖。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闰十月，柳、刘二人同时擢升御史台。

从这时起，他们开始有意识地结成同盟。在这一名单上，尚有禹锡的中表兄韩泰、当年淮南重臣故相韩滉之侄韩晔、刘晏的老部下陈谏、同是监察御史的程异，另外还有一位就是柳、凌、李、韩都曾执弟子礼的春秋学者陆贽。数年间，他们的一切活动显然带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由于叔文的谨慎，这一切仍未被人们所觉察。

在叔文来说，这些朋友是同志，更是自己的希望。

顺宗即位的当天，就单独召见了王叔文，非正式地命他入直翰林学士院，这也是计划中的事。同时王伾也禀承帝命入居柿林院，那是离皇帝寝殿十分靠近的地方，二人进入了实际上的中枢要地。下一步就是要开始安排人事了。

叔文对此早已成竹在胸。

首先是宰相人选。叔文本人当然是绝对不行的，他也从来没有想过以自己这种侍臣身份去充任宰辅。叔文一直很清楚，他只能永远处于幕后，这是他的不幸，但也未尝不是他的一个有利之处，因为在政治上要取得成功，就不能把一切都暴露出去，真正的决策者也是绝对不可以在大庭广众下露面的。叔文的意思本来是想用刘禹锡，为此还作了不少准备，前年在东宫与太子商议时就初步定下了。可后来事情

有了变化，叔文转而把韦执谊推到了前台。

禹锡资历太浅是主要原因，但韦执谊主动投靠却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韦执谊倒是关陇人，不过其父做的官并不大，他的出身至多算是没落旧族。执谊自幼聪俊有才，年纪轻轻就中了进士，吏部考试也成绩优秀，官拜翰林时仅仅二十出头。德宗对这位才子很是宠爱，经常与他唱和诗歌，并时时召他和裴延龄等人入宫顾问。执谊少年得意，多少是他俯仰圣意的结果。无论怎么说，年轻人善于钻营都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从这一点上看，韦执谊绝对不是叔文一类的人。

执谊尽管年轻，也还算得上是朝中阅历颇深之臣，照理他不会去加入叔文那批资浅官轻的集团。但执谊却仍然和叔文和王伾等人挽起了手，这仅仅是因为太子的一句话。

有一次德宗生日，太子献了一幅佛像，皇上遂命执谊作了一篇佛像赞，文成之后，又命太子以缣帛酬之。按照礼制，执谊应去太子处言谢。于是他专程赴东宫谒见，不料礼毕之后，太子和执谊双方都觉得无话可说，场面一下子变得很尴尬。

也不知太子是有意还是无意，忽然对执谊说道：“学士知道王叔文否？此人是一个大大的伟才！”

执谊回到家中一连几天都在回味太子这句没头没脑的话的用意。思考的结果是：王叔文肯定是未来天子身边的要人！太子殿下的话显然是对自己有所期望的一种暗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执谊为自己的聪明再一次拍案称绝。

执谊从此就经常往叔文那里走动。不久，他因母丧去职了一段时间，更有了与王叔文往来谈论的机会，渐渐地也接触了其他的王党成员。叔文对这位年轻的重臣也日渐地有了好感，开始对他寄予厚望。

去年张正一被贬，人们因不知就里而有很多猜测，而叔文却知道这是执谊做的手脚，他虽然对这种过激行动很不以为然，但有时也觉得执谊确实和自己一方达成了很强烈的共识。叔文认为，韦执谊之所以这样疑神疑鬼，至少是因为他已经自觉地把他本人和己方这个秘密

的革新集团联系在一起了。叔文知道其他同志中很难找到一下子可以出任宰相的人，只有执谊是最合适的人选。叔文在这上面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恶果不久就看出来了。

天子已入居禁宫，叔文的身份已经不再是东宫侍读，自然也就不能像早先一样自由地谒见顺宗。但王伾却仍然有着这样的便利，这多多少少让叔文感到欣慰。在内廷方面，宦官李忠言是拥立太子继位的坚定派，顺宗的宠妃牛昭容也可以利用，叔文是很放心的。只要宰臣是自己人，事情就不难办，叔文已经在考虑下一步的策略。

叔文当然不会像汲汲钻营的小人那样只关心新帝御极以后的封官赏爵，他还有着大事要办。此时此刻叔文其实最关心的是另外两方面，一是财政，二是军事。这是他立志兴国的着眼点所在，为了将来顺利其事，在这两方面的人事安排上就必须格外的周密谨慎。

财政方面起用杜佑，这是叔文与禹锡的共同想法，没有异议。再辅之以这方面的干才韩晔、陈谏，是最佳组合，叔文本人也极欲从此处人手，建立基础。唯一无法措手的是军队方面，因为这是最关键也是最麻烦的。目前，中央禁军的领导权全由宦官垄断，地方藩镇暂时也找不到恰当的支持者，在这个环节上只能见机行事。

在王叔文集团里的人看来，柳、刘二人虽然暂时不能入居高位，但两人所能起到的作用仍是相当可观的。叔文的意思是他们不仅要密切地注意朝臣的动向，为今后的改革做实际的工作，而且还须在理论上继续为即将全面铺开的新政鸣锣开道。

人事安排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有一点叔文和其他人还是没有想到：他们中的不少人特别是柳宗元和刘禹锡锋芒太劲了！正如财物上的暴发一样，新进得势必然会引起大多数人的怨望，在讲究资历与出身的时代，这一问题的后果无疑将是灾难性的。

登基典礼结束的第二天晚上，叔文照例又在宅第中叙晤了王伾、凌准、刘、柳和其他骨干，进行他们以往一年来经常举行的磋商。事情都已按部就班，剩下的就是行动了。

夜已渐深。长安城天子所居，本朝厉行宵禁，眼下早已是坊门紧

闭，显然是回不去了。于是叔文干脆唤侍婢端上酒来，几人且饮且谈。酒过数巡，柳宗元兴犹未已，在席间大声地朗诵起他五年前的诗歌作品《韦道安诗》来，当读到“举刀自引刃，顾义谁顾形”一句时，凌准、刘禹锡等不禁连声道好。

王叔文尽管没有多说话，但眉宇间流动的神采，掩饰不住他内心的豪情。他只是可惜吕温正巧在前一段时间里奉使吐蕃，而李景俭也因母丧去京，都不得相逢于此盛会。否则，他是一定要和这两位最老的朋友再把未来的邦国大计仔仔细细推敲一番的。

实行新政

凡是一个新兴的政治集团，总是要力图有所作为。

新帝即位的第三天，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二十八日上午。

宰相郑珣瑜、高郢在政事堂一见面，表情都有点沉重。刚才宫中传来的消息说：皇上因父皇驾崩，哀毁过甚，百官的听政之请未被允许。

郑珣瑜，字元伯，早年被刘晏提拔入仕，崔祐甫为相时，入朝为左补阙。此后在地方、中央历任县令、州刺史、河南府尹、谏议大夫，去年十二月以吏部侍郎召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与高郢、杜佑共为宰辅。此公在河南时政绩很著，时论有“重厚坚正”之评，确是个颇为耿介的人。此刻，这位刚直的宰相却隐隐地有些担心，不为别的，还是那一段时间来朝廷上下都十分忧虑的问题：皇上的身体。

登基大典上谁也没有看到新帝的面容，远远而见的只是天子在垂帘之后隐约的身形。眼下百官们私下猜测纷起，假如皇上再居丧过哀，事情就更不好办。郑珣瑜想得更深了一些，他脑中时不时跳出当年高宗皇帝多病失朝而引起麻烦的故事，心中不寒而栗。

“国不可一日无君。我等应即请陛下遵照旧例，除服听政！”珣瑜对高郢道。

高郢自然极为赞同。其人前年以太常卿拜相，品性恭慎廉洁，但过于老实持重，不大有主见。

珣瑜目的当然不只是单单请皇帝陛下除服节哀而已，他要的是皇上能够处理政务，这事迟缓不得。便又道：“如此即刻去请司徒杜公具名联奏，堂老以为如何？”本朝宰相之间互称“堂老”，他人又称之为“阁老”。称呼之间，倒也可看出对宰相的尊敬。

高郢一想，有宿旧元勋、检校司空杜佑出面最好，便立刻点头同意。

杜佑在府中会见了郑、高两人。杜佑亦认为此际情形确非一般，流言四起，人心不安，奏请圣上除服听政，尤为急务。但嗣君患病已非一日，朝野无人不知，眼下圣上龙体究竟如何，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了解。想到这里，杜佑沉默了片刻，最后对郑、高两位同僚表示自己已有主意，一定想法给朝中诸公一个说法。

二月初一，高郢、郑珣瑜、杜佑具署奏章递上。郑珣瑜看着宫侍们接过奏疏，传进帘帷后的顺宗，不知怎么，心里越发不是滋味。不久，宫中传旨说皇上仍不同意。第二天，三位宰臣再次上表力请。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内心隐隐的担忧早已就是事实：顺宗皇帝实际上是不能处理国家事务了，他的风疾越来越甚，已经让他接近于崩溃。奏章传到禁中最终是传到宦官李忠言的手上。事情已无可回避，李忠言立即召来王叔文和王伾。叔文匆匆览毕，对二人道：“中外暌隔，终不是计。请李中侍宣旨，皇帝陛下明日在紫宸门朝见百僚！”

二月三日，有资格参加两日一朝“正御朝参”的文武官员在紫宸殿门下按部就班，齐齐向阶上的天子行礼。顺宗戴着的“通天冠”压得极低，足足遮盖了大半个脸。

礼毕，只见杜佑出列，跪行数步，叩首而言：“闻陛下居哀过礼，群臣莫不担忧。伏请陛下让臣等一睹圣颜！”说罢，再拜而起。

一闻此语，班列群臣无不佩服杜佑的老辣，同时也都暗暗抬起了

头。

李忠言朝皇上左右的小太监们使了个眼色，便有两位把顺宗的冠冕略略举高了一些。皇上的面孔浑无血色，干涩憔悴，只有茫然的双眼微微透出一点光泽。众人远远望见，心里一酸，“陛下……”声音未毕，又都拜伏下去。杜佑奏道：“陛下至性殊常，哀毁之甚，令臣等不胜惶灼！伏望陛下为宗庙社稷着想，割哀强食，则臣等幸甚，天下万民幸甚！”

顺宗似乎听到了他的话，微微颔首。

“吾皇万岁！”

风波已经过去，新帝也应该颁布新政了。此时，叔文已从容地开始一步步的工作，并由王伾传意于李忠言，再由忠言传谕翰林学士们草定制诰，发布天下。这一过程没有其他人知道，当然也不能让他人知道。六天后的九日，叔文完成了第一步：有诏令韦执谊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入相。当执谊来到禁中履行形式上的谢恩时，叔文心里清楚，他的政治集团从此走入了前台。

十一日，开始发布新帝即位后的第一个政治措施：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

李实本是皇族出身，乃道王李元庆的玄孙，前年始任首都最高长官京兆尹。这个人早年就很刻薄，做山南节度使曹王李皋判官时，曾因克扣粮饷差点被军士杀掉，幸亏他逃得快才得以幸免。自任京兆尹后，为政猛暴，罔顾法令，恃宠强愎，陷害贤臣，长安城中人人侧目，无不切齿痛恨。其中尤其让人愤怒的是两件事。

一是去年春天，关中半岁不雨，严重歉收。李实正汲汲于聚敛进奉，以邀德宗恩顾，对百姓所诉全不为意。当德宗问及京兆一带情况时，李实竟答日：“今年虽旱，但庄稼甚好，并无荒岁之象。”这番奏言使得租税一无所免，关中百姓叫苦连天。敢于上谏的监察御史韩愈由此被贬，优人成辅端只因编了几句歌谣，竟被李实诬以“诽谤国政”而杀头。

二是今年年初，曾有明令蠲免畿内欠租，李实竟违诏征缴，连官

吏都被他笞罚，一月不到竟在京兆府中杀了十几个人。

李实实在是民愤极大，叔文早就想除掉这个祸民之根，所以第一件事就是罢贬他。这天诏书一发布，城中市里欢呼，百姓们都怀着石块在出京的路上等着他。李实知道后，再一次重演他当年的逃跑故伎：先跑到西内苑，从月营门一路往西狼狈而出。

这件事一完，紧接着在第二天，有诏授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并翰林学士，叔文开始独揽制诰大权。另外的几位前东宫师傅包括王伾、冯伉、归登亦皆升迁不等。

二月二十四日，皇上再次朝见群臣，并发布了大赦令，又一次引起轰动。原因是大赦之外，又停征诸般杂税；同时，尤其明文禁止“宫市”，罢除乱政扰民的“雕、鹘、鹞、鹰、狗”五坊。这无疑是叔文和当年的太子如今的顺宗计划已久的事，现在终于有能力完成它了，叔文真是痛快至极。诏令一出，长安城中是一片欢腾，人们一想到市坊中从此再也没有强夺豪取的宦官和借供奉鸟雀之名肆行暴横的“五坊小儿”时，也真是打心眼里高兴。

政令是一项接着一项。第二天，有诏罢停盐铁诸使的每月进献；三月初一，出后宫三百人。初三，又追诏前几年遭贬的陆贽、郑余庆、韩皋、尹杭、阳城赴京。十几年了，先帝德宗对忤旨谴逐者，从来都是不复赦免的。这下子轮到朝廷百官们也忍不住为之欢欣鼓舞了。可惜的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陆贽和阳城都未及闻诏就死在了贬所。

初四，长安百姓再一次的在九仙门外山呼万岁：这一天又诏出后宫并教坊官妓六百人。他们的亲戚们在宫门迎接，许多人激动地大叫。

几乎是一昼夜之间，朝廷衮衮诸公忽然觉察到朝中多了一位翰林学士王叔文，这看起来多少有点蹊跷，于是都在悄悄打听他的来历。没过几日就清楚了：这个王叔文来自江南越州，本以善棋待诏，后来入值东宫，不知怎么竟十分得太子的宠爱。尽管有人说他是苻秦时名臣王猛之后，但大多数人不相信这话，他们一致认为，王叔文仍不过

是小人侥幸得进而已。

至少朝中许多有名望、有资历的高官达臣们是这么看的，其中包括宰相郑珣瑜、高郢。但这两位宰相此时已差不多接近于徒有虚位，一是因为贞元以来，宰相之权早被翰林学士削弱，二是因为新相韦执谊往往能直接从翰林学士院受诏，单独执行，根本不和他们二位商量。

从三月开始，事态越来越明显，人们觉得朝廷每出一项政令，似乎都是由王叔文在翰林学士院决定可否，然后宣达中书，再由韦执谊承行的。朝中士庶也看到王伾、王叔文的宅第前经常是车马不断，而且也总是那几个人：韦执谊、凌准、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陆贽……尤其是王伾，本月初亦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他力主破格任用低级官吏，打破了不少论资排辈的成例，弄得不少大臣心中十分不快。

每一个新的情形出现，反对的总是已经或曾经拥有过的人，而赞成者永远是那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的人，这就是保守和激进的分水岭。此时此刻也不例外，京城逐渐热闹起来，无数品级较低、苦无门路的朝官，当然也包括不少怀才不遇的士子，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机会来了！

这几日，叔文一大早出勤或黄昏时从官署归邸，在坊中的路边便遇到了很多人拿着些诗文卷子投递上来。以诗文干仕是本朝的风气，对那些即将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来说更是必经之路，一旦得到哪位有名重臣或主试官的赏识，官运亨通与科名成就便不在话下。叔文出身寒微，对下层士子总是寄予了同情和希望，他的为政方针之一便是不拘程式地起用新人。不过，叔文对这种过分钻营的做法却也很反感，他接过这些卷子，嘴上不说什么，但心里很不以为然。

“大人有所不知，”在宅中手下人对他说，“这十几天来日日都有不少人候见大人，甚至宿在坊中不走，前曲中的饼肆、酒垆下几乎每夜都有人。听说一个人要一千文钱才能留在那里过夜！”

叔文心想：这等无行之人断不能用。

第二天，叔文遇到王伾，立即就说：“超取拔擢当择善而行，转

托求进者岂能滥用？听说吏部秉承君意，日除数十人，有这事吗？”

王伾道：“皆是素日相与往来可用之士。”

叔文听罢无语。他知道要想继续有所作为，就必须培植力量，只要所用得人，可以不拘程式。想到此，便又强调说：“但异己者绝不能用，这个原则一定要坚持！”

叔文的这个想法不能算错，因为他们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以才能而不是以身份地位才走到这一步的，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也是其赖以结盟力行新政的基础，是绝不能破坏的。但是，此举无疑会得罪另外一大批人，朝野上下那些原本抱有极大希望的人显然彻底绝望，在他们看来，叔文和他周围的人已经完全是一个专权跋扈的私党了。这是个非常可怕的结果。

终于有一个人忍不住了。此人名窦群，其父在代宗朝官至左拾遗，兄、弟皆登进士，独有他仍为布衣。无奈之余，只有另觅他法。本朝特重山林奇人，在这种风气下，很多聪明人仕进中或有波折，便隐居修行以退为进，以才学处士之名博取赏识。因为大多数人经常选择长安附近的终南山，故时人戏称之为“终南捷径”。窦群隐居在毗陵近二十年，其间跟人学习《春秋》之学并著书、献书，德宗贞元时终于被荐为左拾遗，不久又升为侍御史。有一次德宗欲让他充任入蕃使张荐的判官出使吐蕃，但窦群之志其实不在这个实惠有限的外任之职，便对德宗发了一番怪论：“陛下即位二十年，方擢臣为拾遗，臣可谓难进者矣。今陛下用臣为和蕃判官，怎么就如此轻易呢？”奇怪的是德宗对他这几句显然是有点怨气的话竟没有怪罪，反而把他留在了朝中。

有二十年辛酸经历的窦群仍然不过是从七品上的殿中侍御史，眼见着许多品阶比他还要低得多的人被破格提升，心中哪能平衡。再加上早先同在御史台的柳宗元、刘禹锡都十分看不起他，更是越发有气。这天，他专门去谒见王叔文。

叔文听是窦群来见，命人撤去坐榻。窦群进来开口便道：“事有不可知者！”

叔文颇为诧异：“此话怎讲？”

窦群道：“去年李实伐恩恃贵，倾动一时，那时王公您在哪里？不过是逡巡路旁的江南一小吏而已！今番您已处在与当时李实相同的形势上了，王公怎么能不想一想：今天的路旁是否会有像当年您一样的人？”

叔文听出他话中包含的那种既酸又怨的心态，十分不屑，没理睬他。

窦群肺都要气炸了。

很多朝廷重臣也开始怒形于色，当御史中丞武元衡听窦群说，不少与柳宗元、刘禹锡有旧的人凭两人的一句话就如何如何调升时，冷冷地说：

“二王、刘柳是什么人？小人得志遂就以为天下无人了？可笑！”元衡作为御史台的长官，早就对刘、柳二人的冒进不满。

然而到目前为止，叔文却坚信自己的这盘棋十分的顺当，感觉上每一步都恰到好处，整个阵形舒张有力，正以磅礴的气势向战场开进。他的优势感太重了。

过于用强必然会招致强敌，其实叔文只要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只是局限在小圈子内而没有团结更多的人，从而在两方面给自己树立了强大的敌对势力。他们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弱者，绝对不能锋芒太过。这可是生死攸关的错误，短短的一个月后，王叔文就不得不吞下这个自己酿就的苦果。

致命的弱点：缺乏资历

在老成持重者看来，新锐阶层竟能一朝获取高位，一定是某种阴谋的结果；如果其辈仍不能韬光养晦而一味冒进，就一定是怀有更加不良的企图。缺乏资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致命的弱点。

正月底顺宗即位，二月至三月上旬王叔文集团开始主持政务，颁布一系列新政；到了三月十七日这天，又有一道诏书公布，这道诏诰无疑是叔文全面出击的标志。

这天的诏书其实只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委任杜佑出任“度支并盐铁使”，二是任命王叔文为副。杜佑是理财名臣，再度出任财政重职自无不可，关键是后一项副使的任命。

叔文对此预谋已久。德宗以来的政治问题归根结蒂只有两大块：财政和地方割据。先帝德宗虽然努力试图解决这两大症结，但终究没有成功。叔文冷眼旁观了十八年，他的超群智慧告诉他，财赋的好坏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是振兴帝国政治的关键所在。

王叔文敏锐地觉察到，目前如能得判度支使之任，则国赋大权在手，可以上固君位，下安人心，进而致君尧舜之治。故此举不可从缓。

与此有相同见解的是刘禹锡。禹锡的父亲是当年刘晏的部下，他本人早年就曾跟随杜佑在南方从事漕赋工作，对此更是深有体会，十分钦佩叔文的敏锐见解。不过，禹锡有些担心：度支、盐铁、青苗、水陆转运等权利一向都是委派专使负责，德宗以来亦只有刘晏、韩滉、杜佑三人可称其选，自己一方谁有资历出任这一重职？

这正是他们的悲哀之处。

叔文心里异常着急，一个月来一直在考虑这个艰难的问题。尽管他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政权建设，但如果不能把财政抓到手，一切都只是及表而不及里。三月初，叔文终于下了决心，再次与他的同志们商量。

叔文的计划是：赋权一事，只有让大司徒杜佑充正使，而他以副使出面。如此，庶几两全。

众人同意，都认为这是最佳方案。

意见一致，叔文极为欣悦。他对刘禹锡道：“君为杜公门下，今又任其崇陵使判官，杜公入度支使，必会引君判理文案。日后居中调

停之事非轻，专望专望！”

禹锡自是责无旁贷。

与柳宗元、韦执谊和另外一位同盟者、已从监察御史升为虞部员外郎的程异秘密商量后，叔文拟就了诏诰。果然，杜佑受命后便任用了刘禹锡入府掌理文案，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此外，杜佑因兼摄冢宰并德宗山陵使，自不会真的负责度支实任，叔文又通过宰相韦执谊任用程异赴扬州出任“留后”，自己以内职兼副使，与刘、程相呼应。

从新帝登基到王叔文出任度支盐铁副使，满打满算不过五十一天，叔文真是太性急了。那天诏书一发布，举朝哗然。

本来天子的朝会就已经形同虚设，因为没有人能亲自与皇上奏对，天子总是在厚厚的帘帷后面端坐不动，由宦官递进奏章，传达旨意。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王叔文每日往来于翰林学士院、中书门下、御史台等官署，与他的那些私党们在屏风后交头接耳的情景。朝野内外猜测纷起，有人甚至说出皇上已经病重而不能理事之类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王叔文又出任度支副使，对不少人来说确实是十分严重。

郑珣瑜不像高郢那么胆小，也不像另一位年已七十五岁的老宰相贾耽那样只是屡乞骸骨以示不合作态度。他已经是忧形于色，说话也已很不顾忌。

御史中丞武元衡更是对刘禹锡、柳宗元公开表示不满。

杜佑倒是很看重刘禹锡，也多少有点同情王叔文之辈，但却不希望他们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然而势难两全，只有沉默。

翰林学士郑、卫次公等再次表现出他们对伦理纲常的强烈信念，纷纷要求早早册立太子。叔文在翰林学士院一听到他们提起这事，就愤然拂袖离去。在他心里，此举是反对派的唯一法宝，并非是真正为国家社稷着想。叔文也同样有一个执着的信念，那就是柳宗元在《六逆论》中提出的“立贤不立嫡”的大胆之论。今天的顺宗就是一位贤君，只是因为疾病而不能获志，所以，叔文要做这位贤君所不能完成的大业，容不得他人破坏。

但是，叔文的意气与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天道圣统观念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三月以来，原本多旱的京城连日阴雨，长安城中传言说：这是群小用事之象。

宫中终于有人开始行动。这些人是先帝旧人俱文珍、薛盈珍、刘光琦。五十多天前的改嗣之议未能成功后，他们已经身处局外了一段时间。作为先朝的禁中老人，他们还是比较倾向于舒王李谊的，可目前的种种情形表明，朝廷的政局显然对他们很不利。这种不利至少表现在两处，一是李忠言与牛昭容得以侍从新帝后，竟与王叔文站到了一起。宫中内侍之间产生龃龉本就是俱文珍等不愿意看到的事，更毋庸说是严重对立了。其他内官们敢怒不敢言，俱文珍却每次都与李忠言吵得很凶，但李忠言要比他更有机会接近皇上，一时倒也无计可施。二是王叔文悄悄采取的不少措施让他们反感，俱氏是十几天前才听说宫中有些宦官们被减少薪俸的，开始他还未在意，当有人告诉说这是王叔文的主意时，俱文珍才一下子反应过来。

二十二日，俱文珍以先朝所带"翰林院使"的身份来到翰林学士院，与郑、卫次公等秘密地见了面。回宫后立即召来薛、刘及几位神策军首领再次商讨了半天。

二十三日上午，俱文珍、薛盈珍、刘光琦、薛尚衍、解玉五人来到皇上养病的寝殿——位于东内大明宫之西的金銮殿。牛昭容听报，赶到殿口挡驾："诸位何事？"

俱文珍来不及行礼便道："李内侍在哪里？请他出来说话。"

"李内侍今日不在殿内侍疾。诸位可去内侍省——"

俱文珍心想"正好"，不等她说完，径直就往里闯。牛氏见状大惊："俱文珍！皇上龙体不康，你难道想犯驾不成！"

俱文珍不睬她，继续朝殿内走。牛氏看情形不好，急对身边的女官说："快，速去请李内侍！"

还未等牛昭容跟进去，俱文珍就已经出来了，似乎只是进去走了一走。他一到殿口就大声说道："皇上有旨，速召翰林学士郑、卫次公、李程、王涯进宫议事！"

郑、卫等人早已候在紧靠金銮殿的东翰林院，见到俱氏派来的小黄门出现，遂立即直趋入宫。在殿口正碰到匆匆赶来的李忠言，忠言一看到俱文珍和郑、卫次公等人，心中就明白了七八分。

宫中的两派在殿口争执不下，但忠言这方此时只有他与牛昭容两人，实在是势单力薄，无力阻挡。

俱文珍说："无须再论，即请皇上裁夺！"言罢，便带头入殿，紧接着薛盈珍和刘光琦对几位翰林学士一使眼色，一起往殿里走去。李忠言无奈，只得跟在后面进入殿中，随着众人跪在顺宗的榻前。皇上这时只是睁着茫然的眼睛望着他们。

郑从袖中掏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纸条，递到顺宗的面前。

纸条上只有四个字："立嫡以长。"顺宗的记忆已在风疾的折磨下变得一片空白，哪里还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他盯着这张纸条，忽然，点了点头。

俱文珍等人盼望的就是这个，齐齐叩首，口呼"万岁！"李忠言望着这一切，默默地闭上了眼睛。

叔文还不知道这件事，就连王伾也蒙在鼓里。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忠言根本来不及向他们通报消息。这一行动从计划到实施实在迅雷不及掩耳，第二天郑草制的册太子诏就予以宣达，叔文和王伾都十分茫然，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过了一天，王伾终于有了消息，但也十分模糊，因为侍疾皇上的已经不仅仅是李忠言和牛昭容，有时俱文珍等仗着是先朝旧人，也来指手画脚，所以在联络上变得很不方便。

"此诏是宫中俱文珍的主意，经郑、卫等学士草制。"王伾把这一含糊的情报告知了叔文，并自作主张地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形式而已。

"皇储大事，宫里怎么不加斟酌？"皇妃牛昭容多次暗示，希望自己的儿子入承大统。叔文此语的意思就是李忠言和牛氏如何也不予反对。

“李内侍也许出于无奈。不过，诏中仍称‘令有司择日册命’，看来宫中已预有力焉。”王伾只能如此猜度。

叔文气得顿脚，连连说：“天命一出，如何再改？误大事矣！误大事矣！”叔文作为跟随皇上近二十年的老臣，太了解皇上的长子广陵王了。这位皇子精力充沛，意志顽强，对自己的决定常常执著得近于偏激，将来绝不是一个能轻易相处的天子。

王伾不做声，他也觉得如果官里情况发生变化，绝不是一件好事。

二十八日，叔文已连续两天没见到韦执谊，从柳宗元、刘禹锡处传来的消息说，目前朝中情形很不正常，不少人暗怀着一股气，都有早册太子之意。叔文听了更是着急，立即动身去寻韦执谊，心想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赶紧拿出对策。

中午，叔文直奔中书门下的政事堂。他知道此时正是宰相会食的时间，韦执谊肯定在那里。走到门口，一位省中的值事正在值勤。叔文命他速去通报，有要事与韦相商议。

值事很不解：“宰相会食，旧例向不许百僚入见，学士俟后再来。”

叔文本就很焦躁，听罢大怒：“什么旧例！我有急务在身，耽误了你担得起吗？”

值事被叔文的怒气吓怕了，他也晓得这位新任的翰林学士不好惹，只得入报韦执谊。

执谊与杜佑、郑珣瑜、高郢已开始进餐了，听说王叔文在门外等候，一定要破例见面，执谊的脸面很下不来。出去见吧，自己与王氏的关系就再也藏不住了，作为一个有资历的朝官，执谊一向觉得不能过于暴露；但不出去，叔文肯定不答应，不管怎么说，自己有今天是和叔文分不开的。执谊是个能分出轻重的人，想了一想，便起身出迎。叔文一见到他，就把执谊拉进侧阁中。

三位宰相只好停箸以待。时间过了许久，还不见执谊出来，三人

都觉得过分了。这时，有人来报："王学士索饭，韦相已与之在阁中同食。"

杜、高两人不语，操箸续食。郑珣瑜心想区区一个待诏出身的人如此猖狂，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一拍几案，大声道："我郑珣瑜岂可再居此位，作此伴食副相！"说完站起身来大步而出，备马回府。

回到家中，更是越想越气，干脆称病不起。郑珣瑜归卧不出的消息一下子传遍了朝中，也传到了俱文珍的耳里。文珍与薛、刘等人一合计，都认为事不可缓，太子须尽早正式册立，天子之侧不正常的局面也应该立即结束。

册立太子以明确储位，向来是维护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其内在机理是可以保障皇权的合法性与连续性，预防旦夕祸福。假如天子已老，或者身罹重疾，或者为群小遮蔽而施政无道，这一机制便会立即自行启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事情总有一正一反，册立太子既有好的一面，同时也就具有坏的一面，有时甚至可能成为政变的手段。眼下，宫中坚持册立太子，下一步的目标必然就是太子监国，再下一步，进而就有可能发生"禅让"。

但是，皇上虽沉疴不愈，但真相并未公开，道义上终究是一朝天子，轻易不能动摇。再说，如果单是朝中百官倡议，也不见得有效果，此事最好还要有外镇节将的配合。这一点，宫内势力是非常清楚的。

可眼下的地方力量大多暗蓄异志，有谁愿意出头？俱文珍和广陵王身边的宦官吐突承璀想来想去，想到了三个人：一是同他俩都有点交情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一是曾为窦文场养子的河东节度使严绶，另外一位也是同他们往来甚密的裴均。俱文珍对此三人倒是很有把握。

转眼就到了四月，几天来叔文都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王伾从宫里带来的消息是一天比一天坏，正式册立太子看来是早晚的事情，叔文异常地沮丧。

四月初六这天又是常朝的日子，叔文早早地来到了宫门口，他已

经预感到今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果然，当天子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帘帷后面时，叔文在百官班序的前列看到了广陵王。只见这位未来的太子脸上充满着一种兴奋难抑的表情，叔文什么都明白了。

册太子书是郑宣读的，叔文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他已经近乎麻木，只觉得满腔的辛酸、悲哀在心中弥漫、交织，像要把他整个吞噬。“万岁！万岁！”的朝贺之声响彻殿堂，把叔文从迷蒙中惊醒，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就在此时，久雨的天气突然放晴了，一轮红日照耀在五彩的天空。叔文随着退朝的官员们踱出殿外，他没有心思去理睬周围的那些嘲讽的目光，一刹那间，他想起了“起自草莽”的王猛，想起了“七出祁山”的诸葛武侯。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叔文的眼泪又一次夺眶而出。

运筹帷幄，容不得丝毫疏忽

运筹帷幄，容不得一丝一毫的疏忽，更不能存有侥幸心理。

四月的一天，有一个人单骑缁衣，来到叔文府中。

来人姓刘名闢，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的支度副使。“支度”与“度支”不同，是负责地方财政的长官。刘闢进来一见叔文便请屏退左右。

叔文不认识他，拿着名刺才晓得面前的这个人是韦皋的亲信刘闢。叔文多少知道一些韦皋的情况，此人当年代替入朝的张延赏而镇蜀，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因对吐蕃有功封南康郡王，顺宗即位，又加“检校太尉”。叔文心想：韦氏在蜀二十多年，重赋敛以事“月进”，弄得蜀土虚竭，时誉极坏。平生与韦皋素不相识，此番他不远千里派人来见，其意安在？想着这些，叔文不动声色，将刘闢引入内室。他

当然还不知道，宫中已与韦皋有过联系。

“韦太尉使闢致意足下。”刘闢说得意味深长。

叔文立即听出他话里有话，便开门见山，请他说出真实来意。

叔文快人快语，刘闢也就实话实说了：“太尉专使闢致诚足下，足下若能使太尉都领整个剑南三川，则必以死相报足下。”——言下之意是：你王叔文若有韦皋之助，何忧其他？——“足下若不留意，太尉当然也有相‘酬’之处了。”

这分明一是利诱，二是威逼，韦皋自擅强藩，在宫中宦官与王叔文两边分头交易，图谋剑南三川。

王叔文怒火万丈。

第二天，叔文的一封手书直接送到了韦执谊处。大意是说：剑南西川节度韦皋支度副使刘闢，以韦皋之势威逼叔文以求都领剑南三川。此等贿赂求值，公然胁迫之徒，应当绳之以法，公开处决。我已经吩咐有关人员打扫刑场，请宰相下令逮捕执行。

韦执谊心道：这如何使得？无凭无据就妄杀边将，惹出麻烦怎么收场？王叔文也太过分了。他立即写了个回条，告知叔文：此事千万不可。叔文见到后立即来见执谊。

叔文问：“如何杀不得？”

执谊回答：“无第三人在场，何来实据？再说公议日甚，吾等行事还要小心才好。”

叔文急了，说：“不杀此贼，难昭天理！你处处迫于公议，懦弱犹豫，要坏吾等大事的！你难道忘了当初的约定了吗？”叔文点他一句。

执谊脸色微红，道：“执谊自不敢忘。执谊目前行事谨慎小心，并无他意，不外乎是力图曲成吾兄之事而已。”

叔文叹了口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已经有了一种预感，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宰相，可能将最终走到他的对立面。

刘闢事件是太子册立后最危险的信号，它至少说明宫内外两方面都在紧鼓密锣，蠢蠢欲动。“太子”这着棋没有走好，带来了难以逃避的一系列灾难，叔文几乎感到快没救了。

“事并非完全绝望，”凌准对叔文道，“眼下贵近者炽焰嚣张，携失职之人有心把持禁中，竟不以天子为意而擅下矫诏，不外乎自恃有神策禁军在手。如即取其兵权，夺其所恃，势犹可挽回。”

叔文当然很同意此话，但又非常困惑。“此事先前商量，亦是主张极早进行，只是苦无机会。”叔文面色沉重。

“现在看来，此际正是千载良机！”凌准认为，“朝内外心怀憎疾之人固多，但借故亦只有一个，即所谓皇上沉疾未痊，请册皇储以固国本云云。今太子已册，口实遂去，势必有所松弛，若于不动声色之间，命一位德高望重之臣出长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先夺其外，再逼于内，则事可成矣！”

左右神策军系统除驻扎京师的直系之外，尚还包括京西北不少城镇中的“神策行营”。本朝自安史乱后扩建神策军以来，凡有叛乱之事，朝廷时常征调地方驻军攻伐，并以节度使带“神策行营”名领之。比如当今与边防关系密切的凤翔节度和夏绥节度分别称为“右神策行营节度使”和“左神策行营节度使”。这些行营大都分布在京城西北，所以凌准有“先夺其外”之说。

“此计甚佳，只怕无合适之人。”叔文已觉察到其中的妙处。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叔文在心里感叹。

“有，”凌准与刘禹锡、柳宗元事先已有计议，遂道，“范希朝可用！”

叔文心中一动，他知道这个人。在先帝德宗后期，拥兵节将自愿入京述职的就只有这位范希朝，更早的时候大约在十几年前也曾任过神策军使。但叔文仍有疑虑：“此人靠得住？”

“范氏是近世名将，此人极朴实忠厚，断不会因附中人强镇。”刘禹锡也发表了看法。

凌准接着道："昔年朱泚叛乱，弟与他同在邠宁，故极知其为人。不论其他，单看他前年累请朝觐，不以节钺自重就可知道。再之，希朝又是神策旧人，若以其领外镇行营，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此语一出，刘、柳等都更觉有理。

叔文考虑了几天，终于下定决心，通过王伾、韦执谊和宫中的李、牛二人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命。果然，五月初三这天诏书顺利下达，任命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行营节度使"，出镇奉天。朝中包括内廷的那些反对派对此虽然略有怀疑，但一想到范希朝以一代名将身份出使新职，不过是朝廷加赐功臣而已，也觉得没有什么。

但叔文不放心。这是最后的孤注一掷，存亡在此一举，单靠范希朝的同情和支持似乎并不能解决问题。他要的是完完全全地成就一番大事业，说白了，就是解决宦官和藩镇，兴利除弊，恢复帝国和天子的荣耀。是当今天子顺宗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他的抱负和理想眼看着一步步走向成功，但是，皇上的病是日甚一日，已经不足以依恃。假如没有兵权，那么他们永远就只是刀俎之上任人宰割的鱼肉，所有的一切都将化作泡影。叔文回想起那天册命太子朝会上众人幸灾乐祸的嘴脸，顿时不寒而栗。一不做，二不休，叔文在心里说道："决战的时候到了！"

第二天叔文找到了王伾："夺兵一事，尚有遗漏。"

王伾大惊：此事经众人商量，莫非还有什么不妥？再说诏旨已宣，范希朝克日即将赴任。

"人心难测，"叔文还是那句老话，"我思之再三，此事非同小可，单以范氏为靠，绝非良策。"

如此则计将安出？王伾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并无谋略。

"可想法以韩安平为行军司马，随之入镇，并伺机代之！""安平"是韩泰的字。

王伾一听，觉得叔文很有道理。韩泰是很有干才的一个人，他的谋略经常让王伾感到其并不在叔文和刘、柳之下；另一方面，他的官

资也较高，在此非常时期，也只有他才能当此夺军重任。不过，王伾还是想到了一点，谁都知道韩泰是新进者中的一员，是己方的死党，在这种情形下，是否会弄巧成拙？但王伾没有把他的顾虑说出来。于是二人立即分头进行，叔文该做的便是悄悄地会见了韩泰。两天后的五月初六，便有诏书命度支郎中韩泰为范希朝行军司马，这天的情形就不同于三天前了，诏书一出，立即就有人窃窃私语。

叔文一着过分，把最后一个机会也丢失了！

然而叔文却没有工夫去仔细捉摸他的失误究竟在哪里，因为这两天又有一件事让他感到惶恐不安。五月十一日，王党分子、饱学多识的春秋学者陆贽被任命为太子侍读，这是韦执谊的意思，本来是一件好事，既可以入宫窥伺新册太子的动向，又能从某种方面争取这位未来天子的同情和支持，叔文当然很赞同。不过，执谊也还有点私心，在他的感觉里，叔文或许已经不能作为永久的依靠了，因为大多数人都开始表示明确的反对。在政治上，打击敌人的一个有效武器就是攻击对方朋党比周，执谊也不能把自己划进那种结党营私的印象中去，那更是为时代的正统观念所不容的事。执谊是个从“正道”上来的人，严格说来他甚至不反对早立太子，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他就没有为叔文所动反对册立，执谊早已经渐渐地认识到，自己与王叔文之辈也许根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因此，他更需要太子的理解。

就这样陆贽来到东宫报到。陆贽是叔文坚定的支持者，但却不是一个精于世故的政治家，他不懂得如何巧妙地运用手段。所以当他刚刚开口说了两句，就被太子义正辞严地顶回。

太子道：“陛下是令先生为寡人讲解经义的，谈其他事干什么？请先生不要再说了。”

陆贽被一闷棍打得噤默而退，回来告诉叔文。叔文同他一样，听后只能以沉默表示内心的悲哀。

更让他不安和悲凉的还在后头。五月十三日，王叔文同往常一样来到翰林学士院，不料，等待他的却是一封诏书。叔文一见，顿时大惊失色。

一旁的王伾接过一瞧，心里也陡的一惊。原来是调王叔文为户部侍郎，度支盐铁副使依旧，但削去翰林学士一职。

叔文感到一股凉意自上而下倾泻在全身：宫中又生事了！众人看他模样，纷纷围拢过来看这封诏制。情急之下，叔文已是慌不择言，对另外几位翰林学士道："叔文每日来此办公，若不带此院职事，则无缘至此矣！"

王伾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此诏不是俱文珍的主意还有谁！他立即不声不响地草拟了一份疏请，送进宫去。王伾心里暗暗想，李忠言你在这上面可不能再让步了。

然而侥幸心理只能成为最后的一点信心，使人不至于立即崩溃而已，但永远也改变不了现实。王伾一疏再疏，甚至亲自进宫，也最终未能挽回局面。李忠言没有让步，但却也无力回天，俱氏的力量不在宫内而在宫外，这就是他之所以反而在宫中拥有发言权的道理。还好，宫中的力量对比并没有一下失去完全的平衡，俱文珍多少退了一步：允许王叔文三五天到一次翰林。但事到这一步二王心里都已清楚，皇帝已不再是他们的皇帝，而成了俱文珍的皇帝了。政敌们并且还拥有太子，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敌方已牢牢地占据了主动。

叔文平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他只能在心里暗暗地祷告：

"韩泰！韩泰！……"

没有了"势"，胜负早已注定

胜负手是必须的，但没有了"势"，胜负却早已经注定。世事如棋。

韩泰已随范希朝赶到了设在奉天的"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节度使府"。

韩泰很清楚自己身上担负着一种什么样的使命，他也知道这是维

持新政的决定性之战和挽救失败的最后一招，绝对容不得有半点的差池。韩泰信奉实干，讲究谋略，他的好友柳宗元对他的评价是“厉庄端毅，高朗振迈”，确实颇能反映出他的为人。韩泰也是个是非分明的人，年轻的热情决定了他有着一种对挚友同志的强烈感情和建功立业的豪迈决心，他坚信自己不会辜负凝聚在他背后的殷切希望。

刚至奉天，韩泰立即就开始了行动，首先是四传命令，召集诸镇军将听宣圣旨，接受新使范希朝指挥。接下来韩泰所要进行的便是从架空范希朝人手，一步步地掌握兵权，最终彻底接管这一重要的军事力量。

然而，他和他的同志们都没有想到的是，使用他本人去完成这一任务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而这个错误决定了他们的最后一击必然以失败告终。这个重大失误就是：韩泰的身份！

虽然京西诸镇在性质上讲是地方驻防系统，但实际是都直接归神策军最高首领——左右中尉——的节度，他们与禁中宦官们的关系自不待言。本朝军事力量的情况与以往自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似的：军队的掌握常常是以一种非正统的政治手段维系，或以家族，或以师生，或以上下属等等，这种传统渊源关系一旦建立，其力量甚至强于天下公义和道统信念。这种现象在本朝有两种反映，一是地方世袭强镇，二是先帝德宗时酿下的苦果：宦官典掌中央神策禁军系统。京西将领们与禁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数年之久，已经近乎于牢固不破。他们一见到范希朝的行军司马是韩泰，都不约而同地恍然大悟，这是王叔文的人！从这个事实推开去，结论就昭然若揭了：范希朝、韩泰两人来者不善。

这是重要的情况！一封封书信从京西各镇飞驰京师。

俱文珍等人开始还蒙在鼓里，当他们看到京西将领们的来信时，如梦方醒：“如让其谋得成，吾辈必死无葬身之地矣！”

俱文珍对京西来使说道：“速速归告诸将，切勿交出部队！”

韩泰是有耐心的，他一直在等待着行营将领们前来报到，他乐观地认为，一切应该都需要时间。对此，怀着异心的将领们也抱着同样

的心情，他们也在耐心等待着京中的指示。于是，奉天很平静，一切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战机就这样一天天地失去。要是韩泰能够料到后果是多么严重的话，他是绝不会这样守株待兔的。

可京中的王叔文已感到不能再等了，朝中的情形已经一天坏似一天，尤其让他恼怒和辛酸的是，韦执谊，他们所依赖的宰相、新政的支柱和能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代表，已正式倒戈易帜。尽管他还没有立即反戈一击，但这已足使叔文震撼不已。

叔文早先的预感是正确的，韦执谊从根本上就不是同道者。叔文反思过去，越发清楚地觉得当初的选择本就是一种无奈。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南方的寒族，如果不去寻求一种依托，将终究无所施计。成功需要妥协，但这一代价太大了。

王、韦交恶的深层原因是“势”的变化，绝非是由一两个偶然因素所引起，不过，“羊士谔事件”是使其最终表面化的导火索。

宣歙节度府巡官羊士谔是进士出身，严格说来，他与叔文的老友吕温还是同门，关系一向不错。不过此人性情浮躁，好出风头，在这一点上也有点像他的另外一位同学窦群，喜欢见风使舵，博取时誉。他五月份出差来京，听说王叔文等人正招致了大多数人，当然是和他同类的那些正统朝官的不满，眼见有利可图，再加上一时冲动，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批评王叔文，指出叔文的种种不是，轰动了京城。

叔文对此是不能忍受的，假如允许这么个一介小官如此猖狂，威严何在？叔文决心杀一儆百，遂请执谊出诏命将之斩首，但是执谊不同意；叔文又要求在大理寺就地杖杀，执谊还是不同意。叔文心中积聚多日的怒火一下子爆发，当着不少人的面，大骂韦执谊忘恩负义，弄得朝廷中人人皆知。刘禹锡、柳宗元都是出自执谊的提拔，也不好对此妄加评说，一时间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郁。六月二日，执谊将羊士谔贬为汀州宁化县尉，算是作了一点妥协，但是人们都已清楚，两个最主要的人物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了。这对反对派来说，是莫大的喜

讯。

刘闢此时还在京城，游说王叔文既不成，便转而执行另外一项任务。六月二日羊士谔被贬，他怕王叔文拿他开刀，吓得连忙逃出。不过，他走得很放心，因为一个月来，他已同宫中的某些人达成了共识，并已通过剑南节度的驻京机构“剑南进奏院”呈递给韦皋，这个共识就是：扳倒王叔文。刘闢只是可惜自己不能亲眼看到这一切。

俱文珍当然不能让剑南一道独撑局面，那样的话，声势就太小了，也有点弄虚作假的味道。让他欣慰的是，太原严绶处的监军李辅光已有消息表明，河东节度使严绶亦将出面。另外，荆南节度使裴均是自己的旧识，当年都在窦文场门下出入，自也不会不给面子。看来一切都已就绪，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六月十六日，韦皋的《请皇太子监国表》递到了门下省，请皇上“权令皇太子亲监庶政”；同时又有《上太子笺》，出语就更直接：

“圣上远法高宗，谅荫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辄当重任，赏罚任情，堕纪紊纲，散府库之积以赂权门。树置心腹，偏于贵位；潜结左右，忧在萧墙。……愿殿下即日奏闻，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则四方获安。”

高宗因体弱多病，遂有武氏代唐之事，这是本朝历史上极不光彩的一件事。韦皋把今上比作高宗，又曰“所付非人”，连带把当今天子都责备了一下，若非出自授意，恐怕没有这么大的胆子。笺中还直接点名道姓，直呼“群小”，更显得是有备而来。两天不到，严绶、裴均的笺表继至，内容相同。门下省按照本朝处理臣下上书的制度，覆奏画可，加印转发，这一下，朝中很多人振奋不已。有重兵大将作为后盾，所有的人都似乎有一种公理在身的感觉，大大地出了一口闷气。政治有时就是这样，能够使人一刹那间感到身心舒泰，就是正义和符合公益的行动，没有人也无需人去讨论它是否真的正确。

叔文已经无计可施，他的权力已被削弱，一切只能靠王伾和李忠言维持这艰难的局面。他知道，这一局棋已到了危急的地步，如果不赶快扭转这种局面，失败将不可避免。然而，在六月十七日这天，也

就是韦皋上表到达京城的第二天，韩泰从奉天驰归，彻底打破了叔文的幻想。

韩泰已在奉天等了将近半个月，最终也无人前来报到。他这才反应过来情况有了变化，于是星夜快马加鞭，赶回长安。

风尘仆仆的韩泰一见叔文，立即报告说，其与范希朝至奉天已有半月之久，无一兵一卒至。韩泰此刻也已明显地感到，可能大事不好！

叔文自然能猜到是怎么回事，但他不明白这一计划是如何走漏风声的。叔文已觉得整个人像是坠入了无底的深渊，眼前一片黑暗。如之奈何？叔文已失去了方寸。

韩泰也想不出任何良策。

户外，又是一轮夕阳摇摇欲坠，飘动的暮霭随着业已闷热的微风压在初夏的长安城上，让人喘不过气来。叔文和韩泰默默地相对而坐，谁也说不出话来，汗水从额上滑下，从后背透出，浸湿了衣衫，他们都浑然不觉。

就在此时，一个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叔文之母不幸去世。消息传到他与韩泰议事的秘室时，宛如晴天霹雳，叔文忽地站起，脸色顿时煞白。

叔文的母亲病重已有时日，尽管老人家年岁已大，患病也不轻，但叔文没料到会有什么不测。这几天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叔文甚至无暇到母亲的病榻前问候。母亲亡故则必须服丧，这是伦常对人子的要求，母丧同父丧一样，是五服的第一等，起码要停职居哀三年。如不是非常情况，比如皇帝下诏“夺情”、“起复”，是不允许有所变通的。这无异于置叔文于死地，难怪他要如此惊慌不已了。

可是，叔文的悲剧命运似乎无法避免，内院中一片低沉的哀号声说明了一切。未过多久，韩泰看见叔文缓步走出后闺，来到中院，抬起头望着微暗的天空，热泪满面地喃喃自语：

“天其丧予！”

第二天一大早，叔文平静地吩咐人准备五十几担酒食带到翰林学士院，就绪后，以度支使的身份命人去请宫中诸内侍。诸宦官不知叔文有何用意，陆续来到翰林院就座。其间有俱文珍、薛盈珍、刘光琦、薛尚衍和解玉，李忠言带了两个小黄门也来到院内坐定。

叔文一言不发，先走过一圈，给每人塞了一块黄金。然后命人给诸内侍斟满酒，自己举起酒盏，对座中诸人道："叔文请诸位先饮过此杯。"言罢，一干而尽。

俱文珍等人没有动，只有李忠言默默地饮干了杯中的酒。

叔文又加满酒卮，对他们说："羊士谔诋毁叔文，叔文将杖杀之，而韦执谊懦弱不敢；刘阚以韦皋之势威胁贿赂叔文，叔文欲集众斩之，韦相又不同意。叔文是堂堂正正的人，每想到让这两个凶徒逍遥法外，心中不快。"

众人不知他还有何下文，都不说话，唯听俱文珍"哼"了一声。

叔文不动声色，继续说道："叔文自判度支盐铁副使以来，所作所为，皆为国家兴利除害，又创获无数钱财以资国用，可谓有目共睹。"

俱文珍料到此刻叔文不敢把自己怎么样，站起来打断他的话："王大人此言何来？自大人出任度支，不见一日以簿书为意，但见与人窃语公署而已，今云'兴利除害'，岂非笑谈！"

叔文瞧着他，依旧是面不改容，对侍吏道："为俱内侍满酌一杯！"转向俱文珍，"请俱内侍与叔文对饮这杯！"俱文珍见状，举起酒卮仰头喝下。

叔文又说："叔文母亲病重，因为身任国事，不能亲侍医药。看来这两日不得不告假归侍，叔文为国竭心尽力，不避危难，但为尽忠报君而已。一旦离职，百谤交至，届时不知谁能鉴察此心，以一言相助否？"

俱文珍又忍不住："大人既自称为国尽心，又何虑他人毁谤？"

叔文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不停地劝酒，在座的人也不说话。有人

起身如厕，听到廊下的两个王叔文家人正在那里窃窃私语，一人道："母亲已亡，还有心思在这儿喝酒！"另一人道："说的正是。"这位宫里的人连厕所也不去了，急忙回来悄悄地告知俱文珍。文珍一听，心中昭然。

第二天，叔文又故伎重演，把众宦官们又请到翰林学士院。但这一次，叔文却不再像昨日那么谦卑温和了，脸上隐隐带有一种杀气。他在酒宴上只说了一句：

"叔文专来告知诸位，圣上龙体业已恢复，此刻正在皇苑中猎兔，上马如飞，一如当年。敢有异议者腰斩！"

说完，拂袖而去，留给座中诸人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慑感。俱文珍与其他人都感到，王叔文已开始孤注一掷。但即便如此，宦官们此时已有恃无恐。

六月十九日，叔文终于宣布，以母丧去职。真是天赐我便，不少人额手庆幸。

叔文是出于无奈，而不是退缩。此后近二十多个日日夜夜里，叔文和刘、柳、凌、韩等人苦思计策，希望能够起复官职。韦执谊已在考虑退步，已经不能依靠，他们只能设计另外两种方案，一是通过宫中的李忠言一派，借助于病重的顺宗作为天子残存的威慑力；一是求助于宰辅杜佑，争取一些朝臣的支持。王伾担负了这一计划的主要工作，连续多日每天来回于宫中和杜佑府第，先是请起复叔文为宰相、总领北军，结果当然是徒然；后来又降求为威远军使，领"平章事"，又未果。这种情况下，反对者如何还能让你王叔文再任要职，并且还是拥兵大权？最后，胆小的王伾第一个垮了，他在这个考验人的时刻暴露了他缺乏信仰的致命缺点，他的神经终于崩溃，他想要逃跑。这天，王伾屡次上疏没有回应，在翰林学士院等到夜里，忽然仰身倒下，口中叫道："王伾中风了，王伾中风了！"第二天坐车回宅，从此闭门不出。

在杜佑和新任副使潘孟阳手下工作的会计专家陈谏是第一个受害者，因去请示已经离职的王叔文而被赶出朝廷，贬为河南少尹。

时间到了七月，在俱文珍等人看来，时机已经成熟。太子的意思也很明确，目前已到了解决宫中不正常局面的时候。俱文珍等人一合计，现在是外有藩镇声援，内有朝官支持，既有神策军在手，王党又失势无靠；太子英明睿智，足为依恃，可以下决心了。

七月中旬，首先是宫中的人发觉，往常侍疾皇上的内侍李忠言突然消失了，再也没有露过面。有人说他已重病在身，命在旦夕。后来，皇上的宠妃牛昭容也消失了踪迹，人们再也没有看到她，只是发现宫中的一个旁殿被禁闭起来，任何人都不得人内。但所有这些，并没有引起什么更多的注意。

七月下旬的一天，翰林学士郑、卫次公、王涯等人奉诏入宫。在太极殿侧阁，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薛尚衍正等着他们，在座的还有一位东宫的内侍西门珍。俱文珍对翰林学士们宣布："皇上有旨，令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请诸位学士即刻草拟诏诰。"

七月二十八日，诏书颁下。百官在东朝堂朝见太子，太子哭着宣布：因圣上未康，寡人权监国是而已，就不答百官的拜贺了。群臣无不感泣。

王叔文，你的末日到了

微霜众所践，谁念岁寒心！

太子站在父亲的榻前，四周阒无一人，他已下令不许一人进来。

望着已经不能动弹的皇帝，太子心里思绪万千。他这时才真正明白为什么皇上迟迟拖延册立法定的继承人，照这种样子，任何人都可以挟天子以令天下，更何况那些不满于他这位嫡长子的小人呢！想到此，太子不禁咬牙切齿："王叔文，你的末日到了！"

将近一年了，太子都在忧虑不安中度过，重病在身的父亲能够顺利登基只是让他稍稍松了一口气，但紧接着，实在的危机却比以前还

要严重，竟然有人阻挡他合法地入居储位，这差点令他昏厥过去。幸好，几个月的努力改变了这一状况，过去发生的看来只是一场可怕的梦魇而已。太子知道，要达到目的还有一些障碍，但在他心里，对除掉这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无所畏惧。太子的决心已下。

七月二十九日，在麟德殿西亭，太子朝见来使，会晤宰相昭告天地社稷，开始“权勾当军国政事”的工作。但太子的重点显然不尽在此，他整个一天的其它时间里都与他的可靠支持者——先帝德宗的任使旧人、掌握中央神策禁军的宦官们秘密会商，策划着下一步，也是决定性一步的具体措施。让太子感到欣慰的是，所有皇上身边的内侍都一致认为：皇上的身体已不能支持，皇上本人也早已“厌倦万机”；他们还说，朝中百官从国家社稷出发，也已经纷纷表示，假如皇上引退，似乎更有利于帝国结束目前不正常的现状。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八月初二，太子监国两天后的这天夜里，太子和他的亲信东宫内侍西门珍、吐突承璀几乎是一夜不寐。第二天，两位东宫内侍又与俱文珍在内侍省会晤了半日，当天中午，翰林学士们再一次被召入宫，在皇上的寝殿太极殿接受了俱文珍宣布的皇帝诏命。八月初四，发下了皇上的禅位诏。

诏书说：朕获缵丕业以来，严恭守位，不遑暇逸，然天佑匪降，疾恙无瘳，不能奉宗庙之灵，实实“有愧于心”。一日万机不可以久旷，天工人代不可以久违，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居兴庆宫，请所司择日行册礼。

八月五日，已是太上皇的顺宗正式告别了只坐了七个月的皇帝宝座，坐在步辇上，在宫侍们的簇拥下迁居兴庆宫。兴庆宫位于长安东郭，是本朝的玄宗皇帝所置，因在大明宫及皇城中的太极宫之南，又称南内。顺宗的身体虽然已彻底地崩溃，但他被抬进宫中的花萼相辉楼时，似乎明白了些什么，他那尚未完全失效的神智告诉他，自己正在遭受严重的迫害。可怜的顺宗突然疯狂地蠕动着身体，喉咙里发出一种模糊的呢喃声，但这已经太迟了。有几位宫中的老侍卫望着这一切，痛苦地低下了头。

这天，太上皇又有诰：命太子宜于本月九日即位，并改元“永

贞”，大赦天下。

还未到九日，初六这天即有制命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驰驿发遣。开州和渝州两地分别距京城一千四百六十里和二千七百四十八里。

八月九日，太子正式即皇帝位，后来的庙号为“宪宗”。因为德宗灵殡未出，而太上皇又在兴庆宫，太子下令不于前殿含元殿即位，以示对二位皇帝的崇敬。

九月十三日，新帝诏贬神策行军司马韩泰为抚州刺史，司封郎中韩晔为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邵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为连州刺史。

万象更新带来的是心旷神怡，没有人去关心帝国的宫廷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事情发生得太快太蹊跷了，还是有不少传言流到了京内外。

九月下旬的一天，有一人悄悄地从京城来到秦州普润县求见陇右经略使刘澭，自称是山野侠士，名叫罗令则，有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相告。

这正是顺宗禅位称太上皇不久，刘澭很敏感，传令士兵屏后埋伏。

“令则从京中而来，专请使君出兵勤王。”

刘澭一震，喝道：“山人请谨慎其言！此话怎讲？”

“令则有太上密诏！”

“密诏安在？”

“事出无奈，太上只使令则传口谕而已。”

“这如何叫本使相信？”

罗令则凛然而言：“宫中内禅，实乃太上事不获已，现下人主幽闭旁宫，阉竖拥兵擅权，列祖大业，系乎一旦！太上素知使君忠义孝勇，深晓逆顺之理，故将宗庙兴危尽付于使君，诏令使君赴京行废立

之事。”

刘澭心里已是惊骇万分，他控制着自己，尽量平静地说：“然则废立若何？”

“使君请递掌过来。”令则不露声色。

刘澭伸过已经略显颤抖的右手，只见令则在他掌心划了几个字。

刘澭已感觉出来了，他的心猛地一缩，汗水淋淋而下，他还来不及考虑得失，一种简直就是本能的反应促使他一拍几案：“大胆狂徒，竟敢妄构异说！左右，给我拿下！”立时就有几名刀斧手冲进来把令则按倒。

令则大呼：“刘澭，你可要想清楚！宗庙倾覆，你就是千古罪人！”

就在这一刹那间，刘澭已权衡过了，其实也无须斟酌，两派的力量对比本就一目了然，刘澭不是个傻瓜。

“左右，给我用刑，叫他供出指使之人！”

令则知道事情没有成功，一种悲剧感涌上心头，他猛地挣脱了按住他的兵士，大声说道：“不用动刑，我罗某不是怕死的人！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等同志甚多，约与德宗迁葬时发动，这是太上之旨，你就是知道了也没有用！”

刘澭大骇，急令严加看管，又着人星夜驰驿报闻长安。宪宗览表，脸色都变了。

未过几天，罗令则被押到京城，禁军又大肆搜捕，共获得十数个嫌疑分子，即刻全部杖杀。

十月初二，曾经有望承德宗皇帝入继大统的舒王李谊在销声匿迹几天后突然被宣布去世。新帝废朝三日。

十四日，提前葬“神武孝文皇帝”于崇陵，庙号“德宗”。

朝中仍处在一片欢腾之中，对其他事浑然不觉。往常那些闭门不出、缄默不语的朝廷重臣和求进不得的失意者们纷纷出面，庆贺胜

利，尽管谁也说不清这种胜利是否属于他们自己。一切的不满、怨气、仇恨都需要发泄，政治上的变化给了他们以机会，于是群言沸腾，万夫所指，都加在卑贱而暴起的王党成员身上，这种攻击是如此的同心协力，以至于此时此刻所有的行动都显得是那么的合理，包括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大正常的一些怪事。

韦执谊只有沉默，袁滋和他的岳父杜黄裳已被委任为宰相，主持事务。新帝暂时还没有把他这位朝廷的前第一大臣一棒打死，他依旧是每天出勤，或在政事堂办公，或去延英殿廷对。他幻想着因为自己后来与王叔文的翻脸或许能帮他渡过难关，但他内心也清楚这是不可能的，严重的惩罚也许只是时间问题。韦执谊每天都在极度的惴惴中熬过，他早先那种颐指气使已变成了处处看人眼色，事事唯唯诺诺，甚至闻人行色，就惶悸失态，完全失去了国家重臣的应有气度。看着他奄奄无气的样子，就连要为他开脱的人也感到面上无光。

这一天不可避免地来到：十一月初七，韦执谊从宰相贬为崖州司马。

十三日，因为朝议认为对王党成员处罚太轻，新帝再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又贬河中少尹陈谏为台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为连州司马，岳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到此，加上韦执谊，王党的八位成员皆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司马”在本朝是州府的属官，二万户以上的州，司马的官阶也只有从六品上。

新帝宪宗皇帝在新一年改元“元和”（公元806年），正月十八日突然下诏宣布“太上皇旧疾愆和”。公布太上皇病情，这是本朝历史上罕见的事，颇让一些敏感的人困惑不已。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太上皇就驾崩了，年四十六岁。

太上皇升仙不久，王叔文被赐死。王伾亦病死任所。一般来说，本朝贬官在三五年之后可以“量移”，即予以调升或改善境遇。但这一年发布了诏令：此后即使有国家大赦，王叔文之党也不在量移之限。

时间能冲淡世上的一切，但无法抹去人心中的信念。柳宗元初贬

邵州刺史，十一月再贬永州司马，在永州呆了十年。在此期间，他一直在忧郁悲凉和不甘的煎熬中度过，写有“微霜众所践，谁念岁寒心”的诗句，抒发不平之鸣，表明自己的高洁情操。在给亲朋好友的信中，宗元反复申剖事件的真相，为自己的无辜获罪而辩白，希望得到他们的援引。感伤激愤，溢于言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有诏征“八司马”中仍在贬谪的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入京，但不久又相继被排挤出京，宗元于该年三月份外出为柳州刺史，四年后病殁。

刘禹锡行至江陵，再贬为朗州司马，也在贬所度过了近十年的谪贬生活。禹锡在此十年中，写下了不少寓意深刻的政治讽喻诗，抒发心中的愤懑。元和十年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齐奉召回京，旋又以诗歌讥讽执政而外放连州刺史。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从和州奉诏回洛阳，方才结束了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涯。此后的十五年中，他先后在洛阳、长安、苏州、汝州、同州任职。开成元年（公元836年）改任闲职，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加“检校礼部尚书”荣衔。刘禹锡幸得高寿，是王党中最后一个去世的人，他的革新之志从未停歇，然而因困顿于现实终使其无所作为。禹锡晚年精力不衰，写有“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豪迈诗句。直至临终，禹锡丝毫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毅然写下了《子刘子自传》，为早年的行为辩护，为王叔文恢复名誉。

公元842年，“王叔文革新”的三十七年后，刘禹锡病故于洛阳，给九世纪初这场短暂的新政画上了一个句号。

“八司马”其他六人的最后结局：

为顺宗即位立下大功的凌准不幸最先去世，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寂寞地死于任所连州的一个佛寺中。他的好友柳宗元写了首《哭连州凌员外司马》诗哀悼他的亡故，并为他撰写了墓志铭。

贬得最迟但最远的是韦执谊，为崖州司马，这是他平生最恨最讨厌的地方。因为他是王党的首脑人物之一，没有得到任何的赦免，最后死于任上。四十多年后，有一位宰相李德裕也被贬来此地，感慨遭遇相似之余，作了一篇《祭韦相执谊文》，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

价。

陈谏此前已出京任河南少尹，后被贬为台州司马，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同柳、刘等一同入京，又一同被逐，先后为封州、通州刺史，死于通州。

贬为饶州司马的韩晔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被外放为汀州刺史，又转为永州刺史。因为韩氏一族累世卿相，韩晔又与曾受叔文排挤的韩皋为表兄弟，因而朝中为之斡旋的人颇多，后来的境遇有所改善。卒年不详。

韩泰受谤较刘、柳为轻，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时，与王党政见不合的韩愈还曾经举韩泰自代袁州刺史。在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量移中从漳州刺史改任郴州刺史，后又任吴兴郡守，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又拜睦州刺史，不久迁湖州、常州刺史，和他最为要好且有亲戚关系的刘禹锡对他的境况颇有叹羡之意。卒年不详，大约在禹锡之前。

程异是“八司马”中唯一又被重用的人，元和初年就因盐铁使李巽的推荐被录用，擢升侍御史，后来一直从事财赋工作。程异以他对财政事务的精明才能得到宪宗皇帝的认可，于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被破格起用为宰相，一年后去世。

王叔文最早认识的两个人吕温和李景俭因为这八个月期间不在长安，受牵连较少。吕温出使吐蕃将近一年，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使还，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死于衡州。他和柳宗元、凌准及二韩都是陆贽的学生，传其《春秋》之学，为人极富智勇孝仁。他的朋友们都为他未能参与其事而感到莫大的遗憾，在他们看来，如果吕温在场，结果就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在他死后，刘禹锡在《哭吕衡州诗》中还为此怅然不已：“空怀济世安人略，不见男婚女嫁时。”柳宗元更对他的早死悲痛欲绝，他在祭文中写道：“今复往矣，吾道息矣，虽其存者，志亦死矣。”

李景俭也因服母丧不克与事。他与那位因向叔文投靠不成而心怀怨望的窦群是同门，后来受窦群提拔出任监察御史，结果又因窦群获

罪连累被贬。李景俭参加了后来讨伐淮西的战斗，于元和末年入朝，因追怀往事，心情忧郁，终日醉酒自遣，得罪了不少人，不得志而卒。

第二章　元和：短暂的中兴

汝南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音和平。
路旁老人忆旧事，相与感激皆涕零。
老人收泪前致辞，官军入城人不知。
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

——刘禹锡

帝国遇上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新帝很年轻，具有果断而敏锐的天性。同时，天下态势已渐渐发生变化，帝国逢上了一个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机会。

王叔文纵负奇才，也没能完成他的乾坤之局，仅仅八个月不到，他的壮志就在政敌的谈笑中，灰飞烟灭了。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八月九日，新帝改元“永贞”，翌年又改元“元和”。按照次序算来，这是帝国的第十一位皇帝，后来的庙号为“宪宗”。

宪宗即位时年二十七岁，正是精力充沛，斗志昂扬的年纪。他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曾经历过被废黜的危险，这在他年少的心灵中印象尤深。回想起在储位时那几个月担惊受怕的日子，他就十分痛恨王叔文，同时也很怨怒自己的父亲：病重的太上皇。刚直而无所畏惧正是年轻天子特有的秉性，消除这些不快并没有花去他太多的精力，太上皇在被迫迁居兴庆宫不久就顺利地宾天了，赐王叔文死也是早晚的事，新帝在潜意识里业已得出一个经验：加强天子本身的力量是第一要紧的。

这短短的几个月已经显露出新帝与他的父亲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新帝能够成功地走上皇位，轻而易举地粉碎王叔文的美梦，就在于他已经知道把家奴家臣们牢牢地掌握在手里的重要性。家奴们近躬傍圣，在政治上有一种近水楼台的作用，这是保证天子存亡的前提；而只要皇宫大本营牢固不破，朝廷才能够团结，臣子们才能够尽忠。新一代天子似乎已经对自己的哲学充满了信心。他正年轻，上天赋予了他果断而敏锐的天性，这更是孱弱的顺宗所没有的。年轻的皇帝不久就已经感觉到，他应该把目光重新投回到整个天下中去，就像祖父德宗一样，让帝国重新恢复失去已久的声威。建功立业的最好方式，无非是完成先帝们未竟的事业，每一代天子都当仁不让，他有理由为此踌躇满志。天佑我朝，几乎从一开始起，世事的发展就注定了宪宗必然会获得一种成功。

第一个契机是老臣杜黄裳对皇上说了一段话，这番话影响了天子的思维整整十几年之久，也奠定了整个“元和”时代——九世纪第一个二十年的基本格调。真是一语千金！

事情的缘起是去年皇上刚刚即位时，率先上表请太子监国的韦皋天不假寿，死在了任所，那位曾经游说王叔文的支度副使刘闢竟然自为留后。其时天子才即位，正为眼前的事而忙碌，自不能一下子就去改变多年来这种边将自立的陋习，便表示同意。但刘闢此人怀有异志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一见有机可乘，进而于新年的元月上表求领整个剑南三川——这是他当初在王叔文那里想要而没有要到的东西。这对于一位颇具雄略的年轻天子来说，多少显得有些过分了，当然不能允许。刘闢没有能达到目的，便举兵围东川，想以武力造成既成事实。这场叛乱发生在新年的元月，离皇上即位刚刚三个月。

皇上对宰相们透露道，很想对这些不法方镇再度开战。皇上也同时保证说，一切不会像先帝德宗那样冒进，这次定会谨慎从事。但就是这样，朝廷上下还是纷纷表示反对。

他们的理由是：蜀地险要，易守难攻，恐怕难以奏效。大臣们私下难以启齿的想法其实很明显：如果不克其功，反而引起动乱，不如暂时妥协为好。这也不能说不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想法，德宗时动荡局面给他们的记忆实在太惨痛了。

可杜黄裳独排众议，力主讨除。

“刘闢不过是一狂妄书生，能成何事！取之易如反掌。臣保举神策军使高崇文领兵出征，只要陛下委以军权，勿置监军，必擒刘闢。”以宦官监军形成常制是从玄宗开始的，起初倒也是出于中央能够有效控制出征军队的考虑，不过，尽管在这方面起了点作用，但监军往往骄横跋扈，既妨碍正常决策，又影响将士的情绪，已被代、德以来征伐不利的事实证明不是一个好办法。黄裳胆大，语无遮拦，指出了一条正确的征讨方针。

皇上极为赞成。他对黄裳推心置腹地说：“国家受方镇之患，已非一日。应付之略，究当如何？”

“陛下，”黄裳历经代、德、顺三朝，见得多了，感触自然更深，“德宗自变故之后，事多姑息。贞元中，每当方镇首领物故，必先委派内廷中使前去侦伺动静，而那些有点威望的副使副将们也大多贿赂这些近臣以求见用，在此情形之下，皇帝亦必然听其赞美而用之，以是因循，方镇帅守几无朝廷委任之人。”他说出自己的想法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陛下应熟思贞元时期的这些弊端，一步步以法度整肃诸侯，如此，天下何忧不治！”

黄裳此语绝非是一番单纯的对策而已，他已看到了“制度”的重要。恢复帝国中央的权力，不能再像德宗那样一味动武，更不能走到哪算哪，必须要有一个总体方针的指导，这就是迅速恢复起维护国家利益的法度，以法治天下，并且一旦强硬就坚持到底。这个意见既符合实际，又颇为中肯，难怪天子听罢，雄心陡生，大有一种成竹在胸的感觉。

至言得闻，天下之幸。后来的事实证明，宪宗赖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在此后近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没有忘记掉这一点。

第二个契机是高崇文在八个月的时间里一举剿灭了刘闢，收复了西川。这真是今上洪福齐天！想当初高氏受杜黄裳推举出任统帅，曾经让朝野大吃一惊，因为功勋宿将甚多，统帅之职无论如何也轮不到这位高某人。但正是这个一介武夫的高崇文，却颇善于用兵，在杜黄裳的激励下，数月以来连战皆捷，最终打进成都，捉住了刘闢。一举克服叛镇，至少是二十多年来前所未有的，这件事情绝不仅仅是一个军事胜利而已，它的意义同样十分深远。

首先是皇上信心大增。

十一月一日，刘闢被执送京师时，自以为还不足死罪，甚至见到神策兵士来捆他时，尚还十分惊讶道：“何至于是？”当皇上在兴安楼义正辞严地驳斥他的狡辩时，刘闢这才无话可说，垂首伏法。另外还有一个成功的事例是在三月份，夏绥留后杨惠琳拒绝承认朝廷任命的

新节度使，皇上亦坚决地下令征讨，未几杨氏就被部下所杀。征服蜀、夏是新帝即位初始就完成的功业，本就足以自豪。天子在这个胜利的时刻肯定十分激动，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感到了天威奋发后的那种无可言喻的欢畅和成就感。

自德宗以来子孙相接的那些地方藩镇则有点不知所措。

时势已略有不同，藩镇力量已弱，自无德宗时问鼎之势。见到蜀、夏两地被朝廷轻而易举地翦灭，诸镇大为惕息，纷纷上表求朝。所谓“求朝”，也就是节度使们自请赴京朝觐。人既入京，自不可能再有“将在外有所不受”的便利，所以，这个举动实际的含义就是放弃兵权。

本年的九月，在剿平蜀、夏的声威下，镇海节度使李锜很不自安，也上表求朝，并署判官王澹为“留后”。宪宗下诏表示同意，拜他为左仆射，还派了位中使赴京口慰抚其将士。但李锜却毫无动身之意，屡次拖延行期，上表说有疾在身，无法遽行。

镇海地处浙西，是南方的重镇，肩负着天下财赋的重责，朝廷对它是相当重视的。这个李锜倒也是皇族旁支，德宗贞元时因门荫而官至湖、杭二州刺史。长期在富庶之地任职，李锜手中积聚了不少钱财，以此贿赂求官，竟得到德宗的赏识而出任润州刺史并领盐铁使。后来王叔文罢免了他的盐铁使，但在润州置镇海军时，还是以他为节度使。李锜此人恃恩骄恣，在地方上横行不法，甚为天下所不齿。因为得到了镇海节度的重职，所以他一直忍而未发。此番上表，实在是迫于无奈，其实是很不甘心就此赴京去挂一个荣衔的。

消息传到朝中，皇上征求宰相们的意见，武元衡第一个觉得不能忍受。

“陛下初即政，这个李锜求朝便朝，求止便止，成何体统！若事事由李锜决定，陛下何以令四海？”

这话说到皇上的心里，皇上决定：下诏征他来京！

诏书一到，王澹和宪宗派来的中使劝谕他动身，李锜很不高兴。心想：哪能如此便宜！王澹不识相，频频劝驾，搞得他极为恼怒。于

是暗地里指使手下的士兵把王澹杀死。中使听说军中鼓噪，急遣卫将赵琦出面慰谕，又被李锜手下那些暴悍的兵士们投进大锅中煮食。当那位中使赶到，士兵们还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极尽污辱之事，这时李锜才假惺惺地出来喝止。十月份，诈言军变，正式起兵。但是李锜手下有不少将领不愿造反，在中央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倒戈一击，生擒了李锜。由此江南大定。

南方得以保持相对的稳定是值得庆贺的。不过，藩镇多少年来养成的那种子孙永保、自为除授的习性不会一下子消失。特别是一些大镇，比如有名的河北诸镇成德、魏博、淄青等，还是时时刻刻在侦伺可能，未尝少息。但总的来说，势力既有消长，各镇之间矛盾则必然加深，分化也日重，而中央对江南财赋之控制在元和时日益增强，财力的保证是一切的关键，帝国正逢上了一个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一种机会。

国之将兴，群才迭出

国之将兴，群才迭出。

谋事在人。朝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无论从数量还是从整体素质上，都是本朝自安史动乱以来前所未有的。就以前两年来说，宰相前后有郑、郑馀庆、杜黄裳、武元衡、李吉甫，翰林学士有裴垍、李绛，都是一时佳选。此外，兵部侍郎权德舆、吏部郎中李藩也都是蕴籍风流、精鉴默识之士。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的四月十三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天子策试制举之士，在“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中，校书郎白居易、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前进士萧俛、沈传师等人脱颖而出；同日，一代元勋杜佑因年迈力衰，举兵部侍郎兼度支使、盐铁副使李巽自代，从此李巽成为帝国财政的主要策划者。天降奇才，这标志着帝国即将要走出低谷，恢复它失去已久的生机了。

杜黄裳在相时间不长，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初被调任外职，出为河中节度使，不久病故。据说这位三朝老臣为人有个很大的缺点：身为宰相，任用官吏却不分流品，而且接受贿赂。此事在他死后被揭发出来，遭到御史台的追劾，宪宗念在勋旧，未予追究。尽管如此，黄裳坚持征讨刘闢，为整个元和树立了一个锐意进取的成功榜样，功不可没。在杜黄裳之后，一个更为强硬的人物走进了帝国的上层。

事情要从“政事堂”说起。

本朝宰相的合议之处政事堂，开元后也称“中书门下”，设在东内大明宫里的中书省。若不是常朝之日，宰相们从丹凤门入宫，绕过含元殿，从朝堂廊下穿过观象门，左转进月华门，便可来到政事堂。

政事堂虽设在中书省，却是独立机构，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与皇帝沟通，宰相们在这里以天子的名义议定天下大政，“政事堂会议”是帝国最高行政机关。堂后设列五房，分理众事，供职者称“堂后官”，负责行遣文书，虽是一般吏员，但地位极为重要。

大约是宪宗即位后不到一年的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八月份的一天，时任宰相的郑馀庆正在政事堂中大光其火，他对一位跑到他们身边指指画画的堂后官大声叱道：

“你是什么身份，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滚出去！”

事出有因。这位堂后官名叫滑涣，在中书门下有不少年了，但尽管如此，他也只是个吏员，绝不敢如此放肆。他之所以有这个胆子，是仗着和宫中宦官、任知枢密一职的刘光琦关系匪浅。刘光琦是宫中的老人，对拥立宪宗、打倒王叔文起了很大的作用，此人对国家事务，从来都是极为关切的，不时要按照己愿干涉一番。于是他就指使这个滑涣，对宰相施加影响。杜佑、郑都是老实人，不敢得罪他，此次郑馀庆实在是忍无可忍，怒火终于爆发。滑涣只得灰溜溜地退下。

可郑馀庆为此付出了代价，未过多久被罢相，改任太子宾客。

这时，有一位中书舍人看不下去，秘密给皇上奏上一本。表奏中没有就事论事，只是向皇上密报说，政事堂吏员滑涣擅权专恣，任意

妄为，接受了无数贿赂，请皇上下诏翦除。

宪宗览表，十分愤怒。心想：这还了得！立即下令宰相采取行动。

这天，整个中书省四门被突然关闭，任何人不得出入，神策军士们直奔堂后搜查，果然获得了滑涣受贿的证据。九月，滑涣被贬为雷州司户，不久赐死。

皇上心里对上表的这位官员大加赞赏，联想起早先议讨刘闢时，杜黄裳力主进攻，朝中也只有他坚决赞同，并建议另征江淮之师，取三峡之路，以分敌寇之力，计策十分精当。皇上采用了他的策略，更对这位刚毅而有谋略的大臣有了一种强烈的印象。

这就是李吉甫。

吉甫字弘宪，排行老三，赵郡人。他的父亲李栖筠在代宗时曾任御史大夫，名重一时。吉甫幼禀家学，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以门荫入仕，二十七岁时就做到太常博士。太常博士一职主掌朝廷五礼仪式，负责祭祀礼仪并拟议王公及三品以上朝官谥号，是有名的清望之位，非朝廷礼仪方面的权威不能胜任。吉甫以该洽多闻、精于故实而得到一致的称赞，后来在德宗贞元八年（公元792年）转为驾部员外郎。陆贽为相时，由于意见不合，被贬为明州员外长史，此后在忠州、郴州、饶州任职，滞留江淮将近十五年，备悉民间疾苦。宪宗即位，方才入京为考功郎中，转任中书舍人，与裴垍并充翰林学士。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正月，杜佑退休，杜黄裳也出镇河东，实际上已不再行使相权。十九日这一天，翰林学士李吉甫和裴垍受命草拟命相制书，两人在学士院分头垂帘挥翰，互不相知。吉甫起草的内容是命武元衡入相，书罢，吉甫控制不住自己的失望情绪，连声叹惋；而另一头的裴垍却一语不发。其实吉甫并不知道，裴草拟的制书却正是拜他入相。

裴垍写完，才起身向吉甫道贺，一无落拓之意。两人执手间，吉甫却几欲泪下。

他对裴垍道：“吉甫流落江淮十多年，不想一旦蒙恩若此！”说到

这，话音业已哽咽：“为人臣子报皇帝陛下恩德，唯有提拔贤才而已，君有精鉴之识，愿为我尽言之，吉甫定当不遗余力！”

裴垍也很受感动，遂取来纸笔，一气写了三十多个姓名。果然，吉甫没有食言，数月之间，选用略尽，一时朝野为之振奋。

一个人的处事性格，往往从一两件典型的事情中就可以看出端的。吉甫做事较冲动，为人也很固执，一旦有了主见便会坚持到底，所以经常和其他人发生抵触。但吉甫对国家的忠诚是不可怀疑的，对是非善恶更是有一种近乎偏激的爱憎感，这无疑又是他的长处。吉甫为忠州刺史时，陆贽也被贬来此地，吉甫不念前嫌，主动修好，并仍以宰相礼事之，使得陆贽大为感动，这也反映了他刚正的人品。吉甫的政治立场异常的坚定，因而对藩镇割据的现状十分反感。

比较来说，当时朝中的其他几位主要的大臣与他都稍有不同，其中武元衡公允平正，裴垍端默持重，李藩忠恳言直，权德舆文质彬彬，而李绛则以明察思深、讲究谋略见长，因此，尽管他们在抑制藩镇这一个大方针上意见是相同的，但吉甫却是朝中主战派的代表。

十月份李锜反叛，吉甫坚决支持武元衡的讨伐方针，并且又向皇上提出了一条极富战略性的计策。他主张诏令敌后的徐、汴二地的军事力量共同行动，与中央军形成犄角之势，给中间的李铸加以强大的威慑，可使敌不战自溃。宪宗接纳了这个建议，战局的发展正像吉甫所料，李部在压力下果然内变。

在力主对藩镇强硬这一点上，吉甫对皇上的影响是没人能够相比的。他鉴于方镇贪恣专权，上表皇上建议令方镇所领的各州郡刺史得自为政，并由朝廷派出“员外郎”一级的朝官出任刺史，以削弱节度使权力。宪宗深以为然，派出了十余人赴外任，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吉甫的强硬路线还在于他直接向藩镇的首领——节度使开刀。乘着平定蜀、夏、吴的东风，他以宰相的身份发布任免，对将近三十多个藩镇节度使进行调动、改易，并迫使其中有些人请求入朝，山南东道节度使于以及早年上表威逼王叔文的荆南节度使裴均就是其中的典型。尽管此举尚未能对河北实施，但魄力还是相当大的。据白居易在

给皇上的一份表状中说，这一段时间以来，诸道节度使在朝廷或追或替的政令下，到了“奔走道路，惧承命之不暇”的地步。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

不过，吉甫无疑也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对立面。

果然，到了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三四月，发生了一系列事情，使得吉甫的地位发生了动摇。

这时裴均已由荆南入朝，他是窦文场的养子，通过宦官的关节，得到了“尚书右仆射、判度支使”的荣衔，正显贵一时，很是得意，一心想要把吉甫弄下去。

正好，在四月份的“贤良方正直言”策试中，三位应试的低级官吏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闵放言指陈时政之失，特别是皇甫湜，甚至把矛头指向宦官，认为宦官操纵兵权，过于专横。这些言论引起考策官吏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的注意。结果，韦贯之把他们署为上第，呈送皇上，皇上见了策文不大高兴，被攻击者就更感到不能忍受了。

平心而论，元和初年的政治确实也并非无懈可击，这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朝廷欲加强中央集权，必然要损害民众的利益，另外朝中意见多少有些分歧，各派之间意气用事的情况也不少。但主要的症结是皇上对宦官的依赖和依靠并未减轻，权贵骄奢淫逸、宦官专横霸道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时任翰林学士的白居易就经常与皇帝争论，并且写作了大量的“讽喻诗”进闻于上。可见牛僧孺等人的言论倒也不是空穴来风。

此时，另一位宰相武元衡已奉诏接替高崇文出镇西川，朝中当事者就只有郑和李吉甫。吉甫对外采取加强集权的强硬方针，对内必然也要有所动作，所以经常向朝士们表露对宦官们干预是非的不满，想不到皇甫湜居然就在策文中捅出来了。对他的直言不讳，吉甫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是十分赞成。

裴均指使人向皇上报告：“这全是出于执政宰相的唆使。”意思就是吉甫。

宪宗得知后很生气，觉得李吉甫以此方式宣泄不满，有失为臣之道。幸亏不少谏官秘密上疏为吉甫申辩，皇上才稍稍改变了想法。但宫中的宦官对策文中强烈的攻击却是无法接受的，更不可能示弱，否则以后日子就不好过了。

刘光琦和吐突承璀对皇上哭诉道：“裴垍、王涯负责策试的复核，而擢为上等的皇甫湜是王涯的外甥。王涯不先说明，裴垍又无所异同，选人唯亲，简直太不像话了！伏请陛下明察。”

皇上对身边的近侍一向是信任的，他还要依靠他们做他想做的事，见两人这么说，事实似乎也能成立，于是罢免了裴、王二人的翰林学士。接着，又贬王涯、韦贯之、杨于陵出京，对牛僧孺三人也不予升调，迫使他们不得不远赴藩府。本朝地方大镇可以自辟中下级属官，无须中央任命，所以士子在朝不得意者，往往入于幕府。后来有所谓“藩镇得人”之说，实质上也就是中央朝廷不能尽用贤才而致使野有遗贤的侧面反映。

皇上此举招致了很多议论，白居易就是坚决反对者之一。但不知怎么，吉甫仍然没有表态，甚至在处理牛僧孺三人的过程中，也一点都未表示过不同意见，更没采取他应该能够采取的缓解措施，或者做些解释。也许在他看来，这毕竟是一件小事，但吉甫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他就此犯了他一生中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在数十年后，有不少人把这件事的过错加到他身上去，由此给他的儿子——日后的一位杰出的宰相——酿生了一场重大的灾难。

宪宗虽然不能摆脱宦官的影响，但对宰相的态度尚还非常明智，他很清楚祖父德宗晚年的失误就在于事事躬亲，没有做到用人不疑。同时，皇上也十分慎重，每次选用宰相都经过仔细的斟酌，一旦任用，便推心委之，经常与他们讨论交流。政治的秘诀就在于对权力进行互相制约，每一种权力都不能无限膨胀，皇权和相权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两端，什么时候两者能够平衡，什么时候就能显出政治上的清明。宪宗做得很成功。

因此“元和”成为本朝历史上第三个贤相辈出的时代，前二次分别是太宗的贞观和玄宗的开元年间。

四月份，皇上尽管因中人之意罢免了翰林学士裴垍，但不久却命他入相，时间是九月十七日。这是天子即位后任命的第五位正式宰相，五人基本同时，德行操守也都有口皆碑，不过有些摩擦也在所难免，主要原因还是李吉甫的为人性格所致。皇上起用裴垍，也是出于解决这个问题的考虑。

吉甫任翰林学士时与裴垍就有意见上的不合，武元衡经常为他们调停。吉甫入相后，偏激的毛病不时或犯，和郑也产生过牴牾，对他事多因循很有意见。但是吉甫和他们的私交并不坏，彼此也相互敬重，裴垍得以入相，吉甫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吉甫得罪宦官在所难免，但吉甫不幸还得罪了另外一个人，就是时任御史中丞的窦群。这个窦群在王叔文当政时的表现证明了他确实是个小人，吉甫引起他的愤恨就注定是要倒霉的。

窦群与羊士谔、吕温是同学，两人当时都在御史台，窦群便想提拔他们。本来，吉甫对二人也是十分赞赏的，即使是超资录用也原无不可，但吉甫对窦群不先对他这个当朝宰相打个招呼就擅自主张很生气，把任命扣压了几天。窦群是何许人，哪能轻易招惹？他立即就要报复。

御史中丞是御史台长官，负责纠举官吏过失，有一定的权力。窦群探知有一位叫陈克明的方士经常出入吉甫在安邑坊的宅第，便秘密地将此人逮捕，并上奏皇上。宪宗亲自讯问，却没有查出什么奸状。皇上大怒，知道窦群诬奏，要将他斩首。这时倒反而是吉甫没有记仇，劝住了皇上。风波虽然过去，但宪宗心里对吉甫某些易招怨恨的处事方法多少有点不高兴，开始想让裴垍主持工作。

得知皇上这么想，宫中不少人很高兴，也纷纷说李吉甫确实不适宜久在相位。

这一年的九月，宪宗把吉甫也派出京外，出任淮南节度使。皇上自开始对藩镇施加压力以来，就经常把朝廷重臣派到重要的地方上出任节度，一是改变方镇节帅自为除授的旧例，二是为了加强控制，早些时候的杜黄裳、武元衡挂衔出镇都是先例。此次命李吉甫出镇主要

也还是这个意思。不过，本朝士大夫都崇尚在京中任职，因此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出任外职，心里都隐含着一些失意的成分。

吉甫此次为相实际不到一年半，但他深明时政，多有建树。这两年，在新任财政长官李巽的努力下，国家的财政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吉甫撰写了一部国情报告《元和国计簿》，汇总了全国方镇、州府县的数目以及户口、赋税、兵员状况。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出，整个帝国有十五个道控制在不法藩镇手中，不向中央申报户口；而每年的财政收入，全部依赖于只占全国面积六分之一的江淮一带的八个道。这份报告的核心是重点指出了江淮一带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所在，吉甫的洞察力十分高明。

九月十九日，天子亲自在通化门城楼为吉甫饯行。告别了皇上，吉甫乘船向扬州进发。秋风阵阵，灞水汤汤，离别君阙之际，吉甫也未能免俗，心中感到无比的惆怅。

然而这对于帝国来说，或许却是件好事。淮南是帝国的第一方镇，天下财赋，半出于斯，对维系国家安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形势正向有利于中央政府的方向发展，如果吉甫能克尽其职，保持淮南的安定，长安的霸业就成功了一半。

新相裴垍是河东人，其七世祖裴居道是睿宗时的宰相。裴垍二十岁就中了进士，应制举中的“贤良方正极谏直言”试又是第一，授为美原县尉。任期满后藩镇交相征辟，他均未接受。后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等职，元和初入为翰林学士，与李吉甫、李绛、崔群同掌机密。其时正值初平蜀、吴，事务繁多，裴垍承担了主要部分，励精思理，小心谨慎，很得天子赏识。

宪宗对他十分了解，知道此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正直、讲究法度。所以尽管罢免了他的翰林学士，但不久就直接起复他为宰相。

裴垍入相之时才四十四岁，然而须发尽白，和他的实际年龄很不相符，一看就是个器局峻整、秉公无私的人。果然，裴堆一入相，便齐整法治，考课吏理，即使大官前辈有所托请，也绝不徇私，甚得朝野好评。特别是他入相之初，即推荐、提拔了好几位贤才进入了中枢

阶层。

一是荐李藩入相。李藩时任“给事中”，就是专门负责封驳制敕的门下省官。李藩敢于驳正，制敕有不可者，经常就在敕书背后批涂退回，有刚正之声。宪宗在裴垍的建议下用他代替了无所建树的郑。

二是启用了裴度为起居舍人。裴度是贞元五年（公元789年）的进士，应赴制举数科，皆登高第，元和初做到监察御史。因为直谏得罪了杜佑而被贬出京，在河南府任属官。裴垍对他和另外一人元稹十分赏识。

三是擢用李夷简出任御史中丞。李夷简是皇族子弟，但仕途也有起伏，为人谦虚忠正，未尝苟辞悦人，正是御史的佳选。

此外尚有不少人。裴垍量材赋职，从不挟以个人好恶，所以选任之精，前后莫及。其间还出过一个趣闻。

裴垍也曾应过“博学宏词”试——本朝科举分常举和制举，制举又分诸种，士人可以多相赴试，不受限制——但却名落孙山，当时的主考官是崔枢。裴垍为相，仍然提升他为礼部侍郎。

裴见到崔枢，笑说：“以此报答君前番之‘厚德’也。”

崔枢惶恐羞惭不已，他此时正站在堂前的台阶上，心里一慌，差点一个跟头摔下去。

裴垍赶紧拉了他一把：“此戏言耳，此戏言耳！”

一时长安城中传为佳话。

但裴却与一个人有矛盾，这就是皇上身边的近臣、宦官吐突承璀。

承璀其时为内常侍、知内侍省事，统领全部宦官，并还任左神策军中尉，掌管禁军，恩眷无媲。这不仅是因为他从宪宗为太子时就侍奉左右，更主要的原因是皇上需要身边有一种力量保证皇位的安稳，这是新天子从正反两方面得出的经验之一。当然，皇上也知道这种力量不能大到反客为主的地步，所以他即位以来尚还能掌握分寸，至少

他对承璀的期望就是尽量利用他的忠诚维护天子而已，并不一味纵容。否则，朝中的那些正直不二的朝官是不会答应的。

就是这样，裴垍对包括承璀在内的宦官们仍然十分不满，尤其是对那些出使各镇的监军。此辈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经常使得原本忠于朝廷的一些方镇产生抵触情绪，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裴垍抑制他们的态度很坚决。

承璀仗着天子的靠山，并且立过大功，自然也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但是作为宦官，对宰相还是怀有畏惧的，承璀也只能通过皇上起作用。然而一般的关照请求，皇上始终没有松口，可一旦涉及关键问题，宪宗能否坚持就是个未知数了。

其时的中心问题无外乎是：打击藩镇。

天时、地利、人和不如政治清明

战与不战，常常并不取决于外敌之强弱，而是依赖于内政之是非。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不如政明。政策失误，挫折必所不免。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三月，河北三镇之一的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的儿子病死。不出预料，其子成德副大使王承宗自命为“留后”。河北三镇早就开始自置所谓“副大使”，以嫡长子为之，父死则以子代领军务，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经过三年多的准备，宪宗开始想对河北有所动作，王士真之死正是个契机。

四月份的一天，皇上在紫宸便殿召重臣入阁议事，在场的还有吐突承璀等一些宦官。

宪宗道：“朕欲乘王士真之死革除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以朝廷之命委任成德节度使，若其不从，即兴师讨伐。卿等以为如何？”

裴垍非常慎重。

“陛下，”裴垍谈出他的想法：“淄青镇李纳跋扈不恭，其子李师道自命留后，陛下都予以同意；而王承宗祖父王武俊对国尚算有功，陛下前许师道，今夺承宗，违背情理，彼必不服，若再讨伐，就是名不正言不顺。”李师道自为留后是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当时朝廷正对刘闢用兵，未暇分心，曾下诏答应李师道承袭父职。

殿前议论不下。皇上于是又问翰林学士们有何意见。

翰林学士李绛也是赞成抑制藩镇者之一。

“河北不遵朝廷声教，普天之下，谁不愤叹！”此话一出，皇上很高兴，但出乎意料的是，李绛却也反对立即动手：

“不过今日取之，恐怕不行。”李绛的智谋是朝中最出色的，他的话处处显示出深谋远虑：“一是成德自王武俊以来，父子相承近四十余年，人情习惯之下一旦易之，恐怕彼处上下都会不以为然；二是另外数镇与其同体，唇亡齿寒，必然会私相勾结。再说兴兵攻讨，征招邻近数道是在所难免之事，可他们哪里又会与朝廷真正协力！届时按兵逡巡，坐观胜负，而国家又要负担他们的劳费之资，岂非得不偿失！眼下江淮正有水灾，财政情况很不好，不是用兵之时。”

皇上沉吟不语。旁边的吐突承璀却有自己的想法。

承璀伴君有年，知道皇上炫耀圣威的心情很迫切。他仗着有禁军在手，觉得自己能从中大捞一票，还可以借机把朝官的势力打下去。主意一定，承璀便挺身而出，自请领兵讨伐王承宗。

宪宗尽管有点心动，但没有立即表态。

这个时候适宜不适宜进兵不是主要的，关键是目前绝对不能与河北开战，因为河北诸镇实际上已是一个互为联系的整体，成德、魏博、淄青甚至幽州往往相互依托，如果朝廷不能一战而捷，战线就必然会越拉越长，后果也就会像德宗时那样，天下疲弊，内外空虚，以致祸起萧墙，夷狄乘间，造成无可挽回的灾难。元和之初平定蜀、夏、吴的成功也证明，只有先对弱小者动手，各个击破，才能对河北

形成致命的打击力量。可惜的是，朝中似乎只有李绛、白居易深明这一点。

李绛坚持认为：河北与早先的刘闢、李锜不同，数镇内则胶固，外则势广，本质上都是想永保世袭，因而在这一点上更能形成统一联盟。朝中急躁之人劝图河北，实在是因前日之成功冲昏了头脑，绝非深谋远虑之言。

天子心里很窝囊："照你这么说，眼看幽州刘济、魏博田季安亦有病朝夕不保，若一旦物故，岂非也要像成德一样付授其子，如此天下何时可平？"

"陛下，"李绛语重心长，"太平之业，非一朝一夕所能致，请陛下三思。"

宪宗还是心有未甘，迟迟没有下达对王承宗的处理意见。

事有凑巧，就在这时，从淮西镇传来的消息说：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病重，可能拖不了多久了。李绛一听，计上心来。

淮西节度使治蔡州，即现在的河南汝州，辖申、光、蔡诸州，故又称"蔡"或"申蔡"。在它的西面，南出襄州（湖北襄阳），北逼洛阳；东面，南跨淮水，北临汴州（河南开封），可以截断汉水、运河交通，地位十分重要。自德宗时的李希烈树起反旗之后，一直成为中央政府的心腹大患。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德宗《罪己诏》颁布后，王武俊、田悦、李纳皆去王号，惟李希烈反称皇帝，国号大楚，两年后的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四月，其部将陈仙奇毒杀李希烈，被命为淮西节度使。七月，淮西将领吴少诚杀陈仙奇，自为留后，从此独霸淮西将近二十年。

淮西虽然地位重要，对朝廷有很大的威胁，但它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它地处中原的腹地，面积狭小，四周全是忠于朝廷的势力，在一般情况下，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当年的李希烈之叛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李希烈在公元784年谋反时，他与河北的叛乱同伙很难作出任何战略上的协调，而且立即就引起了邻近地区军事力量和中央军队的包围，只是因为当时河北事重而让他钻了空子，占据

了从汉水到汴渠的一大片土地，切断了南方的供应路线，才得以苟延残喘。

李绛正是看到了这点，所以在得知吴少诚病重的消息后，立即给皇上秘密上了一本，建议放弃对王承宗用兵的计划，转向淮西。

这个计划极富战略眼光，如果能被皇上采纳的话，元和时代的成功或许可能要提早不少年。但是，好急的宪宗和心怀他意的吐突承璀还是将整个有利的形势打乱了。

王承宗久不见朝廷表态，有些惶恐，赶紧上了好几份表状解释自命留后的原因。既然如此，皇上在八月份派京兆少尹裴武赴恒州宣慰。九月初一，裴武回朝复命，报告说：王承宗“受诏甚恭”。宪宗听报，便坚持按己愿办事，在任命王承宗为节度使的同时，将德、棣二州从成德镇划出，成立保信军，以王承宗女婿薛昌朝为节度使。但魏博的田季安不愿意朝廷就此开分割河北诸镇的先例，派人到承宗那里从中挑唆，王承宗遂派人在朝廷使节到达之前将薛昌朝囚禁了起来，想让朝命空悬。

这显然是对天子的挑衅，皇上命人晓谕承宗放回薛昌朝，但承宗拒不应命。十月份，宪宗不顾朝臣的强烈反对，以吐突承璀为统帅领神策军讨伐成德。同时诏命恒州四周各镇进兵征讨。

皇上开始任命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白居易首先上表称以宦官领兵万万不可，朝中谏官、御史也一致反对，可宪宗不听。第二天，数十位大臣又在延英殿力争，皇上这才不得已，削承璀“四道兵马使”衔，改处置等使为宣慰使。换汤不换药，承璀还是实际上的统帅。

皇上想不通，老觉得绕不过这个弯来，他对李绛说：

“卿等极言宦官侵害政事，谗毁忠良，他们哪里敢呢！就是此辈胆敢如此，朕亦不听。”言下之意，宦官绝对不敢放肆，不如尽量利用这一点。李绛只有苦笑。

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正月，战事拉开。

幽州刘济与王承宗不无矛盾，在人劝说下，倒是接受了朝命出兵响应，亲率七万人出击。而淄青的李师道、魏博田季安只是攻掠了一二个县城就止兵不前。另外，河东、河中、振武、义武四镇军也在承宗北面的定州会合，形成夹击。这几支部队开始都还有些战果，唯有吐突承璀的中央军威令不行，屡战屡败，军中大将郦定进阵亡。

过了不久，刘济攻乐寿城不下，河东范希朝、义武张茂昭又在新市被阻，承璀军全无胜绩，其本人又没有号召力，于是朝廷各路兵马在王承宗的顽强抵抗下失去了协调，三月份，战况不可避免地进入胶着状态。朝中的白居易坚请罢兵，未被接受。

此刻吴少诚果然病死，但既已对河北用兵，势必已经不能再讨淮西，天子只得任命其子吴少阳为留后。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是当时首倡讨伐承宗的方镇首领，其真正的用意不外乎是讨好天子和吐突承璀而已，如今真的起兵，便逗留不进。一方面暗中与承宗通谋，另一方面派卫将王翊元入京上奏称：其他诸道兵与敌勾结，此际不宜进攻。搞得皇上困惑不已。

裴垍早就知道卢从史这个人十分阴险，此番更是怀疑，他悄悄地把王翊元召来，晓以大义，迫使他道出了真相。并又派他回部争取了军中大将乌重胤的支持，当王翊元再赶到京城时，裴垍觉得时机业已成熟，于是进宫请皇上下令将卢从史秘密逮捕归案。

宪宗听罢愕然，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位早先的主战派竟是如此之辈。师出未捷，反谋又生，太让人无法接受了。

裴垍着急万分：“卢从史狡猾贪狠，今日不除，后必为乱。”

皇上沉思良久，终于拿定了主意。

裴垍遂即开始部署，派人怀带密诏星夜赶赴承璀军营，并附上了一纸行动要略。

四月十五日夜里，承璀把卢从史骗来营中，在帐中擒下，立即用马车囚赴京城。从史的卫兵尚未省悟，就被承璀刀斧手所斩。乌重胤挡在卢从史的军营门口，叱回骚乱的士兵。囚车快马加鞭，在天明之

前顺利出境。不久，卢从史被贬，昭义节度使易人。裴垍的这次行动使得朝廷成功地掌握了昭义这一大重镇。

但战事仍然不能进展，到了六月份还是久攻不下，各军疲弊不堪，供应也发生了问题。白居易再次上表请求罢兵，宪宗无法推诿，只得连续几日与翰林学士们往复商讨，大家的意见一致，都觉得已无法再战。

七月，王承宗遣使上表，说自己反叛实乃卢从史离间所致，请求给予自新。天子借了这个台阶，宣布赦免承宗，加节度使，复以德、棣二州与之。

此次用兵历时半年，共调各道兵二十余万人，耗军费七百余万缗，除了昭义镇外，一无所获。

舆论大哗。

实干型宰相：李绛和李吉甫

天子的英明与否，非人力所能决定。既然如此，帝国的中兴还得依靠宰相的谋国之忠与处事之明。意见不一，反能使决策不误；攻错若石，愈可见同心若金。

朝中没有一个人不感到窝囊透顶。师出无功、耗费财物倒也罢了，重要的是朝廷的威望大损。王承宗还是得到了节钺，德、棣二州依旧又归到了他的名下，相对于四年前平定刘闢、杨惠琳以及李锜的辉煌来说，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可谁也不能把错误推到天子身上去，不管怎么说，皇上的决断虽然欠妥，但在道义上却绝对不错。于是，大家便把矛头指向吐突承璀。

更令人无可容忍的是九月份，承璀从行营回朝，皇上居然复命他为左神策中尉，并加衔“左卫上将军”，一时间京中百官弹劾表奏，雪

片似的递进。

裴垍奏道：“承璀首倡用兵，疲弊天下，卒无成功，陛下纵念其旧功不加杀戮，亦应贬黜以谢天下。”

李绛道：“陛下不责承璀，他日复有败军之将，何以处之？”

给事中段平仲、吕元膺说得更直接：吐突承璀理应斩首！

皇上心里也有气，但他气的是那些力主罢兵，阻挠他扬威天下的朝官，而不是身边这位忠心耿耿为己出力的吐突承璀。可战事毕竟失败了，压力之大也前所未有，身为天子是不能认错的，那也只有找一个替罪羊了。两天后，宪宗罢免了承璀的中尉职务，将他贬为军器使。这是内侍省的一个小官，对宦官来说也算得上是个不轻的处分了。朝野上下总算出了口恶气。

就在这天，克勤克劳的宰相裴垍积劳成疾，患中风症一病不起。皇上甚感震惊，不断派人问候病情。但是，裴垍这场病太重了，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天子闻之，叹惜不已。数天后，以太常卿权德舆入相与李藩共同主持朝政。

对宪宗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岁月，在这半年中，他遭受了第一次重大的挫折。不过，皇上并没有死心，在宫苑中独立寒秋，他时时把目光投向东方，那是他祖孙三代蒙受羞辱的地方，他无法把它彻底忘怀。

皇上变得十分好财。他对李绛解释说：

“眼下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又沦于异族之下，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重蓄聚。不然，朕宫中用度本极俭薄，多藏又有何用呢！”

这年的冬天在一片忧郁的气氛中很快地过去了，转眼又将是新的一年。人们都在等待着什么，总觉得从新天子即位以来的那种轰轰烈烈的气象不能就此烟消云散。幸运的是，皇上也有同样的想法，到今天为止，他丝毫也没有认为他这位真命天子就无所作为了。有迹象表明，皇上也正在考虑着什么。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新春正月二十五日。朝中发布了一道诏令：征召远在淮南的李吉甫入京。

吉甫颇有点像当年的崔祐甫，在一个微妙而动荡的时机再任宰辅。在入京的路上，他反反复复地进行着思考，觉得自己务求实效，力主强硬的政策并不错，尽管不久前的这场战事遭致失败，但这只是战术而并非整体战略的错误。对付藩镇的原则不可变，吉甫在淮南数年始终坚信这一点。吉甫更清楚地知道，一切不能流于空谈，重要的是实干和技术上的精益求精，他在淮南兴修水利，筑“富人”、“固本”二塘，溉田数千顷，就是以实际的运作来为他的战略作准备。吉甫那种切合时政的务实精神，单从他为所修水利工程起的名字上即可略见一斑，“富人”、“固本”，这不仅是治理天下的不二法则，也是当前的急务，但所有这些急务的目的只有一个：打倒藩镇，恢复中央的集权。

然而他的几位好友不这样看。

同是宰相的李藩是其中之一。这位刚直的大臣总觉得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至少目前绝不应再兴兵戎。在这一点上，李藩显得过于懦弱而眼光短浅，吉甫对他很有意见。

二月，李藩坚持委任吴少阳为节度使，终于引起吉甫的强烈反对。

本来淮西的吴少诚死后，朝廷委任其子吴少阳为留后就是迫不得已之事，因为其时正对王承宗用兵，无法两线作战，只能出此下策。而进一步妥协以至于委命节度，就显得过分姑息了。对河北属于无奈，若对淮西亦如此，朝廷颜面置于何地？吉甫不徇私情，向皇上直率地表示自己不能接受这一做法。

宪宗经他提醒，也觉得此举实属不当。

二月七日，李藩被改任太子詹事，罢卸相权。这次去职的表面理由是李藩为相成绩不著，所谓“夙夜之勤虽著，弼谐之效未孚”等等，但深一层的原因是皇上的斗志不死，他要以这种做法来表示自己对藩镇用兵的计划并未消歇。

吉甫殚精竭虑，为帝国的宏图大略一步步地做着准备。吉甫胆识超人、不惧鬼神是出了名的，淮南以至京师一带流传着他的许多故事。此次入相，朝野内外对他抱着很高的期望，正是基于他的这种敢作敢为的声威而来。不过，人们还是没想到吉甫的气魄如此之大，他的第一个措施就让长安平地起了一个惊雷。

吉甫在入相不久即奏准天子，开始省官减俸。官多则务繁，员多则费广，在帝国政治中，官署、官吏的多寡往往是清明与否的标尺之一。本朝自玄宗皇帝以后，置吏不精，冗食日滋，“天下劳苦之人三而坐待衣食者七”，这是相当惊人的。无怪乎吉甫要大声疾呼了。

此次行动历时有数月之久，参加的人员有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以及李绛。共减省内外官员八百零八人，诸司以及流外吏员一千七百六十九人，占帝国官吏总数的四分之一。

这是吉甫头一年的最大善政，当然，如此大的政治措施必然也会引起利益被损害者的不满，这不足奇怪。所以，长安城中说吉甫闲话的人不少，有的说他勾结宦官，希图控制皇上的意志；有的说他与其他宰相不合，从而排斥异己；也有的人说他好结朋党，以谋私利等等。吉甫对此并不在意，他似乎无暇去顾及这些捕风捉影之事，罢朝归邸，吉甫总是在书房里研究历年收集的天下山川地形资料，翻阅古书，默默地在胸中算计着丘壤山川的攻守利害，筹划着扼制天下的方略。

人们的闲话只有一点说的不无道理，那就是除了李藩之外，裴垍、李绛的观点与他也有分歧。裴垍不幸病重不治，于这年的七月逝世，李绛在十一月出任宰相，开始与吉甫共理朝政。

李绛最讨厌吐突承璀的专横霸道，他和吉甫不同，在任何事情上都是言无不尽，他坚持要皇上摒斥承璀。宪宗对此自然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多一种互相制约的力量对维护天子的地位当然是没有坏处的。对李绛的直谏，皇上总是用一句话推托道：

“贤卿说得太过分了！”

可是吐突承璀不省事，受贿为人求职，偏偏又被发觉。皇上觉得

这下子可以让朝官相信，天子还是能够端平一碗水，并不因为是近侍之臣就予以姑息。于是对李绛说：

“朕把他贬出京外如何？”

李绛大出意料：“外人真想不到陛下能一下子就这样做。”

皇上很是得意，感到自己真是一位挥洒自如的统治者，略施小术，就能纵横捭阖。他心里好笑，嘴上却语重心长地说：

“此人不过是朕的一个家奴而已，早先念其鞍前马后跟随多年，才不得不假以恩宠。若有违犯，朕除掉他还不是就如同吹去一根毛一样！”

李绛不作声。

就这样，吐突承璀被任命为淮南监军。承璀一走，宰相提供给皇上的意见自然就少了一些反对，这是一个绝好的形势。但是，二李在某些方面却有着严重的分歧。分歧的重点还是在于是否可以对河北用兵。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八月，魏博镇发生内乱，节度使田季安因患风病精神失常，杀戮无度，被其妻元氏废去，立其年方十一岁的儿子田怀谏为副使。同当年的成德、淮西一样，藩镇内部发生内讧，总是给朝廷提供了一种机会。

皇上召集御前会议，商量对策，二李终于发生了严重的争论。

吉甫主张兴兵征讨。吉甫并非是过于冲动才倡议用兵，其实他在整个战略上也自有见地。他也知道就目前的强弱来看，淮西是最弱的，而河北却仍然可能是一个大陷阱。但吉甫认为朝廷的力量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粮草供应也有保障，应该抓住每一个战机，而不仅仅是守株待兔。

李绛反对用兵。他主张施以压力，按兵养威，促使其内部进一步分化，可“不战而屈人之兵”。

吉甫不同意，他说：“目前魏博祸起萧墙，已臻其极，此时不

击，他日岂易轻取！”

李绛不以为然：“正是因其内祸顿生，诸将离间，才可不烦天兵。”他转而对皇上说：“臣观察跋扈藩镇已非一日，其辈致命之处在于节度使分兵以隶诸将，希望不使任何人权任太重。但由此带来的是诸将势均力敌，不相制约，加上刑罚严峻，人人畏疑，无不谋变，只是不敢先动而已。倘主帅严明，尚能控制局面，而田怀谏不过是个乳臭小儿，能成何事！臣敢断言贼中祸乱未已，故不必用兵，魏博自有人求归朝廷以图自保。”

天子左右不是，只得改日再议。

第三天，延英殿里李吉甫与李绛又一次展开争论。

吉甫提出了一大堆理由，认为用兵利大于弊。他向皇上保证，粮草军饷绝对没有问题。

李绛坚持认为兵不可轻动：“前年讨成德，发各地兵二十万，又发神策军远征，天下骚动，耗资无数，而卒无成功，为天下笑。今日疮痍未复，人皆惮战，若再驱兵征战，恐怕非但无功，反生他变。况且对魏博不必用兵，事势明白，请陛下勿疑！”

吉甫还要再争，宪宗摆手止住他：“你二人各有道理。不过就眼下而论，似以暂不用兵为上，但不可不作准备。”皇上顿了顿，“这样吧，敕令各邻近诸道选练兵马，严阵以待。”

事实的发展最后证明吉甫是错误的一方。不出李绛所料，魏博的内乱果然进一步恶化，部将田兴废掉了田怀谏，在朝廷的威慑中，魏博众人都觉得投诚是最好的出路，于是举六州之地上表求归。朝廷立即又派干练的大臣翰林学士裴度取代宦官前往宣慰。不仅任命归顺的田兴为节度使，在李绛的坚持下，宪宗又拨出一百五十万缗作为赏赐，结果田兴感激涕零，士众无不欢欣鼓舞。朝廷的恩威在这时重新恢复了一些光彩。

魏博镇在不沾皇化五十年后重新回到帝国的大家庭中，这一事件的意义犹如当年克复蜀、夏、吴一样，不仅给予其他不法藩镇以强烈的冲击，更使得天子和中央政府坚定了彻底解决藩镇割据的信念。它

预示着帝国在年轻天子的率领下，在众多贤相的规划辅弼中，有可能获得近几十年来所从未有过的生机。

皇上再一次地感到一种无上的荣耀和对建功立业的渴求。

在李吉甫、李绛杰出的形象面前，另一位宰相权德舆就显得有点无所成就。更让皇上不满意的是当二李为国是发生争论的时候，权德舆身为宰臣，居然不置可否，严重丧失了应有的责任心。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正月，宪宗不客气地停止了权德舆的宰相职权。三月十一日，征召挂宰相衔赴镇剑南西川的武元衡回朝入知政事。这样，三位忠正耿直、富有勇气和才略的大臣同时为相，真是一个难得的局面。

可惜好景不长。相权过于强大，宫中的势力自然就有所消减，皇上既然还试图树立起宦官这一对立的平衡因素，矛盾也就不可避免。

近臣们老是在皇上面前嘀咕，说宰相们私树朋党。宪宗召来三人质问。

吉甫谢称“不敢”，李绛答道：

“自古人君深恶臣下树结朋党，故小人谗害君子，必借以为口实。君子自与君子相合，岂可一定要与小人相合，才算非朋党否？请陛下明察。”

宪宗不语，但他内心却不无算计。皇上又变得自作聪明起来，他觉得似乎还是应该保持一种平衡为好，于是他开始想调回吐突承璀。皇上早先的话说得太大了，除掉吐突承璀并非像吹去一根鸿毛那样简单。

一年不到。在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的正月，二李在内外不少人的压力下先后上表请求辞职，皇上挽留了吉甫，却批准了李绛的辞呈。这是他在为重新启用吐突承璀做准备，因为谁都知道李绛与承璀两人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

吉甫在这一点上又显出了原来的弱点，没有表示反对。照理，他是应该坚决阻止皇上重用承璀这种以逢迎为事的宦官的。吉甫以沉默

代替了耿直的规谏，这是他有生之年的又一次错误。

然而吉甫没有停止他的实干，在上一年，他已经把费尽心血所撰就、代表着他对于政治总体策略的三部书《元和郡县图志》、《六代略》、《十道州郡图》进呈皇上。到了今年，他进而把目标转向了淮西，因为吴少阳在九月份也死去了，其子吴元济又擅请袭位并且不听朝命，无论如何到了下手的时候了。

吉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准备进攻，甚至打算亲自赴蔡州劝说吴元济归朝，如其不听，则转而说动其将领倒戈。吉甫的气魄决定了他有不怕冒险、百折无回的决心。

悲哀的是天妒英才，还未等到着手他的大胆计划，十月三日，一代重臣、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李吉甫突患急症不治身亡，年五十七岁。宪宗伤悼不已，厚抚之外，追赠司空之衔。

吉甫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自己计划的实现，但他却可以死而无憾，因为他最亲密的朋友武元衡继承了他的遗志，同样地为削平淮西而不遗余力。这年冬天，朝廷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讨伐吴元济，第二年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朝廷正式对吴元济宣战。尽管战事进行了几个月后并不顺利，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效，成德、淄青二镇为了切身利害又转而勾结淮西，朝中还有入主张罢兵，但是朝廷仍然没有丧失主动，在武元衡的主持下，到了五月底，中央军队逐渐开始对敌方形成了压力。

天下事阴阳互根，此长彼消，现在轮到那些藩镇犯错误了。

现在轮到藩镇犯错误了

玩火者，必自焚。机会一旦出现，就需要抓住它，但是抓住机会并不容易，如果策略不当，说不定这场大火既烧了敌人，也烧了自己。

这几个月来战局的实际情形很微妙。

淮西吴元济深知自己是这场战事的唯一目标，根本无法逃避。于是一门心思地顽强抵抗。二月，在磁丘击败由严绶统率的主力部队，推进了五十余里，占据了唐州，同时又打败了寿州团练使令孤通的一支军队。开始的一个时期里叛军声势颇著，而朝廷方面却似无成效，只有忠武节度使李光颜取得了几次战役的胜利。

到了五月份，勇而有谋的李光颜在一个叫“时曲”的小地方成功地击溃了淮西军，终于得以给叛军形成了压力。吴元济眼见单靠自己一方孤镇难以抵挡，便求救于成德和淄青。

王承宗和李师道与淮西在对抗朝廷这一利害点上是相同的，他们知道假如淮西一旦失败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但他们却暂时还不能公开与其站到一起以致引火烧身，只是数度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这种情形下，自然不可能得到皇上的回应，在日益严峻的态势面前，二人暗地里都是心怀鬼胎。

淄青的李师道颇似他的祖父李正己，为人极其狡诈。一直都有人传言他好养死士，手下聚集着无数的亡命之徒。不过，大家都没有充足的证据。

四月初，李师道派出了一支二千人的队伍开赴到淮西的正前方，声言是帮助朝廷以讨元济，但根本不见这支部队有所动作。

紧接着，朝廷得到报告，河阴转运院这一重要的供应站在四月十日这一天被几十个身份不明的盗贼偷袭，杀伤十余人，烧毁钱帛三十余万缗、匹，粮食三万余斛，损失惨重。有迹象表明，这显然不像是普通的盗贼所为。

五月下旬，王承宗派了一位亲兵将领尹少卿入京奏事。这一天，尹氏来到了中书门下求见武元衡，直言不讳地为吴元济游说，并代表王承宗请求武相奏请圣上罢兵，被武元衡轰了出去。

五月底，王承宗上了一表，对武元衡极尽诋毁。

很明显，战局在明、暗两条战线上进行着，而暗的战线无疑更为惊心动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还只能算是刚刚开始。

六月初三这一天，天还未亮，宰相武元衡像往常一样，从自己位于靖安坊的宅第中出来，跨上坐骑，赶往大明宫上朝。他身边只带了几位侍从。

一行人刚刚走出靖安坊的东门，突然，从暗处跳出几个蒙面大汉，拦在路上用箭向他们射击，还未等元衡反应过来，随从已被击散，蒙面人把他从马上拽下杀死，并割下了他的头颅，呼哨而去。

同一时间，另一位主战派人士御史中丞裴度也在上朝的路上遭到袭击，蒙面贼从裴度必经之路通化坊东门突然杀到，裴度中刀落马，贼人正欲割其首级，裴度的家仆王义奋不顾身，扑到主人的身上以自己的肉躯遮挡乱刀，蒙面人以刀挥击王义，王义抱住一个贼人大喊，贼人惊慌，挥刀割断了王义的一条胳膊。裴度乘机负痛全力滚进路旁的水沟中，天暗沟深，众贼搜寻不得，遂逃奔而去。

裴度得以幸免全赖他戴了一顶扬州毡帽，贼人挥刀中帽，厚厚的毡帽卸去了大部分力道，才使他大难不死。

事件发生后，长安举城震骇，皇上龙颜大惊，紧急下令：凡宰相出入，皆须有金吾骑士护卫，全体护卫务必箭上弦、刀出鞘，严加防备。同时全城戒严，全力搜捕。

第二天，掌管京城巡警的左右金吾卫府、长安地方当局京兆府以及所属京畿两县县衙门同时接到飞刀留柬，上书八大字：“毋急捕我，我先杀汝。”观者无不失色，一时长安城中人人自危，朝士未晓不敢出门，有时皇上御殿很久，上朝大臣还没有到齐。大家都很清楚，这一阴谋不出于王承宗，即出于李师道。

看来这一恐怖行动似乎达到了目的。朝中两位主要的强硬派一死一伤，朝野上下一片肃杀之气。但是，事态的发展却证明那些藩镇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犯了一个自掘坟墓的错误。

在任何时候，恐怖行动总是会有正反两种结果：一方面是能震慑人心，另一方面却也能使人由哀生怒，同仇敌忾。

白居易不顾自己已调任太子东官、任职太子左赞善大夫的身份，上疏力请搜捕刺杀武相之贼以雪国耻。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因为他

此时的身份是“宫官”，照理是不应在谏官之先议论是非的。但白居易在愤怒之下已顾不得许多了。

兵部侍郎许孟容更是对皇上大哭：“自古以来从没有宰相横尸路旁而让凶手逍遥法外的，这简直是朝廷的奇耻大辱！”许孟容同样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他又到中书省中建议道：“请诸位立即奏请皇上以裴中丞为相，大索贼党，察明奸由。”说话时，挥泪不已。

天子亦忍无可忍，下令大索京城。他对众臣道：“有人竟奏请朕罢裴度官以安二镇之心，真是岂有此理！若罢裴度，岂非奸谋得逞，朝廷纲纪何在？吾用裴度一人，足破二贼。”皇上下诏：在裴度养伤期间，以金吾精兵进驻其宅第保护，务必做到万无一失。

裴度在家足足躺了近二十天方才痊愈，二十五日，被委以宰相。同时为相的是去年十二月任命的韦贯之和张弘靖。裴度的入相是极其偶然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藩镇的阴谋把他推向了相位，单从这个事实就可看出，恐怖活动的制造者是大大地失策了。

事情当然不能说就此一帆风顺，相反，裴度迎来的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时期。首先是刺杀武相的案件有了眉目，有人举报成德驻京机构“成德进奏院”的兵士张晏等数人形迹可疑，神策军立即将其收捕，数人竟然供认不讳。尽管负责审讯的监察御史陈中师觉得可疑，但皇上正在气头上，联想起早先王承宗曾上表谩骂武元衡，想当然地认为刺杀事件一定是那个可恨的王承宗所为，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将张晏等共十四人斩首。半年后的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正月，正式下诏攻讨王承宗，不明智地陷入了两线作战。

其次是前线作战不利。在头两年里，各路军统帅先是曾经逼王叔文下台的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此人就知道交结宦官，是个典型的无能之辈。后来是宣武节度使韩弘出任主帅，却又暗怀私心，拥兵自重，不愿迅速平定淮西，以便自己大捞一把。在这两人的指挥下，朝廷在将近十八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

再就是皇上的老毛病不改，一直坚持宦官监军。天子的这种患得患失心态可以理解，但却绝对是个最大的祸根。宦官与前线主将本就

不是同一种人，矛盾是与生俱来而不可调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又能打胜仗？

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六月十日，右羽林大将军兼唐、随、邓州节度使高霞寓在铁城被淮西兵打得全军覆没，仅只身逃出。此次失利没能被前线众将遮盖，传到了长安。消息一到，举朝震愕。韦贯之和新任宰相李逢吉入殿奏报此事时，劝说皇上罢兵。

宪宗在这个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天子的大度和百折不回的信念。

“胜负乃兵家常事，现在应该讨论的只是用兵方略，比如将帅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等。岂可因一将失利，遽议罢兵！”皇上语气坚定，不容置疑。

裴度庆幸皇上主意坚决之余，却也忧心忡忡。

到了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对淮西的战役已经进行了将近四年，朝廷前后参加会战的兵马共九万人，然而却久攻不下，仓廪耗空，民多无食，局面已相当艰难；另一方面，讨伐王承宗共有九道兵计十万余人，战线回环数千里，既无统帅，又相去遥远，供应线过长，已到了战不下去的地步，不得不在五月份撤罢河北行营。

帝国到了一个严峻的十字路口。此刻若是立即息兵罢战，并不是不能够做到，但这样一来，不仅前功尽弃，而且帝国又将恢复到几十年前的老路上去，这个结果没有人会同意；但如果继续征战，就必须速战速决，一举克复最弱小的淮西，然后借以稍作喘息，再集中优势解决成德和淄青。这已经是摆在帝国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可如何完成这一重责呢？

皇上对宰相提出了这个严峻的问题。

李逢吉长叹：“师老财竭，势难奏功。还是下决心罢兵休战吧！”

裴度沉吟不语。在皇上的催问下，他用低缓而坚决地声调所答非所问地说：“微臣请求去前线督战。”

天子大喜，急切地问：“贤卿真有此意？”

裴度道：“臣与此贼不共戴天！臣反复玩味吴元济的上表，觉得贼兵已经十分窘迫，只是因为我前线诸将不齐心、不尽力才不得取胜。臣赴行营督战，将领必担心臣此举是前来抢功，势必奋勇争先而破敌。”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八月初三，裴度在通化门拜别了天子，带着天子和满朝文武的殷切希望，怀着一腔忠诚和必胜的信心，走向了淮西战场。帝国的历史应该为这个不寻常的日子额手加庆。

裴度在出京前，采取了一个重要行动：奏请皇上罢免与李逢吉一样不赞成继续征讨的翰林学士令狐楚。皇上在这时对裴度寄予厚望，当然予以同意，不仅将令狐楚削职，并同时还罢免了李逢吉的相权。裴度首先在朝局中取得了胜利，消除了后顾之忧；又在路上成功地躲过了吴元济骑兵的袭击。一到前方，立即奏停了各路兵马中监军的权力，使得各将重新掌握了军权。形势顿时有了改观。

在裴度的筹划下，最后由杰出的军事将领李愬实现了划时代的胜利。

李愬是当年一代元勋李晟的儿子，以父荫起家，有筹略，善骑射。去年七月高霞寓战败后，朝廷任命袁滋为帅，亦无成效，在这个时候，李愬上表自荐，愿于阵前立功，经宰相李逢吉推举，出任随、唐、邓节度使，负责对淮西的正面进攻。开始，敌军因为屡败高、袁，并不把李愬放在眼里，对他的防备甚为松懈，李愬看到了这一良机，表请增兵，朝廷从河中等镇拨出了两千骑兵归其指挥，从而使得攻击力大大加强。李愬继承了其父卓越的领兵才能，推诚待士，以德服人，他的部队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成为会战各部中战斗力最强者之一。

李愬的成功在于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精确的判断。通过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上半年一系列战役的具体实践，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李愬制定了一个以穿插、游击为主要方式，以敌人薄弱环节为主要打击目标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的核心内容就是：出其不意深入腹地，对吴元济进行偷袭。

五月，李愬先后俘获了淮西的两位将领吴秀琳、李祐，厚待以礼，由此对敌占区里的险易远近虚实得到进一步的了解，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到了八月，敌情更为明朗，降将李祐此时立了一大功，他根据自己的分析，对李愬道：

“就目前情况来看，淮西精锐全在洄曲一地，再加上四面受力。边境尤须布以重兵，因而蔡州守备定是老弱之辈，我军可以乘虚直抵蔡州，必擒吴元济！”

李愬听罢当即决定，绕过敌军主力，直取蔡州！十月初八，派掌书记郑澥秘密前往郾城，向主帅裴度报告这一计划。

裴度拍案称绝：“兵非出奇不胜，此计绝妙！”当下就予以批准。

十月十五日一个漫天风雪之夜，李愬突然行动，以三千人为突前、三千人为中军、三千人为殿后往东疾行，一切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进行，除了李愬本人和少数几位将领外，其他所有人都不知所之。经过一夜一百三十里艰难的急行军，于第二天凌晨三时左右抵达蔡州城下。

三十多年了！在三十多年漫长的岁月里，从来就没有外来的军队到过蔡州——这座淮西镇的老巢。当李祐率先攀上城头时，朝廷三十年的耻辱、三十年的无可奈何都在这一刹那间烟消云散了，尚在睡梦中的吴元济终于成为一个彻底的被征服者。这是李愬的胜利，也是裴度的胜利，更是天子和整个帝国的胜利。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十月十七日，吴元济投降。淮西克复。

中兴和隐患

帝国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中兴。但是，大功之后，逸欲易生。

山陬海澨，同声欢庆。

待罪荒州的刘禹锡、柳宗元也不例外。前后算来，他们已经度过了十二年的贬谪生涯，尽管他们在武元衡被刺后囿于个人恩怨，多少流露出一些幸灾乐祸的情绪，但两人对天子和国家的忠诚依然与当年一样，丝毫未变。当本年的十一月份吴元济在长安人头落地时，刘禹锡写了《平蔡州三首》、柳宗元写了《平淮夷雅》来歌咏这个胜利，是时人公认的颂歌代表作。

裴度的行军司马是韩愈，他也是帝国文坛上响当当的人物，早在贞元年代，就与刘、柳等人一起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风而名噪一时。不过，韩愈与刘、柳政见不同，学问上分歧也很大，但这不影响他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同样显示出他的大手笔，为天子纪功，为千秋万世立法式。

韩愈花费了近一个月时间撰就了《平淮西碑》一文，进献天子。宪宗赞赏之余，即命刻石于蔡州紫极宫。勒石立碑，动流亿年，固不可不慎重，韩愈并没有忘记这一点。所以他历时旬月，耗尽心血，才得以完成。然而就是这样，由他这位可称海内第一碑文大家所撰文的“平淮西碑”，却仅仅在蔡州矗立了两年不到，就又被天子下令磨去了。韩愈怎么也没想到的是，他是如此的小心谨慎，还是犯了一个大错。

但谁都不可能预卜未来，至少韩愈和他的上司裴度在当时没有认识到。所有人还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和繁杂的后续事务中，无暇去理会其他。人们有这样一种隐约的预感：河北的割据也将不会长久了，帝国正在“中兴”之中，甚至可以恢复到天宝年间全盛的状态。天子和朝野上下都为这个快要到来的事实而激动不已。

确实，朝廷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而得到的绝不仅仅是淮西一隅的三个州而已，它获得的是失去已久的威望和对天下的强大震慑力，收复王承宗和李师道应该是早晚的事，因此，这些胜利的意义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天子依旧是无上的天子，朝廷依旧是权威的朝廷。仅此也就足够了。

对淮西之役持消极态度的李逢吉已被罢相，被委以剑南东川节度使而出镇京外，在裴度赴前线期间，朝中宰相实际上只有去年年底任

命的王涯和一个月前刚刚任命的崔群二人，宪宗遂征召淮南节度使李鄘入相。

这是出于吐突承璀的推荐。前几年承璀被李绛弄出京外，出任的是淮南监军，其时李鄘正代李吉甫为节度使，二人得以共事。李鄘尽管为人刚峻，但性格内向，他不愿与承璀直接冲突，而承璀也对他心有敬畏，所以在淮南的相处倒也融洽。承璀还京后，又得到皇上的贵宠，他在李逢吉、韦贯之罢相后，便向皇上推举了李鄘。承璀以往吃宰相的亏不小，他此番力荐相选，内中的私意是很明显的。

李鄘却感到受宦官引进是莫大的耻辱，他更不愿意就此入京而受人摆布，以至于接到任命时竟对着手下人号啕大哭：

“本人一向安于外任，宰相不是我这个人能做的！”

但是天命难违，李鄘一百个不情愿地离开扬州，一路上拖拖拉拉，直到十二月二十五日才来到京城，这时裴度都已经从淮西班师回朝十几天了。李鄘一到即上表皇上，称自己重病在身，不能入觐，更不能到位视事；同时，闭门杜客，隐居在家，显然是一心不要当宰相。三个月后，皇上只得罢免了他的相职，而启用了当年裴垍提拔的李夷简。

这时，在朝宰相共有四人：裴度、王涯、崔群、李夷简。主持朝政的仍旧是裴度。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正月，成德、淄青、幽州等镇都上表求朝，表示忠顺。尽管李师道犹不甘心，于七月份再度反叛，但立刻就被朝廷下诏征讨。到这时，朝廷才得知武元衡被刺是李师道下的毒手，众怨沸腾，异口同声地声讨。这一次朝廷已无后顾之忧，各道兵马很快就对淄青形成了夹击，战场上的形势是非常乐观的。

长安城中的气氛却有点不对。这倒并不奇怪，胜利总要给国家带来一大批功臣，他们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应该得到应有的荣誉，然而危机一旦消失，某些人功高盖主，麻烦就不可避免。首当其冲的就是裴度。

七月，李夷简出镇淮南；八月，王涯亦被罢为兵部侍郎。九月，

皇上任命了两位财政官员替补宰相空缺，一位是盐铁转运使程异，一位是户部侍郎皇甫镈。奇怪的是，这项任命引起了裴度的强烈反对。

本来，财政重臣出任首辅，受到一些议论是免不了的，当年的刘晏、杨炎都是先例。任命二人的制书颁布后，长安城中也确实有不少人嗤之以鼻，都说此二人手握财利，多半是贿赂以进。可大家也只是说说而已，只有裴度怒气万丈，觉得不堪忍受。

说起来其中自有原因。当裴度在淮西前线主持军事时，负责供应的就有皇甫镈。在当时的情形下，兵饷粮草是否充足是克敌致胜的关键，容不得私毫马虎，而皇甫镈、程异都难免事有疏漏，因此经常使得前线主帅裴度窘迫万分。这个过节是在生死存亡关头结下的，很不易消解。更何况皇甫镈并非理财高手，他比起程异来在这方面还要逊色不少，所以裴度对他更是不满。再加上有人火上浇油，传言他结交吐突承璀，使得裴度对他简直就是极端痛恨了。

九月二十四日，裴度拉着崔群，在延英殿当面向皇上表示：万万不可命此二人为相！宪宗没有同意。

裴度回宅后一夜不寐，觉得很受委屈：自己之所以如此，亦无非是为国家社稷着想，怎么就不为天子荃察？想到将来要与皇甫镈这个小人同列，一口闷气实在咽不下去，于是连夜给天子上表。

裴度仗着自己功高勋著，在表中话说得很重，称两人为“市肆商徒”、“佞巧小人”；如果一旦置之相位，不仅会使“中外骇笑”，而且将使“亿万之众离心，四方诸侯解体”。并且直指皇上：“今既开中兴，再造区夏，陛下何忍却自破除？”最后甚至以挂冠求去相要挟。

裴度这封情绪化十足的上疏让宪宗很不高兴，他对左右的人说：

“裴度党见太深，如此激讦之言岂是君子所应发？”

消息传出，公议却纷纷倒向裴度。程异是当年王叔文党人，尽管这许多年来一直克勤克职，为国家财赋奔波操劳，但仍不为人们所理解。他灰心至极，自觉不能出当大任，任命发布一个多月了还不敢行使相权，后来自请出任“巡边使”远赴西北，未决而卒。和人们的猜测相反，程异生前理财数年，死后却家无余钱。

程异以谦逊退让来面对裴度的指责，可皇甫铸却没有这么好说话了。

皇甫镈是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的进士，与令孤楚、萧俛是同榜，关系自不必说。元和九年（公元815年）皇甫镩初受天子赏识时，楚、俛两人已为翰林学士，与宰相李逢吉一起，是反对裴度淮西用兵的主要人物，令孤楚因此而丢掉了翰林学士的职务。皇甫镈与令孤楚的交情更不同寻常，这层关系更是裴度所没有想到的。

皇甫镈先在皇上那里做工作，尽量取得信任。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想尽办法为皇上聚财。宪宗对钱物一向关心，早先是为天下用兵，而现在功成名就，骄奢就开始抬头了。当然皇甫镈不能以这个为借口，但无论什么理由，那怕是为敷国用而储备库藏，天子也是很高兴的。皇甫镈站稳了脚跟。

相反，除了河北军事方面，皇上对裴度的信任程度开始降低。皇上觉得在很多事情上，裴度经常使他难堪，有时甚至都不敢在朝会上面对裴度的质询。皇上现在颇容易生气，对裴度不能与皇甫镈和平相处更为不满。

十二月份，对李师道的征讨已经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朝廷两派的明争暗斗也逐渐明显。宫内外都有不少人在皇上面前诉说道：眼下朋党炽盛。其实指的就是裴度。

天子当着裴度、皇甫镈、程异三位宰相的面，很生气地说：

“人臣事君，只要力行善事，自会树立威望。怎么反而好结朋党？朕对此甚为痛恨！”

程异唯唯，皇甫铸知道这是对裴度而发，也不说话，心里暗自得意。

裴度委屈万分，站出来据理力争道：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君子与小人都各有其徒。君子之徒，谓之同德；小人之徒，方称朋党。外虽相似，内实悬殊。”

“其他人也都是这么说，那么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君子、小人，观其所行之事，自有区别。”

皇上不以为然，转向皇甫镈。

皇甫镈显得很大度：“愿圣主辨其邪正而已。”

皇上只好折中而处：

“凡是好事，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卿等既然这样说，必须照所说的去做，不要只是说说而已。”

天子这话听起来似乎更应该对自己说才对。

两个月后，时间到了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二月，李师道被部下杀死，朝廷收复了淄青十二州。淄青自李正己以来，子孙相承不受朝命凡五十四年，是地最广、兵最多的一镇。淄青被灭，表明元和时代的对藩镇的战争顺利结束了，帝国重新实现了统一。

这当然是天子圣明的结果，可是长安城中却偏偏有这样一种言论在流传，说是裴度矜伐功劳，将大功归于己身，已到了让人不能容忍的地步。有人还举例说，韩愈的那篇《平淮西碑》刻意抹杀了著名功臣李愬的事迹，过分地抬高了裴度的功绩就是最好的证明。蔡州甚至传来消息，说李愬部下的老兵不满意碑文对李愬的不公正态度，把那块碑都推倒了。一时间众说纷纭，也不知是真是假，更不用说是源出何处了。

但有很多事情却是活生生的现实：四月二十九日，裴度被命为河东节度使，出镇太原。

七月二十日，令孤楚被征召回朝并拜相，与皇甫铸同知政事。

同一时间，宪宗下诏磨去韩愈撰写的《平淮西碑》，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十二月，碑成。就在这个月，崔群被贬为潭州刺史。

事情总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可不论怎么说，人人都发自内心地感到这几年来确实可称作是一次“中兴”，至少德宗皇帝给人留下的那种痛苦的回忆被抹得一干二净了。明晓历史的人还经常把当前的兴旺与

太宗的贞观和玄宗的开元时期相比，可见人心思治之一斑。可是，天子的主要功绩“削平僭乱”其实有很大水分：在诸镇中，只有势力单薄的淮西是唯一真正被击灭的，河北三镇则无不出于归降。山东之地中地形最重要的是魏博，兵源最广的是淄青，距离最远的是幽州，其根基都未被动摇。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若不予以彻底摧毁，又何谈“削平”？就算是叛乱暂时被荡平了，但却远不能算是治世的实现，统一亦不意谓着太平，更不意谓着永久。若要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因为自古以来，暂时的成功往往就是彻底失败的最好温床，正如其时一位大臣谏议大夫武儒衡——已故宰相武元衡的堂弟——在给皇上的一份奏疏中所说的：

“大功之后，逸欲易生。”

不幸的确被他言中了。

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白居易

中兴之主竟死在家奴手中

天子具有无上的地位，这决定了他必然也具有无尽的欲望。纵欲的结果，只能是毁灭。

皇上多内宠。

天子年轻，血气方刚，好于此道本不足为怪。至少，皇上还算不上夜夜笙歌之辈，并没有玩物丧志而弄得不可收拾，大臣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不过，皇上的毛病在于精力显得过分的旺盛，对色欲有着一种近乎强烈的爱好，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十六岁时生下长子邓王李宁以来，二十七年内共生二十位皇子、十八位公主。

天子嗣育之广并不能保证帝国的储位不发生问题，这一教训尤其深刻，皇上的父亲、当年的顺宗皇帝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宪宗皇帝即位后的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当时还是翰林学士的李绛即认为，天子嗣膺大宝已近四载，而未册储闱，十分不妥，建议皇上为国家社稷着想，早行册立大典。

天子正是信心十足的时候，对此原本不以为意，但早岁的痛苦记忆让他猛省，于是立即宣布立长子邓王李宁为太子，改名“宙”。

太子的母亲却并非正宫。宪宗在东宫时的正妃是郭氏，出身于名门，乃当年郭子仪的孙女。郭氏也生有一子，名李宥，时封为遂王。遂王之所以未被立储，大概是郭氏虽是当年的正配，但天子即位后却一直未立皇后，她也就是在元和初年被立为贵妃而已，其子既非长，也就没轮上这一幸运。可这个猜测却很难站得住脚，因为邓王虽“长”，但却非“嫡”，也只不过比遂王大两岁而已，如何就被付以国储之位？这一点很让人费解。

邓王有这个运气却没有这种福气，刚做了两年太子就去世了。照理，遂王入继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议立储副之时，却竟然发生

了争执。原因是吐突承璀力排众议，请立澧王李恽。澧王尽管是皇上的次子，不过既非嫡出，也不为皇上所爱。众人坚持原则，要立大宗嫡子的遂王，宪宗没有理由反对。

不过，承璀表现出来的忠心耿耿一向让皇上感到欣慰，他奉请立嗣澧王，似乎也有他的理由。皇上表面上虽然没有答应，但内心觉得在储嗣问题上，似乎更应该相信吐突承璀一些。

在举行册立遂王为太子大典的前夕，宪宗召来翰林学士崔群。当时翰苑诸人，崔群受宪宗奖遇最深。

“卿代澧王撰一封让表如何？”这明显已经是意有所图。

崔群认为此举不合情理，遂道：“凡事理合当之而不为，方有谦让。今澧王不当立，如何能上让表？”

皇上心想：这话说得不错。他在这件事上最终没有听从承璀的意见，还是册立了遂王李宥。太子一入东宫就知道了其中的波折，把吐突承璀恨在了心里。

还好，这事在皇上当政期间未发生大乱。但是，在许多胜利面前，皇上的成就感太强，他有一种愿望越来越炽烈，最终给他招致了大祸。

皇上好长生。

本朝为李氏宗庙，奉太上老君李聃为远祖，受天命而治天下，故以道教为国教。道者，或玄或气，或丹鼎或符箓，皆以致学仙道、修达真性为旨归，故而服饵炼气以求长生，不免为其中之一流。本朝士人率性自然，不为世俗拘碍，好神仙方术，亦是言人人殊之理，本无足置喙。但是，人主为万民所望，若耽于神仙虚幻之事而贪长生，就不是为君之道了。

宪宗却十分执著。早在元和五年，宦官张惟则出使新罗，路经海上，回来后编造了一个离奇的故事，称自己在一座孤岛上偶遇神仙，花木楼台间仙人戴章甫冠、着紫霞衣，口道“唐皇帝乃吾友也，烦请传语”云云，说得天花乱坠。皇上居然大喜：“吾前生岂非仙人？”为之

感慨良久。从此之后，更是不断下诏罗求天下方士；唯求长生。上有所好，趋利之徒遂纷纷于道路。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十月，有一位叫李道古的大臣因怕人追究他在鄂岳观察使任期间的不良行为，正苦苦思索取媚皇上的方法，忽一日，计上心来。他找到宰相皇甫镈，道：“属下在鄂岳时，有一山人柳泌能制长生不老之药，敢请阁老荐与圣上。”

皇甫镈告之宪宗，皇上立即下诏命此人入京，住到兴唐观专门炼药。

柳泌炼了一段时间，毫无所获，于是对皇上说：“台州天台山乃神仙所居，山中灵草奇多，臣虽知之但无力致取。若陛下委任臣主掌该地，也许能为陛下求得。”

宪宗听他如此说，即命他暂代台州刺史。谏官们大为不服，纷纷上奏：“从来也没有授方士为地方长官的先例！”

“烦一州之力而能为人主致长生，卿等难道舍不得吗！”皇上很不满这些反对的谏官，认为他们有失为臣之道，一点都不为天子考虑。

可这位柳泌又岂能轻易找到不死之药！在台州折腾了近一年，还是一无所得。这下他开始害怕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竟举家逃入深山。浙东观察使闻知，派兵把他抓回解送长安。朝廷本欲治罪，可在皇甫镈、李道古二人百般说情下，皇上不仅没有处理，又命他为翰林待诏，并且仍旧服食他所炼就的丹药。

凡是服食方士所制“长生之丹”，马上就会有两个反应：一是口渴难当，二是脾气躁怒。据方士说，此乃脱胎换骨必经苦楚，耐得住即可成仙。宪宗服药后的反应更是厉害，但一想到唯有历尽艰难，才能长生不死，也只有忍住。可是，皇上身边的人可就受苦了。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的最后几个月，皇上变得极为暴躁。在药力的作用下，有时神智紊乱，狂怒得像头笼中的猛虎。左右的宦官近侍，动不动就被他一脚踢开，喝令推出斩首。宫中人人自危，仿佛末日临头一般。

皇上身边的宦官们觉得，皇上为求长生可以忍受，而他们再要忍下去连苟全性命也不可得了。

新年（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元旦，宪宗终于得病，这天的朝会被取消。此后天子连续数日不视朝政，京师人情忧惧。直到二十五日这天，杀李师道而反正、被朝廷委以义成节度使的刘悟来朝，皇上在麟德殿接见了他，刘悟出宫后说皇上龙体并无大碍，才使得人心稍安。

但是，宫中的实际情形如何，外人谁也不知道。只有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隐隐有些不祥的预感，他很清楚目前在宫中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承璀与皇上的感情非同一般，可以说没有皇上也就没有他，可此际承璀却并没怎么去想皇上的病体或者宫中的不正常现象，他心中计议的是另外一件事。

承璀在宫中多年，得出了一条重要的经验：作为伴君的近侍，掌握天子是第一位的。而结纳天子，却必须从储位开始，这样的关系才牢不可破，正如他与宪宗一样，十几年的交情从太子时就成形了，没有谁能予以破坏。在这个微妙的时刻，承璀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的立储旧事，想起了自己曾反对过当今太子，突然不寒而栗。

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承璀不敢怠慢，立即开始行动。这天夜里，他秘密召见了手下的神策军将领，又在宫中会晤了与自己关系匪浅的不少宦官。谈话间，当承璀提到“澧王”两个字时，大家都明白了。

事情做得再缜密，还是没瞒过东宫。太子得到情报后大恐，赶紧派人去请教他的舅舅、司农卿郭钊。郭钊是位正统之士，他对来人说：“请告太子但守孝谨，勿想其他。”

这句大道理谁都会说，但关键是天子的宝座却并非保持德行就能够顺利坐到的。太子不急，宦官中与承璀对立而倒向太子的人也不能坐待。这一方的主要人物是王守澄和梁守谦。守澄时为内常侍，是皇上身边的人之一；守谦为右神策中尉，与承璀一样，掌握着左右神策

军的一半军权，两人不满于承璀的得宠是十分自然的。

还未等两派有具体动作，大变已经突生。

内常侍陈弘志早已不能忍受皇上的暴怒，更害怕皇上稍有康复后再度发作，说不定下一个莫名其妙身首异处的就是他。弘志在恐惧的压力下已不能自持，二十七日，在中和殿将熟睡中的宪宗缢杀。当然，单凭恐惧是不可能使一位奴才顿生弑上之心的，有一种可能性无法排除，那就是陈弘志或许得到过王守澄的暗示，或者受有来自某种更深处力量的直接命令。无论如何，可怜一代天子，就这样死在了家奴之手。

弘志做完，业已神志恍惚，他唯一还知道的是走出殿来，派小黄门去请王守澄。守澄起初不知何事，但当他与弘志一起走进殿内皇帝的寝室，一眼见到呼吸停止的皇上时，却出奇的冷静。他用手拍了拍不知所措的陈弘志，拉着他一起走出，对手下人道：

“速请中尉梁、马、刘、韦诸大人来此议事——”守澄的话中不无悲戚，“圣上药发，遽而升仙了！”

这时，吐突承璀还蒙在鼓里。

当天，王守澄与右神策中尉梁守谦及中尉副使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等共迎太子入宫，即时立为皇帝。同时，两队神策军士紧急出动，直奔承璀与澧王李恽的府第。未过多久，二人解到，被就地处死。

新一代天子在闰正月初三于太极殿正式即位，后来的庙号为“穆宗”。即位之时，年二十六岁。

新帝对这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清清楚楚，但他丝毫不以为意。对这位年轻的新君来说，做了皇帝就足够了，他根本不想为其他事烦心。他现在已经成功地成为天子，是天命造就的万人之主，谁又能说三道四？

但王守澄当然不会这样想。要知道已故的宪宗是一代英主，声威正如日中天，假如真相泄露，他王守澄有几个脑袋？他要做的事太多

了。

还好，朝野上下都知道宪宗服药已近沉迷，对皇上是因中毒而暴卒的说法并未表示怀疑。事实上，谁也没有想到英武威德的天子竟会被一个小小的内侍谋杀，国家正在中兴，人们想象力再丰富，也不可能产生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猜测。王守澄封锁消息做得相当成功，或许也只有少量的宫人晓得一些蛛丝马迹，不过，一道高高的宫墙阻挡了这一切。

吐突承璀和澧王被杀引起了一些议论，穆宗同时还把皇甫镈贬到了崖州。但前者多少算是天子的家事，臣子无得间辞；后者更不用说了，皇甫镈以掊克希上著称，时誉本就不好，发配之时，市井欢声不绝，谁还去问其他。

只是宪宗皇帝英年早逝，仍给大家震动不小。河北新平，后事尚多，唯一能够镇住大局的天子忽尔仙逝，怎么也让人忧虑不安。朝中派系的争讦日趋明显，四方夷狄又虎视眈眈，所有这些，都在“中兴”的喜悦上投下了一缕阴影。新帝穆宗在即位的当天，想请自己以前的两位师傅兵部郎中薛放、驾部员外郎丁公著出任宰相，薛、丁二人都感到在这种时候难以胜任，固辞不就。

五月二十六日，群臣上先皇帝谥号为“圣神章武孝皇帝”，庙号“宪宗”。二十九日，葬于景陵。

宪宗未享天年，既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幸运的是宪宗保住了自己的威名，因为他刚死两年不到河北又叛，从此帝国竟再也没有真正统一过。不幸的是，宪宗这位中兴之主竟死在被他称之为家奴的宦官手中，算起来，这还是本朝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但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罪恶只要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幽州告急，又起风云

中兴局面的好景不长，并不是最令人失望的事。真正值得悲哀的

是，从宪宗被弑开始，帝国的政治波澜中，又多了一股汹涌的狂潮。

元和时代的最后一年，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实际上是穆宗皇帝的头一年，因为宪宗在正月就去世了。新帝即位后，朝廷对河北采取了一系列后续措施，目的是进一步巩固战果。

中央政府首先是把各大方镇的首脑来了个大掉换：将魏博的田兴（此时已赐名弘正）调往成德，李愬由昭义调往魏博，刘悟自义成徙驻昭义，而将成德的王承元（承宗之弟，其时承宗已病死）调防义成，同时又任命田弘正的儿子田布为河阳、怀、孟节度使。调换节将同分割藩镇一样，都是朝廷的政治手段，既可以成事，但也可以败事。

成德的王承元受诏上路时，诸将号哭喧哗，不让他走。承元感慨往事，不愿再与朝廷对抗，去意甚坚，甚至杀掉了几个带头挽留的将领。这一次，成德镇破天荒地没有率先闹事。淄青镇在刘悟杀李师道而归顺后就立即被一分为三，由朝廷委任马总、薛平、王遂三人分领，刘悟被调领义成，虽然失望至极，但不敢抗命，此番徙往昭义，也就不好再说什么。麻烦出在最北的幽州镇。

第二年，公元821年，穆宗改元“长庆”。

这时幽州的节度使是刘总，他是原节度使刘济的第二个儿子，在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伙同亲将毒死了其父，并又杖杀了亲兄刘绲，得以总领军务。此人极为阴险狡诈，从其弑父杀兄上即可见之。在河北战场上，刘总表面上接受朝命对成德、淄青开战，实际上却按兵不动，空领朝廷供馈。吴元济、王承宗、李师道先后死去后，三镇相继归服，刘总失去党援，明白朝廷不会放过他，忧惧万分。

不知怎么，在恐怖之下，他的良心突然发现，夜夜做噩梦，看见父兄被杀时惨烈的情景。刘总悖惕不已，遂于官署后置道场，令数百僧人昼夜作法请父兄恕罪。这样度过了不少个忧惧不安的日子后，刘总感到无法忍受了，万念俱灰之下，选择了遁入空门来彻底解脱。临行前上表求归，朝野闻之颇为感慨，穆宗赐法号“大觉”。或许“大觉”后必证涅槃，刘总离开幽州还未走出多远就暴卒而亡。

朝廷派前相张弘靖入幽州主事。弘靖虽不是个无行之辈，但却不会办事，安抚工作尤其没有做好，给不满于归顺朝廷的人找到了借口，相率谋反。本年的七月十日，幽州旧兵们鼓噪而起，把弘靖囚禁了起来，并杀掉了他的随官。这件事情本来还闹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有一个早有异心的人利用了这次事变，此人就是当年朱滔的曾孙——朱克融。第二天，朱克融在哗变军士的拥戴下，宣称“权知军务”。

八天后，田弘正也被不满于受他节制的成德军士所杀，领头者是成德镇都知兵马使王庭凑。这个胡人的后代暴悍凶险，共杀了田弘正及其手下将领、家属三百余人，自称留后，逼着监军宋惟澄奏求节度之职，成德镇终于再叛。

八月三十日，宋惟澄把消息报告到长安，震撼了朝野。

谁都没有思想准备。

去年在任的宰相萧俛当初就是反战派之一，他一向认为不宜穷兵黩武，在河北初平后，更是屡劝穆宗就此息兵。为此，萧俛给皇上献了一条“消兵”的秘策，这条计策建议朝廷容许各军镇每年有百分之八的军士逃亡，从而渐渐地削减天下兵员之数。从道理上说，本朝数十年来致乱之由，实因地方兵多将广，既不足以平叛，又徒耗民力，因此这个建议确实是一个聪明的策略。但计策虽好，却根本来不及实施。河北的根基尚存，叛乱只是时间问题。

继幽州、成德之后，魏博的田布也没能压住阵脚，在士兵的压力下无可奈何，不得已自杀身亡。朝廷没法，只能以带头煽动的将领史宪诚为帅。魏博一乱，形势就不妙了，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变故不绝。

新帝是个典型的享受派，好击毬，喜狎俳优、观杂戏，尤沉溺于畋游。享受天子乐趣的心占据了他的整个头脑，他可没有像他祖父、父亲那样的雄心大志，自然也就管不了这许多。

幽州之乱，朝廷命刘悟出征，但被他推辞。李愬尽管壮心未已，准备出战，但不幸得病谢世。于是裴度立即又被任命为征讨河朔的主

帅，领李光颜、乌重胤等名将再度出击。但是，十万之众，在近半年的战事中却一直没有取得效果。次年二月，朝廷不得不给王庭凑昭雪，并授为节度使。宪宗勘定藩镇的所有成就从此化为泡影，短暂的“中兴”也宣告结束。

理固其然。在几十年的战争之后，朝廷与藩镇最终落得了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谁也不能把对方一举吃掉，寻求一种根本妥协已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天平的两头一旦开始均衡，冲突就不再显得那样激烈，如同阴阳之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似乎都不成为对立面了。然而令人焦虑的是，从长远来看，朝廷这一方是慢慢地衰落着，而藩镇却是一天天强盛起来，总有一天这种平衡会被彻底打破，那就将是毁灭性的。

但这不是现在的事，当前的问题是帝国的政治出现了一种新的局面，并足以让这些自霸一方的藩镇退到次要的位置上去。实际上，从宪宗之死开始，就已标志着这个时代的到来。在此后的数十年里，宦官得以走上了国家政治的舞台，九世纪的波澜中，又多了一股汹涌的狂潮。

风云再起。

宦官与禁卫军

宦官是奴才，也是被压迫者。挟天子以自威自重，并最终达成反奴为主，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愿望。宦官一旦掌握了禁卫军，他们的愿望就有了实现的可能。

宦，仆隶也。“宦官”，原就是指宫内侍奉之官，起初并不都是阉者，后汉时宦官开始全部用刑余之人，不复杂间他士，后世遂以“宦官”称宫中为皇帝仆役之阉人。士人蔑视之，抑或称“宦寺”、“宦竖”、“阉宦”。

说起来，一切原委还肇始于有一位万人之上的天子存在。人之

初，性本善，但若是生为人主，天赋权威，则后天之习必与常人迥异，以天下为娱乐之具而遂一己之好，也就成为他们的本性了。后世君主固不待言，即使先圣先王，亦从无例外。

于是崇宫室，于是广嬖幸，御柳宫墙之内，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后宫三千犹不得足，恨不得天下女子皆为我有。历代相因，竟成定式，这倒也罢了，关键是后宫既广，则需要有人为天子管理守卫，所以阉人应运而生。阉割称为“宫刑”，残暴酷烈，莫此为甚。但不如此，则不能保证天子的私有财产不被沾染。阉者刑余之后，人道已失，守之后宫，断无可忧，这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办法！

无数不幸的人们就这样成为天子的家奴，他们既为人主所驱役，又为世人所不齿，心中惨怛，发之于外，遂有慷慨偏激之举。从后汉时期起，就有宦官们干预朝政、擅权自利的记载。在惨痛的教训面前，天子和朝臣定下了许多防范的措施。然而，宦者既为天子所必需，就注定了那些规矩是挡不住被压迫者的奋发的。

本朝虽也不能幸免，但在立国之初，情形倒还不错。

起先宦官常员所设，主要就是一个“内侍省”，掌统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内坊六局，有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内给事十人，此外还有内谒者、内寺伯、寺人等名目，皆为清一色宦官担任。太宗皇帝为限制宦官之权，曾立制规定内侍省不置三品官，以此本省最高官“内侍”不过为“从四品上”，防范不可谓不力。

太宗皇帝在这方面是很有心计的，有几次他派宦官出使外地，结果反应不好，太宗就非常生气。宰相魏征——本朝最著名的宰相之一——对此发表了一个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朝臣对宦官的普遍看法。

他对太宗说：“阉竖地位虽微，但是狎近左右，时有言语，易为人主所信，若出谮言，为患更深。圣上明鉴，可以无虑，然为子孙万世计，不可不杜绝其源！”

太宗深然，遂下诏，自此以后，不再以宦官充使外出。这可谓是最好的防范措施，但同限制官品一样，后来也没能坚持，以致最终形

成了宦官不仅有高官厚禄，而且不断充当各种专使、通过使职擅政的恶劣局面。若要就事论事地追究起来，造成这一恶果的罪魁祸首是太宗以后的两位皇帝：玄宗和德宗。

玄宗实在是出于无奈。“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在外重内轻的态势下，为保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不得不行宦官监军之制。时势使然，不能求全责备。但德宗却难逃其咎。

就以此事来说，以宦官监军分领军权，固可以使将兵叛变之事多些阻碍，但打不了胜仗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这对于久经战乱的帝国来说，是不能不思变革的。况且宦官跋扈骄纵，有时甚至还激起兵变，已经成为百弊而无一利的东西。肃、代两帝以来，议者论之不绝，废停此制已成共识，就是德宗皇帝本人，肚子里对此也是清楚得很。

顺宗时倒王（叔文）主将之一的薛盈珍，德宗时就曾出任义成军监军。此公仗恃圣眷，欲夺节度使姚南仲的军权，南仲不从，两人翻脸。盈珍便屡向德宗密报对方的种种不是，果然搞得皇上对南仲发生怀疑。不久盈珍尚嫌不足，又派一员小吏程务盈从驿道赶往长安诬奏。巧的是，南伸手下的一位牙将曹文洽正要赴京公干，得知个消息后昼夜兼行，追上了程务盈。

驿馆中，文洽假装与他亲热，乘机将其灌醉后杀掉，把薛盈珍的上表丢在了茅厕中。自己又同时写了一封上表给皇上，一封信给姚南仲，然后自杀。

这是其时监军、节度使之间闹得还算小的一件事。事发后，姚、薛二人都被召来长安。

德宗问姚南仲：“薛盈珍干扰你了吗？”

南仲答得好：“薛盈珍没干扰微臣，是微臣自己乱了陛下的法。不过，天下如盈珍之辈者所在皆有，臣等又如何行恺恺之政，成攻取之功？”

说得德宗默然。

然而他还是我行我素，继续他的方针。德宗不是不知道其中潜伏的危机，在他“不知依仗何人”的表面下，德宗其实固执地坚持着一条原则，在他看来，宦官尽管有着多少不是，但却不会反对自己，因为皇帝是他们赖以存在的基础。比起那些朝官来，他们更可靠，更易于驱使。德宗在纷扰的现实面前，选择了一条自以为聪明的道路：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包括与自己二位一体的宦官。德宗没有想到的是，他最终把灾难留给了自己的子孙。

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左神策监军窦文场排挤了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独掌军权。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德宗又设立左右护军中尉，并以宦官担任。

鸟瞰帝国的首都长安城，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宫城居北，为皇宫所在，包括太极宫、东宫、掖庭宫；南五门，承天门居中；北三门，以玄武门分左右。皇城居城南，为各官衙所在，北面无墙，与宫城以横街相对；其间南北七街，东西五街，中央各署分列其间；南面正门取法天象号曰“朱雀”，与“玄武”对称。朱雀门出一大街直趋外郭城，宽一百二十步，纵九里又一百五十五步，可称名副其实的“天街”。

外郭城位于皇城、宫城的东、南、西三面，为官民住宅及市肆所在，共有东西大街二十五条，街面宽广，两侧均有整齐水沟，当初裴度就是因落到沟中才得以逃生。此二十五条大街分全城为两市、一百零八坊里，以朱雀大街为界，东半五十四坊及东市属万年县，西半五十四坊及西市属长安县。白居易有诗道“百千家如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真是形象无比。

很清楚，宫城居北，因而守卫京城的卫戍军主力必定是布置在这里，地点就在宫城北大门玄武门之外。其军初由禁军中之“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组成，本朝人又称之“北军”，与由十二卫将军掌握以护卫皇城百司的“南军”对称。安史之乱后，又置“左、右神武军”、“左、右英武军”，共八军。北军所处地势极其重要，掌握着天子所居之地掖庭官的北大门，玄武门一旦生变，则宫闱必不保。当年太宗皇帝杀兄逼宫，就是因为有北军之助，于玄武门一击成功的。

后来情形略略有了变化。

一是高宗嫌太极宫潮湿，扩建了位于宫城东北的大明宫，并迁居该地，此后除玄宗外，诸帝都在此居住听政，大明宫取代太极宫而成为了宫廷中心。

二是神策军渐渐成为禁军北军的绝对主力。神策军早先是陇右节度使所属的一支劲旅，起初主要承担的是西北的防务。直到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宦官鱼朝恩率此军在吐蕃的入侵中为保护代宗立下大功，才成为禁军编制。此军经常出征，地位日重，由于德宗归之于宦官，因而赏赐亦丰，于是驻防长安四周的部队纷纷请示隶名于神策军籍以广其衣粮，以致挂名之旅遍于全国，数量迅速扩大，贞元时已至十五万人。但其核心仍是京师左右神策军，实际上的统帅就是左右护军中尉，与禁军中的左右龙武、左右羽林军分驻大明宫东北、西南两侧的九仙门、太和门外。在这一点上，一如太宗时玄武门外的情形。与以前所不同的，也是最要紧的是：它却是由宦官所掌握。

所以，当年顺宗的嗣君地位发生危机的关键时刻，他即使重病在身，也不得不强扶病体力疾出九仙门安抚；而右中尉梁守谦与王守澄诛杀了左中尉吐突承璀之后，立即就赐给左右神策军士每人钱五十缗，其他六军每人却只有三十缗，都是出于这个道理。

宦官有了神策军，长安城的格局也就不再是横平竖直的方正之象了。有一种势力正越来越大，终将会彻底摧毁旧有的态势。这一天已经慢慢到来。

变化中的格局

天子家奴与朝廷士子是永远排斥与斗争的两极。在宦官的势力日趋浓炽之下，假如士人们不能精诚团结而是各私其心，那么政治黑暗就必所不免。

裴度对再叛的河北诸镇没能取得战果固然是大势所趋，但也有重

要的其他原因。

皇上在头一年贬斥了与吐突承璀有染的皇甫镈，以令狐楚、萧俛、段文昌为相，三人都是反战的中坚，自不会对突变的形势有所准备。第二年初，又贬去令狐楚，引崔植为相。崔植是崔祐甫的侄子，因坚决反对皇甫镈而名重朝野，得到皇上的赏识，入相后，也颇能尽谏。此人学问倒是不错，但却不懂军事，更缺乏政治远略。在战事拉开，萧、段两人先后去相后，他与原翰林学士杜元颖共同主知政事，同样也是无所作为。

天子只有二十六岁，正是玩乐享受的最佳时光，他可不愿意放过。正式即位的第一天，仪式刚刚完成，皇上就迫不及待地召来倡优演杂戏给他看，这边百官尚未走出大明宫，穆宗就已在丹凤门楼上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第二天，皇上又到神策军营看人摔跤。即位以来，如此之类的宴游畋猎，几乎没有断过。谏官们上奏，告诫他要适可而止，皇上竟大为惊讶，对宰相道："此辈何人？"连大臣都不认识了。

原因还不仅于此。

人为天地万物之灵，"公平"是文明的基础。本朝是文教昌盛的时代，伦理教育让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士子或以才华德行取仕，或以报效边庭立功，忠君报国，安身立命。可若是没有了"公平"原则，一切都成空谈。就是地方藩镇的那些武将，拼死拼活也无非就是想以武功证明这一点而已。同理，天子既然造就了一个宦官阶层，他们也就不可能永远甘心为奴。

本朝为士子提供的公平手段是相对严格的考试制度，给武将的进身之阶自然也就是战功，但士流以外的工商杂类什么也没有。宦官表面上有官品，但实际上鄙卑更甚，他们只是奴才，甚至比奴才尚低一等，因为他们甚至是"非人"。宦官所能得到的，似乎只有皇帝对奴才的赏赐而已。这个大大的不公平永远是激发矛盾的根源，历朝历代都不乏先例，而到了此时此际，它开始有了一触即发的态势，宪宗之死就是个信号。

宦官掌握了神策军，使他们具有了这种能力，而枢密使一职的出现与壮大，更使得他们拥有了机会。

“枢密使”正式设立是在宪宗元和初年，又称内枢密使，左右各置一员，首任者是刘光琦和梁守谦。枢密使的职责是“承受表奏、出纳王言”，说白了也就是承“上”启“下”，“上”是皇帝，“下”是宰相。这个职务的性质就决定了它能兼达两头，既可以乱帝听以削挠相权，又可预宰相共参政事。“枢密使”使宦官在取得军权的同时，进而获得了政事权。

宦官王守澄立有大功，此际已被穆宗命为枢密使、知枢密院事，负责内外传达，但权势绝不仅限于此，他的地位早已超过当年的吐突承璀。更何况皇上喜淫逸，少不了与他同乐的人，宦官们比朝官更胜一筹的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握了天子。宛如儿童的穆宗是第一个完全的战利品。

和宦官的气势相反，帝国的现实是骄主荒淫，辅相庸碌，政策、处置皆无是处，在这种情况下，谁又能在前线打胜仗！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朝廷中的头一件大事是在三月份的一次“常科”考试中发生的。“常科”是国家每年举行的常设考试，与皇帝召试以待非常之才的“制举”不同，科目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以“进士”、“明经”最为重要。这次考试的主考是右补缺杨汝士和礼部侍郎钱徽。

本朝科考并不糊名，应考者的姓名对主司是公开的，因而考生的名气与声望乃至家世、与主司之关系等对考试结果有异乎寻常的作用。为国家选才是人臣的义务，可以唯才是荐，甚至可以举贤不避，这一次也不例外，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都对钱徽有所推荐。

然而榜出后，段、李所属者皆名落孙山，而及第者中大多是公卿子弟，其中还有考官杨汝士的弟弟。段文昌不服，认为太不公平。皇上征询意见，有不少人持同样看法，结果这次考试成绩取消，重新进行。此次事件牵涉到不同意见两方面的很多人，段、李这方面有宰相

裴度、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主考官钱、杨方面则有中书舍人李宗闵等人。事情虽然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谁也没有把它就此忘记掉，特别是在事件中得到贬职处分的李宗闵。

这年十月，刑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王播入相。此人在三年前曾出为西川节度使，皇甫镈去相后屡请还京。王播在财政上很有些办法，手上颇有些钱，宦官的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早在年初，萧俛听说他靠此道求职，极其愤怒，到皇上面前力争："王播如何可以入居台司！"穆宗要靠王播弄钱，没有听萧俛的。萧俛一气之下，辞去了相职。不久段文昌也被命往西川，王播得以和杜元预同时入相。

四个月后的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二月，河北宣告停战，工部侍郎元稹被命为宰相。

此人更是大有故事。

元稹字微之，早年与白居易、萧俛等人同时踏入仕途，也是以才气知名之士，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因与裴度上疏指责朝政，引起宰相杜佑的不满，同裴度一起被贬。裴垍入相，裴、元二人先后被起复，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元稹以监察御史"分司东台"，到设在东都洛阳的御史台亦即所谓"东台"或"留台"任职。在任期间屡屡劾奏地方大吏，又引起不少怨恨，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二月，朝廷调他回京。

这一日，元稹回京的路上走到华州，见天色将晚，遂留宿于一个叫"敷水驿"的驿站。驿站中看到是监察御史大人，不敢怠慢，安排他住到了唯一的上厅。不意到了夜里，事情来了。

帝国交通十分方便，驿道四通八达，尤其是长安到洛阳这一路，全是宽广的大道，和全国各地一样，道旁每隔一段就设有驿站，供往来的官员休息、换马。大的驿站中皆有上、中、下不同的厅房，以接待不同品阶的公务人员。这一天很巧，在夜里，一队宦官也来到敷水驿下榻，为首者是奉命出使的内给事刘士元，刘士元一进来，当然要到上厅去住。

站吏报说，上厅已有人了。御史与中使都是经常在驿站中落脚的官员，朝廷对此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御史到馆驿，已于上厅住下，有中使后到，则就别厅；而如有中使先到上厅，御史后来，亦就别厅休息。站吏心想，虽然内给事官品要比监察御史高好几级，但有这个旧例在，倒也好安排。

刘士元可不答应，一听不过是个监察御史元稹，更是傲气："叫他换到别处去，上厅本使要住。"

站吏一看不是路，不敢违抗，只得前去请元稹移驾。元稹这时已更衣毕，正欲就寝，一听这话也有气，隔着房门对站吏道："本官先到，断无让厅之理。"

站吏回报士元，士元大怒，对手下人道："跟我进去，今天倒要看看什么人敢如此托大！"众人齐发一声喊，随着士元就往里走。

士元手提马鞭走到门口，一脚踢开户门，指着元稹破口大骂，同时甩手就是一鞭，正中元稹的面颊。元稹吓得连鞋子都来不及穿，拔腿就往后厅跑。士元哪里肯放，追上去用鞭子乱挥。

元稹的马早已被士元的人牵走，元稹是进退不得，只好在驿站中四处避让。士元又呼令手下人去找弓箭，只吓得元稹魂飞魄散方才罢休。

元稹狼狈赶到长安，不少朝官们都感到是奇耻大辱。他的好友白居易一连上了数表，为元稹无端受辱鸣不平。连跟宦官关系不错、其时正任御史中丞的王播也摆出旧例认为这是刘士元做得不对。但宪宗在两人之间，肯定是选择偏袒宦官这一方，还是借他故将元稹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后来又先后调他到通州、虢州任职。

元稹这一去就是十年，十年的挫折让他大大转变了。元稹家境贫寒，完全是靠奋发才走得到今天的地位。这次教训让他"如梦初醒"，感觉到凭着他以往的那种年少轻狂对自己的仕途是极为不利的，于是"痛改前非"。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宪宗大赦，元稹被召回京任职，为了达到进入台阁，甚至做宰相的目的，他竟开始结交曾给他以羞辱的宦官。

第一个是他在江陵的故交监军崔潭峻，第二个是入京后认识的神策中尉副使魏弘简。有一段时间，元稹经常轻车简从，出入于魏弘简宅第，以事相请。结交宦官的效果出奇的好，穆宗即位之初，元稹就因回朝述职的崔潭峻之荐，被提升为库部郎中，兼“知制诰”。所谓知制诰，就是有资格参与诏书的草拟，本朝除禁中的翰林学士、禁外的中书舍人以外，一些官员也可以本官带“知制诰”。不久元稹又被召入翰林，任中书舍人，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

当时的几位宰相中，萧俛从来不喜欢超格任人，对元稹原本又无好感，因而很讨厌他的冒进。只有段文昌对他不错，还专门在皇上面前替他美言。但朝中都知道他转托宦官的事，对元稹之辈靠此道捷足先登都十分不满。中书舍人武儒衡就当面给过他们难堪。那是在一次知制诰官员的会食上，众人正在吃饭，正好有不少苍蝇飞来，儒衡以扇挥之，口道：“哪里来的东西，一下子就能聚集到这里？”众人听罢脸色都变了。

元稹此际也是主张罢兵的，他的不少诗歌反映了这个观点，正合穆宗之意，所以在魏弘简的建议下，终于在河北战事结束后用他为相。裴度照理是与元稹共过患难的人，但见元稹附和宫中主张而阻挠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十分气愤，三次上表反对启用元稹，迫使皇上把元稹和魏弘简都降了职，两人由此产生了重大矛盾。

这是一个危险的开端，在对河北的战事以失败告终之后，朝中派系分野已经日趋复杂，离合变化层出不穷。朝官们好使意气，囿于私见，不能开诚布公，攻讦又日益严重，自然也就给另外一种势力以可乘之机。而裴、元不和，更是雪上加霜。

元稹终于得以入相，元、裴二人的矛盾便开始闹大。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二月，元稹力请昭雪王庭凑，并建议为彻底息兵，应立即解除裴度的兵权。皇上同意，下诏命裴度为东都留守。制诰一出，遭到不少反对，穆宗便命裴度先来长安再说。

裴度一到，第一件事就是请皇上下令杀掉一个在昭义镇恃恩骄纵的监军、宦官刘承偕。此举虽然没被皇上答应，可依然得罪了宦官，裴度还是被命出朝，去任淮南节度使。这一下朝中议论纷起，都说在

此关头，有将相之才的裴度不宜外出，才使得他留在了朝中为相，与元稹共同主事。这是三月份的事。

元、裴两人倒是暂时得到了妥协，但政治分野绝不是非甲即乙的事，元、裴互相嫉恶，可还有与他二人都有矛盾的人存在。同时，宦官势力既然掺合了进来，也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事情麻烦了。

前宰相李逢吉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他可没有闲着。

逢吉颇和早年的杨炎类似，有一种对个人恩怨过分执著的心态。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平淮西之前被裴度挤出朝廷后，一直都耿耿于怀，几年之间，心里很不是滋味。逢吉知道，眼下裴、元不和，正是自己的良机。但身在外任，无可奈何，一切都必须回到长安才行。

他的族子李仲言对他建议：走宦官的路子。

李仲言道："侄认识一个奇人，名唤郑注，此人虽以医术闻，然有经略之才。早年在李营中为王守澄治疾有奇效而为其所知，今为中尉王氏守澄近侍第一人。若托郑注交结与彼，事无不成。"

逢吉纳其言，请郑注达意与王守澄，守澄正恶裴度不亲己辈，一拍即合。就在五月份朝廷果召逢吉入京为兵部侍郎。逢吉一入京，真的就来了机会。

在被朝廷昭雪之后，王庭凑依然将朝廷任命的深、冀节度使牛元翼围困在深州，时间已将近四个月之久，很使朝廷难堪。穆宗只知道一意姑息，根本不解决问题。有一位将门之后于方欲立大功，设想了一条奇策，秘密求见宰相元稹。

于方道："有两位奇士王昭、王友明曾在燕赵间行走，与贼党很熟，可于敌营中行反间计而解牛元翼之围。"

元稹大感兴趣，赶紧问他如何安排，于方一笑，说道：

"本人愿以自己家财资其出行，并可贿赂吏部官员，弄出二十通告身文书，供其见机使用。事出机密，故而不得不变通行事，还望相公批准。""告身"，就是吏部对官员的委任状。

此事本意虽佳，但不通过朝廷擅自主张，又贿赂朝廷命官，实属于违乱法纪之举。但元稹出任宰相，受人讥笑太多，一直想有所建树，心想此计若能得逞，正是大功一件，竟也就糊里糊涂地答应了。不料，此事竟被李逢吉探到了一点风声。

逢吉其实并不清楚事情实质，他得到的消息只是某位宰臣将有机密之举。但对他来说，这也就足够了。

五月的一天，裴度府中来了位叫李赏的人，说有要事面呈裴相。裴度不尚奇诡，就请他在前厅明说。

“和王府中的属官于方，不知相公知道否？”李赏先问了一句。

“知道，此人乃故司空頔之后。”

“正是这位于方，欲为某侍郎结刺客击杀相公，不可不防！”元稹是以工部侍郎的身份挂“同平章事”衔行宰相之权的，李赏的话很明显。裴度一听，心想这从何说起？元稹再与自己有隙，也断不至于如此，这个李赏的用意太恶毒了。但裴度的气度自非寻常，在未了解来龙去脉之前，他是不会轻举妄动的。所以忍而未发，只是淡淡一笑：“言尽于此，谢君厚意。送客！”

几天过去。裴、元二人一如寻常。李赏便又一次出现，这次他直接去了左神策军营。此际的左军中尉已是马进潭，是当年与王守澄辅弼穆宗入继大统的功臣之一，现在和梁守谦一左一右，并驾齐驱。在宦官中间，此人和元稹的关系最不怎么样。

神策左军立即上了一本：“有告事人李赏称，于方受元稹所使，结客约刺裴度。”宰辅之间，竟有谋杀之事，皇上平日再怎么散漫，闻奏之后也是大吃一惊，立即命左仆射韩皋、给事中郑覃与李逢吉三人会同御史台严审此案。

一鞫于方，“约客刺杀”之事自然是子虚乌有，但逢吉岂能轻放，穷追不舍之下，元稹擅作主张用反间计的事情就包不住了，于方如实供出。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宰相的不当之事，枢密使王守澄与李逢吉更坚持说裴度知而不报，也应当一并处理，皇上表示同意，下诏罢二人相职，并贬元稹为同州刺史。

谏官们有异议，认为裴度无罪，不当免相，而元稹身为宰相，与于方擅为私谋，却责之太轻。皇上没有完全听从，只是缓和了一下，命裴度以右仆射在朝，削去了元稹带的另外一项职衔。六月初五这一天同时还发布了另一项诏命：以兵部尚书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再次入相主持政事。

李逢吉的目的达到了。对宫中的宦官而言，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结果了。

有了派系，就有了斗争

一切派系的形成，都缘于私心。有了派系，就有了斗争。

李逢吉是陇西望族出身，登进士，入幕府，赴朝为清望官，出使南诏、塞外，仕途相当顺利。在元和七年（公元812年），他和另外一人被命为太子诸王侍读，得以被当时的太子穆宗所识，这对他来说，更是有关他后半生的一个关键。两年后改任中书舍人，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二月首次入相。

凡是境遇顺利的人往往心高气傲，然而却极易受到伤害。在突来的挫折打击面前，这种心态就会转化成一种偏激，他们变得妒忌、孤僻乃至奸诈，为了满足自尊和达到某种心理平衡，他们甚至会不惜一切手段。李逢吉就是一个典型。逢吉第一次入相要比裴度晚大半年左右，两人只共事了七个月，裴度因不满于他对淮西之役的种种沮阻，通过宪宗将他请出朝外，出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恩怨就这样结下了，而且不可调解。

逢吉有两个优势，一是于当今皇上有侍读之恩；二是他有一位极富谋略的侄子李仲言。李仲言也是进士出身，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逢吉正是通过他以及他的好友郑注，才和宫中近臣达成了利益上的共识，不仅顺利回京，而且排挤了裴、元，出任宰相。仲言尤能交结豪士，为逢吉培植羽翼，出力甚多。

宫中方面，第一是王守澄，其次是左右中尉马进潭、梁守谦，还有内侍内使魏弘简、刘弘规等人都至少与逢吉在一点上是见解一致的，即对裴度的态度上。对于一个势力渐兴的阶层——比如宦官——而言，任何一位不肯屈从的老家伙都不会受欢迎。裴度功高勋著，刚直不阿，对宦官极端不利是很明显的，所以也不会例外。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六月，李逢吉入相前后，朝中的人事有很大变动，宰相中除了挂衔者外，王播已于上个月赴淮南；杜元颖虽然留任，去职也是早晚的事；白居易再次被贬出京为杭州刺史。几位杰出的大臣中，韦处厚为中书舍人，李绅为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韩愈为兵部侍郎，李德裕为御史中丞，牛僧孺为户部侍郎。未来的斗争必然就降临到他们身上。

本年下半年来，地方上情形不妙，徐州、汴州相继为乱。从六月到九月，各地兵兴未已。到了十一月，皇上因在打猎时受了惊吓，居然得了风病卧床不起，长安城中谣言四起。

起因是皇上尚未立储。朝官们都很紧张，一旦出事而国无储君，势必天下大乱，这事非同小可。皇上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得的病，此后数天不闻起居，宰相们屡请入见，未被枢密院答复。大家遂请德高望重的裴度出面，上疏请立太子，并请皇上接见朝臣。

宫中的宦官也很不安，穆宗确实病得很厉害，而外间的议论更是对着他们来的，有一种说法竟直指王守澄和梁守谦，说他们有废立之谋，事态已变得很严重，神策两军奉命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十二月初五，在守澄的安排下，皇上终于在紫宸殿接见宰臣。这一天宫中的戒备特别森严，皇上身边的护卫一律换成宫中内侍，天子坐在床榻上，面对着臣下的请求，也只有微微颔首而已。幸运的是，十二月初七宣布立景王李湛为太子之后，皇上的病也渐渐好转了。新年的正月，为了嘉奖神策军在这次风波中的绥靖贡献，特别有诏赏赐两军中尉以下的官兵。这已经到了长庆三年（公元823年），穆宗的第四个年头。

本朝宰相既实行政事堂集体领导制，自玄宗开元年间以后，人数已渐少，但除去荣衔以外，一般也有三到四人。目前当朝宰相只有李逢吉、杜元颖两人，新年伊始，补充相选已是当务之急。其实早在去

年，朝中已经有两位大臣有入相之望。

一位是李德裕。这是大名鼎鼎的李吉甫的儿子，早岁好学有志，不乐仕进，元和初还因父秉国钧，避嫌不仕台省之官。先被张弘靖辟为幕僚，后以门荫入仕，历任监察御史、屯田员外郎、考功郎中兼知制诰、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去年二月改任御史中丞。德裕颇有雄才大略，很为穆宗赏识。

另一位是当年与李宗闵在考策中公开指责朝政而名重一时的牛僧孺。进士出身，入仕后因在那次对策中得罪了宫中，一直未得升调。穆宗即位，历任库部郎中兼知制诰、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僧孺为官清正，亦向有声名，特别是他拒绝了宣武节度使韩弘的贿赂而被穆宗知道后，恩遇渐隆。

照理，李德裕资望较深，又为穆宗信任，出任宰相是大有希望的。但不幸的是，他是李吉甫的后代，这一无法更改的事实给他的后半生增添了无数波澜。

李逢吉第一个就不能答应。他无法忘记元和年间因息兵之议而被罢相的旧事，所以他最恨裴度，连带也恼恨主张强硬的李吉甫，更妒忌这些靠门荫入仕的功臣之后。按照逢吉的观点，正是这些自命不凡的人给国家造就了动荡的现实。李德裕在翰林院与李绅、元稹情款意洽，也是逢吉必须将其摒除的动机。逢吉是个想到就做的人，他既丝毫不掩饰他的观点，又锐意于行动，当他在去年九月将德裕排挤出朝任浙西观察使时，朝中已经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逢吉的意思在牛僧孺。

就逢吉本人来讲，这里的原因不外乎也要上溯到元和初年的那次策试中去，当时赞赏僧孺等人的考官是韦贯之。就是与他同在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前后反对淮西用兵的同志。他对那次事件的态度与朝中不少人一样，都认为是李吉甫的不是，所以对牛僧孺，逢吉的那种亲近感几乎就是天生的了。

牛僧孺自然而然地在逢吉的引举下入相，时间是长庆三年（公元823年）的三月初七。这一天也许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从元和

三年（公元808年）四月的那次策试——包括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那次贡举风波——到现在，历经十四年的工夫，本朝历史上一个最大的误会最终形成了，这个误会所带来的广阔而深远的后果，不久就将爆发。

皇上的病虽有了些好转，但仍未痊愈。

天子有疾，历来都是权幸者得志的最佳时机，在这种当口，谁最有权，谁就拥有发言权。枢密使王守澄当仁不让。

人们在这段时间里发现，有一个身材矮小，眼睑厚重而下垂，目不能上视的人日夜出入于守澄的官邸。据说，此人就是郑注，是位怀揣密术的奇人，既为枢密使所亲重，也甚为皇上所厚遇。只要求他，似乎没有办不成的事，为此，他在城中的那座大宅，天天都是车马满门的。

工部尚书郑权就是一例。此公好色，蓄了众多的姬妾，可工部本非肥缺，单靠他那点俸禄自是养不起。郑权思忖，只有外放富庶地方，才能多捞一些。为了养家，郑权也顾不得什么了，便请郑注通融于王守澄。果然无多久，郑权就被委以岭南节度使。人们好笑之余，也不禁痛恨起宰臣误国来。

其实政事堂中，宰相李逢吉、杜元颖、牛僧孺三个人的话加起来都没有守澄一个人多。本朝起初有宰相轮流秉笔执事的规定，可在守澄的授意下，此时只有逢吉一人当值，竟成了常务首席。二人相结，权势膨胀，做了完全不合规矩的事，朝中重臣也无一人敢持异议。裴度终于未能在长安呆下去，已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连“同平章事”的宰相衔都没有挂。

只有翰林学士李绅不买他们的账。李绅是个有才能的清明之士，与李德裕、元稹同在翰林时，号称“三俊”。翰林学士算是内官，常受天子承顾，若得信任，其职权也就类似于枢密，并不亚于禁外的宰相。早先的陆贽号称“内相”，就是这个道理。穆宗此时就常常将逢吉的拟状征求李绅的意见，李绅的反对意见占了多数。

逢吉气在心里。但李绅身在禁署任职，又为皇上所信，一时也不

太好办，最好是先把他弄出天子身边才好。这时，又是李仲言，给逢吉出了一计。

当时朝中有两个人耿直是出了名的，一是李绅，还有一个是韩愈，也就是当年裴度征讨吴元济时的部下、《平淮西碑》的作者。韩愈道德文章世所公认，尤敢于死谏，曾为宪宗贪长生而冒死上《谏迎佛骨表》，差点丢了脑袋。韩愈自穆宗即位以来先后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户部侍郎，是个有望之臣。李仲言的意思，此间大可利用。

一日，皇上御延英殿召对宰相。这是本朝“常朝”之外，天子与宰相面议政事的制度，天子有事商量或宰臣有事敷奏，即可举行，并不定期。

在这天的延英召对中，逢吉奏了一事：“眼下御史中丞位缺，李绅清正，可任此职。”

李绅时任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出任御史中丞倒也不算降格。他心中大感困惑，不知逢吉出于何意。

皇上照理是舍不得李绅卸去翰林学士的，但转而一想，御史台乃天子耳目，确也是个重地，再说御史中丞官品等同于李绅现任的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都是“正五品上”，又是可在宰相之后赴阙听对的“次对官”，也就同意了。

逢吉暗喜，进而又奏请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尹作为首都行政长官，其规格亦同于省官，上任之时按旧例是要到御史台谒见，谓之“台参”，但韩愈又兼了“御史大夫”，情形就有不同。

按照本朝官制，御史台长官本就是御史大夫，后因官重位崇，自安史之乱后官不常设，御史中丞才得以成为实际上的宪台之长。此次韩愈既带了“御史大夫”之衔，所以宰相在任命时特别加了一条：免去台参。这下事情来了。

李绅刚直，如何能依！他特地移文韩愈，颇有点责怪他不知事体的意思。

韩愈这个人本就倔强，见状不服，与李绅公文往来，言辞上就更

为不逊。此事渐渐弄得沸沸扬扬，朝野皆知。

机会来了，逢吉抓住借口，立刻奏明皇上：李、韩二人严重不协，有违朝纪，请予以罢职处理。

穆宗对李绅一直是心存爱意，心想李绅既不宜在朝，就改放外任吧。十月，在贬韩愈为兵部侍郎的同时，以李绅为江西观察使。皇上还特地派了个宦官去安慰他。

李绅到此算是完全明白了，一腔委屈无处发泄，便对来人大哭，说自己实为李逢吉所排挤，“微臣恋阙效忠之心未已，恳请中使禀奏圣上！”

穆宗知道后有些省悟，他也晓得朝中大臣之间一直互有攻讦，心里对逢吉的不能容人很不高兴。便改任李绅为户部侍郎，仍留在朝中。这个结果不要说李逢吉，就连王守澄等宦官也觉得不能满意。但皇上做主，暂时还只能表示接受。

可未过多久，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正月，皇上在服食金丹的不良作用下，旧疾复发，不幸驾崩，年仅三十岁。穆宗皇帝尽管在即位之初就把那位坑害过其父的江湖术士柳泌砍了头，但却不意味着他不相信长生药。实质上，年方盛年的穆宗贪念长生比之其父也未必少让，对长生仙丹，他只是不相信效果不佳的一种而换服另一种罢了。还好，皇上的暴崩未引起突变，但却有宦官跑到太后那里游说，劝她以母后的身份称制，结果被骂了出来。太子太年轻了，只有十六岁，难怪有些人要如此热情地为国是奔走了。同月，韩愈也死在了兵部侍郎的任上。

正月二十六日，太子即位，史称敬宗。

李逢吉的目的只达到了一半，他当然不会就此罢休。眼下他更担心的是新君会不会重新启用李绅。至此，逢吉那种妒贤嫉能的奸险品性已完全暴露无遗，他不允许逆己者阻挡他满足独秉国钧的欲望，他既要排挤反对者，也不容许被排挤者报复，这是心胸狭窄、私欲过重之人的通病。逢吉丝毫也不认为他没有这个能力，有王守澄和他站在一起，这也许就意味着天子以及整个帝国都在他们的手中了，还有什

么办不到的呢？！

世上若是没有了叛变投靠和反戈一击的人，阴谋也就不会存在了。李绅有个亲戚叫李虞，算起来是他的族子，相当于远房侄子，以文学知名，自称无意于仕进，隐居在华阳县。有次来长安看李绅，与其叔父李耆以及前进士程昔范都投在李绅的门下，相与过从，亦颇投机。未几，李耆拜左拾遗，回到华阳的李虞有点耐不住了，写信给李耆，希望他能向朝廷引荐引荐一下自己。

不料带信的人把此函误投给了李绅。李绅一见好笑，心想我这个侄子不是不乐仕进的吗，如何进退之心反复无常若此，倒要劝劝他。顺手就写了封回书，言辞中真是把李虞讥诮了一下。

李虞看到李绅的信闹了个大大的红脸，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觉得李绅太不给面子。由怨生恨，李虞咬牙切齿：“不报此辱，誓不为人！”

李虞立即上京去见李逢吉，把以前李绅与他私下的谈论，特别是有关中伤逢吉的话，诸如逢吉如何奸邪，如何附和宦官等等，添油加醋，一股脑全说了出来。逢吉听罢，气了个半死，更恨极了李绅，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彻底打倒，绝不能让对方借着新君御极的机会东山再起。

具体的计划用不着逢吉自己操心，李仲言已为他招致了不少人，正日夜计议着如何抓到李绅的把柄。

政事权旁落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皇权与相权皆为宦官所掌握，反奴为主便成为严峻的现实。

李仲言为其叔罗致的死党中，有两个人最厉害。一个叫张又新，一个叫李续之。当逢吉问计于二人，有没有一些更好的办法时，两人皆曰：

“朝中缙绅大臣，大都自惜羽毛，谁肯为相公搏击？此事须得非常之人出死力而为。我等知道有一个叫刘栖楚的人，即是个奇士。”

“哦？”逢吉问道，“怎么个奇法？”

李续之接着道：“此人曾在成德王承宗手下为吏，承宗有次将其绑了起来，他以首叩地固争，承宗竟也无可奈何，其果敢坚锐如此。相公若能提拔他为谏官，令其侦伺李绅过失，待机曝扬于圣上之前，恩宠必替。即使不成，亦过在栖楚，牺牲掉他也没什么可惜的。”

此计甚毒，却也正合逢吉之意。于是，李虞、程昔范、刘栖楚三人都被逢吉擢为拾遗。“拾遗”，乃是本朝谏官的一种名号，分左右而置，与谏议大夫、左右补阙一样，专门以进谏为职，又称言官。左右拾遗品秩虽然不高，只有“从八品上”，但谏诤之任不轻，所谓“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即是设置“拾遗”一职的本义。不过，三人此际的“拾遗”目标却没有这么高远，不外乎就是“拾”李绅一人之“遗”而已。

李仲言与张又新在舆论上为推倒李绅推波助澜，他们对那些胆小而又头脑简单的人广为散布，说李绅看到有人在一起议论，便到皇上面前密报，说某某人结党、某某人拉派。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弄得士大夫们对李绅都有点畏忌。

不过，单凭如此这般寻找机会是要花点时间的。楚州刺史苏遇也是个倒李绅派，他对逢吉门人不急不慢的做法很不以为然，找到张又新等人说：

“新君一旦听政，必举行延英殿廷对。李绅乃次对官，这是他希蒙圣恩的唯一机会，要防就防他这一点！”

又新等人猛省，急急建议逢吉道：“事情确已迫在眉睫！若是拖到圣上正式听政，李绅一旦入觐而为上所用，后悔就晚了。”

逢吉心想：“此话有理。看来不下重手不行！”

这事最后只有靠王守澄。

守澄对新帝道：“陛下之所以立为储贰，臣备知其中过节。”言下

已有深意。

敬宗自然很好奇。

“当初陛下之立，全赖李逢吉之力。而杜元颖、李绅辈，原本都是想立深王为储的。”深王李察，是穆宗的弟弟，新帝敬宗的叔叔。搬出这种事情来，就是击到问题的要害了，守澄在宫中多年，他当然知道孰轻孰重，在这方面，他又要比李逢吉和他的门人强多了。

新帝年轻，对帝国储副常生不测的事没有切身体会，觉得杜、李等人都是几朝老臣，做不出这种事，不大相信。

可随后任度支员外郎的张又新也上了一表，说李、杜二人其实对皇上不利，他们曾暗蓄异志，欲立深王为太子，只因先帝不听，才未得逞。新帝尚未面见群臣，表奏都由枢密院呈上，守澄急劝皇上览这一封。敬宗见此表内容与王守澄所云如出一辙，早先的想法有些动摇起来。

未过几天宰相李逢吉的奏疏也上到，说的也是同样的话。这下不由得皇上不信了，二月初三，皇上下诏贬李绅为端州司马。按常理来说，国家去一奸佞，自然是一大幸事，逢吉也知道这个道理，为郑重起见，还特地率百官赴阙表贺圣上英明。可当百官退下，又有不少人按惯例转赴中书门下的政事堂贺喜时，逢吉开始觉得有点不妥。

逢吉不想让人觉得是他在里面起了作用而使李绅被贬，因为事情做得风声太大，反于事无补。他一回到政事堂，就把张又新叫了进去。

朝廷百官都已来到阁门，值事者报：“相公正与人谈话，请诸大人稍候。”

这一候就是好久，众人正感纳闷，忽见张又新挥汗而出，对着大家团团一揖，道：“‘端州’之事，实为天子除忧，为朝廷造福之举，份内之事，我张又新不敢谦让，就此谢过诸位盛意。”说时，大汗淋淋而下。

原来是这个人的手笔！众人更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心想：“这

么个小小的员外郎就因依仗宰相，竟做出如此大事，真不可小觑！”大家都不作声，缓缓退出，片刻就走了个干净。

朝中的气氛压抑得让人难受。初六，公开表示了一些不满的右拾遗吴思被命为吐蕃告哀使，远赴异域报告先帝穆宗的死讯；李绅所推荐的翰林学士庞严、蒋防同日被贬。在这种时候，没有原则的人纷纷暴露出两面派的丑恶嘴脸。在贬庞、蒋二人的诏制下来后，与庞严交情甚笃、具有封驳权的给事中于敖，竟把敕书封还。见者以为他为庞严鸣不平，都为他担心。不料诏书再下，他的奏议竟是认为此两人贬得太轻而请求重议的。落井下石，没有比这更狠的了，逢吉居然还大大地奖许了他。

张又新已被逢吉推上了前台，他为己为逢吉考虑，也只得一不做，二不休。连续几天，每日上书皇上，坚持认为对李绅责罚太轻。皇上见他说的有理，便答应他可将李绅处于极刑，事态越发严重了。翰林学士兼皇上侍读韦处厚觉得不能再沉默下去，立刻奏上一表，一是指出李绅实为逢吉所诬谄，二是认为即使有罪，也应缓刑，更何况李绅根本就无罪。在逢吉与王守澄主宰一切的时候，韦处厚是唯一敢说话的人。

一个偶然的事情救了李绅的命。这一日，新帝无事，阅览禁中的有关文书，忽然发现了穆宗时期封存的一大箧档案，打开来，正好看到了裴度、杜元颖、李绅请立太子的奏疏。皇上这才觉得李绅冤枉，想到自己差点就将这位忠臣杀掉，也有点内愧。皇上叹了一会，吩咐左右：“将人所上谮绅之疏统统烧掉，此后再不准奏！”但皇上烧了几封不痛不痒的奏疏，却没有把李绅召还。天子尽管年轻，也是懂得要点面子的，更何况这原本就是枢密与宰相的主意，并非是天子的独裁。皇上的心理立刻就平静了，他还有其他事要做呢。

逢吉和守澄实际上过虑了，新帝直到三月初五这天才第一次在延英殿召对宰相。即位以来的几个月里，皇上都是在游宴、击毬、奏乐中度过的，还常常赏赐宦官、乐人财物，耗费不可胜计，哪里有时间来考虑国是朝纲！有宰相和禁中的枢密也就够了，让他们去烦心吧。新帝无论在心理上、年纪上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孩子，他原本就不懂得

什么，李绅的事就是个例子。

皇上好歹听政了，可每日上朝极晚，往往日头高起尚不见天子坐殿升班。时维三月，春寒料峭，百官在紫宸门外列班等候，老病者都几至僵踣。新君如此御极天下是本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远的不论，即比数年前宪宗的宵衣旰食来，差距亦不可以道里记。臣子的失望是显而易见的，不过，皇上尚未成年，谁又有什么办法？谏议大夫李渤就因为自己不能尽谏职，自请宰相降罪。

这一天是三月十九日，敬宗皇帝又一次到极晚才临朝。大臣们又一次在殿外被冻得够呛，可谁也没想到的是，那个刘栖楚居然挺身而出。

栖楚也许是想报答一下宰相李逢吉的知遇之恩，尽一下自己未尽的“拾遗”之责，跨班而出，力谏皇上。“陛下富于春秋，嗣位之初，当宵衣求治；而嗜寝乐色，日晏方起，梓宫在殡，鼓吹日喧，令闻未彰，恶声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长也……”刘栖楚又祭起他“以首叩地”的绝技，“请碎首玉阶以谢谏职之旷！”言毕，果然以额叩墀，声闻于外，血流不止。

敬宗没见过这一套，一时手足无措。不过，栖楚做得也太过分了，皇上不允，叩首不止，眼见阶上已是一片鲜红。

立在班首的李逢吉只得宣道：“刘栖楚不必叩首了，退下去静候回复吧。”

照理，有了宰相的这句宣令，就表明天子已经接受了臣下的奏议，上奏者可以退下等候天子对所奏事情的处理了。可栖楚却越发做作起来，叩头如捣蒜一般，弄得殿上的大臣也觉得这真是近乎哗众取宠、矫情卖直了。不过，除了宰相，谁也不好说话，只能看着这场闹剧，不管怎么说，栖楚的话客观上总是代表了大家心里的想法的。

栖楚意犹未尽：“不用臣言，请继以死！”

牛僧孺实在看不下去，又一次宣道：“刘栖楚不必叩首，所奏知道了，下去静俟回复！”皇上更是连连摆手叫栖楚出去，他看不得这种血淋淋的场面。

天子既令臣民失望至极，便无圣威以慑天下。眼下长安城中人们似乎很少把天子放在眼里，名声最大的除了宰相李逢吉和枢密王守澄，就是逢吉门下的一帮人，诸如李仲言、张又新、李续之等。当然还有这位刘栖楚，经过这件事后，名气更是响亮。此外还有一个就是宫中的红人郑注，他眯着他那双永远睁不大的眼睛，夜夜往守澄的宅第中钻，动不动就是一个通宵。朝中忠直之臣，走的走，贬的贬，除了韦处厚，谁也不敢说话。

一个月后，出了更大的一场闹剧。

长安城中有一个算命先生叫苏玄明，此人不知怎么心血来潮，硬要说自己的一个朋友、染坊的工头叫张韶的有帝王之分。张韶点墨不通，见苏玄明说他什么"日角龙颜"、"天阔地方"，十足的九五之相，竟也就信以为然。苏玄明道："今主上昼夜击毬，多不在宫中，大事可图！"四月十七日，张韶便与他纠结了手下的染工和地痞无赖一百多人，把武器藏在草车中，准备混进宫内。不料在宫门口被盘问的士兵发觉，于是他们便杀掉了守卫，换上禁兵的服饰，抽出兵刃，大呼小叫直趋禁宫。

皇上正好在清思殿打毬，宦官闻讯大惊，赶紧将殿门关上，跑去禀告皇上，敬宗吓得不知所以，以为有什么大乱，一连声叫道："快去右军！快去右军！"右军中尉是梁守谦，是皇上最信得过的。手下人道："右军太远，不若去左军。"遂狼狈逃奔左银台门。还好，一路上未遇上犯贼。左军及时赶到，时任中尉的马存亮和大将军康艺全立即率队进宫，将苏、张等一网打尽。

皇上在左神策军呆了一天。这一天把整个长安都震动了，外人不明情况，无不惊骇。十八日皇上还宫，宰相率官来贺，到者只有十几个人。这虽然是一场虚惊，但把所有人都吓了个不轻。帝国似乎是越来越不成体统了。

五月，在李逢吉的引荐下，吏部侍郎李程、户部侍郎兼度支窦易直同拜相，算是决策机构多少走上了一点正轨。可窦易直以财官入相，多少说明皇上的耗费已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了。

所有的事情都无起色。六月，成德王庭凑杀掉牛元翼家属的消息传到了长安。本来牛元翼已经在一年前突围了，可只带出了十几个人，而不得已把家小留在了深州。王庭凑是在本年年初将牛家一门老少杀掉的，消息来得慢，朝廷直到现在才知道。牛元翼本人得悉噩耗后，大怒而绝。

敬宗闻知，也有点感慨。皇上觉得，是宰辅非人，才使得强贼肆行无惮。他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却也相当不容易了。韦处厚乘机上奏，劝皇上启用裴度。敬宗这才发觉裴度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时，连宰相衔都没有挂，于是下诏恢复，有了一点让他回朝的意思。

时光如梭，这一年很快过去了。在此新旧交替之时发生的一件大事又是关于宦官的。

新年前几天的一个傍晚，地处京兆府的鄠县县令崔发正在衙门中署事，忽听到外面喧闹起来，十分奇怪，便叫人去查明来报。未多久，县吏回来道：“京城来的五坊小儿殴打百姓，以致喧哗。”

崔发听说原来是这么回事，不由得火冒三丈，心想：“五坊小儿为天子放鹰犬，滋事扰民，屡禁不绝。今依恃天子年幼，游畋无度，竟又跑到这里来撒野！是可忍孰不可忍？”崔发大叫：“县尉安在？”底下有人应声答“到”，崔发道：“与我擒来细细拷问！”

待到县尉与捕快拖三拽四地把十来个人弄到衙门里来时，天已昏黑了，根本也看不清这些人长的什么样、穿的是什么服色，崔发也不问，先把他们捆起来再说。过了一会，渐渐弄清楚了，原来这些人可不是普通的五坊宫宛使手下的人，而是奉旨出使的宫中宦官！崔发意识到：这下可闯大祸了。

这些中使回去到敬宗那里哭诉，皇上大怒，立即派人将崔发收执，交付御史台议罪。元旦这天，天子的大赦令业已颁布，崔发和其他囚犯被卫尉带到宫城门右的金鸡殿下等候处理，突然来了几十个宦官，手持大棍，不由分说对着崔发就是一阵乱打，直打得崔发面破齿折，昏死过去。这还未了，一帮人走了，又来一帮，照旧也是一顿痛揍，崔发僵卧于地，已近绝气，幸赖台官们用席子把他遮住，才得以

幸免。照理，大赦令对除死刑之外的所有犯人是一概赦免的，可皇上命令释去他人，独留崔发不放。

给事中李渤愤然上奏：“县令不应拖拽中人，但中人亦不应殴打御犯，况且县令崔发所犯在大赦之前，中人所犯在大赦之后。宦官如此横暴，若不绳之以法，臣恐四方藩镇闻之，顿失敬畏之心！”

谏议大夫张仲方也认为对崔发不予赦免说不过去，可皇上就是不听。只有李逢吉搬出一个理由，说崔发有八十多岁的老母在堂，“陛下以孝治天下，理应对此有所存念。”皇上这才释怀，命中人放崔发还家。崔发老母无奈，当着押送宦官的面，打了崔发四十杖，这场风波方才停息。

这是敬宗即位后的第一个新年，天子改元“宝历”，时为公元825年。

宰相牛僧孺已失望至极。

僧孺为相近两年，在李逢吉与王守澄之下做了不折不扣的傀儡，毫无作为。面对着天子荒淫、嬖幸用事而国事日非的现实，他心中失望，可又没有胆量站出来，只能选择独善其身的道路，屡请辞位。正月十一日，牛僧孺被任命为武昌军节度使，出京任职。人不恋名位而求去，不外两种考虑：一是出于畏罪避祸，二是不愿同流合污。僧孺此去，除了以上两端外，却还有个说不出的原因，他是逢吉推举的，然而多少不满意他的做法，碍于情面，又无法言说，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摆脱这种内心的痛苦，只有逃避一法。

僧孺一走，韦处厚一派又在极力援助京外的裴度，再加上与新相李程不和，逢吉已感到开始有点难办了。其中，他最为担心的还是远在山南西道的裴度。

逢吉是不能甘心自己的政敌翻身的，他在这方面极为执著。这世上对任何事都可以执著，唯独对恩怨之事不然。人只要一陷入“恩”与“仇”的泥淖，便一定会丧失原则，甚至丧失理智。

逢吉有一个既能阻止裴度入朝，又可同时打倒李程的杀手锏。

原来，京师有一个叫武昭的人，早先在裴度手下出了不少力，颇为裴度赏识，保他做到刺史一职。可裴度被斥出朝后，这个武昭连带受累，一直未得重用，竟成了一个闲人，于是自然对裴度的死敌李逢吉不满。武昭在京有两个好友，一是太学博士李涉，一是金吾兵曹茅汇，三人以气侠相许，在京中也稍有名气。李程的亲戚水部郎中李仍叔看不惯逢吉对李程的排挤，乘机对武昭挑拨说："李侍郎欲授官职与公，但为李逢吉所沮。"李侍郎是指李程。武昭一听，更是愤怒。

一日，武昭多喝了几杯，一时酒兴，便对人说要去刺杀逢吉。听者把这话告诉了拾遗张权舆，张权舆是逢吉的死党之一，立即说与了逢吉。逢吉马上就有了主意。

他先是吩咐侄子李仲言把武昭和茅汇找来，安抚了一番，另一方面却又命人准备捅出此事。这是下半年七八月份的事，正好是朝中有人议论要请回裴度的时间。

九月，逢吉正式发难，暗令一个十分不起眼的人上报朝廷，说有一个名武昭的人要刺杀宰相李逢吉。如此大事，当然要立案调查，十六日，皇上诏命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司会审。这时，仲言按计划找到茅汇，逼他在审讯时作伪，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仲言话说得很露骨："说武昭与李程同谋则活，不然则死。你看着办吧！"

可是茅汇却没有被吓倒，抗言道："茅某人为朋友甘心冤死，绝不诬人以求自免！"茅汇的义气使逢吉的阴谋完全落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果然，武昭与茅汇、李涉三人下狱后都如实招供，结果武昭被处死，李涉、茅汇流放，而李仲言和另外一个参与谋划的逢吉门下、拾遗李虞亦皆被处理。逢吉虽然没被牵进去，但地位已大大地动摇了。先是朝中言事者多称裴度为国家贤才，不宜久置于地方；到了年底，皇上又数度遣使赴山南西道劳问裴度；接着，裴度上表，请求回朝。

第二年，宝历二年（公元826年）正月，裴度回到长安。这不由得李逢吉不怕了。

新年前后，长安城中突然流行起一个新的民谣，内容是这样两句话：“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初听起来似乎莫名其妙，但细一捉摸，问题就来了。“绯衣”自然是个“裴”字，而“天上有口”不就是个“吴”字？这岂不是说当年裴度平淮蔡捉吴元济的事情！

又是那位拾遗张权舆上了一表：“裴度名应图谶，宅占冈原，不召而来，其旨可见……”

“名应图谶”四字好解，天意垂象预示未来就表现为图符谶语，谁人应之，谁就合当大分；说裴度身为人臣而合图谶，意思也就很清楚。后一句“宅占冈原”就有点深奥了。

原来，帝城长安从南至北正好有六条高坡横亘东西，称为“六冈”，暗合于乾卦的六爻之象。易理：卦分六爻，或阴画或阳画，阴画称“六”，阳画称“九”；“乾”卦象天，天乃积阳气而成，故此卦六爻皆阳画成卦，从下至上名为“初九，九二，九三……九五，上九”。六冈亦如六画，故于九二置宫殿以当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裴度宅第在平乐里，恰居“九五贵位”的第五冈，这即是张权舆“宅占冈原”四字所指，也亏他想得仔细。

此时，臣下的表奏已不经门下省审议而改由枢密院直接递呈了，张权舆此表多少是占了与枢密使王守澄意见相同的便宜，否则这种强项之辞早就被门下省驳回了。

不过，天子尽管年少，却也没有轻信这种话，韦处厚说那句民谣的始作俑者说不定就是张权舆本人，敬宗觉得也有道理。再说，皇上也有点好笑，“什么‘不召而来’？是朕暗中密诏他回京的，你张权舆又哪里知道！”这样一来，皇上对裴度的态度反而更好，二月，即任命裴度入相，同时升衔为“司空”。裴度一上台，逢吉就彻底完了。八月，李逢吉被委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挂“同平章事”出京，他的政治生命从此结束。

但裴度并不是胜利者，在斗争中真正得到了好处的是宫中王守澄一派。从这两年的许多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帝国已由王守澄说了算，他与右枢密杨守和、左中尉魏从简、右中尉梁守谦四人已成了帝国的

权威，裴度与韦处厚之辈只能等而下之。庸主荒淫，辅弼无力，试看今日之域中，究是谁家之天下？

宦官反奴为主

家奴再弑君上，成为帝国命运的真正主宰。

皇上却越玩越大。

先是击毬、游宴、打猎、沉溺女色，乐此不疲。皇上特别喜欢击毬，每次都拉了宫中内侍陪他玩耍，动辄就是几十人，直闹到精疲力竭方才罢休。然后就是听乐，用大型乐队为他击毬助兴。为此赏赐宦官、乐人财物不可胜计，有一次一下子就赐给内教坊一万缗钱，以备他行幸时开销之用。敬宗击毬常常不分昼夜。而且不在宫中，他喜欢到神策军营中去玩，因为人多热闹。皇上的这一嗜好，长安城中没人不知道。

皇上尚不及及冠之年，好动喜闹倒还算是正常，然而他同样也不能割舍酒色，于是视朝每晏，且月不过三，以后就更不正常，以至国事日废，而使王守澄之流独揽朝钧。

不是没有人进谏，李德裕尽管已远赴浙西，但在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年初就上了一篇谏书，洋洋洒洒有数千言，讽劝皇上正服、罢献、宵衣、纳诲、辨邪、防微，每句话都是语重心长。可是，李德裕的一番苦心，换来的也不过就是敬宗的一纸优诏而已。皇上并未因此而收敛。韦处厚、李程都上过奏，甚至刘栖楚、张权舆也都磕过头，作用却甚微。在这一点上，李逢吉首先是罪责难逃，裴度等人也有责任，因为天子童昏，翼戴大臣不能尽职，非其之咎而谁咎？

即使如此，皇上居然还是感到不能尽畅，在这方面，皇上永远有新鲜的花样。他在后宫中发明了一种纸箭，其间密封了一种麝末香粉。每当妃嫔们群集时，敬宗便用竹皮弓向她们射这种箭，被击中者刹那间浓香满体，宫中称之为“风流箭”。听到宫人们都说“风流箭，人

人愿”，皇上更是兴高采烈。

敬宗不仅毬击得好，还好看人手搏，经常是令力士们全力表演，手搏者臂断头破是家常便饭。最后，皇上喜欢上了一种更有趣也更刺激的玩法：在夜间捕捉狐狸，而且是亲自动手！他把这个游戏称之为“打夜狐”。天子到了这一境地，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狂童了。

这个狂童不仅无比骄纵，又十分褊急而蛮不讲理，“人主”的身份和贫乏的阅历更使他极端无知。他驱使手下的奴才近乎于狂暴无常，力士、内侍偶有小过，轻受捶挞，重遭流配、籍没，情况一如其祖父宪宗最后时期的情形，宦官们又怨又惧，忍无可忍。

总体来看，宦官中也有两派，一是高品阶层如两枢密、两中尉，此外就是天子身边的内侍们，这一派虽然无权无兵，但他们贴近皇上，正如当年的陈弘志，此辈若要有所反抗，自然就要从皇帝下手。敬宗只是个小儿，比之当年的宪宗更是无法相比，他的末日到了。

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十二月，经常陪伴皇上击游猎的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瑞，神策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周惟直等人秘密地结成了同盟，开始了行动。他们再也不会像早先的陈弘志那样仓猝起事，他们进行了周密的部署，计划已近于滴水不漏。这一次轮到王守澄、梁守谦懵然无觉了。

初八这一天，敬宗夜猎还宫，意犹未尽，命人大摆宴席，与刘克明等二十八位侍从喝酒。此时，宫中守备松懈，刘克明的同盟者又全体在场，整个殿内外就只有皇上和他们这些人。机会难得，克明与诸人以目示意，决定即刻发动。

皇上高兴，酒已到了七八分了，丝毫也没发觉早已有人离席，站到了大殿四周。又喝了一会，敬宗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走往内室更衣。皇上刚刚走出，只见刘克明把酒盏突然一掷，四面人影摇动之间，霎时灯火全灭，整个大殿一片黑暗。冥冥中，一条身影“呼”地窜起，直奔内室，一声惨叫之后，又恢复了死一般的沉寂。

一个时辰之后，刘克明率几位内给事来到了不远处的翰林学士院，此时当值者是路随。克明道：“皇上不预！请即入内草拟遗制。”

第二天正是单日常朝，百官们照旧没等到皇上，可等来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天子驾崩了！遗制宣布：以绛王勾当国事，入继大宝。绛王李悟，本名寮，是宪宗第六子。

直到宰相与百官在紫宸殿外廊庑中觐见绛王时，还没有一个人能反应过来。大臣们那种似诧似思的表情，仿佛就像梦游者一般。

王守澄也是刚刚才得知这一消息的，他的惊愕不亚于那些朝官，不过，他一下子就猜到发生了什么事，也马上就反应过来此刻他应该做些什么。

刘克明同样不敢怠慢，他已经开始采取第二个措施：立即撤换枢密使和神策中尉，夺取神策军！苏佐明等神策军将手里有一些人，但人数太少，起不了大用。对克明来说，这甚至比杀掉皇上更为急迫，得神策军者得宫闱，他何尝不清楚这点。但是，他还是乐观了，这种夺兵之举只能像他除掉天子一样秘密进行，绝不能明火执仗。一旦到了以明对明的地步，在对方开始反击之下，敌我之势悬殊，这兵权又岂是轻易能夺得过来的？刘克明等人的整个计划坏就坏在这里。

左右枢密王守澄、杨承和，左右中尉魏从简、梁守谦这“四贵”在当天上午就成功地会合。他们第一个要做的是号令禁军待命，然后经过密商，派人紧急奉迎江王。年轻的江王莫名其妙中就被带进了神策军营。

四个人此时都觉得平息这场政变已不是问题，唯一要考虑的是下一步如何办。毕竟事出仓猝，局势是本朝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王守澄尽管经验丰富，但也是第一次面对伪君已立、师出无名的尴尬场面，他有号令中外的能力，但也有些顾虑。这时，在场的朝官只有韦处厚，因为他的强烈责任感和正义感，使得处境艰难的帝国在道义上还挽回了一点面子。

处厚道：“正名讨罪，有何避讳！应立即发布宫变消息，剿灭叛贼，请江王入宫主事！”

“江王当如何践祚？”守澄又问。

韦处厚博通古今故实，胸有成竹：“待到明晨，当以王教布告中

外已平内难。然后群臣三表劝进，以太皇太后令册命新君即位。”

于是众人不复犹豫。中午开始，左右神策军、龙武军从东西两侧开进宫中，尽诛刘克明徒众，绛王也在混乱中丢掉了性命。

两天后，江王即位。这位合法的新帝是穆宗皇帝的第二子，敬宗皇帝的异母弟，时年十七岁。即位之时更名为“昂”，后来的庙号为“文宗”。

在靖难中最能看出是谁主沉浮。这几天发生的一切再明白不过了，“家奴”已不是家奴，而是决定帝国命运的真正主宰。

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

辇路生春草，上林花满枝。

凭高无限意，无复侍臣知。

——文宗皇帝

文宗：不愿做傀儡的新天子

新一代天子从一开始就不愿甘为傀儡，而朝中辅臣虽多庸碌委琐之人，天下却不乏忠君忧国之士，但从哪里着手？

文宗皇帝不得不面对着这样一个不幸的现实。

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就在那个夜里，神策军士未经通报便闯门而进，“两枢密、两中尉有请江王大驾！”还未等他从惊骇中完全清醒过来，第二天，他就已经踏在了大明宫的紫宸殿上，成为帝国的新一代天子。

那个夜里，他应该正在读书。江王虽然年轻，但敏感聪睿，博学多思，身在藩邸，心怀天下，这一切都来自于读书不辍。他喜欢的书很多，比如古代经典《礼记》、《春秋》、《周易》、《尚书》、《论语》和历史名著《史记》都是手不释卷。可惜的是，王邸中藏书太少，即使有，有的也非全帙，这给年轻而求知若渴的亲王带来不少烦恼。不过，有一部书是完整的，那就是本朝玄宗时的史官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这是一部歌颂太宗皇帝祖德以资训诫的书，尽管枯燥乏味至极，但江王依然爱读，更难得的是，他从这部书里得到了很多启示。旌牙拥护中，奔驰在夜长安的大道上，江王的思绪还未从刚才的书本中走出来，他想到了太宗皇帝，他想知道这位英明盖世的远祖如果处在他现在的地位，是否也会惊慌失措。

文宗皇帝同样也忘不了王守澄在烛光下那张阴沉的脸，当他与其他人伏地请命时，文宗仍不知道是为什么。但，刹那之间，一种好像末日临头的感觉却当头罩下，从此，他就再也无法挥去这个惨痛的记忆。

又是黄昏，又是夕阳。江王走进大明宫时，他第一眼见到的就是那朦胧、微带醉意的缕缕金光。变乱后的东内，红墙飞檐，残柳败草，横七竖八的尸体和摊摊的血水，在冬日的斜照下，弥漫出一片凄

冷肃杀之气。新天子在宦官们的簇拥下站在金殿上，望着夕阳给他投下的一个斜长的身影，却被许多杂乱的人影蹂碾得支离破碎，忽然喃喃自语：

“丛兰欲茂，秋风败之！”

“嗯？”左右未名所以，面面相觑。

这是当年太宗皇帝的话，文宗没有点破其中的深意。阶前，神策、龙武禁军的兵士们肃立无语，兵刃上的血迹斑斑，尚未来得及拭去。文宗回头望望表情冷峻的宦官们，恐惧，一种极度的恐惧感像一束藤蔓，悄然从后背攀援而上，冷冷地爬上背脊，爬上脖颈，钻进他的心里。

一夕之间，沧海桑田。江王已经成为了帝国的第十二位天子，史称“文宗”。新天子目睹了自己如何从亲王变成天子的全过程，他终于明白了一切。本朝立国垂二百年，从来就没有家奴血洗皇宫、操纵废立的事，想不到今天却被亲眼证实，新帝心潮难平，思如泉涌。他想起了宪宗、穆宗以及死于非命的异母兄敬宗，想起耆老故旧的传说，想起古书上的记载，恍如大梦初醒。与其父兄不同，新一代天子绝不是一个平常之人，祖宗有灵，让他入承皇统，这是天降大任，新帝突然觉得自己义不容辞。登上紫宸大殿的那一瞬间起，天子心里就油然而生起一种强烈的冲动：他要为父祖报仇，要为兄洗耻，要使家奴照旧为家奴，天子重新为天子。坐在御榻上，他甚至无心去享受贵为人主的那种无上感觉，皇上只想着一件事：“从哪里开始？”

文宗即位后的第三天，常朝就如期举行。除了韦处厚为相、翰林学士路随承旨、侍讲学士宋申锡为书诏学士三项人事任命外，这一天的诏命还有许多内容：出宫女三千人；减省教坊、翰林待诏、总监冗食者一千二百余人；停诸司新添衣粮：御马坊场所占陂田悉归有司……退朝后，裴度泪水莹莹：“太平可期了！太平可期了！”

看着百官们的贺表，皇上心想：“这只是第一步而已！”

在朝野一片欢呼声中，公元827年来到了。二月，新帝改元“大和”，是为“大和元年”。

三月初一，右军中尉梁守谦因年老到了退休年纪，不得不请求致仕，王守澄顺利地取而代之，成为右神策军中尉。他听说当今皇上去奢从简，颇有励精求治之心，倒也没有在意，但守澄对皇上与宰相的某些举措仍旧不以为然。新君践祚，他是第一功臣，守澄觉得自己有这个资格充当辅弼之任。

此时宰相除韦处厚外，尚有新命的裴度和前朝的窦易直。自然，凡是裴度、韦处厚之议，守澄即认为不妥。

皇上往往不敢多说，只是有点情绪："朕已允诺，恐怕不好再改。"

守澄心道："岂有此理。宰臣们就知道自命清高，懂得什么治国之道！"他对新帝说话从来无所顾忌："陛下，事有不妥，当思更改，何顾虑之有？"

皇上不语。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把王守澄之流一脚踹开的时候。

可是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时，宰相们便觉得有些过分，认为皇上虽虚怀听纳却不能坚决执行，实在是莫名其妙。韦处厚气得要辞去相位：

"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为宰相。不想凡有奏请，初蒙听纳，寻易圣意！裴度元勋宿德，窦易直忠事先朝，陛下尚难信任，微臣才薄，言既不从，宜先退位。"

从韦处厚的立场来看，他的话确有道理。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更何况已经决定了的事，怎么又能如此朝三暮四？但他不知道的是，皇上实在是迫不得已。

文宗脸涨得通红，心里有苦说不出，只得一迭声地安慰韦处厚："贤卿何至于此，何至于此！"言不投机，韦处厚说走就走，皇上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就已走出了延英殿门。皇上急起来，命人将他召回，允其尽言其余。

韦处厚谢恩，接着就是一大段议论，要皇上彰善惩恶，强调法制，重用裴度。天子听得很认真，表示接受。宰臣们感戴圣德之余，

觉得这一次心情大畅。

然而王守澄很不快，他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新天子不是寻常之辈。但尽管如此，守澄还是被暂时之得冲昏了头脑，没有把这个苗头扼杀在摇篮中。他的得意忘形预示着他将来是要倒大霉的。

皇上不动声色，一直在等待时机。他奇怪的是，两朝天子都无疑是被宦官所弑，怎么朝中就没有一点议论？他问过侍讲学士宋申锡这个问题，申锡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天子心里有气，可暂时又无可奈何。

事情到了这一步，当然有人不能容忍，其中就包括一大批朝臣。但话又说回来，朝廷重臣们毕竟老成持重，多少要考虑到皇上的颜面、朝廷的威信以及自己的退路，不敢把话说得太绝。事实再一次证明，无官无职的士子总是会成为担负天下兴亡的先锋，他们虽不一定能克功其事，却往往能率先出头。

大和二年（公元828年）三月底，天子亲试“贤良方正”科制举之人，昌平人刘参加了这次对策。这次由考策官代皇上拟就的问题也同往常一样，都是泛泛之问，诸如“何施斯革于前弊？何泽斯惠于下土？何修而古理可近？何道而和气克充？……”等等。“策问”之题尽管以皇帝的名义发出，所谓“唯此龟镜，择乎中庸，期在洽闻，朕将亲览”云云，但实际上还是由主考官批阅审定，决定可否。所有的人都没想到，刘就这个普通的策问作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回答。

主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读到刘的这篇策文，甫览数节，口中便叫出一个“好”字，再往下看，竟不知不觉地出了一身冷汗，拿着卷子的手也禁不住微微颤抖起来。

刘说了些什么竟让冯宿如此激动？说起来原因极其简单，就是他说出了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刘认为，帝国已然之兆，是“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单这一句就已让人触目惊心。

官闱之所以将变，乃因为“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刘直接点出左右枢密、左右中尉这少数

近臣操纵国柄，当此之下，“忠贤无腹心之寄，阍寺持废立之权”，因而社稷亦将危殆；刘蕡更是明确指出，正是这帮人“陷先君不得正其终，陛下不得正其始”，君不君，臣不臣，天下终必倾覆。而政刑既不出于天子，则攻伐必自于诸侯，“此海内之所以将乱也”！

刘是普通的士人，对朝政现实更有一种十分清醒的洞察，文中一句句地痛斥了宦官祸国殃民的种种罪恶：“国之权柄，专在左右，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对此刘下结论道：本朝眼下的情势，已足以与东汉末宦官专权的局面相提并论。

刘洋洋数千言，都是一个主题：宦官骄横已臻极致，不仅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更出于人主之右，如此以往，祸乱未已！眼下是什么时候？禁中“四贵”不论，就连郑注仗恃中人宠信，收受贿赂，卖官鬻爵，人们都不敢议论，更遑谈其他了。刘言论如此，难怪冯宿看了要汗流浃背。

冯宿放下刘的策文，心中唯有叹服。

诸考官传阅，一阵面红心跳之后，都感到痛快至极。可是，叹赏归叹赏，谁也不敢擅自做主把这篇策文列为上第。

策文抄本立即就传遍了长安，轰动了整个朝野。士人读其辞，无不感慨流涕。向来不满宦竖的一些谏官、御史，更是扼腕叹愤。而大小宦官却是怒火万丈。

王守澄大骂：“何其狂妄乃尔！”时任右神策领军将军的仇士良，在朝会上冲着刘中进士时的座师杨嗣复诘问，出语就更是不逊：“这么个疯汉，你当初怎么把他取为进士？！”杨嗣复大恐，慌不择语：“嗣复当年取刘及第时，他还没疯呀！”仇士良气犹难平，铁青着脸，又望着阶前的宰相。裴度、韦处厚两人不说话，面无表情，考策官冯宿、庞严等见状，更不敢多事，便把刘策文压下不报。反正所谓“皇帝亲览”只是场面上的话，素未真正执行过。

刘自然是落选。闰三月初九，诏制颁下，“贤良方正”一科共取了裴休、杜牧、李郃、李甘等二十二人，悉由吏部授官，独未有刘。榜出，物议嚣然，皆为刘称屈。李郃对同第者大声说道：“刘下第，我

辈登科，诸位能不羞愧？”大家附议，于是联名上疏。及第者为刘忠直受屈抱不平，更为执政者不敢上闻而愤恨，疏中称：刘既不能及第，而“臣等对策不及刘远甚”，请求朝廷收回所授官职“以旌直”。这简直就是激烈的抗议之辞，门下省不驳，也通不过枢密院，这份联奏上达于帝听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长安城中固是一片哗然，可也只能“哗然”而已。

对朝官们来说，无论如何，这种事情最好是大事化小。因为事情闹大，激怒了某些人，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宰臣中，裴、韦既不表态，另一位宰相窦易直资浅，更不好说三道四，剩下的就是去年六月又一次花了钱得以拜相的王播了。王播这次从淮南入觐，大小银碗就进奉了三千四百枚，绫绢二十万匹，当然，给王守澄的就更多。刘所说宦官之下的“贪臣”，一半就是指他。对这次事件，王播当然要出点力。

王播不让谏官和御史们上奏。“此徒招黄门之怨而已，于事何补？”“黄门”即指宦官。王播先是同情了不平者一番，然后又说了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国家开科取士，天子亲策，所求者辅弼俊才，所访者要道大务而已，岂容矫直之辈狂犬吠日？刘不取也罢。”真正的嘴脸露出来了。

第一个造反者总是牺牲者。这场科场风波算起来是近二十年来的第二次了，前一次的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闵是久未升调。这一次刘一辈子都未得到朝廷授官，只是屈为藩镇幕僚，郁郁而终。

天子始终不知实情，也未能读到这篇文章，否则，他的计划可能就要提前进行，可能也会更加周密、有效。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先帝性命都未能保住，更何况他这个他人掌心中的新帝！能不成为地道的傀儡就已经很不错了。

然而皇上没有忘记初衷，单日朝参从未缺席，甚至恨不得日日与宰相论政议事。罢朝后，皇上要么是手持着《贞观政要》发呆，要么就是在寝殿里来回踱步，他在盘算着一件大事，往往是想一遍，又想一遍，再想一遍。“谁能当此大任呢？”文宗问了自己无数次。

年底，因横海镇留后李同捷叛命，宰臣屡屡入朝会商军情，韦处厚不意早起遇寒，入殿白事时竟晕仆于案前。文宗亟命宫侍扶归私第，但不幸病重，越宿即殁，以身殉职。窦易直亦于同时罢职，翰林学士路随继相。

皇帝找错了人

不是阴谋家，不能行阴谋之事。皇上找错了人。

近一年多时间过去，皇上还是没有主意。

时间到了大和三年（公元829年）。这一年起初的几个月里，藩镇纷扰不绝，河北一带已经是尸骨横地，城空野旷，户口存者十无三四。朝中，气氛沉寂，所有的政务只是忙于调兵遣将，应付地方的叛乱，各路王师瞻头顾尾，亦全无效果。幸好，到了八月，双方又不得不妥协，局面渐渐平息，天子又得以有机会再次暗中计议他的大事。这时，他心里有点数了。

皇上先召回了李德裕。

文宗考虑：裴度年老多病，其威在外而不在内，似难膺负心中的这件重任；韦处厚又死，其他文臣，也不堪大用。穷途知返，皇上的思路稍稍有了点突破。

先是去年，裴度不经意之间，突然荐举二十几年前的旧人、此时起复为礼部郎中兼集贤殿学士的刘禹锡，皇上心中就是一动。后来一想不妥，此举多少有些树大招风，未必能行。可当裴度转而推荐李德裕时，文宗便觉得不妨一试。八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被召入京任兵部侍郎。对此，皇上不无深意，至少是欲用他为相。可没想到的是，就在同时，枢密院却引举了李宗闵入相。这么一来，计划就全被打乱了。

皇上开始还没意识到。

李宗闵什么人？此公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与皇甫湜、牛僧孺在制举试中一同上书指责朝政的主角，为此与僧孺受到不公待遇，长期不调。后来又在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一次科试纠纷中，因涉请托，罢官出朝。前数年复出，任礼部侍郎，算是有了一些转机。宗闵是元和三年那次风波以后最记仇的一个人，但奇怪的是，他把受迫害的账没算到真正的主凶吐突承璀身上，却记在了当时的宰相李吉甫名下。父债子还，他对李德裕十分反感。

在文宗印象中，李宗闵这个人没什么政绩，资望也不算高，他不懂枢密使杨承和为何就是要拜他为相。其实，宗闵走的是宪宗驸马沈曦的路子，沈曦又转托内宫中的老人、女学士宋若宪代请杨承和，绕了一大圈，这才算托到了正门，真难为他的一片苦心。说起来难以理解，宗闵早年也是反对宦官贪横的，但与元稹一样，吃过中人的亏后，反过来又去依托中人，不说朝秦暮楚，起码也可谓生而多变。更奇怪的是，自元和三年以后，他就十分讨厌李吉甫、裴度、元稹以及李德裕，再也没有改变过，这又能称得上是极端专一了。也许，处在政治漩涡中的人，都免不了欺软怕硬的通病。

李宗闵一入台阁，就转命刚刚在几天前到京的李德裕为郑、滑节度使。

德裕见诏，长叹不已。行装甫卸就又得上路，满腔悒郁，无可申诉，一时黯然难禁。刘禹锡得知，送来一首诗，末句有道：“自古相门还出相，如今人望在岩廊。”德裕读毕，虽明知这是老友安慰之语，但心中也略略好受了一些。八月底，德裕转赴滑州。

此后的事情也都是皇上无法想到的。

宗闵上台，自然就引举了亲密战友牛僧孺入相，时在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正月。这事顺理成章，朝中没人反对，枢密使们更是赞成，无需天子认可就可以拍板。此后的几个月，李、牛二人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免。

数年前回京的元稹首当其冲，被命为武昌节度使出京，填补牛僧孺入朝后的空缺；

李德裕的好友郑覃罢翰林侍讲学士，改任工部侍郎；

年高体弱、大病刚愈的裴度又被外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裴度一手提拔的崔从出为淮南节度副大使。

……

皇上开始明白其中的奥妙了。这不是典型的囿于私怨而置国家于不顾吗？日日听着宰相琐屑的奏事，再看着王守澄指指画画专横的样子，天子真是恼丧万分：宦者强横，全是这些相互攻讦之臣不以天下为意的结果，否则，有一人为朕分忧，亦不难改变局面。文宗心道：“此辈朋党比周，断不可当朕大任！”到这时，皇上拿定了主意，决定就选择不久前自己刚刚开始倾向的那位大臣：翰林侍讲学士宋申锡。

也是事出有因。六月的那一天，皇上召来申锡讲读《贞观政要》，其时，正逢心情不佳，君臣谈了一会，皇上突然控制不住，叹了口气。

申锡肃然，垂手不语。

文宗第一次仔细打量了一下他，心中开始掂量起来。皇上知道这位出身孤寒，进士及第，以对策而知名的大臣和其他朝官浑无爱怨，不属于任何派别，是个持重厚道之人。委以腹心，托以大事，确是个恰当的人选，只是不了解他心意如何。心念及此，皇上便道：

“贤卿日与朕讲经论道，竟不知道朕的心事吗？”

申锡惶恐：“微臣不能分主上之忧，罪该万死！”他清楚皇上的想法，一想到当今天子英明睿智而陷于人手，心里何尝不也是悯然悲戚。在皇上的追问中，申锡觉得自己无用，十分的惭愧。

文宗被他的情绪勾出了辛酸之事，再也忍不住：“宦者强盛，逐日为甚。元和、宝历比致宫禁之祸，至今弑逆之徒尚在左右，专横跋扈，犹有甚于昔者，”皇上一拍龙案，“朕每受其逼，尤须外示优渥，长此以往，为祸不远，朕何以告宗庙社稷！”

申锡也是激动不已，声音哽咽："陛下且宽圣怀，微臣不才，愿效死力！"

文宗甚喜，觉得自己判断没错，宋申锡确是个可用之人。实际上，皇上此时身在九重，欲求外助也不可得，申锡时为翰林侍讲学士，居于内廷，是唯一可吐心事的朝臣，皇上不靠他，又靠何人？

君臣商定了一些粗略方案，都认为先除去王守澄的内逼威胁是第一要务。申锡领旨，皇上还有点不放心，一再叮嘱申锡务必联络外廷朝臣，广为准备，不可草率。文宗道："朕可设法诏卿入相。居宰辅之位而行事，自多方便。贤卿千万小心，莫负朕之厚望！"

申锡叩首而退。

果然，几天后，文宗下诏加申锡"尚书右丞"之衔，一个月后的大和四年（公元830年）七月，又加"同平章事"入相。这一切并未招致枢密和神策军方面的怀疑，进行得十分顺利。

朝中很多人对申锡主事抱有幻想，都以为他对目前"威令不出于人主"的局面会有所改作，至少可以改变一下朝官之间不正常的现象。然而，申锡在政事堂的表现却令他们大大的失望了。这很自然，申锡的心思原本就不在更新朝政上面，他是密负上旨而来，有另外的重要任务，平常的政务剖断显得因常循旧，实乃不得已之事，外人又从何而知。

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元旦前后，皇上在与申锡的往复商量中制定了计划，决定采取一种非常手段：即时诛杀宦官。文宗没想到的是，此举绝对是个下下之策。

首先，宦官目前势力颇劲，王守澄大权在握，若要从容翦灭，绝非易事。加之对方耳目众多，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其次，无奈之下选中的宋申锡，其实不是个恰当的人选。这个道理很明显，申锡不是个阴谋家，又如何能行"阴谋"之事？

在不握禁军，又无外镇后援的情况下，对王守澄采取行动，必须要有一个人参加，这就是帝国首都京兆府的行政长官"京兆尹"。首都和陪都所在地称府，这是汉代的遗制。作为首都所在地，京兆府掌治

天子辇毂之下，供给百物，调拨夫役，其务远重于外府州县。而护卫王畿，更是首要之责。以是之故，其长官“京兆尹”之地位不亚于台省首脑，出任人选，包括所属诸县的“令”、“丞”、“簿”、“尉”，皆选精明强干者为之。京兆尹倘不阿容苟且，京中权贵、宦官以及禁军将校之横暴就会相对收敛；反之，朝贵与京畿府官结成势力，帝国中枢就将大大不利。因而，本朝对京兆尹及其属官的任命一向极为慎重。申锡欲图事，第一件要做的就是委任可靠之人出任京兆尹，借其之力襄助大事。这点申锡是清楚的。

可申锡不知怎么却挑中了吏部侍郎王璠。此人以前仗着受李逢吉信任，任御史中丞，行为狂傲，目空一切，在朝中名声很臭。有一次，与左仆射李绛在街上相遇，交车时竟不避让。“仆射”是国家优待功臣元勋的荣誉之职，虽无实权，但衔高遇重，按朝廷礼制，一般官员是必须表示敬意的。李绛看不惯王璠的狂妄，给当时的皇上敬宗上了一表，指责他尊卑不分。为此，尽管有李逢吉的庇护，王璠也被罢为工部侍郎。申锡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才做出这个决定，也许，他也有他的理由，但实在太草率了。

事情是在极其秘密中进行的，正月中旬，申锡面见王璠，示以天子密诏，并约以京兆尹授之。王命如此，王璠当时答应考虑。

但王璠权衡再三，这事做不得！在现时情形下，利害得失太明显了。王璠既无起码的道德信念，他便首先要为自己考虑。于是，王璠悄悄地找到了郑注。王璠曾是李逢吉的亲信，李、郑二人又不是一般的关系，自然王璠与郑注是能够说得上话的。郑注没想到皇上竟然已经有了行动，不敢怠慢，立即禀告王守澄。守澄大吃一惊，“此事如何处之？”

郑注多年以来一直是守澄的左右手，自诩谋略过人，每与守澄筹划，招数都在阴辣狠毒之间。此刻，又是一副山人自有妙计的模样：“事不宜迟，当先下手为强，去宋申锡以清君侧。”

“计将安出？”

“先帝遽逝，今上本不当立。——宋申锡与漳王时有过从，去之

何患无辞！”

此计甚毒，漳王李凑乃是文宗的弟弟，颇有人望。再说，朝臣交通诸王，其中就大有文章可做。守澄听罢，立时就明白了，马上就吩咐郑注准备。

郑注找来一位神策军官豆庐著，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一番。这个豆庐著时任神策右军的都虞侯，是郑注的亲戚，也是守澄的亲信之一。神策军侦伺朝廷大臣过失，已不是头一回，郑注与王守澄等已经无所顾虑。

二月下旬旬末，王守澄突然发难。

先是二十八日，豆庐著奏上一本：宋申锡谋立漳王！疏中同时举报，参与此事的有负责为诸王采办的宦官晏敬则、宋申锡侍从王师文等人。翌日，守澄直接将奏疏呈于皇上，奏称：“臣得本军都虞侯豆庐著奏状，告宋申锡与漳王谋反！”文宗一听，晓得出事了。

尽管文宗对守澄此举猝不及防，平时对漳王也有所猜忌，但一想到牵涉有宋申锡在里面，心里何尝不明白。但碍于情势，皇上还不得不故作愤怒状：“竟有如此之事？”

守澄不容皇上喘息：“宋申锡大逆不道，臣请全城戒严，搜捕逆党，并屠其全家，请陛下敕准！”

这就是要下重手了。守澄很清楚，所谓宰相谋反，事极荒诞，肯定是经不起推敲的。因此他不希望把它变成一件普通的案子，而是要借“谋反”这个强烈的罪名一鼓作气，把天子的种种企图彻底摧毁掉。

皇上饶是沉着，见状也是大大地恐慌起来，一时说不出话。

守澄走上一步：“请陛下当机立断，臣愿亲领二百骑前往！”言下之意，今天你皇帝就是不答应也不行。

面对守澄的咄咄攻势，文宗都快要绝望了。

第一次反击：还没开始就已失败

第一次反击尚未完全发动就已经失败。无所作为的朝臣，令天子彻底失？望。

刹那间，紫宸内殿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宋申锡命不该绝。与王守澄同时进来的还有一位宦官，这就是当年在敬宗时平定苏玄明、张韶叛乱立下大功的马玄亮。马氏虽然也做过神策中尉——平乱时即任左神策中尉——而且还有勤王救难之功，但此人与王守澄等人不同，他并不十分热衷于权力，为人既颇忠厚，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信仰也甚为坚定。此际，他的官职是飞龙使，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使职，往往以宦官中颇承恩遇者担任，专领原来由殿中省、太仆监主掌的天子舆辇牛马之务。马玄亮是受皇上的传呼入殿议事的，正巧遇到王守澄奏报机密，宋申锡便有救了。

玄亮觉得，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尚无确证，就要屠戮宰相全家，这将置国家法令于何顾？他当然要表示反对。

“陛下，千万不可草率！遽出禁军，城中不乱而乱。”

玄亮说出此话只思忖了片刻，但这一会对皇上来说，简直就像熬过了一年时间一样。

文宗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暗自吁出一口长气。

守澄瞪着玄亮：“如足下之言，难道让逆贼逍遥法外不成？”

玄亮不让步：“即使申锡或有不轨，也应召宰相廷议其罪。”

文宗赶紧发话：“言之有理！明日召宰相延英廷对，共议此事。”

至此，王守澄只得罢休，他恨恨地看了马玄亮一眼，朝天子匆匆施礼便掉头而去。皇上望着他的背影，心里百感交集，不知是什么滋味。

第二天是旬休日。本朝官员在职期间可以休假，称之为“休沐”，除节令假外，百官每十日一休假，名为“旬休”，时间是每旬的最后一天。这一日，正在休假的宰相们被宫中传唤：天子在延英殿召见，有要事相商。几位宰相得命后急忙赶赴大明宫，宋申锡不明就里，也随之来到。四人在中书省东门，遇到了前来迎候的一位宫使，这人一看

到申锡便道：

“圣上所召，并无宋公之名。”

路随、李宗闵、牛僧孺都是莫名其妙，申锡陡听此话，心里先是一惊，但马上就反应过来：“事情泄露了！”他极力控制着情绪。转过身来朝着延英殿的方向，郑重地抱笏叩头，行遥觐之礼。“臣不能克竣大事，罪该万死！……望陛下保重！”申锡心内是一阵辛酸，自己现在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申锡做罢，起身缓缓退下。旁边的三位宰相看着，满腹狐疑。

进入延英殿，文宗早已升座，班立者除王守澄外，尚有左右枢密使在列。殿内气氛肃然。

文宗见宰相们到齐，出示豆庐著的奏疏道：“神策右军告宋申锡与漳王谋反。”

路、李、牛三人相顾愕然，这怎么可能？接过奏疏一看，简直就像是传奇故事一般，横竖理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大家心里隐隐约约地感到其中有故，但却说不出一句话。

文宗的话浑无声调，有气无力：“朕已命中尉王守澄系捕豆庐著所告之晏敬则、王师文二人。”皇上顿了一顿，又加了一句：“申锡等有无反状，不久自明，卿等不必惊骇。”这就是话中有话了，可这几位不知前因后果，哪里省得。

王师文是申锡的随从，知道一些其中的内幕，见事情不妙，立即逃亡。可怜那位晏敬则根本就不知内情，糊里糊涂地就被抓到了宫中。三月初二，申锡先被罢为左庶子，等候处理。

事情正式宣布后，朝官们都是莫名惊诧，没有一人敢站出来说话，只有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觉得案子的进行有违制度，接连上疏请求将此案交付外廷司法部门审理。皇上顺水推舟，诏准其奏，可还是晚了，晏敬则在禁中已经屈打成招。

文宗再次被逼到无奈的境地，只得孤注一掷。初四，皇上诏开延英，命三师以下及各台、省、府、寺诸大臣悉赴殿合议，指望朝官的

力量使事情有所缓解。

谁知宰相们使皇上大为失望，李宗闵不出一语，牛僧孺、路随的反应也很微弱，宰相退下后，案子几乎已经定谳。中午时分，其他朝臣进入延英，皇上甚至都不抱希望了。

可谏官们的意见却十分强烈，一致请求将案子交付外廷重新按核。皇上心想：“宰臣都不表态，谏官毕竟言轻，王守澄岂能善罢！”到此，文宗极为担心神策右军会弄出大事，这可就非同小可！皇上想到这一节，不免犹豫不决。但十几位谏官坚决不退，马玄亮更是叩头不止，流着眼泪道：“杀一匹夫犹不可不慎重，何况宰相！”文宗见状，鼓起勇气，命召回宰相再议。

这一次牛僧孺终于委婉地表示了对这件冤案的反对意见。

“人臣不过宰相，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其所谋，所为何来？申锡当不至于谋反！”僧孺这话说得倒也恳切，皇上觉得有点分量，可以与守澄讨价还价，至少能保住申锡的性命。于是，文宗命众臣退下，听俟诏制。

郑注听说了延英辩论的情形，觉得这样下去反而不好，届时定会重审，事情弄不好要败露。当天下午便立即来到王宅，劝说王守澄止行贬黜就可以了。守澄想想也有道理，遂不再坚持处死宋申锡。初五，诏旨就下来了，贬漳王为公爵，宋申锡为开州司马，其余案犯或处死或流贬不等。

马玄亮当日就请求卸职退休。宋申锡虽免于横死当时，可不久也在贬所郁郁而终。临死之前，他一直都在恨恨地念着一个人的名字，他没有忘记，这件事情除了自己以外，只有一个人知道，这就是王璠，他要诅咒这个小人，让其也不得善终。

这第一次行动尚未开始就彻底失败了。

文宗虽然沮丧万分，但他的信念却并未因这次的失败而消歇，五年来的日日夜夜，皇上的心里只有这件事情，它关系到天子的名誉和社稷的安危，如何又能轻易割舍！文宗所不能忘怀的，是这几个不能为天子主持正义的宰相。到了这一年的年底，皇上的不满越来越重。

三月的宋申锡事件是主要起因。在整个事情的过程中，李宗闵、路随竟是一言不发，牛僧孺也没有表现出国家宰臣所应有的风范，结果是由家奴们说了算，皇上的愿望彻底破灭。九月份，在与吐蕃的边境上发生了“维州事件”，牛僧孺又不同意前敌指挥官李德裕采取强硬对策，坚持走和平妥协的路子，结果却是让帝国丢尽了颜面。吐蕃就在边境之上，当着使节的面，将我方交还的维州投诚将士全部处死，场面极其酷烈。

十一月份，回京任枢密使的原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向文宗报告了这一情况。作为参与其事者之一，他对朝廷的这一举措十分不解：“缚送投降者以归，绝后来投诚者之路，岂是良计？”皇上听了，也甚为。后悔，对牛僧孺就更是不满。

文宗对这几位宰相已差不多彻底失望。他在延英殿当面就问他们：“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究竟有无佐理兴化之心？”这话显然说得很重了。皇上也是郁闷之极，才如此责备宰相。照皇上的意思，眼下不仅河北诸镇不得安宁，四夷搔扰不绝，更要紧的是天子身边的现实简直不成体统，尔等作为宰辅之臣，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心吗？

李、路答不出来，僧孺居然还有理由：“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治，亦可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能及。”满足于现实，成就感十足，这是无能者固有的嘴脸。僧孺虽非庸碌小人，但陷在朝臣党派圈子里难以自拔，有这个想法不足奇怪。可他作为一位儒士，不能对宦官持政的局面有所批评，反而拿“小康”来搪塞，还委婉地指责天子“别求”，这就很不像话。比起宋申锡为天子分忧而不惜牺牲的勇气，就差得太远了。

天子有何“别求”？不外乎翦除宦官而已。当然首先得清除朝官的内讧，团结一致，合力对外。当朝宰臣既不能理解这一层，皇上自然便要换人。十二月，文宗罢牛僧孺出朝，又召回了在西川任职期间政绩颇著的李德裕。

但李德裕也很难有所作为。作为李吉甫的后代，一位有主见的大臣，他就一定会有很多政敌，尽管他的品行无可指责并又富于才干，但同牛僧孺一样，一旦卷入党派政治的漩涡，便就是人在江湖，身不

由己。更何况，宦官对这种严格按正统观念行事的人，天生就有一种抵触情绪，在此局面下，文宗要靠德裕达成治理，绝对是个空想。

但是皇上心切，人情望治，大和七年（公元833年）二月二十八日，文宗任李德裕为相。这一天，久旱的京城忽降大雨，这是一个难得的佳兆，连禁中的有些宦官都说，李德裕该称“李德雨”了。朝野对德裕此次入相，确实是期望甚高。

李宗闵却没有这样的心情，他是自李逢吉之后最不满李德裕的人，也是结党最厉害的一个。他的周围不少人，比如给事中杨虞卿、萧澣，中书舍人杨汝士、张元夫，户部侍郎杨汉公都是他一手提拔的亲信，其中三杨还是从兄或亲兄弟。德裕一入相，第一件改革之举就是清除“朋党”，李宗闵又岂能坐视。

两人展开斗争，互不相让。先是德裕在天子面前提出，三杨及萧、张等人结党营私，舆论最为不满。文宗同意，“据朕所知，众人皆以杨虞卿、张元夫、萧澣为党魁。”皇上如此说，宗闵只能寻找遁词，便否认自己曾主张授他们以美官。德裕当廷就一条条予以驳斥，事实俱在，宗闵无话可说，大为窘迫。

此后德裕连贬三人出京，又提升先前被李、牛贬抑的郑覃出任御史大夫。宗闵再度反击，在皇上面前力言其不可。但文宗喜欢读书，很欣赏郑覃对经术有独到的理解和议论，坚持任命郑覃，甚至见到因宗闵反对而导致宰相们不能一致通过，干脆不通过中书门下，直接宣布了这一任命。

宗闵气得不行，对枢密使崔潭峻发牢骚道：“圣上事事宣出，要宰相何用！”

崔潭峻一语双关：“八年的天子了，就让他做一回主吧。”文宗即位，至此正好八年。

话怎么能这么说？连宗闵听了都不是滋味。

宗闵在第一回合失败了，六月，罢相，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七月，右仆射王涯被命为宰相，并兼度支、盐铁转运使，主掌财政。王涯博学多才艺，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就得中进士，历仕宪、穆、

敬、文宗四朝，在中央、地方都担任过要职，对财政也有一些办法。王涯这次为能够入相，花了不少钱物，托郑注打通了王守澄的关节，才得以实现。他没有想到的是，到头来却是自己给自己买了个大大的不幸，正是这次人相，造成了他最后的悲剧命运。

德裕在宗闵出京后继续推行他的方针，包括改革进士科考试的内容；使宗室诸王出使外任等等。不过，这一年又很快到头了，德裕在清除李宗闵之辈的过程中手法过重，没有采取更为圆滑的手段，遂又一次地树立了对立面，从而也给自己堵死了退路。远的不论，就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德裕能否安于其位，也都成了一个未知数。

十二月十八日，皇上突然中风，口不能言。为此，王守澄紧急召来郑注，这位既有谋术，又通医道的奇士，为皇上治病。结果，疗效极佳，虽然还未能完全治愈，但皇上在十六天以后，新年（大和八年，公元834年）的正月初五便能在太和殿召见群臣。

尽管中风是天子家族几代以来的老毛病了，但这仍然算是个偶然的事件，不过，郑注能药到病除，却是偶然中的必然。上天注定要给郑注这么一个机遇，因为这个机遇，先是他本人，然后是李仲言，走上了帝国政治舞台中心。他们二人在未来的一年里进而得以主宰了朝政，甚至成为了文宗百挑千选之下的最后垂青者，为天子发动了第二次也是最主要和最后一次反击，这一次反击更为惊心动魄。

慌不择路，选择郑注和李仲言

文宗最后选择了某种意义上的第三方力量来实现他的计划。然而方向既已迷失，任何努力都只不过是一场赌博。

郑注在医术上确实有一套。

说起来话就长了。郑注本姓鱼，因为郑氏是大姓望族，遂冒姓为郑，早年就以医药之术游于长安权贵之间，后来他也正是凭借此道才得以投入王守澄的门下。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起，郑注先是被李愬所用，署为节度衙推等职，随之转战各地。郑注医术精湛，屡验其效，李愬对他极为赏识，渐渐地，连军政大事之可否，都经常与之商讨参决。郑注在这方面也表现出很高的才略，为之筹谋，皆得采纳，因而得以在李愬军中挟恩骄纵，作威作福，惹得军府将士甚为怨怒，都欲除之而后快。但李愬看中了他的智术和医道，每为袒护，大家敢怒不敢言。

王守澄当时在李愬军中任监军，听得将士们反映，也很讨厌郑注。后来，郑注结怨太深，军将们都忍无可忍，纷纷到守澄处诉苦，守澄便去请求李愬排斥此人。

李愬一笑："情况我都知道，郑注是有这些毛病。不过，这个人确实是个奇才，将军若是不信，不妨与其谈谈，若真是一无所取，去之未晚。"当时宦官出为监军，多挂诸卫将军之衔，故李尊称守澄为"将军"。

说罢，李愬吩咐传话郑注，"内衙将军召见。"

守澄面有难色，心想："我怎么能见这么个人！"但节度使如此说，他也不能完全推托。没办法，守澄很勉强地接见了郑注。

有阴诡之机的人天生有一种常人很难具备的才能，这就是善揣人意。不唯如此，这种人更有一种以片言只语打动人心的机辩，一般人是很难抗拒的。果然，守澄与郑注略谈了一会，就被他完全征服了。从外厅谈到内室，两人促膝投分，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郑注成为了守澄的亲信，并随之入京，开始了他不平凡的经历。

长庆、宝历之际，王守澄入知枢密，专领国政，郑注如鱼得水，往往是昼伏夜出，专门从事守澄不能公开进行的勾当，一时门庭若市，从奸巧之徒到朝廷大臣，无不争趣其门。长安城中的人都知道，要找王守澄办事，先要去求郑注，当年李逢吉入相，就是通过侄子李仲言走的这条门路。京师好事者给他起了个外号，曰"鱼郑"，后来干脆称之为"水族"，取其本姓之字义，也有讥讽他圆滑巧佞的意思。

宋申锡事件后，郑注外放为邠宁行军司马，大和七年（公元833年）九月，卸职入京师时，被御史重重地参了一本。

首倡者是侍御史李款，在十天之内，连续上了十几道奏章，请将郑注交付法司。王守澄见风声甚紧，便把他藏在自己的神策右军军营里。郑注也知道，因为宋申锡冤案，自己犯了众怒，眼下只能缩头不出，避避风头再说。有王守澄的保护，一两个朝官的弹劾倒也是奈何他不得的。

但其中还有一个值得细细说上两句的事情。

宦官之中，也大有派别，早年的李忠言与俱文珍的分野就是一例。特别是宦官分领左右神策军，两中尉地位相当，为争取权力，自然就有分歧和冲突。这也是由来已久了，左军先是马玄亮，与当时的右军梁守谦就有不和。眼下右军的王守澄独掌大权，挟天子把持朝政，宦官中便就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满，其中包括现时左军中尉韦元素，左右枢密杨承和、王践言。在利害相同下，三人更是联合了起来，合力对付王守澄，而郑注被朝臣弹劾，正是一个契机。有左军与枢密参与了进来，郑注就危险了。

左军将官李弘楚建议中尉韦元素诈病召郑注医治，届时在左军中先杀后奏，“有御史的弹奏，又有杨、王两枢密在圣上面前进言，大人绝不会因除奸而获罪。”李弘楚道。

元素以为然，遂召郑注。郑注晓得此番前去凶多吉少，躲过今日躲不过明日，遂走险招，果断地来到左军。一见到韦元素便跪行数步，接着俯仆在地，又是一大段滔滔不绝的自诉，一把鼻涕一把泪，真的是感人至深。

元素心软，不觉同情他起来，听了他的一段表白，也觉得有道理，赶紧下座将他搀扶起来。郑注一见得计，话就更多了，巧舌如簧，说得元素是兴趣盎然，早把杀他的意念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李弘楚立在元素身旁急得不行，屡次以目示意，元素就是视而不顾，最后还厚赐郑注不少金银布帛，放了他回去。

郑注刚走出屋外，李弘楚便道：“中尉大人今日不能决断，来日必受其祸！”元素不语。弘楚望着门外郑注的背影，跺脚长叹不已。

王涯出任宰相，郑注在中间出了不少力，王涯为了报答郑注对他

的襄助，最后压下了李款的奏状。守澄又在皇上的面前说了话，郑注终于逃过了这次难关，升任侍御史兼右神策军判官，得以正式在王守澄手下任职。任命一下，朝野无不骇叹。极权政治之怪往往如此，一个人越无行，受到的抨击越多，极权者就越是要扶持此人。原因无他，“极权”的实质就是反常道而行之，否则，大家都赞成，又何能显出唯我独尊的快乐？

以郑注的天才，又借天子得病的东风入侍医药，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当郑注略施小术，开出几副药，说出几段话后，文宗便成为了他所征服者名单上新的一员。

单有郑注，恐怕还很难有异日之变。在大和八年（公元834年）正月，皇上因风病小瘳，发布大赦后，又有一个“奇人”回到了长安。

这就是李逢吉的侄子李仲言，当年为逢吉迫害裴度、元稹的主要策划者。

此人更不同寻常。比之郑注，他虽然没有小道之术，但却是标准的名门之后、进士及第的士流。形貌魁梧，神情洒脱，长得一表人才，更兼才识过人，机辩不让郑注。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身份地位比郑注更能成事。

李仲言可并不斤斤计较一时的得失，也不会为金钱权位而得意忘形，他是有大志的人，起码也要像他的祖先一样，出将入相，成就一番大业。仲言的一切行事，都是在为此做准备，对他来说，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起先依赖李逢吉没有成功，并不意味着他就此沉沦不复。仲言任侠豪放，有不少两肋插刀的朋友，郑注就是其中的一个。郑注既为皇上所宠信，他的机会就来了。

仲言得罪流贬后，是因为母亲去世，才返回洛中故里居丧的。此次入京，他带了价值百万的金帛珍宝，目的有两个，一是为李逢吉上下打点，一是为自己活动，希望能够恢复一官半职，重新步入政坛。一来到长安，他当然第一个就找郑注。

皇上好易学。易之道，其思也博，其用也大，是一种富于辩证，讲究哲理的神奥之术，所谓一阴一阳之间，天地皆备，八八六十四

卦，涵盖万物。想当年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圣人以后，虽未亡于秦火，然微言既绝，大义亦乖，若非上智之人，不能略窥堂奥。当今天子好学深思，才智不让古贤，他对易学，下了很大的功夫，即位以来，常常是捧以随辇，朝廷无事时，便在偏殿读之竟日。这几年来，皇上把一腔郁闷全部转化成了读书的热情，他迫切需要在书中找到解决的方法，皇上常感慨的是："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何以为人君？"其实，现在的天子"甲夜视事"早已难有作为，恐怕也只能是"乙夜观书"罢了。

皇上对易学的爱好如此强烈，当然不仅仅是出于对古代典籍的崇拜而已，文宗在这部书里，获得了一种《贞观政要》以及其他书中所没有的东西。奇正反合，阴阳交感，乾坤为列，否极泰来："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君子以远于小人"……都是皇上孜孜探究的问题，皇上把圣人垂则与眼前之事联系起来，似乎就更能理解书中的深意。皇上披览群书之时，或扼腕欷歔，或欢呼裣衽，但读《易》时却多是沉默不语，很明显，不甘的天子自有心机。可惜的是，朝中却无人通晓易道，身边的三位侍讲学士虽然时相顾问，但解决不了什么实际疑难。皇上苦无商析疑义、倾述衷怀的对象，其寂寞可想而知。

巧的是，李仲言精通易学，他浸淫此道十几年，仕途的不幸更使得他对易理有深厚的理解。仲言既托到了郑注，郑注自然便将他引荐给王守澄，守澄得知仲言独擅其术，便郑重地推荐于文宗。同得到郑注一样，皇上大喜过望。

仲言尚在居丧期间，不好除授官职，为避人耳目，皇上命他着戎服。对外称"王山人"，与郑注同时在禁中行走。

王守澄暗自高兴。从他这方面来说，宋申锡事件暴露出两个苗头，一是皇上对他的态度，一是左军的不良企图，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守澄荐举郑、李二人，特别是引举标准的士流李仲言，有自己的考虑，他希望两人能够扼止住不利的趋势，同时扩大己方的实力。从文宗这方面来讲，对二人一见倾心，相遇恨晚，立即就准备重用，其中也有外人难以猜度的打算。至于郑、李二人，更非等闲之辈，皇上忧怀万方、魂不守舍的心态，很难不被他们感受到。得以近君傍圣，

自古而来都是为人臣子感戴不尽的幸事，更何况天子对他们是如此的亲近，两人的兴奋与激动是可想而知的。感觉最强烈的是李仲言，因为王守澄为避人耳目，已经在此后不久把品行粗俗的郑注外调为昭义镇节度使。

于是，三方都是各怀心事。

一场变故将不可避免地到来。谁将是这场变故中最后的胜利者，现在还很难看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处于文宗和王守澄之间的另外一些宦官，无疑会在双方的势力消长中获得好处。

仲言在与皇上的讨论中尽显才华，君臣解《易》之际，更多的是谈到了经典以外的事情，如同当年的宋申锡一样，仲言也被皇上誓雪仇耻的激愤深深打动。他毕竟是一位儒士，当然知道为国为君是个人的至道，仲言无法拒绝这一强大的诱惑，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第一件有为之事。

郑注也不例外。与仲言为人稍有不同的是，郑注平常更多的是考虑到成败与得失，这是他做人的原则。参与天子的穷则思变之举，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但大事却未必有大利，郑注每一次行事都是注重于理性而不重感情的，但这一次却不知何故，同样也被激情冲昏了头脑。王守澄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作茧自缚，推荐给皇上的两个人，最后都将倒戈相向，成了他的掘墓者。

这也是天子的力量。只要天子还是天子，哪怕是懦弱的傀儡，或是残酷的暴君，他仍然拥有一种唯一的、正义的、具有强大震慑作用的感召力，既如泰山压顶，又如三月春风，令人不可抗拒。成功的天子往往都是善于利用这一力量的人。文宗知道他俩是王守澄的亲信，只有攻心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唯其如此，才能出其不意而占得主动。话虽这么说，但其实，皇上这时也属无奈，身在九重深处，既无内应又无外援，差不多已被逼入绝境；更何况，朝中大臣没有一人能够理解的心事，竟被对方阵营中的李仲言一点即破，皇上又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在文宗心目中，李、郑二人既是反正的义士，又是富于谋略的奇人，一嫡出名门，一起自草泽，阴阳交合，正反相成，是符合《易》理，契于天意的安排，文宗不能不下决心。

但皇上亲用仲言遭到了宰相李德裕的强烈反对。

“李仲言先前所为，陛下想亦知道，”德裕这话，指的是仲言先前陷害裴度和元稹的事，“对这么个人，陛下如何能置于近侍之位？”

皇上难于正面回答，反问道：“难道不容许他改过？”

“此人坏在本心，断不会改。”德裕这个结论下得斩钉截铁，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了。皇上不悦。

不过仲言的处境确实不好，早年的前科尚未被人淡忘，自己又是受处分的人，身无半职，加上刚刚母丧期满，皇上也不大好说话。八月，文宗只授了他个“四门助教”的职位，这是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下设的“四门馆”里的一种教职，官阶只有“从八品上”。就是这样，门下省犹欲封还敕书，幸亏王涯做了手脚，任命才得以通过。

文宗已不能等待，十月前后，他不仅召回了郑注，而且升仲言为翰林侍讲学士，并且同意他俩的提议，征召李宗闵还京复相，将德裕又外放出京。仲言对此想得很清楚，你李德裕既无情，也就不能怪我不义，自己正干着一番百代伟业，尔等腐迂之辈又省得什么！十一月，仲言上表请改名为“训”。真不知道他把自己名字改掉的用意究竟是什么，也许，他要借此表明他脱胎换骨的决心，而与旧我彻底决裂？无论怎么说，李仲言——现在应称李训，似乎已经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不管未来的命运要把自己抛向何方。

如果说选择宋申锡是所托非人的话，那么选择郑注和李训，就是慌不择路。

长安的冬夜，照例是一片凄凉。可在宫苑深处，天子的寝殿却时时是灯火通明，一种炽热的气氛弥漫殿中，飘荡飞扬、跌宕升腾，穿过重重帘帷，像要把屋外厚厚的积雪彻底融化。

第二次反击：计划临时起变

这一次行动部署周密，思虑狙诈，但是计划不如变化。道失既先，事艰必后。

皇上从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十二月患病，郑注入侍，到今年（大和八年）六月得见李训，再到年底最后拍板，花了近一年时间。皇上这次汲取了宋申锡失败的教训，为了克成其事，真可谓殚精竭虑。

首先，不能引起王守澄和若干宦官的怀疑。这一点是文宗主要考虑的事情，也是促成他最终选定两位宦官所信任的郑、李二人特别是郑注的主要原因之一。郑、李在此方面确实有着先天的优势，以至于当他们次第为皇上所任用时，王守澄还暗自高兴。皇上为了稳住对手，甚至还不惜与朝廷大臣们翻脸，坚持任命他们强烈不满的郑注、李训，从而给宦官一种圣恩正隆的假相；李、郑也在竭力拉拢左军和枢密院里的倒王派，为行动作准备。

其次，任用李、郑翦灭宦官，也不能让朝士们得到蛛丝马迹。宋申锡失败就失败在这里，他不应把大事托付给一位居心不良的王璠，导致了全线的崩溃。皇上与李训有一个共识：朝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可与谋大业。这也是天子九年来一贯的想法。

可无论怎么小心，李、郑两人屡屡入宫与皇上朝夕计议，难免会有风声传出去。文宗听到消息，先是有些担心，但很快就有了主意。他招来郑注，如此这般地吩咐了一番。

十二月初三，皇上特敕郑注为太仆卿。果然，朝官中有人上疏坚决反对，郑注立即上表固辞，皇上遣人直接以告身赐之，郑注居然也坚辞不受。接着，郑注在长安城中大肆招摇，公开收受贿赂，于是宾客盈门，财物山积。朝间正统之士，愤切郑、李二人倚结宦官横行不法，无不恨之入骨。

天子在一次朝会上更出奇招，把李训所作的五条《易》疏公诸朝廷，宣称：有能出其意者赏！这天，李训站在百官之中，神情得意，那意思是说：有谁能与我论《易》？皇上的意图很明显，他要给外人这样一个印象：李训完全是因为易学精湛才如此圣眷优渥，并无其他原因。

眼光短浅的政治手段往往不免顾此失彼。文宗要完成他的计划，只有也只能任用李训、郑注，他们有他们的长处，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为正统的朝士所不齿，因而不能团结大多数人去对付宦官这一强大的敌对势力。在朝廷重臣中，只有几位投靠他们，一是王涯，时为宰相之一；二是贾，也是新任宰相；三是舒元舆，时为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其中，王涯是受过他们恩惠的人，贾、郑二人自称不与二李（德裕、宗闵）同派，因而对李训、郑注言无不从。他们与郑、李走到一起，充其量也是利益上的暂时同盟而已。更难堪的是，为了保证机密，李、郑乃至皇上并没有对他们交底，这使得仅有的几位重要支持者完全不谙原委。这样，他们的实力就要大打折扣了，尚不如早年的王叔文集团。李、郑的这一局棋，自然也就更为艰苦。

但是，天子的信任使他们斗志倍增，光辉的前景让他们心旌摇荡；自负才略，又使他们得意忘形。同时，箭在弦上，弓如满月，岂有不发之理。

冬去春来。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春天，李训给文宗献上了致太平之策的十二字方略：“先除宦官，次复河湟（边患），次清河北（藩镇）。”李训的话，使天子在郁郁愤闷中度过了九年窝囊生涯后，第一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意。

“先除宦官”这第一步怎么走？皇上与李训、郑注煞费苦心。

皇上最恨的是王守澄，别的先不谈，元和时弑杀宪宗的陈弘志，就因为他的庇护尚还优哉游哉，在外间做着山南东道的监军。“此弑逆之徒，当先除之！”天子跺脚拍案不止。

这个好办，擒贼先擒王，只要除掉王守澄，区区一个陈弘志何在话下。李训担心的是，王守澄轻易动不得，“如之奈何？”他对郑注说出心事。

郑注自有办法，他太清楚宦官之间特别是右领军将军仇士良与王守澄的矛盾了，更明白彼辈有隙正可利用的道理。因此他给李训的建议是：守澄既领右军，不妨以仇士良为左军中尉！

这就是先分守澄之权再说。李训觉得此计可行，马上就禀奏了文

宗。五月二十一日，天子诏命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制下，守澄吃了一惊，一整天闷闷不乐。然而，他还是没有怀疑到李、郑二人。

事情在一步步进行。

六月，原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在天子的暗示下，进以居中用事，招致王守澄不满，双方闹得不可开交。天子乘机下诏，出杨、韦、王三人为西川、淮南、河东监军。不久，李训、郑注又指责他们与李宗闵、李德裕皆有勾结，接受贿赂，于是三人先是免职，最后被分别赐死；另一位牵涉其中的宦官崔潭峻虽已亡故，也被剖棺鞭尸。守澄大为高兴，觉得报了左军一箭之仇，完全不知道这是皇上与李训、郑注借他之手除掉了“四贵”中的三个，下一个就要轮到他了。

也是这个月，完成了使命的李宗闵被郑注弹劾，贬为明州刺史；同时，朝中凡与二李有染者，皆被逐斥。七月二十一日，李训升任兵部郎中、知制诰，翰林侍讲学士一职不变。八月初四，郑注升为工部侍郎，兼任翰林侍讲学士。两人皆带侍讲学士之衔，保证了他们在外廷任职的同时，依旧能与皇上保持联系，这点至关紧要。

九月初，山南东道监军陈弘志突然接到旨令，命他即刻入京。二十一日，弘志走到青泥驿站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特使出示天子密诏，当即将他绝杀杖下。此事几乎没人知道，更不用说王守澄了。

二十六日，皇上发布诏命，调升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到了这时，守澄仍还蒙在鼓里，以为这是郑、李二人的报恩之举，他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这一荣衔只是李训、郑注架空他的措施，根本不存在着丝毫善良的意图。守澄的昏懵决定了他已经接近于灭亡。

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

彻底解决宦官务得有兵在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必须及早准备，方不至于被动。当年王叔文临时抱佛脚不克其功的故事，李训、郑注又何尝不知道。早在九月中旬，郑注即主动上表请求外任为凤翔军节度使。凤翔是京西北的战略重镇，因为地位重要，此间节度往往

带“神策行营”之名，军力亦颇强盛。京中的左右军既不可得，掌握京城周围的行营部队就十分重要。在调升王守澄的前一天九月二十五日，诏制颁下，同意郑注的请求。宰相中唯一的不合作者李固言因反对这一任命，也被派出京外。二十七日，舒元舆、李训入相，皇上在拜李训“同平章事”的制书中还特别命令：李训仍需每二三天一入翰林，为天子讲解《易》经。

十月初八，李、郑悄然进宫，与皇上密商了一整夜。第二天，毫无准备的王守澄就在府第中被毒酒鸩杀。

到此，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李训从一位受流贬的人一跃而至宰辅，为天子倾意任用，或在政事堂，或在翰林院，天下事无不可决，这是前所未有的。朝野上下，无不震恐，就是神策中尉、枢密使，见到他都不敢不迎拜叩首。李训决定：十一月份动手！

这是因为，下个月有个绝好的机会。

王守澄死后，天子追赠“扬州大都督”之衔，就定在十一月下旬在城外的浐水入葬。郑注虽在京外任职，但以故旧情深，请率亲兵入护丧事，自也不会引起怀疑。到时，只要天子下令内臣齐集送葬，李训关起城门，郑注则可在城外令亲兵尽诛宦官，使无遗类。同时，城中诱捕住两中尉，事即可成。这是李训、郑注反复计议的结果。

李训提出，计划中最为关键的是郑注出镇凤翔，务得蓄以兵力，届时召之能来。

郑注理会得。他有些担心的是，届时自己是在城外，得手后即使马上进城，也难保能一下子扫清后事，关键还是要看京中。到时，有无足够的兵力应付局面？

李训已有安排。

在郑注即将赴任的前夜，李训及其死党大理卿郭行余、户部尚书王璠、京兆少尹罗立言、太府卿韩约、刑部郎中知杂李孝本一起在郑注位于善和里的宅第中秘密集会，进行最后的决定。

不时，诸人来到。李训对众人宣布道：“圣上旨意，下月中外同

赴，诛杀宦官，还望诸位不遗余力，襄助其事，同靖国难，报天子圣恩！”

众人慷慨激昂之余，都隐隐有点不安。毕竟，这是要见真血的事情，这些平常养尊处优、逍遥自在的人一想到马上就要真刀真枪地上阵，也真有些胆怯。但李训已不能让他们在这个最后时刻退场，他道：

“诛灭宦竖，必须里应外合。除郑学士出镇凤翔外，邠宁、河东两镇，京中的几个要害部门亦须掌握。明日仆即奏明圣上，将两镇节度及京兆尹、金吾卫弄到手。”其中邠宁、河东两镇拱卫京畿，兵员充沛，举事之际尤得假借，所以李训非常重视，他把这个任务委托给王璠、郭行余二人。

王、郭表情肃然，点了点头。

十一月初五，文宗颁布诏制，命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王璠为河东节度使；调原京兆尹李石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以罗立言代理京兆府事；以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李孝本代理御史中丞。其中，韩约的“左金吾卫”更是关键所在。

“左右金吾卫”是中央卫戍军队十六卫之一，原来担负的是保卫皇城中枢机关的职责，本朝之初称为“南衙诸卫”或“南军”，与“北衙卫”或“北军”对称。北衙（宫城）的神策禁军兴起后，南衙诸卫基本上都成了闲司，既无权，亦无兵，只有左右金吾卫仍然担任昼夜警巡之职，是京城除了左右神策军之外唯一的军事力量。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十月底，郑注就到了凤翔节度府任所。一到镇，立即精心挑选了数百个精悍的壮士为亲兵，配备精锐武器，赏赐丰厚钱物，时刻准备进军。不多日，消息传到：王守澄入葬，日子定在十一月的二十七日。郑注立即上表请求入京，同时传书李训，告知了上路时间。

但不知为何，京中的李训却决定提前行动。

事后很久的一段时间里，以至于在千余年后的今天，人们都对李训为什么突然改变计划表示不解。确实，这情况郑注还不知道，也来

不及通知，如此临时变更，就等于把郑注的力量摒弃在外，对于本就捉襟见肘的李训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好主意。更何况，李、郑的这次行动仍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宫廷政变，它的成功全赖于周密的计划和万无一失的措施，如果这个都做不到，事情就很难说了。

有一种说法是李训忌讳郑注。因为照原计划办，成事之后，郑注则专有其功，对他不利，所以他要先期行动，同时可把郑注也一并解决。这种意见是当时不明内情的人的普遍看法，宋朝司马光同意此说，并把它写进了他的名著《资治通鉴》，因而广泛流传。

另一种说法是认为李训、郑注本有两套方案，一前一后，而以李训的那套出奇不意的计划为主。因此提前发动，并非是李训的临时决定。这是近代史学家吕思勉的见解，他甚至认为，李、郑二人预谋早在八月份就定形了，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十月底。

事实上，这些论断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甘露之变：不成功则成仁

诡道权宜，不能治本；阴谋逆德，终非胜算。

李训确实决定改变计划提前动手，不过，这个决定的做出，完全是出于无奈。

正如李德裕后来指出的，其时天下大势，全在北军，左右神策主宰着整个帝国中央政府的存亡。如先在城外王守澄葬礼上动手，诛杀的仅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宦官，丝毫不能触及问题的根本，宦官的首脑、现任左右中尉的仇士良和鱼弘志仍需在城中解决，届时一旦有所疏忽，惊动了他们，李训等人就绝非是神策军的对手。

那么，对京中的神策军能否动些脑筋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多年以来，神策军士唯听中尉号令，左右中尉不去，神策军就是金汤一座，无法策反。

形势既如此，换一种思路考虑，如果就在宫中发动一场奇袭，先下手解决首要人物左右中尉，特别是王守澄之后拥有大权的仇士良，问题岂不是迎刃而解？

李训在与郑注约定之后，就意识到原计划存在着破绽，开始考虑上述方案。但是，决定已经作出，难以更改，李训即使察觉到在城外动手的危险，本也无可挽回了。可就在此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李训不得不铤而走险，果断决定提前发动。

这是因为：消息有走漏的迹象！

从上月底郑注赴镇到现在，已将近二十余天，这时，郑注在凤翔的有关动作，已隐隐地传到了一些人耳中。朝野上下，对李、郑不满的大有人在，风言风语，也开始在京中流传。虽然说这些话的人尚不知其中的真情，但这足以让李训吃惊不小。眼下，离王守澄下葬的日子，还有七八天之久，李训感到，如此拖下去必将凶多吉少。

大约是十五、十六日前后，李训得到密报，说郑注率五百亲兵已在赴京路上，京内外已经有人知道了这一情况，并且很可能传到了宦官那里。事情已极为紧迫，李训赶忙召来王璠和郭行余。

“情况紧急，怕不能等凤翔兵了！二位可借赴镇之前征召幕僚的名义，立即广募豪侠义士，等待号令。切切！”

两人虽感惊慌，但不敢怠慢，马上分头加紧行动，两三日之内，又招集到了不少人，约为亲信私僚，使他们以仆从的名义跟在身边，人数大约有几百人。

但这仍然是不够的，李训又密嘱韩约、罗立言、李孝本各以其金吾卫兵、京兆府以及御史台卒吏集中待命。这一天已是十一月十九日，李训又秘传韩约会商，最终决定，提前在二十一日动手。

起初，二人为具体的行动计划苦思冥想，反复掂量，足足熬了一宿，也拿不出妥善的办法。直到凌晨，李训偶然把目光转向窗外，寒雾朦朦中欲出未出的晨曦映在树丛微霜的枯叶上，突然使他心头一亮。李训回过头来，意味深长地对韩约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啊！”

这是《道德经》上的话。韩约莫名其妙：这个时候怎么还有心思谈经论道？

李训提醒他：本年八月，有甘露降于紫宸殿前樱桃树上，圣上亲采而尝之。

“？”韩约茫然，还是不明所以。

“假如过两天，有甘露降在足下的金吾卫仗庭院中，又当如何呢？”

韩约猛省。

甘露，甘美之雨露也，乃太平之瑞兆，轻易不可见。一旦得降，预示着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普天之下，皆应颂贺，算得上是朝廷的一件大事。有了事情，就好做文章了。

事不宜迟，李训对韩约交待道：只须如此这般……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大明宫紫宸殿。

钟鸣五鼓，天子升殿，百官班定，早朝开始。左金吾大将军兼金吾街使韩约，抱笏步出班列。

按常例，金吾街使此时出奏，当是报告今日京城六街的平安状况。然而，韩约所奏却出入意料：“左金吾听事后院石榴树上，昨夜忽降甘露，臣恭颂陛下圣明感格，得此上天垂祥！”奏讫，蹈舞再拜。

百官听罢，虽略感意外，但也觉得年来瑞兆迭现，今日再降甘露，或亦可能。一时间，殿内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宰相李训、舒元舆赶紧称贺，百官随之齐齐拜下，山呼万岁。李训、元舆都道：“陛下宜亲往观之，以承天庥。”文宗允诺，于是下令班放含元殿。百官退下，齐往南走。部分官员包括宰相王涯、贾、舒元舆等各归本司。

左右金吾仗院就位于大明宫正门丹凤门的两侧，实为整个大明宫的门卫，含元殿是第一道大殿，自然离左金吾仗最近。不一会，天子

乘软舆出紫宸门，过宣政殿，再出宣政门，来到含元殿升座，命李训率中书、门下两省官先往视之，验明后回报。

从含元殿到左金吾卫仗院充其量也只有五百余步，加上验明甘露的时间，一个时辰也就足够来回了。可不知怎么，李训等人去了许久，才返回含元殿。李训奏道："臣与众人验之，不像是真的甘露，不可遽为宣布，以免讹误而使天下枉贺。"

天子果然一副惊异的模样："有这般事？"回过头望着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文宗又道："卿等可再率诸内臣往视之，务得验明真假。"

两中尉得旨，率人往外走。李训不动声色，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后，立即对殿下班列的百官大声叫道："王璠、郭行余安在？来受诏敕！"

殿下的两人知道，行动开始了。王璠再一次露出了他的懦夫嘴脸，在此受命之际，竟吓得两腿发颤，一步也走不动，只有郭行余急步趋前拜下："臣在！"

李训又对殿下的廷卫官喝道："圣上有旨，速令河东、邠宁两镇官健入宫听命！"

"臣领旨！"此人说完，立即就往外跑。王、郭两人所募的私兵早已怀揣兵器候在丹凤门外，不一会，河东兵陆续来到，而邠宁兵竟在宫外观望，一个也不动，其行径正好与宫内他们的两位首领相反。

殿下尚在的一些台省官见此情形，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

与此同时，仇士良、鱼弘志带了十几个宦官来到左金吾卫仗，进得门来，就遇到了等在那里的韩约。仇士良还未发话，突然瞅见韩约面色仓皇，额头流汗，一副恐惧的模样，很是惊讶："将军怎么这个样子？"

话音未绝，一阵劲风穿堂而过，厅廊之间的帷幕被风吹起，士良不经意之间眼睛一瞥，忽然看见幕后竟有不少全副武装的士兵，阵风

之中，还传来兵器相击之声。士良心头一震，心道：“不好！”电闪雷击之间，他与鱼弘志对望一眼，二人立即就明白了。“快退！”士良对众人大呼，带头就往门外跑。

众宦官紧紧跟上，门口的一位金吾卫兵欲将门关上，士良大喝一声，跻身而上，门竟不能合。鱼弘志领人一哄而出，随着士良往含元殿急奔。韩约惊在当场，茫然无措，厅廊上的士兵不敢妄动，看着仇士良等人逃出左金吾卫仗。

李训在殿上一见仇士良、鱼弘志全身而退，往这里奔来，晓得不好，赶紧对立在殿下的金吾卫兵们叫道：“快上殿护卫圣上乘舆！每人赏钱一百缗！”但事出突然，士兵们都不知所以，还没有反应过来，仇士良已抢先入殿，对皇上说道：“宫中有变，请陛下速速还驾！”逃回来的宦官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由分说，抬着软舆送到天子面前，连拖带扯，就把文宗架了上去。此时，殿前已有金吾卫兵上来，已无法从正门出去，宦官们抬着皇上便往后跑，含元殿后是一排藩篱，众人七手八脚，硬是扯开一个洞，要从这里逃出。

李训奋不顾身，扑上去拽住乘舆大呼：“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宫！”皇上也是挣扎不已，连声大叫。仇士良声嘶力竭：“李训反了！李训反了！”拥舆急奔，想把李训甩开，李训死不松手，一直被拖到宣政门前。

这时，金吾卫兵已拥上含元殿，罗立言率京兆巡卒三百余人从东，李孝本率御史台从吏二百余人自西赶到，与金吾卫兵纵殿击杀尚未逃走的宦官，霎时，殿中宦官鬼哭狼嚎，一下子死伤了十几人。

后面的哀号声不断传来，这边的李训仍是紧紧地抓住乘舆不放，此时，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千万不能让仇士良逃掉，更不能让他们挟持着天子，他心里清楚得很，覆巢之下，安得完卵？若没有了天子，一切都将鸡飞蛋打。

宣政门就在眼前，拥着乘舆的宦官知道，只要逃进去就是他们的天下。有一位叫郗志荣的宦官挺身而出，对着李训当胸就是一拳，李训双手正抓着舆杠，无法遮挡，被兜心一击，当场倒地。仇士良导着

乘舆驰入，宣政门沉重地渐渐合上，里面传来众宦官“万岁！万岁！”的激动声音，躺在地上的李训听着这一切，浑身上下一片悲凉：完了！

含元殿前，百官早已一轰而散，罗立言、李孝本率人杀了一会，忽不见李训与天子，再看看左右中尉也浑无踪影，也知道事情不济了。可这时两人手上还有数百人，如果乘宦官立足未稳，一不做二不休，再杀入宣政门，也未必就不能挽回败局，但在关键的时刻，他们想到的却是赶紧脱离干系，立刻收拾起家伙，急急出宫。一大批人霎时就走了个干净。

李训倒不愧枭杰本色，从地上起来，十分的冷静。他与身边的从吏对换衣裳后，面不改色，走到宫外，然后骑上坐骑，快马加鞭就直接往城外疾驰。一路边走边说：“我有何罪，竟被贬斥！”路旁的人都以为李训在今天的朝会上受了处分后发牢骚，也就没有加以怀疑。

既已图穷匕首见，那就绝对容不得后退。李训之辈也许都根本没想过一旦失败的对策，因而在事不成后，竟毫无作为，不负责任地作鸟兽散。他们也不想一想，拱手把反击的机会让给别人，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他们如何可能全身而退！

宣政门内，仇士良已经红了眼。

他对蜷缩在乘舆里惊慌失措的天子恶狠狠地道：“陛下！你干的好事！”这再清楚不过了，若没有天子良好的配合，李训又怎么能做得如此天衣无缝！士良此时已十分冲动，若不是当着不少宦官的面，他真恨不得把这个用心毒辣的天子就此一刀劈死。想想也真是后怕，若不是自己反应得快，他们这些宦者将全都是人家刀下鱼肉。多年以来忠心耿耿，想不到竟是这样一个结果，难怪士良一腔怨气按捺不住。

其实，左右的宦官都与他是一样的心情，都是怒目而视，嘴上骂骂咧咧。

皇上面红耳赤，无话可说。此时，他自身的安危已系于人手。又能怎么样呢？要怪，他也只能怪李训不争气，片刻之间，就输了个一

干二净，连天子都搭进去了。

“杀！”士良对各率五百禁兵赶到的神策左右副使刘泰伦、魏仲卿道。仅仅在事变后不到一个时辰，宦官们即从北东西三面，向位于大明宫南部的各衙门发动了反攻。

其他宰相中，只有舒元舆得知内情，悄悄改换官服，已单人匹马逃出宫外。而王涯、贾尚懵然无觉，对前来询问的一些省官们道：“不知何故，请诸公各个自便。”这边众官刚刚退下，王涯等正准备进餐，忽就有人来报：“不好！有禁兵从宫内开出，逢人辄杀！”王涯、贾这才晓得事情严重，慌忙逃窜，这时宫内各门均已被人关闭，两省官、金吾卫兵们足有千人，都从建福门往外挤，王涯等刚刚奋身脱出，宫门就被禁兵合上，有六百余人没有逃出，全被斩杀。横尸流血，狼藉涂地，宫内诸衙印鉴、图籍、帷幕、器皿在兵乱中一扫俱尽。下午，神策军分遣千余骑兵出城追捕，又在城中大索，死亡人数又将近有一千余人。长安城中，已是一片尘嚣。

以牙还牙，宁滥勿缺，这是报复者固有的心态。

朝士们休矣！

郭行余当场被执。王涯当时年已七十，徒步走到永昌里，不得已在茶肆中歇脚，被禁军擒获。押到禁中，受不得严刑逼供，只得屈招与李训谋行大逆，将尊立郑注。王璠逃归私第，本以亲兵自守，闭门不出，但被神策军将骗道：“鱼中尉致意，欲以公为相主持大事。”王璠以为自己幸脱干系，遂出门随之至左军，也被拘禁。见到王涯，王璠不怪自己朝秦暮楚，以至上当，反而甚为气恼：

“二十兄自认谋反，又何必牵累他人！”王涯排行二十。

王涯想想此人实在不足与论，没好气地回道：“五弟昔为京兆尹时，与宋申锡谋，若不漏言与王守澄，岂有今日？”王璠排行五。

这话答得好。王璠这个可以说坏了两次大事的人，听了也是作声不得。

舒元舆逃得早，已出了安化城门，但也未能走脱，被出城追捕的

禁军抓获。罗立言在太平里被擒。贾易服避居民舍躲了一夜，第二天，想想没什么意思，主动来到兴安门，被擒送左军。李孝本以帽遮面，单骑直奔凤翔欲投郑注，但不幸走到咸阳城西，亦被追兵擒住。躲在崇义坊的韩约同样不免，在数天后被禁军查获。

只有李训逃到了终南山。

终南山有位叫宗密的和尚，是个有道高僧，以前曾与李训颇为投机，见李训来投，宗密有意剃其发而匿之，但为其徒众所沮。无奈，李训只有出山改奔凤翔，在路上被一位地方军将抓住，送归长安。

走到长安城郊的昆明池时，李训心想，事已至此，到了神策军更受酷辱，便对拘送者道："你们抓到我就可得富贵，但听说禁军在城中搜捕，等一会见到我说不定要来抢人，你们不妨取首以送，现在就把我杀了吧！"听者从之，斩下了他的首级。

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两天，整个长安在无限惶恐中度过，天子被软禁，政府部门的权力也被彻底停止，生杀除授之权，皆决于两中尉，禁军嚣横，无所拘碍，京中吏民死于无辜者不可胜计。城中闲人恶少，乘机杀人报仇，剽掠百货，相互攻劫，尘埃蔽天，数日不绝。

二十二日这天，仇士良把王涯的供状递上时，殿上的天子悲不自胜，强忍着没有流下眼泪。二十三日下午，在左右神策近六百人的警卫下，王涯、王璠、罗立言、贾、郭行余、舒元舆、李孝本在两市中当众处死，连同李训，枭首于兴安门外。其辈亲属，不论亲疏，悉数处死。

牵连而冤死的朝官人数更是无算，在宦官的报复下，朝列几乎为之一空。

右仆射郑覃、户部侍郎李石被拉出来代行相权，但天下事皆决于仇士良，他们两人不过徒行文书而已。在延英殿上，二人唯一能对士良有所辩驳的话就是："此乱诚由训、注而起，但不知训、注由何人而进？"这话当然是指责宦官首开祸端，但在文宗听来，他已是两面都得不到一点支持，完完全全地失败了。

到了二十四日，尽管坊市之中渐趋平静，不过，戒严未除，大赦

令也未颁布，神策军依旧大肆搜捕，罪人亲属故旧尚在不断牵连之中，长安城仍然是一片肃杀和悲凉，官吏百姓，都是惴惴不安。

两天来，一阵严寒又忽袭长安城，这是多少年来不曾有过的，人们都说，这或许是杀气太重的缘故。可是，郑注尚没有抓到，京城人都纷纷传言，郑注将率兵为乱。仇士良还不能就此罢休。

事变的那天，郑注已到了扶风县，离长安只有几十里之地。不幸的是，李训提前发动，又提前失败，使得郑注完全陷入了被动。他是二十二日得知李训事败的，眼见他的这支本以奇袭为目的的小分队已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意义，没奈何，只得收兵急还凤翔。郑注的匆忙撤退也使得往这里逃奔的李孝本、李训二人没有机会与之会合，最终被追兵赶上，丢掉了性命。

不过，即使他们与郑注会合，也逃脱不了最后灭亡的命运，因为政变的失败已使得他们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只能任人宰割。这再一次证明，每一场宫廷政变都是不成功则成仁，没有别的结果。

郑注还犯了一个错误：回到凤翔，他没有立即公开号令出兵勤王，“以清君侧”。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郑注决意行动，凭着一镇兵力之强劲，乘着朝廷混乱，人心怨愤，再加上各大藩镇本就蠢蠢欲动，说不定能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地方反叛。可是郑注只是一味观望，这一犹豫，给了仇士良机会，一天后，他的秘密敕令就传到了凤翔监军张仲清手里。

张仲清经过一夜思考，果断地下了决心，派人去请郑注。

郑注仗着自己手下人多，没有防犯，把亲兵留在了门外，只带了数人与仲清会面。结果被张仲清当场亲刃，其亲兵也在门外被一网打尽，这一天是十一月二十五日，离李训发动政变的二十一日只隔了四天。消息传到长安，引起了一片欢腾，城中士庶的心理很简单：这一场风波也许总算过去了！二十七日，京师各禁军还营。二十八日，最后一位要犯韩约被处死。

这就是“甘露之变”。

进入宦官时代

东汉末期之后，第二次宦官主宰的时代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今日山川对垂泪，伤心不独为悲秋。

文宗顷虽有志，晚无成功。“甘露之变”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失败，是一次没有达到任何目的的无效的反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是一场不仅没有取得丝毫效果，反而带来无穷灾难的动乱。更可悲的是，天子这次任用为左右两派都深恶痛绝的李训、郑注行此大事，道义上都没能站住脚，因而从当时到后来，连丝毫的同情都不可获得。

长安的格局由此终于发生了质的变化。

前面说过，帝京长安由北向南，依次是宫城、皇城、外郭城，而政事堂、中书门下两省常设在宫城之南，尚书省及六部、九卿、三监等又位于皇城，所以，本朝人把这些政府部门称为“南衙”，而将位于宫城西北的宦官机构内侍省称为“北司”，这与“南军”、“北军”对称，同是一个道理。

“北军”兴起后，“南军”已名存实亡，到了此时，“南衙”竟也让位于“北司”，宰相和朝廷百官都成了内廷的附庸，宦官终于将政事权也夺到了手中。这一场南、北之争由来已久，若从王叔文算起，也有三十几年了，在此时此刻，“北司”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今以后，尽管朝廷职能部门名义上依然故我，但大部分实权已不复存在，一切都要视枢密、左右神策和各种中使的臧否行事。所谓“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帝国首都的方正之象，从此成为历史。

这当然不完全是李训、郑注的过错，“甘露之变”只是给了宦官一个借口而已，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借口，“北司”的强大也是一个无可挽回的事实，总有一天，他们要完全成为一个统治阶层，而“甘露之变”的失败使他们开始实现这个美梦。

十二月十六日，有诏停止搜捕追亡，在正式拜相的郑覃、李石，以及新任京兆尹薛元赏的努力下，长安逐渐恢复了正常。第二年正

月，天子发布大赦，改元“开成”，时为公元836年。

自此，文宗皇帝在无限的悲哀和郁愤中度过了最后的四年。

仇士良代替了王守澄，成为遥控天子的新的主宰者。在此强大的内廷势力面前，皇上已彻底无所作为，“天子”的名分只是使他依旧升殿听奏而已，但所有的权威都已化为泡影。天子终于在此时成了地道的傀儡，这是他自即位以来一直不愿发生的事，也是他九年来一直刻意避免的事，然而却终究成为现实。文宗其实是被软禁了，这最后的四年，皇上实际上是在醉酒听歌、闲吟诗书中度过的。

皇上的心在流血，在哭泣，他当然希望醉人的醇酒能消解他心中的悲伤，然而，举杯浇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酒能使人暂时忘记一切，但却不能忘记永远。天子毕竟年轻，他又如何能够轻易把一腔衷情徒然消磨！

皇上像爱好诗歌一样爱好音乐，他善于吹奏一种叫“小管”的乐器，甚至还作过曲，但美妙的音乐也不能挥去他心中的忧伤，反而常常使天子哀不自禁，悲从中来。即使是音伎盈庭、杂戏骈罗，一片热闹之象，皇上也是无动于衷，难解愁颜。

皇上的叹息声像一个个沉重的梦魇。

那是一个温熙的春日，禁中牡丹盛开，莺歌燕舞，姹紫嫣红，但在文宗的心里，如花的春景似乎也是一团团迷茫的愁云，压在胸中，使人难以喘息。望着高低相间、摇曳生姿的丛丛牡丹，他想起的却是舒元舆的《牡丹赋》中的句子：“俯者如愁，仰者如语，合者如咽。”皇上第一次理解了其中的深意，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情到深处，物我皆一，这如画的牡丹，又岂非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哀叹！天子感慨之余，无限胸臆都在不知不觉中化为两行热泪，悄然而坠。

左右侍从默然，谁也说不出话。

宫娥翩翩而至。一曲《何满子》奏了起来，有位宫人步出行列，合乐起舞。《何满子》，舞曲名，相传本朝开元时沧州人何满子，善歌，因事触刑律，临刑前进此曲以赎，音调低沉哀婉，愤懑苍凉，所

谓“一曲四词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舞者按拍踏步，轻展燕体，把这首曲子演绎得淋漓尽致。

曲终舞罢，皇上被深深打动，唤这宫人来到御前，赏赐了一对金臂环，问道：“汝是何人，家在何处？”

宫人盈盈下拜：“妾名沈阿翘，本是吴元济的伎女，元济败亡，因善声歌而为陛下宫人。”言语之中，不胜凄楚。

吴元济死了快有二十几年了，那么，这位宫人在寂寞深宫之中，也就度过了如此长久的漫漫岁月。相逢何必问，同是断肠人。皇上不再说话，只是命她再舞一曲《凉州曲》，这又是一首著名的哀歌。音韵清越，舞姿哀缓，乐声停处，一时四面静默，观者无不凄然。

有一位布衣士人张祐听说了此事，写了一首诗：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

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寥寥二十字中，宫怨君哀，一泻喷薄，真是写得好！这首诗又辗转传入宫中，为宫人歌唱不绝。

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冬天，皇上风痹又一次发作，服食药剂后，病情稍有缓解。十一月二十一日这天，因天子病体未愈，朝会早早地散去了，退朝之后，文宗扶着疲倦的身体回到思政殿。

文宗望着远方，拱默良久。一个时期以来，他的心里常有一种虚幻缥缈的感觉，天子知道，自己也许不久于人世了。

忽然，文宗缓缓地对侍从道：“今日翰林院值日者是谁？”

旁边的翰林院使答道：“中书舍人周墀。”周墀，时以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

“试命召来。”皇上依旧沉稳地说。

周墀奉旨进殿，文宗先命赐座，又以金卮赐酒三杯，周墀饮毕，谢恩。文宗徐徐道：“依卿看来，朕是何样君主？”

周墀一听，立即下座，恭敬回答道：“小臣不足以知大君之德。凡百臣庶，皆言陛下有尧之圣，舜之明，商汤之仁，夏禹之俭！”

文宗淡然一笑：“贤卿这是出于爱君之心，不得不这样说。朕其实哪里敢追踪尧舜禹汤之明，”皇上顿了一顿，“朕要问你的，是朕比诸周赧、汉献二帝如何？”

这是什么话！周墀如五雷轰顶。周赧王、汉献帝是两个庸碌的亡国之君，怎么能与我大唐圣明天子相提并论？皇上饶是为人钳制，也是有为之君，如何心哀如此？天子受辱，则人臣之过也，周墀激动地无法控制，倒身拜伏，声音哽咽。

他想不出其他话来安慰皇上，只是一个劲地称颂圣德，劝皇上不要为小节而谦谦挂怀。

皇上只好自己说了：“朕自以为比诸周赧、汉献犹有不及。周赧、汉献受制于诸侯，朕却受制于家臣，所以朕比他们还差得远了！”

文宗平静地说出这段话后，终于无法控制，突然俯首痛哭，泪如雨下。

周墀还能说什么？趴在地下更是悲不能禁，涕泗并流。

从这天起，皇上再也没有视朝。一个月后的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初四，文宗皇帝驾崩于太和殿，年仅三十二岁。

第五章
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

内官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

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沾朝衣。

——李德裕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派系之争

数十年来，帝国政治的黑暗，尚不仅仅是因为宦官。

失败的反击“甘露之变”使文宗落得个悲惨的结局。当这个自称“受制于家臣”的皇帝在万般无奈中撒手人寰时，其身后事是可想而知的。

文宗此时后宫无子。长子鲁王原在大和六年（公元832年）被立为储嗣，但五年后竟莫名其妙暴卒而亡。次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封蒋王，亦不享天年。皇上本得位于其兄敬宗皇帝，所以在两子相继亡故后，开始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自己百年之后，将皇位大宝还之于兄之子！于是开成四年（公元839年），立敬宗第四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文宗晏驾时，陈王年既冲幼，又体弱多病，帝国的继承权再一次成为严重的问题。

宦官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就以年轻的太子陈王入继皇统，一派则欲立皇弟颍王。前一派以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为首，宰相杨嗣复、李珏副之；后一派的首脑便是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两派的斗争酿成了一场不小的政变，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实力强劲的仇士良一方获得了胜利。

事情的经过是：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初二，文宗弥留之际，急召刘弘逸、薛季稜并杨嗣复、李珏四人入禁中，欲以太子监国。这是皇上最后的挣扎，想在安排后事上最后行使一次权力，但仍然遭到了仇士良的驳斥，请更议所立。李珏不服，说了一句：“太子已立，岂可中变？”仇士良就干脆自行发布诏令，以太子年幼不克大任为借口，制命颍王（文宗弟）为皇太弟，复太子仍为陈王。

当天，仇、鱼二人仿效当年王守澄的做法，发左右神策、飞龙、羽林禁军数千人，直接从诸王居处“十六宅”强行将颍王接到宫中的少阳院，并在思贤殿接见百官。不费吹灰之力，便使储君易人，这就是

拥有兵权的好处，刘、薛二人并宰相们无可奈何。

初四，文宗驾崩；初六，陈王、安王、文宗妃杨贤妃就被赐死。其中，陈王是原太子，安王是文宗的小弟，而杨贤妃又是主张立安王的人，仇士良假借嗣君的名义让他们彻底消失，既顺理成章，也不用花什么脑筋。正月十四日，颍王李瀍即位，后来的庙号为“武宗”，时年二十七岁，也是一位年轻的皇帝。

天子迭代之际，是非激烈之时。成者王侯败者贼，这种斗争最是鲜血淋淋，没有半点温存可讲。从五月到八月，反对武宗即位的宰相杨嗣复、李珏相继罢贬；另一个关键职位京兆尹的人选也被撤换。第二年，刘弘逸、薛季稜被诛杀。

又是一场急风骤雨，但这仍不过是拉开了未来动荡岁月的序幕而已。

“北司”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再也没有人敢公开把宦官不放在眼里了，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这是既成的事实，也是事情的必然，徒示不满没有任何的作用。渐渐地，大家也开始接受了这一现状。时间是造物主最妙的魔具，它能让人慢慢地忘记痛苦，适应现实，并且最终与现实融为一体。

不过，要是以为帝国政治中的“南北之争”从此风平浪静，那就大错特错了。树欲静而风不止，任何对立的双方都不会同时或者永远失去利害冲突，更何况，“南、北”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为这与帝国的立国纲纪和道德伦理格格不入，不是彼死，就是我亡。现在的平静只是暂时的，这是宦官太过强大的缘故，未来的很多年内，宦官们一直保持了这一态势，双方的斗争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永贞”和“大和”时期的那种惊心动魄的情景。但是，今后的岁月里，二者的斗争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呈现出来罢了。

与前此的刀光剑影不同，这种变换了方式的斗争是由无数个悲欢离合的故事组成的。

故事的中心人物有三位，未来的十几年内，在“南、北之争”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聚光灯将再次投射到他们身上，看着他们演出一段云

诡波谲的活剧。这里说“再一次”，是因为事实上，这一出活剧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登上了帝国的舞台。人们对这三位风云人物已经非常熟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帝国的政治，至少有一半是围绕着他们进行的。与过去不同的是，从今天开始，他们的这出大戏将逐渐达到高潮，并且彻底结束。如果没有他们，九世纪将会是多么的平淡无奇。

只要对过去十几年的是是非非尚未完全淡忘的话，一下就会想到这三人就是：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

一切都要从一次“制举”说起，这就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

简单说来，本朝的考试制度有两种，一曰“常科”，一曰“制科”。“常科”或称“岁举”，每年定期举行，乡贡州（府）选，最后集中到长安，统一由礼部主试，故也称“礼部试”，主要有六科，以“进士”一科最为重要，所试科目为诗赋。但通过常科考试后只能取得“出身”，要想获得官职，尚须经吏部衡量选拔，通过“身、言、书、判”四方面的考察。“制科”或称“制举”，是由皇帝委任策试官命试，科目不定，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问，由被试者答以策文，以供皇帝“亲览”、朝廷参考。制举试天子往往亲临，故又称“廷试”或“殿试”，对策高第，皆可授官。

因为考试科目多是现实问题的缘故，与“常科”相比，“制举”与政治的联系就更为紧密。应试者往往通过对策表达对时政的看法。天子与主试官有时也引导举人申述政见，以发现人才、体察舆情。特别是一个名为“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的制举科目，最有“应诏直言”的特色。

明白了这些，就可看出问题来了：制举试特别是“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既有如此的特点，那么，欲在考试中取得佳绩，必然要投其所好，在策文中“切时宜，观政事”、“指病危言”，以求获得轰动效果。此乃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况且，言切辞直的策文，常能在客观上对国家弊政有所匡正，也算是种有理的行为。麻烦的是，考试与政治相联，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是非之争。这正反两种效应往往相伴而来，在本朝的制举试中屡见不鲜。元和三年的那次“贤良方正能言直

谏科”考试就是一个最为有名的例子。

考试的中心人物就是李宗闵、牛僧孺以及另外一人皇甫湜。事情的经过本来很简单，三人在策文中攻击主要以宦官为代表的权贵，结果因此而得罪。但是，这次科场案中却牵涉到当时的一个重要人物宰相李吉甫，遂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祸根。

李、牛、皇甫三人最后得罪被贬，罪魁祸首应该是当时的宦官首脑人物吐突承璀，可不少人却把过错推到了李吉甫头上。糟糕的是，吉甫竟也没有否认，就这么默认下来，从而为自己的儿子李德裕酿就了一辈子的苦果。说他在这里犯了一个终身大错，确实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怪罪李吉甫的人自有他们的理由，因为当时的所谓“首座”，亦即主持工作的宰相就是李吉甫，身为宰臣，对这个案子充耳不闻，本身就值得批评；而且，吉甫在后来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援救措施，也真是太不应该。但是，就此猜测是吉甫对三人嘲讽时政有所不满而主张将他们贬斥，那就是某些见识不高者的盲见了。

李宗闵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策文中为了标榜自己，还特意对朝廷坚持用兵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而吉甫又是当时最坚定的主战派，从这个推理出发，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吉甫是处分自己的主倡者，从此与李吉甫结下怨仇。吉甫在几年后便去世了，因此李宗闵把这种怨恨转移到与吉甫一样坚持主战的裴度、李绅等人身上，并且一味排挤吉甫的儿子李德裕。他在大和时期与牛僧孺共同打击德裕，在开成时借助宦官的力量入朝，再次谋排德裕等等行为，归根结底都是这种报复心理在作怪。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绝大的误会！三人的策文，皇甫湜以攻击宦官为主，而李、牛却主要是指责当权者炽于武功。当然，吉甫是主战派，坚决主张对藩镇用兵，但却绝对不至于因此就下毒手。再说，李、牛二人也并非是针对吉甫而来，因为当时吐突承璀是最希望以武功博得宪宗赏识的人，为此，他后来甚至不惜挑起朝廷与成德的争端。策文只有指责此人，发人所不敢发，方能博取声誉，事实上，两人的本意也确乎在此。他们应该想到，自己既非针对宰相李吉甫，李

吉甫又有什么必要大动肝火？本来，这场误会是可以避免的，谁料想，他们后来还是听信了别人的谣传，固执地以为是吉甫对己不利，基于这种认识，并最终走上了极端的道路。另外一方面，李吉甫不作解释，不作调解，也是造成这一重大误会的原因之一。他要是知道这件事的后果是多么严重的话，一定会追悔莫及。

然而，这次制举案仍然还是一个伏根而已，真正的导火索却是因一次“常科”考试而点燃的。这就是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三月的进士科考试。

这次试场案的过程已见前述。当时，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相继入朝为官，开始在帝国政坛上发挥作用，这次事件的实质就是李宗闵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并使朝中的不少人围绕着他们三人而形成了鲜明的政治与个人分野。

李宗闵与牛僧孺是亲密的同盟。李德裕的周围虽无明显的党人，但在德裕与李、牛发生冲突时，也有不少朝中要人或以政见不同，或因个人私利，而与德裕共同指责和排斥李、牛二人及其党徒。所以说朝中从那时起正式分成两大派系，这个结论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从穆宗皇帝时起，他们之间的互相倾轧开始变得十分明显。

李宗闵与牛僧孺的轻信和固执己见，固是造成这种党派斗争的主要源泉，但是，李德裕在这上面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事情发生在长庆三年（公元823年）三月，李逢吉荐引牛僧孺入相之后。

当时德裕亦有入相之望，无奈因与裴度、元稹及李绅关系密切，受到李逢吉的排挤，被外放浙西观察使。而在此之后，逢吉又再引牛僧孺入相，有人传说：这是李逢吉借此来阻挡德裕入居台阁。这件事终于给了德裕以很大的打击。

本来，在此事之前，他们并未在重大政见上发生激烈的矛盾，自长庆元年的试场案后一直保持着相对的平和。但是，在长庆年间，李宗闵、牛僧孺二人却和李逢吉的见解非常接近，进而依托逢吉的势力，境况很是得意。对此德裕是有看法的，不过仍然没有表示出来。到了这时，他才第一次开始从心里对牛僧孺产生了个人感情上的憎恶

感，为他后来的某些作为隐下了伏笔。作为一位器具过人、拥有将相之才的名门之后来说，也不免陷入个人是非恩怨的窠臼，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在此之后，德裕也曾强烈地反对李宗闵私树朋党，但那是代表了大多数人意见的正义之举，倒不可归之为私人恩怨，他的第二个不当是几年后的事。

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五月，朝廷命德裕出任淮南节度使以接替牛僧孺。

按照规定，诸镇节度相代，新任长官一般要清点前任的账目，核对钱帛、器械、斛斗的数目，奏报朝廷，作为当时接收和今后贡赋的依据。可长期以来，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为了留有余地，防止上任之后突发天灾人祸而使经费紧张，新官一般都要把前任的账册数目拦腰杀半。也就是说，假如前任官交接的账册上注明尚有钱帛合计一百万贯匹的话，则继任者上报朝廷时，便奏报实领只有五十万，其余数目以库藏不符、交接时差中的支用等为由表示并未收到。这是地方官常有的瞒天过海之道，一般很难被朝廷追究，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惯例了。

德裕是代僧孺出任镇淮南的，当僧孺得知这项任命后，不愿意与他正面接触，遂将军府事务交付副使张鹭，自己即时卸职赴京。

德裕到了淮南，竟也因循那种旧日的陋习，奏报朝廷说：账册上扬州府藏八十万贯匹，但只领到四十万，其余已为原副使张鹭用讫。在这里，德裕尽管有“旧例”可循，但以他刻意改革弊政的一贯做法来看，此举多少显得有些矛盾。况且，淮南也曾是其父李吉甫建立功勋的地方，照理他是不应该在这种事情上给人留下话柄。德裕之所以这样做，恐怕确是出于潜意识中对僧孺的不满情绪。改任东都留守的牛僧孺却不放过这件事，上疏辩白。僧孺这一边也有不少人弹劾德裕妄奏。朝廷只得下诏德裕重新核检，结果自然使德裕很狼狈，因为检点下来的数目正好是八十万，一文不少。德裕不得不上表检讨，请求处分。

事情虽然不大，但要紧的是，它同此前的那次“维州事件”一样，加深了他们二人之间的沟壑和敌意。与“维州事件”所不同的，这一次是德裕难逃其咎。

文宗时期，三人先后交替在朝，又先后为李训、郑注排挤，几乎是与王守澄和李、郑二人以及宦官中的其他派系同时进退。对文宗来说，这两派他一派也用不上，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放在了对方身上，缺乏为皇帝除去心病的主动性。所以，文宗才不得不任用和他们没有牵涉的宋申锡，甚至最终还慌不择路，选用李训、郑注这两个非正统人士来实施对宦官的反击，从而酿成了一场帝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剧。

对此，文宗在大和末期，李宗闵强烈排挤李德裕之时，曾说了一句无限感慨的话：

“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

当时，河北强镇割据依旧，不听朝廷号令。文宗正受制于人，话不好明说，只能用“河北之贼”来与朝官中的“朋党”现象相比。其实，若用“家奴”来代替“河北贼”，倒是更为恰当，因为对宦官的反击虽然艰难困苦、屡遭失败，但其中也并非完全没有胜机，而政治派系一旦产生，那就绝非是靠武力或者强权所能解决的，用一句诗来形容就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是一位叫李商隐的人在后来写的，此人在文宗说那话三年以后及进士第，从此也被卷进了这场是非相争的滚滚洪流中。

不管怎么说，天子这话确是一语千金。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更何况是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令人困惑的是，这三个人如何竟造成了这一场本朝——也许不止本朝一代而已——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政治派系之争？

说起来也真是一言难尽。

党争的前因后缘

成住坏空，有因有缘。世界上没有无故的爱与恨。

关键在于李宗闵。

宗闵字损之，宗室子弟出身，元和时期曾做过宰相的李夷简就是他的伯父。但从他的祖父时起，这一家已无祖荫可恃，所以宗闵也免不了走科举的道路，在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进士及第。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宗闵本与牛僧孺又在制举“贤良方正科”得中高第，因策文言辞过于激烈，结果不得升调达四年之久，直到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方才入朝任监察御史。

宗闵在仕途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裴度出征吴元济时，征用他为彰义军府的观察判官。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使得他此后步入了朝廷的中枢阶层。淮西平复后，宗闵入为驾部郎中，又以本官兼“知制诰”。穆宗即位，升为中书舍人。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那次试举案中，宗闵也是被处理者之一，原因是他的女婿苏巢在其好友、主试官钱徽主持下进士及第。这次考试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就是公卿子弟特多，有些竟还是主试官的亲戚。为此，翰林学士李绅、元稹及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群起而攻之，结果导致了两位主考官和牵涉请托的某些朝中大员被处分。同时，在对已中进士者的重新“复试”中，苏巢等人因实才不符而落选，宗闵因为这个缘故，自也难逃嫌疑，被贬为剑州刺史。

凭心而论，宗闵在这件事上多少有些冤枉。主考官钱徽与他交情笃厚，而擢其女婿及第，宗闵当然有请托的嫌疑，但这场纠纷的发动者段文昌、李绅却也很难说自己就很清白。

段文昌爱好书画，任相时有一位杨凭曾以家藏珍贵书画献于文昌，托他引荐即将应进士试的儿子杨深之。恰恰在考试前夕文昌罢相出为西川节度使，赴任之前，文昌便又是面托，又是写信，请钱徽照顾。可榜出而不见杨氏子，反而尽是主考官亲旧者之子弟，遂使得文昌勃然大怒。

李绅也是这种情况，他属意于一位举子周汉宾，亦曾专门托请钱徽留意，不料结果竟是名落孙山。他与段文昌一气之下，便向皇上弹

劾主试官钱徽。可见，在这场科试案中，他两人确实是有私心在里面，算不上于私为公的。

事发后，据说有人劝钱徽把段、李二人的信公之于众，钱徽却不同意。

“苟无愧心，怎可以私人书信相证！”钱徽对来人道。

这话说得漂亮，也表明钱徽甚为明智，否则，当时洗刷了自己，今后却难逃种种更大的是非漩涡。

与此事无关而站在段、李一边，强烈指责钱徽、李宗闵等人的是翰林学士元稹。他本与宗闵一样，都是急于求进之流，在争夺宦官支持方面，不免与宗闵产生牴牾，二人由是相恶。此时元稹便利用这个机会攻击宗闵，为此还专门拟了一道诏制，把这件事上纲上线，狠狠地批驳了一番。在这一态势面前，宗闵倒霉就是必然的了。

李德裕倒是没怎么落井下石，但他与李绅、元稹在当时号称翰林学士院的“三俊”，相互间情同手足，凭这一点，德裕也就无法脱身事外。

这次科场案算得上是本朝有史以来最大的，处分也很重。朝中与钱徽、杨汝士（另一位主考官）、李宗闵有关系的人，都有些愤愤不平，李宗闵本人就更不用说了。

李宗闵这个人极端的冲动固执。

这样说他，绝非是信口开河。仕途上的两次挫折在他的心理上造成了伤害，使他变得十分记仇。贬剑州后将近两年，因牛僧孺在李逢吉的荐引下拜相，宗闵才得以起复为中书舍人，并在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十月权知兵部侍郎。最后在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走驸马沈和枢密使杨承和的路子，做到宰相。执政之后，立即便将德裕及与之相关的人员请出中枢机构之外。特别是对德裕，宗闵更是有一种政治上无法共存的排斥心理，非要将他剥夺权力而后快。其实，宗闵似乎并无什么一贯的政治见解，此一行为完全是出于一种心理上的需要。

不仅如此，宗闵还有一种强烈的派性心理。

本来，同志相互支持，关怀提携，固是艰难人生之一大幸事，亦乃人之常情。但是，宗闵把它看得过重了，这样，“义”代替了“忠”与“直”，私心压住了公利，同志成了同党，好事即不免成了坏事。

大和四年（公元830年），宗闵刚刚入相不到四个月，马上就荐引上表告退的牛僧孺再次入相。近两年中，他把自己的同年、同学辈人统统提拔到显要的位置上，而这些人又转相依托，以至于引起朝野的共愤，连文宗也认为大臣之间私结朋党的现象颇为严重。当李德裕第一次入相，坚决主张去掉朝间议论最多的“三杨”等党人时，宗闵还千方百计予以袒护，在他看来，自己的所谓“同志”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谁要是反对，谁就是与他本人过不去。长安城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门生故吏，不牛则李。”“李”就是指宗闵，“牛”便是指牛僧孺，这句话是说，他二人取人，大多数都是自己的门生故吏。

别看宗闵事事锱铢必较，但表面上却很豪放任侠，对后辈以及同僚颇存宽厚，因此身边很有一些人，大半是在他前后进士及第的新贵，还有不少是他的同门或亲戚故旧，因而相互间的情分是很重的。

这又要谈起“进士科”考试了。

本朝“常科”与“制举”并重，合称“科、举”，是士人进身的必由之路。其中科目繁多，但比较起来，还是“常科”中的“进士”一科最为显要，一旦得中进士，那简直就是一件光耀无比的事情，此后释褐入仕、出将入相，都指日可待。后人有所谓“簪绂望之继世，草泽望之起家”之语，就是指的进士科。士子一生荣辱，寄乎其中。

本朝“进士试”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不糊名，也就是阅卷者（主试官）可以知道这是某人的卷子；二是试诗赋，亦即考试内容以写诗作赋为主。由此，整个过程便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情形：

首先是可以公开推荐；其次是考试重才艺不重实学，举子们平日的声誉重于临场的发挥。

主试者称为“知贡举”，就是“特命主掌贡举考试”的意思，一般以

朝廷名望大臣担任。与知贡举者关系密切的人，可以公开为他推荐才人，这也是朝廷出于不拘一格广泛选拔人才的考虑。而举子们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华，往往提早很多时间，向公卿大夫投献诗文，以博得他们的赏识和引荐，同时营造声誉，期望来年得中进士。所以每年的秋天，都有数千举子云集长安，奔走于名公贵仕之间，希望他们向主司推荐。有时，甚至在考试之前直接向主考献诗，陈诉衷情。

这是应试的技巧，也是必由之路。否则，起于泥涂、升腾云空的一腔抱负，就有可能成为泡影。

当年柳宗元的一位朋友下第后，找他请教。柳子厚赠他四个字："先声后实。"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一定要先给主司一个印象，然后才能在考试中用上真才实学。

知贡举者拥有生杀大权，而每年却只有极少数人能登进士第，因此，一旦得中，及第者必对知贡举者感恩终身。时人把主试称为"座主"，把当年进士称为"门生"，"座主"之于"门生"，不啻于恩重父母、义同再造，这种关系可非同小可！

元和时期，崔祐甫的侄子崔群在中书舍人任上曾做过一年知贡举，后来罢职，退隐林下。其妻有一天劝他：为子孙考虑，是否应该置点庄田。

崔群笑答："我有三十座美庄良田遍布天下，夫人何忧！"

其妻茫然："从来没听说夫君有这些产业。"

崔群大是得意："我前年知贡举放榜三十人，他们不都是我的良田吗？"

崔群真是明白人，他知道"有人"的好处要大于一切，而所谓"有人"，又有什么能比得过"门生遍天下"呢！

近几十年来最著名的知贡举是德宗时的宰相权德舆，他在贞元十八、十九、二十一年连典三年贡举，前后擢进士七十人，登辅相之位者，即有十余人之多。比如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年）这一榜，李宗闵、牛僧孺、杨嗣复就赫然其中。权氏自己正是凭了这一点，安稳轻

松地做了几年的宰相。

于是，进士一科的种种弊端由是而生。试诗赋，重声名，使浮文艳词大行其道，举子们轻德重艺，蔓衍成俗，越来越脱离现实。而“座主”、“门生”，受命公朝，拜恩私室，开请托胁迫之路，扇奔竞冒进之风，也使得公平原则大受破坏。同时，如此情状，更使得诸如长庆元年的那种科场案屡屡发生。

宗闵与僧孺等无数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幸运地成为每年充其量只有二三十个名额中的一员。他们在特定的仕进过程中有着相同的经历，“同年”、“同门”、“师生”这些纽带把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友情因素取代了理念成分，最终决定了已经延续了一二十年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

宗闵周围算得上是关系亲密且身居要职的有好几位。

文宗去世这一年的宰相杨嗣复，是宗闵的同榜，同年情义，十分相得；与其同相的李珏，更是宗闵一手提拔，由嗣复推荐才得以入相，他们的关系自也匪浅。此外人数颇多，“三杨”兄弟是其典型。

杨虞卿是宗闵最为得力的干将，受其知遇也最重，宗闵甚至把他当作骨肉兄弟一样看待。他是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的进士，比宗闵晚五年，在元和末期官至监察御史，长庆四年（公元824年）为吏部员外郎，仕途也是相当顺利的。在吏部员外郎任上，因检下无术，曾被一度停职。大和时期李宗闵、牛僧孺同相时，被起复为左司郎中，一路高升，做到给事中的职位。

此人天性圆滑柔佞，攀附权贵很有一套，不仅得到李、牛的赏识，而且与宫中宦官的交情也甚为密切。有了这些关系，他在朝中便以路子广、办法多著称，一些举子为了得中科第、获授美缺，往往托他行走，很少有办不到的。因此，虞卿门下党徒众多，朋比唱和，喧嚣朝野。

虞卿弟汉公，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登第，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官至司封郎中，在宗闵左右，也是个很得力的人。堂兄杨汝士，比虞卿早一科，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进士。他是长庆元年与

钱徽同知贡举的主试之一，在那场案子中因涉嫌擢其弟鲁士及第，被贬为开江县令。从此汝士便与宗闵走到了一起，更得到他的厚待，大和后期一直做到中书舍人。

“三杨”兄弟卜宅于京师靖恭坊，号称“靖恭杨家”，他们与杨嗣复还是同宗，一门数人位至公卿，是其时显赫一时的大族，也是朝廷中拉帮结派者的中心。位于靖恭坊的杨宅从早到晚都是车马如注，虞卿每天都要接见无数宾客，也不知道都在商量什么，反正看上去来往其门的不是有事请托之人，便是三杨的至亲好友。人们戏称杨宅是“行中书省”，因为它似乎比朝廷的中书省还要热闹，还要具有权威。

来往于“靖恭杨宅”的主要人物是张元夫和萧澣，官职分别是中书舍人、给事中，此二人是虞卿圈子中最得力者，时人把他们与虞卿合称“党魁”，这个称呼甚至连天子都有所耳闻。

“三杨”兄弟感恩图报，在大和时期为宗闵上蹿下跳、大肆活动，朝野为之侧目，实在也闹得太大了。所以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德裕入相，主要打击的就是杨虞卿及其党人，将他们全部贬出朝廷。但是，一年后宗闵再相，杨虞卿等人又官复原职。随着李训、郑注逐渐掌握大权，与枢密使一派宦官关系紧密的宗闵等人利益便有所损伤，因此他们和大多数朝官一样，对这两人也不能接受。杨虞卿时任京兆尹，既对李、郑表示不满，则对方为“行大事”的需要，自也要拔去这个眼中钉。大和九年五月到六月，贬虞卿出明州，连带将李宗闵、李汉、萧瀚、白居易等人一并驱逐出朝。可怜的是，宗闵的其他党人安然无恙，都熬过了这次贬谪，只有虞卿病死在贬所，没有看到他们一派在后来取得的完全胜利。

所有的这些人，都以宗闵为中心。没有李宗闵，几十年的派系波澜就决不会如此轰轰烈烈。

道不同不相为谋

道不同不相为谋。

在宗闵的同党中，最主要的当然是他的同学兼同年牛僧孺。宗闵与僧孺两人虽然一起成名，但由于长庆元年试场案的关系，僧孺却要比他早入相，因而资望在后来超过了宗闵。在帝国政治上的影响，僧孺也不亚于宗闵。但尽管如此，僧孺在前后几十年的派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却不能与宗闵相比。

僧孺与宗闵有些不同。最大的一点是性格沉稳而不外露，做事讲究技巧；而且很能够辨明利害，不强为出头之鸟，该避让时一定退让，一旦抓住机会也绝不松懈。

僧孺家境贫寒，年轻时为了出入头地，很是用了些功。为此，中了进士后颇为自矜。僧孺绝对没有德裕的那种正统的观念，这也许是他出身贫寒，又得中进士的缘故。进士科靠的是才学，古往今来，有才者如不能锻炼其志，就不免浮华不拘，放浪形骸，而且急于求进。僧孺也有这个特点，尽管比起他人来，尚不算是太过分。比如他好奇石、好声伎，在文宗开成时闲任洛阳期间，曾与好友白居易时相过从，他对朋友夸言道，自己曾先后服用过三千余两钟乳石，因此在“那个”方面是很可以的。白居易听了，也为此佩服不已。

当然此乃小节，无足厚非。僧孺这人最大的缺点是气魄狭小，懦弱而不思进取。辛勤数载，中进士、得高位，在他看来就是人生之极限了。为了既得的地位，僧孺不惜以退让自保来牺牲原则，所以当年李逢吉勾结宦官把持朝政，他便主动上表辞位出京；宋申锡事件中，更不能坚持正义。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对朝廷用兵——无论是对付外族入侵抑是地方反叛——都强烈地表示反对。他在其他方面不敢坚持原则，但在这一点上却十分的顽固。

战争总是人情所厌恶的，因而古今中外，反对战争者都能讨巧，给自己留下一个爱护民生的美誉。但是在实际情况下，为了达到和平，有时却不得不诉诸武力，这种情况下的用兵，和穷兵黩武是大有不同的。僧孺和当年的李绛不同，李绛是从帝国战略上考虑，主张轻重缓急应有区分，而僧孺一味反对兴兵，往往是出于既不担风险，又不失清名，何乐而不为的考虑，这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为这事他与德裕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维州事件”是前数年中最厉害的一次，在后来的武宗时期，面对着回鹘入侵以及昭义镇的反叛，他仍然主张妥协退让，和德裕主战的方针格格不入。这是后来两派争讦的焦点所在。

僧孺饱览诗书，有文学之才，在这个方面他与李宗闵也很不相同。所以，他对政敌采取的手段，相应也就温和些，这一点倒也不可不论。

除了在“用兵”这一点以外，僧孺和宗闵在政见上其实与德裕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分歧。所以说，有时政治派系的产生，并非是一些正经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往往出于一些看起来不甚重要的小事。比如进士科考试，便是宗闵与僧孺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情贵难贱易。中进士既然很难，则社会愈重进士，因而进士及第者的仕途相对于他人来说就比较顺利。进士出身者人数不能算多，也有的人终身未授官职，但是，这个阶层却是帝国政治的核心，而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以目前几十年而论，朝中文职大员，几乎清一色是进士及第者。

但是也有例外。

李德裕就不是进士出身，他是靠祖荫起家入仕，进入政坛的。而且，他对进士考试的种种弊端尤为不满。

早先，牛僧孺刚及第时，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那次尴尬的事件尚未发生，他与德裕的关系还很不错。那时僧孺二十九岁，是风华正茂的新进士，德裕二十一岁，随父入京，补授秘书省官校书郎，是意气风发的年轻朝官。大家都是年轻人，平时时常相聚，说话也不拘束。

一次宴集，两人都在座，僧孺正是得意的时候，不大看得起公卿子弟，于是对德裕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瞧着德裕道：“绮纨之子，怎么也坐在这里！”其时，预席者大约以新进士为主，所以僧孺如此嘲笑了德裕一句。

奇怪的是，德裕却无动于衷。确实，他没有必要为这句话生气，

德裕十分清楚他自己的行为：他之所以没有功名，是由于他没参加过任何考试，而其中原因，就是他从来都不看重科举。这在他后来的一番自述中表示得一览无遗。他曾对武宗皇帝说：

“臣无名第，自不当指责进士。但臣之祖先在天宝末期因仕进无路，勉强应试，竟还一举中第。所以厌恶其技浮华不实，自后家不置《文选》。臣以为，朝廷显官，还是应以公卿子弟为之。”

当时武宗很不解，照他的想法，无论出身贵贱，取人但凭真才实学。宰相怎么如此说？

德裕并非是顽固的守旧之人，他有他的理由：

“公卿子弟自小便习举业，”——所谓“举业”，当是指“制举”之业，亦即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的策问之类，和单以诗赋为业的“进士科”大有区别——“因而熟悉朝廷事务，诸如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之类，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入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悉……”

德裕怎么拿“台阁仪范”、“班行准则”来衡量人才高下？话乍听起来有些泥古不化，其实不然。这是因为进士浮荡，不以礼俗为事，已成积习，所谓“驱驰于才气，不务以德行”，屡为有识之士所批评。所以，德裕要积极提倡天子重用讲究儒家礼法经义的公卿子弟，这才是他的本意。

基于这种认识，所以德裕早年不应举，而其后也主张对进士科考试进行改革。德裕第一次入相的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就对进士科进行了几项改革，一是停试诗赋，亦即进士科考试中不以诗赋为题；二是罢宰相阅榜，这尤是德裕的独创性措施。

早先，进士试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主考官须将录取名单，在正式发榜前呈送宰相过目，称为“阅榜”。因此宰相便可以利用职权，上下其手，调换增删及第人员。德裕坚决主张废除这一陋习，并在翌年正月由朝廷正式通过。

但不久德裕就被李训、郑注借李宗闵的力量挤出执政地位，宗闵一上台，德裕的主张自得不到贯彻，大和九年（公元835年）便又恢

复了试诗赋。德裕对武宗的关于任用公卿子弟的进言是后来的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他第二次入相时，在一次廷议上提出来的，此后，他又是雷厉风行地对进士试进行了几项改革，这次更触到了问题的关键。

第一是及第进士不得呼主司为“座主”，及第后只能一次性谒见主试，此后不得聚集参谒，更不能于主司宅第置宴。这是从“座主”、“门生”过于亲密一点上来开刀，确实击到了要害。

第二是禁止“曲江大会”。

进士科之考试、放榜、宴集，早已形成定例。考试结束后，一般是在二月出榜，榜出之日，黎明五更，禁鼓敲过，举子可到礼部南院东墙下看榜。击鼓唱名，便见分晓。以后，新进士则先赴主司处拜谢座主，然后群谒宰相，接下去便是大大小小的宴会了。各种宴集名目繁多，但最热闹的就是“曲江宴”，亦即德裕所禁止的“曲江大会”。

曲江位于京城长安的东南角，占地近十二顷，碧波荡漾，烟光明媚，尤其是春天，花卉茂盛，是其时著名的游赏之地。而新进士的曲江游宴，更是一年中曲江景色的主要内容，到了那一时，进士们泛舟听乐，纵酒颠呼，热闹非凡。公卿大家倾城纵观，甚至专门来挑选东床快婿。有时，天子还亲临曲江之畔的紫云楼，垂帘观赏。时人有诗道“柳絮李花留不得，随风处处逐歌声”、“倾国妖姬云鬓重，薄徒公子雪衫轻”，真是得意者的无上欢聚。由此，京城薄游豪侈之风大长，而进士辈交结朋比的习气也得以盛而不衰。所以，德裕才要下令禁止。

不过，德裕的想法在当时是微乎其微的，有不少人甚至猜测他因为没有名第，所以不惜手段打击进士及第者。这种误会闹得很大，在一定程度上给他造成了不利。同时，积习难改，更何况这些都已成定俗，靠一两项禁令是无济于事的，一年后，德裕的这两项措施都未能坚持下去。也难怪，众人独醉而一人独醒，在醉者看来，这个醒的人不是神经不正常，就是别有用心。

无论谁醉谁醒，有一点已是确凿无疑的：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

裕之间，其家世背景、个人品行、信仰理念乃至为人处世，相差实在太大了。此前以及以后的那些种种是非冲突都不是偶然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冥冥之中，也许就注定了很多固有的矛盾必然在他们身上展开。

大约在文宗的最后几年，也就是开成时期，京城中流行着几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说它“有意思”，是因为这些文字并非是传统上的宏文大著，其内容似乎都是些离奇的故事，有的竟还有点荒诞不经的味道。这些东西时人或称为“传奇”，与古代街谈巷议的“小说家言”很接近，在本朝颇为流行。特别是那些应进士试的举子，都很喜欢写这类东西，因为这种体裁很适合表现才气，投献给名公贵卿，更能够加深他们对自己才华的印象。

但这次流行的几篇“传奇”，其内容却引起了许多议论。

一篇的题目为“霍小玉传”，说的是一位轻薄无行的士人与一个歌伎始乱终弃的故事。本来这倒也平常，关键是文中的主角却是有名有姓的真人，唤作“李益”，这就令人兴趣大增了。

李益字君虞，行十，是大历四年（公元769年）的进士，早先一直在各地军府任职，德宗时入朝，官至右散骑常侍，文宗大和元年（公元827年）致仕，并在当年去世。这个李君虞诗名早著，人虽已故，可他的诗篇仍为时人吟唱不绝，比如《夜上受降城闻笛》一首：“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甚至被谱入弦管，为天下人传唱。

李益此人才名很著，声誉却不大好，他从小就有个毛病：猜忌成性。尤其是对自己的妻妾，那简直是达到了苛刻的程度，当时有一种传闻，说他为防范妻妾而“散灰扃户”，成为时人笑柄，甚至还闹到了朝廷公议的地步。不过，这篇传奇上说他“重色”、“负心”，大家似乎还闻所未闻。

有人说这篇《霍小玉传》出自蒋防之手，说是他在长庆初年专门写给他的恩公李绅、元稹的，也有人说此文本就是蒋防在长庆四年（公元824）遭贬后的刻意詈毁之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

个事实却是很明白的，那就是李益当年曾极端反对李吉甫，又是与李逢吉亲善的令狐楚之友，而元稹、李绅又与令狐楚关系恶劣，假如此文确乃蒋防所作，其用意就不难知道了。

当然这些念头在读这篇传奇的人的脑海里一闪就过去了，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李益的无行，像有一个重大发现一样兴趣盎然。因为当事人早已去世，作者无所顾忌，读者就更无必要为死者讳了。

另外一篇更绝。

这篇东西题为《周秦行记》，是一个人自叙其传奇般经历的游记。说的是其人在贞元中进士落第，归途中，走到伊阙南道鸣皋山下，误入汉朝薄太后庙，邂逅千年前的古人、汉文帝之母薄太后，并与汉高祖戚夫人、南齐潘淑妃、本朝玄宗太真妃子杨氏相遇，最后由汉王嫱——也就是那位远嫁匈奴的王昭君——侍寝、春风一度的故事。整篇内容荒诞不经，文字也不精彩，但其中有一处描写却骇人听闻。

文中写道：在薄太后给作者引荐杨太真妃子后，太后问及当今天子是谁，对曰：“今皇帝，先帝长子。”太真笑道：“沈婆儿作天子，真是大奇！”

不论其他，单就这种语气就让人惊倒了。如何能把代宗沈皇后竟称作“沈婆”？把德宗皇帝呼作“沈婆儿”？这种污辱先帝及先朝皇后之举，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另外，谁都知道当年的沈皇后在安史之乱中曾两次陷入胡贼之手，最后竟莫知存亡，德宗皇帝后来曾数度寻访，均无下落。而文中却以曾作胡人妇的王嫱“侍寝”，作者这种用意极其恶毒的影射，亦让人心惊不已。这篇文字是谁的手笔，竟有这么大的胆子？

卷端赫然题着撰者姓名：牛僧孺！

人们先是惊讶，然后是怀疑，最终一致认为，这东西绝不会是僧孺所作。原因太简单了，尽管人们都知道牛僧孺好写传奇故事，也曾作过一部《玄怪录》，但他绝不会如此愚蠢无知，弄出这么个东西，把自己置于死地。这肯定是有人假托，借以诋毁诬陷牛僧孺。这篇

《周秦行记》还传到了文宗手里，连皇上看了都道：“此撰者定是假名，僧孺哪里至于会称德宗为‘沈婆儿’呢！”

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何人的杰作。

其实不光是现在这个时期有这些怪诞的传奇故事在流传，早些时候，这种文字也层出不穷，内容大体上都是借古事或子虚乌有之人把一些不经的行为写出来示众，可像这篇《周秦行记》公开伪托詈毁之作，大家却是第一次看到。

人们茶余饭后，读事猜旨，虽也不无乐趣，但是仔细想想朝中派系相互攻讦的现实，心里面还是有一种隐隐的忧虑的。

风起于青萍之末。若是没有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的对立，也就不会在朝廷政治中产生派系之分，两种派别既然相互斗争，文学便就是一种最有力的工具。

孰为君子，孰为小人？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但孰为君子，孰又为小人？

过了好多年，还有不少人争论着一个问题：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到底谁是谁非？换句话说，到底哪一方是朋党，还是两者皆为朋党？

古有定论：为私利而勾结意趣相投者，称为“朋党”。

从来人们就讨厌朋党。道理何在？一是结党就必然营私；二是党派之间的是非争斗，自然也就影响到国家的安稳和君主的地位。本朝实行的三省分权和宰相政事堂合议制度，无不是从政治技术的角度出发，力图解决这个问题。可“制度”既是人定的，也就是人所能改变修正的。一旦“制度”在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所动摇，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古人有云：“亡史甚于亡国。”“史”是什么？“史”就代表一种理念，一种是非标准，甚至一整套既定的制度。国亡仍可

复，史亡则不可寻。

也许，本朝自九世纪以来的种种现实，就既是亡国，又是亡“史”的过程。所谓“朋党之祸”就是证明。

宪宗皇帝就对朝间“朋党太甚”的现象十分忧虑，曾两次提出这个问题，第一次是在元和中期朝廷上下为是战是和争论不休的时候，由李绛回答了天子。第二次是元和后期李逢吉与裴度、李绛彼此冲突的当口，是裴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穆宗也遇到过这个难题。其时是韦处厚明确指出，李逢吉之流实为“朋党”。而文宗更为此苦恼万分，这一次是李德裕先后对朋党的现实进行了分析。在这些论述中，他们异口同声地指出了一点，即：君子为同德，小人是朋党。也就是说，只要是君子，就断不会结党营私，“朋党”一词，是小人的专用品。

问题的实质是：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朋党？

李绛说朋党其实无迹可寻，乃是小人谮言君子的借口。若要强为之论，则君子固与君子合，小人固与小人合，这也就是所谓“朋党”。裴度认为，正邪自有区分，全靠人君鉴别。韦处厚则直指李逢吉树党结派。而李德裕更为文宗指出，朝廷当中三分之一的人是朋党。

被攻击者当然不愿退让，从李逢吉到李宗闵不仅都断然予以否认，而且反过来指责对方挟怨报复，造谣中伤。这个问题在当时就争论了几十年，始终不能得出一个清楚的结论，而在往往复复的争辩中，派系已经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回到现实中来，我们还要弄清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结果？

凭心而论，李德裕、牛僧孺二人的道德品行都算不上有问题。但李宗闵则偏执主观，好挟私嫌，而且两派之中的其他人，也免不了良莠不齐、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宗闵、僧孺这一边自不必多说，而经常与德裕站在一起的，有不少人也是私心过重，比如元稹、贾，甚至李绅，都在某些事情上有失公正。假如把问题看得简单一些，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朝廷如此严重的派系斗争，完全是由个人恩怨而来的派性心理的结果。

但是，事情毕竟没有那么简单。

无论是说宗闵、僧孺私结朋党、派性太深也好，抑或是断定李德裕也难逃个人恩怨嫌疑也罢，假如仅仅是这两派党同伐异、彼此排挤，造成的波澜绝不会如此深远广阔。其实，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囿于私见而打击异己，在政治上都是屡见不鲜的，但从来也没有哪次像他们这样牵涉到这么多人，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起起复复那么多次。一句话，如果没有了第三者、第四者，任何一种对立就必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会相互转化、相互妥协，而断不会永远处在矛与盾的永恒是非中。

在宗闵、僧孺与德裕之外，尚有天子。

天子内心对这种事很头疼，但有时在客观上也能得到好处。早先，做得最好的就是宪宗。至高无上的天子有权选择什么是应该做的事，一旦决定以后，他就必须把重心全归结到这上面来。不管朝中有几派存在，谁符合他的想法，他就扶植哪一派。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元和后期，对淮蔡能否取得胜利，是帝国对藩镇强硬政策成败的关键，而这时裴度、李逢吉两人的争讦也达到了高潮。宪宗赞成平定藩镇、扫平淮蔡，不能不倚仗裴度，于是在把裴度派往前线的同时，顺从裴度的请求罢免了反战的李逢吉、令狐楚。但到了淮蔡平定，河北三镇也相继归顺后，宪宗起用皇甫镈却遭到了裴度的坚决反对，这时宪宗的心思已经从平藩转到了收集钱财方面了，显然，裴度的固执坚持已成了最大的阻碍，所以天子便斥责裴度“党见太深”而召回了令狐楚，还磨去了《平淮西碑》以安慰由于因裴度受重用而心生不满的一些人。宪宗此际所做的这一切，其实就是一种绝妙的牵制，尽管不是有意识的，但只要身处天子之位，也就决定了这是一种必然。

年轻的敬宗皇帝有一次做得更妙。

那是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李逢吉为相时，敬宗不满于他的无所作为，遂有心思召裴度为相。但皇上并没有马上就颠倒乾坤，而是悄悄地派人告诉远在山南东道的裴度：

“皇上已定下了召你回朝的时间，你可凭此行事。”

这个暗示再明确不过了，裴度自然心领神会，立即主动上表请求入朝。结果使李逢吉大为恐慌，情急之下，竟使出了下九流的手段，也就是编出了那段“绯衣小儿坦其腹”的东西来诽谤裴度，自己导致了失败。在这里，敬宗是胜利者，他的这种近乎于左右逢源的作法，真是神来之笔！

文宗在这上面花费的心思更多。

文宗当政期间最大的问题是宦官，而且他孜孜以求的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先是放弃相互之间有成见的朝廷派系而依靠宋申锡，宋申锡失败后，他又把希望寄于李宗闵和牛僧孺，但结果仍让他极为失望。所以便转而启用李德裕，并且赞成他大刀阔斧地清除李宗闵与牛僧孺的党徒。文宗在反复多次后虽然放弃了依靠朝臣的努力，但在客观上还是严重加深了朝间的派系分野，使他们的私隙得以再一次扩大。

所以，没有了天子，也许就没有了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的故事。

可是，事情还是不能就此打住。

天子之外，还有宦官。

在这几十年里，宦官的力量早已不能忽视，从文宗开始，他们的权威和势力甚至超过了天子。如果说天子对派系斗争只是下意识地起了一种牵制作用的话，那么，宦官则完全是在有意识地操纵两派的进退，以达到符合自身利益的目的。

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似乎已经不必解释，人们只要回忆一下文宗皇帝那一个无奈时期的种种现象，便立即会恍然大悟，只是心里不敢说出来而已。即使李宗闵、牛僧孺，抑或是李德裕本人，他们心里又何尝没有一本账！

现在的问题完全是出于好奇：两派与宦官这个第四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李宗闵和某些宦官关系密切。

这些宦官就是文宗时的左右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左军中尉韦元素，以及王践言的前任崔潭峻。这四个人是王守澄的死对头。

宗闵是通过杨承和才和他们搭上关系的。当初他为了走杨承和这条路子，还颇花费了一些脑筋。皇天不负苦心人，宗闵托了驸马沈、女官宋若宪，终于联系上了杨承和，为他入相辅平了道路。另一位崔潭峻是当时的枢密使，也是很有影响的人物，此公尽管与元稹关系最好，但对宗闵也不薄。

当然，宗闵与郑注、王守澄的交情也不浅，不过没有与杨承和那样亲密，所以当郑注不需要他的时候，便借口他与李德裕闹党争而将他一脚踢开。

牛僧孺虽与宦官在若即若离之间，但他早年是在李逢吉和王守澄的支持下做到宰相的，又在某种程度上依恃李宗闵，也就注定了他无法对宦官表露出不满。在这一点上，他与李宗闵没有质的不同。然而总的来说，僧孺与宦官的关系不算太好。

文宗大和五年（公元831年）起出任枢密使的王践言十分讨厌僧孺。原因无他，这位王践言做过西川监军，与德裕是同事，而且是“维州事件”的当事人，赞同德裕的主张。他于该年的十一月份回宫任职时，便直接在皇上面前表示过对宰相牛僧孺的不满。

僧孺自己也意识到这些问题，所以他曾经两次告退，自动要求解职出京，以逃避可能的祸患。他在大和六年（公元832年）罢相出朝，任淮南节度使后一直不愿入朝，在淮南呆了六年，又在东都洛阳过了好几年，直到李宗闵入相后把他召回朝中为止。

李德裕与宦官是什么关系，说起来很复杂。作为坚持传统礼法的世家子弟，他当然对宦官有一种天生的反感，但是，他与其父李吉甫一样，和宦官却很少发生正面的冲突。他几次出外任节度使，在所有的外放大员中，就属他与由宦官担任的监军关系处理得最好。早年他在西川时，监军是王践言，前两年在淮南时，监军是杨钦义，这两人后来都还宫入知枢密。德裕回朝后，与之也没有发生矛盾，所以政事处理上便很少有来自枢密院的阻碍。

原因是德裕这个人绝无势利之心，做事讲究个“礼”、“信”二字，假如别人不失正派，即使是宦者之流，德裕从来也都是以诚相待的。

那一年在淮南时，监军杨钦义接到诏令回宫，看样子必是入知枢密。可德裕听说后，除了按礼节略示祝贺外，没有表示出什么特别之处。

到了临别之日，杨钦义突然接到德裕的请柬，邀致府第一饮。

钦义如期前往，来到府中，见德裕在中堂设宴，席无余宾，就他与自己两人，席旁有好几个床榻，上面堆满了珠宝古玩图书画册等物，都是很珍贵的东西。

德裕视若罔闻，只是频频催酒，与钦义依依话别，直到席终，德裕方才指着那些床榻道：

“与将军同僚一场，情甚相得。无以赠别，权以这些东西充数，不成敬意！”

钦义大喜之余，更觉得德裕全无趋炎附贵之态，是个可交之人。

不料杨钦义走到汴州，又接到诏令，命他仍回淮南任监军。钦义空欢喜一场，只得再回扬州。他想想自己既然不能入京，也不应该白拿德裕的礼物，便把德裕所赠，原样送还。

德裕一见，笑道：“将军把德裕看成什么人了！这些东西值不了什么，平常礼物而已，将军又何必相拒？”

钦义很受感动。

但德裕与王守澄、郑注乃至李训却是势同水火。他再怎么样，也不至于像宗闵、僧孺一样容忍他们的擅权专政。矛盾爆发过好几次，最厉害的就是他第一次入相后的那两年，因而郑注、李训便通过王守澄调回李宗闵，借宗闵之力将他弄出京外。在那个时候，王守澄无疑是宦官中最得势的一方，操纵权全在他的手里。谁进谁退，全在他唾手之间，所以李训、郑注才有可能乘机借刀杀人。

说起来，宗闵、僧孺与德裕闹得最厉害的也就是这一次，最后两

边一起被贬出朝外更是绝无仅有的。这完全与宫中宦官派系的势力消长互相对应。不过，他们却因祸得福，在“甘露之变”时正好都不在长安，由此而保住了性命。

开成时期，天子已完全成为傀儡，仇士良是唯一说了算的人。起初，朝中先后任宰相的是德裕一边的李石、郑覃、陈夷行、李固言，四人与仇士良进行了对抗，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安在巨变后总算恢复了正常。

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正月初五，宰相李石在上朝的路上遇到不明身份盗贼的袭击，幸亏他跑得快，强盗只是砍断了马尾，没有伤到他的要害。出事后京城大恐，捕盗数日而不获。最后传出消息，这是仇士良派人干的事，整个朝廷霎时缄默。

李石晓得仇士良不会放过自己，没奈何，只得请求辞职。十九日，李石带衔出任荆南节度使，宗闵的同党杨嗣复、李珏入相。杨、李正月执政，二月，就秘密地托了几位宦官，请他们在宫里帮一些忙。于是皇上在初七这一天的紫宸殿召对宰相时，郑重地提起了一件事。

天子对宰相们道：“李宗闵在外面也有好几年了，可否考虑量移？”宗闵此时被贬为衡州司马。

郑覃不同意：“陛下若是怜其身处荒远之地，移近三五百里就可以了。断不可再用此奸邪之人。陛下若用宗闵，臣请先退！”

陈夷行也道：“宗闵结党图私，死罪尚轻。朋党奸险能倾覆朝廷，不是没有先例，比如当年的李逢吉和手下的什么‘八关十六子’就是证明。”

李珏反驳：“那是李逢吉之罪，与宗闵何干？”

陈夷行转向皇上：“昔舜帝逐四凶而天下治，如今朝廷求理，何必可惜数十个小人？”

杨嗣复暗有所指：“大和末宗闵、德裕皆得罪，两年之间德裕量移为淮南节度使，而宗闵尚在贬所。凡事不能只徇私情，总要端平一

碗水吧？”

文宗想要折中，便道：“这样吧，给他个州刺史”。

郑覃不让：“刺史太优，顶多授个洪州司马。”

陈夷行加重语气，又提出一个理由道：“李宗闵养成郑注，为患几覆朝廷，这个巨祸还不轻？”

杨嗣复不愧是老奸巨猾：“早先，陛下想授郑注官职，宗闵曾反对过，陛下想是记得这事的。”他想借皇上来反击陈夷行的话。

郑覃立即道：“陛下，嗣复这是党庇宗闵！臣看宗闵这个人，其奸邪甚于李林甫。”李林甫是玄宗时的宰相，在他手上直接造成了“安史之乱”的空前浩劫，是公认的奸人。郑覃拿他来和宗闵相提并论，话说得是很不客气的。

“郑覃这话说得太过分了！”杨嗣复不能容许郑覃说他和宗闵同党，马上找理由反驳：“陛下惩恶扬善，进退之理在于一个‘均’字，非臣所能党护得了的。昨日殷侑与韩益二人奏事，臣因为韩益前年曾犯过贪赃之事，所以未允，他郑覃还对臣说什么‘过去之事何必再提’之类，如此看来，是谁在党庇？”

双方各执一辞，争得不可开交。但最终宗闵还是得到了量移，起为杭州刺史。这无疑是宦官的力量最后起了作用。过了一年，郑覃、陈夷行也被罢相，杨、李得以主持朝务，宗闵、僧孺遂一步步得到提升，大有东山再起的势头。可就在这时，杨嗣复、李珏却犯了错误。

他们站错了立场。文宗去世后，两人竟与枢密使一起要立太子陈王，而仇士良却要立武宗，最后是仇士良获得了胜利。武宗成为天子，怎么还有他们的好果子吃？

不用多说，这下子东山再起的一定是李德裕了。不过，他这一次命运的转机仍然不是他自己决定的。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会昌之政：李德裕一个人的时代

武宗会昌年间，是属于李德裕一个人的时代。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文宗驾崩，武宗即位。

五月，杨嗣复罢为吏部尚书，以刑部尚书崔珙同平章事兼盐铁转运使。

八月，葬故皇帝于章陵，庙号“文宗”，同时，宰相李珏罢为太常卿；京兆尹尹敬昕被贬为郴州司马。

杨嗣复、李珏相继罢去后，新帝征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朝。八月底，德裕就来到了京师，九月初一，正式入相。

德裕入谢之日，就向新帝呈上了清明政治的几点建议。这一进言代表了德裕深思熟虑的结果，也奠定了他今后的主政方略。

德裕在“甘露之变”后虽然身处朝廷中枢之外，但他与居于洛阳优游林下，“无复进取之志”的牛僧孺不同，在淮南的几年并没有白过。他在大行善政的同时，也不忘对文宗大和、开成以来的种种现实进行反思，就朝廷相延数十年的派系分歧、朋党猖獗以及“令不出中央”的弊端苦思根除的良法，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甫入宰辅，便能立即向皇帝进言。

在德裕看来，这“为政之要”有三端，首先是必须“辨群臣之邪正”，这显然是针对大和时期李宗闵之流结朋党纷争于朝而发的。德裕把自己独出于“朋党”之外，不论有无自我标榜的嫌疑，可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朝廷派系，固有正邪之分，也必有君子、小人之别，之所以纷争不歇，人主不能正确区分而摇摆不定是主要原因。故德裕坚持要辨明群臣之邪与正，并非完全是从洗刷自己的角度出发，而是充分考虑到使国家“治理”的需要而言的。德裕比裴度更进一步的是，他在这一点上还强调指出，正人君子如松柏“独立而无所倚靠”，而小人则如藤蔓“必附它木”，从而给出了区分的标准。

这一标尺颇耐人寻味。君子独立没有疑义，而所谓小人“必附它木”之“它木”指的是什么？明眼人是无庸解释的，只要想想李宗闵，特

别是李训、郑注之流缘何而进高位，就一目了然。德裕在此没有明指宦官，但含义却很清楚。

第二端是“朝政应归中书”，就是说政治权威应该重新回到朝廷行政部门，而不是“政出它门”。德裕于此同样没有把“南衙”、“北司”的现实状况点透，可这一点承上面而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帝国政治的要害，分量是够重的了。

德裕提出的第三端属于具体的运作范畴，他认为宰相在位时间绝不应过长，过长则必导致专权而生祸端。这一全无私利的政治方针，也是德裕纯从王政的考虑出发的真实写照。

新帝无不嘉纳。

从这时开始，德裕的政治生涯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

第二年，新帝改元“会昌”，是为会昌元年（公元841年）。

新年的局势却很不好。在边境方面，河、湟数州仍在吐蕃的控制下。而北面的回鹘，又出了变故。

原来，在回鹘的西北，有一个叫“黠戛斯”的部落，本朝初期为回鹘所败，此后与中国不通。后来该部落势力逐渐强大，与回鹘交兵近二十年，回鹘慢慢不支，到了本年，终于被黠戛斯击溃，各部纷纷逃散，一支往吐蕃，一支往西北的安西镇（这是本朝全盛时所设的边镇），还有一支由回鹘可汗之弟嗢没斯率领，径往天德军所在地天德城而来，请求“内附”。外敌衰弱，正给了边将邀功的机会，有消息说，天德军节度使田牟等有攻击回鹘散兵的意图，正在积极准备，不日奏报也肯定会到。这种情况之下能不能用兵，朝廷又面临着抉择。

在中央方面，情形也不太妙，问题出在天子。

新帝登基以来十分气愤朝野竟有不少人对他入继大统颇有微辞，即位的当天就把一位公开表示不满的朝官谏议大夫裴夷直贬出了朝廷。接着，又将不支持自己登位的两位宰相杨嗣复、李珏，两位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请出京城。在仇士良在鼓动下，三月十九日，出诏赐刘、薛二人死，并派中使立赴潭、桂两州，要诛杀分任湖南、桂管

观察使的杨嗣复和李珏。不管天子是否有理由这样做，杨、李二人毕竟做过宰相，事情弄到要杀他们的地步，这就过分了。

户部尚书杜悰听到消息非常着急。这位杜悰是当年杜佑的后代，也是宪宗的驸马，因为李珏的一力保荐做到现在的职位。此际，他没有忘记报答李珏的知遇之恩，立即快马去见德裕，请他出面劝说年少冲动的新帝。

德裕虽对杨、李二人不抱好感，但朝廷大臣不容轻杀，这是原则问题，与私人恩怨是牵不上的，德裕立即会同同相的陈夷行、崔珙以及崔郸上疏。陈夷行在这个问题上也和德裕一样，始终不以私嫌为意，一心一意地为援救杨、李出力，照理他与那二位的矛盾是最深的了。德裕诸人连上数章后，又怕耽误事情，于是把枢密使请到中书门下，请他向皇上美言，无论如何，至少也要让皇上在延英殿召见宰相。

到了傍晚，武宗终于同意召见宰相。德裕等人入内，涕泣而言：

“陛下宜慎重行事，勿致后悔！”

皇上道：“朕绝不后悔。”言罢，赐诸人坐。

德裕答：“臣等愿陛下免二人死，不奉圣旨，臣等不敢坐。”

皇上连命再三，叫他们坐下谈话，德裕等人就是不坐。如此良久，皇上见他们意思坚决，只得说道：“罢了，朕就看在诸卿的面上，免他二人死罪。”

德裕及陈夷行、二崔听得此话，连忙下阶拜伏谢恩。皇上道：“这下诸卿可以坐下了吧？”数人这才听命。武宗叹了口气：

“朕嗣位时，宰相何尝心服？李珏、薛季稜志在陈王，杨嗣复、刘弘逸志在安王。陈王尚是文宗遗意，安王则专附杨贤妃觊觎神器。且嗣复与杨妃同宗，还与杨妃云：‘姑何不效则天皇后临朝？’卿等想想，这是什么话？若是安王得志，朕哪有今日？”

天子这一番表白发自内心，诚恳率直，似乎显得有理。其实，皇上不意之间，泄露了天机。照他的话，陈王既是先帝遗志，如何你陛

下却取而代之？若是以陈王冲幼不克大任，安王与你皇太弟之间也并无必然的是与非。不过，数代天子嗣位的不正常情况已屡见不鲜，德裕等人身为人臣，既无法说清楚，也不敢说出来。在这种情形下，只能委婉规劝而已。还好，皇上改变了主意，只是再贬杨嗣复为潮州刺史，李珏为昭州刺史，裴夷直为州司户。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德裕与陈夷行、崔珙、崔郸不失君子风范，是值得大大称许的。

接下来，德裕又很好地处理了边境上的回鹘散兵内附问题。

在这个事情上，不仅天德军的田牟有出兵的意向，朝中也有不少人力主进攻，陈夷行甚至也是这个主意。德裕力排众议，坚请武宗不能轻动武力，对溃败的回鹘应以安抚为上，即使进攻，也应待部署安排妥当后再说；目前仍当以约束边将，严兵保境为佳，既不失道义，也不至于酿成祸患。

皇上问了德裕一句话很有意思："嗢没斯请降，卿敢担保他是诚心的吗？"

德裕道："朝中之人，臣尚且不敢保，何况千里之外夷狄之心！臣是具体分析眼下双方形势，才如此断定彼辈尚不至于为乱。"

这是政治家应有的风范，既不为怕担风险而一味讨巧，也不能不负责任地轻率行事，德裕在对这件事的态度上，第一次真正体现了他过人的战略眼光和政治策略，表明他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绝不亚于乃父。此后情形的发展证明他的策略完全正确：两年后，嗢没斯等人果真入朝，朝廷授任归义军军使；又一年后，回鹘乌介可汗倒是率军侵扰天德、振武两军，这一次我兵大破其部，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武宗的头一、二年里，德裕和整个朝廷的精力都放在了对外处理上，其中既包括回鹘的滋扰，也包括河北几个镇的一些不安分举动，德裕对这些事的处理都表现出了很强的能力，得到天子高度的信任。

已升为观军容使的仇士良有些不能忍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他找了个机会要给德裕难堪。

那是群臣要给天子上尊号的前夕，第二天，皇上就要在丹凤楼接

受尊号并大赦天下。这天，有人不怀好意地告诉士良，宰相和度支使正在草拟诏制，准备削减禁军的衣粮马草数量。士良一听，正中下怀，便当着不少朝臣的面扬言：“果真如此，明日禁军军士必会于楼前喧哗！”

德裕闻知，立即奏报皇上，请在延英召开宰相会议，当面澄清此事。皇上听德裕说知此事后大怒，马上派人到禁军宣示：“大赦令中本无此语。况诏书出自朕意，非由宰相，尔等安出此言！”这一棒打得士良措手不及，只得惶恐称罪。

这也是德裕反击得及时，使仇士良刀未出鞘就宣告失败。德裕的这次成功，也说明他对付宦官有一套办法，既让他们无懈可击，同时又严阵以待，不给他们有出击的机会。有了这种战略思想，德裕主政期间，宦官的势力大大削弱。

除了以上的因素外，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还有两个：

一是德裕与枢密使杨钦义有交情，观点也很接近，都主张抑制地方藩镇，强化中央集权。当然，以杨钦义为代表一部分宦官之所以如此，自有他们的考虑，因为中央强大，他们的地位自然随着天子威望上升而稳固，假如天子为方镇所胁，宦官就什么都不是了。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二是皇上信任李德裕，德裕的措施又富有成效，宦官的影响便随之降低。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武宗任命一位宰相时，竟然没有事先告知枢密使和宰相，而是自行决定后就直接颁布。这也就是说，皇上把枢密使参与政事决定的“老规矩”破除了，宫中的老人都骂杨钦义懦弱，不敢出面力争。其实，杨钦义在这种新形势之下，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拥戴武宗即位的仇士良在武宗与德裕两方面的压制下，最后在这一年也不得不请求退休，正式退出了政治舞台。在其党徒们送他时，仇士良对这些宦官们语重心长地说：

“不能让天子闲而无事，要常常引他纵情享乐。而且娱乐要日新月异，如此，天子自无暇顾及他事，吾辈才可以得志。”士良想起文

宗的事，又加重语气道：

“尤其要紧的是千万不能让天子读书，亲近儒生。他见到前代兴亡之事，心生忧惧，便会疏远吾辈。”

这是仇士良的肺腑之言，实际上也是几十年来宦官行事的原则。士良此时要给后来者谆谆传授这条秘诀，既出于临别伤感，也属于一种训诫，他是不希望眼下的这种情形长此以往的。

当然，仇士良是走了，不久也死在了家里，但宦官的根基却没有就此动摇，“北衙”与神策军也还牢牢地掌握在他们手中。不过，他们的势力毕竟还是削弱了，尽管程度很小，但也确实是了不得的事。

德裕在这以后使帝国取得了政治、军事上的一系列成功，关键原因就在这里。

会昌年间朝廷最大的收获是收复了昭义镇。

昭义镇在德宗时号昭义军，元和时在讨伐河北三镇的战事变得强大起来，辖泽、潞等数州，地处河中、河东和魏博、成德四镇之间，也是个有影响的大镇。“甘露之变”时，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是唯一上表斥责仇士良罪恶的藩镇首领，仇士良拥立武宗，刘从谏更为恼怒，反意遂生。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刘从谏病危，遗命其侄刘稹自为留后。从谏死后，刘稹果然不听朝廷号令，欲图继位。在德裕的强烈坚持下，武宗决意讨伐。

德裕对这场战事的基本方针是稳住刘稹的后方，依托成德、魏博两镇，并晓谕利害，使之夹攻昭义。为此，他亲自草拟了给二镇的诏书，明确表示朝廷对河北政策不变，允许它们子孙世袭，并重赏有功将士。

结果，战事完全按照德裕的筹划进行，成德、魏博奉命出兵，从刘稹的后方助攻邢、洺、磁三州，而朝廷组织各镇兵力从正面压迫泽、潞两州。昭义一镇哪里顶得住如此强大的压力，只坚持了一年，便告失败，昭义镇从此回到了朝廷的手中。

这是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八月的事，第二年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七月，德裕又干了一件大事，他在热衷于道教的武宗的支持下，对长期盛行而严重影响国家经济的佛教发动了一场革命。此事后来被恨恨不平的佛教徒们称之为“会昌法难”。这次“废佛”共毁佛寺四千六百多所，僧尼还俗者二十六万多人，收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规模可谓是空前绝后。

到了这个时候，德裕进官衔“太尉”，封“卫国公”，威望达到了顶峰。

恩怨两泯：谁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

数十年的争斗暂告终结，双方谁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

在会昌时期执政的五年中，德裕没有让宗闵、僧孺等人得到一点机会。

杨嗣复、李珏当政后，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李宗闵已升迁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在洛阳担任了一种闲职；而牛僧孺先是被召入朝中拜为左仆射，因为仇士良等宦官的关系，他内心仍不情愿卷入是非之中，于是托疾不出，到了这一年以“兼平章事”的身份出为襄州刺史并兼山南东道节度使。就在此后不久文宗死，武宗即位，李德裕第二次入相，获得执政的地位。

德裕无法和他们言归于好。到了这个时候，他心里十分清楚：李宗闵与牛僧孺形成顽固的朋党派系已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一切都是针对自己而来的，如果允许他们回到朝廷中枢，就等于放弃自己的政治方略。德裕当然不想这样做。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二月，德裕的亲密好友李绅回到了长安，出任宰相。

李绅是当年因强烈反对李逢吉与王守澄而被贬斥的，由于韦处

厚、李德裕的先后援救，慢慢得到量移，武宗即位后代替德裕出镇淮南。

李绅与德裕已有近二十年的交情。早在穆宗时期，他与德裕、元稹同在翰林，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绅这个人刚直不阿是有名的，李逢吉当初要用僧孺入相来排挤德裕，自然为李绅所反对，所以逢吉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心要把他打倒。屡经谋划后，终于在敬宗初年抓住了一个机会，把他贬出了京外。此次李绅被征召入朝表明了德裕毫不退让的立场。

合理的人事安排是保障政策能够顺利贯彻的基本前提，德裕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是不可能做好好先生而让宗闵、僧孺有隙可钻的，否则一切努力都将在瞬间化为乌有。两派相争到了这种程度，确实是哪一方都不能心慈手软。

国事方殷。回鹘、黠戛斯、吐蕃的边患，方镇的蠢蠢欲动，无不预示着帝国需要强有力的措施来加强治理，德裕有信心做到这一点，同样也就有决心把“朋党”问题彻底扫除，尽管他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如何的艰难复杂。

这年的七月，陈夷行罢为左仆射。为郑覃所知重，而为李珏、杨嗣复所恶的谏议大夫李让夷拜相，这同样也是德裕经过审慎选择后的结果。到目前为止，德裕都是选用自己信得过的人出任要职，这为他在会昌后期取得的重大成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这方面，德裕并没有顾忌别人的议论，行事也很谨慎，但就是这样，他还是犯了一个错误。这起因于本年九月份的一件事。

武宗忽然想启用时任太子少傅的白居易为相，但德裕却不赞成。

白居易这人的道德文章无懈可击，元和时在帝国诗坛上与元稹齐名，时人称为“元白”，又和刘禹锡相伯仲，称“刘白”，是其时文坛上执牛耳的人物。他少年家贫多故，漂泊各地，二十七岁始中进士，又登制举中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开始迈入仕途：元和初期先后任翰林学士、左拾遗，以敢于直谏而闻名朝野。在武元衡被刺案中因得罪权贵被贬，直到穆宗即位，才渐得起复。

白居易是李宗闵的亲戚，与牛僧孺的关系也很好，但他与另外一个圈子中的不少人也有交往，特别是和元稹的友谊极深，同时，在政治见解上，他也有着自己一贯的主张。因此，在穆、敬、文三朝两种派系斗争日趋明显的情况下，居易便十分为难。

平生抱负既不能伸，居易便想到独善其身。于是他不愿继续留在京城，上表乞病，还居东都洛阳，于香山之麓疏沼凿滩，构楼种树，自号“醉吟先生”，又号“香山居士”，与弟行简、祖弟敏中游览登胜，流连诗酒，和牛僧孺亦时相唱和，倒也颇为自得。在这一年，居易已年臻七十。

不过，德裕和他却几乎没有来往，对其才名似乎也有点不以为然。德裕反对武宗起用居易为相，是否考虑了他与宗闵、僧孺有的这层关系，一时也难以断定。但德裕提出的“居易衰病，不任朝谒”理由是很充分的，因为其时居易不仅得了风疾一直未愈，而且年纪也实在太大了。

德裕为了妥善起见，郑重建议皇上启用居易的祖弟白敏中，为此还对敏中作了一番很高的评价，说他“辞学不让居易”，可以胜任要职。不久，敏中便被授予翰林学士，进入帝国的高层。

德裕内心对这一切似乎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他认为自己并没有丧失公正的立场。但是，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政治斗争不仅严酷，同时也非常微妙，有时，哪怕是毫不相干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反对派强烈的敌意。比如这次，德裕认为白居易年老，说不定居易自己也这样认为，但德裕的反对者却断不会抱同样的想法。白敏中不仅没有对德裕的推荐心生感激，反而把德裕的“恃权忌才”牢牢地恨在了心里，在他看来，德裕启用自己，完全是出于不让白居易担当大任的考虑。

任用非人，是政治家之大忌，德裕的这个失误给自己后来的彻底失败埋下了伏笔。

但是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不犯错误。德裕在对李宗闵、牛僧孺的态度上更是如此，他既然不能允许他们有机会回到朝廷中枢来干扰既定方针，那么无论怎么处置得当，都必然会像白居易事件一样引起争

端。时势使然，德裕既不能退让，便注定无法取得预料的效果。对宗闵、僧孺来说，无论你李德裕如何想，都不能消弥彼此之间的过节和积怨。看来，事情到了这一步，也无所谓什么错误不错误了。

昭义战事之起，既是德裕取得重大成就的外在因素，也是德裕执政期间影响两派斗争的最大事件。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的五月，刘从谏于上月初七死后，其侄刘稹自称留后，秘不发丧。四月二十三日，朝廷诏刘稹护从谏灵柩归东都，刘稹不从，五月初二，德裕在朝会上坚持讨伐刘稹，为天子首肯，战事已一触即发。

昭义一镇的核心是泽、潞二州，也是中央部队的主要攻击目标。东都洛阳处于敌阵的正面，是朝廷各军的攻守堡垒，在这场战事中的战略地位显然十分重要。在如此情形下，以前与昭义刘从谏关系不错的东都留守李宗闵，便似乎有点让人不放心了。是皇上首先想到，不能把他放在东都洛阳。武宗对宗闵在文宗时期的所作所为一向抱有成见，他有这个想法不足为怪。

德裕想了一想表示，此事可进一步商议。

皇上以为宰相考虑的是具体安排，忙补充道：“方镇不行。调他到远一点的州去！”

德裕倒有点难办了，宗闵与刘从谏的交往毕竟是十年前的旧事，单凭这点理由就贬斥他，确实说不过去。就是调他走，起码也要给个州刺史的职位，德裕不愿在这上面再授人以柄。

最后，宗闵被调到了江南的湖州，这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也算得上是个美缺。不过，宗闵当然还是不可能领德裕的情，满心委屈地离开了洛阳。

在这几年中的其他人事安排，与前面两事相同，在反对派来看，似乎处处都体现了德裕“以憎恶用人”的党派习性。但实际上的情况是否如此，却很难用简单的标准去判断。德裕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证明他的政策是相对正确的，如果为了保证正确的政治方针能够得到贯彻，采取一些强硬手段并不能算错。

但对于有所牺牲的人来说，德裕的成功并不能证明他做的一切就有道理。不管怎么说，任人唯亲、排斥异己都是不符合传统伦理的。有意思的是，李宗闵等人先前当政时绝对不会有这种想法，当德裕主掌大权后，他们才感到这一点是多么重要。

这一年崔珙罢相，李让夷荐崔铉入相，这也就是武宗不通过宰相和枢密使自行任命的那个人。崔铉与崔珙在许多事上不协，结果崔珙遭到贬斥。会昌四年（公元844年），户部尚书杜悰入相，他与李珏关系非浅，自算不上是德裕的同志。就在同时，李绅出任朝外，代替杜悰镇守淮南。

当昭义平定，德裕的权力达到顶峰后，更大的事情来了。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七八月间，李德裕一手提拔的猛将、泽潞西南面招讨使石雄率先击破昭义军，又在泽潞初平后受旨领七千人进入昭义镇治所潞州受降，尽擒刘稹党羽。九月，朝廷任命的新节度使卢钧进驻潞州，昭义正式收复。十月，石雄向朝廷奏报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

石雄奏称：攻占潞州后，手下兵士在贼处搜获了一批档案，检点时发现其中竟有李宗闵、牛僧孺给刘从谏的亲笔信件。

在接到石雄奏报的同时，河南府尹吕述也给德裕写来了一封私人信函。吕述在信中说，平定泽潞的捷报传到洛阳时，正在东都述职的太子太保牛僧孺竟“出声叹恨”。

德裕接到这些报告后非常生气，早先毫无证据的“交通敌贼”、“同情叛党”嫌疑，原来竟是事实！德裕带着一些隐约的快意立即把这两件事呈报给了皇上，根本没有仔细考虑考虑：此事由石雄、吕述两人报来，其中有无虚拟的成分。

天子勃然大怒，立即诏贬僧孺为太子少保，宗闵为漳州刺史；几天后，又贬牛僧孺为汀州刺史，宗闵为漳州长史。一个月后，天子似还不解气，再贬僧孺为循州长史，宗闵长流封州。“长史”与司马一样，都是州刺史的佐官；所谓“长流”封州，也就是流放到封州。这是牛李二人有生以来遭受到的最严重的处分了。制命一下，不要说他们

本人，整个朝野也大为震动。

本来德裕就在执政期间继续实行抑退浅薄浮华之士的策略，而大力奖拔孤寒，打击朋党，早就引起为数不少人的不满。此次唯一能与德裕相抗衡的宗闵、僧孺又遭毁灭性重创，使得这些人的怒气和怨愤达到了高潮。这时，在淮南任节度使的李绅又做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

他到任不久，发现手下的江都县令吴湘盗用公粮钱，并且还强娶民女。李绅最容不得这种事，怒火万丈，给这个人定了个死罪。这件事情本来不大，李绅的处理也在地方官的权限之内，但其中却有个复杂的情况存在。

原来这位吴湘的哥哥叫吴武陵，与李德裕有点过节，德裕对这个人也公开表示过不满，已是人所共知的事。这一下，李绅的处理便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判吴湘死罪，显然是禀承德裕之旨而与吴武陵过不去，这不是挟怨报复又是什么？他们不敢把矛头直接指向德裕，便纷纷指责李绅处理不公。德裕在此坚决维持老友的原判，并把持不同意见的两位监察御史崔元藻、李稠公贬了职，压住了波澜。如此，德裕树立的对立面便越来越多，对立的程度也越发尖锐，只是没有最终激化，因为德裕的声威正如日中天，在他的身后还有天子，宦官势力又采取默认的态度，这些人再有怨气，在眼下却无可奈何，只能把仇恨深深地埋藏在心里而已。

此后，无所建树的杜悰、崔铉先后去职，李回入相。李回是德裕用兵昭义时，起用他奉使前往河北三镇执行说服工作的人，无疑是一位有功之臣。德裕用他为相，也不能算是囿于派性。在德裕主政期间，最后同相的是崔元式，他与德裕在很多方面有分歧，未多久便也去任。

德裕在相已经五年了。尽管他曾经在几年前数度上表辞职，但都未被武宗接受。眼下的情形正应了他刚刚回朝时的话：宰相在位不可过长，过长则必导致专权。德裕主观上有无这个问题姑且不论，但客观上这种事实的存在确实也是不可否认的。

到此，以李宗闵、牛僧孺为代表的一派与德裕为代表的一批人的种种过节，似乎以德裕的胜利而烟消云散了，确实，照这种情形发展下去，德裕笑到最后是完全可能的。然而，世事实在是太难预料了，德裕最终也未能善始善终。决定性的原因只有一个：德裕强有力的支持者武宗皇帝，居然也英年早逝。

坏就坏在皇上同前几代天子一样贪恋长生之术，迷食丹药，弄得不可收拾。

武宗即位之初，就十分赏识一位名叫赵归真的道士，命他于三殿建“九天道场”，自己亲受法箓。一名谏官上疏切谏，还被贬为河南府士曹。几年过去后，皇上对赵归真的宠幸有增无减，连德裕的劝谏也不以为意。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十月，皇上因服用了赵归真等人炼制的金丹，性情开始变得暴躁焦急，喜怒无常，这个症状与当年的宪宗一模一样，已经不是个好兆头。

入冬以后，皇上自己也觉得身体不适，像是患了大病。赵归真上言：“这就是在换骨了，请陛下坚持。”皇上仍不以为非，嘱咐左右：“不可让外间知道！”于是宫外莫知详情，德裕也被蒙在了鼓里。

如此一来，一场悲剧又不可避免：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二十三日，武宗在坚持了近四个月后终告不测，年仅三十三岁。天子弥留之际，因皇子冲幼，宫中宦官决定：以皇太叔光王“权勾当军国事”。二十六日，光王即位，史称“宣宗”。

德裕固然没能想到武宗竟这样地撒手而去，但更没想到即位的新帝将是一位置他于死地的天子。他简直无法相信的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古训，竟会在他的身上变成一个最好的范例。

新帝即位的当日，德裕正奉册在侧。典礼结束后，新帝带着一副无法猜测的表情，含义无穷地对左右道：

“刚才在朕身边的是不是李太尉？他每看朕一眼，便使朕毛发俱竖！”

四月初三，德裕被命为荆南节度使出朝。

初四，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被贬为忠州刺史，其弟元龟贬为崖州司户。

五月初五，白敏中入相。

八月，牛僧孺、李宗闵、崔珙、杨嗣复、李珏这五位前宰相各得量移不等。

第二年，新帝改元“大中”，是为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新年中，事犹未已。

正月，恢复进士及第者“曲江游宴”。

二月，德裕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

闰三月，诏命凡会昌五年所废佛寺，听其修复，地方不得禁止：增复会昌时所减州县官。

六月，牛僧孺进位太子少师；令狐楚之子令狐绹被擢为考功郎中兼知制诰。

八月，德裕同僚李回罢相，出朝任西川节度使。

九月，御史台发李绅任淮南时的“吴湘旧案”，再贬德裕潮州司马。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九月，德裕三贬为崖州司户，李回再贬为贺州刺史。

……到此可以暂时打住了。事情一目了然，凡是旧帝所支持的，全为新帝所否定。这一次首当其冲的是德裕与他的同志们，被彻底地清除出朝外，并且一贬再贬，直到永远消失。

大中三年（公元849年）正月，德裕抵达贬所崖州，这时他已经六十三岁了。李宗闵最早去世，死在受量移后不久，牛僧孺也于去年十月病死在洛阳。德裕虽然活到了最后，但他心里清楚：最终失败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因为一切光辉灿烂的功绩都已在新帝的手中被彻底摧毁。

十二月十日，李德裕在郁郁中去世。消息传到长安，有人写诗

道：“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看望崖州！”

这一场延续了几十年的故事就这样以三位主角的去世而渐渐开始消歇了。是非自有公论，但无论是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还是各自的派系，他们都不是胜利者，真正的胜利者说到底也许只有一个，这就是我们的新一代天子，帝国第十九位统治者：宣宗皇帝。

第六章
宣宗皇帝：最后的辉煌

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天恨不胜。
欲就麻姑买沧海，一杯春露冷如冰。

——李商隐

十六宅中的三朝皇叔笑到了最后

十六宅中的三朝皇叔，凭借着坚毅和忍耐，笑到了最后。

在帝京长安的最西北角，南临兴宁坊，西靠长乐坊，东北两面紧毗外城城墙的地方，有一大片华丽的宅宇，殿楼逶迤，飞檐相接，独自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坊区。这就是本朝诸亲王居住的地方——十六宅。

除了册为太子的皇子入居东宫，其他的皇子几乎都住在这里，若非危难时期受命出镇或领衔外任，自本朝玄宗皇帝先天年间起，皇子例不出阁。他们的屋第虽不在一处，但却十分集中，大家可以不出坊里就相互往来。久而久之，“十六宅”便成为本朝诸王的代名词。

“十六宅”起于何时，倒也很难详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不是一天建成的，而且一年年也有所变化，最终成为长安城中一块极有分量的地方。其原因也是一目了然：近几十年来，“十六宅”出了好几位天子。

照理，东宫的太子是合法的继承人，原本是轮不到十六宅里的诸王的。可是本朝的储位问题在最近一个时期里变得越发严重，几代天子竟都不享天年，不是没留下嫡脉，便是皇子冲幼。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国家社稷的考虑，由宫闱做主，皇位便常常改由天子的兄弟继承。所以，“十六宅”便有戏了！

第一个是文宗皇帝，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被神策军从十六宅中迎到了大明宫，首开“十六宅”诸王入居大宝的先例。接下来是他的弟弟武宗皇帝，在太子已立的情形下，犹被仇士良率数千禁军迎为天子。武宗同样也是英年早逝，去世之时，长子杞王只不过几岁，于是，“十六宅”再出一位皇帝又将是不可避免。

近三朝以来，十六宅中有一位光王李怡，和别的亲王大不一样。

德宗以后，顺、宪、穆、敬、文、武六帝先后御极，其中敬、文、武三帝是兄弟，分别是穆宗皇帝的长子、次子、第五子；宪宗子息颇多，共有二十子，长子穆宗，第十三子就是李怡。不过，这第十三子李怡却不是嫡出。

其母郑氏原是宫女，据传还是当年宪宗平定李锜时的战利品。因为生有美色，遂获宪宗爱幸纳入后宫，生下李怡。李怡长庆三年（公元823年）时被其兄穆宗封为光王，所以按辈份算起来，应是敬、文、武三帝的叔叔。这位三朝皇叔在十六宅中，是个很受人注意的角色。

说起来有点让人吃惊，光王有些名气既不是因为他是三朝天子的叔叔，也不是因为他有怎么样的功绩，更不是因为他有如何的德声——说得难听一点——而让人感到他有觊觎大宝之心。光王之所以让大家记得他，却是因为他似乎是个痴呆，至少是个智力不健全者。

宫中都这么说。这位光王生于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六月二十三日，小的时候尚不觉得，长到几岁后就发现，他的心智有严重缺陷，与同龄的幼儿简直不能相比。随着年岁增长，也没有多大的改观，无论哪一方面，都较常人逊色。这已经渐成大家的共识。

文宗大和时期，光王已经成年，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加了一条：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起来。任你天大的事，他也是不发一言。平时游畋宴集，总是一副毫无表情的模样，让人无法捉摸。

有些人猜测，也许是光王有一次到掖庭宫谒见当朝国母——也就是其兄穆宗的生母、文宗的祖母——宪宗懿安太后的时候，竟然遇到宫人行刺，受了严重惊吓的缘故才如此雪上加霜。可是，那次事件不过是有惊无险，按理也不至于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的。

不管怎么说，光王已成为十六宅中唯一让大家感到放心的人，诸王们有时虽也拿他开开玩笑，但与他相处得却还不错。确实，一个人只要让人觉得毫无威胁，与自己没有利害冲突，他就能博得信任、同情，甚至是诚心诚意的帮助。

文宗是由十六宅出去的，即位后，便经常来到诸王居处，与大家

叙旧。但他对光王的态度却不怎么样，有时故意作弄他，近乎于恶作剧。

一日，天子在十六宅大摆宴席，款待诸王。席间大家欢笑戏谑，无复君臣之别，可光王却依旧是不说一句话。文宗笑道："谁能让光叔开口，朕有大赏赐！"

众王哄然叫好，立即就有几个年轻的亲王上去逗他。结果当然是徒劳，任你百般捉弄，光王始终是不露声色，缄默其口。文宗看着皇弟们无可奈何的样子，大笑不已。

时光如梭，一天天，一年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外间的风起云涌，照例不能影响到十六宅的平静，诸王们在流连诗酒、游畋宴集中打发着声色犬马的日子。只有这位"光叔"似乎稍有不同，他照样也参加各种聚会，但曲终人散之后，他又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宅第，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但是，一个人如此韬晦，总会引起一些多心人的猜疑，武宗就是一个。

这里面有件事情说不出口。当初敬宗皇帝晏驾后，文宗以皇太弟的身份即位本就有点名不正言不顺，而文宗之后，皇弟武宗踵继大宝，也是出于一种极不正常的程序。宫内外有人看不惯，因此十六宅里的光王，便自然为人所瞩目。只是人们都知道他有很多毛病，除了为他可惜之外，也想不起其它什么。

可武宗不这样看。即位之前，他在十六宅的日子也比较长，由于自己性情豪爽任气，经常拿光王开心，因此比其他人要多了解这位"光叔"的情况，同时也就比他人更加疑惑，更加莫名所以。

武宗虽然粗率而不拘小节，但他有一种预感：光王的沉默不言、与世无争是装出来的。尽管找不到充分的证据，但他觉得这种感觉绝对不会错。这种第六感一样的东西时时会涌现在他的心头，特别是当他与光王同行同处的时候，望着光王无动于衷的表情，总觉得在那张脸背后其实深不可测。武宗所不明白而感到大惑不解的是：他为什么要这样？

武宗即位以后，这种感觉越发强烈。

同其兄文宗一样，武宗也经常到十六宅与皇叔弟们欢笑戏谑，不过，他很讨厌光王，时常给他难堪，光王越是不经意，武宗就越是无礼。

于是，武宗在位期间，光王李怡便时常出现一些意外。不是与皇上击毬时偶然落马，便就是在入宫时莫名其妙地失足，凡此种种，都在不经意之间突然降临，让人猝不及防。但是，光王仍顽强地活着，并且永远不出一句怨言。有时甚至弄到疮痍遍体、满身腥秽，连前来侦视的宦官也为之惊讶的程度，他却还是那样地不以为意，就仿佛是一位不知世事的顽童，只要没有受到斥责，就已经感到无比幸福了。

然而更大的危险还是一天天临近。

那是有一年的冬天，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长安的大道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时间早已到了宵禁时候，坊门四闭，积雪盈道，四周阒无人迹，只有一大队车驾的辙印依稀尚在。一名金吾卫的巡警正缓缓地挪着脚步，忽然，他发现雪地里似乎有个人影。

巡警大惊，急步走上去，只见一位华服微髯之人，正在雪地里呻吟，挣扎着要爬起来。巡警问道：“你是何人？”

“我光王也。不意至此，……我又困又渴，你能不能找些水来？”

巡警半信半疑，但看此人，尽管泥浆满身，却也不掩英武之相。不敢怠慢，便到近处有水的地方给他装了一罐，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光王李怡坐起身来，将手中的水一饮而尽。他抬起头，望着黝黑苍茫的天空，像是在思考他为什么会倒卧在雪地上。他想起来，晚上是同诸王兄侄随驾出游的，酒后策马而回，突然一个闪失，后面的事情就不知道了。但是，此刻他却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马失前蹄，而差点就冻死在这无人的街道上。也许真是苍天有眼，保佑自己命不该绝，这才能从昏迷中及时苏醒过来，不至于横尸雪地。想到此，光王只觉得那一罐冰冷的水在腹中翻滚升腾，如同一团烈火在熊熊燃烧，

直使他周身滚烫，散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像是要把他托上九天云霄。他在心里道：这样的“失足”一定是最后一次了！

光王李怡慢慢地站起来，略略辨了辨方向，便毫不犹豫地踏雪而进，向十六宅的府第走去。黑暗中，朦胧的雪光映照着他的一身紫服，发出一片黯淡的光芒，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幽灵在徘徊。

武宗还没来得及得出他的答案，或者说他甚至还没有完全决定他是不是还需要这个答案时，就突然撒手而去了。皇上走得如此匆忙，是着实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可万幸的是，危急存亡时刻，总是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站出来扶持大局的。宫中的宦官们又一次挺身而出，从文宗开始，他们就有了这个资格，也有了这个能力。

宦官比朝士们更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所谓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有所耕耘，才有所收获。如果天子是在我手上产生的，而这位天子又是平庸懦弱之辈，这份好处还用说吗？当然天子必须由太子继承，这是百代不易的制度，不过，太子如果年幼无知，那就可以另当别论了。

早在武宗皇帝病重之际，曾有两个多月不视朝政，宰相请见，亦被枢密驳下，朝野内外忧惧万分。

拖下去于事无补！内侍仇公武首先提出：皇叔光王可当大任。

左军中尉马元贽一听，肚子里转了几转，立即就随声附和。他知道这里面的奥妙。

枢密使和右军中尉没有他们两人反应得快，可一会儿也恍然大悟。这个主意真是精妙！文、武两帝的干练冲动，他们虽无切身体会，却也深知一二，前辈仇士良的谆谆告诫言犹在耳，所以在这件事上不得不小心谨慎，斟酌再三。可在此刻，他们的意见却一下子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统一：以后的日子有了这位憨痴而无所决断的光王，至少是不用担惊受怕了。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二十日，遗诏发布：“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应军国政事令权勾当。”二十一日，皇太叔在宫中少阳院接见朝廷百官。

当文武百官步入宫殿时，谁也没有对这位即将入替大宝的新帝抱有任何幻想，因为谁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国运就将要系在这么一位天子身上，大家无可奈何之余，仍还有些微微的不甘心。可是，太子确实年幼，宫中遗诏已出，又有什么办法？首席大臣李德裕在这期间也不是没做过努力，可在这种建置天子之事上，他也无能为力，更何况他人！

百官班定，内侍齐集，枢密中尉们也已就列。皇太叔出现了。

他的脚步沉稳有力，他的目光炯炯有神，他的面容满含着一种真切的悲哀，一切都如常人——不，从他那坚毅同时又蕴含深邃的表情看，他的聪明睿智绝对要超过常人！

所有的人都被皇太叔的不凡气象笼慑住了，他们惊在当场，仿佛梦中。

皇太叔开始处理积留数月的政务，一件件一条条地剖决裁断，无不明白合理。他对国家政务和制度礼仪的熟悉就好像是一位垂拱已久的天子，他的敏锐果断和不凡见识又像是一位英明的长君。在这短短一个上午的时间，皇太叔举手投足、言谈话语之间，就让所有的人明白了这样的事实：他们以往的认识是大错特错了！

在场的每一个人先是惊诧，继是欣慰，最后，他们突然觉得一阵寒意袭上心头，丝丝入怀，无法自已。当一阵料峭的春风吹过时，他们才发现，自己背后的衣衫已被淋淋的汗水湿透。

但没人能想到的是，这样的冷汗，竟要流上十几年！

二十三日，武宗驾崩，皇太叔光王即皇帝位。这就是“宣宗”，时年三十六岁。

这是忍耐的胜利，这是毅力的胜利，更是处心积虑、坚韧不拔的最好报偿。一个人只有保存好自己，才有可能战胜强敌，实现自我的辉煌。先知先圣老子有云“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宣宗皇帝以他的超凡精神验证了这一箴言。相比起来，无论是李德裕如何的建功立业，李宗闵如何的快意恩仇，牛僧孺如何的自保其身，白敏中如何的最终得计，在宣宗皇帝的胜利面前，统统都不值

一提。

政治就是不断地否定与再否定

政治就是不断的否定与再否定。

备受艰难的人，是无法忘却自己那种疾痛惨怛的经历的。爱恨情仇的熊熊之火，足以倒置乾坤。

宣宗首先要做的便是彻底推翻武宗所有的一切。他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他再也无法使自己像过去那样咬牙忍住了，即位的第一天，新一代天子就开始了行动，他的一腔怒火，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

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他对李德裕的处理。

德裕是会昌时代的首席宰相，也是武宗最信赖的辅弼大臣，递代之际，禁中颁布的遗诏，都无可置疑地将他列为冢宰。但对新帝来说，他既代表着先帝，便就是清除的对象。

新帝刚刚即位八天，秉政近六年的李德裕就被罢相。功高位重的德裕就这么一下子从执政的地位被拉下来，连他的政敌都没有想到。两天后，德裕最有力的帮手和同志、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也被贬职出京，其弟薛元龟也被牵连罢官。

宣宗深明此际需要何种必须的手段，一开始就显得胸有成竹。从薛元赏之贬中可略见一斑。

薛元赏是什么人？此人于甘露之变后曾出任京兆尹，在李石、郑覃等人的直接领导下，为平靖巨变，恢复京城秩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立有汗马功劳。甘露事变后，长安陷入极度的混乱，政府部门整体瘫痪，城中恶少纵横剽掠，盗贼侵夺坊闾，寻隙报仇，草菅人命之事，不一而足。加之神策军士横行暴虐，公行不法，尤使情形雪上加霜。仇士良虽稍事收敛，但仍无济于事。当时任京兆尹的是张仲方，

面对这个局面，束手无策。

郑覃入相后，立即起用了薛元赏替代张仲方主掌京兆府。元赏精明吏事，尤能行非常之举，任职后果然不负众望，不仅以强有力的手段遏制了京城的无政府状态，甚至还狠狠地教训了一下神策军。他的铁腕手法，连其时的主宰者仇士良都无可奈何。以至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里，京中恶人包括禁军兵士一提到元赏，无不心有余悸。

元赏入朝之前在地方任职，“维州事件”时曾上疏赞同德裕的处理。政见与德裕很合拍，会昌中遂被德裕重用。元赏的精明果断和不畏强暴成为德裕的重要依靠。宣宗知道，这种实干家才是德裕周围最有威胁的人，这种人必然忠于旧主，忠于同志，而且拥有强大的力量，无论如何都必须清除。

这一切都来得迅雷不及掩耳。

五月初五，白敏中入相更是个关键。

白敏中的成名其实全赖于白居易的影响。他自小便父母双亡，由诸兄抚养训厉成人，长庆初年登进士第后，先在藩镇幕府任职，此后升为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与其堂兄白居易在洛阳相处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若不是武宗想启用白居易的话，以敏中的资历声望，断不会这么早就能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是李德裕不合擢用了敏中，从而给了他机会，使他才有可能在新帝即位后脱颖而出。

此际，敏中的入相说起来也是大势所趋。别看他资望不怎么样，可才名却不小，另外在当时的朝中大员中，也只有他是独立于德裕一派之外的人。再加上他与白居易、牛僧孺不同寻常的关系，由他来填补德裕出朝后留下的执政之位，完全符合新帝的既定策略。

新帝恨的是武宗，由此而及的是会昌时期的一切，李德裕之罢相其实是个表面契机而已，皇上其实倒并没有把德裕彻底消灭的意思。而敏中恨的是德裕，连带而及的是德裕的同志，他要的是将李德裕及其势力一举翦灭。妙的是，敏中不仅对新帝的用意心领神会，而且把天子的心意与自己的打算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条对双方都有利的路子。

于是，李德裕带着无限悲戚离开了京城，三年三贬，直至在崖州——这个帝国疆域的尽头——郁郁而终。同相的李让夷、李回也被清除出朝。相反，李宗闵、牛僧孺、崔珙、杨嗣复、李珏等一再北迁，直到最后平反。只可惜宗闵、僧孺都先后谢世，没有看到这一场是非恩怨的最终胜利，否则他们一定会对新帝和敏中的“公正”感激涕零的。

做这一切当然需要充足的理由，因为德裕毕竟是一代名臣，功高位重，若无大过，是不可轻作处分的。当初宣宗遽罢德裕，也还只是采取一种明调暗降的手法，让他带衔出为荆南节度使。尽管这是天子罢免宰相的惯用做法，但德裕至少还是一位“使相”，亦即所谓领“平章事”出镇，名义上的规格尚不能算低。可敏中当然不愿意就此罢休，他的策略是穷寇务追，一鼓作气灭此朝食。

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先是找人进言皇上，暴露德裕当政时的种种不是。德裕既从高位一旦落下，以往的各种积怨便纷纷泛起，要找出这么些举报之人还不算太困难。于是德裕先被解除了“同平章事”之衔，改任东都留守，这已是一种地道的闲职。接下来，敏中仍是不改初衷，终于在一件旧案子（即“吴湘案”）上找到了突破口，将德裕彻底摧毁。

敏中的聪明处在于他善于利用上下两方面对李德裕的不满，因而他的计划一直进行得很顺利。不过，他虽然是获得了成功，可他忘记了政治斗争的一条基本原则：过于强硬而不作调和者，最终是没有好下场的。

宣宗全力支持敏中的做法，但他的着眼点尚不仅限于此。在他即位的初年及第二年即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连续颁行了一系列有倾向性的措施。

首先是恢复佛教。一是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五月，命长安左右两街各增置八座佛寺，祠部继续度牒僧尼；二是大中元年闰三月，诏复会昌所毁天下佛寺。

宣宗对佛教的态度与武宗大相径庭，这也许与他悲苦的遭遇有

关。十几年前，京中的佛寺中常可看到一位素服的儒士，在殿前厅后徘徊踟蹰，有时亦向佛师们讨教些禅理。只是北地的僧人都不大通晓这种新起的玄义，无法与他交流。此时，这位儒雅洒脱之士便常常会笑笑走开，转去与那些借寓佛寺的举子叙叙各地的见闻，听着他们对朝政的放肆评论。

这当然就是十六宅时的宣宗。他对由西方世界传来的佛理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不过也只是兴趣而已，并未深入地涉猎过。可尽管如此，佛还是给予了他其他教门所未能赋予他的东西，他在此中知道了生之苦难、死之艰辛，也感受到了忍受尘世、忍受现实的终极意义。这对年轻而思深的宣宗来说，是有极大启发作用的。

于是武宗与德裕废佛，他便要反其道而行之，这既代表着他的政治方针，也显示出他对佛教的基本态度。他对翰林学士说：

“佛者虽异方之教，然可深助国家治理。可存而不论，不必过毁而伤令德。”

道理是不错的，但皇上如此迫不及待恢复佛教的行为，却明显还是一种情绪在作怪，这一点大家肚子里都很清楚。

本朝佛教的一大特点，就是佛寺发达，僧尼众多，武宗时一炬毁废这一基础，遂使佛教元气大伤而不得不转寻轻便易行之道。此际再行恢复，光是重建寺院一端，财力上就不胜负担。宣宗诏命之初，就有一位进士孙樵上疏反对，中书门下也委婉地表示了不同意见。到了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十二月，宰相们又再次奏言度僧不精之弊，终于使皇上开始修正这一策略。

其他举措，也无不带有这种情绪化的特点。

另外一项是恢复进士及第者的曲江宴集。宣宗特别重视进士及第之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皇上有其个人好恶也自有道理，但一定要恢复这种以浮华为事的“曲江大会”，就绝非俭德之君应有的态度。再比如刚即位的当年，宣布增复会昌时所减省的州县官员数目一事，更能显出宣宗的“不甘”心理。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汰斥冗员总是一项善举，不能因为其出发点不正或效果不佳就遽为否定。宣宗的这

项诏令虽然只增加了三百八十人，但其实质却仍不是基于改善吏治的一种修定，而完全属于鲜明的个人爱憎。

做完了这些，皇上到太庙祭奠列祖列宗。过穆、敬、文、武四宗牌位而无动于衷，唯独在其父宪宗的灵室里突然放声大哭，泪飞如雨，哀颤而不自胜，左右观者莫能仰视。

他的感恸是发自内心的。

皇上对武宗是仇恨，对文宗是厌恶，对敬、穆二帝也没有好感。唯一能让他怀念的就是他的父亲宪宗皇帝。自从他诞生到这个世界以后，也许只有元和时期的七八年是他最无忧无虑的日子，此后随着年岁的增加，生存的环境却越来越险恶，甚至生命也遭受到了威胁，若非自己明白果断、毅力顽强，哪里会有今天？如果父皇宪宗不被贼子弑杀，就不会那么早离他而去，自己也就不会有这二十几年惨痛的遭遇。想到这里，皇上如何不悲从中来！

幸好，二十年的悲苦辛酸终于有了报偿，以自己的庶出身份，竟能最后贵为天子，皇上的心中更是百感交集，他当然要将一腔衷情尽情地挥洒。

宣宗的悲哭声震屋瓦，也使已移居兴庆宫的懿安皇太后颤抖不已。

懿安太皇太后是宪宗皇帝实际上的正宫，她的祖父是一代元勋郭子仪，母亲是代宗皇帝的长女升平公主，出身是地道的金枝玉叶。宪宗在藩邸时，即纳其为妃，并于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生下穆宗皇帝。但因为宪宗后宫多宠，一直未能立为皇后，直到穆宗即位，才如愿以偿地成为国母。

宪宗皇帝死得不明不白，这情况后来人都或多或少有点知道。可对如此大事，懿安太后就是不闻不问，穆宗也讳莫如深。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外间的人不敢想，当然也就无法道出。不过，在深宫高墙之内，却是有无数种说法在悄悄流传着，一直到了穆宗晏驾后，才由文宗皇帝将数名直接元凶绳之以法。不过，文宗也没有这个胆子去彻底揭开这个盖子。

宣宗可不理这一套。他的生母是皇太妃郑氏，宣宗即位之后，立即奉为“孝明皇太后”，其地位直逼数朝祖母之尊的懿安太后。皇上并且还放出风声说，一定要追究宪宗死因的真相，无论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这话就把懿安太后吓了个半死。

太后当然没有直接参与弑君的阴谋，不过她显然是知道内情的，事情的结果是穆宗即位，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既有利于自身，又何必去惹这个麻烦。再说，太后对于自己的夫皇宪宗，也并无太深的感情，她无法把宪宗迟迟不立自己为皇后的事情一笔勾销。所以，宪穆之际，天子莫名亡故，朝野竟是寒蝉一片，王守澄能只手遮天，太后当然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别看宣宗当时只有七八岁，但童年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再加上数十年的明察暗访，潜心推究，要想猜透其中的过节，对于聪明睿智的宣宗来说，绝不是难事。太后的所作所为，包括那次掖庭宫中突如其来的暗杀事件，他早就一目了然，并且心中计议已定。眼下说的这些话，意思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懿安太后已是惴惴不安，数日来茶饭不思。

她没想到即位的光王竟原来是这么一位欺世之人，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手软，在那次刺杀失败后应再接再厉，致他死命。眼看皇上的生母郑氏已居太后之尊，攻势仍是咄咄逼人，而自己孤零无靠，如何能够抵挡？太后感到无法忍受的是，身为四朝太后，三朝祖母，功臣之后，皇叶之身，竟被人强逼如此，心里一口气如何咽得下去！太后心道：“你不就是想要我死吗？那好，我就死给你看！千秋万世，让你这个无德之君留下个逼死国母的恶名！”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午，太皇太后在两名侍女的陪伴下登上兴庆宫里的勤政楼。其时风和日丽，草木葱茏，太皇太后倚栏而望，却不禁悲从中来，想想如此下去，终究难逃一死，不如就此了断了罢。主意一定，便颤颤巍巍地跨栏而上，要往下跳。

两侍儿吓得面色飞白，扑上去拼着全身力气拽住她。太后大叫：“休得阻拦！我这是要遂皇上之志，快快放手！”两人哪里肯依，

死活不松手。太后年高体衰，僵持一会，便已是气喘吁吁，不能坚持，只得听由二人将她扶下，送还寝殿。此事立即就有人报告了皇上。

宣宗拍案而起："让她去死！让她去死！"皇上的怒火按捺不住，面色通红，胸腔一起一伏，整个身子也微微颤抖起来，当着众多内侍的面，破口大骂："身为国母，听任光陵商臣之酷而不怀惭惧，犹藏异心，言死尚轻——"说到此，皇上突然停住了话头，慢慢地坐下，脸上露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冷笑，"好吧，朕就成全了你！"

左右肃然。

这天夜里，兴庆官就传来消息：太皇太后忽染急症，不治身亡。第二天，朝廷正式讣闻。这事情太明显了，酒坊茶肆，立时就是议论纷纷。

几天后，太皇太后入殓。有关部门得到皇上的暗示，上奏说：太后宜葬景陵外园。意思就是不配祔宪宗。

礼部检讨王皞是一位负责朝廷礼仪之事的太常寺官员，这个人有点愚忠，听得此讯，心想：这怎么可以！立即上疏道：郭后宜与宪宗合葬，在太庙的神位也应配祔宪宗。这份奏章送到宫里，宣宗一见，差点没有气死。他看着宰相白敏中，竟是连话也说不上来了。

敏中退朝后马上传王皞入见，问他是怎么回事。

王皞道："太皇太后乃汾阳王郭子仪之孙，宪宗东官时即为正妃，又曾以儿妇事顺宗。宪宗厌化之夕，事出暧昧；而太皇太后天下之母，身历五朝，岂得以暧昧之事遽废正嫡之礼！"

敏中有气，心想这个人真是蠢得厉害。"诛除凶恶，无使漏网，此乃圣上旨意。况今上已奉孝明皇太后——"

王皞打断他："这是什么话？太皇太后国母之尊，事无证据，岂能与弑逆之徒相提并论！"竟是一点不让。

敏中气得不行，板起脸来教训他不要信口开河，可王皞横竖不买账。

到了中午时间，同相的周墀立在门口等白敏中一起会食，可这里敏中正与王皞相持不下，只得出来对周墀道：“正为一书生所苦，公请先行。”

周墀好奇，便走进来在一旁坐下，听着二人的辩论，心中大生感慨：朝中到底还是有孤直之臣！

可第二天，孤直的王皞就被贬为句容县令。这当然是敏中的安排，他与皇上是无时不保持一致的。

太皇太后既已除去，皇上接下来的手段就更是干脆。从宫中开始，一直到朝间京外，无论宦官、外戚甚至是东宫官员，只要与其事有牵连者，重则格杀，轻者贬斥，一概不留情面。这事持续了将近六年，直至大中八年（公元854年）的正月，该杀该罚的人都已处理得差不多的时候，考虑到人情安稳，方才下诏宣布：自今以后，余者不问。算是给这件案子画上了句号。

皇上的这些行为虽然手法颇重，却不能说明当今天子就是一位冷酷之君。宣宗其实是一个大有情人，只是过去的岁月养成了他不把情感显露于色的性格而已。他的内心世界其实异常的丰富，不能想象，一个人若是没有强烈爱恨信念的支撑，如何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忍受孤独痛苦的煎熬！文、武时期的遭遇，唤起了皇上对童年的怀念，也就引发了他对宪宗的无限追思。恨得深，也就爱得切，元和时代的一切甚至成了他全部的寄托，这种感情延续了宣宗的一生。

大中二年六月，那时他刚刚即位一年多。有一天他问宰相白敏中：

“朕昔年从宪宗之丧时，道遇大风雨，百官六宫皆四散避去，惟有任山陵使的一位大臣攀灵驾不去，这人是谁？朕记得此人年纪颇长，面有重髯。”

“令狐楚。”敏中很熟悉先朝故事。

“他有子否？”

“长子名令狐绪，今为随州刺史。”

“能否担当宰相之任？”皇上心情急切。

“令狐绪少病风痹……”敏中迟疑了一下，又道，“不过令狐楚次子令狐绹，前为湖州刺史，大有才器。”

皇上立即便制命提升此人。令狐绹入谢圣恩时，宣宗又亲切地和他谈起元和的往事，想不到他比白敏中更为明悉，君臣话语投机，兴而忘倦，而皇上更是欣慰不已。

宣宗从此开始奠定了自己用人的基调。此后的十一月份，杜黄裳的儿子杜胜、裴度的儿子裴谂，也先后被起用。令狐绹最后在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入相。整个大中时代，宣宗无疑是唯一的主角，而白敏中、令狐绹是当然的配角，没有了他们，也就无法衬托出宣宗皇帝精彩绝伦的演出。

当武宗的一切被彻底否定后，宣宗的时代便正式开始了。

给宣宗当宰相的秘诀

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之物。

此时的天子已不再是一位躁动无知的少君了。

宣宗已近不惑之年。更主要的是，当今天子的阅历是前几代皇帝所无法比拟的，他所承受过的寂寞痛苦，就是本朝的列祖列宗，恐怕也没人能望其项背。新一代君主宣宗皇帝，确是带着深深的思绪登上九五之位的。

对此，令狐绹是第一个深有感触的大臣。

那是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月，其时他刚刚由司勋郎中入居禁署，担任翰林学士。有一天傍晚正在翰林值班，忽有中使传谕，说是皇上召见。

令狐绹赶忙入宫，走到皇上寝殿门口，便见有小黄门在那里秉烛

而候。显然，皇上正急切地等着他的到来。

令狐绹走进殿来，皇上正在榻上读书，“贤卿入座。”令狐绹行礼已毕，在一旁恭敬地坐下。

皇上放下手中的书，凝神望了他一会，道：

“贤卿从江表来，不知对彼处民情吏政有无考察否？”皇上略略顿了一下话头，接着又道，“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广，虽明君也难能自理，故尤需贤臣良弼的辅佐。”

说到这，皇上正眼瞧着令狐绹，意味深长地道：“然朕近来留意朝廷，却未见有忠赤之士。”

令狐绹心里一慌，急忙离座降阶而伏，口道：

“圣意如此，微臣便是有罪了！”

皇上一见效果达到，话锋立时一转：“卿甫为翰林学士，方才之言，本不相及！贤卿不必如此，上来就座。”

令狐绹口里唯唯，心中却是忐忑不已。

天子命宫人以玉杯斟酒赐与令狐绹，令狐绹山呼万岁，一饮而尽。

皇上望了望放在榻上小案上的书，有意岔开话题：“朕听政之暇，未尝不披寻史籍。”他拿起两册，又接着说，“这一册是先朝所述的《金镜》，此册为《尚书·大禹谟》。”皇上随意翻开其中的一卷：“贤卿读过《金镜》否？”《金镜》乃本朝英明之主太宗皇帝手撰的一部治国经验之谈，与后人记述的《贞观政要》一样，都是历来君臣取法贞观之治的必读经典。《尚书》则是先王先圣的言行纪录，也是垂范百代的不二宝鉴，《大禹谟》是其中的一篇。

令狐绹暗自庆幸：还好自己对这部书下过功夫。遂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文皇帝此书，讲的是治国治身的至理。微臣披阅诵讽，不离于口。”令狐绹话中的“文皇帝”就是指太宗，太宗皇帝庙号“太宗”，谥

日“文”，所以有这样的称呼。

天子十分高兴，“卿试举其要。”

令狐绹朗声而读，果真是烂熟于心。当他读到“乱未尝不任不肖，理未尝不任忠贤。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则受天下之祸”一段时，皇上摆手示意他停住。

“朕每至此，未尝不三复然后已。《尚书》上也说：‘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欲致升平，当以此言为首！”

令狐绹当然称颂不已。

宣宗的好读书又非是当年的文宗所能比拟的。文宗血气方刚，追求的是一种完美的理念；而宣宗披览史籍，却完全是寻求一种技巧上的借鉴，两者性质不同，效果也就大相径庭。

谁都知道要“任贤去邪”，可怎么个“任”、怎么个“去”？再说，即使有了贤明的辅弼之臣、忠直的清明之士，国家就真能治理？前代的李德裕就是个例子，最后还不是功高盖主，而使天子退居其后！宣宗相信书中所总结的这个原则，但是他却自有他的方法。他对令狐绹说：

“朕想知道朝中百官所有人的姓名。”

这就是了，宣宗确实不笨，他在十六宅度过的日子没有白费，他早就深思熟虑过其中的手段和必需的原则了。任何事情都必须做到成竹在胸，也只有这样，他才是真正的天子。

令狐绹很为难：“六品以下的官员太多了，皆由吏部造册登记：五品以上，方由中枢制授。这部分倒有一种名册，称作‘具员’。”

皇上心里有数。送走了令狐的第二天，他立即命宰相撰就《具员御览》一册呈上，放在案头，时时翻检。

可见宣宗不是一般的人，他的极高心智已经开始逐渐显露，这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就是一个信号。

第一步是确立一种原则。宣宗选择的是“法”。

自古而来的传统皆反对法治，因为治以形名，则必伤乎道德，而帝国的基础正建立在一系列的伦理制度之上，法既不能绝民刁顽，也无助于人君教化。所谓“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宣宗却不以为然，他的想法是，若以铁腕治国，就少不了法。

早在即位不久的大中元年正月，京畿大旱。皇上为此减膳食，出宫女，祷告上天，仍不见好转，于是想到赦免囚犯。便命宰相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系囚。但其时任大理卿的马植却上疏称：有些重犯，罪有应得，似不可一概宽宥。

天子得奏，也觉得有理，又命两省五品以上官员合议。讨论的结果，赞同马植意见的占了大多数，皇上就采用了这一措施，诏命一切皆按法规办理。这是宣宗倾向于法治的开端。

不能不说马植的话给了皇上重大的影响，他在奏章中所说的“诛罪戮奸，式合天意；雪冤决滞，方副圣心”、“若平日大赦尚且不免之人，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贪吏无所惩畏，死者衔冤无告，恐非所以消旱灾致和气之道”之类的话，和皇上内心的想法本就有很多的契合之处，而马植的这一理论，更符合他所构建的政治策略，因而立即就予以接受。马植为此在后来也成为宰相，为宣宗所重用。

宣宗当然还有所发展。他自己就公开说过：“犯朕之法，虽我子弟亦不宥！”既把“法”有所限定，此“法”非他“法”，而是“朕之法”，又着重强调了“法”的铁板原则，操作起来，便就得心应手。

有一段时间主掌京兆府的是一位叫崔罕的人，此人治绩不怎么样，但做起事来却很浮躁。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位官员没有避让他的马头，崔罕心里大为生气，再一问，此人不过是一位小小的内园巡官，竟马上重责其人五十四杖，至于将人打死。皇上得讯震怒不已，立即宣谕，把崔罕贬去远州。

宰相们倒觉得处罚太过，齐诣皇上援救。宣宗心里有着细细的一本账，他对宰相们道：

“崔罕为京兆，抑强扶弱，是其职责。道不避马，杖之也不算为

过，但问明为内园巡官再下手，就是明显的欺弱怕硬。另外，人臣之刑，止行二十杖，此乃朕之法；他打到五十四杖，这是谁家之法？真是骇人听闻！”

宰相们听着这番话，顿悟皇上执法之旨，又如何不心生畏惧！

当然，宣宗选择的原则是为自己服务的，刻于用法是为了政治的需要。皇上聪明就聪明在他从不幻想着以德行使天下治理，那是典型的远水救不了近火。皇上宁愿选择威严之后的宽仁，也不愿去做仁德之后狰狞尽露的蠢事。天下人确实也都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通病：十日被威，一日受德，无不感激流涕；而十日被德，一日受威，却不免交怨沸腾。天子懂得了这个道理，天下事就成功一大半了。

不过这第一步还只是小样。若要就此以为这位新一代天子也不过是如此而已，这种见识那就是比文、武二帝这两位乳臭小儿都不如了。宣宗十六宅中二十年的岁月，又岂是白白虚度的？

尽管皇上多才多艺不让先人，无论是射箭击毬或是制曲吹管，都能曲尽其妙，但皇上却不甚为意。甚至对于女色，天子也是淡然得很。皇上退朝之后，只做两件事，一是读书。为此天子下令，专门辟置了一间偏殿作为读书之处。有时皇上一进去就是一夜，到第二天早晨，内侍们看见的常常是烛灰遍地、书卷狼藉的情景。二是读书之余，便是召见翰林学士，与他们长谈不倦。

令宫侍感到迷惑的是，皇上召见学士时，全都屏退左右，不让任何人入侍。皇上还亲自整理读过的奏章，经常亲手焚毁其中的一些，然后再吩咐人拿去处理，这也是前朝所不曾有过的事。寝殿的楹柱上，御笔大书“乡贡进士”四字，此外还有许多人名，有时枢密使们偶尔看上一眼，发现其中有些是知名的朝官，有些则是无名小辈。

皇上的记忆力惊人。不谈别的，整个大明宫中，厕役、洒扫之仆少说也有百十来人，可皇上只要见过面，都能记住他们的名字。皇上若有指派之事，从来都不是吩咐一声了事，常常就是直接说：“叫某某人来”，无一差误。宦官宫婢都暗自心道：简直就是神了！

宫侍们最感到心惊肉跳的时刻，是天子升殿听朝之前的那一会。

皇上这时会突然沉下脸孔，变得面无表情，默默地朝着某个方向肃容片刻，然后更衣、盥手，调匀气息，再慢慢地走向大殿。此时此刻，天子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但这静得让人无法呼吸的气氛，却犹如泰山压顶一般。

在走向金銮宝座的那一刻，皇上能感受到他的背后凝聚着不少疑惧的目光，但这不是他主要追求的。皇上心里清楚，他真正所需要的，是在马上要面对的朝廷百官的眼神里，也要看到这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般的恐惧。

宣宗有办法做到。

临朝之际，皇上的脸上已是一片熙容，接对群臣，往往犹如宾客。朝臣们当然很平静，因此，开始之时，都能奏事甚明，有些劝谏，也敢于上言。皇上在这个时候总是非常专注地倾听着，有时还在默默地念叨，好像生怕自己会忘记似的。

有一次延英殿合议，事情处理得差不多的时候，皇上忽然笑道："现在可以说些闲话了！"说着，自己先带头大谈宫中游宴的趣事，引得大家也情不自禁地说些坊里闲话。过了一会，宰相及翰林学士、枢密使们刚刚感到情绪轻松下来时，皇上又突然正色而道：

"卿辈好自为之。朕常恐卿等负朕，以使日后不复得见，再无今日之乐。"

这话说得让诸人猝不及防，人人都是陡然一颤。

皇上的态度变化率皆如此，让人无法揣度。没有暴怒，没有焦躁，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严酷处罚，但朝中的中枢要员，却无时无刻不感到战战兢兢。特别是当朝宰相，这种感受尤其强烈。他们有时甚至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天子虽有些刻于用法，但也不失宽仁爱人之风，勤于政事，从善如流，怎么说也能算上英明俭德之君，己辈的忧惧又所从何来呢？

在大中时代初期前后为相的有白敏中、崔元式、崔琮，在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崔先后罢去，接着便是周墀和马植。其中敏中担任的时间较长，居相接近六年之久，而周、马二人，在位分别只是一

年与两年。

敏中的秘诀就是无所建置，一切都唯天子是从，至多也是略作修饰而已。他在相时最大的举动就是清除了李德裕之辈，帮助皇上不遗余力地否定会昌政治，其他的实在无可足道。不过这种人，宣宗却很赞赏。

这倒不是皇上昏庸，宣宗要的就是这种事不关己的宰相。以宣宗的明察秋毫和事必躬亲，有敏中做摆设，那是再好不过了。所以敏中才有可能做了那么多年的宰辅，而其后来的罢相出镇，也就是因为他在开始的时候，对德裕之党处理过重，擅权独行，引起朝野不服的缘故。

周墀就是那位文宗曾经相与痛哭“受制家臣”的人，文宗时颇受重用，先后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武宗时出外任职，宣宗即位后，大中二年入朝为兵部侍郎兼判度支，五月份拜相。

本来周墀应该是能像白敏中一样多做几年宰相的，这是因为在入相之时，有一位极富韬略的人给了他一个忠告。

此人名韦澳，是元和时宰相韦贯之的儿子，是周墀的老部下。当周墀向他请教为相之道时，韦澳说了这样一句话：“但愿相公不要有权！”

这话当时让周墀着实吃了一惊，不过在韦澳的解释下立即就明白了，并还深为叹服。

韦澳的解释表面上是大道理，但实质就是要周墀尸位素餐，无功无过而已。这可算是摸到了宣宗的心里去了，韦澳有这样的见识，真是一个有心计之人，无怪乎在后来成为皇上的心腹。可惜的是周墀尽管接受了这一劝告，也循规蹈矩地坚持了一年，可在最后还是忍不住犯了冲动的毛病，既得罪了一些宦官，又忤逆了皇上，无奈被罢。

此后最主要的宰相就是令狐绹和魏谟。这两人在相时间都很长，正如前期的白敏中，他们与后期的宣宗之政也是密不可分的。

令狐绹是大中时代居位最久的宰相，自大中四年（公元850年）

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辅政几达十年。在圣明睿德的天子眼下，令狐绹能如此长久地安居其位，其中当然自有奥妙。

御下有术

无幽不察，收放自如，天子做到了极致。

令狐绹能从湖州刺史的任上入朝，并在不久之后就入值禁署成为翰林学士，完全是沾了他的亡父令狐楚的光。宣宗追怀往事，特别重用元和公卿子弟，尤对令狐楚之子令狐绹眷顾深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令狐绹得以稳坐相位，却不仅仅是这个缘故。

他与皇上在很多事情上颇谈得来，这也是他十几年来潜心攻史、苦读经典的报偿。学问的力量是无穷的，它能让一个人彻底地改变自己，在心里产生一种真正的自信。学问来自于读书，善读书者，更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处世的妙方，这一点，令狐绹与宣宗不谋而合。皇上得到的是如何御下，而令狐绹则学会了怎样曲线生存，怎样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其实这里也没有什么天机，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即：永远不要对人说“不”，尤其是在天子面前。

令狐绹这个人本身性格就极为庸懦，他甚至没有刻意为之，就做得游刃有余。

皇上在大中三四年间，经常在夜里召见翰林学士秉烛长谈，其中就以令狐绹次数最多。皇上对他是十分满意的，原因就在于不费心思，便能使他为自己任意驱役。

大中四年（公元850年）的整个一年中，除了党项、吐蕃依旧在边境为患外，帝国上下出奇地平静。十月二十六日这天的夜半时分，皇上又突然在大明宫的含春亭召见当值的翰林学士令狐绹。君臣在清风微露的秋夜里畅谈不已，直到烛炬燃尽，方才罢休。宣宗亲自送令

狐绹下亭，并命内侍以“金莲炬”送之归院。金莲烛炬是天子才配使用的东西，颁赐臣下，是至高至极的恩泽。

一行人走到翰林学士院，院吏远远望见光焰闪烁的金莲蜡烛，相与而叫：“天子驾到了！”慌不迭地准备迎接。可一会儿却见是令狐绹在烛火簇拥中来到，都惊得面面相觑。

第二天，令狐绹就正式拜相，一直做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的十二月宣宗驾崩以后。

为相的这十年中，令狐绹很少犯错误，他的小心谨慎、不置臧否的处事作风使他的圣眷始终没有消减。不过，百密难免一疏，有一次令狐绹不经意之间，竟然也行使了一下宰相的权力，做了一回主。

皇上在即位不久后就规定：凡是诸州刺史，秩满后不得即赴他州，须得归阙朝对后，才可以赴任。这是宣宗独特的政治改革之一，目的是为了防止外官久在朝外而不受驾御的情况出现。有一位刺史从随州调任邻郡房州，令狐绹认为两地毗邻，实在没必要再劳繁缛，便命他可以从便，即去房州赴任。朝命一下，新授之人照例上了一封谢表。

皇上览表奇怪，他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入朝觐见过。便问令狐绹：“此人为何从便赴任？”

“地近授受，也好方便迎送。”令狐绹答道。

皇上正色道：“朕是考虑到近来州刺史们为官因循，不念治民，这才命他们到京，也好亲问其为政施设、理道优劣，为国家今后升黜立式。”天子说到这里，带着一种冷意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命既行，岂又逾越？宰相太有权了吧！”

令狐绹省悟过来了，吓出了一身冷汗。时虽严冬，却竟然重裘皆透。

后来，令狐绹对人说了一句心里话：

“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但每次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流沾衣！”

其实，每一个朝中大员又何尝不是如此。谁没有这样的心态，也就注定他不会在中枢之位呆得过长。比如魏谟，他在令狐绹稍后入相，也许是乃祖魏征——这位本朝第一名相——赋性遗传的缘故，颇能谠言切直，对皇上的一些做法提出意见。宣宗为平衡人心，也需要这位声名卓著的大臣在某些情形下做点补充，但毕竟不能容许以臣子的孤直来取代天子的清明，所以最终还是要将他请出朝外。当魏谟做了六年宰相出任外镇时，有人以为这是令狐绹的排挤，实际上却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大中期间的宰相还有好多位，如崔铉、崔龟从、郑朗、崔慎由、萧邺、夏侯孜、蒋伸等人，各人情形虽有差别，但不是些平庸之辈，便是投机取巧之人。这些人所以被任用，可绝不是因为天子也同他们一样无能。宣宗最后的一次除拜宰相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那是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的十一月，蒋伸其时任兵部侍郎，他在一次入阁奏事时，不小心对皇上说了一句大实话："近来好像官位很容易得，不少人都有侥幸之心。"

宣宗大惊，他自忖在用人方面极有把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如此不是要乱了吗？"皇上顿时担心起来。

蒋伸回答得妙："乱倒尚未至于乱。不过侥幸之人多了，即使真乱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话说得皇上叹服不已，他在心里道："有如此高见，朝中能有几人？"宣宗朝着蒋伸意味深长地说："今后怕不能单独和卿见面了！"

蒋伸当时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满头雾水。直到几天后拜相的制命下来，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蒋伸的职位兵部侍郎品级上属于"次对官"，也就是能在常朝的入阁奏对时单独被召见；而本朝制度规定：宰相必须是在延英议事时集体面见天子，不可独自觐见。皇上那话的意思，竟是要命他人相，蒋伸又怎么能想到。

蒋伸无疑也是一位"侥幸之人"，不过，皇上是不怕"侥幸之人"多的。这是大智若愚，还是聪明过头？答案也许不辨自明。

看得出来，宣宗有意要撇开宰相。他与早年的德宗有些相似，相

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皇上是有些猜忌和自信，但他与德宗不同的是，他经过多年的处心积虑，业已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水平。

确实，没有皇上不知道的事，也没有他无法解决的事。

天子常常微服出游，这是他自十六宅时就养成的习惯，只不过那时只是为了排解忧虑而已，与此际的目的大不相同。

皇上每次出去都是一人单驴，厚帽遮颜，一路之上不停地看，不住地在心里默记，有时甚至与贩夫走卒、乞儿穷汉搭上两句闲话，往往要到日暮天昏，方才归宫。即使是大队人马出城畋猎，皇上也不忘顺带作点巡访。

一次是在皇苑之北遇到樵者数人，宣宗命留下他们，有话要问。

“尔等家在何处？”皇上对跪在面前的樵夫们问道。

“小人们乃泾阳县百姓。”泾阳是长安附近的一个县。

“邑宰是谁？”这是正题。皇上可不像史书上记载的那些君主，装模作样地问些年成丰歉之类的东西。

“李行言。”

“为政如何？”

樵夫们也无顾忌：“为人有点呆板。上次抓到五六个劫贼，不容他们以钱赎罪，全部杖死。”

宣宗还宫，立即就把这位李行言的名字写到了寝殿楹柱上。过了两年之久，朝廷有令擢李行言为海州刺史。行言人宫谢恩时，皇上问他：

“你是不是曾做过泾阳令？”

行言答道：“臣是在泾阳呆过二年。”

皇上听道，便命赐赏金紫服。不同的服色代表着朝臣地位的高下，也象征着天子的不同恩遇，紫色是品极较高的一种。行言再谢。

“卿是否知道朕赐你着紫之由？”皇上又问。

行言奏答：“臣不知。”

皇上微微一笑，命左右去把柱上贴有他名字的纸条拿给他看。行言怎么也没想到，天子的寝宫里，居然大书着自己这么一位低级官员的姓名。他又一次拜伏下去，除了激动，也情不自禁地倒抽一口凉气。

还有一次是大中九年（公元855年）二月出外校猎时，在城西快到渭水的地方，皇上看到有一二十个醴泉县的百姓，在村头佛祠中设斋，祷求本县官秩已满的县令李君奭留任。皇上回到殿中，马上就命内侍将此人姓名重重写上。后来，中书门下两次拟换醴泉县令，都被皇上驳回。过了一年，宰相奏怀州刺史一职空缺，请命人填补。天子遂亲笔写了一张条子：“醴泉县令李君奭可授。”传到政事堂会议上，宰相们顾视茫然，连他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人为皇上所垂意。

可皇上却不能满足京畿周围这一小块地方，他还要知道天下所有的父母官们是不是恪尽其守。皇上对此虽已无法亲自前往，可他照有办法。

这时，极有谋略的韦澳已被皇上用为翰林学士。宣宗秘密地命令他：撰写一份诸州风物利害情况的报告。韦澳领旨，归宅闭门，虽子弟亦不许入内，日以继夜地赶了出来，题为《处分语》，独自呈上。

过了几天，正好有一位邓州刺史薛弘朝回京述职。出宫后，禁不住内心的惊叹，逢人便道：“圣上处分本州事务，惊人的准确！”

韦澳问他怎么回事，薛弘朝一五一十娓娓道来，韦澳一听，果真全是《处分语》上提到的。

宣宗已把他的心智用到了极致，事无巨细，全部包揽，十几年中可以说是始终如一。像他这样殚精竭虑的天子不能说没有，但能做到如此这般算尽机关的，那真是凤毛麟角。当今天子的御下之术已有相当的火候，此乃历朝历代人君梦寐以求的东西，而宣宗庶几得之，这就更为难得了。

皇上的孜孜追求，甚至到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时任司勋员外郎的李远，很有文才，诗名亦颇著称。令狐绹想把他升为杭州刺史，延英召对时便向皇上提了出来。

宣宗当然知道这个人，但他不同意令狐绹的建议。

皇上道：“朕以前曾读过此人的一句诗，说甚么‘长日唯消一局棋’，这种人如何可以出任一郡长官！”

令狐绹都有些哭笑不得，忍不住道：“这是诗人写诗时才说的话，不一定实有其事。”

皇上愣住，像是在清理自己的思绪。过了良久，才缓过神来，明白自己这是存念过深了，方才不语。

宫中的内侍们在后来还常常看到皇上用小纸条写上好几个人的姓名，用碗盖住。一旦需要任命宰辅时，天子便净手焚香，虔诚默祝，最后在碗下拈着谁人，就命谁人入相。宫人们都天真地以为天子必有神助，其实皇上根本就是无奈。他再怎么资禀过人，像这样地苦心孤诣，总有一天要江郎才尽，到了这个份上，人算真就不如天算了。

天子确实是用心太多了，除了朝中臣子，皇上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些人，他在这上面更没有少费心思。

宣宗知道，没有宦官，自己就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御极天下的地位；但他也没有忘记前几代天子的苦难悲剧，作为人君，是不能受制于家奴的，否则即使贵为天子，也就形同草芥。

他对宦官的基本策略是：对重要人物委以虚恩，对位轻之辈则严施约束；大的方面装糊涂，小的事情上绝不留情。

看起来似乎是本末倒置，其实这叫做敲山震虎，在目前这种不可能大动干戈的情形下，还真是上上之策。

大中期间主要的宦官先后有马元贽、王公长、马公儒、王宗实、王茂玄几位。特别是左军中尉马元贽，为宣宗即位立下大功，在宣宗初期可是炙手可热的人物。皇上对他的安抚做得很好，元贽表面上荣

耀无比，但除了手中的禁军之外，却没能形成什么实际力量。

皇上表面上装着毫无疑心，其实暗地里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想法解决。宣宗有一点很明确，绝对不容许宦官交结朝臣，这是有前事可鉴的，当年的王守澄就是最好的范例。在这种事上，皇上肚子里很有一本账，他也知道该怎样对付。

马植入相后，有点想交结马元贽，竟跑去和元贽叙同宗之谊。元贽恩冠诸宦，有些大大咧咧，一高兴，便把皇上赏赐的一条金宝带转手送给了马植。天子赐物，这是莫大的优渥，即使做不到压之箱底、世代传家，起码也不能送人。元贽此举做得是有点过分。

皇上还就发现了元贽身上的御赐之物不见了，怪而问之。元贽自觉理亏，不敢隐瞒，便道出实情。宣宗当时忍而未发，他晓得，对神策中尉之流的宦官是千万不能草率处理的。

但是皇上可以杀鸡儆猴。他没有动马元贽一丝一毫，却转而立即罢免了马植的宰相，又下令严查此事。最后马植的从官交待了马植与元贽来往的事，皇上这才发现宰相当中竟真的存在交通宦官的情况，龙颜大怒，又再贬马植为常州刺史，并公开宣布：他的罪名就是与宦官有所来往。天子的这一招把马元贽一下子就震住了，心生恐惧，便再也不敢有越轨之举。

对那些小人物就不用说了，皇上在内宫中设有专门的棍杖，有时就在延英殿，当着宰相的面杖罚他们。宰相们倒觉得天子未免有失儒雅，还常常劝解。可皇上说得理直气壮：

“此辈是朕之家奴，杖之何妨！如卿等奴仆有过，亦不可不罚。”

此举一半是向朝官显示自己的不私近臣，一半也是做给其他的大宦官们看的。皇上的其他举动，亦往往如是，哪怕是再小的事情，也无不含有深意。

前几代天子为了防止左右神策军横生事端，定下了这么个规矩：凡是左中尉卸职，须由右军而出；右中尉卸职，则务须从左军出宫。宣宗心想：这真是笨得可以了！若是中尉心生不轨有意作乱，这种小聪明又如何能阻止他们？于是下令改革，命中尉离任，皆从本军径直

出营。

这下，朝廷及宫中宦官有时都不知道中尉已经易人，即使卸职中尉本人，也不清楚对方情况。两军既莫知情由，又如何敢轻举妄动！皇上的谋略，真不知要高于那些自以为得计的先代天子多少。

不过，宣宗还是没来得及消除掉这个祸患。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为此皇上曾反反复复地找翰林学士们商量对策。他是有心要花大力气改变现状的，只是因为文宗时期因轻躁而酿致惨败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皇上心存顾虑，才一直没有动手。

韦澳认为有甘露之变的前车之鉴，绝不能再用外间朝士，不如就在宫中选择忠直有识的宦官，以子之矛，攻其之盾。

“这是最下之策！”宣宗对宦官太了解了，“那些人若是身处下位，尚都能感恩戴德；一旦成为三品的禁军将军，就变得沆瀣一气。”皇上没有充分的把握，不做冒险之事。为保证一击成功，他宁愿慢慢来。

是令狐绹的懦弱断送了皇上的大计，他自己没有勇气挺身而出，反而以种种借口打消皇上的这个念头。令狐绹对皇上说：“只有陛下坚持以往的方针，有罪勿舍，有缺不补，彼辈则自会渐耗而至于瓦解。”

皇上听了不语。这是他一贯的策略，但不是永远的方针。可他也知道，最后的一步将是无比的艰险，弄不好就是全盘皆输，连眼下的苟全也不可得。没有臣下有力的支持，他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朝中“侥幸之人”太多，终于在这件事上暴露出了恶果。皇上与朝官既丢失了由武宗和李德裕争取过来的先机，则必然使宦官们得以苟延残喘，有机会开始积蓄反击的力量，并终于在宣宗死后再次发挥出他们强大的威力，主宰了帝国的政治。这真是令人悲哀的事。

可话又说回来，神策军、枢密使造就的反奴为主的现实，单靠宣宗的智术是无法改变的。皇上能做到十几年的时间里没让宦官兴风作浪，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被“长生药”结束的时代

是英雄造出时势，还是时势成就英雄？无论如何，宣宗皇帝既承受了时代的垂青，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现在可以把目光从天子身上移开，投向帝国的现实了。

宣宗皇帝从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即位，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八月去世，在位十三年五个月。

在这十三年里，朝廷再没有出现过前几朝“朋党”倾轧的现象，宦官的势力也有所消减，几乎没有发生过干预朝政的事情。地方上，在朝廷安抚为主的方针下，除些短暂的风波外，众多强镇也都没有大的动乱。边境上的吐蕃、党项虽然一直骚扰不止，但力量也在逐年萎缩，早在大中三年（公元849年），西南的维州、抚州即相继收复，西北的秦、原、安乐三州及境内七关也成功地摆脱了吐蕃的统治，归顺故国；两年后，沙州人张义潮乘吐蕃内乱，发兵收复河湟一带瓜、伊、西、甘等十州，连同沙州，共举十一州之地归复朝廷。从此，帝国重新把边境推到了河湟以西，多少洗刷了一些安史之乱以后放弃西北的耻辱。

不知不觉，让人大吃一惊。

宣宗的这十三年，竟是出奇的平静。算起来，地方上断断续续的藩镇叛乱，朝内外纷纷不止的派系斗争已经持续了近一百年，至少，每一代天子都无法避免一场严重的动乱。最思治理的德宗，甚至酿成了九鼎播迁的灾难，差一点就断送了帝国的命运。而其后的几代天子，外乱未除，内患又生，顺宗、文宗受制于家奴，宪、穆、敬、武四帝忧于“朋党”，即使如宪宗皇帝英明睿武、斗志昂扬，也只不过是以沉重的代价换来一个“中兴”的名声而已。谁又能像宣宗临御的这十三年，四方数镇虽失统驭，可是终无异心；朝野上下数有波动，却也大致安宁。即使比不上本朝开元时期的全盛，但却也是一个地道的太平之世。文治武功是书生们喜欢夸耀的事，对天下百姓来说，只要平

平安安，就是无上的幸福。

看起来，皇上的艰苦努力并没有像德宗那样付之东流。

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十几年来忧勤之道，始终如一，甚至每日每时都未敢稍宁心思。臣子、家奴、方镇、州郡，无不常系心头，哪怕是在偏殿读书，皇上也不忘冥思苦想，力求为日间的疑难找到一条妙之又妙的计策。

宣宗不是一个求道者，也不是一位秉赋超群的人，严格算来，他只是个不懈于锻炼本心的智者。他用自己辛勤三十载的沉思，弥补了所有的不足。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与众不同的道路上取得了独特的成功。宣宗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好学不倦不是为了追求道义，更不是为建立德声，他只是注目当前，就事论事，宁愿以实际上的效果代替理论上的完美。奇怪的是，现实往往就垂青这样一种人，这是让所有的“仁者”都愤愤不平而又无可奈何的事。

这样的统治者往往还要有所牺牲。

南方越州的地方官曾经进奉过一部女乐，也就是由女子组成的歌舞乐队，其中有位绝色美人。皇上一见倾心，十分宠爱，数月之间，赐物盈积。可是有一天早晨，皇上刚刚起来，忽然面有忧色，闷闷不乐。

“玄宗只一杨妃，天下至今未平。我岂能忘？”皇上在心里说。

他召来美人：“朕留你不得！”

美人盈盈泪下，长跪不起。

左右内侍不忍，有一位奏道：“陛下既不留之，可以放还。”

“放还朕必思之。”皇上望着窗外的远方，怅然而又坚毅地说，“不要多说了，就赐酒一杯吧！”

可怜绝代佳人，只落得了个全尸。但皇上要忍受如此这般的痛苦，也并不比她接受死亡来得容易。

所有的臣子家奴在天子的超绝睿智面前都要冷汗淋淋，而皇上面

对着眼前的这些文武百官，心里又何尝轻松。他不能容许自己有丝毫的疏忽，更不愿被人所欺骗，因此只能收拾精神，全力应战。皇上的自信其实是自己极端孤独的表现，他不要宰相，不要近臣，便只有相信自己的智谋，否则就会彻底崩溃。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半夜三更还要找来翰林学士长谈的原因。虽然天子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了法治，但这种“法”的实质却是“天子之法”，说到底还是一种“人治”。人治的悲哀就在于，它只能满足一时，而不能满足永远；只能抓住机会，却无法创造机会。

为人臣者是都变得循规蹈矩了，可“智慧出，有大伪”，在宣宗的聪睿面前，白敏中、令狐绹、蒋伸之流就学会了巧言令色之道。假如今后的天子不再是如此有心的天子，这些变得聪明起来的臣子们，还会这样俯首帖耳吗？宦官也不得不收敛了许多，这是因为他们选错了天子，竟让这位大智若愚的人登上了帝位。他们也确实斗不过宣宗，但却能再与朝官们决一高低。为了生存，他们仍还要重新祭起百战百胜的法宝：再造就一位皇帝，难道还怕你皇上真的长命百岁不成？

宣宗恐怕最终还只能算是一个平凡的君王，因为他只看到眼前，而忘记了为子孙后代负起一点责任。不过，放眼龙宸，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能做到这一点的，又有几人？！

回首往事，就可发现宣宗还真是幸运。

藩镇已经无力再大动兵戈。虽然元和以后不少强镇特别是河北诸镇依旧脱离了中央，自成了一个个独立王国，但长期的战争消耗已使其元气大伤，他们无法，也无力再与中央作直接的对抗。朝廷也是如此，为了追求名义上的满足而消灭割据，早已被天子和大臣们所抛弃。于是双方只有妥协，中央政府以安抚政策使他们不妄生事，而藩镇也以承认天子而得到子孙相代的实利。所以，武宗时期敢于跳出来兴风作浪的昭义镇得不到一点的同情，因为它破坏了这样一种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平衡，以至不到二年，就宣布垮台。这种愚蠢之举，又有谁去效仿？

大中时期，有几个藩镇也闹出了点事情，但都只不过是内部纷乱，或兵逐主帅，或强者自立而已。朝廷换个节度使或者干脆一纸诏

书默认事实，事情也就自行消歇。只有在大中末年，南方的几个军镇哗乱较大，如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五月的湖南军乱、六月的江西军乱，才使中央调动了邻道的兵力进行讨伐。这几镇兵力极弱，根本不能成事，很快就告平息。

财政情况在平和的局面下出现了良性循环。继刘晏、杨炎、李巽、程异之后，又有一位干练的大臣裴休成为帝国最后一位杰出的理财能手。他自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担任盐铁转运使以后，也是从整顿漕运人手，全面梳理了国家财赋的运转。他借鉴当年刘晏的经验，又立新法十余条，彻底清除了元和以后的种种弊端，三年后，运到长安渭河码头的漕米便达到了一百二十万斛，最多的一年是大中十四年（公元860年），达到了一百四十三万斛，接近于天宝盛世时数量的一半，这也很不简单了。

所有这些，显然都不是皇上的高深智术所能办到的。说得直接一点，宣宗应该感谢武宗，没有会昌时期打下的良好基础，情况也就绝不会有这些好转。但这话也是说说而已，因为这种机会的出现，恐怕也很难说是武宗时期的功劳。

是时势造就了宣宗的成功。若是没有这种机会，无论宣宗再怎么聪明过人，恐怕也难逃德宗那样的厄运。阴阳互动，否极泰来，帝国已经动荡了近一百年，各式各样冲突双方都势衰力竭，不免相互转化、相互依托，以酝酿下一次更加激烈的冲突。宣宗的十三年就正是这样，它宛如大浪跌下后溅起的波峰，溅得越高，也就将落得越深。它的平静是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后来的事情马上就可以看到。

可这一刻是平静的，幸运的宣宗出现在这个平稳的时刻，有了机会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于是凭借东风，浩荡入云。

宣宗的最后一年，有一位叫李商隐的人死在了离东都洛阳不远的郑州。此人比宣宗小一岁，但与宣宗同年去世。他的前半生与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之间的恩恩怨怨牵扯在一起，而后半生则与大中时代相始终。李商隐一直都沉沦下僚，郁郁潦倒，可正因为如此，反而造就了他辉煌的文学成就。

可在当时，李商隐却是个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寂寞地死在京外异地，并不是什么大事，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可是上天垂谶，往往就出现在一些不为人所注意的事情上。商隐死了，宣宗皇帝和他们的时代也接近了他的末日。这一切，在两年前李商隐的一首诗中，早就消息毕露了。可惜天机不可泄漏，就是作者本人，登高临风，悲世伤身，尽管思绪交综、惆怅万千，却也没想到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二十字中竟成诗谶。

那是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李商隐罢梓州幕入京，在朝中担任了一个小官。商隐最后的几年，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先遭丧妻之痛，复又辗转漂泊。随着年岁之长，怀抱身世之慨，遂多见于诗什。这年夏秋之交的一个傍晚，商隐忽又幽绪袭来，怅惘莫名。踌躇片刻，决意独自出游，以排遣这无端感伤。遂命驾驱车，前往乐游原而去。

这“乐游原”本是一处庙苑，创建于汉宣帝时，后因破败废毁，成为一片势高地敞的坡原。它位于帝京长安的东南方，登高回首，全城尽览。本朝流传的一首著名的曲词“……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就是此地风情的写照。

又是一个夕阳西下的时刻，李商隐的轻车驰上了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他凝神西望，但见满目青霭的京城，镶嵌在一轮橙红的斜阳里，像是要融化在无边无际的辉煌灿烂中。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商隐吟出这下面两句时，已是满腹怆然。

黄昏是美丽的，但却是最后的辉煌。

宣宗犹豫再三，还是未能抵御“长生”的诱惑，从大中后期起开始服用医官李玄伯、道士卢紫芝、山人王乐等人所炼的“长生药”。不过，皇上是瞒着所有人偷偷进行的，这也许是他自己都有些不甚坚信的缘故，所以便不想因为这事召来过多的麻烦。可酷好“仙道”而服饵食丹，已被历朝历代天子们的经历证明不仅是麻烦，而且将是带来致命祸害的事，皇上如此聪明，怎么还照入彀中！

皇上吃的这种药乃是以伏火丹砂合诸金石而成，药性特别猛烈，起初是觉得身上燥热，冬天连棉衣也穿不上去，宣宗还以为这是好事，根本未曾在意。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五六月开始产生恶果，背上生了一个很大的疽。到了八月，病情开始恶化，宣宗终于知道自己为时不久了。

但同前几朝的情形相同，在此关头，年纪颇长的宣宗竟然也是未立太子。其实在大中十年（公元856年），也就是李商隐写下那首“夕阳无限好”名篇的同时，裴休就曾劝说皇上早立太子，可不料皇上却连太子也不愿信任。“若立太子，朕不就成了闲人了？”一句话中，就暴露了他极强的权力意志和胆怯的本性，他人又怎能再说什么！到了事情迫在眉睫的程度，再临时举措，便注定大乱不免。

宣宗有十多个儿子，年纪稍长的两位才识都很一般，皇上很不喜欢。从选择储嗣的角度讲，他属意的是三子夔王，但以次越长，不合继嗣之顺，又是很讨嫌的事，这也是皇上迟迟未立储宫的原因之一。但此时已容不得考虑，皇上在病榻之上，秘密召来了一向宠幸有加、的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和宣徽南院使王居方。

皇上指着侍疾的夔王对他们道：“朕百年之后，夔王可继大统。辅弼之任，就托付众卿了！”说完，已是气喘不已，再也无力发话。

三人跪倒榻边，泣而受命。当他们再次抬起头来时，一代枭主宣宗已经停止了呼吸。这一天是大中十三年的八月七日。

他们来不及悲哀，立即退到一旁商议这件大事。不用说，奉立夔王的最大障碍，就是神策中尉，特别是左军中尉王宗实。他们知道，王宗实和右中尉王茂玄素有不合，与己辈就更是有隙。弄得不好，王宗实要出乱子。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三人想到此，都是忧心忡忡。

到了深夜，三人终于有了主意。

第二天，宫中有诏制传出，命王宗实为淮南监军。尽管淮南是国家第一重镇，但从中尉的任上出京，多少有些明升暗调的意味，宗实虽不大高兴，可在天子的制命之下，也不敢公然违抗。上午，宗实在

宣化门外领旨后，回到营中收拾已毕，便准备从左银台门出宫。这时，手下副使丌元实忽然道：

“大人请慢！这事有蹊跷。”

宗实大惊：“此话怎讲？”

“圣上染疾逾月，即左右中尉亦只隔门问候，今日除改之命，难辨真假！大人何不亲眼见过圣上后再走？”

宗实猛省：“快与我来！”两人翻转身急奔内宫。

一路走过崇明门、紫宸门时，两人就发现门口已比平常增加了守卫人数，心里更明白了几分。丌元实带着宗实直奔天子寝殿，几乎是破门而入。

真相大白。天子业已驾崩了，宫人内侍环绕左右，都在默默地流泪。王宗实大叫：“好啊你个王归长！竟敢矫诏谋逆！”

归长三人见到王宗实闯进时，就已经是魂飞魄散。事情一败露，他们哪里能斗过神策中尉，更何况右中尉王茂玄又不在当场。三人吓得“扑通”跪倒，爬过来抱住宗实的双腿，连呼“中尉饶命”。宗实一脚一个，踢翻三人，胸中犹是怒火万丈。

宣徽北院使齐元简立刻就被宗实秘密地派到十六宅，去干什么事，却没人知道。九日，禁署突然宣布：宣宗长子“郓王”立为皇太子，改名“漼”，权勾当军国事；处斩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三人。当日，发布遗诏，以令狐绹为冢宰。十日，郓王即位，是为“懿宗”。王宗实同日升衔“骠骑上将军”。这几天的变化太突然了，尤其是所谓的“郓王”，更让人迷惑不已。朝官都知道先帝是有不少皇子，但大多数都住在宫里，由师傅教习读书，似乎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十六宅有这么一位居然还是嫡长的“郓王”存在。疑惑之下，有不少人竟然忘了在拥戴表上签署上自己的姓名，其中就包括几位当朝宰相。

毋庸多说，过去的一切又都重新开始。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人既死，大盗亦不止。

这一轮红日，已经摇摇欲坠，无可挽回了。

第七章
崩溃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

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

——聂夷中

新帝的秘密

天子昏庸无道，朝士各有算计，而宦官势力一天天坐大，所有矛盾重新开始了斗争，这一次将足以致命。

帝国的第二十位天子懿宗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急变中就被推上了帝位，这一次新旧交替有一点与前几朝大不相同，那就是在新帝已经登基后，还始终有一团阴云笼罩在人们心头。

先帝宣宗未立皇后，所以实际上诸子并无嫡庶之分，只有长幼之别。夔王是宣宗的第三子，这是大家都已知道的事实，而且包括夔王在内有五位王子一直住在内宫，也是先帝在位时有过明示的，不过，其长幼就不太清楚。“郓王”既是先帝的长子，为何单在宗族诸王杂居的“十六宅”居住？先帝又为什么从未提起？册命郓王为皇太子的那天，禁中宦官特地出示了一篇由翰林学士萧置撰写的铭辞，根据这篇据说是由先帝嘱撰的铭文，郓王乃已故昭容晁氏所生，与先帝宠爱的万寿公主同为一母。但是，这种铭辞照例是不详载出生年月的，因此并不能解决问题。

从相貌上看，这位郓王的年纪是要大一点。可是，十六宅年长的诸王多得很，凭此就能入继大宝吗？大家不敢再往下想了。

帝国的现实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确实已是无话可说。这个天大的秘密也许只有王宗实和新帝自己肚子里清楚。但不管事实的真相如何，新帝是从十六宅而不是由东宫产生的。想当年，没有仇士良就没有了文宗，今天也一样，宣宗死时若没有了王宗实，懿宗也就不可能登上帝位。这就意味着，又有人反奴为主，成为天子的主宰者。

宣宗死后的第二年，公元860年，新帝改元“咸通”，是为咸通元年。从去年十二月份开始，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百多年来相对安稳的南方浙东一带，竟然爆发了一起贼人的造反，而且声势甚为浩大。因为这个缘故，朝廷不得不将全部精力都转向平乱，所以新帝登基伊

始的十几个月里，朝政倒显得十分的平静。可是叛乱一旦被平息后，事情就不可避免。

这时，令狐绹已经退出了政治中枢的舞台。他为相的时间太长了，或多或少地要得罪些人，宣宗在位时大家还不敢说，新君一即位，便有不少人竟攻其短。先帝驾崩几个月后，令狐绹就被罢相出镇河中。本来，白敏中是有望重新执政的，在同一时期从荆南节度使任上被召回入相。但有一件意外的事打消了他的念头。

那是咸通元年的二月二十五日，敏中在上朝时不小心跌了一跤，从台阶上重重摔下，腰受了重伤，四五个月都卧床不起，无奈只得上表辞职。新帝起初不许，但经不住因首席宰相空缺而造成的尴尬，下诏同意。于是毕诚、杜悰二人先后入相，连同去年任命的杜审权及留任的蒋伸，共同主持政务。

咸通二年（公元861年）二月的一天，两位新任枢密使突然来到政事堂所在地“中书门下省”。

四相与其叙礼已毕，分列而坐。因不知来者何意，一时也不好说话。

还是左枢密先打破了沉默：“禁中或有拟议，将同宰相会商。”

四相相顾茫然。

果然，过了一会儿，门吏便报：宣徽院使杨公卿到。

宣徽院是宫中内诸司使的总管部门，分为南、北二院，下设二十四内司，负责行使天子的各种具体差遣。由于掌握授受大权，其地位有时也与枢密院不相上下。不过，此时的杨公卿与左右枢密使一前一后来到，显然是商量好的。

诸人起身迎接，不料杨公卿看了看四位宰相，却单单向杜悰作了一揖，道：“请杜公受宣。”这话的意思，就是要其他人回避了。

两枢密似乎早有准备，从容退下。杜审权、蒋伸、毕诚却是一片惶恐，手忙脚乱地避入西面的一个小厢房中。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心里不住地打鼓。

杨公卿见众人已走，便从怀里掏出一函密封的文书，打开来递给杜悰。杜悰一看，原来是先帝宣宗大渐时，朝官请求郓王——现在的皇上——监国的奏疏。杨公卿道：“当时没有在上面署名的宰相，皆当以谋反之罪论处！”谋反，是帝国刑法的第一大罪，按律是要处以极刑的。

原来如此！杜悰这才明白为什么单独与自已商议的原因，那时他犹非宰相，正巧身处事外。不过，饶是杜悰事不关己，但听了宣徽使这话，也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作为朝官，易代之时立场犹豫，这确实是件糟糕的事情，新帝即位后惩处异心之人，照理也不能算错。可事情毕竟过去一年多了，单因未署名拥立就要以“反罪”处理国家宰辅，这确实太严重了。

杜悰看着这封当时的奏疏，说不出话来。也是，虽然他并不是涉嫌者，但此刻人家却要借他的刀去杀人，杜悰再不怎么样，这种事又哪里肯做？

杨公卿的眼神始终逼视着他。杜悰没有抬头都能感受到这股威严的目光，心想：是不是又到了一个无法讲道理的时候了？

杜悰就是那个杨嗣复一手提拔，并在会昌时期临事不慌救了他恩人一命的人，到底不愧见过大世面，将手中的东西反复读了四五遍，又沉思良久，终于开口说话：

“圣主登基，万方欣戴。”这开宗明义的一句，已有意要把杨公卿堵回去，“值此欢欣新朝伊始之时，如此文书，就不是我等臣子所应看的了。”说着，杜悰郑重其事地把文书又重新封好，递还给杨公卿，又道：“主上即使欲罪宰相，亦当在延英殿面示圣旨，明行诛谴。”这话的意思是：你宣徽、枢密两院与我本人似乎都没有权力决定此事。杜悰轻描淡写地就把自己的干系推卸得一干二净。

默许就意味着赞成。杨公卿本也就没指望杜悰能主动参与，遂不再说话，收回文书就告辞而去。

既把自身脱离事外，杜悰就显得从容多了，马上找来候在偏房的两枢密使，显得十分推心置腹地道：

“内外之臣，事犹一体，宰相、枢密共参国政，本不分彼此。”杜悰先要大套感情，所以话说得很漂亮，两枢密一听，也不禁连连点头。杜悰一见得计，立即趁热打铁祭起攻心之术：“今圣上新践祚，固当以仁爱为先，岂可立即就杀宰相？若圣上养成滥刑之性，则中尉、枢密等权重禁闱，能无自忧？”

两个枢密使默然相顾，心道：此话不无道理！右枢密想了一想，慢腾腾地说：“仆等将把相公之言转禀……圣上。……若非相公提醒，我等倒真没想到这一点。”这后半句还真是一句大实话。说完，两人起身致礼，告退而去。

西厢的三宰相见人离去，赶紧出来问杜悰是怎么回事。杜悰正吁出一口长气，哪里说得出话。这下把三人吓得不轻，蒋伸眼看着眼泪都要下来了。杜悰赶紧道：“诸堂老不用担心，料无大事。”果然正如杜悰所说，接下来的几天很平静，什么动静也没有。皇上在延英殿召见宰相时，神情怡然，好像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事发生过。

杜悰谈笑之间就为朝官们消弭了一场大难，或许并非是一件好事。他把这个盖子捂得了一时，却捂不了永远。这个矛盾总是要再次爆发的，不谈其他宿怨，就以先帝宣宗时期而言，这两方面就已经是干柴烈火，只待一丝引信了。

当时宣宗太犹豫，以至于酝酿过久，使得消息有所泄露。由此“南司”、“北司”之间，就有点剑拔弩张的味道，只是有圣明天子在上，北司的宦官们一时找不到借口而已。懿宗即位后，双方依旧继续着这种对峙局面，但宦官方面的势力已在一天天增强，看来目前的平衡不可能保持多久，这次事件就是一个严重的信号。

宣宗以超绝的智谋掩盖了一切，但这只是现实的成功，而非历史的胜利。他对后事草率的处理甚至成为一个契机，使得压抑已久的宦官有了机会解决自身的分裂，重新获得了高度的统一，恢复了以往强大的力量。矛与盾再一次开始斗争，它的激烈程度便一定是过去所有的冲突所不能比拟的，这一次将彻底致命。

所有的崩溃，都是从内部开始的。

懿宗一下子就捞着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东西，这恐怕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王宗实选择这样的嗣君，当然有他的理由。至少，王宗实不会希望龙椅之上，再坐上一位让他们时时都要出冷汗的天子。新一代天子确实没有让他失望。

皇上好音乐、好宴游，殿前时时供奉的乐工，接近五百多人；每月之中，有十天要举行宴会。也许是皇上年轻而精力旺盛的缘故，听乐，观戏，饮酒作乐，从无厌倦之态。出驾巡游，随意所之，几乎是踏遍了长安的四郊。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每次巡幸，随驾的内外诸司扈从，竟达十余万人！耗费的财物，实在无法计算。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朝大臣的道德信念江河日下。

这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宦官的坚固势力是个强有力的威慑力量，而天子的荒淫又助纣为虐，若非胆略过人，绝无可能做到信仰坚定，更毋庸说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了。时势造人，斯言不虚——激昂的时代造就英雄和枭杰，而一个醉生梦死的末世所产生的，则必然是庸懦、胆怯、自私自利的小人。

无论是身出于名门或是拔起于寒微之士，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进士的声名和浮浪的生活，本朝原先所固有的那种自由而不拘执碍的风气，成了他们追逐声色犬马的最好理由。就是时下流行的乐曲诗歌，也大多都是些凄婉轻艳的内容，再也无复那种清丽俊逸、慷慨悲凉的风格了。

更为可怕的是，朝官与宦官的对立越来越成为一种纯粹的权力斗争，双方都以个人利益取代了公理的是非。早年宫廷内外争斗虽然也十分激烈，但大多数传统的官僚仍是把国家利益和道德伦理放在第一位，从维护皇权和政事权这个角度来攻击宦官把持朝政而形成的种种弊端。所以从陆贽、王叔文到裴度、李绅、李德裕等人，都只是就事论事，而从未把自身与宦官完全处理成两种利益集团。他们也许早就有这样一个清醒的认识：宦官作为天子的家奴，是一种既成的事实，似乎不应该把家奴的存在与反奴为主的现实完全等同起来。因此，早先朝士与宦官的斗争一直都是围绕着天子进行的，只要天子能够成功地限制住家奴的权力，一切都将迎刃而解。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宦官既是一个存在的阶层，他们就没有理由不为自己争取“公平”的权利。他们出身卑贱，没有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更没有理念的束缚，因此除了攫取权势之外，不可能去做其它事。天子左右操纵和维持平衡的做法给了他们机会，同时也就使正统朝官采取的道德手段无法取得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是文宗把这事情扩大化了，他开始想要连锅端起。不过，文宗还是从皇权和社稷的角度去做这件事的，并不是单凭自己的爱憎。但他所用的两个人李训与郑注则并非如此，他们的手段就已经开始显露出很大的私心成分。所以，从甘露事变起，朝士与宦官逐渐形成互相对立的集团，天子和士大夫们本身也有很大的责任。

李德裕把局面稍稍地缓和了一下，却未能抵消后来宣宗所采取高压政策而引起的尖锐情绪。到了懿宗朝，朝官们已经完全忘记了这场斗争的初衷，他们开始有了这样一种信念：宦官是他们天生的敌人，更是自己求取高位权势以及个人利益的最大障碍。于是，道德上的惩恶扬善变成了政治上的快意恩仇。

这种局面出现得相当早，而且是由朝士们首先挑起的。

大约就在咸通二年（公元861年）二月，杜悰刚刚纾解了一场严重冲突的预谋之后不久，有人就把这个情况透露了出去，结果便引起了几乎是全体士大夫的强烈不满。从此，一种一致对外的凝聚力和复仇心理油然而生。

正好在这个月，建州有一位来京会试的举子叶京一举登第。中了进士，自然都很兴高采烈，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叶京也未能免俗。一个月里，日日与同年们游宴集聚，日子过得很快活。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了一位他以前在一位宣武军节度使宴会上认识的宦官。叶京一看是认识之人，又是曾做过宣武军监军的高品宦官，按礼数当是应该致意的，于是想也未想，便在马上恭敬地作揖施礼。这一切正好被同游者看到，一下子就传遍了朝野。

朝士大哗。叶京从受人尊敬的新进士一下子便成为了千夫所指的无行之徒，百口难辩，狼狈不堪，最终都没得到一点的同情，以至于

终生沉沦。

真是人心叵测。如果是为了天子和帝国的利益，这些士大夫们似乎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齐心协力过，可一旦从个人得失出发，却不知为何，突然就变得如此坚定不移。可见自诩为恪守信仰的精英分子，其行为处事往往并不像他们自己说得那样好听。

这些人由愤懑而生仇恨也是情理所致，到了懿宗中后期时，宦官的势力业已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南北司之间，南司只有无奈不平的分，而北司却断没有需要抱怨的事。宦官们只是在等待着机会，一举而成为至高的主宰，只是眼下变乱太多，实在是难以质变而已。另外，朝官们即使心念如一，但也不是铁石一块，至少几位宰相就很会在夹缝中生存，为自己捞好处。百官之首的宰相既然都有这样的心理，其他人的压抑情绪就更无处宣泄了。

杜悰实际上还不失忠厚，最有代表性的其实是后来的杨收、路岩、韦保衡三人。

杨收的入相是左军中尉杨玄价左右的结果，因为两人是较为亲近的同宗。在王宗实之后，最有权威的便是杨玄价，他把杨收这位原本就受到不少当朝宰辅所器重的人擢升要职，并非是什么难事。杨收有这种渊源关系，也就决定了他只有在夹缝中走他自己的路。但他的两面三刀做得很不高明，只顾自己靡华享乐，既引起一些前辈朝臣的不满，又因无法完全站到宦官一边，最终被杨玄价拉下了马。

路岩是懿宗朝最年轻的宰相，在位的时间也最长，一共有六年。路岩于咸通五年（公元864年）入相时年方三十六岁，年少得志，又借着天子昏聩，不免得意忘形。同杨收一样，他也是一个好权好财之辈，在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杨收，根本谈不上有所作为。最后因与韦保衡争权夺利，而被排挤出朝。

路岩很擅长拉帮结派、树植党羽，手下很有一班子人。咸通十二年（公元871年）正月罢相出任西川时，刚在朝会上领受诏制，便就在殿前寻找代理京兆尹的薛能。路岩知道自己积怨不少，生怕出城时人人喊打，薛能这人是他以前提拔过的，路岩想请他帮帮忙。

薛能听罢来意，抱着象笏朝着路岩一揖，慢条斯理地说：“抱歉。宰相出朝，府司一向都没有派人保护的先例。”

路岩想不到碰了这么个钉子，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怏怏而退。果然在长安大道上，路岩被四面而来的瓦砾砸了个不亦乐乎。这时他倒反而泰然自若起来，花开蝶满枝，树倒猢狲散，自己早先没能想到这个结果，又怨谁呢！

韦保衡是当朝驸马，咸通十年（公元869年）懿宗爱女同昌公主下嫁他时，场面极为豪华，皇上倾宫中宝物以为资送，不仅赐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宅第，还特赏钱五百万缗。不到一年，韦保衡就做到了宰相。皇亲国戚如此快地就成为国家宰辅，也是近几十年来所没有的。

这种人自然被人看不起。杨收、路岩就很鄙薄这位驸马的为人，在中书门下共事时，都对他没有好脸色。但韦保衡更不能容忍他们。保衡自恃恩顾，对素不相悦者一向是毫不留情，甚至连自己的业师和同门都不放过，对杨、路二人，韦保衡当然也要报复。结果两人先后罢职出朝，杨收后来还在他的穷追不舍中丢掉了性命。

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八月，同昌公主突然得病故亡，皇上悲痛不已，一气之下杀掉了二十多位御医，并还逮捕了三百多位御医们的家属，欲连坐治罪。宰相之一的刘瞻实在看不下去，连忙召集谏官，请他们上奏谏劝。可是，众谏官无一敢去，刘瞻一咬牙，亲自上疏，请求懿宗宽恕家属，天子览表不悦。可刘瞻不省事，又联同京兆尹温璋再次在朝会上力谏，结果天子勃然大怒，当场叫人把他们轰出殿去。

第二天，刘瞻被罢相出朝，温璋被贬为振州司马。诏旨下后，温璋长叹：

“生不逢时，死何足惜！”当夜服毒自尽。

这一句话，或许就是崩溃时代的最好注脚了。

经济彻底被摧毁

宣宗以后，帝国的经济基础就已经丧失。民不聊生，则揭竿而起。

懿宗在位的时间不算短，单以朝间而言，大的冲突倒也没有发生。这也许是因为外患过多的缘故，而使得内部的矛盾无暇充分暴露。皇上在他垂拱的十四年里，糊里糊涂地行事，糊里糊涂地用人，奢侈豪靡，荒淫无道，竟然还就比他名义上的父亲、智深谋广的宣宗皇帝多做了一年的天子。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七月十六日，皇上病重不省人事，这一次轮到的是左右中尉刘行深、韩文约。在如此方便的情形下，两人当然也就做得更绝，神不知鬼不觉中，懿宗的四个年纪稍长的皇子就丢掉了脑袋。他们所立的天子，也就是后来庙号为“僖宗”的本朝第二十一任皇帝，即位之时，年仅十二岁！在本朝历史上，那可就是破天荒的了。

十二岁的皇上懂得什么？他只知道与自己曾同卧同起的奴仆田令孜是个可信可靠的人。在皇上年幼的心里，已故的父皇似乎并不像自己的父亲，哪有这位和蔼的长者来得亲切！皇上甚至已经早把他当作是自己的父亲，即位之后，也直称“阿父”。宦官小马坊使田令孜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一跃而成皇帝之“父”、天子的天子。

刘行深、韩文约这两个出头之鸟结果弄得个灰头土脸，在田令孜的挤压下，被先后勒令退休，很不情愿地把中尉之职让了出去。田令孜和另外一位宦官西门匡范顺理成章地成为左右中尉。从这时开始，人们便直呼左右神策为“东军”、“西军”，因为决定性的禁军力量就只有这两支，再称呼本名不仅麻烦，而且实在也是多余。

顽童天子僖宗喜欢斗鸡、跑马，也许只有在这一点还能体现出其祖辈尚武豪迈的秉性，其他实在是不足道，也不可能有所道了。田令孜既为其“父”，又何须把这小小的劣童放在眼里，从公元874年——这一年新帝改元后的年号为“乾符”——开始，真正的天子便不姓李了。

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积患已久的事情终于不免。在咸通时期的无数纷乱后，两位盐贩王仙芝、黄巢在关东道领导了一次武装变乱，官军数剿不绝，数年之间，竟成燎原之势。公元880年——这年僖宗又改元“广明”——十二月，自称“冲天大将军”、“天补大将军”的

黄巢率几十万大军打进了长安，僖宗在田令孜的护卫下仓皇出逃，一直跑到了剑南的成都。这是本朝历史上第三次皇驾播迁了，也是最长的一次，皇帝在外共颠沛流离了数年之久，才回到长安。

在成都的流亡朝廷，依旧是田令孜的天下。田氏时任“都指挥处置使”，大权在握，并未因艰难的动乱而减轻恣意妄为的程度。本来，天子有难，就应该推恩及人，广施恩泽，以唤起各方勤王靖难的忠心而挽回败局，可田令孜没有这样的抱负，他只知道维持自己的生存，其他的一概不论。

当时的物质已极度匮乏，但四方所贡来的有限的金帛，却全部被令孜用来颁赐随驾军队，四川的地方部队除了开始每人赏赐三缗以外，再无所得。一位地方军将郭琪出于愤怒，起兵哗变。仓猝之中，皇上只与宦官们闭门自保，根本就不考虑外臣的死活。不少朝官们幸脱沦陷，含辛茹苦地来到了这里，眼见这一情形，那一腔委屈实在是难以按捺。

郭琪事变平息后，谏官左拾遗孟昭图忍不住上疏宣吐情绪：

“多难之时，中外之臣尤须一体对待。去岁车驾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仆射以下尽遭杀戮，独独北司无损。此次变乱，陛下只与令孜等内臣闭城登楼，不召宰相朝臣入城；翌日，又不见宰相、不慰朝臣……”孟昭图最后难以控制，又在疏中写道：

“天下是高祖、太宗打下的天下，不是北司的天下；天子是四海九州的天子，不是北司的天子。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未必尽无用，难道天子与宰相已无关系？而朝臣竟成路人？”

孟昭图尽管完全是出于委屈，不过他的话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他的祖辈们要是听到他的这番言语，怕真是再也不敢相信的。

如今的情形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笔说不清道不白的糊涂账。不过，尽管世事如麻，总还是能找到一丝入手的线头的。

经济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政治的腐败必然导致经济的衰落，经济一旦被摧毁，天下百姓也就失去了甘愿成为“百姓”的理由，于是草泽之雄揭竿而起，就不仅是符合道义的，也是无人所能抗拒的。

非止本朝而已，堂堂华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家，最高的家长便是皇帝，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政治上说，百官是天子家臣，百姓则是天子子孙，皇帝也就等于国家，因而从经济上说，“国计”便永远位于“民生”之前，亦即所谓“富国”才能“安民”，“富国”总是第一位的，经济的好坏，全看朝廷的财政收入如何。当然，敛之必须有道，最高的理想就是“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本来这实在是难以做到的事，但本朝起初的一百五十年，竟然真就达到过这个理想。不过这是过去的事了，与纷乱的政治现实相始终，帝国的经济衰败也将近有百年之久。在这期间，历代朝廷所能做的努力，也仅仅就是完善搜括的方法，为天子的存在竭泽而渔而已。天下无甚贵甚贱的局面早就已经成为甜蜜的追忆。

实际上，九世纪中以刘晏为代表的理财能手之所以能获得一些成功，完全是因为有南方可以依靠。安史之乱后，帝国的北方一再受到严重的摧残，而南方经过逐渐的开发，迅速显示出比北方高出不少的经济水平，加之战乱较少，便得以长期维持。从德宗时开始，南方的财赋通过漕运，源源不断地供给北方的中央政府，才使帝国的大家庭不至于毁灭。可假如南方经济也不能幸免于难的话，即使家庭的合心力再大，也阻挡不了彻底的分崩瓦解。

事情出在懿宗时期。

从天子到宰相，无不唯货是崇，假刑杀以立威，而索财货于诸道，诸道又索之州县，于是州县只有大索天下之穷民。天子的淫靡和朝政的腐败，最终导致横征暴敛，这就是“敛之无道”了。没有人能够被无休无止地索取，就是富庶的南方，也不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一句话，天下虽然是皇帝的天下，但国家的基础仍是四海的百姓，天子既然不把他的子孙当作子孙，那么子孙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奉养这个一家之主了。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到咸通元年（公元860年）的那次浙东“贼匪”造反，明显就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但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懿宗时还有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对南诏进行了数年的战争，这场耗资无算的战事把宣宗刚刚建立的一些良性循环丧失殆尽，特别是给了南方以沉重的压力，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八百名戍守岭南的徐州守卒不满超期服役，拥立粮料判官

庞勋为都将，擅自北还。这些人回到徐州后，为免朝廷追究，干脆又推戴庞勋为节度使，想逼迫朝廷承认既成事实。

南方戍军的暴动已经不止一次了，宣宗晚期的几次事件就使得朝廷很狼狈，因为帝国在这一带一直不设重兵，一旦发生骚乱就必须从北方征调部队。这事是很微妙的，想当初，北方的割据似乎也就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所以几朝以来，从天子到朝廷，对南方总是持着一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就这次庞勋事件而言，朝廷也不想一下把事态闹大，准备先行安抚，再徐行镇压。可偏偏就有一些欺软怕硬的人不省事，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原是这批叛卒的主帅，这个人为人严苛，不能容忍在自己手中出这种事，首先主动发兵出击，于这年的十月与庞勋接战，于是又酿成了一场持续近一年的战事。

这次兵变最后发展成为不单单是由戍卒参与的大规模的动乱，因为有不少被逼得毫无活路的农民、四方的流匪甚至一些地方士绅也加入了这支队伍。帝国历史上，从来都是由割据一方的骄兵悍将发动战乱，从来也没有像这样的事情发生过。这再次说明百姓的生计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以至于出现为历来传统儒士所深恶痛绝的“盗贼”蜂起的现象。这是典型的乱世象征。

战事延及十余州，覆盖了江、淮之间的大部分地区。尽管一年以后战乱结束，但各地继起的小规模纷乱依然不免，这一切又反过来再一次摧毁了帝国本就已经相当脆弱的社会经济。从关东一直到江淮，甚至江淮之南的地区，民众的生计也开始接近了崩溃的边缘。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正月，翰林学士卢携在一封奏疏中特别指出了关东地区的严重情形。根据这份报告，去年自虢州到海州的广大范围内遭受了一次旱灾，给本就连年不稔的情况雪上加霜；可是州县催逼徭税，却未曾少息，百姓虽拆屋伐木，卖妻鬻子，亦难能供奉府库。卢携最后在疏中委婉地对天子说：

“朝廷倘不抚存，百姓就实无生计了。”

这话实在是用不着他来说，说了也没用。这年的十二月，大战之后的徐州又传来消息：“群盗寇掠？州县不能禁。”这自然也是百姓无

以为生，入山为盗的结果。在黄河尤其是长江以南的地方，因为没有强大的割据势力，所以没有可能以“地方——中央”的对抗来表示不满，众多的百姓便往往采用这种方式发动革命。他们之中开始还多是一些亡命之徒，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啸聚山林，打家劫舍。但他们不久后就发现，这也许就是一种解决生存问题的最好方式，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这条道路，团伙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当这种事情在整个帝国普遍开花时，这些人就不单单是“流寇”而已了。

祸不单行。关东在大旱之后，又逢水患，随之又带来了严重的蝗灾，黄河下游的农民首先被推到了绝境。就在此时，两位不平凡的人物王仙芝、黄巢先后在长垣、冤句两地聚众揭竿而起，奏响了帝国崩溃的序曲。

黄巢起事

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最后是黄巢成为这一场空前暴动的领袖。这个人出身于盐商之家，居然也曾经到长安去考过进士，但却是屡举不第。作为商人的后代，他如果不能博取功名，就注定不能有所作为，黄巢的科场失意决定了他今后的道路。黄巢是曹州冤句人，那一带是私盐贩卖的重要集散地，他年轻的时候，就曾与王仙芝以贩私盐为事。两位盐贩出身的人发动了这次不平则鸣的反抗，说起来倒也并非偶然。

本朝同以往一样，一向也采取“重农轻商”的策略，这是因为产业不发达，自然就不会产生政治以外的势力，只要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统一和稳定也就不会受到破坏。可这种人为的压制代替不了物质发展的必然，无论历代政府坚持怎样的信条，都不能避免对有利可图产业的日益依赖。只要存在着国家对产业的干预，对贸易和城市税的征收，也就使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与商业开始发生紧密的联系。所以，农民以外，城市市民也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阶层而对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仙芝和黄巢或许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黄巢在朝廷和各种势力的夹击下采取了一条飘忽不定的运动战略，如行云流水一般，席卷了整个帝国的半壁江山。黄巢本人其实并不是因为意识到东南地区对中央的重要而向南方进攻的，像大多数农民革命一样，他们一开始的目标仍是打进长安，杀向龙庭，这是其辈斗争热情的根本源泉。是朝廷阻止他们北进的顽强抵抗造成了黄巢向南方的发展，他在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渡过长江进入浙西，又翻越崇山峻岭跨入福建，最后横扫岭南，打下了广州。黄巢成功地占据了富庶的南方使得他与帝国中央形成了南北对抗的态势，转战四方又使这支农民革命的武装空前壮大，尽管朝廷在长江一带设立了最后防线，但已经无法抗拒这一业已燎原的全国性动乱。终于，僖宗广明二年（公元881年）十二月初五，黄巢打进了长安。

黄巢农民军无意识地在经济和政治上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黄巢占领了东都附近的汝州，号称“天补大将军”，同时传檄诸路官军：不日进攻洛阳，并将杀向京都。二十四日，消息传到京城，僖宗在延英殿对着宰相们泪如雨下。

田令孜奏：“请发左右神策军弓弩手守潼关。”潼关是护卫京城的最后一道屏障。

皇上感叹：“侍卫将士不习征战，哪里有用！”

难怪天子悲哀。当年安禄山五万之兵进犯长安，大将哥舒翰领兵十五万都未能守得住潼关，此番黄巢号称有六十万之众，区区一个潼关之险，又如何能当得起事！无论僖宗再怎么顽劣不化，这点道理还是懂的。

在军事上，朝廷和各路地方武装并没有犯什么重大错误，他们的封堵战略十分成功。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镇海节度使高骈首先把黄巢的锋芒逼住，迫使其转向浙江并南下福建、岭南。当黄巢从桂州沿湘江北上时，在荆门又为襄阳节度使刘巨容和江西招讨使曹全重创，不得不取消直取中原的计划，改道东进。朝廷也不是不想保住淮

南和南方的几个重要的财赋重镇，一直采取各种方法不让黄巢进占扬州和广州。可是，中央政权的安危和天子的地位始终是第一位的，在两难的情况下，只有先保住哪怕是观念上的政权再说，所以要坚守江淮防线，就只能让黄巢横扫南方，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其实，任何一种政权都不得不如此作为，尽管这是再愚蠢不过的短期行为了。朝廷在军事策略上既没有严重的失误，那么，局面弄到这一步，完全是原则上的问题。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七月，黄巢终于在采石渡过长江，进围扬州。沿江防线的最主要干将淮南节度使高骈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弃了抵抗，坚城不出。九月，黄巢乘胜渡淮，直指东都，帝国的军事行动彻底失败。高骈出身禁军世家，早年在西南一带任职，曾大破南诏的入侵。乾符四年（公元877年）调到江南后，最初在征讨王仙芝部众时成绩显著，他也是后来执行朝廷围堵方针，迫使黄巢南窜岭南的最主要功臣。这样一个朝廷寄予了莫大厚望的人，关键时刻竟然不敢应战，说起来是大有原因的。

表面看来好像是高骈心有怨气。原来，在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三月，由宰相卢携的保举，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负责堵截黄巢。上任之后，高骈传檄四方，募得淮南与诸道兵马近七万人，声威大振，一时屡挫农民军。就在此时，黄巢使了一个缓兵之计，上表请降。高骈以为黄巢坚持不了多久，此时此刻岂能让外人分功，于是便遣散了各地军马。这样一来，让黄巢得计，五月，大破高骈之众，阵前斩杀高骈大将张璘，乘胜渡江攻占天长、六合等县。高骈上表告急，朝廷下诏，严责其遣散诸道兵之不当，惹得高骈一气之下，称病不战。但这只是其然而不是其所以然。

经济的崩溃和吏治的败坏，使得帝国中央的实力再也不像从前了。由于官军的寡弱，所以平乱剿贼不仅必须征募兵士，尚须大力依赖地方自卫武装。而天子和帝国的威望大跌，先前的那种勤王扶政的正统观念在人们心中越来越淡薄，天子登高一呼，四方之师云集的局面尽管存在，可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崛起的藩镇大多出身于盗寇和地方军将，其地方割据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因而在国家危难时期对皇室的忠实程度上便有很大的折扣，即使如高骈这些官宦出身之辈，在

这种分崩离析的关头，也免不了心怀异志，更遑论那些地方军将和割据藩镇了。要靠此辈完成匡复国家的重任，那实在是要打上一个问号。

高骈手下的一位谋士说得好：

“相公勋业已高，妖贼未殄，朝廷已有闲言。贼若荡平，相公威望盖主，则又如何处之？为相公良计，莫如临岸观火，自求多福。”

这根本就是为不忠不孝开脱的一句漂亮话。高骈何尝不知道作为拥据一方的藩镇首领，即使“功高盖主”，天子又何以处置？更何况现在的情形，又绝非是“兔死狗烹”的时代，他又哪里来的这个担心！所以高骈放弃抵抗，实实在在是出于私心。一年后两京沦陷，高骈尚欲兼并两浙，以成当年孙策三分天下之计，就是最好的证明。

高骈放弃抵抗，使引颈南望的天子和满朝文武一片哀叹。中央政权本身已经多少年没有起过扭转乾坤的作用了，眼下更是无所措手。别看田令孜信誓旦旦地要守潼关，其实他早就准备西逃蜀中。作为实握大权的宦官，他从来也不会选择玉石俱焚的道路，只要保住了天子，也就保住了自己的权益，这一点，连皇上本人都不无感觉。所以，皇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下令在潼关作最后一战，不然，天子的颜面又置于何地？但是，靠京中的那些由富家子弟组成的神策禁军，潼关哪里守得住？

十二月初二，黄巢攻克潼关，初五，进占长安。十万大军入城之时，长安居民夹道观看。人心的离失，是为政者最大的失败，当僖宗仅在田令孜五百神策兵护卫下从金光门狼狈出逃时，恐怕是很难想到这一点的。

官吏的无能就是政治的无能。

僖宗自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七月即位到现在，前后有刘瞻、崔彦昭、郑畋、卢携、王铎、豆卢瑑、崔沆、郑从谠等人入相。其中，刘瞻早死，崔彦昭不日离任，在朝中主掌政务，并还能做点事情的主要就是郑畋、卢携、王铎和豆卢瑑四人。然而这四位宰相，在对待黄巢的态度上，分歧相当严重。

郑畋主抚，卢携主剿。王铎虽也是主战派，并已于前一年兼任荆南节度使及诸道行营兵马都统，负责长江中游防御，但卢携与他有矛盾，力主以高骈取而代之。豆卢瑑在后来则主张避让，是附和田令孜西逃蜀中的大臣之一。郑、卢二人曾发生过激烈的争执，时间是在乾符六年（公元779年）五月黄巢占据安南都护府后。

郑畋对僖宗说：“巢贼之乱，本因岁饥。而国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战。所在节将，又都闭门自守，不能抵御。”郑畋既是大族出身，又进士及第，也是经过磨难才入居高位的。从这句话上可以看出他还不失传统的理念，尚能够保持正确分析的能力。他的建议是“不如释咎包容，权降恩泽。其辈本因饥年利合，一遇岁丰，自然分崩离析。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郑畋真是个明白人。

卢携不同意。他这时自恃手上有在浙西屡败黄巢，并成功地将其赶往岭南的高骈，他当然要立一个奇功。卢携道：“高骈将略无双，淮土兵甲甚锐，”要知道，吹捧自己提拔的人，也就是在宣扬自己本身，“蕞尔纤寇，不足为虑。岂可对敌示怯而使四方诸军解体！”卢携话说得如此大，皇上当然听了舒服。

郑畋对地方大镇向不抱幻想，尤其对高骈这个处处考虑自身利益的人很有看法，他当然不能同意卢携的方针。郑畋在政事堂宰相会商草拟诏制时，忍不住讽刺卢携道：“高千里这个人迁延玩寇，其实无意灭贼。堂老靠他而用兵，吾辈当死无归宿了！”高骈字千里。

卢携听得大怒，忍不住拂衣而起。“咣当”，衣袖碰到砚台，墨汁沾了一身。他本碍着面子无法发作，见如此，便恨恨地抓起砚台摔在地上。

事情给僖宗知道了，皇上十分生气，“国家重臣相互诟骂，何以表仪天下！”下令罢二人宰相。两人以丧失仪范而罢相，这也是本朝前所未有的事情。

但是时局的发展不久便证明谁是谁非了。高骈果然不当大用，黄巢终于打进长安，使帝国处于存亡的边缘。卢携罢相后不久又被召用，黄巢打进潼关后，田令孜把失败的责任全推到了他的身上，卢携

在一片指责声中饮药自尽，王铎后来又取代了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在大势面前也是浑无作为。只有郑畋不失英雄本色，广明二年（公元881年）初，以凤翔节度使兼任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留守京畿抵抗黄巢。三月初三，郑畋即在凤翔大破黄巢大将林言、尚让、王璠所部。官军这一仗的胜利完全是因黄巢军的轻敌所致，黄巢手下的三将欺负郑畋是文人出身，以为他不会用兵，在进军过程中竟毫无戒备，既无行伍，复又鼓行而进，犯了兵家大忌，结果被郑畋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伤亡万计。可尽管如此，郑畋在危急关头能独立不屈，并有如此作为，实在也是很不简单。所以说，儒者之勇，往往不啻于百万雄师。

本来，直接覆灭这个奄奄一息帝国的机会，完全是属于黄巢的。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黄巢队伍，像历史上所有的朴素革命者一样，在取得暂时的胜利后，便暴露出它的致命弱点。与帝国失败的命运相同，黄巢根本的错误也是原则上的。

是自身的利益取代了一切。黄巢大将，也是主要军师的尚让在入城时曾对百姓说："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朝廷不恤汝辈。"然而进占长安后的所作所为，却没让这句话得到充分的兑现。从黄巢到普通士卒，各忙于称帝、封官、杀人、抢劫，被物质利诱冲昏了头脑。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现在还仍然是"盗寇"而已，眼下第一件要做的，就是"必也正名"，在政治和策略上倒转乾坤，让帝国昏庸的天子和流亡朝廷成为被谴责的对象，而一旦旧的统治者被抛弃，新的政权才能得到真正的成立。所谓不破不立，即此之谓。

即使退一万步说，也应该立即乘胜西进，在肉体上彻底消灭苟延残喘的旧政权，不给他们有丝毫振作的机会。这样，一切便都从容多了，至少可以争取时间来意识到上面所说的那个原则问题。说实话，每一位革命者也并不是事先都有一套完整方略的，他们只是能在实践中慢慢认识到而已。可黄巢和他的同志们都没能做到这一点，他们不是彻底的理想主义者，没有一种可以战胜欲望的崇高志向，所以，"入城"之日，便是其失败之始。

黄巢在具体的行动策略上也犯了许多错误，比如每到一地，都是

旋得旋弃，这在革命初期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是可取的，大规模的游击战略可以避敌锋芒，在各个击破中壮大自身力量。然而当势力强盛后再不考虑建立根据地，却是重大的失策。当年的安禄山和朱泚也都占领了长安，可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后方，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显得十分充分，因而即使名不正言不顺，也坚持了很多时间。黄巢转战半个中国，结果连这一点都未做到，最后以几十万大军困守长安，内无粮草之给，外无兵马之援，时间一长，众心分离，士气衰落，遂不免一败涂地。

在进占长安三年后，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四月，黄巢兵败东走。第二年六月十七日，黄巢退至泰山虎狼谷时，追兵已在身后。眼见不济，黄巢万念俱灰，嘱其甥林言动手，林言不忍，黄巢遂拔剑自刎。自乾符二年（公元875年）起事至今，前后正好十年。

这一场农民暴动是帝国深沉危机爆发的结果。黄巢虽然兵败自刎，其余部力量也随之分崩离析，但事物的内部矛盾是无法由此而得缓解的，显然，这一次已到了非彻底解决而不可的地步。一个政权的灭亡不外乎肇于三端：一是内忧，二是外患，三是自身政治的腐败。政治的败坏导致内忧，内忧则引发外患，而外患又通过二者激化矛盾，最终一同爆发，一起灭亡。此三端互为关联，缺一不可。不幸的是，这一切条件已经全部具备。黄巢的革命虽没能直接完成天降大任，却证明了无情的事实：帝国最后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了。

乱世出贼子

王道无存天下大乱之际，便是强盗流氓得志猖狂之时。

广明二年（公元881年）七月，流亡蜀中的僖宗改元“中和”。中和三年（公元883年）黄巢退出长安，一年后败死，又一年后僖宗再改元“光启”，这年正月，皇驾方从蜀中还京。这时，天子制命所及，只有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的数十州而已。十几个大镇包括一个黄巢起事时借入援之机占据了河东的少数民族沙陀的武装，自擅兵

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可以说，“王道”已荡然无存。

这时有两个人物必须提及，一位叫朱温，一位叫李克用。

朱温，宋州砀山人，幼时曾随其母在人家当佣工，是地道的劳苦出身。黄巢率军渡淮后，朱温参加了起事队伍，当时年仅二十多岁。这个人天资聪明，也颇为英勇善战，不久便成为黄巢军中的一位干将。往往越是出身于下层社会的人，其物质欲望和权力欲望就越为强烈，朱温的身上集中了流氓无产者所有的秉性，既有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优点，也有阴险凶虐、首鼠两端的劣性，这种人参与革命没有一丝一毫的理想成分，完全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因而，在自身目的不能达到的情况下，他就必然会改弦易辙，成为一个变节者。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正月，困守长安的农民军已经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处境时，黄巢任命朱温为同州刺史，却又叫他自取其地。还好，同州守将不战而走，朱温占据了同州。在黄巢军已开始军心涣散时，朱温多少算是尽了一点责。但从这时开始，朱温已经发觉黄巢并不是能使自己达到目标的人。

这年的二月以后，朱温受到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节节压迫，力不能支，屡向黄巢求援。黄巢此际已经是顾首难顾尾，根本无暇理会。这一来，就把朱温推给了对方。九月，朱温理所当然地以同州“归国”，投降了王重荣，并以舅礼视之。僖宗任命其为金吾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赐名“全忠”。从此，朱全忠便成为九世纪最后二十年的风云人物之一，谁也没能想到的是，正是在这位朱全忠手上，帝国结束了绵延三百多年的历史。

当然，这一切尚没有发生，朱全忠目前还算是一个小人物。可他却是由叛臣贼子而来的地方军镇的最好代表，其不可能“全忠”于朝廷的事实是不言自明的。

另外的一位李克用是沙陀人，说起他来，倒要多费一些工夫。

沙陀是突厥族的别部，本朝初年，其部散居于现在的天山一带。隋朝文帝时期，中国强大，突厥分裂为东、西二部，势力变弱。可到了隋炀帝后，中原纷乱，突厥则乘机而起，成为最严重的外患。本朝

太宗皇帝凭借渐趋强盛的国力，与其展开抗争，一举灭掉了东突厥。后来的高宗皇帝又消灭了西突厥，使突厥部落分化瓦解成若干个小部落，并慢慢地成为帝国的内附国。沙陀也是其中的一个。

古代的先知先圣们都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国是四海的中心，它有责任，有义务也有力量成为天下大家的庇护者，就如同一位严厉而慈祥的家长对待自己所有的孩子一样，不求报答地施予爱护，予以教导，赏善罚恶，让神圣的泽惠遍及四海。多少年来，发达而强大的中国都是这样做的，而本朝尤其突出，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原则和信念。

可是，如此博大的胸怀和气度需要非凡的正义感、责任心、坚韧不拔的忍耐力和强大的力量，更要具备无怨无悔的牺牲精神，本朝和古代的汉朝一样，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主要的就是耗费过度而疲弊百姓。而那些内附诸国，一时不能为先进的文化所感化，囿于自身的利益，往往横生事端。比如沙陀，在八世纪的公元789年，又倒附吐蕃，共同攻占了帝国的西北重镇——北庭都护府。后来吐蕃攻扰帝国边境，常常就是以沙陀军为前锋。

对这种情形，太宗皇帝早就有所感慨。本朝立国之初的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的十二月，葱岭以西的一个小国“康国”遣使长安请求内附，太宗即不肯接受。太宗皇帝对臣下道：

“接受康国内附，一旦彼有急难，中国即有不得不救之责任。师行万里，岂不疲劳！”

太宗在对外政策上，既有保持原则的一面，也有极为实际的一面。他的两位继承者高宗和玄宗就没有这种眼光，一味博取国家名义上的荣誉而忘掉了为民众谋取实利，结果使帝国的负担变得极为沉重。先有突厥后有吐蕃，相继在边境上为患，并乘着帝国的内乱和实力的衰弱，渐渐强大起来。就连九世纪上半叶被吐蕃压迫而不得不内附到盐州的沙陀残部，也慢慢地恢复了力量。到了宪宗和武宗时期，朝廷对几大藩镇开战时，沙陀军都出了大力。懿宗时，沙陀首领朱邪赤心率骑兵助剿庞勋有功，被赐名李国昌，又因防御回鹘而做到振武节度使。李国昌的儿子就是李克用，父子二人自咸通十三年（公元

872年）起开始不受朝命，屡在河东生事。朝廷派军与战，甚至借来吐谷浑、萨葛两部落兵合围，在遭受一系列败仗后，于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七月击败了李国昌。沙陀部众离溃，国昌父子二人率残部逃奔鞑靼部。也就在这一年，黄巢攻占了长安，这个契机改变了李克用的一生。

中和元年（公元881年）三月，在代北监军陈景思的建议下，朝廷下诏赦免李国昌父子，结果克用乘机率兵万人再犯河东太原，河东节度使郑从谠奋力抵抗，才使得克用南下的目标没能得逞。当朱温降唐，被授为右金吾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朱全忠时，李克用已占据了忻、代二州，并屡屡侵扰相临的并、汾数州。尽管克用一直累表请降，但并无归附的诚心，他在寻找着与朝廷讨价还价的砝码。负责防御沙陀的河东节度使郑从谠是当年的名相郑余庆之后，其时以宰相衔出镇河东。领命之后，从谠知人善任，明于治军，一时军威大振，太原一府被朝中称为“小朝廷”，享有极高的声望。从谠与强劲的克用所部在代州一线形成拉锯局面，相持不下。

克用别号“鸦儿”，当时年纪也只有二十多岁，冲锋陷阵，骁勇无比，沙陀军中称之为“飞虎子”。克用一目微眇，时人又谓之“独眼龙”，这只“龙”确实有着过人之处。他有着胡人尚武的天性，善于领兵征战，手下的沙陀兵善于骑射，战斗力极强。

十二月，身为首席宰相的王铎以高骈无心平叛，诣阙发愤请行。流亡的僖宗命其代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统率诸道兵马合攻黄巢。在朝廷诸军中，最主要的两支力量是河中留后王重荣率领的河中军和忠武监军并兼行营都监杨复光率领的陈、蔡军，这两人是使李克用最终成为乱世枭雄的始作俑者。

直接的原因是黄巢虽然被迫困守长安，但军势尚强，处在一线的王、杨二人都感到力不能支。这时，杨复光出了一个主意。

复光对愁眉苦脸的王重荣道：“代州的李克用勇猛无比，又拥有强兵，可为朝廷所用！”

这个提议很大胆，因为此时李克用的沙陀兵正给帝国的北方以很

大的压力，屡招不降，并且牵制了一部分朝廷兵力，多少算是一个大患。

复光知道王重荣的疑虑，他补充道："其实李克用也早有徇国之志，所以不听朝命，是因为与河东郑从谠有过节而已。若诚以朝旨晓谕郑公召之，克用必来，来则贼不足平矣！"

复光也是一个资格颇老的宦官，为人慷慨任气，颇善筹略，在黄巢起兵之初，就出为外镇监军，领兵作战中立有功劳。他和那些只知颐指气使的宦官监军不同，既善指挥，又善抚士卒，因此很有点名望。但是他此番提出的建议却多少有点出于私心，因为他的养父内常侍杨玄价早先曾经当过盐州监军，在招抚沙陀的过程中与李国昌有很大的交情，复光本人对此也并不讳言。既然对公对私都有利可图，复光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很正常的了。

王重荣称善，报与朝廷宣慰使王徽。王徽亦以为然。两人再报王铎，王铎同意了这个提议，遂以天子名义颁谕郑从谠召李克用领兵入援。王铎时为挂帅出征的首相、诸军都统，有这种便宜从事的权力。一个月不到，李克用即率一万七千沙陀、鞑靼兵入战。取道河东时，克用尚不敢从太原过境，只与数百骑在晋阳城下与郑从谠告别。从谠尽管无奈，但也顾全了大局，很客气地送走了这个老对手，还赠了他不少马匹器具。

李克用的参战大大改变了力量对比，对战局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十二月，克用兵渡过黄河，进据同州。第二年的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正月，败黄巢弟黄揆部于沙苑；二月，与河中、易定、忠武三军会合，在成店至梁田陂苦战一日，大败尚让十五万部众，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进围华州，逼近长安；三月，又与王重荣在零口再破黄巢军，拔华州；四月初四，再与诸军合趋长安，于渭桥击败反击的黄巢军；初八，李克用率先从光泰门打入长安。在围攻诸军中，克用功劳最大，五月，朝廷加赐"同平章事"之衔。

帝国灭亡的格局形成了：李克用是外族武装，朱全忠是归附叛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义武节度使王处存、邠宁节度使朱玫等则是拥有重兵的大镇，徐州的时溥、许州的周岌等人又是平乱过程中羽翼

渐趋丰满的地方军将，再加上东走的黄巢，在蔡州、洛阳一带闹事的秦宗权、诸葛爽皆非良善之辈，孱弱的朝廷何以处之！

更为麻烦的是，天下势既不再有九九归一回到中央政权领导下的必要，那么人人都可以取而代之。由此而来，这些势力之间便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在此时，朱全忠与李克用二人首先结下了怨仇。

挑起事端者是朱全忠。全忠此际虽被升为宣武节度使，但在击退黄巢收复长安的过程中并没有太大的功劳，因而自身的势力也很一般。这对于一个野心十足的人来说，无疑是最痛苦的事情，他当然不可能甘于现状。

中和三年（公元883年）黄巢退出长安后，仍然不失强劲，东部战场上的朱全忠、时溥、周岌等本非强旅，对抗中都感到有点窘迫，不得不再次求援于李克用。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二月，克用率五万人进援。五月，到达全忠部所在的汴州。李克用是当时实力最强的一支，对朱全忠而言，自然是日后最强劲的对手，全忠要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于情于理，都必须痛下毒手。所谓今日不除，必为大患。但克用拥有强兵五万，全忠根本不是对手，要除掉这个心腹之患，只能智取。

这天，李克用到达汴州后，大军在城外扎下营寨，本人并不进城。全忠遣人固请，克用碍不过面子，便同意入城。

全忠在克用下榻的上源驿中置酒布乐，盛陈美食，款待克用。席间，全忠殷勤劝酒，礼貌极恭，打消了克用的疑虑。克用在当时诸镇首领中年纪最少，只有二十八岁，少年气盛，倒也并不把全忠放在眼里，他与亲将们见全忠不足为意，便纵酒豪饮起来，克用乘酒使气，说话间对全忠不无讥讽侮辱之语。全忠气在心里，表面却不动声色。

这顿酒一直吃到日暮时分，克用来人皆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全忠派将领杨彦洪先用捆绑在一起的旧战车作为路障堵住去路，然后发兵包围了上源驿。先将哨兵斩杀，接着亮出兵刃，高声呐喊，冲向驿中。

克用的十几个亲兵首先被呼声惊起，奋身而上，与冲到门口的偷

袭者格斗。房中，克用尚在梦中，对发生的事浑然不知。其侍从郭景铢发觉有变，急忙把克用推到床下，用凉水浇到他的脸上，克用这才睁开眼睛，苏醒过来。克用不愧为久经沙场的勇士，马上就反应过来，来不及抹净脸上的水，站起来就张弓拔箭，与亲兵薛志勤对门外射击，一下就射死数十人。

也是克用命不该绝。恰在此时，突然天色有变，雷电大作，大雨倾盆而下，浇灭了来犯者手中的火把，四周晦冥一片。薛志勤扶着克用带着身边的几个亲兵翻墙而出，乘着电光突围。数人且战且退，杀开一条血路，最后登上汴州南门，缒城而下，奔回营中。在这次事变中，只有克用等数人幸存，有三百多人不及逃出，皆被全忠兵所杀。

克用逃回营中，本拟起兵报复，被其妻刘氏劝止，只是移书责难全忠。克用虽然暂未报复，但从此与全忠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二人在大唐帝国的最后二十年里，相与争斗不息，共同书写了一段兵戈纷纭、天下大乱的历史。

成就霸业的四个步骤

乱臣贼子最后成其霸业，大致有四个步骤。第一步是借多事之秋壮大实力；第二步是挟天予以令诸侯；第三步则是铲除异己；第四步是僭号称帝。

王重荣据蒲、陕，李昌符据凤翔，诸葛爽据河阳、洛阳，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高骈据淮南八州，其余如邢、沼、郓、齐、曹、濮、淄、青、宣、歙以及浙东诸州，无不由方镇擅据。各地均不听朝令，更无论贡赋，而两河及江淮的赋税早已断绝，国家已处在生死的边缘。以上的人中，肯定有一位其事竟成，只是现在仍不知是哪一个而已。

在朝廷方面，田令孜已成为南北司实际上的首领，自然也是天子的代表。可僖宗回到长安时，中央政府已经几乎是手无寸铁，只有田令孜在蜀中招募的五六万禁军，还在支撑着名存实亡的天子。可是这

些人也要吃饭领饷，单是京畿的赋税，养活朝廷南北司官属尚且不充，又怎么能再有余额分一杯羹？田令孜要恢复朝廷和天子权威，重新建立强大的禁军，已是不大可能。

田令孜苦寻良策，想到了安邑、解县两个盐池的盐利，这是目前朝廷唯一能够伸手的经济来源。可两地是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专有，令孜要想收回两池，就得拿王重荣开刀。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四月，令孜宣布受命兼任两池盐利使，下令收其利以赡禁军。王重荣上章论诉，表示不能同意。五月，令孜调重荣为泰宁节度使，重荣拒不赴任，上表朝廷大骂令孜。令孜于是交结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与之对抗。其时，许、蔡的秦宗权已公开反叛，僭称皇帝，田令孜在此关头又开事端，麻烦是一天比一天大。

十月，王重荣求救于李克用，克用正气愤朝廷不肯将朱全忠治罪，见有机会发泄怨气，求之不得，立即招兵买马，聚结诸胡，准备参战。但克用的目标仍是朱全忠，他对王重荣说："待我先灭全忠，再回扫鼠辈。"重荣慌忙回书道："待公得胜班师，我早成俘虏。不如先清君侧之恶田令孜，再擒全忠。"克用想想有理，决定先攻朱玫、李昌符。因为他知道这两人与朱全忠关系匪浅，都是仇恨自己的人，先扫除外围，也很有利。

这一场争斗是李克用取得胜利。十二月，克用与重荣两军逼近长安，田令孜只得挟天子落荒而逃，奔往风翔。僖宗在不到十年的工夫里两次出逃，在帝国的历史上是头一回。事变后朱玫、李昌符都倒向克用，而克用意在全忠，无心再战，自率兵回镇。王重荣、朱玫、李昌符则上表皇帝，以诛田令孜作为回驾长安的条件。在强大压力下，田令孜终于失势，让位给另一位宦官杨复恭。而朱玫竟和不少痛恨田令孜的朝官在长安改立皇帝，给自己招来反对力量，结果丢掉了性命。朱玫的失败证明，不按一定的步骤就想成事，确是不大可能的。

僖宗流亡又接近两年。在此期间，朱玫被其部将王行瑜所杀，王重荣亦被部将常行儒所杀，常行儒又被重荣之弟王重盈杀掉。神策军将李茂贞在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八月也成功地消灭了李昌符，三位杀人者都取而代之，分别成为新的藩镇之首。除了克用以外，靠近

中央的几个藩镇由于和权力离得太近，处在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中，谁也无法独领风骚。而朱全忠却凭据汴州扼制四方的地利，正慢慢地积聚着力量。看来还是他眼光远大，是真正懂得“霸业”诀窍的人。

公元888年初，僖宗还京，改元“文德”。不久，皇上旧病发作，不治身亡。帝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皇帝在享尽了富贵也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后，年仅二十七岁，就告别了人世。僖宗在位的这十四年，是帝国灾难深重的十四年，也是李家天下开始崩溃的时代。天不假寿，也许是件幸事，因为地下的僖宗应该知道，祖宗基业没有在他手上结束，还算是他的造化。接下来的继任者，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当年的懿宗有七位皇子，僖宗皇帝排行第五，但他的四位兄长早在他登基之初就被宦官刘行深、韩文约弑杀，所以现在只剩下皇弟吉王李保和寿王李杰。按照礼制，自应是年长者继嗣，所以朝廷上下都欲立吉王。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僖宗病危，群臣便欲请吉王监国，但当权的宦官，十军观察使杨复恭却另有打算：他要立寿王李杰。

无论再怎么说不过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眼下只有杨复恭说了算。宦官们对地方藩镇也许并无计策，但对天子废立是有绝对的权威的，前几朝的事实对此早就下了结论了，用不着谁来表示不同意见。于是寿王李杰被立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僖宗亡故后，寿王即位，改名“晔”，时年二十二岁。这就是历史上的“昭宗”。

想不到的是，杨复恭却歪打正着，给垂死的帝国立了一位英明贤达的天子。新帝虽然只有二十二岁，但据说他体貌明粹，好文学，重儒术，尊礼大臣，追想前贤，尤其具有恢复祖辈旧业的豪迈志气。即位之后，果然让大家感觉到此言不虚，一时朝廷内外，称颂不已。

这是懿、僖两帝给人的感觉太坏了，所以一旦有品行稍佳的天子出世，有了一个对比，人们便很容易为内中的情绪所感动。他们也不想一想，在如今的现状下，即使尧舜再世，又当如何？

昭宗胜于两位先帝之处在于他还知道要尽一些天子的责任。事到如今，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很明显：一是清明朝政，翦除宦官；二是振作威令，消灭割据。昭宗是明白这一点的。他的英明在此，可他的失败也在于此。

为什么？在特定的危急时势下，假如一个人简简单单地随意做来，哪怕是浑浑噩噩地无所措施，相反倒能够平和局面，因为事情既按照它本身的趋势而发展，则必然会耗尽内力，分化消弭，归于结束。若是自认聪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倒是会激化冲突并带来新的问题。就像一个弥留之人，尽管病人膏肓，可自身仍有抵抗力存在，若以不病视之，未必就不能让其生命力自行焕发而恢复生机。强作解人，以为阵痛之后必有大愈，反而有可能让阵痛危及生命。先圣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正是这么个道理。目前的危局，已成一触即发之态，昭宗不思进取还好，一思动作，便将葬送帝国。

可是，昭宗是个有志向的天子，和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帝王一样，一生所求，就是青史留名，他不可能不思振作。大顺——这是昭宗的第二个年号——元年（公元890年）五月，皇上在藩镇朱全忠（时为宣武节度使）、赫连铎（时为云州防御使）、李匡范（时为卢龙节度使）的倡议下和宰相张濬、孔纬的附和中下诏讨伐李克用，走出了第一步。

李克用是该讨伐，因为他势力最强也最不安分，不断侵犯邻镇，扩张领地。正好时下也有个机会：几个月前他刚刚损失了一支强有力的部队。但关键在于，讨伐克用会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换句话说，会不会给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前一个疑虑是很正常的，克用是最强的藩镇，以现在朝廷的力量首先去碰最硬的石头，必然是得不偿失；而后一种担心就更容易产生了，朱全忠等人是最有可能从讨伐克用的行动中大捞一票的，凡是真正的明白人，都一眼可以看出背后的隐患，难道皇上就看不出吗？

昭宗确实有点困惑。在朝议上天子就说：“克用有复兴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人将怎么说我？”

大多数朝官更是以为不可，杨复恭也表示反对。虽然他的动机倒

也并非在此，而是出于和克用的私交，但他的一句话却颇能代表大家的观点，就是："宗庙甫安，不宜更造兵端。"

可当朝宰相张濬、孔纬却坚决赞成。张濬说："机会千载难逢！今日失之，后悔莫及！"孔纬说："讨平克用，万世之利！"张濬又拍胸脯："陛下付臣兵权，克用旬月可平！"孔纬便跟着说大话："馈运、犒赏之费，支持两年绝无问题！"当今的天子是个信赖朝臣的人，在这番话下，不下诏讨伐倒是不合情理的了。

张濬何人？此公当年曾在克用手下做事，好空谈、不务实，克用一贯就看不起他。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张濬入相，克用对人道："他日交乱天下，必是此人。"话传到张濬耳里，他便将克用恨之入骨。此番借机生事，目的就是公报私仇。张濬的另外一个动机是要排挤杨复恭，因为他最初是依靠复恭爬上高位的，可当复恭被田令孜挤压失势后，他又转投令孜。复恭再度得势，张濬就难以自处了。想要得宠就务得立功，所以他才要一味主战。这后一层原因，恐怕也最合天子心意，因为昭宗一即位就感到了，宦官尤其是杨复恭，是自己恢复天子权威的最大障碍。

这个事端的后果自不待言，一年不到，张濬领导的兵马被克用打得大败，而杨复恭不愿坐以待毙，又在后方叛乱，结果导致畿辅三镇的李茂贞、王行瑜、韩建乘机胁迫朝廷，帝国的威信再次扫地殆尽。

畿辅三镇是凤翔、邠宁和华州。三大强藩地处京畿，临近长安，弄得不好，就会造成当年玄宗、德宗乃至僖宗鸾驾播迁的后果。果不其然，景福——昭宗的第三个年号——元年（公元892年），李茂贞以求官不遂，进逼长安，迫使昭宗杀掉了力主对他开战的宰相杜让能，又逼皇上杀掉了身边的三个大宦官，使天子成了地道的孤家寡人：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李茂贞纠结王行瑜、韩建再入京城，又杀宰相李谿、韦昭度，进而谋废天子，猖狂到了极点。可怜英明过于乃兄僖宗的昭宗皇帝，还是不免狼狈出逃。

这时朱全忠仍在忙于河南、淮南的作战，无暇北图。又是李克用出头，遣兵三千急赴皇驾所在地石门关，同时发兵击败了王行瑜，又给凤翔李茂贞以强大压力，逼使他暂表归顺，终于又为王室立了一大

功。但好景不长，乾宁三年（公元896年）李茂贞、韩建又叛，再入长安。这一次更为厉害，茂贞烧宫室，毁市肆，韩建则解散禁军，遍杀诸王，甚至还派兵包围了昭宗在华州的行宫，胁迫昭宗达两年之久。此时就连李克用也无可奈何了，因为朱全忠已经不甘寂寞，参与到这场大纷乱里。乾宁三年（公元896年）六月至十月，全忠在魏州一带数次攻击李克用，声势日见其盛；一年后又举兵东进，最后郓、齐、曹、棣、兖、沂、密、徐、宿、陈、许、滑、郑、濮等州五镇之地尽归全忠。只是他的老对手，时为宣歙观察使的杨行密，力保江、淮之地，没被全忠收归。尽管如此，全忠已逐步兼并了中原的广大地区，此时的全忠再也不比当年，他手上有强兵数万、土地千里，业已有了坚实的基础，可以和强大的李克用相颉颃。接下来就该轮到他也开始走第二步：挟天子以令诸侯了。乾宁三年（公元896年）七月，全忠与河南尹张全义及关东诸侯表请迁都洛阳，给关中的悖逆之辈以极大的震慑。

在此情形下，李茂贞、韩建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担心起来，太原李克用既不能一日除之，而汴梁的朱全忠又虎视眈眈，他们不愿两面树敌，于是便寻求妥协。这年十月，茂贞上表请罪，请献钱十五万缗，助修宫室，而韩建亦致书克用愿意修好。乾宁五年（公元898年）正月，李、韩二人在洛阳朱全忠一连串的压力下，不得不急修宫殿，奉昭宗还驾长安。八月，昭宗回京，改元“光化”。这时，朱全忠会同魏博镇罗绍威，与太原李克用、幽州刘仁恭联盟展开了一场空前对抗，光化二年（公元899年）正月，先败仁恭，乘势进攻河中、河东；光化三年（公元900年）九月，再败仁恭，又取镇、景、莫、祁、定等州，成德、义武两镇均向全忠请和，至此，河北诸镇全部归到他的手中。光化四年（公元901年）四月，全忠发六路兵攻李克用，连下数州，直逼晋阳。克用大为窘迫，亲自登城指挥，数十天里，衣不解带，未遑饮食。五月，全忠因粮食补给发生问题，又以久雨不止，士卒多病，这才解围而还。朱、李力量之比终于颠倒，形势又变。

灭唐祚者朱全忠，可以说是确切无疑的了。

看来昭宗的一切作为，实质上就是让真正的颠覆者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而已，此外一无是处。尽管他看起来要比他的前任高明许多，

但也无法避免充当一个悲剧角色的命运。昭宗把帝国的国祚延续了几年，最终拖进了十世纪，可实际上当他在华州陷入韩建手中时，就已经宣告了帝国的灭亡。

日落长安

当一切道德准则、礼法规范都被埋葬的时候，帝国本身便再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了。

昭宗最后的错误是十世纪初酿成的。

悲哀至极的天子开始走向极端。从华州回京后，昭宗开始酗酒，变得性情暴躁，喜怒无常。他此际已是既无权威，又无倚靠的空头天子，所能做的一切，便就是把他所剩下的勇气化为对家奴的凶残暴戾，他要对宦官开刀。光化三年（公元900年）上半年，昭宗与宰相崔胤谋议，于六月份先将两位专权的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贬出京外并不日赐死，揭开了大清除的序幕。

这又是昭宗太过于“英明”了。宦官固是天子的敌人，但昭宗在如此纷乱的时代尚能坚持时日，宦官倒也功不可没，是他们努力在维系着皇帝的存在。与朝士不同，没有了天子也就没有了宦官，朝士可以抛弃理念，可以弃暗投明，但宦官则不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别无选择，只有和天子——或者说是和他们的天子——站在一起。历次兵变而使皇驾播迁，都是宦官们临危不惧，护驾出逃。天子其时并不是不想带走文官，一是事起仓促，二是文官大都是书生，在那种场合下，实在也没什么用。而宦官典掌禁军多年，毕竟还是有随机应变能力的，至少他们很会保护皇上，更不能容忍帝位的空虚，在这一点上甚至比恪守传统的士大夫们还要坚决。所以他们即使擅权专政，骄横跋扈，但在实质上与天子是同一个联盟。在其他任何时候，恢复王权都必须清除宦官，但在中央政权已行将就木的时刻，却万万不可走这一条路。

此时此刻，宦官、朝士、藩镇三者对于天子是十分微妙的，若无法控制其中某一方坐大，最低限度也绝不能让其中的某一方消失。昭宗对宦官动手，只有倚靠朝官，可朝廷无兵，所以朝官还得倚仗地方强藩；藩镇之间本有矛盾，又会各为其援。三者中各有两方合纵连横，势必兵戈再兴，后果岂堪设想！

这一年十一月的一天，皇上出外畋猎，夜半回宫，不知何故突然暴怒，亲手杀死了数名近侍宦官和宫女，一下子使宫内震动，大小宦官人人自危。其时，四大宦官首领是左、右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左、右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四人此次已势无可忍，立即发难。第二天，率禁军千人破宫门而入。

他们的理由很充分："主上所为如是，岂可治理天下！废昏立明，自古有之，此乃为社稷安危，非不忠之举。"

崔胤虽不甘心，但他的外援朱全忠离长安太远，救不了急。而宦官一方的韩建却是随时可以来京。不得已，他和朝中百官都在逼宫表状上签了字。

十一月初六，季述、仲先再伏甲兵于门外，自己与进奏官程岩等十几人入对。才登思政殿，宫外禁军便大呼着往宫里冲来，逢着昭宗宠幸的宫女、方士、僧道之辈，见人即杀，昭宗吓得滚到床下，被刘、王二人拎起，与后嫔、侍从一行人统统被关到了少阳院。刘季述在少阳院中对着昭宗历数罪状，直说得天子垂首无语。此后，刘季述亲手将少阳院锁闭，嘱咐手下熔铁浇铸，把门固死，只在墙上开了个小洞以送饮食。昭宗求衣帛不得，求纸笔亦不得，其时天气甚寒，妃嫔们无衣无衾，号哭之声不绝。

初七，刘、王矫诏令太子嗣位。事情闹大了。

朱全忠开始还没意识到这是个绝妙的机会，直到天平节度副使李振对他说了一句："王室有难，霸者之资"，全忠这才恍然大悟。

两个月后，崔胤在全忠的声援下，在长安反正，杀掉了刘季述、王仲先、王彦范、薛齐偓等，救出了昭宗，迎之复位。崔胤一得志，就要报仇雪恨，他准备彻底摧毁宦官，并要在肉体上斩尽杀绝。这

时，轮到宦官们悲哀了，惊惧之下，他们开始自救。新任左右军中尉的韩全诲、张彦弘一方面暗中交结李茂贞，一方面计划除掉崔胤。崔胤当然不能让其阴谋得逞，立即修书全忠称：天子有密诏，令你率兵迎驾。崔胤此举正中全忠的下怀，原来他就想赶在李茂贞的前面把天子抢到手，这下子机会来了。七月，全忠急急从太原前线返回大梁，准备发兵。同时，韩全诲亦罗致了一些尚未出京任职的将领，也准备动手。

昭宗这时有点数了，八月初五，急诏翰林学士韩偓。皇上道："有人建议朕招崔胤、全诲入内殿，置酒和解二人恩怨，卿以为如何？"

韩偓与崔胤自有不同，他开始就不赞成这种意气之举，曾对昭宗说过"宦官亦不可全无"的话。韩偓还算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只是像他这样的在眼下已是凤毛麟角。

他对昭宗道："全诲之辈跋扈，确是非解决不可。如此示弱，则更增其凶悖。不如尽快调走首恶之徒，余者许其自新，庶几能避免麻烦。"

韩偓的话原则上是不错的，但实行不起来。昭宗发布的调令，没有一个遵守。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关头，谁又敢主动撤退？

九月初五，皇上听到了全忠即将发兵的消息，一下省悟了。他终于知道，自己谋除宦官的努力，结果是前门拒狼，后门引虎，而且还是两只虎：一是东面的朱全忠，一是西面的李茂贞，两虎相斗于君侧，岂是闹着玩的！昭宗无奈，又问计于韩偓，韩偓这时也是无可奈何："臣早知如此，早知如此！"皇上看着他，无语而泣。

十月，全忠从大梁发兵。韩全诲得讯，先动一步，领神策军将昭宗挟至凤翔，依附李茂贞。全忠到长安后，随即西征，围住凤翔。茂贞又向李克用求援，但克用军虽牵制了部分宣武军力量，可作战屡屡不利，甚至还被全忠追到晋阳。若非天公作美，克用还要吃更大的败仗。茂贞一人独撑，也是屡战屡败，终于在天复二年（公元903年）冬天向全忠妥协。天复三年（公元902年）正月，茂贞杀掉了韩全

诲、张彦弘等七十二人，送昭宗还长安。全忠则解凤翔之围，拥天子回京。

回京之前，全忠就将已在京师退休、未随昭宗西赴凤翔的九十二位老宦官秘密处死。天子还宫后，崔胤力请全诛宦官，于是全忠尽杀宦官数百人，外任监军者分令各地藩镇诛杀。至此，本朝的“宦官时代”宣告结束。二月，天子进全忠爵为“梁王”，赐号“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全忠留步骑兵万人宿卫长安，令其心腹分任要职，自己班师汴州。

朱全忠成功地完成了第二步后，紧接着开始远交近攻，消灭异己。七月，大破平卢节度使王师范；天复四年（公元904年）正月，又密令部下在长安尽诛崔胤之党，迫使昭宗迁都洛阳；八月十一日，弑杀昭宗，立昭宗十三岁的太子李祚为帝。第二年（公元905年）二月全忠又在洛阳宫苑的九曲池缢杀昭宗诸子共九人，投尸池中。

天祐二年（公元905年）五月初七——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一天，有一颗彗星出现在天空，由“轩辕”、“大角”二星宿一直拖弋到天市垣。天有星变，是灾非祥，占者有曰：“此君臣俱焚之象，宜诛杀以应之。”于是乎全忠大肆流放朝臣，贬逐无虚日。六月，将裴枢等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招到滑州白马县的白马驿中，一夜尽杀之。全忠部下的天平节度副使李振——就是当年在宦官幽闭昭宗时劝全忠抓住机会的那个人——早年屡举进士而不第，心里恨透了这些读书之人。三十余位缙绅人士被杀后，他还不解意，对全忠道：

“此辈不是自称‘清流’吗，那就把他们投入黄河，叫他们变成‘浊流’！”

全忠大笑。

当朝士们的尸体在浑浊的黄河水中随波浮沉的时候，帝国的一切道德准则、礼法规范也随之而被埋葬，帝国本身便再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了。

尽管李克用等势力还在顽强抵抗着朱全忠吞并天下的行动，但对帝国政权来说却已经是毫无意义。天祐四年（公元907年）三月，在

全忠手中的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宣布“禅让”，全忠更名为“晃”，即皇帝位，建号“梁”，历史上称之为“后梁”。唐朝正式灭亡，中国随之进入了第二个大分裂时期。

世事东流水，乾坤一局棋。

古代中国的全盛是公元七世纪初到八世纪末一百五十余年间的唐朝，它的辉煌曾经如日中天，照亮了整个世界。可惜，这一轮灿烂的太阳并没有闪耀出持久的光辉，在九世纪一百年中，就慢慢地熄灭了。宛如一柱激昂的喷泉引回到死水般的池塘，再也不兴波澜。只剩下点缀其间的一片静谧的莲花，稍稍掩盖了一些沉沉暮气。

何时轮到它再度升起？

初版后记

历史就是昨天，就是正在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所以历史也就等于今天，等于现在。我们本来永远都不能、也无法从历史的巨网中挣脱的，可不知怎么，我们似乎还是渐渐地忘记了历史的存在。今天的人们成了超越自己皮肤的人，看起来挥挥洒洒、轻松自如，其实总有一天要感到惘然若失。

也许罪魁祸首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把历史看作是“历史学家”独有的东西了，在他们精辟的考证和缜密的教科书中，忘记了历史本应该就是所有人的事。悲哀的是，我们有时竟把这个事实当作是必然的，心悦诚服地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拱手让给了别人。于是，历史终于被扼杀了，真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何时是个尽头。

怀古多从幽寂来。如果没有奔波红尘的肉体煎熬，没有独坐长夜的心灵跋涉，本人断没有这个胆量和意识去唤回我心中的历史，更毋庸说写本书了。这或许完全是一个偶然，因为有一个寂寞的夜晚我突然想起，历史老人既永远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存在，任何一个人便都有资格去和他举杯对饮。

历史老人从不吝啬，也从不做“谁有钱给谁拜年”的事，然而，若非绝顶聪明之人，却也无法从他那里得到箴言与训诫。聊以自慰的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幻想。微蚤如益，才智不过中人，所能做的一切，当然也只不过是向他略抒胸臆罢了，原本就是不敢妄求天下人心领神会的。如是而已。

本书吸收了众多前辈大师和海内外当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如岑仲勉、吕思勉、陈寅恪、范文澜、王仲荦、韩国磐、瞿兑园、唐长孺、黄永年、傅璇琮、朱金城、杨志玖、胡如雷、乌廷玉、张国刚、王梦

鸥、章群、傅锡壬以及业师卞孝萱、周勋初两先生，限于体例，不能在文中一一注明，在此谨特为标出并表示深深的敬意。学长武秀成、姚松兄，在典章故实、资料取材、篇章结构等方面教诲良多，使我受益匪浅，亦当衷心铭感。另外，还要特别感谢挚友钱进兄，数年以来，时相过从，讲史论道，坐而忘机。他的精辟分析和独到见解，还常常使我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没有他的鼎力相助，“九世纪的落日”也许只是停留在我心中的一个模糊思绪而已。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伊人。

癸酉仲秋，作者识于国立南京大学之北园

王朝的终结丛书

大宋帝国的衰亡

西风凋碧树

赵益 著



大宋帝国

不贪财、不好色、锐意革新的王安石为何被认为是败坏天下的人？
改革派、保守派轮番上阵，十六年变法成果一夜归零，

为何励精图治的政治变革会沦为一场人斗？

江苏人民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西风凋碧树：大宋帝国的衰亡

作者：赵益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6月

ISBN:978721418469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总序
第一章 四战之地，悲剧一开始就已注定
五代乱世
定都汴梁：埋下悲剧的种子
息事宁人就能安枕无忧？
重拾斯文，道德标准放在首位
养士与养兵之策
穷则思变
第二章 势在必行的改革，谁来做推手？
范仲淹：理想主义改革派
宋朝不缺的是人才
王安石理财：经济基础规范一切力量
王安石变法的功与过
书生意气与快意恩仇
党同伐异，历史总在轮回
第三章 南渡，只剩下半壁河山
宋徽宗：只怪生在帝王家
致命的诱惑：联金伐辽
靖康之难
高宗的四次大难不死
半壁河山，以柔道御天下
秦桧擅权，黑夜更黑
第四章 雍容与惨淡，安逸与痛苦
天子与秦桧
成功的防守和失败的进攻
临安：销了剑锋，雌了男儿
南渡帝国的新一代
朱熹：当学术与政治相遇
历史的合理性总是出人意料
第五章 败局：坏在根柢
三朝内禅：南宋皇帝的无奈选择
天子的权力凌驾制度之上
错误的北伐
雾失楼台：独裁、专权与腐败
史弥远“擅自废立”的真相

奸臣：翻不过去的篇章
第六章 天下：谁宾谁主
走向中国：文明的必由之路
市井无赖贾似道
襄阳之战：帝国的最后一搏
文天祥：殉国的开始
崖山海战：最后的悲壮
初版后记

总序

关注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何在？西方史学家一直推崇公元前二世纪时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话：“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而考古学证明，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商代，中国人就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时的史官们不仅要记录发生了的事件，还要预测将要发生的事件。他们选择龟甲来刻写卜辞，因为龟具有长久的寿命，见证过历史的沧桑，所以能够暗示未来的吉凶。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也是文明延续性最强的民族国家，很大的原因在于这个民族强烈的历史意识，使他们一旦遇到重要的选择，便首先去翻阅史书。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某个王朝一旦出现衰亡的征兆，上天和民众马上会抛弃它，将它变成新兴王朝的历史收藏，以供取资。《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记载夏桀迷惑暴乱，太史令终古便出奔投商。而当商纣王迷惑暴乱之际，内史向挚也“载其图法，出亡之周”。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官似乎有着一种自觉的意识：让历史永远服务于未来。

什么是重大事件？古代史书中记录的重大事件大多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中最大的又莫过于改朝换代，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兴亡”。而中国人讨论“亡”似乎更有甚于“兴”。古代中国在战国秦汉之际发生过最为重大的转折。此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享国超过五六百年甚至达八百年的氏族王国，但这样的国家毕竟是联盟式的松散政体。而经过战国秦汉的历史实践过程完成、确立的郡县制国家，才是统一的领土国家和全民国家。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国家体制如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起算，至清帝逊位的1911年，延续了2132年。其间有过二十多个统一或分裂；汉族或少数民族的王朝，但都奉行了郡县制度，因此我们不妨将他们视作一个中华帝国的不同届次的

政府。只是这些政府的任期与更换方式与近现代国家不同而已。而他们开辟的国土、抟成的民族，创造的文化、锻造的性格大都被近现代的中国人继承了下来。

汉、唐、宋、明、清是中华帝国任期最长的五大王朝，这些国祚久长，创造过盛世的王朝，其衰亡更加具有历史意味。我们发现，尽管它们的灭亡各有原因，但有两个方面是相同的，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其一是这五个王朝的灭亡形式囊括了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两种形式：来自内部的分裂与来自外部的挑战。汉、唐亡于内；宋、明亡于外；清朝有些例外，其外部的挑战来自于新的时代与新的世界。当然，他们的灭亡都是内忧加外患，销磨积弊多年，才导致一个最终解决的方式。其二是这五个王朝由于制度的优越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就，没有一个王朝是毁于一旦的。他们的代替者或是受其抚育的臣民，或是受其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除了清朝，其他四个王朝的代替者无一不以他们的继任者自居，进行政治改革并修撰前任王朝的国史。就清朝而言，最后的革命是由于改良政治的失败而导致的。这一点，与夏、商、周、秦、汉之间的推翻暴政，解民于水火式的革命很不一样。因此，汉、唐、宋、明、清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是最为丰富的，而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也是最为深刻的。它们是历史遗产最丰富的王朝。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套讨论兴亡的丛书只是历史通俗读物而不是学术著作，是三个大学文史专业教师不务正业的少作和一位作家对历史的演绎，代表着他们的文字趣味与历史见识，这次再版作了少许的修订。他们的目的只是用现代散文话语营构一个历史阅读场景，其中只有情节、人物、议论而不是在阐述历史的规律和理论，叙述与议论各有不同的视角，对历史的看法和文风也不尽统一。但他们相信，在这个全球风云变幻、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会有更多的国人想要了解我们的过去，关注我们的未来。正如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所言：“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惟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如果这套文字通俗但又不是戏说的丛书能够感发人们对国史的兴趣，便满足了他们的心愿。

徐兴无

2016年5月于南京大学

第一章
四战之地，悲剧一开始就已注定

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

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

——钱惟演

五代乱世

中国最鼎盛的王朝大唐帝国于公元906年寿终正寝，代之而起的是无数个割据一方的短命政权。因中原地区先后有五朝立国，史家遂简称此为“五代”。“五代”之世，持续了五十余年。

日月如惊丸。

也只有经历了无数苦难无数离乱无限悲哀无限凄惨的人才能真正体会人生的意义，因为造物主喜欢将流光的推移放在渐变的法则下进行，使之宛如一条静静的河流一样悄无声息。倏忽之间，沧海桑田，世界已经不再是旧日的光景了。倘无身世之慨，便乏敏感之思。

幸运的是，乱世却多出忠臣义士，面对艰难的世界，他们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最终在难以觉察的晷移寒暑中仍能够发现许多人间的真理。尽管也有一些超凡的智者视若无睹，悲哀的愁人空怀愤懑，但苍白的面容下其实都是心潮难平。看起来乱世也多隐者，然而真正的高人却是无法逍遥世外，无论是箪食陋巷抑或是垂钓江渚，他们皆如同身登蓬莱而遥望齐州，九点烟云中，往往慨然浩叹。所以说，总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决定了乱世是不会长久的，愈是黑暗，期望光明的程度也就愈为炽烈，尽管没有多少人能真正地知道从黑暗到光明的过程需要多么大的代价。

这种感慨却不是书斋里的无病呻吟，从公元906年开始以后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连后来习惯于心平气和不动声色的史官们都常常用“呜呼”两字表达他们对这段黑暗时代的激愤之情，所谓“唐室既衰，五季迭兴，凡易八姓，纷乱天下五十余年”。确实，如果欲节省笔墨而一言以蔽之的话，也没有更好的句子能概括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中国史家自古而来的直笔信条，是严格区分正统与僭伪、王霸与偏安的界限，用到这一场合，便就是把入主中原的五代王朝奉为正朔，但这却丝毫不能掩盖四海之内如火如荼的权欲之斗。五十余年中，山河破

碎，生灵涂炭，一茬茬自封的僭位的傀儡的皇帝们杀人、剖骨，铜柱炮烙，酒山肉海，芙蓉帐暖，折磨着可怜的妃嫔们柔嫩的胴体；铜雀春深，聆听着战鼓伴奏下的《玉树后庭》。所有的人文伦理和道德信仰都已在博取生存的实用法则下被践踏殆尽。文明已久的中国何曾有过如此荒唐的岁月？天下势乱久必治，是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公元960年，“真命天子”终于登场。

照理，记叙一个新王朝的历史并非一定要把前因后果剖析如缕。但我们对“五代”却不能不提，且把它作为起笔来带出全书，这个用意应该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的意义不久就可以随着叙述的深入而渐渐看出。一个极端荒谬的时代必定会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伴随着矫枉过正的革新，这一浅显的道理恰恰又正是历史演进的不二法则，姑且在这里强调出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让我们还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墨。

据说，新朝的出现便就是许多大智大慧的人早就成功地预言到了的。比如，这个季世中有位疯疯癫癫的和尚就曾对人说，尔等渴望太平，若要太平，则须等定光佛出世。说这话的时候，狡黠的眼神让人一见便知其人佯狂欺世的本相来。遗憾的是听者大多是粗鄙的百姓，既不知定光佛是何方神圣，更不知去哪里祈祷真神的降临。听者既漠漠，言者更戚戚，于是无话，和尚收起褡裢，飘然而逝。这一走又是数年。

易代之际常常会有这样的故事流传，它们往往都是一些神秘的寓言，被用来揭示一种不可抗拒的未来，表明将要发生的事情都是上天的注定，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当然这都是当时人或后来者别有用心的臆造，一言蔽之，无非是把世事变化定义为合理的演变而已。这在古代称为“谶”，太平时期尚不多见，但每当革故鼎新之举成为必要时，它们便会纷纷出笼。

大宋朝的开国君主、令人景仰的“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史称“宋太祖”的赵匡胤在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四这一天，那一场突如其来的事变发生的当时，自己有没有当皇帝的意思，确实是不得而知。但追述已往，这应该是他心里存想已

久并早就预谋准备的事情，这一点并无疑义。五代是有名的乱世，乱世的特征就在于人人都能取天子而代之。三十四岁的赵匡胤历仕二朝，随着知遇之恩甚重的周世宗南征北战，什么场面没见过？这一套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不过的了。不过，赵匡胤的愿望却很独特，他要的是兵不血刃而手到擒来。这位后来的新朝太祖皇帝在当时确有一般人不能望其项背的优势，一是因为他勇猛善战，功勋卓著，能做到国家辅弼的高位，业已拥有操纵废立的实力；二是他志存高远，苦心孤诣，有着常人所不能有的超然智慧。另外还有一条原因就是他身边有一批肯两肋插刀的部属，尤其重要的是，这些跟着他混饭吃的人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有了赵匡胤的富贵，才有他们的功名利禄。所以，当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指挥使赵匡胤率军出京抵御契丹族入侵，兵次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时，手下的不少人就要他做皇帝。

早在此前，开封城里就有一句民谣在流传，说的就是官为“策点检”的赵匡胤“将为天子”。看来一切早有准备，或者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都是顺理成章的。但太祖为人仁厚，当然还要点面子，他不愿意落下个乘着少主冲幼而篡夺大宝的恶名，于是很巧妙地喝了几杯酒，略有醉意之后，自去睡觉，事情会有人去处理。其实晚上计议就已结束了，第二天是正月初四，一大早便有人把黄袍披在了太祖身上。

这与九年前的一幕何其相似！那时太祖还是后汉枢密使郭威的部下，当后汉幼主登基时，郭威是顾命大臣之一，手握重兵，独揽大权，与今天太祖的地位相当。也是在率兵御寇兵次途中之际，忽然间诸军将士鼓噪而起，伏拜马前，要郭威做皇帝。郭威当然也表示自己绝不敢当，甚至退居馆驿闭门拒之。可兵士们不依，登墙越室而人，涕泗并下，请为天子。其时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最终有人扯裂黄旗披在了郭威身上，刹那间山呼震地，郭威感极而泣。就是当年的尧荐舜让，大概也没有如许热闹的场面。

太祖的黄袍加身没有做戏做得如此过火，这是因为太祖弟匡义和后来成为新朝第一位贤相的赵普极懂事理，知道怎样控制节奏。不过太祖话说得太妙了，当一切都结束时，太祖说：

罢，就依你们了，你等要贪富贵，如是奈何！

是“你们”而不是“我”，这是太祖“巧妙”之核心所在。所以他在说这话的时候，还由衷地叹了口气。这也是不能不叹的，因为潜台词表示还有话没有说。于是众人齐道：但凭吩咐。太祖便说出一番话来。太祖说：欲立我为天子，须听从我的命令，不然，我是万万不愿做的。千万不能小看太祖的这番言语，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个前提奠定了本朝立国的基础，三百年中，竟就没有发生过拥兵自重、犯上作乱的事情。当然这是后话。

太祖既然黄袍加身，理所当然地班师回京，当天即整军从开封仁和门入城，一路秋毫无犯。翌日，在崇元殿行禅代礼，太祖就龙墀北面拜受，此后，由宰相扶升殿，服衮冕，即皇帝位。因新帝初所领节度使在宋州，于是号天下曰“宋”，改元“建隆”，大赦天下。

《尚书》上曾把有文德才艺之古帝王称为“艺祖”，这是对开国皇帝的一种美称。本朝人博古尚文，遂称太祖皇帝为“艺祖”，在另一方面，当然也是出于对太祖的崇敬之心。这和当时人们口语中常把天子称为“官家”的意思一样，“官家”来自于“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的成语，同样表示了一种对皇帝的尊敬之情。确实，太祖皇帝自是与五代如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天子们不能同日而语的，他在很多方面当得起“艺祖”这个称号。

这一日禅代大典的重头戏是在殿上宣读禅代诏书，这当然是由饱受古训且文笔精湛的大手笔撰写，一个识时务者翰林承旨陶穀早就拟就了这道诏制。尽管就古有之例来看，这种无可奈何的文字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至少从表面上来说这道禅让诏还算是温婉平和，也给旧朝留了些面子。以后周幼主柴宗训口气所说的一句“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国命有归”，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活生生的现实。难怪华山隐士陈抟闻宋代周，十分欣喜地说：“天下自此定矣！”

这无疑又是一个善良的谶言，因为天下当然不是一次黄袍加身就能太平了的。但艺祖没辜负天下渴望和平者美好的期望，远交近攻，辅以仁厚爱人之德，先定周境，继平荆湖，灭后蜀，再取南汉、南唐，最后吴越入朝归顺，江南大平。除了北面的北汉、辽以外，差不

多也就算得上是天下一统了。不过，这一切用了将近十三年的时间。艺祖陛下完成了这百代功业，竟也就在吴越入朝的那一年，公元976年，驾崩仙逝。御弟匡义（建隆元年太祖即位时改名为“光义”，此际又改名为“炅”）即位，继续太祖未了的事业，在接下的几年里，又收服了江南泉、漳二州十四县，再灭北汉，基本上奠定了本朝的版图。只是连征辽国失败，不得已屈己议和，采取守势。难以预料的是，先知圣人孔子“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话却没能应验，这一守竟就是三百年！

世事虽不是完全不可预料，但天机又岂能处处泄漏。就是华山隐者陈抟，这位传说中创造了《太极图》、《先天图》，发明了象数之学的得道高人，也未能指明三百年的后事，又何论奔走尘寰的芸芸众生？人们只是沉浸在新朝初政光宅天下的仁明化浴中怡然自得，饮酒赋诗，歌舞逍遥，享受着人文洋溢礼乐雍然的快乐和自豪。夷狄之辈又何惧许多，在文明的感召下远人来归，定将是迟早的事情。这是久乱而重新归一的时代，天德人文便不可阻挡地大放光辉。从太祖皇帝率兵回师开封，在崇元殿即位的那一刻起，这种基调就已经定下了。

人们常说，每一种事物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会显现出一种“气象”，这种气象是从涵养深处蕴育而生自然流露的，如同春风化雨一般无处不在。或雄壮高古，或粗俗卑陋，决定着攸化神运的起承转合、成住坏空。本朝的气象如何，虽然目前还不能遽下结论，但经历过五代乱世血淋淋的残酷后，新一代天子必须以仁德去征服天下，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新朝的运祚就会像五代的王朝一般短寿而夭。不过，“仁”的力量并非是无往而不胜的，假如没有廓清四合、荡涤天下的雄威，一切仁德便只剩下徒具其表的外衣，好看而不中用。太祖显然是明白这一点的，因此在贵为天子后却常常不能安然入眠，他不止一次向他的忠直大臣赵普抱怨说：一榻内外，全是他人鼾睡。事实也正是如此，多年的痼疾并不会因为新朝的建立而一旦消亡。更可怕的是，如果矫枉必须过正的话，那就会带来新的问题，它们与此前的病端虽然不尽相同，但所有的疾病性质总是一样的，一切都以最终危及生命而结束。太祖的一生就是在仁与威的矛盾交织中度过的，不幸的是，它也同样会贯穿着本朝历史的始终。

还是回到大宋朝建立的那一天来。那是公元960年正月初五，这一天本是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既无日月星辰之变，也无五行灾异之象，除了任职旧朝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韩通因不从新朝，全家被杀外，由于太祖的严饬，诸如惊犯宫阙、侵凌朝贵及剽掠府库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一切都很平静。细述起来，本朝建立的这一天太祖皇帝自然有许多诏令，就像每一位承受天命的受禅者一样，给前所未有的新朝开辟一种崭新的气象，虽然都是形式上的，但却不能不做。比如内外军士赐赏，贬降者叙复，流配者释放，父母该恩者封赠，以及遣使遍告诸国，诏谕诸镇将帅等等；此后，告祭天地社稷，加官进爵不等。到了正月十七日，最后一项措施立太庙完成之后，新朝便可以说正式开始了。新朝政令没有提到国都的问题，原因也很简单，本朝受禅于周，自是以周之国都为国都，太祖既然是在崇元殿庭中拜受周禅，那么一切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于是，大宋的国都便就是开封。因其地旧属汴州，又名汴梁，相对于西京洛阳而言，本朝人遂又称之为东京汴梁。

从来都没有哪一个王朝像我大宋帝国，诞生之初，就是衰亡之始。从一座城池，走向另一座城池，演绎出一段凄苦苍凉的双城故事。

定都汴梁：埋下悲剧的种子

国家首都的意义就如同“宗庙”、“社稷”一样，也是一个原则上的事情，有很大的讲究。

首都常常又称作是“京都”、“京师”。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故曰“京都”；京者大也，师者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故又谓“京师”。汴梁本是唐代的汴州，后梁建为东都，后晋称为东京，本朝因其名，定为国都。于京都置开封府，京畿一路辖有五州四十二县，后虽稍有减损，也有十六县。

从古代“天下九州”的意义上来说，这里是“兖州”之域，春秋时为

卫、陈、郑三国之境，战国时为魏都，居于中原要地，是有名的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其中尤须一提的是其水路交通。黄河以外，汴梁周遭诸水，莫以汴河为重。据说大禹塞荥阳泽开渠以通淮泗，名莨荡渠，就是后来的汴河。汉时河、汴决坏，汉明帝曾遣使者修治汴渠；隋大业中更令开导，引河水入汴口，名通济渠，再东引入泗，连于淮，以通江淮漕运。炀帝巡幸江都，即乘龙舟泛此而往，故亦谓之御河。河畔御道植柳，郁郁葱葱。至唐，改名为广济渠。宋都汴梁，自此往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公私商旅轴轳相接，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运东南百物，下西山薪炭，不可胜计。

帝国中心枢纽的地位，决定了东京汴梁的迅速兴盛。唐之汴州旧城，周回不过二十里一百五十步，本朝太平兴国年间大事扩充，新城周回增至四十八里又二百三十三步，称为国城，又曰罗城，使东京的面积增加了一倍，没过多久，便一跃而成为帝国最大的城市。东京陷落后，它的风华繁盛成为当时无数人心目中的美好追忆，并被发之笔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便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种，人们从中可以看到正史记载里所无法具备的东京的生动形象。

不过，帝国首都却无险可恃。

汴州自古就是有名的“四战之地”，即所谓四面平坦无险可守而极易遭受攻击。战国时的赵国也是立国于四战之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得已采取一条“全民习兵”的政策，以作抵抗外侮之备，但最终还是被以关中险固之地立国的秦国所败。四战之地虽是兵家必争之要冲，却非帝王之居，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京师乃国家中枢所在，一旦有虞，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大事，銮舆播迁，政令不行，这种灾祸将足以动摇宗庙社稷。

问题还不仅仅在此。本朝从立国那天起，对国家的威胁主要就是来自北方。太祖平复周境虽然未费功夫，但对北汉就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北汉之地在黄河以北，离汴京就只是相隔一河而已，以太祖受禅后的实力，守虽然可以暂无大碍，但立时克服，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太祖立下的国策是“先南后北”，尽管极富谋略，但多少也是出于无奈。更何况北汉之外，还有辽国，夷狄之徒虎视眈眈，随时都

有可能挥戈南下。以汴京平坦开阔四通八达之地，又岂能轻易战守而游刃有余？自太祖时起京城陆续汇集了全国的精锐之师数十万之众，目的就是捍卫京畿，但即使是天险，也有险不足恃的时候，更何况汴京这个根本就无险可守之地！

其实在建国后不久，太祖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完全是一个偶然，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三月初四，太祖西幸洛阳。西京洛阳原本是太祖的出生之地，他在此度过了充满美好回忆的少年时光。不过，皇上自从十二岁离开后，十年仗剑漫游，十年戎马倥偬，君临天下后又日理万机，一直再也没能很好地重游故地。此番亲身体验到西洛山川关河的雄壮，一刹那间大生感慨。太祖想，据此险固之地而立都，则可以不繁冗兵而自固，岂非天赐之便？新朝开国皇帝这时开始后悔自己匆匆建都开封的草率，于是提出迁都。一代雄主发自内心地认为：一迁洛阳，再迁长安，效汉唐故事，应该是绝妙的霸策。可惜的是，从驾的大臣无不反对。首先是起居郎李符上疏不可，太祖不听。祭祀先祖罢，皇上赖着不肯起驾东返，那意思就是想造成既定事实。对此，群臣甚是惊骇，一时无有谏者，但有位不肯服输的大臣再度上言。

这是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他的话说得似乎很实在：东京有汴渠，因而便有了江淮每年数百万斛的漕米，都下数十万兵马仰给于此，陛下留居此地，米从何出？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安固已久，岂能动摇根本？

那就径迁长安！皇上的主意在那一刻还是坚决的，所以他赌气说出此话。

终于有人叩头了，凡是懦弱无识而又自命效忠的人最后总是会祭出这个法宝。这是晋王赵光义，皇上的御弟、新朝主要的军事统帅，同时也是太祖黄袍加身的始作俑者之一，他的话自然有着相当的分量。晋王以首叩地言辞恳切：陛下，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啊！

太祖沉默了。他明白这件事情一旦错了就无法改正，一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能以沉默回答晋王。晋王退下，太祖长叹：不出百

年，天下民力殚矣！这是太祖第二次长叹了，这一次是英明的太祖陛下为顾全大局而作了一个灾难性的妥协。这件事情的影响是如此的深远，以至于它的是非功过，简直无法评说。新朝的开国皇帝在这件事情上确有远见卓识，可惜的是没能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尽管后来也不断有迁都之议，但都不能付诸实施。

太祖于西幸洛阳七个月后去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二十一日，御弟晋王赵光义出乎意料又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大宝。说出乎意料，是因为历朝历代的继承原则是父丧子代，除非万不得已，没有兄终弟及的道理；但这又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赵光义是新朝的第一功臣，没有他就没有宋家江山，他的仁厚与统御才能更不让乃兄，在国家初立，外患未平的创制阶段，以他的地位与威望入继大统，当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这多少有点不正常，朝野有些议论和谣言也是事出有因。说起来也是光义有心要当皇帝，否则，有太祖谦虚仁慈的美德在前，即使天子猝死变故突发，朝廷内外一时没有准备而有传位于弟的意向，光义理所当然也还是必须谦让的。

新朝的第二位天子，史称“太宗”。

太祖时期，尚为奠定国统而南征北战，对首都的担心当然显得有些多余。相反，以四战之地取攻防要枢，纵横捭阖，倒有许多战略上的优势。更何况太祖取的是攻势，攻的意义就是在别人的土地上摆开战场，需要以决定性的战略决战一锤定音，于是进退自由的汴梁并非不是一个定都的佳选。可当太宗受挫于辽，国界渐渐确定后，这个问题就开始隐隐约约地严重起来。

太宗的对外国策以“歧沟之战”的失败为标志形成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

本朝的统一方略其实并不显得如何雄大。太祖的意思是南方基本平定后，帝国对北方的目标应该主要就是“燕晋”。“晋”是指太原的北汉，也就是后汉的一股残余势力在黄河以北建立的小朝廷；“燕”则是指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给契丹辽国的幽蓟十六州之地。特别是在辽国统治下的燕蓟，太祖甚至想先以金钱赎买，假如不果，再徐图以武力。太宗即位后首先于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灭掉北汉，这一

胜利使得新朝的嗣皇帝开始对立时收复燕蓟产生幻想。平定北汉后没有多久，太宗便要下令乘胜进军。

但是辽兵的威猛给宋军的印象似乎非常深刻，大家都不能忘怀在攻伐北汉的过程中，辽军不时的侧翼进攻给我方造成了多么大的难堪。军中诸将的疑虑与天子的跃跃欲试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下，使得太宗本人也显得犹豫起来。幸好殿前都虞侯——领掌宿卫禁兵的中级军官——崔瀚说得斩钉截铁：

“乘此破竹之势，取之易如反掌。机不可失！”

太宗大喜，决心遂下。于是，宋朝大兵直趋辽境，进而包围了南京。辽国先后设有五京：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辽之南京在今北京市，公元938年设，是辽国逼视大宋的军事重地。宋军一路报捷，兵临南京城下，逼得辽守军几无生机，差一点就要大功告成。不幸的是，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却久攻不下，宋军开始产生懈怠，加上大兵聚集，势力钝重，给了辽军反击之机。七月初六，辽宰相耶律沙率援军赶到，宋军不测其多寡，诸将疑惧，协调不力，被辽军分兵夹击，在城外高梁河一战即溃，太宗乘驴车仓皇南走，宋军大败。这一次北伐以优势而落败，给宋军上下又一次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

宋军的惨败完全是相互之间不能机动协调的结果，太宗亦未能起到天子亲征所能带来的那种鼓舞士气、指挥得力的作用。在战事的关键阶段，最高统帅部甚至一度中断了与各军的联络，以至于产生一部分军将谋立他人的严重事件。这次事件的当事人是武功郡王赵德昭（太祖的第二个儿子，太宗之侄），还京后因为太宗的责怪，惶恐万分，跑到宫外的一间茶楼里，要了一把水果刀自刎而亡。战争成败的决定因素往往不单单取决于兵力多寡、国势强弱，它还需要心理上的稳定与成熟，更需要上下一心的同仇敌忾与众志成城的必胜信心。说实话，从这次战败来看，太宗并没能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几年后遭受更大的失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歧沟”是歧沟关的省称，位于辽境“南京道”之易州与涿州之间。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太宗再一次大举北伐，东路军从雄州挥戈直

指辽国南京，歧沟是其必经之地。这次北伐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原因是大宋的第二代天子心有未甘，轻信了辽国正起内讧而势有减弱的不准确情报，兴三路大兵伐辽。除东路以外，西路军由潘美及北汉降将杨继业率领，目标是辽之西京大同；中路是田重进为统帅，兵出飞狐，穿插包抄，策应东西两路。这一次的失误在于矫枉过正，三路大军又相距太远，根本不能相互呼应。被辽军诱敌深入后，东路的曹彬部便先遭重创。

当时，曹彬已连克新城、固安，四月进围涿州，进兵神速。因辽军坚守，未能及时攻克，加之供给又被敌军切断，无奈之下，退还雄州。太宗接报，非常震惊。

皇上立即飞传诏令，命曹彬暂缓进军，沿白沟河慢慢向米信部靠拢，待西路潘美克复敌后数州，与中路田重进东移，再合力夹进。太宗的这个策略还是非常正确的，岂料西、中两路已率先奏捷的事实，给了曹彬所部上下以很大的压力，众将都认为本军拥有重兵而不能有所攻取，且已退兵一次而丧失战机，纷纷要求立即进兵再攻涿州。

曹彬是本朝杰出的开国将领之一，素来以诚实稳重、中立不倚著称，很得太祖赏识，在平西蜀、灭南唐中立有大功。此番以幽州行营前军马步水陆军统帅的身份领掌东路军北伐，接受的任务本来是佯攻。太宗也曾反复叮咛：“持重缓行，不得贪利。”然而曹彬在诸将喧闹之下，竟也没能坚持原则，以疲惫之师行不得已之役，发军再攻涿州，犯了兵家大忌。结果被辽军以轻制重，在歧沟将曹彬师老疲乏之众一战击溃。兵败如山倒，曹彬主力一败，整个东路军便全被冲垮，十万大军狼狈逃窜，从雄州一直退到高阳。此战宋军死者数万，人畜相蹂践而死者则更不可胜数，可怜曹彬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六月初八，败军之将曹彬等人被召回京师，诏鞫于尚书省。当曹彬素服长跪在殿前时，连太宗都忍不住长叹不已。

歧沟之战的失利，使得西、中两路的进攻丧失了意义。五月初九，太宗便命两军回师，潘美退还代州，田重进退守定州，由攻转守。但得胜的辽军却不愿善罢甘休，从六月开始，在诸路兵马都统耶律色珍的率领下，辽军十万人马南侵，一路连克云、朔、寰、应数

州，将战场推至宋境。七月初九，杨继业临危受命于西路统帅潘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领孤军出击。行前与潘美及监军蔚州刺史王侁商定，先伏兵于陈家谷口，俟出战不力转至此地时，出兵相救。可王侁在继业出击后，等了三个时辰不见继业回报，使人登高瞭望，见色珍军佯败却以为是辽兵退走，王侁欲争功，便引军离开了谷口。潘美发觉，已不能制，干脆也逃之夭夭。黄昏时分，继业果然退到了谷口。以重伤之躯领数十残兵，望见无人，可以想见，那是一种何其悲哀、绝望的心情。回马再战，结果全军覆没。

杨继业原是北汉大将，被擒后太宗不仅不杀，犹委以信任，使杨继业深为感动，此番负伤被执后，表现出坚贞不屈的高尚风范，绝食三日而死，成为北伐中精忠报国的英雄代表，然而却也是死不得其所。此次战役的失败明显是因为潘美和王侁的渎职，按军法当治以重罪。但太宗却只不过将潘美降职三级，王侁除名发配而已，姑息了这种罪行。军律松弛是自五代石敬瑭以来养成的一个恶习，有时甚至严重到丧师蹙地者一概不问的程度。后来的周世宗虽有所整肃，可到了太祖，复又一味宽容，转战经年平定四合，始终未尝戮一大将。此后，太祖的子孙们遂相袭以为自然，他们似乎不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没有纪律的军队是无法取胜的，这与天子的仁德是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此次轰轰烈烈的北伐就这样以三路大军相继被挫后彻底失败了。这次失败的意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挫折，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本朝北伐的意向从此泯灭，自上而下都完全丧失了与辽军战斗的勇气和信心。务实派如宰相赵普等更是以此为由反对丧师耗财而无一成果的徒劳之举，太宗也终于把一腔热血变成了安于现状的心安理得。这个结果对于太宗和立国未久的帝国来说也许是合适的，但对于王霸大业与国家前途来说，它却是一个无穷的隐患。

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四月初七，太宗犹想发兵攻辽，殿前众臣无一赞成。最后殿中侍御史赵孚奏上一表，中心内容是八个字：内修战备，外许欢盟。这下天子龙颜大悦，嘉纳此议，从此奠定了本朝的对辽政策。不过，太宗的所谓“内修战备”在后来的实践中却只是表现为一个“守”字而已。

与辽事实上的分界在太宗后期大致定在今天的山西、河北的北沿，也就是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三路大军的出发地代州至雄州一线，在本朝初期的行政区划上属于河北东、西路及河东路的范围，但实际上的防线却很含糊。宋军退守以后，辽师就曾经乘胜深入到深、德、邢等州，这些可都算是本朝北面的腹地了，离帝国中央政府的最后一道屏障——黄河已经非常的接近。这一带基本是一片广袤的平原，仍旧不好守。为此，有一位叫何承矩的边将提出了一条建议。

何承矩在太宗端拱年初出任河北沧州节度副使，颇有善政。此人幼年随其父何继筠转战黄河以北，对该地的山川形势非常熟悉。他的建议是：在顺安寨西挖开易河蒲口，导水东注于海，形成一条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十至七十里的河渠塘泊带，就此筑堤贮水以作屯田，可以遏制敌人骑兵的奔逸之势；同时，岁闲时期又可播为稻田，所谓“收地利以实边，设险固以防塞”，“春夏课农，秋冬习武”，可以一举两得。他的这条计策最后被太宗采纳；结果在淘河至泥沽海口屈曲九百余里的范围内形成了一条二十六寨、一百二十五军铺、百余艘战船、三千余士兵的防线。这道防御屏障当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甚至到了真宗时期也还未敢轻废，但是它的致命之处却也显而易见。

太宗之所以采纳何承矩的建议，是因为自北伐失败后，从天子到大臣，在原则上已经完全放弃了进攻。河北东路这条防线的设立，基本上就把帝国在北方的军事活动范围定死了，只可坚守，而不能出战，更遑论北进。自此，整体防御的格局也开始形成，尽管这条沟塘湖泊弯曲陂泽之地姑且也算得上险固，但这正如同在家门口筑了道墙一样，假如持险固守而险不足恃，则必至于亡。

息事宁人就能安枕无忧？

辽是契丹族建立的国家。契丹源出鲜卑，是鲜卑宇文别部的一支。

鲜卑的宇文别部原居辽水上游，与其他二部慕容部、段部鼎足而

三。南北朝时期宇文部不幸为慕容部所破，其残余分为契丹和奚。契丹屡受他族之侵，亦为北朝几代政权所轻视，不得已，从北魏太武帝时起，渐渐内附，岁致朝献。不过，由此也得以与中原交流日多，获得了宝贵的文明经验。唐朝建立后，契丹逐渐中兴，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背离突厥，归附唐朝，从此成为中华大家庭之一员。尽管在传统理念上来看，他们仍是异族，但客观上的存在胜于一切理论上的雄辩，在“四海一家”这个大背景下，他们也要不可避免地走进中国的历史中，虽然这个过程充满着血与火的洗礼和惨痛的创伤。

唐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契丹贵族中的遥辇家族取代了大贺家族，在后来的一百年中逐渐站稳脚跟，开始从逐寒暑，随水草，以车帐为家的游牧方式向农牧结合、居有定处的先进生产方式过渡，部落之间也不单单再是简单的军事联盟关系，国家的概念与形式也已开始形成。当十世纪初，世里家族的耶律阿保机登上契丹的统治地位时，表明契丹的勃兴正式开始。

阿保机属于那种不甘在蒙昧的环境中固步自封的人，他具有抬起头来放眼寰宇的天性，并能把握住周围一切变化的事物给他造成的感触，同时把这种印象转化成有益的启示。阿保机亲率部落多次南征，他在这些军事活动中不仅仅是获得了粮食、牲畜与奴隶，更重要的是开拓了自己的眼界，接触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成就。据说，阿保机能说汉话，通晓汉文，甚至工于书法，从他的作为来看，这些记载并非是夸大之辞。后晋之时，阿保机曾入关取平营二州，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一如汉人制度。这座城池名曰“汉城”，在独石口北三十七里处，地可植五谷，有盐铁之利，汉人安之，竟不思归，可见他的气度与韬略非同一般。

先进力量总是能战胜愚昧，阿保机以他的果断与强有力的手腕再一次证明了这条真理。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阿保机以一次骗局诱杀了另外七个部落的酋长，自称“天皇王”，建立了契丹帝国。此后，不断内事统一，外事开拓，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阻卜等部，连战皆捷，平定西北；又转而东灭渤海国，开辟了契丹历史的新纪元。公元926年，阿保机去世，其次子耶律继光继位，史称“辽太宗”。辽太宗进而征伐中原，并于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

年）占据后晋首都大梁后改号“大辽”，把目标指向了广阔的中原。宋代周而入主中国，便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与辽长达百多年的故事。

本朝究竟有无足够的力量使戎狄臣服，这本就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而本朝两位先王于无形中定下的基调，更使这个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太祖、太宗的矛盾看起来似乎在于以德服人与以战屈人的两难选择上，而事实是早在本朝开启王运之初，种种迹象就已表明，中原的长久战乱使天下士庶之心逐渐把大唐以来以声威服人的雄伟魄力摒弃在一边了，他们要的是和平的生活而不是空图声名的穷兵黩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和”的基本策略并不是仁德天子们的一厢情愿，而是人之常情和时势所逼的产物，应该是无可非议的。歧沟之战后十八年，宋辽之间终于实现了外交上的和解，这个结果可以说是与太祖以来的基本国策一脉相连。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假如帝国并不具备以战屈人的实力，那么这种和解就是苟且、脆弱和暂时的，更不能保证“修文德以徕远人”宏伟目标的实现。事实上，这次与辽国的和解虽然在客观上给帝国带来了宁静与繁荣，但也成了本朝彻底放弃对外用武的起点。

这是宋真宗，也就是本朝第三位皇帝时期的事。一切也都似乎肇自于辽国大军数月之中便打到了开封城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闰九月，辽军在辽主及太后的亲率下大举南进，定州首当其冲，告急文书一夕五次飞传至京。定州治所在真定府北百余里，一旦为敌所破，整个河北防线便要土崩瓦解，首都东京自然也将无所遮蔽地暴露在敌人的锋芒面前。

任相不久的寇准字平仲，以集贤殿大学士的身份与老一辈的毕士安并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位有名的刚直不阿之士。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早就预见到事情的发生，因此他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慌张。寇准在如此紧急的情况面前依旧神色自如谈笑风生，颇有当年谢安谈笑退敌之风度。不过，临阵不慌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成算，同时还必须具备客观物质上的条件，寇准压下奏报隐而不发，固然表现出胸有成竹的气度，但却不能说明外在的成败因素是否具备。然而，像他这样的人在朝廷中毕竟还是少数，第二天，同僚中有人便忍不住了，朝会上便急急将严重的军情奏报皇上。这是典型的不能为君王分忧的表现。

天子龙颜大惊，急问寇准。寇准说得好：陛下欲解此忧难，五天的时间就够了，但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亲征澶州。澶州是开德府的旧称，在黄河以北，是辽军矛头所指。早在近一个月前，寇准就以禁卫重兵已在河北集结的理由要求天子亲赴该地督战，真宗自己也曾明确表示过愿意前往。但眼下事态已有了不同，此时此刻天子龙銮渡河，便是决一死战的架势。寇准此话犹如平空响起一声惊雷，一朝之臣全被这个提议吓呆了。真宗心里更怕，要起身还驾内宫。寇准最后把话说得很绝，他以恐吓的口吻对皇上说：陛下这一走，大事去矣。

帝国目前的窘境自然不仅仅在于首都东京的难守易攻，细究原委，更深一层的症结是本朝建立后一系列国策上的变化。这当然也不是一事一地所决定的，所有的后果都是各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东京的孱弱只不过是最后的表现而已。

太祖皇帝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常常为后人津津乐道，可耐人寻味的是，太祖收兵权的初衷却在于巩固天子的地位，一开始时并没有把天下的安危当作终极目标。尽管太祖在召问赵普，这位本朝第一位有所作为的宰相时信誓旦旦地把兵革不息、苍生涂炭作为他平息天下之兵的由来，但这话可听而不可信。赵普的回答是："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正是这话道破了太祖的心事，所以赵普语犹未毕，皇上就说：卿勿再言，朕明白了。太祖明白了什么？在后来的事情中一目了然，皇上首先做的是除去心腹之患，以利害得失的劝谕威胁与恩威并重的手段把功臣石守信、王审琦从典守禁卫的要害之位一夕之间就变成了饮酒相欢终其天年的寓公。如此策略的核心是"强君弱臣"四个字，心腹之患既去，节镇强重的肢体之害便不难破除。太祖与赵普为完成后一个目标花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其处心积虑的程度甚至比前一个举动要大很多。即使这样，最后完成却也是本朝太宗时期的事了。

当然，不论太祖此举的出发点如何，天下苍生受利的结果是不容怀疑的。中国自古战乱频仍，就是号称盛世的前唐，天子们的好大喜功，照样使黎民百姓痛苦不已，更遑论群魔争斗天下纷乱的五代。王道式微则乱臣贼子兴，本朝两位先王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们使中央政权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建隆四年（公元963年）的夏天，湖南并

入新朝的版图，这时中央政府悄悄颁布了一项任命，以当时任刑部郎中的贾玭等人“通判湖南诸州”。通判一职设立的意义在于：它既是由京官出任，又以儒臣担当，更能与府州同理地方政事，客观上便大大减弱了地方藩镇的势力。在本朝初年，通判的权力甚至一度引起了地方军政长官的一致不满，每当两者发生冲突，通判常用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乃监郡，朝廷使我监汝。尽管太祖曾下诏劝谕，但州郡长官还是与通判格格不入。有一个笑话这样说：后来有一位叫钱昆的，世居余杭，因喜嗜蟹。一日，此人求补外任，人问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而无通判处则可。这真是个不错的调侃，当然也是中央集权强盛最好的注脚。太宗在此基础上，更下令罢除藩镇领支郡之制，所谓支郡，就是指节度使间接治理之州郡。值得注意的是，这条措施的第一个对象却是倡言削藩镇之权的赵普。另外一位大臣高保寅在出知怀州时因不满于事事为领节度使的赵普所抑，上书太宗乞罢节镇领支郡之制。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赵普既不免作茧自缚，又遑论他人！太宗太平兴国（公元977年）二年八月，一道诏制中，全国三十余节镇中十八军所领支郡皆直属京师。所谓太祖杯酒之间就把藩镇痼疾一旦消弭的说法显然是一种美化，因为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也不完全是太祖个人德行见识的功劳。仔细考察这件事的始末，不难发现其间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

不唯如此。当年赵普为对付藩镇而建策太祖，还有另外两项内容：一是制其钱谷，二是收其精兵。此两条与夺其权柄一样不可或缺。设想地方藩镇若失去了犯上作乱的资本，又何愁其势不弱！此两项举动皆始于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后人记载甚详：“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又置转运使为之条禁，文簿渐为精密。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令天下长吏择本道精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需要强调的是，从后来的进展看，这些都绝非是凭空记录。在军事制度上的改革也是随着这一总体思路而来的：集天下之精英者为禁军，领导机构是殿前司和侍卫司，设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与马军都指挥使三帅分领。过于专权必然导致尾大不掉，这在地方与中央是一样的。因此，太祖又在中央设枢密院，主长者为正副枢密使，使之成为

调兵机构，与统兵的三帅共掌军务。这样，本朝军事制度的最后格局形成了：在中央，宰相不问枢密军务，战时将领则临时委派，两者皆直属于皇帝；在地方，节度以下，坐食俸禄而已，方面有警，则总师出讨，事已则兵归宿卫，将归本镇。这种格局虽然在国家危难之后引起各方面的怀疑而有所修改，但大致不变，基本贯穿于本朝近三百年历史的始终。这就是所谓的"弱枝强干"，就内政而言，帝王基业和赵家江山在它的庇护下显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稳固之态。

所以，定都东京固然是一个无奈，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错误，然而中央势力是这样的强劲，一定程度上应该是能够弥补首都四战之地的缺憾的。中央正规军禁军的数量在本朝初年大约是二十万上下，京城驻军即近十万，占了总数的一半。太宗时禁军总数达到三十五万，守卫东京特别是河北防线的部队至少也有十七八万人。此次辽军南下，在人数上并不比宋军优势。只是辽人善于骑射，马军的冲击力强劲，特别是能集中精锐而各个击破河北一带相对弱寡的地方城池，在气势上占了先手而已。宋军主力既已渡河，各道兵马也有合围夹击的可能，无论如何也不至于立时就想到退却的。

但本朝立国以来，朝廷大员中一直不乏那种懦弱于外寇入侵者，此际的典型代表是参知政事王钦若与佥署枢密院事陈尧叟。这两位一是金陵人，一是四川人，此时竟分别密劝皇帝驾幸金陵、成都，开了本朝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就原则而论，这种妖言惑主、动摇军心之举，是十足的奸佞行为，可在真宗眼里，他们的建议居然还颇合心意。这种现象是极不正常的，难怪寇准听说以后勃然大怒。寇准以为，以圣朝天子之神武，若车驾亲征，敌人将不战自遁。即使坚守河北，亦可以挠其谋、老其军，从而稳操胜算。岂能远之楚蜀而委弃宗社？寇准在这里稍微灵活了一下，以近似激将的语气使天子自入彀中。果然，真宗在寇准的吹捧中有点昏昏然起来，放弃东京的念头从此打消不提，甚至当辽国主动表示求和时，皇上还有点不大愿意。十一月二十日，真宗终于出京亲赴河北，二十六日，到达澶州。双方皇驾的亲征使这场战事不再仅仅局限于边境冲突的范畴，必将会带来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结果，这就是一个极为著名的停战条约"澶渊之盟"。

这个结果的产生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偶然事件导致的。当真宗亲临河北走到卫南时，辽统军萧挞览所部已先后击败天雄、德清两军，进而三面包围了澶州。围城后，萧挞览自恃其勇，只以轻骑简从潜至城下巡视地形，结果被宋威虎军将张瓌用床子弩射死。

统军萧挞览是辽国著名大将，博学多智，极为辽主所重。此次南进，就是在他竭力倡导下实现的，因此他的死给了辽人上下极大的震动，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辽军的斗志。辽太后亲临挞览棺车，恸哭失声，为之辍朝五日。相反，真宗在三天后及时赶到了澶州，当天子的黄龙旗出现在澶州北城门楼上时，宋军欢呼之声闻于数十里之外，士气大振。

本来，辽国也并没有久战之意。同以往数年的情形相同，此次南侵的目的，也不过就是攻城掠地炫耀武力而已，且目标也就只是河北北线一带。辽军在边境战斗中之所以屡屡取胜，一是因为宋军以固守为主，二则也是因为辽师本身采取了灵活机动的巡略方针。若以大军深入直逼东京，恐怕也没有这个实力。因此辽人从心底是想与宋廷媾和的，只要捞到了实惠，一纸和约的确是无可无不可的事。十二月份，双方开始实质性接触。

但谈判的过程还是很微妙。早在辽军大举深入之际，辽太后就曾辗转送来一封带有求和意味的书信，但真宗认为彼大兵在后，疑为欺诈而未予置信。倒是宰相之一的毕士安坚持说这是辽军受挫后耻于自退之举，所以劝皇上不妨答复。于是真宗手诏回复说：若真有此意可以议和，但宋廷是不能先派使者的，必须是辽国方面“即附边臣闻奏”。这就是在外交上讲究起大国的面子了，辽国自然也不会同意。这时，一位宋朝降将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此人姓王，名继忠，真宗在藩邸时即委以亲信，即位后一直将他擢升到镇、定、高阳关三路钤辖兼河北转运使的职位，也算是个统帅一方的封疆大吏。不幸的是，在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的一次战役中兵败，下落不明。朝廷方面本以为继忠业已殉国，直到辽人致书议和之际，才发现王继忠是陷敌被俘，不仅没死，连辽国的求和之议竟也是他一力促成的。于是，王继忠从一位兵败被擒的降将一跃成为双方的红人。有了此人的折中，宋辽的和议在面子上的障碍似乎便少了许多。最终是宋廷方面先派了使

者，几经周折，恰好在萧挞览死后不久到达辽营，停战的时机最终成熟。

双方的使者宋廷方面是曹利用，本官是右班殿直，因为恰好赴行营公事，被枢密院推荐出使。此人机辩无伦，慷慨有志操，确是个佳选。在辽国方面，飞龙使韩杞被辽主充以大任，此人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两国由战而和，交际仪节之间，就成为新的战场。本朝自是中国的正朔，与辽约以兄弟之国，大国之邦的体面绝不可失。所以还必须有人制定仪式，此际充当此职的是翰林学士赵安仁，在行营当中也只有他能熟记有关体式，因此受命出任。

其实所有的这一切都已是无关紧要的了，因为宋家天子乃至朝中大臣都早已把息事宁人的方针摆在了首位。真宗本人根本就无心再战，所以当韩杞在廷前扬言辽军还要南进时，皇上便迫不及待地予以让步，答应以输送银两绢帛的方式许和。就是忠直刚勇者如寇准，此际也不过就是把曹利用拉到帐中说：天子虽许你以百万，若此去结果超过三十万，回来就砍你的头。于是双方和平之议变成了讨价还价的拉锯战，最后宋帝国以每年输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的代价换取了辽国的一纸盟誓和班师北还。就以此每年合计三十万岁币的数目而言，恐怕还得归功于寇准的坚决态度和曹利用的不辱使命。

当然，这在本朝大多数人眼里自然谈不上什么丧权辱国之类，相反却是天朝圣明与大度的写照。照天子的观念来看，中国得天下风土之宜，地饶物丰，助尔犷憨小国若许军旅之费，不仅是大国的本分，实在也是小事一桩。千年前的汉世，早就开了先例，可见中国之风范就是以大家胸怀庇护四夷众生，德之尚者，又敢不遵之！至于三十万两的数目是否过大，不是原则上的事情。老臣毕士安说得好：不如此，和事恐不能久也。

怕只怕无关愁绪，最恨是在心深处。共遵诚信，虔奉欢盟的皆大欢喜之外是“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的实际约定，加上三十万两岁币的具体现实，本朝仁厚与大度的背后也许就是强咽痛楚往心里去。但是，天下太平是真的，君不见天子驾返东京了，大赦天下的诏书颁布了；河北给复二年，壮丁归农，行营罢除，

戍兵减半，四边警戒人不安枕也已成为过去了。

既如此，复何求焉。

重拾斯文，道德标准放在首位

东京的故事可以说从现在才真正开始。

帝国的历史已将近五十年了，即使从帝国平定四境的大业完成之时——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9年）五月北汉被灭——算起，到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也有二十五年的光景。帝国廓清四合应付外寇的风云际会，仁明圣德的沐浴教化，已经彻底改变了天下四海的风貌。

窥一斑可知全豹。单以本朝京师而论，除了“四战之地”的无奈外，与旧时相比又有了许多不同。

第一，东京汴梁有内外三层，由外向内，分别是外城、里城、宫城，所谓城垣三道，重重环卫，拥立着巍峨的帝京。当然，这倒也不算是什么特别，不同的是，东京外城的形制并非是方正如矩的旧象，而是顺着地势高低上下，走了一条纡曲蜿蜒的线路。据说，这是太祖皇帝的主意，如此迂回纵斜的城墙蓝图还是艺祖亲笔所绘。当时有许多人不解：缘何本朝京都第一道拱卫之垣，不效仿公正方直、经纬有序的自古京城之相？其实这正是太祖的高明之处。取法天象而建立的城制只是人文的需要而没有防御价值，东京既无天险可恃，就必须赖以城池之固。建城曲宛如蚓而顺地势，正是得朴素坚固之防卫要领。

第二是东京城有四条运河穿城而过，谓：五丈河、金水河、蔡河、汴河。东京一地河渠贯连而四通八达，这来自于历朝历代的不断疏凿，而本朝却终得其利。舳舻绵连千里不绝的好处不仅仅是漕运贡输而已，最重要的是它把帝京和四海九州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可是前无古人的事！难怪太祖把此数河比做圣朝天子腰间的玉带，他的意思很明显：玉带飘扬之间，天下尽在手中。

太宗当政年间的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六月，由于淫雨连绵，汴河发生了一次水灾。十八日，大水坏堤，泛滥民田，一直淹到东京附近的浚仪县。太宗得报，按捺不住，一大早便亲自出城。宰相及枢密使等当朝大员迎谒于路，力谏不必劳动皇驾。太宗的话语发自内心：

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能不顾？！

这就是东京的另外一个特殊之处了。确实，东京的人口之多，是前朝数代所无法比拟的。漕运的重要是因为帝国的中枢承受着沉重的负担，仰给赋税者除了天子和中央政府以外，尚还有着数十万的禁军。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前代的兵员，大都分散在四地，天子辇毂之下，不外乎就是一些承担护卫的禁卫部队而已，一旦有急，则有待于四方勤王之师。本朝却很不同，经过太祖太宗两朝天子的努力，天下精兵都已汇集京师，禁军数量大大增加，已经成为帝国绝对的军事力量。保守估计，本朝京师户籍的数目，已至少是前唐的十倍，这还没算上驻守京城的这若许禁军。天子百官、皇亲国戚乃至天下四方之客，给这座新朝国府，增添了无限的繁荣，也带来了一个无法挣脱的包袱。这就是说，帝国首都之势重，业已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了。

东京不仅是大宋的中心和天下安危的关键，也是帝国风华的象征。

它开始变成一座真正是属于黎民百姓的城市。流水潺潺，长桥卧波，梨白桃红，荷绿杏黄中自然有着无限的秀丽妩媚，而即使在宫城巍峨凝重、金碧辉煌的赫赫皇仪里，仍然不失些许清幽和欢愉之象。宣德门正南大道上馥郁芬芳的如锦繁花，正是把天子的化雨春风，从沉沉如海的宫禁内苑里洒播开来，昭示着“与民同乐”的辉煌仁政。更不用说元宵之夜五彩斑斓、锦绣交辉的上元灯节了。都城的宵禁渐渐开始流于形式，自古而来的坊制也已不像旧时那样谨严；四时不绝的江淮扁舟带来了市的兴旺，柳陌花间里的叫卖吆喝，茶坊酒肆中的丝竹管弦，人声鼎沸中更是一番融融之乐。

东京也是文士们精神的家园。春花烂漫、秋叶静美，小园香径、

楼台亭阁，日暮黄昏独自徘徊中，一缕心事岂堪怅惘。同志者于心既有戚戚，以是次韵相酬、唱应赠答，杯酒光景间，清苦幽闲、雕采巧丽，亦常能使人回味无穷。

东京更是才人们的温柔之乡。与位于里城西北部的皇宫相对，外城之内，朱雀门东南、南熏门东北一带位于京城东南角的区域是东京乃至全国最繁华热闹的地方。此地叫做“蔡河湾”，繁华的商业和娱乐场所都集中在这里。妙的是，贡院、太学、国子监与教坊乃至妓馆、瓦舍相近。青衫愁苦，红粉怜才，每邂逅于风尘，必多殷勤之思，依红偎绿浅斟低唱，花衢幽巷中往往不胜沉浮。

诸王毕，四海一，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汴。然而他们与古时降王降臣的命运却不可同日而语了，湖南周保权、荆南高继冲、南汉刘、南唐李煜、西蜀孟昶、漳泉陈洪进、吴越钱俶、北汉刘继元等一方霸主，纳土受降后，无不保全首领，封爵赏官之外，又皆于京师颁赐甲第。其子弟臣僚，或居肘腋之地，或职州郡兵民，从未有因猜防疑忌而至于杀戮者。虽然后蜀孟昶来京后不多时即暴卒而亡，南唐李煜最后亦郁郁而终，但有关两人不幸遭遇的故事都是出于野史的传说，可信程度不大。至少，其辈子弟臣僚大都平安地入仕新朝并终其天年，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惟有宽容，才能兼收并蓄。四海之大，无所不有，没有超凡胸怀，又如何能并包天下？可见，这一现实虽然是出于五代丧乱之后人道斯文重归环宇的一种必然，但更主要的是我朝君臣的恢弘气量之所致。世事轮回中，本朝的开国天子终于认识到仁德往往是真正的神威，这是所有人都应该额手加庆的事情。

西蜀和江南自古是富贵之乡，几代以来又殊少战乱，人们赖其地利，子孙相乐，歌诗之风昌盛。自从前唐以来，民间又流行一种叫“曲子词”的歌行，渐渐成为新制。文人士大夫进而厕身其中，更予发扬光大，于是倚声填词之文学形式由此而生，与诗对称，名之为“词”。较之于格律谨饬、端庄持重的五七言诗而言，词之一体以其声词结合、结构松散而独树一帜，它的形式似乎更适于表达儿女情感和幽怨心绪，更能抒写活泼性灵的情感流露。职是之故，词人既层出不穷，词作亦愈做愈工。在词的创作方面，即以西蜀、南唐独领风

骚，从人主至大臣，每每乐此不疲。其中南唐后主李煜最擅胜场，西蜀人韦庄、南唐人冯延巳等紧踵其后，并由此而集开了一代新风。

天下复归于一统，车船舟马带着亡国君臣、后宫嫔妃、词士乐工辇来新朝，也把伴随着悠扬声调的清词丽句带到了东京。东京的繁华和温柔，既是一帖醇厚的催化剂，把望乡的哀怨、失意的惆怅、闲适的心绪和得意的放浪统统融入了词的声声舒缓里；同时它也像一乘奇妙的仙槎，把那柔婉美丽、缠绵悱恻的词境带到了现实生活当中。文学从庙堂重回人间，这是世事沧桑中可歌可泣的进步。

照理，天下武以靖之，文以持之，两者不可或缺。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本朝从立国之始一直到当今时代，却都侧重于文治。即使太祖的所谓以武定邦，也只不过是表面的内容而已，本朝的皇帝们从根子里始终将道德人文的基本准则放在了第一位。尽管他们的初衷和目的并非是完完全全的纯洁无私，但在客观上却符合着古代先王——或者说是上天——的垂范。在这里我们也许要再次感谢五代那并不算太短的战火丧乱和斯文扫地了，正是这惨痛的代价换来了天下人的觉醒。

澶渊之盟九个月后，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九月二十二日，真宗皇帝下诏，令资政殿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杨亿纂修历代君臣事迹。这是本朝第二次修纂大部头的典籍了。盛世修书，是历来文治昌隆的必然产物，也是时代的一种象征。前一次是在太宗皇帝陛下主持下进行的，时间大致从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至雍熙四年（公元987年），修成的结果共有三部，后来分别题作《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和《太平广记》，总数量在二千五百卷左右，天地万物之理、政教法度之原、理乱废兴之由、道德性命之奥，无不包罗其中，真可谓洋洋大观。但真宗此次修书，资治备鉴的目的似乎更为明确，单从“历代君臣事迹”这一内容界定上也可看出。所以，官家亲自删定义例，给予了极高的重视。王钦若等受命后自不敢怠慢，遂请以直秘阁钱惟演等十人同修。诏从之。

王钦若此人的品德和学问并不怎么样，但杨亿和钱惟演却算得上是忠清鲠良的才学之士。杨亿七岁时即为太宗赏识，后赐进士及第，

时任翰林学士、户部郎中并知制诰。钱惟演更有来历，他是五代时吴越王钱俶之子，时授为太仆少卿。参与者还有一位叫刘筠的，进士出身，精工诗文，与杨亿并号“杨刘”，才思不让人后。其他编纂人员也都是一时之选。

众人在秘阁里工作，有时难免枯燥寂寞，一时兴来，便免不了做些诗歌消遣。杨亿出了个主意：既如此，何不彼此唱和一番，以作同值秘阁的纪念？这个倡议得到众人赞同。于是大家或就同韵，或拟一题，相互酬唱起来，日子倒也过得自如潇洒。三年后，杨亿把这些作品汇编成册，题作《西昆酬唱集》，刊布流行，一时反响颇巨，“西昆体”竟也蔚为风尚。

真宗一朝大致就是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度过的。在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九月，天子甚至下诏：由于稼穑屡登，机务多暇，自今群臣不妨职事，并听游宴，御史勿得纠察；上巳、二社、端午、重阳并旬时休务一日，初寒、盛暑、大雨雪议放朝，并著于令式。确实，澶渊之盟以后，平和清静的形势持续了有近十几年的时间。造成这种祥和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有几点很明显：一是澶渊之盟后宋辽战争基本消歇；二是几年来各地风调雨顺，岁致丰稔；此外就是自今上登基以来，朝中的人事相对简单，这似乎是任何一种政治平稳所最最需要的东西。

自景德年间起，朝中宰执大臣先后主要有李至、李沆、曹彬、周莹、张齐贤、吕蒙正、向敏中、寇准、毕士安、陈尧叟、王钦若、冯拯、李迪、王旦和丁谓出任，他们在某些事务上虽然存在着不少矛盾，但总的说来还算相安无事。明显的例子就要算与辽国的和战一事，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但最后毕竟达成了一个结果，也就是“澶渊之盟”的签订。能够产生实效，就表明政治处于良性运转当中。可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这种实效不属于合理的范畴，和谐的结果便往往是暂时的。所以，十几年的太平无事，也并不能保证真宗皇帝在后期就不做出一些不伦不类的事。

真宗皇帝一度常常援以自豪的就是与辽国的媾和，但这件事情不久却又使他心绪不宁，原因是王钦若对他说，寇准主持签订与辽国的

所谓和约，在实质上是个“城下之盟”。

这话把事情的性质整个就颠倒过去了。“城下之盟”是指敌军兵临城下，被迫与其签订的休战条约，是以丧权辱国为代价的。古有明训：易子而食，折骸以爨，城下之盟，不能从也！

王钦若为人倾巧矫诞，其人的劣迹早在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兵入侵时就已暴露无遗。此刻，他说这番话完全是出于对寇准的嫉妒。钦若和后来的一位宰执丁谓一样，是真宗在位期间汲汲于排挤他人的典型代表，在当时即被视为奸佞之辈，他们与刚直者寇准的矛盾也是相对平和的朝廷人事中的一个不和谐音符。政治环境中的丑恶行径往往来自于两端：一是出于个人私利，一是出于妒贤嫉能，这两者也是人性中所有缺陷的根源。当然，德行不正者如钦若之辈所以能站住脚，是因为他们还有一套取媚于皇帝的妙法，以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在人下。

有一次，官家做了首《喜雪诗》，赐予几个宰臣，其中有处韵脚用错了一个字。宰相王旦看了出来，想说与皇上知道。君臣切磋诗艺，本来是件普通的事情，但钦若却故作危辞：天子之诗岂是礼部所定诗律所能校正的？大家一听此话，不由得不作罢。岂料钦若私下里却自己去告诉皇上，说某某字错了。不久真宗在朝会上笑对宰相、枢密道：前番所赐一诗，若不是钦若指正，怕要为众人所笑了。王旦听了，真是哭笑不得。

错误的根子总是出在天子本身，然而灾难的产生却一定是奸佞之臣诱导的结果。自从钦若讲了“城下之盟”一番话后，皇上心里一直都排之不去。作为太祖太宗的继任者和帝国的圣明天子，他不能容忍费尽心机所造就的和平现实却是出自于一个与夷狄的“城下之盟”。若此，大宋皇帝的颜面将置于何处？有损王霸大业倒还在其次，如果因此而遗臭万年，那就是非同儿戏了。于是，他开始想要补救，可一时又没有什么办法。大约是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下半年的某个时间，皇上召来钦若问计：“今将奈何？”

“陛下发兵取幽蓟，可洗刷此辱。”钦若知道真宗一向是讨厌兴兵的，所以先故意说得一本正经。

果然，皇上道：“河朔生灵，始得休息，吾不忍复驱之死地。贤卿再思其次。”

钦若答：“陛下苟不用兵，那就必须做一件大功业。如此才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这就是引入正题了。

不出钦若所料，天子十分好奇：“何谓大功业？”

那就是封禅，钦若为皇上道破玄机。封禅之事天子当然省得，此乃告祭天地的圣典，在东岳泰山筑坛祭天称“封”，在泰山之南梁父山辟场祭地称“禅”，自秦汉以降，一直是国家的大典。一般来说，这种圣德之事非有德之君不能为，也就是说，天地所能接受的祭祀，必须来自于圣明天子之所为，并不是随便哪个称孤道寡者都可以做的。所以，封禅尚必须有天瑞昭示，方能进行。但是，钦若说得好：天瑞虽不能必得，但也可以人力为之！

这分明就是要皇上做伪了，亏他也能说得出口。但是真宗目前急需摆脱内心的苦恼，恢复失去的自信，动机既出于私意，是非的概念自然便就趋于模糊。其实，自古而来的封禅大典倒也并不一定都是天地圣灵所同意的，王钦若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理论上讲这毕竟是个原则问题，古代先王们对此就特别谨慎从事，没有十足的自信，谁也不敢遽行这一大典。因此，真宗确是犹豫了很久，他怕大臣们有意见，特别是宰相王旦。王旦此人是个持重之士，办事尚还有自己的原则，天子对他是否能赞成这样一个师出无名之举，心里实在没有把握。

钦若不以为然。他认为天子若以圣意宣谕王旦，王旦不敢不答应，并且为此还去做了王旦的工作。可即使这样，真宗还是犹豫不决。最后，是一个偶然促使皇上下了决心，这是有一天晚上皇上心绪不定，亲自来到秘阁征询意见。当晚值日的是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杜镐，皇帝骤然问他：卿博通典籍，知道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是怎么一回事吗？杜镐是个老实的儒士，不测天子此问何意，就事论事地答道：此也不过就是古代圣人以神妙之道垂示教化而已。这话的意思是，所谓河图洛书等天示祥瑞，实乃圣人借造化神妙弄出来的东西，目的不外乎是以此教化天下。杜镐的话恰好与王钦若的意思不谋

而合。真宗听后龙颜大悦，主意遂定。接着，天子在一天晚上召来王旦欢宴，并颁赐了一尊佳酿嘱王旦带回。王旦回宅打开，里面竟藏了一颗价值连城的明珠，这下王旦还有什么话说！

这件事情究竟是何人具体经办并不太清楚，准备工作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中进行的。但殿中侍御史赵湘明显参与了真宗的“做伪”，因为是他首先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言请天子封禅。赵湘是宗姓大臣，一直得到皇帝的信任，而其人虽然此时代理三司的部分工作，但还算不上是宰执大员，由他先倡议封禅，确是十分恰当，看来皇上真为此下了番苦心。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初三，真宗正式开始了这场“大功业”行动。

皇上先是对宰执大臣们说，自己早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就做了一个梦，梦中有神人告曰下月三日，也就是十二月初三，当降天书三篇，名为《大中祥符》，因此宜于正殿建道场一月。皇上说：目前道场已建好了，虽已过了整整一个月，但仍不敢罢去。刚才恰好看到皇城司有奏，说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曳于鸱吻之上，朕细细想来，怕就是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了。

于是王旦、王钦若皆山呼万岁，敬贺灵文果降。随后真宗亲自步至承天门，焚香受书，命陈尧叟读之。结果这封“天书”的文辞与《尚书·洪范》及老子《道德经》很类似，内容也不外乎就是始述当今皇帝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以世祚永久之意。看来作书者也并不十分高明，最后还是模仿了一下现有的成例，而《尚书·洪范》和《道德经》实在也是最普通的两部古代典籍。

天降祥瑞的事情一解决，下面便就是封禅。真宗当然还要推辞一番，最后自然也是耐不住天下所请，宣布十月有事于泰山。在此之前，已大赦天下，加恩百官，改元为“大中祥符”。这件事情最后弄得轰轰烈烈，成为帝国的头等大事，一直到十一月二十日皇上从泰山还京，始告结束。这次东封泰山直接耗资达八百余万贯，其他用度还不算在内。若从这个角度说来，确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帝王盛事了。

后来的人们曾煞费苦心地猜测真宗和满朝文武汲汲于做这件奇怪事情的真正目的，但始终是不得要领。因为像真宗这样一个尚算不上

是昏昧的皇帝，恐怕还不至于愚蠢到自己欺骗自己的程度。唯一一个勉强说得通的假设是：当时的敌对方契丹人特别敬畏天地神灵，真宗君臣乃是希望以此神道之言动敌听闻，而潜消其觊觎之心，所谓“假鬼神以雪前耻”者。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令人要长叹一声“呜呼哀哉”了。

养士与养兵之策

真宗“大中祥符”年号持续了九年，名如其分，这九年的基本调子也就是不断而来的天书、祭祀、建观、崇道而已，整个国家都在为此而大事忙碌。喧闹的庆典冲淡了一切，即使真宗皇帝御极期间天下有什么隐患的话，也必然被这些华丽的装饰掩盖掉了。

社会稳定的基础归根结蒂是由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真宗之所以能在执政后期无所忌惮地弄出这些花样，其深层的因素也就是帝国的经济尚还差强人意。当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十一月间皇上正为封禅事犹豫不决之时，曾专门就经费之事问过当时负责财政的三司使丁谓，丁谓表示经费不成问题后，真宗这才大胆地放开手脚。真宗统临寰宇近二十年岁月，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恰巧在走向歧途的关头，幸运地结束了。历史总会让一些人成为时代的宠儿，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东京汴梁的故事，不会永远像这样波澜不惊的。

真宗在公元1017年又改元“天禧”，这自然是“天书”又降的结果。五年后，又改元“乾兴”。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正月十九日，真宗崩于延庆殿，享年五十五岁。皇太子赵桢柩前即位，后来的庙号为“仁宗”，时年只有十三岁。因为嗣君年幼，继代大事均是在皇太后主持下进行的，辅臣草制遗诏，自然也有“军国大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的字样。顾命大臣之一、刚被先帝封为晋国公的丁谓要去掉此句中的“权”字，遭到一致反对。权，代理也。正如另一位辅臣王曾所言：皇帝冲年，不得已太后垂帘。政出房闼，这已是国运否背了，如

何再能删一“权”字！本朝力矫前代之弊，对后宫干政，一向是防范极严，太祖所定下的一些基本原则就包括了这一条。因此王曾此话是理直辞正，丁谓也只好作罢。这是本朝第一次出现新帝冲幼的局面，由于制度的谨严，终于没能酿成恶果，倒还是值得称道的。

新帝仁宗直到十年后的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才亲临朝政，在这先后围绕着垂帘听政九年的明肃太后以及当朝皇后的废立之事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波。这件事同真宗晚期的一次宫廷事故一样，给朝间许多宰执大臣造成了不少隔阂和冲突，也给后来的麻烦埋下了种子。从那时开始，仁宗后来的朝廷政治便波澜四起，揭开了东京汴梁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的浩瀚篇章。但尽管如此，我们却不得不暂时把它放下而从东京移目向外去放眼寰宇，这是因为，世事的发展已经开始让人大出意外。

让我们不妨从庆历年间——这是仁宗的第六个年号——开始。时间上，若从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算起，新一代天子业已即位了十八年，而本朝立国正好度过了八十年的岁月，似乎是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了。

这一年，有一位叫张方平的官员向天子上了一道数千言的奏疏。方平字安道，少颖悟绝伦，读书过目不忘，一度被朝间重臣视为天下奇才，此时的身份是以集贤院学士知谏院。谏院是专掌规谏讽谕的官署，与御史台合称“台谏”，知院官如以他官兼领，则称“知谏院”。近年来，方平一直不断就国家急务上书皇上。方平以无比的挚诚和独到的眼光尽着自己“既居谏垣，事无不言”的职责，他的这封千言书归纳国家自祥符以来的弊端有五：一是务为姑息；二是取士失道；三是命将养兵，皆失其正；四是国用窘迫；五是政出多门。这个精辟的分析基本概括了帝国近二三十年以来的现实。

对此当然还要费些口舌。

自黄袍加身时说“须听我号令”一番话的那一刻起，太祖皇帝就一直为国是殚精竭虑而夜不能寐，他和继任者太宗一起奋斗了几十年，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自豪的结果。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重文治，讲究以仁德怀远不能算错，由此而来的重用文臣，限制武将，削弱藩镇等一系列相关政策当然也是极端明智之举，但一味姑息迁就于外敌就大错特错了。文明总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从来就没有放弃生存而一味追求理想的道理，更何况这本来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世界。同理，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分官设职，不使专权，可以保证威柄归于人主而帝国无内变之忧，这一个官家天下的妙法自是赵家天子的血泪总结。但是，为人臣者若要从此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而尽听命于独夫，这又是有悖于圣贤教训的。于是，太祖为了“朕之天下”而创立的祖宗之旧和天子家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两个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也就是张方平所说的“国用日迫”和“政出多门”。不言而喻，其中最最要紧的是前者：经济的败坏。

真宗东封泰山弄得沸沸扬扬，花了几百万贯，其实还算是小样。国家财政的日益窘困，人口的增加和土地过于集中使税收减少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真正的根子是在于冗兵和冗官的不胜负担，国家的支出实在太大。

太祖曾为他的养兵之策而颇为得意。那是建国不久，他问赵普等几位辅弼大臣：当今何事能为百代之利？

赵普等人七嘴八舌，说了许多。

太祖只是摇头：“再思其上者。”

赵普等苦苦思索仍不得要领：“愿陛下道之。”

太祖说：“可以利百代者，唯有养兵。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即丰年不幸有变，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太祖的意思是，只要把兵养好，即可以使天下无叛民之忧。而无平民之乱，又何惧叛兵呢？这真是聪明绝顶的办法。事实证明，太祖后来一直以此为基本国策，甚至不惜在荒年招募饥民入伍，供其衣食，以防其啸聚山林。更进一步的，为了使叛兵也不至于产生，太祖还不吝于厚待士兵，同时在兵制上分化将与兵的天生联系，使将不知兵，兵不属将，并且将天下精兵齐集京都，而在境内各州惟设不加训练、仅充劳役的所谓“厢兵”。太祖也并非不知来自于北方的威胁和东

京的缺陷，但他自作聪明地认为，有了拱卫京都的强大精卒，似乎也不至于惧怕外来之寇。他没有想到的是，国家的强大不是以一地一兵决定的，举国的力量才是真正可靠的力量，东京固然是一只铁拳，但也只是一条臂膀而已。尤为重要的是，国家的强盛也不单是兵员多寡决定的，没有良好的政治经济，所有的军事设置都只是空谈。所以说，太祖的聪明才思都用在了他身下的天子宝座和自家江山上罢了，在这一点上，他的子孙们当然也未曾少让。随着时光的推移，到了今年——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全国兵员的数量已臻至一百四十余万，这是令人咋舌的数字。

国防从来都是以金钱为基础的。国家财政部门长官三司使蔡襄在十年后曾做过一次统计：若按禁军一人每年耗费五十千、厢军三十千计算，军队每年总支出达四千八百余万，占整个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这个难以置信的比例表明帝国的财政必然面临极其严重的危机。

养士与养兵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太祖精心设计的百代良法之一。据说，太祖曾誓书金匮，坚嘱子孙不杀一士。这种宽大忠厚固然超迈前古，但养士既须优厚俸禄，又须给予政治特权，所以冗兵之外冗官的形成也就不可避免。本朝的官制虽然大体上继承前唐旧式而来，但却起了明显的变化，从实质到形式都像个闪烁无定的万花筒，虚实相交、纷乱繁杂，令人目眩神迷。比如汉唐以来有所谓“官”与“秩”的分别，官以任事，秩以定级，互为关联而各有其名，本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系统，可在本朝却被打乱，突出点就是正官成为阶位，与所事之职完全分离，而别立所谓“差遣”以治事。这就是说，某一官职并不代表具体职务，而职事高下又与俸禄无关，并且俸禄之外还有职钱。官擢品未必升，官贬阶亦未必降；差遣——也就是事权——被罢但官、职尚在，职落而待遇如故，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在这一制度下，官员又怎能不多，庸碌之徒又如何能免！同时，分化事权已使官署机构叠床架屋，而太宗以后科举大开，进士及第后不经礼部再试即可释褐，因此每科平均七八百的新人均要授官，又反过来促使机构的膨胀。真宗年间内外官的数字已臻一万多员，到庆历年间，保守的数字也不下一万五千人。经济再发达，也无法忍受如此沉重的负担。尽管近几十年来各种赋税都以几何级数递增，但据张方

平在另一封奏表中所估计的，庆历元年的财政赤字，就已经至少在三百万缗以上。

花费如此金钱和代价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究竟是怎样一个状况，仁宗即位以来的这二十年，便是最好的说明。

中国的西部地区，有一个古老的族群羌族，它的起源甚早，一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东汉时，羌族被迫迁徙西南，其中的“发羌”一支建立了吐蕃，另一支“党项羌”历经磨难，后来迁移到今天的甘肃和陕西北部一带，最后其首领拓拔思恭降唐并随李克用出兵攻黄巢，为唐王朝赐姓李，封为“定难军节度使”，拥有银、夏、绥、静、宥等五州地区。本朝立国后，太祖继续承认党项的地位，并授其首领李彝兴以太尉的称号，彝兴亦历年进贡，对宋臣服。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其内部的分裂，事情有了变化。

公元980年起，党项内部发生争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首领李继捧率众入朝，献出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并愿留居东京。这一放弃祖宗旧业和部落权利的举动遭到了其弟李继迁的拒绝，继迁率本部逃入夏州东部，抗宋自立。在宋军的攻势下，经过数年的战斗，不断破败，不得已于公元986年附辽，被封为夏国王。此后，与宋和和战战了近十几年。这十几年中，李继迁不断内事统一，外事扩张，实力得到加强。继迁死后，子德明继位，采取外和辽、宋的政策，专力向西扩张。到了公元1031年克服回鹘后，党项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于北面的辽国之外，成为本朝西北的一个强劲的威胁。

德明死于宋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其子元昊继夏国王位，并于宋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正式称帝，建号“大夏”。元昊与他的父亲有所不同，他有着强烈的叛逆性格和民族自信心，不愿意永远依附他人。同时，元昊也具备革故鼎新的雄才大略，他善绘画，通晓蕃汉文字，精于汉人故实并能有所创新。元昊在位的十六年间，大夏占领了东近黄河，西临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的一大片地域，拥兵十五万，并建立官制礼仪，创造文字，发展自身文化，以自己独特的禀性无可辩驳地走进了中华的大家庭中。

宝元元年元昊称帝的消息两个月后才传到东京，给了朝廷不小的震动。因为自宋、夏于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签订和约以来，帝国在西边撤备也有几十年了，天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眼下一旦有警，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容易消靖的事情。然而在内心仓皇、茫然无措的心情下，朝臣们却众口一词地说元昊不过一小丑而已，可即诛灭，这真是自欺欺人得可以了。事实的发展证明，元昊的反叛，使帝国的弊端彻底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从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到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间，帝国与这个叛乱的藩国之间有三次大的战役，全部以失败告终。第一次是康定元年初的延州之役，这次的失败首先是延州知府范雍在敌人大兵压境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没有进行有效防备的后果，导致夏军长驱直入，直抵延州城下。其次是驰援的鄜延路军军将只求自保，互不应接，仅剩的一个坚守职责的军官又是文人出身，素不会打仗，最后全军覆灭。幸好一场大雪及时降临，使元昊不得已退军，延州城才得以不陷。帝国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次用兵，便遭致如此惨败，使朝野上下一片哗然，主持军事的枢密院三长官王鬷、陈执中、张观全被解职。而延州地方将领为推诿责任，聚讼纷纭，朝廷又派侍御史文彦博、天章阁待制庞籍赴延州处理。最后延州平民诣阙告急，为皇上召问，兵败诸将的过失才无可掩盖。但就是这样，天子仍没有严肃军纪而杀一儆百。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因为太祖以来的祖宗教训就是以宽仁治军，这条法则的基本核心说白了就是宁愿要不打胜仗的军队，也不要能打胜仗的叛兵。凡是聪明的皇帝，都懂得这个道理。

延州战役的失利虽然导致了两位杰出的大臣范仲淹、韩琦出长西北战局，但仍然没能扭转整个态势，紧接着在第二次战役中又遭败绩。这一次失败的原因与上次有所不同，主要是朝廷计议迟缓而地方主将又意见不一的结果。另外，中央与西北前线联系的不便，在一定程度上贻误了战机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本来，在延州兵败后，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仁宗即下令于来年正月上旬主动出击，但在具体战略上，范、韩二人却有分歧。仲淹用兵谨慎，力主未可轻兵深入，而韩琦则主张两路大军齐出，合力猛攻。仲淹反复判断利害后，先写了一封信给夏主元昊，谕以逆顺之理，劝他罢兵；

然后上疏皇上，坚持正月寒冬之季起兵伤亡必大，请于春暖时出军。朝廷接到奏报，虽同意仲淹的请求，但仍不想放弃立刻进军的初衷，下诏仲淹与韩琦云：“可以应机乘便，不拘早晚。”这一含糊不清的命令再加上朝廷所派的特使经略安抚判官尹洙已经出发的事实，决定了此次战役的胜机又将是微乎其微。西陲延州离东京道路遥远，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二十六日，尹洙方到达延州，然而仲淹说已得诏令，坚持按兵不出。尹洙在延州劝了仲淹近二十天不果，二月二十二日返回到庆州，这时才得知另一路的韩琦却单单领会了诏书中“应机乘便”的旨意，在十天前派环庆军副部署任福率领临时招募的一万八千兵马出击，结果被敌军诱至好水川，大败，死伤近万人。消息传开，邻近的关中地区物价腾踊，人心骚动，东京满朝文武亦皆为惊骇，参知政事宋庠还紧急上疏，请求立即整修潼关，以备敌东进。

仔细分析起来，也有几条内在原因可以归纳。一是军人久不习战，又无将帅督责，帝国的部队已变得骄惰不堪，甚至连武器都要雇人荷担。兵士既日事游嬉，又还在军官的组织下参与各种生意，弄得与廛市百姓几无二样。如此军队，又岂能打仗！二是太祖有所谓“更戍法”，规定军队赴边防戍或到其他重镇驻泊就粮，三年一调。结果造成军队常年流动，兵帅不合，遂使战斗力大大下降。韩琦好水川之役，败就败在几道梯队都是临时拼凑的人马，乌合之众，自然一战即溃。

范仲淹在西北先后有好几年，他所做的即是针对上述弊端而来，诸如加强训练，抚教士兵，同时注重防守，不断筑城建寨等，基本上没有犯错误。夏人称他“胸中有百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指范雍）可欺”。但除了韩琦，再也没人能像仲淹这样有所作为，整个战局连遭败绩也就不奇怪了。仲淹、韩琦有心杀贼，但也无力回天。

此次兵败后，韩琦上章自劾，诏罢招讨副使之职而改知秦州。而范仲淹因擅自移书元昊，也被解除招讨副使而知耀州。继任的是陈执中，当时也是枢密院首脑之一，四月份以同知枢密院事改“陕西同经略安抚招讨使”。陈执中做事极端保守，同原经略安抚使夏竦一样，都是怯于用兵的懦弱之辈。此番受任，一无建树，只知采取守势而已。十月，两人同罢，而夏竦更是自请解除兵柄，其为国奔走之志和

效忠之心，似乎还在执中之下。此后，范、韩两人又被起用，与知渭州的王沿、知延州的庞籍同兼招讨使，但在武备废弛、兵不能战的基本态势面前，也是一筹莫展。同年，辽国又趁火打劫，以屯兵境上为要挟，要求增加岁币，并还要求宋朝在外交字眼上不称“遗”而称“纳”。帝国迫于无奈，又只好吞下这样一个苦果。接着在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闰九月，夏军再次出击，又获全胜。帝国继在北面失利于辽四十余年后，又一次遭受外敌的重创。这是中原大朝从来就没有受过的奇耻大辱。

国家柔弱如此，朝中的政治又如何呢？

穷则思变

自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仁宗亲政起到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对夏用兵失利，帝国政坛的风云人物首推吕夷简。

夷简字坦夫，祖父吕龟祥曾任寿州知府，父亲吕蒙亨也做到大理寺丞的职位。他的堂叔吕蒙正，在太宗、真宗两朝曾三次入相，是当代的名臣，夷简正是由于他的推荐才为真宗赏识。夷简进士及第后，先在朝任职，后因河北水灾，选为滨州知府，因被真宗誉为“有为国爱民之心”，擢为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此后大部分时间担任京官。仁宗束发即位，明肃太后垂帘听政，夷简因辅弼有功升至宰相。仁宗亲政后一反明肃太后之政，凡太后亲任者悉罢之，由于一个误会，夷简不幸也在其列，但不久又复起为相。

宰相一贯是政治波澜的中心，本朝更不例外。

到目前为止，本朝中央政府机构呈现出中书省政事堂与枢密院两府双峰互峙，总理财政之三司又独立其外的基本格局。政事堂相沿唐制而来，以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总领行政，以“参知政事”副之，称“副相”。参知政事又常称为“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两者的地位渐渐相当。枢密院的职责与唐时已迥然不同，成为最高军事机

关，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等，皆以文臣充任。其长官称枢密使，或称“知枢密院事”；副长官为副枢密使，或称“同知枢密院事”，若担任副职者资历较浅，则称“枢密直学士签署院事”、“同签署院事”。

三司是盐铁、度支、户部的合并，也曾经几度分合，因总领财政，号称“计省”，其长官为三司使，也称为“计相”。计相在地位上仅次于参知政事，同样是中央政府的主要首脑之一。

宰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受命天子总理万揆。古往今来的无数事例表明，它与皇帝在制度上的关系影响着天下的兴衰，相权的消长是政治得失的一个关键所在。在某种意义上说，宰相甚至比天子更为重要，因为皇帝虽然代表着一种理念，一种原则，而宰相却是道德和忠诚的象征，它是天下四海的基本准则不被损坏的一种保证。因此，它又必须拥有经验和技巧，在“道”与“器”之间充当桥梁。从理论上讲，宰相是士的精英，由此它还必须无愧于这种信任。天降大任于斯人，他们的第一要务是坚守自己的信仰，更要寻求到一种合理的制度来保证这一道德准则本身不被邪恶异端所玷污。帝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是否有利于宰相实现理念所规定的目标，现在还很难说，不过有一点很耐人寻味：从行政、军事、财政分职的情况来看，相权存在着被分割的危险；但分权互制使政务处理趋于专门，使权威趋于分散，由此宰相的权柄无疑又是百官中最有影响力的，处理得好，还能在实际运作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尽管这种加强的权力在本朝来说对天子并没有什么影响。这确实是既矛盾又统一的事。

吕夷简第一次罢相的缘由是仁宗皇后郭氏给皇上吹了一次枕头风的结果，为此，他十分嫉恨这位参与朝政的年轻皇后。后来，天子由于恩眷别移而废黜郭氏，重新入相的夷简从中出了大力。不过，仁宗此举实在是有些孟浪，夷简的不顾原则也有失宰相的风范，因此遭到以范仲淹为首的一部分朝中大臣的反对。从此，夷简便与仲淹结下了怨恨。更麻烦的是，因为这个事件，朝中大臣围绕着吕、范两人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派别。

事态的表面化发生在景祐二、三年间（公元1035-1036年）。

夷简复相时五十五岁，以资格较老且圣眷恩渥，处事颇专横，使

同相的李迪感到事事不合，甚为尴尬。夷简的复出得力于御史中丞范讽在朝间的一力援引，范讽此人风流倜傥，不拘小节，做事说话都很随便，因与当时的宰相之一张士逊议论不合，所以一力使吕夷简重出江湖。两人起初倒还融洽，一起参与了仁宗废黜皇后郭氏的过程，但后来也有了矛盾。起因是范讽自恃有恩于夷简，便要他把自己也弄到宰相或枢密的位置上，夷简没有答应。范讽意有不平，诡激的毛病又犯，时常骂人，在皇帝面前也敢肆无忌惮地说出“陛下朝无忠臣”之类的话来，弄得大家都很不满，更不用说吕夷简本人了。

其时庞籍为御史，数度弹劾范讽不拘礼法、败坏风俗。宰相李迪与范讽关系不错，彼此又是姻亲，自然袒护范讽。庞籍被降职后，在夷简的授意下，干脆穷追不舍，追劾不停。范讽亦奋起反击，公开声言请求朝廷公断。此事最后终于弄到天子出面的程度，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二月，仁宗诏命宰相吕夷简、参知政事宋绶殿前核裁，结果庞籍降为知临江军，处理最轻；范讽则再降为武昌行军司马，并以其罪申饬中外。李迪受牵连，罢相出知亳州，其他与范讽关系亲密者也一概黜削。夷简推荐同辈的枢密使王曾入相接替李迪，宋绶调任枢密副使，给事中蔡齐、翰林学士承旨盛度人为参知政事。夷简取得这一回合的胜利后，开始独操国柄。王曾虽然受恩于夷简，但夷简事不少让、独断专行的作风，却又使王曾甚为不满。两人意见既有不合，便经常在天子面前争论，但王曾始终不占上风。两位副相中，宋绶与夷简友善，蔡齐则颇附王曾，朝廷派系的苗头已渐渐抬头。

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因反对仁宗废黜皇后而被吕夷简贬到睦州、苏州任职的范仲淹调回京城，权知开封府。仲淹回到东京，便对夷简主持下朝廷政治的不良局面，特别是对夷简单凭一己好恶进退人物，使侥幸之徒奔走其门的情形表示不满，并大胆与夷简辩论，使夷简甚为不快。仲淹对夷简的公开发难是上了一道《百官图》，他把目前的人事状况详细地画了张图，指着其中次第告诉仁宗，谁谁是循序而迁，谁谁是不次而进，谁谁属于公正，谁谁则属私心，并要皇上“不可不察”。在专制政治中，仲淹的这种“百官图”是最为执政者所忌的东西，当然也就是动摇腐败的最有力武器，在任何情形下，当政者都是不可能在这上面让步的，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压制。仲淹言事无

避到了这种程度，注定又会招来新的迫害。

这时，正好有一位龙图阁学士孔道辅建议迁都洛阳，仲淹为这事又上书皇帝，表示反对。仲淹虽然是个充满激情并富于变革精神的慷慨之士，但同时却又极端务实不尚空谈，他在地方和京城开封的政绩就处处显示出他的这一性格特色。仲淹认为，此时再议迁都毫无意义，但却无妨做两手准备：未来数年里以充实洛阳储备为主，“太平则居东京舟车辐辏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不难看出，仲淹提出的方法是一个既能够解决东京后顾之忧，同时又不影响帝国根基的最佳途径，也是一条既有可操作性，又不乏战略意义的良策。然而皇上拿它去征求夷简的意见时，夷简却说：仲淹此人迂阔，务名无实。仲淹得知后，再次向皇帝进言，内容大抵讥讽时政，矛头全指向吕夷简。这下，终于使夷简勃然大怒，开始反击。

两人先是交上章疏辩论于天子之前，但最后还是夷简得势，原因是夷简使了一招杀手锏，这就是控告范仲淹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这一着厉害！

先知先圣们早就说过：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这就是说：结党则必然排斥异己，必然以营私为最终目的。此话怎讲？人动则争竞，争竞则必结朋党而打击异己；如此则必诬罔，诬罔则臧否失实，所以导致真伪相冒，主听迷惑，故谓之“奸之所会”。朋党为害既烈，所以为人主所深痛，忠直之士所不屑。可也正是因为如此，自古以来，朋党之论却常常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借以打击别人，标榜自己。甚至恶人先告状，用这个有道之士最讨厌的东西倒打一耙，掩盖他们自身结党营私的丑恶。远的不说，前唐时期就曾出现过一次历时四五十年之久的惊涛骇浪，多少人在“朋党”二字的重负下或终生沉沦，或不得善终，朝廷纲纪也在彼此往复不休的争讦中渐渐颓丧。时间不会倒流，历史永远重复，从这时开始，“朋党”又一次成为政治斗争中一个绝妙的武器。

仲淹每论天下事，往往奋不顾身，辞论切直无所避讳，出发点也是为了天子和社稷。即使有一些同志在他的感召下厉尚风节，纷起响

应，也是出于对正义的向往。说他荐引“朋党”，这从哪里说起？不错，意气相投者免不了来往亲密，但这是“朋”而非“党”。仲淹有很多知己，都是因为志节的相近和相互认同，就像他爱好音乐而有不少知音一样，如果这样的关系也要被视作朋党的话，那天下也就没有道义可言了。

然而权力的作用是压倒一切的，既然天子点了头，一般容不得商榷和探讨。从道理上讲，此时也只有谏官们还能上言谏诤，但实际情况却是没有一个谏官站出来说话。本朝的谏臣已经养成了一个陋习，他们似乎忘记了其掌谏王恶、补阙拾遗的本职，不敢极谏天子，倒一门心思去纠绳其他官僚，这就是台、谏不分了。如此，则下情又如何上通，皇帝又怎能从善如流？夷简既收拢了台谏之臣，独持国柄也就更为方便。御史韩缜在夷简的授意下上疏，请以仲淹朋党之罪公布朝野，诫百官“不得越职言事”，事情便定了案。结果不仅仲淹被贬，所谓“朋党”的事情也被夷简大肆渲染，一时朝廷上下人人自危，谁要是提到范仲淹，马上就被目为朋党之徒。东京的空气刹那间寒意逼人，大有滴水成冰之感。

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越是关键时刻，越是能够考验人的品格。夷简严酷的政治迫害，反而使真正的志士顿生同仇敌忾之心。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首先上书仁宗，直指天子有过；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更是自称与仲淹“义兼师友”，结果两人同被罢贬。其他站在仲淹一边的还有馆阁校理蔡襄、馆阁校勘欧阳修和正在服父丧的光禄寺主簿苏舜钦等人。另外一位值得一提的是龙图阁学士李纮，当仲淹被贬出京时，无一人敢送，独李纮饯之郊外。有人问他：为何自陷于朋党？李纮笑答：范希文贤者，得为其党人是我的荣幸。李纮这话，无论是于公于私还是于情于理，都无懈可击。可见真正的贤者，并不惧怕黑暗的摧残，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和原则有强烈的自信。

在这种情形下，朝廷政治一无生气是很自然的。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宰执换了一批人，但这批人似乎还不如吕夷简，既无应务之才，又相互不和，也不乏因私害公之举，同样无所建树。到了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西边战事爆发，内外矛盾终于一旦显现，帝国的时势变得十分严峻的时候，仁宗不得不开始调整政策。其中一个主要的措

施就是在这年的二月下诏罢除越职言事之禁，并把范仲淹和韩琦调到了西北。不幸的是，在帝国窘迫的现实面前，对夏战争还是以失败告终。最近的一次是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闰九月，夏主元昊先使人伪诈求和，然后突然大举入侵。镇戍军副总管葛怀敏受命率兵抵御，结果尚未接战即被敌包围，全军覆没。这位葛怀敏好大喜功，刚愎自用，被范仲淹认为是怯懦而不知兵的典型，不可大用。朝廷众议也同意仲淹的意见，但一时无人，又难更易，遂不得已而用之，导致又一次惨败。此次失利使夏军乘胜直抵渭州，大肆焚掠，城垣之外为之一空，其惨状比诸上几次有过之而无不及，连吕夷简都不得不长叹：真是一战不如一战。

是仁宗自上而下做了一个决策。康定元年的战事一起，他就罢免了时誉很不好的宰相张士逊，又重新命吕夷简主持政务。皇上知道，夷简与范仲淹两人有着一些过节，在夏人叛乱的严重态势下，迫切需要朝廷的和谐，于是在起用范仲淹的同时，专门晓谕仲淹，要他主动与吕夷简讲和。仲淹不是那种斤斤计较个人恩怨的人，在天子的浩荡恩遇面前，仲淹很受感动，顿首上表请皇上放心：自己以前的言论，都是为了国家之事而绝非私人争斗，更与夷简无隙。这时，吕夷简也表现了自己身为国家重臣和老资格宰执的应有风范，主动提议超格擢用仲淹。仲淹得知，又去信自咎，更是表现了一种磊落的气度和大度胸怀，两人从此尽释前嫌。范吕两人的和解不仅表明了政治上的一种团结，也预示着帝国进行政治变革的条件渐渐成熟。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春，吕夷简身患重病，不能上朝。在最后时刻，夷简开始反省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和道德的信仰终于战胜了私心，上表辞位，并推荐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博等一班激昂慷慨之士人居中枢。夷简退出政治舞台，固然是迫于舆论的压力，而西边战争无功，对辽又事妥协，海内重困、民益弊苦的国家现实也是他不得不引咎退位的原因。但尽管如此，夷简晚年不惜补过而收之桑榆，虽未出于至公，天下却实被其赐，还是值得称许的。夷简既去，章得象、晏殊为相，贾昌朝、范仲淹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韩琦、富弼为副使，欧阳修等为谏官，政治局面为之一新。而最主要的，仁宗已经习惯了天下无事的生涯，对连年的用兵更是深恶痛绝，

他想要重振威德以服四海，修正百度以致太平，终于要求变革。这年的九月，天子专门召来中枢大臣共八人，赐座，授以纸笔，请他们畅言天下之要、当世急务，并命其一一条奏。天子赐座，这在本朝是前所未有之殊礼，事起仓促，大家都惶恐万分，不敢下笔。皇上见状，又专门指定姓名，责成仲淹、富弼等条列大事而实行，心情十分迫切。一个月后，仲淹挺身而出，领衔条陈十事上奏，揭开了东京汴梁崭新的一幕。东京汴梁的舞台上，一个惊心动魄的高潮已渐渐到来。

穷则变，历史亘古不二的永恒主题。

第二章
势在必行的改革，谁来做推手？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
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
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
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苏轼

范仲淹：理想主义改革派

变革的要求由来已久，只不过在庆历年间开始表现出来。

改革的意义在于一反陈规、扫除旧弊，这样一种性质决定了它的具体内容其实是次要的。改革的关键在于：它对旧有的制度变革到什么样的程度，对人们相沿而来渐以为常的积习有多大的冲击。范仲淹的新政并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是，仲淹在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却享受到了自古而来一切锐意改革者的所有遭遇，其事业也和前贤们一样落得个无疾而终的最后下场。帝国近半个世纪的拯救运动，竟从一开始就染上了凄壮悲凉、云诡波谲的色彩。

范仲淹的道德操守极佳，对天子和社稷的忠诚有目共睹。他做事相当谨慎，虽力图革故鼎新，兴致太平，但也知道一切并非唾手可得。仲淹所倡导的新政更非过激之举，他所条陈的十事亦不外乎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而已，把这些变革之举放到任何一个时候，在原则上都能站得住脚。在具体措施上，仲淹也都是从防患于未然出发，并不一味追求天翻地覆的效果。即使为了澄清吏治、限制官员骤得高位而修订太祖以来实行已久的磨勘法和荫子制，也没有对原有的规定一概予以否定，而不过是使其更加严格细密罢了。

但是，范仲淹从本质上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有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却不具备谋略家的手腕。他在人事处理方面似乎更为糟糕，与吕夷简等宰执大员的交恶倒还在其次，最麻烦的是，仲淹和周围的一些人过于冲动直率。这固然是出于坚贞的信仰而对衰败现实忍无可忍的缘故，但是拍案而起一飞冲天，无形中便把自身与他人分别开来了。在传统观念中，过分的激昂慷慨总是能让自诩持重的人感到无法理解，更不用说能使那些品性不佳的小人们嫉妒眼红不堪忍受了。

仲淹倒也并不欣赏那种自视清高、孤芳自赏的名士习气。庆历三

年（公元1043年）四月，一时俊秀不次进用而入主政坛后，国子监直讲石介按捺不住喜悦，作了一首《庆历圣德诗》，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显得过于狂放，仲淹就很不满。他不无忧虑地对韩琦道：“这些怪鬼之辈要坏大事！”话虽直了一点，但却不幸言中。

吕夷简虽生病致仕，但反对者也还大有人在，妒忌不满者的谤訾之言亦纷纭而至，夏竦是其中的代表。

夏竦此人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实在是不足称道。他仗着自己才术过人，急于进取，尤喜交结权贵；性又好色，为人则倾侧反覆，唯己是重。夏竦虽然在地方上有些政绩，但却是因走了宦官的路子才得以入朝为官。他的品性与当时身为宰相的王钦若趣味相投，自然也得到钦若的赏识，一步步做到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三司使。夏主元昊反叛，命知永兴军，可夏竦意在朝廷，不愿久在塞外，竟数度上疏请解兵柄。在国家多事之秋忘记臣子的本分，自然不能被御史们所原谅，庆历年初，仁宗终于召他入京时，欧阳修、余靖等谏官、御史便交相上章，坚决反对。夏竦人都抵达了东京，仍被诏还归镇。正是欧阳修等新一辈当政者的努力，造成了他“奸邪”的公论，石介那首诗中所指的“大奸”，也就是指他，以夏竦的秉性，对此又焉能不怀恨在心！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年初，夏竦便首先鼓动一帮人声言欧阳修、范仲淹等树党结派，又一次掀起“朋党”之论。

天子当然又很疑惑：“从来都是小人多为朋党，君子也有朋党？”

仲淹当廷回答：“臣在边塞时，就曾亲眼见到过勇敢者自成一党，胆怯者也自成一党。在朝廷自然也有正邪党派之区别。若结党从善，对国家又何害之有！”

仲淹这话与欧阳修在这期间所奏上的那篇著名的《朋党论》的核心是一样的，都以无畏的精神，并不讳言他们实为同志。在他们看来，小人们以利益结伪党，而君子则以同道为真朋，若天子圣心能察，进君子之真而退小人之伪，则更能达治天下。

然而深层的道理和正确的逻辑并不能打动高高在上的天子，皇帝

害怕“朋党”的心态从来就是相通的，因为他们坚信朋党必然危害君权这个古老的箴言。这也难怪，所有的伦理原则本来就是为了维护天子的存在而产生的，再高明者，也转不出这个奇妙的轮盘。

六月，夏竦便以石介为对象展开新的攻击。这次他下了一个重手，竟伪造了一封废立诏书，署名石介，并散布流言道此乃石介为富弼所撰。富弼时任枢密副使，是范仲淹倡导改革的主要帮手，反对者真正的目标是不言而喻的。谋事废立是大逆不道之罪，尽管仁宗不太相信这些谣言，但却使范、韩两人大为紧张。就在这时，辽、夏两国又发生了战争。

本来，宋夏之间的和议已经到了一个关键阶段。两国的和议起自去年年初，一方面既是两国人心厌战的结果，一方面也是受辽宋之间重归于好的影响。元昊几年来虽然取得了不少胜利，但物质消耗也相当巨大。两国交兵，互不通市，损失犹在夏国一方。西疆的军事统帅之一庞籍认为，夏人饮无茶，衣无帛，求和确是出于真意。然而，正如当年宋辽之间订盟一样，双方在有关国家体面的外交辞令上又不免存在着严重分歧，元昊只肯称“子”，而仁宗君臣则坚持必须称“臣”，由此和议一再迁延不决，一直拖到今年五月方始完成。宋夏一旦媾和，辽人却不愿意夏国就此坐大，辽帝遂亲率十万大军西征。辽夏交战，使帝国又面临新的抉择，朝廷意见很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力主增派部队保卫河东，预防辽国乘我不备突然南下，并请求亲自出任陕西河东。仲淹这一次出京，固然是不能忘怀于西北两边之警的缘故，但另外一个主要目的也是想避一避朝廷上下正纷纷而起的谗谤之言。然而他所没有料到的是，自己这一走，新政竟也就随之结束。

赴任途中，仲淹顺道造访已退居林下的吕夷简。

夷简很奇怪，问仲淹：“何事遽出？”

仲淹答道：“暂往经抚两路，事毕即还。”

夷简一听顿脚：“君眼下正蹈危机。既已出京，又岂能再入？！即欲经抚边事，当然也是在朝方便。此显见之理，如何不省？！”

到底是在宦海中沉浮了大半生，夷简此语真是一针见血，说得仲淹愕然变色。

八月，富弼亦被命为河北宣抚使，石介也上表请出，被命为濮州通判。改革派的势力一旦减弱，政局马上就突生波澜。两位年少冲动不拘小节的新派人物苏舜钦、王益柔首当其冲，前者因在进奏院召一帮新派名士宴集，并以伎乐娱宾，而后者又醉后即席狂语，被人抓住辫子不放，穷追猛打。宰相章得象、晏殊虽不反对仲淹之辈，但两人老成持重，平常对事情一贯无所可否，此时更是不发一言。而贾昌朝、张方平、宋祁都站在了反对派的一边，只有韩琦一人在孤军奋战。结果此事闹得很大，苏、王两人被贬外，其他赴宴的新派人士同时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连远在京外的范仲淹也被迫上表乞罢参知政事之衔。达到了这些目的后，反对中坚御史中丞王拱辰忍不住手舞足蹈，竟发出“终于一网打尽”的叫嚣，同样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激动情绪。

凭心而论，范仲淹条陈十事而施行的新政，不仅算不上什么重大变革，而且时间很短，效果也十分有限。仲淹一派的余靖就承认，朝廷一年来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达到修举法度，以兴治道的目的。无所建设自然也就无所破坏，这个事实就等于从反面证明：一年左右的改革并没有打乱原有的秩序。可就是这样，仲淹等仍然无法躲避汹涌而来的谤议大潮，迫不得已而采取了一条息事宁人的路线。归纳起来，除了仲淹等人本身的因素之外，士大夫之间意气用事的毛病是一个重要原因。

士者，有知识有抱负的有志者；大夫，辅弼天子治理国家的臣僚。士大夫合称，便指的是超拔于芸芸众生之上的一个精英阶层。古时其辈多出于贵族，随着历史进替，起于寒微者也不乏其人。但不管其出身如何，他们所能选择的道路总不外乎两端：一是兼济天下，一是独善其身。而真正的君子，则能允执其中，臻至最高尚的境界。不过，这毕竟是一种理想的人格，能够达成者微乎其微。本朝历行文教，重于德行，士大夫崇儒学、尚名节一时蔚然成风，但他们似乎仍然缺乏某种踔厉奋发的精神斗志，进而在和熙富足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温文尔雅、端重持默。而太祖所定下的那种宽容纵许的原则，更赋

予他们甘于自守的借口和理由。矛盾的是，道德伦理又一贯要求士大夫们不得忘怀于庙堂社稷，不能老在理论上空谈而不事实践。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下，他们便选择追求性命真谛来遮掩甘于逍遥的劣迹，借批评他人来证明自己并未推卸责任。他们做不来大事，但却不容许别人做事时犯一点错误。于是，在不少徒具其表的人那里，品藻人物的名士之风不免演变成相互攻讦、争名好胜的俗陋之习。他们平常自诩正色不阿、鄙斥浮薄，可一旦有人奋发而起出乎其意，却又无法泰然处之。操守可称者不免如此，就更不用说等而下之者搀杂私心于其间，往往做出诬讦陷害等下流之事了。

范仲淹成为众矢之的就是这样一个风气的产物。在这种大环境下，即使以兴治天下为共同理想而成为同道的新派人士，彼此之间也免不了意见偏杂。梅尧臣对仲淹的态度，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

尧臣字圣俞，是侍读学士梅询的侄子，赖叔父之荫得官。初未为人所知，但由于诗写得好，被钱惟演引为忘年交。欧阳修当时也在惟演洛阳幕府，特别激赏尧臣的诗才，加上一批年少才俊迭相师友，互为倡和，渐渐使尧臣知名于当时。尧臣的确有很高的文学才能，他对诗的标准很高，曾对人发表诗见曰：“凡诗，意语新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矣。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也。”确乎至论。仕途的失意使他刻意于诗作，用力极勤，甚至日课一诗，焚之以求更精。尧臣的精思刻厉，勤于创制，一变西昆浮靡旧习，从而开创了本朝一代诗风，也博得了很高的诗名。

大凡才子，都疏于修诚立身。尧臣也有这个缺点，喜谈笑，好臧否人物，诙嘲刺讥往往托于诗中。屡试不第，一生未得高官的遭遇反过来又使他晚年轻儇戏谑的毛病更加突出。梅、范两人结交甚早，尧臣在仲淹第一次因越职言事被贬后，曾有诗赠范，对仲淹有很高的评价。但当仲淹入主朝廷从事政治改良后，尧臣却对他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曾当面写诗劝仲淹作为一个南方人不要过分矜夸而致丧身。仲淹当时也就原题答复一诗，表示见解不同，但无妨殊途同归，两人的关系尚未至于破裂。

范、梅交恶的导火索即是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十一月导致革

新派垮台的苏（舜钦）、王（益柔）“奏邸之狱”。这场冤案的告发者是晏殊的外甥李定，时任太子中舍人，因为想参加这次宴会被舜钦拒绝而怀恨在心，遂向御史中丞王拱辰密报。李定是托梅尧臣去见舜钦的，事情一发生，仲淹当然连带怪罪到尧臣，由此对他大生反感也就顺理成章了。尧臣自感委屈之余，认为仲淹等人不检点行为反而怀疑故友，亦对范不满，便写了一篇《灵乌后赋》与仲淹公开决裂。这场过节虽是整个庆历新政的余波，但多少反映了士大夫之间常以意气而坏事的结论绝不是危言耸听。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正月，范仲淹、杜衍、富弼同罢。仲淹自上表乞罢参知政事之衔后，宰相章得象还认为仲淹素具“虚名”，若其一请遽罢，会使天子落下个轻黜贤臣的名声，因此建议仁宗下诏不允，若仲淹上谢表，即是挟诈君上，届时再罢不迟。仲淹哪知是计，见朝廷久无回音，以为皇上有意挽留，果真奉上谢表，仁宗这下越发相信章得象之言不虚。章得象平时于事不置可否，但这一希上求宠之着却相当巧妙，而对仲淹来说，却不啻于落井下石。杜衍为人清正谨严，好荐贤士，去年由枢密使而拜相，也因为新一任参知政事陈执中的谗构被罢，仅在职一百二十天。富弼一向以忠义知名，曾出使辽国，正辩屈敌，享有很高声誉。前段时间出巡河朔半年之久，事毕甫回，就落职而外任闲郡。

韩琦为此很不平，他不便为仲淹辩解，遂上疏替杜、富两人说情。韩琦从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希望朝廷至少能以富弼全权负责北边，以仲淹全权负责西边。由于疏入不报，再加上本人也时受讥讼，韩琦无奈，亦求补外。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出知扬州。同时在一个月前，仲淹创制的有关新法，也被天子下诏罢除。

就在这个月，于去年底暂赴外任的欧阳修上疏皇帝，力辩范、杜、富、韩等无党，并无可罢之罪。此举使朝中对立方甚为恼恨，对欧阳修的攻击也越来越烈。八月，在谏官钱明逸、知开封府杨日严的诬陷下，贬知滁州。三个月前，余靖也因侍御史王平、监察御史刘元瑜的劾奏而罢职，出知吉州。

仁宗公开排斥仲淹等人后，转而起用所谓的持重之人如贾昌朝、

陈执中等，朝廷纷争如麻、无所立事的局面依旧没有改善，更遑论去达治天下了。所幸三年后的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夏竦终于一罢不起，退出政治舞台，算得上是唯一一个可以称道的事情。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和十二月，河北京东西发生水灾，河北民死者十之八九，仁宗于是改元“皇祐”。此后的近十年里，台谏与宰执之间的议论争吵显得越发厉害，就是宰执大臣本身，意见也始终无法统一，人事更替如走马转灯，不得安宁。直到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先后数度入相位居中书达八年之久的陈执中罢相后，朝野人情方才稍为融洽。这一年又改元“嘉祐”，在嘉祐八年的时间里，韩琦、富弼、欧阳修都重新受到重用，另外一些宰执大臣如文彦博、刘沆、曾公亮、宋庠，台谏大员如包拯、胡瑗，都不仅是公忠直亮、深沉周密之士，重要的是他们有同心为政的共同想法，彼此之间能够保持基本一致而求同存异。由于这个缘故，嘉祐年间的政治面貌才终于有了一些起色。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对帝国的长治久安来说，士大夫的团结同心是多么的重要。

当然，朝野上下的意气用事和权力之争绝非是造成帝国政治风云变幻的唯一因素。政治斗争从来都是一场原则的较量，这在帝国后来的历史中将一目了然。不过，以范仲淹之高风亮节与处事有道，进行一些谨慎的改良，竟会带来这样一种连锁反应，还是让人大吃一惊。本朝立国至今亦不过百年，保守和惰性的力量如此强劲，也是人所始料未及的。

聊以欣慰的是，改革的要求一旦产生，便将势不可当，王安石的出现，便是这个趋势的最好反映。王安石，字介甫，出生于江南西路的临川县，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中进士，出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从事”入韩琦幕，五年后改知鄞县，此后历任舒州通判、群牧司判官，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又知常州，次年改“提点江东刑狱公事”，十月，入为三司度支判官，寻迁知制诰。但这时的王安石，尚还不大为人们所知，甚至在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夏天向仁宗上了一封长达万言的言事书，也未曾被天子所充分注意。

宋朝不缺的是人才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皇帝崩于东京汴梁宫城后苑福宁殿，享年五十四岁，在位共四十二年，是至今为止本朝御极天下时间最长的一位天子，这个纪录看来在今后也很难被打破。大行皇帝的庙号最终拟定为“仁宗”，这在某种意义上还算是恰如其分。不过，史官们说他恭俭仁恕出于天生，倒有一点夸大。仁宗之世外有夏人犯边、契丹渝盟，内有刑法纵弛、吏治偷惰，国家贫弱的现象亦愈趋严重。虽有秕政而未至于乱，当然天子的行为处事是一个主要原因，但这却并非是由于他具备与生俱来的仁厚天性，而是天下积重难返的积习使其顺乎其然而已。继承总是易于创造，庸碌者无过即是功，所以看起来此辈似乎有所谓忠厚之德，其实根本无从谈起。乱久必治，治久则安逸之心生，假设这还不失为一个简单归纳的话，那么真、仁两帝终不免治倦而放任，就不足为奇了。

三月二十九日的白天，患病有时的仁宗饮食起居尚还正常，到了晚间，皇上突然起床索药，并急唤左右传召皇后。皇后到时，仁宗已不能言。火速召至的御医们投药、灼艾，竭尽全力，亦无力回天，中夜时分，皇上驾崩。照旧例，此时应立即召翰林学士及宰执大员入宫商议继嗣大事，于是仁宗身边几位贴近的宦官便传令开宫门召辅臣。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个插曲。

皇后突然发话，不同意传召大臣：“官门岂可夜开？且至黎明再召不迟！”

更令人惊奇的是，皇后传下懿旨后，又亲自到御厨去取了些皇上用过的稀粥回来，同时召回御医，命人看守。不用说，这明显是对医官们有所怀疑了。此情此景令惊悸的宫人不免联想起一个传说中的故事，那是八十七年前的一个大雪纷飞之夜，当时福宁寝殿只有太祖与太宗两兄弟对饮，烛影摇动中，太祖就忽而仙去。看来本朝宫闱防卫号称谨严，似乎也不是没有漏洞。

此事后来虽不了了之，可种种迹象表明，仁宗大行后帝国的继代之事将会有麻烦。果然在第二天早晨，皇子赵曙竟拒绝嗣立，这可真是石破天惊之举！

仁宗一直未曾立嗣，为此不少大臣颇有微辞，但皇上却总是

以“朕已有分寸”之类的话来答复众人。确实，仁宗心里已经定下了人选，这就是堂兄濮王赵允让的儿子赵曙。但是濮王赵允让是高王赵元份之子，赵元份则是真宗之弟，所以赵曙以“小宗”入继“大宗”是个颇麻烦的事，为此仁宗君臣还专门议了一个名号专供其使用，并赐名“宗实”，但是赵曙却一直惧不敢当。诏书已下，犹坚卧称疾不受，他的谦虚谨慎，更使仁宗君臣欣慰不已。从此以后，其作为未来嗣君，已为大家所普遍认可。

四月初一这天，当皇后及众臣告以皇帝晏驾，请皇子嗣立时，赵曙又一次惊恐万状，连呼：“某不敢为！某不敢为！”掉头就走。但众大臣却一拥而上，或上前解其束发，或被以御服，强行将他拽上了天子的宝座。这或许算得上是本朝第二次黄袍加身的故事，不过赵曙这次的推卸却是完全出于真心。宗法之制乃立国之本，历来昭穆有序，长幼有别，始祖嫡长子一系为大宗，更是万世不易之法。赵曙是书生气十足的人，又生在讲究礼法的治世，他实在也是太过于明白了，所以疑惑恐惧而至于想要逃避。逃避既未能得逞，属于他个人的悲剧便不可避免。新帝后来的庙号为“英宗”，即位后先坚持为先帝仁宗守孝三年，不果；后又开始装病，亦未能改变现状。最后勉强听政，但始终忧疑在心，三年后就去世了。英宗心态如此，注定他干不了大事，所以当政期间每次处事，辄问臣下是否合于朝廷故事，是否与古治相宜，然后以群臣所议裁决。新一代天子的这种作风，当然要比那种觊觎神器、矫诏夺嫡的恶劣者神圣得多，但除此之外，实在也是乏善可陈。

英宗御宇只有三年，朝廷政治在一定意义上与仁宗后期是一个概念，它的特色是老资格的大臣当政，除了范仲淹、杜衍、刘沆以及两宋兄弟之一的宋祁去世外，韩琦、富弼和欧阳修都回到中枢主事，他们与相对后起的一批台谏官员又形成了某种对立。在经历过一系列的宦海风波后，韩、富等人包括欧阳修都多少改变了十几年前的作风，转而倾向于保守，尽管他们的年龄尚还没有达到老态龙钟的程度。英宗的年号是“治平”，治平年间宰执与台谏的往复争议十分剧烈，最厉害的一次就是因为英宗的身世而引起的：天子究竟应该称生父濮王赵允让为“皇考”还是“皇伯”。礼法之争与其他一些不起眼的议论一样，

往往都是政治斗争的反映。与王安石相关联而成为帝国后来历史的关键人物之一的司马光，因为此次事件而闻名天下。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比王安石大两岁，入仕也比安石略早，自考中进士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朝任职。治平年间的这场争议中司马光崭露头角时，安石正以丁忧去职而在金陵居丧。令人感兴趣的是，假如安石此时仍在度支判官知制诰的任上，不知对此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安石虽在金陵服丧，但并未因此闲居，而一直在收徒讲学，从事著述，他的学生先后有陆佃、龚原、李定、蔡卞等人。在这几年里，王安石的治国之术不仅开始成熟，声望也与日俱增，甚至迥然超过了许多老辈。特别是他坚守孝义，累召不起，尤为时人所称道。到了英宗不幸去世，新天子即位后，“金陵王安石”已经呼之欲出。

安石的成名与欧阳修有很大关系。

欧阳修字永叔，和安石一样都是江南西路人。十几年来，欧阳永叔不仅是朝廷政治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并逐渐成为帝国文坛的盟主。早在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擢甲科进士后，即与尹洙、梅尧臣等一批年轻文士歌诗唱和，开始变革西昆体以来的浮华旧风。永叔尤其推崇和提倡自前唐韩、柳开创的古文传统，继承创制不遗余力，给本朝七八十年来专以剽剥故事、雕琢破碎的骈俪文风以强大的冲击。每当他有文章写成一出，天下士无不向慕，效仿惟恐不及。特别是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永叔知贡举，以行政手段推进文风改革，终于大获成功，从此使文质并重的新文学蔚为风尚。文统与道统向来是与时代紧密相关的，永叔等人开创本朝一代新风，亦未尝不是时势变革的必然结果。

同古代文质彬彬的贤君子一样，欧阳修重交游，爱奖掖后进，就在嘉祐二年那次知贡举中，苏轼、苏辙兄弟，曾巩、曾布兄弟，吕惠卿、程颢、王回、张载等一时俊秀皆在榜中。曾巩是安石的同乡，两人于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秋在东京邂逅，一见如故。十年后的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曾巩第一个郑重地把王安石推荐给欧阳修。欧阳修一见其文章，爱叹有加，立即希望与安石会晤。至和元年（公

元1054年）九月，两人终于在京城相见，欧阳修对安石极为赏识，有诗赠曰：“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并同时向朝廷推荐。但不幸的是，尽管欧阳修及其门下士如曾巩、两苏兄弟等人都十分推重安石且交情甚厚，但由于见解的不同，最后都与他分道扬镳。

欧阳修为安石延誉，称他“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可用，所谓无施所不可者”，促成了他的知名。但安石之所以能成为本朝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关键还是他不懈于修炼自身的结果。安石几乎继承了古代贤者所有的优点，他的道德操守近似于无懈可击。就是自始至终都对他恨之入骨的政敌和反对派，对这一点也都不得不自叹弗如。安石自幼随父亲王益宦游四地，他的成长取决于十七岁那年的猛然发奋，开始树立大志，刻苦学习。虽寝食之间，亦手不释卷，读书往往通宵达旦。更重要的是，安石披阅虽广，但从不为书本所束缚，而能够断以己意，去抓住知识的真谛，这是所有聪明人共同的特点，也是安石不同凡响的最根本原因。

他早年的一些诗文就曾让人大出意外而惊叹不已，比如嘉祐四年做的那首《明妃曲》，这本来是个咏史诗的老体裁，可安石却能出其不意，以别样口吻写昭君之事，从中表现出具有叛逆意义的内涵。这首诗让许多人震叹，其中有欧阳修、梅尧臣、曾巩甚至包括司马光，并且纷纷步韵相和，但都不赞成王安石诗中之旨，当然也不可能赞成。王安石《明妃曲》表现了其强烈的叛逆性格应该毫无疑问，后来人攻击此诗“无父无君”固然无稽，但确是从侧面反映出他对传统的怀疑和叛逆精神。此诗与他的另一篇短文《读孟尝君传》在这一点上是一脉相承的。

安石对生活无所苛求，他从不修饰，甚至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同样对功名利禄亦视若闲云野鹤而从不为意。无欲则刚，这使得他从不畏忌谤议猜忌，处事一贯刚毅而坚强，具有百折不回、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斗志。许多人因此说他固执犟拗，这话可能有一点道理，但若像范仲淹那样遇事妥协，又如何能从事大业？这也许是他唯一的缺点，但同时也是王安石最最独特的素质。安石长相也有点奇特：牛耳虎头，目睛如龙，视物如射。朝中有一位大臣就曾拿安

石做例子说：如此面相者就是勇往直前，敢当天下大事的人。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初八英宗晏驾，太子继位，史称“神宗”。新帝很年轻，只有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有志进取的年纪。即位不久，便有诏起用服丧期满的王安石。这固然是安石在金陵著述讲学，声名大振的缘故，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韩绛、韩维兄弟的影响和宰相曾公亮的推荐。韩氏兄弟是真、仁两朝时期的著名人物之一，是曾入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的韩亿的儿子，素来与安石友善。新帝在藩邸时，韩维为其记室参军，每讲说天下事而为神宗所称，韩维必云“此吾友王安石之说”，这使年轻的藩王心里有了一种强烈的印象。神宗立为太子后，韩维拜太子庶子，又荐安石自代，更使神宗对其想慕日甚。在安石的不断辞谢下，新帝仍坚持曾公亮的力荐命安石入知江宁府，并开始有将他推向宰辅高位的想法。神宗曾就此试探屡请辞职的韩琦：

“卿去谁可属国？王安石何如？”

韩琦答：“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韩琦的话代表了相当一批资深大臣的看法，他们对见解迥异、锋芒甚劲的王安石一开始就抱有怀疑态度。谏职出身素以强直著称的吴奎是第一个表示强烈反对的人，他以自己曾与安石在群牧司共事的体会反对起用王安石，理由是安石“自以为是”、“所为迂阔”。吴奎早年不惧豪强，遇事刚正，但成名以后却养成了一些矫情卖直的毛病，无事不与人争。这种习气在最近十几年很流行，台谏之辈以外，有些中低级官员也以此作为进名之阶，他们的共同心态就是惟恐朝廷太平无事。正锐意于进取的神宗对此当然不满，甫即位时就破口大骂过一位弹劾欧阳修的官员蒋之奇，说他不言大事，却好抉人闺门之私。天子的批评如此鞭辟入里，说明当今皇上确是个有主见的君主，吴奎等人的反对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当年闰三月，安石出人意料地不再称病辞谢，应诏赴江宁府视事。几个月后，神宗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并兼侍讲。“侍讲”是本朝专设为皇帝进读书史、讲解经义并备顾问之职，一般以学养醇深者兼任。以安石的高见卓识和聪明睿智，一旦进入天子之侧，其意义自然可想而知。第二天，新帝改元元“熙宁”，是为熙

宁元年（公元1068年），一个百年壮举从此开始。

事情起初进展顺利不仅仅是因为新一代天子有意兴图大业的志向很坚定，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当今的一些朝廷老臣不能契合圣心而使皇上十分失望。韩琦已执意辞去，张方平也以父忧罢职，而富弼于这一年四月入朝时竟首先是劝说皇上求稳，并要天子二十年口不言兵、不赏边功。这就是要神宗放弃对外寇的抵抗，与他二十六年前出使契丹时不屈不挠的斗志真有天壤之别。就是新一辈大臣中的佼佼者如司马光，他能给予皇帝的治国忠告也只有六个字："官人、信赏、必罚。"司马光认为平生所学尽在此六字箴言，其实仍不过是一些空洞无物的大道理罢了。只有文彦博，这位同样是历相三朝并在仁宗后期起过一些作用的六十二岁老臣，对神宗承认：天下事已如琴瑟不调，须解而更张之。这是唯一一位曾在口头上流露出变革意思的朝廷元老，但也仅仅停留在认识的水平上而已，甚至几年后还是自己推翻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个当口，满朝文武既然没有一人能具有像王安石那样的激进精神和求治信念，天子倾向于安石，已是顺理成章。

实际上，天子的决策也是大多数人想法的最终反映。司马光在这前后给王安石写了第一封信，两人虽然从一开始就在政治上有重大分歧，但彼此之间的友谊和相互尊重却终生不渝。司马光为人虽然过于持重谨慎，但同样不失为是个有道之士，他反对以辩说相高的纵横之术，所以他的话也从来都不危言耸听。信中有道：

"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

这个评价已经不能再高了，尽管他在后来多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初四，皇上与富弼谈话后三天，诏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对谈。神宗向他索解心中的一个疑惑：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其中道理何在？

这是自真宗起几代天子的一个共同情结，他们有时并不讳言国家的某些衰败现实，但更多的时候则认为天下无大变、无大事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种想法虽不能说是无源之水，但却是一种天子所独有的逻辑。确实，本朝立国已百年，有一些为害猛烈的地方暴动，但没有大的内乱。可是在外敌压境下屈辱求和则是事实，由此而带来了一系列后果更是无可回避，又如何能说“天下无事”、“粗致太平”？这种重内患而轻外忧的逻辑在本朝而言是太宗奠定的，太宗说过：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而奸邪共济为内患，则最为可惧。这话如放到国力强劲致力开边的唐代，似乎还有一定的道理，但拿到孱弱而不能平灭夷狄的当今帝国来，那就大错特错了。它的症结在于：本朝君臣们都没有能想到，时代已经大大不同了，天下大势也许就会发展到有一天强大的中国王朝沦于夷狄之手的灾难。

王安石则大有不同，他认为百年无事不过侥幸而已，是赖于夷狄尚未昌炽、天灾未过频仍的帮助。而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业已丛生：学校失教，科试无方，上下偷惰，庸者在位；农民坏于差役，而水土之利不修；兵士杂以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将无疆场之权，宿卫尽无赖之徒。至于理财，更为无法，所以虽俭而民不富，虽勤忧而国不强。这番言论出自就皇帝所问而奏上的一道著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言下之意就是申明所谓“百年无事”的虚妄，同时强调变革，这与他九年前所上仁宗万言书的主题一脉相承。

天子一夜览尽，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命安石一一策划改革施设之方。可也就在初四那天，当安石要神宗“当法尧舜”时，皇上却叹了一声：“卿可谓责难于君矣！”

看来，安石对天子的要求确实过高了，在这一点上安石也未免有些理想化而不切实际。他对天子提出如此严苛的标准在他本身来说也许出于自然，但在旁人看来就不免带有蛊惑人主的色彩。“致君尧舜上”的口号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了，因为世事沧桑已让人们不知不觉地变得世故起来。在这种情形下，过于认真是容易掉进泥潭的，至少会被人当作攻击的借口。安石的精神固然可贵，但同样十分可悲。

王安石理财：经济基础规范一切力量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初三，王安石升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近五个月以来，京城及河北等地灾害不绝，先是黄河多处决口，接着河朔及东京一带地震频仍，连绵数月不止。安石正是在这个多事之秋进入了宰执阶层。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天子有意和众望所归的结果，但就像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一样，安石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冲突、斗争的考验。

早在此前的去年年初，安石除丧后竟还是累召不起，就引起一些人的抨击，说他态度不恭，对天子有所要挟。七月入居翰林后，围绕一项关于“谋杀”的法律律令的具体界定，司马光与安石意见相左，发生了第一次争执。接着，参知政事唐介因不满天子事事都视安石可否，愤懑难捺，数与安石当廷争论。可唐介虽然号称鲠直敢言，但固执强辩却无法抵敌安石，加上天子的偏向，最后气得背疽发作而死。即使不论政治分歧，天子如此袒护安石，注定了他今后的日子必然是众谤交加的命运。

王安石入居副相二十四天后，神宗下诏在朝廷设置了一个新机关“制置三司条例司”，以陈升之、王安石领衔。这个机构名义上归在三司之下，但因其职责是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而通天下之利，实际上的地位却是在三司甚至宰执之上。不用说，这是安石开始推行酝酿已久计划的第一步。到职伊始，安石立即任命吕惠卿、苏辙负责条例司的日常工作，其中吕惠卿尤为核心。

安石选择吕惠卿作为变法的同盟者是必然的。惠卿字吉甫，也是南方人，嘉祐二年进士，曾为欧阳修、曾公亮所推重。及第后曾任真州推官，秩满入都，遇到在京师群牧司任职的王安石，两人讨论经义，多有所合，遂订为至交，至今也有十几年的时间。安石在皇上面前推荐惠卿，着重说他学先王之道而能致用，这与安石本人强调经世

的观点正相一致。在条例司事无大小，安石辄与他商量而定，也是基于这一点而来，并未考虑其他因素。司马光不愿意自己一贯推重的贤者王安石走向他的反面，所以竭力攻击吕惠卿险佞乖巧、蛊惑人心，还曾专门贻书安石，说此人日后必将出卖变节，劝他疏远惠卿。但此时此刻安石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忠告。凭心而论，吕惠卿虽然为人有不少缺点，并在最后也确实背离了安石，但他为安石变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就某种意义上说，是吕惠卿成了安石的替罪羊，几乎为他承担了道德上的所有攻击。安石选择惠卿是他个人的失误，而并非是变法的失误。

到了这年的四月，事态已渐渐明朗，改弦更张的变法措施即将出台，也早已不是秘密。唐介死后，朝中大臣在天子对安石信任益专的情形下，也无人再出面饶舌。只有一贯强项的御史中丞吕诲给王安石拟构了十大罪状，上闻帝听。但这种出于愤怒而炮制出来的东西尽管来势汹汹，可根本经不起推敲，吕诲便因此而丢了官。宰执中曾公亮数请告老，富弼称病不出，都在静观时变。早年有“铁面御史”之称的参知政事赵忭，此时也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看到有事变更，就连叫十几声“苦”字。京中有一句政治笑话在流传：“中书有生、老、病、死、苦”，说的是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忭苦，倒真是十分形象。

国家贫弱只是现象，它的症结在哪里，到目前为止人们的认识尚还十分模糊，更提不出什么有效的解决办法。早先范仲淹从政风方面着想，主张首先应该进行吏治的整顿。从他的治道理论来看，仲淹所追求的也只是实际效果，尽管所条陈的十事牵涉面很广，但他最希望的还是通过精择官长使贤能者当政，从而以人治解决夷狄骄盛、寇盗横炽的弊端。不用说，他没有触及到根本问题。与仲淹同时的一位知名学者、世称“直讲先生”的李觏认为，当前的急务是土地问题，开始有了一些深入。但就他拟议的措施而言，理想化的成分仍然很重。神宗则从切身感受出发，认为理财最为要紧，在安石的影响下，逐渐对富国之术思望甚切。这个想法终于接近了本质问题，但仍有不足。

在目前的时势下，治国的根本就是致富图强，这个道理没有人怀疑，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去做。保守一派的观点是认为祖宗之法具

在，只要人主坚守圣德，则财用自足，中国自强，夷狄骚扰将终归是暂时现象。这种理论从原则上讲似乎找不出漏洞，可在安石眼里却不值一驳。安石以帝国的具体现实证明：纲纪法度虽在，但业已因循苟简，非变之而不可。安石的原则在于，富强的方法要通过改变旧法去寻求，天下事“以术为先”，就是首先要创制新的法度。安石的信念在一个时期里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在相对年轻资浅的低级官僚阶层那里得到了不少拥护。甚至有人有意无意地将这种观念概括成三句话：一是“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二是“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三是“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纷纭之议，不足采听”。这番话的具体措辞并没有定本，只是一直在朝外流传，是司马光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春把它拟作一道试策的考题上报，方才始达帝听。神宗将其称之为“三不足之说”，第二天问王安石对此有何评论。

安石当然十分赞成这本来就属于他自己的看法，只是对第一条“天变不足畏”没有明确表态。其实早在一年前京城一带地震、水灾不断的时期，安石就说过“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的话，使得富弼大为惊叹。富弼的感慨有他的道理，因为天灾乃昊天之垂警，作为一条古老的训诫一直是臣民规范天子的法宝，一旦推翻，后果不堪设想。安石的用意也并不在于彻底否定，他反对的是借天灾来阻挠变法而已，所以在天子垂询时稍稍变通了一下，没有直接评论。这或许是因为他相信只要天子能够坚持后两条，也就足以使自己成事的缘故。无论如何，像“三不足”这样的想法毕竟是本朝立国以来闻所未闻的，它必将对已有的一切产生强烈的震撼更是不言自明。

安石与天子最早就是在理财这一富国之“术”上达成了共识，同样也是在这件事上第一次遭到来自司马光的强烈反对。这场争论发生在安石入为翰林学士后不久的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八月，争执的起因十分耐人寻味。当时河朔正在闹灾，朝廷一再抚恤，府库空虚，国用有些不足，因此司马光建议节省冗费。这事本身倒也不错，但安石对他老是强调国用不足但却从不提倡合理的生财之道甚不满意，于是表示反对，认为国用不足并非急务，该用的还要用。司马光很疑惑：国家自真宗末期就已用度不足，近岁尤甚，你如何却说此非急务？安

石道：

“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善理财之人。”

但在司马光看来，善理财者只是善于敛刮而已，造成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对国家不利。显然司马光是一位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人，被历史上箕敛民财、竭泽而渔的事情吓怕了，以为凡是生财，则必无道。所以他对安石“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自饶”的理论竟感到十分奇怪，认为是自古以来欺人之谈的翻版。

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只有一个定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若不加赋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在这里，司马光的前提是有问题的。既知百物为天地所生，则天地生生不已何有尽头？又如何能计有定数？尽管安石自己承认没有很好地钻研过财利之学，但早在十年前给仁宗上万言书时，安石就知道自古治世从未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而患在治财无其道。看来安石有时生起气来当面骂那些反对者“不读书”倒还不失明察，司马光算是个读书多的人了，但囿于某些观念而不能进行认识上的提升从而有所创造，也算不上是正确的读书明理之道。

不过，司马光在这一经济认识上的失误并非是出于无知。他的前提实质上是传统儒家一贯坚持的命题，即恪守“民本”原则，通过非此即彼的逻辑手段，树立一个先验性前提，从而实现根本上的保民目的。可见，经济问题的核心就是政治，不同的政治目标，决定了不同的经济政策。

需要强调的是，帝国的根本制度是无法改变也是安石不想改变的。在此方面君臣士庶无论贤愚不肖，均无异议。因此在提出核心问题之前所采取的某些措施无非改良而已，其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必然退到次要地位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也正是如此，拟议中第一项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是罢诗赋取士而改用经义、策论，最为人们所赞成，但也最无效。唯一的反对者是苏轼这位天下知名的才子，他就明智地指出无论以何法取士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诗赋佳者未必不懂治道，策论佳者未必能够临政处事。这个道理无疑十分公允。此后进行的一些政治方面的改革如恢复学校、整治军队甚至包括巩固帝国秩序和加强

防御外寇能力的保甲法和保马法等，同样也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尽管也遭致反对，但比较而言，反对的程度也相对较轻。经济基础是规范一切的力量，这是一个铁的法则，它决定着政治与思想理念的向背。王安石十五年变法的成败得失，亦不例外。

条例司在紧张有序地工作着，不少本来有名无实的机构也随着施设渐张而重新忙碌起来。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开始提高吏员俸禄，这一增俸养廉的做法也涉及到职位较高的官员。国家官学及地方学校的重新设置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到九年（公元1076年）也一直在进行着，其他措施如整肃军队的各项法令的实施同样延续了很长时间。青苗法、均输法、农田利害条约是制定较早的措施，分别发布于熙宁二年的九月四日、七月十七日、十一月三日。保甲条制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十二月首先在京畿开封、祥符两县实施；京城市易制度和方田均税条约均颁布于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与保甲法相关的保马法在熙宁五、六年间由兵部实行。雇役法的酝酿修改时间最长，从熙宁二年二月开始拟议，十二月方第一次由条例司正式提出讨论，熙宁三年，五月至七月间由司农寺草成条例先在一二个州试行；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正月拟定，首先在开封一带推行；最后在十月一日正式颁布。在这些变革之举中，最主要的两项青苗和雇役法都是由吕惠卿最先拟就的，这一点决定了他对新法的态度和日后的转变。

王安石最终选择了一条崭新的经济政策。诸如以行政手段制定等级土地税、实行相对低息的政府贷款（青苗法）以及将劳役改为出钱免役（雇役法）等，其实质都是一种政府干预与规划经济的行为，它的目标就是国家享有生产发展的利益后再进一步推动经济的进步。所以改革在某些方面带有原始国家主义的色彩，比如国家专卖、平抑物价、直接控制流通领域以限制商业利润等，实质上都是从古代的制度演变而来，只在内容上使之贴近现实而已。从理论上讲，尽管在经济关系尚未理顺的情况下，王安石等所施行新法的动机和效果并不具备彻底平等的精神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国家的干预和实行社会平等政策可以避免人为的兼并和政治上的压榨，其合理性自不待论。可不幸的事实却是：王安石的新法在不久之后就被彻底否定了，而且被否定了

近一千年之久。这是什么原因？

一阴一阳之谓道，正确与错误总是相反相成的。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可能的偏差。

首先，尽管安石把“因天下之利”而非搜刮箕敛作为生财的主要原则，在理念上也一直严格遵守，但实际操作中因为君主政治体制的限制、官吏素质及地区差异等因素难免发生偏误。以“青苗法”为例，第一批参与条例司工作者之一的苏辙就指出：以钱贷民，使出低息，其本意在于救民而不在利，这是好的一面；但具体出纳之时，吏掾为奸而法不能禁又将是难免的弊病。两相比较，不如单纯行常平之法，以政府调节谷价来代替贷款。这是一个正确的看法，尽管苏辙也没能认识到发生偏误的真正原因。实际上，引起争议最多并几乎使所有人都加以反对的青苗法其实并不是个怪物，它不过是超越了自古而来“常平”的范围而有了一个突破罢了，其核心就是政府“贷钱于民，立息以偿”，出发点是免除农人特别是贫苦下户在青黄不接时遭受豪强高利贷之苦，同时也是与高利贷者争夺利益。正如苏辙所云，本意仍佳。然而在落后的政治体制下以及在千差万别的广阔范围内统一实行这种贷款，就未见得妥善，甚至会引起严重的问题。比如：农民是否自愿？若因灾伤，难以纳还时怎么办？官本是否会失陷？允许不允许官本的失陷以及是否将此纳入官员考核体系？户等怎样客观评定？对实际需要贷款的贫户或实际上不需要贷款的豪门大户是否应强制抑配？或者，是不是因为某种原因而实际上造成了强制抑配？另外，尽管二分年息较百分之数百的高利贷已是不能再低了，但是否对每个民户都合理？更重要的是，会不会因为某种内在原因而造成了实际的利息远远超过二分？另外，还贷是否必须以现钱纳还？凡此种种，一旦不能妥善处理，都必然带来始料未及的祸害，这也是政府参与经济领域的根本困窘所在。

雇役法的实施同样如此。“役”与“赋”一样，虽然作为天下百姓对天子和国家的义务而不可或缺，但它却也是民众最沉重的负担，历朝历代都不乏苦于重役揭竿而起的事例，于是修改完善使之尽量合理就变成了一个急切的任务。新法提出“出钱免役”的雇役法，正是基于这一点而来。但这同样涉及到一个标准问题：什么人出？出多少？政府

以此收入雇人充当差役，又如何计值？司马光认为，若照新法标准划分贫富计纳免役钱，则不免使人不敢求富；而一些不法官吏在划分等级时上下其手，又造成了新的不平等现象。“雇役法”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一个实际问题成为反对者的理由：有不少农民因为缺少货币而无法交纳免役钱，甚至不得不先用实物换取货币，从而被官府所剥削。这是由于国家金融系统的不完善而造成的，因为即使金、银乃至国家铸造发行的货币铜钱甚至纸币已广泛流通，但不能否认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会使部分地方会闹钱荒。所有这些都会给新法的实行带来严重的困难。

然而，可能性并不一定等于必然性。所以，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些可能的问题究竟发生了没有？换言之，如同改革与保守两派纷纭不息的争论所归结到的核心焦点：变革是否带来了实效？给什么对象带来实效？民是否得其利，国是否得其财？

麻烦的是，在实行变法的头几年里，改革派没有确凿的事实能够证明这一点。以青苗法而论，对他们有利的只是个别地区一些零碎的反映表示赞成，但仍旧缺乏强硬的证明。反对派也一样，韩琦对青苗法的攻击是最为具体的，他列出了可能造成的四种弊端，但也只是出于推论，并不完全是事实。实际上安石虽然坚持原则强硬推行，但也作了重大让步，朝廷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下诏停止对富户的抑配和禁止阻挠自愿借钱就是一个例子。

从当时的结果上看，雇役法究竟有没有减轻百姓负担的问题同样十分模糊，从政府在“收钱一雇役”过程中确实得到了相当数额的节余这一点来看，原来想象中彻底改变“民苦于役”的目标也并未能完全达到。可是，反对派也没有确凿的现实证据来证明雇役法相反是一种倒退。政府节余亦即“宽剩钱”的存在如果是某种纯粹的经济行为收入，那就不能算是掊克。反对派动辄以“宽剩钱”说事，仍然不过是一种借口。

越是广泛而深入的变革，越难产生明显的快速利益。其所可能的优良效应与深重灾难，都不会在短期内呈现。熙宁二、三年间（公元1069-1070年）是变法的酝酿初始阶段，在这个时候，无论就何种对

象而言，经济的得失问题显然不可能明显化。因此，正反双方在效果方面的争论，均无太大的合理性。在阶级利益上，就以“青苗法”、“均输法”和“雇役法”而论，也许只有富裕的庄园主和一部分产业主可以确定无疑在变法中受到一定损害，但他们毕竟是社会的极少数，所以问题并不十分突出。从另一个角度讲，朝廷中反对变法者也并非完全是以富户与豪强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尽管在“青苗法”抑配和利息上的争论固然可以看出他们有时确实在为富户们着想，但在道义上，反对派却没有任何理由去直接反对抑制兼并的政策本身。司马光与苏辙等人只能坚持认为：贫富自古不均，两者相资相恃，乃天下稳定之要素，既非所当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他们既然承认贫富“苦乐不均”是个不容置疑的现实，却又不主张改变，就注定了其理论违背了自古以来强调“均平”的传统信条，因而失去了道义上的基础。所以一旦变法稍事妥协，在“青苗法”问题上停止抑配和采取更宽松的自愿原则后，他们的论点便不攻自破。

苏轼——这位也许可以算得上是本朝最伟大的文学家——若干年后因为政治迫害而被一贬再贬，路过庐山时，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诗极能启人神智。一旦抽身事外，跳出五行，就可以发现原来所谓“高低远近”，不过是“横、竖”立场的差异，与事实浑不相干。变法的是非争论亦然：效果利益之辩，无非假象。比如在青苗贷款利息问题上的争论，随着往复的深入，最后显示出斗争的核心其实根本不在具体的经济范畴。翰林学士范镇，这位强硬的反对者之一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朝廷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这甚至从根本上否定了经济之辩的意义了。

王安石变法的功与过

对新法的反对几乎无一例外地出于理念上的因素。

君子不言利。假如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则必须舍利而取义，这是传统伦理最核心的内容之一。范仲淹的长子范纯仁，此时已成长为帝国政坛的一位干才，他就王安石的理财提出的原则上的诘难颇具代表性。这是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七八月间，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便超越了具体设施的分歧而表示了原则倾向的不同。这一趋势后来被苏轼所继承发展，他在这年年底给皇帝上了一道长达七千余言的奏疏，提出了鲜明的政治观点：国家社稷之存亡在于道德之深浅，不在于强弱；王道历数之长短在于风俗之厚薄，不在于贫富。不用说，苏轼的理论不仅是本朝太祖、太宗定下的基本治国框架，更是三代以来形成的基本价值体系核心。如果王安石有悖于这个原则，那就不仅属于妄改祖宗法制的范畴，更重要的是背弃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这种攻击才真正代表了反对者的观念核心，也说明了安石的变法为什么会造成如此众多的抗议浪潮和誓死抵抗。

与此相伴而来的是他们对安石的变法依据进行的分析和批判，这种理论上的是非定性一向是政治斗争进入高层次领域的必然要求。韩琦就认为安石动辄以《周礼》为证倡言理财是诬污圣典。范纯仁更直接地指出安石的内在理论其实就是管仲、商鞅之说，属于一种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而讲“五霸富国强兵之术”的权诈理论。若照此施为，必将摇动人心而乱天下。在这个严峻的关头，政治理想上的异同造成的学术分歧同样相当严重，即使是有心维新的一部分人，对安石的主张也很难赞同。突出的代表是程氏兄弟程颢、程颐，他们是本朝杰出的哲学家濂溪先生周敦颐的学生，后来自成一家而成为所谓“洛学”的开山之祖。程氏兄弟一贯具有高尚的求道与治国抱负，大程早岁入仕，政绩显著，曾经一度参加过三司条例司的工作；小程早在仁宗时就以处士的身份上书皇帝，要求天子“建非常之功”。他们强调以王道仁义之心来求治盛世，自与安石取法先王之政而来的富国强兵之术相去甚远。

因此，二程自然也不能赞同新法，并指责安石重利轻义、学术支离。而王安石对程颢只懂王道之至正，不知王道之权宜也不以为然。安石曾嘲笑他的政治主张空想难行道：

“公之学如上壁。”

程颢亦反唇相讥，道：“参知之学如捉风。”这是说安石取法先圣而实未见道，如同捉风一无所得。

因此所有的焦点便归结到司马光所作的总结上，这也代表了司马光本人所坚持的政治原则。他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三月曾经往复与安石书信争论，指责安石尽变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表示了极大的愤懑与悲哀。自此以后，政治上的分歧演变成“变”与“不变”的鲜明对立，任何技术细节上的是否与成效的有无便不成为原则问题了。

王霸义利之辩、仁德刑名之争，由来久矣。在实际政治中，两种倾向其实都有所融合，表现为“以义为上”和“公利可言”、坚持原则与从权变通的有机统一。不过，任何一方都不能改变它们已经达成的某种微妙的平衡。王安石的突出之处，就在于他所主持的新法有意识地破坏了这个平衡，因此必将被一个无形的黑洞所吞噬。此后一千多年，熙宁新政一直处于一种被基本否定的境地，也是上述价值平衡系统自我防范机制作用的结果。

原则冲突之外，还有一点也不得不提。一个人政治上的选择总是与处世之道相表里，安石所以能触动传统信条，在于他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固有禀性与坚强的意志。而绝大部分士大夫们不遗余力反对变革，恐怕也有不少是害怕生事、惟恐世变的百年惰性在作怪，这在元老大臣一辈如富弼、韩琦、文彦博甚至欧阳修等人身上特别明显。本朝从来就不乏所谓思深忧重者，这不知是否与他们读了太多史书、听了太多的教训有关。然而忧患不引产奋发反而催生苦恼，那就真是连杞人忧天都不如。这与本朝在对外方面的懦弱不堪是紧密相关的，国弱正是源于人心之弱。

五代的丧乱使太祖皇帝懂得了统一与安定的重要性，也使本朝士大夫从此就对任何情况下的动乱深恶痛绝，欧阳修撰《五代史记》，便用通篇的“呜呼”表达了这种心态。可王安石与此不同。

神宗曾有一次问安石，有没有读过《五代史记》。

安石回答说不曾仔细看过，但见其篇首必曰呜呼而已。安石的意

思是：哪里到了事事皆可叹的程度呢？

安石不同意亦师亦友欧阳修的看法，其实就是表明他与本朝以来的普遍情绪迥乎不同，他既不畏天，也从不怕事。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在立场上与所有的人分道扬镳了。

尽管从司马光、范纯仁到韩琦、富弼都掌握不少有力的原则依据，可在政治上依旧无法攻倒安石。神宗皇帝与安石的千古君臣之遇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传统原则也还拥有一些自我修正因素，并可为安石所援引：祖宗旧法固然不可轻废，但因循苟简却不能不除。若一切都是成法而子孙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更改？这一点是安石在回答神宗对“三不足”的询问时而提出来的，它的说服力足以压倒一切。安石还拥有一件法宝，那就是任何一项有作为的举动都必然会遭致流俗的反对，只有以道胜流俗，岂有坐为流俗所胜的道理？安石自始至终都坚持这样的信念，并不断以此来影响思于进取的神宗皇帝，因此改革派取得政治上的胜利是在意料之中的。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正月间，神宗在变法与反变法交锋最为激烈的“青苗法”上作了一个妥协：下诏重申禁止青苗钱对富户的抑配。在改革派来说，这种妥协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不失为一个以退为进的策略。不过，诏下后安石心情仍十分抑郁，以称疾不出并请求辞位表示自己对天子隐隐的不满。这一多少带有向皇上示威意味的举动使司马光感到愤恨，他一变往日沉稳持重只在理论上对变法进行驳斥的作风，公开发难。司马光当时任翰林学士，具有代皇帝批答奏疏的权利，于是便在安石的辞表上以神宗的名义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使得安石勃然大怒，上章辩白。最后神宗以“诏中之语，失于详阅”的手札表示了歉意，仍旧希望安石继续执政。

这件事情是个契机，使两位素来在私交上并无过节甚至还十分友善的人从政见分歧走向了面对面的对抗。司马光这一行动同时也激起了安石采取强硬的政治手段为变法扫清障碍，这也是变法走向深入后的一个必然。

在一系列的压力下，首先是范镇上表求去，诏许之；接着御史中丞吕公著、参知政事赵忭同被罢职。三位中书舍人宋敏求、苏颂、李

大临亦被罢卸知制诰之事权。安石特别对台谏官员进行了调整，数月之间，人员几乎全被撤换。早在此前，权知开封府郑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诰钱公辅等就因不同意新法而被解职外任，范纯仁甚至在安石的盛怒下降职左迁，富弼、韩琦、张方平等一班元老也早已自动挂冠求外。到了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初，欧阳修、曾公亮甚至包括一度与安石尚还不甚对立的陈升之也在无奈之下自请退位。在这先后，苏轼、苏辙与程颢、程颐两兄弟也离开了朝廷。最后是司马光，在九上辞表后终于未能被天子挽留，先是出知永兴军，三月份，请求致仕被批准，归居洛阳。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自此绝口不谈政事，只是在洛阳埋头于读书著述。这也许是大痛苦之下必有大无奈的缘故，但更多的是他以自己独有的儒家精神在磨炼斗志，用沉默来表示抗议。这与那些囿于个人进退与好胜意气而信口雌黄、造谣中伤的人相比，倒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与此相应的是又有一批新人步入帝国政坛的中枢要地，诸如安石的左右手之一韩绛入兼参知政事，谢景温进入御史台，曾布出掌司农寺等。不过，神宗在这些人事过程中仍旧巧妙地作了一些调节，他不顾安石的反对，先后进一步提高了御史中丞冯京和三司使吴充的地位。尽管冯京的擢升是安石为调离吕公著而不得不作的让步，但这两位确都是坚决地反对新法的人。皇上的这一举动表明一个想法已经开始抬头：作为天子是不能容忍对立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的，否则独一无二的神圣权威必然会受到动摇。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十二月十一日，韩绛、王安石两人同时拜相，与此同时，“保甲法”和“雇役法”两项重要举措开始实施，标志着变法运动进入了高潮。此后的两年，变法不仅继续深入而且逐渐开始产生效果。先是在对外方面，王韶这位继范仲淹之后本朝又一位杰出的治边人才，在安石的大力支持下，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招抚了一个较大的吐蕃部落，使二十万人归附大宋，本朝疆土也因此拓展了近一千二百里。此后，王韶不断乘胜进攻，最终在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将西夏以南的大部分吐蕃部落收服，彻底切断了吐蕃、西夏之间的联系，成功地实现了他早在八年前就提出过的使夏人腹背受敌的目标。这是自澶渊之盟以来的第一个重大的对外军事胜利。这一

次成功的取得固然与王韶的经略之才和安石的正确方针密不可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使得帝国的国防边备有了较大的增强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王安石主持下的新政方面，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是几个重要的变法举措实施推广的年份，继前两年的青苗法之后，雇役法再一次引起了广泛的反对，但由于安石的强硬对策，改革的趋势仍旧没能被反对派所动摇。

在取得胜利的同时总是要犯错误，这是历史上所有的激进者共同的毛病。安石对来自反面的意见过于敏感了，他在政治上排挤一切的做法使敌对势力空前壮大，这种局面使得本来属于一种正义行动的改革看起来倒成了少数人一意孤行的倒行逆施。历史上，在野的与受压制的一方似乎总是正确的一方，这种约定俗成的概念使得不少毫无原则的人跟着反对派同声谴责，也使得改革所面临的压力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即使安石从不畏惧所谓的天下怨谤，神宗却不一定能够无动于衷，更何况变法派内部本身并不都像安石一样具备这种不折不挠的天性而坚如磐石。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随着方田均税条约的实施特别是“市易务”这一机构的建立，更大的政治冲突终于爆发。

市易务的建立出自一位布衣之士魏继忠的建议，它的出发点是由国家来平抑京城过于波动的物价，打击垄断富商。其实质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物价低时稍增价买进，以保护普通商贩；物价高时则稍损价卖出，以保护平民。这一做法原先仅在京城实行，后来也逐渐推广到一系列重要城市和地区。这本是典型的国家干预政策，也是自古以来的常法，在理论上并无可厚非。但是，此中却有一个潜在的结果，即：政府同时也能从中得到一些利润。这就又不免使反对派老调子重弹，发出所谓的义利之叹了。唯一尚在朝中的元老大臣文彦博便认为这是有损国体的行径，在他看来，堂堂大国惶惶求利，实在是无可容忍。

更直接的导火线是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八月“免行钱”的实行，这是市易政策推行后的一个附带产物。所谓“免行钱”，其实就是一种商业税，它规定京城各行业按利润厚薄交纳，税款付讫后即免除各行户对官府的无偿供应。不用说，这种手段因为能在保护商业的同时更能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所以同样为反对者所痛恨；另外，货币

税收总是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对立情绪，加上收钱标准和具体实行也很难做到公平无误，因此再一次引起争议并不奇怪。不过，免行钱一事引起严重的冲突倒不在于上述几方面，这一次惹起麻烦的根子在于它的打击对象同时涉及到了政府机关、宫禁及皇族中的有关方面，具体而言，就是负责采办公家及宫廷用度的大小官员和宦官，以及参与某些垄断经营的部分皇族。正是这个缘故，此法在实行一年后，反对的呼声几乎来自各个阶层，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此法颇“不便”，甚至有消息说，两宫皇太后亦为此泣下。巧的是，自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七月至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京城一带地区滴雨未降，引起了严重的旱灾，朝野纷纷传言：此乃朝廷收免行钱之故。有一位地方官郑侠甚至密上了一张《流民图》道：若将一切掊克不道之政尽数罢去，十日之内再不下雨，即请斩臣首以谢欺君之罪。这下不由得神宗不慌了，四月初六，天子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下令暂停青苗、雇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岂料，诏下后果真雨下。天命虽不可畏但天意却高远难测，安石第一次感到了无可奈何。

尽管吕惠卿在天子面前痛哭流涕，暂时使神宗收回了成命，只罢除了方田均税一法，但在如此天灾人祸面前，改革面临挫折已是在所难免。十九日，安石已无法再安其位，遂上表辞相，请求外任使职。神宗当然不甘就此罢休，天子更不愿相信他的一腔热诚竟会败坏天下，于是再三挽留安石，希望安石至少能以天子师傅的名义留在朝中，但这对安石来说已毫无意义，去意甚坚。在赴知江宁府之前，他向神宗推荐了韩绛代替自己，并特别擢升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以辅助天子继续未了之功。安石去后，变法的步子虽没有从此停止，但事情起了一些变化。

变法派成为了时事的中心。

在变法派的几巨头中，除了王安石，主要就是韩绛、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章惇五人。韩绛的地位最高，但才干有限，处事无方，他在前几年曾自请出使陕西、河东，也一无建树。曾布是安石好友曾巩的胞弟，时以翰林学士兼三司使，从地位上讲是仅次于韩绛的第二号人物，几年来与吕惠卿共同参与了绝大部分变法的筹划。曾布此人对变法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可也许是在与吕惠卿起草变法章程时意

见不同而产生矛盾的缘故，他与吕惠卿关系一直不好，进而对时任提举市易司务的吕嘉问也有些不满。由于一时冲动，当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三月，神宗在一系列压力下密令曾布调查免行钱过程中的问题时，曾布竟不顾全大局，参劾吕嘉问违背市易原则并有不法行为，同时还间接地批评了一下免行钱措施。因为曾布所报与事实多有出入，而吕嘉问也有办事不明的现象，在曾、吕当廷对质后，神宗折中处理，两人皆被罢黜。曾布的这一做法显然在客观上帮了反对派的忙，自然使安石、惠卿极为生气，这是改革派内部发生的第一次裂痕。

吕惠卿无疑是变法派内部最关键的人物，也是除安石之外对变法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从熙宁二年到七年，他先后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司农司、国子监、军器监任职，兼任过知谏院、知制诰及翰林学士，直到入居参知政事成为副相。尤其重要的是，绝大部分新法的创制发明都出自他的倡议，包括许多具体内容的拟定；在理论战线，他与安石的长子王雱共同修撰由安石审定的《三经新义》，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所有这些都不仅为安石所肯定，亦为神宗所赏爱。因此，吕惠卿在安石之后成了反对派另一个主要攻击目标，为安石分担了巨大的压力。

惠卿极其聪明，更兼学识渊博，既不乏理论水平，又具有实际操作能力，是个典型的能人。这种人最大的可贵之处在于沉溺理想之中，具有高昂的工作热情和强烈的事业心，最大的缺点是不可避免地在人际关系上有欠周到。在具体工作中惠卿不仅难免与安石发生牴牾，和其他人如后期参与变法工作的沈括、李承之等也多有嫌隙之处。在安石的主持下这些问题尚不至于突出，可安石一旦离去，隐患就开始暴露。曾布事件发生后未过多久，韩绛也对吕惠卿产生了不满。

尽管朝野闲话称韩、吕两人一为“传法沙门”、一为“护法善神”，但实际上韩绛并没有做多少工作，而是吕惠卿一力主持着变法的深入和对抗着各方面的攻讦。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六月，郑侠自攻击安石得逞后，又上了一道《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放言“国忠已诛，贵妃未戮，人以为贼本尚在”，矛头直指惠卿。惠卿展开反

击，禀告皇上并使神宗予以重责，借天子之手压住了郑侠的嚣张气焰。紧接着在七月，惠卿创订“手实法”，加强了民户财产的清查，以保证免役钱的平均交纳。最后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正月又成功地将郑侠清除出朝，同时还使冯京被罢。惠卿一旦得以施展手脚，他的热情和创造力是无穷的，因此也免不了过于冲动，有些做法包括“手实法”甚至使远在金陵的王安石亦来信表示不同意见，这些都为他以后遭致无端的诽谤埋下了种子。在惠卿的风头面前，韩绛终于不能忍受，遂密请神宗重召安石。这个想法正与天子不谋而合，于是在安石罢相十个月后的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十一日，皇上又召安石复相。不用说，惠卿对此十分失望。

虽然他从心底来说不反对安石重执朝柄，但这件事情使惠卿受到了伤害是无疑的，因为这明摆着就是对他的不信任。跃跃欲试的雄心被兜头浇上一盆凉水，这种心情对任何人来说都无法排遣，惠卿当然也不能免俗。更何况安石受诏后竟一无辞谢立即就道，七天后就赶到了京城，更使惠卿十分伤感，开始萌生去意。改革派这次发生的裂痕十分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变法今后的去向。

事实证明王安石选择重新回朝并不是个高明的决定。复相后不久，韩绛首先和他发生分歧，闹了点意气后竟挂冠而去；接着是吕惠卿又不满于安石对他的怀疑态度，心下十分伤感，也上章求外。天子自然无法体会此中的微妙，他问惠卿：何故无事而数求去？是否因与安石在商议用人方面有所不合？

惠卿的一番话实际上已经很明显了：“用人之议与臣去留无关。前此安石为陛下建立庶政，不料千里复来后竟一切托疾不问，与昔日大异，不知欲将大业付与何人？”安石身体两三年来一直不好，但复相后托病不问事，在惠卿看来似乎是意有所指，所以他才说出此话。

神宗道：“安石何至于此！”

说到这里，惠卿的情绪已经控制不住：“安石不安其位，是因为臣在。不如逐臣外去一听安石，天下之治可成。”显然，惠卿同样也太过于意气用事了。

这一年的八月，御史蔡承禧奏劾吕惠卿与章惇、李定等人结成死党。接着，御史中丞邓绾又揭发出他与兄弟吕升卿强借华亭富民五百万钱，与知县张若济合伙买田之事。如此一来，惠卿自己要走都走不成了，十月，被罢，出知陈州。邓绾也曾不遗余力地参与了改革，但安石罢相后一度倒向惠卿，此番举报虽出于对安石的献媚，但肯定也得到安石的默许。就事论事地说，虽然惠卿的弟弟升卿在这件事上当负主要责任，但惠卿也不是一点过错也没有。在反对派来说，惠卿永远都是打倒王安石、分化改革阵营的突破口，因此他们一直在千方百计地寻找着机会，并不断地散布谣言，可一直没有得逞。令人悲哀的是，最后将惠卿撼落的却是改革派自己。内部的分裂比任何外来的力量都强大，这个事件就是再好不过的例证。

韩绛、吕惠卿固然要为最后的分裂承担主要责任，但安石也难逃其咎。安石执政数年来，由于敌对浪潮的浩大，不得已以一人与万人战，在长期的紧张与忧愤下，固执的性格便显得越发突出。他不能容忍任何对变法的反对固然反映出他的鲜明斗志，但他不能容忍同一阵营的不同意见则是一种偏执行为，这对他所从事的事业显然是得失参半。一贯支持父亲的王雱就在这个时候对他说了一句用心良苦的话：

“公不忍人，人将如何忍公？！”

安石当时默然，显然他知道自己的这个缺点。但天下人皆不同己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他无法对此释然。韩绛与吕惠卿的辞去又加深了这种感觉，安石矛盾的心态由此加重并不奇怪。在回到相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安石除了在道义上不断地为他的变法理论进行辩白之外，确实没有做进一步的实事，惠卿的指责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最后的契机是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六月，爱子王雱不幸英年早逝，给了安石以巨大的打击，他的无畏精神和一腔热忱终于从高峰坠落，遂不断上表请求告老还乡。此时安石五十五岁，人到晚年百事哀，贤者如安石，也没能避免这个人性共同的弱点。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安石第二次罢相出京回到江宁府，次年六月，又辞去“判江宁府”的官衔，正式退休。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安石在江宁府金陵城东门外蒋山之麓，筑

屋凿塘，号为半山园，在此度过了最后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安石虽未忘怀于庙堂，但更多地是在思考和反省，在寄情山水中排遣自己的忧伤。除了跨驴出游之外，安石总到附近的定林寺里去读书著述，他的《字说》就是此时写成的。

曾激烈反对新政的苏轼后来有一次路过金陵，安石没有忘记这位意见相左的后辈，野服乘驴谒于舟次。苏轼不冠迎揖，道：

“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安石笑道：“礼岂为吾辈而设！”依旧豁达豪放，一无鄙俗之气。

苏轼谈起早年因反对新法而被罢黜的旧事：“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

安石无语，往事又何堪回首。彼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此际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于是招苏轼共游蒋山。数日间，或论文字，或味禅悦，尽得相晤之欢。苏轼感慨而对人说：

“不知再有几百年，才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

实在而论，放眼寰宇纵目古今，也不会有第二人了。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安石大病一场，病愈后更不免意气消沉，他呈报神宗，将半山园改作寺院，并由天子命名为“报宁禅寺”。次年三月，神宗去世，又给了他一次重大打击，从此后终日只以读书为意，时时以手抚床而叹，有时甚至绕床终夜，不能入眠。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新法全部罢废时，安石业已忧郁成疾，四月初六，不治而亡，享年六十六岁。安石死时，他的老朋友兼老对手司马光也在病中，闻之亦怅惘莫名，他给吕公著写信道：“介甫无他，但执拗耳！”信中又说：“不幸介甫逝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看来司马光也知道，对安石个人的刻意诽谤和诋訾中伤，绝非是真正的仁者应做的事。实际上，即使是对变法的谴责和反对，也并非都是出于高尚的目的。安石的生前身后名和新政的是非成败姑且不论，举国上下如此意气用事而争讦谤讪，一定会带来更大的恶果。

书生意气与快意恩仇

王安石离开朝廷与天子的倾向当然也大有关系。变法已经持续了九年多，在强劲的反对面前，本来就信心不足的神宗放弃锐进而转向守成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政治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妥协，神宗的后十年就属于这个渐变的过程。尽管如此，至诚恻怛、思怀振作而心忧天下的神宗皇帝依旧值得称许。没有神宗，就不会有王安石，更不会有十几年的变法图强。

历史也有着它独特的惯性。在王安石退休一年后的公元1078年，神宗改元“元丰”，元丰时代持续了八年的时间，除了在官制上作了一次大改动外，其余措施都基本上延续了熙宁时期的做法。八年间，宰执之臣有吴充、王珪、元绛、章惇、蔡确、冯京、吕公著等人，基本上是改革派与中和派共同当政，这也是神宗后期有意识地采用“新旧人两用之”策略的结果。其中王珪居相时间较长，在延续熙宁新政方面，尤其功不可没。这位被人称为只会说取旨、领旨、得旨的“三旨相公”虽然无所发明，但他自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就入居参知政事，跟随王安石从事于新政，此番感于天子的知遇而勉力守业，居然也能做到顺其自然，绝非像传说中说的那样一无是处。

元丰的平淡是相对于熙宁的轰轰烈烈而言的。其实，神宗天子依旧年轻而有志建功，特别是在用武开边收复旧地方面一直心有未甘，但对外作战却始终未尝胜果。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那次对西夏发动的强大攻势，尽管兵民合计有近六十万人，可还是一无所获。改革固然使国家的财政和边防有所增强，可并没能唤起帝国同仇敌忾的决心。早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辽人威胁要重划地界时，所谓“纳污含垢，且求安静”，以免一跌之失的主张就已经成为朝野舆论的主流。富弼在一道奏表中说，当听到天子有亲征的打算后，中外臣民益更忧惧，以至于“心陨胆落”。在这些懦弱胆怯的人来看，即使是弃北而西，去征服稍显弱小的西夏，也是个招引祸患的事情。当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神宗决意西讨时，知枢密院事孙固认为“举兵易，解

祸难”，吕公著认为“既无大将，不如且已”，老臣张方平嘱苏轼代撰奏疏，甚至说皇上好兵如同好色，所谓“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帝国的普遍心态如此，第二年九月，当永乐城这一控扼夏人的要害失陷后，皇上从此意志颓丧而一蹶不振，就不是没有原因的了。

我们这位有作为的天子死得太早了，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初五不幸驾崩时，年仅三十八岁。天子在这个年龄撒手而去，注定又要给帝国带来一位年幼的少君，这就是史称“哲宗”的赵煦，即位时年仅八岁，由祖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一个缺少专权的政治真空，往往是久被压制的在野势力重新登台的最好机会，这个月底，司马光入朝吊丧，便引起了京城的轰动。人们不仅总是同情弱者，同时还总在期望着新的东西，因为这样才有机会宣泄他们的怨气。在舆论的召唤下，这年四月，司马光被太皇太后起为陈州知府，五月，入朝为门下侍郎。翌年是新帝的第一个年号“元祐”，这年闰二月，司马光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丰改制后，尚书左右仆射即为宰相，左仆射又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枢密院、门下及中书两省长官、尚书左右丞同为宰执之臣。参知政事一职已罢。司马光闲居洛阳十五年后一朝平反，便彻底宣告了新法的寿终正寝。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做得如此坚决，如此迅速。在入相前后一年的时间里，司马光基本上废除了所有剩余的新法。此时的司马光，已经完全失去了旧日持正谨慎的面目，变得狂躁冲动，峻急严厉，不遗余力地从事着有生之年最后的事业。

新法并非一无是处，就是不少反对派也承认这一点。苏轼、苏辙就反对全部罢废新法，至少雇役一法可守而不可变；吕公著也认为青苗、雇役与保甲等法利害参半，只可调整，不应尽去。范纯仁甚至主张为国用考虑，亦无妨继续青苗法。但这些都动摇不了司马光的决心。从道理上讲，他此刻提出的理由甚至还不如十几年前那么有根有据，在新派人士章惇不断的辩斥下有时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但拨乱反正既是眼下的潮流，又为信任元老的太皇太后所赞成，他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病中的王安石一直保持着沉默，但当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雇役法终于罢废而重行差役法的时候，安石也忍不住愕然

失声：“亦罢至此乎？”

安石无限感慨地对人道：“此法绝不可罢！我与先帝商议二年方行此法，已做得无法再详尽了！”

安石的疑惑其实毫无必要，因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本就在于事情的性质而不在于事情的内容。所以苏轼等人反对尽除新法，却不反对从政治上清除一切变法人士。司马光在废除各项新法的同时，设置“诉理所”以昭雪熙宁、元丰年间的各类人事冤抑，便明显是出于报复心理。原则争辩一旦成为快意恩仇，人身迫害也就不可避免。一贯温和而讲究仁义的本朝政坛，意气纷纭之外，又从此沾染上了血腥之味。

如果没有后面的那些事发生，帝国这艘负载沉重的巨船是否就一定会遭受灭顶之灾，实在还是个未知数。到元丰末年，变法使帝国在广储蓄、救灾荒、兴田利、振贫弱等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特别是使国家的财政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据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的几个统计数字来看，保守估计，整个帝国的钱谷节余数量亦达数千万贯、石，已经可以供给二十年之用。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即使小邑所积，也相当可观，更不用说国家的一个战备库“元丰库”所积藏的金帛粟米了。这个储备库是神宗在元丰年间特别设置的，地点在司农寺南，收藏三司岁收之外的剩余收入部分，至少有二十个单元，因为天子赋诗二十字分揭其上。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由此看来，神宗与王安石富国强兵的最终目标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尽雪前耻，恢复旧疆。安石曾说过，天下事如弈棋，以落子先后当否定胜负。应该说，安石不仅占了先手，投子也不失其当，可惜的是后来者没能明乎其理、顺乎其势，从而一步步地丧失了主动，最后将一局大好河山尽付他人。

如前所述，政治斗争虽然归根结蒂都是原则和信仰的较量，但也并不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个人的好恶和处世之道甚至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私利不能完全摒弃的时代，政治斗争有时就是利欲之战，初起于互执己见，再变则成意气用事，三变而死生祸福之事起。如果说熙宁时期围绕着变与不变的新旧之争尚还不失以崇高的治道原则为旨归的话，从司马光的一味更化开始，帝国的政

治斗争就开始演变成纯粹的意气之争。尽管人人都各据其辞证明自己的高尚，总是有这样那样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从来都没能跳出个人是非恩怨的圈子。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九月初一，王安石去世五个月后，司马光也不幸病故，总共只当了七个月的宰相。这天，朝廷正在明堂举行祭祀典礼，同时降敕大赦。司马光逝世的消息传到，在场百官无不震惊。宣仁皇太后甚至恸哭失声，连年幼的皇帝也受之感染流涕不已。两省官员在下面合计，准备仪式一结束即前去祭奠，可惟有崇书殿说书程颐表示反对，“崇书殿说书”是本朝皇帝的侍讲官，属于帝王之师的性质。此时，程颐之兄程颢已经亡故，他本人在司马光等人的推荐下以布衣身份受诏出任。

程颐先引了一句经典：“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此语出自《论语》，意思是说孔子在这一天哭过，就不再唱歌。程颐接着道：“岂可贺赦才了，即往吊丧？”

先不论程颐如何的不近情理，就是他的逻辑也有问题。于是有人非难道：

“孔子哭过则不歌，并非歌罢则不哭。今大赦已毕再往吊丧，于礼无害。”

本来，尽管程颐恪守经义近乎刻板，但人家的话并不违背经训，程颐就算不肯轻易就范，一时也无话可说。然而一旁的苏轼却不省事，摆出他的才学和机智，给程颐来了一句幽默。

苏轼道：“此乃枉死人叔孙通所制之礼！”

叔孙通是秦汉时人，先仕秦，后从项羽，再归汉高祖刘邦，虽曾采择古礼而定汉朝一代朝仪，但此人是个随机应变的典型，连他的学生都不耻于他的行径，说他“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而得亲贵”。苏轼把叔孙通称为枉死人，又把程颐比作叔孙通，骂人骂得太高明了，难怪众人听了此话，都不禁笑出声来。程颐是个一本正经的人，他如何能承受这样的讥讽？嫌隙就这样产生了。

程颐自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幼有高识，非礼不动。十四岁

时又与兄长程颢一起问学于经学大师周敦颐，饱受礼教的熏陶。程颐一直没有做官，长期的野贤形象更使他执着于对现实的抵触和对古典的怀念，在他看来，任何违背于圣训的事情都是一种邪恶，一个正直之士的唯一目标就是向圣人看齐，绝不容许有半点的杂念。因此，程颐其实是个绝对的宗教家，为人严肃而苛刻，在他身上已没有丝毫的人情，有的只是对终极目标的坚定信仰。他平生不喝茶，不观画，亦极少做诗，甚至自己生日也致斋恭肃，不事宴饮。自从主掌天子讲筵后，程颐自感责任重大，夙夜殚精竭虑，惟欲主上德如尧舜，因而既有点性急，更有好多做法不近情理。十几岁的幼君下课后折了一条柳枝，程颐也要板起脸孔告诫道：春天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对此，有一些人认为他不愧为天子导师，但更多的人不以为然。连推荐他的司马光也曾感慨而言道：

“人主之所以不欲亲近儒生，就是这种人坏的事！”

无风不起浪，苏轼极其讨厌程颐更是大有原因。苏轼此人一直就非同凡响，他出生于相对和熙而富足的四川，接受了各种思想流派的影响，既不乏黄老清静之学，也沾染了纵横机辩之气，同时又喜好佛教、精通禅理，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因此倾向多变而态度不定。苏轼又有极高的文学之才，诗词书画无一不能，情感丰富旷达任性之外，也有些狂傲不拘之气，人生和仕途的蹇困侘傺也并未改变他的这种禀性。苏轼是与程颐截然不同的人，自然无法忍受程颐的迂儒作风，他本就性不忍事，喜好谐谑，连平生最敬重的司马光也敢骂，又何况程颐！苏轼早就指责过程颐言行迂阔，好古不当，有时甚至处处与他对着干。不过，这一次做得太直露了，程颐即使不以为意，也有人会为他抱不平。程氏兄弟虽然无权无势，但他们一直在开馆授徒，传播学说，拥有众多的学生，这同样是一个不容低估的力量。

十二月，程颐的门人左司谏朱光庭、右司谏贾易这两位谏官，因为其恩师无端受辱而心不能平，开始围攻苏轼。当然，这件事情本身并不能构成弹劾的理由，他们必须要从严重的政治问题上着手。朱、贾两人着重指出的是苏轼在主持学士院馆职考试时出的一道考题有问题，有讽议朝政之嫌；苏轼对天子之师程颐的不恭作为一个附带的证据也被提了出来。弹劾甚至还指出，苏轼对死去的司马光也有极不负

责的言论。苏轼当即上章自辩，表示不能接受这种指责，而他的同乡兼挚友殿中侍御史吕陶上疏，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朱、贾之举明显属于公报私仇，同时对朋党之弊重新抬头表示了忧虑。

吕陶的担心不无道理，但他的参与却很不明智。朱、贾是程颐的学生，而吕陶本人是苏轼的同乡，事情的本身就给人以“朋党”之嫌。虽然侍御史王觌特别是元老派人物宰相吕公著、枢密使范纯仁居中作了一些调停，暂时压制住了事态的发展，但苗头一旦出现，就说明事情起于内部，外在的力量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到了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的八九月份，程、苏两派的往复诋讦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人们以地域为名，称程颐一系为“洛党”、苏轼一系为“蜀党”。“朋党”一词毫无避讳地出现在朝野上下的议论当中，固然带有一定的批判意味，但多少表明本朝的政局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是什么样的一个基本态势了。

“洛党”、“蜀党”之争的激化促使朝廷的派系进一步明显。王安石一系的新政人士蔡确、章惇等还在继续反抗，与之相对的则有司马光一系，以执政官之一尚书右丞刘挚为首。刘挚这个人很值一提。

此公字莘老，永静军东光人，早享大名。王安石初秉政时，搜择人才不遗余力，擢其为中书检正。但仅过月余，刘挚即与安石议论不合。神宗召对，问道：

“卿是否从学于安石？安石多次称赞卿器识俱佳。”

可刘挚却不买账：“臣东北人，少孤，独不识安石。”

刘挚一贯强项，他曾与曾布在司农寺对辩，并要求天子将两人所上奏疏宣示百官，让大家考定是非。刘挚的大胆使其声誉鹊起，逐渐成为司马光一派的栋梁人物。他是河北人，此派遂被其他几方称为“朔党”。朔党人士本就以正统派的面目出现，大多担任政府要职，更是一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在天子冲幼、后宫听政的政治局面下，就是吕公著等元老独立其外而有心调和，也不能有效地阻止这场派系斗争。

从表面形式上讲，学统是地域之外形成朋党的另一个要素，程颐

一派就属于这样一种性质。学术讲究师承家法，这是源于见解的不同和生存的需要，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使学术走向政治而去争一个正统地位，这就与学术的意义背道而驰了。当年王安石定《三经新义》，以一家之学人居官学，就是这样一种倒退。程颐的弊病同样在此，单单因为恪守古礼而不近人情，并不至于能引起政治上的反对，可如果坚守正统而排抑他人，就难免怨诟交集。在这场斗争中，程颐是第一个罢职的人，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八月，他被冠以“污下检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的罪名调到国子监。贾易虽然也同时罢知怀州，但不久又重新回朝，取代其师而成为洛党的主将。

苏轼的无奈在于遭受到几方面的夹击。洛党之外，新政人士对他自然恨之入骨；司马光一系的实权派中，也有很多人因为他对元祐政治的态度而有所不满。苏轼性格是独立不羁，在他看来，早年是人多附王安石，现在是人多师司马光，所随不同，为随则一。他既然不愿“随”，也只有离开是非之地。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求外任被批准，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后，出外的苏轼曾以退为进展开反击，在朝出任要职的胞弟苏辙也曾一力援引，但仍然未能敌过洛党和朔党的攻势，两度被召回朝廷，又两度被逐。只有程颐还不失聪明，自罢讲筵后一再求归故里，最后以父丧去职后坚辞不入，专心于学问，暂时脱离了风波险恶的政坛。

值得一提的是，谏诤之职放弃纠察王过的本分而与御史合流，终于使台谏成为朝廷争讧的绝对主角。“洛党”一方有左右司谏朱光庭、贾易，“蜀党”一方有侍御史吕陶，而朔党则有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右正言刘安世、监察御史张舜民，此辈仗着“言者无罪”的原则而气焰高涨，相互诋毁攻击极尽能事。

御史本乃掌纠百官过失，如此倒也算得上是职尽本分。但谏官劾奏百官有恃无恐，说到底是本朝天子的一种策略所致。本朝内重过于前代，若不养言者锐气以折权臣，如何救指鹿为马之患？圣人设过防之计，固乃不得已而为之。太宗将原来的谏官名称左右“补阙”、“拾遗”改为左右“司谏”、“正言”，就已经寓有扩大职能鼓励直言的意思；真宗时别置谏官、御史各六员，增其月俸使其专亲职事，开始使谏官名副其实。仁宗时陈执中为谏官，屡请专门设置谏院的办公机关，这

一请求在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得以实现，朝廷下令以原门下省邸宅充谏院，而将门下省搬至右掖门西，这又可以看作是谏垣走向强劲的一个征兆。而真宗、仁宗皇帝都曾下诏允许谏职论奏百官营私舞弊，不断申明台谏具有“防臣僚之不法”的本分，终于使习惯演化成为制度。照旧理，谏垣之职负责纠绳天子，人员应有宰相任命，可天子既然有意改变，便相应地予以更新而设立回避法，仁宗以来，历代都有严敕辅臣不得荐用谏官的事情，遂使谏垣一变而成为宰执的对立面。

御史一向有风闻论事的权力，即弹劾时可以略去告事人姓名，称“风闻访知”。纵所言不当，或在疑似之间，亦不受词讼之例。渐渐地，谏官也有了这一特权，台谏混一，共同成为人主的耳目，其作用便相当可观。当年石介为阻止夏竦的入相，一夜奔走游说于台谏官之家，以至所乘之马为之疲毙，可见台谏在朝臣心目中的地位。

谏职权限的扩大本不是坏事，但允许这种强大的势力成为执政官的专门掣肘而破坏了君相权力的平衡，其害处就十分明显。仁宗嘉祐时的一位宰相刘沆就对台谏滥用权力甚为不满，他对皇帝抱怨说：

“自庆历以来，台谏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无当否悉论之，必胜而后已。”

刘沆是个明白人，他指出的弊端很有道理。但像他这样的宰相却不是很多，此后的大多数宰执大臣一味从“广开言路”的原则上考虑，有意无意地纵容了“议论多于事功”的陋习愈演愈烈。

朱光庭、贾易弹劾苏轼之后，吕陶反对，而王岩叟等则赞成，皇太后以两派结党，本有同逐的意思，但吕公著却以为不可。在这位宰相看来，言者无过，朝廷绝不能以言官的得失而降罪。这种规限人主的考虑固是不错，也符合设立谏垣的本意，但台谏沆瀣一气而另立山头，无论如何是不能轻视的。吕公著以为自己有妙方压制朋党之争，其实却无形中助长了这种风气。

大约在程、苏起隙的同时，张舜民因为上疏言事不符，被诏罢御史之职，结果引起了一系列强烈的反对，吕陶没有参加营救行动，竟

又遭致贾易和另一位御史的弹劾。双方互责朋党乱成一团，在听政的太皇太后看来当然是不成体统，于是一气之下将几位闹得最凶的人罢卸言职，其中既有贾易、吕陶，也有王岩叟、傅尧俞，甚至还有右谏议大夫梁焘，这是刘挚一派的一位核心人物。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八月初二那天，贾易在朝会上攻击苏轼、吕陶结党时，竟把一代元勋文彦博也扯了进去，把这位老臣说成了苏、吕的后台，这下激怒了一向倚重元老的太皇太后，当下要严惩贾易，又是吕公著和了一道稀泥。公著道：

“贾易所言颇切直，只是诋毁大臣太甚，止去谏职即可。”

诋毁大臣近乎诬蔑，在公著看来还不失切直，这种逻辑很使人纳闷。公著下廷后解释道：

“重要的是不能使人主轻视言者。”

话是不错，但用错了地方。目前言官们的目标并非是迷惑的天子而是意见分歧的同僚，似乎谈不上人主轻视与否。

接下去的几年，朝中依旧是乱哄哄的局面。不过，各种派系也有相对一致的地方，这就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彻底否定和对新政人士的排挤打击。听政的太皇太后凭借着天子祖母的身份临朝，一贯刚愎自用，其专横霸道的作风影响了整个元祐政局。一味更化而否定前朝的结果当然不在具体政治措施的改变上，重要的是带来了士风的进一步颓败。几年来，彼此相斗的手段都显得十分下流，弹劾动辄十数上，用语亦极尽诋毁之能事，吕陶在为苏轼的辩章中所说的“欲加之罪，何所不可”的话，竟成了后来许多事情的一贯手段。甚至捕风捉影上纲上线，也成了人身迫害的常法。神宗末年出任宰相的蔡確，与王安石的关系并不太深，与其说他赞成新法，倒不如说他拥护神宗皇帝来得实际。尽管如此，蔡確仍不免成为新政的代表而遭受一连串打击，最后又由于早年所作的一组诗给人加上“谤讪”之罪，一贬再贬，于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死于荒蛮之地。严格算起来，他是本朝第一位死于政治迫害的宰相，这种不幸无疑与太祖以来宽厚的仁德之风是绝不相容的。尽管有不少人如范纯仁、苏轼十分不忍于蔡確的遭遇，但也并不能改变普遍的复仇情绪。

主持政治报复的实力派主要是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四人。特别是刘安世，他是司马光的学生，蒙其恩最深，因此报仇心也最强，时人号其为“殿上虎”，可见其作风之一斑。一个人没有公正的心态，又岂能作出公正的判断？如果事事都免不了激动而掺以个人恩仇，那政治就不成为政治而成了一场决斗。

这种气氛很令人无奈。元祐时期一些老资格的大臣有调停之心，但无纠弊之力。前期是文彦博，后期是吕公著和范纯仁，三位老臣曾经一度主持工作，但无一例外地受到实权派的排挤。议论纷纭间，又何暇去做实事？如此只有破坏而无建树的态势，也许从此将成为帝国政治的基本格局。

党同伐异，历史总在轮回

在我们的帝国中，既然存在着天子这一个绝对的砝码，就注定了矛盾永远不可能统一。因为天子是人而非神，他的倾向性是无法抹杀的，这个决定一切的力量失去中立之日，便就是新的一轮风波开始之时。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初三，宣仁太皇太后崩逝，此时的哲宗十九岁，亲政已成定局。

十天前，五位执政官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韩忠彦、刘奉世进入崇庆殿后阁，探问病危的太皇太后时，心情都极为沉重，弥留的太后无可奈何的口谕又更使五人忧形于色，隔帘噤默无语。任何一位过去的天子都是祖宗旧法的一部分，全盘否定并没有道义上的理由。整个元祐政治对熙宁、元丰的反正太过激烈了，这是人人心里都十分清楚的事实，因此过去九年的强硬措施随着太后的逝去将面临灰飞烟灭的危险，也是明摆着的事情。国是将变的气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无论是从帝国还是从个人前途着想，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都是他们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同当年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不同，元祐诸人本就十分心虚，此刻显得尤为慌乱似乎不足为奇。

吕陶、苏辙、范祖禹、吕希哲开始不断上疏，就太后变改政事的

做法给年轻的皇上一一解释，异口同声地说太后更张先帝之政，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于私意；所改之事既是生民所便，所逐之臣亦是天下之恶，社稷因此危而复安，人心因之离而复合，绝不可以为非。他们甚至连将要出现的奸言险语也考虑到了，吕希哲在奏疏中故作轻松地说：游说皇上之言不外乎有三：一是修复神宗法度，二是独揽乾纲，三是复用已往迁谪之人。范祖禹连疏坚请皇上“明析是非，斥远佞人”，要新天子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四人中，吕陶、苏辙是一系，范祖禹曾是司马光的部属，而吕希哲则与二程交往甚密，意见虽有不同，可在这件事上却是相当的一致。

但任何预防手段看来都将无济于事。当今天子虽是庶出，但却是已故神宗所立的堂堂正正的储嗣，即使他对专横强项的祖母听政九年不存怨望之心，也无法容忍一个时期以来对父皇治绩的污辱和否定。年轻的嗣君已经长成，不可能再安于傀儡而无所事事，天子无上权威的滋味是一个强大的诱惑和推动力。九年来忍辱负重的新派人士自太后仙逝后就已经开始四处活动，两个月的形势变化极快，甚至连重新起用章惇的呼声也通过一定的渠道上达帝听。朝野上下随之而议论纷纷，但大多数人心怀顾望，都在猜测着皇帝的动向，不敢贸然站出来说话。十月份，除丧听政的皇上第一件做的事情是擢升了几位身边的宦官，执政大臣们以为天子亲政之初先擢内臣，纷纷表示不服。范祖禹又上了一道奏表，这封带着强烈个人情绪的奏疏对熙宁、元丰的非难和谩骂达到了极致。元祐诸臣危言耸听而咄咄逼人，反倒促使年少气盛而带有强烈逆反心理的皇帝更快地走向了他们的对立面。

第一个出头的总不免是些风头人物。礼部侍郎杨畏在十二月份首先上疏主张绍述神宗，便成了不少人心目当中又一个恩将仇报的典型。原因是杨畏的升迁得力于首相吕大防，大防是秦人，因独立于洛蜀两党之外，担任了六年的宰相，尽管在某些方面颇招人反感，但也是元祐政治的主力人物之一。杨畏的奏疏声称：神宗变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哲宗接疏立即召见，询以先朝故臣孰可起用，杨畏开列了一长串名单，其中有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追述先朝的第一要务是起用旧人，这几乎成了一条定律，可惜蔡确不幸去世，没有熬到这胜利的一天。新年的二月，李清

臣——这位元祐初年因反对尽废新法而被罢职的前执政官——被命为中书侍郎，三月即在进士考试的出题中批判废除新法的不当。苏辙上疏攻击清臣，哲宗龙颜大怒，罢苏辙门下侍郎，出知汝州。此后，吕大防亦被罢相出知永兴军，同时曾布被起用为翰林学士。此时，一位久在朝外而对元祐诸臣切齿痛恨的官员张商英被召为谏职右正言，正是他再次上疏明确建议哲宗重事诛赏，要求皇上尽斥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刘挚、吕大防、梁焘、范祖禹等人，追述神宗盛德大业。

四月十二日这天，雨后初霁的京城上空，白虹贯日。此乃精诚感天之兆，机不可失，曾布再次上疏，请复先帝故事，并乞改元以顺天意。哲宗纳之，改元“绍圣”，天子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接着，章惇被重新诏命入相，又一个乾坤倒转的时代终于来临。

新时代的突出之处倒不在于恢复了一些元祐时被罢废的新法，因为青苗、雇役等法在不久后虽然被重新颁布执行，但多少都作了些修改，已经不再成为核心问题。哲宗的“绍述”主要体现在理论领域，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在一定意义也是这场拨乱反正之所以得以延续一个较长时间的根本原因，而司马光主持的元祐更化正是忽略了这个环节。重修《神宗实录》是其中之一，宰相章惇、翰林学士曾布都参与其事，但承担主要工作的是蔡卞。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兼学生，他把元祐时期史官挟带个人恩怨而篡改的历史进行了修正，为他的恩师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我们的帝国一贯讲究历史的作用，所谓是非必正，褒贬分明，全在于史官的秉笔直书。蔡卞既然能根据安石留下的亲笔记录核对史实，发现了篡改诬陷的成分，原则上的是非定性便应运而生。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七月，朝廷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等赠谥，贬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人官职不等；十二月，元祐史臣范祖禹、赵彦、黄庭坚，坐诋污降官，吕大防因领衔监修，责无旁逭，亦再遭迁谪。

也许是在残酷的斗争中得到磨炼而汲取经验教训的缘故，章惇主持下的政治清洗和人身打击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绍圣元年（公元

1094年）八月，在追贬司马光等后，章惇即有心再将文彦博以下三十人悉贬岭外，仓促未果；此后几年间，章惇不断将反对新法的人贬官罢职，包括对这场过分的政治报复持不同意见的李清臣和曾布。从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二月开始，章惇制裁元祐旧人的行动达到高潮，再追贬司马光、吕公著、王岩叟，夺赵瞻、傅尧俞赠谥，流贬吕大际、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岭南，谪迁吕陶、朱光庭等近三十余人。最厉害的一招是将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四月至元祐九年亦即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四月十二日十年间之全部章奏汇编成帙，进行严格审查，凡有涉嫌者分别予以处分。特别是辑理了司马光的所有章疏案牍，选官编类置之二府，以为天下后世之戒。最后是在哲宗的第二个年号“元符”年间，先是借口神宗不豫期间的一次谋议废立的旧事，再将文彦博、司马光、刘挚、梁焘等已死之人冠以大逆不道之罪；然后在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的六月，章惇在蔡卞的建议下，以元祐之道还置其身，命蹇序辰、安惇两人审理当年司马光所设“诉理所”的档案，凡参与诉理者一概摘其姓名编入另册，由此而得罪者达到八百余人。

章惇这位为人豪迈而孤傲的新宰相是本朝一位著名象数学者邵雍的学生，与二苏兄弟、曾巩曾布兄弟、吕惠卿、程颐之兄程颢皆为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主持的那次礼部考试的同榜。嘉祐二年这一榜几乎都是四五十年来帝国的风云人物，并在后来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这在本朝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章惇与吕惠卿、曾布略有不同，自为安石所重而进入三司条例司后，虽一直参与了新法的实施，但在熙宁新政中并没有做多少工作。章惇表现出其奇伟绝伦的才华主要是在元丰时期，特别是在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同司马光力辩雇役法不可轻废的那场争论中，显示了强烈的斗争性格。此番作为绍述运动的主力人物登车揽辔，遂不免慨然而有澄清之志。蔡卞则是熙宁年间的进士，他对王安石的感恩戴德促成了对元祐旧党的切齿痛恨。蔡卞为人深谋寡言，富于心计，他能掌握章惇的弱点而要挟利用之，在绍圣党同伐异、陷害异己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话说回来，这也是时势的要求。箭在弦上，不能不发，章惇、蔡卞之流的过激行动既是一个相当长时期以来本朝士人好挟私怨的最终

反映，也是哲宗皇帝绍述政策的必然结果。政治从来都是黑白分明的，否定与再否定环环相连无有终日，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严酷，除非矛盾双方在生死相搏中同归于尽，不会有风平浪静的一天。而天地万物生生不已，幻想着这个权与欲的世界有朝一日停止争斗，那实在是痴人说梦。

在君门九重、坟墓万里的元祐人士看来，这无疑是一个阴翳横天、层冰塞川的世界。党祸烈于火，苛政猛于虎，眼前的处境就是最好的说明。恓恓惶惶而奔避不暇中，即使能耳冷心灰百不闻，也无法每屈心情入酒杯。在惨淡的人生中，一切失意的哀叹和惆怅都显得无足轻重，虽然苦涩的忧怨境遇能使后人一洒同情之泪，可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严峻的现实已带来一个迫切要求，呼唤着我们这个泱泱帝国的智识之臣抛弃私怨而精诚团结。可贪于安逸、固执己见的作风业已养成，轻易又怎能一旦割舍！

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尽管所有的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肇自于王安石的变法，但在实质上，从元祐时起一直到今天，如此风云激荡的政治斗争根本就与王安石无关。王安石的晚年虽然在沉默中度过，但当他在定林寺与人谈经论禅时，对世事沧桑之慨也偶有流露。在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雄杰看来，围绕着新法的斗争，实际上大多出自好于争胜的意气用事，绝大部分人都不免投机取巧、闻风转舵，以至于前叛后附，或出或入。

安石认为，自议新法以来，始终言不可行者，只有司马光一人；始终言可行者，也只有曾布。这后一句颇耐人寻味。

曾布虽也是新法的主要起草人，但至少在敌对方来看，吕惠卿、曾布两人同为王安石的心腹，却有明显的主次差别。实事求是地说，两人在对变法的态度和贡献上，也确实有强弱大小的不同，吕惠卿所起的作用也要超过曾布。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曾布接受神宗皇帝的密令而调查“免行钱”实施情况，进而参劾吕嘉问的事情，安石是十分清楚的。正是因为曾布的轻率而导致了曾布、吕惠卿两位变法中坚的进一步交恶，这也是新法阵营中人人皆知的事实。可尽管如此，安石在心目中仍把

曾布摆在了很高的位置上，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评价不公，其实内里却自有奥妙，至少从反面证明安石对另一位主要帮手吕惠卿的行为作风确有不满意的地方。在意见冲突、矛盾重重的曾、吕两人中，安石在感情上最终站在了曾布一方，甚至不惜原谅曾布由于冲动而做出的不明智行为。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王安石在最后要把吕惠卿排斥在外，为什么反对派在后来能不断制造出王、吕不和的种种谣言的渊源所在。

曾布由于熙宁末期曾遭到吕惠卿的迫害，因而在元祐时期并未受到严重的冲击，出外不久后还京为翰林学士，一直做到知枢密院事。不过，他对司马光废除新法尤其是雇役法还是持反对态度，他曾对司马光道：

“雇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吾手。若令自作改易，义不能为！”

在绍圣年间，曾布对章惇的复辟举动无疑是大力支持的，但对章惇起复吕惠卿却坚决反对。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十月，曾布就与韩琦的儿子韩忠彦联袂向哲宗进言攻击吕惠卿，不同意吕惠卿入朝，从而迫使惠卿一直在外任职。他与章惇的最大分歧点在于对元祐诸元老大臣的政治评价上，曾布认为追夺赠谥乃至于毁墓仆碑，纯属徒劳无益之举，进而对章惇的专权亦有所不满，这导致了他最后与章惇、蔡卞的决裂。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二月，曾布在一次廷对中向哲宗道：

“章惇、蔡卞施行于元祐之人，众论皆谓过当。两人所作所为，分明是报私怨！”

政治家若空有原则而没有手腕，便不可能久在其位，因而所做的事情往往半途而废。曾布在几十年走的是一条相对折中的路线，从而保证了他在政治风波中的稳定，这一点他自己也不否认。曾布的处事方针虽然在客观上可以起到诸如王安石、吕惠卿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但一味务实，却无疑要犯原则上的错误。

元符三年（公元IIOO年）的正月十二日，年轻的哲宗不幸突患急病，不治身亡。皇太后向氏突遭变故，急得对宰臣大哭：

“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事须早定！”哲宗享年仅二十四岁，

唯一的一位皇子又不幸早夭。

章惇大权在握，说话也一向严厉："当立母弟简王。"简王赵似是神宗第十三子，元符元年（1098年）封简王，与哲宗为同母所生。

太后感叹："老身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言下之意，立谁都是一样。

章惇道："以长幼论，则申王当立；以礼律论，则大行皇帝同母弟简王当立。"申王赵佖是神宗第九子，因年长的诸王皆早薨，因此在剩下的五位皇子中年纪最大。

太后其实意有所属："皆神宗子，何必强作区分！以次序论，端王亦可立。"端王赵佶是神宗第十一子。

这下激起了章惇的强烈反对："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章惇说出这样胆大的话来，曾布当然更为不满，于是大声叱断他的话："章惇听太后处分！"一下说得章惇默然。太后最后下结论道：

"申王有病，不可立。先帝曾说过，端王有福寿，而且有仁孝之德，当立为嗣君。"事情就这样定下了，端王赵佶入继大宝，后来的庙号为"徽宗"。

章惇虽然有种种不是，但他此刻却说了一句大有见地的话，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新帝即位后就被贬谪，辗转飘零，最后死于睦州。而曾布坚持了自己游刃有余的原则，顺理成章地一跃而为时代的新宠，但却为我们的帝国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历史虽然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但个人却足以能改变它的方向，这在曾布如此，在帝国的第八位天子徽宗则更是如此。

新帝仍然尚未成年，皇太后向氏又得以像早先的宣仁太后一样垂帘听政。奇妙的是，两位太后在对待熙丰政治的态度上惊人地一致，所采取的做法也十分相像：大权在握，立即就进行翻案。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二月，元祐时曾任知枢密院事的韩忠彦被起用为相，他既是元祐老臣韩琦的儿子，也是曾布和李清臣的好友，作为一位相对超然而出于两党之外的人，主持了对章惇绍圣政治的全盘清理。太

后听政虽只有七个月，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元祐旧臣再一次卷土重来，一时间充斥朝廷甚嚣尘上，宣泄着他们久积的怨恨。其结果是为司马光等人全部平反，由此相及，一大批对“绍述神宗”持不同政见的人被陆续提拔，而章惇、蔡卞及其兄蔡京等则被清除出朝。

当然，这是与曾布这位新朝辅命大臣的倾向分不开的。此时的曾布，已经完全转向于折中调和的路线。徽宗亲政后，他向新帝建议：既然元祐、绍圣均有所失，何妨以大公至正态度，调和两党？新帝此时十八岁，龙銮宝座的新鲜感自然也使他产生一些革新的精神，于是诏命明年将改元曰“建中靖国”。“建中”，执两端之中也。这个本意当然不坏，但曾布与新天子都没有想到的是，两极混斗怨怨相报，又如何能轻易调停而做到不偏不倚？曾布使元祐党人重新登台，但彼辈却不会因为他的善良动机而抛弃宿怨。侍御史陈升次第一个把矛头指向曾布，上疏指责他“独擅国权，进用匪人；轻视同僚，威福由己；子弟招权，交通宾客”。一位半年之内先后曾上一百多封抗论奏疏的强硬人物任伯雨，进而反对他的息事宁人方针：“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者，欲二者并用，只能使君子去而小人留。”任伯雨甚至反对更改年号，他认为“建中靖国”用了唐德宗的年号“建中”，而唐德宗正是因为君子小人不分才导致銮驾播迁之灾，因此“不可以不诫”。在这种情况下，曾布不得不展开反击，于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三月将任伯雨调为度支员外郎，同时又采取了一个巧妙手法将另一位元祐分子陈瓘请出了朝外。陈瓘是弹劾章惇、蔡卞最起劲的人，也是提议再次重修《神宗实录》的始作俑者，章惇、曾布都有意招抚他附己，但被陈瓘拒绝。

过了不久，我们年轻的天子就意识到，再坚持曾布所谓调停的方针，将会是一个两面都不讨好的事情。十一月，起居郎邓洵武入对，对皇上说了一番话：

“陛下今以韩忠彦为相，忠彦乃韩琦之子，韩琦尝论神宗新法之非，于是忠彦更变神宗之法。忠彦为人臣，尚能绍述其父，陛下为天子，如何反不能绍述先帝？”

这无疑触到了徽宗的痛处，说得天子默然无语。邓洵武趁热打

铁，又进了一道《爱莫助之图》，将元祐、绍圣两方面目前在朝的人列成图表，按官职大小分成宰相、执政、侍从等七类，结果绍圣一方执政官中只有一人，其余每类亦不过三四人；而元祐一方则包括了剩下的所有朝廷官员，达到百余位之多。邓洵武在表中总结道：陛下有绍述先帝之志，然群臣无能助之者，必欲继志述事，则非用蔡京不可。先不论蔡京何许人，值得邓洵武这样推崇，反正从此天子开始有了新的想法已经毫无疑问。第二年，改元“崇宁”，不用说，这是“崇尚熙宁”的意思。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三月十九日，蔡卞的胞兄蔡京被诏命回朝，出任翰林学士承旨、监修国史。

蔡京字元长，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进士，在其弟蔡卞之后进入中央政府，官拜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兄弟二人同掌书命，一时朝廷荣之。蔡京早年参与新法很积极，但元祐初司马光秉政后，蔡京却立即卖身投靠。当时，司马光废除新法心情峻急，要求在五天之内将雇役法复为差役，众人无一不认为时间紧迫，可独有蔡京于治下畿县如期完成，博得司马光的由衷赞叹。可这种阴邪无端的投机嘴脸连元祐人士都甚为不齿，台谏纷纷弹劾，结果使他落职出外。绍圣时期章惇复新法，蔡京摇身一变，又成了绍述的急先锋。十年之间玩弄黑白于股掌，使蔡京成了人们心目中见利忘义的典型。徽宗即位，谏官陈瓘就指责他交通内侍，使蔡京罢翰林学士出知江宁府。这给蔡京的打击很大，心中怏怏，迁延而不上路。最后御史们又交章论劾，于是朝廷下诏夺其职，仅以祠职“提举洞宵宫”居于杭州。本朝大臣罢职之后，朝廷常授予此类以道教宫观为名的祠职，但无职事，仅借以食禄。

然而一个反复无常的人并非没有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蔡京是个有极大野心的人，他是不可能甘于退隐林下而逍遥余生的，他还没有达到目标，所以仍必须寻找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幸运的是，蔡京有一些特长，他对绘画和书法造诣极高，特别是写得一手好字，深得王羲之笔意，算得上本朝有史以来数一数二的书法大家。这在一般人看来当然算不了什么，但要紧的是，当今官家却是个富于才学的皇帝，他对书画之道同样十分爱好

并且精通。蔡京与天子竟存在这样一个共同点，后来发生的一切就不是偶然的了。

机会来得十分自然。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左右，宦侍童贯以供奉官的身份来到三吴地区为皇上访求古玩字画，在杭州停留了一个月。蔡京是个深知宦官重要性的人，为此他并不顾忌本朝一贯禁止交通内侍的政治准则，抓住这个机会，与童贯结成了深交。所作书画屏障扇带之属，也由童贯源源不断地送入皇宫。徽宗本就欣赏蔡京的字画，再加上童贯的吹捧和朝中某些蔡京好友如起居郎邓洵武、太学博士范致虚的怂恿，天子逐渐有了非相蔡京不足以有为的想法。于是，一年之内就把他提到翰林学士承旨的位置。不久，升任右仆射。

制下之日，徽宗赐坐延和殿，曰：

“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至今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以何教之？”

蔡京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他立即避席顿首而言：“臣愿尽死效忠！”

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正月，蔡京进位左仆射成为首相。从此，蔡京先后四次拜相，成为徽宗在位二十四年的象征。蔡京的成功在于彻底掌握了天子这一神圣的武器，因而屡罢屡起，始终不倒。无智不足以御人，蔡京的天资绝高，他懂得任何一种可以为自己谋利益的手段。在蔡京来说，只要做到两点也就足够，一是铲除异己，一是邀宠固位。他在入相两个月后就奏请徽宗立“元祐党籍碑”，将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刘挚、韩忠彦、曾布等原宰执、待制以上一百二十人定为奸党属于前者；而借熙丰新法为名加重税收，为天子享乐不惜竭泽而渔则属于后者。奸臣一旦能表现出其“奸”，那就是客观的必然恶果，无论元祐还是绍圣之党，抑或是夹缝中求生存的曾布之流，都无法改变这个既成的事实。

假如没有几十年的党派混斗，帝国的政治决不会堕落到这样一个地步。这实在是令人英雄气短。人们常说，灭唐祚者非黄巢朱温，亦非藩镇宦竖，实乃牛李朋党之弊。看来，这个悲剧不幸又在本朝重

演。

第三章

南渡，只剩下半壁河山

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

奇谋报国，可怜无用。

尘昏白羽，铁锁横江，

锦帆冲浪，孙郎良苦。

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

——朱敦儒

宋徽宗：只怪生在帝王家

逻辑上的简单推理很能迷惑一些平庸之辈，若干年后，当帝国的第十位天子在“行在”临安城里反思往昔的时候，犹还把王安石变法当作是灾难的源头。朝野舆论也顺理成章地认为，不仅几十年来的党同伐异可以归结到王安石的头上，而蔡京的擅权祸国也是新法带来的必然恶果：没有熙宁，何来元祐、绍圣？没有新法的惶惶求利，又何来蔡京的横征暴敛？没有熙宁时的开边寻衅，就更不会有宣和时的起兵勤远、稔祸速乱。这种想法并不奇怪，追究历史有时就是寻找借口，并以此来服务于当今的时势。徽宗和继任者钦宗那个时候已经落入夷狄之手，正在敌人的魔掌中茹毛饮血。作为继嗣者的新君高宗，总不能把过错推到父兄的身上去，给帝国的伤口再添痛苦。徽宗的悲剧结局使他暂时逃脱了谴责，但一时的幸运却代替不了永远，历史虽然总是以慈悲为怀，但绝非是善恶不分。

后事姑置勿论，回到现实中来。

我们的官家风流俊逸，洒脱不群，他不像是一位天子，而更像是一位艺术家。他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到对艺术的关注上，在构筑典雅巧幽的幻想境界中追求他的人生极致。因此徽宗也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始终把个人放在世界的中心，在他们看来，古往今来上下左右都是一己之化身，我就是宇宙，我的享受也就是天地万物的享受。

这或许是由于少年时代的某种因缘机遇所致。早在藩邸时，徽宗就不像其他骄奢的皇子们注重于单纯的感官刺激，他喜欢读书学画，欣赏古器山石，从中感觉到做为一个文人的快乐。即位以后，对艺术的独特感觉更使他的才能发挥得酣畅淋漓，其书法笔势飘逸，意度天成，自号“瘦金体”，犹如冲霄鹤影，掠水燕翎，高迈不凡而又轻盈无迹。徽宗的诗词绘画更具典丽的意境和巧妙的构思，刻画入微而意味隽永。本朝尚文，天子的才艺自然很使一些人惊讶而景仰。不过从原则上讲，天子一味致力于雕虫之道，自是与传统精神背道而驰的。章

惇说他“轻佻”，也正是从这一点上着眼。

但徽宗却绝非只是轻佻而已，诡异的冲动和独来独往的性格使之每每异想天开。我们的天子找到了最能够刺激他幻想的东西，这就是能通鬼神、能致长生的道教。道教虽自称源于先秦的道家，其实本起于民间，两汉六朝以后渐趋隆盛，丹鼎符篆炼身养性之术，蔚为大观，前唐奉为国教，本朝以来也甚受扶助。礼崇宗教总有政治上的原因，真宗天子大兴“天书”、“祥瑞”之举，无非是想借其神灵之力以达到镇服四海、夸示夷狄的效果。徽宗尊尚道教，当然也有这样的考虑。可他能把道教推奉到第一崇高的地位，却与个人放浪形骸的艺术气质密不可分。徽宗确实从内心里喜欢那些变幻莫测的机巧和呼风唤雨、预言祸福的神秘莫测之术，所以他不仅自诩为真人，更自命为教主，他相信“道君皇帝”也许才是他真正的归宿。于是崇宫观、设道职、搜求经典、任信方士，超越了政治而进入了纯粹的宗教范畴。十几年来，当无可胜数的通妙先生、金门羽客在庙堂之上放言诡诞时，道君皇帝往往感怀沉迷，付之于会心的惊叹。

所有的这些归根结蒂都是从一己之心出发的结果。壮年以后的徽宗也好女色，但他的方式却十分极端，每隔三五日御一处女。这或许出自道术上采阴补身的需要，或许是来自于某种猎奇的欲望，但不管怎么说，他在身下柔弱胴体的震颤中获得的肯定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由此激发出一种发泄的愉快。在古代中国，这种行为一向不为人们所诟病，相反倒成为精力旺盛、风雅不拘的象征。但徽宗却不满足，作为一朝天子，竟然喜好微服出行于花衢柳巷，在与妓女的耳鬓厮磨中把自己幻想成潇洒的文士。天子的快乐与庶人的快乐兼而有之，这才是人生之美的极高之致，看来徽宗是真正懂得及时行乐的人。因此我们的这位天子十分奇怪焚臂炼骨、舍身求法的佛家教义，由衷地替迷惑于此道的黎民感到悲哀，所以他既兴道，便要排佛。一位狂妄的佛僧胆敢咒骂天子破坏其教，徽宗便把他碎尸万段。

玩物丧志往往在不经意之间。

帝国的主宰者既享有无上的权力，也担负着崇高的责任，否则便不可能永远贵为天子。徽宗追求自己的旨趣是他的自由，但绝不能因

此而敝国凋民。当然，很少有天子真正懂得这个道理，比如徽宗根本就没有想到对器玩花石的嗜好竟会带来严重的恶果，在他看来，这不仅和王道大业毫无关联，甚至还不失为风雅之趣。然而上有所好，蔡京之流夤缘而进，事情就不会因其平凡细小而不成为祸端。政和初年，皇上不过是对蔡京之子蔡攸开了一个玩笑，就被蔡京紧紧抓住，加紧了从东南一带向徽宗进奉奇花异石的步骤，并由此大开进奉之风。举凡太湖诸石、两浙花竹、湖湘木竹、江南诸果、福建荔枝龙眼、两广四川奇花等，越海渡江健步捷走而来，虽万里之遥，三四日即达，异味珍苞，色香不变。

这就是著名的“花石纲”之役。纲者，船队也，政和年间运送花石的船队，每一纲都有数十舟之众。其中，尤以苏州的朱勔最甚。朱勔是苏杭供奉局的首脑，这一专门从事采集贡品的机构设立于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由蔡京父子遥控指挥。朱勔发挥了他长袖善舞的聪明才智，近二十年间，花石船队舳舻相衔于淮、汴，将灵石异草、古玩器木源源不断地送到了东京。天子品评赏鉴，欣会所遇，朱勔中饱私囊，大发横财，换来的是整个东南为之疲敝，天下为之骚然。“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疤”，正是此谓。

熙宁以降的理财措施带来了一定的实效，尽管付予辽人的岁币数额不小，但通过边境榷场，帝国从贸易上也获得了很大的收入。兵戈不兴、四境稍宁的太平掩盖了冗官冗兵的积久之弊，这是淫逸产生的客观背景。蔡京把熙宁、元祐之争演变成压制异己和擅权独裁，这是灾难发生的政治因素。缺乏忧怀天下之心的徽宗皇帝，从根子上促成了帝国最后的崩溃。

帝国仁厚德懋的风气下竟能产生蔡京这样的人，说起来颇令人悲哀。熙丰以来的党争可谓烈矣，可蔡京打击报复元祐、元符之党，其手段之酷、株连之众，要超过司马光、章惇不知凡几，甚至不惜亲自将打入另册者书碑立石，颁之全国，竟要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蔡京裁定的元祐党人在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已达一百二十人，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他再将己所恶者添入党籍，使人数扩大至三百零九人，连章惇、曾布、张商英等绍述主将，竟也因与其不合，被列入奸党之籍。其胞弟蔡卞由于反对任用宦官，也遭到他的诋讦，无奈求

去。如果说帝国几十年来的党派争斗多少还是源于政治分歧的话，那么蔡京则完全出于个人利害之计。因此在他的周围形成了地地道道的私家集团，张康国、刘逵、薛昂、林摅、余深等都因奔走其门而得入执政行列，根本谈不上志同道合。薛昂、林摅、余深以至于举家为蔡京避私讳，薛昂有一次不小心误及之，马上就自批其口。奴颜婢膝，莫此为甚。张康国虽然最终与蔡京分手，但也无力敌之，于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暴疾而亡，死的时候仰天吐舌，显然是中毒的迹象。

蔡京以侈靡之道迎合人主，已臻极致。他常常标榜王安石的一句名言“人言不足衅”，把它作为鼓励天子享受太平之养的最佳理由。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蔡京进言倡修大内时，对皇上保证说以目前所积超过五千万的财政实力，供天子广乐备礼，根本就不在话下。政和年间，蔡京从《周易》中找出了理由，这就是“丰亨豫大”，意思是：财多德大，此正帝国之象；德大则无所不容，财多则无所不济，天子又何必以奢华为意？宰相既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徽宗就没有道理不相信天下是真的太平了，于是制作营筑，大肆挥霍，也便是自然而然之事。结果是累朝所积，扫地而尽。

即使撇开原则上的是非不论，蔡京的某些做法也极为荒唐。徽宗即位之初，竟异想天开地要改革币制，蔡京此际正力托绍述之名变更成法，便极力怂恿襄佐。本朝的币制确有不当之处，但货币问题至关重大，若无万全之法，不能轻易更张。天子与蔡京等人想当然的轻躁之举结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弊端，不仅没使币制改善，相反更为混乱。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蔡京请求重行方田法，徽宗在几年之间先后数次下诏推行，但正如熙宁时期一样，均田的关键是核定土地等级、区分地区差异，需要以秉公无私的原则和严格细密的方法对主事官吏及具体细则进行监督和制定，以蔡京的水平，去吕惠卿、曾布又何止万里，哪里能做得到！从崇宁三年至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近二十年间方田法虽然屡辍屡行，但一无成效。不过，任何露骨的、变相的、隐含的、直接的敛刮却不需要什么技巧，蔡京做这些事情倒是得心应手，熙宁新政的诸多理财措施，被他改头换面以后，全成了地道的掊克求利手段，这恐怕是王安石没有想到的。

蔡京第一次入相历时五年，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二月，由于

彗出西方、太白昼见的灾异之象，引起群臣的弹劾而罢，然仅一年后再相。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在台谏交论下，被迫退休，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因为彗星复出，在御史的责难中退居杭州。可未过多久，又被召还。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间，再次致仕，再次起复，权势更盛。到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蔡京当国已近十数年，专政日久，遂起公愤，第三次退休致仕。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在亲密党人朱勔的一力援引下，第四次被徽宗起用，此时的蔡京已七十八岁，目昏不能视事，政务悉决于季子蔡絛徽宗禅位后，在大敌当前的危急时刻，失去依托的蔡京终于成了众矢之的，为自全计，举室南下。蔡京这一走，众言无忌，交相谴责，迫使继代者钦宗下诏严惩。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七月，蔡京死于贬道，年八十岁。

蔡京得以操纵国柄垂二十年，其中的原因很复杂。除了个人因素外，还有一个政治上的问题。帝国百多年的传统本就一向注重分权而治，而台谏合流使言官的势力陡增，更使宰相受到极大的牵制，而令天子得以独揽乾纲。但话又说回来，天子要想遂心所欲，又必须依赖朝廷主要的决策大臣宰相，所以他既要任用得人，还不得不加重宰相的权力。同时，宰相欲思作为，也要想方设法扩大权限。在制度业已形成的情况下，这种加权是通过设立暂行机构实现的，比如神宗时建置“三司条例司”就是一例。蔡京入相伊始，便如法炮制，倡设“讲议司”，除了其本人出任主管“提举”一职外，并揽其党徒吴居厚、王汉之等十余人为僚属，不仅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国用、商旅、赋调、户牧等在它的“讲议”范围之内，帝国事务的各个方方面面也都有所涉及，可以说，一时朝廷法令尽出于斯。尽管讲议司在几年后划归三省，但蔡京已通过这个特别设置获揽大权，为他此后的结党树势集权专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见，某种专门机构的设立总是有它的深意所在，切不能因为其师出有名而掉以轻心。

毫无疑问，蔡京的需要其实就是徽宗天子的需要，“丰亨豫大”与其说是蔡京的逢迎蛊惑，无宁说是皇上的内心想法。假如天子并不只限于个人趣味的追求而恬嬉荒惰，犹还把骄奢淫逸的作风引入到政治的范畴内，那就必然会在自覆其位的同时引起国家的败亡。

“澶渊之盟”后，最大的敌人辽国在将近百年的时间里没有南下，

这使帝国得以腾出手来治理西陲。然而仁、神两帝取得的一些胜利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是夏人自攻陷永乐城后，怙胜气骄，不断侵扰。元祐时期，宣仁太后一味固守，许以岁币、和市，司马光等人甚至一度主张放弃熙宁时夺取的熙河之地，这些绥靖政策无形中使西夏的气焰复炽。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至七年（公元1092年），夏兵往复来寇，蹂践杀掠不一而足，朝廷对此一无良策。章惇执政的绍圣、元符时期，在固守的基础上展开了一定的攻势，局面方有所好转。从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至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边帅章楶成功地击退夏人的多次进犯，迫使西夏遣使求和。徽宗时期，欲建不世之功的蔡京模仿神、哲二帝用兵河湟的旧事，又极力主张向稍显弱小的吐蕃开战。结果帝国以巨额的财力人力为代价，彻底克灭了河湟一带的吐蕃势力，开拓了西过青海，东至兰、熙、岷州，北接西夏，南毗阶、成州三千余里的疆域。这场胜利虽然辉煌，但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利益，实质上倒是为帝国徒增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外患的减轻并非是本朝国力气势增强的结果，这主要来自于四境夷狄特别是两个主要的敌国夏、辽的衰落。自得于暂时利益的惰性既能使意志销磨而安于现状，也会带来政治的衰败和力量的分化，最终使他人得享其利。西夏在败于宋朝后彻底归附辽国。而辽国自其道宗皇帝即位后，贵族内部的倾轧日趋严重，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域内各族纷纷揭竿而起。到了徽宗即位后一年，亦即辽国新君天祚帝即位时，原本强大的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一个民族无论其祖业是如何的辉煌灿烂，如果只会守成而不思进取，最终必将被无情的历史所淘汰。夏、辽两国也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辽国统御下的遥远北方的白山黑水之间，居住着一个古老的民族“女真族”。女真的起源虽早，但由于居处绝远，与中原交通不便，一直默默无闻。中国人最早称其为“肃慎氏”，后来又有“挹娄”、“勿吉”、“靺鞨”之称，五代时始称“女真”。很长时间里，女真处在一种相对野蛮的发展程度上，部族之间不相统属，互为残杀，故而制度落后，势力不强。辽朝建立后，对尚未归附的所谓“生女真”发动战争，基本收服了其绝大部分的部族。女真归顺辽国后，因避辽帝耶律宗真

之讳，改称“女直”。

到十一世纪中叶，女直内部的融合开始完成，其中的一个部落“完颜部”逐渐强盛，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广泛的部落联盟，其酋长乌古迺被辽帝封为“生女直部节度使”。乌古迺与其子劾里钵、颇剌淑在辽的支持下，不断内联外战，逐渐变弱为强。十二世纪初也就是中原宋王朝进入徽宗时期，乌古迺次子盈歌出任联盟长，一个新生的女直联盟业已巩固壮大。盈歌统一号令，加强权力，使完颜部为首的部落联盟开始具有对抗辽国的实力。宋徽宗崇宁二年、辽天祚帝乾统三年（公元1103年），盈歌死，劾里钵长子乌雅束继任，又向西面发展，攻克泓忒城，扫清了后方。宋政和三年、辽天庆三年（公元1113年），乌雅束死，弟阿骨打成为新的联盟首领，称“都勃极烈”。完颜阿骨打的出现是女直联盟走向强盛的最终反映。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总是免不了要走向世界，掠夺和扩张不仅能获得土地、物产，同时也能发展和壮大自己，更重要的是能够在无形中吸收新的东西，提高自身的文化。历史的潮流不会因为其过程的残酷而止步不前。

阿骨打早就是女直部落中一位深孚众望的军事统帅，在南征北战中立下汗马功劳，具有勇敢的斗志和强烈的叛逆精神。这是与新生女直部落的民族性格紧密相关的，奴役和压迫必然带来反抗，女直已经被辽国统治了一百多年，摆脱奴隶地位自是它必然的要求，阿骨打顺应了人心所向，因此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内部的问题一解决，女直的成功就指日可待了。阿骨打即位后，便向辽国表示出强硬的态度，开始为彻底推翻这个压迫者做准备。

但我们的帝国对这一切并不清楚。朝廷上下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北方的盟国辽国内部似乎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内乱，但说起来这毕竟是与我们无关的事情，与其杞人忧天自寻烦恼，倒不如隔岸观火逍遥自在。

当然也有人另有想法，时为枢密院长官的童贯就是其中之一。

致命的诱惑：联金伐辽

童贯是个宦官，因善迎人主而被宠信。徽宗任用宵小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重用阉竖，童贯就是其中一例。也许是兴趣上的臭味相投，他与蔡京是莫逆之交。蔡京入相，荐童贯为西北监军，从此操纵天下兵柄近二十年，位比宰相，权势熏天。人称蔡京为“公相”，称其则为“媪相”。蔡京与童贯主宰着徽宗政治的文武两端，是人们心目中倾覆天下的罪魁祸首。虽然如此，天子却属意有加，命他主持西北战事，因此对西夏、吐蕃的胜利，便归在了童贯的名下。政和初年时的童贯十分得意，竟打起了图辽的主意，向天子请求出使辽国以探听虚实。徽宗同意，遂以祝贺辽帝生辰的名义，命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正使、童贯为副使出访辽国。即使出任副职，以宦官为国使也是有悖大朝风范的事情，可徽宗出于觇伺敌国的考虑，并未顾忌朝野的非议。

童贯使辽并未打探到有用的信息，但他回国途中道次辽南京析津府卢沟一地时，却有了一个重大的收获：遇到了一位奇士。

此人名叫马植，本是辽之大族，官至光禄卿，但在辽朝的名声不太好。也许是这个原因使他产生了报复心理，在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十一月份的一个黑夜，马植秘密地来到童贯下榻的馆驿，自称有平燕之策，请求童贯接见。童贯与其一谈，大为惊喜。

马植此时已俨然是宋国臣子的口吻，他的计策是：女直对辽人恨之入骨，而辽天祚帝又荒淫失道。宋军若自登、莱一带涉海而渡，即可联络女直相约攻辽。此计得到童贯的极力赞成，遂易其名为李良嗣，载与俱归，荐于朝廷。

从海路上溯径至幽燕之北，这条路线一直就有人走过，并非新鲜之举。建隆年间，就有女直人取此道泛槎而下，至登州卖马，只是在后来渐渐中辍。百余年来，因为该地接壤诸蕃，帝国政府一直严禁商贾舟船取此道北上。因此朝廷讨论下来，都认为轻开此路对中国不利。但徽宗不死心，又单召马植详细询问。马植坚持己见，认为辽国必亡，他对皇上道：

“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直得志，事不侔矣。”

马植的话从理论上当然不错，他的慷慨陈词也足以打动好大喜功的天子，于是又赐其姓赵氏，正式改其名为赵良嗣。徽宗虽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但无疑却把马植的主意深深地记在了心里。灾祸的种子就这样种下了。

从军事上说，内外夹攻，出其不意，确实是一条妙策。从原则上讲，收复幽云故疆，吊民伐罪，更是王道的要求。行此大业，不仅能尽雪前耻，尚能建不世之勋，也是天子义不容辞的责任。但若冷静思之，事情却并非这么简单。

第一是本朝在西边的胜利并不能表明帝国有能力重开战争。财政上的困难不论，军队的实力也并非如天子想象中那么强大。特别是北边一线，百余年来没有大战的考验，其战斗力实在是要打上一个问号。励精图治整军经武不仅需要清明的政治和仁德天子的感召力，更需要时间和具体策略。以本朝目前的政治军事现状，委实是不能轻举妄动。

其次是臣民的心中已彻底放弃了武力强国的幻想而趋向于务实。正如熙宁开边引起激烈非议一样，赵良嗣的建议之所以在一开始就遭到反对，正是这种心理在作怪。若非蔡京的擅权使朝政形成了一言堂的局面，还会遭到更加强烈的反对意见。人心厌战，这是最最主要的抵触力量。

另外就是一个道义上的因素。本朝虽然曾经蒙耻于辽国，但自澶渊之盟后，长期的和好已使双方成为实际上的盟国。尽管每年的岁币在心理上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可辽人不再刻意为敌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传统是讲究信义，本朝则更是一个泱泱礼义之邦，如何又能撕毁盟约而做出这等禽兽不齿之举？从另一方面考虑，谁又能保证女直得志后不生虎狼之心？唇亡齿寒、假道灭虢是立即就能想到的教训，后来不少人坚决否定夹攻之议就有这方面的理由。

徽宗显然没有对此事深思熟虑，同童贯一样，天子一开始就为赵良嗣的这条计策兴奋不已。朝议提出的不利因素只是暂时打消了他的想法，并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九月，阿骨打率各部兵共二千五百余人向辽进攻，拔寨掠地，俘获甚众。十一

月，辽师反击，在出河店被女直打败，阿骨打乘胜进兵占据辽东。翌年，阿骨打即皇帝位，国号“大金”，建年号曰“收国”。建国伊始，阿骨打即亲自领兵攻占辽国重镇黄龙府。九月，辽天祚帝统领举国主力共十数万来伐，又被金军击溃，天祚帝狼狈而逃。此后的两年中，金军又攻占了辽之东京等地的大片领土，锋芒直逼中京大定府和上京临潢府，辽祚气数已奄奄将尽。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七月左右，辽国东京府苏州地区（今辽宁金县一带）的一些汉人约二百余人为避战乱，乘坐一条大船欲往高丽，不巧遇风，被吹到宋界驼基岛。这些人的到来，使金军攻伐辽国且已打过辽河的消息传到了朝廷。

徽宗闻之大喜，急召蔡京、童贯商量，两人建议朝廷派人以买马为名前去访闻虚实。但第一次派去的人因为怕事，到了金人攻下的辽国苏州地界后不敢上岸，转回青州，却谎报女直不纳。经过青州安抚使崔躬直的调查，朝廷发现了他们的渎职欺骗行为，徽宗下令严惩之余，于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八月又派马政、呼延庆两人再往。这时，天子“联金攻辽”的想法已经形成，尽管这个决策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但在蔡京、童贯的坚持下，徽宗终于未能拒绝这个强烈的诱惑。

这场交涉进行得十分艰难。往来不便是一个原因，但主要还是双方的主观态度所致。出于对辽国的负疚心理和道义上考虑，朝廷在一开始时采取了极其秘密的方式，事既暧昧，目的性也很不明确。因为名义上是去买马，所以出使人选是两位低级官员，并不负有全权责任。宋金之间从没有外交上的接触，相互之间都不甚了解，这使得金人很不信任马政等人，金国边将对他们百般刁难，使之在十月中旬才见到金帝阿骨打及大臣宗翰等人。金朝于十二月遣李善庆等三人回访时，反而赍带国书及贽见之礼，相形之下，倒比宋朝正规而有礼节。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正月，李善庆等来到东京，双方初步达成了夹攻之议。但宋朝派人与李善庆渡海报聘走到中途时，由于徽宗轻信了辽金之间已达成妥协的情报，下诏令使节人员不必前往，只派呼延庆送李善庆归国。这个轻率的举动引起了金人的不满，也暴露出朝廷对这个重大举动并没有周密的准备和详尽的计划。当然，才疏意广的蔡京、童贯之流也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

更大的失误还在后面。到了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事态已经十分明朗，在金兵摧枯拉朽般的攻势下，辽国外战未胜，内难先作，废立叛亡之事相继蜂起，已呈土崩瓦解之态。此时，徽宗仍然躲躲藏藏，不敢明令出师，只是宣密旨于童贯，命他见机图复燕云之地。童贯受命后第一个想到的却不是整军肃武积极备战，而是想依靠外援走一条捷径，于是在这年的二月建议派赵良嗣、王瓌再度赴金商议夹攻。

事情紧急而机密，因此天子只是给了两位专使“奉旨面议”的口谕，并不另赍国书，而以一通御笔手诏代之。这道手诏只有简单的几句话：“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原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

手诏的文字不仅语意不明，而且逻辑混乱、态度卑弱，在外交上先折了锐气。燕京等既原是汉地，又何谈“若许”两字？双方既是平等协商共图辽国，根本就不能首先示弱而允诺“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这明显反映出天子和主事者既未能审时度势，也并没有彻底洗刷祖宗耻辱的大志，他们只想到燕云一地，并想当然地以为可以用金钱财物来换取。殊不知，被动地接受他人的施舍只能是自掘陷阱。果然，阿骨打与赵良嗣讨论岁币数额时不同意三十万两的数目，他的理由很充分：契丹占有燕京，尔南朝犹与之五十万，今将燕京还与贵朝，如何只给三十万？良嗣无法自持，只能答应。更糟糕的是，燕云共有十六州，天子在手诏中笼统地只提“燕京并所管州城”，给赵良嗣的谈判造成了极大的被动。金人坚持所议者只是燕京一地，其他不在商讨范围之内，尽管良嗣竭力争取，金人始终不松口。也难怪，金人本不想轻易地将血战而来的长城以南原有汉地尽数归还，这势必在今后的战略攻防上要吃大亏，现在既然你只提燕京，正好顺水推舟。良嗣归来后，朝廷才发现铸成大错，于是赶紧补救，又派马政复赍国书报聘，对要求归还的所谓“五代以后失陷诸州”的燕、云十六州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但已经于事无补。金人的态度强硬，不仅认为平、滦、营三州不属燕京，对原答应的西京大同府也不予承认。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月，金廷派遣哈噜随同马政返报，聘书的主要内容一是要宋朝如约夹攻；二是若欲西京，须再加财币。这场交涉到现在仍无

结果，徽宗无法不感到恹恹。

此时，帝国内部的情形已经不妙，东南一带的民众苦于“花石纲”之役，纷纷暴动，睦州青溪人方腊揭竿而起，竟成燎原之势。攘外须先安内，这是帝国的一贯原则，于是童贯受命出征方腊，夹攻辽国的准备又被放下。哈噜到京时，徽宗已经不想再如前约，传旨道：鉴于辽人已知海上往还之事，前议已无意义，可谕其使者令归。负责接待金使的国子司业权邦彦闻之大惊，力言不可，天子方收回成命。不过，从天子到大臣都对此犹豫不定，拿不出良策，徽宗只好传令暂留金使，俟童贯回来再议。哈噜等了个把月，童贯仍未得胜班师，只能返国。朝廷不再遣使送归，国书也含糊其辞，只笼统地写了“所有汉地等事，并如初议。俟闻军到西京，以凭夹攻”云云，完全放弃了主动。徽宗天子联金图辽、恢复祖业的想法在原则上是不错的，但以己度人，幻想着金人也能像讲究仁德的中国一样不失仁慈之心，那就是幼稚得可笑了。大臣们显然也未能忠于职责，拿不出得体的措施来应付时局，只是以不能轻开边衅的理由一味反对开战。无事则可自安，这是中国传统中最奇妙的麻醉剂，无疑也是最危险的毒药。

这次交涉因为取道海上，后人遂称之为“海上之盟”。盟约的主要内容归纳起来有四点：一是宋金同时攻辽，金兵负责攻取长城以北州县，宋军则攻取燕京；二是灭辽后宋廷须将原给予辽的岁币转予金国，作为交换，长城以南州县归宋管辖；三是双方不得单独纳降；四是不得出兵失期。实际上，由于双方各怀心思，分歧出入很大，加上往还不便，因此达成的盟约并不十分严谨。从宋廷这一方来讲，因为处于被动的地位，也不可能在外交上有过高的要求，所以在最后一度十分消极，甚至产生放弃的想法。

谈判桌上的砝码取决于自身的实力和战场上的胜利。从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十一月至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三月，金军进兵神速，已攻占辽国的绝大部分领土。而宋廷方面见到形势有利，这才又想到履行夹攻之约。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辩，徽宗命童贯和蔡京子蔡攸率领大军北伐。然而面对行将崩溃的辽国，宋军却屡遭败绩，十月二十九日，宋军高世宣部在业已进入燕京的情况下，犹被辽兵击溃。可怜宋军十万兵马一溃千里，所有粮草辎重尽委尘土。童贯为逃避责

任，赶紧暗中派人联络金兵入关进攻燕京，结果引狼入室，金人于十二月三日攻克燕京，使得宋廷在外交上陷入了更大的难堪境地。

这时的金人态度倨傲、要挟苛刻自然顺理成章，徽宗为了最后的一点收获也只有委曲忍让。弱者固无外交可言，除了仰人鼻息，实在也无他路可走。经过四五个月艰难的交涉，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宋帝国也在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得到了金人剽掠已尽的一座燕京空城和满目疮痍的蓟、景、檀、顺四州。而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是：原付予契丹的岁币年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燕京税赋年一百万贯，犒军费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均转付予金人；另外，赵良嗣还口头答应借给金军二十万石的军粮。尽管岁币及燕京税款尚不至于马上交付，但金人对犒军费则要求一次付清，二十万石米粮名义上是暂借，其实也是有去无还的事情。不过，帝国在这方面是从来都不把实际利益放在首位的，几座空城虽然浑无意义，但在政治上却有它的价值。天子可以援此自德，政客亦可以借此自利，既然皆大欢喜，谁又去做煞风景之事？所以尽管人人都知道金人今后必将渝盟，但谁也不敢说出口。只有赵良嗣私下里对人说：

“此盟约只能保三年而已！”

良嗣作为本朝的全权大使，是整个宋金交涉的见证人，最清楚其中的过节与甘苦。但他的这个估计也过于乐观了。帝国君臣共同的毛病是既没有想到金人会最终取得胜利，更没有想到一个新生的弱小政权竟会就此坐大。所以当金人在仅一年多的时间后就寻衅南下时，童贯万分惊诧：“金人初立国，遽敢作如此事？”徽宗天子更是如雷震顶，连呼“不意金人如此”。正是他们的不明事理，断送了帝国的半壁江山。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没有宋廷后来出于对金人的怨望而招降辽国残余势力的违约行动，金人也一定会挥戈南下。这个新兴的夷狄之邦虽然制度未备、政治未精，没有什么高深的理想，可通过掠夺性的侵伐可以获得好处的浅显道理，决定了他们不会因为仁义礼信而裹足不前。事实上，金廷内部的智识之士早就有这个想法，只不过因为力不暇及而暂告缓如而已。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八月，金帝阿骨打殁

于军次，其弟吴乞买继位，后来的庙号为“金太宗”。新君甫立的政局和战线过长的态势，也使金廷不得不暂且按下一头，全力对付辽之残余。但徽宗也做得太过分了，竟想到诱降狼狈逃窜的辽天祚帝，甚至许诺待以皇弟之礼、第宅千间、女乐三百余人的优厚条件，这种愚蠢之仁真是莫名其妙。更荒唐的是，天子和当时的主政者王黼想通过捷径来获得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当投降金朝的辽将张觉以平、营、滦三州来降时，竟予以接纳。岂料张觉出城接诏时，金军从天而降，张觉落荒而走，宋廷敕书、诰命尽数落入金人之手。三州既未能得，又徒授金人以“违盟渝约”的把柄，最后还不得不斩张觉之首以谢罪，什么好处都没捞到。从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三月开始，金人不断挑衅，先是借口二十万石军粮未能克日交齐，鼓动西夏军进攻武、朔二州，后来干脆公开起兵，于该年八月攻下宋军控制下的蔚州。

蔚州是山后九州之一，这个九州属于“燕、云”中的“云州地区”，按照宋金初约，原本也是要归于宋廷的。金人占有其中七州后，本就不愿把此战略要地让给宋朝，此时借机吞并蔚州，当然也不会再守前议。蔚州失守，徽宗仍想当然地认为这犹不过是边境争端，又复起用退休的童贯前去交涉，同时仍不放弃招纳辽天祚帝的想法，命他见机行事。但辽帝也知道宋廷绝不可恃，没有接受宋朝官家的美意，转投西夏，当他在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二月十九日走到应州新城东六十里时，终于为金将洛索所执。可以想见，辽国的正式灭亡之日，也就是金兵南进之时。经过近八个月的酝酿，金廷上下于这年的十月统一了意见，决意伐宋。此后，金廷开始集结军队，准备粮草，并已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方略。这些消息当然也断断续续地传到了朝廷，但没人把它当作一回事。

这时童贯已返回太原，留在大同府交涉山后诸州事宜并兼伺敌情的宋廷使者是马扩。马扩早年即随父马政使金，又参与了交割燕京的谈判，也是帝国的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之一。这一天，马扩突然发现馆驿中供具甚厚，超出了平常款待的标准，非常奇怪。

金朝一方的首席谈判萨里穆尔笑道：

“这是最后一次招待贵使了！”

一语道破天机。

同当年的辽师一样，金兵在短短的二十天后就打到了太原。十二月二十一日，另一路金军也已包围了中山府，离东京只有十天的路程。

一百多年前那次凄恻惨痛的记忆早已在时间的流逝中消失无痕，健忘的人们哪里还能接受这样的打击！像是在六月盛夏突逢飞雪一般，整个帝国都被这个急变所震惊，就连东京宫城鳞次栉比的流檐飞甍，也似乎为此而战栗。徽宗在满面惊泪中的下诏罪己、遣一使求和，不过是些可有可无的姿态，朝廷下令召四方勤王之师，自然也是画饼充饥之举。宰执虽日聚都堂，依旧茫然无策，只忙着向各地遣送家属而已。在如此情形下，徽宗最后所能做的。也就是备舟楫装宝货而准备南下了。帝国君臣就如同一群刹那间受惊的雁阵，眼看就要四散而去。

太常少卿李纲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二十一日夜里，他来到素相友善的给事中吴敏的府第，郑重提出：只有今上引咎禅位，才能使天下克济赴难。吴敏没有辜负好友的信任，第二天就向徽宗建议效唐明皇故事禅位。二十三日上午，李纲怀揣血疏，在玉华阁恳请官家禅位太子以号召天下。经过几个时辰的犹豫，徽宗在无奈中终于接受了这个选择，装作因忽然中风半身不遂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宣布内禅，由太子即位。这就是后来庙号为“钦宗”的赵恒。他是一位更不幸的皇帝，即位仅一年有余，就与其父一起作了金人的阶下囚，最后客死异乡。

钦宗继位六天后就是新年，新君将这一年改元为“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迫于压力，首先严肃处理了以蔡京为首的六大“贼人”，其中蔡京流放，童贯、王黼、朱勔包括蔡京的两个儿子先后处斩，李彦、梁师成赐死。然后任用李纲固守东京，也不再提弃城之事。这两件政治革新多少唤回了一些士气人心，也使得李纲成功地保住了帝国的首都。然而好景不长，当孤军深入的这支金军部队不欲恋战而提出议和时，钦宗马上就改变了初衷，以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和在东京就地搜刮而来的金银数百万两为代价，换取了金兵的撤退。令人

悲哀的是，这时陆续而来的各地勤王之师已将近有二十万之众，而围攻东京的金军只不过区区六万人。

金人南侵之师兵分两路，分别由完颜宗望、完颜宗翰率领。宗望的名字又译作“斡离不”，是金太祖第二子，时任南进大军的右副元帅；宗翰又译作“粘罕”，是阿骨打的堂兄弟，时为西路军主帅。宗望这一路意在直图东京，因此进军神速。宗翰则由西路经太原包抄而下，意在与东路宗望军合攻东京。由于两路进程有异，此次进攻的目的未能完全实现，宗望撤围东京后，宗翰也回师大同府。八个月后，金廷再度发起攻击，这一次宗望、宗翰两军只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成功地实现了会合，并于十二月初完成了对东京的包围，断绝了四方宋军的来路。金人锋镝尽聚，已是势在必得，当然绝不仅仅满足于三镇之地了，宗翰派人传言，要求划黄河为界。

庙堂之上，早已没有死义之士。李纲已被罢知扬州，另一位老资格的将领种师道也不幸病死，剩下的不是贪生怕死因乱谋利之徒，就是浑无韬略自以为是之辈。虽然谋夫众多，发言盈庭，讨论的内容也只有割地请和一端。以此来对付欲壑难填的金人，又能济何事！李纲招募的河北军已被解散，四川、福建及湖广诸路的勤王兵马也被遣回本路，帝国在军事上已没有任何抵抗力。既不想战，又不能战，钦宗只有按照金人的意思下诏，令黄河以北州县“仰开城门，归于大金”。政府既然放弃了保护百姓的本职，天下黎民自然也就失去了忠于朝廷的必要，天子诏命一出，两河百姓汹涌而起，表示绝不从命。金人无力逐城逐地攻掠，便刻意压迫已在囊中的宋廷。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三十日，在勤王之师一无赴者的情形下，堂堂帝国的天子钦宗终于跪倒在金人的面前，称臣谢罪，表示纳躯听命。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正月九日，钦宗第二次被宗望、宗翰强令至金营后，便一去无回。同时，后宫嫔妃、皇亲国戚、技艺百工、娼优僧道乃至帝国府库和首都东京的一切所有，都成了金人的战利品。

最妙的是我们的太上皇徽宗，他本在金人第一次兵临城下时就已跑到江南的镇江府去了，但由于不能割舍贵为天子的滋味，在宗望退兵后的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四月，竟别有用心地回到东京。这一次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不仅未能重坐龙廷，反而身陷危城。钦宗被执

后，徽宗在金人索要甚急的情况下，被手下人哄骗出城，也当了金兵的俘虏。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初六，金人废徽、钦二帝。三月初六，册立原太宰张邦昌为帝，建立傀儡政权“大楚”。数天后，金师北还。

唯一使人感到安慰的是，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因为不在东京而免遭虎口。五月，时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的康王在离东京不远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这就是后来的“高宗”。尽管时势仍极度艰难，但不管怎么说，大宋国祚总算是赖以保存了，这是不幸中之万幸。

徽、钦二帝最后被迁移到金国腹地的一个偏僻小镇五国城，在夷狄的牢窗下度过了屈辱的余生。

同时被掳的皇子皇孙、王公贵戚和后宫妃嫔都随之而沦为亡国之奴。在颠沛流离的迁徙中，不少人即由于不堪饥寒而抛尸野外，其余幸存者则被迫垦田荒外，种莳自给。等而下之者降为奴隶，执炊牧马，菲衣薄食，不到五年，十不存一。最不幸的是女子，无论是王妃帝姬还是宗室妇女、名门闺秀，或沦为奴婢，或选为女乐，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金人的淫具，被奸淫毙命者亦数不胜数。百姓妇女，大多沦为娼妓，在金人的奴役下强颜欢笑，残喘苟延。

生活能够改变一切。我们的徽宗从至高无上的天子一落而至阶下囚，使他从一个异想天开的艺术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痛苦、悔恨、无奈和悲伤的体验也使他的诗词一洗铅华，成为血泪心境的真实写照。公元1135年6月17日，徽宗在尝尽了极度的屈辱和伤痛后，郁郁而终，享年五十四岁。钦宗比他的父亲多活了二十六年，于公元1161年逝于五国城。

从被俘之日直到客死异乡，徽宗从未放弃过有朝一日能够回归故乡的幻想，然而，他还是带着极大的遗憾告别了人世。兔走旧窟，狐死首丘，徽宗只有在临终时遗命归葬中国，但他的这个最后愿望也没有被金廷所同意。徽宗去世五年后，宋金休战达成协议，金廷虽然特

许高宗生母韦太后归国，可并不放还钦宗。在此后的岁月里，钦宗一直希望他能避免像父亲一样的命运，执著地相信他的弟弟能够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直到最后的事实彻底击破了他的美梦。

靖康之难

某一种特别的经历足可以改变人的整个一生。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的那两次如履薄冰般的历险，就已经给当时的康王后来的高宗以终生都难以磨灭的惨痛记忆，在后来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我们的第十位天子始终都无法摆脱这个怵心刿目的梦魇。

第一次是这一年的元月金人首次围攻东京，其时情形紧急，虽有李纲统领守军力保城池不失，但敌锋太锐，我军未集，固不能不和。然而当金使来到阙下邀亲王宰臣赴军前商议时，天子环顾宰执，竟无有对者。李纲请行，钦宗不许，怕他出言不逊惹怒金人。最后，选派李棁奉使。谈判下来，宋廷同意割地赔款，金人要求以亲王、宰相为质。李纲得知后上廷力争，反对增岁币、割三镇，更不同意亲王出使，但在内外恇惧的大势面前，未能被天子接受。

此刻，徽宗诸子中年长者只有肃王赵枢和康王赵构两人在京，蹈险入质，二者必有其一，没有其他选择。康王也许是想透了其中道理，于是私谒皇兄钦宗，毅然请行。在他的慷慨英武面前，李棁十分惭愧，不得已打了个圆场道：

“金人不过是担心我朝失信，要亲王送他们过河罢了。”

康王正色道：“国家有急，死亦何避！”

一时闻者悚然。在那一刻，我们未来的天子似乎确实有着一种为国赴难的冲动。临行前，副使张邦昌自度此去凶多吉少，吓得涕泗交集，康王犹还责备道：“此大丈夫本分，相公不必如此！”初生牛犊的

勇气在于阅历的贫乏，而并非是本性刚强，现实马上就能证明这一切。

长于深宫的康王赵构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枪林戟阵，第一次面对贪婪狡狯的夷狄之徒，也真正地体会到了敌人的猖狂气势，他无法不从内心里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惧。这种震撼足以摧毁道行匪深者脆弱的防线，凭着年少冲动而意气用事慷慨入质的康王当然未能免俗。当东京守将姚平仲轻率地夜劫金营落败，金人以此呵责恫吓宋廷人质，大有斩之以徇的意思时，康王也显然不能坚持他早先的那种豪迈气概了。不过，与已经是股战而栗、痛哭流涕的张邦昌相比，康王尚还能够自持，没把大宋亲王的颜面尽数丢尽，他倒是有理由为此自豪的。

宋廷竟然不顾人质的死活发兵劫营，颇让金人感到意外。宗望由此想到庶出的康王赵构似乎不足为恃，便提出要更换肃王赵枢来营，同时于二月初九放回了康王和张邦昌。我们的康王后来能成为天子并成功地保住了大宋的国祚，或许还是宗望一念之差的结果。倒霉的是肃王，自入为人质后，各地宋兵已渐趋京城，宗望久候西路军不至，眼看三镇也已到手，遂不等宋廷交纳金币数足，引兵北还。肃王也从此一去不回，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殁于五国城。

如果说这一次的经历启迪了康王某种想法的话，后来的那次险情则让他感到无比的后怕。靖康元年八月金兵再次南下，起初并不理会宋廷的议和之请，直到攻下真定、中山两府后，在加紧进军的同时，佯示和意，方提出割让黄河以北之地的条件。宗望这时已知道上一次更换人质反而弄巧成拙，因此一开始就准备挟掳康王为质。在这件事中，宋使王云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他听信了宗望的话，派遣从使李裕从真定返回东京传言道：金人已不复求地，但索五辂及上其尊号而已；且须要康王亲自前来，方能达成和好之议。上尊号不过是名义上的顺从，比称臣纳贡要好许多，“五辂”即帝王所乘之车，更乃无足轻重之物，明白人是不难看出金人之心绝非仅此的。但钦宗宁信其真，不信其假，在业已回朝的王云鼓唆下，于十一月诏命康王奉衮冕玉辂，偕中书舍人耿延禧及王云出使河北金营。康王赵构前一次急难赴义的英勇为他自己酿就了恶果，这一次就算他再怎么不情愿，也是在劫难逃。

是磁州知府宗泽拯救了康王的性命和大宋国脉。宗泽字汝霖，出身于乡绅之家，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进士及第，此后一直在地方做官，政绩卓著。大约是在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的四五月份，以六十八岁的高龄应诏入京。金兵二次入犯，朝廷本拟由宗泽出使，由于他坚决反对盟赂敌国的抗战态度而罢，改命他出知前线重镇河北磁州。其时太原府已失守，出任河北的官员大都托故不行，在帝国存亡之际，宗泽表现出舍身求义的崇高风范，受诏即日便单骑就道，从者只有十余人。宗泽到任后，真定府亦沦陷于敌手，敌酋宗望又派兵进攻磁州，宗泽身先士卒顽强抵御，成功地击溃了来犯之敌，声威震于河朔。

康王一行人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磁州时，金兵已于七天前渡过黄河。宗泽认为金人绝无议和之意，力劝康王勿行。在他的影响下，磁州民众亦遮道阻谏。康王当然十分犹豫，然君命在身，王云在侧，他也无可奈何。宗泽阻留之意甚坚，最后鼓动愤怒的百姓杀掉了王云，终于使康王北行之事半道而辍。要不是宗泽的坚决，康王必然也像他不幸的父兄一样客死在异国他乡。当十二月初金军长驱直入团团包围住东京后，不仅他本人为此感到万分侥幸，连许多身陷重围的朝官都认为康王能为磁州士民所留，一定是天意使然。

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这一年的经历给我们的亲王造成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此以后那位慷慨陈词“为宗社大计，岂应辞避”的康王已经不复存在了，后来的赵构脱胎换骨，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照宗庙次序算来，徽宗诸子中康王排行既末，又是庶出，若不是金人南下掳走二帝，永远也轮不到他入继大宝。也许这两次吉星高照的意义就在于不仅仅使他能够领受到百年难遇的机会，更让他懂得了怎样百般珍惜这个上天所赐的礼物。

康王是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二月一日受钦宗密传蜡诏开府于相州，出任河北兵马大元帅的。当时麾下的兵力约有五万，将领有张俊、苗傅、杨沂中、田师中等人，分作五路次第进发。半道上宗泽和信德知府梁扬祖率兵来会，兵势更振。但当东京议和的消息传来，特别是钦宗生怕勤王军前来会引火烧身，又传密诏诫勿轻动时，康王立即就倒向了元帅府中主和派汪伯彦、耿南仲的一方，转趋东平府。

只命宗泽一军取道大名、开德进逼东京。为已成危卵的东京着想，康王投鼠忌器，此际停兵不进也不能算错，但当事态渐趋明朗，和议将成镜花水月的时候，再对金人抱有幻想，那就不仅是十足的胆怯，而且是多少还有点别有用心了。当二帝终于被掳后，河北元帅府也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只有宗泽提军追击，欲从大名府渡河据敌退路邀还二帝，然而势单力薄，未能得志。

二帝被囚，东京的帝国政府随之土崩瓦解，康王在痛哭流涕中登上了天子的宝座，这是靖康二年——新帝即位后将这年改元为“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五月初一的事。第一件反映出新一代天子某种心态的行为是他对傀儡张邦昌的态度。金兵北还后，张邦昌显然是出于无奈才归宝避位的，这与他当时出任“大楚”皇帝的情形如出一辙，都是贪生怕死、毫无原则的表现。但即位后的高宗却不仅对他宽宥有加，犹还授衔太保，封同安郡王。很明显，新帝十分同情张邦昌所谓“为人所胁”的不得已做法，从某种角度说，经历过若干变故的高宗甚至很能理解张邦昌的无奈。对此，六月初赶到天子行在应天府的李纲十分不解。

“张邦昌僭逆，不得已而自归。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这是什么道理？”李纲语重心长，“陛下欲建中兴之业，而尊僭逆之臣，以此示四方，其谁不解体？”

由此而联系起天子对伪命臣僚一律置而不问的作法，李纲更感到愤懑难捺：

“如此，何以励天下士大夫之节？”

高宗重用李纲的心情迫切，这使他最后接受了他的规劝，下诏处理了张邦昌和一些接受伪命之臣。不过，其时的不少宰执之臣如中书侍郎黄潜善等却站在邦昌的一边。在国家破败、宗庙涂炭的大是大非面前，竟还不乏为投降者开脱的人，其本身就说明帝国临时政府的立场并不坚定，至少还存在着事迫于危时采取变通从权政策的潜意识。实际上，当天子有意任用李纲之初，就有不少人持反对态度，这些人大都在一开始就力言和议而抵触抗金。例如御史中丞颜岐提出的理由是李纲素为金人所恶，不可大用。从原则上讲，这简直就是站在了敌

人的立场上，若以通敌罪论处，都不算过分，但天子不过是将颜氏调离它任而已。

就在李纲大力整顿军政的同时，高宗仍不忘遣使赴金营求和，但天子诚恳的通好之请未被金人接受。在黄潜善、汪伯彦及殿中侍御史张浚的一力诋诃下，李纲也终未能安于其位，八月十八日被罢，在相仅七十五天。另外一件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是太学生陈东竟因上疏言事而被杀。

陈东是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伏阙上书，乞诛蔡京六贼的首脑人物，此后一直为国是上书直谏，拳拳报国之心，天下皆知。高宗闻知陈东之名，召赴行在。陈东来到后，立即上疏切言宰执黄潜善、汪伯彦不可任，李纲不可去，并请皇上驾还汴京，治军亲征，迎请二帝。陈东确实过于忠耿而至于天真了，在天子想来，敌强我弱，要寡人遽而亲征赴险，岂非以卵击石、羊入虎口？再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微妙是：若二帝南还，则朕又将置于何处？所以深怨诟己的黄潜善密请诛杀陈东，正合天子的心意。高宗不能重责李纲、宗泽，却无妨杀一布衣。就这样，杰出的爱国之士陈东未死于夷狄铁蹄之下，却命丧于中兴君王高宗之手，死年四十二岁。同时被斩的还有一位抚州人欧阳澈，他同陈东一样因上书指斥用事者黄、汪之徒而遭致不幸。陈、欧两人被斩于市曹时，连行路之人都为之涕下。

天子和周围大臣的心态作为如此，帝国前途的基调已经初显端倪了。最能说明问题的事情是帝国的新君高宗就是不肯回銮东京。此时宗泽早已进驻汴梁，不断来疏恭请还驾，朝野人士亦纷纷上言还都，但高宗始终不为所动。天子一日不回首都，天子驻跸之地永远就是所谓的“行在”，中央政府就只能在天子行营办公，这对恢复帝国的行政及军事秩序是极为不利的。退一步说，即使担心东京易攻难守而暂避锋芒，也要立即定下“行在”之所，以便明出号令召集四方勤王之师。高宗即位以来态度暧昧绝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是另有想法。果然，当黄、汪及御前众臣提出要皇上巡幸东南时，高宗立即下诏同意。无疑，天子的意思就是以退避而望和了，所有的那些收复失地、邀还二帝的雄大誓言不过都是骗人的姿态而已。

李纲以为，即使车驾不还京都，行幸之所也应以关中为上，襄阳次之，而建康最下。皇上纵不能行上策，亦应去襄阳，以示不忘故都之心。李纲用历史教训作例子道：

“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者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者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中原一失，东南不能必无其事，虽欲退保一地而不可得也。”

史实昭在，斑斑可证，这个道理确实不容置疑。而李纲提出的另一条理由更使天子无话可答：“陛下已降诏许留中原，人心为此悦服，奈何诏墨未干，遽失大信于天下？”

尽管李纲暂时打消了天子退避东南的念头，但并不能从根子上抹去帝国君臣怯战怕事的普遍心态。当金兵于这年九月进犯河阳、汜水，有南侵之意时，高宗立即下诏择日巡幸淮甸，并命淮浙一带增修城堡，招抚民兵，以备皇驾。另外又发布诏书以示圣意坚决：銮驾暂往淮甸，捍御稍定即还京阙；有敢妄议惑众沮挠巡幸者，许告而罪之，不告者斩。十月初一，天子登舟赴扬州，同时下令：以勤王为名擅募民兵溃卒者，并令遣散；有擅募者，帅宪司按劾以闻。从这一天起，帝国的天子就永远告别了中原大地，并无情地抛弃了两河之地坚守国土、引颈南望的忠义之臣和黎民百姓。

也难怪后人为之感慨不已。假如天子不走，留在中原腹地明诏抗战，未必就不能扭转帝国的覆败之局。最低限度，也能与金人划河而治，保住黄河以南的土地。

确实，形势虽然很严峻，但毕竟金兵主力已退，正倾其全力收剿黄河东、北未下诸城，对黄河以南地区的正面压力已有所减轻。同时，河东、北真正失陷者也才十余郡，余皆固守不降，成为金廷的绝大负担。宗泽已在东京抚循军民、修治楼橹，并屡挫敌军的挑衅；沦陷区内奋起保家卫国的忠义民兵，多则数万，少则数千，结寨山泽伺机出击，也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金军兵力。就是不少宣和以来苦于苛政铤而走险、啸聚山林的盗寇，也纷纷来归，至于“行在”者即有十余万人，若善用其力，也是一支不容低估的力量。

忠而有谋的李纲本已在各个方面开始了整顿，在担任行在宰相的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举凡机构建置、募兵买马、军士训练、国赋税收等政治、军事、财政诸般措施，无不卓有成效。在李纲的倡议下，张所、傅亮、孙昭远分别受命置司河北东路、陕西路及京西北路，招谕山寨，养民为兵。一段时期内，三人政令之出，响应不绝，取得了极大的收益。如果李纲不去，使政令措施得以坚持，结果委实是很难预料的。

民心士气亦有可用者。张所部下的将领王彦，率七千人渡河而战，一举收复新乡，后突破金人重围，领七百部曲进入共城西山。部众皆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号称“八字军”，两河山寨民兵归之者达十余万人，所控区域绵亘数百里，成为金人的心腹之患。各地特别是河朔一带的守臣兵民，大都协心并力，率励不懈，急切盼望着恢复，更不乏宁死不屈效忠赴义者。设若天子志在雪耻复仇，进君子而退小人，不惑于求和自安而勇于激励天下之气，国事之败断不至于发展到卒无可为的程度。

但这毕竟是后来人的一厢情愿。我们这个堂堂帝国的颓势并非是一朝一夕酿就的，这个道理不言而喻。本朝从来都不乏懦弱的皇帝，高宗皇帝也不例外，他的突出之点在于，严酷的现实使他一步步学会和掌握了聪明天子们所必备的法宝，那就是只有首先保全自身，才能最后庇护国家臣民。帝国的中兴君主从父兄的悲惨遭遇中更加深切地体会出了这个道理。

高宗的四次大难不死

整个建炎时期的四年，是帝国历史上最不平凡的一页，是一个彻底打破旧有格局，催生新兴之势的时代。历史的魔法以它惊人的创造力，看起来就好像是在刹那之间，就把大宋王朝的故事从东京汴梁转移到了钱塘临安。地理变迁虽然不是世事演化的唯一结果，但却是一切沧海桑田的最好表征。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四月张邦昌被废后，金人即有意南下，九月二十五日张邦昌被宋廷赐死，不过是金室再度进兵的借口。十月，当高宗南之扬州的消息传到北方后，金军左副元帅宗翰即受命于金太宗，开始规划约集诸路金兵南侵事宜。至十二月，果分中、东、西三路大举南下。中路由宗翰率军从大同府下太行；东路由右副元帅宗辅及宗弼领军，由燕京取道沧州攻山东，同时分兵趋淮南；西路则由娄室等率大军自河中府经同州进攻陕西。这一次南进的规模和范围都是前所未有的，三路大军先后渡河，京西、陕西、山东诸路为之震撼。

三路金兵中，娄室所部西路军最顺利，十二月自韩城履冰渡河，陷同、华二州，攻破关中门户潼关，继而于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正月包围并击破永兴军所在地京兆府古城长安，此后一路南下，又陷均、房二州。娄室得势后，复又鼓噪西进，开始向熙河一带进犯。

中路、东路的金兵也势如破竹。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正月，宗翰已破邓州、郑州；东路宗辅部也已攻陷潍州、青州，并分成二部，一部继续攻进山东诸郡伺机南下淮甸，一部由宗弼率领向中路军靠拢，试图对中原地区形成夹击之势。

但独守东京的宗泽成功地遏制住了金军的势头。宗泽自去年六月出任东京留守后，一方面联络义兵扩大力量，另一方面抚慰军民整治战备，使东京汴梁成为了一个强固的军事要塞。在金人的大规模入侵中，各地州县纷纷陷落，唯有汴京两河一带岿然不动，百姓安堵如旧。在起初的一两个月里，宗泽数度击退金军的进攻，使金人在一段时间里不敢再犯汴梁，只得采取正面对峙、侧翼迂回的战术。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二月份，宗翰屯兵西京洛阳，与东京遥遥相峙，而宗弼自郑州抵达白沙镇，离汴梁已不到百里之地。可金军先后数次的进攻全被众志成城的开封守军击溃，并因此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宗泽声威日著，以至于金军士兵闻名丧胆，私下呼宗泽为“宗爷爷”，这对于一向骄悍气盛的金兵来说，无疑颇为难得。宗翰自度东京既不能下，江淮则未可轻入，于是在三月份焚掠西京，驱迫十数州宋地百姓迁往河北，退兵还大同。东、西两路也分别在四五月份受挫而退。

然而宗老爷子能保住东京，击走来犯之寇，却无法唤回高宗的抗敌之心。在天子驾幸扬州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宗泽先后表上二十四道，《乞回銮疏（表）》，殷切盼望着皇上能辍巡南服，回驾汴都。在一道道奏表中，忠心耿耿的宗泽愤怒地指责御前宵小之辈的优游苟安行径，细致地分析了帝王之都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特别是恳直地指出：假如独怀忠愤、力抗贼锋的两河军民久阙王师之援助，必然怀疑天子和朝廷已置两河于度外，最终因失望而解体。不用说，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在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的五六月间，宗泽再一次向高宗提出了出师渡河、恢复故地的详细方略，并保证说若能在当前敌势穷蹙的有利条件下乘胜而进，必能缚金人而臣之，使二圣天眷有归，两河故地得复。他在最后一道奏表中无限感慨地说：

> 臣犬马之齿，今年七十矣。勉竭疲驽，区区愚忠，所见如此。臣愿陛下早降回銮之诏，以系天下之心。臣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若陛下听从臣言，容臣措画，则臣谓我宋中兴之业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为可用，则愿赐骨放归田里，讴歌击壤，以尽残年。

但这一切已丝毫打动不了我们的天子。悲愤交加的宗泽终于郁郁成疾，六月间疽发于背，不幸病倒。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十二日，这位七十岁的老人在连呼“过河！过河”中病逝于东京。

孤直的宗泽也许不愿意相信，但现实却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那就是京城和两河乃至维系天下安危的中原早就不在高宗的眼里，眼下他最关心的是帝位的安稳。即使宗泽能守住京师，天子也从不认为国家剩余的实力足以抵挡夷狄的猖獗，彼强我弱，又岂能激怒敌夷而再招祸乱？在驾幸扬州之前，高宗业已三令五申地宣敕江南一带增治城隍，治兵完备，并派遣人员营缮金陵，复遣官奉迎太后六宫过江以往，早就有退避三舍的意思。此刻驻跸已定，正在扬州这个繁华之城逍遥自在，又如何能听从宗泽的回銮之请而去冒险？五月份天子倒是下了一诏，信誓旦旦地表明要回师东京恭谒宗庙，但言之凿凿，却始终没有起驾的意思。

原来，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随童贯去大同府谈判的那位马扩在金人首次南下时兵败被俘后，佯示降意，换得金酋宗望的优容，开

了间酒店，但私下里一直与敌占区的义军暗中来往。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携亲从数人成功地从敌人眼皮底下逃跑，进入太行山以东的五马山一带。马扩此人很有斗争策略，当有一个人自称是乘敌不备从金地潜回的信王赵榛时，马扩立即就奉其为领袖，并以此号召远近，很快发展了一支近十万人的起义队伍，给金人制造了很大的麻烦。这年四月，马扩带着“信王”的手书秘密渡河请求朝廷给予支援，先是来到东京，然后在月底赶到扬州。

这件事着实让天子震动不小。信王乃今上亲弟，与父兄同时被掳北行。假如他果真从金地逃回并在五马山率众抗御，这必然对北方军民产生强大的号召力，这种影响绝对不能低估。黄潜善、汪伯彦两人始终不相信马扩带来的手书，高宗也一度有点怀疑，然而他认得这位皇弟的手迹，不由得不信。于是发布诏书命信王为“河北兵马都元帅”，迁马扩为“元帅府马步军都总管”，准其过河以后便宜从事。然而黄、汪二人多少做了点手脚，只以一支乌合之军付予马扩，并且还暗中派人侦伺。马扩刚走，五月初一这一天，宗泽请求回驾的奏书又到，高宗犹未加理睬。但第二天，突然传来了信王赵榛有意渡河进入汴梁的消息，这使得天子极为尴尬，为扭转被动局面不能不赶紧表态，所以才有了上面的那道回京之诏。不过，事情来得快也去得急，时局一变化，回归九重的诺言自然随风而去。事实证明，马扩的南来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他的求援不仅没能取得效果，相反却使金军加紧了对五马山的围剿。马扩尚未能渡河，五马山寨就被攻破。

宗泽一死，东京义军便十散五六。朝廷没有接受东京士民的请求任用宗泽之子宗颖，却委任了好大喜功、短于谋略、为人残忍好杀的杜充继任开封府尹、东京留守。杜充到任，既无恢复之志，又不能抚御人心，于是众怀疑沮，集于宗泽旗下者散之殆尽，两河山水寨亦不听节制，宗泽的预言不幸成为现实。

一笛西风吹落日，满帆行客背孤城。中原已经无望了。

自从李纲走后，天子行在竟在许多方面保持着十分惊人的一致。这种一致若非来自于君臣之间的同心协力，便是臣子们阿谀曲折、随意所向的结果。很明显，朝廷目前的状况属于后者。两位宰相黄潜

善、汪伯彦就可以说是地道的无聊之徒，保宠邀禄专权恣睢之外，略无大志，只知道以蒙蔽欺骗的低劣伎俩来打发时日。要知道，金人的刀枪剑戟可并不理会这些，不会因为我宋君臣的慷慨大度而与人为善。宗泽殁后的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间，金兵再次分道南下。此次进军经过了金廷上下的充分酝酿，明确了两大目标：一是平定陕西五路，一是追击宋帝，而尤以后者为要。西路渡河后连陷丹州、延安府直至鄜、坊二州；东路径袭庆源之五马山，大破其寨后又败马扩援军，再陷濮州、滑州、开德及北京两府，并转而与中路大军会合。宗翰所率中路军本以奔袭为主，因此长驱直入，直指高宗而来。

扬州方面居然无动于衷。统领御营军的将帅之一张浚提出早为预备，黄、汪两人竟一笑置之。直到扼守淮阳的大将韩世忠不敌而走，敌军下彭城、淮东直趋泗州后，黄潜善犹认为不足为虑。正所谓栋宇将焚，燕雀在堂，可见黄汪之流不仅庸懦无伦，而且荒唐透顶。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正月底，宗翰攻破楚州后，以主力居后，径遣数百骑往南突击高宗行在。在一片慌乱惊惧中，拥有近万人的天长守军竟不战而遁。初二这天夜里，从天长狼狈奔还的内侍邝询急报金军将至，高宗匆忙爬起被甲乘马，初三黎明时分驰至瓜洲，得一小舟渡江，身边只有亲军数人及王渊、张浚两臣及内侍康履等从行，日暮时分才满身泥泞地赶到镇江府。金兵前锋驰至扬州后，得知宋帝已南走，立即分兵火速追赶。抵达江边的扬子桥时，高宗已经渡江而去，金人一时难觅舟船，再加上其时大雨滂沱、积水盈地，马步不能进，只得望江顿足长叹。

高宗走时，黄潜善、汪伯彦正在共进早餐，听得吏员大呼“驾已行矣”，两人愕然相顾，仓皇失色。心神甫定，首先想到的就是走为上计，两位宰相竟不顾满城士庶，独自跨马而逸。而扬州市民突然见到天子策马出城，宫人也四散而出，晓得情况不妙，登时大乱，争门践踏、奔挤堕江而死者无数。整个扬州乃至对面的镇江，哀号不绝，怨声载道。十万御营大军亦于同时一旦瓦解。最可怜的是司农卿黄谔，逃到江边时，被溃兵误认为是黄潜善，军人因久恨潜善，遂大骂曰：正是尔等误国误民！举刀就砍，黄谔还来不及分辩，就已经身首

异处，做了人家的替死鬼。

高宗皇帝虽然又一次幸免于难，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仅在心理，而且在生理上落下了惨痛的烙印。那是因为邝询闯闱而入时，官家正在新造的宫室里凤鸾颠倒，行云雨之欢，矍然惊惕，遂病熏腐。自此以后，天子后宫便绝少怀孕者。

这一次打击所带来的痛楚很快就被一系列新的创伤所代替，此后两年的颠沛流离使我们的天子犹如鱼游沸鼎，不遑暇处。扬州之变后高宗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逃到杭州，金军虽然没有尾随而至，但御前的禁军却横生哗变，若不是时任宰相的朱胜非机智巧妙地处理，大难不死的天子和帝国刚刚建立起来的政府又要遭受灭顶之灾。如此苦难使天子震悸交集，从内心深处浩荡而出的恐惧和忧虑已经使他无法面对严峻的现实，甚至已完全丧失了作为大宋天子应有的风范。他在扬州溃败几个月后写了封书信转致金帅宗翰。

皇上首先是在信中自称“某”，然后承认金军南来固是“大国之征小邦”，而我们这个小邦绝非对手，“中原全大之时，犹不能守”，更何况“军兵挠败、盗贼交侵、财贿日朘、土疆日蹙”的现在！所以偏师一来，不敢不束手听命，又岂敢言守？信中说：“某”已从汴梁而迁应天，由应天而迁扬州，自扬州而至江宁，三年之间，已过三徙，今已委身于荆蛮之域。高宗在最后甚至十分委屈：“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然而守则无人，奔竟无地，“天网恢恢，将安之焉？”“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无有二上矣。亦何必劳师远涉，然后为快哉？”不能将此视为天子的缓兵之道，因为信中最后表露出的意思已经是彻底的投降。我们这位君主真实的心态是：惹不起总能躲得起。他唯一的希望就是金人能够“存人血脉，全人肝胆”，不要“竭山而畋、竭泽而渔”而已。大宋王朝高宗皇帝此时浑无生人之气的表现，正是我们这个泱泱大邦所有愚蠢、所有懦弱、所有丑陋的集中写照。

短暂的平静后高宗一度北返江宁府，改府名为“建康”，也曾有心在那里布置防卫准备抵御。但随着金军的第三次南下，天子再次惶惶而奔，从金陵退走杭州，再赴越州、明州，最后竟以泛槎入海来逃避

金酋宗弼锐不可当的追击。

完颜宗弼的名字常又被中原人译为“兀朮”，此人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第四个儿子，早年参与了追击辽天祚帝的战斗，此后又随宗望攻宋。宗望死后，又出任宗辅副帅，率军东入山东，西击汴梁，是金廷强硬的主战派人物。金军此次渡江南下，宗弼是除宗翰之外的主要统帅，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俘获宋帝高宗。当时，宋廷守建康者是杜充，守镇江的是韩世忠，守九江的是刘光世，并以杜充节制诸将。

杜充的昏庸无能已见前述。金兵入侵后，杜充竟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七月放弃职守而归于行在。因为他的举动而使东京留守司名存实亡，是造成帝都东京在七个月后终于沦陷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杜充仍得到天子的充分信赖，命他为江淮宣抚使，抚循诸将力守江浙。可杜充在建康的处事与当年在东京一样，酷而乏谋，御敌无方，深为诸将不服。所以他既调不动远在上游的刘光世，也无法指挥近在咫尺的韩世忠，只有靠手下的几位统制，如声名甚著的岳飞等人领兵抵挡。但金兵来势凶猛，根本无法取胜，建安三年（公元1129年）十一月，杜充率步骑六万人在建康向金军投降。

诸将浑无斗志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但这也与朝廷缺乏抗敌信念和一味逃避的基本政策是不可分割的。整个江南防线既已崩溃，宋军遂成为一盘散沙，虽然岳飞率领部下士兵沿途缠斗，也无法扭转败局。金军得胜后兵分二路，一路追击南走江西的隆裕太后等皇眷，一路向高宗所在挺进。此刻御前大将只有张俊，只能护着王驾且战且走，最后不得已从明州人海。

无疑，我们的天子是第一次见到汹涌澎湃的大海，正如他第一次走进金人的军帐一样，他的感触之深是无法言喻的。高宗在明州至温州一带的海上几乎漂泊了一个多月，当驾乘之舟在蓝色波涛中上下起伏之时，也就是帝国的第十位天子最后确立其“过江而避”之王道大计的关口。可以肯定的是，从今以后他将不再改变，也无法改变这个既定方针。

宗弼孤军深入尚能取得如此辉煌之绩，怕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正月，惯于骑战的金人竟不畏艰险，乘

舟入海追击宋帝御乘达三百余里，其骄狂正与宋军的颓丧形成鲜明对照。幸运的是，金人毕竟不习水战，加上畏惧酷热，遂不得不于暑期到来前撤兵，三月份宗弼先退，紧接着进犯江西的一路也从荆门北返。镇江守将韩世忠以逸待劳，正率水师在镇江严阵以待，结果以成功的战略阻击了宗弼之军，将其十万大军困在长江沿线达四十八天之久。若非宗弼得到高人指点，根本就过不了江。这是自靖康以来，劲马硬弓所向披靡的女直军队第一次惨痛的失败。宗弼北返后，犹为这一次差点葬身鱼腹的遭遇连呼侥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他自此以后不敢轻言过江的主要原因。

高宗也许更值得庆幸，算起来这也是他第四次大难不死。不过，在浙江一带奔走逃窜确实也有一个收获。天子发现，以淮甸为屏障，以江表为缓冲，襟带荆楚，背海而立的浙西之地是一个理想的居处。这一想法肇始于他第一次走进杭州府治临安城门的瞬间，后来在两浙不断的辗转使他越发相信自己的判断不误。从天子的逻辑上讲这很自然：金陵离金人锋镝太近，单凭一条长江天险，绝非轻易能守；武昌、长沙则正面受敌而两侧有隙，背无倚仗；巴蜀太远，陕西又太孤立；再往南走进入两广腹地，显得过分偏于一隅，政治、经济基础不够，必将无以自处。从眼前的战略上考虑，背海面陆的杭州虽不是恢复中原的最佳基地，但也不失为一个易退易守的首选，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吸引高宗属意有加了。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九月，天子路过杭州时，便升其为“临安府”。虽然自古以来的王朝都耻于渡江而都，但这一点显然不在高宗的考虑范围之内。从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四月起，天子在越州停留了一段时间，在那里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军事整顿。新年的元旦，高宗改元“绍兴”，这是取“绍奕世之闳休，兴百年之丕绪”之意。在越州又呆了一年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正月，高宗回銮临安。从此，帝国的行在就再也没有迁徙过。

宗弼在镇江惨败后，一年前被宋廷派去经营陕西的张浚受命对西北金军发动攻势，迫使金廷调命宗弼增援。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七月，宗弼主力近两万人终于离开了两淮一带而西入陕西富平，这使多灾多难的帝国朝廷终于喘了一口气。

半壁河山，以柔道御天下

本朝杰出的人物之一欧阳修在几十年前就曾经指出：自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来，无道未必不服，盖自因其盛衰而已。这个论断出自于他的名著《五代史记》，意思是说：中国之制夷狄，并不系于我们自身之强弱，而缘于其势力之盛衰。其实，道理对双方都是一样，即以目前而论，金军的退却就不是因为宋军抵御成功的结果，而是因为它的内部已渐渐产生问题。宗弼停止追击高宗不用说是个绝大的失误，但也是不得已使然。

直接的因素是江浙一带水网密布、丘陵起伏，极不利于骑兵的作战。宗弼的电闪雷击虽能摧枯拉朽长驱直入，但一旦进入两浙腹地后，便显得十分滞重。时间拖得越久，对金兵就越为不利，既然不能达到俘获宋帝的目标，只有迅速抽身。宗弼还算是明智的，如果他再拖延一段时间，南方的湿热天气必然还会使金军北方士兵水土不服，从而大大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但主要的原因还是战线过长。即使不论金国后方那些尚未完全降服的若许藩国以及两河宋地，新近占领的黄河至长江一大片区域就已经成为金廷的沉重负担。兵力的分散，使金兵往往孤军深入而无所依靠，因此从根子上决定了它的激烈攻势绝不会持久。实际上，真正的女直士兵只占整个金军的十分之一，其中绝大部分是受其驱役而战的两河之民、降叛之卒以及藩国小邦如契丹、渤海之兵。其他方面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骤起的女直帝国确实无法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建立起一统天下的物质基础。为此，金人很早就采取了“以汉制汉”的策略。立张邦昌“大楚”虽不是一个成功的先例，但并不妨碍他们如法炮制，在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九月立宋朝降将刘豫为“大齐”国主，建都大名府（后迁入汴梁），以此作为统御中原疆土并进而威胁南渡宋廷的工具。这是征伐异邦的常法，似乎不能算是一个失策。

可是，客观上带来的效果却让金人感到悲哀。刘豫没有能完成摧

毁宋廷的任务，相反却使退守长江以南的宋王朝在相对缓和的形势下一步步走向稳定。尽管“大齐”在金人的威胁利诱下，自建立伊始便对宋廷展开了进攻，但始终没能取得明显的收益。在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和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刘豫甚至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入侵，其中第一次进攻还有金人的援兵作为依托，可最终仍大败于宋军。刘豫的无奈在于他的傀儡性质的政权既不能博取民众的支持，也缺乏足够的军事实力，因此每次进军都极不顺利。尽管在局部间或也有点收获，但最终无法避免夭折的命运，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十一月，刘豫的伪政权被失望的金廷废除。

与刘豫近八年的对峙使帝国的军事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恢复。高宗在相州出任河北兵马大元帅时，兵员不足万人，此后会集各路勤王之军，也只有七八万人。在扬州时，军力号称强大，可大部分是地方部队，经过金军的两度攻击，最后也所剩无几。然而渡江以后经过短短的两三年，宋军一下陡增至二十万，这对于休养未几的南渡政府来说，是相当可观的数目。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不小的奇迹，但说起来却很简单，其中的奥妙是：南渡朝廷继续实行了恩威并重的招安政策，并且做得相当成功。

世遭丧乱往往盗贼蜂起。本朝自宣和末年以来就祸起萧墙，频繁发生民众揭竿而起的事情，国家的败亡加剧了这一现象，使之愈演愈烈。保守估计，南渡前后的盗贼土寇乃至溃兵，至少在一百万左右，其流窜劫掠的危害，对帝国的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幸运的是，大敌当前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裂痕，使一致对外共御敌寇成为普遍的道义所在。在招安方面，宗泽、李纲甚至马扩就早已有过成功的尝试，屡逢打击、穷蹙无奈的帝国天子和政府采取了安抚包容的策略后，也收到了意外的效果。南渡以后成长起来的几大将领都参与了收剿行动，并通过收编壮大了自己的部队。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韩世忠、刘光世部各有四万人，张俊部三万人，岳飞部有二万三千人，王部有一万三千人，另外御前军的数目也有三万余人，其中不少都来自于盗寇、流民。叛军、溃卒经过整编后，也有相当的战斗力，对刘豫的军事胜利就证明了这一点。

帝国军事上的策略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对武将同样采取优

厚的待遇。在一定的范围内，不仅许其割据，各自为法，发展自身的实力，甚至默许他们参与政治决策。这与太祖以来的原则似乎有些背道而驰，但国家目前正当用兵之时，所以尽管有不少人反对，就连天子本身一直也有尾大不掉的担心，眼下也还只能如此。

兵力的增大自然带来财政问题。绍兴二年的每月军费在二百五十万缗左右，这个数字还在逐年递增之中。南渡以后的局面是强敌未去、百事凋敝，不可能腾出手来发展民生而渐得其利，因此朝廷此时完全以重税重赋来解决财政困难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天子唯一可能的选择。战时经济的成败取决于物质基础，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帝国也许要感谢穷追不舍的金军，正是敌人的猖狂才使朝廷最后落脚到帝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否则的话，要恢复国防不仅不可想象，就是支撑政府的日常开销都是个问题。

当然，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政治因素。

挽大厦于将倾绝非易事。帝国从东京败覆后一泻千里，业已丧失了原有国土的大半，在敌骑狼奔虎突的冲击下，百年基业早已摧毁殆尽。在近四年的时间里，虎口余生的朝廷只能在躲藏退避中保持着名义上的完整，以延续赵氏国脉作为逃跑的遁辞。即使金兵因内部的困窘而暂时收敛了锋芒，但在土崩瓦解几乎不能自保的情况下，重整山河——哪怕是东南一隅的半壁之地——又谈何容易！

严格地说，高宗天子并没有进行任何拨乱反正的政治变革，除了固守求和的一贯想法外，在主观上也缺乏挽回颓势的强烈动机。他只做了些修葺恢复的工作，出发点不过是让帝国这架疲敝的战车能够载动他的皇位而已。高宗在越州时正式宣布尊崇元祐，把败亡的责任推卸到蔡京甚至王安石的身上，也不过是为父兄的过错和自己的退避望和寻找借口罢了，这种做法符合天子的一贯作风。南渡后的帝国之所以能得到四方臣民的拥戴，并使天下之心渐渐来归，这种凝聚力和感召力追究起来还是本朝百多年来的培育养成之功。

中国伦理的核心在于“忠”、“义”二字，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强烈责任感。本朝崇尚文治、讲究仁德的一贯努力，终于在最严峻的关头带来了收益，这就是志士们没有忘记维护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崇

高义务，怀赍报效之志而云集阙下，他们把高宗的登基看作是一场“中兴”，并对此寄予了莫大的期望。无疑，这才是帝国赖以继续存在的真正基础。高宗作为临危受命的最高统治者，他的成功在于以安抚的手法和优容的接纳政策使士大夫们大大舒缓了一直紧绷着的惊慌心态，能够从惊悸中定下神来聚集在天子的周围，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兼收并蓄的效果。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五月，尚在流亡中的帝国政府就已经开科取士；渡江以后更注重绥怀之方，强调以柔道御天下。比如对待滞留北方或不幸被俘而出任伪职的人，朝廷不仅不予责难，相反还善待其留在南方的家属，以此召唤他们回头反正。所有这些都是使天子的号召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的原因所在。一切夷狄之辈都往往低估了中原文化的巨大潜能，他们从没有真正地意识到，这种无形的力量是任何刀剑都无法斩尽杀绝的。

绍兴初年的形势虽然看起来与建炎时期一脉相承，都在为应付外寇而疲于奔命，但客观上却无疑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高宗的退守自保路线终于成为唯一可行的方针。从物质条件上说，二十余万的兵力虽已与前几年不可同日而语，但与敌虏相较，根本不成比例。财政则更为糟糕，应付军队和日渐增多的各级官吏都已经捉襟见肘，更谈不上保障大规模军事行动。就原则而论，最好的反击机会早已被一而再、再而三的丢失，事到如今，除了卧薪尝胆徐图恢复之外，哪里还会有更好的办法！

委曲求全是肯定的，但如何去达到最后的目标呢？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宋廷南迁后，金军一方面南下追击高宗，一方面加紧肃清淮河沿线的宋军残余，九月底，攻破江南东路的楚州。十月初二这一天，离楚州不远，位于淮水东头的涟水军驻地孙村，突然来了一艘身份不明的船只，船上有五男二女，为首者自称是前御史中丞秦桧，自东京陷落后为金人所执，金人东进，强随以行。楚州失陷时，携妻王氏，仆婢两人及御史从官翁顺、高益恭及水手孙静，乘敌不备而逃出。

巡逻者大多是乡民出身，不晓其说，遂执缚秦桧等人送入水寨，但寨中将官们也半信半疑。确实，两军对峙，全家安然脱归，哪有这

么方便的事？事情蹊跷，未可遽定，便将秦桧一行送至主将寨中。

统制丁禩也不甚相信秦桧的自述。此刻他正巧患病，于是借口不出，由手下的几位将领陪同秦桧。秦桧见众怀疑沮、敌意甚重，无奈回到舟中住下。过了几天，丁禩经过一番斟酌后，还是派参议王安道、冯安义陪同，护送秦桧转赴天子行在。当时陆路已经不通，一行人由海道前往浙中，十一月初五抵达越州——这个天子驻跸之地此时已升格为“绍兴府”。

秦桧再一次向朝廷陈述事情经过说：靖康元年东京沦陷，因不愿拥立张邦昌，为金人拘执北去，至于中京大定府，同行者妻王氏，奴砚童、婢兴儿以及御史台街司翁顺数人。金人提兵南来，命秦桧以随军转运一职偕行。因与妻王氏密谋，故用反语，激敌酋完颜昌同意家属随行。楚城陷，乘金人争趋入城、纷纷不定之时，密约舟人孙静俟于淮岸，自己以催发钱粮为名，与妻王氏等数人于当夜乘舟而去。行六十余里，宿于丁家寨南，次日，为涟水军统制丁禩逻者所得。入寨后，诸将颇不信，复有一刘靖者欲杀桧而取囊橐，幸为桧当面折之，事寝不发。

但朝中大多数人对此表示怀疑。

确实，事情的疑点甚多。当初与秦桧同时被拘者还有何？、孙傅、司马朴，他们三人下落不明，唯独秦桧得脱虎口，此可疑者一；自中京大定府至燕京有千里之遥，自燕京再至楚州又将近有二千五百里，敌人一路之上岂无防禁，而容你秦桧轻易逃脱？此可疑者二；金人若无放归之意，则必然于命其随军之同时质其家属，绝无使王氏等同行之理，此可疑者三。最令人疑惑的是，秦桧自称随军至楚后，定脱归之计于顷食之间，借催粮之名匆忙而奔，照情理言，绝不应携带囊橐之物。则如何又有抵达涟水军后，军将因觊觎其行囊包裹而图谋不轨之事？人们有理由认为，秦桧的南归确有不明不白的地方。

但这些猜测却被朝廷宰执们所否定。宰相范宗伊、同知枢密院事李回一向与秦桧友善，此次更是站在了秦桧的一边。特别是范宗伊，此人不仅一贯主和，而且曾经一度出任过张邦昌的伪职，因而对秦桧的逃归便持有一种天然的肯定态度。两人授意秦桧先谒见诸宰执大

臣，以期首先打消朝廷重臣的疑虑。初六，秦桧来到政事堂，在范、李两人证明下，大家果真接受了秦桧的说法，并上报天子。

除了范、李两人的力保外，秦桧早年的名声也是使宰执们消除怀疑的一个原因。秦桧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进士及第，先补密州教授，后又中“词学兼茂科”，出任太学学正。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攻汴京，秦桧上书言事，其大略云：金人贪得无厌且奸诈无信，朝廷至多只可割让燕山一路，同时东京守御绝不能缓。因言论不符钦宗之意，疏入不报。那时的秦桧虽不比李纲等主战派，但至少是与朝廷上下惊慌失态的衮衮诸臣确有不同。后来的廷辩中，赞成割让三镇的人有七十人，而反对者只有三十六人，秦桧即是其中之一。肃王入质金营，秦桧是随驾奉往的大臣之一，金师退兵后回朝，正是因李回之荐入为殿中侍御史，寻迁左司谏，一直做到御史中丞。金人再度来犯二帝被囚后，金人传意立异姓为帝，众臣皆失色无语，身为御史台之长的秦桧进状请存赵氏帝脉，因此而为金人要执。这段事迹虽谈不上轰轰烈烈，倒也有目共睹、臣庶皆知。对这一点，幸免于难的诸多南渡大臣心里是有数的。

然而一个人早年的表现并不能证明日后的一切。单凭秦桧这点过去的忠诚，就对他陷入敌手后四五年的经历不加审查，显然也悖于事理。不过，这也是此刻政治环境的产物，国家新遭丧乱，百废待举，尤须以广大包容之心接纳故臣旧民，这是既定的国策。国家正当用人之际，事贵从权一切不问，更是天子内心根深蒂固的想法。对僭逆事敌的张邦昌都可以不咎既往，又何况千辛万苦奔回故国的秦桧？从现实的角度上讲，此际弃家别土从敌占区内辗转南来的士绅庶民数量极大，也不可能一一加以甄别。所以秦桧从海上来到行在的第三天，谒见宰执后的翌日，高宗就予以召见。

毫无疑问，自从他决定从金地脱逃之时起，秦桧就一直盼望着这个时刻的到来。这天上午，秦桧是踌躇满志地走进天子行宫的，他为此酝酿已久，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必胜的信心。他也知道，自己一定能够打动人主之心。这是建炎四年十一月初七，公元1130年12月10日，帝国历史上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秦桧对皇上道：

“如欲天下无事，须得南自南，北自北。”

这就是说：南方归于南方，北方归于北方，双方各成一家，互不相涉。言下之意，不仅金人的吞并两河能够承认，就连刘豫的僭伪也是可以默许的。

很显然，秦桧已彻底放弃了本朝百年廉耻礼义之训，对祸变危迫既不以为忧，对败衅迎降更不以为耻，所以他才要朝廷正式面对南北分裂的现实。秦桧这个十足的投降主义言论也证明，他虽是不得已而北去，但却独受金人青睐而受伪职随军，其中不会没有原因。变节者只有泾渭之分，没有程度之别。不能舍身求义，反而以事贵从权的理由自遁，这从某种角度止说，与那些弃君叛父、奉敌称臣者如张邦昌、刘豫等并无明显的区别。秦桧的理论要是放在以前，恐怕任何一位天子都有可能将说话人逐出殿堂。然而眼下之时，正是理灭欲兴的末日之世，一切苟全性命的主张，都自有它的市场。

高宗已决定做一个彻底的务实者。按照他的想法，王朝正统犹在，是可以不怕那些割据者僭逆一时的。克己复礼而天下归仁，我们的天子自有他行事处世、统临四极的原则，所以他对秦桧的话便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

秦桧立即着手他的计划，第二天就草就了给金酋完颜昌的国书，由宰相范宗伊呈送御览。高宗为此感慨万分，对宰相道：

“秦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得到了二帝和母后的消息，又得到了一位佳士！”这一赞叹确是发自内心。

这时，完颜昌已攻占楚州，继而又有南下之意。就在秦桧入对的这天，完颜昌近二十万大军已向泰州附近的鼍潭湖水寨发动攻击，得手后又转攻泰州。转战长江沿岸的岳飞五月中旬收复了建康府城金陵后，此时受命出任通泰镇抚使进驻泰州，但敌众我寡，不得已渡江退守江阴。这下，局势顿时又紧张起来。消息传到绍兴府，天子行在已经是一片惶恐。

高宗对秦桧的讲和之书未作任何改动，只是将“国书”的名义去

掉，转以私人信件的形式命负责长江防线的刘光世伺机转致金军。宋家天子尽管无可仗恃，但仍旧还是要面子的，扬州覆败后的那封辞意谦卑的信函，同样是采取了这种方式而未预外闻。假如这种东西的内容泄露出去，朝野强大的舆论将会是一个巨大的牵制力量，天子不愿看到如此事件的发生。

本来，范宗伊对秦桧的安排尚有些顾虑，但天子却十分爽快，立即就给了一个“试礼部尚书”的头衔。“礼部尚书”原是寄禄官，相当于一种薪俸的级别，元丰改制后，方实领本部事务；“试”是试用的意思，一般在一段时间后转正。任命下达，秦桧照例上了一道让表，说自己泛海而来，只是奏报两宫安好消息而已，既已蒙受恩赐，志愿已毕；况且新从敌中脱身，理应投闲，请求按原职致仕。但天子正属意有加，未予接受，四个月后的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二月，进而擢升秦桧为参知政事。参知政事一职原本已罢，一年前朝廷简化政制，并三省为一，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原门下、中书二侍郎改为参知政事，废尚书左右丞，参知政事遂又重新成为执政官。

秦桧取得初步的成功后有些得意忘形。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七月，范宗伊罢相，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相位无人，秦桧有点耐不住了，他逢人辄道：

“我有两条计策，可以耸动天下。”

听者中有人奇怪：“何以不言？”

秦桧回答：“方今朝廷无相，说出来也无法施行。”

这话传到天子耳里，高宗不由得不动心。此时，刘豫的伪齐已经僭立，张浚在西北战场上的主动出击也遭致失败，陕西地区的永兴路和秦川五路已尽为金人所占。形势已愈趋严重，满怀疑惧的天子当然不会放过每一个可以让他安枕无忧的妙策。八月二十三日，朝廷发布任命，以秦桧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与吕颐浩同登相位。秦桧从逃归到入相，只用了十个月的时间。

然而秦桧入相近一年，也并未看见他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秦桧

大约也知道他的两条所谓的奇策其实是老调重弹而已，所以尽管早已成竹在胸，并且也将此付诸文字贻观有关大臣，但却不急于付诸实施。他现在最关心的仍然是权力，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排挤掉与己不合的吕颐浩。颐浩字元直，元祐进士，是一位老资格的大臣，自高宗于应天府即位后就一直随驾在侧，在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的一次兵变中立有大功，入为右相，次年罢。此次与秦桧分任左右相，是第二次入居中枢。颐浩此人在政治策略上倾向于抗战路线，主张先平内寇，再御外侮，并进而北伐。但他的个人作风却很难令人恭维，既挟私用人，也好倾覆异己，这样的人与秦桧共担朝纲，自然不能相容。

两人争斗下来，颐浩取得胜势。他的杀手锏是讽使御史黄龟年上书劾弹秦桧主和误国。高宗本来无意以此罢去秦桧，但兵部侍郎綦崈礼出示了秦桧所谓的奇策后，天子也觉得有些说不过去。

秦桧的原话是八个字：“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虽然简单，但明显是比当年的“南自南，北自北”具体得多了，更确切地说，这八个字是拨开云雾露出了庐山面目，暴露出了他的真实想法。

所谓“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意思就是要把河北人归于金，中原人归于刘豫。这话的涵义也有扩大，不仅仅是承认了敌伪占领的现状，而且连帝国本身也否定掉了。把北方人赶走，这不就等于说大多数南渡臣民不是大宋帝国的子孙吗？难怪天子看后不悦道：

“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是北人，归到哪里去？！”

秦桧第一次入相的经历就这样宣告结束。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八月二十七日，高宗下诏罢免秦桧，制词责两策之诡，同时榜于朝堂，谕以永不复用之意。消息传出，议论沸腾，对秦桧的谬论，人无贤愚，交口唾斥。秦桧成了众矢之的。

秦桧竟会提出如此荒谬的理论，实在是匪夷所思，朝野中有不少人就认为这是有意资敌。联想起秦桧南归的种种疑点，人们怀疑他甚至有可能是金人的奸细。秦桧自称是从金酋完颜昌处逃脱的，若非其有意纵归，为何秦桧甫一回朝就献策天子，致书于完颜昌？再说，金人攻陷扬州时，就曾张榜城内，鼓动“西北人从便还乡”，秦桧要不是

金人所遣，他又怎么会有如此相似的说法？不幸的是，朝野的这些议论也只是怀疑而已，尚拿不出确凿的证据。

秦桧擅权，黑夜更黑

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八月秦桧被罢后到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年底，帝国事务的中心内容一是与敌伪军对峙中的拉锯战，一是对各地盗寇的收剿，再有就是不断地向金人派遣使节示以停战议和之意。对高宗来说，前两者并不是时政之要，重要的是后者。让天子感到无奈的是，即位以后虽屡屡遣使如金通问，但绝大多数都被对方拘留，金人也从未派遣过一介之人报聘。直到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春，通问使潘致尧去而复回，才终于打破了旧例。这件事情当然是某种消息的透露，高宗感到由衷的高兴。为此，天子立即停止了吕颐浩的北伐准备，同时由枢密院发布命令，谕戒边将不得擅越疆界。这年七月，命韩肖胄为使如金。五个月后，韩肖胄不辱使命，返国时带回了金帅完颜宗翰派遣的九人使节团，双方终于开始了正式的谈判接触。此后的几年里，金廷不断在战场和谈判桌上双管齐下，迫使宋方答应苛刻的条件，但宋廷内部反对和议的力量甚大，使高宗一时不能遽下决定。另外，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也使高宗不得不暂时将和议搁置一旁，一是金人的要价甚高，一是局面有所缓和后，朝廷上下滋生了一些相当乐观的情绪。殿中侍御史常同的话就是一个典型，他认为，和、战其实是同一件事，关键在于掌握主动，本朝已有二十万的兵力，用不着畏首畏尾。在这段时期里，主战派基本占据了主流，也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天子，尽管高宗从心底里恨不得一朝一夕就达成永久的和平而一劳永逸。

与和、战的艰难选择相关联，朝堂之上的政治斗争同样十分激烈。吕颐浩罢于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九月，直接的原因是他因独断专行过于苛刻而遭致御史的参劾，但内里的原因则是因他屡请北伐而一无效果，使一心望和的高宗有所不满。此后是朱胜非担任了一年

的宰相，胜非是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秦桧去职后由吕颐浩力荐出任的，也是第二次入相了。他与吕颐浩很有相似之处，一是他们在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的那次兵变中同有斡旋靖难之功，二是两人的时誉都不很好。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九月朱胜非罢相后，赵鼎与张浚先后人相。

赵鼎字元镇，南渡后历任右司谏、殿中侍御史、御史中丞，由参知政事拜相。他基本上是一个稳重派，主张战、守、避三者并重，反对退守吴越。在这一年的二月，极力赞成岳飞收复荆襄要地襄阳的主张，并一力促成以岳飞主持战事，使其最后取得胜利。因此，赵鼎得到了高宗的充分信赖。张浚字德远，靖康初为太常簿，闻高宗即位，驰赴应天。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后力主经营川陕以保东南，并受命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一去就是五年。张浚在川陕主持抗战中取得过一些胜利，但也在富平战役中遭致严重失败，丧失了陕西大部。从总体上讲，张浚尽管有所失误，但毕竟还保全了整个蜀地和陕西的部分领土，为屏蔽江淮、牵制金军起了很大的作用，应该是功大于过的。然而张浚回朝后，却有不少人攻击他丧师误国，处事无方，甚至说他当年请行川陕是“避祸远去”，此番受命回朝是“闻知虚位，前缓后急”。不过，高宗并没有为此所左右，仍然命其入相，并对他们两人寄予了甚高的希望。

可是事与愿违，赵、张两人虽被舆论誉为“同志辅治”的不二之选，但几乎从一开始就产生了摩擦。赵鼎特别注重程颐之学，因此十分推崇元祐政治。高宗早在建炎初期罢停王安石在宗庙中的配享地位，反熙宁而尊元祐，就是赵鼎一力所促成。赵鼎此次入相后，提倡程门之学，擢用元祐大臣子孙不遗余力，显得十分偏激。可笑的是，由于赵鼎从没有见过程颐，有人冒称程门子弟，他也照纳不误。赵鼎的努力加上高宗本有否定熙宁之意，一时程颐门人充斥朝野，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然而张浚却不以为然，至少不像赵鼎那样以个人好恶妄定雌黄，他认为元祐未必全是，熙宁也未必全非，对程门之徒喧嚣朝野也有所不满。在对待金人的态度上，赵鼎主守，张浚主攻，也有不同。政治原则上的重大分歧必然反映在日常事务中，因此两人之间不断产生龃

龉，议论既不合，言语之间也有冲撞。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底，赵、张的不和达到顶点，赵鼎对皇上抱怨说：虽然我两人早年如兄弟，但今日共相，势同水火，不如留彼而去臣。经过一系列冲突后，赵鼎终于在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十二月罢去。九个月后，因为刘光世部将郦琼叛变投敌的事件，张浚也引咎辞职。不过，张浚此际的表现还是值得称道的，罢相后主动荐举赵鼎自代，于是赵鼎复相。

赵、张不睦并不是悲剧产生的根源，他们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是让秦桧复出。始作俑者是张浚，他这个人性格轻躁锐进，喜欢奇士，因此对秦桧十分赞赏，不止一次地在其他人面前夸奖秦桧。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后，和议之论渐占上风，秦桧的境况开始好转，张浚又力荐可用，遂使其渐渐起复。赵鼎去后，张浚进一步引用秦桧，最终让他做到了枢密院使的位置。赵鼎本来很鄙视秦桧，但再相后在秦桧的逢迎苟合下，竟也改变了想法，反倒认为他堪当大任。张、赵二人在与秦桧共事一段时间后都有所省悟，但明白得太迟了，最后皆被秦桧排挤出朝。张、赵的这个错误使我们的帝国从此真正变成了一个不思进取、退守自保的偏安政权。

由此看来，一时名臣赵鼎、张浚德才器量不过如此，识见更不见得高明。高明的是秦桧，这位左之右之翻云覆雨的诡黠奸佞之徒。可叹的是，这种人总是能运用巧妙的手法为自己铺平道路。

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

事情要从三年前说起。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九月，金军协同刘豫部队南进，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给宋军的长江防线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但不知为何，金军前锋完颜宗弼在十一月间的一个风雪之夜里突然就撤军而返，使得整个南侵战役不了了之。事后才知道，原来是金太宗病重的消息传到了金营，宗弼已经无心恋战。

金太宗死于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由金太祖孙完颜亶继位，是为“金熙宗”。金廷自发动侵宋战争并取得胜利后，以完颜宗望、完颜宗翰东西路大军为主的军阀派别即已形成，宗族之间不可避免地开始了激烈的争斗。宗望死后，宗翰所谓的“西朝廷”在后来成为金国最具实力的军事集团，继宗望出掌东路军的完颜昌等人已无法企及。宗

翰的权势如日中天，必然引起新帝金熙宗的疑忌，即位之后，首先采取架空的策略罢卸了宗翰等人的军权，然后又默许以完颜宗磐、完颜昌、完颜宗弼为首的一批实力派合力排挤宗翰。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秋天，宗翰终于被逼迫致死。刘豫的“大齐”本是完颜昌一手树起来的，不料刘豫被立后，为生存计竟大力攀附宗翰，这使得完颜昌甚为痛恨。完颜昌一上台，立即就在金帝面前弹劾刘豫，并得到了响应。这年的十一月中旬，金廷正式下诏废除了刘豫的政权。此后，完颜昌升任左副元帅。完颜昌成为金廷的掌权人物，也是高宗重新启用秦桧的动机之一，因为据说完颜昌一直都很赏识秦桧，两人的私交还很不错。既然天子有意与金人谈判，秦桧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宗翰被除后，金人内部的矛盾又开始转化，宰相完颜宗磐和完颜昌成为一派，与另一派太傅完颜宗斡、军事统帅之一完颜宗弼发生利益冲突。为了增加自己的砝码，完颜昌主动向宋廷示以和谈之意，于这年的十二月份遣送宋使王伦返朝，表示可以归还徽宗灵柩。而且只要宋廷臣服，愿将刘豫所领河南之地归还。王伦辞行时，完颜昌意味深长地说：

“自今以后道路畅通，和议可以平达了！”

刘豫伪齐既已不复存在，宋金之间名义上的缓冲阻壅也随之消失，双方当然可以方便来往。但是，这种方便对我们的帝国意味着什么呢？

高宗皇帝为此欢欣鼓舞。“只要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无所计较”，这是他的原话。王伦回来后仅几天，又被高宗再度遣往金廷，名义当然是奉迎徽宗梓宫。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五月，金使乌陵思谋、石庆来到宋境。此时秦桧已升任宰相，他不折不扣地执行着高宗的方针，开始了帝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和谈。

金人当然附有苛刻的条件，这从朝廷没有公布金廷国书内容的事情上也可略知一二。高宗当然也没有立即表态，原因是宰执大臣争论不定，参与谈判的宰相赵鼎、枢密副使王庶两人就表示不能接受金人的侮弄。但高宗的犹豫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七月，又派王伦出使。到了十月份，高宗已经和秦桧达成了完全的一致，明确表示坚决讲

和，并且同意了秦桧提出的由其独主此事、不许群臣干预的请求。十月二十一日，无可奈何的赵鼎只有称疾求去。十月二十六日，金使张通古、萧哲抵达宋境。这一次朝廷已无法像上一回那样遮人耳目，因为这两位使节所挂的头衔一是“诏谕江南使”，一是“明威将军”。既“诏谕”又“明威”，天子想躲都躲不过去。张通古一到临安，事情马上就会摆到了眼前：要想达成和议，我们的天子就必须跪接金人的诏书，更不用说那封诏书上有什么屈辱的条件了。但是，高宗已下定了决心。

朝野内外针对皇上不惮屈己，只求速和的政策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早先的澶渊之盟尽管带有岁币的条件，但毕竟还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和议。而靖康之难中的徽、钦二帝，乃迫不得已屈膝称臣。帝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过哪一朝天子主动以臣子之礼事敌的。负责起草国书的曾开当面痛责秦桧：

“主上以盛德当大位，相公则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为何自卑辱至此？”

司勋员外郎朱松等六人的联名上疏更是一针见血：

> 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边备，以竭我国力，以懈缓我不共戴天之仇，以绝望我中国讴吟思汉之赤子，以诏谕江南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礼。自公卿大夫至六军万姓，莫不扼腕愤怒，岂肯听陛下北面为仇敌之臣哉？

这可以说是自南渡以来最具酣畅淋漓之气的一道奏疏。尤为可贵的是，从中可以看出本朝士子也并非都是心态糜烂而不可收拾。特别是枢密院编修胡铨的上书，直接要皇上处斩秦桧、王伦等人，一时间市井之间争相传诵。然而天子和秦桧并不理会这些，秦桧甚至干脆大事清洗主持抗议的大小官员，将他们一一处理，其中受到打击最大的是程颐门生。同时秦桧把自己的党徒勾龙如渊提升为御史中丞，对反对和议的大臣专事弹劾。其手段之强硬，已臻极致。

但军队的参与让秦桧紧张了一阵。帝国此时的三大军事统帅中，除了岳飞在鄂州不知详情外，张俊、韩世忠均上表极力反对。御军将领杨沂中等甚至告诫秦桧：若皇上必行屈膝之礼，万一军民汹涌闹出乱子，我等概不负责。在群情激昂面前，秦桧虽然毫不动摇，但如果

拿不出好的办法来照顾天子的颜面。则必然激发事态进一步扩大，导致和议中辍。不用说，秦桧绝不愿这样的事情发生。

天子也未尝不知道跪受诏谕对他来说是多么的尴尬，但为了自己想望已久的大计，似乎也没有其它的选择。高宗认定，这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万乘之主所作出的牺牲，他不止一次地标榜说：梓宫未还，母后在远，陵寝宫阙久稽汛扫，兄弟宗族未得聚会，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是他不惜屈己就和的出发点。所谓“若使百姓免于兵革之苦，得其安生，朕亦何爱一己之屈？”他甚至有理由为自己这种忍让与厚生之仁感到骄傲。因而天子不仅十分奇怪臣民们不能谅察苦衷，对士大夫们缺乏为人主分忧的勇气尤感到愤怒，进而对秦桧、王伦也有相当的不满，认为他们拿不出良策来帮助圣躬。可见，最使高宗为难的不是国家的尊严而是自己的面子，假如真的跪在金使的面前，这对于堂堂大宋君主威信的消极影响确实是无法弥补的。十二月二十四日，金使到达临安，下榻于左仆射府邸。同时，金国方面也不断施加压力，甚至放出有意立钦宗为帝的消息，我们的帝国朝廷已到了必须做出最后决定的关头。

还是秦桧为天子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受到一位聪明的大臣楼炤的启发，突然想到天子眼下正在为先帝徽宗守丧，嗣君谅荫虽不一定三年，几个月还是必要的，这岂非是一个绝妙的借口！四天后，秦桧以暂摄国政、总领百揆的冢宰身份，代替天子在金使张通古的面前跪受诏书。秦桧以下的从官，其实都是些披绯着紫，装扮成朝廷大员的低级官吏。这样一来，既维护了天子的尊严，又照顾了士大夫们的颜面。也亏他想得周到。

这件事一完成，和议就成功地告一段落。无论如何，金人毕竟答应了归还河南之地，朝廷还是得到了不少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天子觉得有资格为此自许。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元旦，不无欣喜的高宗下诏布告中外，同时大赦天下，并开始了一系列落实措施，其中包括派遣各种使节，或如金报聘，或交割地界，或宣谕诸方，甚至派皇族前往河南恭谒祖陵。天子的心情十分迫切，恨不得达成的书面协议马上就变成现实。这时，前线的岳飞方得知确切消息，累表反对和议不果，于三月份愤然上书乞解军务。高宗没有同意，他在敕书中信

誓旦旦地表示，朝廷并没有放弃武备，希望岳飞不要遽而言归；但他同时告诫岳飞要始终一心保卫社稷，切不可以贪功为念。张浚在永州也前后上疏五次，力言金人狡诈无信，但同朝内外许多上疏讽劝的人一样，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和约实施了一年有余，河南地区也差不多交割完成。但是，和平终归是金人赏赐的，操纵权既然在人家手里，注定事情必然会有反复。

金国的形势陡然又起了变化。完颜宗磐、完颜昌联盟得势未久，就遭到了完颜宗弼等一派的打击。宗弼自建炎以来，一直就是金军南侵的急先锋，此人极端狂傲，从来都不把宋廷放在眼里，尤其反对完颜昌让地和宋的做法。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七月，宰相宗磐被诬以谋反罪处死，完颜昌也由汴梁调往燕京，到任不及一月，即以“与宋交通，倡议割地”的罪名被执，满门处斩。完颜昌死后，宗弼顺理成章地进位“都元帅”，并立即撕毁和约，于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向宋廷展开进攻，帝国刚刚得到的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南京应天等地又告沦陷，高宗的欢喜瞬间化为乌有。

为此，朝廷上下自然群情激愤，这也包括天子在内。高宗又在诏书中称金人为“贼”，对夷狄之徒出尔反尔的行径感到由衷的伤心。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也只有开始全面的抵抗。令人兴奋的是，在岳飞的奋勇抗击中，金人的势头很快被遏制。本朝建国以来最伟大的军事统帅岳飞率领他那支战无不克的岳家军，进而把矛头指向了河朔，欲乘此东风，从头收拾帝国的山河。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六月，岳飞的牛皋、孙显部首战告捷，大破敌军于陈、蔡州界；闰六月二十日，张宪部克复颍昌城；二十四日，张宪、牛皋克复陈州，几天后，另一路王贵军收复了郑州，此外河南义兵也纷纷而起，占领了不少州县。岳家军所向披靡的同时，负责淮西战事的张俊、王德部却无意锐进，攻克亳州后便班师庐州，这使得宗弼集中兵力，开始对岳飞实施重点打击。七月初八，完颜宗弼探知岳飞本人驻扎在郾城，遂派了一支突击队偷袭，以冀建立奇功。但在岳飞亲卫军的迎击下，这支近一万五千人的敌军还是大败而逃。七月十二日，岳家军进入洛阳城。七月中下旬，岳飞以挺进突兀、两翼空虚的孤军，犹与完颜宗弼在颍昌府境

内展开决战，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一系列战役中，整个岳家军号令严明、作战英勇，具有一种守死无去、有进无退的顽强精神，俨然是一支不可动摇的力量。那句有名的话“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就是所有金兵从内心发出的感叹。

然而岳家军由于不断的进攻而掉进了一个危险的境地，这是因为淮西一翼的张俊、王德部不仅没有火速并进，反而继续撤退，使岳飞完全暴露在敌人的夹击中，前不能进，后不易退。颍昌决战胜利的第三天七月十七日前后，岳飞在连章请求增援而不得的情况下，反复掂量得失，不得不按照朝廷的严令“措置班师”，使眼看就要到手的胜利付诸东流。这一事件使岳飞为之痛心疾首。确实，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这对于一位赤胆忠诚、以灭虏复仇为己任的志士来说，又岂是一个“痛”字所能概括的！

金人叛盟对秦桧是一个重大打击，他为此很是忧恐了一阵子，深怕他的地位会从此丧失。但事实证明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高宗依旧对他保持信任。秦桧转忧为喜，决心重整旗鼓，从头再来。

到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八月，中原和淮东的宋军已基本撤退，金军也开始休整。从十二月起，经过了充分准备的完颜宗弼选择了淮西作为重点进攻的目标，开始从汴梁一带向南移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正月，渡过淝水攻占了寿春，揭开了第二次战役的序幕。进军初期，金人并不顺利，在柘皋县一战中，还遭致了失败，但不久宗弼就来了一个回马枪，将轻敌的淮西宋军张俊、王德部成功地击退。在这场战役中，奉命驰援的韩世忠水军也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等到岳飞受令移师淮西时，沿线宋军已全部脱离了战场，岳家军也自然也无可施为。

此次战役双方的得失参半，但这两年进攻宋军如此不顺，是宗弼没有想到的，这使他锐气顿失，大有无可奈何之态。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的八月，宗弼转而在心理上向宋廷施加压力，放回了扣押的宋使莫将、韩恕，并让他们带信返国，信中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岂料这个效果竟出奇的好，高宗一下子就表示接受金廷的责备，愿意以新的条件重新和谈。

许多迹象表明帝国的天子根本就无心恋战。去年停发援军，让岳飞不明不白退军是一例，今年四月，更以庆贺淮西之捷为名，一下子就将三大主帅张俊、韩世忠、岳飞明升暗调，从而罢卸了他们的兵权更是一个典型的表现。在这一事件中，秦桧与高宗的目的相同，但出发点却不一样，他之所以汲汲于此，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把这三人除去，自己就不可能安居其位，秦桧并没有忘记前番议和时三大帅强烈反对的旧事。三帅名义上担任了枢密使和副使，但除了战功最逊的张俊逐渐倒向秦桧外，韩世忠、岳飞两人都成了地道的闲人，内心苦闷中，表面上还不得不装作优游闲散的样子。最可忧的是两帅的部属，疑惑之下，不免猜测纷纷，军心已有所动摇。这一倾向不仅给秦桧重新整编韩、岳两支部队提供了动机，也为他们的主帅埋下了悲剧命运的种子。

最能表现秦桧丑恶嘴脸的事情是岳飞的冤案。岳飞对我们帝国的贡献有目共睹，短短十年间，他从一个普通的将校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主帅，完全是凭着自己对国家社稷的忠诚和血汗努力。然而，甘泉易竭，秀木必摧，岳飞的赫赫功勋却使许多人由嫉妒而忌恨，张俊就是最不能容忍岳飞的人，就连韩世忠也不能免于此病。金人就更不用说了，宗弼就曾一再表示，若要议和，必须杀掉岳飞。利害得失如此，叫我们的天子和秦桧怎么做呢？

这场冤案的过程虽然很复杂，从这一年七月初秦桧党徒谏议大夫万俟卨率先弹劾，到张俊首告岳飞部将张宪与岳飞子岳云谋反，再到十月份岳飞入狱，前后共三个多月的时间。但制造冤狱者的动机如此，这件事情其实是十分简单的。岳飞的申诉已经毫无意义，他脊背上刺写的那闪耀古今的“精忠报国”四个字，更打动不了诬陷者的顽石心肠，他只有在最后的逼供纸上写下“天日昭昭”的字样来迎接最后时刻的到来。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被毒死，年三十九岁；岳云、张宪斩首。

似乎不能认为秦桧一人就可以一手遮天，若没有天子的默许，秦桧要想杀掉一位朝廷重臣绝非如此轻而易举。本朝虽然一向防忌武人，但自太祖以来，从未杀过一位大将，秦桧胆敢开此先例，不可能没有倚仗。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岳飞之死竟没有引起朝堂之上的任何

反应，只有韩世忠一人到秦桧面前说了句气话。士大夫们可以为天子的无端受辱而不顾性命，为己辈的忠而不察而抗言直疏，但却不能为精忠报国的岳飞说上一句公道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哀？

与此同时，和议在紧张地进行着。这一次已与帝国的颜面浑无关系了，因为天子已全盘接受宗弼的条件而表示臣服，再在细枝末节上锱铢必较不仅毫无意义，也不为高宗所同意。十一月二十六日，天子不等金朝一方的誓书签返，就正式告祭天地宗庙，宣布和议的完成。誓书的主要内容是：双方以淮水中流为界，宋方另割京西一路的唐、邓两州以及陕西大半予金，每年纳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金方则归还徽宗梓宫及太后。帝国的誓书最后说："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

誓仪完成后，高宗先后两次对金使表达这样的意思：朕有天下而养不及亲，徽宗已不能及，若太后能回，自当谨守誓约，否则朕不惮用兵。这就是说，天子不耻屈和是为了孝义。那为什么一字不提他的兄长、正在敌人囚窗中度日如年的钦宗皇帝呢？可怜的钦宗，在送高宗生母韦太后返国的时候，痛哭流涕地拉着太后的衣服不放：

"寄语九哥，吾若南归，但为太乙宫主足矣，其他不敢望于九哥。"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八月二十三日，当高宗在临平镇与母亲抱头痛哭的时候，太后一定对他转达了此话，但效果自是不言而喻的了。

帝国的半壁河山就这样形成了，整个疆域只有两浙、两淮、江南东西、湖南湖北、四蜀、福建、广东广西十五路，京西路襄阳一府，陕西路阶、成、和、凤四州，共计府州军监一百八十五，县七百零三。

第四章
雍容与惨淡，安逸与痛苦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
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辛弃疾

天子与秦桧

可叹的是，帝国近似于以胜利之势向敌夷投降。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金军的再一次南进，不仅不能与建炎时期的三次入侵相提并论，就是和两三年前的情况也有绝大的不同。这一次完颜宗弼背盟毁约大举南下，在军事上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尽管在淮西、西南两个战场上双方互有得失，但最大的失利者却无疑是金国一方，因为宗弼的整个进攻计划受到重挫，业已丧失了战略上的优势。凭着金军眼下的情况，绝对不可能再有靖康、建炎年间长驱直入的实力，敌人所谓“问罪江表”、“水陆并进”，只不过是祭起早年的法宝恫疑虚喝罢了。很明显，宗弼正是由于军事上的困顿才想到进一步威胁宋廷，却没有料到歪打正着，一下竟击中了高宗的要害。天子也没有认真想一想，狡诈多端的金军哪一次大兵压境时，像这样“先事以告”过？

比起十多年前的惊恐万状，帝国的整体心态已趋向于稳定，朝野反对和议的呼声高涨，至少证明现时的民心士气可用。以帝国目前的实力，假如上下激励、同仇敌忾，也未必就不能再与金人决一死战。虽不一定能直取河朔，保住淮水一线当不会有太大问题，又何至于主动示弱而未战先降？

即使单从天子的利益考虑，我们的高宗皇帝似乎也没有必要如此屈辱苟和。能够成功地保住宋室的国脉，这已经让许多人为之额手称庆，再加上十多年的惨淡经营，我们的天子已经为自己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就算金人施以辣手，把钦宗从五国城请到汴梁，也未必就能对现在的大宋皇帝构成威胁。当然，宗弼如果把钦宗送回到临安，这倒会使南渡政府产生一点麻烦。不过，和与战的主动权一直都在金廷一方，两国交兵时金人固有理由不放钦宗，但说不定在双方媾和后，金人反而会弄出送返宋室旧帝的伎俩，这都是很难保证的。高宗是个聪明人，他不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既然如此，我们的天子无心恋战、不惜屈服的原因何在？特别是默许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了岳飞，表现出高宗不仅已经对和议已计无反顾，而且从根本上彻底放弃了武备。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对于一个刚刚得到恢复，并且依然处于强敌威胁之下的政权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径。

有一种说法是高宗不能容忍武将势力的坐大。这种见解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如果一味持久抗战下去，除了三大帅将越来越难以控制外，还很有可能产生新的军事势力。因此，天子要收回三大帅的军权，并且纵容秦桧杀掉岳飞。这个解释或许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限制武装固是本朝的国策，高宗因为登基不久就曾遭逢兵变，从而对将领手握重兵心存顾忌也不难理解。但按常理来说，兔死狗烹是和平局面下的事，眼下国家正灾祸未已，岂可因所谓尾大不掉的担心做出这种荒唐之举？中兴以来战事频仍，武将确实也有恃功骄纵的一面，但尚还没有发展到囿于个人得失而不顾国家利益的程度。同时，帝国如果与金军打上持久战，也就是勉强维持淮水以南而已，更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另外，三大帅内调后，都已经明确表示放弃兵权，另一位资格较老的刘光世也在不久之后称病赋闲。天子即使有心，也没有这个必要再动杀机。

一切的一切其实很简单。高宗是一位天子，天子无上的地位决定了所有登上这一宝座的人都不免迥异于常人。因为天子可以做几乎一切事情，所有理论和规范都是在这一前提下制定的，尽管它们在表面上看起来冠冕堂皇。从历史上看，天子过分的随心所欲也许会带来危及本身的祸端，但这仍然不过是一个空洞的经验教训而已，皇帝们有遵守帝王规范的义务，但并没有不得不去遵守的限制。因而他们要做的事情只是因为他们想做，他们只要想做就一定会去做，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即使独夫之辈每每以道义作为标榜，然而从根子上讲只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所有的皇帝并非都是低能儿，如果能使自己从心所欲，又何妨讲一点手法？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不用多举。归结到高宗的身上来，我们的第十位天子的机会是上天所赐的，这个机遇来得太突然而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它让高宗在欢欣鼓舞

的同时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必须绝对珍惜这样一个上天的礼物。早年的经历更加剧了这样一种心理障碍，他已经变得脆弱不堪，几乎所有的风吹草动都会使他草木皆兵，眼见的事实和确凿的逻辑也不能增加他的任何自信。高宗在后来已经不知道怎样分析利害得失了，他就只知道“和”，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形，只要能求得哪怕是一纸空文的和平，他都能感觉到最彻底的满足。对这样一种病入膏肓的人主而言，除非把未来的一切放到他的面前，否则他就永远无法改变已经形成的禀性。所以，以妥协求和为国是，遂成为高宗朝政治的法律性决策。而二十年后金兵再一次南侵时，高宗便宁愿去当太上皇，他已经没有丝毫的勇气再去面对如临深渊般的恐惧。

只要有这样一位天子存在，就一定会有秦桧这样的人。

事实已证明秦桧是一个无耻之徒，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顾一切。因此秦桧孜孜以求的投降动机只能归咎于我们的天子，是皇帝的需要赋予了他动力和源泉。贪生怕死、全无操守的人虽然也有他的处世原则，但绝不可能对任何事都一以贯之、始终坚固。所以即使他确为金人的奸细，一旦身居高位后，也并无绝对的理由再为金人奔走效忠。如果秦桧当初可以为身家性命而卖身投靠，现在也可以为高官厚禄而纳宠新主，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秦桧的成功在于他从里到外都与天子达成了高度的契合。高宗没有什么强烈的癖好，秦桧也没有蛊惑人主的奇巧诡异之术，因此这种亲密无间就绝不是性情之合，而是为了某种功利的认同，这就是从权变通、一切为一己得失考虑的路线，为保存自己而不惜任何代价的强盗逻辑。假如高宗是一位好战的天子，秦桧一定也会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以雪耻兴复为己任的志士。

秦桧当然也自有他的手段来保持这种契合。早年提出的二策没有落到点子上，反倒迫使他采取了更巧妙的策略来抓住天子的动向。本朝不比以往，没有宦官可资利用，也无法攀附后宫作为依托，因此秦桧发展了一位天子御医王继先成为自己的亲信，同样在皇帝身边找到了一位通风报信者。王继先是汴梁人，世代为医，他本人也是由于医道高明而受到了高宗的宠信，成为天子身边唯一能说得上话的近臣。

高宗之所以对一名御医如此宠爱，有一个原因也不能不提。那就是建炎三年（1129年）扬州惊变落下的那场严重的疾患，使天子病于“熏腐”。人道既失，为己身的快乐以及宗脉的延续考虑，都必须尽可能地加以治疗。因此继先得以凭恃恩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上蹿下跳，势焰熏灼。秦桧当然不会放过援引的机会，所以让妻子王氏与继先拜为兄妹，两人联手，对双方都有好处。秦桧其实是很不轻松的，他必须始终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殚精竭虑，于是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他乘轿、骑马或默坐时，经常是嚼齿动腮若有所思，好像是在筹划什么重大的举措。阴险者的嘴脸，往往如是。

高宗皇帝之外，秦桧的妻室王氏对秦桧的一生也起了一种异乎寻常的作用。秦桧本人就说过，若不是王氏给他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是不可能使金酋完颜昌答应让他们夫妻同时随军的。确实，王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直是秦桧的主要智囊和谋主，因而秦桧北去时要王氏同行；出任伪职随军南下，他也要想尽办法把王氏带在身边。最后临机应变仓皇逃走时，犹不惜冒险与王氏同生共死。这似乎不能单纯以秦桧夫妻情深的理由来解释，要知道国破家亡之时，往往变故突发，绝大多数人都不免骨肉分离、妻离子散，要都像秦桧一样面面俱到，根本就无法照顾自己，又何论保全妻孥。所以当秦桧南来后，朝士们都奇怪秦桧竟能与家偕归，由此而怀疑其中有没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

无论秦桧如何逃脱，无论其夫妇感情如何，他离不开王氏是可以肯定的，秦桧在很多方面确实都要靠他这位贤妻为他运筹帷幄。岳飞下狱后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定案，当时就有不少传说，认为是相府闺阁中拍了板才促使宰相最后下了毒手。无风不起浪，假如这些传说并非全都是无稽之谈的话，王氏的不简单就可略见一斑了。

王氏算得上是名门之后，其祖父就是当年被人戏称为“三旨相公”的王珪，在神宗后期及元祐太后掌权初期担任过十五年的宰执。王珪这个人基本上属于折中派，在变法与反变法的夹缝中起过一定的缓冲作用，就客观效果而言，对变法也有一些贡献。王珪有两个儿子，一曰王仲山，一曰王仲嶷，王仲山就是王氏的父亲，大约是在秦桧中进士后不久，以二十万贯的嫁妆，把女儿嫁给了这位南方人。

王家后人继承了王珪赋性不坚的特点之外，尤还增加了懦弱胆怯、贪生怕死的劣质。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金军渡江后分兵追击隆祐太后进入江西，一路攻城掠寨，沿途守军望风披靡。王仲山时知抚州，仲嶷知袁州，也都无一例外地开门投降。名门之后如此恬不知耻，还一度引起朝廷的愤慨。但事过境迁之后，在帝国政府宽容一切、不咎既往的政策下，王氏兄弟犹还不断钻营，力求重新起用，但遭到朝野公论的鄙夷。秦桧当权后，王氏当然会要她的丈夫想尽办法营救，秦桧也确实为岳父奔走援引不遗余力。可以想见的是，既然有心为弃城投降者开脱，则必须要在理论上分清战与和的原则是非，秦桧力持和议，不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原因。

高宗迫切希望的是和谈能够从速达成，因此十分需要了解金人的动向，确切地说，需要知道完颜宗弼到底有没有和的意思。天子既然把主动权拱手让给了对方，他当然还必须清楚对方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条件，其中哪些可以婉拒而不至于影响大局，哪些又绝不可贪图细节而因小失大。秦桧在这方面做得尤为从容，他似乎很能洞悉金人的谈判砝码，因而在具体的措置中，秦桧也能够让高宗彻底放心。在这一点上，与秦家有着几重亲戚关系的人物郑亿年起了不小的作用。

郑亿年的母亲是秦妻王氏的姨母，而王氏的哥哥王？，又娶了亿年的妹妹。下一辈中，秦桧的养子秦熺又娶了亿年的侄女。郑、秦、王三家亲上加亲，注定了他们少不了臭味相投、互为庇护。郑亿年是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金军追击南逃朝廷时在宁波被俘的，刘豫僭立后，出任伪齐高官。秦桧当政后的第一次金宋媾和时，亿年自觉有所依托，遂从北方脱归回到临安，明里上表待罪，暗地里当然向秦桧进行了通报，说不定还曾密疏皇上。果然，秦桧和天子都为他一力开脱，最后不顾朝间大臣的汹汹之议，作为一个特例恢复了他的官职。亿年的凭仗当然不止是一个秦桧，显而易见，他一定还掌握了高宗所不得不对他礼遇有加的东西，所以他才敢回到朝廷。至少，亿年就曾在朝堂之上以全家性命作保，说金人绝不会背盟。他如果不知内幕，何来这样的信心？从某种程度上说，郑亿年或许才是金人有意放归并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物，以利用他的关系向南渡朝廷的天子和宰相传达信息。至于后来的反复，那主要是因为宗弼发动政变掌握了权力的结

果，亿年所负的当然是完颜昌的使命，他也不可能预见到金廷内部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绍兴和议达成后，金人据有关协议要求宋廷放还原在汴梁伪齐任职后又逃归宋廷的有关人员，郑亿年也在名单之中，但高宗就是不放。于此也可看出，亿年具有一种双重奸细的身份已无可置疑。

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体。没有高宗自不会有秦桧，没有王继先、郑亿年乃至万俟卨等人，秦桧还不能完全成为秦桧。而没有王氏，秦桧也不可能发挥出他的全部极致。

后来的事情不难想见。

秦桧在达成和议后的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进位太师，历封秦、魏两国公，稳如泰山地做了十五年的宰相。这十五年中，秦桧所做的不外两端，一是粉饰太平，以此抚慰天子的心神，同时也为自己的丰功伟绩制造证据。此外，援拔党徒，打击异己，进一步巩固他的地位，也是秦桧在十几年中的一贯方针。在天子始终如一的恩宠下，秦桧最后的势力如日中天，无人企及。甚至有时在天子面前，秦桧都敢于抗言争辩，强迫皇上遵从己愿。只有到了晚年，他才感到为众论所嫉的恐怖，于是设置逻卒，布满京城，闻有议之者，当即收捕，深文罗织，必置于死地而后快。

高宗天子与秦桧绝对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秦桧从中得到了尽享威福的实利，而天子也得到了安居宝位的满足。双方求同存异，各取所需，于是十五年来相安无事。高宗在后来并非不讨厌秦桧，甚至对他的专权十分恐惧，但只要一天存在着金人的威胁，高宗就一天少不了秦桧，天子为了根本的利害也只有委曲求全，就像他对待金人的态度一样。只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二十二日，秦桧病死后，高宗才终于长吁了一口气道：

“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

十二月，高宗马上就开始亲决政事，收揽权柄，并罢黜秦桧姻党，清除他的势力。不过，天子并不允许“和”的方针在秦桧去后有所改变，因此他早在秦桧死后的第二天就下诏明示：“秦桧力赞和议，

天下安宁。自中兴以后，百度废而复备，皆辅相之力，诚有功于国。”第二年三月份，朝臣纷纷请废和约，太学生们也在酝酿着伏阙上书，而一些冲动之士甚至在私底下伪撰废和诏书以鼓动民心，高宗为此再次严诏督责道：

“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义耶？”

可见，天子需要的是秦桧的政策而不是秦桧本人。千百年来，恐怕再没有人能像他们两人一样把君臣之分变成如此赤裸裸的利用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和议本身的利弊得失并不是主要问题。秦桧和我们的天子把天下正气销蚀殆尽，才是帝国的真正损失。秦桧在相位，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便立取显美。这使得朝间的风气愈趋浇薄，人怀速化之望，仕于朝者多不肯外迁，随事俯仰，共乐晏然。忠臣义士贬逐略尽，而执政者皆乃沽名钓誉、柔佞奸巧之辈。轻儇之徒，竞于告讦，虽朋旧骨肉，亦相倾陷。如此薄恶之风，不能不给本朝百多年苦心培养的道德礼义造成了无法言喻的损害。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国家的命运亦复如此。

成功的防守和失败的进攻

北方的金国也并不平静。

金廷的世系与宋室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两位开国皇帝太祖阿骨打和太宗完颜晟也是同胞兄弟，皆为劾里钵之子。金太宗驾崩后完颜亶即位，史称“金熙宗”，他是太祖阿骨打的孙子。金熙宗以第三代继承人的身份登基时只有十六岁，因此整个在位期间，老一辈的宗室元勋始终没有停止过争权夺利的斗争。完颜宗弼、宗幹两人也是兄弟，都是太祖的儿子，他们联手诛灭了完颜昌、宗磐、宗隽集团后，基本主宰了金廷的政局。其中宗弼进为太保，领行台尚书省、都元帅，算得

上是金廷负责南方事务的首脑；宗幹则进位太师，封梁宋国王，是朝中最显赫的人物。不幸的是，与宋签订和议的那一年也就是金皇统元年（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宗幹从熙宗出幸，在回京途中病故。宗幹的次子叫作迪古乃，汉名为“完颜亮”，这个人在不久后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

完颜亮这个人保存了女直人残暴而野蛮的一面，为人僄急猜忌、残忍任数，自以为与熙宗同为太祖之孙，对皇位常怀觊望之心。皇统八年（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十月，集军事民政大权于一身的宗弼去世，完颜亮终于有了机会。

年轻的皇帝熙宗无力平息朝中贵族大臣之间的纷争，因而金廷内部的派系一直处于相互对峙的局面，表面风平浪静，其下却暗伏潜流。宗弼死后熙宗亲问政事，但也没有办法控制事态的恶化，由于处事不当，更引起了朝中部分贵族的不满。到了皇统九年（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十一月，熙宗杀掉了与完颜亮等大臣勾结的皇后裴满氏后，事态已一触即发。

十二月初，完颜亮已经与左丞相秉德、驸马唐括辩及大理卿乌带等达成共识，又开始在宫廷内外秘密联络。他首先争取了熙宗几名重要护卫的支持，然后重点开始策反熙宗的近侍局直长大兴国。熙宗最信任的近侍就是大兴国，未尝一刻轻离左右，只有在就寝后才放他归去。大兴国掌握了皇帝寝宫的钥匙，同时又能自由出入，要想发动宫廷政变，他这一关非过不可。

完颜亮先找了一位与大兴国有旧的人探知了一下底细，知道大兴国正因无端受到熙宗的责备而心怀怨望。遂在一天夜里将他邀致府第，终于把他说服。两人约定，事不宜迟，就在十二月初九举事。

初九这天夜里二鼓时分，大兴国窃取符钥打开宫门，矫诏熙宗有旨召唐括辩。唐括辩早已候在宫门附近，见机立即趋入。守门者因唐括辩是当朝驸马，不敢怀疑，便将他放入，于是完颜亮等人暗藏利刃也随之入内。走到殿门，守宫卫士方觉有异，刚要动手，被唐括辩手起刀落一下砍倒几个。惊惧之下，其余卫兵竟无一敢动。熙宗在寝殿中听到动静，察觉情形不妙，急往榻上取刀，岂料往日从不离身的佩

刀早已被大兴国藏到了床下。几位反叛护卫首先持刃进弑，完颜亮继之，熙宗血溅当场，时年三十一岁。

完颜亮即位后本性便开始彻底暴露。最典型的表现是任意妄为，需索无度，依附群小，滥杀无辜。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完颜亮采取了极端手段，所谓“刑杀不问有罪”。未过多久，对政变有功的秉德、唐括辩皆被诛杀，太宗子孙、宗幹子孙等宗室子弟亦遭诛夷，一些军事将领如左副元帅撒离喝等人被满门抄斩。完颜亮为满足一己之好，甚至抛弃了基本的伦理纲常，以至于淫嬖不问骨肉，妇姑姊妹尽入妃嫔之列，为夺人妻则使之杀其丈夫。完颜亮的行径是开化未久的游牧民族残存劣根性的典型反映，因此在他身上，既有残酷而缺乏人性的一面，同时也有豁达任性、不以礼法为意的天真之趣。比如他有时出巡，见到民车陷入泥淖，辄令卫士为之牵挽，必俟其出而后行；他身边常备有黄金钱币，如有需要者，即令自取。最有意思的是，身为一朝之主，他甚至允许臣子直呼其名。完颜亮以强制和压迫性的手段统治他的国家，虽然在客观上能够加强集权政治的威力，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金国内部各种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了自己的败亡。

从某种程度上说，金帝完颜亮既然代表着女直民族野蛮性的一面，他便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好战掠夺本性，并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完颜亮念念不忘讨伐宋朝，早在即位的翌年就曾公开表示迟早要将江南之地收为己有。即位后的第五年，完颜亮把首都由上京迁至燕京，并改名为中都，仿造宋制，大事营建。当然，模仿宋朝制度仍然只不过是他用来满足猎奇性格的一场游戏罢了，他从来也没有真正的从理念上接受汉家文明的熏陶。在完颜亮的眼里，只有那未知的广阔江南才是他真正急需的东西，他把帝都从遥远的北方迁到燕京，目的也就是为此。到了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连一向麻木的宋廷上下，都有不少人感觉到完颜亮叛盟南下只是迟早的事情，但未被高宗和属于秦桧余党的朝廷宰执们接受。第二年，完颜亮决计南下，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二月，开始小规模挑衅，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正月，开始进行军事准备，打造战船、运贮军械、调兵遣将。金廷计划了近五年，可宋廷方面却始终一无防备，就是到了中外籍籍、路人皆知的当口，高宗犹还不愿相信：

“朕待彼甚厚，金人拿什么借口出兵？”

权礼部侍郎孙道夫哭笑不得：“敌夷出兵，岂需借口！”

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八月，金军重兵已屯驻淮水宿、泗一带。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六月，完颜亮移驻汴梁。七月，大肆屠杀宋、辽宗室一百三十余人，八月，又弑杀反对南侵的太后徒单氏，南进之意已无可动摇。九月，完颜亮戎服亲征，以六十万的兵力分三路大举入寇：西路自凤翔攻大散关，以取宋朝侧翼四川；中路由蔡州攻荆、襄，从正面压迫；其本人亲率东路主力从淮西进攻江南东路。另外，完颜亮还派遣了一支水军由山东取道海上直袭临安。金军此次入侵在战略上虽是老调重弹，但规模却明显地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

然而不同以往的是，金人这一次虽然来势汹汹，但早已失去了当年鞭梢所指、所向披靡的效果。金军的战斗力不是一成不变的，早在绍兴九、十年间，就已有明显的征兆表明他们并非不可战胜。此次金军数量虽众，但大部分是各族士兵拼凑而成，成分既复杂，相互之间的差异也大，加上兵员众多势必造成后勤保障的困难，确实很难做到速战速决。首先南进的西路军一开始就遭到宋四川守将吴璘的阻击，退守凤翔；接着中路军也被击退，被迫改向东进。十月二十七日，曾在岳飞制下的李宝率战舰一百二十艘挂帆北上深入敌境，将正在密州陈家岛停舟待风的金军水师一举歼灭。

决定性的采石大捷虽然看起来是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特别是中书舍人虞允文的临机果断，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实际上这场胜利也有其必然性的一面。客观上的因素一是完颜亮不顾朝野一片反对之声竭举国之力兴兵南下，已促使金廷发生内变，十月初八，曹国公乌禄在辽阳被立为新帝。消息传到前线，金军亡归逋逃者更是不可胜数，这也使得完颜亮部队的士气十分低落；二是塞外契丹诸族也开始叛乱，声势已趋浩大，加上河北汉民的起事，不得不使完颜亮分兵以征，导致南侵军力的分散。另外，金军的水战经验要明显逊于宋军，宋军在水面上的装备也大大超过对手，金军以小而缓的战船对付宋军大而速的战船，以长江的宽阔汹涌，绝对不是对手。完颜亮过分高估

了自己，他认为当年宗弼能以小舟在海上追击宋帝高宗，此次必然也能成功渡江。事实也证明，宋廷淮西守将王权所统领下的士兵并非不能打仗，而只不过是胆怯的主帅临阵逃脱瓦解了军心，才使金军渡过淮水直逼长江。若无民心士气可用，虞允文纵有回天之力，也无法力挽狂澜。十一月八日，虞允文到采石犒军时，王权已被罢免，而新帅尚未到任，一路溃散下来的宋军士兵只剩下一万八千余人，散坐路边，不复成伍，情况已是千钧一发。允文毅然负起指挥重任，以其出色的组织能力将采石一带的军民调动起来，结果保住了长江防线。

当然，采石之捷的具体战果绝非像宋廷渲染的那么辉煌，完颜亮临江时已无心久战，所以只派了先头部队渡江。为采石宋军击败后，完颜亮大队人马立刻就趋回扬州，并没有再次尝试强渡。尽管如此，虞允文将金帝亲征之师打得落荒而逃仍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宋军以一儒生率区区乌合之众就能将完颜亮的精锐主力一举击溃，虽不能证明宋室的军事实力是如何的强大，但至少说明金人五十年来的南侵确已成了强弩之末。

采石大捷的意义极其深远。

十一月底，众叛亲离的完颜亮被部将杀死，残部退军三十里后遣人持檄至宋镇江军议和。不久，荆、襄及两淮各地金军亦皆拔寨北还。乌禄即位后更名为“雍”，史称“金世宗”，世宗得知完颜亮死讯后，进驻燕京正式掌权。此时，中原一带民众纷纷起义，山东人耿京起兵收复东平，成为其中声势较大的一支。金廷为安顿局面，一方面在两淮及西南收敛兵力以图再战，一方面也不得不遣使请和以作喘息。尽管金军仍在各地与宋军往复交战，但完颜亮发动的南侵毕竟还是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

更大的影响还是在我们的帝国方面。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十二月完颜亮死后，高宗尚还有意乘胜恢复汴京，并亲临至镇江府。但当金国新帝即位后兵势复振，高宗的意向马上就开始改变，坚决要返回临安。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正月，宰执奏金使将于二月份渡淮南来议和时，天子的和意已经十分坚决。照理而言，徽、钦二帝已经驾返道山，重兵大将也所剩无几，用兵取胜破虏复仇，丝

毫没有背其所利而中其所忌的成分。然而帝国的天子所担心的早就不是得失利弊，高宗的怕事已融入骨髓，他既没有心思去作任何的判断，甚至连面对明白无误的胜势的勇气都没有。早在十二月份朝廷下令在西北战场上首先撤军就是天子的主意，结果使秦凤、熙河、永兴三路所光复的十三个州又为金人所占，吴璘部仓促退还，在金军的掩击下损失惨重。全军将士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连营痛哭，声震原野。在高宗心里，败固然非所情愿，胜也并不能保证一切，他只相信眼下的无事才是最最要紧的，因此他对臣下说：

“朕料定最后还是一个和字。”

和是不错，战争发展到最后也就是妥协。但怎样去和？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四月，金使高忠建来到临安，经过一番激烈争执，抗战派中坚左相陈康伯驳斥了金国仍要宋廷行臣子之礼的谬论，以洪迈报聘，国书采用敌国之礼。这种方式的休战似乎才是我们的帝国所能接受的，外交上的胜利当然是战场上胜利的产物，根本没有必要惧怕谦让。然而，高宗还是密付了洪迈一道手札：

“若彼诚能以河南地归还，必欲居尊如故，朕复屈己，亦何所惜。”

这又是退回到老路上去了。天子在大好局面下仍不惜屈己退避的做法，显然已无法被十几年来第一次扬眉吐气的主战人士所接受。洪迈到了金国，金世宗见到国书用词不逊，先令洪迈更改，洪迈不从；后又命他朝见时行旧礼，洪迈也坚执不可，结果被金人反锁在使馆中，水浆不通达三日之久。本来，洪迈完全可以按照高宗的手诏行事，屈膝称臣以讨得金人欢心，然而他就是没有屈服，表现出难能可贵的高风亮节。与洪迈在敌营的大义凛然相呼应的是，朝中要求乘胜恢复的呼声也极为高涨。代表人物一是当朝首相陈康伯，一是完颜亮南侵时方被重新启用的张浚。

康伯字长卿，宣和进士，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除参知政事，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迁左相。完颜亮南侵时，举朝震骇，不少朝士都遣家属南下以避寇，独有陈康伯具舟迎家眷入浙，对安定人心起了很大作用。敌虏逼江，康伯坚决反对幸闽之议，迫使高宗留在

了临安。虞允文出任参谋军事前往采石，也出自康伯的倡议，结果取得了采石大捷。张浚虽然一直被高宗闲置，但在朝中主战派中却享有甚高的威望，此番出判建康府后，处事布军，风采依然，赢得了朝野的广泛尊敬。此时的另一位元老级大将刘锜刚刚去世，张浚遂成了抗战一派的希望所在。陈、张二人得到普遍的拥护，反映出时下的主战潮流确实无可抵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高宗皇帝要想再蹈故辙，实在也是非常困难了。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采取了退位禅让的做法来作最后的逃避，其中的原委倒也颇令人困惑。高宗从建康回到临安是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二月十八日，五月二十八日便下诏立皇子赵玮为皇太子，明显表露出禅让的意思，到六月初九正式下诏内禅，前后只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洪迈出使金廷是在四、五月份，如果从那时算起，高宗实际上是在一个月内就作出了选择。前唐玄宗、本朝徽宗之内禅，都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我们的天子目前正处于一个国威复振的大好时机，年龄也只不过五十六岁，又何至于如此心灰意冷而想到归于淡泊、颐养天年？严格说起来，古今都没有这样的先例。

实际上，高宗要是一意孤行，再次委曲求和，尽管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但也并非不能做到。当年的和议所遭受到的反对浪潮，也并不比今天逊色，天子彼时能不惜任信奸佞、滥杀大将，此次当然也可以如法效仿，从这一点上讲，他似乎没有理由做此无谓之举。有一种说法是陈康伯对皇上施加了压力，但这显然不符合情理。康伯是个正直之士，他不可能做出这种有悖于臣下之道的事情。眼下的情形也不同于靖康之时，高宗的声望虽然由于不惮屈己而有相当程度的下降，可与当年的徽宗仍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康伯即使有心逼宫，也不会为天子所答应。

最后的解释仍要归结到高宗的懦弱本性上来。所有的天子都没有丝毫的逻辑性可言，高宗也不例外。他内心的害怕恐惧情结已经根深蒂固，任何外力都无法左右，这使他完全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和思考能力。败时可以和，但胜时如何呢？我们的天子显然也是黔驴技穷，所以内禅完全是出自于他的本意，他也只有这条路可走。高宗的禅让诏出自洪迈的哥哥洪遵的手笔，但有一句话也真实反映出天子的心态，

即所谓“思欲释去重负以介寿臧”。他已经安居帝位三十有六年，与其忧勤万机，宵旰靡怠，倒也无宁雍容释负，退养康宁。六月十一日内禅典礼结束后，已成为太上皇的高宗随即驾往德寿宫，从此平安地度过了二十六年，以八十一岁的高龄走完了他并不轻松的人生旅程。

高宗唯一的儿子早夭，因为扬州兵败时染上痼疾，从此再无生育。即位的皇子赵玮是秀王赵子偁的儿子，算起来是太祖的七世孙，受册太子时更名为昚，后来的庙号为“孝宗”。翌年，孝宗改元“隆兴”。孝宗是个主战派，即位伊始，就重用了张浚，同时追复岳飞父子官爵，正式予以平反。朝野气象，为之焕然一新。

高宗内禅只是采石之捷深远影响的一个方面而已，这场抗战胜利对帝国产生的最大后果是孝宗主持下的朝廷发动了一次北伐。很显然，这次乐观情绪下的主动出击同完颜亮的南侵一样，都是不合时宜之举。南渡朝廷是否具备足够的实力彻底降服金敌并不是主要问题，重要的是朝野上下究竟有没有形成高度统一的思想意识。不幸的是，帝国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许多事情表明帝国内部的主和倾向已经蠢蠢欲动，只不过暂时蓄而未发罢了。孝宗以新君的锐气一贯其勇固然值得嘉许，然而恢复大业并不是单靠一腔热情就能实现的。而金国虽然内乱频仍，但底气尚在，金世宗能够迅速抚定局面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以帝国久弛的武备遽而北上劳师远征，能够速战速决尚还有取胜的希望，如果一旦受挫，立即就会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年轻的嗣君是否有这个思想准备？

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初张浚出任北伐统帅，四月，李显忠、邵宏渊取得宿州大捷，成为近十年最为辉煌的光复胜利。然而时隔不久，由于李、邵不和，未能协同作战，导致宋军在符离的大败。此次失利在军事上并不算什么严重的挫折，然而它在政治上的意义却非同小可，这使朝廷妥协的潮流又开始抬头，并进而影响到即位不久的天子。果然，一贯主张议和的汤思退又重新入为宰相，在他的一力干扰下，先是张浚被迫去职，接着主战派遭到清洗，最后两淮宋军在金军的袭击下全线溃败。宋师尚还未渡过淮河，就宣告了北伐的破产。

想望中兴的孝宗仍旧未能避免高宗的命运，最终还是不得已与金

人求和。尽管这一次的和约看起来比绍兴和议有了大大的进步，比如双方不再称君臣而改称叔侄，“岁贡”改称“岁币”，数量上也减少了十万等，但宋廷一方仍然割去了六个州。帝国的形势原本已一派大好，即使不能渡淮北上，至少也不必再度割地。假如孝宗意志坚决，准备充分，应该是能够避免这样一个结局的。

但我们只能承认这个无奈的现实，这是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十二月的事情。第二年，孝宗改元“乾道”，时为公元1165年，距高宗南渡已近三十五年。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临安：销了剑锋，雌了男儿

这是雍容富足的时代，这是惨淡萧条的时代；这是安逸平和的时代，这是痛苦无奈的时代；这是湖山歌舞、尽事逍遥的时代，这是志士堪悲、拔剑而起的时代；这是水云浩荡迷南北的时代，这是断肠落日千山暮的时代。

自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高宗自绍兴府移驻临安后，因为敌情的变化，天子行营或因巡幸或因亲征，也曾有过短暂的迁移。当年冬天，宗弼军南下，天子出幸平江；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高宗再次亲征，行在随之北上。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春天，张浚力主北伐，遂鼓动天子移驾建康；赵鼎复相后的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二月，又奉皇帝复还临安。自此以后，始无变动。

临安府所在地杭州本名钱塘，隋始置州，大业初又改名余杭郡，唐复置杭州，五代时吴越王钱俶即定都于此。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高宗升其为临安府，属浙江西路。

虽然临安已成为南渡帝国实际上的京师，但在名义上还不算是永久的首都，故仍曰“行在”，朝廷亦称“行阙”，这当然都是不忘故都之意。不过，名号的不正丝毫未能影响它在南渡以后的飞速发展。绍兴

初年，临安数遭兵火，户口仅存十之二三，大半还是北方流寓的客户。和议以后，人口激增，到了绍兴末年，户数已臻至二十五万左右，人口近五十五万，使临安一跃而成为一个庞大的都市。整座城池周遭约七十余里，分内外两城：外城一名罗城，在沿袭吴越城垣旧制的基础上有所扩建，形成南跨吴山、左江右湖的极为可观的规模；内城即大内宫城，位于凤凰山下，本乃州治所在，过江伊始因陋就简改作行宫时，不过只添造了二三百间房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至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间先后建成慈宁等八殿后，宫殿始具规模，但仍只不过是汴京的四分之一。孝宗即位后，大内建制方日趋完备，新建宫殿大都朱钉金户，画栋雕梁，覆以铜瓦，又镌以龙凤飞骧之状，巍峨壮丽，光耀溢目。而规划中的许多亭台楼阁都在陆续营造之中，照其建制预计，假以时日，行宫将来的规模超过旧都汴梁当是毫无疑问的。

临安吸纳诸方精华，渐渐而成繁盛之都。方圆数十里的范围中，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径行不绝。尤其突出的是，临安已彻底消除了历来天子都会严格划定的坊、市界限，店铺甚至临街而设，通衢坊巷，连门俱是。自然的，夜市亦应运而兴，交易之盛，一如白昼。各种官办及私营作坊，遍布杭城内外；勾栏瓦舍，不计其数。

临安更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如果说东京汴梁是蕴藉深沉的，行在临安则是秀丽妩媚的。多雨而温暖的南方所具有的那种绚烂的色彩、和熙的氛围，临安无不俱备。春之燕语莺歌，夏之荷钱榴火，秋之金风玉露，冬之梅红雪白，四时之美，齐集于斯。更妙的是，临安城中尚抱有一如珠之水，号曰“西湖”，一城胜景，全在此一勺碧玉中，本朝苏轼曾有诗写其妙处道：“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便是其万种风情的绝好写照。南渡后，湖山之间，堤桥成市，歌舞丛之，走马游船，达旦不息。

温柔的临安像一位绝代佳人，她以温暖的怀抱，化解着无数伤心人的痛苦。销了剑锋，雌了男儿。

经历过苦难的人，才能真正知道欢乐的可贵。太上皇高宗就是其

中的一个，这位高寿的太上皇晚年喜静好佛，在优游闲淡的岁月中打发着余生。早先的痛苦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褪去，剩下的只是吟风弄月的潇洒和恬适。上皇尤爱西湖，常常泛舟湖上乐而忘倦。平日居于北内，亦甚属意器玩之物，嗣皇帝孝宗秉意承欢，时时网罗人间奇珍以供怡颜，遇得佳物，不复问价。每逢上皇生日，进奉尤甚，孝宗为承上意，曾一次进钱四十万缗之数。宫廷靡奢之习影响甚大，贵近之家、北来豪客，仿效之风不绝，进而也传染到民间。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聊足安慰的是，新一代皇帝孝宗显然不同于他的前任，并没有经历过惨痛的教训，因此尚还不失锐意进取的精神。早在藩邸时，孝宗对恢复大业就十分向往，导致在即位不久就有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伐。然而符离失利使新帝的一腔热情陡然浇灭，从此不敢轻言出师。不过，孝宗并没有忘怀恢复大志，内心深处也时时都在考虑如何去达到这个目标。问题是时势又有所变化，敌国的金世宗果断息兵专治内政，同时不忘广蓄严备，使我们的帝国根本无隙可乘。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十一月十三日，天子又一次对辅弼大臣们谈到了恢复故疆的事情，同知枢密院事刘珙的意见反映出一种比较典型的看法。刘珙道："复仇雪耻，诚乃当今之要务。但臣以为，若非积十年之功内修政事，恐怕未可轻动。"

刘珙早年曾因忤秦桧被逐，论事峻切，一向主张收复旧地。这样的人说话都如此保守，看来其中不乏原因。当廷臣中有人提出疑问道：汉之高祖、光武二帝，起于匹夫而有天下，不过数年工夫。帝国恢复之业，如何竟要十年？刘珙说出他的道理：

"正是因汉之高、光起于匹夫，所以他们无所顾忌。陛下躬受宗社之寄，其轻重程度，岂彼两君所能比！"这就是说到点子上了。

帝国所经历的遭遇是前所未有的，在敌人几度兵临城下的危机面前竟能一次次逢凶化吉，更难免让人们心惊肉跳不已。尽管国家用丧失绝大利益的代价换取了暂时的和平，但隐藏的祸患并未根除，久积的弱势也尚未改善，若置宗庙社稷之安危存亡于不顾而一味好战，确实也不见得有效果。相反，如果处置不当，还会带来危及帝国根基的

灾难，这都是有前车之鉴可以记取的。当然，在有志之士的心中，恢复仍是第一急务，但关键是如何去做到这一点。无疑，刘珙是相信德政和文治的力量的，所以他提出要皇上取法古代的贤王周宣王，“侧身修行以格天心，任贤使能以修政事”。公平地说，刘珙此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符合帝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的，它代表着一种务实的政策，与高宗天子在敌我刀剑相向时尚还固执地坚持委曲退避的投降哲学仍有根本的不同。

刘珙的意见绝非偶然。整个帝国的心态仍旧不很正常，怕事怯战的懦弱心理很难一日消弭。四个月前，朝廷修治前线重镇扬州的城隍，谏议大夫陈良祐就表示反对，他认为备战绝不能招致敌人之疑，而修扬州城又徒劳无益。这个意见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

孝宗不解：“备战如何无益？”

良祐道：“万一敌人突破时我不能守，则此岂非为敌人所筑？今遣二三万人过江治城备战，敌人一旦探知，便有挑衅借口。”

不想到胜而首先考虑到败，这就是目前帝国大臣的通病。他们的畏敌情绪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成分，但最终的结果是对国家的利益造成了损害。

天子又问：“若临淮不可，在内地如何？”

就是这样良祐也主张缓行缓施，总之不能被敌夷所乘。所以他说：“今日为备之要，莫过于选择将帅，收蓄钱粮，爱民养士。”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意见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就是倾向于锐进的人士，在考虑问题时也变得谨慎小心，试图规划出一条切实可行而又稳妥可靠的路线。他们也清楚，天子目前的心态正处在矛盾之中，过于激烈的方案，必然会被拒绝。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五月，一位从北方南来的义士辛弃疾入对，提出明确的抗战主张而未被孝宗接纳，就证明了这一点。辛弃疾献策后不久，张浚的儿子张栻也上疏皇上请求朝廷下哀痛之诏，明示复仇之义。但他同时也承认：当今之势，“我亦未有必胜之形”，为此必须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练兵，把“内修外攘、进战退守”统一起来。张栻在后来又不

断向皇上阐述这种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观点虽是刘珙、陈良祐两派理论的综合，但确是大大前进了一步。这年十二月，代表着激进思潮的太学生中有一位叫袁枢的上书天子，也认为今日图思恢复，应当审察至计以图万全之举。显然，在这一点上君臣的意见已经大致相同。

事实上，孝宗垂拱天下的近二十年里，在主观出发点上一直都把人才、财用以及治理得道等内政放在了中心地位。特别是理财方面，朝廷虽然并没有采取大规模的改革举动，但始终予以高度的重视，尽量在加强国家储备上多做一点文章。与金国的和议在客观上为理财创造了条件，而南方优厚的物质基础又使它成为可能，因此帝国开始幸运地走向一条繁荣的道路。人口的增加最能反映出经济的改善，乾道二年（1166年）整个南方帝国的人口数已达到二千五百多万，尽管其中有不少南迁的北方人口，但这个数字还是相当惊人的。临安的风物鼎盛和君臣士民的奢华之风，都是国家财政开始好转的必然产物。

当然，帝国的国力尚远远达不到充裕有余而能应付强大军力的程度，这一点朝野上下都十分清楚。主要的原因是国家的负担依然很重，为了收拢士心而继续采取的优厚政策，使冗官闲士的数量有增无减。既无事职，犹还挂名食俸的现象甚至还要超过南渡以前。国家既重视文治，又必须在经济上予以扶持，所以文化教育事业空前兴盛必然也伴随着物力的消耗。民生条件虽然有一定的改善，但地区之间、贫富之间也存在着相当不平衡的情况。除此之外，财政金融等经济领域里的各项措施，也频繁发生差舛错失，政府有时应付偶发的天灾人祸尚还捉襟见肘，更不用说大规模的用兵征讨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加强中央政府对经济事务如盐、茶、酒专卖的绝对控制外，只有沿袭高宗的做法继续重税重赋。尽管朝廷上下对此反应强烈，要求拿出切实的惠民政策，然而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多大的改善。帝国的物质状况固然是处于上升之中，但正如刘珙所指出的，生聚教训需要时间。

在采石大捷中立下殊功的虞允文在孝宗初政期间做了一段时间的宰相，在整军肃武、增加军备方面做了不少实事。孝宗对这位有胆识的大臣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为此专门派他到蜀中任职，想让他在富庶

的四川地区率先出兵。但允文使蜀近一载，始终没向朝廷报告进兵的规划，于是天子在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左右又一次密诏催促。

允文的回答是军需未备，不能出击。

孝宗十分不满，又派人持御札敕谕允文尽早行动。但传令者到时，允文已不幸病殁，使天子的愿望又一次破灭。这是孝宗的第三个年号“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的事，从此出师之议便再没有被提起过。

无情的时势使孝宗的政治策略最终还是趋向于折中。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二月十五日，孝宗对宰相虞允文等人谈及他的为政之道，曾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孝宗道：

“近世废弛之弊，宜且纠之以猛，它日风俗变易，却用宽政。”

天子打了一个比方说：“这就好比立一华表，倾则扶之，过则正之，使之适中而后已。”

最初，天子的本意是想力纠时弊，就是更张以往一味退守不思进攻的废弛之政。所以他坚持认为：天地间若无肃杀，就无所谓发生。言下之意，为政之道并不忌讳暂时的用强。为此他发挥出一套“适中”理论，拿来为他的“猛纠”政策服务，其用意不可谓不深。不过，宰执大臣们却不同意皇上的观点，比如虞允文虽然承认救宽之道在于猛，但他也说，虽然“杀之”是为“生之”，但天地之心终归于仁，政治仍须以重德厚生为准则。在这当口，聪明的宰相虞允文固然以阴柔之功巧妙地化去了天子的一腔壮志，但最终让孝宗走向自己反面的东西却是时间，这个造物主最伟大的魔具。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十月，天子终于无奈地承认：本朝家法虽远过于汉唐，但唯独用兵取胜一道，实不及之。孝宗此时已开始更正他的想法，他对宰相龚茂良道：

“治体不可有所偏。比如四时，春生秋杀而能成一岁，若一于肃杀，则物有受其害者。”

孝宗把他自己“无杀则无生”的理论整个颠倒了过来。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的天子的心情一定是十分复杂的。

早在几年以前，帝国便已经明显呈现出无为而治的状态。值得赞许的是，政治妥协在客观上总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孝宗以他的平和、宽厚的作风在某种程度上又加强了这种效果，从而使整个当政期间的朝廷政治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平静的局面，这当然是应该肯定的。当今天子的政治作风无疑也有着性格上的因素，孝宗的为人可以说是当得起“淳厚英毅”四个字，所以他也能和太上皇始终保持着亲密的父子关系。我们这位帝国的第十一位天子以外藩身份入继大统，而能做到克尽宫廷之孝，自古而来确实无有及之者。他后来的庙号为“孝宗”，就这一点来说实在也是当之无愧。

然而帝国的心腹大患仍然近在眼前，如果安于现状积重难返，后果便不堪想象。天子最后返归到保守的老路上，饱受国禄的宰执大臣们要负主要责任。乾道时期的虞允文等尚还有些作为，但大多数人都是无所建树。本朝优待士人，而士大夫亦能不懈砥砺，所以也还能算得上人才辈出。然而党派斗争剧烈，政治迫害严酷，再加上蔡京、秦桧之流的钳网之风，使人才摧抑亦极。此际终于看出了恶果。而士气一旦摧损，流弊必及于百年之后。士大夫们虽心怀贞志，但在行动上却不求尽忠，但思无过，各有安身立命之术，以使进不贻君子之讥、退不逢小人之怒。正如后人王夫之在《宋论》中所云：举世习与相安，为获一吉人之誉而随事俯仰，始以容容，终以靡靡。孝宗一朝，书生意气也始终充斥朝堂，言战者指斥言和者忘记不共戴天之仇，言和者又嘲讽言战者好大喜功、无所顾忌，双方互执一辞，议论不已而全无实效。最后在天子的妥协方针下，大家彼此消化，又都成了折中路线的实践者。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幸运的是，天下事往往得失参半。不知不觉间，帝国迁来临安已近四十年了，造物主的自然法则使南渡帝国的第二代人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这一代人大都出生在南渡以后，在相对平和的环境中长大，虽没有亲身经历过靖康之难的血泪洗礼，但他们自束发受教之日起，面临的就是半壁河山的惨痛现实。在父老耆旧的教诲下，他们同样为帝国的奇耻大辱而愤懑难平；即使在耽于安逸无所更张的无奈现实中，犹能不忘砥砺慷慨激昂之志。更重要的是，这一辈人已不同于他

们的父辈，他们对国家的命运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正是这年轻的新一代，肩负着帝国未来的重任。

南渡帝国的新一代

孝宗登基不久的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十月二十四日，张浚符离失利五个月后，新天子在垂拱殿召见了一位有禄无事的赋闲官员朱熹。一个多月后，一名客居临安的布衣之士陈亮也向天子上书。其时北伐方遭顿挫，天子下诏求言，各种人士纷纷怀牒于朝上书言事，朝野气氛正处于激动紧张的状态。与军事失败后的尴尬情形相比，召对上书一类事情本身并不能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朱熹和陈亮这两个名字，还是给了人们以强烈的印象。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其家世居南方。父亲朱松进士出身，宣和末年授建州政和县尉，大部分时间在福建一带任地方官。南渡后，一度入朝，因言论与秦桧不合而被贬出。朱熹于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生于福建南剑州龙溪，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时进士及第。陈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比朱熹小十三岁。其父名次伊，身名不显，大约只不过是一地乡绅。

朱熹与陈亮两人虽然在年龄上有一定的差距，但经历仍有一些相似之处，最主要的是同属于南渡以后的南方新生之辈，且都在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聪睿的才智。朱熹幼年就被其父课以《孝经》，自题其眉曰："不若是，非人也。"从小就对古代礼训产生倾慕之心，十八岁时贡于乡，一举登第。陈亮虽终生未仕（五十二岁时曾被朝廷授以官职，未到任而卒），但一样是才气超迈，卓尔不凡，年轻时就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酌古论》，得到了所居郡守周葵的赏识，目为他日国士。

但从早年的经历上看，两人也存在着绝大的不同。朱熹是个沉潜思深之士，对传统有着一种天然的向往，五六岁就知道向天发问，十五六岁时便能读经传而为之警砺奋发，自小就对形而上的问题发生了

浓厚的兴趣。自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后，朱熹遵从遗嘱，跟从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位老师继续学习。这三人都是朱熹的父执之辈，也都是德养深厚的名士，特别是在程颢、程颐所倡之学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对朱熹最后归入二程的洛学起了很大的影响。二十四岁时，朱熹执弟子礼第一次拜见了父亲的同门学友、在当时极为著名的儒学大师延平先生李侗，从此奠定了他一生思想学术的旨归。朱熹当过一任崇安县主簿，此后一直挂衔赋闲，其间不断向李侗请教，同时孜孜于儒学，特别是对二程之学进行了深入钻研，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人生信仰和哲学观念。早在一年前他就曾向孝宗上书，建议皇上首以明理，次以养气，复以任贤修政经纬其中，以此三纲治天下之事。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时的朱熹三十四岁，已全然是一位饱受圣训且心有所得的儒学之士，在天子的征召下，怀抱着强烈的思想原则和政治理想来到临安，向孝宗上了三道札子。

朱熹在第一札中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务须以儒学圣典《大学》之道为本；在第二札里明确表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主张战以复仇、守以制胜，合战守之事为一；第三札则向皇上推崇“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之道，要天子以正心诚意为主，修德业、开言路、正纪纲。可以看出，朱熹早年的思想尚不失积极进取的精神。遗憾的是，当时孝宗正为军事的失败与和战的选择而大伤脑筋，对朱熹高深的理论并不十分感兴趣。读第一札时，天子尚能温颜酬酢，至第二、三札时，孝宗便沉默不语。失望的朱熹从此辞职归里，专心于探究学问、著书立说，近十年间一直力辞征辟。

陈亮与其不同，他生来目有光芒，迥乎常人，十来岁时就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年轻的陈亮善于机辩，议论风生，同侪不能及。尤能著文，下笔千言立就，具有一种逼人的英气和豪放的性格。他虽然没有师承，但天道酬勤，刻苦的学习使他在世事学问上独具慧眼。一贯器重他的父母官周葵在陈亮来到临安之后入居宰执，在朝士间为他大事揄扬，凡有官员前来办事，周葵必命其访见陈亮，于是一时俊杰，多与结交，陈亮也因此声名鹊起。绍兴末朝廷与金人缔约，天下人多为之忻然庆幸，独有陈亮力持不可。他的禀性是激扬踔励不甘默守，因而断然向天子上书极言抗金。与朱熹的

遭遇相同，书入不报，没能得到任何的回应。统治者的下诏求言自古以来都是一种安慰士心的姿态而已，它的意义在于求言本身，而不在于照方行事，所有慷慨上书的忠臣义士除了能达到宣泄的目的外，其实别无所得。

此后的十年间，除了在乾道四年（1168年）以乡贡解元赴临安省试未第，并于次年再度向天子上了一道《中兴五论》外，陈亮一直在故里砺志读书、著述传学，四方学者慕名访问者不绝。所不同的是，陈亮家贫日甚，为生计不得不托于讲授，但乡闾却不信其说，对他的激进言论更有所不满，这使得他的处境十分不妙。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陈亮家童杀人于境，恰巧被杀者又曾与陈亮的父亲有隙，因此其家人向官府状告，陈亮父子遂被执于州狱。朝廷台官认为情节严重，又把父子二人移下大理。当时的宰执中有一位叶衡是陈亮的同乡，对陈亮的印象甚好，于是一力援救，再加上有不少人特别是很有名气的辛弃疾看重陈亮的才志，又从中出力，方使陈亮父子幸免于难。

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陈亮走的就是这条道路。十年的磨砺使得陈亮的志气益坚，信仰愈固，他推崇孟子和王通的王霸之学，以“推倒一世之勇，开拓万古心胸”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因而便与朱熹的主张差之千里。此时，婺州的另一位德高望重的有道之士吕祖谦亦退居故里讲索学问，祖谦极博学，虽亦主张“明理”，但更提倡“躬行”，十分讲究经世致用。陈亮往谒，祖谦一见如故，与之彻夜长谈而不倦。吕祖谦与张栻、朱熹极相友善，陈亮也许正是从他那里开始知道了朱熹的学术蕴义，不用说，他对这种理论是不以为然的。

在朱熹和陈亮之外，第二代人中还有一重要的人物不能不提，这就是为援救陈亮出过大力的辛弃疾。辛弃疾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具有的那种无与伦比的优良品性的杰出代表之一，在他的身上，凝聚着千百年来中国土地上最光辉的精华，他以自己有限的生命把这种闪光的结晶发挥到极致，从而又一次给天地之间的浩瀚正气添加了一抹壮丽的色彩。辛弃疾的一生再次使我们相信，无论在怎样的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对国家民族的赤子忠诚不仅不会消失，相反还能激扬奋发、跌宕

升腾而至于永恒。

辛弃疾与朱熹和陈亮等有着绝大不同的是，他是北方人，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出生在济南历城时，整个淮河以北地区沦陷敌手已经十多年。辛弃疾一家和所有无力南来的众多士人百姓一样，都成了无奈的亡国之民。人在檐下，百事艰难，弃疾的祖父辛赞为了全家生计，也不得不出仕金国的地方守吏。辛赞是个普通人，他虽然不能以杀身成仁的壮烈证实他的忠诚，但在心中始终未能忘记对灾难深重的祖国所应尽的匹夫之责，他把这一切都教给了他敏而睿哲的孙子，在弃疾的身上寄托着报效祖国的一腔壮志。弃疾没有让他失望，二十二岁那年，他成功地组织了两千多人，在济南山区英勇起义。

弃疾尽管年轻，但文才武略兼备，他遵从祖父的教导，以精忠报国为己任，因此从未在繁文缛节上下过功夫，而代之以对文韬武略的刻苦学习和广收博蓄。弃疾先后两次借赴金廷科举北去燕京，一路考察山川攻守要略、四方民心向背，开始在心中谋划恢复故国山河的大计。弃疾心怀高志而又能临事有方，正是惨淡现实所磨砺出的那种干略之才。泰山之麓本有一支义军，其首领就是在绍兴末年完颜亮南侵时，被南渡朝廷遥封为“天平军节度使”并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的耿京，弃疾率众起义，正是为了响应耿京。

弃疾来到耿京军中，耿京委任他为掌书记，负责军中书檄文告的工作。但不久之后，弃疾就显示出他文学以外的杰出才能，开始在义军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当时金廷正挥戈南下，为后方安稳计，对起义各军施展以分化利诱和压迫围剿等各种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耿京义军显得内外困窘，处境十分艰难。弃疾当仁不让，他首先为耿京处理了内部的叛贼，然后审时度势，果断向耿京提出南渡淮河归靠朝廷，以保存这支起义力量的建议。这个策略得到了耿京的赞同。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正月，辛弃疾等数人经楚州来到当时天子行驾所在建康府，高宗立即予以接见，并同意耿京军南来。

但弃疾返回途中，情形又顿生变化。其时完颜亮已死，金世宗即位后一方面与宋廷讲和，另一方面在境内招抚纳降，采取怀柔政策，使得耿京义军分化日重。耿京部下一位叫张安国的人在弃疾走后，竟

联络了一些人杀掉了耿京，劫持部分义军向敌人投降，自己并且去做了金廷的济州知州。弃疾走到海州时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当机立断，约集了当地义兵五十人轻骑突袭径奔济州，在张安国五万大兵的军营中将其缚捉，并策反近万人渡淮南归。他在后来回忆此事道：“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豪迈俊逸之风，溢于言外。可以想见，在弃疾的心目中，上马杀贼是一件多么酣畅淋漓的快事。弃疾的脾性显然接近于陈亮，所以在南来朝廷任职后便全力援救陈亮，并与之在后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辛弃疾所没能想到的是，他的南来也许根本就是一个错误，南国的半壁河山竟成了埋葬他一腔抱负的坟墓。

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辛弃疾向孝宗上了一封共含有十道论札的奏疏，他称之为《美芹十论》。在这篇书奏中，辛弃疾不仅为皇上分析了金国的虚实，提出了帝国御戎的策略，更重要的是他在书中向天子大声疾呼必须破除朝廷上下惧于争衡的懦弱之气，反对承认南北定势而安于东南。在十论书后，弃疾又着重强调，绝不能再把和战之权让于敌夷，尤不可以暂时的失利而放弃根本大计。同样，他的观点也是接近于陈亮而又更富于现实意义。然而天子既已定下了和议的国是，弃疾的主张便同朱熹、陈亮一样，最终还是被无情地搁置。

南来以后，弃疾便再也没有回到军队中。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被派往建康府任通判，三年后再度入对，亦未能被天子认同。此后任职朝廷又近两年，其间反复献策宰相虞允文，仍没能达到效果。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弃疾赴职滁州，开始了任职地方官的生涯。身怀大志而不能伸，这对弃疾这样一位忠贞之士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痛苦，尽管他在各个任所都克心尽力多所建置，但依然不能消解心中的苦闷。辗转徙驻之间，登高临风，悲世伤生，满目江山，献愁供恨，缕缕幽绪岂堪怅惘；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又是何等的悲楚！

淳熙时代是一个新老交替的分水岭，因为南渡后出生的新一代已逐渐步入了他们的壮年时期。然而现实给他们划下的种种藩篱，常使佼佼者往往不能身居大位，譬如朱熹、陈亮乃至辛弃疾等，他们都未能对政局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这样的人还很多，他们大都声名卓著，

空怀才智而无处施展。不过，政治并不能替代一切，精神的力量同样推动着历史的进步。第二代中的杰出之辈从个人遭遇来说也许是不幸的，但他们得以把心灵升华在无尽的时空中辉映千古，谁又能说这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陈亮与朱熹、辛弃疾相识较早，而朱、辛直到绍熙时期才第一次见面。三人中朱熹的年龄最长，就他们对时局及后世的影响来说，朱熹也无疑要排在第一位。

朱熹：当学术与政治相遇

本朝是学术鼎盛的时代，然而迄今为止形成巨大影响的，却只有王安石与二程兄弟这两派理论，这是政治因素的作用。王学与程学的分歧虽然由来已久，但直到徽宗时期，双方的斗争主要还是表现在政治范畴而非思想领域。靖康以后王安石的所谓“新学”被否定，程氏兄弟的洛学曾经一度活跃了近十年，但此后也同样遭到了排斥。洛学这一段短暂的兴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权力扶持下的结果，当时的宰相赵鼎并未从理论上真正了解洛学的精蕴，而高宗天子的态度则是来自于对眼前利益的考虑而并非出于对学术的尊重。至于秦桧当政后在更大程度上禁黜程氏洛学的做法，更是独裁统治必然带来对学术的禁锢和摧残这种一般规律的典型表现，此中道理自是不须分说。

就本朝而言，把学术和政治结合在一起肇始于王安石，元祐时期的种种做法又加剧了这种劣习。思想家和学者如果入主政坛，便不可避免地以政治的眼光来对待学术，王安石与司马光的错误正在于此，二程之一的程颐在某些方面也未能免于此病。学术上的真理绝非是用强权就能树立的，朝市之显学若非是一种宣传手段，便一定是荒谬错陋的俗学。对以往经验的反思使南渡以后的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反对赵鼎一味扶植程学的张浚、后来主张对学术派别不当一切摒弃的叶谦都是其中的代表。不过，排斥异端是政治的内在要求，并不以人们的善良愿望而转移，有识之士的努力相对于强大的政治权威来说，

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南渡以后的杰出人物朱熹以在野身份潜心学术所创立的哲学，假如聊备——家而容与修正，本来应该是一个伟大的贡献。难以预料的是，政治却不容许思想意识独处事外，最终必然会选择某种理论标榜于庙堂之上而成为官学，朱熹之学同样也没能避免王安石新学那样的命运。当然，这是本朝后期的事情了，但一种思想能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里成为钳制其他思想的工具，朱熹的哲学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例子。如果他知道自己会带来这样一个结果的话，不知是否会黯然神伤。

朱熹的理论直接起源于二程，而二程哲学则是继承发挥了本朝以来一种传统儒学的精髓而形成的，后来的人们将洛学的师承划归于濂溪先生周敦颐的看法虽不一定确切有据，但从二程及朱熹的学术渊源上看，他们接受濂溪之学的影响是确凿无疑的。周敦颐字茂叔，生活在仁、英、神三朝，就其对“心性义理”之学的畅幽抉微来说，他可以称得上是所谓“理学”的开山之祖。“理”者，道理、法则也，如果一言以蔽之的话，理学就是有关天人性命定理的哲学。孔孟之后，只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义既乖，道德人心之用亦绝。濂溪之后，张载、二程、邵雍等大师辈出，这些思深之士始终不懈地锤炼心智、发展性灵，有意识地从具体的现实向形而上转化，以千年的文化传统为积累，转益多师，厚积薄发，从思想上对人生、社会、国家的终极问题展开了更深一层次的思考，终于使集大成者如朱熹等人横空出世，开始奠定未来中国的思想基调。

朱熹的特点是融会贯通，把理学推到了极致。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在长沙访问了张栻，相与两月，从张栻所传的衡山胡（宏）学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编成《程氏遗书》。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又撰成《资治通鉴纲目》五十卷，对司马光重视史鉴的格物致知之学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同年，朱熹纂集了《八朝名臣言行录》，第二年，阐释周敦颐的太极之说而成《太极图说解》等著。也就在这一年，朱熹在与吕祖谦的往复探讨中撰成《伊洛渊源录》，进而在两年后又共同编纂了《近思录》，把周敦颐、张载、二程四君子之说整理成文，标志着理学系统架构的完成。这一年朱熹四十五岁。

朱熹的哲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不过，它的核心却十分明了，最重要的一点是把“理”字发展到严密、精致和深邃的境界。他说：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有一个“理”，未有天地之前，也只有一个“理”，有此“理”才有天地，才有流气发挥万物，所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朱熹认为理与太极是同一的东西，理就是天之道理，此理摄万理，万理又归于此理，理依于气而行，化育流行，涵盖万物。从这一点出发，人之性也就是天赋之理，天理使人具仁义礼智之禀赋，而化气则使人有善恶刚柔之区分。因此天理人欲，不容并立，“修德之实，在乎去人欲，存天理”。

朱熹之学无疑是传统儒学的最高之致，他把人对自身修养的要求提到了一个崇高的地位。“若非圣贤，即是禽兽”，这是朱熹思想规定下的天理、人欲关系的必然产物。每个人都必须居敬穷理，“内无妄想，外无妄动”，方不失为立于天地之人，这既是朱熹对人性的定义，也是对政治和社会范畴里一切行为的规范。从这个方面来说，无论他本人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朱熹的思想都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典范，它把我们与禽兽和事物相区分，指示了一条走向终极目标的艰难而又崇高的道路。

但不幸的是，也正是这一点注定了朱熹哲学的荒谬。假如以天理来规定人，人之本身岂非毫无意义？如果照朱熹所说，天理与人欲是绝对的对立，那么造化育人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以天理的神圣，又何能容忍气之所化，再赋予人性之恶？当然，也许天理的本意是磨炼我们的意志，但理在气先，气化我成，以我们渺小的形而下又怎能与至高至极的形而上同归一途？朱熹指示的道路太艰难了，也许根本就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事情明显的是，如果做到了这些，人也就不是人而成为“天理”了。从另外一点上考虑，“天理”的标准在哪里？如果这个标准只不过是由圣贤来决定的话，那它还是一个历史的东西而绝非是一个纯粹的原则。朱熹哲学被后来的政治用作统治理论看来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使统治者的强迫手段成为可能的思想基础。

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四月，朱熹送吕祖谦返乡时，来到江西信州铅山的鹅湖寺。由于祖谦的撮合，朱熹与当地的两位人物陆九

龄、陆九渊得以相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学术论争。

陆氏兄弟也是知名当时的思深之士。特别是比朱熹小九岁的陆九渊，刻苦向学，覃思精微，取孟子“放心”之说而发挥，主张以廓复人之本心为第一要务。九渊认为天之所以与我者不过此心，心皆具此理，因此心即天理，不待外求。所以一开始就与朱熹追求名分、讲究行为的观点有着重大的分歧。在赴会之前，两兄弟专门预先讲辩直至深夜，准备折服朱熹。

第一天双方不欢而散，原因是九渊一上来就抢了先手，直截了当地宣称自己的“易简工夫”要胜过朱熹的“支离事业”，这使得朱熹很不高兴。

但第二天朱熹在如何教人求学的问题上展开反击，他坚持认为只有居敬存心才能穷理致知，而致知问学又是涵养尊德的必要过程，二者不可偏废。他对陆九渊“先求本心，然后泛观博览”的教人方法很不以为然，认为过于简单。

九渊仍然坚持己见，批评朱熹的方法过于支离。朱熹那些“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的所谓持敬工夫，在九渊看来当然是难以容忍，所以针对朱熹提出的“泛观为先”发出诘难道：

“尧舜之前，何书可读？”

这话说得就近乎于强辩了，幸好下面的话为其兄九龄所止，否则两人的唇枪舌剑说不定就要闹出伤害感情的结果。

鹅湖之会虽然未能取得一致，但双方通过这场学术讨论多少还是有了一点融合。特别是九渊的哥哥九龄在思想上起了重大变化，自此以后幡然悔悟，转向著书讲学的求道方式，与朱熹取得了契同。朱熹虽然不能同意九渊的“求心”理论，但也对他的为人深表钦佩，一直希望两家能兼补所长，并且后来在某些方面也接受了九渊的理论。只有九渊终身未改其说，他甚至在后来公然宣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把“心”的作用同样发挥到一个绝对的境地。九渊在学术上的从一不二，在某种角度上说也是使得自己的“心学”传人在后来与朱学一派发展成水火不容之势的原因之一。

朱、陆虽然分歧严重，但他们的大前提还是共同的，只不过是在具体的认识方法上存在着迥异的见解而已。真正与朱学既殊途又殊归的是陈亮的学说。

浙东婺州一带是南渡帝国的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经济既能导致文化的昌盛，必然也影响着学术思想的内容。婺学有一个共同特色是主张经世致用，带有明显的事功色彩。南渡后最著名的学者先是唐仲友，后是吕祖谦，都无一例外地具有这样的特色。唐仲友与朱熹在学术上甚不相容，由此后来两人之间还发生了互相诉讼的事情；吕祖谦虽然也强调性命之学，对朱熹理学也有很大程度上的契合，但仍未放弃强调躬行实践的初衷，所以他既与张栻、朱熹私交极佳，又能与陆氏兄弟时相过从，同时也能与思想激进的婺州后进陈亮有着亲密的交往。这一切都反映出环境对学术思想所起的影响，确实是不容低估的。

但最能代表婺州事功特色的是陈亮的学说，他与吕祖谦的调和理论完全不同。陈亮从根子上反对性命之学，同时把致用的目标彻底地具体化，明确提出中兴复仇、致达王道霸业的目标。从来也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将功利提到这样一个明确的高度。陈亮的哲学既是环境的影响，也是时势的反映，更是其坎坷遭遇的产物。

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陈亮在家居十二年后入太学为诸生，这无疑又是叶衡帮助的结果。在这一年，陈亮于太学的一次试论中再度发表见解，以至于满学之士口语纷然，腾谤之言数月未已。第二年，陈亮再度上书孝宗畅言恢复，结果让锐意恢复的孝宗读后赫然震动，天子当即在朝会上传旨，要将陈亮所上书榜于朝堂，并欲召陈亮授以官职。

不幸的是，当朝宰臣中大多数人一下想不起来陈亮是谁，殿前独有一位叫曾觌的官员知道陈亮，主动提出前去宣召。这个偶然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说改变了陈亮的一生。

曾觌这个人名声很臭，他早年以父荫补官，孝宗在藩邸时为内知客，因而在孝宗即位后为天子器重。曾觌与另一位经历相似的官员龙大渊恃宠骄纵，横行不法，在当时甚为正直之士所不齿。陈亮是何许

人？以他的性格，甚至都不愿见到曾觌，如何又能在他的面前受诏接旨！所以陈亮在居处听到曾觌将到的消息后，立即翻墙而逃，给了曾觌一个绝妙的软钉子。曾觌当然十分怨恨，为此在朝间一力攻击陈亮。而一部分宰执怪罪陈亮出言不忌，也在天子面前谤沮不已。他们受命天子前去复考，陈亮的慷慨陈词尤使这些朝廷大员感到落落不合，遂使得授官之议被暂时搁置。

十天后，陈亮先后两次诣阙上书，反对坐守临安、偏安东南，并对献书数天后没有回应深表遗憾。在第二书中，陈亮把自己向汤思退等朝廷重臣的面进之言和盘托出，言下之意，对某些人的从中阻挠也表示了不满。陈亮的勇气和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孝宗仍然十分欣赏陈亮的切直，再度要授官陈亮。然而陈亮得知后不过是淡然一笑而已：

“我的目的是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岂是以此而博一官？”

陈亮当日便渡钱塘江而归。数罹祸患使陈亮愤懑难禁，归乡后常与同邑知己狂饮，以壶中之物浇胸中块垒，醉后拔剑起舞，少不了豪气干云，说出一些狂话来，有些人便把此事告到了刑部。刑部侍郎何澹在省试中黜陈亮下第，陈亮对他曾有所不满而语出不逊，何澹便借此报复，又把他下到大理寺狱中，笞掠批杖以至体无完肤。幸亏天子依然有心袒护，否则这一次陈亮难免就要身遭不测。

出狱以后的陈亮再度归乡发愤读书，潜心思考，终于使自己的思想理论趋于成熟。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二月，陈亮出乡访问朱熹，两人在一起呆了十几天，彼此充分地交换了意见。此后的十年，他与朱熹书信往复，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一次的争论虽然不像鹅湖之会那样面对面地进行，但它所涉及到的深度和广度，都无疑要超过鹅湖之辩许多。

一个基本问题始终贯穿在这场辩论中，这就是王霸和义利。陈亮认为，天理人欲不可分割，因此王道与霸业可以并用，义与利也可双行。无疑，这自然遭致朱熹的强烈反对。两人从三代以至汉唐，通过历史事实互为诘难，但谁也说服不了谁。陈亮的学说从根本上讲是针

对当今的现实而发的，所以在“成人之道”的问题上，陈亮以“志在天下”反驳朱熹的“独善其身”，把自己的哲学发展成为天下生民计利的有为之论，当然比保守的朱熹高明得多。实际上，在陈亮的堂堂英气面前，朱熹根本就无力抵挡，他就像一个年长的禅师一样，故作高深地作着劝谕：

“奉告老兄，何必如此撺掇？闲汉在山里咬菜根，与人无相干涉，了却几卷残书，岂非一事？……名教中自有安身处。”

陈亮答道：“风不动则不入，蛇不动则不行，龙不动则不能变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

两相比照，优劣尽知。就连朱熹也不得不承认，陆九渊的近禅之学倒并不可忧，因为学者一旦无可摸索，自会弃去；唯有“浙学”专于功利，学者学之便可见效。他为之而感慨万端道：

“陈同甫之学已行到江西，而浙人信响已多。家家谈王霸，可畏！可畏！”

看来朱熹之学后来成为帝国恢复大业的一种拘碍势力同样不是一个偶然，它的核心就包含了反对进取的因素。他所力持的那种“先得吾身好，党类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国家好”的理论，尽管是种地道的迂腐之谈，但无疑会被人拿去当作逃避的凭据。朱熹过分相信道德修养的力量，并不是他一家的发明，而是本朝以来甚至是有史以来中国这个礼义之邦的通病。它带来的无穷恶果是：天下生民肉体上的血泪痛苦既不能免，而道亦未必能行，心亦未必能安。也许它唯一的长处就是把伦理道德树立为先验的标准，在一种虚幻的理想世界里麻醉自己也麻醉别人，从而维持着社会的长期稳定。但是代价太沉重了。

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陈亮又遭受到一次冤狱，得脱后又为人聚凶徒击于路，卧床一月始告平复。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二月，陈亮来到金陵、京口，观察沿江山川形势，其后来到临安，再度上书天子极倡恢复，一心内禅退位的孝宗没有加以理睬。陈亮义无反顾地倡言王霸义利，浑无顾忌地疾呼恢复，当然使许多人无法忍

受，他们把陈亮视作狂徒，极尽排挤打击之能事。朱熹就认为他是祸由自取，乃平时自处法度之外、不闻礼法的结果，甚至来信要他痛自收敛，绌去王霸并用之说。在落魄境遇中，唯有辛弃疾不断来函抚慰劝励，赋壮词相寄，使得陈亮深为感动。这一年冬天，陈亮约请朱熹前往紫溪与辛弃疾相会，但朱熹负约未至。陈亮遂独与弃疾在江西信州的铅山山中重逢。铅山的主峰就是鹅湖，峰中的鹅湖寺也就是当年朱、陆辩论的所在，陈、辛两人也常常去那里小坐，但他们却不是相与争辩而只是互道衷情、共论时事。两人盘桓近十日后洒泪而别，这一场相逢成了他们不幸人生的唯一可堪慰藉之事。

辛弃疾此时已罢职闲居好几年了，无奈、愤懑、痛楚和不甘交织在他的心里，百转千回而不能已。“近来愁事天来大，谁解相怜？”当陈亮走后的第二天，对挚友的依依难舍之情使弃疾又去追赶陈亮，希望能再与他把酒起舞，倾吐心事。但追到鹭鹚亭时，雪深路滑，实在无法前进，弃疾只有无奈而止。夜宿于道旁孤馆，中宵闻笛，不能成眠，弃疾将一腔惆怅化作歌词，遥寄知己。词中有道：

> 佳人重约还轻别。怅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路断车轮生四角，此地行人销骨。问谁使君来愁绝？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长夜笛，莫吹裂！

陈亮答词有道：

> 树犹如此堪重别！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行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但莫使伯牙弦绝！九转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寻常铁。龙共虎，应声裂。

弃疾再答曰：

> 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陈亮又答曰：

> 斩新换出旗麾别。把当时、一桩大义，拆开收合。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摇肢动骨，这话霸、只成痴绝！天地洪炉谁扇鞴？算于中，安得长剑铁！淝水破，关东裂！

把忧怀社稷生民的一腔血泪铸成词什最终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最突出的就是辛弃疾，他的作品肝肠似火，色肖如花，雄奇阔大委婉缠绵之美，不仅独步当时，亦可冠盖古今。也许我们唯有相信，现实的本意就是让真正的志者只能在心中完成他们的壮烈。否则，我们又如何面对这许多泪洒江山的英雄豪杰呢？

历史的合理性总是出人意料

淳熙后期的朝廷事务基本上是由王淮主持。王淮字季海，绍兴进士，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入为副相，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拜右丞相，不久升为首相。取法汉制而将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是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的事情，自此以后，宰相的名号便没有再变动过。王淮此人从总体上讲倒也是个持重之士，风骨清癯，萧然简远，为人冲淡寡欲，喜愠不形于色。但这种秉性的人虽会有善名，但却不一定会有善政。

至少，王淮也不是完全像孝宗所认为的那样不党无私。朱、唐交讼一事就是个例证。

朱熹在朝廷的一再征召下，于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赴知南康军，两年任满后接受王淮的推荐，出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这是一种经济监察官职，但在其时主要的责任是监督浙东一带的救灾措施。朱熹到职后，先后弹劾多位官员的不法行为。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七月巡按至台州时，发现离任的知州唐仲友有不少问题，遂连章朝廷请予惩罚。王淮起初压下不报，此后又在天子面前为仲友开脱，最后大事化小，以夺唐仲友新授之职转授朱熹的处理了事。

仲友是王淮的姻亲，王淮在这个问题上有点感情用事可以理解，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王淮也是婺州人，与唐仲友一样具有一种讲求经世的思想倾向，所以对朱学有一种排斥心理。尽管他为政宽厚，但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不能摆脱学术偏见，以至于在不久后默许郑丙、陈

贾诸人攻击程、朱之学，开了以政治手段压迫朱熹学术的先例。就事实而言，朱熹所提倡的理论在客观上对帝国的恢复大业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影响，朱熹本人从再度出仕之后，就明确主张“先以东南之事为忧”，反对急功近利妄生衅端。但当时朝廷反对朱熹者并非出自于这个考虑，他们只是攻击朱学之人“饰怪惊愚”、“欺世盗名”，这对于朱熹来说当然不是很公正的。凭心而论，只有陈亮对朱熹的批判才具有一种无私的意义。从政治上对学术思想进行压制无论从什么方面来说，都是非理性和非人道的。

王淮罢于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虽然他刻意为天子理财治政、区分军务，但不言自明的是，他的努力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山河依然，气氛照旧，帝国政府从没有真正把眼光转向沦陷已久的北方。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正月，与孝宗并驾齐驱、和平共处的金熙宗去世时，几乎没有引起南方的任何反应。

从高标准上说，帝国第十一位天子御临天下的时代其实是庸碌和无为的，孝宗皇帝最后一个举动证实了这一点。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初，皇上几乎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就突然宣布自己将禅位太子。他对新任宰相周必大、留正说，准备在旬日之间就把这件事情完成，并密赐当年高宗禅位的手诏给周必大，命令他立即依式进呈诏草。孝宗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只是说年来稍觉倦勤，所以想退就休养，同时也可终毕先帝高宗三年之孝。太上皇高宗于两年前返归道山。

这在帝王原则上是不能成为理由的。人主受命于天治御万民，本就应当治道忧勤、宵衣旰食，绝不能以日理万机劳心蚀骨而遽让神器。何况天子不过五十三岁，春秋方盛，圣体未愆，如何竟能以倦勤而想到休养！至于上皇驾崩，哀深慕切，欲以塞耳闭目之道以尽三年之丧，则更悖于古来的圣训。尽孝之大者在于尽道，欲报高宗之恩，尤应殚心竭力以奠安天下，哀毁过礼岂足以慰先帝于溟漠？孝宗虽是个淳厚的人，但并非不明事理，他所谓宅忧谅荫以尽丧纪的理由明显是一种饰词。

这件事情确实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朝堂上下一片寂静多少说明

了这一点。孝宗把绍兴禅让挂在嘴上，目的是想打动二府的宰执，并不能说明他的真实想法。当年高宗的内禅，明显是出于时势压迫下胆怯懦弱心理的作怪，而眼下虽然国步未康、恢复无功，但依然不失为一个平和熙乐的年代，我们的天子根本没有任何动机去效法先君。至于说他的禅位是因为抱志未伸、不甘屈辱，那只不过是后来臣子美好的愿望罢了，祖宗之仇家国之痛又岂是退处闲适所能消磨的？值得注意的是，天子急切希望此事能速战速决，正如他计划的那样，从透露风声到最后禅位确实只用了十来天的时间，如果没有难言之隐，又何必惧怕其中的波折？

根子出在已故的上皇高宗。他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内禅时正当盛年，这个事实使得入继的嗣君只有二十六岁，照本朝诸帝大都御极长久并能享高寿的先例推论，新一代天子像高宗那样再次垂拱三四十年是不成问题的。果然，孝宗居位一转眼就是二十八年，这叫有心大宝的储君如何能堪呢？

太子赵惇排行第三，已经四十三岁了，人为储贰也有近十年的光景。天意难测，以他这个年龄走在皇帝前面也不是不可能的，长兄庄文太子早早而薨就是先例。太子没有父王至淳的修养，因而心怀怨望也就顺理成章。在这个问题上，太子妃李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氏是庆远军节度使李道之女，出身将官之家，既缺乏礼义簪缨之家应有的教育，更没有金枝玉叶所具备的涵养，因此性格粗率又悍妒狭刻。尽管孝宗一度有废去之意，但她成功地掌握了太子，一直我行我素。在李氏的影响下，太子不止一次地做过母后的工作，希望她能说服皇上能效法祖翁而早日内禅。爱子心切的成穆皇后当然也委婉地劝过孝宗，但起初未被天子同意。孝宗对皇后道：

“孩儿尚小，缺乏经历，故不能与之。”

当皇后无奈地回复太子时，太子推起头巾，露出前额：

“儿臣毛发已白，尚以为童，岂非翁翁之罪！”他也许不好指责皇上，所以只能把怨气发泄到祖父高宗的头上。

上皇高宗的去世是太子的怨气开始表露的契机，当孝宗最后得知

这一情况时，不能不在心底有所触动。自古以来，储位之事一直是个两难的问题：久阙不建，对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隐患；但过早确立，也会带来新的麻烦。东宫的影响是很微妙的，历代都不乏太子不道而祸起萧墙的故事，孝宗自然是十分清楚的。从这一点出发，孝宗最后选择当年高宗的道路，以抛弃一切而自求快活的退让来达到折中之道，自与他性格十分契合。太上皇高宗二十几年恬淡的生活给孝宗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这也是他甘于退却的另一个因素。当然，天子是个至孝的人，以老吾老之义推及幼吾幼之情，是他最终下定决心内禅的根本原因。

不过，孝宗的做法既是一种逃避，就注定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受制于悍妇的赵惇并没有因顺利地入继大宝而改变性格，反而愈陷愈深，作了自己皇后的傀儡。李氏当然也没有因为顺利地执掌大权而消释积压已久的情绪，第二年就对曾经有心废己的太上皇孝宗开始报复，不断离间他们父子的感情。一段时间后，两宫的关系竟成隔绝之势，有时太上皇要见儿子都不可得。

这事使得举朝忧虑。一两年来，宰辅百官以至布苇之士，过宫为请者不绝，但亦未能立即改善状况。新天子本就有心疾，在李氏的悍妒暴躁下，震惧成疾，不能视事。孝宗遭此打击，独处在幽深的重华宫里怏怏难捱，后悔不迭，但为时已晚。孝宗的这个失误就如同他二十八年的临政一样，怀有良好的愿望，但却没有良好的结果。

新帝后来的庙号为“光宗”。光宗即位第二年改元“绍熙”，也只做了五年的皇帝。后宫干政是本朝家法所严格禁绝的，在这方面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共识，也有着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光宗陷入妇人之手的遭遇决定了他必然成为龙銮宝座上的匆匆过客。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五月，上皇孝宗大渐，思见光宗犹不可得。消息传出，朝廷上下顿时哗然，六月初九太上皇孝宗驾崩，光宗又未能赴重华宫尽礼，这导致了光宗帝位的最后终结。以赵汝愚、韩侂胄为首的一批贵戚及宰执大员发动了一场近似于政变的运动，请出寿圣太后——这是孝宗的母亲，光宗的祖母——主持了又一次禅让，使光宗的第二子赵扩成为帝国的第十三位天子。这是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七月初五的事，新一代天子史称“宁宗”，时年二十七岁。

历史的合理性常常使人无比困惑。

以公元十二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宋帝国来说，尽管和议在精神上严重挫伤了国家的气势，然而在客观上也造就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即便是高宗的退避和秦桧的专制，在产生不思进取的消极心态的同时，却也使得半壁河山的稳定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军事上，我们的帝国虽说从原来的基础上又退后了一步，比如十几年的兵戈不兴武备不整使得战斗力已经大大下降；但在另一方面，本来诸事不张的经济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繁荣。

第一当然是农业的恢复。以南渡之后的半壁之地应付居高不下的政府开支，首先得依靠农桑，这是天子臣民的共识。为此政府实行了不少政策，比如蠲免租税、招抚流散、经界田亩以去民之扰等，从实际情况看，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特别是大兴水利，使南方河道密布、水泽纵横的地利得以发挥，更使生产水平大大提高，从根本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农业的恢复带来民间产业的兴盛，举凡采矿冶铸、丝染棉织、造纸制瓷，甚至工艺技术要求甚高的造船业，都能克尽其善。物质需求的强大动力使民生工业在这个时代第一次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进步，这是很值一提的。其中对我们帝国最大的贡献是造纸的发达，本朝的纸无论从品质、种类来说都已臻致极高的水准，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印刷业的繁荣，自然也就保证了文化的积累和传播，这更是划时代的事情。本朝的书被后人称为“宋本”，并不是单单以时代命名，它代表着一种精美和准确的典范，尽管后世不断取法模仿，但始终难以超越。

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则是商业，这个被传统理念所排斥的经济成分也在南渡以后的历史条件下蓬勃兴旺起来。它的最好反映就是行在临安和大大小小的城市，比如平江、镇江、衢州、江陵、潭州、襄阳、成都乃至兵燹之后的扬州，工商辐辏，极尽其盛。濒海的福州、泉州、广州又能通舟洋外，商货输入，不计其数。商户富户金珠罗绮，也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阶层。

南方优越的物质条件当然是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政府的南迁。南北之分由来久矣，历史因素使中国的政治中心一

向处于北方的中原地区，“圣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的信条最后固化成一种原则，不断强化着所谓四海归一的向心力。由于这个原因，地利优越的南方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南渡的现实打破了这个藩篱，从而使广阔的南国自六朝以后再度成为天下的中心，南人不受重视的时代也已一去不返，因为他们已成为唯一的百姓。绍兴和约使北方移民南来的规模与程度已经大大减低，而靖康一辈又已谢世，第二代人早已融合在这个新的大家庭中而不分彼此。这个事实造就了一切，南渡帝国得以稳居东南的奥妙，也尽在于斯。

但我们若是以这种眼前的利益就承认现实的合理性，那就是大错特错了。世事的合理与否绝不可以一时的结果来下判断，更不能以实际效果来取代是非标准。否则的话，历史就成了称斤论两的数字而不再是一种惩恶扬善的理念了。帝国持续已久的战、和的分歧也就在此，究竟是坚持原则还是图求实利，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特别是此刻帝国的现实正处在承平已久、渐得其利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便显得十分突出。

朱熹在光宗即位的那一年完成了两部重要的著作《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在完善学术理论的同时，也建立了一种道统，人们称之为“道学”，开始受到普遍的注意。他又在各地任所复古建礼，躬行实践，广泛传播他的学说，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雪耻恢复的问题上，此时的朱熹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观点。他认为恢复之计至少需要有二三十年的辛苦准备，像现在这样既不练兵又不积财，一味高谈恢复就只能是一个空想。朱熹在这个时期内曾对他的弟子们反复强调，除了“战”与“和”之外，还有个“守”字，只要措置得当顽强固守，就不会再为敌夷所侵。他的这种看法基本反映了淳熙以来务实派的思想主张，也成为时下的理论主流。这种理论就道理上讲固然是不错的，但承认现实就必然会亵渎原则，假如强烈的正义感竟因为“不切实际”而受到指斥，这必将给我们的帝国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

这种风气首先给那些坚持信念的仁人志士带来了不幸。陈亮于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十二月再度入狱，这是某些当政者不满于他狂

放如初的结果。幸有大理少卿郑汝谐阅其辨疏，诧为奇才，力言于光宗，陈亮始免一死。出狱后，陈亮虽在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策举进士，第二年又终于被朝廷授以官职，但这时陈亮已经五十二岁，困苦的遭遇使他的身体也受到损害，未到任便突发急病而卒。

闲居十年的辛弃疾在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被朝廷起用为“提点福建路刑狱公事”，为政公正，奉职勤勉，并与朱熹一起也在任所内推行丈量田亩的经界之法。朱、辛两人在这一年见了很多次，讨论政事之外，也谈到了双方的分歧。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弃疾奉召入朝，上书皇上建置长江军务，毫无结果。此后又出任福建安抚使近一年，在任职期间撙节钱财、整肃军队，甚至还准备扩充地方军力，但谏垣的一道措辞严厉的弹劾再度扑灭了他的满腔热情，“残酷贪饕，奸赃狼藉”的罪名使辛弃疾罢官卸任，于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八月又回到江西信州的带湖，这一年他五十五岁。

时光荏苒，南渡以来最著名的诗家莫过于尤、范、陆、杨四人，其中曾出使金国不辱使命而享有盛名的范成大死于前一年，而光宗皇帝的老师尤袤已在本年去世。另外两人陆游与杨万里也都已到了古稀之年而致仕在乡。他们两人同弃疾一样，都是满怀报国之诚而终未得伸的高洁之士。烈士暮年，壮心未已，陆游有一首诗可以略窥其志，这是他在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十一月的一个风雨之夜里所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雨声，铁马冰河入梦来。

金戈铁马的时代总是会到来的。不在战火中新生，就在刀剑下灭亡，没有谁能逃脱掉这个法则。

第五章
败局：坏在根柢

湛湛长空黑。

更那堪、斜风细雨，乱愁如织。

老眼平生空四海，赖有高楼百尺。

看浩荡、千崖秋色。

白发书生神州泪，尽凄凉、不向牛山滴。

追往事、去无迹。

——刘克庄

三朝内禅：南宋皇帝的无奈选择

在我们这样一个帝国里，天子的行为法则总是不可理喻的，政治的关键还是在于朝堂之上的衮衮诸公，在于他们的道德修养和个人素质。假如执政者不能尽到士民与皇帝之间的折中之责，国家的灾难便不可避免。

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七月的那场变故既为宗庙社稷带来了一位新天子，也给我们的帝国推出了一位重要人物，这就是韩侂胄。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位韩侂胄改变了帝国历史的进程。

韩侂胄为内禅得以顺利实现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当时情形的尴尬程度，在本朝历史上十分罕见。孝宗崩后的第二天，宰相留正率百官拜表请天子就丧成服，竟被光宗诏以疾病未愈而推却。国遭大丧，嗣君不出，这是个相当严重的事件，朝廷宰执们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在左司郎徐谊及另一位老资格的大臣吴琚的建议下，留正与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转趋寿圣皇太后，想请这位两朝太后垂帘主丧，但也被皇太后拒绝。两人一再恳求，寿圣太后也只答应暂代祭奠之礼。显然，这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尚书左选郎官叶适果断提出以早正储位、太子监国的办法来彻底扭转帝国政治的不良局面。留正赞同此议，当天就率宰执进呈，但疏入不报。六天后再请，天子在奏疏上批复了“甚好”两个字，似乎已经同意了宰相的请求。翌日，留正与众臣将拟好的诏旨递进，请天子正式批付翰林学士院降诏。但这天晚上，光宗突然给宰相来了一道手札，上有八个字：

“历事岁久，念欲退闲。”

这就是有退位的意思了，留正看后大为惊惧。按照他原来的意思，皇帝既以疾病未克主丧，宜立皇太子监国。这样的话，即使无可奈何而行内禅，太子名分已立，自可即位。现在皇上竟然首先想到禅

位，这不能不使他大为紧张。留正不敢拍板，便去找赵汝愚商量，但汝愚一向不同意宰相在如此情形下尚还坚持循规蹈矩的做法，此刻更是主张顺水推舟：以太皇太后传旨，宣布禅位皇子嘉王。留正听罢十分无奈。

留正是个聪明人，他心里清楚：储诏未下，遽提内禅，这是不符合礼制的越轨之举。事情顺利便罢，若以后一旦有所变故，宰相必然要负责任。留正显然不愿以一时的冲动而致使日后难处，所以在第二天早朝时假装跌倒受伤，以一乘肩舆离开了朝廷。刚出官门，便立即上表辞职。他这一走，朝会上人心益摇。这还不算，光宗刚刚出现在殿上，便晕倒在地。朝堂上所有的官员顿时目瞪口呆，就连一向沉稳的赵汝愚也手足无措。

紧急关头，还是徐谊给汝愚出了主意。徐谊认为，禅让事关重大，非皇太后出面不可，知閤门韩侂胄是太后的亲戚，若通过他去说服，事情一定能成。“知閤

门事”是閤门司的主管，负责朝会、游幸、宴享以及文武官员、外国藩邦朝见谢辞礼仪，一般有外戚勋贵担任。知閤

门等官员虽是一清要之选，但不预政务，若非事出急需，韩侂胄本来是不可能参与到这件事情中的。始作俑者徐谊与他非亲非故，完全是因为他同皇太后的亲戚关系才想到把他派上用场。

侂胄做得很好，他通过内侍张宗尹、关礼两人见到了皇太后，并说服了太后定下内禅之策。侂胄复命后，汝愚这才向另两位宰执陈骙、余端礼通报，并让近卫军统帅郭杲等人分兵把守大内，做好了应急准备，最后使内禅得以完成。应该说，新一代天子宁宗即位的第一功臣是赵汝愚，他是宗族大臣，在这个问题上既怀有为国分忧的忠诚，也有克襄大计的勇气。汝愚在事后尤以“同姓之卿，不敢言功”的谦逊辞让了右相之职并只担任了枢密使，犹不失宗臣的本色。韩侂胄当然在其中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相比之下还是略为逊色的。不过，侂胄却并不明白这一点，他自认为自己的功劳十分巨大。

新帝即位后，汝愚主持朝局，裁抑侥幸，起用名士，甚至还召回

了留正。同时进行了一系列人事调整奖揄有功，包括以陈骙为知枢密院事，余端礼参知政事，郭杲为武康军节度使等。但出入意料的是，侂胄只被升衔为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一职。

侂胄面谒汝愚，希望至少能像郭杲一样加赐节钺而成为一地节度。但汝愚却予以婉拒，对他道：

“吾是宗臣，汝是外戚，何可言功？只有普通大臣才应当推赏。”

侂胄极为失望。

侂胄是当年忠献王韩琦的曾孙，父亲韩诚娶了高宗皇后的妹妹，官至宝宁军承宣使。而他自己以父荫入仕，并且又娶了寿圣皇太后的侄女，因此既是外戚，也算得上是武臣世家。在此之前，侂胄本身就带有一个汝州防御使的武职，所以他十分想成为封疆大吏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作为元勋子弟，侂胄当然还有一些别人所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对建功立业非常向往，对功迈远祖、光耀门楣有着一种天然的希冀。也许是读书较少的缘故，侂胄为人直率，冲动而不拘小节，他的思想行为与传统的礼训有一定的距离，与朝中那些进士出身的文臣们当然也有相当大的区别。

实际上大家对此也都十分清楚。叶适就对汝愚说过：“侂胄所望，不过节钺而已，与之又有何妨？”但汝愚没有接受。本朝有一种鄙视近幸的传统，特别是对于担任知閤门一类官职的皇亲国戚，更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当年陈亮对曾觌的态度就是例子。汝愚多少也有些宗室大臣的傲慢习气，他与不少人从骨子里就看不起身为外戚的韩侂胄，这也是他不同意擢奖侂胄的原因之一。

最典型的就是留正，此人除了老奸巨猾之外，尚还有自以为是的毛病，他把对侂胄的鄙视表现了出来，直接导致了侂胄后来与他们这些文臣们的对立。这是当年八月份的事，天子即位以后，侂胄自恃恩宠，经常到宰相办公所在地发表意见，留正甚为不满，指使省吏转告：

“宰相部堂不是你知閤事日日往来之地！”

这话近似于侮辱，侂胄当然无法忍受，于是他立即就到宁宗面前

进言，以留正当初在内禅中的暧昧态度为由，使天子下诏罢免了留正。赵汝愚一向倚重留正，所以不惜在新帝即位后立即将他召回，现在侂胄不先预告就使天子出诏罢免首相，汝愚无法不感到气愤。他像留正一样把这种情绪付诸行动，当侂胄就此事来谒见时，汝愚辞而不见，使侂胄惭忿而返，终于和他彻底翻脸。事后，汝愚为自己失去控制而怒形于色也感到后悔，曾经一度想补救，但被侂胄拒绝。

朱熹在这个月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天子侍讲，这是新帝两位老师黄裳和彭龟年推荐的结果。他们两人因十分推重朱熹的学说，所以经常在天子面前提及这位名噪海内的儒臣。朱熹在孝、光两朝的处境不是太好，有点心灰意冷，此次受诏后曾上章辞谢，但未被接受。朱熹不得已在八月底来到临安，由此也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中。

侂胄的优势在于接近天子。他不仅是当朝皇太后的亲属，又是宁宗皇后的堂祖父，同时与新帝的婕妤曹氏也有一层亲戚关系。另外，曹氏的几个姐妹通籍禁内，与侂胄的关系亦十分融洽，这都为他邀受皇恩浸预政事创造了条件。新帝遽而登位，本身就缺乏自信而十分需要有所倚仗，侂胄不失时机地走到天子身边，正好填补了宁宗心理上的某种空缺，因而获得他的充分信任是很自然的。患难之交往往牢不可破，侂胄在后来的成功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种难以言喻的感情因素。

当觖望转化成怨恨的时候，单纯的不满便被刻意的报复所代替。侂胄排挤掉赵汝愚只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来自于与侂胄同样心怀怨气的同事知门刘弼，他为侂胄勾画了一条便捷的途径，建议他首先任用台谏以树植势力。台谏一向是宰相的对立面自不待言，关键还在于台谏之官一向是天子任命而宰相不得与闻的，这正好充分利用了侂胄的优势，刘弼的计策不能不说是相当高明。在十月份，侂胄开始以御笔批出的手法调整台谏人选，其党人刘德秀、杨大法先后被他提升为监察御史和殿中侍御史，罢吴猎之监察御史，而以刘三杰代之，为打击汝愚排除障碍。当然，事情伊始就使得朝廷上下一片哗然。

原因是天子御批不由中书的情况太露骨了，而且谁都知道这是侂

胄一力左右圣意的结果。第一位被免的谏官黄度就公开宣称侂胄“假御笔而逐谏臣”的做法，具有当年蔡京擅权的性质。而朱熹则进而上书天子，明确指责侂胄窃取圣柄而使“主威下移”，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原则的高度。侂胄恼羞成怒，立即予以反击，又唆使天子罢免了朱熹。这是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闰十月的事，朱熹担任天子侍讲仅仅四十余天。

侂胄对付朱熹的做法使不少人气愤之余又忍俊不禁。他让一个宫廷优人装扮成峨冠阔袖的形象，在天子面前逗笑，以影射朱熹的迂腐不堪。朱熹可能是有一些这方面的缺点，他坚持居理持敬的修养功夫，也不得不首先使自己道貌岸然，当年的陆九渊就曾讥笑过他，以侂胄的性格，对此当然尤为讨厌。不过，以此细琐小节而进行人身攻击并达到政治迫害的目的，则无疑是一个极端荒谬的行径。朱熹的罢职使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恶化，中书舍人陈傅良、起居郎刘光祖、起居舍人吴猎、吏部侍郎孙逢吉、工部侍郎黄艾、吏部侍郎兼侍讲彭龟年等人连章抗议，指责侂胄奸佞不法。而侂胄倚恃天子展开反击，先后将陈傅良、刘光祖、彭龟年罢免，知枢密院事陈骙虽素与汝愚不协，也被侂胄排挤，于这年的十二月份罢职。侂胄引用了一位老资格的大臣京镗入为副相，并用为谋主，使汝愚在朝中完全被孤立。第二年，新帝改元“庆元”，这一年的二月，赵汝愚在侂胄一连串的打击下终于罢相。清除汝愚的同时，所有反对者也一概被侂胄诬以汝愚党人而被逐斥出朝，其中既有十数位朝廷大臣，也有六名伏阙上书的太学生，甚至对他有过重大贡献的徐谊也未能幸免。

侂胄在对待汝愚的态度上十分强硬。太府寺丞吕祖俭因上书反对，被侂胄出旨安置韶州。这是一个岭外荒蛮之地，处分已不能不说是太重。有人提出：祖俭是当年社稷功臣吕公著的孙子，投之岭外，岂非过分。但侂胄的回答是：谁要是再敢援救，就把祖俭放到新州去。新州比韶州更远，这下没有人再敢说话。虽然后来侂胄迫于舆论压力而一度将汝愚改置吉州，但仍然对他怨恨未解，一心欲置其于死地。七月，罢停了汝愚祠职，十一月，又使人上书请斩汝愚，未能得逞后，再将汝愚改置永州军。

汝愚自知必死，这时倒反而很坦然。临行前对诸子道：“观侂胄

之意，必欲杀我。我死，汝等或可免。”果不出其所料，次年正月二十日，汝愚暴死于贬途衡州，时年五十七岁。

汝愚的政治经验显然很欠缺，他既没能想到侂胄因为求节钺不得而会如此失望，也未能注意到侂胄越来越重的报复心态。在这一点上就连朱熹都比他明智，曾建议他厚酬侂胄以消其预政之望。但汝愚不以为然，认为区区一个韩侂胄并不足为虑，他的幼稚最终使他命丧黄泉。在本朝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哪一个宰执大臣像他这样不明不白地暴死在异地他乡。

韩侂胄的出现再次暴露出我们的帝国在权力问题上的弊端。太祖以来制定的政策只是一味地限制宰相和重兵大将，结果使天子的权力过重而失去牵制。天子本身是凌驾于制度之上的，蔡京和秦桧的故事早就证明，宰相一旦和天子结合在一起，手中的权力就会极度膨胀，独裁也就应运而生。

天子的权力凌驾制度之上

侂胄得以主宰政局也有一些客观因素。正如本朝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几个专政时期其实都是迎合了某种需要一样，侂胄的强硬手段也是适应了朝野上下某种不满情绪的结果。这种不满当然不一定尽是出于公义，其中的绝大部分甚至是党派之见或个人恩怨的产物。然而事情既然存在，它就必然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绍熙内禅的险恶风波造就了这种气氛，而韩侂胄的恣意妄为又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侂胄对朱熹的打击本出于政治报复，但事情最后归结到朱熹所提倡的“道学”上，并不是侂胄本人事先所预料到的。朱熹发展儒学思想功不可没，但他在淳熙末期对其所谓“正心诚意”之说的过分渲染多少就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而此后树立严谨的道统，就更明显地表露出自我标榜、独立门户的倾向。人们没有理由把他与孔、孟先师相提并论，因此不能不对他的动机发生怀疑。当然，前些年王淮等人对朱熹

的攻击还是不免政治上的因素，但也表明朱熹自高其道的做法并没有多大的市场。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兵部侍郎林栗指斥朱熹时，有一位婺州人叶适曾经极力为他辩护，反攻王淮、林栗随意创名诬陷朱熹。但也就是这位叶适，在不久之后就开始对朱熹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认为朱熹之说完全是背离孔子大统的“浮论”，充分反映出与朱熹对立的思想潮流仍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侂胄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侂胄先是组织了一场声势颇大的批判运动，反复从理论上论证朱熹之说的伪学性质，然后按照他的需要，将所有不附己者尽数列入“道学”的名单。既然朱熹的“道学”已被指斥为“伪学”，那么道学之人也就是伪党，这对侂胄完成他的政治清洗是再好不过的借口。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八年正式申严道学之禁，十二月，朱熹被削职罢祠。这时的朱熹才明白事情的性质已有所转化，但既已错过了反击的机会，除了在福建家里焚烧文稿之外，别无办法。

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十月，事态臻于极致，有一位绵州知州王沇上疏，建议订立伪学名录，以便今后处理。这简直就是蔡京“元祐党人碑”的翻版，侂胄当然乐于取法。于是在这一年末，五十九人被列入了这个名单。其中宰执有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四人，待制以上官有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等十三人，其他官员则有刘光祖、吕祖俭、叶适、黄度等三十一人，甚至还包括武臣三人，普通士子八人。

很明显，这个道学党籍可以说根本就与所谓的“道学”无关。赵汝愚不必说了，留正与王蔺两人也从未涉及过道学，特别是留正，他与朱熹的个人关系甚至都不怎么样；另一位宰执周必大以文知名，更与道学浑不相干。严格来说，五十九人中真正的道学家也许不超过两三位，由此可见，这完全是一个政治运动的黑名单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之所以名列其中不外乎是与侂胄发生了抵触而已。刘光祖在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曾说过的，“因恶道学乃生朋党，因生朋党乃罪忠谏”，确实不失为先见之明。侂胄禁黜道学之党，其实是从反面证实了自己的朋党事实。

独裁政治的一个最大效应就是趋利之徒奔竞于道路，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世事既不可能清明如水，人性自然也就不会全如光风霁月般纯洁无瑕，即所谓天道流行化育万物，必得是气而有是形，禀得衰颓薄俗之气，便为愚、不肖。在这一点上，朱熹确实是说到点子上了。愚不肖者既然无法避免，那么侂胄一人翻云覆雨如此肆无忌惮，也正是适应了他们的需要。小人当道，则道德沦丧、士风日下就是个必然的结果。

侂胄当政后，吏部尚书许及之谄媚所事无所不至，但两年内却一直未得升迁。及之每次拜见侂胄，总是涕泗俱下，其衰迟之象，就差要跪在侂胄面前。如此次数既多，侂胄恻然生怜，终于把他升为同知枢密院事。有一次侂胄庆贺生辰，及之来迟一步，阍人已经上栓落门，及之无奈之下，只得俯偻而入，奴颜之气，令人扼腕。不过，这还不是最典型的。

相比之下，有一位叫赵师的比许及之高明得多了。侂胄尝与众客饮于私园，信步之间，他指着山庄中人工修筑的竹篱草舍道：

“真是一派田舍气象，只是缺了犬吠鸡鸣之声。”

话音未落，丛草之中立时就传来犬嗥。众人趋前视之，原来是师在那里匍匐为狗，侂胄大笑。这一笑给师笑来个工部侍郎的官衔。

群小之象虽不值置喙，但有些事还是颇发人深思。侂胄兴道学党禁最得力的助手是京镗，这个人比侂胄要大十四岁，早年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孝宗初政锐意用兵，群臣大多附合，唯有他主张徐缓图之；高宗驾崩后奉命报谢金人吊丧而出使，京镗以正为上皇服丧之故，在金廷不肯听乐，金人强之，京镗大义凛然：

“头可断，乐不可听！”

但也就是这位京镗，在侂胄欲逐赵汝愚而苦于无计的关口，竟对侂胄说：

“汝愚是宗室之臣，若诬以谋危社稷，则可一网打尽。”

这简直就是杀人而不择手段，与他当年的作为不啻霄壤。在党禁

过程中，京镗也是主要的策划人，对侂胄的襄助甚大。若不是他几年后死去的话，这场政治打击运动恐怕还不会轻易地平息。权力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有些人能不畏刀剑，却不免在欲望面前轻易就范，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朱熹卒于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三月，当朝廷听说朱熹四方信徒可能会齐集信州，为这位道学宗师送葬时，又特别下诏，严饬地方予以约束，禁止彼辈聚会之间妄议时政。结果使朱熹殁后，门生故旧无一至者。但严酷的禁令并不能磨去天下的正义之心，辛弃疾就为朱熹撰写了祭文道：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耄耋之年的陆游也为朱熹的不幸遭遇深表感慨，专门为文祭之并给朱熹以很高的评价。如就两人的思想倾向来说，他们无疑与朱熹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他们并没有因学术观点上的不同而落井下石，这充分表明韩侂胄的政治迫害是相当不得人心的。

执政的侂胄一方显然非常心虚，因为对立一方虽然遭受重挫，但未必就不会东山再起，有报复就有反报复，这是极为浅显的道理。朱熹死了两年后，侂胄方在很大程度上松弛了道学之禁。这是因为在侂胄看来，目的既然已经达到，再在连他自己都不甚清楚的所谓“道学”上做文章，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了。

朱熹去世的这一年十月，侂胄进位太傅。有意思的是，以侂胄的外戚身份是不可能出任宰相的，但他却能将太傅这类荣衔变成实职，从而成为宰相的宰相。这再次说明制度这种东西的虚幻，对聪明人来说，它毫无约束力可言。一个月后，皇后韩氏突然病故，这对于侂胄来说是个不小的损失。次年宁宗改元“嘉泰”，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二月份，侂胄接受了一位党人的建议，突然宣布放宽对道学的禁令，并且先后追复赵汝愚、朱熹两人的官衔，留正、周必大、徐谊等人也渐渐复官还秩，实际上也就是基本停止了这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接下来，一件更大的事情发生，对侂胄后来的人生经历起了重要的影响。

皇后韩氏死去后，坤位虚悬了一年有余，册立新后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侂胄与曹婕妤相善，按他的意思当然是把想把曹氏扶上皇后的位子。但另一位候选人贵妃杨氏却是个有心计的人，不愿束手就毙，与侂胄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较量。就接近于天子来说，杨氏显然比侂胄要得天独厚，控制一位年轻的皇帝，作为女人的杨氏更具备侂胄所没有的条件。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十二月十四日，宁宗下诏立杨氏为后。新皇后奉受册宝的这一天，侂胄也进位太师，封平原郡王。但这却并没有使他感到一丝一毫的兴奋，侂胄知道，宫苑深处已经出现了一个潜在的威胁，他必须赶紧拿出对策来应付这个变故。正是在这个时候，侂胄发现了他真正应该做的事情，几乎是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这件事将会获得的支持和响应，比禁黜道学不啻要高出多少倍。

侂胄之所以在后来作出这个震惊中外的重大决定，主观因素是最主要的原因。侂胄十分清楚，自己这个近幸出身的人很难服众，更无法对付由于大兴党禁而带来的普遍反抗。假如不能建立殊绝的功勋，他也就无法永远掌握天子，因而也就不能抵御新皇后的排斥。就目前形势而言，建功立业的最好方式就是恢复故疆、尽雪仇耻，这一点触目可及。同样，这一件光辉大业所能产生的反响，也是无需判断的。帝国为这件事情已经争论了七八十年，从来也未曾在人们的心目中淡忘，侂胄有理由相信，只要抓住这个东西，登高一呼必然应者如云。有一个事实更是昭然若揭：凡是在恢复大业上有作为的人物，不仅能在当时提高威望，也都能在身后受到广泛的赞誉。毋庸置疑，侂胄想望这样一个结果的心情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强烈。

侂胄是个粗率的人。他对自己当政之后种种专权擅政、恃势骄居的作为从来都不加以掩饰，只是率意放纵、为所欲为。内宴之上，常常会看到他与妃嫔杂坐，言语肆意，无所忌惮；而与曹妃的姐妹们出入宫闱，秽声传于朝外，侂胄也不把它当一回事。侂胄既没有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也不像蔡京、秦桧那样富于心计，因此他从来也想不到自圆其说。只要是能够做到的事，侂胄从不考虑是非，当然也就不会去认真地考虑后果。眼下他最迫切的需要是巩固自己已经得到的地位，为达到目的，自然就会不择手段。

当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年初侂胄匆忙停止所谓的伪学党禁时，他就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十二月份杨氏立为皇后，促使他进一步确立了方针。为此，他开始作出姿态，不仅追复朱熹、赵汝愚，恢复受排斥人员的官职，同时将一大批长期不受重用的人擢升入朝，其中就有一贯主张用兵恢复的薛叔似、辛弃疾和陈谦，甚至包括年近八十的陆游。其中的陈谦还是赵汝愚的门客，因党禁而被罢斥，但因为力主抗战，也为侂胄起复。从这件事情上看，侂胄的用意已非常清楚。到了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侂胄开始进行具体的行动：七月，命殿前司制造战船，出封桩库府钱十万缗；八月，增派战略要地襄阳骑兵；十月，命两淮诸州教阅民兵弩手。种种战备措施已全面展开。

不过，最后促使韩侂胄付诸实施的还是客观因素。

这个时候金国的情形很不妙。

本来，金世宗统御的几十年里，金国的国势已经基本稳定，中原地带也逐渐融合在既成的现实环境中。世宗取法汉制，宽厚治政，在相对平和的态势下使久经战争的国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休养生息，制度文化以及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发展。但与南渡帝国相似的是，金廷上下对怎样维护长治久安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安乐之下，淫逸易生，这个新生不过数百年的民族似乎还是缺乏生存的经验。世宗之后是后来被称为“金章宗”的完颜璟成为金国皇帝，即位后不久，内部的问题就开始渐渐暴露，特别是与中原汉人的矛盾又开始突出起来，成为金廷的一个绝大心病。但最主要的威胁却是来自于它的外部。

得中原者得天下是以不断进取为附加条件的，它是一条进攻之道而并非一个守成之策。金人的窘迫正在于此，它在入主中原之后既未能进而克服南方，相反又面临着北方异族的挑衅，结果两面受敌。对宋朝的休战是个明智之举，使它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北面特别是几个渐趋强盛的游牧之族鞑靼、蒙古两部落，因而取得了初步成果。但自金明昌五年（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起对北方开始大规模的征讨后，金人才终于感觉到用兵再也不像早年一样毫无顾虑了，因为内部

的问题时时在掣肘着它的对外进攻。两年后，契丹人占据信州反叛，远近震动，使得金廷不得不分兵以击；又一年后山东汉人亦纷纷起义，再次给金廷制造了极大的麻烦。此后在边境及境内两方面，这样的事情连续发生，金国政府已是焦头烂额。金人的不幸是因为进驻中原后，它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业已从一个掠夺者成为了反掠夺者。成为中国人是有极大代价的，必须学会付出、学会忍让、学会用精神力量来克服困难。显然，金人尚做不到这一点，历史给予它的时间太短暂了。

暗怀心思的韩侂胄自然不像以前的帝国大臣那样对金敌的情况麻木不仁，在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左右，当不少人将有关情形汇报给侂胄时，立即就促成了他的决策。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正月，除授浙东安抚使的辛弃疾受命入朝，给天子上了一道奏疏，又给了侂胄决定性的影响。

辛弃疾此时已经六十三岁了，但几十年的光阴并没有让他的报国之心和誓清中原之志发生丝毫的衰减。他是一个有眼光的人，即使赋闲家居也没有忘怀国事，一直就注意了解敌国的动向。他与好几位朝廷派往金国的使节有着较密切的交往，从他们那里初步得知了眼下的形势。出任浙东方面的封疆大员后，弃疾又先后派遣了不少人前往北方的河北、山东一带探听虚实，力求掌握第一手资料。弃疾知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他对好友程珌说：

“谍者师之耳目，兵之胜负与国之安危皆系于此。”

弃疾给谍报人员布置了很详细的任务，既命其深入幽燕，也让他们到中山、济南等地详细调查，凡是有关山川形势、官寺位置、兵马数目、将帅姓名都在侦察范围之内。弃疾自己就在山东长大，又历经北方诸地，对反馈的情况有着独特的判断能力。他向程珌出示的一幅战略地图，正是根据各种谍报综合处理而绘制的，它的详实程度，颇使程珌叹为观止。

其实弃疾根据手中的材料所下的判断，对目前的局势并不十分乐观。他私下里就对程珌承认，眼下敌人的士马状况还是相当可观的，绝不能掉以轻心。然而弃疾对恢复大业刻骨铭心般的向往，使他仍然

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而不应白白错过，因此他在给宁宗的奏疏中说：目前敌夷的势态如果继续恶化，金国必乱必亡是肯定的，朝廷可以考虑采取应变之计。弃疾是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的将帅佳选，以他的身份提出这样的建议，侂胄不能不予以高度的重视。

但最后促成侂胄贸然开战的却是刚刚出使金国回朝的邓友龙，他对侂胄说：

“臣出使时有一金国的驿使夜半来见，具言金国业已困弱不堪，王师若来，势若拉朽。”

显然，这是根据一个含糊的事实做出的一个极不负责任的臆断，但赌徒最爱听的就是这样的话。

错误的北伐

所有的舆论准备都是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的。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五月二十一日，有诏追封冤死的抗金英雄岳飞为鄂王，这无疑是侂胄决意用兵的信号。

其实在两三年前，金廷由于担心宋廷方面趁火打劫，就在沿边聚粮增戍，又禁止了襄阳榷场，中断了部分贸易，致使双方边境上的小规模冲突逐渐开始发生。但自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起，挑衅就主要来自宋廷一方，沿边地带的宋朝军民趁着金国的内乱，不断进行骚扰活动，进一步加剧了紧张气氛。湖北节帅吴猎第一个开始筹措军务，在重镇襄阳一带蓄积钱粮、整编军队、构筑工事，率先完成了中路的准备工作。十二月，侂胄创建国用司，以宰相陈自强兼国用使，负责战时经济工作。十一日，下诏明年改元“开禧”，这是取太祖年号“开宝”与真宗年号“天禧”合并而成，其恢复祖业的寓意十分明显。新年的三月份，金人截获了一份宋廷书牒，这才得知韩侂胄已在鄂、岳一带布置了重兵。一个月后，金国边境报告说，宋军已进入秦州、巩州一带，金廷上下开始有所警觉。金章宗一方面命枢密院移文宋

廷，要求宋廷按照两国和约撤出部队，另一方面命平章政事布萨揆为河南宣抚使，集诸道兵马严备。

侂胄采取了瞒天过海的手法。在布萨揆抵达汴梁后，帝国朝廷由三省及枢密院联名具文答复道：边臣生事，已行贬黜，所置兵亦已抽去。前线濠州的两位指挥官也配合朝廷佯示诚意以麻痹对手，他们派了一些当地的老百姓前去汴梁，向布萨揆报告假情报说：宋军增戍，本意是对付盗寇，且军士多为白丁，穷蹙饥疾，死者甚众，根本不能打仗。布萨揆相信了此话，松弛了防备，并把这些情况报告了燕京。

金廷主要的问题是意见不甚统一。尽管有些大臣认为宋廷意图不轨，但更多人认为南渡宋室连遭败衅，自救不暇，恐怕没有胆量叛盟。就整个金廷朝野的意见来说，确实是不愿意再与宋开战，章宗本人也同样是这个意思。于是在得到布萨揆的报告后，这年的八月，下诏罢停了河南宣抚司。九月，侂胄为了进一步探听金人动向，派陈景俊借贺正旦之名出使金国。章宗明确对陈景俊表示，河南宣抚司业已罢停，意在息战。但十二月份金廷派出的复使赵之杰却没有能很好地贯彻金帝息事宁人的主张，入见宁宗时态度倨傲，在帝国朝廷内外引起公愤。次年正月，陈景俊从金廷使还，带回了金帝明确表示的有关双方互不干涉的意向。金人的委曲涵容是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这无疑又助长了侂胄的骄气。

与金廷的示弱相反，侂胄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早在去年六月，朝廷就已秘密下诏给内外诸军，正式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七月，侂胄被加为“平章军国事”，立班宰相之上，三日一朝并赴都堂治事，这就在名义上也完成了韩侂胄的领导身份。侂胄在收纳三省官印于私第的同时，又建立了一个叫“机速房”的特别机构，使战时指挥大权直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到了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事态已是一触即发。

近一年以来，整个帝国上下的气氛极度紧张凝重，大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味。对这件积压心中已久的事情，不少人为之慷慨激昂长吁闷气，但更有很多人惴惴不安，仿佛大难临头一般。当侂胄的开战企图明朗化以后，几乎在帝国的各个阶层都引起了抗议浪潮，最

激烈的是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四月武学生华岳的上书，他在切谏朝廷不宜开兵边衅的同时，甚至要天子斩韩侂胄等人以谢天下。在这种关键时刻，侂胄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行为来阻挠他的大计，于是以强硬的手段弹压反对言论，华岳也被侂胄投入大狱。

道义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一贯主张复仇的丘崈就认为，中国当示大国之体，在金人未必有意败盟的情况下，只能申儆军实以作防备，而不能率先生衅。丘崈为此坚辞了宣抚两淮的职任，在丘崈看来，金人宣抚既寝，我方亦不可轻举。丘崈的这种言论明显是“凡事礼为先”的传统观点，侂胄自然是很难理解的。

在侂胄的坚决态度下，一切都已经无法改变。从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二月开始，侂胄已经不再掩饰，帝国军队开始在好几个边境地带主动进击。尽管宋军起初仍然采取一种昼伏夜出的骚扰形式，但也使金廷逐渐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金章宗在取得殿前大臣的共识后，于三月份重新命布萨揆在汴梁设置行省，分兵屯守要害。

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四月十九日也是一个帝国历史应该记取的日子，这一天，朝廷下诏追论秦桧主和误国之罪，削夺王爵，改谥“谬丑”。制词中有道：

“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认诸人之责！”

这句义正辞严的话让无数人为之一吐积郁，一时都下之口传诵不已。在这一刻，我们的帝国无疑是激动、兴奋而又慷慨激昂的。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侂胄的意料。本来，从四月份开始进兵后进展颇顺，山东京洛招讨使郭倪收复了泗州东西两城，江州都统使许进收复了新息县，镇江都统陈孝庆收复了虹县，光州义军收复了褒信县，只有江州都统王大节在蔡州失利。在形势大好中，侂胄自以为得计，便于五月初七请天子下诏正式对金宣战。岂料下诏之后，两淮一线宋军各部却进击不利，先后在宿州、寿州、唐州遭受重挫。丘崈受命出长两淮后又单纯退守，使得金人由守转攻，于十月份分九道南下。到了这年冬天，中路及东路宋军开始全线败退。此后，就是陕西河东招讨使吴曦于十二月据蜀叛变，使得整个战局急转直下。

吴曦是当年显赫一时的封疆大吏吴璘的后人，其父吴挺官至利州安抚使。吴氏家族世袭兵柄，长期经营四川，号称“吴家军”，南渡四大将之后，也就只有吴家世代为将独守一方。吴挺死后，在丘崈的奏议下，朝廷召回了吴曦而改用他人镇蜀，这使得吴曦甚为不满，回朝后一直在上下活动，想重回四川。侂胄为了拉拢吴曦，答应了他的请求，于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七月命他出任兴州都统制。放虎归山，终成后患。

吴曦节镇一地后便开始收拢军政大权，图谋不轨。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三月份被命为四川宣抚副使后，进一步加紧了活动。战事开始后，吴曦一直按兵不动，并派人赴金以献关外四州的条件求封蜀王。十二月与金人达成了协议，暗中退兵，使金兵长驱直入。侂胄主持下的朝廷中枢对吴曦的不法行为反应十分迟钝，直到次年正月吴曦公开称王之前，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半年不到的时间就证明了侂胄发动的这次北伐根本就是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

侂胄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自认为战局的失利是国无贤才的缘故。为此他在六月罢免了两淮宣抚使邓友龙而改用丘崈后，又处理了数位丧师失地的将领，甚至把他的得力助手苏师旦除名抄家。师旦本是侂胄的门客，北伐前后一直是侂胄在军事上的主要谋士，也是力襄北伐的骨干。侂胄对他的处理固然是为了平复人心的需要，但从侧面也说明苏师旦根本就担负不了克敌制胜的重任。七月份，他又调整了中枢的人选，进而在次年正月罢免了擅自与金兵议和的丘崈而改用张岩，同时自出家财二十万补助军需，然而丝毫无济于事。

确实，正如反对开战的人早就指出过的，目前将帅乏人的情况非常严重。陆游、辛弃疾已老，叶适、丘崈等由于和侂胄观点分歧又不愿合作；而薛叔似临事无方，邓友龙柔弱乏力，两人皆不堪大用。剩下的只能是侂胄手下的一帮党徒，其中陈自强、苏师旦无能，许及之胆怯，根本不是将帅之选。等而下之者如张岩，开督府九月，耗费州县官钱三百七十万缗而未立寸功。至于叛贼吴曦则更不用说了。所有这些，都证明了帝国在人才方面的无奈现状。不过，这还只是事情的

一个方面而已。

决定性的原因是帝国实在是没有能力去打赢这场战争。大的因素不论，侂胄的准备就显得过于仓促，疲敝的士气和骄惰的兵卒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五月份攻宿州时，士兵乍遇暑潦就怨声载道，全无军纪，到符离后，金人本欲投降，而当地义军业已登垣肉搏，岂料官军反而妒忌其功，以箭射之自相杀戮，守城者于是不降。至于攻击不利后，更是兵败如崩，溃卒满野。如此军队又岂能与敌开战！

侂胄的用兵动机也注定了他必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金兵在短短数月的时间里就能发动反攻，证明了辛弃疾的判断不误，敌人尚还没有达到完全崩溃的程度。叶适在侂胄决心下诏宣战时就坚决拒绝了草拟诏书的任务，他在给天子的上书中忧心忡忡地预言说，如果认为“虏已衰弱、虏有天变、虏有外患”而轻率冒进，将是一个“至险至危”的事情。当然，侂胄是绝对不可能接受这一说法的。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归结到欧阳修的那句老话上去：如果自身不具备实力，并不一定能够乘人之危。何况敌夷尚还没有困危到让你有可乘之机的地步。

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初，由于内外交困特别是来自北方的压力越来越大，金人在取得胜利后便已经有意乘势收手。二月份，吴曦刚刚称王没有几天就被部将所杀，更使金章宗感到十分沮丧，议和之意遂定。对金国来说，对宋休战虽然是目前形势下唯一的选择，但它毕竟拥有胜利者的身份，就像以前一样，金廷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八月，宋使方信孺从金营使还，带回了对方的要求。

第一是割两淮，第二是增岁币，第三是索取归正人，第四是犒赏军银，第五——方信孺说：“第五条臣不敢言。”

侂胄坚持要他说，信孺只好嗫嚅而道：

“这第五是要太师的人头。”

侂胄气极而晕。

这当然是不可能答应的。事到如今，侂胄已经没有退路。如果说

他当初是为功名地位而赌博的话，现在则是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战了。几个月不到，侂胄须发皆白。

九月初六，无奈的侂胄只得起用辛弃疾，发布诏命委任他为枢密院都承旨，希望能用弃疾的威望和才略挽回颓势。弃疾虽力主恢复，但他并不同意仓促开战，更不愿意与侂胄同流合污，所以一直被侂胄排挤在外。诏命到时，弃疾已经是重病在身，有心杀贼也无力回天，只有上表自辞，四天后即赍志而殁。九月十八日，侂胄以赵淳取代了九个月以来毫无作为的江淮制置使张岩；十月十三日，又促使天子下诏，借罪己而鼓舞士气民心，但败局已定，临事更张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侂胄身边的党派集团是因为相互的利益才和他走到一起的，既然这个目标已经不可能达到，侂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事实上，当敌人指名单要侂胄的人头而不问其他时，侂胄的末日就已经到了。

出身名门的礼部侍郎史弥远是京镗的心腹，素与侂胄有隙，也并不赞成侂胄的北伐。这个人工于心计，也颇有点干才，属于那种不甘趋人之后的类型。由他来成为侂胄的掘墓者并不是一个偶然。

大约是在十月底或者更早一些时候，史弥远秘密上奏宁宗，以兵兴以来士民涂炭、公私大屈为由，请天子诛杀侂胄。当时宁宗听罢不语，天子既有些不甘就此罢休的想法，同时多少也有点顾虑，毕竟侂胄不是一般人。但皇后杨氏得知后，马上就抓住这个机会。

杨氏先让皇子荣王赵曮去说服皇上，不果后又请出她的哥哥杨次山劝驾。杨次山明白宁宗的心意，因此对天子保证说，不妨选择可以信赖的大臣共同举事，这才使得宁宗的心思开始活动。次山见天子已经有意，马上返报皇后。杨氏令其择廷臣可用者，次山选择了史弥远，而弥远欣然奉命。杨氏自出御批二件，一份给史弥远，一份给左司郎官张镃，密嘱他们立即行动。不过，皇后这时并未确定一定要杀掉侂胄。

有了天子的默许和宫中的支持，弥远已无后顾之忧。他挑选了两位大臣作为重点争取对象，一是钱象祖，一是李壁，这两人都是侂胄

的党徒，时下皆身为副相，特别是李壁，虽然对率先用兵心存顾虑，但最后还是迎合了侂胄之意，对金人的宣战诏书就出自他的手笔。如果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事情就成功了一半。弥远先去说服钱象祖，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在某些方面与侂胄发生过抵触。果然，钱象祖一拍即合，由他出面，李壁也毫不犹豫地成为了倒戈者。此事本极隐秘，惟主谋者史、李、钱数人知之。

十一月初二，侂胄在都堂对李壁道：

“听说有人要生变，公知此事否？”

李壁以为事情泄露，吓得面红耳赤，话都说不上来了。

“……恐怕，没有……没有这样的事吧……”

弥远听李壁说知此事后也十分惊恐，两人立即找到张镃，张镃道：

“势不两立，不如杀之以绝后患。”

史、李颔首同意，弥远拍案对张镃道：“君不愧为将门之后，吾计已决！”张镃是南渡初期大将张俊之后，正如弥远所说，倒也真有些乃祖之风。当年若没有张俊，秦桧也未见得就能杀掉岳飞。

史、李又急趋钱象祖府第。钱象祖认为应当奏明皇帝，而史弥远、李壁均担心事情从缓会导致败覆，主张就在翌日进行。三人最终订下了计划，命令殿前司公事夏震领兵三百人埋伏在侂胄上朝的必经之地，伺机擒杀。

十一月初三，侂胄像往常一样怀着重重心事上朝，走到六部桥时，夏震率手下人拦住轿舆，厉声道：

“有旨，太师罢平章事，即日出朝！”

“有旨吾如何不知？——”

侂胄话音未尽，夏震等即抢上前，将侂胄轿乘向宫外拥去，走到玉津园夹墙中，不容侂胄分辩，一阵铁鞭乱棒将他毙命。

当史、钱两人向宁宗报告侂胄已诛后，天子还不敢相信，当确凿

无疑的事实摆在他眼前时，我们的天子不能不在心底倒抽一口凉气。在宁宗看来，眼前这个满身杀气的史弥远，与那位霸道十足的韩侂胄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初五，陈自强罢相，贬永州居住；初六，苏师旦贬韶州安置，第二天被杀。几天后，邓友龙、郭倪、郭僎、张岩亦相继被贬。反戈一击的李壁因为主战的缘故也未能脱离干系，被贬抚州安置。

第二年，帝国改元“嘉定”。

雾失楼台：独裁、专权与腐败

无论韩侂胄是怎样的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他能在帝国久习安逸之后，毅然仗义复仇，下诏伐金，在道义上并没有错。至于说到客观上的败势，那是帝国衰敝的现实所决定的，不能由侂胄一人承当。侂胄的不幸在于他的动机既不纯净，而判断又发生失误，在错误的时间里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从这一点上说，他只是个失败者，但绝不应是一个罪恶者。然而我们帝国的新贵们，却在敌夷之辈的凭空要挟下，竟真的就把他的首级拱手相送。

靖康时李纲力主抵抗而深为金人所恶，朝廷也只不过是将他罢官免职。秦桧和议之心可谓坚矣，但也未至于把岳飞送给完颜宗弼。如今侂胄不仅毙命棒下，而且已盖棺入土，可在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三月，朝廷仍然授命临安府斫棺取首，枭之两淮，此后又将侂胄、师旦之首付使送至金营，以交换淮、陕失地。可以说，韩、苏两人的头颅完全是附加的，帝国政府并没有因此而能拒绝金人增岁币三十万和一次性赔款三百万两的休战条件。

金人起初的索首之言当然不过是一种离间，与宋作战有年的金人非常清楚这一手段的效果，但他们也未必想到宋廷真的会送来侂胄的首级。年初议和时，金帅完颜匡就问过宋使王柟，对宋朝方面能否去掉韩侂胄表示怀疑。直到侂胄的死讯传来，完颜匡这才重提侂胄首级

的事情，岂料王柟竟一口答应。在帝国朝会上就此事表决时，也只有一位大臣站出来说这事有伤国体，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都表示赞同。吏部尚书楼钥的话说明了一切：

“和议重事，待此而决，奸宄已毙之首，又何足惜！”

确实，当和议能够避免灾难时，天子可以下跪，土地可以割让，人民可以委弃，金帛可以资敌，则区区一个奸佞之辈的首级又值几何呢？！当政大臣史弥远之流完全有理由为秦桧被侂胄谥为“谬丑”而感到愤愤不平，早在三月初四就已经由天子下诏恢复了秦桧的王爵与赠谥。朝野公议对他们来说无足轻重，因为议论毕竟是议论，与金人的劲马硬弓相比，作用实在是太小了。重要的是金国如果能休兵罢战，帝国的政权就不至于发生危险，而统治者的利益也就能得到保证。侂胄既然愚蠢到连这一个浅显道理都不懂的程度，他也只能落下个身首异处的结局。

五月初，王柟将韩侂胄、苏师旦的首级送至燕京。初九，金章宗御应天门，备黄麾立仪仗受之，百官上表称贺。接下来悬两人首级并画像于通衢大道，令百姓纵观。此后漆此二首，藏之军器库，成为永久的战利品。仪式完成后，金帝问其大臣右司郎中王维翰道：

“宋人请和，复能背盟否？”

王维翰答得好：“宋主怠于政事，南兵佻弱，两淮兵火后，千里萧条。其臣惩杀韩侂胄、苏师旦，无敢执其咎者，其势实不足忧。唯有北方当劳圣虑。”

真是一语中的。

金人的胜利本身就很勉强，衰敝的国势更不容许它继续支撑战局。早在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初，重要统帅布萨揆就已经死于军中，九月，左丞相兼元帅崇浩亦相继而殁。宿将凋零，金廷举朝惴惴，生怕宋人乘势反悔。和议能够达成，金人实在也是长吁了一口大气。而北方的情形更趋严重，新兴民族蒙古已在朔漠草原中崛起，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十二月，铁木真称帝于斡离河，号曰“成吉思汗”，翦灭诸部，攻入灵州，势力渐盛，不能不给金廷以巨大的震

慑。后来的事情证明，假如韩侂胄能迟至两年或三年后再发动北伐，结局将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与侂胄在很多方面颇有一致的宁宗天子为这场北伐最后下结论道：

“恢复岂非美事，只不过未能量力而行罢了。”

世事无情，即使痛心疾首后悔不迭也不能使它重新轮回。侂胄轻率的开战导致失利，实际上就已经使朝廷永远失去了恢复祖业的机会。更严重的是，当韩侂胄被枭首委敌后，所有的正义感和原则力量已经被彻底践踏。灾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与理念的丧失。我们的帝国依然任重而道远。

史弥远在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正月知枢密院事。任命下达的那一天，朝中唯一反对过将侂胄枭首授敌的大臣——权兵部尚书倪思入对，建议天子注意收归权柄。倪思暗示，侂胄虽诛，但枢臣犹兼宫宾，不时被宣召入宫，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所谓枢臣，指的就是史弥远。刚刚被召回朝中的吏部侍郎娄机也向天子指出：如果权臣私意横生，必将败国殄民。娄机虽没有指名道姓，但谁都明白他的话并不单单是针对韩侂胄而发。但这些都没能影响到史弥远在这年的六月入兼副相。不幸的反而是倪思，因为指责弥远的缘故在八月份离朝出知镇江府。

十月份，朝廷中枢机构的人事调整告一段落，钱象祖为左丞相，史弥远右丞相，雷孝友知枢密事，楼钥同知枢密院事，娄机参知政事。一个月后，史弥远因丁母忧去职归治丧事，但第二年五月就起复为相。这是因为太子——也就是与皇后一起力主清除韩侂胄的皇子荣王赵曮，他在韩侂胄被杀后入为储副，初更名为“帱”，后更名为“询”——一力建议的结果，他专门为此请示父皇，请求赐第弥远，让弥远在临安宅第中持服，以便时时咨访。这样的理由冠冕堂皇，太子现年十七岁，正是应向宰辅大臣们学习的年纪。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韩侂胄的一批老部下秘密联结，准备埋伏在钱塘江边的浙江亭附近，俟弥远起复回朝百官迎谒之时，举火为号，尽诛弥远以及宰执大员，然后突入大内挟下诏书。不幸的是这个政变计划被人告发，为首者罗日愿凌迟于市。弥远又专门上书宁

宗解释此事道：“陛下昨诛元恶，臣获密赞，故其余党切齿。”天子尽管优诏抚慰，但弥远心里还是有些不安，他不可能不为侂胄余党可能的报复而感到担心，这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弥远开始为加强自己地位而做进一步的努力。娄机在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十二月退休，一年以后，曾在诛韩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张镃被除名置象州羁管。张镃的罢职来自于弥远的弹劾，罪名是“扇摇国本”，但似乎没有丝毫的证据。从此时开始，弥远的权威不用说已经是相当可观了。

弥远的优势同样是与宫中的联系。他出入宫禁旁若无人，早已使外议哗然，当年倪思上书还很含蓄，而朝野闲话则明确说他表里杨后，可与历史上的武三思相比。传说当然未必如实，但弥远颇有倚仗杨后之处则是不言而喻的。弥远和东宫太子的关系更不是个秘密，与诸亲王皇子也都有交往。他不像韩侂胄那样是个外戚，因此在这方面尤须花费相当的功夫。弥远显然比韩侂胄要聪明许多，否则以他的资历和能力，要建立强劲的势力是不可想象的。

近五六年内帝国处于相对安逸的状态，除了境内间或有些流寇作乱外，外部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警报。金人一心对付蒙古，因此守持和议十分严谨，使天子和帝国政府感到由衷的欣慰。两淮一带虽然尚欠生聚，但对朝廷来说，只要四境安宁就是一个最大的满足。当然也有忧患之士，比如江陵镇守赵方从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起就开始在守地整治战备，既增修三海、八匮以壮山川形势，又在荆门东西两山中构筑堡垒以守遏冲。赵方坚持认为：金人北逼于蒙古，必会南迁。事情不幸为其言中。

在蒙古骑兵风卷残云般的扫荡下，金廷连年战败。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三月，又发生内变。原西京留守胡沙虎弑杀金帝完颜永济，拥立升王完颜珣即皇位，史称“金宣宗”，此时金国已无力再战，遂向蒙古求和屈服。蒙古人尚未摆脱那种旋战旋走的游牧民族固有的秉性，因此在得到相当的收获后便退出了居庸关，返回北方。金廷得以喘息后，宣宗眼见中都燕京实在守不住，便于这年的五月十一日下诏南迁汴梁。

金廷放弃北方固然是个无奈，但正如当年宋廷南渡一样，选择退

避路线并不能挽救失败的命运。迁都南来，实际上就意味着把广袤的关外土地拱手资敌，既丧失了立国的基础，又大大地动摇了人心，百弊而无一利。从战略上讲，燕京固然近敌锋镝，但汴梁四战之地易攻难守，又岂是疲敝之国安身立命之处！当时就迁都问题进行辩论时，有不少大臣就主张迁往山东或者辽东，但宣宗皆不接纳，一意孤行南迁汴梁。金廷的南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逃跑，但却又一次给我们的南渡帝国带来了祸患。事情很明显，当金人受逼于蒙古而无以自处时，它必然会在宋国方面打主意，这两个同样衰颓的政权之间的争斗又将不免。

对此，临安政府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七月，迁至汴梁的金宣宗遣使南来督促宋廷交纳两年的岁币后不久，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建议罢停岁币，修固两淮。他的理由是“此时当乘虏之将亡，亟图自立之策；不可以虏之未亡，姑为自安之计”。宁宗纳之，遂宣诸朝廷商讨。

淮西转运使乔行简不同意这个说法，他在给宰相的上书中认为：蒙古之势可忧，在这种情况下，金国就不再是仇敌而成为屏障了，因此“宜姑与币，使得拒蒙古”。

朝廷上下议论不决。

两种主张虽各有各的道理，但无疑都不可能达到效果。金国衰败之象已趋明显，它根本无力对抗强大的蒙古军队。既然其已必亡，对我们帝国所可能起到的屏蔽作用便不可能长久，贻送其资，岂非徒劳。但是，罢停岁币则必使金军南侵，以帝国目前的状态，绝难有必胜之机。事物的矛盾往往就在于此，越是无法选择，越是必须选择，岁币问题当然是个细节，但怎样应付目前的时势，却是帝国务必解决的难题。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五月，金中都燕京陷入蒙古，河北地区也随之不保，此时金国的状况，已到了和当年辽国的遭遇如出一辙的地步。真德秀在嘉定九年（公元1216年）十二月向宁宗指出了这一点，他告诫天子“宜以政和、宣和为戒”，这就是说，绝不能再像徽宗皇帝那样麻木不仁。

经过激烈的争辩后，金廷终于在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四月份左右发动了南侵。

这一决定是否明智，很难一概而论。但就金国的困窘来说，选择与宋开战是唯一可行的方针。当时河北已失，山西、河东剽掠严重，各地流亡齐集河南，衣食都发生困难。另外，北面压力未减，四地暴乱不绝，局促于中原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假如能成功地向西部和南方扩地立国，这对于金国不失为一个克服危机的办法。当然，能否成功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临安朝廷只有仓促应战，在这年的六月下诏伐金。此次战役中，准备充分的襄阳方面统帅赵方首先立下了大功，在中路抵住了金人的强攻后进而反击，在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年底彻底击溃了来犯的金军。淮东方面也有相当大的胜利，在这年的三月大败金军，使金人此后六七年内不敢再窥淮东。不过，西南战线的情况不妙，大散关两度失守，使金军连破诸州，抢掠甚夥。但就整个战线来看，宋军的防守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为今后的战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后从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至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近四年中，金国一方面抵抗蒙古和西夏的两面进击，一方面不断向西、南猛攻，明显已是最后挣扎的态势。然而由于财用不济、军势已弱，加之三面作战的窘迫和内忧外患的困扰，金国连年征战毫无所得。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三月不得不与宋停战。

我们的帝国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是最好的反映，开禧北伐本就耗资无算，而长达七年的往复交战又大损物力，到嘉定后期，帝国的经济情况已经非常不妙。南渡以来的现实本就是土地日蹙、赋役日重，人民伤败而官僚富腴，尽管理财实质上就近乎聚敛，但帝国还是无法遽得财力以应付战时的需要。当年的韩侂胄甚至自出家财二十万资军，可见国用的艰难。因此无奈之下，也只有饮鸩止渴，以增发楮币筹措军费，嘉定用兵期间，政府发行纸币竟达一亿四千万贯。通货膨胀，物价腾踊，其对经济民生的摧毁程度，是无法言喻的。

如果政治上再不思振作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史弥远“擅自废立”的真相

当朝宰相史弥远的心思显然不在处置国事上面。身为宰辅，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竟没有丝毫的建置，虽倒也无可置论，但嘉定后期帝国战事方殷，朝廷上下议论攻守和战时，宰相甚至一言不发，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异。不过，如果认为弥远在整个宁宗后期所做的事情就是领衔修书，不断奏上宝训、会要的话，却也未必如实。弥远自有他的事情要做，而且十分投入。

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八月，皇太子赵询不幸夭折是事情的关键。

宁宗后宫一直没有生育。早在即位不久的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天子便诏育太祖后人燕懿王赵德昭的九世孙于宫中，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底诛韩侂胄后立其为皇太子，这就是赵询。可惜的是赵询天不假寿，致使帝国的储位又成为了一个问题。一贯缺乏主见的宁宗在这个时候却自作主张，故伎重演，下诏在宗族中选择合适的人选作为太子，条件是太祖的十世孙，年满十五岁以上。天子的这个做法从道理上来看似乎无可厚非，而且也有先例可循，但实质上是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原因是储位之所以成为国家的根本，就在于它的唯一合法性。天子无嗣而不得已选诸宗室，这本是一种无奈的做法，因此必须明辨是非，审慎抉择，绝不能贻人以口实。宁宗的错误在于他的标准并非唯一，太祖十世孙中年满十五岁者绝非一人，这就注定了事情必然会给人造成可乘之机。

史弥远明察秋毫，立即就发现这是个十分有利的机会。弥远很清楚自己与杨后的关系并不是可以长期依恃的，当年之所以结成联盟，不过是在对待韩侂胄的问题上达成了互利的共识而已。假如不能拥有太子，就不能掌握未来，以弥远的聪明，当然不可能不意识到这一点。

为史弥远寻找人选的亲信余天锡颇费了一番周折，原因是弥远的想法非常独特，他根本就不想去找一位真正的宗室之子。弥远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并非是为宗庙社稷着想，自然会从尽善尽美的方面去考虑问题，这似乎并不奇怪。余天锡踏破铁鞋，终于在越州绍兴有了收获。他向弥远汇报道，越州西门一位保长的两位孙子相貌独特，在当地被认为是大贵之人，也许可以作为候补人选。弥远当即嘱使天锡招来一观。

于是天锡返回越州具告这位保长，保长大喜之下，竟然隆重其事，赘产鬻田，治衣宴客，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两位孙子送到临安。这种有可能走漏风声的做法虽然使弥远很恼火，但他也为两兄弟特别是哥哥赵与莒的贵人之相大为惊奇。弥远善相，为此也十分自负，因此最终拍板定计。诡秘的行为之所以往往会掺杂些神异的色彩，这是因为它具有一种增强自信的客观作用。但弥远表面不动声色，立时又把两人送回，这使得一心以为福从天降的保长在姻党乡人之前丢尽了面子。但弥远的目的却达到了，他在一段时间后派遣余天锡秘密地将赵与莒接回临安，改名“贵诚”，对外宣称为宗室之子，以供皇子之选。

但他的努力不幸落空，赵贵诚的大贵之相没能打动天子。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的六月，原宗室赵希瞿嫡子，入继已故沂靖惠王赵垓嗣子的皇侄赵贵和被选中，立为皇太子，更名为“竑”，而弥远荐来的所谓宗室子赵贵诚只被补为“秉义郎”，代替入为太子的赵贵和入嗣沂王。很明显，赵贵和的入选是宫中势力一意促成的结果，在太子册立的当时就有大臣指出了这一点。如果像建储这样的国家大事都不能断自宸衷而眩惑于左右近习与不法之臣，无疑是相当危险的。弥远同样为此感到忧心忡忡，当然他的出发点与别人迥乎不同。

新太子好鼓琴，弥远马上就在民间买了一位善琴的美女献于东宫，他以厚廪其家的条件，指使美人侦伺太子。弥远强调，东宫的一举一动都务须立即报告。这位美人没有辜负弥远的重望，凭着色艺俱佳而且知书慧黠的素质，立时就得到了太子的宠嬖。

消息很快就传来了，原来太子对宰相的态度近似于痛恨。美人报告说，平日太子就经常在桌几上书写宰相专权的罪恶，进而有一次指

着地图中的琼、崖一带对她说，他将来得志，必定要把史弥远放逐到这里去。美人虽是女流之辈，但也知道琼、崖恶州乃是天涯海角之地，历来是贬逐奸恶的极限。惊讶之余，立即就告诉了宰相。

弥远这一惊非同小可。他万万想不到太子对他的厌恶竟会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此时的弥远显然为他在立储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十分后悔，如果早知道结局如此，他是绝不会让这位皇子就这么顺利地入居东宫的。现在事实既成，任何补救措旋都已经为时已晚，唯一可做的就是寻找一个根本性的解决方法。弥远不怕冒险，也并不顾忌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无毒不丈夫似乎是弥远一贯的信条。成功地杀掉韩侂胄锻炼了弥远的谋略和勇气，他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太子把弥远逼到了痛下辣手的地步，为身家性命计，即使是再懦弱的人也会狗急跳墙，更何况把持了十几年朝政的当朝宰相！

弥远第一步考虑的当然是改易太子，为此他在净慈寺中的惠日阁秘密约见了国子监学录郑清之。弥远选择郑清之是有道理的，这个人既是他的同乡，关系也相当不错，肯定不会拒绝他的请托。弥远考虑的另外一点是清之时任清要之官，不太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弥远道："太子不堪负荷，而入嗣沂王者甚贤。吾有意择君为讲官，深望君能善启迪之。"

这一句话就已经再明白不过了。现时的沂王嗣子是宰相所荐，举朝皆知，清之当然立刻就省悟出宰相的深意。

弥远欣然："事成之后，弥远之位就是君之位。不过话只能出于我口，入于君耳，若有一语泄漏，就是灭族之祸。"

清之如何不知，连道"不敢"。

世事变化之快超出弥远的预料，当谋废太子的行动尚还没有什么眉目时，宁宗天子就已经病重不豫了，时间是两年后的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八月中旬，与金国停战五个月后。

弥远得知消息后立即就让郑清之前往沂王府，转告拥立之意。但出乎清之意料的是，赵贵诚听后竟然沉默不语。清之十分着急：

“丞相使清之从游殿下，相布腹心，今殿下不答一语，叫清之如何回复丞相一片苦心？”

贵诚听罢此语，拱手而言：

“绍兴老母尚在啊！”

这位骤取显贵的沂王显然是个极懂事理的人，他不是没有胆量与史弥远共图大事，而是明白福兮祸之所伏的道理，知道这一去前途未卜祸福难料，弄得不好就是满门抄斩。赵贵诚虽然不为自己担忧，也不能不为高堂老母着想，我们这位未来的天子似乎还没有利令智昏，在这种是非关头多少还能保持一些平常人的本心。不用说郑清之感到诧异，就连弥远听后也是感慨了一番。

然而事态已不容许退却，八月二十七日，宁宗在福宁殿驾崩，时年五十七岁。弥远没有为沂王的犹豫所影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的计划。杨后兄长杨次山的两个儿子杨谷、杨石继其父之后成了弥远新的帮手，他们一夜七次往返于掖庭，劝说皇后支持弥远，但杨后始终不答应。两人最后在皇后面前痛哭流涕道：

“事已至此，若不立沂王，杨氏一族必无遗类了！”

直到这时杨后才终于明白事情不是她一人之力所能改变的，史弥远既有心于此，当然也就有必胜的把握。至少她已经从两位侄子口中得知，殿帅夏震又一次地站到了弥远的一边。既然现在的问题不是宗庙继嗣是否合理，而是杨氏一族的安危与否，皇后已经没有选择。杨氏沉默了许久，终于缓缓而道：

“其人安在？”皇后显然还不太清楚沂王赵贵诚究竟是何许人。

殿下的史弥远立即嘱人速宣沂王，同时郑重叮咛：

“所宣者是沂靖惠王府皇子，不是东宫皇子，如要弄错，回来就把你们全部处斩！”

太子也听说了皇帝驾崩的消息，他还不知道大祸将临，犹在居处等待宣召。但久候不至，也感到有些奇怪，便到门口张望。隐隐之间，似乎看见有宫使簇拥一人疾驰而过，但天色已暝，不辨何人。太

子十分疑惑，径去皇后宫中询问。

杨氏没有多说，只是拊着他的背道：

“你现在是我的儿子了！”

太子太过于懵懂了，直到最后被召入举哀时，他仍然没有明白过来。当烛影之中最终看到赵贵诚坐在御座之上后，太子犹还犯起倔强，坚不肯拜。这种人没能成为天子是必然的，被人如此轻易地玩弄于股掌之上，注定了他即使入继大宝，也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

新帝是帝国历史上第十四位天子，后来的庙号为“理宗”。理宗最后在赵氏宗庙里占据一个牌位是十分滑稽的事情，因为他与赵氏宗族实在是毫无血缘关系。以本朝礼制谨严的程度，居然也没能避免这种悲剧，实在是令人沮丧。当然，事情能够成功最根本的因素是其中的奥秘尚不为人所知，也许除了弥远与新天子本人之外，就只有那位余天锡知道。最危险的往往也就是最安全的，弥远可谓得之。

十一月，诏改明年为“宝庆元年”。

太子于新帝即位当时被改封济王，出居湖州。权臣操纵废立如此明目张胆，这同样是本朝近三百年以来的首例，尽管朝野上下为这种恐怖行动所震慑而一时噤若寒蝉，但举国为之不平是非常明显的。当济王来到贬地湖州后，当地人潘壬与其弟潘丙、从兄潘甫把不满情绪付诸实施，他们与一位归附朝廷的义军首脑李全联系，准备谋立这位已被废黜的太子。

李全是山东潍州北海人，长于骑射、枪法高明，人称“李铁枪”。嘉定末年夫妇二人率众起义于山东，连破金兵，被朝廷授以武翼大夫、京东副总管，此刻驻扎在淮东一带。此人手中有些兵马，一直欲有所图，因而对史弥远的专权不堪顺从。潘氏兄弟的行动当然颇合他的心意，但李全为人狡猾，表面上答应了潘氏兄弟南北呼应共举大事，但实际上却按兵不动，准备坐收其利。新年的正月初九，久候李全军不至的潘壬担心事泄，遂以其党人及盐贩共千余人起事，他们打扮成李全军的装束，扬言自山东而来，乘夜突人湖州州城，挟持了济王赵竑。当潘壬等人揭榜城门历数史弥远罪责，并号称有水陆大军二

十万时，湖州举城为之震动。但天明之后人们发现，所谓二十万大军竟全都是太湖渔民和一些地方巡尉之卒，不禁大大失望。很明显，潘氏兄弟这群乌合之众成不了大事。

李全的阴险是事情无成的一个方面，另外济王的不肯合作也是使这次拥立行动落败的原因。这位原太子在这个时候又一次显示出他不堪托付的庸人嘴脸，遽闻有变，竟匿于水窦之中，此后被潘壬发现而以黄袍加身时，仍号泣不从。最愚蠢的就是他竟向朝廷密报虚实，尚还幻想着能够侥幸得免。殊不知事情既然发生，他就不可能摆脱干系，潘壬兵败后，弥远借口济王有疾，派门客挟医赴湖州诊视，借机将他缢杀。

潘氏兄弟的反叛行为不可能得到公开的支持，但济王的死却可以让朝廷的反对派得到了一个突破口，起居郎魏了翁、考功员外郎洪咨夔相继上书为赵竑鸣冤，而真德秀则以此事联系目前的现实，向新帝具言治道之要，力请天子选贤任能、重振朝纲。德秀是一个时期以来朝间唯一能有所建言的大臣，他虽没有指名抨击过弥远的专权，但他也一度以挂冠而去表示自己的不合作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德秀在上疏中明确提出要天子起用一些耆老之辈，就已经有点与弥远公开决裂的意味。到了这年的五月，进士邓若水在所上封事中就开始力斥史弥远之奸，甚至用了“弑”、“篡”、“攘夺”的字眼。“封事”就是密封的奏章，是群臣禀奏机密的一种方式。但这种皂囊封缄的东西依旧不能越过弥远的耳目，他不仅记下了邓若水的姓名，而且用浓笔将书中的激烈措辞一概抹去。当然抹与不抹都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因为天子显然不会被这种言论所左右。六月，弥远加太师衔，封魏国公，柄国专权钳制内外，任用爪牙销铄正人，与当年的秦桧、韩侂胄已无二致。

毫无疑问，弥远虽然在嘉定年间当了十几年的宰辅，但真正得志是从理宗即位开始的。如果说秦桧反映的是人性之恶，而韩侂胄是人心之躁的话，则弥远无疑可以说是人之淫逸骄奢的最佳代表。整个宝庆和后来的绍定年间的现实是外部风云激荡，而内里积弊丛生，但这都被他的狡黠而一一掩盖。与前此所有的权臣所不同的是，弥远从不在国家大政上做任何决策，因而就避免了由于国事措置不当而引起的

外力影响，这也许是他从韩侂胄那里得到教训的缘故。在他看来，天子既已在自己的手中，除了尽情享受这份美妙之外，又何须去做其它。

新帝理宗先天不足，这位起于民间的年轻人无法在很短时间里完全适应身份的变化所带来的那种变化的环境，自然也不可能骤然就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皇帝，显然，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当然，天子也没有必要推翻他与弥远达成的协议，从道义上说，他还必须为弥远的再造之功和拥立之德尽自己应该尽的义务。事实证明，理宗很好地报答了弥远的恩情，在此后的八年中把朝政完全交给了弥远。在这段时间里，帝国的新一代天子极为理智地把自己巧妙地藏在了幕后，他知道只要史弥远存在，自己就必须等待，这不是单单的知恩必报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保存自己的唯一选择。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的十月二十四日，因为在这一天，宁、理两朝为相共二十七年的史弥远终于撒手人寰。第二年，理宗改元“端平”，是为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

即使天不寿祚，堂堂大国的败亡也绝非一日所能致。然而南渡以来退守自保不过百年，其中韩侂胄恣意妄为了十年，史弥远又浑浑噩噩了二十有七年，三十七载的岁月，岂堪蹉跎？

奸臣：翻不过去的篇章

史弥远死后，有一种舆论开始抬头。相当一批官员们提出，天下安危系于宰相一身并不是件好事，群臣养交而天子孤立则更是不可容忍。最典型的是时任礼部郎中的洪咨夔，他认为权归人主实际上比政出中书要重要得多。这位在史弥远当政时期曾一度上书抗言的大臣从内心里对大权独揽的宰相并不抱有好感，他在给理宗的奏疏中总结道：中书之臣弊端之大者有四，一是自用，二是自专，三是自私，四是自固。因此他强烈呼吁天子必须将威福操柄收还掌握，使天下在知有朝廷的同时“知有吾君”。

这种思想倾向渊源有自，韩、史以来权臣用事的经验教训太深刻了，它不能不使人们有所警觉。然而，对执政者抱有太大的期望总是十分危险的，对宰相如此，对天子更是如此。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十月史弥远死后，理宗亲政，一反过去的沉默无为，改元更化励精图治，一时确有革新之象，但仍然没能改变帝国政治的恶性循环。

天子的毛病正在于矫枉过正。八年的刻意修炼使他逐渐对天子之道有了深入的理解，史弥远的擅权更使他有了一个强烈的比照，因此理宗亲政之后立即表现出一种唯我独尊的基本态势是不奇怪的。在朝野舆论的影响下，天子甚至于一度对朝堂宰执们持有一种强烈的怀疑态度，表现在用人方面，往往是除擢既骤，去之亦亟，任之不专，信之不笃。可见，帝国的制度不能保证折中妥协这一根本政治目标的实现，权归人主就很难做到政出中书，反之亦然。

郑清之这位史弥远操纵废立的帮凶和天子藩邸时的老师，是理宗亲临朝政之后的第一位宰相，他响应了天子更化政治的号召，以廉俭清明的作风独树一帜，并召回了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徐侨、尤焴、游似、洪咨夔、杜范等一批老成持重之士，一度使天下翕然相望。然而维新之象并没有持续多久，自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五月真德秀去世，十二月魏了翁出朝后，这一大批正直之士又被轻易黜去。走马转蓬的朝廷宰执们相互之间门派林立，议论纷纭，而全无实效。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圣明天子扬廷出令，震撼海宇，又有何用？

短短七八年里，天下已经大变。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年底，宋与蒙古达成协议联合攻金，终于使金国土崩瓦解。先是蒙古军在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正月攻克汴梁，接着宋军于这年四月大败西逃的金军残余，收复邓、唐数州。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正月，宋、蒙两军合攻中原腹地蔡州，金室最后两位皇帝一无奈自杀，一死于敌军，金国灭亡。历史惊人的相似，正如真德秀所预见的那样，与宣和末年联金灭辽后极为相同的问题又一次摆在了帝国政府的面前。然而历史教训却没能影响宰相郑清之，他还是接受了分任京湖、淮东制置使的赵范、赵葵兄弟所提出的建议，主张乘金国之亡抚定中原，进据河关以抗蒙古，又一次走上了老路。

如果理宗稍微认真地考虑一下朝廷上下的不同意见，本来是能够避免这个错误的。当时朝堂之上也只有郑清之一人力主其说，从宰执大员到其他方面的统帅甚至包括赵氏兄弟的部将，都异口同声表示反对。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兵兴于外不能解忧于内，所得绝对不抵所失；二是内地的现实和国势确已不堪再战，北方既未能图，南方或已骚然。这些意见来自许多有经验的朝官和前线的封疆大吏，反映了内外两方面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不是空论义理一味求安的懦弱之论。另外，从战略上考虑，用兵的谬误也显而易见，正如淮西总领吴潜所说：兴兵收复河南，“取之若易，守之实难”。若得而不能守，谋据河关岂非空谈？

然而天子的想法是“和不足恃”，这是他当初亲政时就已经牢牢树立的信念。当然，“和”是不足恃，这也同样是帝国血泪历史的经验总结，但这却不意味着一味冒进就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取胜之道有多种，吴潜同时为郑清之所指出的“以和为形，以守为实，以战为应”就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天子有意进取是值得肯定的，不幸的是，美好的愿望代替不了严峻的现实。此次战役基本上就是以宋军完全的失败而暂告停止，自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起蒙古开始南进后，整个帝国便立即转成守势。

于是，四十年的战争拉开了序幕。当然，这场保家卫国的生死搏斗是无法避免的，理宗的独断只不过是过早开始了这场战事的进程而已。但是，这一决策过程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相当严重，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天子和帝国宰臣们尚不能认真把握形势，接受谏论而勇于修正，从根本上反映了政治上的腐败已经趋于何种程度。天下的有识之士有理由相信，龙庭和都堂之上已经浮云蔽日，看不到任何希望了。就在这一年，有一位在野之士痛切地向理宗皇帝预言道：天下之势既如人之垂老得疾，实在也就无可救药。尽管我们这个迟暮的帝国又苟延残喘了将近五十载，但这仍然不失为是一个无比精确的论断。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迢迢银汉谁渡？

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后理宗又改元“嘉熙”，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二月，魏了翁死于福建安抚使任上。朝廷方面，郑清之、乔

行简并相，郑性之知枢密院事。二年（公元1238年）二月，史弥远之侄史嵩之出任副相，并督视京西、荆湖南北、江西四路军事，置司于中部的鄂州，成为帝国全线的最高统帅。

史嵩之与其从父史弥远一样，好于权术而乏于实才，尽管当年曾率军与蒙古军合破蔡州，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他具有担当帝国最高统帅的素质。此人之所以能出长要职，同样来自于天子的赏识。端平议战时，嵩之曾反对郑清之出兵，师溃之后，理宗在反对派中独独想起了他，一擢再擢，直至此职。嵩之赴任之后未改初衷，立主和议，在军事措置上也并无建树。这年九月，蒙军以和议要挟不果，以八十万大军包围庐州，被守将杜杲击败，但嵩之作为最高节帅也得到了天子奖揄。此后，杰出大将孟珙转战收复襄阳，克复夔州，取得开战以来的重大胜利，嵩之自然也有一份功劳，由此挂衔宰相，封公赏爵。两年后的嘉熙四年（公元1240年）三月，被天子召回临安，在接下去的淳祐期间独相近四年。

嵩之为相期间并无实绩，然而自恃边功，骄狂日盛，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九月，他的父亲病故，本应卸职丁忧，然而嵩之贪恋权位，竟援引战时特例自我起复。一百四十四位太学生伏阙上书，指责他席宠怙势，殄灭天良，从而导致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潮。本朝注重教育，国家地方学校林立，学生亦有忠谠直言、为国尽忠的优良品质，眼睛里容不得半点虚伪，因此对嵩之的刻意之奸愤愤不平。而嵩之做法低劣，也给了他们宣泄对权相不满的机会，于是这场风波越闹越大，连不少朝官也参与进来。虽有天子一力袒护，但无奈压力太大，嵩之只有停职归丧。

淳祐年间的几次风波明显表现出朝野士人对政治状况的不满情绪。史嵩之事件后，一批元老与名望之士相继召用，都堂之中如宰相范钟、杜范，参知政事李性传以及时号“端平六君子”的国子祭酒徐元杰、侍御史刘汉弼等人都深孚众望。如果对政治革新的期望过于迫切，人们对事情本身意义的注重就会取代对实际效果的判断，因此朝廷新政者发布一系列措施后，临安士民竟欢呼载道，对更新后的人事表示出了绝对的支持。

然而此后却发生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怪事，先是淳祐五年（公元1245年）四月杜范病卒，入相仅八十天；两个月后，徐元杰在一天夜里也突然暴疾而亡。太学、京学、武学三学学生相继伏阙上书，对徐元杰的暴死表示怀疑，请求朝廷查验真相。但临安府立案后尚无结论，刘汉弼竟又得肿疾死去。人们进一步怀疑三位宰臣之死有很大的可能是被人下毒所致，霎时之间，临安物论沸腾，都堂会食无敢下箸者。紧接着，史嵩之的侄子史璟卿又成为第四位暴死者，这下舆论矛头开始指向史嵩之，因为大家都知道璟卿曾上书谏责嵩之，并曾吁请天子尽去群小、召用君子，改弦易辙戮力王事。然而因为证据不足。最后仍不了了之。

史嵩之因为受了这件事情的影响，服丧期满后最终未能被起复。淳祐七年（1247年）四月，郑清之再相。清之以拥立之功被天子在史弥远之后委以极高的信任，初相端平也能有清明之誉，但此际入相时，他已经七十二岁了，年衰齿暮，根本无力主政。一位前年曾参与临安学潮的布衣之士郑起登门怒骂清之道：

“端平败相，何堪再坏天下！”这是借他轻率北进之败指责他不知羞耻。

清之气极，执郑起下狱，其母、妹及子郑思肖也被牵连，一时舆论大哗。临安尹也觉得事情过分，只拘禁了郑起一夜就将他放走。但清之犹有未甘，使手下多方搜索郑起，务求泄愤。他的做法激起了更大的愤怒。清之号“安晚”，时人做诗讥之道：“先生自号为安晚，晚节胡为不自安？”嬉笑怒骂可谓鞭辟入里。清之为相数年，政事多出于其侄孙，乏善可陈，自非奇怪。

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到十年（公元1250年），赵癸出长军事，以枢密使兼参知政事。吴潜、陈韡、史宅之、谢方叔、别之杰等人先后入居执政。这个时期基本上是新贵当政的局面，颇符合理宗独操国柄的初衷。淳祐九年（公元1249年）十一月，理宗下诏训诫道，今后士庶上书倘涉私邪，朋奸罔上妄肆雌黄，一律严加追究。这道禁令虽说是天子加强权威一贯做法的延续，也从侧面反映出朝野上下门庭崖岸，党派分歧的现状。

淳祐年间由于两位杰出将领孟珙、余玠的努力，帝国得以与蒙古大军相互对峙在长江沿线。特别是两人先后经营四川——这个古往今来历代王朝最后和最坚固的堡垒——十分成功，不仅击退来犯之敌，犹能整军抚民、治城聚粮，最终使巴蜀之地成为帝国的一个主要依靠。可惜的是孟珙囿于困窘现实而无法伸志，于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悒郁病故，使危难的帝国又损失了一位肱股之才。耐人寻味的是，蒙古军始终都把入蜀放在重要的地位，从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开始，它在不放弃对四川一带施展压力的同时，竟绕道攻击南方的大理国，此后又入侵西南诸部，明显采取了一条南北夹击的策略。

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年）年底理宗再次改元“宝祐”。后来的近十年是理宗政治走向彻底腐败的最后完成阶段。当政二十五年后的理宗，已逐渐从早年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开始真正懂得了身为人主的乐趣。当一个人终于找到他真正的归宿后，也就无须再用面具藏住他原有的本性。圣人说五十而知天命，也许天命的神威只是让我们的天子懂得生也有涯的悲哀而已。旧年除夕，理宗把一位临安城里的名妓唐安伦召入了宫中，在与这位歌色绝伦的可人缠绵尽欢中，迎来了宝祐时代。

有官员上书道：陛下坏三十年清修之操，都是左右宦官如董宋臣之流引诱的结果。在那个时代，即使坚持原则也不得不采用这种委婉的方式，以推过于人的手法来表示对天子的规劝和讽谏，可见我们的制度从根子上讲是为天子服务的。因此理宗不仅没有能避免权相重新出现的悲剧，而且竟容忍了近幸用事泛滥成灾，并不完全是他的过错，制度和它造就的天子本身应该负全部的责任。

长有一副蓝色面皮的丁大全唯一可自恃的东西，就是与宫中的关系。其中渊源，也不过就是他娶的妻子曾经是某外戚家的婢女而已。然而仅仅如此，大全就能因缘取宠，博升高位，并得以交结了内侍卢允升、董宋臣。就本朝历史来看，单凭这一点背景似乎不足以胆大妄为，但大全却能开一个先例。他在宝祐三年（公元1255年）六月入居右司谏后不到一年，就因私结宰相董槐不果而心怀怨恨，上章劾奏，极尽诋毁之能事。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复章未下，他竟然调兵百余人冲入相府强执董槐入大理寺。若非恃宠在身，何来如此嚣张气焰。朝

野并非没有人反对权臣当道、奸佞柄国的丑恶政治，但正如秦桧，韩侂胄以及史弥远的旧例一样，天子既然刻意委信其人，其所作所为就无道理可讲。

另一位人物贾似道更是等而下之。此人本是里巷轻薄之徒，从小就胸无大志，日行游博，不事操行。但因为其姊入宫有宠于理宗，似道由此跃入龙门，从淳祐三年（公元1243年）升为户部侍郎后，短短数年间就成为封疆大员，淳祐十年（公元1250年）领镇两淮时也不过只有三十岁。出身卑贱者若不能勤于克己，便不免堕入卑鄙，似道的人生信条就是凭借恩宠，及时行乐，因此从不检点行为。就连理宗也知道，西湖上终夜不熄的灯火楼船，除了似道绝不会是旁人。其实，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似道的无行不过是天子荒逸的一个延伸而已，难怪天子对此从来都是愠而不责。风气的败坏是政治腐朽的最好注脚，君臣淫靡如此，国事复能何为。

丁大全罢于只有一年时间的“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九月。大全去位，贾似道立即就除拜右丞相兼枢密使，此后又将恪守忠直的左相吴潜排挤出朝，开始独领朝纲。此时，蒙古大军在西路取得重大战果后又从东路渡淮南侵，这年二月趋犯京湖，进围长江中游的战略重镇鄂州。似道受命危难之际的表现是可以想象的，入援鄂州后，果然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竟私许割地称臣以求妥协。所幸蒙古内部纷争突起，在鄂州宋军的顽强抗击下又无法遽得全胜，不得已在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十一月合军北归，似道恐怕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凭空就捞到了一件盖世伟业。年底，似道上表天子，自伐其肃清之捷。失去判断力的理宗龙颜大喜，以再造之功加似道太傅并召班师，同时敕命改元为“景定”。这是理宗最后一个年号。

时势已使人不得不发出季世之叹。

杜范曾对帝国军队的状况做过一个精确的总结：首先是边方帅臣丧尽德操，“黄金不用于反间敌人，而用以刺探朝事；厚赐不用于士兵，而用以交通权贵”；其次是“赏罚颠倒，威令慢亵”，最后导致重任者怙权攘夺，禁兵骄悍难制，兵盗群聚，相为剽劫。军队有名无实，则难当卫国之任，这是最危险的事情。问题绝非仅仅如此，在淳祐年

间，杜范对国家的民事状况同样也有一份详尽的报告，报告中的描述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旱暵荐至，人无粒食；楮劵猥轻，物价腾踊；行都之内，气象萧条，左渐近辅，殍尸盈道。”

如此情形下，贾似道之流犹在歌舞逍遥不舍昼夜，正因了那句“今日有贫国，有贫民，而无贫士大夫”的精辟之论。主修宁、理两朝实录国史的黄震在后来也说，国家大弊有四：民穷、财匮、兵弱、士大夫无耻，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帝国半壁江山固然富庶丰饶，但历经战乱之后，土地日蹙人民益伤，最后以一百余郡之残力，养赡二万四千余员之冗官犹且不足，又遑论日渐繁重的军费。本朝由于冗官冗军的先天弊病使财政问题在二百年前就已经趋于严重，南渡以来休战之后稍有改观，但同样未能避免重蹈覆辙。问题出在帝国既未能统筹安排开战的时机和规模，就只能长久实行重税重赋的刻薄手段，天下财帛并非取之不尽，于是推剥朘削只能解一时之急而不能消永久之痛。

对王安石理财的否定使南渡帝国在经济制度上无所更张，使伤贫而不夺富的不平等的现象纤毫未变，以至于生齿之民日烦，而权势之家日盛，兼并既滋，百姓益贫。四海之民既不再有应得的权利，又何意克尽应有的义务？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忠臣义士们对帝国的病象的慷慨陈辞，始终不绝如缕。畅言忧患从来都不是隔岸观火般的幸灾乐祸，而是一种激扬人心以作最后一搏的真诚呼唤。所谓壮士拂剑、浩然弥哀，其中既有对大道日丧的激愤与悲伤，然而更多的是对积健为雄、横绝太空的向往和期待。

第六章
天下：谁宾谁主

水天空阔，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
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
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
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

——邓剡

走向中国：文明的必由之路

地分南北，人有东西。先辈们囿于一井之天，以四海之中之大者自居，把周边他族蔑称之曰“夷狄”，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不过，这种情绪也并非空穴来风，塞外大小诸族特别是西、北强劲剽悍之辈，以弦弓毒矢强弱相并，不能驯受教化而又常为中国之患，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三代有猃狁，秦汉有匈奴；隋唐之间，突厥为大，其后则有吐蕃、回鹘之强。五代之际，名见中国者尤多，其中以契丹最盛，降至本朝而不衰。此后党项、女直以及蒙古又相继而起，为害酷烈，日甚一日，最终甚至发展到了危及我泱泱大国的地步。

求取生存是一切侵掠的主要动机。游牧之族逐水草随寒暑、食兽肉饮其汁，完全以畜牧为生，因此受气候环境的影响绝大。如果一旦发生干旱而使畜群倒毙，只有另辟他径以自救，这种办法一是寻找新的水丰草美之地，一是向他族掠夺资产。显然，缺乏物质蓄聚是其中的关键，当然这又是畜牧本身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以畜牧为本的社会对天灾的应对能力实在是非常脆弱而有限，气候变迁之外，诸如瘟疫、人口膨胀也都会带来致命的问题。这一切都迫使他们不得不仰仗于物产丰饶的农业之国，以获取牛羊以外的其它基本生活资料。假如不能以公平的贸易而达到目的，也只有采取战争的方式。

中国王朝在认识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相当严重的误区，君臣士庶只看到了夷狄之辈“被发左衽，人面兽心”、“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的一面，而没有发现他们不得已而诉诸武力的一面。因此在攻伐不成之后，便采取建城立垣的闭关政策，几乎完全杜绝了与关外诸族的贸易或者只进行非常有限的交换，这就使得游牧社会无法用和平方式取得物质的补充。历代的圣贤们认为中国以田耕为本而自给自足，从根本上讲不需要对外贸易，没有意识到贸易在维护和平上的极端重要性。执政者自恃于国力的强盛，一直把互市也就是相互贸易当作是要挟夷狄的一个手段，却从来没有把它视作是一种自避隐患的良策。殊不

知，一旦抵御入侵的能力有所降低时，就无法不被为生存所迫的外族盗掠侵驱。这个问题终于在本朝走向了极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道长城或许还是罪魁祸首，如果放弃政治偏见而开放边境，允许双方的自由贸易，在互利的情况下保证对彼辈欠缺物资的供应，应该是能够避免兵戎相见的。

早先的中国典籍里找不到“蒙古”的名称，这是本朝以来才有的译名，同时先后还有许多其他的称呼，如萌骨子、朦骨、蒙国斯等。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蒙古族的最后形成时间相对较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个部族的活动地区十分遥远，大致在今天贝加尔湖以南，西起阿尔泰山东至大兴安岭一线，这个广袤的区域北是山岭牧地，南方则是平坦的草原。也许只有国力强盛的唐朝时期，中原帝国的版图才有及于此。本朝北有契丹，西有吐蕃、党项，基本上没能涉足戈壁和草原，因此无缘得知其间的情形是很自然的。实际上，自从唐朝时期鼎盛一时的东、西突厥逐渐没落，回鹘人又迁出后，那一带的情况就一度晦暗不明，一直到成吉思汗的崛起为止。

当然，仔细考察起来也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唐五代时有人就记载道，北方的夷狄中室韦部较盛，其中有一支称作“蒙兀室韦”，这可能就是后来的“蒙古”之称。不过，名称不是主要的问题，因为一个新兴的部族绝不可能从天而降，它自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过程，尽管我们对这一过程并不能做到了如指掌。从民族的角度上说，生活在该区域的许多部落都属于同一个大民族，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称的“蒙古”族，与突厥族及属于通古斯族的契丹、女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一定的不同。契丹、女直处于这一地区的边缘，因而得以与中国较早接触，也正是由于契丹的强盛，使蒙古地区的突厥余族被清除，蒙古各族才得以重新活动，开始沿额尔古纳河西迁至斡难河一带。关于这次西迁，蒙古族有一个古老的传说道：一对受天命而生的夫妻“苍狼”和“白鹿”渡过腾吉思湖来到了斡难河源头，生子名“巴塔赤罕”，就是他们的第一代祖先。如果这个传说属实，那么蒙古重新兴起并最终形成一个完整民族的时间确实相当之晚，因为耶律阿保机直到公元924年才驱逐了该地区的突厥族。

一个小而微的部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变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就

一定是融合了其他部落而成为一个共同体的缘故，蒙古当然也不例外。这要归功于一个伟大的人物，这就是公元1162年亦即宋朝纪年的绍兴三十二年生于斡难河畔的铁木真。铁木真出生的年代，正是蒙古诸部激烈争战的融合时期。铁木真九岁时，身为蒙古乞颜部首领的父亲就在部落战争中死去，铁木真与他的母亲和兄弟们不断受到敌人的袭击，十几年里九死一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铁木真正是在血与火的岁月里成长起来，生活磨炼出他的坚强意志和非凡性格，也教会了他应付时世的智慧和计谋，因此使他最终成为草原民族豪放气概和顽强精神的杰出代表。到了四十岁时，铁木真已经基本统一了蒙古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公元1206年也就是韩侂胄伐金的开禧二年，铁木真在斡难河召集诸弟、诸子、驸马、部族奴隶以及各部首领召开议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铁木真接受了“成吉思汗”的称号，树九游白旗，正式建立蒙古帝国。“汗”原是部落首长之意，北方诸族都以此词来称谓本族的君主；“成吉思”的具体含义已无从得知，但它是一种最高权威的尊称则是没有疑问的。“成吉思汗”铁木真的诞生，是世界范围内震天动地的大事。

成吉思汗首先进攻的是西夏和西辽，后者是辽国灭亡后契丹残部西迁后建立的政权，在取得胜势后立即就转向了金国。蒙古对金人的仇恨是简直就可以说是与生俱来，因为金廷长期以来一直对蒙古各部采取极端的压迫政策，甚至在灭辽后，出于对北方各部的恐惧感，每三年出兵掳掠杀戮一次，谓之“灭丁”。如此残酷的灭绝行径，不可能不激起蒙古人的反抗，成吉思汗从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开始伐金后，举国之力几乎全部投入到这场战争中。以蒙古强大的势力，孱弱的金国已根本不是对手，四年后就丢掉了中都而被迫南迁汴梁。

很显然，在这个时候蒙古人尚未完全意识到他们对中原的兴趣，也尚未摆脱游牧民族掠夺的禀性。克服金中都后，成吉思汗带着大批战利品回到了怯绿河上的宫帐中，依旧过着他们传统的游徙生活。大约在两年后，一个偶然的事件促使成吉思汗转而向西，对中亚大国花剌子模帝国展开了征讨。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争斗的最初起因也是由于贸易上的纠纷酿成的，这再次证明草原帝国的彼此征伐和物质需求之间的某种天然联系。

这场西征几乎荡平了整个中亚地区，蒙古军队最远一直推进到印度河和克里米亚半岛的第聂伯河。成吉思汗杰出的军事才能在这次西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蒙古军队也从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这场战争同时也使蒙古帝国获取了极大的物质利益，虽然这对于其他族群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痛苦。成吉思汗所禀持的那种摧毁一切、消灭一切的信条，其实也是长期以来饱受压迫的民族心理的必然反映，但他能把这种心态发展到攻取天下的高度，这对于蒙古民族来说，却不失为是一个伟大的贡献。不过，雄才大略无与伦比的成吉思汗仍旧只是局限在以弓马取天下的范畴里而已，他还没能认识到的一个简单道理是：屠杀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在征伐金国并占领中都燕京后，成吉思汗听说了一位契丹贵族后裔耶律楚材的名声，并于三年后将他召到帐前，向这位博学之士讨教命相占星之术。耶律楚材出身于一个完全汉化的契丹人家庭，长期侨居中原，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士人。然而他对于蒙古帝国的巨大影响当时并没有显露出来，因为成吉思汗除了术数之外，对耶律楚材的儒学并不感兴趣。

此外，成吉思汗还接触过一位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汉人，这就是长春真人邱处机，全真教的掌门人。全真教是道教的一个门派，在金国入主中原后发展兴盛，到了邱处机时，门徒遍及整个北方，具有相当的影响。成吉思汗同样是在燕京听说了这位长春真人的名声，不惜派人万里迢迢把他请到了西征行营。与召见耶律楚材的性质相同，他此次的目的是想请求这位仙风道骨的真人教给他长生不老之术。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四月，真人在路上走了一年又两个月后，到达了蒙古御营并随之北上。很难猜测真人不畏艰难长途跋涉应召蒙古大汗的动机，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响应过金廷和南渡宋朝的征召。虽然真人知道了成吉思汗的动机后十分失望，但这位道行高深的人并没有以丹鼎灵药之术来迎合蒙古大汗，相反代之以诚恳的劝说，希望他能接受道家的理论而不嗜杀戮。真人强调说，只有清心寡欲才能长生，敬天爱民才能一统天下。显然，成吉思汗并未能为他的高深理论所说服，尽管他始终对真人保持了一种敬重和推崇的态度。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在围攻西夏时，成吉思汗带着遗憾不幸去世，因为他

对宿敌金国尚未在他的手中被征服而耿耿于怀。这是颇令人沮丧的事情，假如成吉思汗能够亲自来到中原的话，蒙古帝国所能取得的光辉业绩或许还要更为巨大。

成吉思汗西征后，把灭金的任务交给了太师木黎华，命他负责太行以南的军务。正是木黎华迈出了蒙古民族走向成熟的第一步，他在经略中原的过程中渐渐认识到屠杀抄掠的落后，从而采取占领求治的政策。他的军队纪律肃然，甚为占领区的吏民所欢迎，也为一大批汉人世族所拥护。这一切都为新一代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灭掉金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窝阔台在位期间，蒙古帝国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基本开始了从游牧部族向文明国家的过渡，这个过程是所有南进民族取得胜利的必由之路，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耶律楚材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不过，过分夸大个人的作用显然是不符事实的，蒙古人一旦从北方来到中原，它就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也无法避免环境的熏陶，因此耶律楚材所采取的定税赋、立造式、榷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诉讼、别军民、设科举等等措施，无非是出于现实的需要而已。是病弱的宋王朝提供了这样一种机会，使契丹、女直以及最后的蒙古人越过长城来到了这个田园之邦，最终成为历史的幸运儿。客观地说，假如我们的帝国像汉、唐那般强大，大多数游牧之族必然还将保持着被发文身、饮血茹毛的状态。可见，融合是多么的重要和伟大。

窝阔台的早死带来了这个庞大帝国的内乱。成吉思汗有四个嫡子，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四个儿子都得到了相当可观的封地，而窝阔台则被他指定为继承人。窝阔台死后，先是皇后摄政三年，此后长子贵由继位，不料两年后死于巡幸途中。此后，诸王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拖雷一系向汗位发出了有力的挑战。三年后，年富力强的拖雷长子蒙哥在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下，登上了汗位。这次政局动荡持续了近十年，不仅使蒙古帝国的中央集权遭到了破坏，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蒙古向南方的进攻步伐。蒙哥即位后重新开始了对宋廷的进攻，他本人亲率大军侵入四川，派其弟忽必烈从中路攻击。不幸的是蒙古军队尚没能适应在崎岖山区的作战，屡受顿挫，蒙哥也于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七月死于合州城

下。此时忽必烈已到达长江北岸，他本来无意半道而辍，因此仍然渡江围攻鄂州。但到了十一月份，突然传来了其弟阿里不哥谋取汗位的消息，忽必烈在部属的劝说下终于决定回朝争夺汗位，并于月底匆匆北返。由于这个意外原因，我们的大宋帝国才得以又延续了二十年。

翌年三月初一，忽必烈在蒙古帝国最高政事会议上战胜了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被推举成为新的蒙古大汗，时年四十四岁。在一定意义上，忽必烈才是一位真正具有了入主中国能力的领袖，他早年受命经略中原，此后又转战西南灭掉了宋室的南方藩国大理国，文治武功，高标一时。他的即位，标志着蒙古帝国自北向南战略转移的最后完成。此后的数年中，忽必烈平定内乱，加强集权，同时在燕京营造国都，建立年号，推行汉制，承认汉人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正统地位，使原本游移不定的蒙古帝国在中原站稳了脚跟。

忽必烈受他的母亲影响很深。这位贵族出身的王后与她的丈夫拖雷一样，在国家政坛上享有很高的威望，寡居以后她被封在了原属金朝的真定路，以立学养士之政享誉一府五州。忽必烈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与汉人士子的接触，并渐渐形成了一个幕僚集团。古人称天子未即位前所居之藩邸为“潜邸”，这是取“潜龙在渊”的意思。忽必烈登基后，他的这个智囊团被人称为“潜邸旧臣”。这个集团的出现最初是来自于一位僧人的建议，这位很有名望的高僧劝说忽必烈“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有志于天下的忽必烈采纳了这个提议。宋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忽必烈在蒙哥即位后受命经略汉地，在金莲川设立幕府，开始四方延揽人才，标志着这个集团的正式形成。“潜邸旧臣”的人数众多，高峰时期达到六七十人，大多是富于才学和经世之术的汉人世族士子，蒙古人只占很小一部分。此后忽必烈能够成功地治理汉地，夺取汗位，战胜蒙古保守势力而趋于汉地文明，这个集团起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作用。

忽必烈的第一个年号是“中统”，中统二年（宋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他在中央政府设立了“劝农司”，鼓励百姓开垦荒田、种植农桑，并且禁止了蒙古人占田放牧的旧有做法。这对于蒙古民族来说，同样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贡献，较之他的祖父伟大的成吉思汗，似乎也毫不逊色。

从此，中国大家庭中又多了一个新的成员。

回到临安来，我们帝国的气氛依旧萧索。理宗皇帝于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十月二十六日驾崩升遐，享年六十一岁。皇太子赵禥即位，后来的庙号为“度宗”。第二年，改元“咸淳”，当朝首相仍然是贾似道。

似道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够取信人主、威震朝野，完全是因为鄂州解围的结果。从那时开始，似道就已懂得了如何利用外敌的威胁来为自己谋得利益。虽然他本人远远算不上是个勇敢的人，但有时也常常为帝国内部的恐惧心态而感到好笑。似道很清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要刻意而为，世间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加以利用。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年初，理宗山陵事竣，似道便突然不告而别，回到越州故里。同时密令手下诈报道：蒙古军队正在向下沱猛攻。下沱是江陵府上游的一个重要集镇。

果然朝廷大骇，天子百官手足无措。度宗与太后先后手诏谕敕似道，希望他能立即回朝应付时局。似道当然暗暗窃喜，洋洋自得地回到临安。这是似道给度宗皇帝的一个下马威，他要让年仅二十六岁的新天子知道，没有他这位辅弼大臣，帝位是不可能获得安稳的。显然，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四月，贾似道被加衔太师，封魏国公，权威达到顶点。新帝每次朝会必答拜，称之曰“师臣”而不称其名。至于朝廷百僚，则尊称为“周公”。这实在也是一件荒唐透顶的事情。

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二月，似道再次故弄玄虚，上疏天子乞求卸职归养，顿时又让度宗龙颜大惊。天子命大臣与宫侍传旨似道表示固留，一日之内来了四五批，至于派中使赴似道府第宣慰加赐，更是走马不歇。度宗为了不让似道离朝，甚至命人卧于第外日夜守之。天子对宰相如此圣恩隆渥固然前所未有，但身为人主如此谦卑无奈也是亘古罕见的。最后，特授似道平章军国重事，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这就是明文确立了他的最高宰辅地位。此外，赐第于西湖葛岭，迎养其中。

然而似道每隔五日才上朝一次，而且是乘舟泛湖而来，优哉游哉，轻松闲适。都堂则从来不去，凡有公事处理，则由吏员抱牍就第

呈署。大小朝政，一切委之于门客廖莹中和堂吏翁应龙。朝廷的其他宰执大臣，基本上已形同虚设。似道虽然深居简出，但他同秦桧一样，善于将人性中的丑恶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朝间贿赂贪污、徇私舞弊、欺上瞒下的风气大盛之时，当然也就是独裁者最安稳最放心的时刻。

自开庆元年忽必烈从鄂州退军后，蒙古帝国近九年之内没有进兵南下。这个新造之邦的版图太大了，当它把重心转移到中原时，无疑需要集中精力修整内部，积聚新的力量。不过，从它以往的进取精神和强大的实力来看，自然是不会就此裹足不前的。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十一月，一位宋朝降将刘整向忽必烈陈言道：

“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者，不为正统。”

作为降将的刘整有这样的言论不足奇怪，因为他所投靠的新朝若非堂堂正朔，自己就难免成为乱臣贼子，所以他当然希望蒙古君王能够一统天下。而忽必烈接受这样的理论就更为正常，他既然有意领受儒学的指导，也就首先必须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否则的话，他就把蒙古帝国放在了夷狄的位置上而自绝于他一贯向往的中国大地了。

不过，事情也并非如此绝对。假如七年前忽必烈派往宋廷的使者不是因为贾似道的拘留而使鄂州达成的协议实施，蒙古朝廷得到了岁币二十万两银绢的利益后是否还会刻意南下？这个问题倒也颇令人困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如辽、金对待南渡帝国的一贯态度一样，蒙古人同样不会仅仅满足于金银玉帛，南下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而已。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局势一旦缓和并持续较长的时间，双方是否会发生势力消长的变化呢？即使我们的帝国已经垂老欲朽，但成吉思汗的事业也绝不会永远年轻。

假设毕竟是假设，对我们的帝国来说，生死决战已经无法避免。

市井无赖贾似道

决定性的战役首先在襄阳打响。

回顾帝国抵抗北方侵略的百年历史，特别是对双方的攻守战略进行一番总结，就可以发现这绝非是一个偶然。除了早年的完颜宗弼曾单兵直突两浙追击高宗皇帝外，金兵数度南下基本上选择了三路并进的策略：西攻巴蜀，中取京湖，东侵淮东。如此全面进攻虽能给帝国防线造成极大的震慑，但敌军本身也存在着兵力分散，不能相互支援的弊病。相反，川陕固守要津，轻易不能克服，中部有长江天险，也可有效遏制入侵势头，因此两路呼应，还能乘隙各个击破来犯之敌。淮东虽最不易守，但地域广阔、水网密布，敌军一旦进入到江、淮之间，兵势很难展开，十分容易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事实证明，金人的攻击方略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初期蒙军以伐蜀为主，这明显出于包抄战略的考虑：以长江上游为目标实施重点打击，然后转而向中下游开进。当时蒙古大汗蒙哥的计划可谓相当周全，自己亲率大军攻蜀，同时派忽必烈围攻鄂州进行牵制，使中路宋军不能轻易支援上游，以保证侧翼的胜利。这个战略比金人进了一步，但实际效果也不甚理想。主要的原因是四川一带易守难攻，很难在短时间内一举肃清，因此大军主力无法抽身沿江而下。蒙军既然不能形成对长江防线的有效突破，即使当初内部不发生变故，也不可能实现从西往东扫清宋朝的初衷。

从实际情况上看，南渡帝国的四川和两淮都曾先后失地丧师并一度退守，四川甚至在蒙军的进攻下失掉了成都，但中路的长江防线始终没有被敌军攻破。这个防区包括江北的襄阳、荆门，沿江的鄂州、江陵，几个重镇形成有力的犄角之势，互为依托而以长江天堑为核心，扼守着整个帝国的正面。其中，襄阳府最为关键，它位于汉水之畔，是江防的前哨，维系着整个中部的安危，只要它没有被攻破，沿江防线不仅不会失守，同时还能够三面出击，与各个战场保持有机的联系。最强劲的也就是最重要的，这个道理毋需详说。

正是刘整为忽必烈指出了这一点。

此人是河南人，有机谋，善骑射，因避乱而从金地来到南方，很快就成为孟珙手下数得上的一员将领，鄂州解围后升为知泸州军州

事。贾似道当权，大力排斥异己特别是前线诸将，刘整因不附和也在名单之中。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六月，蜀帅俞兴在似道的授意下诬构刘整，刘整上诉于朝未能如愿，不得已降蒙。刘整是前沿防务的重要将领，他对于帝国的军事虚实情况实在是太了解了，投降之初便向蒙古军成都经略使刘嶷和盘托出。与刘嶷的大喜过望相反，当有人将刘整叛变的情况报告贾似道，提出帝国军事机密有可能因此而泄露时，似道却全然没有加以理会。

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刘整在燕京向忽必烈建议伐宋的同时，提出了先攻襄阳的计划：

“攻宋方略，宜先攻襄阳。若得襄阳，则浮汉入江，宋国可平。”

这无疑击到了要害之处。其中的关键是“浮汉入江”四个字，襄阳一得，即可沿汉水入江；沿江东下，整个两浙便尽在彀中。顺水而下的威力是巨大的，自古以来北方王朝克服江南偏安政权，大都采取了这条方针，本朝太祖平定南方诸藩，也曾走过这条路。就目前情形来看，四川宋军实力业已削弱，根本无力出峡东援；而下游宋军出兵增援，由于是溯江而上，兵势又要打上很大的折扣。可见，从中路进击是十分正确的方针。

当然，也并非只有刘整一人认识到襄阳的战略地位。此地原已沦陷金国，端平元年（公元1233年）金廷覆灭后，宋廷江陵制帅李曾伯就立即予以修复，屯驻重兵，重筑为强镇。与此同时，蒙古军中也有人意识到襄阳的重要，有一位将领就曾向当时的大汗蒙哥建议攻取襄阳。此人名李桢，是当时蒙军的前左右司郎中，他认为襄阳乃吴、蜀之要冲，江南之咽喉，得之则可为他日取宋之资。英雄所见略同，即此之谓。

忽必烈接受了刘整的方案可以说是他一生中许多成功的决策之一。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这也是他最终成为一代雄主的原因所在。其时在燕京朝廷上不是没人反对这个策略，但忽必烈并未因此而改作他计，在后来近五年中，蒙古帝国的最高决策层始终没有放弃初衷，这显然也是忽必烈意志坚定的表现。在这一点上，新兴的蒙古帝国无疑要优于当年的辽、金许多，后者都因为暂时的顿挫

和眼前的利益而使图宋方略虎头蛇尾，并渐渐消弭于无形。

刘整提出建议约一个月后，忽必烈诏征诸路兵马，以阿朮、刘整为统帅率军向襄阳进发，拉开了南进的序幕。同月，宋廷以吕文焕出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使。

蒙、宋正面边境上的第一大镇襄阳位于汉水南滨，三面环水，与北岸的樊城隔水相望，所以又合称“襄樊”。两城相倚而立，互为依托，确实是一个极佳的攻守要地。不过，蒙古在这里也有些基础。

那是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时的事。当时的襄阳镇帅是吕文德，此人早年随赵癸抗击蒙古，累立战功，后来也曾参与了保卫四川及鄂州的战役。文德虽有些才勇，但判断力并不高明，也就是在老帅宿将被贾似道锄诛略尽的情况下才成为宋廷的主要大将。刘整很清楚他的为人，向忽必烈建议说，可以用小利诱使他犯错。这一招确实高明，蒙古派出的使者用一条玉带和一番花言巧语就骗取了吕文德的同意，在襄阳城外宋境内建立了一个榷场也就是贸易场所，此后筑土为墙，内建城堡，俨然成了一个军事要塞。等到文德明白过来，后悔也已经晚了。

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八月，阿朮率蒙古大军首先抵达襄樊。九月，刘整也来到前线，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制造战舰、训练水兵，并以五千战船、七万水军的规模开始了具体实施。蒙古铁骑的威力是不言自明的，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代们之所以能够扫荡中亚、廓清四合，靠的就是一支劲弓铁马的骑兵。可现在对宋作战，单靠骑兵显然是不够的，刘整很清楚这一点。

阿朮同样也是一位有眼光的军事统帅，他在观察了襄樊地形后发现，襄樊一带获得后方如荆门军、江陵府粮草支援的主要渠道就是汉水，如果切断了这条补给线，无疑就是第一个胜利。于是，阿朮立即在白河口、鹿门山两处建筑城堡，扼断了河道。

吕文焕见状十分惊惧，立即以蜡书密报时任帝国军事统帅的胞兄吕文德。岂料文德见书后勃然大怒，他不好责备他的弟弟，便对来人大骂：

“你这是妄言邀功！即使有之，也是假城。”文德似乎对襄阳的物质储备甚有信心，认为襄、樊不仅城池坚深，而且军储至少可支十年，区区两三城堡奈何不了襄樊防守，“回去转告吕六，坚守即可。若刘整胆敢进犯，俟春水来时，吾自率军前往，只怕彼时敌军早已闻风而遁了。”

对文德的大言不惭，朝野有识之士都感到十分可笑。但除了无奈之外，也没有办法改变执政者的固执己见。

九月底，汉水已经被完全切断，襄、樊基本上就成了孤城。

十一月，不甘就此困守的襄樊诸军向沿山蒙古各寨主动出击，希望能夺回对汉水出口的控制，但立即就被蒙军击败，死伤惨重。第二年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五月，阿朮自白河进围樊城，三月初一，进驻鹿门山城堡。十七日，京湖都统制张世杰在赤滩浦阻击来犯蒙军，又遭失利，使阿朮首先完成了对樊城的全面包围。

消息传到临安，朝廷群臣纷纷提议枢密都承旨高达可以承当赴援之责。御史李旺把众人的看法面呈贾似道，但似道不同意：“如果用高达入援，吕文焕怎么办？”似道习惯于玩弄权术，因此他对将领之间争功邀赏的不良习气倒也甚为清楚。不过，似道的真实动机并不在此，他内心里根本就不想增援襄阳。似道一直在天子面前把目前的战况捂得严严实实，大动干戈必然使事态沸沸扬扬，这显然对他的专权不利。

真不明白在这个关键时刻吕文焕如何还有心思去考虑他的既得利益。他在襄阳听说了高达将要到来的误传后，竟然十分不快。照他的想法，襄阳是他的防区，如果接受高达，则势必证明自己的无能，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堪忍受的事情。于是文焕在门客的出谋划策下，向朝廷谎报大捷，以此来沮消临安起用高达入襄的想法。果然，贾似道本就无心增援，见到奏报后便顺水推舟，基本上放弃了对襄阳蒙军的主动出击。直到此时，贾似道仍没有把襄阳的安危放在心上，他似乎认为这仍不过是一个局部边境战役而已。天子则更不必说，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似道手中的傀儡，既不知道天下之事，也无心去担忧国是。

在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一年当中，唯一一位贯彻命令实施增援的将领是沿江制置副使夏贵，他在春汛到来水涨船高之际，以轻兵简舟载运粮草突至襄阳城下。但因为惧怕蒙军掩袭，夏贵只能与城头的吕文焕交语而还，没能达到增援的目标。七月份，汉水一带大雨淋漓，夏贵乘势把水军拉到汉水东岸，在略事佯攻后突然转趋西岸的新城，企图攻破这个襄阳后背的要塞。然而夏贵的意图早已被阿朮识破，他不动声色，将水师主力埋伏在虎尾洲，以逸待劳等着夏贵上钩。夏贵决策失误，结果被蒙军大败，损失战舰五十余艘，士卒战死溺毙者不计其数。贾似道的女婿范文虎受命率军入援夏贵，在灌子滩亦被蒙军击败，文虎自己以轻舟遁走。这一仗透露出来的消息是：刘整训练的蒙古水军不仅已经适应了大江大河上的作战，而且在数量及装备上也超过了对手，开始具备与宋军水师全面抗衡的实力。帝国军队在战术上的唯一长处也被敌军制服，如果不在战略规划和主观意志上有所弥补，实在也就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十二月，吕文德在深深的自责中郁郁成疾，背发疽疮而死。他始终不能为当年允许蒙古人设置榷场的错误而释怀，临终前常常自言自语的一句话就是：“误国家者我也！”其实，他如果早一点识破蒙军合围襄阳的计划，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汉水的畅通，也就没有必要为前一件事情后悔。吕文德念念不忘榷场之事而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后来的轻敌之谬，再次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军事统帅的合格人选。

文德死后，范文虎被贾似道任命为殿前副都指挥使，总领禁军。这个人当然比吕文德还要逊色许多，因为他既不具备军事才能，道德品质上也有很大的问题。严格地说，文虎与他的岳父在某些方面简直就是一丘之貉，后来襄阳的失守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他一手造成的。

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正月，帝国面临的严峻态势已经无法回避了。贾似道终于开始部署决战规划，起用高达为湖北安抚使知鄂州，孙虎臣为淮东安抚使知淮安，吕文福为淮西安抚副使兼知庐州，吴革为沿江宣抚使，黄万石为沿江制置使。同时以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负责增援襄阳。此时襄阳被围业已两年。

李庭芝原来也是孟珙部下，是一位忠勇有为之士，孟珙死后将他推荐给贾似道，在军事设置方面对似道有过不少襄助。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后主管两淮制置司，成绩卓著，声名斐然，被朝野视为良将佳选。此际出任增援重任，确也是众望所归。

但范文虎却极为不满，他在给贾似道的信中说：

“末将率数万兵马进发襄阳，一战可平，只求不受别人节制。如此则事成之后，功业自归恩相。”言下之意，就是不愿庭芝抢功。

似道当然高兴，女婿的功劳也就是自己的功劳，他又何尝希望庭芝独建奇功。于是，似道立即升衔文虎为福州观察使，指使他从中掣肘庭芝。似道此时的地位权势已经俨然就是天子，他以一己之好随心所欲，宗庙社稷的安危存亡不在他的考虑之中。如此君不君、臣不臣，国家本身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虽然我们不能把亡国之责全推到一两个人身上，但奸佞之辈的胡作非为却能够加速败亡的进程，这也就是奸人不生于乱世则为害不烈的道理。遗憾的是，这个悲剧似乎总是无法避免，衰世与奸佞实在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同一体，衰世必然滋生奸恶，而奸恶只有在疲敝之世才能为所欲为。

襄阳之战：帝国的最后一搏

李庭芝到任以后，屡屡约请范文虎共同举兵入援襄阳，但文虎就是不予理睬，他以取旨未到为借口，一直按兵不动。在时势岌岌可危之际，文虎依旧日日与妓妾、嬖幸击鞠宴饮为乐，不仅未把李庭芝看在眼里，丝毫也没有把襄阳放在心上。文虎勒兵不进，李庭芝也就巧妇难炊，增援之事一拖就是近一年。

在此期间，朝廷也有不少人为襄、樊的安危忧心忡忡，左丞相江万里就曾屡请贾似道增兵入援。然而江万里这个人虽不失忠直，但魄力不够，在似道的沮骇下，最后只有力请外任来逃避现实，并未能在

朝堂之上尽到自己的义务。先后离朝的还有王应麟、文天祥等人，都因为力主入援襄阳而被似道排斥。如此一来，朝间仅剩的一些端方忠勇之士也被贬逐略尽，国事遂益无可为。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二月，襄阳守军竭尽全力，派出步骑兵万余人、战船百余艘攻打万山一带，又被蒙军击败。与帝国的迟缓动作相反的是，阿朮与刘整仍然在紧张地打造战舰、操练水军，并加强了对襄、樊的压迫程度。到了八月份，襄、樊被围已近三年，渐渐也有疲敝之态。

但我们的宰相贾似道却仍在临安葛岭的府第中逍遥自在，大兴土木，挥金如土，极尽奢侈之能事。在新造的“半闲堂”中，似道挂起了自己的肖像，在像下时时与道士们挥麈闲谈，探究性命之术。似道好色，倡优乃至尼姑貌美者，无不纳入后闱，宫人叶氏有美色，竟然也被他取作姬妾。似道累月不朝，但却常常与群妾踞地而坐，斗蟋蟀为戏。此外，他最喜欢的消遣是收集宝玩，为此建造了一个“多宝阁”，一日一登，迷而忘返。似道嗜于古玩器物的程度近似于疯狂，甚至为了一条陪葬的玉带，竟将功臣大将余玠的墓冢挖开。这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掌握生杀大权的宰相在他的威福臻于鼎盛之时，已经完全暴露出他那种市井无赖的固有禀性。

现在的贾似道已经可以入朝不拜，这是开国元勋才能享受的崇高礼遇。不仅如此，退朝之际，天子犹还必须起立避席，目送他出殿以后才能坐下。很明显，似道不仅成为帝国实际的主宰者，甚至在名义上也凌驾于天子之上，任何一位挟权自重、作威作福的权臣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无须怀疑的是，贾似道既是个轻薄无行之徒，他自然就不会具备士大夫们才有的那种传统理念和道德原则。

就在八月份的一天，度宗问他：

“襄阳已被围三年，如之奈何？”

似道故作诧异：“北兵早已退走，陛下何出此言？”

天子无知，实话实答：“适有女嫔言之。”

似道岂能放过，逼着度宗说出这位宫嫔的姓名，随后立即赐死。自此之后，边事虽急，也无人再敢饶舌。

似道的所作所为常能使天下臣民们想起秦桧、韩侂胄以及史弥远。令他们感到困惑无比的是：从历史事实来看，早年的权臣奸相都曾无一例外地激起了强烈的反抗，如何眼下竟水波不兴？这个问题同样使后人百思难解，他们在痛责这位奸佞之臣的同时，常常也不免感慨万千。尽管这许多疑问都各有各的道理，但却无疑都是庸人自扰，因为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

牵制政治独裁的唯一力量是军队，如果武装势力不足以与政治权威相抗衡，或者其本身已经被某位独裁者所掌握，那它就不仅不能制约政治，相反却还能成为政治压迫的帮凶。贾似道虽没有能完全控制军队，但帝国的武装力量早已非同往日，握兵大将既然不能立寸功于外，又何以威胁权相？而士子们永远都是手无寸铁，他们的全部所有不过是心中的一腔忠诚而已，书生意气可以指点江山，却无法做到诛桀伐纣，一切都要靠武力来解决问题。最悲哀的是，帝国武将的懦弱并不完全体现在对付敌寇方面，他们在专横霸道的独裁者面前同样胆小如鼠，为了逃避迫害，最后竟还不得不选择投降的道路。那位掉转矛头的刘整不是第一位，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位。

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十二月，一名蒙军将领张弘范突然发现了襄阳久围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原来，汉水补给线虽被切断，出口也被堵死，但并没有做得很彻底，背后的江陵、上游的归州与襄阳之间始终有零散宋军来往。特别是襄阳西面的粮道被蒙军所忽视，使得间断的补给仍能达于围城之中。于是张弘范郑重向蒙军统帅部提出：筑堡万山以绝其西，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从根子上切断襄阳与外部的联系。这个建议被采纳，襄、樊终于陷入了真正的苦战。

翌年五月，忽必烈调整了战略，在西线开辟了第二战场。另遣两路兵马扫荡四川，一路由赛典赤、郑鼎率领水陆军西击嘉定；一路由汪良臣、彭天祥、札刺不花等从重庆、泸州、汝州等地顺流而下沿途巡击，意在牵制上游宋军，进一步肃清襄阳的侧翼。忽必烈始终没有在东部动手，这是因为蒙军的优势在西面，攻打襄阳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的东下，因此便把两浙先放在了一边。这是一个集中兵力的明智之策，但能否实现的关键还是襄阳战役的成败。

襄阳军民的意志力和战斗精神是无可争辩的。他们以孤城寡力独挡数倍于己的汹汹之敌，并能成功坚守了四年，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由于蒙军的重重包围，襄、樊两城顽强抵抗的情况未能被外人了解，但其中的艰苦卓绝可想而知。在久候援军不至的情况下，他们甚至没有放弃主动进攻，在这一年中仍然发动了多次出击，但几乎全遭败绩，七月份的一次战斗一下就牺牲了二千余人。值得庆幸的是，襄阳府丰赡的储备和便利的地形有力地保证了他们的抗战，否则襄、樊就会像历史上所有的孤城一样，最后城未破，粮先绝，酿成屠马割尸、易子而食的千古悲剧。

西路蒙军开始行动后，范文虎终于率领两淮水师近十万人的大军慢慢靠近了鹿门山，当时正是多雨的六月，汉水大涨溢出岸堤，对逆水的宋军十分不利。文虎本无谋略，更不能应变，被夹江而阵的阿朮水军一举击溃，十万之众丢船卸甲狼狈而逃，将不计其数的舟船甲仗白白资敌。

在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中，蒙古帝国在军事上并没有取得空前的胜绩，主要原因就是襄阳尚没能攻破。但燕京政府在各个方面都获取了宝贵的经验，它的政治、经济已经渐渐地步入正轨，入居中原后近十年的努力也已使北方的民生状况大大改善，具备了一统天下的思想和物质基础。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五日，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这是取汉家经典《周易》所谓“大哉乾元”的意思，代表着一种“本源”和“博大”之意。此后又将首都燕京改名“大都”，当九游白旗飘扬在大都宫殿之上时，忽必烈就从一位马上帝国的大汗变成了一位立足大地坐北朝南的王朝天子。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不仅是本朝太祖的高见，也是所有有志于天下者的共同意识。在登基这一天，大元皇帝忽必烈凝眸之处，一定就是千里以外的襄阳。

到了咸淳八年（公元1272年）四月，襄、樊陷入重围已经接近五年。两城之中虽然不乏粮食，但盐、布等物资业已告罄，军民困顿之态亦愈趋严重。最主要的是，援军始终不至给了守军上下以极大的压力，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面对如此情形，樊城主将张汉英决定再次向朝廷求救。五月，他招募了一位泅水高手，将蜡书藏在发髻里，头顶浮草，顺水漂下。

泅到汉水隘口时，元军守卒见水面上漂来一大堆积草，便钩之上岸以作柴薪，结果发现了藏在草下的报信者。元军由此获知了张汉英给朝廷的书信，立即在郢州、邓州方向重兵布防，使最后的一条进援之路亦被断绝。

李庭芝本已到达了郢州，由于力量有限，重点仍是放在了防守而不是进攻上。此时，庭芝也感到情况已日趋严重，绝不能再事延缓，于是立即采取了措施。他先是悄悄地将部队向襄阳附近移动，然后出重赏招募当地义勇。庭芝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这支军队不仅兵员不足，战斗力也十分有限，为了弥补缺憾，只有利用熟悉地形的当地民兵。庭芝一次就成功地招集了三千名骁悍善战的义卒，委任其中两位智勇双全的首领张贵、张善为都统，率领这支敢死队向襄阳突袭。

庭芝训道：“此去有死无生，非出于自愿者请离去，不要坏了大事。”

出乎意料的是，众人无不感奋，没有一人离开队伍。

在一个水急夜黑的晚上，这支突击队驾船出发，船中各置火炮、火枪、炽炭、巨斧、劲弓，首尾结阵，乘风而进，首先在磨洪滩与元军船队遭遇。义军击断铁絙，冲破围堵，与敌军转战二百余里，所向披靡，于黎明时顺利抵达襄阳。襄阳绝援已久，闻知援军大至，无不踊跃过望，一时士气大振，人人奋勇争先，将尾随的元军击退。在此次战役中，元军损失惨重，但义军方面也有相当死伤，张善身中四枪六剑，堕水阵亡。这是襄阳围困以来唯一一次成功的救援，但因缺乏后续攻击，也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

完成任务后，张贵犹想杀回郢州，吕文焕认为敌众我寡，此去凶多吉少，不如一起留在襄阳固守。但张贵自恃其勇，坚欲回师。于是，他先派两人泅水赴郢州向范文虎求救，约其军在龙尾洲接应，自己于九月初九告别文焕，乘夜东下。张贵此军依然英勇，一路断絙破围，奋勇向前，阿术、刘整亲率水师邀击，亦不能挡。经过一番苦战，张贵船队终于在半夜时分渐渐接近了龙尾洲。

岂料范文虎的接应之军早在两天前就莫名其妙地撤走，而元军得

到降卒密报，也已知道了张贵的计划，并在此地伏下重兵张网以待。张贵不知就里，见龙尾洲水面火光通明，以为是接应宋军，喜跃而进，结果被元军舰队迎个正着。张贵全军覆没，自己身被数十伤，力不能支，遂被擒获。张贵被俘以后，犹不失忠贞不屈的高尚节操，坚不肯降，数天后被杀。当阿朮将张贵的尸体送到襄阳城后，城内顿时一片痛哭之声。

从表面看，范文虎的逃跑直接导致了张贵的失利。但严格说来，李庭芝没有接踵其后乘胜进攻而失去了一个绝好的战机，却是襄阳之围未能缓解的主要原因。当然，也许庭芝确实有他的难处，然而张善、张贵能不惜生命以卵击石，庭芝又岂可以孤军深入为意？贪生怕死的范文虎不能为国分忧是很自然的，这种人已不足与论。而庭芝之辈自许以身委国，竟也优柔寡断不能慷慨赴难，这就注定襄阳的失守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元军最后能攻破襄阳也有几个战术上的因素，一是阿朮、刘整采取了分割击破的策略，先烧毁了襄、樊之间的浮桥以断其联络，然后力攻樊城，终于在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正月攻破樊城。樊城一下，襄阳失去依靠，遂成瓮中之鳖。第二是元军采用了新型火炮，这种火炮来自西域，威力巨大，元军以此轰击城垣，炮起郛毁。拿下樊城后，元军又以此炮转轰襄阳，使城内城垣楼阁，摧折几尽。宋军从未见过如此厉害的武器，士气大折，军心动摇，并已开始出现逾墙而降的现象。

吕文焕方寸已乱，每次巡城，总是恸哭而下。朝中贾似道接到急报，一方面假惺惺上表请行，另一方面讽使御史上章固留，依旧不以襄阳安危为意。城外宋军诸部，既无心赴援，也毫无办法可想。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二月二十七日，走投无路的吕文焕在元军的招抚下，开门投降。

虽然襄阳的失守并不是文焕的罪过，而坚守孤城五年之久，望眼欲穿一兵未至，他内心的怨恨委屈也确实不难理解。但身为饱受国恩的重兵大将，以个人情怨而抛弃宗庙社稷，这就不能令人原谅。至少樊城就是一个绝好的对照，城破之后，守军犹坚持巷战，将领如范天

顺、牛富都自绝而亡，以“生为宋臣、死为宋鬼”的豪迈证实他们对祖国的忠诚。文焕即使做不到这一点，起码也不至于入降以后就倒戈相向，自请为元军前锋去攻打郢州。也许文焕是为范文虎、李庭芝的见死不救而愤愤难平，但一个受过礼义教育的人应该懂得，国家的利益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形下都是高于一切的。也正是这一点，才可以成为是非标准最终极的试金石，古往今来的忠贤愚恶，都会在它的鉴别下泾渭分明。

襄阳的失守宛如一声惊雷，滚过死水一般的临安。

文天祥：殉国的开始

贾似道对度宗道：“臣屡请巡边，陛下不许。向使臣早出，事当绝不至此。”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越是无赖之极，往往就越能生存。尤其是在极易摒弃道德因素的政治领域内，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无论这种手段是翻云覆雨还是指鹿为马。同时，政治的目的和标准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掌握权力者各有各的意图和追求，正直之士向往真理，奸佞之徒属意私欲。既然世上的芸芸众生无法做到老死不相往来，政治就成为必需，而丑恶也就应运而生。

显然，帝国上下已经无心去探讨谁是谁非的大道理了，所以似道的荒谬既不可恨，也不可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布置防务，这是摆在眼皮底下的事情，否则就是大军一到，灰飞烟灭。

朝野上下纷纷献上守备之策。四川制置司首先发来奏报，声称获取了刘整的一批私人奏稿，其中提到了攻取江南的策略，建议朝廷早做防备。这次度宗皇帝亲眼看到了这份奏疏，于是下令在淮东清口一线筑城以备。不过，东面的元军虽然大兵压境，但却始终没有动作。

四月，汪立信、赵溍被起用为京湖制置使和淮西总领兼沿江制置使，负责西线和建康防务。六月，曾在四川任职的一位官员张梦发提

出应急三策：一是锁汉江口岸；二是扼守荆门与当阳交界的玉泉山；三是在上游峡州以下联置堡寨，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张梦发此策很实用，也极有战略价值，其核心就是加固长江中上游防备，坚决堵住元军的沿江东进。然而贾似道偏偏就压下了这份极重要的奏疏，转让京湖制置司审度。遗憾的是，京湖制置使汪立信也没有丝毫采纳，原因是这位耿介正直并还算有点头脑的人有他自己的看法。

汪立信在给天子的奏疏中一方面痛责贾似道、范文虎之流，另一方面也提出应急之策。他认为，应将内地之兵尽数遣出，汰去老弱可得五十万，相距百里而屯，如此往来游徼，刁斗相闻，既可使粮饷不绝，又能互相应援，此乃战守并用之上策。汪立信同时提出，许输岁币以缓其师，二三年后再作主张，这是中策。立信没有明言他的下策，只是在疏中愤激而言道："二策不果，则天不佑我，那就准备衔璧舆榇之礼吧。"古者国君死时口中含玉，"衔璧"即指国君战败出降以示亡国当死；"舆榇"就是载棺以随，古之士子于国亡之际往往如是，同样表示决死之意。可是汪立信有心殉国，贾似道却不想同归于尽，他见到立信的奏疏后勃然大怒，掷之于地，高声大骂：

"瞎贼汪竟敢狂言如此！"立信一目微眇，所以似道这样骂他。

立信无疑犯了一个错误。他不知道在贾似道当国的情况下，这个尽遣举国之力的做法是不可能实现的，更不是他一人所能决策的。相反，张梦发的计策属于具体军务处置，并且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立信完全有可能自我筹备而不通过贾似道。归根结蒂，有谋者无权，有权者无谋，我们的帝国焉得不败！

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七月，度宗皇帝由于纵欲过度英年早逝，年三十三岁。此际度宗三子俱幼，国事艰难，须赖长君，而建国公赵是年长，照理可以从权入继。然而贾似道单单拥立了年仅四岁的皇太子赵？，用意不言自明。初九，新帝即位，后来的庙号为"恭帝"。太皇太后临朝听政，但实际上帝国的最高权威已经不复存在。

占据襄阳后，元廷上下纷纷建议早日下诏正式伐宋。前线大将阿朮等人向忽必烈奏报道：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国可平。他们都认为，通过几年的战斗已发现宋军弱于往昔，灭宋良机正在此

时。忽必烈召来平章军国事史天泽商议，史天泽也同意大家的看法，表示混同海内的时刻已经到来。于是，大元天子忽必烈在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正月定下了决策。

当月，忽必烈就签发了增兵十万的命令，二月，又下诏在汴梁增造八百艘战船；三月，在荆湖、淮西分别设立行省，荆湖行省由老臣伯颜、史天泽并为左丞相，阿朮为平章政事，阿尔哈雅为右丞，吕文焕为参知政事；淮西行省由哈达为左丞相，刘整为左丞，达春、董文炳为参知政事。六月，正式下诏伐宋，借口是贾似道悔约祸民。这是度宗死前一个月的事情，但不清楚我们的天子是否知道了这件事情。

七月二十一日，伯颜辞陛赴任，大元天子专门谕敕道：

“古者善取江南者只有曹彬。你能做到不嗜杀戮，就是我的曹彬。”

曹彬乃本朝开国大将，取西蜀灭南唐，都能禁军屠掠、抚民安邦，曾被太祖给予甚高的评价。忽必烈能诫谕部将效仿曹彬，不管后来的实际效果如何，这位新朝天子甚有本朝太祖之风是没有异议的。

九月，元军在襄阳完成了集结。伯颜兵分两路，一路由自己与阿朮率军沿襄阳入汉水渡长江，以吕文焕为水师先锋。另一路由博罗欢率领取道枣阳陆路径取淮河，以刘整骑兵为先锋：这一战略部署具有相当的水平。

坐襄阳而望临安，无非两条路：左沿淮水南岸趋扬州，自镇江渡江取建康，由建康下逼两浙；右沿汉水下郢州、鄂州入长江，沿江水陆并进而趋江州、池州，与左路会合于建康，即可进取临安。伯颜把大军主力放在了右路，左路方面以牵制为主，战略目标是力保两路大军在江南的会师。到了这年的十二月，伯颜大军就已经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开始泛江东下，新年的正月逼近了池州。毫无疑问，较诸当年的完颜宗弼自建康奔袭临安之举来说，元军这次的攻势，在各个方面都要超过前者不啻百千倍。

一路之上，除了郢州及青山矶一带抵抗较烈外，其他宋军基本上是望风披靡。复州知州翟贵、鄂州守将张晏然、黄州守将陈奕、蕲州

知州管景模以及改知安庆军的范文虎等率皆投降。尤其是范文虎，尚未接战就主动投敌。两位有战功的方面统帅张世杰、夏贵也兵败而退，其余城镇堡寨，差不多也都被一扫而尽。元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元军沿江而下的始作俑者是刘整，因此他力请参与右路的进攻，以实现他建功的宿愿，但伯颜却把他派往了左路。刘整看到元军进展神速，而吕文焕立下头功，万分遗憾，竟至于发愤成疾不治而亡。从中可以看出的是，元军甚至包括宋廷降将的迫切心情和取胜欲望是如何的强烈。

宋室已将新年改元“德祐”。天既不庇，德又何祐？从年号上都可以看出宋廷的无奈。一直阳奉阴违的贾似道听说刘整已死，竟然也胆大起来，亲率精兵十三万出征，月底抵达芜湖。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还是立即遣使议和，可伯颜未予接受。

二月初二，起复为江淮招讨使的汪立信受命奔赴建康，在芜湖与似道相遇。似道这时已为亲眼所见的局势所震慑，见到立信竟放声大哭，表示悔不当初之意。立信十分鄙夷，冷冷而言：

“平章公，还能再骂一次瞎贼汪吗？”

似道哪里还能答话，只得讪讪而问立信此去何往。

汪立信没有正面看他：“江南已无寸土干净，吾只不过是找一块赵家土地赴死而已。总之要死得分明罢了！”言罢即去。立信最后实现了他的诺言，在来到建康后见事无可为，率部数千人北上高邮抗击渡淮元军。宋军芜湖兵溃后，立信遣散僚佐，嘱以家事，慷慨而绝。

似道不久就在伯颜大军攻击下一败涂地，其本人退居到李庭芝驻守的扬州，上书太皇太后请迁都以避，未得响应。月底，似道被同样万般无奈的临安朝廷解除了职务。三月，伯颜军进占建康，除遣军攻击扬州外，同时分兵合围临安。

大局已定。

临安城里的朝廷百官已开始作鸟兽散，纷纷出城逃逸。太皇太后在三月十九日下诏痛责接踵宵遁的大小官员，这道诏书说得倒也十分贴切：

> 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

凭心而论，本朝的士大夫并非都是无耻之辈。即从眼前来看，弃城投敌、畔官离次者有之，但急难赴义、慷慨勤王者也不在少数。关键的责任还在天子身上。正直忠勇之士既不能参与国是，那么帝国朝堂之上尽是无耻之徒也就不足为怪。太皇太后下诏切责臣子固然不失道理，但其实更应该罪责的是先帝先君。

七月，忽必烈下令在鄂州、江州的元军分兵进击，一取荆湖腹地，一取江西，配合建康伯颜军从三个方向进攻临安。同时又命阿朮继续攻击扬州，阻挠淮南宋军南下。九月，淮南元军攻克泰州，大将孙虎臣自杀殉国；南进元军也已进围常州，临安危在旦夕。

八月二十六日，擢为为兵部侍郎的文天祥从江西赣州来到临安。

文天祥本来是个普通官员，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进士第一，及第后恰逢父丧，直至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方补授为承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事。这一年，天祥曾上书请斩宦官董宋臣，但疏入不报。此后十几年里，他在朝内外先后任职，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因得罪贾似道而罢职，此后起复为江西提点刑狱事。天祥在朝中虽没有太大的影响，但他的声名仍很卓著，当年殿上试策时，天祥不为草稿，洋洋万余言一挥而就，理宗皇帝亲拔为第一。考官王应麟评价道：“此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这句话同样也可以用来形容天祥的道德节操。忠臣节士绝不是一日养成的，文天祥也同样如此，只不过此前尚未表现出来而已。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正月十三日，天祥接到了去年七月太皇太后所下的征兵勤王哀痛诏和召他入赴临安的别旨，立即招募义士，并自出家资助军，三天后就在江西起兵，并且克日就道直奔临安。然而到了吉州时，沿途的不少守将却十分不满他一力出击的激进态度，向朝廷诬报天祥此军乃乌合之众，不堪大任，宰相陈宜中于是下令不许前来行在。后来出于舆论的压力，朝廷虽然终于批准天祥入卫皇驾，但这已经使他在外耽搁了近三个月的时间。

此时临安朝堂中差不多已经空无一人。原先的两位宰相陈宜中与王爚因意见不合都先后离去，直到十月份，陈宜中才响应诏命回朝，与留梦炎同时入相。天祥来朝后，随即建议重新布置政治军事，主张将境域划为四大区域，各个集中兵力以抗敌锋。这本来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应急方略，但朝廷议论下来，却认为过于迂阔。从这件事反映出来的情况看，朝廷决策层显然已经非常矛盾，既想守住最后防线，也有就此投降的意思，否则如何对主动应战之策给予“迂阔”的评价？要想在这种危急时刻力挽狂澜，只有死战到底一条路可走。方法虽不是主要问题，但斗志可鼓而不可泄，如果此际上书言战犹还遭受指责，那实在也就无事可为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十一月元军攻破临安正面的屏障独松关后，朝廷已经手足无措，只有选择乞和之道。文天祥所提出的以目前残存三四万勤王兵与敌一搏的主张，更不可能得到陈宜中等人的首肯。十二月，临安正式派遣工部侍郎柳岳出使求和，但伯颜未予理睬。元军打到平江府后，陈宜中再遣柳岳径赴大都求乞，走到高邮时为民众所杀。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初，临安大内慈元殿上，文官只剩下了六七个人。此刻，太皇太后方才接受了天祥的主张，派遣诸王分赴福州、泉州。这虽然出自保存宗脉的考虑，但客观上却也达到了分镇境内的目的。否则，临安一陷，帝国也就寿终正寝了。

太皇太后虽是一介女流，但在关键时刻倒还有些倔强。大臣日请东走，她就是不答应，似乎也有点与临安共存亡的想法。不过，太皇太后尽管不失勇气，但仍然不敢死战，数度拒绝了文天祥与另一位领将张世杰召义兵背城死守的建议。可见她或许还是对敌人抱有一线希望，至少幻想着能够以不惜屈辱奉表称臣来逃避灾难。但是，她本人也许可以全首退处，我们的帝国怎么办呢？

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十八日，太皇太后派监察御史杨应奎奉国玺降表向伯颜无条件投降。伯颜接受降表，要宋廷宰相来营商议具体事宜。当夜，陈宜中就逃往温州，张世杰也退走海上。其他宰执无人愿意出面，天祥只有出来主持残局。但他辞去了宰相衔，而以资政殿学士的旧职出使，想在最后时刻保留一些帝国的颜面，用心可谓良苦。

天祥一去就被拘执，并被伯颜送往北方。所幸在三月初一走到真州时，借机逃离了虎口。同时，伯颜进驻临安，将宋室幼帝及皇太后全氏等皇族遣送燕京，唯有太皇太后以疾暂留。

崖山海战：最后的悲壮

至此，大宋帝国差不多就可以说走到了尽头。

三百年的岁月两分天下，一分归于东京，一分归于临安。由此看来，王朝兴衰并不完全系于地域之多寡，就是与外敌是否强大似乎也没有决定性的联系。历史虽不乏机遇巧合，但所有震天动地的变故背后也都能找到一些必然。因此，一切的一切都在于我们自身。所以回首往事之时，实在也用不着悲哀。惆怅因缘、喟叹世事从来都是懦弱者的表现，真的勇士，就必须抛弃无谓的空想，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用一点一滴的努力去重塑自我、再造乾坤。说实在的，我们的帝国就是因为缺乏实干的精神土壤，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尽管灾难唤醒了沉睡，但毕竟是太晚了。

太皇太后嘱使南行的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分别只有七岁和四岁，在禁兵保护下经过千辛万苦，于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闰三月到达温州。第一批闻讯赶来的大臣有礼部侍郎陆秀夫和殿前指挥使苏刘义，接着宰相陈宜中和少傅张世杰分别从清澳和定海被招至两王行营。这一条逃奔路径几乎就是当年高宗皇帝走过的老路，温州江心寺里尚还保存着南奔时的御座，众人在此会面，免不了大哭一场。收泪之后，一致推举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副之，发兵除吏，传檄天下，并准备开赴入闽。其过程似乎也与当年高宗在应天受命危难时同出一辙，但此际时势已有根本不同，他们显然也不会再有高宗那样的运气。

文天祥从真州脱逃后本无意南下。当时扬州及所属高邮、宝应、真、通、泰州等仍在拒守，因此淮南尚有可为。天祥先是分别联络李庭芝和夏贵，试图举兵以兴恢复。但此时夏贵已经降敌，而李庭芝得

书后却不相信天祥真能从敌营脱逃，反而谕使部下杀掉天祥。于是天祥只有转奔扬州，由于庭芝下令防区戒严闭城，天祥至城下而不敢进，又转去高邮。途中迷路，几被元军擒获。历经艰险，方于三月二十四日到达通州，巧遇商船，遂偕入海，四月八日到达温州，立即上书劝进。国不可一日无主，在天祥看来，只要天子仍在，帝国就仍有希望。

五月一日，赴难众臣拥益王登极于福州，改元“景炎”，史称“端宗”。七岁儿童当然无法主持政务，因此国事皆决于陈宜中。文天祥则辞去相位，外赴江西，经略帝国腹地的抗元战事。在元军紧逼之下，福建行营一再南迁，自十一月起，陈宜中等不得不奉驾入海，在泉、潮、惠州一带辗转漂泊，完全就是苟延残喘，不仅谈不上振作恢复，即使谋求容身之地似乎也不可得。

只有文天祥以他的报国热诚和急难精神，给疲敝的帝国重新鼓舞起一些斗志。他于这年的七月到达南剑州，开设督府，传檄起兵，一时福建、江西两地云起响应。元军数路进击闽、广使形势恶化以后，天祥在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初转战到漳州及梅州一带。五月，又引兵越岭复还江西，终于在江西掀起一场抗战高潮。先是进入会昌，进击雩都，取得大捷；此后在六月进入兴国，七月进至赣州城下。与此同时，其部下各军连克江西四县，声威所及，达于江北、淮南，各地起兵者纷纷不绝。

整个帝国腹区，包括江北、淮南甚至巴蜀，仍然还存在着相当规模的抵抗力量。然而星星之火欲成燎原之势，非有强大的号召力而不能成。流亡朝廷已远在海上，根本不能担负鼓舞天下的重责，所以文天祥奋而跃起，四方顿时响应。但是暴风骤雨来之既快，去之亦急，关键是天祥的力量实在是微弱而不足道。各地相互支援的通道早被元军切断，初看起来似乎四方旌旗犹在，但其实是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因此天祥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就仅仅局限在表面的影响而已。

元军在这年上半年进攻缓慢是由于北方出现了一些变故，但从七月开始，又加紧了对江西、两广的围剿。元将李恒亲率大军入援江西，直趋文天祥而来。天祥没有料到李恒进兵神速，仓促应战，结果

全军覆没，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尽遭毒手。时间是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的八月十七日。此后天祥退走汀州，收拾残部，屯兵于南岭。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二月，天祥又转至潮、惠，探访朝廷下落。

与此同时，元军翻越大庾岭向南追击流亡宋廷，迫使端宗行营一再迁徙。

在逃亡路上，众皆惶惶失态，独有陆秀夫仍然朝服持笏，不以风尘仆仆为意。但秀夫有时悲从中来，潸然泪下，竟能将一袭衣袍尽数染湿。左右观之，无不恸哭失声。就这样，帝国的末代朝廷在一路清泪中走秀山、赴井澳，奔山入海，仓皇逃窜。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四月，年幼的端宗殂于硇州，时年十一岁。天子一死，众臣多欲散去，陆秀夫厉声而言：

“度宗一子尚在，如何能弃而不顾！古人有一旅成中兴者，今百官具备，士卒数万，若天不绝宋，岂非一国？”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种愚拗，但也是一种挚诚，在危急存亡之秋，这更是一种超绝的精神，绝不可以不名事理而一笑置之。在秀夫的鼓励下，留守众臣再拥赵昺为帝，改元“祥兴”，这就是大宋的最后一代天子。说实话，从恭帝开始，就已经无法再在宗庙中为自己找到一个位置了，因为宗庙社稷早成瓦砾。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后人实在也无法称呼这位末代皇帝，只能直呼其名，称之为“帝昺”，这也就是亡国之痛中的一端。六月，行营再迁至新会县厓山时，天祥终于得以和陆秀夫接通消息，但两人互读书信，也只有长叹而已。此时陈宜中已遁走，天子身边也只有陆秀夫和张世杰两位辅臣。厓山在县城以北八十里的大海之上，张世杰认为有天险可守，入山伐木，大造行宫，存储衣粮，整理战备，准备建立一个海外小国。如此一来，这个流亡朝廷除了延续宗脉的作用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十二月，文天祥在海丰五坡岭突遇敌军，吞毒未死，被元军所执。第二年正月，主持两广军务的元军大将张弘范由潮阳港入海，探听到帝昺在厓山的消息，立即扬帆而至，但

在海上却无奈张世杰。最后李恒军从广州赶到，与弘范合力围打孤岛厓山，终于在二月初二击溃世杰之军。

正是日暮时分，世杰大势已去。他来到帝昺居所，欲携天子乘舟逃遁。陆秀夫认为此去未卜，不愿帝国天子再遭凌辱，坚不同意，最后背负帝昺跳海而亡。

陆秀夫的舍身求义和威武不屈，谱就了我们帝国最后的辉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感到了亡国之恸，第一次真正体察到为异族战胜的耻辱。泽畔之吟，出于憔悴；穷途散发，岂效嵇阮。严格地说，这一次的痛楚和悲哀是前所未有的。在慷慨就义的悲壮中，在凄怨不甘的无奈中，在眺望故国家园和精神故乡中，最后一代的帝国臣民用心血写下了一部动人心魄的心史。

文天祥最后被押解至大都，元廷上下极尽威胁利诱，亦未能使之丝毫屈服，三年后被杀，时年四十八岁。他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这部心史的最好写照。

大宋王朝灭亡了，对自身文化过分的自信和依赖使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血泪痛苦。但是，第一次被异族统治的中国却像一所被人打开了大门的学校，以无与伦比的灿烂文明和博大胸怀教育和融会了所有走进这个光辉殿堂的人，达成了前贤古哲殷殷期盼的“来中国则中国之”的理想目标。“厓山之后无中国”是囿于族类的庸人之见，此辈既难理解“天下一家”的至上情怀，也不了解历史的真相，更不知道其实正是宋代的独特精神，奠定了中国从此以后的长期统一和稳固。

汉唐以后不再有汉唐，但宋以后中国却永远是中国。

初版后记

本书是《日落九世纪——大唐帝国的衰亡》的姐妹篇。

尽管两书的构思、起草几乎可以说是同时进行的，但直到《日落九世纪》竣稿近一年后，本书才终于得以完成。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本人的学力和才识实在有限，面对史料繁富、异见纷纭、号称难治的宋史，每每有力不从心之感。实际上，为了寻找对宋朝历史的真切感受，在已经完成本书总体框架后，我又不得不将主要的宋史典籍重新阅读一遍，然而结果却是既未能解决旧有的未知和疑惑，又使我更加迷茫而不知所措。虽然人们常说“前人未必是，后人未必非”，但最后的成稿中这许多矛盾武断、疏陋浅薄之处，却无疑还是本人力不能逮的结果，尽管我深深地知道历史并不可能有一个最后的结论，就像真理永远不可能被完全接近一样。

另外，有一个问题也使我时常停笔深思，那就是：探究学术的目的究竟何在？贤者谆谆：小而言之，是为经世致用；大而言之，是为道德人心。可如果固守在象牙塔中寻章摘句，老死于雕虫之业，似乎与此相距甚远。而为了博取职称、地位以证明自己的高雅，则更与原则所提出的要求有着天壤之别。闵予小子，道行疏浅，但却也不敢效仿那些沾沾自喜于雕琢琐碎的衮衮诸公们，我敢说他们不仅是忘记了学术的崇高责任，而且根本就缺乏承担道义的智慧与力量；此辈鄙视奔波红尘的芸芸众生，可他们本身的功利之心却比任何人都要来得强烈。可悲的是，本人虽不惮于堕入错解经义的野狐禅，但却自感无力去抗拒正统力量的狮子吼，所以不免于低首踟躇、辗转反侧，在迷途中彷徨徘徊。这个难题不仅现在让我困惑，也许还将继续使我困惑下去。

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偶然。假如十三年前不是信笔涂抹了一张表格，假如九年前不是凭着少年意气而孜孜追求，假如七年前的那个炎热难捱的夏天能够离乡远去，假如五年前的那个繁星闪烁的秋夜能够果敢选择，我就绝不会有今天的困惑与苦恼。也许命运本就是一个充满着迷茫和痛苦的过程，每一次十字街头的彷徨都决定了一生的无奈，这些无奈交织在一起，便使我们无法回头，只有面向未知的前方，行行复行行。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保持体例的同一，我不得不忍痛删去了近百条注释。因此许多参考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地方，未能得到应有的说明。我愿意借此机会向各位前辈大师和海内外当代学人，如王云五、钱穆、范文澜、邓之诚、陈登原、唐圭璋、侯外庐、谭其骧、程千帆、朱东润、聂崇岐、金性尧、陈乐素、韩儒林、邓广铭、漆侠、朱瑞熙、程应谬、沈起玮、张家驹、郦家驹、周宝珠、王瑞采、蔡美彪、姜书阁、范寿康、曾枣庄、顾吉辰、徐远和、任崇岳、张邦炜、陈植锷、吴松弟，以及刘子键、李则芬、林天蔚、张峻荣、萧启庆、加藤繁、费正清等诸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没有他们近乎完美的研究成果，我将一事无成。另外，同门学长巩本栋兄的《北宋党争与文学》、严杰兄的《欧阳修年谱》、程章灿兄的《刘克庄年谱》、张宏生兄的《江湖诗派研究》等著，也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在这里一并向他们表示谢意。

我还要向业师周勋初先生致以诚挚的感谢，没有他的鼓励和教导，我是没有勇气再去修改和完成这部狗尾续貂之作的。同样我还要把这本小书献给业已荣退的卞孝萱师，借此感谢他长期以来的关怀和教诲。

本书原拟名为《西风碧树——大宋帝国的衰亡》，出版社出于更为切题、发行征订以及能为更多的读者一目了然的动机，确定了现在这一书名。虽然差强人意，但鉴于如此多的现实理由，这或许也无妨是一个选择。

乙亥仲夏，作者识于金陵城西